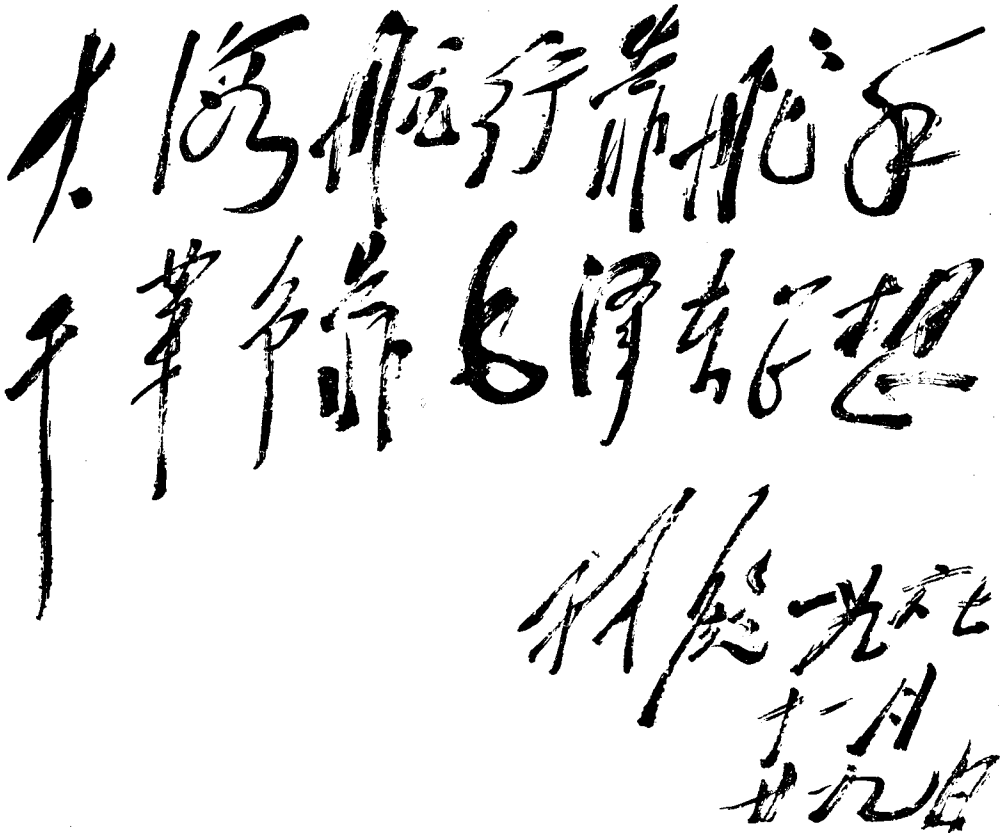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万岁

内部文件　严禁外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目　录

第一师范講堂录（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1
讀“明耻篇”后題詞（一九一五年）……1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1
工人夜校招生广告……2
夜学日記（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2
新民学会的方針（一九一八年四月）……2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
　同学时的談話（一九一九年初）……3
湘江評論
　創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3
　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0
　增刊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5
　第三号（一九一九年十月廿八日）……19
民众的大联合（一）（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一日）……20
民众的大联合（二）（一九一九年七月廿八日）……22
民众的大联合（三）（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24
問題研究会章程（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26
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30
新民学会会員通訊集（一）……33
新民学会会員通訊集（二）……37
新民学会会員通訊集（三）……43
非自杀（节录）（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48
驅逐张敬尧文电（一九二〇年一月）……49
发起“文化书社緣起”（摘录）（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49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50
“湖南自治运动”应該发起了（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51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現状証明之（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51
湘人为貪吏卖矿呈总統府
　及国务院外、财、农商三部文（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七日）……52
致湖南省警察厅的公开信（摘录）（一九二〇年十二月）……53
文化书社第二期会务报告（摘录）（一九二一年四月）……54
怎样去做才有眞正的劳工团結出現？……56

新民学会一次討論記載（一九二一年一月）……58
給楊怀忠先生的信（摘录）……58
湖南自修大学創立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59
告中国农民书（一九二一年）……60
上工宣言……61
长沙鉛印活版工合致“大公报”
記者盾（李抱一）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61
《省宪法》与赵恒惕……62
紙烟税……63
英国人与梁如浩……64
湖南自修大学組織大綱（一九二三年四日十四）……65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須知……68
外力、軍伐与革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69
《新时代》发刊詞（一九二三年）……70
少年中国学会改組委員会調查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71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場
日刊发刊詞（一九二五年十月二五日）……71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五年）……72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
改組委員会調查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3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爭宣传大綱……73
政治周报……76
反攻（一）……77
反攻（二）……79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
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81
反攻（三）……83
宣传报告……84
中国农民中各阶級的分析
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89
中国社会各阶級分析（一九二六年）……92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六年一月）……96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
民党中央对該报的处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99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00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
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102

視察湖南农民运动給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103
湘省各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議案（一九二八年十月廿五日）……104
紅軍第四軍六次代表大会决議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109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一九二九年六月）……109
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
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110
命令（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113
反圍攻时給紅軍的动員令……113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一九二九年）……114
中国共产党紅軍第四軍
第九次代代大会决議案（一九二九年）……114
总前委代表毛泽东
給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8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129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130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結（一九三三年）……133
乡苏維埃怎样工作（一九三三年）……140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
与人民委員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
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144
中国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一九三四年）……147
关于日本声明书談話（一九三四年下半年）……149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結决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150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命令……150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54
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160
致蔡元培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160
給张学良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161
关于停战抗日的談話（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16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162
致蔣介石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163
給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164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講演（一九三七年）……165
命令（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166
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67
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則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184
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爭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185

《农村調查》序言（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185
在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說（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186
基础战术……187
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訓詞（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213
和美国記者貝特兰的談話补充（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214
給抗大九队同志的信……214
加强政治教育与体育活动給項英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215
与延安新中华报記者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二月）……215
与合众社記者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二月）……223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綱領……225
在紀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日陣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說詞……227
对新四軍进行游击战的指示……229
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滿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
之談話（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229
論新阶段（节选）（一九三八年十一日）……232
八路軍軍政杂志发刊詞（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233
《論持久战》英譯本序言（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235
中国軍队应当学习苏联紅軍（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235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講話（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239
抗大三周年紀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239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240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綫上（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241
在延安模范青年給奖大会上的講話……241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241
反投降提綱（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243
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講話……262
中央軍委关于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五日）……262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263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講演提綱（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263
研究淪陷区（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269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270
在延安紀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272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吳玉章
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詞（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273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覽会
开幕典礼上的講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273

强調团結与进步（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274
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一九四〇年二月）……275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276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講話（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277
在边区中央局經济自給动員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277
讀防扒手（一九四一年五月廿三日）……277
謠言与烟幕（一九四一年五月廿八日）……278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議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280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280
中央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282
“曾忠才长征記”一文按語（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283
“文化課本”序（一九四一年）……283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283
广播講話（一九四一年）……284
贈給王观瀾同志的一段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285
庆祝苏軍二十周年（一九四二年）……285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談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286
“整頓学风、党风、文风”的补充……286
“反对党八股”的补充（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287
給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288
关于統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領导及調整各組織間关系的决定……288
历史的教訓（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292
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維克化十二条（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294
电賀苏联紅軍第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304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問題（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304
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态度問題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306
关于批評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談話”的一封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307

第一师范讲堂录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修身。人情多耽安佚而憚劳苦，懶惰为万恶之淵藪。人而懶惰，农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学，业卽廢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矣。因而懶惰，始則不进，継則退行，継則衰弱，終則灭亡，可畏哉！故曰懶惰万恶之淵藪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軍。策羸乏之兵，当新羈之馬。如此欲图存而不亡，非奋斗不可。

朝氣。少年須有朝气，否則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讀《明恥篇》后題詞

（一九一五年）

毛主席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間，讀了当时很多进步书刊。当他看了《明恥篇》以后，**义憤**填胸，亲自揮笔在书上写道：

“五月七日，
国民奇恥；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这十六个字充分表現了主席青少年时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的雄心壮志。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一九一七年）

长沙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向新潮方面走的，实在不少，又因近年来屢受軍閥派的摧残，弄得长沙这錦綉的地方，常常沒有一点生气，于是一般稍有知識的人——各校教职員及学生——莫不深深痛恨。更覚得这《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問題万不容緩。

工人夜校招生广告

列位工人来听我們說几句白話：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話說的：講了写不得，写了訊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現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設的，从禮拜一起到禮拜五止每夜上課两点鈡，教的是写信，算帳，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講义归我們发給，并不要錢，夜間上課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請赶快于一禮拜內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說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們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講牌一块，遇有軍警查問，說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們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躭擱。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夜学日記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片断

甲班上課算术罗宗輸出席教以数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拉伯数字碼，历史常識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四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暫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課，管理者李端綸、蕭珍元。

实驗三日矣，覚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減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語（介乎白話与文言之間），常識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講义宜用白話，簡单几句表明，初不发給，单用精神講演，兼取講义略讀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覚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几人之多，此則宜逐漸加深。

新民学会的方針

（一九一八年四月）

1918年4月毛泽东同志团結湖南进步青年，組織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后来在传播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动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学会的方針問題。我們学会到底拿一种甚么方針做我們共同的目标呢？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議，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針說：“大家决定今后进行之方針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針，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的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触和观察，我們多数的会友都傾向于世界主义，試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某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覚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員，而不愿意更复杂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講話

（一九一九年初）

我覚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問拿回来，改造我們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問題。我覚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間花費在本国，則对本国更为有利。

湘　江　評　論

創　刊　宣　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遑取的方法。多說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絕大的問題。从这个問題。加以研究。我深了“应該那样生活”“不应該这样生活”的結論。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

見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見于文学方面。由貴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学民的文学。現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見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議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沒限制的选举。見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級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見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

見于經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見于思想方面。为实驗主义。見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兌莫克拉西。——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經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两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两种方法。我們应有一番选择。（一）我們承認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类。濫用强权。是他們不自覚的誤謬与不幸。（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結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約”战爭。我国的“南”“北”战爭。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寻着什么眞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續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沒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們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課。罢市。罢工。排貨。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間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見。他們的政治沒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爭。他們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般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獄。待学生如囚徒。他們的产业沒有开发。他們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学好了学問和艺术。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余地。閉鎖一个洞庭湖。将他們輕輕挡住。他們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飯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納异材。他們的脑子貧弱而又腐敗。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沒有提倡。他們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沒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識新艺术启导他們。咳！湘江湘江！你眞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动了。且开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业已奔騰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們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西方大事述評

各国的罢工风潮

法英美三国的官閥和財閥，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敗北的德奧，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們的国內，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們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財閥，虽然不敢十分輕視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

归，种种怨憤不平的問題，联合同类，憤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給他們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餓，看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給他一个餅子。但終是杯水車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見識。从老虎口里討碎肉，是不能够的。

此回各国的罢工风潮，英国因为在大战初了时候，（去年十二月）英倫加苏格兰各埠交通机关，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等已演了一大罢工。故此次罢工，未发生于英倫本土。法国罢工情形，初頗严重。終亦以小惠收場，沒闹出什么好結果。广义派人有乘机在巴黎实行政治运动之說，亦未見諸事实。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話人員的罢工，乃在附和議員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意大利之罢工乃社会党嫉恶其政府所为的一种运动。德国自去冬少数社会党大失敗，各处大罢工，亦隨之而沒得好結果。多数社会党掌握政权以来，早已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此次为和約签字問題，有激起罢工的形势。但施特滿內閣倒了，繼任巴安內閣，仍是前內閣的同調。抵御外侮不足，防备家賊有余的武力，緊握在手，誰敢予侮。广义一派的猛断政略，暫时决沒有发动的机会。罢工不能成为事实，亦无足怪。匈牙利所受罢工影响不大，其原因則全在缺粮沒飯吃。今将一月以来各国罢工情形，分述于下——

法国　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賦閑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四日蔓延更广，推算当有五十万人罢工。五日，洗衣工人罢工。自后罢工的人数更多。地底鉄道，电車，街車的用人决議繼續罢工。地底鉄道工人要求工值每月至少四百五十佛朗。（以每佛朗当四角合我一百八十元）滿五十岁須給养老金。服役十五年后亦須給养老金若干。七日巴黎罢工現象有轉机，五金业与机器业，工人与僱主，已商妥数事。十一日，五金业及地底鉄道工人上工。当道已取必要方法对付鉄道罢工。煤矿工人有全体罢工的形势。十二日，国会通过矿工每日工作八时議案。但矿工会議，仍不滿意，决定从十六日，全体罢工。水夫联合会，也决計于十六日罢工。工人联合会，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記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貴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朗。）謂非洲各口岸，堆集麦粮千百吨，任其朽腐。各埠存貨如山，輪船火車，宁閑置不运載。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騙，和垄断！十四日，风潮漸平。极端派有乘机推翻克勒滿沙强权政府的运动。路工联合会拒絕之。但矿工因解释政府每日工作八小时議案，未能滿意，定十六日全体罢工。恐怕路矿运輸联合会工人，也会罢工，表示同情。克勒滿沙老头子急了，和运輸公司及运輸工人代表会商，恳請彼等在国家危机时候，发出些爱国热忱。工人吃了他的浓米湯，已老老实实决議上工了。

英国　倫敦五月三十日电，全国警察拟于三日罢工的气象，正在酝酿中，政府已允增給薪資，优加待遇。但不承認警察联合会及收用已革除的警察。英国的属地澳洲，坎拿大，苏依士，皆有罢工风潮。六月四日，坎拿大維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六月五日，苏依士运河工人罢工，局势狠恶，六月九日，澳港航务罢工，势头狠烈，各項工业，都受窒碍。十×日，风潮仍严重，他业工人，因此賦閑的逐日增多。

美国　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員联合会一时罢工，共約六万人。內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員联合会。該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計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話司員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員。八日，电报人員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員宣布，連收发电报生在內，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統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贊

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員罢工沒成。

意国　六月十三日，意大利斯貝齐亚地方，因粮食昂貴，发生暴动，搗毁商店。十四日，热那亚工界示威，被捕者数百人，銀行商店閉門，电車不走。杜林工人此日多停工，紀念德国斯巴达团領袖卢森堡氏。米兰工人罢工，抗議热那亚与斯貝齐亚当道的行动。

德国　六月十三日，大柏林公民会議秘密会，决議罢工。各职业及軍界中人，均贊助停止各項实业工作的計划。有人料此举将促成国內战爭。中等社会将得政权。

匈国　五月三十一日，匈京飢餓的工人，发生暴动。紅旗軍奉共产政府命令到各工厂制乱。匈京几无粮食。

东方大事述評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新世界被捕。被捕的原因，据警厅方面的布告，系因这日晚上，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密探拘去。到警厅詰問，方知是陈氏。今录中美通訊社所述什么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于下——

一、取消欧战期內一切中日秘約。

二、免除徐树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段芝貴王怀庆职。并即驅逐出京。

三、取消步軍統領衙門，及警备总司令。

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組織。

五、促进南北和議。

六、人民有絕对的言論出版集会和自由权。

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乃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順民意，則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上文是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我們看了，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处。政府将陈氏捉了，各报所載，很受虐待。北京学生全体有一个公函呈到警厅。請求释放。下面是公函的原文——

警察总监鈞鑒，敬启者，近聞軍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两要点于下：（一）陈先生夙負学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称于国內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瀾。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計。（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現代思想見异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誠恐国內外人士，疑軍警当局，有意罗織，以为摧残近代思想之步。現今各种問題，已极复杂，豈可再生枝节，以滋糾紛？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請貴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北京学生又有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鎮。忽于眞日被逮。住宅亦被抄查。群情无任惶駭。除設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上海工业学会也有請求释放陈氏的电。有“以北京学潮，迁怒陈氏一人，大乱之机，将从此开始”的話。政府尚未昏憒到全不知外間大事，可料不久就会放出。若說硬要兴一文字

獄，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拚一死战，吾想政府也沒有这么大胆子。章行严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館长及研究所邏輯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給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轉达警厅，立予释放。大要說——

……陈君向以講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獄，視若囚犯，至断絕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詎可忽兴文緜，重激众怒。甚为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龔心湛一函。說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結念为劳。茲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聞因牽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詳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講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論，或不无过甚之詞，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則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詎可蹈覆講之殊，师监謗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論，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獄。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无解，政紐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試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鑒，可为寒心。今日謠琢萦兴，清流危惧。乃遽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眞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漸防微，用敢望諸当事。且陈君英姿挺秀，学貫中西。皖省地綰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誠歎难能。执事平視同乡諸賢，諒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請即飭警厅速将陈君释放。剑与陈君总角旧交，同衿大学。于其人品行誼，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証。……

章士剑拜启　六月二十二日

我們对于陈君，訝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說的話，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謂危險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訝有个人，不訝有自己，不訝有眞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結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則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結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賽因斯"（科学）和"免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报給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敌了！凡思想是沒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領卢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紀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給他做紀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損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輝远大。政府决沒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說过，出实驗室，即入监獄。出监獄，即入实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夸驗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世界杂評

强叫化　前月的初間，日本米价頂貴时候，每石超四十元。日当局有狼狽之状。报紙証言粮食的危机已迫。可怜的日本！你腸将飢断，还要向施主逞强。天下那有强叫化續得多施的理。

研究过激党　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謀，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說，則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閉着眼睛，只管瞎說，"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絕"等等的空話。一光眼，过激党布滿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沒得走处了！

实行封鎖　前月巴黎高等經济会議議决，实行封鎖匈牙利，說理直到匈政府宣言遵从民意时为止。这要分两层观察，一、协約国看錯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級，紳士阶級，志願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級，平民阶級，沒有志願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們所組織的。二、实行封鎖，这是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吾恐怕协約国也会要卷入这个漩渦。果然，則这实行封鎖，眞是"罪莫大焉"了。

証明协約国的平等正义　德国复文和会，要求德国陆軍减少之后，协約国也須同减。这話誰人敢說錯了？协約国滿嘴的平等主义，我們且看协約国以后的軍备如何？就可求个証明。

阿富汗执戈而起　一个很小的阿富汗，同一个很大的海上王英国开战，其中必有重大原因。但据英国一方面的电传，是靠不住的。土耳其要被一些虎狼分吞了。印度捨死助英，賺得一个紅巾照烂給人出丑的議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沒得允許。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阿富汗是个回教国，狐死兎悲，那得不执戈而起？

来因共和国是丑国　协約国要划来因流域为自己挡敌的长城，必先使之脫离德国的关系，别成一国。听說已在威薩登成立临时政府，一位道登博士做总統。这位道登博士不知果然高兴到甚么样？金人立了刘豫，契丹立了石敬塘，我們中国也曾有几个这样的国呢。

好个民族自决　波兰捷克复国，都所以制德国的死命，协約国尽力援助之，称之为"民族自决"。亚剌伯有分裂土耳其的好处，故許他半自立。犹太欲在巴力斯坦复国，因为于协約国沒大关系，故不能成功。西伯利亚政府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績，故加以正式承認。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議承認。朝鮮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們認为直是不要脸！

可怜的威尔逊　威尔逊在巴黎，好象热鍋上的螞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滿了克勒滿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盜。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賠若干金錢。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見的种种会議。有一天的路透电說："威尔逊总統卒已贊成克勒滿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的意見"。我看了"卒已贊成"四字，为他气悶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炸弹暴举　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

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貼說，“阶級战爭”业已发生，必得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員的住宅，屋頂上发現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望牽官員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們晚上如何睡得着？議院里一些錢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議員，还在那里痛詆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訴諸位，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飯，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們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不許实业专制　美国工党首領戈泊斯演說曰，“工党决計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許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越发达，要哭的人越多。戈泊斯的“不許”，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許”，即是好現象。由一人口說“不許”，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說“不許”，由低声的“不許”，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許”，这才是人类眞得解放的一日。

割地賠償不两全　德国答复协約国，說，如失去西里細亚及薩尔煤矿，則无力行賠償。我料协約国听了一定很煩脑。何以故？地可割，賠償也可得，最为两全。据德国的說，两样便成了反比例，如之何不煩脑？虽然，奉劝协約国的哀哀諸公，天下那有两全的好事！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　奥总代表任納博士答复和会，說，“奥国今已坐食其較前大減之資本，若再加以摧残，必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蠢哉任納博士！你还不知道协約国一年以来之眞目的，你专为造成社会党流血之地嗎？

彭斯坦　德博士彭斯坦演說曰，“媾和条件，乃野蛮战爭的結果，德国最宜負責，和約条件十九为必要的”。我們固然反对协約国的强迫和約，但博士这話，系专对野蛮战爭而发，听了倒很爽快。

各国沒有明伦堂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馬路，要拆毀明伦堂，发了肝火。打电給岭伍，斥为“侮圣灭伦。”說，“遍游各国，未之前聞”。康先生的話眞不錯，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什么是民国所宜？　康先生又說，“强要拆毀，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嗎？

大略不是人　邓鏡在新国会云，“尊孔不必設专官，节省經費”。张元奇云，“內务部祀孔，由荼房录事办理，次长司长不理，要設专官。”內务部的荼房录事，大略不是人。要說是人，怎么連祀孔都不行呢？我想孔老爹的官气到了这么久的年載，諒也減少了一点。

走崑崙山到欧洲　张元奇又說，“什么講求新学，順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尊孔逆挽潮流。”不錯不錯！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楊子江里的潮流，会从崑崙山翻过去，我們到欧洲的，就坐船走崑崙山罢。

湘江杂評

好計策　一个学校的同学对我說，我們学校里办事人和教习，怕我們学到了他們还未学到的新学說，将图书室看×了。外面送来的杂志新聞紙和书籍，凡是稍新一点的，都沒得見。我听了为之点首叹服。他們的計策眞妙！岂仅某学校，通湖南的学校，千篇一律都象联

了盟似的。

摇身一变　一些官僚式教育家，为世界的大潮卷急了，不提防就会将他們的飯碗冲破。摇身一变，把前日的烂調官腔，輕輕收拾。一些眞有所感而改变的，很可佩服。一些則是假变，容易露出他們的馬脚。这类人我很为他羞！很为他危！

我們餓极了　我們关在洞庭湖大門里的青年，实在是餓极了！我們的肚子固然是餓，我們的脑筋尤餓！替我們办理食物的廚师們，太沒本錢。我們无法！我們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們餓极了哀声！千万不要看錯！

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　一个女学校里的办事人，把学生看做文契似的收藏起来，怕他們出外見識了甚么邪样。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們寓目。此次惊天动地的学生潮，北京的女学生聚訴新华門。貧儿院的小女孩子，愿到监獄替男学生抵罪。这个女学校的学生独深閉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象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

哈哈！　青島問題发生，湖南学生大激动，新剧演說，一时风行。有一位朋友对我說，一位老先生，因为他的儿子化装演剧，气得了不得。走到学校問先生，开口便說，"我的命运如何这么乖？养大的儿子竟做出那么下流事"？我听了这話，忍不住卟的一声，哈哈！

女子革命軍　或問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什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竪那招摇畏风的鬟？女子腰間偏要紧縛那拖泥帶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鬟长裙，是男子加于他們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飾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獄，痛之不敢声，閉之不敢出。或問如何脫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軍。

第　二　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

西方大事述評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約

签約之前：敗而不屈的德意志的代表兰超等于（五月初旬）到巴黎。（五月七日）在凡尔賽宮举行很庄严的和約交付礼。德代表的态度很倨傲。克勒滿沙站起声述其开会詞。德总代表兰超，則坐誦其如下之演說詞——

德国軍事破裂，德国失敗的程度，自己明白。但这回欧战，負責的不仅德国，全欧都与有罪。因五十年以来，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实貽毒于国际局势。德国战中的罪行，固不可諱，战事的时候，人民的天良，为感情所蔽，故有罪行。然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德国沒与战事的人，多死于封鎖的影响，协約国亦冷淡視之。威总統十四条大綱，为全世界所贊助，协約国业已声明依照此項大綱而立和約，那么，德国当不致于全沒救护。国际同盟，各国都許加入，不能将德国丢在外边。德国愿以好意的精神，研究和約。……

和約为灰黃色封面一大册，和会秘书长杜斯瑪，捧了交到兰超手中。兰超回到寓舍，晚

餐的时候，默无一言。晚餐毕，即使人翻譯和約，于晨間三点譯成，送到兰超寝室。兰超看到天明方毕。另外录出几份，派专差送到柏林。八日德內閣会議許見。

內閣总理施特滿，向考虑协約委員会演說——

和約条件，簡直是宣告德国死刑。政府必以政治的沉靜态度，討論这可厌而狂妄的公文，……

随将和約条件，电告各联邦政府，請他們表示意見。因为感受很深的痛苦，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許剧院演唱和这痛苦极沒相同的悲剧。股票交易所，因感受痛苦的印象，停閉三日。各界人士听得和約会要签字，皆为作怒，群相討論拒絕签字的后患，甚至沒有一人想到或可受納此項条件的。柏林各报一致詆訾，有的說，“和約的苛刻远过最消极的預料，这系狂暴无知識的制品，若不能修改，只有用“否”字答他。”有的說，“我們如签定这約，实是屈于武力。我們的心中，应坚决拒絕。”惟独立社会党的机关报，則主张签約說，“从經驗看来，拒絕徒增后患。”这时候最可注意的，是德国政党的态度。多数社会党的政府派，是不主张签字的。民治党和中央党也是这样。只有独立社会党不然。（十二日）独立社会党通过决議案，主张接受和約，并說“德現政府恢复黷武主义的行为，使别人坚其对德的疑惧。德国舍屈于强迫签字，沒有办法。俄德和約，及德罗和約，均沒多久的寿命就取消了。凡尔賽和約，也未尝不可以革命的发展取消他。”我們为德国計，要想不受和約，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約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不提和議，明目张胆地对抗协約国，协約国至今未如之何。向使去冬德国广义派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成了功，則东联俄而南結奧，更联合匈牙利和捷克，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或竟使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协約国政府还食得下咽嗎？独立社会党和广义派社会党，本是一党而分为二，他的議論如此，本不足怪。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約这話正不要輕看呢。

同日德国会討論媾和条件。施特滿演說——

今日为德国人生死关头！我們必須团結一致！我們除謀使国家生存，无旁的責任！德国不图进行其国家主义的梦想，并沒爭权的問題。于今人人的喉嚨中間都覚有手塞住他的呼吸！人类的尊严，現付于諸君的手中以保持他！

（十四日）兰超致克勒滿沙一个牒文，內容的大要如下——

和約中关于領土的条款，是使德国失去其×关重要的生产土地。各地薯芋的收成，将減百分之二十一。煤減三分之一。鉄減四分之三。鋅減五分之三。德国既因失去殖民地和商船，使經济成了瘸木不仁。今又不能得充分的原料，势将被毀到极大的程度。同时輸入的粮食必将大減。依賴航务和商业为生的数百万人，德国政府不能将工事和粮食供給他們則势不得不到国外求生，而重要的国家，多禁止德国移民入境。故签定和約，不啻向数百万德人宣告死刑。……

兰超于上述的牒文之外，更以牒文两通致克勒滿沙。第一通的大要說，“协約国占德土地，和威总統宣布的主义不合。”第二通的乃关于賠償条款提出抗議。謂“德国愿賠償，但不是因为負了战爭的原故。”我們看德国的抗議，大家注重(一)不独負战爭責任。（二）不愿失去原料所从出的土地。其他各項，虽有抗議，但不是最重要的处所。

（十三日）晚上，柏林有大举示威。多数社会于示威时，起坛演說謂，“和約条件，較罗馬施于加薩臣的，尤为刻毒而可羞。”群众游行各街，止于协約委員团所住的亚特伦旅館前

面。有人向众演說，其势汹汹，欲攻旅館，为警察所阻。到內閣总理屋前，施特滿氏临窗演說。又有人民一大队，于薄暮时候，唱歌到亚特伦旅館，大呼“推翻强暴的和局。”“克勒滿沙皆亡”。“与英伦皆亡。”众又到施特滿处，請他演說，施氏講到威尔逊总統十四公綱时，众忽大呼“与威尔逊皆亡。”这日柏林和乡間独立社会党开会，有四十处。

（十九日）柏林某报載有社会党領袖彭斯坦博士的演說，謂“非常苛刻的和約条件，非完全出于激怒与仇念。实德国政策既不能見信于人，則当然受此待遇。一切破坏咎在德国。德国之履行各項要求，不过补償他們前所寄予人的而已。我很不以一般人士所发激烈的演說为然。告訴他們！不可再具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气焰！”这于德国热烈的反对声中，算是一瓢凉水。

（二十日）兰超致书和会，要求改正审查及討論和約的期限，（二十二日）克勒滿沙复书，允許展长期限，至五月二十九日为止。（二十三日）晚德全权大使起程往斯巴，将和来自柏林的閣員数人会晤，决定一切。（二十四日）斯希特芒，欧士白格，从柏林乘車到斯巴，兰超及委員十六人也到，即开一极长的会議，斯希特芒主席，通过德国的反提案。会毕，政府委員回柏林，兰超等回凡尔賽。

（五月二十七日）。德国有答案交付和会，答案的第一部分，要点如下——

（一）德国承認減少軍队到十万人。

（二）交出巨大的軍艦，而保留商船。

（三）反对关于东边土地的决定。要求于东普魯士区中，举行庶民大会。

（四）承認丹齐为自由口岸。

（五）要求协約国，在签字四个月后，撤退軍队。

（六）要求加入国际同盟。

（七）坚欲取得代替殖民地的权利。

（八）賠償总数，不得过十万兆馬克。

（九）拒絕引渡凱撒及其他人物。

（十）德国須有重新經商海外的权利。

德国答案的第二部分，亦有如下的要点——

（一）过渡时代，須維持大軍，以保治安。

（二）須許德人开公民大会，討論土地割让問題。并許奥人以加入德国的便利。

（三）拒絕割让西里細亚上部。

（四）不承認俄国有享取賠償的权利。

（五）无賠償意、門、罗、波兰等国的义务。

右之德国答案，四大国代表为长久討論后，提出答复文，将德国所約議的，逐件駁复。全文很长。不外說德国战爭責任万难推諉，德国必須尽其能力賠償損失，必須交出戎首，和战时行暴的人，用法惩治。必須于数年內受特别的約束。凡协約国所持以构成和約的根本主义，万难更易。惟对于德国的实际建議，可以让步云云。

（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又因德代表的請求，屡次展緩签約日期。最后允展至六月二十八日为止。六月前半月的光阴，全为着往复反議事占去。

至（六月十八日）德代表团，乃由法京回德，一致告誡德內閣，拒絕签約。德內閣乃准

备在韦馬召集国会，議此次重大問題。此时协約方面，早做軍事准备。一俟德国有不签字的表示，即行进軍。德国已处于不能不签字的情势了。

（六月二十二日），协約国对德的“最后复文”于这日送达德代表，限德国以五日承受和約。“最后复文”內，迹可以让步的条件，如下——

（一）西里細亚上部，实行民众投票。

（二）西普魯士边界，重行划定。

（三）德軍暫增至二十万人。

（四）德国宣布愿于一个月內将被控破坏战时法律的人名单开出。

（五）修改关于財政問題的細則。

（六）以德国履行义务为条件，保証德国为将来国际同盟的一員。

施特滿內閣知和約不能再有挽回，遂决計引退。

（二十二日）德新內閣組織成立。国务总理巴安氏，外交穆勒氏，財政欧士白格氏，內务达維特氏，陆軍拿斯奇氏，殖民貝尔氏，邮电格萊斯勃資氏，劳动森士南氏，工程斯利奇氏，公业經济惠塞尔氏，国庫夏勒氏，粮食斯密氏。巴安氏及諸閣員，多属多数社会党，本系前內閣的同調，在这回外交紧急声中，出当此签定和約的难局。新內閣既成，已可决其是預备签約的了。施特滿退职。施特滿內閣所委任的媾和代表，当然随着退职，于是德国講和代表团易人。新代表团即以新內閣中的外交总长穆勒，邮电总长格萊斯勒資等組織而成。

此时国会业已在韦瑪召集，巴安氏即赴国会，作很沉痛的演說，极言加入新政府的痛苦。恳請国会确立主张，否則战事将屢发作。巴安氏曰，“我特于自由的日耳曼最后一次，起抗此强暴破坏的和約！起抗此自决权利的假面具！起抗此奴隶德人的手段！起抗此妨害世界和平的新器！”国会乃于“反对”“贊成”的喧嘩声中通过签約动議。

签約的动議通过，二十三日巴安再赴国会，申述无条件签約的必要，其演詞謂，“战敗的国家，身魂受世界的凌辱！吾人姑且签定和約。吾人一息尚存，終望損害吾人荣誉的人，有一日身受报应！”这时候右党提出抗議。乃付表决。結果証实准許签約。議长貴里巴贊氏起立发短节的演說，“以不幸的祖国，委托于慈悲的上帝！”且謂“各党領导，允宣告軍界，全国希望海陆軍树先已牺牲的模范，輔助劳工，重造祖国！”关系全世界安危的德国签字，在一場非常慘痛的演說声中，完全决定。德意志人的大紀念，有史以来，当沒有过于这日了！

签字案既經国会通过，德新代表团乃到巴黎，致“允可签約的牒文”于和会。牒文的大要說，——日耳曼民国政府，知协約国决計以武力强迫日耳曼承受和約条件。此項条件，虽沒有重大的意味，然实老在剝夺日耳曼人民的荣誉。日耳曼政府虽屈服于作势的武力，但关于从古未聞离背公道的和約条件。”

右文既布，各国的欢忭，自不可言。至（二十八日）而最后展緩的滿期已到。于是凡尔賽宫中，仍有亘古未聞的大签約一举。

签約之际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五分，凡尔賽宫中开会。在宫中設高坛，甚为庄严。协約国全权代表首先会集。次为德国全权代表，只到外总长穆勒和交通总长裴尔，其余均不愿到。克勒滿沙主席，首发短簡宣言，謂：“协約国和共同作战国政府，均贊成媾和条件。今加签字，表示彼等忠誠依守庄严的了解。”継乃“請日耳曼民国代表首先签

字。”德代表所坐席次忽发大声，“德意志！”“德意志！”克勒满沙于是乃改称“德意志”。德代表即起立在約上签名，裴尔氏首先签之。时为午后三时十二分，园中噴泉四射，炮声大作，当德代表回到坐处的时候，会場皆露喜容。次为美国签字。次为英国签字。次为法国签字。次为意国签字。次为日本签字。最后签字的为捷克斯拉夫民国。三时三十五分签字完毕。克勒满沙氏宣布散会。

签約之后，当德国国会允許签約的消息传布，德国全国即有爱国的示威运动。群众列队唱战歌，国歌，欢呼致敬于年老的統兵員，各报对于裁判德皇問題，表示极大的忿怒。有一报悬請一九一四年的陆軍軍官，表示如德皇受裁判，也愿受协約国的裁判。并請組織团体，或須入荷兰，保护德皇。各地暴动罢工事情，接續而起。及（二十八日）和約签字的消息传到柏林，柏林某报即載出一文，謂“德人終必报一九一九年的恥辱！”为政府禁止发行。（二十九日）各报皆有“黑綫”，表示哀痛。各报皆載有极悲观的評論。柏林及各地鉄路工人及电車工人罢工。柏林城里的运輸机关全停。亨堡等处出了乱子。全国的罢工，有扩张形势。

評論我叙签約。我爭叙德国的签約。我叙德国签約，单注重其国民精神上所感痛苦的一点。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回和約，除却国际同盟，全是对付德国的。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一朝决裂，新劍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挡他不住。我們莫将德国穷兵黷武，看作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結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韻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鑄。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們还說是沒有打敗，“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我实現其所謂“高”。我們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黷武，濫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德国的民族，他們敗了就止了。象这样的屈辱条件，他們也忍苦承受。他們第一次翻轉面目，已从帝国变成了民国。他們的第二次翻轉，或竟将民国都不要了。这話我殊敢下一个粗疏的断定。我們且看挡在西方的英法，不是他們的仇敌嗎？英法是他們的仇敌，他們的好友，不就是屏障东方和南方的俄、奥、匈、捷和波兰嗎？他們不向俄奥匈捷等国連絡，还向何处？他們要向俄奥匈捷連絡，必要改从和俄奥匈捷相同的制度。俄匈的社会革命成了功，不用說。奥捷也有此趋势，前日电传說捷克已經成了劳兵民国了。德国广义派斯巴达团，去年冬天的猛断举动，和成功仅仅相差一間。爱倍尔政府成立，多数社会党握权，所恃以制服广义派的，全是几个兵，几杆枪。和約成功，兵是要解散了。枪是会要繳出了。那时候政府还恃着什么？德国工商业的大毀敗，要重造起来，不得不仰賴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而广义派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連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以做同样的断定。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結果，是用协約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經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設有战爭，就是阶級战爭，阶級战爭的結果，就是东欧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們不要輕看了以后的德人。我們不要重看了現在和会高視闊步的伟人先生們，他們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

哩！他們总有一天会要头痛！然則这回的和約“其能穩”尙靠不定。若眞以“德俄和約”，“德罗和約”的例来推測，恐怕就是早晚的問題。无知的克勒滿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黃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穩固，可怜的很啊！

世界杂評

高兴和沉痛　克勒滿沙在办公室接得德国接受和約的电話，高兴了不得。起身来，和在办公室的閣員及同僚握手。說，“諸君！我之靜候这一分鈡，已有十九年了！”这話何等高兴。虽然，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威廉第一和俾士馬克，高踞凡尔賽，接受法国屈服牒文的时候，何等高兴。結果遂釀成此次的战爭。虽然威廉第一，俾士馬克，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伦蹂躪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藩納聘。拿破伦何等高兴。結果遂釀成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战爭。虽然，拿破伦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奧为巨擘的神圣同盟軍，深恶德国的民主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結果遂崛起拿破伦，而有蹂躪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們执因果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們看这番和約所載，和拿破伦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滿沙高兴之极，卽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們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們記取此言。

卡尔和溥仪　奧前皇卡尔避居瑞士，某报通訊記者求見，見其侍者。侍臣說：“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暫时隱居，不問政治。”凡做过皇帝的，沒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沒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慣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彻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頗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俄人之处死尼哥拉斯第二(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絕禍根。拿破伦被囚于圣赫利拿，今威廉第二拟請他做拿破伦的后身将受协約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禍根。

增刊第一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梦华諸名流，在长沙設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頗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則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福愧悔，敬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鉄騎和无畏兵船。中国的

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彻衢云，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轉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紐。湖南也跟着轉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紐。

思想变了，那时候的思想是怎样一种思想？那时候思想的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点？此問不可不先答于下——

（一）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講求西学”，什么“虛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方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的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門，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虛的思想，我們試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內酌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說話。那时有一种“办学室”，“办自治”，“請开議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閙而已。凑热閙成了风，从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眞理了。

（三）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炮厉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泳”，要受一世人的唾罵了。

（四）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滿的运动，有要求代議政治的运动。于学卫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問要新，道德要旧”的謬說，“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語。

上面所举，全中国都有此就行，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間占一位置。所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彻的变化，任何說是籠統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致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籠統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

湖南講求新学二十余年，而后有嶄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頗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气尚未尽歇，不过书院为学校占去，学生为科学吸去，他們便必淹沒在社会的底面了。推原新学之所以沒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則有以下的数个原因：

1、沒有性質純粹的学会。

2、沒有大学。

3、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飯問題和虛荣心理，竟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續研究其专門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黃兴吸去做政治运动。

4、政治紛乱，沒有研究的宁日。

这是湖南新学界中心思想不能确立的原故，即是沒有学风原故，辛亥以来，濫竽教育的，大部市儈一流，逞其一知半解的見解造成非驢非馬的局势。中心思想，新学风气，可是更不能談及了。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陡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致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

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健学会之成立　六月五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潤霖君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員徐特立，朱剑凡，湯松，蔡湘，鈡国陶，楊树达，李云杭，向紹軒，彭国君，方克刚，欧阳翥，何炳麟，李景桥，赵翌等发起健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今录某报所載陈潤霖君报告組織学会的意旨于下——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能，深抱乐观。象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做官为唯一目的。非独大学为然，卽大学以外之学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見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月刊中。因之各校学生，亦頓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其致此之故，則因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掉。或該訊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突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漸漸輸入于远东。虽派別甚多，而潮流則不可遏抑。卽如日本政府，从来对于提倡社会党人，苛待残杀，不遺余力，而近日竟許社会党人活动。如吉野博士等，則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和緩过激主义，順应世界之趋势，从看将日本政体改变为英国式虛君制。

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改变之速，势力之大矣！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終难久事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軌，国人等組織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学之学說而为彻底之研究……

这日开会，听說尚有朱剑凡君主张“各除成見，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眞理”的演說，向紹軒君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說。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謂空前的創聞。今录出該会所发表的会則如下——

（一）本会同志組合，以輸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

（二）本会定名为健学会。

（三）会所暫定长沙儲英源楚怡小学校。

（四）入会者須确有研究学术之志愿，經本会会友一人以之介紹，得为本会会員。

（五）关于輸入新思潮之方法——

（1）凡最近出版之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蒐集，以供会員閱覽。会員所藏书报，得借給本会会員閱覽。其有愿捐入本会者，本会尤为欢迎。

（2）延請海內外同志，随时調查，通信报告。

（3）介紹名人談話。

（六）关于研究之方法——

（1）研究范围，大半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論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經济学諸問題，会友必分訊一門研究。

（2）重要之問題，由会友共同研究。

（3）会員有愿习外国語者，由本会会友传授。

（七）关于传播之方法——

（1）講演。分定期，临时两种。定期講演，每周日曜日午前八时至十时，由会友輪流担任。講員及講題均于前周日曜日决定。講友須預备講稿，交由本会汇刊。临时講演，凡有主要演題，或由会友，或請名人講演，另覓地点，择期举行。

（２）出版。

（八）本会設会計，管理图书各一人。其他会务由会友共同負責。每次开会推会友一人临时主席。

（九）会友应守之公約如左——

（１）确守时間。

（２）富于研究的精神。

（３）学問上之互助。

（４）自由討論学术。

（５）不尚虛文客气，以誠实为主。

（十）会員年納两元以上之会金，有能特别筹助經費者，本会极为欢迎。

（十一）本会遇有重要事項，必須討論时，得于定期講演后，临时通告全体，举行会議。

会則中的（五）（六）（七）（九）极为重要，（九）之富于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滿的成見，立意很好。尚生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継之以"批評的"精神。現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各人的独到所創获。最重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慣，非死人不加議論，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論恰成一反比例。我們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求合心所安合乎眞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不知古今最确的原理，伟大的事业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創造来的。我們住在这复杂的社会，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其君謂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話殊覚不錯。（九）之自由討論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人类最可宝貴最樂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們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健学会之进行　健学会进行事項，会則所定大要系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現在注重于研究一面，聞已派人到京沪各处，采买书籍，新聞紙和杂志。在省城設一英語学习班，使会員学习英語，为直接研究西方学术的預备。有年在四五十的会員都喜欢学习。又設一演講会由会員輪流发表意見，实行知識的交換。官气十足的先生們，忽然屈尊降貴，虛心研究起来。虽然旁人尚有不滿意的处所，以为官气还有十分五、六，講演要多采用命令式和訓話式。更有謂他們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象这样的求全責备，我們为何以不必。在这么女性紆紆，暮气重重的湖南有此一举，頗足出幽囚而破煩悶。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們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作"改造湖南的张本"看他們四次講演的問題，如"国人誤謬的生死观"，"怎样做人"，"教育和白話文"，"采用杜威教育主义"，都可謂能得其要。倘能尽脫习气采用公开講演，尽人都可以听，則传播之外，得益之大，当有不可計量的了。

（《湘江評論》临时增刊第一号）

第　三　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世界杂評

畏德如虎的法兰西　法国于德国畏惧他如虎狼。德国这么大敗，法国尚畏惧得很。割薩尔煤矿，划来因左岸独立，毀希里哥倫炮台，力波兰独立以夔其东陲，助捷克独立以阻其南出。日耳曼奧地利也并归德国，則不惜破坏民族自决主义，多方以妨之。殖民地，陆海天空軍备，則多方以消之。商船亦須交出大部，以阻其海外貿易之恢复。这样也算够了，还不止此。又向英美两国，請求保卫。前日电传，威尔逊于离法以前，签訂一約。系証将来法国一受攻击，美国当起而援助。劳合乔治亦以英国名义，签定一同一性質的条約。此意何等深刻！何等慘淡！籍非法国有不可告之大缺点，何至有这样的畏惧。法兰西民族素負豪气，何至竟象妇人孺子，斤斤乞人保护。我覚得这不是法兰西的好現象！

和約的內容　斯末賓将軍說："我之签訂和約，非因和約乃滿意的文件。为結束战爭起見，不得不签訂他。"又說："新生活，人类大主义的胜利，人民趋向于新国际制度和优善世界，所抱如此希望之践行，象这样的約言，均沒有載上和約。于今只有国民心腔里抒发义俠和人道的新眞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难而止的問題。"又說："我很以和約里取消黷武主义，仅限于敌国为憾。"斯末賓是英国一个武人，是手签和約的一个人，他于签約后所发議論是这样，我們就可想見那和約的內容。

日德密約　巴黎的路透电說："近今外間又有日德密約的謠传。密約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妄人想发現于今后的国际間么？日德密約更是什么东西？日俄密約，为列宁政府所宣布了，不但沒成，反丢了脸一大块。日英法密約成了，我們的山东就要危險。什么日德密約，前年也謠传了多次。据說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德国允許日本自由处置荷兰的殖民地，爪哇苏門答腊在內，为英政府听至，告訴了荷兰，阴謀方止。我們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屢次寻求未遂的狗男女，他們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軍閥浪人不割除，德国的愛貝尔政府不革命，娼夫和淫妇，还未拆开，危險正多呢。

政治家　斯末賓云："惟人民的新眞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难而止的問題。"人民的眞意，和政治家的見解，何以这么不相同？政治家何以这么畏难？人民何以这么不畏难？这里面果有一层解释呢？我自来疑惑所謂"政治家"，怕英不是一种好东西？我如今获得了証据。巴黎和約签訂后，路易乔治回到英国，在下院演說道："我們英国，得到許多成功是我們伟大国民团結兴奋的动力。我們于今欢欣鼓舞，但不要存着禍患业已过去的妄念。已使我們获胜的精神，仍要保持，以应付将来事件。"我們不要消費精力于彼此相爭。这就是政治家的大本領，这就是政治家的大魔力。不要浪費精力于彼此相爭。就是說道，你們人民不要拿着生活痛苦，国民眞意，种种无聊問題，和我們政府为难。那些問題都小，都不关痛痒。将

来寻着事端，我們还要和别国打仗。爱国，兴奋，团結，对外，是最重要沒有的。我正式告訴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們所說的一大篇，我們都清白是“鬼話”，是“胡說”。我們已經醒了。我們不是从前了。你們且收着，不要再来罢。

湘江杂評

不信科学便死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雷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雷气独多，应建高塔。設避雷針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識，誰也应該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沒一人有閑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說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罰”。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死鼠　鼠是瘟疫发生的一个原因，长沙城里到处看見死鼠，张眼望警察，警察却站在死鼠的旁边，早几年的长沙城，都沒有这个样子，警察先生們，还是請你們注意点。

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設，固然是不錯，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們竪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論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較大的运动，必須有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負所分，則看他們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眞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則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貴族的联合，資本家的联合为主。如外交上各种“同盟”条約，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薩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議院，为貴族和資本家的联合。（上院至元老院，故为貴族聚集的穴巢，下院因选举法有財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資本家所盘踞）至若什么托辣斯（鋼鉄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滿鉄会社……）則純然資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貴族、資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許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貴族的大联合，資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許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滿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滿，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

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貴族資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識，第二是金錢，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貴族資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絶沒有机会去受得。他們既独有知識，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級。金錢是生活的謀借，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識的貴族和資本家，整出什么"資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錢就漸漸流入田主和老板的手中。他們即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們自己，叫作"不动的財产"。又将叫作"动的財产"的金錢，收入他們的府庫（銀行），于是替他們作工的千万平民，仅只有一佛朗一辨士的零星給与。做工的既然沒有金錢，于是生出了貧富的阶級。貴族資本家有了金錢和知識，他們即便設了軍营練兵，設了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地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招牌，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壯的儿子当了兵，遇着問題就抬出了机关枪，去打他們懦弱的老子。我們目看去年南軍在湖南敗退时。不就打死了他們自己多少老子嗎？貴族和資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級。

可巧他們的三种法子，漸漸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們当作"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唸了一点，便漸漸有了知識。金錢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紅資本家的舒服，他們也要染一染指。至若軍营里的兵士，就是他們的儿子，或是他們的哥哥，或者是他們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們射击的时候，他們便大声地喚。这一陣喚声，早使他們的枪弹，化成軟泥。不覚得攜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貴族和資本家的健将。我們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鷲旗易成了紅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間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貴族資本家的三种方法窺破，并窺破他們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覚悟到他們的人数是那么少，我們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搗蛋。这一派的首領，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馬克思。一派是較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們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領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魯泡特金。

我們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于历史的势力——习慣——我們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們所不以为然的，我們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們已經得了实驗。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們要知道别国的同胞們，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应該起而仿效，我們应該进行我們的大联合！

——原載《湘江評論》第二期

民众的大联合(二)

以小联合作基础

上一回本报，已說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說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們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們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們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組織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說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小联合，有大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換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們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利益因为我們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諸君！我們是农夫。我們就要和我們种田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以謀我們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們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們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們去求。种田的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們？租税是重是輕？我們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里沒有沒田作的人嗎？这許多問題，我們应該时时去求解答。应該和我們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較著的去求解答。

諸君！我們是工人。我們要和我們做工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以謀我們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們做工的各种問題，工値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紅利的均分与否？娛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們的同类結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諸君！我們是学生，我們好苦，教我們的先生們，待我們做寇仇，欺我們做奴隶，閑鎮我們做囚犯。我們教室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綫照不到黑板，使我們成了“近視”，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們只顧要我們多看书，我們看的眞多，但我們都不懂，白費了記忆。我們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血灰白的使我們成了“貧血症”，成了“神經衰弱症”。我們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縮？呵！都是先生們迫着我們不許动，不許声的原故。我們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諸君！你看我們的实驗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貧乏——几件坏仪器，使我們試驗不得。我們的国文先生那么頑固，滿嘴里“詩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二十世紀，还迫着我們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們脑子里灌，我們閱书室是空的，我們游戏場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們还貼着布告，禁止我們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們的恩賜眞多呢！唉！誰使我們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愉快？我們不联合起来，講究我們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們已經陷在苦海，我們要求講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們尽可結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們，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內强权者的跋扈——我們就列起队伍向他們作有力的大呼。

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为什么不許我們参政？我們都是人，为什么不許我交际？我們一窟一窟的聚着，連大門都不能跨出。无恥的男子，无賴的男子，拿着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們围着，什么“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貞童庙”又在那里？我們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們的又是一些无恥无賴的男子，整天說什么“賢妻良母”，无非是教我們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們不受約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綫，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們！我們于今醒了！我們要进行我們女子的联合！要扫蕩一般强奸我們破坏我們精神自由的恶魔！

諸君！我們是小学教师，我們整天的教課，忙的眞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沒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沒有一个专为我們而設的娛乐場。我們教課，要随时长进学問，却沒有一个为我們而設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課鈡点，那么多，并沒有余时，沒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問。于是乎我們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們教給我們的眞传講义。我們肚子是餓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尅減軍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錢，上到他們的腰包去了。我們为着沒錢，我們便做了有妇的鰥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講的小学教师是終身事业，难道便要我們做終身的鰥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說学校应該有教員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們为着沒錢，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說了！小学教师直是奴隶罢了！我們想要不做奴隶，除非联結我們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諸君！我們是警察。我們也要結合我們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們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說，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員和警察，我們也有点感覚。

諸君！我們是車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車主的賃錢那么多！得到的車費这么少！何能过活，我們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車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們受苦不过，就想成功于他們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說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籠統的名目，过細說来，象下列的：

鉄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員的联合，
电話司員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紡織业工人的联合，
电車夫的联合，
街車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級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輸工人的联合

会，电車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許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許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許多的小联合彼此間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問是我們学生分內的事，就組成我們研究学問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論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們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們，我們应該多多进行我們的小联合。

《湘江評論》第三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八日出版

民众的大联合(三)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上两回的本报已說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說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們到底有此覚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們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覚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們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們虽贊成他們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們也用不着我們活动。然而我們却有一层覚悟。如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我們有話要說，有事要做，是无論何时可以說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們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爭，和世界战爭，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爭結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們，毒我們，剝削我們，越发得了鉄証。世界战爭的結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紅旗軍东馳西突，扫蕩了多少敌人，协約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現了嶄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內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轉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軍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間，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話剧，洞庭闔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覚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国家者我們的国家。社会者我們的社会。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众大联合，我們应該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問我直答之曰“有”。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諮議局的設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組成。有諮議局乃有各省諮議局联盟請愿早开国会一举。有革命者乃有号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举。辛亥革命，及革命党和諮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諮仪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国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

召集省議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設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結。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組設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族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环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銀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是单純，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說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紛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覚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許多非民众的“紳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議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紳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則純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則更純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們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嗎？果可得成功么？談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問了。原来我国人口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沒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設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設立工党，做学問的只知閉門造車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規模有組織的事业，我国人簡直不能过問，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說，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績，就是依靠

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沒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鉄路，清洁，設备，用人都要好些。鉄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沒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談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們根本的沒能力，我們沒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們沒練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沒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們練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总要努力！我們总要拚命向前！我們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湘江評論》第四期1919.8.4出版

問題研究会章程

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現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問題。同人今設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問題，先从研究入手，定名問題研究会。

第二条、下列各种問題，及其他認为有研究价值續行加入之問題为本会研究之問題。

（一）教育問題——

1．教育普及問題（强迫教育問題） 2．中等教育問題 3．专門教育問題 4．大学教育問題 5．社会教育問題 6．口語教科书編纂問題 7．中等学校国文科教授問題 8．不惩罰問題 9．废止考試問題 10．各級教授法改良問題 11．小学教师知識健康及薪金問題 12．公共体育場建設問題 13．公共娱乐場建設問題 14．公共图书館建設問題 15．学制改訂問題 16．大派留学生問題 17．杜威教育說如何实施問題

（二）女子問題

1．女子参政問題 2．女子教育問題 3．女子职业問題 4．女子交际問題 5．貞操問題 6．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問題 7．男女同校問題 8．女子修飾問題 9．家庭教育問題 10．姑媳同居問題 11．废娼問題 12．废妾問題 13．放足問題 14．公共育儿院設置問題 15．公共蒙养院設置問題 16．私生儿待遇問題 17．避姙問題

（三）国話問題（一白話文問題）

（四）孔子問題

（五）东西文明会合問題

（六）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問題
（七）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問題
（八）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問題
（九）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問題。
（十）劳动問題——
1．劳动时間問題　2．劳工教育問題　3．劳工住屋及娛乐問題　4．劳动失职处置問題　5．工值問題　6．小儿劳作問題　7．男女工值平等問題　8．劳工組合問題　9．国际劳动同盟問題　10．劳农干政問題　11．强制劳动問題　12．余剩均分問題　13．生产机关公有問題　14．工人退职年金問題　15．遺产归公問題（附）
（十一）民族自决問題
（十二）經济自由問題
（十三）海洋自由問題
（十四）軍备限制問題
（十五）国际联盟問題
（十六）自由移民問題
（十七）人种平等問題
（十八）社会主义能否实施問題
（十九）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問題
（二十）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問題
（二一）俄国問題
（二二）德国問題
（二三）奥国問題
（二四）印度自治問題
（二五）爱尔兰独立問題
（二六）土耳其分裂問題
（二七）埃及騷乱問題
（二八）处置德皇問題
（二九）重建比利时問題
（三十）重建东部法国問題
（三一）德殖民地处置問題
（三二）港湾公有問題
（三三）飞渡大西洋問題
（三四）飞渡太平洋問題
（三五）飞渡天山問題
（三六）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車問題
（三七）西伯利亚問題
（三八）菲律宾問題
（三九）日本粮食問題

（四十）日本問題
（四一）朝鮮問題
（四二）山东問題
（四三）湖南問題
（四四）废督問題
（四五）裁兵問題
（四六）国防軍問題
（四七）新旧国会問題
（四八）鉄路統一問題（撤消勢力范围問題）
（四九）滿州問題
（五十）蒙古問題
（五一）西藏問題
（五二）退回庚子賠款問題
（五三）华工問題——
1．华工教育問題　2．华工儲蓄問題　3．华工归国后安置問題
（五四）地方自治問題
（五五）中央地方集权分权問題
（五六）两院制一院制問題
（五七）普通选举問題
（五八）大总統权限問題
（五九）文法官考試問題
（六十）澄清賄賂問題
（六一）合議制的內閣問題
（六二）实业問題——
1．蚕絲改良問題　2．茶产改良問題　3．种棉改良問題　4．造林問題　5．开矿問題　6．紗厂及布厂多設問題　7．海外貿易經营問題　8．国民工厂設立問題
（六三）交通問題——
1．鉄路改良問題　2．鉄路大借外款厂行添筑問題　3．无綫电台建設問題　4．海陆电綫添設問題　5．航业扩张問題　6．商埠馬路建筑問題　7．乡村汽車路建筑問題
（六四）財政問題——
1．外債偿还問題　2．外債添借問題　3．內債偿还及加募問題　4．裁釐加税問題　5．盐务整頓問題　6．京省財权划分問題　7．税制整頓問題　8．清丈田亩問題　9．田賦均一及加征問題
（六五）經济問題——
1．币制本位問題　2．中央銀行确立問題　3．收还紙币問題　4．国民銀行設立問題　5．国民儲蓄問題

（六六）司法独立問題
（六七）領事裁判权取消問題
（六八）商市公园建設問題
（六九）模范村問題
（七十）西南自治問題
（七一）联邦制应否施行問題

第三条、問題之研究須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問題研究之先，須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須注重研究之主义。——

（一）哲学上之主义
（二）伦理上之主义
（三）教育上之主义
（四）宗教上之主义
（五）文学上之主义
（六）美学上之主义
（七）政治上之主义
（八）經济上之主义
（九）法律上之主义
（十）科学上之規律

第四条、問題不論发生之大小，只須含有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問題之类。

第五条、問題之研究，有須实地調查者，須实地調查之，如华工問題之类，无須实地調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調查者，則从书册杂志、新聞紙三項着手研究。如孔子問題，及三海峡凿隧通車問題之类。

第六条、問題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現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預測之問題，亦注意之問題。在古代与現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則不注意。

第七条、問題研究之方式分为三种。——

（一）一人独自之研究
（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
（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

第八条、問題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問題”，以“实行解决問題”属于問題研究会以外。

第九条、不論何人有心研究一个以上之問題，而愿与問題研究会生交涉者，即为問題研究会会員。

第十条、会与会員間会員与会員間，只限于“問題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問題研究会以外。

第十一条、問題研究会，設书記一人，办理会中事务。

第十二条、問題研究会，于中华民国八年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一日成立。問題研究会章程，即于是日訂定，且发布。（抄自《北大日刊》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版）

学 生 之 工 作

（1919年12月28日湖南教育月刊）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沒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設工讀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他 議。今 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說本位教育說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学校及旁的新社会連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 办 法，曾草一計划，今抄上計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誨。我覚得在岳麓山建設新村，似可成为一問題，倘有同志对于此問題有詳細規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一）

学校之教授之时間，宜力求減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应划分每日之 时 間 为六分。其分配如左：

睡眠二分。

游息一分。

讀书二分。

工作一分。

讀书二分之中，自习一分，教授占一分。此时間实数分配，即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上例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讀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

（二）

工作之事項，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

（甲）种园。（1）花木　　（2）蔬菜

（乙）种田。（1）棉　　（2）稻及他种

（丙）种林。

（丁）畜牧。

（戊）种桑。

（己）鳴魚。

（三）

工作須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現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練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細，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如为手工課之优点。然多非生产的（如紙、豆、泥、石膏各細工），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結果則学生不熟諳社会內情，社会亦嫌恶学生。

在吾国現时，又有一弊，卽学生毕业之后，多鶩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不乐农村生活，尙有其他原因，今不具論）。此訖地方自治之举行有关系。学生多散布于农村之中，則或为发議之人，或为执行之人，卽地方自治得学生之中坚而得举行。农村无学生，則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滿推行之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現代政治，为代議政治，而代議政治之基础筑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眞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紳恶棍，无选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甚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推其原因，則在缺乏有政治常識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則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漸減少矣。

欲除去上文所說之弊，（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鶩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第一，須有一种經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論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現今社会普遍之需要。第三，此种工作之場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

上述之第一，所以使之直接生产。第二，所以使之合于实际生活。第三，所以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慣。

（四）

訖上文所举之外，尙有一要項，今述之于下。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須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錯，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則有家庭，一端則有社会。……

（第四部分的摘記：

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而教育之全体，……

学校与家庭的矛盾，斗爭有两前提，故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謂举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

（五）

第二节所举田园树畜各項，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經营之，則为新生活矣。旧日讀书人不予农圃事，今一边讀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視工作焉，則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識一流，多营逐于市場与官場，而农村新鮮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尝，吾人改而吸尝此新鮮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則为新生活矣。

种园有，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間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僱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营养之范围內，皆可分别营养。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飼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魚，亦生产之一項，学生所喜为者也。

（六）

各項工作，非欲一人做遍，乃使众人分工，一人只做一項，或一項以上。

学生訊学校如其家庭，訊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讀同志会”。会設生产、消費、儲蓄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間內不取出会中所存的利益，在某期間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

（七）

依第三节所述，現时各学校之手工种，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是謂“能力不經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經济类，今有各項工作，此两科目可废弃之。两科目之利，各項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新民学会会員通信集第一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发的信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員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員通信集，为会員发抒所見相与揚榷討論的場所。凡会友与会友間往来信稿，不論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和誊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不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以退还。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　启

发刊的意思及条例

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年旧信，然于学会頗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展的。留法活动一事此集只能載蔡君給各会友的信，各会友給蔡君的信，其重要者尚望蔡君付来选印，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約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絕对公开态度，俱不宜标榜，故通信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論会友非会友，都要納一点印刷費，集內凡关討論問題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評及討論，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論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好极了。

給陶毅的信

※“联軍”
※“同志的分配”
※“自修大学”
※“女子留俄勤工勤学”

斯咏先生：

（上略）

我覚得我們要結合一个高尚純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們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个問題，頗有好些感想。我覚得好多人講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終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

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計划，象“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設”，然多有陷于錯誤的。錯誤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覚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現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而多成功少”，是“最不經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討論”。共同的討論有两点：一、討論共同的目的；二、討論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討論好了，再討論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討論，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問），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設。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覩。“浪战”，是招致失敗的，是最沒有效果的。共同討論，共同进行是“联軍”，是“同盟軍”，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們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們非得組織联軍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問題，是一个大問題。至今尚有一个問題，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作事的分配”。我們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講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間，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現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講究經济。不然，便重迭了，推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同志，发狠的招人到巴黎去。要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錯了一些。我們同志，应該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該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該去打先鋒的人。

我們几十个人，結識的很晚，結識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发生的），未能将这些問題，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狠蕾懂狠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遊，观察多方面情形，会唔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覚得这几种問題，很有研究的价値。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話，有甚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見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話还空，我們可再实际一些講。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該常时开談話会，討論吾儕共目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該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的責任，为有意識的有組織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預計，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創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国劳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該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瑣碎。

会友张国基君安頓赴南洋，我很贊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組織工讀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經名自修大学），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綱，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継“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庄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为商量。所說上海复旦教授湯寿軍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好象你曾說过楊潤余君入

了我們的学会，近日翻閱旧的大公报，見他的著作，眞好！不揚君近日作何重活？有暇可以告訴我嗎？今日的女子工讀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該团連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属一韓人一苏人，覚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績怎样？还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以說已經失敗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純君函，說将在周南教一課，不知已来了否？再談。

毛泽东

九月二日在北京

給周世釗的信

※国内研究出国围研究的先后問題

※团体事业准备工夫

※自修大学

尊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沒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現时在家，必正綢繆将来进行的計划，我很希望我的計划和你的計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已能够一致。我現在覚得你是一个眞能爱我，又眞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計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現在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討論，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許是从前和你談过来的。

我覚得求学实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証据。我曾以此問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暫不出国去，暫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問的綱要。我覚得暫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譯本比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較短的时間求得較多的知識。

3、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从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資比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脫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調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現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說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資比致。

老实說，現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說，都还沒有得到一个比較明了的概念，想从譯

本及时賢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說剌取精华，使他們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剌取的編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認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說。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說：

我們是脫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預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們現在便应該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則以为很是一个問題，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組織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經济，才能于較短的时間（人生百年）发生較大的效果。我想（一）結合同志，（二）在經济的可能的范围內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覚得这两样是我們現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輔。第一应占时間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間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說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贊成，而大大贊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們在长沙要創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先生造的）。我們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費用取得的方法，約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課。（每人每周六小时及至十小时）

2、投稿。（論文稿或新聞稿）

3、編书。（編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动的工作，（此項以不消費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費为止。我想我們两个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邵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相团”。这組織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談話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談話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說暫不出洋在国內研究的話。但我不是絕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覚得我們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癮才对。我覚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們要組織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話，暫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項，我覚得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間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評論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談，暫不多說，有暇請簡复一信。

弟 泽 东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給罗学瓒的信

荣熙兄：

兄此信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話我沒有不以为然的。我已經决定了一种求学的方法，暫时也不必說，只是你的話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現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說你已离学校在工厂

做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托尔斯泰所謂“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眞快乐”。我現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灘君劝我入工厂，我頗心动，我現在頗感覚专門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灘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鉄，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鉄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沒有工錢以漸得到每月工錢十二元。他現寓上海法界漁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組織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在理問街道俗报。湘潭教育腐敗已极，旅省諸人組織“湘潭教育促进会”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发会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轉去，稍迟当轉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湘南日报，无轉閱必要了。此信曾經复了一次，今再附識近来感想于此。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民学会会員通信集第二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員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員通信集，为会員发抒所見相与揚权討論的場所。凡会友与会友間往来信稿，不論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或誊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可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退还。稿寄长沙文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序

这是新民学会会員通信集“第二集”，采集会員通信計二十八封，重要者如下：向警予討論女子发展的計划一封；討論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問題及女同志联系問題一封；欧阳泽討論新民学会共同的精神一封；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一封；肖子璋报告男女会友在法生活状况一封；易礼容主张吾人进行要有准备一封；罗章阶希望学会反抗靡俗估量最高价值一封；毛泽东討論湖南自治並主张学会同人应为主义的結合一封；张国基討論会务进行一封；报告湘人在南洋情形一封；毛泽东討論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希望会友往南洋为文化动动和南洋建国运动一封；张国基述南洋的奇聞一封；罗学瓒希望会友注意鍛炼身体祛除四种迷惑解决家庭問題一封；毛泽东主张組織拒婚同盟一封。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学术之討論問題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並且都是在能引起会員团体生活的兴味的。其余的信，或商量进止，或討論事宜，或报告个人状况，具載于此，以見一班。

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三十号編者

給向警予的信

※湖南問題

警予姐：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諒！湘事去冬在沪，姐首慷慨論之。一年以来，弟和萌柏等也曾間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識之人，又絕无理論計划。弟和萌柏主张湖南自主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組織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覚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絕少。自治問題发生，空气至为黯談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議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設新湖南之說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詫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計，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无希望。君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頓湘两年，业已决計。惟办事則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絕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頌

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姐同此問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給欧阳澤的信

※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

玉　先生：

共同的精神四項，弟样样贊成。会員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贊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說，是因为新民学会現在尚沒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絡，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諒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絡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絡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謀解决人类各种問題。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見好些团体，象沒有經驗的商店，貨还沒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四出了，結果离不开失敗，离不开一个“倒”。半松园会議，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贊成，兄也是贊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現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都轉給他們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回多忙，未能作答，幸諒！你現状諒好，我忘記你在芬丹白露，抑在蒙达尔尼？来信幸告。近因极倦，遊

覺到萍，旋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旋中

对易礼容来信的評論

礼容这一封信，討論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預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見，于致陶斯咏姐及周惇之兄函中已具体表現，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說过几次。我覺得去年的驅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們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們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們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驅张运动只是簡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簡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較好的环境，我們好于这种环境之內，实現我們的具体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計，决不是我們根本的主张，我們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說到这里，誠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贊周即对于'驅张'怀疑，他說我們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顧及目前的小問題，小事实，就不要'驅张'。他的話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驅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經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們自始至終（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結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們决不跳上政治午台去做当局。我意我們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門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肖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划和組織，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內及国內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儲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以从各面发起並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認为最經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記我們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計划。至礼容所說的結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們的結合，是一种互相的結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們总不要使我們意識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眞同志就好。

泽 东

复肖子暲的信

子暲兄：

你沿途給我的信和照片，都收到，很感謝你的厚意。我竟沒有一个信給你，很对你不住！'华松园会議'的結果，既由他和贊周等带到了欧洲，'蒙达尔尼会議'的情形，又由你和子升递回了亚洲，子升並且自己回国，不日就可見面了，眞是乐阿！你現在諒好，諒还在学校。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門学問，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門，这一門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覺得仅仅常識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問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問未能用功，实深

抱恨，望你有以教我。学会出版分'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請設法收集在法諸友間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五集材料，至感。（請告諸友以后通信均写长沙文化书社）

弟 泽 东

給罗璈阶的信

※湖南問題
※主义的結合
※学生自决

章龙兄：

昨信接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沒有一句答复你信內的話，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贊成沒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聞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維新至孙黃革命，（两者亦自有他們相当的价值当别論）都只在这組織上用功，結果均归失敗。急应改涂易轍，从各省小組織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組織好了，全国总組織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很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組織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內之自庄严璀粲其河山，处之与世界有覚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絲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謂零碎解决实則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謂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們戒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對換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沒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变为主义的結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专紀会务，不載論述文字，尚未着手編写，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討論商討的場所，兄处有无会友們往还信稿，不論新旧，請检查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間很少，讀'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諸語，使我不寒而慄，我回湘时，原想无論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鈡看报，两点鈡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計，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講到湖南教育，眞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共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

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說‘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話）从沒有人供給过他們以思想，也沒有自决的想将来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賜信为感！

弟 泽 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給欽文（李思安）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

欽文姐：

你这信我八月里就收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並一些印刷物。很感謝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沒有即答，想能原諒我吧。湘江尚未出版。湖南虽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沒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們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們，由我們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預备，精密的計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諒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間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継續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囑轉集盧，已轉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給張国基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

※会务問題
※湘人往南洋应取之态度
※南洋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

顯生兄：

两信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項，弟大体均贊成。第一項发行会报，現已决发刊会員通訊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項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項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忙夏間在上海与焜甫，贊周，子暲、蔭柏、望成、禮广、敦洋、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准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純洁，（二）誠恳，（三）向上，並須有五人介紹，經評議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員，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該联絡），第四項，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覓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設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設备，其經費可由各地会員“分”任，第五項，經費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員常年費交齐，普通用費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須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員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內，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訊社組織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

洋有一意見，即湘人往南洋要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紹学生往法国之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則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閉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已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內发生之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賜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須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茲。弟意我們会員宜有多人往南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絡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給罗学瓒的信

※养成讀书和遊戏並行的习慣

※理論上的錯誤

※拒婚同盟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論各节，透彻之至。身体誠哉是一个大問題。你謂中国讀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誠哉不錯。尙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讀书成了习慣，便一直讀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則，用脑一点鈡，应休息一分鈡，弟則常常接連三四点鈡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並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捨。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並不弱，身体弱只有讀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須設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須养成工讀並行的习慣；至少也要养成讀书和遊戏並行的习慣。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屢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話，現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遊一次。

四种迷，說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話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給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身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論事。以部份概全体，是空間的誤訊。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間的誤訊。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間合同的誤訊。四者通是犯了理論的錯誤。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的爭辯，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錯誤尙少。惟感情一項，頗不現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問題。我常覚得有站在言論界上的人就不佩服他，或发現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議論，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要是矫正。我于后之者于說話高兴时或激烈的也常錯誤，不过自己却知道这是錯誤，所謂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說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詳情我小知，請你将組織，进行，事务等，

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換报一节弟可办到。請陆續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資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种絕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論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現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現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經有好多人說了，就只沒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經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們正好奉向蔡做首領，組織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約的，解除婚約（我反对人道主义）。沒有婚約的，实行不要婚約。同盟組成了，同盟的各員立刻組成同盟軍。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們的敌人，对內好生正理內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內的各員，都实践"废婚姻"这条盟約。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們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納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員。我这些話好象是笑話，实則兄所痛感的那些"家庭之吉"，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沒有人贊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我覚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贊成我的意見，便請你将反对的意見写出。此祝进步。

弟 泽 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新民学会会員通信集

第 三 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各会友均鑒：

投寄通信集的信稿，請寄长沙文化书社轉交为荷。

新民学会启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本会同人結合。以互助勉互为鵠，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貫。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間或未能了解。有牽于他种事勢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滿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形情之人，訊为虽曾列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見，惟有不再訊其为会員。并希望以后介紹新会員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新民学会会員通信集”第三集重点及付印出版日期

这一集以討論“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頗有精义。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上旬付印，下旬出版。

給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諸会友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贊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針。
※贊成馬克思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互助互勉。（二）誠悬。
※　　（三）光明。（四）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門研究。
※学会的四种运动。
※联絡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計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議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計划，久思草具計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資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計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們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計划，人人下一个辨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評，以决定或贊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計划和意見之外，再有别的計划和意見。我常覚得我們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沒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結果糟踏了各人自己外之，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豈不可惜？原来我們在沒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計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討論研究的結果。学会建立以后，頓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識，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頗有研究。但因为沒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沒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討論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員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討論，所以虽然有些計划和意見，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見之于各人之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間而已。現在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見；我們不在法国的会員，对于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評，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員，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評，和决定外，先达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見如左。

現在分条說来：

（一）学会方針問題。我們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針做我們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議，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針，說：“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針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針，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

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們接洽和观察，我們多数的会友，都頃向于世界主义，試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謀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覚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員，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謂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該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說："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議书，注重无产阶級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見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級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級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討論外，国际色彩一点，現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們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見，又因为中国比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敗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見。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該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該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鮮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

以下說方法問題。

(二)方法問題。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問題。我們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說："我現認清社会主义为資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級专政"。和森又說："我以为現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現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級存在。打倒有产阶級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級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証。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組織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鋒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見，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則說："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換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溫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謀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傾向无政府——蒲魯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較和而緩。虽緩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說："社会改造，我不贊成籠統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內面改造出来，我覚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学方可以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贊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見。（用平和的手段，謀全体的幸福）在眞理上是贊成的，但在事实上認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說，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級覚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爭，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講演后，曾和殷柏，礼容等有极詳細之辯論。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現在世界，錢尽在資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資

本家，或資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現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館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資本主义的教育。以資本主义教育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轉而用資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資本家手里，則因为資本家有"議会"以制定保护資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級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軍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資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銀行"以为其財貨流通的府庫。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資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資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曰見其微。所以我覚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慣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覚得要資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慣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館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館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謂"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資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說。再从历史上說，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現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現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縮的方面走。小資本家必想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資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軍閥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有拿破伦第一称帝失敗了，又有拿破伦第三称帝。有袁世凱失敗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說，劝大家讀历史，謂袁段等失敗均为不讀历史之故。我謂讀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逐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使将智慧压倒，勇敢前进，必要遇到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話："人不到黃河心不死"，"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均可以証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見資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的理由。再說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現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无产阶級，我們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們）。无产阶級比有产阶級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則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覚悟到自己应該有产，而現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該；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經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覚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无强权无組織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現了之难以終其局。

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于人滿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飯；(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瘦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終于免不掉人滿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絕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德謨克西拉的主义，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訊为于理論上說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贊同。

(三)态度問題。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松园曾討論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贊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依賴旧势力”，我們这学会是新的，是創造的，决不宜許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請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問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誠悬（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質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間”应該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該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項，会友的态度四項，是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問題。极端贊成諸君共同研究及分門研究之两法。諸君感于散处不便，謀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緣，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起，諸君办法此間必要仿行。至分門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綱，以书报为目，分别閱讀，互相交換，办法最好沒有。我意凡有会員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組織。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謂我們常識尚不充足，我們同志中一尚无专門研究学术者，中国現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誠哉不錯！思想进步是生活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問題。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見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見”十八項，弟皆贊成。其中“根本計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針”，“准备人才”，“准备經济，三条尤有卓見。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純粹預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純粹預备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諸条，以“綜挈会务大綱，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員”三項，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創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項，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重。弟意学会的动运，暫时可总括为四：1、湖南运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暫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見成效为鵠。較为明切有着，諸君以何如？甚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冊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貼邮花”一項我不懂意，請再見示。現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現有每县設一分社的計划，拟两年內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絡問題。这項极为要紧，我以为我們七十几个会員，要以至誠悬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絡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誠悬，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

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絡，結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祥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覚得創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們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見大略說完了。聞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談。請在法諸友再将我的意見加以批評，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毛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

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給 和 森 的 信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轉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証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証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組織（工厂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組織，与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組織与工厂的政治組織异性，認为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因为曲說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則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見地极当，我沒有一个字不贊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組織，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帜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詳情后报。

弟 泽 东

十年一月廿一日在城南

非 自 杀（节 录）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为目的达不到，截腸决战，玉碎而亡，則眞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原載长沙《大公报》，轉抄自《光輝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驅逐張敬尧文电

（一九二〇年一月）

……吾湘不幸，疊受兵凶，連亘数年，疮痍滿目。上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糾餓狼之兵，奸焚刼杀，聘猛虎之政，鑛刮詐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厂，卖紗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紙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聞。被张賊兄弟累資各数千百，尚不自厌，連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去年张賊曾唆使湘痞李鳴九等电京查問此款，至去长沙設立米盐公股清查处；聞近复賄令郭人漳等以旅京湘事維持会名义向熊秉三先生詰問該款，无理取鬧；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飽其欲壑。窃吾湘遭此亘創之际，哀哀子遺，非有亘資，何以善后，米盐公款为我三千万人民忍飢食淡所儲蓄，秉必不易，利用尤殷，倘被餘吞，此刼难复。被张賊之暴戾酷害，毒我湘人，已成慣技，独不能我同此食毛践土之敗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公民等对于郭人漳等此种恶劣行为，誓不承訒。总之此款在张賊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暫归湘紳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保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此际倘来无恥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視为公敌。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糾即逝，祈毋忽焉。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五十五人（下略）

（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館）

发起“文化书社”緣起（摘要）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脑子飢荒，实在过于肚子飢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眞是我們心向祷之，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們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論誰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身到了几百元，彼此不因为利；失敗至于只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訒地球之上，长沙城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

（摘自《光輝的五四》第91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版。）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

——湖 南 共 和 国

（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

乡居寂靜，一臥彌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閱大公报，封面打了紅色，中間有許多我們最喜欢的議論，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継續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謬論，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爭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議論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仰自国的弱小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們幸都收了其实沒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連“其实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蕩空，外債如山，号称共和民国，沒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不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沒有一条自主的鉄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盐。十八省中象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爭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紅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紅。波兰独立，捷克独立，匈牙利独立。犹太，阿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脫离英吉利，朝鮮狂欲脫离日本。在我們东北的西北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推翻帝国主义，不許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覚了。

中国呢？也醒覚了（除开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覚，知道全国的总建設在一个期內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謀总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們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該醒覚了。湖南人沒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終究是沒办法。

說湖南建設問題，我覚得这是一个根本問題，我頗有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聽听，希望共起討論这一个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継該討論。

（原載长沙《大公报》，抄自王无为編《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編，太东图书局发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

“湖南自治运动”应該发起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无論什么事，有一种“理論”而沒有一种“运动”繼起，这种“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实現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的以必要”，“現在是湖南謀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論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覚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繼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紙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終究不能实現出来。并且在理論上，好多人从飽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已明白了。故現在所缺少的，只在实际的运动，而現在最急須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覚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設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現在及将来尤为必須，差不多可說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覚得湖南的运动应該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眞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則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看时，一定是腐敗的，虛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們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設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們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眞誠，效力总是有的。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以成功，一起便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到多，从小至大的。頗有人說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話，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謬論。

（同　上）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現状証明之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屈兴，凡欲和中原大国孝长較短。其时則上无中央政府，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竟爭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中分之特性，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組織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謂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瀟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見全，可怜的国，非自主自决的国。节度史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之奴隶耳。五代曾为馬殷割据，陋儒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之明历德，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

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結果。

中国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龄輩領袖其間，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与而熊遂譚杀，亡清政府以其官方施于湖南，新鋭頓挫，事业全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結果。

湖南有黃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黃克强出遁，馬福益駢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湖南不走克辛亥而推倒滿清，早脫臣妾之羈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結果。

民国成立，分数論不胜集权論，袁盜当国，湯屠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驅湯，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統一之迷梦，传良佑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传，兵到岳阳，驟遇大敌，张敬尧連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驅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馬蹄，假中央統一之名，行地方蹂躪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結果嗎？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豈犹是今日的湖南嗎？小組織受束于大組織，事事要問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云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謂中央者为之宰割，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嗎？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載，使无所謂中央者为之宰割，加以人民能自覚悟，奋其創造建設之力，三被征服之慘禍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嗎？我嘗思之，重思之；前者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象机会未来。現在呢？机会来了，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无政府，全中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現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敗，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現象。什么新現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爭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皖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軍蒼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呵！我們的使命实在重大，我們的机会实在佳胜，我們应該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們应該一齐努力！

（同上）

湘人为貪吏卖矿呈总統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呈为貪吏和約卖矿，恳予严惩，以儆官邪而維湘矿，仰祈鈞鑒事；窃湖南矿务局长张荣

楣，品行卑污，貪鄙成性，黨綠湘督张敬尧，至湘滥充政务厅长，助恶貪贼，声名狼借；嗣垂涎湘矿美利，百貪鉆充該局局长，以便私图。前张督与英商葛兰特密議集卖全省矿权，皆其主謀，希图重賄：幸为农商部所发覚，及湘人全体反对，事遂中止。不意张荣楣利心不死，詭謀百出，复暗串該局水口山矿师德人，韦佳克，介紹美商馬意儿布流金等，以合資办理湖南白鉛炼厂名义，抵押借款。其借款合同聞系湖南政府以鉛砂作价入股，为美金八十万万，美商投資为美金一百四十万元，由张荣楣于本年本月十二日下午一点鈡，在京与美商秘密签定草約；期限五年，期滿可續十年；期內湘省所采鉛砂概为該厂以每吨定价美金十元收买。草約签定之日，已交美金六万元。議定正約签定，再交美金十四万元。自草約签定日起，限三星期調印，逾期无效。查水口山鉛厂为湖南財政惟一命源，自鉛炼厂为湖南矿业唯一生路；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財政亦失整理之資。张荣楣丧心病狂，希图賄扣，飽入私囊，竟不惜以湘省重大利权輕輕断送，盜賊之行，罪豈容誅，查矿业条例，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資办理之矿叶，其資金必須均等，以护主权。今据該約所定美商实溢股六十万元，甘以主权让渡外人，显违矿业条例。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訒者一。湖南水口山，系湖南自办之矿；今該約以专买权授之該厂，且予为規定价金，无論鉛砂价格将来不无騰涨之时，一为該約所束縛。汉治萍与日人所訂之复輸，将重見于水口山，損失自不待言。且专买权既属該厂，无异以水口山移为該厂之附属品，是于炼矿权断送之外，并采矿权而亦断送之，后患何堪設想！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訒者二。又，查該約訂定之日，美商交款二十万元于湘政府，是明之以合資炼矿之款，供炼矿以外之用，美商何以为报效？张督以此作何用途？此中黑幕不問可知。牺牲一省最大之矿权，塡一二貪官汚吏之欲壑；事前絕不使湘人与聞。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訒者三。总之，此次张荣楣所訂之約，名为合資办矿，实系拋卖矿权。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于嗜，又焉有絲毫計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誰信之！湘民百万，皆历刼余生，对于此种貽禍无穷之契約，訒为与其他之短期刼夺，其关系有本身与子孙，个人与全体之别，院情洶惧誓死不承。三星期轉瞬届临，此时犹在可以取銷不生对外关系之日，伏恳鈞座（鈞院鈞部）俯賜主持，趁該約未經調印之前，迅电张督，立将草約取銷，交款退出；并撤惩张荣楣，以儆官邪而維矿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謹呈大总統。（国务院，外交部，財政部，农商部。）具稟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等。

（平民通訊社印发。12月27日）

（盖印　平民通訊社　北京北长街99号）

（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館）

致湖南省警察厅长的公开信

（摘录）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对于湖南自治，訒为关系湖南人民死生荣辱，曾为学理上之主张，亦曾随众人作为事实上之促进，所謂制宪建設是也。事实絕对公开，并无絲毫隐秘……泽东为新湖南之自由民，

除依法律，无論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絲毫侵犯。

（原載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5日）

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摘录）

（一九二一年四月）

（一）

我們在去年曾出过一本社务报告，是报告“发起及临时营业期內”的情形的，現在这“第二期社务报告“是报告从去年九月本社开幕至今年三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长沙文化书社是去年九月初开幕的，到今年三月底，有了七个月，与本社組織大綱“六个月一报告”之例，拖一个月，这是算賬之故多出来的，以后还要按照組織大綱“六个月一报告”。

（二）

我們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們社是有直接关系的社員諸君，我們經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銷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給大家，使社員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我們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們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員以外。第三层：我們这个社的任务，有我們的“緣起”里曾經說過：“……愿用最迅速、最簡单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組織大綱里也說：“……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閱讀的机会”。象这样极大的任务，是不能由我們几十个社員一肩担負的。我們可达到“人人有閱讀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設分社，以七十五县每县設一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員計，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員。所以我們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設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們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以达到了。第四层：我們社里有的是书报，少的是本錢，为什么呢！因为书报是从外边来的，要几多也有，本錢是社員出的，社員不皆是富翁；社員所作的事又不单只书报这件，那里有許多錢来作本？并且社的本是“公財”性質，沒有退也沒有息，我們这些穷社員，从那里出得来許多呢！然而文化书社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試举其益，便有两宗：

（一）經营簡便。

（二）不消耗本錢。

大家瞭得現时的任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則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經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們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見，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們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們計划于二年內替书社筹足书业資本三千元），我們不知誰是愿意帮助我們的，自然不好到处去問，惟有将来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們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第五层：我們以前全是販书，自己沒有出版物，現正計划組織一个“編譯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連为一貫，然后

本社乃有社立出版物，这样社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筹足资本（編譯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最后还有一层是属于我們社內职員关于营业上的利益的。——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賬目清楚，我們社內的賬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賬算出結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內的賬算出結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賬算出結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結果，我們有了这一算，手續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誤，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

（三）

在第一期社务报告里报了的，此处就不报告了。文化书社自去年八月一日假楚怡小学开会发起，八月二十日訂約承租潮宗街湘雅医学校房屋之一部为社址，九月九日营业开幕，并十月二十二日假长沙县署开第一次議事会以后，几个月間社中可紀的事，略为下述。

1、議事会临时会。十二月二十九日假长沙县署开議事会临时会，到会者：姜永洪、賀寿乾、王季范、周惊元、郭涛僧、彭朗柏、熊瑾玎、易礼容、赵远文、刘馭皆、毛潤之諸君，姜君泳洪主席，討論"另覓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問題。首先討論社址問題，因現社址僻处草湖門一隅，房屋亦覚不够，欲图社务发达，宜于轉为适中的地点，覓一較为寬大的房屋。决議社址自要迁移，惟須愼重，务期一迁，便可安图。在未覓到相当房屋并布置清楚以前，自在湘雅原处。因开会之前日船山学社总理仇亦山君允将学社房屋一部分借用于书社，名以此本甚善，惟須明定契約，不背"安固进行"之目的才好。結果决定由本社与船山再切实交涉。次討論經費問題，从第一次議事会議决尽本年筹足千元，現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的零募不是办法，姜君泳洪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遂散会。

2、与商务等书局訂約。此为本年一月以后的事。本年一月以前，外埠书局如"中华"、"展東"、"泰乐"、"新青年"、"北大出版部"、"学术講演会"等均訂約銷书，至本年一月，如由楊君××介紹上海商务印书館訂約分銷，分銷的折扣，七、八折不等。二月，与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交涉銷书亦成，惟伊文思是一个西书公司，中文书至少，湘省在現在于西书不甚需要，故不能多銷，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知书社，是和文化书社宗旨等大致相同的一个新起的书社，刊印一部"罗素五大講演"与本社交涉代銷預約，本社已答应代銷；有一个在四川的"华阳书报交通处"，将他在四川未銷完的书托本社代銷；又有一个在北京的"亚洲文明协会"，托本社代售其新改組出版的"时事月刊"，本社均經答应；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銷者，在这个期內尚有多家。

3、书报暢銷。本社所銷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在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月余均很暢銷，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資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則随到随尽的原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驟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讀，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現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是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銷于劳动者間的也不少。以年齡論，买书的人自然以青年的多，壮年以上的人次之。

4、成立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設立分社不可。本社对于設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設，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設立起来。不知本

社內容的人或疑分社設立甚难，其实此事至易，資本只要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錢，少則五十元，多則百元，第三批以后卽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能购便得，是一。各县生意多，因无問題，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設，不要独立門面，开銷便不要多，僻县陋鎮，或一年只能銷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是二。本社对于分社，照本让与，不賺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卽因生意少不能得贏利，也断不至于耗本錢，——是三。附带經营，不須多的人員，——是四。銷不完的，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滯銷至于亏耗，——是五。有此五层，所以說开設分社是"至易"的。本社截至今年三月底，已經成立了的分社凡七，卽"平八"、"浏西"、"武岡"、"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处分社外尙有"販卖部"七处。"分社"何以别于"販卖部呢？1、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书店全部让与；"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2、分社在外县，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或个人（个人未販卖小册子于平民及劳动界的，仍让与优价）。

（四）

上述之七分社及七販卖部，分依成立的次序，将其"成立的月日"，"設立的地点"，"創办人"，"銷书額"四項略列于左，至其詳細情况，本社已向各分社征集，容后再报。凡下所列，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未載。

（缺頁）

易礼容（經理）

毛泽东（特别交涉員）

李庠（营业員——管书）

唐自光（营业員——管报兼管书）

王仙枚（营业員——管报）

黃清安（烧飯兼走杂）

以上是現在的职員，在这个时期內尙有陈君子博、任君培道在社各担任营业約二个月。社設在长沙潮崇街五十六号。

（《湖南革命史料几条》第一册）

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現？

工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要脫离僱主的束縛，除掉努力奋斗以外，沒有别的法子，因为一般的僱主，都不抱什么人道主义的，那里肯管工人的死活，卽如工資一項而論，几年以前，每个工人，是二角洋一天的，如今也只有三角洋一天，加不到二分之一，生活程度之提高，那里只有二分之一呢？僱主不肯依"水漲船高"的話儿，毅然去增工人們的工資，弄得他忍餓挨飢，漸漸有不可能过活的样子，还不能得到僱主們长点怜惜。所以工人除掉努力向僱主奋斗以外，沒有第二个法子。唉！可怜的工人們！自己的問題，要自己去解决。你們要改善你們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起来解决罢了！希望僱主发慈悲心，改善待遇方法，是一种慈

善行为，我們羞于忍受，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希望人家鼓吹，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也是沒有效果，我敢断言一句，工人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則已，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紮硬暴，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

但工人要想和僱主奋斗，应該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不致会失敗。沒有强固的团体，以此作后援，貿貿然向僱主宣战，沒有不失敗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屢次发生罢工风潮，結果多半是失敗。是沒有强固团体之緣故。所以現在的中国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組織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强固的劳工团体怎样去組織呢？这話說来很长，但扼要的說一句：先要劳工个个有彻底覚悟，中国的劳动家，覚悟的程度怎样？說起来很令人悲观失望，可为大多数工人从乡下地方招募而来，沒有受过学校教育，所以知識一点也沒有，脑子里面装滿許多卑鄙的观念，人家喊破喉咙的高唱"劳工解放"，他們也不晓得"劳工解放"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是不是可以算得劳工，有的还恐怕高唱"劳工解放"的先生們是过激派。我們听信了他們的話，便是受过激派的引誘，恐怕将来要受牵累呢！这些話不是我自己臆造，諸位去仔細考察工人的心理，才相信却有这种情形，劳工們的头脑，既然这样簡单；知識既然这样浅短，我們却希望他有彻底的覚悟，不是"緣本求魚"嗎？工人既然沒有彻底的覚悟，我們希望他組織一个强固的眞正的劳工团体，不是白日做梦嗎？

但劳工們現在沒有彻底的覚悟，我們終希望設法能够使他們有彻底覚悟的一日，不能因为現在劳工們沒有彻底覚悟，就失掉劳工問題不講，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問題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但我們究竟怎样使劳工有彻底覚悟呢？这个問題須要从工人教育問題中去解决，因为工人之所以沒有彻底覚悟，就是因为沒有受过教育，沒有丰富的知識的緣故，如今假如使他們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得着丰富的知識，自不难有彻底的覚悟了。現在各地方都有工人义务学校設立，我也参观过几处，其中名符其实确能增进工人的知識，供給工人的知識，供給工人的需要，替工人打算謀生活的改善的，固然不少，但名不符实，只挂了一块"工人义务学校"的招牌，以博人家称誉，在工人沒有什么好处的也很多。我希望热心劳工教育的先生們，在沒有工人义务学校設立的地方，快快糾合同志，去开办工人义务学校，以招致工人来讀书；在已經有工人义务学校設立的地方，应該加倍改良、扩充，使工人无向隅之感。果眞如此，工人們的知識程度，不难一天高如一天，那么工人自然能够用理論去判断新事物，怎样是僱主的专横？怎样是工人应有的权利？不愁沒有彻底的覚悟了！所以我相信工人教育問題，是一切劳工問題的先决問題。工人既然有彻底的覚悟，自然因为利害关系，大家联合起来，組織一个眞正的劳工团体，而且覚得不是这样，終沒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于是所組織的劳工团体愈加巩固。上面的話对不对，很希望大家批評。

（該文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湖南大工报）

安源工人自編劳工記（摘要）

新民学会一次討論記載

——提出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主張

（一九二一年一月）

《达到目的須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潤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議。并云：世界解决社会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溫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們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主張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

毛潤之：我的意見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缚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議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議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級的。无政府主义否認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張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謂劳农主义，用阶級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給楊怀中先生的信

（摘 录）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見宇宙之眞理，照此以定，吾人之心之所之之謂也，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为軍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令施为羡其成功，肓目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眞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眞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鵠。

再择其合于此鵠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眞志，而非肓从之志，其始所謂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頃向或求眞求美之頃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眞正之志也，显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眞理即十年无志，終身未得則終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貴乎幼也。……

湖南自修大学創立宣言

（一九二一年八月）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組織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爭毀书院，爭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誉。所謂书院可毀，在它研究的內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內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祿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問；就这一点論，我們可以說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錢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行罢了！学校的第二个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則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給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該說誰“管理”誰，学校乃襲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視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有人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視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鈡点过多，課程过繁。終日埋头于上課，几不知上課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說他們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却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隱諱也无从隱諱。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出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則都沒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篤。二来，沒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說，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現代学校有一項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內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則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学校的內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組織。

以上是說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現在再說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則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和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經入学考試而見遺的，便从此絕其向学的路。現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沒有得到所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訊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則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閥”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識阶級奴使平民阶級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闊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錢的人之于大学，乃眞“野猫子想吃天鵝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則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須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則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則看学問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則自修大学在現在这“金錢就是生命”的时

代，固不能使“无产阶級”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問，但心里則务必使他趋向“不須多錢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館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費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說。那么自修大学的內容怎么样呢？現在說一点大略如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問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館”就是专为这一項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組織，就是专为这一項用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作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間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学。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的习慣，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說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諸君，湖南不是至今沒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嗎？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內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資江流域，澧江流域三千万湖南民族，他們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現出来，发揮出来呢？湖南人民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沒有可以滿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揮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說到这里，便覚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們的肩膊上来了。

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創造他們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設窃取此意。事实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要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求学机关。虽不能說一定有很好的成績，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們的目标的。

告中国农民书

（一九二一年）

有人說中国农民的生活，並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因为所謂农民，都是自己有着田地，自己耕种的，並不是单靠耕人家的田而謀生的。就是耕人家的田，而所得生产物的分配乃是平分的，所以也沒有什么分配不平均。既然这样，你就向他們去宣传，也断不能促进他們的自覚，这話都不然，我現在只要把农民的状况記述出来，就可証明这一說的理由不充足了，不过我現在記述的农民状况，是就我住的那一县和附近那各县状况而論的，我想就以此推向全国，也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

一、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級。有人說中国的农民，都是各有土地的，这句話是有一部分确实的，然而未免太籠統了。一家三人所有千亩田，算是有土地；一家十口人所有一亩田也不能不算是所有土地，然而你們这样的所有，就說农民之間，生活都是一样，沒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嗎？設若細細地考慮起来，就可知农民自身內面，也有几层阶級：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給人耕种，自己坐家收租，这种

人並算不得純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財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的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們也有于自己的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的出产，絕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的田，分得一鈡而自瞻。这一种人也可謂下級的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連插針的地方也沒有，专靠耕人家的田謀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貧穷的农民了。上述四种里面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第一种人当然是少的，第二种也是很少的。第一、二种的生活是丰衣足食的，不是我們問題的目的物。我們的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內面的大多数的第三、四种农民。第四种农民的苦况簡直是非常励害，每天到晚，終年到头的苦作，还不够穿衣吃飯，一遇年岁不好，田主頑强（分配的方法面祥說）的时候，就差不多要餓死。所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第三种农民，虽然自己有一点土地，还耕一点人家的田，然而因为生活程度高，不是东拉西扯地来借貸，也是不能維持全家的生活。所以每到收谷的时候，谷总不能全进到自己家里来，直接运往債主家里去还帳，或还利息了去。因为这种原因，自己所有的一点田，也不得不漸漸卖或当給“土財主”或中等农民（在后面地余中里面祥說），而墜为第四种农民了，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是极困苦的。

照这样看起来，可見得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只拿着农民都是自己有土地这句話，說农民的生活都沒有什么困难的先生們，簡直是瞎說。这种說劳动者是和資本家同样地有收入，他的生活……

（湖南自修大学設补习学校国文講义摘录）

上 工 宣 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領导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胜利了！胜利了！气也出来了！命也可以救了！我們宣布上工。

从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万岁”！但是我們这次罢工所得的代价，只算是胜利的第一次……各位工友們呀！我們努力保存我們的团体工人俱乐部，我們不怕不得胜利！

我們这次罢工胜利了，現在我們要三呼万岁！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級团結万岁！

长沙鉛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記者盾（李抱一）书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对站在群众运动后指手画脚的人指出：工人，农民并非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教訓，但是“教訓人者”必須做到以下三点：

一、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来教訓我們，能够不为我們的师长，而降格为我們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們做工人的缺乏常識'、'不守秩序'、'品类日杂'、'忠告你們工人'、'助长工人习气'，应当要說："我們大家……"才好啊！先生，你真个能誠悬帮助我們，忠告我們嗎？那末，我們是很愿意和你握手，請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們、我們'，恍然象你們是'官'，你們是'小的該死'一样。

二、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将事实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譬如我們說你貴报館，每月多受某私人多少金錢，你能承認嗎？我們且問你，你之所謂'不再受人驅策，而云然，請你早答复我們，我們更愿新聞記者要翔实些才好啊……

三、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眞眞实实地教訓我們。我們工人所需要的知識，这是很不錯的；我們工人很愿意有知識的人們能挺身而出，做我們的眞实朋友。先生說我們受人驅策，为人牺牲，先生'可怜'我們，先生便应該做我們的眞实指导者。我們很愿先生眞个能脫去长衣，辞去大編輯职务，帮助我們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眞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什么我因此更进而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們——啊！先生，我們只承認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飢吃苦，而为我們大多数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吧？請快快脫去长衣！

1922年12月14日

《省宪法》与赵恆惕

"……自湘西問題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立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錢实公团通电，或作一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維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輩发信以工人团体为多，以为工人头脑簡单，必有千余人可来，是日候至十时，不持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祇彼輩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又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彼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講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請百数十分，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处幻灯場开会，一堂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和尚熾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謂：省宪法不謂之者宪經，如佛家之有佛經……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两面——书省宪維会——书省民請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馬褂队，儼然省民代表，約二三千人；

第二队——中华工会，約五六人；

第三队——佛化講演团，老头博衣，約四五十人；

第四队——养济院，約四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

見民国日报

我們向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們历来反对軍閥烂政

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仅做了軍閥烂政客爭权爭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例。赵恒惕現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有省宪以来——摻杀劳工（萍庞等）勦封报館（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剝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員未曾撤去一日）剝夺集会結社自由（封力車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会工人的集会），庇护其軍队販买各种鴉片烟，賄买选举（派遣荣員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錢私造省議会，用錢买得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屢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賦（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被破法定的預算总比例減教育实业費增加軍費，鈎結吳佩孚伪耀南，何一不是藏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森鉌犹爭鴉片稅（所謂持稅）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各义大吹大擂“护宪”，眞不怕羞死湖南人！

紙　烟　稅

我們时常說：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販属，或者有人不相信；我們不时常說：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現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紙烟稅，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閣議，英美公使抗議加征地方烟捐，結果电令答該省停止征收”，征收紙烟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們看六月二十日抗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維奢侈征稅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論，每岁銷場竟逾千万，消耗之鉅，駭人听聞，流毒之列小減鴉片。当局有鑒于此，特命設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聞外商借口条約权利垒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稅，完全取諸。及尹，烟商毫不相涉，純粹浙人所輸之捐，外商又劳干預！且系国內行政主权，断不落外人侵犯，自立据理力爭，忽任有所借口，主权等甚。”原来美英据了协定关稅条約，不許中国对外奢侈品自由抽稅，任凭是“純粹浙人所輸之損”是“国內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貨，所以到底不許抽稅。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紙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僱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內地設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約”出了一点輕微的稅，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許中国“自由”抽稅了，浙江一省銷紙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銷紙烟总額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眞是“駭人听聞”！請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同我們“亲善”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的“閣議，眞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了一个庇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烟来，閣議就“电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烟稅”再請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帳房这句話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沒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甚么緣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紹屠。据陈紹屠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佈梁如浩罪状說："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島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軍事上甚矩，某代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繼續的租借，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支援，专謀利己……梁代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謀，始則托人向余疏通，餌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支将来均可代为报銷，且結果后之种种利益，亦曰分潤，經余屡次拒絕，且倨要求其完全公开，某代知余不可以动，仍繼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代往往拍桌子厉声問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揮左右将余扶出門外。余憤不可迫，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硯欲向头自击，某英人观之大惊，向余劝阻，梁代毫无所动心。……

梁如浩和英人所訂之威海卫草約計甲乙两部二十三条，八月二十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經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一）变接收为續租草約允許英国繼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繼租之权，且将厉来未經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域，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續租之。

（二）断送領土領海条約規定：（1）中国地方长官立据給英国領导租人（永租）凭照；（2）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續費；（3）英国保留官場，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認。其断送領土为如何。草約又規定：（1）刘公島海面之抛錨所，須供英国海軍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英国海軍得在刘公島派兵登岸操演打靶；（3）英国海軍得在刘公島抛錨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規定，英国占領刘公島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沒于我領土領海。

（三）断送国家主权草約規定刘公島威海卫間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統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眞正統属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須由英国人統带，財政，財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則由中英合組之中英委員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虛名，担負英美債务之償还及公費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送。

迷信华盛頓会議的同胞們：华盛頓会議給了我們的在那里？相信英国比日本的好的同胞們：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威海卫交还是把威海卫变成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滿后要强迫續租；要求广九路和粤汉路接軌欲并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經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議則主賬以研究釐余問題为限（八月二十二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鉄路共管案来。迷信华盛頓会議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們：請問华盛頓会議給我們的在那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
国人应反速起对汉奸梁如浩！

湖南自修大学組織大綱

（《新时代》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第一章　宗旨及定名

第一条：本大学鉴于現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书院与現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眞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創設，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資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为主。教师負提出問題，訂正笔記，修改作文等責任。学生不收学費，寄宿者只收膳費。）

第二章　校董会

第二条：本大学設"校董会"以校董十五名組織之，負本大学經費上之責任，并总持本大学大綱，由学社社員推举。校董因必要，得扩充人数。

第三条：校董会得以校董在本大学所在地者經半数以上之列席开校董会。校董之不在本大学所在地者得随时陈述意見于校董会，并得托其它校董代表意見。

第四条：由校董会推举一人为"駐校校董"掌握本大学事务之大綱。

第五条：本大学校董会設名誉校董，額无定数，由校董会推举有下列資格之人充任：

一、助款于本大学五千元以上之人；
二、贊助本大学有甚大劳績之人；
三、国內外大学及专門学校校长。

第三章　学員及办事員

第六条：本大学設学长一人，由校董会聘請，担任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績。但因必要得添聘专科指导員，輔助学长担任指导、考察之責。

第七条：本大学暫設办事員如左：

一、书記一人，受駐校校董之付托，办理本大学文书、交际及設备諸事物。
二、会計一人，受駐校校董之付托，掌管本大学經費之出納及其使用諸事务。
三、图书館主任一人，受駐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图书館。
四、实驗室主任一人，受駐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实驗室。

第八条：本大学于前所举之办事員外，因必要，得加設相当的办事員，其职务及人数，临时酌定。

第四章　通　訊　員

第九条：本大学于国内国外重要之各大学、各专門学校及各学术团体設通訊員，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連絡；幷注意各校各团体学术研究之情形及其重要之結果，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条：本大学于国内国外学术昌明之区域（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昌、巴黎、伦敦、柏林、紐約、莫斯科、东京等）設通訊員，担任本大学与各文化区域之連絡，幷注意各区域内一切重要文化学术之情况，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一条：本大学于湖南省内（省城及各县）各重要之中等以上学校，幷各种学术团体，設通訊員，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間連絡，幷互相介紹其学术。

第十二条：通訊員于上列职务之外，得临时托以其它特别职务。

第五章　学　友

第十三条：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不分男女长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經本大学証明訊可，得报名入学。非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而具有与之相等之学科根柢者，經本人証明訊可，亦得入学。但本大学各种特别班学友，不必具有上列資格。

第十四条：本大学学友，分为下列二种：

甲、住校者，为住校校友；

乙、不住校者，为校外校友。

凡住校校友入学，必須經过試驗，幷自付膳費及杂費，住校学友及校外校友，均享有本大学图书、函授、听講、集会等研究上之便利，凡学友須于每星期始，交納相当之保証金，于每星期未退还，学友应否交納学費，及学費交納多寡临时依所研究之情形規定。

第十五条：本大学学友名額，由本大学斟酌房屋及图书館設备情形临时分别規定。

第十六条：本大学学友，有发現下列各項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

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訊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績之表示；

二、假名自修，分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

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

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它学友及本大学名誉。

第十七条：本大学暫設文、法两科，其科目如左：

文科：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論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聞学、哲学。

法科：法律学、政治学、經济学。

以上各科学科之詳細类别，另以表規定之，学友于以上各种学科中至少須选修一种。

第六章　研　　究

第十八条：本大学研究之范围，分为下列三类：

甲：科学；

乙：哲学；

丙：文学。

甲、乙、丙三类之祥細科目，另行規定。本大学学友，于甲、乙、丙三类各科目中，至少須选修×科目。

第十九条：本大学研究之方法，分为下列二种：

甲：单独研究，学友各自制定課程表，对于所选定之学科单独修习。

乙：团体研究，組織各种研究会，关于科学者，如“数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經济学研究会”等；关于哲学者，如“周秦諸子学研究会”、“印度哲学研究会”、“罗素哲学研究会”等；关于文学者，如“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詩歌、小說、或戏剧研究会”等；由本大学学友因志愿相同，分别組織，定期研究完毕。在研究期間，随时开会辯論商榷，各研究会之組織另定。

第二十条：本大学为图研究之便利起見，特設补助方法三項如左：

甲：通函指导，由本大学聘請国立大学教授及其他国內外学者，担任定期通函指导，其指导之項目如左：

一、开示书目；二、指示研究方法；三、解释疑問。

乙：特别教授，如外国文一科。本大学得酌量情形，开設“英文”、“法文”、“俄文”等各专班。此外如“工人夜校”等各种平民教育，亦得附設。其組織另定。

丙：特别研究，本大学特别講座，随时还請名人担任講师到校講学。

第二十一条：本大学为沟通文化，介紹新知，設各种“譯书会”，如“法文譯书会”、“英文譯书会”等。

第七章　劳　　动

第二十二条：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慣，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識与劳力两阶級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相有当之設备如，“艺园”、印刷、鉄工等。

第八章　图书館及实驗室

第二十三条：本大学于校內建图书館，設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聞紙，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

第二十四条：本大学于校內建設博物、理化实驗室，以为学友实地試驗之用。

第九章　成　績　表　示

第二十五条：本大学学友成績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

甲、平时所作之記录及論文；

乙、每学期届滿时所做之論文；

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做之論文。

第二十六条：本大学学友每人修学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完毕为单位，成績及格者，給与某科目修学証书。（如数学修学完毕成績及格，即給与数学之修学証书）但不要証书者听。学友經訒可得长期在本大学内研究。

第十章　經　　費

第二十七条：本大学經費之大部系用为建設幷充实图书館及实驗室之用，其来源如左：

甲：学社津貼；

乙：公私捐助。

第十一章　校　　舍

第二十八条：本大学以湖南船山学社房屋为校舍（长沙小吳門正街）。将来因必要得扩充房屋或另行建筑。

第十二章　分院及海外部

第二十九条：本大学因学友研究之方便于湖南各重要地点設本大学分院。即以长沙本校为第一院，第二院以下俟經費充足时开办。

第三十条：本大学之学友，因必要得設海外部。

第十三章　自治規約及本大綱修改

第三十一条：本大学内部生活，以“自治規約”規定之，此項“自治規約”如駐校校董、学长、办事員与学友共同訂定。

第三十二条：本大綱之修改，須得校董会之同意。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須知

（一）我們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人設的，是由一些有学問兴趣的学生感于現时教育制度不好，要合古时书院現时学校两样之长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基

于这个意义之上設的。我們这个学校方才創始，确实簡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眞实努力才能决定他有沒有好成績。但我們极愿得到許多有志青年和我們做同学。我們求学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会。我們的求学是求現实这个目的的学問。我們不愿意我們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較愼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們要明白他下列几項：

（1）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經济情形怎样？

（2）要研究那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

（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6）对于社会的批評。

凡要入学的，須将上列六項用通信的方法詳細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記轉交学长評閱；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二）入校者每月須照交伙食費、杂費及学生費。

（三）入校后有投稿本校月刊的义务。

（四）入校后有服从本校公約的义务。

（五）入校为經济所限，目前采完全自修主义。凡自揣无自修能力者不必入校。

外力、軍閥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統一到底能实現嗎？除开张紹曾等一般盲人誰都晓得在最近时期內是不能的。因为国內各派势力在現在是无法使他們統一的。統一当然不是混合，所以現在什么“各省会議”，“国事协議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領磋商，无非是些空談空事。把国內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黃炎培等新兴的知識阶級派和轟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們終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內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的太大了，研究系知識派和商人派都会暫放弃他們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暫放弃他們最急进的主张，和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了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党和緩进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軍閥派。中国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战胜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內，中国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軍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滯，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厉害，質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統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說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資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何等的反动！他們現在是

协調着步驟来侵略中国。他們的步驟以先是不协調的，經华盛頓会議一番商議便协調了。虽然他們的协調終究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們为补尝前次大战亏失而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起协調主义的。美国的門戶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証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資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統一中国，較之民主軍閥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資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成霸占中国于他們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軍閥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經济現象看，中国現在是最便利于軍閥統治的。白狼，老洋人可以在河南一带嘯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未受教育；除了沿江沿海沿鉄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經济生活；人民的組織除开沿江沿海沿鉄路应乎他們經济的情况有一点微弱的組織象工商教职員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組織；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貴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鉄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員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銷到二三十万分的报紙；全国无一种銷到二三万分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平方里；試問在这个社会經济情况下軍閥不来統治，还有誰可以来統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然是軍閥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們从内外政治經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軍閥支配的天下。这时期内是外力和軍閥勾結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組織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終不能为北方統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軍閥，但終究还是革命分子存置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組織一天一天强固。結果是民主派战胜軍閥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乱时期，断不定和平統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統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葯，大家不可不知道。

（原載《新时代》第一卷第一号，湖南自修大学出版）

《新时代》发刊詞

（一九二三年）

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創办的，也可以說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机关报。

本刊与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学的杂貨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者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社会制的不良和教育机会的不各，才集合起来，組織这个学問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虽然自修大学創办伊始，国人的理想还在試驗时期将来成績如何不能預告，但这出发的目标自信非常正确，若凭那种精神和志气实践，必有成功的希望，本刊便是一个試驗的标准了。因此本刊出进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供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許多志同道合的人們从事这种社会主义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少年中国学会改組委員会調查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国内会員以本年11月30日为填繳調查表截止日期，外国会員以本年12月27日为填繳調查表截止期，逾期不繳者即照本届年会議决案第四条办理，取消其会員資格。

（二）答案务須繕写清楚，措辞明确，否則发生誤会应由本人負責。

（三）調查表正付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均請按式填繳，由邮局双掛号寄交南京市黃仲芳收轉。

姓毛，名泽东，号潤芝，省湖南，县湘潭。

最近通信址：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員会。

永久通信地址：长沙文化书社。

問題逐条答复：

（一）对于目前内扰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級的社会主义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級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中产阶級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打倒买办地主阶級（即与帝国主义軍閥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資产阶級及中产阶級右翼），实現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及中产阶級左翼的联合統治，即革命民众的統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会員所抱为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許多会員精神不属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三）入会以后之經历請簡明告知。

（甲）学业研究，研究社会科学，現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問題。

（乙）事业教过一年，做过二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組織工作。中华民国14年11月21日。

（按：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調查“上发表的对于中国革命問題主张张，明确的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場日刊发刊詞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詞。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余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組；自辛亥革命成而敗历十四年，而有現在之領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軍閥之革命；至于今日全国各地慘遭帝国主义杀声中于反动軍閥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声中，而有广东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現和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客观环境之必然，即历史事实之推进。我們从

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軍閥运动中由执行我們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組織和遇敌攻守的經驗，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們将得做什么？

我們的伟大領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軍閥买办地主阶級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們下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們伟大領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現，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們的已故領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下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剝削中国的重要工具是軍閥大买力阶級和地主阶級，又下定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們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們反对大买办阶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級，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經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軍閥（打倒陈林打倒楊刘），反抗大买办阶級（商团事件的鎮压），反抗地主阶級（海丰、广宁、訓德保……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級的斗爭）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領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間，得到了二十万有組織工人、五十万有組織的农人和数万有訓練的軍队，还有許多爱国商人学生都到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設了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有許多外省同志参加，然广东同志实作了很大的努力。

广东是与英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陈、林、邓、殷等落魄軍閥狡然思迁的地方，是陈××等大商买办阶級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級勾結帝国主义軍閥严重剝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規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揮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組組，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广大群众的組織，以保障而且扩大我們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現于广东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責任。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肅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級！

打倒勾結帝国主义軍閥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級！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五年）

袁同志提出这个問題，很可討論。张同志所說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个条件，我們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說，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眞正共产党員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組織，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說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

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首受一个重大的打击，对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說，无論何党，党員出党入党应有絕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組委員会調查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对于目前內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信本人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級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压迫，非一阶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及中資产阶級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打倒买办地主阶級（卽所属于帝国主义軍閥之中国大資产阶級及中資产阶級右翼）实現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及中資产阶級左翼的联合統治卽革命众民的統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員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許多会員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心要，主张宣佈解散。　　（註：該会后为反动組織）

三、入会以后之經历請簡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現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問題。乙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二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組織工作。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爭宣傳大綱

——此件經×××部长提出1925年11月27日中央会議通过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宣传部，以反奉战爭关系重大，其性質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序幕。各地各級党部亟宜指揮全体同志，作广大之宣传，使全国国民了然于此战爭之原因及目的。特别是宣传大綱，首为反奉战爭各方面之分析，次举宣传綱領，次列九个口号。經毛泽东部长提出11月27日中央会議通过，滋录全文于左：

（甲）反奉战爭各方面的分析：

（一）帝国主义方面：去年直奉战爭，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扶直系統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以江浙战，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壟断江苏无綫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綫电报借款。故其时英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燮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爭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唯英国帝国主义在去年奉直战后，鑑于直系之不中用，于五卅运动全国反英时，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調，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鎮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后且相传英国以鉅款助奉扩充奉天兵工厂，企图以奉系統一中国之說，此时直系以杨宇霆督苏上海增兵和在北京所开关税会議有利奉张之故，不得不早日发难，狡猾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役內究竟助奉助直，此时尚难完全断

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計，宁愿拉攏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吳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計，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将看何方胜利把握較多即助何方。

（二）軍閥方面：在直奉对峙的局面中，直系方面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地盘。四川之袁祖銘支配下之貴州，名义上也属直系。但这几省內部各有特殊的派别，吳佩孚、孙传芳亦必相互分裂。在反直战爭剧烈时期，孙吳自須联合作战，現在战事停頓已現裂痕，将来战胜奉张，必然分裂无疑。奉系方面自来即有老少两派。去年胜直以来，因权利的分配內部暗斗日甚。財政竭蹶，奉粟跌至五折以下，前之攫取直魯苏皖，即为解决財政問題。此时苏皖已失，又因国民軍之威胁，山东及直隶之京汉綫亦将不采，关內財源尽矣，聚数十万飢軍于山海关內外，其势力于速战而不利于持久。直奉两派軍閥，无論那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唯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訊为一員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肅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之必要。

（三）政派方面：在此次反奉战爭中，政派之态度可注意者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之买办阶級。安福系，在軍事上的势力此时可說已經沒有。在其政治上的势力，早已裂为亲直亲奉二派。唯因亲直失势，亲奉派在北京当权，故北京政府变成完全代表张作霖的东西。研究系自曹吳当国即付曹吳。曹吳虽失敗，仍为吳佩孚之幕。此次直系抬头，研究系蔣方震等及該系猪仔議員屬集汉口，藉以攫取利益。联治系乃合政学系益友社及所謂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派政客如章炳麟等許多小政派而成，現时亦均聚集在吳佩孚旗帜之下以謀活动。顧維鈞一派所謂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間的卖国經紀人，此派現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級深相結納，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买国运动。上海及南通等地买办阶級，去年反直战爭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以上各政派除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僚利益的安福系属于奉系一边外，其全代表官僚及地主阶級利益的研究联治系，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新外交系，与上海南通买办阶級，都站在直系一边。

（四）国民軍方面：国民軍与英美日本帝国主义都沒有联系，因此同情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国民軍最大的特点。此时因策略上必需尚未与张作霖决裂，或者取暫时的妥协，但这是一时的事。本党欲图接近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反奉战爭后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則国民軍在北方之胜利实为重要关鍵之一。

（五）国民政府方面：本党在广东的基础現已十分巩固，北江熊克武部早已解决，东江陈炯明又已肅清，其小部竄入閩边者已派兵追剿，务絕根株。南路邓本殷部亦不日可以解决。全境統一可說业已告成。英国帝国主义勾結陈炯明等消灭本党革命势力之企图，业已完全失敗。省港罢工問題，港商港政府知无別法可以对抗，現正力图轉，不日可得到胜利的解决。目前本党在广东方面所致力者，为革命軍軍力之精鍊扩充，民政財政司法教育之刷新整頓，工农商学民众运动之扩大。总之以最短之时間，积极准备实力，候南北形势发展到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領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本党业用中央执行委員会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明反奉战爭之目的。并用国民政府委員会名义致电直奉两方重要将領，免其一

致推倒奉张，并于张奉势力倒后建設合于民众目的之政府及政策，以驗其对于本党拥护民众利益主张迎拒。

（六）民众方面：此次反奉运动在民众意識方面，乃为反抗拥护英日帝国主义压迫爱国运动之奉系軍閥的运动。故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該是全国的革命群众，直系的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此时民众之憤怒奉系軍閥为历年来所未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胜利即反英日胜利的观念，与广东民众之討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故此次反奉战爭在民众意織方面与在"直皖""奉直"几次战爭时都不相同。

（乙）我們的宣传及准备

各地各級党部的負責同志，須有組織有計划的覓得各种机会，于同志中尽力解釋，于民众中尽力宣传以下各点：

（一）各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爭中的阴謀。

（二）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軍閥如胜利，則民众将受到絕大的危險。

（三）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險，直系当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記。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級欢迎吳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宜注意宣传此点。

（四）各种反革命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买办阶級都是以人民利益絕不相容，不可不揭其阴私和一律排斥。

（五）在各派反奉势力中，馮玉祥一派与吳佩孚、孙传芳一派不同之点，即馮与帝国主义无緣，贊助国民革命，吳、孙則受帝国主义指使，反对国民革命。故人民于敌友之分辯，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論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訒之为友。

（六）眞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国国民党。眞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眞正人民的軍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軍。因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軍乃反对帝国主义的急先鋒，人民利益的拥护者，人民痛苦的慰劳者（举广东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此次統一广东和积极建設的事实。）

（七）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問題的主宰，此次反奉战爭，人民应該是总指揮的。人民应該赶快組織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八）国民党对时局主张之四条：（1）建設統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間召集国民会議預备会議。（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間召集国民会議預备会議，对于不平等条約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論結社集会之自由。乃結束此次战爭的唯一方法，不照此四条，則战爭結局，仍然是帝国主义軍閥合作支配的局面。人民仍然要受与以前同样的危險。

（九）为实施国民党的主张計，应該赶快准备眞正的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議。在各种人民团体中，"国民会議解决国事之必要"应繼續去年的宣传重新奋起一个普遍的宣传。各种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于必要时，应該在所轄范围內全体动員，对于国民会議作猛力之宣传，以期喚起民众之注意。

（丙）口号：

（一）打倒张作霖、段祺瑞。

（二）打倒英美日本帝国主义。
（三）打倒一切阴謀政派。
（四）人民起来指揮反奉运动。
（五）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議結束反奉战爭。
（六）建設統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七）取消不平等条約。
（八）集会結社言論罢工自由。
（九）一切革命分子速加入国民党。

抄自“政治周报”第一期第8—11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广州政治周报社出版

政 法 周 报

政 治 周 报 发 刊 理 由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現人民的統，为了使人民得到經济的幸福。

我們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軍閥，各地买办阶級土豪劣紳，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們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們的压迫，調动他們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們。他們有外国及本国的海軍陆軍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紙和学校。他們之間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說到对于我們，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們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楊刘肅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現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結社言論罢工自由；东征軍不曾拖夫，废除了广州市場的賭博；全省軍政統一；財政亦逐漸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分革除，其余部分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驟；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肅清；坚持罢工大規模封鎖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們并不隐晦我們的缺陷，我們不是說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許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許多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民政財政司法教育交通諸端內幕积弊还有許多未尽除去，我們不是說这些缺陷都沒有了。我們是說我們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肅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財政司法教育交通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們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們发抖。彼輩怨憤之余，凡所以咒詛誣蔑中伤我們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閧，肆其恶咀毒舌凡所以咒詛誣蔑中伤我們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其迷惑，对于广东眞相完全隔絕。乃至同志之間，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內閧”“共党”等等名詞到处流传，好象广东眞变成了地獄。

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开始向他們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責任。

我們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老实地报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說：“广东共产”。我們說：“請看事实”。敌人說：“广东內鬨”。我們說：“請看事实”。敌人說：“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們說：“請看事实”。敌人說：“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們說：“請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辯論。

接受我們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反　攻

三三三一制

“何謂共产？財务充公。不准私蓄，貧富皆穷。造作好語，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已得三成，一成会用。”这是楊坤茹貼在惠州城厢外的“反共产”四言談話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頗算得清楚的朋友問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么回事沒有？”我听了納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么？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楊坤茹的告示上。”他說：“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載着。”于是我才知道所謂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鮮議論。原来香港晨报在楊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党有过关系。楊刘叛变香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謂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絕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島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許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許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飽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現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論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靜物（报紙之类），不必看得拘限。因为現在“革命”“反革命”分二家，那些动靜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謂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做他們的机关报。这正如馮自由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員；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咀上还說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祺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别有恨于香港晨报和馮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个例子点破給国內外許多朋友看，于观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楊坤茹的告示做的詞意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敗笔，所謂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鍋湯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楊坤茹的佈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楊坤茹的布告已經領教了，还有刘志陆等行“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蕭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吳子玉先生，康南海先

生，梁任公先生”許多人的电报，那上面却稍不同。信那“其罪七”中說：“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素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和。今乃誘以均地之說，乱其互利之序。”不免与楊坤茹冲突。照楊坤茹說：“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会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倒可以說是“互利”。刘志陆說的却是“均地”，其意謂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沒有和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說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說地主一点沒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那个的話？

如果討赤同志仇讎亦吾良友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嗚呼”一段，接着說：“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討赤同志，仇讎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負无待交綏。得天者昌，仁暴不难立判”。刘电列衔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张蕭赵方周齐諸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吳康梁諸先生，固然是討赤同志。但香港×总督伦敦包經理，何尝不是討赤同志？却不将台銜列上去。而且×总督助了如許金錢軍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設总司令部，討赤之志，炳若日星，却偏将台銜漏列，眞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师直为壮数句說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頌德。

頌声来于万国

有个潮梅紳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說：“共产妖党，煽惑粤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刼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釀世界以灭絕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見旌旆所指，浆食爭迎，拉朽摧枯，大功立就（記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賴以鏟除，国基由茲奠定。豈特与云南起义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賴以保障，全球刼运賴以挽回，記念垂于千秋，頌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眞把“赤化”鏟除，“頌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軍大同盟万岁”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共产印刷品上面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軍”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象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吳子玉先生所部，实在算得“反共产中国国民軍”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軍指为共产軍，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簡单名詞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級合作的联合战綫。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戳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擲以图倖胜竟甚么方法都用尽了，

他竟捏造所謂“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們的传单中有一张題目叫做“劝粤民协助粤軍討赤伐党”，那里面說：“嗚呼，我父老兄弟知蔣中正拟訂之共产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責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于一般貧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貧民也。而仰知大謬不然。吾綜观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謂三三三一制者，蓋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謂四四二制者，蓋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厂商場資本科学者，則更完全沒收之。”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載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俱乐部，請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会議商磋解决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紳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簡琴石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簡琴石的話去問陈炯明，我料陈炯明必将答道：“簡琴石自己扯謊，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說未共呢。”

鄒魯与革命

鄒魯說：“我們国民党的同志应該覚悟，切不可因人家說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們同志屢仆屢起，那能有民国。若不是討袁拥法討賊北伐諸役一向无前，那能有今日的历史。这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毀商团，乃須要靠楊刘。打楊刘仍須要靠許梁。即今日之制許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鄒先生！就請你革命罢！实在沒有一个人有本領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須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須得現在还是革命，須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楊刘，老同志許梁，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反　攻

向左还是向右？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議論，即是說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間意見，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榜是站在中間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見，而在江浙頗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明率領反革命派軍人政治买办阶級土豪劣紳站在××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齐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間派，他有也只能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輕步走路。假若有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間，則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要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現在还沒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議論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二十日甲方的大炮已經在南京一带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沒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发生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議論还可以公开的宣传，“留正气于两間，存自由于天地”。但我們若假設一个局面，假設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炮，又是汪精卫蔣介石带領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領工部局，所有“紅头阿山”之徒一齐变了俘虏；馬上封鎖吳淞口，在南北塘獅子林駕上大炮（象虎头門一样），炮台上扯起“炮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鬧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設置了卫戍司令部，請看王懋功先生之流作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車在馬路上飞巡，时事

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許醒獅周报在所不免）。言論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給他剝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間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那自然还有北京。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沒有問題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中央全体委員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較张家口还有自由——話虽如此說，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員会开会，那里岂不是段政府管轄的地方嗎？如果段执政不在——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不是听說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車載入城內打了又給写悔过书嗎？咳！段执政革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眞是难說！更可痛者：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驅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議决三条，第一条組織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政府的样）。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紅旗，未見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誅朱深，枪毙国賊，解散关稅会議，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眞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之前标題道："可駭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駭的示威"，假如将来眞会組織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頂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的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許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間的先生們！請問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赤化原是如此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是粤洋报，譏蔣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頗爱护，反之反共产軍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化，安得染遍着全中国！

杀尽智識阶級的是誰

陈炳明的反共产宣传文章里，有一篇是："敬告青年学生"，末尾几句話說："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絕智識阶級，載青年学生，总算智識阶級，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智識的青年，一个一个杀尽"，要知陈炯明的話对不对，应先把中国智識阶級的地方，作一个分析。我們覚得有智識的人們不能承認他們是一个阶級。只能承認他們是一些有智識的分子，因为他們沒有一个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們联合做一个阶級。他們有的作了张謇穆藕初廉伯等的辯士或书記，說农民不应減租和工人不該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智識分子，已經投入农工阶級的战綫里了。依此，我們很可明白每个有智識的人，就是一个智識分子，这些智識分子，跟着近世界产业进步必然的結果，早已失去了他們所謂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証，由中間阶級暫淪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們竟忘了自身在現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車去和軍閥买办阶級土豪劣紳帮忙，那才算是智識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誰杀尽呢？直接被軍閥买办阶級土豪劣紳寃杀，間接被帝国主义毒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政治周报》第二期）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子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独中国人景仰，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无不景仰，厌恶他的只有各国压迫人民的統治阶級，即帝国主义与軍閥。苏俄当革命之际，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結台尼金，兰格尔，柯尔恰克等白党反革命派四面侵袭，其危急情形殆仿佛两个月前之广东。此时孙先生曾有一勉励的电报致列宁。据俄代表鮑罗廷在十一月廿二日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所述，謂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領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故当孙先生遭陈炯明叛变避走上海之际，其时势力頗为薄弱，但苏俄派遣代表越飞到沪，致意孙先生，期以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是为中俄两国大同盟之起点云云。确实现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大敌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須全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一致，方能和他决战而不失敗，中国所需于苏俄者在此，苏俄所需于中国者亦在此。京沪等处一班高等知識分子譁然以联俄为号，乃不識現今世界上革命及反革命双方爭斗的形势，不識国民党革命策略的意义之故，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設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設此大学以容納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領导人才。据莫斯科来信，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两巨著已由彼邦学者翻为俄文，孙文大学現在积极筹备中，照目前予測，将来必有非常可喜之成績。該校董事会主席为著名之越飞博士，曾任俄国駐华代表，董事会会員則为該校校长拉突，普拉夫打报主笔卜哈連，克魯斯加耶夫人，职工联合会执行部主席湯斯基，及其他名流，中俄两国各社团及个人青著者甚多，經济方面，甚为充足。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該大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領袖人才，課程主要科为經济历史，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經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为革命运动則要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經济及各种社会問題独立之研究及創造的著作。各种成績，并于著名报章杂志发表。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聞第一次定額五百名，在广东方面招百五十名。現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員会考取一百四十七名，从一千〇三十人中选出，其方法分笔試口試两种，必两种成績均优者方能及格。考取各生姓名列左：

（从　略）

以上共百四十名，尚有七名姓名待查，至学生姓别籍貫年龄等項政治委員会已制有統計表，录之如下：

（一）姓别：男一百三十九人，女八人。

（二）省别：广东七十一人，湖南廿八人，江西十人，云南七人，四川七人，江西五人，湖北五人，浙江三人，貴州三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未詳三人。

（四）婚嫁：已婚嫁者四十五人，未婚嫁者九十六人，未詳六人。

（五）职业：学界二十五人，教育界七人，报界二人，农界一人，其它七人，未詳十人。

各在現在准备放洋，分为数批出发，第一批日內即可登船，直放海参威。每人須帶路費

二百五十元，由国民党津貼一百元，自备一百五十元，連日各方面开会欢送者有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国民政府亦邀集学生聚会一次。在此聚会中，汪精卫曾致勗勉之詞，并与学生約定下列三事：（一）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二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的中国学生須团結起来，始終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俄各种預备，請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在此叙会中，俄代表鮑罗廷有一长篇演說，說明孙文大学之目的，謂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則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儲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則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茲录其演說全文于左。

（从　略）

（抄自“政治周报”第二期14——15頁
1925年12月13日广州政治周报社出版）

反　　攻

北京右派会議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員会做了全国反帝国运动的总指揮，使一切帝国主义慄慄危惧，北京右派会議議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員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員会能集中权力指揮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楊希閔，刘震寰，梁鴻楷，郑潤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麟，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議議决取消政治委員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領袖汪精卫領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議議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联帮助国民党政府雇用俄顧問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議議决辞退俄顧問鮑罗亭；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納共产分子增加一枝反帝国主义的生力軍，北京右派会議議决开除李大釗、譚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們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議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北京右派会議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既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楊希閔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現今日北京右派会議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鴻楷郑潤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愷后实現今日右派会議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現今日右派会議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門袭击广州实現今日右派会議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方打到广州实現今日右派会議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沒有效。国民党右派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議之召集，由“炮擾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議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說。自然，右派会議的种种議决，只算是儿戏的議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要比“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敗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說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小部分并无誠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們怎样不承認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們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右派的最大本領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論說：“只有怕革命党的軍閥，那有怕軍閥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話：“中央全体会議属于公开性質，若在北京开会，外則有軍閥的压迫，內則有反动分子利用軍閥而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認为中央全体会議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軍閥。民国日报的錯誤在那里？他的錯誤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眞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組織与会議在

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言則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組織党的会議公开起来，那必須先得敌人的諒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他的默許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祺瑞允許了右派在北京公开的开会，他能允許汪精卫譚延闓等到北京公开的开会呢？該报又謂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祺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未稳固，压迫国民党的政权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馮玉祥手里。沒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的，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許他在北京公开地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須秘密起来，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反动軍閥盘踞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組織，各級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員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議，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組織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的奋斗，右派党員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几个口号，他們也能不看党的决議案背得出；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們一听見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嘴，他們并沒有手与脚。他們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沒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們吓杀了。他們議决了他們所謂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們的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家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們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窠里，向各国領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紅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議，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軍閥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領，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政治周报》第三期）

宣　傳　报　告

文　字　宣　傳

（一）日报

（甲）党办者：

（1）上海民国日报　以前系叶楚伧等的私人报，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收归党办，支扩充費数万元，以后月支經費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然自始即不能算作眞正的党报，其言論記載荒謬之处甚多。西山会議后，变为反动派的机关报。

（2）广州民国日报　以前系广州市党部办，十三年十月始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发行数由千余份增至一万一千余份。

（3）广州民国新聞　以前系反动派机关报，廖案后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改为党报，广东省党部成立归省党部管理。目前日出七千五百余份。

（4）晉江晨报　曾有一个时期收归党办。后叛入敌党，現已停刊。

（5）香港新聞报　十三年七月起脫离陈炯明关系，属本党指揮。罢工事起被港政府封閉。被封前銷数达八千余份，銷路海外多，香港次之。

（6）北京民报　出版未久，被张作霖封閉。

（乙）同志个人办或用社团名义办的日报，調查未周，不計。

（丙）海外华侨党部所办大小日报頗多，調查未周，不計。

（二）周报

（甲）党办者：

（1）中国国民党周刊　第一次大会后中央所办，不久停刊。

（2）广州民国日报曾附属有文学，科学，孙文主义研究，經济，平民，农业，妇女，影画等八种周刊，然不久即停。

（3）党声周刊　归中央宣传部主持，初附属于广州民国日报，后独立，然不久亦停。

（4）評論之評論　第一次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附属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不久停刊。

（5）上海民国日报附属之科学，平民等几个周刊，不久均停。

（6）浙江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浙江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7）新民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湖南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8）中国国民　西山会議后由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主旨对抗西山会議及右派之言論，現改为三月刊。

（9）武汉評論　湖北省党部主持，継續未断。

（10）政治周报　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乙）广东方面各軍及各軍校所办周报半月刊等，如黃埔軍校的“黃埔潮”，第二軍的“革命半月刊”，第四軍的“軍声”，攻鄂軍的“人道”等。

（丙）同志主持用社团名义办的刊物，此类頗多。如

学生团体的刊物，各地都有，如“中国学生”等。

工人团体的刊物，如“工人之路”等。

农民团体的刊物，不多，广东方面稍有一点。

軍人团体的刊物，如广东方面之“中国軍人”“革命軍”“青年軍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之“新海軍”等。

妇女团体的刊物，全国約四五种。

其它团体所出刊物。

（三）月刊

前年有“新建設”“新民”二种，不久即停。現只有中央农民部主持之“中国农民”一种，初出版。

（四）通訊社

（1）中央通訊社　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頗有成績，办理已两年了。

（2）其它有关系之通訊社数家。

（五）书本

（1）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約三十种（内关于孙先生的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十二种，关于其它同志的如汪精卫先生講演集等十一种，中央宣传部編纂的約五种）共发行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册。惟散发偏于广东方面。

（２）各地的不明，无統計。

（六）传单

（１）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共发传单八十三种。惟散发尽在广东方面。

（２）各地的　　不明，无統計。

（七）标語

（１）中央的　　广州市上中央宣传部与广州公安局合作，做了两种标語：一种釘在电綫柱上，一种写在墙壁上。均取材于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及孙先生之遺言。

（２）各軍的　　国民革命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軍，海軍，黃埔軍官学校，及第二第三两軍附設之軍官学校，由各政治部主持，发布各种标語，为数不少，收效极宏。

（３）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方面农会工会印发頗多。

图　画　宣　傳

（一）图画宣传的重要

中国人不識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部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

（二）經过之成績

（１）中央的　　去年四月起才实行，做得頗少，又偏于广东方面，分为下列三項：

（甲）每周供給四幅小諷刺画于广州民国日报（間有缺）；

（乙）每周出一种宣传画（間須两周或三周出一种）；

（丙）印刷　　孙中山先生廖仲愷先生之小照片。

（２）各軍的　　各軍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在战时，于軍行所至之处张貼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

（３）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的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北京上海两处也有一点。

口　头　宣　傳

（一）口头宣传，于宣传中，在分量上，在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

（二）在农民工人兵士学生召集会議时，在此会議中做各种内容的演說，是为經常的口头宣传。

（三）在各种政治变动，或示威运动时，作各种的演說，是为临时的口头宣传。中央党部曾数次組織宣传队。各省各埠大規模有組織的宣传，五卅运动中及以前，做得很多。

（四）負責同志于开党員会时，作政治的党务的报告，是为对党內同志的教育。中央党部于总理紀念周常行之。

两年来十四重要事件之宣傳

（一）本党改組　　发布宣言政綱，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屬物。

其結果：

（1）使民众訊識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的效果。

（2）統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粤海关事件　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很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　使民众訊識了买办阶級的恶毒。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　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同盟奋起。“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爭　民众从此对强大軍閥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　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議”“废除不平等条約”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議促成运动　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議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的訊識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議”“废除不平等条約”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运动　使民众訊識孙先生，訊識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議”“废除不平等条約”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絕交宣言。

（十）五卅运动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約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駐华海陆軍等。民众因此訊識什么是不平等条約。此运动因奉系軍閥高压失敗。但有一成績：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的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

（十一）廖案　民众訊識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少。

（十二）反奉战爭　使民众明白訊識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軍閥之关系，明白訊識中国軍閥崩坏之迅速。在此战爭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軍閥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驅除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驅除吳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恒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的紧张。

（十三反教运动　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組織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訊識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十四）軍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　本党在黄埔軍校及国民革命軍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軍事势力；在广东各次战役时所作之軍民联合的宣传，使軍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軍队。此一事乃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傳

我們的宣传之部分，不能不針对敌人的宣传去作，現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帝国主义　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誣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軍閥买办阶級土豪劣紳，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通訊社之造謠誣蔑挑拨中伤，可謂无所不用其极。

（二）各派軍閥　国內各派大小軍閥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买办阶級　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比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聞报，可为代表。

（四）研究系　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安福系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联治派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国家主义派　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資工商資产阶級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獅周报乃其代表。

（八）国民党右派　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議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現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終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現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結进攻，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結果。

缺　点

从两年来的宣传中，发現了如下的各缺点：

（一）党报不健全；

（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地做；

（三）指揮系統完全缺乏，上級与下級党部的宣传部門間，完全失去連絡，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許多宣传部負責人因此放弃职务；

（四）检查糾正之职务，完全曠废；

（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給于下級党部，完全未办；

（六）有計划的党內教育，几乎沒有做；

（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

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出版《政治周报》六七期合刊）

中国农民中各阶級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你跑到农村中間去，无論你走到甚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見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貧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級，其經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貴族后裔及現在的官僚軍閥，一个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貧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剝削之上。其剝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貧农的剝削，此种剝削极其普遍而慘酷；第二种高利貸，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貧农的剝削，这种剝削之慘，有时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債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經費。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級的武装，为鎮压农民暴动維持地主阶級剝削制度之必要的設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剝削，即剝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資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經营土地，故此項剝削小地主較多，大地主較少；第五种为与軍閥及貪官污吏合作，本年包繳預征田賦，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剝削加于农民的慘酷，眞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眞正統治者，是帝国主义軍閥的眞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堅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級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計算，在农民中大概約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內），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敗者及現在之小官僚。其剝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頗受軍閥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頗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內高等知識分子如大学

专門学校教員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謂国家主义乃自他們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級，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資产阶級地位，建設一个一阶級統治的国家，然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現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在国內有本国无产阶級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級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資产阶級地位建設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級的发展及存在，感覚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眞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議論說："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級的矛盾惶遽态度。他們反对以阶級斗爭說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納共产党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級的右派，他們頗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傾向。但中产阶級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間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助农民协会們忙。但其性質极易妥协，其血統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阶級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資产阶級，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錢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給外，还有剩余，因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們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們的經济地位与中产阶級的小地主頗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們中那些什么"老"什么"会"什么"胡子"的"謹防过激党""謹防共产"的宣传頗相信，自然这些謹防的話又是从大地主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咀里出来的。这班余錢剩米派，乃是小資产阶級的右翼，他們对于現代的革命在他們沒有明了眞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說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約占其中百分之十，計一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給，每年收支怕是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們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們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軍閥地主阶級的压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覚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从前的世界。他們感覚得現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劳动时間，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点罵人了，他們罵洋人叫"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貿然参加，取了中立态度，但絕不反对革命。这一部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約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是原先本来是所謂殷实人家，漸漸变得只能保守，漸漸变得要亏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惊一次，說"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們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过着凄涼的日子，眞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較大，因为他們有一个从前与現在相反的比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頗要紧，頗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約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資产阶級的左翼。以上說三种自耕农对于現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傾的自耕农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

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資产阶級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貧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說半自耕农大概为五千万，半益农貧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謂农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这三种农民是同属半无产阶級，然經济状况大有分別。在半自耕农其生增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須租別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資弥补。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价向別人籴粮，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則租于別人的部分是只收获一半或者不是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貧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济地位頗有分別。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資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魚虾，飼鴉豕，免强維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較貧农为优。其革命性則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貧农。

貧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資产。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以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务丛集，如牛負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級，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絲毫流动資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間之长，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負之重工資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貧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級为帝国主义軍閥地主阶級之剝削压迫及水旱天災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盜、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們貴賤各別，然他們之为一个“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劫”，盜为“偷”，丐为“討”，娼妓为“媚”，名不相同，謀然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魯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济斗爭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問題。中国有两个問題，一个是食，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問題，就算解决了中国問題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級人数說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

我們組織农民乃系組織自耕农、半自益农、貧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組織之下。对于地主阶級在原則上用斗爭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济上在政治上讓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时，則須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級則劝他們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問題的解决，且不可迫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国农民》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

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立場。中国革命且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团結眞正的朋友，以攻击眞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誰是敌人誰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軍队中，未有他的响导領錯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領錯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敗。我們都是革命党，都是給群众領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响导。但我們不可不自問一問：我們有这个本領沒有？我們不至于領了群众到失敗的路上去么？我們可以一定完成功嗎？要有："不錯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謹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分清誰是敌人誰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簡单。我們要訊識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眞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級的經济地位，阶級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論那一个国內，大概地說，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析則有五等，大資产阶級、中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半无产阶級、无产阶級。拿农村說：大地主是大資产阶級，小地主是中产阶級，自耕农是小資产阶級，半自耕佃农是半无产阶級，僱农是无产阶級。拿都市說：大銀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資产阶級、錢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級，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資产阶級，店員小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級，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級。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經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級性。因此对于現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向革命的主力軍种种不同的态度。

中国各阶級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欧資本主义国家的各阶級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現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級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現代革命异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們試看中国社会各阶級是怎么样。

第一、大資产阶級

經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資产阶級完全是国际資产阶級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級——与外資有密切关系之銀行家（陆宋与东兼伯等）商业家（如唐紹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照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顏惠庆等）。

軍閥（如张作霖曹錕等）。

反动派知識阶級——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質的銀行工商业高等員司，財閥，政府之高等事务員，政客，一部分在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門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

律师等都是这一类。

这一个阶級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級

华資銀行工商阶級（因在經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資本銀行工商业的发展尙限在中产阶級地位。所謂銀行业乃指小銀行及錢庄，工业乃指小規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貨商。凡是大規模銀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資本有关系，只能算入买办阶級內。）

小地主

許多高等知識分子——华商銀行工商业之从业員，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門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級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資产阶級的地位，然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級对于民族革命历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感受痛苦时，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革命运动。但国內現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內有本国无产阶級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級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資产阶級地位的阶級的发展及存在，感覚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級即所謂民族資产阶級，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現民族資产阶級一阶級統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眞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議論說："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級的矛盾惶遽态度。他們反对以阶級斗爭說解释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納共产派分子。但这个阶級的企图——实現民族資产阶級統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現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勢力作最后爭斗的局面，这两大勢力豎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級集合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間阶級，在西洋如所謂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謂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須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幻想。他們現在虽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們現在虽然还不是我們正面的敌人，但到他們感覚工农阶級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級的利益迫他們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減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們或他們的一部分（中产阶級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們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級与非买办阶級，有一部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論，固然許多商人是洋貨商土貨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門內，是一部分摆設着土貨，一部分又摆設着洋貨。以知識阶級論，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赴东洋資本主义国家讀书的留学生，固然是明显的除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从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国內专門学校大学校讀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薰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純民族的資产阶級性質，可以叫他們做"半民族資产阶級"。这种乃是中产阶級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斗爭加深；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軍閥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級做着（資料不清）。中产阶級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緣者，此派在某种情况（如抵制外国朝流高潮时）有革命性。及其死持之空虛的"和平"观念极破，而且对于所謂"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反革命极为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級，无論其右翼，及其左翼，也包括許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

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級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級的人，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資产阶級

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識阶級——小員司、小事务員、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員、小律师等都属于这类。这一个阶級，在人数上，在阶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資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識阶級，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計达到一万万三千万，这个阶級虽然同在小資产阶級之經济地位，但实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給外，每年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財"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財。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俗財神）礼拜最劝。这种人胆子极小，他們怕官，也有点革命。因为他們的經济地位与中产阶級頗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級的宣传頗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一部分人在小資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資产阶級全数百分之十約一千五百万，乃小一部資产阶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給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不少，这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发財，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們发財，随着近年帝国主义軍閥大中資产阶級的压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覚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从前的世界。他們感覚現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劳动时間，即每天起早晨，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点罵人了，他們罵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运动，仅怀疑其未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貿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絕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小資产的一半："十分之五"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本是所謂殷实人家，漸漸变的仅仅保守，漸漸的要亏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惊一次，說"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們从前过着次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覚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們有一个从前与現在相反的比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頗要紧，頗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占小資产阶級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資产阶級的左翼。以上說小資产阶級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資产阶級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以参加革命，即左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級及小資产阶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着革命。我們从工业运动和历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經驗看来，这个鑒定是不錯的。

第四、半无产阶級。此处所謂半无产阶級，乃包含：

（1）半自耕农（2）半益农（3）貧农（4）手业工工人（5）店員（6）小販，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貧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計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頗大群众，所謂农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这三种农民有同属半无产阶級，然从經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細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須租种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資弥补。春夏之間，青黄不接虽高利向别人借貸，重价向别人籴粮，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說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則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

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都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与貧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济地位頗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較充足之农具及相当数目的流动資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魚虾，飼鴉豕，勉强維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較貧农为优，其革命性則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貧农。貧农之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資本，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數衍三日五日，債务丛集，如牛負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近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以半无产阶級，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經济地位略与农业中半益农相当，因家庭負担之重，工資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貧困的压迫或失业的恐慌，与半益农亦大致相同。店員为中小商人的僱員，以微薄的薪資，供事人畜的費用，物价年年增涨，而薪例往往須数年一更，偶与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販不論是肩挑叫卖或于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与貧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現代的革命也和貧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員大概有五百万，小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級人数共計約二万万占全国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級。其种类及人数如左：

工业无产阶級約二百万；

都市苦力約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級約二千万；

共約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經济落后，故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級）不多，二百万产业工人之中，主要为鉄路、矿山、海运、紡織、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資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級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們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員罢工、鉄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及五四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級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論那种人都不如他們"有組織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經济地位低下。他們失去了工具，剩用两只手，絕了发財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軍閥买办阶級极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别能奋斗。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头搬运夫以人力車夫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属于这一类。他們除了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經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組織的集中及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資本主义的农业，所謂农业无产阶級，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僱农而言。此等僱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絲毫流动資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間之长，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貧农处于同一要紧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級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失了工作的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爭匪禍的根源。此游民无产阶級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盜賊与娼妓。他們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如閩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魯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紅帮，都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济爭斗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問題，一个是

貧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問題，就算是解决了中国問題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誰是敌人誰是朋友，我們現在可以答复了，一切勾結帝国主义的軍閥官僚，买办阶級，大地主，反动的知識阶級即所謂中国大資产阶級，乃是我們的敌人，乃是我們眞正的敌人；一切小資产阶級、半无产阶級、无产阶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眞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級，其右翼应該把他当做我們的敌人，即使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們当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眞正的朋友，我們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們的陣綫，我們的眞正敌人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妄他們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鋪唾沫。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結起来！

（“农民运动参考书”）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一月

有些人說：国民党現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里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見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現象。我們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現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欲英日本資产阶級反抗封建貴族阶級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产阶級半无产阶級无产阶級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富僚軍閥买办地主阶級的国民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現在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国本各国資产阶級的革命，为資产阶級一阶級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內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資产阶級一阶級統治的国家，其所謂自由平等博爱及当时資产阶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产半无产无产阶級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結果是达到了他們的目的建設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終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資本帝国主义。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是小資产阶級半无产阶級无产阶級这三个阶級合作的革命，大資产阶級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級是介入革命为反革命之間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是小資产阶級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級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設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統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主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級籠絡欺騙某一阶級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級一种共同的政治經济要求，由他們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們政說的綱領；其結果是要达到建設各革命民众統治的国家：其終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設一个眞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各类平等世界六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基本属应該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員还沒有看清此点，黃兴章炳麟宋敬仁等一些右傾領袖們只知道国內滿朝貴族阶級的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簡单的“排滿”，党的組織和內容是极其簡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沒有有組織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內还沒有代表无产阶級利益的中国共产

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垻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級的反革命的联合，沒有被压迫阶級的革命的联合，只有資产阶級的国家，沒有无产阶級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沒有国际的援助。現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轉抵到国际資本主义国家；党的組織逐漸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級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級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經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实現了一个无产阶級国家的苏联和一个被压迫阶級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就因为畏惧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現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以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箅脫壳，粉紛分裂。我們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着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員的社会阶級的属性。我們知道領袖农村无产阶級向滿清貴族及地主阶級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湘泉；兴中会的組織，完全是收集滿民无产阶級的会党；同盟会的組織，一部份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是內地的会党，另一部份則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內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內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級（会党）半无产阶級（侨工）小資产阶級（一部內地学生）中产阶級（留学生及一部份內地学生）这四个阶級的集合体。此时領袖中国大地主阶級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領袖中国无产阶級半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中产阶級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卽不贊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資本見之于实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併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阶級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級在国民党中成了絕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級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諮議局化身，諮議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現今各省有議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沒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憤，决志改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一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級領袖黃兴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兴一派小地主阶級們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脫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們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級，卽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离孙先生；何以必須放弃革命；何以漸漸与大地主阶級由进步脫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目迷，何以到近日竟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級匠四年欲組織而未成型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継花熊克武把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議会县議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僱农都市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級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級的分子混入了进来。他們站在支配党的地位，孙中山及少数革命派的領袖拿了，伪不能革命。乃于走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級的利益，从工农阶級中扩张国民党的組織，并且容納共产党分子入党。当走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垻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第祖权起持异議，反对容納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說，謂二十年以来，党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眞正跟我来革命的，如×××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納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見孙先生的話。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級的領袖們，馮自由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軍伐勾結脫离了国民党，另外組織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

了拥护工人阶級的团結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阶級；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結与減租，得罪了地主阶級；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級的代表魏邦平陈嘏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們已在北京开会，图謀脫离左派領袖的国民党另外組織右派的国民党。惟聞在北京开会議中，代表小地主及与工商資产阶級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級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会議未終卽离京南下之說。我們覚得这种現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現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領袖，統率买办阶級大地主官僚軍伐等大資产阶級組織反革命的联合战綫，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領袖，統率小資产阶級（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級（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員小販）无产阶級（产业工人、苦力、僱农、游民无产阶級）組織革命联合战綫，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間的中产阶級（小地主、小銀行家、錢庄主、国貸商、华資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資产阶級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級大地主官僚軍伐的压迫使他們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現在的革命，在国內有本国无产阶級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級的积极援助，他們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級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級（除开其左翼卽中产阶級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他阶級合作可与其他阶級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現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現，还在梦想中产阶級一阶級的領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資产阶級建設一个一阶級独裁的国家。他們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級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們的革命是为了发財，其余阶級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級，其余阶級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級“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現在还在冒丁孙先生的牌，說孙先生的“主义”，“遺教”是代表了他們。其实孙先生絕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遺教絕对是为了“救苦”，絕对不是为了“发財”絕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級解放出来，絕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級。无論将孙先生的主义遺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絕对不能变动。他們介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間，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沒有这回事。他們疑忌工农阶級之兴起，他們疑忌国內及国际无产阶級政党之援助，他們丢弃了群众，丢开了帮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沒有做成革命的道路。在人数上說，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軍伐等大資产阶級至多每四百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計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貨工商业等中产阶級，大約每百个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卽約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是其余的阶級，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資产阶級約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員，小販等半无产阶級人数最多約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僱农游民无产阶級等完全无产阶級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則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十八、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零点二三。中間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間阶級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足以阻撓中国的国民革命。他們的分裂是基于他們的阶級性，是基于現在特殊的时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謂左派（所謂左派，是国民党的右派，并非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員在国民党內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的左派）的操切，就是扣平揚刘扣平郑黃东江南路北江給了陈嘏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

工給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級性，基于現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与革命乃他們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象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馳緩希望，而且将繼續紧迫。我們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間派只有两条路走，或且向右加入反革命派，或且向左加入革命派（此乃沒有此可能），乃沒有第二条路，而在現在，他們留在国民党內，实在是×××先生所說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們的分出去，为了他們的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反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結。所以我們現在到处可以听得見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結起来！

《政治周报》第四期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該报的处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子任）

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卽从登載北京右派会議的通电之日起，已經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脫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軍閥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軍閥宣传机关之一种。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个报从前是叶楚伧等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卽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論机关。該报常常不登或刪节反帝国主义及軍閥文字之該报所訊为'过火者，替帝国主义軍閥隐恶揚言无微不至，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絲毫不能宣传；去年江浙战爭該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工人流离失所时該报为資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大工人的新聞則拒絕登載或刪节而后登載；本年五卅运动中該报反帝国主义的是清远不要研究系的机关报，近数月来广东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軍閥运动肅清反革命派等重要消息該报都不肯登載，而对于孙传芳的軍事消息則占滿了篇幅。凡此皆該报反动的予兆，个个革命派，党員都早已十分不滿意該报，該报此时不过借北京右派会議內"正式反动"的宣告而已。該报自从十一月二十日表明了"正式反动"以后，連日做了許多攻击左派的宣传，这自然是該报的本分。因为該报如果不做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資格，便不能向上海工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們承訊該报的反革命地位，便不能达到該报反动的目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我們覚得十分有理由。这个証明了国民党左派之强固，証明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反軍閥运动之发展，証明了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結的时候，証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已是快要到来。在中国現在的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現在是不能再載自了。明白了这点，我們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晨报醒獅周报等可以近来攻击国民党，共产党比以前特别激烈，以及国民党右派領袖們何以必須于此时在北京开会以反对广州左派領袖的中央执行委員会和国民政府。关于上海民国日报之处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业經議决派員查办并通电各地各級党部申明該报之反动荒謬行为。茲将电文录下：

必送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并轉直录，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察台尔、綏远、热河、

哈尔滨各党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江苏省党部，杭州浙江省党部，长沙湖南省党部，南昌江西省党部，武昌湖北省党部，广州广东省党部，并轉各級党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館，海外各地党部，各同志均鉴：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議論荒謬，大悖党义，已派員查办。謹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寒。

（抄自“政治周报”第3期第5頁，
1925年12月20日广州政治周报出版社出版）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容被人重視，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很少有人重視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見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我們試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思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又算我們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料，然已与証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崇明　长江口之一島，島之全城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島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剝削佃农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納保証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漸替地主們經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納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請他們吃好酒飯，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称，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稍有反抗，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还你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沒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們，他們成群的起来打毀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鬧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結不固，首領被捕，以致失敗。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災，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繳租則坚持要照例繳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維持会議决”以欺农民（佃业維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組織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江阴　从无錫乘輪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頓山鎮，这頓山鎮在江阴常熟无錫三县之間，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利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顧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錫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組織团体，名曰“佃农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講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顧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錫三县各界农民都为煽动，如出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种种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农民尚未完全联起来之时，劣紳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錫三县，紳士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雪片传到孙传芳，孙传芳那有不听劣紳地主的話，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农合作社”解散了，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鎮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顧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們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們說“周先生是为我們死的，我們要給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农民又想起要求减租，可見他們并不怕死，他們知道只有团結奋斗，以减少貪暴地主的剝削，才是他們的出路。只江阴东乡有一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苛例为交上期例，江苏人所謂寅交卯种，是一件于农民經济上很痛苦的事。

現在农民要求种田还租，正在那里奋斗。

丹阳　这里叙述丹阳县呂城鎮的两件事，（这呂城鎮在丹阳县东乡，靠近沪宁鉄路）一件是反抗当鋪欺削农民，事在今年下間，呂城鎮上有一家当鋪，一天被馬王仁残部在县西茅山为匪者到境搶了一回，但所搶不多。当鋪主人即鳴报失，說典当的衣物都搶去了，同时密将衣物乘空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戶即近鎮各村农民，聞迅，邀截于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藏之部未得，典物的农民乃起而組織“当鋪联合会”，向呂城当鋪算賬，結果当鋪賠償損失一部，即每人賠償等于当价之数目，共賠了九百块錢，此事証明农民有团結便可得胜利，設这回沒有团結，便让奸狡的当商欺剝了全部的当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紳富农强迫农民繳錢舁水。事在今年夏秋，一事到現在尚未了結。江苏各县农村的河里，現在很普遍地采用一种机器舁水，叫作“舁水机器”，以代替旧法的手車脚車車水，呂城領附近八个村子的农民，感覚到要舁水改用机器，但这个地方的劣紳及富农便乘机图利，搶头先做，組織一个“机器舁水公司”，集合資本一千四百元，买来一架机器，安装在河里，用公司名义，要农民按亩出錢，若不出錢不准舁水，农民們一打算：所有这几村的田一年按亩交納的錢，即够买一架机器，若集資自买一架，一次出錢，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机器，則年要繳这样多錢，于是大反对劣紳富营的公司。本地有几位少学教員頓帮农民的忙，帮他們組織一个团体，叫做“农民促进会”，在这个团体內，組織一个“机器舁水合作社”，办法也是农民按亩出錢，也凑足一千四百元，买了一架舁水机器，于是河里有两个舁水机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公司的一架完全摆在那里沒人理会，劣紳气极了，用种种誣詞告到孙传芳那里，結果派兵下乡，大索过激党，捕去四人，通緝三人，声言不用公司机器的人都要重办，当兵来时，村中壯年男女都躲在木丛中，只留老弱妇女小孩見士兵的的面，这些犯了重罪的农民，单是送兵太爷恶捕礼就送了一千元，其余被搜掠者不在內，此案到現在还沒有完結。好在現在已是孙传芳不甚如意之时，呂城的劣紳們或且也稍稍感到难尽如意，亦未可知。

无錫　离无錫县城十里之徐营鎮，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乱子。此地大商兼大地主的荣德生，也要在此地修一条馬路經过农村，折毀鎮上房屋，兼价收买过路田亩，此事直接損害农民經济，故农民們組織农民俱乐部反抗荣德生，結果荣德生屈服，允許田二百元一亩，新植的桑苗一角一株，鎮上房子不折。

青浦　沪抗路側之靖浦县，上月內发生农民反对重价买荒之事。本县荒地，农民繳价买荒，历来定价每亩三元，此次劣紳县长林員一組織一公司，以每亩三元領得荒地，而以每亩十二元卖給农民。农民組織垦务联合会对抗劣紳官厅則多方恐吓，現在仍在爭持中。

泰兴　东乡王家庄地方，今年因旱少收，农民要求減租，与地主起了激烈的斗爭，地主不但不肯減租，反压迫农民，农民之中一人因恨极图杀一万恶之地主，地主报县，捕三十人入獄。

泰县　泰县森森庄地方之农民，今年因旱請求減租，起了一个运动。地主压迫，捕去为首数人。

徐州　江苏农民江北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江枪会連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斗，比他处更多，繼述不尽，銅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洼下，去年禾稼淹沒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轉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連綿，田間禾苗終日浸在水中，田萎黃而腐

烂，农民辛勤半載，溶得两手朴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載道，莫不表現一种抗慘愁苦的状态。天災之处，同时还有横征暴欽之軍閥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紳地主，层层敲剝，因此农民流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慈衍　慈衍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日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地方的农民本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和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紳地主加倍剝削，农民极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沒有收成，那地主鉄租又一些儿都不肯減，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級都很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們把警察署焚毀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繳了，又轉至乡紳地主家“吃大戶”。吃了以后，因憤乡紳地主的凶恶，把他們的屏画古董門窗壁絡搗毀淨尽，每天都是这样，他們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洩他們的愈气‘隔日乡紳逃至城內告发，軍警陆續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領袖多已逃撤。“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由此胆却起来，这个暴动就鎮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敗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沒有組織，又沒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敗。

（《响导周报》第五集第一百七十九期）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講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軍閥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組織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結果。我今天的題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問題。国民革命是各阶級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問題，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农民問題。一切都要农民問題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农民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尽丰富。能解决这个問題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問題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場，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是农民，商人貨物的原料，是从农民中运来的。商人貨物的銷場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貨物中易銷，就要农民問題解决，有余錢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現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們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手工业商业，就是农民問題沒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犹多从事革命运动。中国的学生多是很苦的，并且毕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比如一座三层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軍閥土豪劣紳，下层是工农阶級，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軍閥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現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們現在还不得打倒地主的时候，我們要赶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息，增加僱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問題的。将农民問題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业学生教职員……的問題都解决了。

視察湖南农民运动給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十六日

弟二月十二日由长沙到武昌，茲将各事报告于次：

1、弟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与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的議案起草委員会中商量了各种决議案，此次决議各案大体还算切实。十二月三十日大会閉幕。在区委决定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訓練班，弟作了三次关于农民問題及調查方法的报告。

2、一月四日起往乡下去考察，至二月五日止，共考察了三十二天，經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在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經驗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調查会，所得材料頗不少。在各县乡下所見所聞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見所聞的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現从前我們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頗大的錯誤点，在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調查后回到区委向負責同志作了一次詳細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两县調查后，又在区委做了一次报告，党从前对农运的錯誤，已經有所改正，其重点如：（一）以“农民运动好得很”糾正政府和国民党以及地主阶級一致的論調“农民运动糟得很”（二）以“貧农乃是革命先鋒”糾正社会“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的論調，（三）以从来沒有过联合战綫，糾正“农运破坏了联合战綫”的論調，今后的作法是应共同积极为建設联合战綫而努力。（四）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組織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准备建立联合战綫时期。决不能越过第二个时期（革命暴动时期）而到第三时期而不經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威风的时期（五）湘中、湘南各县大都經过革命时期，农民暴风雨般打倒地主阶級，乡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現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的建立农村联合战綫，以免去农民孤立的危險；农村中武装，民食，教育建設，仲裁等問題也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湘南的政治問題，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議，县民会議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之后，快无可言。（六）第二个时期（即农民起来暴动）的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一切作法都是对的，即使过分一些也是对的，矫狂必須过正，因为不过分，不用大的力量就不会把地主几千年积累的势力打垮，就不能迅速地完成国民革命。因此，农民协会万万不能請县政府或团防来逮捕“痞子”，只能提“整頓紀律”的口号，只能自己动手来进行农民协会基层組織的整頓，清除“少数不良分子”否則其他的任何作法都会減損农民的志气，长地主的威风。（七）阻谷問題是各界的怨府，其实乃多数貧农要阻，只少数富农要放，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貧农让富农让步，不能专代表富农去打击貧农，阻谷所以利害，全国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責任，不全是农协的責任，要谷米流通只是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負責保障民食。（八）农村間的各种冲突，如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党冲突，农学冲突，貧农与富农冲突等，均必須抬出国民党（K。M。T。）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馬上抬出共产党牌子去解放。因此，农民中必須普遍的发展国民党，让国民党去調和敷这些极难調和敷衍的事情。以前国民党发展的程度与农运发展的程度相差得太远，必須大大地在农民尤其在貧农中发展国民党組織。（九）农民問題只是一个貧农問題，而貧农的問題有二个：即資本問題与土地問題这两个都已經不是宣传的問題而是立即实

行的問題了。（十）在湖南的許多县分的农村中，农民已經完成民主革命，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貧农的情緒仍旧很高，依現在的形势，千百万的貧农群众（据长沙統計，貧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迫切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据我們的考察，无論如何压抑也不能长久的压抑住，現在是群众向左，而党在許多問題上的表示，都是不能与群众的情緒相符合。K。M。T。就更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十一）因此，无論（A）为应付目前环境，（B）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們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最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內要发展到两万人（現在才六千），省农民协会会員二万以上的县均須成立独委，这样才有办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須拉攏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是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上列十三項，举其要目，祥細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內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审核，并登报导。

湘贛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議案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宁崗步云山——

一、政治問題及边界党的任务

（一）国內国际政治状况（与毛选一第一部分同，略）49——50頁

（二）中国此时各地苏維埃政权发生及存在的原因。

（与毛选一50—52的第二部分同，略）

（三）边界割据及八月失敗（与毛选一53—54頁第三部分同，略）

（四）边界割据在湘鄂贛三省工农暴动中的地位。是54頁第四部分同）

（五）經济問題（与55頁第五部分同，略）

（六）軍事根据地問題（与56—57頁第六部分同，略）

二、边界各县党的改选与建議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間內，虽然曾領导工农紅軍作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維埃”及給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經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爭很少，（因为有紅軍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遺毒农民党的傾向，在边界各級党部中表現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內的錯誤，洗刷党內机会主义的遺毒，改造各級党部，使之走上眞正无产阶級領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級党部重要的責任。

攸县的党到現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該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責任。

（一）过去党的錯誤

1.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遺毒太深，依靠軍队而不領导群众做独立斗爭，这是一个很大的錯誤。

2.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級領导的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

脫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酃、蓮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組織上很严重的錯誤。

3.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記独裁，完全沒有集体領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訊識个人不訊識党的誤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維克的党。紧急会議中虽然很严重的指出了这种錯誤，特委經常有三个常委駐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材缺乏之故，仍然还是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員病者极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級总部的指示，仍然还是沒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議之决定。

4.指导机关，多数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領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过去党的組織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組織破底，其結果必变成不能斗爭的党。

6.过去党沒有注意基本組織——支部。

7.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問題应該集权于常委会，組織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沒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連組織科都沒有，而仅是书記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議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項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級党部，仍然还是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沒有改正。

8.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沒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員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过去工作，上級与下級隔开，下級对上級也沒有很好的巡視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錯誤。

10.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过去特委只注意軍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崗、永新两县工作。沒有顧及全部，以致成为軍队附属品。如軍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軍队沒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傾向。

（二）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設

1.党必須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肅清組織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領导。

2.特委县委都須有四个以上的巡視員，經常指导下級工作，帮助各級党部改造。

3.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級执委会、常委会都須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各級党的机关，必須組織健全，反对个人領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級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討論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資产阶級、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傾向。

6.党应該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員热烈討論，深切了解，使党員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計划。各級党部委員及书記应尽量用选举法办产生。

7.党員成分必須是先进的覚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貧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資产阶級、知訊分子、富农、須严格限制。

8.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質量，在介紹党員当中，介紹者应对被介紹者做許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紹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議上通过，經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的吸收党員，必須使每个党員成为无产阶級的战斗員，党的組織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組織——支部，实現"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並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記及委員，增加工人領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傾向，在乡村中的党員，須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訓練，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党的組織应絕对秘密，各級党部每个党員，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軍事政治势力去組織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組織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馬上建設，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12."鉄的紀律"为布尔什維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仰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級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爭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爭組織。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級的領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紀律为改造与建設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各县工作問題

各县工作詳細計划由特委負責討論。

（四）农村斗爭問題

1.过去农村斗爭，并沒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謂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貧苦僱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貧农的調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錯誤。

2.过去我們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沒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如花茶陵比較好点）。

3.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貧农之間的阶級斗爭，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貧农无团結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我們今后农村斗爭整个的策略是：团結貧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顧惜的杀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級。

5.根据这个策略，我們应即組織：（1）僱农工会（貧苦的佃农加入此組織），以此团結僱农，加强僱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組織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組織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工人运动問題

1.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鋒，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領导者，过去沒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領导更是說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們党須用大的力量去組織工会，領导工人由零碎經济斗爭进而武装暴动，糾正过去忽視工人运动的錯誤。

3.各級党部各級苏維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領导地位，領导斗爭。

（六）兵士运动問題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必須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現，故軍閥豪紳买办阶級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僱用之，以为保护他們的工具，故現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級指揮之下过飢寒交迫（敌軍有几年未发过餉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軍相当的都受了一点“阶級斗爭”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軍营的（农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覚悟。这些覚悟分子在反动軍官高压防范的严密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領导者，故不敢輕易在反动軍营中作宣传組織工作，实則他們的革命情緒，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証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經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現在反动統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覚悟的国民革命軍，我們士兵运动做的好，則反动統治很迅速的便要倒台，反之，我們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門做农民工作，則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級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顧工民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須知我們过去許多失敗的經驗，主要原因是沒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敗……。）現在如再不注意，則将来的失敗便可預言。很明显的現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級党部必須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記“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計划有組織的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軍队內当兵、当伕、当伙头……在敌兵內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遂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分，要特别注意此項工作。

2.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派人到敌人內部去組織党，不要組織士兵委員会，以免組織复杂而易于惹起敌軍軍官之发覚。

4.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造謠、恐怖煽动，以动摇敌軍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宣传問題

1.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沒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項工作中（如組織苏維埃、暴动队、分田、組織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軍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錯誤。

2.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設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語宣传大綱，都須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給各級党部繕写张貼。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須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講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以后下級党部对上級党部工作报告，須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級巡視和检查下級工作

时，亦須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閱。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綱发給各下級党部。

4.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軍閥內部的冲突，注意反对軍閥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說明軍閥混战其結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我們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須极力揭破軍閥及豪紳欺騙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苏維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紅軍，暴动队，都須制定专門宣传綱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此时我們应对同志和群众，詳細分析統治阶級与政治上經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打破灰心沒有希望的失敗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門依靠軍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們不否認軍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訓練問題

1.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員沒有訓練，甚至入党式都沒有过，現在每个党員都須加以党的基本理論的訓練。

2.特委組織教宣委員会，制定訓練材料，計划每周訓練工作。

3.特委要办經常訓練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訓練班，造成干部人材。

4.各級党部的会議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訓練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目前基本訓練工作，应竭力剷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資产阶級思想，确定无产阶級革命的人生观。

6.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識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苏維埃問題

1.过去苏維埠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門。这些所謂苏維埃政府，应一律改組。

2.由特委制定苏維埃組織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維埃，应一律照組織法組織之。

3.苏維埃必須以工人貧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长把持，实現一切政权归苏維埃。

4.湘贛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各級党部与各級苏維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須发一通告，各級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十）土地問題。接受中央对土地問題的通告，交特委討論，作最后决定。

（十一）Gy問題

1.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組織，过去边界各級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級党更严重的錯誤——主张取消团。

2.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設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負起这个責任，各級党部必須划出一部分力量，經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的建設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組織，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团的經費应該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經費上依賴党的观念。

4.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級党部应有的責任。今后各級党部向上級报告中，必須有“团工作”的一項。上級巡視員在检查各級工作中，亦須留心团的工作。

5.各級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傾向。

紅軍第四軍六次代表大会决議案(摘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毛泽东同志認为必須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如果否認这个民权革命的阶段，認为中国革命已經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这种誤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

紅軍第四軍 司令 政治 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为布告事。我們紅軍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級，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得到解放为宗旨。現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蔣桂馮閻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受压迫的小資产阶級，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組織紅軍。工人組織工会。农民組織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鎮都大大的干起来了。本年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貴。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紳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貧民。这种土豪劣紳，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該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紳，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現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左：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沒收分与貧民，不取价錢。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須减价出卖。規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轉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該欠田东債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間的債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于田东。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錢粮。

（五）工人組織工会。农民組織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組織革命委員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組織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或阻碍革命或經手公款賬目不清的土豪劣紳，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們犯罪的輕重。分别滿以死刑监禁肉刑罪款遊行示众等悔过字等刑罰。

以上六項，自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果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用全力鏟除这些恶人，决不寬貸。切切此布。

（抄自中国軍事博物館）

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

二次战爭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爭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紅軍各級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地方各級政府：

（爭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轉变敌我形势。

自从軍閥战爭暫时停頓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們在大体上說始終是一种守势，龙岡战爭，虽然取得大的胜利，但仍未能轉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轉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爭的中心任务。我們要轉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給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岡战爭更大的胜利。必須这样，才能使敌人溃敗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形势，强迫着他变成一种守势。必須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們才能彻底解决苏維埃区域的巩固問題。必須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們才能使現有苏維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須在敌人溃退下去，苏維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了，才能使紅軍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練。必須在苏維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紅軍进一步扩大与进一步精練的形势下，才能給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統治阶級內部各派爭夺領导权冲突的迅速的爆发，使各派的力量更加削弱，使各派之間的无政府状态更加发展，造成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促进反动統治区域工农兵士貧民斗爭情緒的高涨，斗爭实質的加深，斗爭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紅色区域与紅軍，創造新的紅色区域与紅軍，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內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爭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直至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假如我們不能爭取这次战爭的更大胜利，便不能轉变敌我攻守形势。那与我們上述的任务是违背的。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去爭取第二次战爭的伟大的胜利，哪一个对于爭取这一次胜利不努力，哪一个就是革命的罪人。

（二）目前敌我形势和我們二次战爭的胜利条件。

龙岡东韶战爭以后的政治形势：在反动統治方面，軍閥战爭的危机一天一天継續发展。如最近山西編制問題的就緒，张学良对于××旧部的拉攏，北方七省財政会議的召集，蔣介石极力拉攏黃紹紘解决两广問題，召集軍官講話团結干部，派人到各省拉攏小軍閥，四川云南等省小軍閥的冲突不得解决等等，都是蔣张冲突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証据。另一方面蔣介石对苏区和紅軍第一次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內部是失敗。第一軍在鄂豫皖边界有胜无敗，最近打下黃梅等处，蔣介石派七师兵力去打，无可奈何。賀龙等領导的第四軍团在湘西鄂边活动蔣介石也曾派四师兵力打过，也奈何他不得。贛东北的第十軍湘鄂边的第十八軍很活动，十六軍曾在通城解决敌人整个一团，繳枪千枝。閩西龙岩虽失，紅軍現又向汀州发展，打了胜仗。广西第七軍馳突于桂湘粵三省之交，最近到上犹、崇义，不日既可和我們汇合。至于我第一方面軍第一次战爭的伟大胜利，更是影响全国，給反动阶級以一大威吓，給各地工农以一大兴奋。据近日上海来人說，上海工人曾起来热烈庆祝这次胜利。至于江西紅色区域，除一些城池被敌人占領，接近这些城池的地方有一部分群众反水之外，有些地方还有发展。特

别是广昌、石城、宁都、三都、七保以至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爭取了几十万群众，都在不怕疲劳的与敌人不断斗爭。所以上面这些，一方面証明軍閥的冲突策略，一方面又証明革命势力的頑强。这样使得蔣介石对于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鎮压，尤其对于第一方面軍二次进攻的企图不得不更为积极些。

蔣介石在江西的兵力，除原有的公、罗、蔣、蔡、毛、許等部外，虽然增加了王金鈺，孙連仲两部，数目較前加多，但后方交通須要許多兵力維持；紅軍第七軍来贛，又要抽兵对付，因此实际用上来的兵力得不能超过九师，仍較上次兵力，差不很多。加以张譚慘敗兵心較前更加动摇，赤区进兵較前更加困难。敌人方面的弱点，原来是很多的，我們方面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敌軍，但我們有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軍心团結，大家磨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岡战爭之后，我軍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軍事訓練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統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揮。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爭回了被欺騙的群众。第五、爭取了三都、七保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爭，肅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爭的后方。第六、紅軍第七軍来到江西，給群众一个兴奋，給二次战爭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爭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們的，只要我們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爭取。

（三）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爭与我們的准备工作。

目前敌人已开始移动，南丰增加四团敌人，王金鈺已到南昌，設督办署，王部有到南城說，郝梦龄部到达吉水，吉安有部队增加，并极力拉伕。二次战爭的爆发，已一天一天逼近了。加强准备二次战爭的一切工作，是爭取二次胜利的必要条件，除关于軍事訓練工作已有参謀部指示外，本部特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紅軍与地方两个方面指示如下：

第一，紅軍的准备工作：

（1）以軍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員会議，除政治委員、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員到会外，宣传队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会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政治形势、二次战爭的意义和軍中宣传鼓动計划。报告之后，須充分討論注意糾正各种不正确的見解与实际宣传鼓动的执行方法。

（2）以师为单位，召集士兵大会，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爭的意义，对爭取二次胜利作一大鼓动。講話的人除师长、师政治委員之外，軍长、軍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要分别出席。

（3）指导士兵会开士兵会，主要是提出爭取二次胜利的各种問題来討論，使士兵对于政治方面的問題，能进一步的了解，对于准备的实际工作促使士兵自覺的做起来。

（4）以軍为单位，在大部队集中后开誓师大会。部队之外要发动当地群众参加，主要意义是鼓动士兵群众，提高士兵群众的作战勇气。在大会中講話的内容和技术，要簡短有鼓动性，講話中要插入少数口号，鼓起全場的热气；并須有准备的推动士兵提出一些关于作战方面的問題如連坐法等，重复在大会上通过。

（5）在群众会、士兵会、誓师会中都要講到軍事方面的問題（如作战注意，作战經驗，报告各部队的特殊优点与缺点等）。

（6）組織并鼓励作战附近地区的群众，作各种参战及鼓动紅軍的工作。如举行赤色戒严，派代表团对紅軍慰劳，組織担架队，欢送紅軍作战，送茶水、粥飯等。

（7）政治部应即进行对俘虏的宣传工作及宣传品的准备，办到每个俘虏有一种好的宣传品。

第二，地方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准备工作：

（1）以县为单位召集各級政府主席、游击队长、民众团体負責人的联席会，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爭的意义，計划白軍前进时坚壁清野及参战的工作。

（2）以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主要是起群众热烈参战。

（3）选举有說話技能、观念比較正确的同志組織地方慰劳紅軍代表团，到紅軍中鼓励紅軍作战。来时最好有布置：紅旗上面用文字写鼓励紅軍的口号，写明送給某軍，某某地方工农群众或某团体贈送；同时有宣传单告紅軍战士，能带些慰劳品更好。

（4）准备敌人經过地方的宣传工作，各村各乡应滿写着宣传敌人士兵的标語，散布許多簡单明了（如几句口号凑攏去）的传单。但口号条数，不要多，到处多写相同的几个主要口号。

（5）各乡村組織士兵运动委員会，做白軍士兵运动。

（6）动員群众准备欢送白軍俘虏的欢送工作。如俘虏經过的地方政府应招待飯餐，杀猪他們吃，沿途送茶水飯粥，高呼欢送新同志的口号，由群众送食物給俘虏，同时对他們宣传鼓动。

（7）地方武装部队参照紅軍政治鼓动工作准备。

二次作战中紅軍及地方游突队早晚点名口号：

一、勇敢冲鋒！

二、拚命杀敌！

三、拥护共产党！

四、拥护苏維埃！

五、活捉何应欽！

六、打倒蔣介石！

七、二次战爭胜利万岁！

八、工农解放万岁！

对白軍宣传鼓动口号：

一、白軍弟兄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二、白軍士兵要发清欠餉只有暴动起来！

三、白軍弟兄杀死反革命的官长自己选出官长成立紅軍！

四、白軍士兵不上前綫打仗不替軍閥当炮灰！

五、白軍士兵出身不替軍閥屠杀工农！

六、欢迎白軍士兵下級官长打土豪分田地！

七、优待白軍俘虏兵！

八、医治白軍伤病員！

九、欢迎白軍弟兄下級官长来当紅軍！

十、穷人不打穷人！

十一、士兵不打士兵！

十二、白軍是軍閥的軍队，紅軍是工农的軍队！

主任毛泽东

（抄自中国革命軍事博物館）

命　令

于 的 溪 总 司 令 部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一）敌之整个布置見蔣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卫另录。龙岡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軍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軍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敗兵約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賢方太之蔣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欢涛部，青塘古龙岡之孙建仲部均在向我軍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到达龙岡。

（二）我軍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岡之敌。

（三）攻击龙岡布署如左：

三軍及七軍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岡之西北端。三軍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岡之东北端。四軍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岡之南端。十二軍位置于四軍之后作总預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軍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軍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軍团及七軍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三軍在小别。

四軍在水西、高車、大蕉坑、下車、中塘陂一带。

龙岡圩、表湖、张家車、樊舖一带不駐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間，在龙岡圩区政府（圩場的南端），后晨移石路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軍軍长、政治委員、軍团总指揮、政治委員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政治委員　毛泽东

（抄自中国革命軍事博物館）

反圍攻时給紅軍的动員令

敌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們无論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們这样做就是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們的。英勇奋斗的紅軍万岁！

毛泽东

（摘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初稿」）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

紅軍宗旨，民权革命，贛西一軍，声威远震。
此番計划，分头前进，輔佐民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証，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痛苦。
土豪劣紳，横行乡鎮，重息要租，人人悲憤。
白軍士兵，飢寒交并，小資产者，捐税极重。
洋債越多，国債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蔣桂馮閻，同床异梦，冲突已起，軍閥倒运。
飯可充飢，葯可医病，共产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債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錢，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軍人待遇，必須改訂，发給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士兵，可以投順，以前行动，可以不問。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一净。
城市商人，积珠累財，只要服从，余皆不論。
对待外人，必須严峻，工厂銀行，沒收归併。
外資外債，概不承認，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軍閥，除恶务尽。
統一中华，举国称庆，滿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鏟除，肅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中 国 共 产 党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議案

（一九二九年閩西古田会議）

一、关于糾正党内的錯誤思想（見毛选第一卷87—99頁）

二、党的組織問題

紅軍的組織問題，現在到了非常严重之时期，特别是党員質量之差和組織之松懈，影响

到紅軍的領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問題特作詳細的分析与决定。同志們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組織，务使党的組織确实能担負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党的組織路线

甲、党員发展的路綫，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伕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視。

乙、每連建設一个支部，每班建設一个小組，这是軍中党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在党員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組时，則暫以排为单位建設小組，而把組員有計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須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丙、紅軍原有的小組編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識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編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計划的将各种工作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的混合編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純地把干部分子編成小組，那是要不得的。

（二）党的組織松懈问題

甲、四軍党的組織現状：

（一）党員加入太随便，許多不够党員資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質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各級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問題，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訓練性質的会議，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組联席会，委組联席会，支部大会，縱队或支队党員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三）一般的紀律松懈，特别在負担重要工作沒有人代替他的情况下，对他所犯錯誤，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紀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紀律一般的放松了。

（四）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員，結果所有軍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員，便很少注意他們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級軍事工作会議，各級政治工作会議几乎完全沒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員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簡直不談起了。

（五）上下級关系不密切。下級的报告，上級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級会議上級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級机关組織不健全，但上級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級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詳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一般的缺乏詳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連粗略的指导都沒有。

（六）支部大会与小組会，有許多沒有按时开。

乙、糾正的路线：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錯誤，吃食鴉片，发洋財及賭博等，屢戒不改的，不論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点沒有錯誤（包括阶級覚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沒有发洋財的观念；

5、不吃鴉片，不賭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紹他入党。介紹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紹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經过必須的介紹手續。介紹入党后，要詳細告訴新党員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員应遵守的要点。介紹人对被介紹人应負相当責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談話，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3）各級党部不单是解决問題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訓練同志的会議，及其他訓練办法如訓練班、討論会等，都要有計划的举行起来。

（4）严格的执行紀律，废止对紀律的敷衍現象。

（5）分清党員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質，每个党員（除开党內負了重要或专門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須担負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負党給他的工作。

（6）各級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該比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級对上級要有詳尽的报告，上級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詳尽的討論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級会議，不能借口工作人員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間不够，来掩盖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7）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級党部，应該有計划的每月規定支部大会及小組会討論的材料，并規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

（三）怎样使党員到会有兴趣

甲、党員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不明白会議的意义。支部会議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問題，內部的問題都要在会議上集中討論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見，就是他不了解会議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爭沒有兴趣，凡是对斗爭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議不仅解决了問題，而且在解决問題的过程当中，要考察問題的环境，要参考上級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們的心思才力，由会議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們每个人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了，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这就是会議的教育意义。紅軍党員因为不明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决議案决議了不执行，或对上級請求事項很久得不做答复，因此减少討論兴趣。

（3）負責人事前沒有好的准备。不准备議事日程，对問題的內容及环境不明了，問題应怎么解决也沒有准备一点意見。

（4）主席輕易停止党員发言，发言偶出題外，便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錯誤，除停止外还譏笑他。

（5）封建式的会場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獄，

乙、糾正的方法：

第一，会議要政治化实际化。第二，要把会議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提醒，尤其是对新党員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員。第三，决議不要輕意，一成决議，就要坚决执行。第四，上級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級的問題，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第五，負責人事先要准备議事日程，議事日程要具体化；对問題的內容和环境先要調查清楚，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第六，

主席指导会議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討論潮流奔赴到某一問題，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題外的发展，不仅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制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地点，介紹給大众，成立新的議題。这样会議才有兴趣，問題才能得到眞正的解决，同时会議也才能眞正实現了教育的意义。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場秩序。共产党的会場是要反映无产阶級之积极活动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红军党内青年組織及其工作

（1）部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沒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組以班为单位建設方有利斗爭。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設立团的小組的必要。

（2）党員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緒，除一般的接受党的訓練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爭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須有专門組織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員（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議。这种会議，除以大队为单位經常有計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縱队亦各应酌定时間，召集开会。

（3）为計划对青年党員的教育，計划爭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議，前委及縱委里头各設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員会，支队委及支委則各設一个青年委員，在各級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五）政治委員与党内工作关係

大队支队两級党部的书記，以不兼政治委員为原則。但在工作人員缺乏的部队，仍可暫时兼充。沒有担任党的书記的政治委員，上級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員，有指导該級党的工作的任务。

（六）直属部最高党部问

軍及各縱队的直属队，均組織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員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士兵会党团问題

大队士兵会不設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縱队士兵会要設党团，此党团受縱委指导。

三、党内教育問題

（一）意　义

紅軍党内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为了紅軍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爭之任务之能够負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肅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紅軍，更不能担負重大的斗爭任务。因此，有計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糾正过去之无計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規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員，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詳細的討論，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材　料

（1）政治分析；

（2）上級指导机关的通告討論；

（3）組織常識；

（4）紅軍党內八个錯誤思想的糾正；
（5）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問題的討論；
（6）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7）游击区域社会經济的調查研究；
（8）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9）社会經济科学的研究；
（10）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問題。

以上十項，除一部分（如社会經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員。

（三）方　法

（1）党报；
（2）政治簡报；
（3）編輯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4）訓練班；
（5）有組織的分配看书；
（6）对不識字党員讀书报；
（7）个别談話；
（8）批評；
（9）小組会；
（10）支部大会；
（11）支部委組联席会；
（12）縱队为单位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13）全軍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14）縱队为单位党員大会；
（15）縱队为单位各級书、宣、組联席会議；
（16）全軍支队以上书、宣、組联席会議；
（17）政治討論会；
（18）适当地分配党員参加实际工作，

四、紅軍宣傳工作問題

（一）红军宣傳工作的意义

紅軍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爭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現，才可以达到組織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消灭反动勢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紅軍的总任务。所以紅軍的宣传工作，是紅軍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視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紅軍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統治阶級剝削紅軍的勢力。

（二）红军宣傳工作的現状

甲、宣傳內容的缺点：

（1）沒有发布具体的政綱（从前发布的政綱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忽略群众日常斗爭的宣传与鼓动；

（3）忽略城市貧民之取得；

（4）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对流氓无产阶級的宣传不充分；

（7）极少破坏地主阶級武装組織（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

（8）宣传沒有时間性地方性。

乙、宣傳技术的缺点：

（1）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員由每大队五个縮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队連一个都沒有了。

2、宣传員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伕馬伕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机关不用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現在的宣传队簡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队成分太差，工作成績少，引起一般人对它的不滿）。“閑杂人”“卖假膏葯的”，就是一般人送給宣传队員們的称号。

4、宣传队沒有够用的宣传費。

5、对宣传員的訓練沒有計划，同时对他們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簡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沒有人理它。

（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鮮，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壁报出的很少，政治簡报內容太簡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革命歌謠簡直沒有。

（5）画报只出了几张。

（6）化装宣传完全沒有。

（7）含有士兵娛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沒有办起来。

（8）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紅軍紀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現在的紀律比較松懈了，因此給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上門板、捆禾草、談話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賠尝損失，这些都是紅軍宣传工作的一种，現在也做得不充分。

（11）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对白軍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 糾正的路线

甲、宣傳內容方面：

（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綱，名曰紅軍政綱。

（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爭情緒，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爭情

緒尙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爭，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城市貧农（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視了这个力量之爭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給豪紳資产阶級。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們。

（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經济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証明对革命的迫切要求，而且是决定革命胜敗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

（5）劳动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爭中他們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所以做好对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級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級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級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須注意各部分游民生活与性質之不同，分别的对他們宣传。

（7）地主阶級武装組織之破坏及其群众之爭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間（如秋收与年关，蔣桂战爭时期与汪蔣战爭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

乙、宣傳技术方面：

（1）宣传队問題。

1、意义：

紅軍的宣传队，是紅軍宣传工作重要的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紅軍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訓練問題，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論上糾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輕視的观点，“閑杂人”“卖假膏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該从此取消掉。

2、組織：

子、以支队为单位，軍及縱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組織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員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員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員三人。

丑、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員指揮。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員指揮。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揮，全縱队各宣传队，受縱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揮，全軍宣传队，受軍政治部宣传科指揮。

寅、宣传队用費，由政治部发給，須使之够用。

卯、改造宣传員成分的方法，除請地方政府选进步分子参加紅軍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調班长）为宣传員。政治部应經常地作出訓練宣传队的計划，規定訓練的材料、方法、时間、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員的質量。

（2）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

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問題的重要一項，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当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軍及縱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負責，名字均叫做“时事簡报”。內容是：（一）国际国內政治消息；（二）游击地区群众斗爭情形；（三）紅軍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紙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簡报的編印，应当注意下列各項：1、要快；2、內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一点，要清楚点。

（4）各政治部負責，征集并編制表現各种群众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治部編制委員会負督促及調查之責。

（5）軍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該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軍艺股，应該把全軍繪画人材集中工作。

（6）化裝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設化裝宣传股。

（7）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內建設俱乐部。

（8）宣传队中設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

（9）严格地执行三条紀律。

（10）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計划有組織的召集各种群众会議，要預先規定开会秩序、演說人、演說題目及时間。

（11）对白軍士兵及下級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簡单，使他們頃刻間能看完；要精警，使他們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計划的在敌人經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实某現实部队的标語之外，还要将宣传品存儲于沿途党部及群众机关中，俟敌軍經过时，巧妙地传达給他們。

3、从俘虜官兵中及邮件檢查中，調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給他們。

4、优待敌方俘虜兵，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的方法。优待俘虜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他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物件，过去紅軍搜檢俘虜兵財物的行为，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虜兵，使他們感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給俘虜兵以任何言語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給俘虜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資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經过宣传之后，发給路費，放他們回去，使他們在白軍中散布紅軍的影响，反对只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割下来。以上各項，对于俘虜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軍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錢，要完全和紅軍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葯发給了錢的伤兵，送返敌軍。对待敌人受伤官长亦然。

五、士兵政治訓練問題

（一）材料问題

下列各項，应很艺术的編制課本，作对士兵訓練的材料：

1、目前政治分析及紅軍之任务与計划；

2、土地革命各方面；

3、武装組織及其战术；
4、三条紀律建設的理由；
5、早晚点名口号；
6、識字运动；
7、怎样做群众工作；
8、紅軍标語之逐个解释；
9、各种偏向之糾正；
10、苏俄紅軍；
11、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12、紅軍白軍比較；
13、共产党国民党比較；
14、革命故事；
15、社会进化故事；
16、卫生；
17、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經济常識；
18、革命歌；
19、图报

（二） 方 法

甲、上政治課：

（一）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課，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員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員分担各課，除战斗兵須到課外，传令兵、勤务兵、长伕、馬伕、伙伕，均須到課。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士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識。

（二）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挑选稍識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識者五十五編成。支队政治委員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員分担各課。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較普通班高一級的政治常識人材，以备将来升当下級干部之用。

（三）干部班以縱队为单位，軍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級軍佐，及其他指定人員編成。目的在提高現有下級干部的政治水平綫。使能領导群众，以备将来能充当中級干部。由縱队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縱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四）以支队为单位組織政治訓練委員会，以支委各政治委員会幷軍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訓練者組織之，以大队政治委員为主任。其任务为討論在一个支队內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訓練的种种問題。

（五）軍及各縱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訓練，由軍及各縱队政治宣传科負責組織，政治訓練委員会执行之。

（六）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解俗）；

5、說話要明白；

6、說話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說話；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綱

10、干部班要用討論式。

乙、早晚点名说話；

（一）說話时間每次最多不过半小时；

（二）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評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丙、集合講話：

（一）支队每星期一次，縱队每半月一次，全軍不定期。

（二）每次講話，須要有計划的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員商同軍事工作机关）規定講話內容，指定講話人，并分配講話时間。

（三）每次講話时間，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四）每次講話內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級政治机关須报告上級政治机关。

丁、个别談話

（一）对下列各种人必須和他做个别談話：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罰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二）談話前，須調查談話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三）談話时，須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誠恳的态度和他說話。

（四）談話后，須記录談話的要点及其影响。

戊、游戏：

（一）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娛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打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調；

6、旧剧。

（二）于每个宣传队下，設化装宣传团。

（三）游艺設备費用公家支給（大队的由縱队政治部批准）。

己、改良待迂：

（一）堅决废止肉刑；

（二）废止辱罵；

（三）优待伤病兵；

（四）恢复每月发草鞋大洋四角的制度。

庚、怎样做新兵及俘虜兵的特别教育：

（一）把紅軍生活慣如①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間只有职务的分别，沒有阶級的分别，官长不是剝削阶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阶級）；②三大紀律及其理由；③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④紅軍中的經济制度（經济的来源、管理經济的組織，經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⑤經济委員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⑥废止肉刑辱罵；⑦优待俘虜等項，講給新兵們俘虜們听。

（二）講述紅軍斗爭略史：

（三）紅軍的宗旨：1、紅軍与白軍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虜兵要詳細講；2、紅軍与土匪所以不同；3、紅軍三大任务。

（四）講述紅軍組織系統

（五）普通政治常識。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軍閥受帝国主义指揮，到处混战；4、分田；5、苏維埃；6、赤卫队等。

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一）各縱队政治委員負責編制青年識字課本（以商务館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課，龙岩文化社教本作参考）。

（二）每个縱队內設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設一主任教員，每班以教授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三）由公家出錢备置紙笔墨等用具发給学生。

七、廢止肉刑問題

（一）红军中用的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縱队第八支队某官长爱打人，結果不仅传令兵伙伕差不多跑完了，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經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欢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鉄匠，結果，

士兵感覚沒有出路，充滿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調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結果，跑了四个伙伕，一个特务长，两个斗爭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黨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縱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縱队調去的队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結果，士兵紛紛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縱队。二縱队逃兵比任何縱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縱队下級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慣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队曾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紅軍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說是二縱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結果。現在紅軍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們严重注意。

(二)肉刑的来源和廢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級为了維持它的封建的剝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罰做工具，以鎮压被剝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經济的发展，进到資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的个性，增强他們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資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資产阶級的国家，一般的廢止肉刑，在軍队中亦早就沒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經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誕生，阶級斗爭的激进，工农阶級有推翻統治阶級的权利和依于这个权利的剝削，便要发展自己阶級群众的广大力量，才能取得斗爭的胜利。苏維埃政权，是最进步的阶級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紅軍中老早沒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紅軍第四軍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从封建軍閥軍队里头轉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慣，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慣和非打不怕的习慣，还是与封建軍閥軍队里头的习慣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規定士兵会有申訴他們的痛苦的权利，但簡直沒有什么效力，結果造成官兵間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緒，逃跑的数目日多，軍中充滿了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紅軍斗爭任务完全背馳的現象，如不赶快糾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糾正的方法

(1)坚决的廢止肉刑。

(2)举行廢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廢止肉刑方才利于斗爭"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廢止肉刑覚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廢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和訓練，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廢止肉刑更頑皮了，而且因廢止肉刑，增加了斗爭的緒情，撤去了官兵的隔閡，将要自覚的接受管理訓練和一般的紀律。

(3)肉刑廢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慣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現象是会有的，这应該加紧我們的責任，努力于說服精神和自覚遵守紀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爭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封建現象，便掩护了它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慣。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現象的对廢止肉刑，或对廢止肉刑运动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爭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統治阶級。

(四) 紅军廢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修改紅軍惩罰条例；(2)由最高軍事机关会衔发布廢止肉刑的通令，并頒布新

的紅軍懲罰条例；（3）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軍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議，詳細說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4）一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議，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覚的遵守紀律外，并要產产群众的紀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收获。

八、优待伤兵問題

（一）伤病兵痛苦的現象及影响

（1）全軍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葯少，担架設备不充足，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許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的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2）全軍軍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如1、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沒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簡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議对卫生問題討論很少。2、官长对于伤病兵沒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們，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窩，随时慰問等习慣，在紅軍中簡直沒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問态度，甚至表示討厌他們的态度。3、行軍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們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罵，或无情的驅逐他們。

（3）重伤重病兵給养和用費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沒有衣服換，調养費，病官有，病兵沒有。

（4）蛟洋医院的缺点：①无組織状态；②医官和葯太少；③医官卖私葯；④不清洁；⑤御寒衣被不够；⑥看护兵太少；⑦飯食恶劣；⑧房子窄；⑨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獄，不愿在后方。

上例各种对伤病兵的待遇不良，便发生了下列影响：①使士兵不滿紅軍，“紅軍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輿論簡直普遍全体士兵以及下級官长之中；②士兵和官长不滿意，越发增加官长間悬隔；③士兵及下級官长都怕带花，因此，減少紅軍战斗力；④逃兵多；⑤影响工农群众，減少他們加入紅軍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1）軍政机关对于卫生問題，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議，应該充分討論卫生問題。

（2）卫生机关的組織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葯少的問題，要尽可能設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們看病詳細一点，不要馬馬虎虎。

（3）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視伤病兵，送茶水給他們吃，晚上替他們盖被窩。他們覚得冷，要替他們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照护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4）对行軍时，沿途落伍的伤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們的怒罵和譏笑；2、伤病兵趕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說，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論那一个部队和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論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照顧，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

尽量設法僱佚抬来；4、每次行軍，后卫要耐煩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需时还要替他們背回枪弹。

（5）发給伤病兵零用錢，要酌量伤病兵的輕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輕伤輕病的多給一点。調养費一項，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該不分官兵佚，酌量发給。

（6）伤病兵衣服被窝問題，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該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錢，而且是喚起全軍互相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7）蛟洋后方医院許多缺点，应該有計划去糾正。此外还应該在閩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現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紅軍。

九、紅軍軍事系統与政治系統关系問題

（一）在高級地方政权沒有建設以前，紅軍的政治机关与軍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的执行工作。

（二）紅軍与群众的关系：

（1）凡有全軍意义的事項，如发布政綱等，軍事政治兩机关会銜发布。

（2）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組織群众、建設政权等以及沒收、审判、处罰、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揮监督，在地方政权沒有建設以前，均系政治部职权。

（3）凡沒有建設政权机关的地方，紅軍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建設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經建設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机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則。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紅軍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項，得用地方政权机关与紅軍政治部会銜的方法处理之。

（4）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責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軍事訓練及战时的作战指揮，这个責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需尽可能的經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綫，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紅軍里面用人行政，軍事政治兩个系統，各有独立的路綫，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員等之互相調动，消息之互相传达时，則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軍风紀之执行，軍事政治兩个系統，相互間均用阶級服从原則，不得借口系統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揮。

（五）凡給养、卫生、行軍、作战、宿营等項，政治系統应接受軍事系統之指揮。凡政治訓練及群众工作事項，軍事系統应接受政治系統之指揮。但指揮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

（六）凡紅軍筹款的指揮及政治工作用費的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軍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手續，政治部直接軍需处）。党部用費由政治部支給。

（七）軍事机关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員須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須署名。政治机关一切命令，政治机关单独行使，政治委員无須副署。

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給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省行委轉左路行委、贛西行委、湘东特委：

1、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軍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內房外都写滿了标語、宣言和歌謠，又組織白軍士兵运动委員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仿区之一点也沒有做，吉安祥油大部未搬，盐沒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仿区及吉安的情框之，西区、儒林区、純化区、太和、永新、蓮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云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也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贛西、贛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錯誤观念，要举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都复灭，新喻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損失，峽江紧急会議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幷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資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訓。

2、报載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継續开拔，从遂蓮花方面进攻贛西、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要飞速准备敌外，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負很大的責任，一进到永新、安福、太和、吉安等地，贛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誤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蔣、蔡、罗、李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紅軍第三軍負了很大的責任，上述許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揮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揮部，截至現在正好象沒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沒有发一个通告指示工作，又沒有发一个通报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要指揮就是（原稿缺字）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贛西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贛东行委、贛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此紧急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最近召开的贛西行委扩大会議，贛西各县委員会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蓮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該邀他們列席旁听），眞是非常之不应該。

3、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錢，不发油、盐、米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給紅軍油、盐、米一事，当沒有接到通告，我要財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宁都，一經純化、水南、波头、白沙，办理紅軍給养問題，財政部負責人員号应接应了，实际上幷沒有做，等两天紅軍到了这些地方了，油、盐、米問題全然仍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須予从省政府的盐中批一部分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給紅軍，不用錢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論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支，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提款不可，紅軍一到紅色区域，一切供給都要向省政府領取，此外沒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計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該每天开一次会召集負責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4、我們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苻田，望省委左委贛东行委贛西行委二十二軍軍委每天各有一个情报送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內述独立师繳枪五百余等事的）在安收到。

毛泽东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

一切过去的經驗都証明：只有土地問題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級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級斗爭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級領导下，参加苏維埃各方面的建設，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維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爭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經驗，农村中阶級斗爭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沒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設的阶段。依照土地斗爭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內，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新发展区域，（二）斗爭比較落后区域，（三）斗爭深入区域。

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爭的发展，还在沒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問題，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級的政权，建立革命的群众团体，沒收地主阶級的土地財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給僱农、貧农、中农……凌除債物，焚毀田契与借約。这个阶段中的斗爭，是包括这些区域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接战以至革命打敗反革命而实行处理他們的土地財产的这一整个时期。

在斗爭深入区域，这里已經建立了巩固的苏維埃政权、地方武装与与革命群众团体是广大的发展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已經完全克服下去，土地已經彻底分配好了，农民群众在土地問題上的斗爭已經进到了改良土地发展土地生产的阶段。所以这里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建設問題。

在斗爭比較落后的区域，其发展阶段介在上說两种阶段之間，即是从临时政府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沒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公开的反革命斗爭，已經在第一时期被革命群众打敗了，他們中間許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搖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贊成分田，自算貧苦的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們积极地活动，凭借他們历史的优点，“說也是他們会說，写也是他們会写，”所以他們就在第一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証明他們在把持临时政权，鉆进地方武装，操縱革命团体，有时候比貧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及至进到第二时期，因为上級政府的督促与群众斗爭的发展，改造了革命委員会为苏維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已經过了第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那些假装革命的分子，部分的被洗刷出去。許多地方的土地实行了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第四次的分配，地主富农偷取的土地也清除一部分来。但是苏維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間，还依然躲藏着許多阶級异己分子，在那里“称紅带子算同志”，在那里造謠言，开私会，在那里鼓群众为“左傾机会主义”“乱打土豪”、“公报私仇”，或者他們“开会說得有劲，閉会一事不行”，当着斗爭剧烈的时候，他們組織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AB团、新“共产党”以及各种各色的东西来破坏革命、謀害革命的积极分子。总之地主富农阶級用各种方法来压制群众的斗爭，企图保持他們政权上的与土地財产上的权力，保持他們的残余的的封建势力。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

之間是严重的斗爭着，但这里的斗爭，不是象第一时期里紅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爭了，而是革命的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爭。这种斗爭有他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就是暗藏的反革命不比公开的反革命，农民群众能够一眼看清楚。加上农村中各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如民族关系等。要使农民群众阶級覚悟程度，一般都訊識到应該最后消灭封建残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共产党与苏維埃政权一定要耐心的去向农民解释，一定做許多艰苦的工作，要有正确的阶級路綫与群众工作方法。这里的中心問題，就是查田查阶級的問題，这个問題不解决，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就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起来，封建残余势力不能完全打倒下去，苏維埃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扩大紅軍，筹备經費供給紅軍，扩大地方武装，进行土地建設与經济建設，发展文化教育等等重大任务，都沒有法子得到最大的成功。所以查田运动是这些区域里的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

拿中中央苏区来說，这种斗爭比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鄔、安远、信丰、乐安、宣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县，瑞金、雩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贛县、上杭、永定、新泉的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問題沒有彻底解决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沒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沒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維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級异己分子在暗藏着在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組織，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些原故，这些地方的战爭动員与經济建設都远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贛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瑞金的武阳区，雩都的新陂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这种地方竟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在这个广大区域內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級斗爭火焰，向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爭，而把他們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維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緩的任务。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一切过去的經驗都証明：……（見“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务”一文所述的这一段的开头至建立革命临时政权相同。故略）……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員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及群众团体，才能保障阶級路綫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講阶級，通过阶級，沒收分配及对工会、貧农团的正确領导等。

一、講阶級（做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領导，依靠貧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內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說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說明这个策略起見，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貧农，什么是工人說清楚。在这个說明中証明地主是封建剝削者，富农是封建剝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貧农、工人身

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时不应該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的中心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說明这个策略，說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絕对不許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見，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說他，要着重說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中农的欺騙，使中农脫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結在貧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爭。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騙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民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貧农进行欺騙破坏。

（六）要說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肅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搗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紅軍、經济建設等項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該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起来斗爭，必須提出提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員犯了脫离群众的严重錯誤，使得群众不滿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員的錯誤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爭。

（八）以上是宣传的內容，以下再說宣传的方式。查田运动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級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負責人）講話，使他們首先明了，經过他們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貧农团会議上講話，使会員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講話，使每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員，主要由乡一級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的出席群众会議上去講話。其次是組織宣传队，經过訓練后派往群众中講話。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講話。第二，貼布告。第三，写标語。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查阶級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級，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絕对錯誤的。

（二）查阶級是查地主富农阶級，查剝削者，查他們隐藏在农民中間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貧农、工人阶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絕对錯誤的。

（三）查阶級前，一定要經过宣传的阶段，即講阶級的阶段。不經过公开的普遍的講阶級阶段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絕对錯誤的。

（四）查阶級要发动工会、貧农团的会員及其他群众多数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貧农团与查田委員会。不应該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絕对錯誤的。

（五）查阶級要查明白，不論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們过去的剝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滿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語，那就容易弄錯，本人不服，群众不滿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細查清，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級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級成分調查表”上，使大家好評論，日后好根究。如只講口里記在心上，或只在簿上写两三行，易于遺失，是不好的。

三、通过阶級

（一）通过阶級就是决定阶級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問題的时候，故要十分慎重。一定要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貧农团，要开貧农团大会。經过大家討論，大多数人举手贊成，才算在貧农团通过了。如有疑問的移到下次討論，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員会，对于貧农团的意見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調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員会。区查田委員会决定不下的，提出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剝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贊成不贊成，贊成的通过，不贊成的再去調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滿，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級的四个步驟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許多地方，不經过群众会通过就去沒收，是錯誤的。

（七）如果过去錯誤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該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說明过去錯了，現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滿意。

（八）过去弄錯了現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賠他的土地財产，即使田分了也要抽出賠他。如是富农，現在有則賠，如果实在沒有賠的，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办法。这种賠还，最能爭取群众，如果将錯就錯，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四、沒收分配

（一）沒收地主土地財产，沒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經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才能实行，决不可能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沒收，决不可黑夜去沒收。

（二）沒收了地主的財产，除开現款及宝貴文件交政府財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爭热情的好办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級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沒收分配委員会，即刻沒收，当場分配，不得迟延沒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講分配。

（四）要分配給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推（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給紅軍家族、僱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貧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豬鴨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員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員最好不要求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乏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員自由的拿东西。

（八）沒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組織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沒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紅軍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給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塘、房屋、茅廁，同样要迅速分配給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爭热情最高涨时，要适时的提出扩大紅軍、发展合作社

等口号，領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爭，热烈参加苏維埃建設。

五、工会貧农团

（一）所有講阶級、查阶級、通过阶級、沒收分配等許多工作，都只有动員工会、动員貧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級斗爭的領导者，貧农团是农村阶級斗爭的柱石。

（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員加入貧农团，在貧农团內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貧农团，使貧农团成为广大貧农群众自由願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貧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貧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結中农在貧农团的周围，貧农团的会議应該吸收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貧农团領导查田斗爭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則。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員广大的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滿的成功。一切不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認眞、不普遍，查阶級，通过阶級与沒收分配，不按阶級路綫与群众路綫，不得群众贊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績，反会使群众不滿，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領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論查田运动”）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結

（一九三三年）

一、偉大的胜利

查田运动在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已經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說，查田运动过去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那末在六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七月一个月的工作，便已超过了去冬以来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績。一般說，在开会的八个县中，查田运动已經进入了一个新形势。查田运动已經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瑞金与博生成績最大，两县共查出了二千八百家地主、富农；胜利、雩都、会昌、汀乐、长汀、五城、宁化各县，亦都有了初步成績，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爭发动了，苏維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許多过去停頓着的状态現在都活跃起来了。苏維埃中的坏分子許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严厉的鎮压。一句話，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慘敗。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在查田有成績的区域，扩大紅軍与扩大地方武装，推銷經济建設公債与发展合作社，秋收秋耕与发展劳动互助社，以及俱乐部夜校小学文化建設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成績。一切工作进行更加順利了。在群众活跃的基础上，大批积极分子自己創造成为各种工作干部，許多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被吸收到苏維埃工作中来，最好的例子是

瑞金的壬田区，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家，枪决了群众所謂“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鎮压了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检举了苏維埃工作人員中犯了严重錯誤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混进苏維埃里来的阶級异己分子出去。全区查出了土地二万七千担，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谷土地，分配了豪紳地主的无数財物給予群众。依靠于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扩大紅軍七百余人进瑞金模范师去，沒有一个开小差，节省谷予卖給紅軍，达到一千九百余担，全县沒有任何区比得上它，在各乡的要求下，全区担任推銷經济建設公債四万元，地主罰款富农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認繼續去筹备一万元。合作社迅速地发展了，文化教育建設如俱乐部，識字班，夜学也增加了，党員数量扩大，党的領导加强了，工会工作也进步了。全区另換了一种新气象，由瑞金的一个落后区在五十五天中換了地位，成了与武阳区相等的一等区了。我們現在要問：“壬田区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成績呢？那我們应該指出，由于他們認識了查田任务的重要，由于他們的动員方式，阶級路綫与群众工作，都是坚决执行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正确指示，他們做了眞正布尔什維克的工作，在任务的認識上，他們懂得查田运动与革命战爭有密切联系，因此他們認眞的做这工作，抓紧了查田运动的領导，有計划的去布置当地的工作，在动員方式上，他們在全区十一个乡中，抓紧了最落后和比較落后的七个乡的工作，在这些乡中动員了党，动員了团，动員了乡苏，动員了工会与貧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經过他們去动員广大的群众。在阶級路綫上，坚决执行了依靠僱农貧农与联合中农的策略，广大的发展了几个中农他們說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級不是查中农貧农僱农阶級，他們“講阶級”的工作做得很充分。当着鵝凤乡的地主，恐吓中农，使部分中农发生恐慌的时候，我們的同志找了几个中农来作个别談話，經过他們去传达其它中农，鵝凤乡的中农立即稳定起来，接着积极拥护苏維埃的查田政策，从受地主、富农的欺騙轉到与貧农工人一致进攻地主富农，壬田乡的同志亦曾錯誤地处置了几家成分，但他們迅速地改正了錯誤，关于領导群众斗爭的工作，首先他們做了广泛的宣传，不是开的全区全乡会，他們开的是村子屋子会。这样去接近更广大群众，向他們做了多少次的宣传鼓动，所以全区群众都明了查田查阶級是自己的責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調查阶級的成分，发动了多数人去查，詳細搜查了各个成分的材料証明給群众看，所以沒有发生群众不滿意的事，其次通过阶級成分，是首先通过了查田委員会的分析决定，提交貧农团討論通过，送达苏区批准再到被沒收人的村子里召集本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贊成，然后举行沒收，在分配財物与土地上，工作人員都能了解自己应做模范，不拿东西，而把东西完全分給群众，沒收的村子多分，其它的村子少分。得到了群众的完全滿意。土地也迅速地分配了。别地拖延很久，不分的現象，壬田区是沒有的，所以迅速地发动了群众。他們打进落后大村子的办法也是正确的，他們不是畏惧这些大村子，他們也不用蛮干的办法来应付，他們对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做了更多的宣传，从爭取当地的积极分子着手，团結他們，教育他們，經过他們去动員其它的群众，他們很耐心地去做这种村子里的工作，表面上看是迟慢的，但实际上是迅速的，他們在五十五天中把壬田区所有的落后大村子一概发动了，很短时間消灭了这些村里的落后，抗柏坑乡的一个村子打不进去，原来那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們就采取不同的办法，首先捉到这两个坏东西在当地开巡迴法庭审判他們，經过群众热烈拥护枪决他們，那里的群众斗爭就象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

他們开了十次群众审判大会，三次巡迴法庭都是經过了极广泛的群众路綫，本乡的人都到，别乡的人每村派代表，小乡十几人，大乡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审与裁判的結果，都立即传播到了全区各乡各村去，不但使各个乡村的群众都覚得今天审判的这个人該罰該杀，而且使他們立即想到自己地方那个同样作恶分子也該处治他。壬田区的查田运动眞算得全苏区的模范！瑞金九堡区的查田运动工作也有极大成績，他們首先是抓紧三个乡去做，召集各乡的查田委員会委員，到苏区开了三天訓練班，講明了动員方式，阶級路綫与爭取群众的方法，他們在沒收分配問題上創造了一个好办法，他們的办法是：要沒收一家地主了，就号召本村本屋的群众一同去，在群众大会上选举了沒收分配委員会，在群众的监視下进行收費，沒收的东西堆在一个大坪上，再經过群众同意立即分配給应得东西的群众。吃得的东西又是一个处置，就是杀猪煮飯群众大会吃一頓。这个办法在九堡区收了极大的成功，他們沒收分配委員会不是經常組織的，而是临时組織的，更加密切联系了群众（关于土地的沒收分配，仍有經常的土地委員会負責）。一切东西不挑到乡苏去。不得集中了若干家然后分配，免去了拖延时日与被别人偷去了的毛病，九堡区在其他的路綫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确的，所以能够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查阶級。他們办到了沒有一个地主富农到苏維埃来鬧，成分与过去查田时的情况完全相反，过去总有許多被查的地主、富农到苏維埃来横鬧，說把他們查錯了，不但本人，甚至有时有个别乡代表貧农团員負責人也有来替他們求請討保的，这次当然不是地主富农不鬧了，而是鬧也鬧不起来了，他們的同宗，他們的亲戚，沒有一个人贊助他們，地主富农軟了劲，沒有鬧的可能了，这件事說明了九堡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极充分，不然是办不到这个地步的。

所有这些光荣模范的例子（这种例子别的地方还有不少），給了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以布尔什維克的回答，証明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絕对正确性，那一处完全执行了这些指示，那里就立即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誰违背了这些指示，忽視了这些指示，那里的工作就犯了錯誤，沒有成績，或者成績很微弱，让我再拿事实来証明。

二、有些地方放棄查田运动的領导

查田运动的斗爭任务，在中央局查田决議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訓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沒有普及到一切地方。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績，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績；胜利、雩都、会昌、石城每县的成績，还只当得瑞金最好一个区至两个区的成績；各地有許多区的查田委員会沒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員会，亦还有几个县沒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雩都、石城，宁化）；許多区与乡的查田委員会，区乡主席不做主任，借口别的事忙，放弃查田不管。党对查田的領导，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党的坚强領导作用，党員群众的大多数，在支部与区委的領导下做了很多勇敢战斗的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沒有成績及成績微弱的地方，就表示出党部忽視查田运动，这与会昌县委在中央局查田决議发出后，差不多两个月沒有討論过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开了一次会討論查田；瑞金的下属区委一个时期中，对查田运动完全不管；瑞金市委里在查田开过一次会，却沒有推动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領导，各个支部沒有为了查田运动开过会的。在别的地方，如雩都、胜利、石城、宁化县委与許多区委，同样沒

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党与中央政府說："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級斗爭，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与肅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决議）。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維埃一刻不容再緩的任务（中央政府訓令）。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心最重要的一环（八县大会总結）"。我們的許多同志却在說："忙得很，沒有工夫照顧查田运动。"党的决議說："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付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些同志却还是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查田运动。

三、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

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現許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錯誤，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維埃中还常常有个别的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級斗爭面前，表現了他們机会主义的动搖，这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們丢弃不了姓旗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成分。或者錯誤的分析阶級成分，把地主当富农，把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們的极端疏忽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誣告，另一方面我們有些保卫与裁判部的同志。又沒有跟着群众查阶級斗爭的开始，去积极鎮压反革命，甚至当着群众請求捉拿与枪决抵抗查田运动的地主富农分子时，还有不接受群众請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許多这样錯誤的例子。

四、侵犯中农的傾向是最严重的危險

"左"的机会主义傾向，在七月查田运动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該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議上早已明白的写着："必須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維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們的处置与策略，必須获得他們的贊助与拥护。每一个貧农团与苏維埃的决定，必須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議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呼声，必須注意听，并須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决議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級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維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过程中，应审慎决定。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間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錯。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沒有为許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即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維埃来請求改变自己成份，他們請求改变为貧农。他們說："中农危險得很，推上就是富农，改为貧农咧，隔富农就远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們傾听嗎？黃柏区渾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說："查阶級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級。"踏逞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是有插牌子的意見，是不对的。"但全未为这些同志所注意。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們把查田与分田混合了。不錯，分田是应該插牌子的，是要一丘一丘查清数目，然后拿去分了；但若把这个办法应用到查田运动上来，那就混乱了农村中的斗爭目标。过去我們曾經指出："查田与分田必須严格分别，这种分别，不但为了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們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級斗爭的胜利，必須集中全

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去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的队伍內发生任何紛扰。”（八县大会結論）这样的策略，是我們領导查田斗爭中整个策略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还为許多同志忽視了。这种忽視，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經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錯誤的。当地的上級苏維埃須給他以严厉的处罰。要在党內团內开展思想斗爭，反对任何党員团員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經做了錯事，如已經沒收了中农的土地財产的地方，苏維埃人員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土地財产賠还他。去年兴国曾賠还許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滿意，是一个宝貴的教訓。

五、貧农团的关門主义与忽視僱农的領导作用是錯誤的

“貧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級在农村的支柱，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依靠貧农”是我們查田运动及一切土地斗爭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貧农团則是查田运动中有极大作用的团体。八县貧农团代表大会已經指出过去貧农团的关門主义傾向是錯誤的，应該废除介紹制，向貧农工人打开大門，一切男女老少的貧农工人均可报名加入。但是許多地方仍然沿着旧办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紹不能进貧农团，甚至在瑞金踏逕区当着尚未入会的貧农群众跑来参加貧农团的会議的时候，貧农团的負責人居然拒絕他們参加。博生的竹嶂芰区，七月一个月中貧农团沒有发展一个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区乡，貧农团是广大发展了，而在沒有成績或成績微弱的区乡，那里的一个表征，就是貧农团的关門主义状态。僱农在查田运动中的伟大領导作用，同样为許多同志所不認識。党的决議說：“僱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級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鋒队。因此苏維埃的工作人員必須与工会取得密切联系，經过工会发展与組織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們成为查田运动先鋒队。”我們的同志，依照这个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数。这里主要方法，是使农村工人加入貧农团，而在其中成立单独工人小組；經过这些工人小組，去团結貧农积极分子，发展貧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黃柏区山河乡的經驗是可宝貴的，当我們的同志两次召集貧农团，开会不成的时候，就去开了一个农业工会与手艺工会的会員群众联合会，发动了几十个工人积极起来，每人带領一个貧农分子加入貧农团，山河乡的这个經驗应該把它运用到一切农村中去。这里工会的上級領导机关，应該給下級工会以积极的指导，要把查田运动看成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关于富农問題的不正确观点

农村斗爭中整个我們的策略，是依靠貧农，坚决的联合中农，并使僱农起先鋒队作用，团結所有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級与反对富农。关于富农問題，党已經正确說了：“必須把地主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封建残余斗爭中，决不容許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沒有公开主张消灭富农好理論，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沒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經在許多地方发現了。这一錯誤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当着我們說：“沒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有地租等等剝削的是地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产中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分子，認为是“附带劳动”一类，把他当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則把富农兼有高利貸剝削的認为是“高利貸者”而照着“消灭高利貸者”的办法去对付这种富农；有些

算陈賬，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前請过长工的，也把他当做富农，或者仅仅只請过一年两年长工的而前后沒有請过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更严重的是过去兴国某地方的例子，那里的办法，拿剝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分，三种剝削的叫地主，两种剝削的叫富农，比如請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債，則不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劳动，总之他家里就是地主了。还有“反动富农”这个問題，在許多地方弄得頗糊塗。武阳区一家富农兼商人，七个人吃飯；因过去他家有一人参加AB团，在两年前被杀了，两年之后那里同志一定要全家沒收他。在别的許多地方，同样发生許多这样的事，把富农在暴动前不十分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如参加“收三成租谷”之类（瑞金），暴动后几年他也沒有做过反革命的活动，群众的多数对他不要惩办，而我們有些則一定要沒收他。正确的說，我們对待这类分子的办法，在巩固了的区域与尚未巩固的边区，应該有策略上的不同。在边区，无疑要采用严厉办法，鎮压一切包括富农在內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区，則要分别情形决定，暴动前有过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或暴动后还在做反革命活动的，自然坚决的沒收他，否則不应該沒收。有些一家中只沒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为直接关系的分子，其他則不沒收。这样处置才是正确处置。

七、工农检察部沒有負起自己应有的責任有些並且做出了錯誤

我們的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許多不訊識查田运动开展中正是开展思想斗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貪污腐化消极怠工，驅逐阶級异己分子出苏維埃去的最好时机，因此，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异常不够。許多我們工农检察部的同志，在这个剧烈的阶級斗爭面前，表現了自己的消极动摇。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如瑞金市苏工农检察科长，包庇市苏裁判科长的极大貪污行为（私用公款千余元），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不管，也不去批評他与检举他。工农检察部的渡头区的检举运动，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别的錯誤方向。把恋爱問題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輕微錯誤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統的发动自我批評、开展思想斗爭，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簡单的惩办主义。不消說，苏維埃工作人員中那些犯了长期与严重錯誤的分子是应該坚决洗刷出去的；但是錯誤不到这种程度的也給予撤职处分，則是过分了。关于阶級异己分子的問題，普遍的只講成分，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爭历史，过去与現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維埃的路綫政策，一律叫做阶級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錯，我們要坚决洗刷那些阶級异己分子，那些成分坏又加工作坏的（包括地主富农，消极怠工、貪污腐化等等），地无疑应該洗刷干淨；但如果不是这样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过分的了。

八、关于查田斗爭的領导艺术

了解了任务与路綫，但沒有群众斗爭的布尔什維克的艺术，查田运动是仍然不能开展的。本文的开头已經說了壬田区等处許多很好領导斗爭的例子，但在另外許多地方却在这个問題上犯了不少的錯誤。有些地方对于地主富农集中的落后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种方法去发

动斗爭，即如有种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凶恶即群众所謂“大老虎”的那些豪紳地主分子，才能开展当地的斗爭，我們的同志却沒有这样去做。关于用分配沒收来的財物去发动斗爭这个最好的方法，还有許多不知道采用。在瑞金踏遥区的瓦子乡，甚至把东西只发給查田干部与貧农团会員，其他不发，理由是自己不积极的不应分东西。有些地方沒收的东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沒收了一个多月还未发給群众。沒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动員苏維埃的各部，动員各个群众团結，不知道动員所有的党員团員，在各个群众团体中，各个村屋中，去起核心領导作用；工作推不动，就說这里本来沒有办法的。有些地方当着群众查阶級的斗爭已經发动起来了，許多群众都来报告地主富农，請求去查田沒收时，我們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紧群众这个热潮去領导群众开展斗爭，把查阶級工作开展到各个村子里去。有些地方，則在查了一番之后，群众的斗爭热情不能繼續向上高涨，表現了停頓状态的时候，我們的同志不能用各种方法鼓励群众，使斗爭繼續高涨，一直領导到消灭封建残余的地步。許多地方当着經过了查田运动，群众斗爭热情蓬勃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不知道把这种热情組織到别的战綫上去，比如当着群众得了东西，得了土地的时候，即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或在其它一切有利的时机，鼓动群众去当紅軍，去买公債票，去进合作社；鼓动群众去加紧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乐部，識字班，发展夜学与小学。把这种好的时机放过去，另等上級对于这些工作督促来了，才又重新开头去做宣传鼓动。这种落在群众斗爭热情之后的尾巴主义的領导，乃是最有害于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許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現象。我們曾經着重的指出：要反对对于爭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視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作发动群众爭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級路綫的唯一保障。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須在一切村屋中做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說明查田运动的必要，說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級不是查中农貧农僱农的阶級，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清楚。村屋的群众大会应該不只开一次，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村屋应該多去开几次，应該不让一个劳动分子不听到我們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該首先在乡代表会、工会、貧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及其它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通过他們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查阶級应該不是少数人去查，要发动多人数去查。通过阶級成分不但在貧农团、乡苏、区苏通过，而且要在被沒收人的村屋中开群众大会，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沒收，分发財物，要发給本村本屋群众，取得本村本屋群众的滿意。所以要这样，都是为了爭取群众的大多数。党与苏維埃工作人員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記群众大多数。我們的工作要深入群众，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鎮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門主义，命令主义的錯誤办法。可是我們的許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去做的，在瑞金，許多区乡中沒有向群众講过一次阶級（沒有分析过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在瑞金及别的县的許多地方，都发現不經过宣传就动手去查，以致地主跑出来造謠，欺騙中农，說什么本乡地主富农多得很，或者說本乡有几百家地主富农要查（瑞金）；而我們的同志，还不知用明白的“講阶級”办法，去識破这种造謠。广昌的地主說：“查田运动是中央政府要过去欠債的人把債还給中央。”我們同志沒有立即去揭穿这种鬼話。在踏遥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級只是查田委員会的几个查，通过阶級不但不經过群众大会，連貧农团也不經过，他們說：“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級，阶級成分提到群众大会去通过是要发生糾紛的，还是只由委員会通过是靠得住的。”这个踏遥区同志的理論，眞算得是天下奇聞！好几个地方沒收地主时，

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处地方开群众大会，用了“全区大会”的办法，可是到的不上两百人，三个人輪流从上午演說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飯，說是怕群众跑掉了。这样蠢干的办法，又算奇聞的一种。

九、开展两条战綫斗爭克服自己錯誤爭取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

无疑的，查田运动是在广大地区的內开展了。但当这个运动前进的时候，当我們正确估計了已得成績，并奠定了运动发展的基础的时候，我們还要警覚地注視运动中途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綫斗爭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进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开展反右傾的思想斗爭，反对对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計不足，及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对群众斗爭的尾巴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員的責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喚起全体党員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經明显表現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用两条战綫斗爭的火力，来扫蕩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他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乡苏維埃怎样工作

（一九三三年）

（一）乡苏維埃代表会議的工作

1.乡苏維埃（与城市苏維埃）是苏維埃政权的基本組織，是最接近民众及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一級，是直接領导群众执行苏維埃各种設施与法令的机关。

2.乡苏維埃（代表会議）是全乡最高的政权机关，上級苏維埃的各种重要的法令、設施，本乡的各种政治的、动員的、經济建設的以及其他的問題，都要經过代表会議討論、决定与执行。

3.因此，乡代表会議应該經常的按期的开会，有些地方代表会議不經常开会是不对的。代表会議最好二十天一次（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也可以，应該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特殊紧急的事情，可以临时的由主席团召集代表会議，会議的时間不应該很长，通常每次两三点鉀为好。在农忙的时候，代表会議应該在晚上开。

4.每次代表会議应該有个議事日程，就是这次会議要討論的問題，这个議事日程应該由主席团先准备好，并早几天就通知代表們，好让代表們事先准备并征求群众的意見。每次的議事日程上只应有一个主要的問題。此外，可以有一两个次要的問題。假使每次会議，同时提出三四个大問題来討論，会使会議得不到很好的結果。

5.每个討論的問題，应該有一个同志做报告（乡苏維埃主席或者专門管理这种工作的同志，如各个委員会主任，赤卫軍大队长，貧农团主任等等）。报告要切实具体，有內容。报告的时間至多十分鉀。其余的时間应拿来討論。討論之后，应該由报告人或主席把討論中代表們发表的意見，扼要的做一个結論。

6.每次討論的問題，应得实际化，并且做出具体的决議或决定，并且指定某一个同志或某几个同志去实行，比較大的問題，可以分开几个項目来討論，譬如，討論春耕問題，就可以分开："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难？""怎样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的缺乏？""怎样防止夏荒，多种那些早粮，种多少？""多种棉花"，"多鋤多犁"等等。每項討論后，应該做出具体决定与分工。譬如"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难"决定：（一）組織耕田互助社，兩星期內成立，甲村由张同志負責，至少要有三十社員；乙村李同志負責，至少五十人。丙村王同志負責，至少三十五个社員。（二）发动妇女参加。第一，发动各代表的妻子首先参加，各代表負責，张秀英女同志負責督促。第二，要在下次妇女代表会議討論这个問題，张秀英同志去和妇女代表会主任商量和負責召集，并代表乡苏維埃去做报告。第三，組織生产学习組，由白同志負責。（三）发动儿童参加劳动：第一，由某同志去告訴儿童团，发动他們参加拾粪、种瓜、种菜。第二，由吳同志負責和列宁小学交涉农忙时只上半天学，半天学生回家帮助作庄稼等等。討論时一項一項的討論，討論了一項得了結果，把它写在記录簿上，主席团及下次代表会議，可以根据来督促检查每一个决定。主席团应該經常去督促指定的同志去完成任务，下一次或相隔不久的代表会議上，应該检查这些决定实現了沒有，某同志沒有实行，应該給他相当的批評。某同志实行时做錯了，要好好的告訴他怎样去改正，这样，代表会議总会具体、切实、活泼、有生气。

7.代表会議要做到个个代表都能到会，就要在这次会議上决定下次开会日子（或者一般的决定比如逢五逢二十开等）。开会前三五天，主席应該經过村主任，再通知代表們开会的日子、时間、地点，討論的問題，开会时每次都要点名，沒有到的要在他名字上打个記号，主席团或村主任散会后，应該去告訴沒有到的代表，問他的理由，并告訴他代表会議的討論和决定。如果沒有理由而不到的，应該批評和督促他下次出席。

8.代表会議开会时的主席，应該由乡苏維埃主席充当，因为他熟悉全乡的情形，了解前后工作的經过。

9.要代表会开得好，就要主席团在事先准备得好，主席在代表会議开会前三五天，应該先开一次討論代表会議的議題，指定做报告的人，帮助他准备报告，乡主席要特别負責。

（二）主席团的工作

10.主席团是代表会議閉幕后，全乡最高政权机关，它应該执行代表会議的决議，上級苏維埃的命令和指示，积极領导全乡的工作。

11.主席团由代表会議选举出来的，大乡五人，小乡三人，应該选举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主席团中应选出一个主席——就是乡苏維埃主席。

12.主席团应有一种分工，如果是三个人的主席团，則应該分工为主席、付主席、支书（要識字的，如代表或主席团里沒有識字的，則应該另外找一个文书，他就不参加主席团）；如果是五人的主席团，就可以分做主席、付主席、支书及春耕委員会主任、优紅委員会主任（或别的重要的委員会主任）。

13.主席主持全乡工作，出席上級召开的会議，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該抓紧每个时期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紅、查田、选举、修路、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等），应該注意經常工作的領导（如赤少队訓練、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紅等等），还要注意本乡发生的临时問題（如飢荒、瘟疫、反革命活动等等）。主席应該把全乡各方面的工作經常的

想一想。看那些进行得怎样，那几項工作做得薄弱或者不好，应該怎样去加强，那几个村子工作落后，应該怎样去帮助。他要担任出席一两个行政村的会議，收集各村每一項的工作上的好的經驗和坏的現象，提到主席团或代表会議上去报告，供給会議在討論这个問題时的材料，主席同样要担任出席一两个委員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議。付主席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对于全乡的工作要有一般的了解，以便主席不在时能代理主席的工作。付主席也要担任領导一两个村的工作，出席几个委員会和群众团体的会議。

文书要办理人口册，土地登記，婚姻生死登記，选民登記，各种調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打路条，发通知，帮助居民及紅属写信，主席与付主席不識字的，要把上級的文件讀給他們听。重要文件应該在代表会議上宣讀，会議时写記录。文书是代表时，应該参加主席团，就可以分配他担任出席几个委員会及群众团体会議。

主席团其余的委員，亦应該分别担負領导一两个村及委員会、群众团体的工作。

14.主席团会議要經常的开，最好五天或七天一次。主席团开会时，有重要問題可請村代表主任及委員会主任来参加，普通的問題可以不必参加。

15.主席团会議要經常的討論各委員会的工作报告(譬如春耕委員会，优紅委員会等等)，各群众团体的报告（如赤卫軍，耕田合作社，妇女代表会等），并且检查上一次代表会議的决定，各村代表主任及代表执行了沒有，执行得怎样。或者决定下一次代表会議的議事日程，报告人，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議，在全乡工作中比較小的問題及急切需要解决的問題，都要在主席团会議上解决，不要把每一个小問題，都提到代表会議上去。不要把急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拖延等待到下一次代表会議才能討論。主席团解决的問題在代表会議上报告，通知代表們取得他們的同意。

16.主席团会議应該有一个一个月或二个月的日程表。日程表的格式如下：

参加人	报告人	議事日程	会議日期
各村主任，春耕	王春山	耕田合作社工作	三月五日
委員会委員	李振国	扩紅工作，检查下次	三月十日
各村主任	乡主席	代表会議准备。	三月十五日
各村主任	乡主席	春耕进行状况的检查	三月二十日

主席团照日程表工作，并发給各委員会主任、村主任，先让他們也知道什么日子討論什么問題，日程表上每次会議不要到（列）出太多的問題，一两个問題尽够了，因为一定会有一些零碎或紧急的問題要临时加上去的。主席团会議亦不要超过二、三小时。

17.主席团要領导全乡的工作，就必須抓紧每一个时期中心工作，不要忙于零碎的事务，丢掉了中心工作。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間的困难問題，主席团要注意領导和推动各村代表主任的工作，使得各村的代表会議群众会議都能經常开，开得好。

18.主席团要团結全体代表，各个委員、各群众团体在自己的周围，推动他們去动員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該离开代表、委員会与群众团体，而少数人去忙乱。

19、主席团应該注意教育与訓練代表。代表中积极努力的应該在会議上給予鼓励表揚，消极怠工的应該給以批評斗爭。初次当选代表的，不知道工作怎样做的，就要好好的告訴他怎样去做工作。那些經过多次批評教育斗爭不改变不进步的，或者接連四、五次会議都不到

会的，应該提到代表会議上去討論，把他开除出去，把后补代表补上来。代表在当紅軍或調动工作或別的原因离开本乡的，亦应該立刻补上。

（三）村的組織和工作

20、乡的工作的重心应該放在村，在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尤其应該这样。新乡苏維埃应該特別注意村的領导和工作。

21、每个乡应該按照村庄的分布，人口的多少，划分成为行政村，普通每乡划成三至五个村为好，再多了就不大方便。

22、每个行政村設村代表主任一人，由該村乡苏維埃代表中推选出来，要推选代表中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該村代表在十五人以上时，可以另外推选一个副代表主任。代表主任負責領导督促全村工作，副代表主任帮助他。

23、村主任应該按时（十天或者半个月一次）召集全村的乡代表开会，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庄子各家的情形，討論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議給予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間的小的爭执問題，及困难的互相帮助和救济。这种村代表会議最好是在两次乡苏代表会議之間开。

24、为使全体代表能够都負起責任来，領导居民群众完成苏維埃的一切决定和工作，就要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領导居民的办法。譬如某行政村共有居民五百人，代表二十人則将这五百居民分成二十个单位，每一个代表管理一个单位。但是不应平均分配，而应該按庄屋的位置，代表的能力来分配。有些代表多管一些，有些少管一些，每个代表应該負責去領导督促我管理的居民群众去实現苏維埃的各項工作和决定（如督促所管理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这几十个人中間的积极分子去当紅軍，宣传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入学，督促大人进夜校，督促各家打扫房屋講究卫生，注意地主反动分子活动，等等）并且吸收群众的意見，提到村和乡代表会議上去解决。

25、每个代表要召集自己所管理的几十人开会，这种会議以半个月一次为好。会議采取談話的方式，在晚上或有空閒的时間举行之。在这种会議上，检查各家执行苏維埃工作的情形，討論現在要做的工作，报告乡苏决議，征集群众的意見，两村或乡代表会議报告，会議并可以开展相互間的批評，如某家当紅軍的回来未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人帮助紅軍家属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該帮助，大家不注意等等。这种会議可以最迅速普遍的传达苏維埃的决定，使苏維埃的工作很快很順利的进行，使群众生活很快的得到改善。

26、每个代表对于自己管理的几个人的領导，除了召集会議外，应該經常的到各家去訪問訪問，看看各家的生活状况有什么困难沒有，实行苏維埃工作到底怎样，有什么要解决的問題。首先应該常到紅軍家属里去訪問。

27、代表分工管理居民的制度实行之后，村和乡的群众大会除了大的紀念节及特別重大的問題外，不应常常召集。

（四）乡的委員会及其工作

28、为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工作，在乡苏之下要設立各种委員会，分別管理、領导各項工作，这种委員会由乡代表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員，每个代表都应該参加一两个委員会。

29、这种委員会应該分成两种，一种是經常存在的；一种是为了某个特別的問題临时組

織起来的經常的委員会，如扩大紅軍、优待紅軍家属、文化教育、卫生、粮食等委員会。临时的如查田、选举、水利修筑等委員会，这种委員会在进行这項工作时，要把它組織起来，工作做完了就不要了。

30、委員会的人数应按工作的性質，少則五人多則七人至九人。委員会中間必須每村都要有人参加，因为这样委員会的討論和决定，就很快的可以传达到每一个村去。委員会的名单及主任，应該由主席团提出名单，在代表会議通过。在名单中除了代表外，必須吸收非代表的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

31、各委員会的主任要选最积极的同志担任（最好是代表）主席团要經常去检查各委員会的工作，听他的报告，要教育督促各主任去工作，去召集委員会的会議。乡主席团应該分工去参加各委員会的工作。

32、各委員会应該經常的开会，但开会的期限应該看工作的輕重緩急来定。譬如在农忙前和农忙时，春耕委員会应該多开会。秋收以后，农閒的时候，那末道路委員会、水利委員会等，都要加紧工作。

33、主任对自己的委員会初开会事先应該有准备，才能使每次会議都能得到結果。会后要分配每一个委員以一部分工作，告訴他們怎样去做，下次会議要报告他們的工作。

（五）乡苏維埃与群众团体的联係和对他们的領导

34、乡苏对于本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貧农团、妇女代表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各种合作社、識字运动委員会等），要加紧对于他們的帮助和領导，要依靠他們去努力动員广大的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特别是貧农团、妇女代表会、劳动互助社等团体，乡苏更应負責检查和領导，因为他們沒有直属的上級組織。

35、当代表会議或主席团討論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的問題时，应該請那个团体的負責人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該派人去参加。主席团亦可以听各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报告。

36、乡苏維埃注意对赤卫軍、少先队的領导，要使全体男女都加入。注意他們的訓練，要使赤卫軍、少先队完全担任放哨查路条的赤色戒严的工作。

附註：上面的工作条文大部分是适用于中心区域的，乡苏、边区的苏虽一般亦可以使用，但应特别注意：（一）領导游击小組向外游击；（二）做白軍团匪中間的工作。（三）加强赤色戒严及粮食儲藏。（四）向白区开辟新苏区。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与人民委員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們党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尖鋭化的时期，也正是全世界紧紧地迫近到革命战爭的第一个新同期的时期。

社会主义世界与資本主义世界的对立，現在是极端尖鋭化了。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已取得了最后的巩固，它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在四年內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在去年的第

一年內，又已經取得伟大的成績。苏联早就消失失业現象，而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苏联的国防是极大地巩固了。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建立国交了。

資本主义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資本主义暫时地稳定已經終結。資本主义总的危机已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疯狂的进行战爭，日本帝国主义占領滿州的結果，使得各个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尤其是日英間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爭是正在极端地威胁着全世界民众，然而帝国主义却又在各国暫时緩和它們的矛盾。从而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去寻找出路。反苏联战爭的准备並沒有一刻停止，而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战爭則已經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但是全世界无产者阶級与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亦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成功的影响之下，在帝国主义經济恐慌与战爭威胁之下，生长扩大起来。猛烈的阶級斗爭和民主革命，是在一切与資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开展斗爭，全世界战爭与革命的火焰是逼近着我們。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紧，由于国民党經济总崩潰，由于苏联运动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著的地位。

目前中国的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內战爭，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爭，是工农苏維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資产阶級政权尖銳化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族大众为挽救民族存亡而奋斗的斗爭，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进攻苏联战爭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爭。

一方面，国民党地主資产阶級，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占領中国广大領土，垄断中国政治上經济上一切主要权利（力），引导国民經济全面崩潰，使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遭受着空前所未有的痛苦，剝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压迫一切革命活动，实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在帝国主义指揮之下組織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和紅軍作拚死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中国地主阶級資产阶級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融成一片，将中国引入完全殖民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苏維埃政权、号召，組織，領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爭，組織領导紅軍与民众为保护苏維埃領土发展苏維埃領土而斗爭，以坚决地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屢次进攻圍剿。严厉鎮压苏維埃領土內一切剝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給予农民，紅軍士兵，工人实行八小时制，增加工資，救济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給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国家机构。只不准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剝削分子参加，組織民众的經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資产阶級統治时代受尽压迫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飢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进的地位。組織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資产阶級統治时代完全沒有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引进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資产阶級在全国的統治，驅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統治区的压迫剝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的領土，完整的苏維埃中国。

……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两个年头中間，目前最大的事变就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反革命对

于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围剿”。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爭，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領了东北三省与热河、控制了平津，还正在向着內蒙及整个华北及准备更大規模的杀人战爭。英帝国主义从西藏向四川进攻。法帝国主义准备从云貴，美帝国主义則欲将长江流域及福建置于其直接統治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都在以奴役中国为目的，以消灭中国苏維埃政权为目的，以准备进攻苏联为目的，同时还以准备帝国主义强盗之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目的，向着广大的中国領土伸张其毒手与阴謀。而中国地主資产阶級国民党，却在一切奉送帝国主义的方針之下，断送了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采取了可恥的不抵抗主义，以一切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換得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經济上与軍事上的帮助，以便利其集中力量对于中国民族生存唯一可靠的力量苏維埃与紅軍的进攻。

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地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軍的奋斗，上海十九路軍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經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这时候在全中国革命民众面前，摆着两个政权的相反的行动，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尽量压迫反帝的民众，苏維埃則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尽量援助与領导反帝运动。

两年来，苏維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經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爭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頒布对日作战的动員令，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爭，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与軍事革命委員会曾經发布宣言，号召一切进攻苏維埃与紅軍的国民党軍队，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罢工等自由），（三）武装民众創立抗日义勇軍这三个条件下，苏維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訂立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国民党与日本訂立塘沽协定及最近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时候，临时中央政府曾一再向全国全世界宣言，表示代表全国民众严励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各地民众的反日斗爭，苏維埃政府是实行援助的，单是上海沪西紗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苏維埃政府是曾以一万六千元援助他們。此外，苏区群众还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軍的募捐援朝，对于其他反帝斗爭的精神上与物質上的許多援助。

至于苏維埃領土之內，則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肅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驅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財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并中国境內只有苏区是脫离了帝国主义統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維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爭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維埃与全体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斗爭的发展，首先是团結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維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直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維埃領土之間，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維埃領土进攻，使紅軍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維埃与紅軍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肅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驟。

但是苏維埃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的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維埃十分的加强对于一切反帝斗爭的領导——苏維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爭的組織者与領导者，苏維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

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覚悟程度与組織力量的提高才能胜利的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爭与革命的国內战爭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統治。

为着革命战爭的胜利，为着苏維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員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爭，为了創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农的苏維埃文化。

……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給于群众政治上与物質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現在的苏維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內战爭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設了。

……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門的教育建設，但为了革命斗爭領导干部的創造，我們已設立了紅軍大学，苏維埃大学，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領导下的許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門教育之应該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該成为教育划計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識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資产阶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为苏維埃服务，这是苏維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視的一点。

苏維埃文化教育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爭与阶級斗爭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导斗爭的高級干部。

（註：本文系摘自“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与人民委員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八部分。）

中国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一九三四年）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們：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們的东三省，侵占了我們的热河、內蒙古，現在又夺占我們整个的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軍舰大炮与海陆空軍，正在計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領；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盜匪們的屠杀、奸淫、剝削和蹂躪。

国民党軍閥——蔣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貫的投降与出卖；他們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內蒙，現在又与“滿洲国”直接通邮、通車，承認“滿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和福建省；他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鎮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鎮压抵制日貨运动与反日义勇軍的游击战爭；他們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

以上的軍队，耗費了十万万的銀圓，使用了一切他們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的反日反帝的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进行不断的“圍剿”。一切这些証明：国民党軍閥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軍閥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賊。

中华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曾經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緊急动員令，动員全体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更曾經向全国民众一再宣言：（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与紅軍；（二）立即給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創立群众的反日义勇軍，在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訂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曾經一再反对承認傀儡“滿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軍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鎮压与屠杀。

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內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运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的封鎖我們，向我們进攻，使我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軍一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爭，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盜們驅逐出中国，国民党軍閥們对于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議，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恥的出卖中国，加緊他們对于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的六次“圍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因此，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为了要动員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們的百万的国民党匪軍血战，保持已經脫离了帝国主义羈絆的自由的苏維埃領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匪徒的蹂躪与出卖。同无数国民党匪軍血战中創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們是不輕易放弃的；但是苏維埃政府与紅軍，决不能坐視中华民族的淪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賊所拍卖干淨，决不能坐視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地屠杀与蹂躪，以及东北义勇軍的孤軍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軍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緊急关头，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遇到任何武装队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条件的，我們工农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們：我們中国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該帮助我們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結在我們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們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压迫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盜匪們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們的同伴，我們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們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賊，我們应一致起来消灭他們！我們認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爭，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領土的完整。

为了取得民族革命战爭的胜利，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更具体主张：（一）坚决反对国

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內蒙古、华北，福建省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認滿洲伪国，抛弃对国际联盟及美帝国主义帮助的幻想；（二）宣布对日絕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約的无效，立刻动員全中国海陆空軍对日宣战；（三）号召全中国民众，将国民党軍庫中与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組織民众的反日义勇軍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爭及游击战爭，积极援助东北义勇軍与中国工农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沒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賊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国債款本息，設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軍費拿来作抗日战費；（五）普遍的組織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貨委員会，募捐援助义勇軍与紅軍委員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糾察队，破坏交通队、宣传队，运輸队等，吸收广大群众——一切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来利用罢工、罢課、罢市与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是不顧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綱領奋斗！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要求全中国民众拥护这一綱領的全部实現而奋斗到底！

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賊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罢，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員，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反日大团結，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賊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

中国工农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副主席×××。

关于日本声明书談話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外务省于四月十七日发出为对华政策放列强的通諜后，各帝国主义都从他們自己在华势力范围的利害关系上宣佈一些不滿的意見，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也馬上发表了最无耻的卖国言論，紅色中华社記者为征求中华苏維埃政府对于此事的表示，特往訪我主席毛泽东同志，据談：日本外务省的最近通諜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的一切軍事政治和經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直接鎮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維埃的战爭。日本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們的眞实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門戶开放的公共殖民地”。至于直接鎮压中国革命和增强反苏維埃战爭的后方，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显然是贊同的，在这里，表示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言人，于十九日表示了卖淫归邪样的可丑的声明书，訊为国民党政府“在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說：“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是国民党应有的义务”。当然国民党“从无欲中伤他們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心！”而且国民党愼重的向日本声明：“购买軍用品如軍用飞机等，及雇用外国軍事教官或专家，亦仅是为国防上之必要，大

都为維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然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国民党从英、美、日、法、意各国所借債款，和买来的軍用品，并沒有用过半个鋼板或一个子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和华北，以及英法帝国主义强占仓庫的暴行。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貫的投降与妥协的，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国防，但是，国民党所謂“維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鎮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紅軍的进攻。卖国罪魁蔣介石把全国正式軍队百分之六、七十調到江西来，进行第六次“围剿”，正是国民党表明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誠，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尽清道夫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向日本声明时，已經特别着重的提出来了。并且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声明了，国民党对于日本“倘有不平的事态，可予糾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具改善而顧及两国共同愿望。”这是充分表明国民党走狗之奴隶性，国民党深恐不能完善的尽其狗职，不能博得每个主人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搖尾乞怜，苏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紅軍，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綫电播音听不清——原編者）为爭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的起来，在苏維埃政府領导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維埃紅軍的六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并爭取苏維埃新中国的胜利。

（紅中社）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总結决議

——遵义会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会議通告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結的报告及×××同志的付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議中，曾經清楚地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立苏維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剧烈的阶級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內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內阶級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們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間我們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反动結論(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中央决議)。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計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計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結論。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計，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战爭，証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綫无疑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領导之下，在动員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扩大紅軍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情，动員工农群众的分子武装上前綫，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紅軍大大的扩大了。模范亦少数开始成为紅軍的現成后备軍，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組織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綫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紅軍財政上的粮食上的与其他一切物質上的需要。苏区內部阶級斗爭的深入，苏維埃的經济建設以及苏維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展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

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次順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計不足的。这种估計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們設法子粉碎围剿的結論。

（三）应該指出在我們的工作中还有許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扩大白区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爭的領导依然沒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爭的发展与瓦解白軍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吾苏区紅軍在統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有些弱点无疑也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該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中与結論中都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軍事領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錯誤的估計，与又不訊識，与又不承訊，这使我們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紅軍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們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究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們在軍事領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錯誤路綫所产生的恶果，紅軍的英雄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們不能在軍事領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則战爭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蔣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軍事顧問等，經过四次围剿失敗之后，知道用"长驅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們在苏区內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与物質資源，紧縮我們的苏区，最后求我主力作战，以达到消灭我們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战略路綫应該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擇敌人的弱点，在这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之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爭中，都以单純防御路綫（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陣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謂"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則来支持这种单純的防御战略路綫。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們的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一部分的損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該指出，这一路綫同我們紅軍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五）目前在中国国內战爭的阶段上，在我們还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白暴动軍士兵的譯变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們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們还沒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們还处于內綫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們进攻上举行"围剿"时，我作战战綫，虽然是决战防御，即使我們的防御不是单純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作战的防御，是为了轉入反攻的防御，单純防御可以阻挡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內保持土地，但最終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沒有的，只有从防御轉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区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战綫之下，当我們还沒有发現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們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該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們应該以次要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紅軍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誘敌人，在这方面，主要的运动鉗制敌人，而主力則退至适当距离或轉移到敌人側翼后方，隐蔽集結，以寻找有利时机，攻击敌人，在內綫作战下，当敌人以絕对的优势兵力向我們前进时，紅軍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驕羚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是創造了轉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地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恰当的布署战斗。不要与由于敌人向我們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地調动我

們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們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某計划前进时，我們在突击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該待到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誘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暫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暫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結果。

然而在五次战爭中，对于这些原則都統統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說得很对，"我們覺得似乎在目前这时期中，軍事指揮所采用的計划和步驟，差不多可以說常常是敌人迫近而产生的。敌人和我們挑拨，使我們常常必要的改組我們的力量。因而我們的力量由于繼續不断地变动，就不能积极地加入决战。我們覺得应該在那些我們已經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敗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綫上同时击敗敌人。"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紅軍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純防御路綫，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綫同时击敗敌人，而且企图在全部战綫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面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爭中則变为全綫防御，而在战略上則一者都是錯誤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則是完全錯誤，而适足成为单純防御路綫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絕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絕对占优势，他們常常拿多于我們数倍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們进攻。然而这对于我們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綫，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針，这就造成了我們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們在战略的內綫作战下，能够收到战綫的外綫作战（局部的外綫）的利益，即是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敌人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內綫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綫的外綫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計划。

但是过去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为了防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散兵力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敌人对我們各个击破。五次战爭中，許多次的战役（如三河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役战，溫防战役等等）都由于我們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給紅軍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爭取主动权，不是爭取决战的胜利。其結果就是紅軍消灭敌人的数量数少，而苏区也終于受敌人的蹂躪。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們工农紅軍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行动不应該采取陣战方式，而应当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三月来电又重复的說："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經驗，我們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經获得了許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們虽沒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爭中当敌人"长驅直入"时采取大規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經多次的証明了（沟口、团村、将軍殿、建宁、瀋坊、溫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軍改变时）。然而五次战爭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純防御路綫占华央同志的"短

促突击”理論，却使我們以运动战接受到陣地战，而这种陣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現时工农紅軍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該拒絕的。只有这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調动敌人的情况下，才容許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爭中輕易强攻堡垒，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是把战爭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爭中运动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圍剿”絕然的分开，因而絕然否認过去运动战的經驗，絕然否定誘敌进来給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絕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在这单純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領导者是自然的道。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計过高与对运动的估計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論，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轉变为战綫上的胜利，然而由战綫的胜利才能起战綫上有利于我們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給林彪，×××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之下，只能有許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林离的胜利”（見××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紅軍报的文章），認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爭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論与实际，在五次战爭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們不能否認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圍剿”的新的困难。然而他們最近却以左的空談輕視堡垒主义，（見××同志紅軍报文章），不否認而且应准备紅軍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主义内部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現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精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賴性，使他們脫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脫离堡垒向我們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圍内遍筑足以限制紅軍活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們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順利条件。因此我們紅軍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綫前左右发展游击战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軍士兵运动。所謂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綫內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綫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广大堡垒主义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們做运动战，只要我們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針，才能正确的領导战綫（爭），并正确地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圍剿”单純防卸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指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事实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至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以下略）

（九）在持久与速决战問題上（略）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命令

新字第2号

“鑒于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中国淪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爭，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蔣介石輩。又因蔣介石等的卖国統治，陷中国經济于万不磨之城——特别是农村經济，全国农民群众起来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仇視苏維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当地革命的斗爭。苏維埃中央委員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討蔣之革命战

綫，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論而全部沒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僱人經营之土地不論其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沒收之列。

（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貸出借以剝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沒收。

（丙）統一累租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罰及特殊稅捐。

（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維埃法律时，各級政府应保障其經营工商业及僱佣劳动之自由。

（戊）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之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已）富农在违反苏維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暫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之。

（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紅軍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队在內，并无选举权。

（辛）以前頒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法令有抵触者废除之。

（壬）本命令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次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案。

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議

（瓦窯堡会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表現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与战爭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四省之后，現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并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鑒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領东北四省，曾經引起中国反日的怒潮，这次他就采取比較隐蔽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軍閥政客，作为他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达到直接武装占領华北，这次方式虽然是比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狡猾与凶恶，但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領与建立华北围攻其傀儡政府的步驟。

第二个滿洲国傀儡政府是必然的归宿，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賊集团的主要成分的許多軍伐政客土豪劣紳为劣紳卖办及銀行資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組成分子及其贊助者，沒有这群大汉奸卖国賊，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是不能如此順楊的。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禍，这个大禍就把一切不愿当卖国奴才不愿充汉奸卖国賊的中国人，迫到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賊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爭。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亡人亡国亡人亡种的冒险事业的前进道

路上必然得到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于吞下了东北四省这些較小的炸弹之后，又着手吞下中国本部这个絕大的炸弹。

日本帝国主义蚕蝕并吞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內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爭是必然的結果。而英国却想求得日本的某些讓步和妥协，使它的主要力量能够拿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意大利。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促进了中国反革命統治首先是卖国賊头子蔣介石的統治之削弱与崩溃。一貫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蔣介石丧失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縮小了它的地盘，同苏維埃的长期斗爭，尤其是五次“围剿”。与对中央紅軍的“围剿”使它的精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統一中国的梦想，是宣告了最后的破产。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不利于蔣介石的分贓会議，蔣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国以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是它的出卖，将更促使他的統治加速度地走向灭亡。这种情形，也就更加深了以新的形势上新的性質，而出現的反蔣战爭的爆发的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維埃紅軍轉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自从中央紅軍退出中央苏区，长江下游的一些苏区受到一些損失之后，現在是各地紅軍的新胜利，新根据地的創造，老苏区的游击战爭的开始轉入反攻，与新的游击战爭蓬勃发展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經过去了。中央紅軍以十二个月的功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蔣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的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軍事远征的紀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馳骋的十一省区二万万以上的民众，指出了痛苦救国救己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許多革命种子，中央紅軍与二十六、七軍会合之后，对于对着陕甘苏区进攻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維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它同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后，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盜吞并，扰欲中国出乎亡国灭种，大禍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維埃紅軍鉄一般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亡国灭种大禍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这种民族革命高潮，是在中国革命經过历史上无数次鍛炼之下（主要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产生的。是在目前中国已經有了苏維埃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形势之下产生的。是在苏联已經有着一切力量足以战胜侵略国家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它就将以特别广大、特别坚决、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質而出現。

无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級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們积极参加斗爭，而且广大的小資产阶級群众与知識分子，現在又轉入了革命。中国国民經济的总崩溃，千千万万民众的失业失地，千千万万的災民难民，更使得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的救死救生的日常斗爭密切地联系起来，大大地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憤是在全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經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开始表現出来了，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突击、一部分民族資产阶級、許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乃至一部分軍民，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致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綫是扩大了。

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爭的前夜的形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爭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爭，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无疑的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在目前的革命与战爭的前夜时期，已可明显地看到世界反革命力量的薄弱，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增长，在将来就是大战爭与大革命，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脫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有力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現在就已經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則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陣势帮助着世界革命。

这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的，在有力量的日本共产党領导下的日本工农及被压迫民族（朝鮮、台湾）等，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設苏維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命同日本革命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础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助。

中国革命是处在有利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尤其目前凶横直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准备了决心和力量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在中国反革命集团方面，由于其統治力量的減弱，而不得不更加为虎作伥，投靠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着革命的民族作决望的斗爭与决斗，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形势結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它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領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长时間同敌人奋斗吧！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吧！沒有几千万几万万的革命軍，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一切策略，一切努力，向新組織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場上去。准备了伟大的力量，就是准备了决战的捷报。

二、党的策略路綫

目前的形势告訴我們，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級、阶层，政党及其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們之間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綫与民族反革命战綫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党的政策路綫，是在发动、团結与組織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头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什么阶級，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头子蔣介石的，都应該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爭。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統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和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統一战綫（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社会阶級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部队，他們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动机和立場，有的是为了保持他們的原有地位，有的是为了要爭取运动的領导权，使运动不得超出他們所允許的范围之外，有的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們的动机与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斗爭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退出战綫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們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結一切可能

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中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枪出枪，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綫上。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策略的总路綫，只有这种路綫我們才能动員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蔣介石。

中国工人阶級与农民，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資产阶級群众、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資产阶級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产阶級与軍閥，不管他們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維埃制度。在他們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賊的斗爭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爭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方式，爭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綫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級营垒中間，也不完全統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許多帝国主义互相竞爭的結果，产生了各帝国主义互相竞爭的各卖国賊集团，他們之間的矛盾与冲突，党应使用很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綫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集团与組織全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該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統一战綫內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傾向作斗爭。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賊，应該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当让自己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賊的言論与行动去爭取自己在反日战綫中的領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反日战爭的广大民众，应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动員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爭中的領导权。

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軍

……（略）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軍是反日反卖国賊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統一战綫的組織，所以他应該有最广泛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如下：

一、沒收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在华的財产作抗日經費。

二、沒收一切卖国賊及汉奸的土地財产分給工农及災民难民。

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員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現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識分子。

九、联合台湾、日本、朝鮮內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誼关系。

共产党必須在抗日战爭的过程中，求得这綱領的实現，并經过这些綱領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綱的实現。

四、苏維埃人民共和國

五、党内的主要危險是关門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賊，共产党員必須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領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級的斗爭。这里，主要的关鍵是运用广泛的統一战綫。广泛的統一战綫，一方面是在靠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了解党的主要的正确，爭取他們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須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領导权的問題。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領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能够的。必須使它的一切党員在实际工作中，在每日的斗爭中，表現出他們是群众的領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間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須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領袖，进行談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爭取其中可能繼續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能揭穿那些动摇欺騙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們驅逐出去。党的領导权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級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必須在农村中，兵士中，貧民中，小資阶級与知識分子中，以及一切革命同盟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爭。使他們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論那里的領导者是怎样地反动，共产党員应参加到里面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共产党員表現出他們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鋒队，而不是空談的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則的圣浩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領导权。

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統一战綫，以爭取党的領导权，党必須对党内"左"的关門主义傾向做坚决的斗爭。在目前形势下，关門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險。关門主义的来源：第一，是因为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的政綱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政綱領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为死的教条。这种关門主义傾向，实質上表現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統一战綫的策略。这种关門主义的傾向，实質上是与右傾机会主义相同的，因为关門主义繼續的結果，必然是党脫离群众，使党放弃中国革命領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須反对"左"的关門主义，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統一战綫，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錯誤，从斗爭中去学习領导群众的艺术。

虽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門主义的斗爭中，絲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右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利益的斗爭，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貧民改良待迁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資产阶級与富农的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論批評的武器，惧怕率領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資产阶級，上层小資产阶級分子，以及乡村中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們的尾巴。一九二七年期間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員中的复活，是不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該向着这种右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爭。但在目前說来，"左"的关門主义是党的最大危險。目前的反对右傾正是为得要順利地克服"左"傾，彻底地击破关門主义，使广泛的統一战綫的策略正确地大

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爭的后面，使群众从爭取日常的切身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賊的民族革命战爭的位置。

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爭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負的神圣任务，必須在組織上去扩大去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員，才能率領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級的先鋒队。因此，一切愿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問他們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該吸收入党，担負党的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經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資产阶級出身的分子常常在党內占大多数，但这絲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的地位。事实証明，这样成分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級先鋒队共产国际所給于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和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須同党內发展組織中的关門主义傾向作斗爭。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吸收新党員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該注意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該使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許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員，鍛炼成为有最高阶級覚悟的布尔什維克战士，党內两条路綫的斗爭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区别这一目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維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級領导之具体表現，不从积极的革命斗爭需要出发，不从恐怖观念出发的組織問題上的关門主义，必須彻底的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斗爭，已經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領袖，党的組織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們开門。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維克的政治路綫与鉄的紀律，去保証党的組織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級党員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証提高他們的先鋒队的地位。

必須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綫上去，不是把領导才能每天都教好了，才給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爭中去，使他們从斗爭中去学习，不是以如何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和党員，而是爱护他們，信任他們，分配他們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揮他們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干部和党員，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說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領导机关同他們之間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員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錯誤，不是輕易地給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严厉地处罰他們，而是給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說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錯誤是难免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爭中求鍛炼，是改正錯誤的最好方法，党內斗爭的火力，应該向着那些坚持錯誤观点的不愿学习鍛炼，不受領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組織上的結論，也仅仅是对于那些錯誤严重与无法說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內斗爭与組織結論仍然是带有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質，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貫錯誤路綫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当因为他們一时表現改正而輕易給他們以重要工作。

伟大斗爭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結于党的領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

結全党領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爭，沒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紐，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組織路綫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坚持执行党的策略路綫而斗爭，把統一战綫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軍成立起来，把苏維埃共和国变为全民族的国家，把紅軍变为全民族的武装部队，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結合起来，把国內战爭与民族战爭結合起来。

神圣的民族革命战爭万岁！

中国的独立与統一万岁！

苏維埃新中国万岁！

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三科的文化教育（識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計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你所說的实际与理論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果你所說的实际与理論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須使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一切課程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們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課学了許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会看书作文，那他們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見，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課（識字、看报、作文三門）更增加些，我想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間（包括自修时間）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請你考虑这个問題，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之标准之一。

布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致蔡元培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課堂，旧京集会，湘城講座，敬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泽东一輩，少者則今日之学生，不論貧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尙，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謂亡国灭种者，曠古曠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也？共产党創議抗日統一战綫，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世之衮衮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曰当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嗥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其何以处此也？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

工农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大效，国共两党合作此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計，先生将何以处此也？讀新文字意見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見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嶄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頑固之簇新議論，先生当知見之而欢跃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聞之而欢跃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誠实儿女，又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学院之学术領袖，当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責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內战，放弃其对外退讓，对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賞之亡国方針，发动全国海陆空軍，实行眞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統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眞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将照耀万古，留芳千代，买絲爭綉，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救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減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具名宋、何等５３人，略——編者注。）

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統此致訊。

寇深禍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聞

明教，敬頌

道安，不具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給張学良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

友軍

汉卿先生閣下：

中国共产党建議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已經一年多了，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贊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了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准备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队扩大互相残杀的內战。我們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軍队停止向紅軍进攻，不阻拦紅軍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紅軍的抗日后方，我們首先停止向国党民軍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們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靜待国民党当局的覚悟，仅在国民党軍队向我們进攻时，我們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使国民党当局的覚悟。

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是抗战与內战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得到中国民族历史关系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見轉述蔣介石先生速行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

送呈卓覽。寇深禍急，愿先生迅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关于停战抗日的談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苏維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紅軍軍事委員会，現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紅軍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軍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許采取必須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軍，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繳获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紅軍者听便。

（四）如果国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时，制止任何防碍举动，并愿給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請一切国民革命軍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該項申請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晉綏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綏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誠能顧念国难，停止內战出兵抗日，苏維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紅軍主力为先鋒，与日寇决一死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为魯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一）致許广平的追悼魯迅先生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轉許广平女士鑒：

魯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維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領袖，共产主义苏維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誠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繼續魯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爭，以达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級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以电达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墨，魯迅先生殞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拔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魯迅先生的死，使我們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們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損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中华人民苏維埃中央政府对于魯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

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跃鏡，他沒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匿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战斗的精紳，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鋒，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販卖鲁迅的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沒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貼"等揑造的罪状来誣陷他，但一切誣陷都归失敗；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密語来离間大众的陣綫，但鲁迅先生給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論如何限亘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喚起了无数的人們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們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

致蒋介石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鑒：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維埃与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內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終孤行己意，先則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鎮之役。今春紅軍东渡黃河，欲赴冀察前綫，先生則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謂牺牲，率領西渡，别求抗日途經，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覚悟。数月来緩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謂先生将翻然复計，派遣大軍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湯恩伯之八个团向緩赴援，聊資点綴，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关斌、孙震、万耀煌、楊虎城、馬鴻逵、馬鴻宾、馬步芳、高維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洶洶，大有非消灭抗日紅軍、蕩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之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計，为保存抗日軍队与抗日根据地計，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憤恨，对緩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內战。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內战，早上抗日之战場。即如先生之嫡系可称劲旅者，亦难免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繳枪于紅軍耳。人心与軍心之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緩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綫之守卫士軍队之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內战，明日紅軍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內战战場，开赴抗日前綫，緩远之国防力量，驟增数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

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的請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許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緋絅歧途，将国为之毀，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也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祝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語曰："过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語重心危，立馬陈詞，佇候明教。

毛泽东……（共署各十九人，余略——編者注）

率中国人民紅軍二十万人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給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敗的时候，許多共产党員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爭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党員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虛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滿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說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們心里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脫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現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紀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訊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內。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愿意拣輕松事做，遇到担責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継續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賀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于延安

与北方青年的談話

（一九三七年春）

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先鋒，他們的大多数应該团結，为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到底，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对时局煩悶，这在集体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現的斗爭，北方青年应該对爭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爭取爱国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

中心之一，如若干人只談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斗爭，則抗日是不会有效的。資产阶級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們从北方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靜，从領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該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爭，对改良主义的傾向和影响应該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講演

（一九三七年）

同志們：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結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說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結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爭与土地革命。現在政策是和平团結，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們过去和現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間，我們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許我們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爭，阶級的武装斗爭，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資产阶級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沒有任何第二种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如果說共产党过去錯了，那末請問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們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嗎？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二者之間沒有中間的道路。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內部的阶級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关系也变化了一些。資产阶級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們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們采取了抗日的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們統一战綫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們的統一战綫是民族的，不分阶級与党派的联合战綫，与外国的人民陣綫也不相同，这是我們統一战綫的特点。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号平津学生反日运动以来，經过許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內部已經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內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議，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議，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統一政策，給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內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領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們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紛碎国內統治阶級的围剿这个口号，那末，現在就不是如此了，現在是要团結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蒂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內外都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們提議內面的围剿必須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現在这新任务已經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我們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顧民族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們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爭，我們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沒有民主改革，沒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日会只是一句空話。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以前的不和平不統一，国共两党之間如此，全国各省之間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須和平

統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統一成为全国必須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爭取这种和平統一，現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沒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現眞正的統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現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沒有民主自由，說話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沈鈞儒等爱国領袖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現在听說还要起訴。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紙講爱国話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眞正抗日呢？所以我們說，沒有和平与沒有民主，都不能統一团結，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爭取民主，是实現抗日战爭的必要条件，也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須要做的文章。

我們曾为扩大紅軍而努力，現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現在应該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紅軍也可改为国民革命軍，一切中国的軍队都要变为抗日軍，我們应該为扩大与訓練眞正的抗日軍而斗爭。

过去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負起革命的責任。現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轉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們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爭。

有些同志以为我們紅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了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換上新內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維埃改制，紅軍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揮，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西北青年有团結全国青年的責任，全国青年都团結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結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凶得怎么样，我們是能够打倒他的。（长时間的鼓掌）

命　令

（七月十四日于延安）

总指揮、任政委、林校长、各方面軍、各軍团、各軍、各师、各团及各軍事学校首长，
同志們：

（甲）：

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廿九軍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調派援軍，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紅軍有开赴前綫，增援友軍，并配合友軍消灭野蛮日軍之务。

（乙）：

令到即以軍为单位，改組为国民革命軍編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課程，对干部及兵員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現状。軍事訓練，着重雪地战斗，夜間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救术，长途行軍，无后方作战等項，各軍事学校大体相同，照此办理。

以上各項限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軍委主席团

（此命令对紅軍公开宣布，惟对日寇及汉奸分子严守秘密，不得疏忽。）

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

第一章　唯心論与唯物論

本章討論下列各問題：

一、哲学中的两軍对战；

二、唯心論与唯物論的区别；

三、唯心論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論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論和唯物論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爭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說，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級的人們所創造的，这些人們的意識，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說，表現着一定社会阶級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認識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滿足社会阶級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級的矛盾的社会結构中，最初唯心論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識也随之发展，唯心論应該衰退，唯物論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論不但不曾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論竟长爭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級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級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論学說，一方面被压迫阶級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論学說。唯心論和唯物論学說都是作为阶級斗爭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級沒有消灭以前，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論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剝削阶級的意識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論則是革命阶級的宇宙观，它在阶級社会內，从反动哲学的唯心論之不断的战爭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論与唯物論的斗爭，始終反映着反动阶級与革命阶級在利害上的斗爭。哲学中的某一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識到与否，結局总是被他們所属阶級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傾向，总是直接間接助长着他們所属阶級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傾向的貫彻，便是他們所属阶級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法唯物論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識（哲学也在內）的阶級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級的性質的向有产阶級的唯心論哲学作坚决的斗爭，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資本主义組織、建立无产阶級专政，与建設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現資产阶級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轉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論与政治实践是应該密切联系着的。

二、唯心論与唯物論的区别

唯心論与唯物論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在于对哲学的根本問題，即精神与物質的关系問

題（意識与存在的关系問題）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論認精神（意識，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質（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論認物質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問題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問題上的分歧意見来。

在唯心論看来，世界或者是我們各种知覚的綜合，或者是我們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創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質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虛构的幻想，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質的外壳。人类的認識，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的自己产物。

唯物論相反，認宇宙的統一就在他的物質性。精神（意識）是物質的本性之一，是物質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質，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認識，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三、唯心論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唯心論認物質为精神的产物，顚倒着实在世界的姿态。这种哲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說过，最初唯心論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但在生产发展之后，促使唯心論形成哲学思潮之首先的条件，乃是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結果，社会发生分工，分工再发展，分出了专門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們。但在生产力貧弱时期，两者的分裂还沒有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到了阶級出現，私产发生，剝削成为支配阶級存在的基础之时，就起了大变化了。精神劳动成为支配阶級的特权，肉体劳动成为被压迫阶級的命运。支配阶級开始顚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級之間的相互关系，不是劳动者給他們以生活資料，反而是他們以生活資料給与劳动者，因此他們鄙視肉体劳动，发生了唯心論的見解。消灭肉体与精神劳动的区别，是消灭唯心論哲学的条件之一。

使唯心論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的还在于这种哲学意識地表現剝削阶級的利害。唯心論哲学在一切文化領域的优越，应該拿这个去說明。假如沒有剝削阶級的存在，唯心論就会失掉它的社会根据。唯心論哲学之最后消灭，必須在阶級消灭与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之后。

使唯心論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論斗爭，还須在人类的認識过程中寻找其根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論去的可能性。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使我們的認識分裂为二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質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質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脫离了客观眞理。客观眞理是表現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沒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沒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脫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的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論者所采取的方法。一切唯心論者，即是拿意識，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心論便强調着人类意識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們不能指出意識受物質限制的这种唯物論的眞理，却主张只有意識是能动的，物質不过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級的本性所驅策，唯心論者便用一切方法把意識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它，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的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的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像。經济学上的唯心論，过分夸大交換中非本質的一方面，把

供求法則提高到資本主义的根本法則。許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的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規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动力的結論。唯心論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創造者，唯心論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論軍事家实行拚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論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蔣介石說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結果。我們的思維不能一次反映出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現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調的，生动的，認識之辯証法的过程。唯心論依据于思維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給过程以正确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說："人类的認識不是直綫的，而是曲綫的。这一曲綫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整的直綫，这段直綫就有引你陷入迷陣的可能。直綫性和片面性是見树不見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这些就是唯心論的認識論的根源"。哲学的唯心論是将認識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脫离物質、脫离自然的神化的絕对体。唯心論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机械唯物論）沒有强調思維在認識上的能动性，仅給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鏡子看。机械唯物論对唯心論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認識論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論。只有辯証唯物論，正确地指出思維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維受物質的限制。指出思維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的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辯証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論。

四、唯心論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承認离意識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質是唯物論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級斗爭的实践，科学实驗的实践，使人类逐漸从迷信与妄想（唯心論）脫离，逐漸認識世界之本質，而达到于唯物論。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簡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說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論的起源。

然而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質的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間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級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級斗爭。被压迫阶級考虑形势，估計力量，建立計划，在他們的斗爭成功时，使他們确信自己的見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質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級因为采取錯誤的計划而失敗，又因为改正其計划而成功，使他們懂得只有主观的計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質性及規律性的正确的認識，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給人类証明世界的物質性及規律性，使人类覚悟到宗教与唯心論的幻想之无用，直到达于唯物論的結論。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向自然斗爭史，阶級斗爭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爭的必要，考虑物質的現实及其法則，証明了唯物論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爭的思想工具——唯物論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級斗爭越发发展，科学認識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論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漸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

資产阶級在为了向封建阶級斗爭的必要、及无产阶級还沒有威胁他們的时候，也曾經找

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論作为自己斗爭的工具，也曾經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質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們自己变成了統治者，无产阶級的斗爭又威胁着他們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論。中国資产阶級的代言人戴季陶，吳稚暉，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論到唯心論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証据。

資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級，他們本質上是唯物論的。但由于无产阶級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級，就使得无产阶級的唯物論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唯物論，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辯証法的性質，沒有机械論的性質。无产阶級吸收了人类全历史中一切实践的成果，同时又由于自己的实践，經过他們的代言人与領导者——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辯証法唯物論，不但主张物質离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質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統的嶄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論，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

第二章　辯証法唯物論

这个題目中准备討論下列問題：

一、无产阶級革命的武器——辯証法唯物論；

二、过去哲学遺产同辯証法唯物論的关系；

三、在辯証法唯物論中宇宙观和方法論的一致；

四、哲学对象問題；

五、物質論；

六、运动論；

七、时空論；

八、意識論；

九、反映論；

十、眞理論；

十一、实践論。

下面簡述这些問題的观点。

一、辯証法唯物論是无产阶級革命的武器

这个問題在第一章中已經說过，这里再簡单地說一点。

辯証法唯物論，是无产阶級的宇宙观。历史給予无产阶級以消灭阶級的任务，无产阶級就用辯証法唯物論作为他們斗爭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們各种見解之哲学基础。辯証法唯物論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們站在无产阶級的立場去認識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們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場出发，現实世界才得眞正客观地被認識。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級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級；又一方面，只有辯証法唯物論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結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論。

中国无产阶級担負了經过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須采取辯証法唯物論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辯証法唯物論被中国无产阶級、共产党、及一

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級立場的人們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話，那末，他們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論，他們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結自己的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論，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錯誤，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辯証法唯物論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員，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錯誤的理論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員中間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員违反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糾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覚地研究与了解辯証法唯物論，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旧的哲学遺产同辯証法唯物論的关係

現代的唯物論，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說之簡单的継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統治哲学的斗爭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論和神秘性的斗爭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法唯物論，不但継承了唯心論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說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說的唯心論，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辯証法。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論发展的継續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論的狹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覚的唯物論（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論与費尔巴哈唯物論）之反对者。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辯証法唯物論，継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遺产，同时又給此种遺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沒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的、有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級自覚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論思潮中，唯物辯証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資产阶級影响的机械唯物論，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辯証法的思想逐漸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辯証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級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爭之发展，以横扫的陣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級領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辯証法唯物論哲学思潮，不是从継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遺产而来的，而是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辯証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須同各种現存的反动哲学作斗爭，在全国思想战綫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遺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辯証法唯物論中宇宙观和方法論的一致性

辯証法唯物論是无产阶級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級認識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論的一致体，唯心論的馬克思主义修正派認为辯証法唯物論的全部实質只在于它的“方法”，他們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辯証法从唯物論割裂开来。他們不了解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辯証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辯証法，而是唯物的辯証法，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是絲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論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論者却又仅把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辯証法，而且認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結論。他們不了解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論不是簡单的

唯物論，而是辯証法的唯物論。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錯誤的，辯証法唯物論是宇宙观和方法論的一致体。

四、唯物辯証法的对象问題——唯物辯証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来看的）唯物辯証法看做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則及（在辯証法的各范疇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認識的发展法則的学問。他說：論理学不是关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学問而是关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則的学問，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內容及其認識之发展法則的学問。換言之，論理学是关于世界認識之历史的总計、总合、結論。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論看的唯物辯証法的意义强調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辯証法系由世界認識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結論。因此他說："辯証法就是認識的历史。"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辯証法及其对象所給予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說：第一，唯物辯証法与其他任何科学同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維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則。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辯証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現象間的关系，而是要在各現象本身中观察出他們之間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見解同少数派唯心論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識的）范疇的研究当做唯物辯証法的对象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論者企图建立一个認識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現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疇的哲学体系，这样他們就事实上放弃唯物辯証法。第二，各个科学分析（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經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質世界及其認識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則是狹隘地片面地被各个具体研究領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辯証法則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內容，及人类的其他一切科学認識之总計、結論、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辯証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則，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則，因此也包含着物質世界的本質的）各种規律性和規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辯証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侶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眞正科学認識上理論学和認識論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眞实性的方法論。我們說唯物辯証法或辯証法唯物論是宇宙观和方法論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認哲学存在权的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錯誤，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問題，馬克思、恩格思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脫离实在的現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質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理論观念和理論观念的自身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理論就是少数派唯心論的那种干法。所謂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辯証法这种論发展的学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說唯物辯証法为論发展的学說。恩格斯称唯物辯証法为"論自然社会及思維之运动和发展的一般法則"的学說。列宁把唯物辯証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內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說"。他們都認为在这种学說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說所述一切发展原則的公式，概属狹隘的、无內容的"失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列宁）。至于唯物辯証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內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說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辯証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問題中还要解决一个問題，就是辯証法、論理学、認識論的一致性的問題。

列宁着重指出辯証法論理学及認識論的同一性，說这是“极其重要的問題”，說“三个名詞是多余的，它們只是一个东西”，根本反对那些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做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說去处理的那种干法。

唯物辯証法是唯一科学的認識論，也是唯一科学的論理学。唯物辯証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認識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轉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則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辯証法与認識論的一致。唯物辯証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則，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維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辯証法研究現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現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轉化的法則，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則的人类思維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辯証法与論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辯証法論理学認識論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們看下面唯物辯証法怎样解决关于理論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問題，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說：“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維方法来說，黑格尔思維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說是抽象的唯心論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非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檢証。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錯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两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話，不但要注意許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論理的方法。然而这一論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是舍去了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这种“論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論理学的范疇，是外的定在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簡約”。“范疇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們去認識这一个网和网的結节点的”。“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識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这样的論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謂公理的意义了”。“人类的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做論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識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見的永續性，因为是反复几十亿次的結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質。”上述列宁的那些話，指明唯物辯証法的論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論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則和范疇看成空虛的、脫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它看成脫离物質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們头脑里并且經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質运动的表現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維的同一性上，把辯証法，論理学，和認識論的同一性当做唯心論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辯証法、論理学和認識論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础上的。只有用唯物論解决存在与思維的关系問題，只有站在反映論的立場上，才能使辯証法論理学和認識論的問題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辯証法唯物論去解决論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論中包含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理論发展。資本論所分析的，是那把資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經济范疇的发展的辯証法。这問題之解决的唯物論性質，在于他以物質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疇当做这一現实历史的反映。資本主义的理論和历史的一致，資本主义的社会的論理学和認識論的一致，模范地表現在資本論里面，我們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辯証法論理学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径。

以上是辯証法唯物論的对象問題

五、物質論

馬克思主义繼續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論路綫，正确地解决了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質性，物質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質对于意識的根源性（或意識对于存在的依賴关系）。

承認物質对于意識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質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論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承認物質世界离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現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現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承認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証明这一点呢？証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須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該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現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証据。經过了万里长征的紅軍，不怀疑經过地区連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軍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紅軍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軍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們意識而独立存在的物質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論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質观。

哲学的物質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質是不相同的。如果說哲学的物質观在于指出物質的客观存在，所謂物質就是說的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覚，并在感覚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說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絕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質观則在于研究物質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論，后来的电子論等等，这些說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辯証法唯物論的見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質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質观，是彻底貫彻哲学的唯物論方向之必須条件，在向唯物論和机械唯物論作斗爭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論者根据电子論的发見，裏传物質消灭的謬說，他們不知道关于物質构造之科学知識的进步，正是証明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質論之正确性。因为表現在旧的物質概念中的某些物質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經过現代自然科学的发現即电子論的发現，証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質形态中，而在其他物質形态中則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論对于物質观念的片面性与狹隘性，而对于承認世界的物質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質观，却恰恰証明其正确。原来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質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質的世界的統一，就是物質多样性的統一。这种物質观，对于物質由一形态轉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絲毫也沒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結晶体、細胞、社会現象、思維現象——这些都是物質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質发展史中的种种暫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質形态的发現（物質多样性的发現），只是丰富了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質观的內容，那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質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質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狹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質包括了狹义的物質。

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質观，不承認世界有所謂非物質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質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論在时間与空間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統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謂客观存在的物質。用彻底的唯物論見地（即唯物辯証法見地）来看意識这种东西，那末，所謂意識不是别的，它是物

質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識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識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們区别物质同意識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說，只在認識的見地內有意义。因为意識或思維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認識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認識的物质同被認識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認識論領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認識論以外还把意識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論。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現，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謂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識的根源性，这是这个意思。一句話，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切归于司馬懿”，我們說“一切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統一原理。

以上是辯証法唯物論的物质論。

六、运动論（发展論）

辯証法唯物論的第一个基本原則，在于它的物质論，即承認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識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統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論中已經解决了。

辯証法唯物論的第二个基本原則，在于它的运动論（或发展論），即承認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內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現，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統一原理相結合，就成为辯証法唯物論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辯証法唯物論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簡单化，都是不能容許的。辯証法唯物論的运动論，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爭建立起来的。

辯証法唯物論的运动論，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論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論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他們从否認世界的物质統一性出发，設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沒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沒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結果。德国唯心論哲学家黑格尔認为現在的世界是从所謂“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論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說上帝創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說法都和辯証法唯物論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論与宗教，就是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及現在一切反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論，当他們說到自然現象时是唯物論的运动論者，但一說到社会現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辯証法唯物論坚决駁斥所有这些錯誤的运动观，指出他們的历史限制性——阶級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設在以无产阶級立場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論上面，辯証法唯物論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內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設想沒有物质的运动，同設想沒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議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銳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則有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論或絕对平衡論。他們認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沒有发展这回事，認为絕对的靜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辯証法唯物論坚决反对这种意見，認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內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靜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則是絕对的。辯証法唯物論承認一切物质

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能，并認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認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錯誤，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者况一般化，絕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愛說的一句話："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論。他們也承認宇宙及社会現象的变动，但否認其本质的变动，在他們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的阶級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級如果也承認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論上宣布他們自己阶級的死刑。一切反动势力，他們的哲学都是不动論。革命的阶級同民众，却眼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們的哲学是辯証法唯物論。

此外，辯証法唯物論也不承認簡单化的运动观，就是說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結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結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論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論（十七八世紀的法国唯物論，十九世紀的德国費尔巴哈唯物論）也承認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認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沒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說他們在社会論上的見解依然是唯心論的发展观，就在自然論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統一，归結到某种片面的属性，归結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象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們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內部原因上去說明物质或运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純的外面的发現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說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們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場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減。物体某一瞬間在某一場所，另一瞬間則在另一場所，这样就叫做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減的轉化，沒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結果的。辯証法唯物論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純的場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轉化，世界物质的統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統一与运动。恩格斯說："运动的一切高級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結合着，例如如果沒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沒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認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級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决不能包括各种状况中主要形态的体质的"。这話是千眞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就单純机械运动而論，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須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辯証法的，虽然它們之間的辯証法內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辯証法的运动，所謂物体某一瞬間"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謂"在"某处，所謂"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間內和被限制着的空間內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絕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制的时間及空間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絕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現实世界中，沒有它的絕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映、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現象与社会現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紀与二十世紀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現了运动轉化法則，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轉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地轉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轉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內部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

两种因素相爭相斗，推动着物質的运动和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轉化法則的发現，辯証法唯物論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質統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作永远运动的物質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做由低級形态到高級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質去考察，即把世界当做发展、当做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話来說："統一的物質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論的循环論击破了。辯証法唯物論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認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終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暫时的（有始有終的），就是說，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灭的，認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級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級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暫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都不是絕对最初的，也不是絕对最后的，它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終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爭的法則（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級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說（就各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說），却也会发生轉向的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結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的运动，認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的（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許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認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質新属性的出現，是由連續性的中断即經过冲突和破坏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連結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絕对破坏。最后，辯証法唯物論認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現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質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規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辯証法唯物論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經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質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說："各种各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系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順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說，分类才有意义"。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內，是采取質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質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記物質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問題。所謂"物質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沒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与运动。"物質"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簡写的名詞，在这些名詞中，我們依照它們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覚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內"（恩格斯）。

以上就是辯証法唯物論的世界运动論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說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級的宇宙观与方法論，无产阶級及一切革命的人們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們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时空論

运动是物質存在的形式，空間和时間也是物質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質存在于空間和时間中，并且物質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間和时間这两种物質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間和时間不能与物質相分离。"物質存在于空間"这句話，是物質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質世界是內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說物質被放在一种非物質的空虛的空間中。空間和时間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質的东西，也不是我們感覚性的主观形式，它們是客观物質世界存在的形式。它們是

客观的，不存在于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們以外。

把空間和时間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見解，是彻底的唯物論的見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論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認时間和空間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覚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認发展着的时間和空間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絕对观念；（三）馬赫主义的时空观，認时間和空間是“感覚的种类”，“使經驗和諧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論观点，都不承認时間和空間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認时間和空間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錯誤理論，都被辯証法唯物論一个一个地駁了。

辯証法唯物論在时空問題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論观点作斗爭，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論作斗爭。特别显著的是牛頓的机械論，他把空間看做同时間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辯証法唯物論反对这种机械論，指出我們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沒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間和时間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間和时間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絕对的眞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絕对眞理的路綫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絕对眞理。人类关于空間和时間概念的变动性，始終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組織之科学知識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列宁）。

以上是辯証法唯物論的时空論。

八、意识論

辯証唯物論意識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态的形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識論是和一切唯心論及机械唯物論对于这个問題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馬克思主义的見解，意識的来源，是由无意識的无机械发展到具有低級意識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級意識形态的人类。高級意識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級神經系統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馬克思、恩格斯曾着重指出意識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賴关系，和意識同人类言語发展的关系。

所謂意識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組織复杂的神經系統，这样的神經系統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級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級的动物界，都沒有認識在它們內面或外面发生着的那些过程的能力，它們是沒有意識的。仅在有高級神經系統的动物体，才具有認識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內反映或領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經系統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內部取意識形式的主观表現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論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的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沒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質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語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質，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論者却認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見解歪曲了我們关于这个問題的观念。須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識同重量伸张等是同一物质之不同的性質。意識是运动的物质之內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

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經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两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識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唯物論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馬克思主义的机械論，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資产阶級的左翼学派的見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識。他們把意識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認为高級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們不了解意識的本質之質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識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們把客观和主体之具体历史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的客观世界。这种把意識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維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的問題。

孟塞維克的唯心論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論去代替馬克思主义的意識論，把唯物論同唯心論調和起来。他們拿客观主义同主观主义的“联盟”的原則，去对抗辯証法的原則，而这种原則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怪議論，这就是普列汉諾夫关于意識問題的物活論的見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識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現着。照他的意見，意識不是发生于物質发展过程中的，而是从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質的，石子及低級有机体的意識和人的意識之間，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別。这种反历史的見解，对于辯証法唯物論認为意識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質的特殊性的見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辯証唯物論的意識才是意識問題上的正确的理論。

九、反映論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論者，单承認物質对于意識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須承認意識对于物質的可認識性。

关于物質能否被認識的問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覺得无力对付的問題，只有辯証法唯物論能够給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問題上，辯証法唯物論的立場即同不可知論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論不同。

休謨同康德的不可知論，把認識的主体从客体隔离开来，認为越出主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間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

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論，則把客体同感覺等同起来，認为眞理在感覺中就已經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們不但不了解感覺是外界作用的結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認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覺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現出来）。

只有辯証唯物論的反映論，肯定地答复了可認識性問題，成为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論，指明我們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观客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象唯心論者所說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論者所說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准，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像和样本。

客观的眞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們的感覺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認为客观眞理在感覺中就已經取着完成形态而被我們获得的那种直率实在論的見解，是一种錯誤的見解。

客观眞理在我們感覺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認識的。辯証唯物論的反映論反对不可知論的見解，認为意識是能够在認識过程中反映客观眞理的。認

識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認識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們的感覚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覚和思維，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說的那样把我們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們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覚和思維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轉現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質的东西”（馬克思）。在認識过程中，物質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們的認識中。向着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綫的斗爭，揭破直率实在論和不可知論的錯誤，是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任务。

唯物辯証法的反映論認为我們認識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論者認为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見解根本相反。但我們之接近絕对眞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說：吾人知識之接近客观的絕对眞理，是历史地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眞理的存在是絕对的，我們不断地向眞理接近也是絕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繪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則是絕对的。我們承認人的認識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眞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們不是不可知論者，我們又承認眞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認識的历史运动中。列宁还說：对于自然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或絕对去了解它。認識不是无运动的与无矛盾的，認識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过程中。認識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充滿着矛盾与斗爭的运动，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之見解。

一切哲学在認識論上的反历史观点，都不把認識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狹隘性。感覚主义的經驗論之狹隘性，在感覚和概念之間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狹隘性，則使概念脫离了感覚。只有把認識当作过程看待的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狹隘性，把認識放在唯物的与辯証的地位。

反映論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覚和印象，也存在于思維中（抽象的概念中），認識是一个由感覚到思維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說：“反映自然的認識，不是簡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許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則等等之形成过程。”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覚到思維的認識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闡明了認識中的經驗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辯証唯物論的見解。許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認識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覚到思維（从印象到概念）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轉变，即理解感覚和思維的一致为辯証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論的本質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真理論

眞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絕对的，这就是唯物辯証法的眞理論。

眞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認了物質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質对于意識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認了眞理的客观性。所謂客观眞理，就是說，客观存在的物質世界，是我們的知識或概念的內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沒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論者否認物質世界离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論的基本原則，才主张知識或概念是主观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內容，因而承認主观眞理，否認客观眞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識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規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識，不是客观眞理，而是主观的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級斗爭或民族斗爭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要受着思想（知識）的指揮的，这种思想如果

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沒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沒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識的內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謂主观指导犯錯誤，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識，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眞理。一切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錯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們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說，一般公認的就是客观眞理（主观唯心論者波格达諾夫就这样說）。照这种意見，那末，宗教和偏見也是客观眞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見虽然实質上是謬見，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認，有时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反不及这些謬見的普及。唯物辯証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見，認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識，才能被称为眞理，一切眞理必須是客观的。眞理与謬說是絕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識是否为眞理，唯一的看它們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認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說得天花乱墜的理論，都只能把它当作謬說看待。

唯物辯証法眞理論的第一个問題，是主观眞理和客观眞理的問題，它的答复是否認前者而承認后者。唯物辯証法眞理論的第二个問題，是絕对眞理和相对眞理的問題，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認或否認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認它們，并指出它們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們的辯証法。

唯物辯証法在認識客观眞理时，就是承認了絕对眞理的。因为当我們說知識的內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認了我們知識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絕对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眞理的認識，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認識，因此它实質上是絕对的”（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絕对的眞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們的知識，而是在我們認識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經过无数相对眞理的介紹，而到达于絕对的眞理。这无数相对眞理之总和，就是絕对眞理的表現。人类的思維，就它的本性說，能給我們以絕对眞理，絕对眞理乃由許多相对眞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絕对眞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眞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絕对眞理仅能表現在无数相对眞理之上，如果不經过相对眞理的表現，絕对眞理就无从認識。唯物辯証法并不否認一切知識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識接近于客观絕对眞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并不是說知識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識和謬說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絕对的眞理，这就是絕对眞理与相对眞理相互关系之辯証法的見解。

有两种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論，另一种是唯心論的相对論，对于絕对眞理与相对眞理之相互关系問題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論者，根据于它們“物質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則，認为人类思維也是不变化的，即認为在人的意識中这一成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攝取了。这就是說，他們承認絕对眞理，而这个絕对眞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們把眞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們的錯誤不在于他們承認有絕对眞理——承認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們不了解眞理的历史性，不把眞理的获得看成一个認識的过程，不了解所謂絕对眞理者，只能在人类認識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認識，都表現着絕对眞理的內容，但对于全部眞理說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絕对眞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論关于眞理的見解，表現了認識論的一个极端。

認識論中关于眞理問題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論的相对論。他們否認知識之絕对眞

理，只承認它的相对意义。他們認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絕对眞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眞理，眞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謬說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統治阶級剝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剝削制度也就是眞理，因为眞理横竪只是主观与相对的，否認客观眞理与絕对眞理的結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結論，并且唯心論的相对論，它們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替統治阶級作辯护的，例如相对論的实用主义（或实驗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論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論，或是唯心論的相对論，都不能正确解决絕对眞理和相对眞理的相互关系的問題。只有唯物辯証法，既給思維与存在相互关系問題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識的客观性，再則，还同时給了絕对与相对眞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辯証法的眞理論。

十一、头踐論（略）

第三章　唯物辯証法

前面簡述了“唯心論与唯物論”及“辯証法唯物論”两个問題。关于辯証法問題，仅有概略的提到，現在来系統地講这个問題。

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辯証法唯物的唯物論，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論（或叫机械的唯物論），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問題。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論，（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論，或辯証法的唯心論）說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說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論，否認世界是心的世界，說世界是物質的世界，但物質是不发展的，不变化的，第三种是馬克思主义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說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質，而是发展的物質世界，这就是辯証法唯物論。馬克思主义这样的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眼睛中的样子翻轉了过来，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議論嗎？这世界是发展的物質世界这种議論，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說过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还只簡单地籠統地說了一說，叫做朴素的唯物論，沒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基础；然而議論是基本上正确的。黑格尔創造了辯証的唯心論，說世界是发展的，但是心造的，他是唯心发展論，其正确是发展論（即辯証法），其錯誤是唯心发展論。西洋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紀法德等国的資产阶級唯物論，則是机械观的唯物論，他們說世界是物質世界，这是对的，就是象机械一样的运动，只有增減或位置的变化，沒有性質上的变化，这是很不对的。馬克思継承了希腊朴素的辯証唯物論，改造了机械唯物論与辯証唯心論，創造了从古以来沒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辯証唯物論，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級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質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轉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揮作战，去議論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論是一个东西，辯証法、認識論、論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我們要系統地来講唯物辯証法，就要講到唯物辯証法的許多問題，这就是它的許多范疇，許多規律，許多法則（这几个名詞是一个意思）。

唯物辯証法究竟有些什么法則呢？这些法則中那些是根本法則，那些是附从于根本法則而又为唯物辯証法学說中不可缺少、不可不解决的方面、側面或問題呢？所有这些法則为什么不是主观自造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則呢？对于这些法則的学习、了解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完整的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学說，創建于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說，到了現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与世界革命时期，这个学說又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丰富了它的內容，这个学說中包含的范疇首先如下各項：

矛盾統一法則。

質量互变法則。

否定之否定法則。

以上是唯物辯証法的根本法則。除古代希腊的朴素唯物論曾經簡单地无系統地指出了这些法則的某些意义，及黑格尔唯心地发展了这些法則外，都是被一切形而上哲学（所謂形而上哲学，就是反发展論的学說）所否定了的，直到馬克思、恩格斯，才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些法則成为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論之最基本的部分。

唯物辯証法所包含的范疇除了上述根本法則外，同这些根本法則联系着的，还有如下各范疇。

本質与現象。

形式与內容。

原因与結果。

根据与条件。

可能与現实。

偶然与自由。

鏈与环等等。

这些范疇，有些是从来形而上学及唯心辯証法所着重研究过的，有些是从来哲学片面地研究过的，有些則是馬克思主义新提出的。这些范疇，在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家与实践家手里，揭去了从来哲学唯心的及形而上学的外衣，克服其片面性，发現了它們的眞实形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它們的內容，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論中重要的成份，拿这些范疇同上述根本的范疇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辯証唯物法的系統。

所有这些法則或范疇，都不是人的思想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則。一切唯心論都說精神造出物質，那末，在他們看来，哲学的法則、原則、規律或范疇，自然更是心造的了，发揮了辯証法系統的黑格尔，就是这样去看辯証法的。在他看来，辯証法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法則，而是純碎思想上的理論系統，人的思想造出了这一套系統之后，再把它們套到自然和社会上去。馬克思、恩格斯揭去黑格尔神秘的外衣，丢弃了他的唯心論，把辯証法放在唯物論的地位。恩格斯說："辯証法的法則是从自然和人类历史抽取出来的，但它們并非別的，就是这两个历史发展領域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則，就实質論，可以归納为質量互变、矛盾統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根本法則。"辯証法法則是客观世界的法則，同时也是主观思想里头的法則。因为人的思想里头的法則不是別的，就是客观世界的法則通过实践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辯証法、認識論、論理学是一个东西，前面已經講过了。

我們学习辯証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經济制度的压迫。在我們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慘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們必須改变这些老关系，爭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辯証法呢？因为辯証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則，我們明白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論同方法。唯物辯証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論。我們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辯証法，則我們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无一不违反辯証法，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辯証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辯証法。

有人說，許多人懂得实际的辯証法，而且也是实际的唯物論者，他們虽沒有讀过辯証法书，可是做起事来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唯物辯証法，他們就沒有特别研究辯証法的必要了。这种話是不对的。唯物辯証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辯証的头脑之革命者，他們虽从实践中学到了許多辯証法，但是沒有系統化，沒有如同已經成就的唯物辯証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还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辯証法的必要。

又有人說，辯証法是深奧难懂的，一般人沒有学会的可能，这話也是不对的。辯証法是自然、社会与思想的法則，任何有了一些社会經驗（生产与阶級斗爭的經驗）的人，他就本来了解了一些辯証法；社会經驗更多的人，他本来了解的辯証法就更多些，不过还处在零乱的常識状态，沒有完备的深刻的了解。就将这种常識辯証法加以整理与深造，是并不困难的。辯証法之所以使人覚得困难，是因为沒有善于講解的辯証法书，中国許多辯証法书，不是錯誤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人望而生畏。所謂善于講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語，講亲切的經驗，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講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辯証法，还沒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許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

以下分述辯証法的几个法則。（略）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

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則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上略）今日紅軍在决战問題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眞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針，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則不能打

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軍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結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內战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們游击战爭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請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給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針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的判断与布置。他只想以陈族集中相机敌以打击。暫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族的暫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轉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暫时到五台山也是可的，但請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轉赴晉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族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須轉向五台来的，統請斟酌处理。

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爭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爭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統一战綫等等，应环繞于游击战爭。华北正規战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击战如失敗，我們需負严重的責任。

（二）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爭，借着紅軍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內）动員群众收編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計划的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馬治安，黃紹雄等再談一次。請酌。

（三）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級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領导的党政軍集体机关之組織。要設想在敌整个占領华北后，我們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爭。要告訴全党，今后沒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爭。为此目的，紅軍应給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农村調查》序言（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爭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現在仅存下各部分。一、寻鄔調查，二、兴国調查。三、东坡等处調查，四、水口村調查，五、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清出租問題，七、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八、永新分田后的富农問題，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 长岡乡調查，十一、才溪乡調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爭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經过长征，尚未損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損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調查，因許克祥叛变而損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見其一处。为免两損失，印出若干分，并供同志們参考，这是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見，后来已經改变了。

在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們：

今天我們主要的任务，是先鋒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爭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来領导，需要大批精練的先鋒队来闢道路。这种先鋒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誠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們并不謀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們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道路上起着响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純政府与軍队的抗战，沒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絕对沒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爭到底的先鋒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队，我們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战到底。

今天我們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是位优秀的作家而且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給了革命斗爭。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組織上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等著作都是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輕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定的斗爭。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掙扎着，反抗着。正如陝北公学的同志們，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質生活里勤謹地学习革命理論一样，充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陝北公学的一切物質設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眞理，講自由，是創造革命先鋒的場所。

魯迅是从潰退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馬枪。朝着他經历过来的腐敗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劣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簡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級与民族解放的立場上，为眞理和自由而斗爭。

魯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見。他用显微鏡和望远鏡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眞。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实完全証明，他的見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貼，已經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魯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魯迅則是中国的圣人，我們为了永久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图书館”，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伟大。

魯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爭精神。刚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爭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革命者 例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諾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此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后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反到压迫来了，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来献給敌人作为見面礼（我記得大意如此）。魯迅痛恨这

种人，同这种人做斗爭、随时教育着訓練着他所領导的文学青年。叫他們坚决斗爭，打先鋒开辟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敌惧人对他的威胁，利誘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泪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嘯着前进，魯迅是一个彻底的現实主义者，他絲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他一定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濺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沒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們要学习魯迅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綜合了上述的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完全貫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学习魯迅的精神，把他带到全国各地的統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爭。

【註】：本文系自1638年3月重庆出版的半月刊《七月》

基础战术

第一章 緒論

一、民众怎样担担战争行动

赤手空拳的民众，比不荷枪实弹的武装，怎么能够冲鋒陷陣，杀敌致果去負担战爭的实际工作呢？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合理的疑問。但是我們要知道軍队所用的兵器效力，和軍队所做的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那就可明了我們民众在赤手空拳中还有制敌兵器和工作！

軍队的兵器的最大效用不过是杀敌，最終的目的不过是削弱或消灭敌人的战斗力，那末，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一件东西不可杀敌，那一种行动不可以減少或消灭战斗力呢？譬如，刀、木棍、斧头、鋤头、板凳和石头，件件都可以杀人。如剪电綫、拆桥梁、造謠言、散毒葯、絕接济，处处均可使敌不方便或減少敌人的战斗力，就是我們不肯决心去利用。如果我們实在要去杀敌灭敌，到处都是我們的兵器，到处都有我們的工作，来从事軍民联合行动。

二特别注意事件

此外还須特别注意的，就是現在的国际战爭，它的残酷使我們意外，时間也很持久，我們不要受着未曾見过的残酷战爭痛苦，就馬上受着威胁屈服，我們也不要受长期战爭的影响，就馬上忍耐不住而厌倦了，我們应該以最刚强的精神，最热烈的爱国情緒，和持久的意志，去和敌人作頑强的斗爭。我們要知道，战爭的状况和时間虽然是残酷和无情的，还不象战爭失敗了，国家灭亡，使整个民族陷在大劫不复的地位的时候，那是更残酷而无止期的。故而，无論战爭如何残酷，最后五分鈡的奋斗，我們要絕对的坚持忍耐下来，尤其是我們目

下的敌人，是利在战局的速决，而我們失利战局的持久的策略。

三、不要怕敌

我們看見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武器就如老鼠見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混入其中去作破坏的工作。我們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嗎？兵器我們可用方法夺取过来的，不过是怕給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田地，难道还有誰怕死？死还不怕，那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所以我們看見敌人的时候，无論他是多少，要当他是可以充飢的面包，馬上就可以将他吞下去。以上各件，是我們在实行扩大的时候，亦应該注意的。

四、游击战术的定义

在陆軍主力，不便和敌人作大規模的会战时，故派出别动队或游击队，采取避实攻虛，飘忽无常，随机制敌。按战术正規的应对敌人的方法，就叫游击战术。

第二章　战　　术

在我們国防設备未完全，武器不及敌人精备的时候，我們要对敌决战，应該守着下列的几个原則。

一、行军警戒

行軍的时候，在前卫之前或后卫之后，側卫之側的四五里的距离，均須派遣便衣队，身怀短枪，以充偵察，防敌人意外的攻击，或多余的冲突。

二、駐军警戒

我們駐札地方如果有敌人接近之虞的时候，每日对于敌方，必派遣一队作远出二三里的偵探，或作联絡地方团体，鼓动民众抗战的宣传工作。若发現敌人，該队一面抵抗，一面报告，使我們能准备警戒撤退，不至打不必要的战。

三、不可攻坚

若敌人固守，或据險抗拒。我們非有特别把握，切不可去攻他，因为攻他很費时日，我們必有倍敌的死伤。且在游击战中，我們炮兵不健全，若輕易攻坚，則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方敌人很容易从四面包攏来。关于这点，軍民务要鎮靜，不可輕易凭一时气憤乱干。

四、不打硬仗

不有十分胜利的把握的仗不可打，因为杀人一千，自杀八百，那是不合算的，尤其是在我們的游击战中，人員弹葯补充困难。如果打不胜仗，自己失了許多人員弹葯，在我們算是失敗。

五、敌情不明不可战

我們駐在某处忽然发現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来，則絕不可战，应决然撤退至十里外。如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来攻，一定兵力占优势或有計划的。我們千万不要上他的大当，如敌大我退，自然得便宜，如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也不迟。

六、要有民众組織和联絡

現代战爭，非軍队可单独胜任之事，尤其是在游击战斗中，必須民众的力量，才能有利的把握。因为有了民众的帮助，則凡关于运輸，救护，即不幸失敗、也有方法逃脫或收容，因此，民众沒有組織和联絡的地方，不可輕易作战。不要偵探，扰乱等，有很大的便利，同时可陷敌于孤立的地方，則于我之便利特多。即不幸失敗，也有方法逃脫或收容，因此，民众沒有組織和联絡的地方，不可輕易作战。

七、用民众施行封鎖的襲击

在敌人由我們包围封鎖的时候，我們就要鼓动民众，四方断絕敌人的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軍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暗夜或拂晓将其击潰。

八、单純军队的襲击

探知敌人，距我于数里之外，警戒必定疏忽，此时我則輕装速进，于拂晓前，出敌不意，把他歼灭。

九、用民众扰敌

以軍队主力决定之。在战斗时，以一部分軍队，分为两数組，至少以一排为单位，領导地方民团，警察，义勇軍，或其他农工民众，打許多軍旗，占領四面山头，或村鎮，利用銅鑼、梭标、土炮、刀矛、喇叭等，滿山遍野，叫喊起来，去扰乱敌人耳目，或日夜断續的在四处鳴枪，使他們恐慌，精神疲倦，然后我軍以全力出其不意，从側面击潰它。

十、打圈子脫离敌人

大敌当前，我們无力迎击，則利用打圈子办法，向沒有敌人的地方跑，利用山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沿途利用民众，使之担任前后的偵探工作，不致受敌人前后夹攻。

十一、脫离危境

后有追兵，前有阻挡，或追兵过于强大的时候，为要脫离此危境計，可以一部分部队在距离四五里的地方，引敌人走入大道，主力則取間道脫离敌人，或繞敌后而袭击之，或用民团，警察，在另一路上走去，遺些物品，与足迹路标，貼标語，引敌穷追，我主力則从小道冲击，首尾攻击，四面包围而歼灭之。

十二、声东击西

軍队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去，繞行他处，到了中途忽然打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击

溃他。

十三、埋伏掩击

敌人急急追来，我择地埋伏，候敌到达，可一网打尽。

十四、中途狙击

探悉敌人要从某方前进，中途山岳复杂，道路狭小的地方，派一部兵或射击精良者，藏匿于道傍的山上或树林中，候敌人重要部分經过时，从山上滚石，并猛烈扫射，或狙击其乘馬的指揮官。

十五、坚壁清野

偵知敌人将临，而我們的力量又不与战的时候，即須实行坚壁清野的計划，把民众的粮食、鍋灶、柴米、器具等悉行藏匿，以絕敌人給养；并将乡区的民众除留老人、妇女及儿童，以备偵探消息外，其所有壯丁悉数率其逃跑使敌人无人与之挑运、带路、探消息。同时更派些人击敌后方交通路，截断敌人的接济，捕捉传令兵等，剪断或破坏通信設备。

十六、对于优势敌人的应付

1、敌进我退：敌人比我們力弱，是不敢攻击前进的，如他向我們前进时，我們可断定敌人定挾优势兵力而来。主动的有計划的和有准备的，則便宜避其鋒，預先退却，如中途遭遇，在敌情不明或預知敌軍的优势的时候，絲毫不犹豫的掩护退却。

至退却的地区，不宜由大道行远走，而受敌人旁追，必須盘旋于附近，施打圈。敌出我前，便繞其后；敌在山上，我在山下；敌在中間，便退两側；敌在左岸，便退右岸；敌在右岸，我便退左。

但退却时可在叉路上，我們不走的那条路，故意遺弃物品，或派出一小部分兵馬，践踏些足迹，或写些标語或符号，而将走的那条路，用标記截断，使敌其追击方向不明。

在这个时候，当地民众和警察，民团，或义勇軍等武装团体，最好由各方面路退去，以混敌人耳目。留一部分在原地，把制服或武器等藏于地下，以小販之类去造謠，或假献殷勤去探敌人数，及企图或敌人宿营的地点詢問，并警戒的情形。如敌人詢問我軍退却的方向和兵力，就指东說西，指南說北，以小而大，以大而小，胡乱造謠。等軍队要来攻打的时候，就把人安置好，武器拿出来从中取利，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无路可归。

2、敌退我追：敌軍退便要乘势前进，因此际敌人軍事必有变动。才施行判断沒有决心和我們决战。并乘势掩击其后。敌方的掩护部队一定沒有决战先头部队。在敌方整个計划上，很难回轉。如在山岭崎岖，道路狭小，河流險阻，桥梁很多的地方，即折回亦須很久的时間，即或折回，后卫已被消灭自己解除。

当时民众团体就要設法把敌人退路的桥梁或联絡电綫破坏，最好等他們的大部分退去，趁着后卫和我方軍队对持中，把退路塞住。使他們欲归不得，欲救不能。

但此时民众所負的重大責任，还是要先偵察敌人退却方向。和有无埋伏，詐退，从两側包围我們的企图，馬上报告。使我軍得放胆去追，或設法逃避。

3、敌住我扰：敌人新到我們領土內，地势不熟，言語不通，偵探派出无用，等于走入絕境。此时我們再加扰乱，到处枪声，一定使彼睡臥不宁，使彼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很大的影响。哪怕怎么强悍的軍队，也要动摇，也要疲劳的。等到他們精神动摇，肉体倦极之际，我軍联合起来，一致突入，定可把他們全歼。

十七、对于劣势敌人的处置

为民族生存而战，为达成游击任务，为消灭敌人的战斗力，扶起民众勇敢的精神。对于劣势之敌，当然要联合当地人民群起包围，一举歼灭之。

十八、喚起民众

民众每多貪小利而忘大，往往受敌重利而心为虎作伥。故当敌人到以前，对于当地民众，而尽力鼓吹，喚起他們的抗战情緒，使他們有絕对奋斗到底的精神，不貪利、不妥协、不投降，切实服从指揮，同我軍合作抗敌。同时幷組織抗战会，和其他职业团体，以便指揮，必要时举行清乡，肅清汉奸为敌人利用。

第三章　战爭的目的

游击战爭最終的目的，固然在解除敌人武装，消灭敌人的战斗力，收回被占的土地，救出被蹂躪的同胞！然而有时因客观状况及种种关系，不能达到此目的时，則完好的土地，完全的給敌人来支配，那是不应該的，因此，我們就要想法子去破坏他的政治、經济和交通，使他們虽然占領我們的土地也沒有用，自己自动的退回去！

在游击战爭中，要守着“得地不是喜、失地不是悲”的原則。失城失地是不要紧的，最要紧是想法将敌人彻底消灭。因敌人如实力未損，縱然得到城市也保不住。反之，我們力量不足的时候，虽把城市失去，还有恢复的希望，切不可固守城市，而把实力去做牺牲。

第四章　組　　織

一、組織时机

1、在寬闊的地带从事战斗，人烟稀少，文化落后，尤以交通不便，各种通信設备不完全的地区为宜。

2、狹窄的山陵地带，不容許大部队行动的起伏地及隘路附近。

3、敌人后方的人民同情于我軍时。

4、敌人的武器精良，实力雄厚，不得不避免眞面目的战斗时。

5、敌深入我境內，企图处处施行扰乱牽制敌人的行动时。

6、丛林杂葦，深可沒人的地区，尤以恰逢青紗帳起的夏暑之季，为最有利。

二、組織的方式

游击队动作，是将以下的三个方式而形成。

1、从本軍派出騎兵大部队，并配备騎炮兵，或騎兵随伴排多配属輕自火器，尽可能的迅速潜入敌人的后方，切断后方一切交通联絡，从事毀灭其附近粮草弹葯存积所。并从該后方分出小的支队和分队，破坏或消灭敌軍一切有軍事意义的場所，待至任务完成后，迅速的从另一方面以战斗开始道路归还本軍。

2、派出騎兵，或步兵特别支队。其兵力应由一排或几連，尽可能的深入敌人后方，以飘忽的行踪，轉战东西，如不得已时或敌某时到达时，亦可秘密地巢居該处若干时間，依情况之需要确定，是用全体人員，或是一部。有时以在敌人后方不能再継續駐扎，或是所授任务已經完成后，或因敌人已察覚我之行迹及任务，而加以确实的防卫时。

3、在敌人后方，选当地强悍少壯居民，組成若干分队，受我所派素有經驗及訓練的人員指导，或是受預先在当地所培植的有經驗的人員指导。这些分队秘密的动作，是由此一地区轉至彼一地区，变換他們的服装番号与外行，用尽各种方法，掩盖自己的行踪。

4、或由部队征求志愿者，配以精灵的輕武器，以对此素有經驗与研究的官长率領，为特种游击队。

5、游击队以素質而别，由挑选自愿者为特种游击队。由部队某一部做普遍組織者，为基干游击队。由地方組織者，为地方游击队。基干游击队与地方游击队联合行动时，得由基干游击队队长指揮之。

6、队員之选择，基干游击队員，要由健康、坚定、忍耐、勇敢、敏活的士兵充任之，而这些兵，要自己愿意加入这支队或分队的，因游击时独立行动，其任务是否按照命令做到，往往无法証实，常常脫离上官监視的行动，故队員的选择与訓練以“忠实負責”为中心。

7、游击队的支队长和分队长之选择及委任尤須审慎考虑，因为他們的智力，以及忠勇的才干，和軍事知識，尤其是游击队动作的战术知識，与相机应变的活泼脑筋，而踏实果敢等，为完成企图与任务必具的条件。

三、兵力

游击队兵力的强弱，以任务需要而定，常由五人十人至数百人，其最大限度不可超过一团。盖如兵力过大，則兵力行动呆滯。粮秣供給困难，难于伪装，难于隐蔽。因此一切企图尚未达到，即被发覚或識破，弹葯补充均成問題。又往往受困于不良道路，是以一切企图不独归于泡影，且常陷于往返奔劳之苦。

小游击队主要的优点，就是玲瓏敏活，不要多的时間和力量，就可得食物，也易于找到休息場所。既不要多的粮秣和宿营地，更不受恶劣环境所阻止，弹葯补充亦易，如不成功，可倏然退回。

四、兵种

游击队之兵种，以騎兵工兵及大运动性兵种为宜。騎兵为担任扰乱敌人的翼側，或于追击时压迫敌人的后尾，并扰乱其側方及后方，騎兵均仍为一，且騎兵无論何时，均为游击队唯一的通訊工具和侦探工具。工兵是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如鉄路电話电綫桥梁等），故騎工兵为游击队不可缺少部分，至于大运动性之部队，益使敌有神出鬼沒行臥不安之感。

五、武器

游击队之武器，除步騎枪各种輕机枪手榴弹外，并須多配以手枪及冲鋒枪、机关枪。如地形許可，并附以重机枪及迫击炮或小炮。

六、官兵及行李

輕便敏活为游击队之物質，故一切行李馬匹，装具弹葯等，均应为极力簡单，以求輕便。其战斗員非战斗員，均以适合游击战为适当的編組，其他非必須的人員力求減少。

1、游击之官兵，每班不得超过八名，每排不得超过二十六名，每連不得超过百名。

2、如自动火器較多时，更可酌減人数，游击队亦可以五六名更換行动，收扰乱偵探之收效最大。

3、各主管官之勤务兵，至多不得超过一名，其余則按任务之繁簡或二人三人合用一名，更注意不得濫增传令兵代替勤务兵之用，或同一任务派遣不必要之多数传达，致減少本身战斗力量。故当派遣传令兵时，其能否达到任务与否，必宜审愼考虑。

4、每伙食单位，以不带伙食担子为佳，分带干粮尽时，乘机借居，家具做家粮补充，如必須带伙食担子时，每单位不得超过二担。

5、文件担子，除必要外，不得多带，普通团二担，营一担，連一担卽可，每担重量，不得超过四十公斤。

6、官兵，其私人被着及包袱等，均应自行攜带，不必另外长工挑担，但事前須严厉規定之。

七、携带物品

游击队最好有如下各物：

一、破坏鉄路、电話、电綫，以及軍械庫等的器具，和炸葯。

二、临时之救急葯視季候而定，但綳带等必須长期备用。

三、指北針，和游击队动作地域內的地图。

四、尤須攜带輕无綫电机，以便随时报告敌情，及偷取敌人情报。

五、攜相当数量之金錢以备不时之需要及采办粮食之用。

八、紀律

游击队之軍紀良否，影响我們軍的信誉，及能否得民众同情与拥护，严格的紀律，方能保障其一切独立行动之彻底胜利。因此，对于违反軍紀而危害民众利益，与不坚决执行上級命令的人員，必須毫不客气的严重惩罰之。游击队对紀律之运用，不只是单純之运用，加强官兵的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覚悟，在无形中減少許多违反紀律之行为，使官兵洞悉民众心理，适时善用与百姓打成一片。

九、政治組織

1、游击队的各个队各分队，皆为設政治指导員一名，部队应設政訓处，以便管理官兵，进行政治工作，及司理一切政訓人員之人事問題。

2、游击队每一伙食单位均应設司务員一名，以防反动分子之潜入与活动，和劝导对共产主义訳識不清，意志动摇之士兵。

3、为防止士兵之逃跑，游击队中应成立反逃跑委員会，及十人团，十人团与反逃跑委員会是防止逃亡的消极办法，滋将其組織及工作，概要略举如下：

（1）为防止逃亡起見，部队应成立反逃跑委員会，每个伙食单位应成立十人团。

（2）反逃跑委員会之人数，为七人至九人，会长一名，余为会員，由刻苦耐劳，思想坚定之下級干部，及十人团团长組成之。十人团之人数共十人，团长一名，余为团員，由忠实可靠之士兵組成之。

（3）十人团在工作时，則服从反逃跑委員会。在軍务上，則服从其主管官，及反逃跑委員会。在工作上，則服从政訓处。在軍务上，則服从队长。十人团，或反逃跑委員会在工作上，亦得受其主管官之指导。

（4）十人团工作之进行，注意一般官兵之行动与言論，特别是对“营混子”之流。

①秘密监視不稳定分子，×团員亲身或其朋友。

②每于极其困难之后，或我軍稍挫之余，于宿营时，宜特别注意士兵所生之不良心理，及危及士气的談話。

（5）反逃跑委員会之工作，主要的是在考查各十人团工作情形，适时监督之，指导之。并可召集各十人团团长会議，或团員大会，討論一切工作进行。

4、沙漠縫式的軍人生活，每天学科术所与之疲劳，而使人发生厌煩及反感。为使軍中娛乐，調剂枯燥生活，游击队中应成立俱乐部与娛乐室（其組織細則及工作，詳后）

十、特种军事組織

1、为补救弹葯之不足，及射击技术不精良起見，每連有三名至九名之特等射手，专为狙击远距离或特种目标（敌軍官，机枪射手及炮手，传令兵等）之用。

2、游击队的各支队及分队长，均应选定目力极强之传令兵，作观察員。通令支队长有两名，分队长有一名，专为补救战場观察之不及。

3、游击队的各支队各分队，应有看护兵两名，专为临时医治官兵病症并进行卫生教育。

4、为确实明了敌情，不失时机的得以应付起見，游击队中应普遍的成立侦探队，通常队有一排，支队的一班，分队一組即可。地方侦探队之建立，亦由侦探队到处組織之，或事先預伏侦探人員。

第五章　任　　务

游击队动作的主要目的，在尽量予敌以精神的打击，和于敌后身引起混乱与騷动，吸引敌人之正面兵力，到两翼或后身来，停止或迟緩敌之作战，致分散彼之兵力，收各个击破之良果，以神出鬼沒的行动，使敌于进退維谷之丧頹状态。

一、破坏敌人行动地域內之鉄路及公路，幷路上重要之建筑物，电話尤为重要。

二、損坏敌人主要的及次要的兵站。

三、破坏敌人粮食和軍械的仓庫。

四、袭击敌軍后方的輜重队，传递步哨，以及騎兵偵探等，幷掠夺敌人从后方运到各方的生活品及弹葯。

五、袭击敌人独立支队，及其未曾确实占領的住民地。

六、主要发动民众，組織民众，扶助民众之自卫。

七、破坏敌后方飞机場及空軍仓庫。

第六章　动　　作

一、行动

1、首在秘密和审愼的准备，神速和突然的袭击，如暴风急雨波雾密布之时，或敌軍疲劳困憊之际，或深夜黑暗之天候，皆为游击队进袭之絕好机会。

2、游击队的动作，应該是一种进攻的战斗，无論游击队兵力之强弱，都可出其不意，乘其无备施行袭击。但如有不利之征候或无胜把握时，宜急速退回，以免受无益的損失。如游击队預定的袭击失利而敌人轉为攻势时，則游击队亦宜急速退却。惟在无法避免敌人之追击时，才对敌人抗战，然后逐步退回。

二、战术的采用

1、游击队之利害，幷不全关乎自己兵力之大小，而在于使用自己突然的袭击与埋伏，以声东击西，忽此忽彼的出現，眞假立旗帜，虛张声势，散布自己力量的謠言等，以震恐敌人之軍心，造成无限的恐怖。此外注意活学活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駐我扰、眞伪装攻进等法。

2、游击队之发动民众，坚壁清野，誘敌深入，使敌人消息断絕，給养困难，兵力疲劳，地势不利，然后出击，实为致敌于死地良策。

3、游击队之袭击埋伏坚壁清野等法，皆不能奏效时，則采用攻其旗必救之方法，誘敌于运动中，施行不意之袭击。如一部攻击某处，而以大部兵力，潜伏敌援軍必經之路旁，施行截击。

4、游击队应极力避免陣地战，及一切眞面目之战斗。地方游击队未受正式軍事訓練，不可以之对敌进进正当的和持久的战斗。因此地方游击队在最初成立时，須使之随基干游击队，或特种游击队行动，經过相当时期，方可独立行动。

5、或攻敌最感痛苦之处，以吸收其大部兵力来援，然后我分主力至他处，消灭所余的孤弱守軍，或截击未至的部队于中途。

三、地区的利害

1、游击队在开闊地上动作时，因少良好之遮蔽容身，与我稍有不利。因游击队之活动，特以隐蔽地，山地及复杂的地形內有利。

2、游击队須詳知其活动区域內的地形，經常的考虑如何能从敌軍料想不到的地方，取秘密而隐蔽的路径，谿谷、森林、羊腸小道等，以接近敌軍乘其自信安全，毫不提防之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予以突然之袭击，并且忽而隐蔽的遁去无踪，至敌退却攻战守行止坐臥均感不安的程度。

3、較大之村庄、市鎮，与粮食財物較多的地方，皆为敌人追扰之目标，游击队应經常偵察敌踪，預先埋伏于半途施以截击。

4、游击队在其所担負的区域內，用尽一切方法，使敌之小部队，无法窜入，敌之主力无法隐蔽，必要时，亦可用暴露游击队区域以外之敌人兵力与配置，或其企图等。

四、季候

游击队应考虑季候（适于动作的冬天夏天或秋天），考虑敌我力量，特别应考虑战斗兵器，并应詳知敌軍部队的編制，某季候与我有利否，亦視地域而定。

五、秘密的行动

游击队动作之物質，均在乘敌不意，因此必須采用一切方法，保守軍事秘密，其詳如下：

1、队长对部属說明其任务与动作計划时，应在刚出发前，或行进中，必要时得将整个企图，分期逐漸說明之，其他人員不在必要时，不使知之。

2、游击队之命令下达法，最好是由队长与部属当面說明，一切笔記命令，务宜少用，以防泄漏秘密。

3、对向导与居民，不应与之討論自己的一切行动和計划，至对我同情的居民也是如此，特别是开往某处袭击时，更要禁止討論。

4、預先派出忠实可靠之偵探，前往宿营地点，或埋伏于敌后要道，以封鎖彼之消息。

5、行軍时，暗号与路标，由后卫彻底負責除去之，且采用曲綫式的行进，使敌莫測我之行进方向。

6、部队番号皆用規定之代字，严禁直呼部队之本名。

7、一切文件，除必要外，閱后立即焚毀。

8、为掩飾游击队之眞实企图起見，除采用上述方法外，有时亦可利用当地居民散播关于游击队行动的假消息，以欺騙敌人。

六、运动的部署及准备

为使运动迅速起見，除将一切組織，力求簡单外，不論何时，并应有完善之行动准备

（路綫之調查及偵探、病号之安置、向导之預备，最好用当地同情游击队的农民，或可靠的人）以应带齐三日的干粮为最佳。如是則欲行則行，欲止則止，不須临时部署。

七、胜利条件

1、游击队胜利的条件，是在游击队之官兵，有絕对的勇敢与坚定性，并須具有协同的精神与充分的机构，和忠实于自己的任务。此外还須有健康的身体，能够耐无限之劳苦，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等。

2、游击队不应于困难时期，沮丧志气，縱遇危險环境亦不停止其活动。对于战爭之必胜心，与事业成功之信念，尤其对于民族敌人的仇恨，更是以喚起勇往迈进之志向。

八、联合行动

如小的游击队，因自己人少，不能进行其所受任务时，可以同时联合几个游击队，来达成此种任务。夜間是游击队活动的最好机会。

第七章　襲　　击

一、襲击前的任务审愼考慮

当游击队集合完毕时，偵探通信联絡等都已設施园滿，預备开始袭击某个住居地时，游击队长首先应查明下列各点：

1、該住居地卫戍兵力之大小，配置如何？武装如何？战斗力如何？其派出警戒又如何？

2、附近有无其他敌人？如有，距离若干？能否迅速援助此卫戍队？設想将如何来援？由何方来？

3、游击队方面和敌人方面，有何种道路可通？所拟袭击地方，有何种隱蔽接近路径？怎么走近袭击的地方？以上三点，不独为袭击所要知道，卽事后退回，也不可不知。

4、袭击时間之决定，最好能在夜間举行，因为有黑暗的掩护，卽使袭击失敗也可以使敌人恐慌。但我們必須熟悉地形，明了敌人的配备，或者有很好的向导时才行，否則这种袭击，宁可选在拂晓以前。設若对兵站袭击，則其时間最好在深夜，因为兵站上的人馬和物品，他們重新上路，是从很早的清晨开始。

5、当地居民能否助战？如何使居民不能因此起而自扰，在謹愼考慮袭击的計划中，但要避免各种繁瑣的計划。

二、出发前的注意

1、游击队在出发前，应完成行軍准备（同第三节之六）。并应携带担架，以为运送伤兵之用。

2、袭击敌人的方法，在事前不只是队长及各支队长，和各独立的分队的一切人員，都要根本了解。这种传达方式，应由指揮者与部下当面說明为好，一切笔記命令，务須減少，以免发生遺誤。

3、各級軍官在出发前，均应指定代理人，一面为表示自身之坚决牺牲，并为預防其伤亡时，部队动作，不致因彼而影响全局。

三、运动中的注意

1、游击队之运动須力求隐蔽，勿使敌人发覚，因此行进时应离开大路及大村落，而选择偏僻地方。甚至在完全沒有道路的地方，而沿羊腸小径行进。但要避去泥濘湿路，以免过于疲困。

2、行进时不应老在一条路上行进，因为敌人容易就此寻找出其踪迹。又为秘密其行动起見，通常以夜間运动为宜，甚至长途行进，也应在夜間。

3、行进时，为遮蔽自己起見，派出的警戒，应减少到最小限度，通常只派出几个路上偵探就够了，并須有很好的向导。

4、設若不能自信絕无敌人間諜来窺时，最好是用小的分队向不同的方向分进。而在秘密的指定地点集合。

5、游击队运动时，經常应有与敌遭遇之准备，因此游击队之軍官，通常率其次級軍官，在道路上偵探后或老兵后或部队前方行进（部队則交副者率領之），情况易明了，部署极敏捷，見可进則进，知难后退，只須二三长官，一度会商，便可决定。既免命令往返，迟又誤时机，更少后方遙制，不合情况之弊。

6、游击队之士兵，除路上偵探外，皆不应装子弹，以防途中走火为敌察覚。

四、途中迂敌时的处置

1、游击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以前，絕不应引起无目的战斗，虽于途中遭遇敌軍，亦須設法繞过之。甚至与預先指定的有所偏差，亦必如此做去。但在无法避免战斗时，应从埋伏中，与迅速准备中，以出其不意的奇袭以歼灭之。惟是切行之际，須注意敌人停止或前进情况，須从各方面进行偵察。若敌軍不曾准备战斗，或有力而乏机警时，即应立即对之冲鋒，否則仍然継續隐蔽，靜待时机。

2、路上遇敌之哨所和偵探等，要不被彼等瞧見，靜肅的迂回过去，如遇审查有机可乘时，則用迅速手段，不开枪而捕获之。

五、襲击时兵力部署

游击队当袭击时，其兵力之部署，大約如下：

1、以大兵力，向敌之要害处猛烈攻击，施于迅速坚决之突击。另外一部繞胁其側后方，积极活动，以混乱其判断，使其莫測我主力之所在。

2、全力向敌之一点袭击，但他方面仍假立旗帜，以少数散兵，虛张声势，以混乱敌之耳目，分散敌之兵力。

3、如事前能判定敌人之退却路綫，則須在可能范围內，派出一部分兵力去堵截。如敌有大炮及輜重配置于村落外时，則指定特别支队夺取之。

4、如游击队兵力大时，应分成几个縱队，从二三方或多方施行袭击，以求截断敌之退路，但須顧虑周到，以免引起自己队伍的混乱，将自己錯認为敌。因此在事前必須預定信号

或記号。

5、在袭击敌軍之际，如有某方敌軍增援之虞时，事前应配置一小部队于其增援路上以阻止其增援，或将此种危害，告于本队。

6、袭击时对敌攻击重点之选择，及兵力之区分（通常主攻方面，用全兵力三分之二，助攻方面，只用三分之一）。务須使敌之兵力不及开展与增加，而为我各个击破。

7、游击队的各支队，应在袭击的最近距离內，分遣兵力，联絡前进，最好在冲鋒地点的距离上。因此可以避免迷失道路，及过早分散兵力之弊，也可以保障被袭击的危险。如各个独立縱队，或小游击队之間相隔愈大，地形愈生疏，則希望于同时突击愈困难。

六、突然襲击的成功

大部在于趁敌不备，而于其惊惶失措中，猝然冲鋒。为使袭击能出敌不意而得到成功，則一，須迅速秘密，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企图。第二，要敌之警戒不甚机警时。第三，要虛张声势，分数路同时袭击，使敌举措紛乱，自相惊扰，不能尽全力与我頑抗时。第四，在实行袭击时需依照預定的鈡点，不喧嘩，不射击，不喊“杀”声，要使每一士兵皆須了解袭击时武器的使用，就是刺刀和手榴弹，不可聞枪声而还射。只有在敌人有机可乘时才能前呼后应，选用正面的、側面的、迂回的、直接的突击。

七、襲击成功后的处置

1、一到袭击任务完成之后，游击队卽应迅速遁去，遁去之先，最好是先向某个虛假的方向过几里，然后再轉到自己眞实的方向，以使敌人无从知我踪迹，无法追踪。

2、游击队不宜押带俘虜，及大批的胜利品，以阻碍进行，最好是将俘虜繳械，然后遣散之，或格杀之，胜利品則由地方政府或居民輸送之。

3、战斗間，每連以官兵三名，专負收集遺弃枪弹之責，战斗胜利后，須尽全力收拾战場，且可号召附近民众收集之，不使有×錙銖之遺。

八、襲击失利后的处置

若袭击失利时，則迅速退至預先指定的集合場，通常集合場，是在前夜的宿营的地方，如兵力充足时，則于指定的退却路上，留置一部預备队以备收容俘虜及伤兵。

第八章 偵 察

一、偵察时的注意

1、一切情报之搜集，必須不失时机的报告上官，或通报友軍。

2、搜集情报时务須詳尽，一切馬虎敷衍之报告，应严厉的制止。

3、偵察之范围，不仅限于敌情，且应注意地形，一切有害于我而特别有利于敌的地形、隘路、渡河点，以及迂回此渡河点与隘路之可能等，都应該知道。

4、与游击队有关的一切事物，应力求詳細周密，直至彻底明了而后已。

5、注意人民对敌我双方情緒和关系，是否积极援助我方？其积极性又如何表現？

二、偵察的手段

游击队派出勇敢而聪明的人員及偵探，向各方进行偵察外，尤其与当地民众，亲密的达成一片，幷于紧要地方，利用可靠居民，或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如利用封建关系，找亲戚或找被敌杀害之家属，或仇敌之人民均可）給以較优之工資、秘密的布置偵探网，及递步哨，使我消息灵通。

三、对敌人兵力及其技术兵器的偵察

1、在何处发現敌人的步兵，与騎兵、炮兵、或其他部队若干？敌人的装甲汽車、装甲火車、坦克、飞机等数目若干？幷在何处？

2、敌人在其正面与后方地域或城市，以及其他地方，如何筑壕？幷以何种部队布防？

3、敌之兵站及其仓庫在何处？

4、敌軍情緒如何？是否愿意战爭？其对人民及其长官关系如何？

5、敌軍武器、被服、粮秣，以及其他預备品的供給如何？

四、对地形的偵察

1、首应注意此地地域內之重要道路，及其方向、寬度、土質状况等，是否适合于諸兵种之通行。

2、有无森林？如有，須注意森林属于何种？及所占面积。有无沼泽？在何处？占面积若干，能否通行？如能通行，更須注意其能通行何兵种。

第九章　埋　伏

一、埋伏的种类

从隐蔽配置中，突然向正在进行之敌人实行袭击，謂之埋伏。游击队唯一慣技，就是埋伏，埋伏极易得到良好的效果，而且通常皆属順利，其动作分：

1、誘伏：卽我軍所謂伸开两手，誘敌深入也。

其法先以主力，埋伏于道路两旁，或一側之蔭蔽处，另以小部兵力，向敌攻击。佯作敗退之势，引敌深入，然后主力由一翼或两翼突出袭击之。

2、待伏：与誘伏略同，但不須以部队佯敗，致敌深入，乃于高处設置观察所，以观察敌軍之行动，与其主力达到地点，然后突出袭击之。

二、埋伏的地点与对象

对敌之单独兵、通信兵、整个运动部队、輜重队、运輸队，火車等，皆可設置埋伏，其詳如下：

1、对敌之騎兵与步兵，則应埋伏于其不能使用武器，及不易发揮威力的地方。

2、对敌之輜重队和运輸队，則应埋伏于森林中或村緣。

3、埋伏路旁袭击敌之小部队，或整个运动部队，汽車运輸縱列乃最有价值。但首先須

明了其企图，及其前进方向，与通过时間，并詳虑及偵察易于奏效的埋伏地点，同时对自己的退却道路，亦应預先选好。

4、对于鉄路列車，实行埋伏时，游击队可分成三部。第一部于鉄路附近，占領陣地，以防列車抵抗。第二部占領列車两旁，向車廂发射。第三部是担任冲到車上收查，卸貨繳械等。

三、埋伏地形

1、埋伏的地方应有良好的隐蔽，避免敌之覚察，并且便于观察敌方。

2、能发揚射击之最大效力。

3、須能从埋伏地方，迅速地一跃扑进敌前，因此，埋伏地方与敌軍之間，須設有丛林之阻，沼泽之陷，以及其他隘路断絕地等。

四、埋伏的距离

突施袭击的游击队，如因兵力充足，且欲扑近敌身时，則应埋伏于道路近旁，反之，如敌之兵力甚大，仅图向彼扰乱时，則应停留于道路之远处。

五、埋伏的要訣

1、伏兵最宜静肅，无論日間夜間，絕对禁止高声談話，或梭巡綫上。

2、久处于埋伏中，足以暴露企图，增大危险，因过久人員紧张状态，漸趋于減弱，愼重态度，不宜于保持，故而被敌察覚。最宜注意者，如已被敌发覚时，則立即动作，或迅速遁去。

第十章　对敌征发队实行襲击

一、襲击时机

1、对敌人征发队冲鋒，得在下列时机实行之。

2、在进村庄实行之。

3、待其进入村庄，分向各戶征发时行之。

4、待其将完成征发事务，滿載而归时从埋伏中袭击之。

上列諸种，究以何者为宜，須視当时之情况由游击队負責者，妥为估量，适时处置之。

二、村落中的襲击

在村落中袭击敌人的征发队，最为有利。因此时敌之征发队之大部分，分散各处，不易猝然集合，但此种袭击須偷过敌之警戒哨所，或者毫无声息的捕获其哨兵，然后行之。

三、村落外的襲击

袭击者力量薄弱时，必須等待征发終結，并候征发纵列进到便于袭击的地方，如通过森林、桥梁、隘路等处，然后实行袭击。

四、襲击的目的

游击队击溃敌人掩护征发的部队时，只能算执行了自己任务的一部，必须尽毁或俘虏其車輛。因此，游击队首先要将敌人掩护队卷入战爭，而以主力袭击其輜重并夺获之。

五、襲击时应注意的事項

在袭击敌人征发队时，易于得到地方居民之援助，故在可能范围內，须分一部財物于民众，以提高其勇气。

第十一章　襲击敌人运輸队

一、襲击敌人运輸队

可获得自己需要的武器与粮食，以及供給品等，这是游击队中最有利的一件事。

二、突然襲击

可使敌人惊慌失措，頓成紛乱之象。因运輸之伕役，多系压逼而来的胆小农民，加以掩护队之兵力有限，并常是延伸于很长的距离上，如翻倒車輪之一，可使后方的輸送車輛全部停止。

三、襲击法

1、游击队須不要忘記自己的任务，并不是要战胜敌人，而是要夺获敌人的車輛，所以为要同敌人掩护队战斗起見，只須拨出一部分人員即可，而余的人員，則使之掠夺，驅逐和毁坏敌之运輸品，故每次袭击，都要力图迅速径向运輸队开火，使其停止进行，以扩大其扰敌及恐慌。

2、为要停止整个的运輸縱队，只須射击其先头部分已足，因在群情惶惑中，前面停止了車輛，彼此互相傾軋，顚复道旁，遂演成极度混乱的現象。如大批輜重，因先头部队遭到射击，而后方車輛，为企图折轉，躲避时，則游击队必須拨出少数射手，猛烈狙击其縱列后尾，使其不敢回轉。

3、如游击队劣势，而敌掩护队又极机警时，則游击队以継續不断地警报，疲劳敌人，当运輸队通过森林谷雪地及其某种隘路，敌之輜重縱列不易由道路上回轉过来时，即迅速的实行袭击。

在村庄中，袭击輜重队不能时常有利，因掩护队和輜重队易于利用家屋，及其他掩蔽物，实行頑强抵抗。

4、如掩护队已被击溃，輜重队的抵抗也被压服，而增援队未能赶到时，則游击队便着手毁灭車輛及載物，或将自己不能攜帶和不能利用的物件尽量毁坏之。

第十二章　游击队的通信联絡及后方交通的破坏

一、联絡的对象

为求互相援助，和随时得到敌情起見，游击队对于地方之居民，应尽量的保持最密切而最确实的通信联絡。

二、联絡工具

維系此种通信联絡，除在可能范围內，得利用电話外，应使用一切現有的工具，如徒步兵，乘馬兵，脚踏車兵，事前部署的秘密的通信兵，及递步哨，以及信号与約定記号等。

三、报告送达法

1、重要的通信联絡，及有时間性的重要报告，最好用乘馬来联系。如不能时，則須派出忠实的长于路行的人員，或預先部署的秘密通信送达之亦可。有时幷得派出数人，以保障此报告能确实送达（此法必限于最重要之报告）。

2、如不甚重要的普通报告，通常是用徒步兵与脚踏車兵轉达之。有时还可僱用熟悉道路而忠实的当地居民递送之。

四、联絡信号

为便于指揮各游击队或分队，在日間或夜間，在山地或森林中动作起見，游击队长应預先規定若干基本信号，和記号（如夜間火光，日間淡烟、色巾、旗帜、旗語、口笛，等）。

五、对后方交通路的处置

敌后之交通路，当破坏与否？宜詳加考虑，如認为自己軍队，将来不須利用或不能利用时，可破坏之。

六、破坏交通路的注意

如欲破坏交通路，須熟知地形，才能神出鬼沒的敏捷出現，迅速遁去，不发枪声解除敌人警戒，更不使敌人惊逸。

七、开始破坏交通路的准备

当开始破坏交通路时，須先派出支队到发現敌人的地方，监視敌人巡查，及其小支队，使其不能迅速的秘密的接近本队工作的地方。如开始工作后被敌发現，則开始射击，以阻敌接近。

八、各种地物的破坏法

1、破坏鉄路，当在最不易修复的地方，如鉄路轉弯处，或在鉄路掩蔽处，警戒松懈

处，能遮蔽工作处，以及能作成大的破坏处。在破坏鉄路軌时，須拆却之，或挖空其下面、低洼地方，則作成沟渠，隧道則填塞之。

2、枕木、木桥、电信杆、电話杆則用火燒之，鉄絲則拆走或抛入水中。

3、在車站上的信号轉轍器、＋字杆、鉄路車輛等，則損坏之，最好以炸葯炸毀之。

4、破坏石敷路和公路与桥梁及其他建筑物等，均依該建筑物之性質而破坏之。

第十三章　經常隐藏地与住址时的警戒

一、队伍的整頓

不仅是休息与整頓队伍，且用以保存弹葯粮食，和受伤人員与患病人的安身休养地方。故此地，通常在战斗上也是支撑点，一遇敌人追击时，便向此退却，秘密的隐蔽起来，以便待机而动或重新开始对抗敌人。

二、地点的选擇

1、能持久休息的隐蔽地，便是树林深处，沼泽附近的茅舍，土屋，山中的岩洞，独立农庄，隐僻的小村落。因同情故，小游击队寻得經常隐藏地并不困难。

2、游击队对于选定的几个隐藏地方，务必严守秘密，就是最密切的人如与本队沒有关系，也不可使之知道。如原有隐藏地面被敌人发現，則通常不待敌人来袭击，便須迅速迁移。

3、有时此种隐藏地，又作为軍械庫，火葯庫和粮食庫，且以之安置伤病員者，但各种仓庫，通常是选定独立的秘密地方于隐藏地附近，因隐藏地，一經人們时常出入其間，极易被敌发現。

4、人民中拥护游击队的人愈多，而游击队又能与人民維持通信联絡，則游击队愈易寻得隐藏地，有时为避免敌人追击，求得良好的隐藏起見，不得已在相当时間內分散本队，使各人設法隐藏于各居民家，在如此場合，居民也是游击队員唯一的救星。

三、粮食问題

1、如在居民仇視游击队的地方，只有强行征发，但須派队中可靠人員以免发生掠夺。

2、游击队在不怕暴露本身时，可派出特别小队，征发粮食或收集捐助之食品，或要地方供給。

四、变换駐地

游击队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好方法，必須动作灵活。如必要时，可每夜变換自己駐地（如白天在甲村，黃昏移至乙村）。

五、住地的占據

游击队宿营时，其兵力分配，全以动作的性質来决定，但不应該占据自己力量不能扼守

之大村落。若不得已而位置于此种地方时，只須占領几个独立配置而便于防御的集团家屋。最好是在适当的村落中，能了望各方，特别是敌之来路，但切不可将队員散住于各屋。以貪个人之便，致为敌所乘。为不使敌人知我駐宿地点，最好是深夜才进入村中，并监視村之四周，无論何人均不許外出。

六、警戒的程度

为使队員不致过劳，而得到眞实的休息起見，无須派出大的警戒，只要对于各接近地和道路（敌人必經或与我有关的道路）設置軍团哨与潜伏哨，对于各主要方面，二里至四里处，派出偵察即可。

七、准　　备

游击队在駐止时，无論官兵，随时均須作战斗准备，特别是黃昏后，每官兵，都应收拾身旁的武器和装具，使有秩序，以便于黑夜中如有警报，能迅速出动应战。

八、有敌襲击的顧慮时

1、如游击队本身非常机警，偵察网之組織非常严密，地方又同情我方，常将一切行动，报告前来时，則敌人之突然袭击，是很困难的事，但在任何情况下，还須愼重。

2、为防止敌人，借仇視的居民，来袭击起見，必須采取特别預防的特别方法。例如，以恐吓手段，警戒居民，和拘捕押人，但部队尤須××与准备。

3、設有警报时，可集合全体于有低抗准备的屋內，此屋內，应派适当之枪前哨和了望兵，屋之出入口，应以活动的障碍物封閉起来，并規定防御信号。武装和装具，应准备妥当，靠着身边。

4、当情况十分紧急之际，支队之一部，須担任陣地和住所的警　，对于邻近敌方敌人情形随时报告游击队。

5、用人工的障碍物，来堵塞出路，对于第一綫与預备队的交通，以及与地方必要的交通与通信联絡，都应設立。

6、村落內的街道，如有必要时，可完全封閉，或留有通口，各支队兵力在容許时，須有預备陣地。

九、敌襲时的处置

1、发現敌人向我运动时，如偵知敌兵力不多，則一举而击灭之，如敌优势于我数倍时，則迅速退却。但当退却时，須以虛假方向，显示敌軍，而掩飾自己眞实的退路。

2、如敌袭而我不及避免时，則应充分利用村落防御战的优点，与之頑抗，然后乘机退却。

3、已失了的村落，应以反攻或逆袭的手段，迅速夺回，以便救出被俘虏的同志，以及据守一点依然誓死頑抗的同志，如动作迅速，均可达到此种目的，因敌人在胜利之后，常处于极端混乱，且疏于警戒的状态中。

4、实行这种逆袭或反攻的最好时机，是紧随着在敌人袭击胜利之后，冲鋒所受的牺

牲，比較逃跑，或比敌人袭击时停在恶劣陣地上所受的牺牲少。

第十四章　訓　練

一、訓練范圍

不仅限于軍事技术，而政治及識字运动，及卫生訓練等尤須注意，因此游击队之操作时間，必須平均分配識字訓練，可使之随时随地練习。

为使游击队之一切訓練，收得圓滿效果起見，必須提高官兵自动的学习精神。故除政治方面，提高其政治覚悟外，还应增进軍中娛乐，調和枯燥生活，扶助人民自卫，使民众武力，与我打成一片。

二、各科的訓練

各科的訓練步驟，虽难以等齐，惟普遍方式，均由浅入深，先松后严，由簡易而入繁难。先局部而后普及，每种必須以实驗証明其理論，以坚定其信念。

三、人民自卫力的培植

1、游击队最迫切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被敌人占据的地方内，不断的往来游击，捕杀一切汉奸和反动分子，保卫民众。同时調查敌方具体罪恶，用尽各种手段揭破其欺騙与陰謀，宣揚我之善战。努力联合民众。扶助民众力量。这种动作卽在敌人領土内，亦可施行。更当用尽方法和力量，吸引人民来照本身的行动，鼓动其积极的对敌战斗，并指导其战斗动作。

2、扶助人民自卫力量，应有持久性的，而非动于一时，务使人民知道游击队不論何时，都是为民众而奋战和牺牲的，就在危急紧要关头，也决不危害民众抛弃民众，居民被我引发起来的战爭，如遭第一次失敗，其斗爭情緒必有相应消沉，則我应于其頽唐之际設法鼓舞之。使彼等斗爭情緒重新提高起来。

3、游击队糸人民中最覚悟而先进的分子，故先联合不滿意敌人的民众，受所派人的指导，更須帮助人民拟定計划，取得武器，并与受压迫毗邻的村落，及其他城市中的群众团体，取得联糸和助力，但在进行此种工作时，都要保守极端的秘密。

四、卫生的訓練

1、为巩固其本身战斗力起見，每一伙食单位应設一名或二名的看护兵，以便适时医治官兵之病症，并講解卫生常識，以及协助主官督促队中一切卫生事宜。

2、医葯补充，游击队中最感困难，故須按季候筹备些救急与必需的葯品，以防于万一，对受伤或重伤的队員，不得已时只有托付稍能懂得医术的同伴，或同情于我的居民。

五、軍事教育

1、課目：軍事教育以敌軍为对象，造成超过敌人各項特殊技能。其特殊注意事項，卽

解散、集合、射击、行軍、爬山、工事构筑、夜間战斗，山地战、隘路战、偵探警戒、搜索、联絡等各动作。

2、方法：軍事教育之进行，宜特别注意教育与进解諸方式，并略举如下。

（1）理論之講解，可采用启发式及問答式，一切講演式与注入式教育尽量減少之。

（2）講解动作时，应注意現地講話，使士兵易于明了。

（3）多作实际动作少講空洞理論，因之講堂时間及次数，应力求減少，实地演习之次数应加多。

（4）講堂上之一切講解，以能与野外演习的对照为佳。

（5）一切动作，实施前須精密准备，一切敷衍塞責的馬虎現象，务必扫除之。

（6）一切工作，設法官兵鼓动进行比賽，以提高其工作自动性与积极性，致促进工作速率

（7）增加应有教練，減少制式教練，并糾正制式教練足以維持軍紀之錯誤观念。

（8）教練計划，須适合环境地域及时間，切忌千篇一律的教育計划，抓紧一切机会，厉行机会教育，茲略举如下：

①利用行軍时，进行方位判定，地形識别，距离測量，偵探动作，目标指示法与地形物之利用。

②宿营时則利用警戒配备，演习前哨以下之各种警戒动作，与工事构筑等。

③利用作战机会，在出发前，或战斗开始前，根据受領之任务，講解埋伏袭击或主攻助攻等动作。

④利用待机动作之时机，就实地講解御敌冲鋒，与射击等各种战斗动作。

⑤利用战后講評（这种講評事前須有詳細之調查），指出战斗經过中一般动作之缺点，与个别指揮之当否，給全体官兵以实际的教訓。

⑥利用早晚点名时間，进行各种講話。

⑦利用游戏时間，进行含有軍事意义的游戏及歌舞新戏等，使官兵无形中增高其悔改及效法心。

⑧利用每次賞罰，在官兵中深切的宣传，以提高士兵之向上心及羞恶心，逐漸养成良好之軍风紀。

六、政治教育

为使游击队一切独立行动，取得彻底胜利起見，除軍事方面，加紧訓練外，最主要須使官兵有极高的“政治覚悟”和“忠实”于自己事业。政治教育，就是达到这种目的的維一办法，其内容詳后。

七、识字运动

为提高官兵之文化程度，易于接受一切訓練起見，每一伙食单位就必須进行識字教育，其法如下：

1、甲班，凡識字在五十字左右者編入之。

2、乙班，凡識字在二十字左右者編入之。

3、丙班，凡一字不識者編入之。

4、各班識字之指导者，即以队中文化程度較高者，充任之。

5、駐止时，每日須有一小时之識字时間，行軍时，則利用进行中或休息时間进行教育，此項工作，只求經常有恒，不求太速，普通每日能識两字者即算上等。

第十五章　政　治　工　作

一、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

是在坚固并提高队員的战斗力，因游击队的战斗力，不只是靠軍事技术来决定，最主要是政治覚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民众，瓦解敌軍，使广大民众受我指揮，游击队中无論政治，軍事，以及其他一切設施，都是向着这唯一目的迈进。

二、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实施复兴民族的政治教育启发其民族意識，与爱国爱民爱群之观念，使游击队中，每一官兵皆能明了其所負之民族責任，为国家奋斗的必要。

并应注意拥护領袖，精誠团結，彻底执行上級命令，維持鉄的軍紀，使之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决心与志气。

游击队除了巩固本身战斗力外，更須向群众宣传侵略者及敌人的阴謀。

三、小組討論

此事系团結意志，坚定信心，宣揚主义的良好工作。

1、集中各同志意見，以免隔閡，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2、借以訓練干部增加工作能力，更可熟悉开会制式及发言法，借以迅速的介及問題，更可检查过去，改造将来。

3、考察联絡，吸收同志。

4、便于訓練，充分說明了各同志的环境能力和知識。

5、依性能可分为，討論会，检閱会，批評会。

四、方　法

会前准备，即通知組員，确定討論中心，同时报告上級。

1、人数，以三五人为最佳。

2、不拘仪式，随时随地均可討論。

3、时限，不宜过长，以一小时为最大限。

4、以每周一次为适宜，其程序，主席报告，出席人报告討論，結論由組长担任之，并記录主席某人，討論題目、出席人数与地点。

5、問題，不超过两个以上之問題，先从本身問題討論起。

6、发言方法，組員方面，发言宜抱要簡单明了，做有系統不重复并以誠意和藹的态

度，道答之，切忌含有譏諷意味，并应注意他人发言，同时作根据题目的判断。

7、組长方面，报告簡单，不再重复介紹，抓住时机，引起組員发言。

8、結論以归納法，批評整个言論，有不同意結論可再发言。

五、政治工作的进行

不只靠几个政訓員，最好能吸收培养覚悟分子，或对此有兴趣的官兵，参加工作，訓練全体队員使均能从事政治工作。

六、政治工作分类

大概可分为平时，战时，与战后三种，至于宣传鼓动方面如下：

1、平时政治工作：

加紧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覚悟，統一思想言論及行动，維持鉄的軍紀，与民众打成一片，其法略举如下：

（1）确实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如买卖公平，講話和平，借物归还，損坏賠償）。

（2）随时随地帮助民众，解除民众困难（助民众收割、耕种，或遣我軍医为民众防疫治病，或慰問被难民众，設法救济之），确保軍民联合，甘苦与共之精神。

（3）常与民众談話，借以得知我軍之紀律，与民众之感情，更詳知民間飢苦。

（4）常开軍民联欢大会，借以調和軍民間一切隔閡，增进軍民感情。

2、調和上下級官兵間一切隔閡，其法略举如下：

（1）政訓人員，除与士兵同甘苦外，并常同士兵談話，詳察其切肤之痛苦，随时报告上官，設法改善之。

（2）对上下級之一切意見，須站在純理智的立場，以誠恳的态度說服之，解释之，务使上下融洽确如一人，益增其团結力。

（3）对违犯紀律之士兵，应采取教育方法說服之，一切体罰与責罵，务須减少。

（4）常开官兵同乐大会，以提高官兵之感情。

3、提高官兵之敌愾同仇心，增进誓死杀敌之决心。敌愾同仇心之增进，是巩固士气唯一要素，所以游击队特应注意敌人一切残暴行为，及屠杀我軍民的事实，在軍中做普遍的宣传，以提高官兵之誓死之勇气，坚定其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杀敌决心。

4、巩固对敌战爭必胜信心，略举如下：

（1）时常的拿着本身过去之光荣战史，对其官兵进行宣传与鼓励。

（2）列举敌軍之缺点（及其×間所遭遇之困难或崩潰等情形，以証敌終必失敗之事实）。

（3）列举我方之优点（如軍民拥护，消息灵通，地形熟悉等）及現在的胜利情形，以証明我之必然胜利。

（4）就敌方慣用之伎俩，晓示我軍今后应注意之处，以防畏敌或輕敌之心理之产生。

（5）受打击后，一时陷于困难于疲劳，而妄自菲薄，张大敌人力量，失了胜利心。

七、战时政治工作

出发前之政治工作：

1、先由最高統帅者，召集干部会議，說明“目前政治形势，如何有利于我們，及胜利条件，与作战意义，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注意之处，但不涉及軍事秘密”。

2、政訓处要根据干部会議，立即召集各級政訓人員开会，說明宣传之中心与方法，然后具体的分配工作。

3、支队和各分队立即召集官兵大会，除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我們必胜的把握”外并提出竞賽条約，如“輕伤不下火綫，重伤不喊痛”，又如“看誰枪械繳得多”，“或捉得俘虏多”？同时分配各个政訓員，分×的工作（如监督，領导去宣传）。

4、对附近居民，則派員召集开会談話，鼓励他們参战，或加入担架队，运輸队，对民众团体，則指导开会，作战与动員配备之方法。

5、战斗开始后，担任主攻的或特别重要的作战部队，則指派重要的政訓人員，鼓舞之。次要的作战部队，則派次要的政訓人員前往鼓动之。

6、預先派出宣传組及歌舞团（皆为活泼可爱的儿童，着一律的好看服装），在軍队行进路旁，作短促的講話，或歌唱，或跳舞，或喊口号，尽量的鼓舞官兵之作战勇气。

八、战斗开始后的政治工作

1、战斗开始后，应注重向对方士兵講話，喊口号。以涣散对方士气，即破坏工作之一种也。

2、当战場入于休战状态中或陣地对峙中，則設法与对方士兵开联欢会，借以送食品給对方士兵，以博其欢心，然后再进行宣传工作，事前应有准备。

3、战斗开始后，对外固須宣传对内尤須鼓励。其法不一，以适合当时环境为主，例如：

①攻击前进时遭敌袭击时，則进行下列解释。“同志們，飞机是不能解决战斗的，我們应抓紧这个机会，赶快前进，迅速接近地上敌人，同敌人拚刺刀去”。

②火战开始时，則进行以下鼓励。

“同志們，不要乱射击，不瞄准不发射，我們要做到一顆子弹打死一个敌人。”

③接近敌方将突击时，其鼓励法。

“同志們，解决敌人时机到了，我們要不顧一切牺牲，鼓起勇气，战胜敌人而歼灭之，拿我們的胜利鼓动全軍，赶快冲上去吧！杀！”

④第一次冲鋒頓挫时，作第二次突击时，仍須进行以下的鼓励。“同志們，我們是无敌的鉄軍，我們是每战必胜的劲旅，我們定要消灭这个敌人。保持我們的光荣。”

⑤战斗中如官长伤亡时，則进行以下的鼓励。

“同志們，我們的官长某某已經光荣的牺牲了，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迹，完成他們未了的任务，消灭当面的敌人，替他报仇去！”

⑥如敌方面呈动摇时，則进行以下的鼓励。

“同志們，敌人动摇了，赶快冲上去，活捉敌人师长！”

⑦追击时，则进行以下之鼓励。

“同志們，敌人退却了，快快追过去吧！冲破敌人收容队，解决主力，消灭全部，看誰繳得枪械多，看誰捉得俘虏多，打胜仗不追击，是最可惜的。”

4、防御时。

①受命后即进行下列宣传：

“同志們，敌人来了，这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机会，巧妙的利用地物，沉着射击，杀伤敌人愈多，我們主攻方面就愈容易奏效。”

②敌人冲鋒时，则进行下列鼓励。

“同志們，敌人要冲鋒了，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拿出我們的威风，保持我們已往的光荣，消灭敌人于我陣地前。”

③被敌包围时，则进行下列鼓励。

“同志們，我們是百战百胜的部队，我們是英勇无敌的鉄軍。要为民族国家血战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至死不繳枪，杀身不投降，繳枪是自杀，投降是无上恥辱，突破一点，冲出去！”

④反攻时，或攻势轉移时。

“同志們！我們反攻了，繳敌人枪去，活捉敌人官长，看誰是最勇敢的！”

⑤退却时之宣传。

“同志們！秘密我們的行动，迷惑敌人的判断，放开两手，誘敌深入，不落伍，不掉队，不动摇，不恐慌，不怕牺牲，坚决到底执行上級命令，最后胜利是我們的。”

⑥掩护退却时，其鼓励的方法，与上略同。

九、战后政治工作

1、战斗結束后，为防止輕敌或畏敌心理之产生，应注意下列各点：

（1）正确指出胜敗的原因，即不可因小胜而矜驕，更不可因小挫失却胜利信心。

（2）确定今后应取之对策，或应注意之处。

2、收集胜利材料及英勇作战的部队或个别官兵姓名，然后制就宣传大綱，歌舞，新旧剧等。

3、印发大批捷报、标語，张貼各处，同时組織流动宣传队，分向规定区域宣传并号召民众开捷报大会。

4、开捷报大会应注意下列各点：

（1）报告胜利意义，与当前的任务，或为达此任务，而采取具体办法。

（2）报告勇敢作战的部队，及个别官兵之姓名，至于伤亡的官兵可采其最有价值者报告之。

（3）表演新編之剧曲与歌舞。

参加开会的部队，当报告（1）（2）两項或表演戏剧时，应高呼口号以和之，并应提出撫恤陣亡官兵家属的办法。

并将被俘虏的官兵，或胜利品，集合于众目之下，則更能增加我軍民之斗爭情緒与勇气。

5、各机关在祝捷大会，并应发起慰劳运动，其应注意如下：

（1）物质的慰劳，慰劳品不在多少，而有意义，不在精美，而在适用，如草鞋、面巾、猪羊、鸡鸭等，皆可做慰劳品。

（2）名誉的慰劳，当慰劳品缺乏时，应以名誉的慰劳代替物资，如制旗赠送或編成歌曲以紀念之，或传令嘉奖亦可。

（3）如小胜后，则不需做扩大的慰劳，仅由战地附近設法慰劳之即可。

6、宣揚协同动作与独断专行，及坚决执行命令之模范，例如：

（1）于战斗方酣之际，如因协同动作、独断专行坚决执行命令，而取得胜利者，应尽量宣揚贊美之，其不幸而失利者，亦应嘉奖之。

（2）图保存实力观望不前，或执行任务不力，致使友軍失利，而受处罰者，亦应在部队中作广大宣揚，教育全体官兵或其他部队，使之知所警惕。

十、俱乐部及娛乐室的工作

在調剂軍中枯燥生活，也是防止逃跑的一种办法，茲将其組織工作及概要，略述如下。

1、組織条例：

（1）为增进軍中娛乐，調剂枯燥生活，提高工作兴趣，鼓舞学习精神起見，游击队中，每一伙食单位，应組織娛乐室，內分軍事組，游击組，体育組。及每一伙食单位之官兵，均应各就其性之所近，任选一組，亦可参加二組或三組。

（2）如娛乐室应設主任一名，由連指导員或有活动能力的排长兼任之。其所属各組各設組长一名，由組員会决定之，六月为一期，亦可連任。

（3）組长会議及各組会議，均应每星期举行一次，股員会，每月一次，由主任組长分别召集之。

（4）娛乐室在工作进行上，应服从上級俱乐部之指导，并受主管官之监督与指导，但在軍务上，則絕对服从主管官。

（5）为指导并統一各娛乐室之工作进行，大游击队，应成立娛乐部，內設主任一名，干事一名，专司其事。

（6）俱乐部应隶于政訓处，因为娛乐工作，系政訓之一种，但在无政訓处时，方直属于主管官。

（7）俱乐部之工作进行，在指导与推动各娛乐室之工作，因此，每星期召集各娛乐室主任开会一次，每月召开官兵或軍民联欢大会一次。

（8）无論俱乐部娛乐室，其一切工作之进行，皆以不妨碍軍事行政，軍事教育，軍事行动为原則。

2、工作概要：

軍事組在誘发官兵自动学习精神，討論軍事問題，或相互的糾正动作，以补訓練射击时之缺憾不及，其內容如下：

（1）刺枪組（与以預想之敌国为目标，而演习之。）

（2）擲弹組（以木刻制手榴弹，向靶投擲。）

（3）軍事游击組。

（4）架上瞄准。

（5）瞄准检查。

（6）射击姿势。

（7）击发检查。

（8）利用地形物。

（9）野外各种目标之射击法。

3、体育組。此組工作，强健官兵之体格，更可补助軍事教育不及，其內容如下：

（1）球术（籃球、足球、排球、网球、垒球等）。

（2）田径賽（跳高、跳远、賽跑、障碍超越）。

（3）拳术及大刀。

4、游艺組。此組工作，在增进軍中娛乐，調剂枯燥生活，以提高工作情趣与学习精神之增进。

（1）笑話組，不論何时，均可进行，但应注意下列各点。

①說笑話时，应注意通俗，如笑林广集之类，但不可过于猥亵。

②講故事时要講古人之丰功伟业，及嘉言懿行，以收鼓励之效。

③报告新聞时，应注意我方胜利情形，及敌方之残暴行为。

（2）戏剧組利用晚間及日間休息时，表演各种有政治意义的，及有滑稽性質的新剧、戏曲、双簧、花鼓，以揚士气。

（3）歌舞組，根据部队所处之环境之任务，編制各种不同歌譜，引起官兵学习唱歌之兴趣，或举行化装跳舞，做种种滑稽形象，引起观者捧腹。

（4）音乐組內分胡琴、口琴、乐琴，及其他，歌可与戏剧舞同奏之。

（5）各种工作之推行方式，应根据时間及环境，活泼运用之，切忌呆板形式。

（6）各組工作之进行，因有賴于严格的检查及督促，更应采取竞賽方式，使全体官兵，自动努力。

（7）各种歌曲及新旧剧等。

（8）各种各系应有专門人才，以利工作之进行。

（9）参加表演之官兵得酌免勤务。

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訓詞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要与同志們說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就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說，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过去的十年斗爭經驗均証明着，你們这次挖窰洞也証明着，将来在抗日战爭中还要証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与克服活的敌人，战胜日寇虽然有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关群众的方針，还要善于应用战略战术，还要善于組織动員領导群众与爭取同盟軍等工作补充起来才

行。

你們現在已經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經你們的天才把他継續发揚与发揮起来，战胜日本，驅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見抗大校刑《我們的伟大事业》第十四期）

“和美国記者貝特兰的談話”补充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問：你們对于将被毒气攻击一事有所准备沒有？

答：因为物質困难，現将还沒有什么防御武器，但我們正从蔣委員长要求援助。朱总司令已准备发表宣言答复日本华北軍司令部，这个宣言指出，日本法西斯这种灭絕人道的举动，必然促成他們自己的毀灭。

問：共产党不是主张普选制的嗎？

答：我們是主张普选制的，因为只有普选制才能彻底的表現民意。临时国民大会是一种过渡方式，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不許可从容的选举，目前也沒有保証选举出民意的条件。此时求其能够比較的代表民意，还是依照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候的主张，由政党軍队与民众团体各自推出代表的好。这种办法，当然与普选制有区别，我們一定要达到普选制，这个办法是到普选制的桥梁，然而他是当前比較好的办法。

問：据你估量，国民党是否能够同意？

答：困难至此，国民党中許多明达人士早已有了这种呼声，蔣介石先生亦有声明要实行民权主义，社会各界人士，抗战軍队的将領，亦有多人感到这种必要了，我想国民党沒有理由拒絕这个提議吧！假如他們同意的話，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来到亲密合作的阶段，这是一个国利民福的前提。

給抗大九队同志的信

九队同志們：

庆祝你們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們及全国人民在現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希望你們学习这个統一战綫的理論与方法，唯有統一战綫方能达到救亡的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

加强政治教育与体育活动

給項英同志的一封信(手稿)

（一九三八年）

項英同志：

战士課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課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課××（字迹不清——編录者註）来看加修改，要将大資产阶級民族資产阶級，亲日派大資产阶級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資产阶級，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士紳，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待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請你向××同志索取一閱。在第三課中主要应說各阶級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現实意义，亦請加以注意。

第二十五課，等几天再給你看。

在去年十二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資产阶級与开明士紳的态度是否与大資产阶級、大地主阶級有区别，还不能明显的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請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

与延安新中华报記者談話

（一九三八年二日）

问題一：苏联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以党专政嗎？

答：苏联是工人阶級专政的国家，即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不是以党专政的国家；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阶級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区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級的最覚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中起領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級去实行专政。因此，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創造者，列宁斯大林从来未曾将党的专政与阶級的专政混为一談，而他們有时借用所謂党的“专政”这个名詞时，不过是指的党在国家系統中的領导作用这一点而已。为的使你明了和相信我的这种說法，我乐于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这个問題所說的話介紹一点給你。为了記忆和了解便利，我特将斯大林所著“关于列宁主义的問題”这本书上对这个問題所引証列宁的意見和他自己的意見介紹一点給你，在这本书里，在“无产阶級专政系統里的党和工人阶級”这一节中，斯大林曾将列宁对这个問題的意見加以詳明的发揮，例如他說：“比方，在我們苏联这里，在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里，应当把这样一件事实看作党領导作用的最高表現，这事实就是我們的苏維埃的或其他的群众組織，在解决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时候，都要根据党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說：“无产阶級的专政，在实質上，是他的先鋒队的‘专政’是它的党的‘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級的基本的領导力量。”請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这个問

題所說的話："田納尔說：他是主张无产阶級专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級专政并不是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样，他認为我們所了解的无产阶級专政，在实質上，就是无产阶級的那个有組織的有覚悟的少数的专政。而且眞的是，在資本主义时代，当工人阶級是遭受着不断的剝削而不能发展自己的人类的才能的时候，工人政党的最大特点，正是在于这政党上能包括本阶級的少数，政党只能团結本阶級的少数，正好象在无論那个資本主义的社会里，眞正覚悟的工人，只是占全体工人的少数。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这个有覚悟的少数，才能够指导和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而如果田納尔同志說他是政党的仇敌，而同时又主张由工人阶級中少数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分子来給整个无产阶級指导道路，那么，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实际上是沒有什么意見分歧的。"（請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可是这是不是說，可以在无产阶級的专政和党的領导作用（党的'专政'）之間放一个等号呢？可以将前者与后者看作一个东西呢？可以将后者代替前者呢？当然不是这样說。当然是不可以的。例如斯大林同志就說过是无产阶級的专政就是我們党的"专政"（請看关于'列宁的学說'P.95）这个說法显然是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級的专政看作一个东西°从列宁主义立場上看来，可不可以認为这种把两个东西看作一个东西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是不可以的。

由此可見，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級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把阶級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談，是既不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論，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我想，对苏联这方面問題的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創造者列宁斯大林自己的意見是最有权威和最有信任的意見。

问題二：虽然苏联不是以党专政，但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俄国各党派长期斗爭中人民×是选擇的結果，即是在俄国人从长期斗爭中厌弃了其他党派而只拥护共产党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内部沒有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也就沒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为的使你能明了和相信我这种說法，最好也还是将斯大林自己关于这个問題的說法介紹給你。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的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与第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我們共产党的地位，全国唯一的公开政党的地位（一党垄断的地位）并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来的，这种地位决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的方法所能造作成的。我們共产党的垄断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在历史上逐漸形成的，这是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維克党全党破产而下台的結果。"

在苏联，除共产党以外，无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无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中，特别解释过。他說："末了，还有一类批評家，如果上边所述的一类批評家，責备苏联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級专政，那么，这一类批評家，恰恰相反，他們責备苏联宪法說它絲毫沒有改变苏联的現状，說它沒有放弃工人阶級专政，沒有容許各种党派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产党在苏联的領导地位依然有效。同时这一类批評家認为苏联各种党派沒有自由，乃是违反民主主义基础的一个标志。"

我承認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确仍保留着工人阶級专政制度依然有效，同样也保全着苏联共产党目前的領导地位，而毫无变更。如果可敬的批評家認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缺点，那

么，只能对这一点表示惋惜而已。我們布尔什維克却認为这是苏联宪法的优点。

至于各种政党的自由，那么，我們对这个問題的观点略有不同。政党是社会阶級的一部分，是社会阶級的先鋒部队，只有在有着对抗阶級，其利益互相敌对、彼此不能調合的社会里面，換一句話說，只有在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貧农等等社会里面，才能談到数个政党和政党的自由的存在。在苏联，資本家、地主、富农等等这一类阶級早已沒有了。現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級，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級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苏联并沒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因之，也沒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即勇敢和彻底保障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存在。它对于这两个阶級的利益，保护得并不坏，这一点未必有人可以发生怀疑的。

人們都說民主，可是什么是民主呢？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有彼此对抗的阶級，那个的民主，归根到底，乃是对于有势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对于有財产的少数人的民主。在苏联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对于劳动者的民主，亦即对于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見，违反民主主义原則的，亦不是苏联新宪法，而是資产阶級的宪法。因此，我認为，苏联宪法，乃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由此可見，一党存在的事实，只有在这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已在革命过程中完全为人民大众所鄙弃，所推倒和沒有其它党派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如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样，才能够眞正形成和做到。

问題三：为什么德国意大利都是一党专政呢？

答：首先必須把国內一党掌握政权与一国內是否只有一党存在的問題分别清楚。在德意两国的确只有一个政党掌握政权，但这不是說，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存在，在德国，固然今天当权的只有法西斯主义的国社党，但是在法西斯上台执政以前的其他各政党——曾在末次(一九三三年)国会选举时拥有千百万选民的社会民主党，拥有5—6百万选民的共产党，拥有数百万选民和有历史传統的各种民主制度的資产阶級各党派——都是繼續存在和活动着，不过是不公开不合法的存在和活动着而已。請任何人到德国的城市农村里去仔細考察一下，他便立刻可以看出集中监獄里虽然囚禁着几十万反政府党派的分子，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一切拥护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党派，都还潜在地英勇地斗爭着，他們秘密地出版自己的报紙杂志，他們痛苦地进行教育和組織民众的工作。在法国、捷克斯拉夫、比利时等国的德国政治侨民正在联合国內自己的党派，为設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民主政治的人民陣綫，在社会民主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共产国际領导机关里，均派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意大利的情形和德沒有两样，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同样英勇地秘密地进行反法西斯党的活动，这些党派的代表，同样在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領导机关內占着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見，如果說在德意两国內只有一党掌握政权，只有一党有合法地位，这是对的；如果說在这些国家里只有法西斯蒂党存在，那就完全不合事实。

问題四：有些人說現在国民党应該实行“一党专政”，你对这个問題有什么意見呢？

答：对这个問題，我可以分两个方面回答你。

第一，如果你所謂的“一党专政”是指国民党一党掌握国民党党員，或国民党自愿指定的人物，中国的其他各党派，現在均无代表参加政府。我們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以外的我国第二大的政党。我們今天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关于这一点，我們党領导人陈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美国記者白得思先生的談話中，以及我們党的另一位領导人张聞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发表的《巩固国共合作爭取抗战胜利》一文中，已經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恳切的声明过。关于这一点，我可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一次郑重声明：我們中国共产党現在誠恳地帮助国民党对日抗战，但我們現在并不要求参加国民政府。

第二，一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謂一党执政，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如果所謂“一党专政”的办法，实际就是对于国民党过去十年所实行的政策，那我以为有考虑的必要。在我看来，今天国民党是可以維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了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材和表現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当然这些民主办法是絕对有利抗战的民主办法，是絕对巩固政府和更增加人民对政府拥护信任的民主办法。

问題五：現在有人說，国民党应当再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換句話說，即是不允許国民党以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对此問題有何意見？

答：只允許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認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理論，而且是曾經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慘痛的結果，是不仅内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来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来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的痛苦經驗告訴我們：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其他党派的政策，已經遭受失敗；同时，中共在中国現有条件下企图造成一党領导的政权，也未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一次因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經驗，十年来因国共分裂而形成严重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訓了国共两党的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件苦的眞理，即是中国統一局面造成的眞实有效的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或企图消灭另一党派的内爭，而是把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統一战綫，——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六个月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对日抗战的根本前提，便是由于国内民族力量的团結和統一，而我国民族力量团結和統一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而是国共两党不仅相互拋弃了过去互不承認和互相对立的立場，而且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实行携手合作，即是国民党放弃过去否認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立場，实行一切抗日党派团結御侮的方針，共产党和其他反日的党派也放弃过去对国民党的立場，实行与国民党合作，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由此可見各党派力量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沒有这个前提，破坏了这个前提，便是实际上使中国継續内战，中国一有内战，便无法継續对日抗战，这是显而易見，人所公認的眞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法西斯軍閥若干軍事侵略之外时刻企图使用“以华制华”的毒計，首先是企图再挑拨中国各党派之間的内爭，以便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战綫。

由此可見今天有些人宣揚的不許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論，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經否定了的理論，是使中国回到团結抗战以前的紛爭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形成的統一局面不能継續，因而也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論宣揚这种理論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統一”，如果他們的理論不幸見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結果，一定是破坏今日既經形成的統一局面；因而无論宣传这种理論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們的理論不幸而見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結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結，使对日抗战不能継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深信，这种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結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慘局面的理論，一定会受到爱国人民的反对，一定会受到全国抗战軍队的否認，同时也就一定会受到国民党賢明領导人物和一切为国为民而領导継續抗日的国民党同志的斥責和厌弃，这是毫不足奇的，首先因为这种理論完全不合于实际，违反着实际。这些人說：国民党之外如其他党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地位，便因党爭而妨碍抗日；事实的証明是：原来只許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而不許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中国确实有极大的党派內爭，以致中国未曾抗日——頂多也不过局部抗日，以致中国无力进行全面的对日抗战；恰恰相反，当国民党允許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的地位并与其他政党合作时，中国的确停止了內战，消释了党爭，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国家政权和軍队的統一局面，因而才能进行空前未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爭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和爭取民族的解放。这些人說：国民党以外，如允許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則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便成为妨碍国家統一和破坏国家統一的因素。中国的事实証明是，只国民党一党有合法地位而同时不允許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国內紛乱到不断的国內战爭；恰恰相反，国民党——允許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国內統一的局面立見，各政党之間，对某些問題即有爭論，也絕不会用武器作批評，頂多也不过相互以友誼的批評作武器；英美法比捷瑞等国的事实証明：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絕未曾妨碍或破坏这些国家的統一。由此可見，只允許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中国才能統一才能抗日的理論，是不合中国实际生活的理論，是使中国既不能眞正統一，又不能眞正抗日的理論，这种理論絕对不为中国爱护統一和坚决抗日的軍民所接受。

问題六：現在有人說共产党既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先生对此問題的意見怎样？

答：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有人說共产党員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現而奋斗，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代表我們的党郑重声明：这只是拨弄是非者的謠言，这絕不合乎事实。我們是共产党員，我們宣布愿意与国民党同志們一起去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我們絕不会放弃我們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其次，有人說，如果宣布你們为三民主义实現而奋斗，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这便不合乎三民主义的立場，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再一次郑重指出：这种說法完全不对的。这种說法完全既不合乎首創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动，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从理論上看起来，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等主要內容，与共产主义所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人民达到民族独立；彻底摧毀封建压迫，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彻底改造中国經济制度，使中国人民达到民生

幸福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絕不是不能相容的，因而本党与国民党也不是不能合法并存和攜手合作的。关于这一点，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演講中不止一次地說："所以一講到社会問題，多数的青年便贊成共产党，要拿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問題，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們便极力組織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我們国民党的旧同志，現在对共产党生出許多誤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講》四十二頁）特别指明是：一般地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义的互相結合性，特别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义。因此，在解释这种原因以后，中山先生在这篇演講里繼續說："为什么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对民生主义还沒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一次国民党改組許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說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实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不能容納的。然則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演講，有一点发明，是說社会的文明发达、經济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經济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級战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問題不能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們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孙中山先生在演講中接下去发問說："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員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員也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幸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論，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員，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說是他們个人的行为；所以我們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員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們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即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么，我們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問題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中山先生这段演講里面，我們应当得出那些結論来呢？結論应当是：第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能够相容并存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朋友的关系，第二，認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也是不懂三民主义的人，特别是不知民生主义是何物的人，这些人应該是国民党中的极少数，同样，認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关系的人，这种人也应該是共产党中的极少数。而对于这个問題的解决办法，中山先生認为这只是某一方面的个人行动，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来反对另一方面的全党及其主义；第三，中山先生認为，不仅主张共产主义的人应該了解三民主义，同时中山先生指示：主张民生主义的人，也应該細心去研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我們共产党員非常贊美中山先生这种态度。的确，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不曾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实行的。我們不仅愿意为实現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样，我們更欢迎任何人——首先是国民党的同志們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来細心研究共产主义。因为我們深信：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眞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認馬克思主义是伟大社会問題的最高理想，是集千年来人

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滿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絕沒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說："……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錢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創出；那些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垄断起来，因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爭极剧烈的时代。这种斗爭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主义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謂人与人爭，究竟是爭什么呢？就是爭面包，爭飯碗，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有面包和飯吃，便不至于爭，便可以免去人与人爭，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尚的理想，来解决社会問題的。"（見《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一講第三十八頁）对于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山先生曾說："至于馬克思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說，可以說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們学說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个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着他走。"

从以上所說的一切，你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亲手著作的三民主义理論中，絕找不出个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指示来，至于講到中山先生对这个問題，在行动中表現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后，中山先生与共产党員便有着亲切的关系，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决心改組国民党时，便公开与共产党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亲密的，即不仅建立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联盟，而且允許共产党員以个人資格加入国民党組織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全国还不过几百个党員，成立历史不过几年，而且共产党員并以个人資格去加入国民党，去共同为国民革命而斗爭，即在那种情况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产党員提出过除三民主义以外不允許同时相信共产主义的要求呢？沒有！即在那种情况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許国民党一党存在，不允許共产党同时合法存在的主张呢？沒有！不仅沒有，而且中山先生还坚决反对别人提这种要求和这种主张。这就是中山先生伟大远見和洞悉实情之处，因为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絕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組織，絕不是可以强制解散或消灭的，古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极端鎮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而現今的情形，比当时还更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已經有十七年奋斗的革命历史，有数十万党員，有久經战斗的坚强組織，有为主义、为党、为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为全人类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奋斗的領导和干部，有千百万群众的信仰和拥护，那里能談得到取消共产党員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組織呢。如果說只是因为我們宣布了我們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現而奋斗一层，就应当取消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完全是誤会，因为我們对三民主义与对共产主义的相互了解，的确如中山先生一样，即我們認为他們是好朋友是相容的，所以我們共产党員不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以共产党員的資格去与国民党同志一起为三民主义的实現而奋斗，即在国共分家后，我們在自己单独的革命苦斗中，也还是为的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目的，即是与三民主义根本思想相符合的目的。今天和过去国共分裂时不同的，只是过去我們共产党員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单独地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事业奋斗，今天国共重新合作时，我們共产党員又与国民党同志們在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要求共产党員放弃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組織，这不仅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而即有直接违反着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动。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看来，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

革命蓬勃发展和北伐軍的伟大胜利，而国共关系破裂，便造成了十年来外患內忧空前严重的局面；現在国共两党一經合作，对外便能发动空前未有的光荣的民族自卫抗战，对內便能造成数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政权的統一，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党派各阶层力量的大团結，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感覚到，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唯一生机和希望。两个主义的两个党同时合法并存，对于中国人民和国家是有利或有害，应根据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判断，而不应該根据少数人的偏見和主观愿望为决断根据。中国的过去和現在的鉄一般的事实一再証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合作，則国家統一，革命发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則国家分裂，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这种事实的意見，必然都是不能实現的，一旦或万幸而实現了，定造成国家民族的災难。

由此可見，認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相容的意見，以及由此而認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能同时合法并存的意見，都是毫无根据，而且有害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意見，这种意見既违背中山先生的理論和行动的遺教，又违反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意見的实际危险，就是有把目前举国一致对外的良好政局轉化成視綫对內，增加內部困难的可能局面。

因此，在談話結束时，对这个問題，我再重复郑重地告訴你几句話：如果所謂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內容，即是說国民党一党掌握政府的政权，这是已成的事实，这沒問題。我們共产党員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們对領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絕对拥护，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才否認国民政府，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今天只有执行日寇特务机关意旨而行动的托洛斯基及其門徒們，才会造謠說国民政府是克伦斯基式的臨时过渡政府，因而才对国民政府采取"表面上虛与委蛇"，"实际上准备打倒"的汉奸政策。我們共产党員对国民政府的拥护和帮助，是絕对眞誠的，是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場出发的。同时，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內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許共产党員和其他党派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許共产党員有自己的共产党員的信仰等等，这絕不是新的理論，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回轉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見諸实际行动，則既又害統一而又害抗日，即是使中国既經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危险。因此，这些思想客观上一定会被日本法西斯軍閥和汉奸所利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确难相信，这种意見能得到国民党中以国家民族根本利害为重的有識之士的同情。当然，更談不上这种意見能得到宝貴統一和彻底抗日而无党派偏見的同情了。不过，这个問題即恰当着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关头，能公然提出，这就不能不喚起共产党員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們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問題，而且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問題。所以我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各党派有远見的賢明之士，都严重注視这一問題的发展趋势，尽一切努力使以各党派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不受威胁，使国家統一和抗日救国的一切事业不受危险。以达到抗战到底，爭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任务。

抄自《毛泽东救国言論集》

与合众社記者的談話

（一九三八年二月）

问：現在有許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見如何？

答：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敗后胜，轉弱为强，这已經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爭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漸漸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則漸漸加强起来。日本現在正借錢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經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說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經消耗他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債跌落，他的“速战速决”計划已經失敗，試問他那有許多錢无限长期打下去？就軍事方面講，日本在中国的战綫已經延长到自杭州已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他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他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漸漸薄弱。他占領了长距离的鉄路，便需要軍队去防守每一个車站，日本已动員三分之一的軍队来中国了，如果他再要占領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須再动員几十万軍队，那时他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內国际的其他許多大矛盾，他終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问：先生說中国的力量能够漸漸加强起来嗎？

答：根据过去七个月的作战經驗，在軍事上我們若能运用运动战、陣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軍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見，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軍，在运动战中給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要抽調八九万軍队組成二三十个基本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揮員領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陣綫前面，从这个长陣綫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間，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結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軍的运动战，而使敌人疲于奔命。至于陣地战，由于我們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們必須建設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設法輸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陣地，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說，我們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說的，我們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陣地战、游击战三者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輔，在将来要使陣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說来，則始終是輔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爭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們已有国內的統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現在的成績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軍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須的。只要繼續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預示着前途的光明。

问：第八路軍在日本人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本人驅逐或歼灭的危险嗎？

答：第八路軍現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綏、正太、同蒲四鉄路中間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

軍队密切結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軍在这里已經建立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驅逐他們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軍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綫。第二个区域是平綏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晉西北地带。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間的晉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晉西南。他們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絡綫，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灭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鉄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沒有失掉。这一实例給全国以具体的証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问：先生覚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嗎？

答：我以为是的。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同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經历了艰苦的經驗，这种經驗能增强今后的团結，現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則之下，只要我們的友党能有和我們一样的誠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问：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說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爭胜利之后还要建国，請問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級的政党将来怎能建立新国家呢？

答：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則更处在亡国灭种的关头，連半殖民地地位都处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級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則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战，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党綱領下的合作，是有原則的合作，是眞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綱領与原則，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則的政党所不許可的。有綱領有原則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間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问：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答：我們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組織代議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針应該向此方向前进。

问：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滿意嗎？还須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嗎？

答：我們拥护現在的中央政府，因为他坚持抗战的方針，并領导抗战的行动。但我們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內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們曾經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們訊为有益于团結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們并无成見，只要眞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问：东三省义勇軍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領导嗎？

答：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軍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軍領袖，揚靖宇、赵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产党員，他們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績，是人所共知

的。那里同是民族統一战綫，除共产党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軍队与民众团体，他們已在共同的方針下团結起来了。

问：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答：美国民主党的贊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統的譴責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紙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爭的声援，这些都是我們欢迎与感謝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給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現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抄自《毛泽东救国言論集》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綱領

(为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胜利而斗爭)

《解放杂志》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財产，否認日本外債，废除日本条約，收回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反对任何的动搖妥协。

二、全国軍事的总动員：

动員全国海陆空軍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純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針，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針。

建立經常的国防会議，討論与决定国防計划与作战方針。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爭，配合主力軍作战。

改革軍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与战斗員团結一致，軍队与人民团結一致。发揚軍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人民革命軍东北义勇軍。破坏敌人后方。

实現一切抗日軍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軍区，动員全民族参战，以便从僱佣兵役制轉变为义务兵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員：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縛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頒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国人民动員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枪出枪，有知識

出知識。

动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眞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通过眞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針，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須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驅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汚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領土主权的范围內，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相协定。

拥护和平陣綫，反对德日意侵略陣綫。

联合朝鮮台湾及日本国內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財政經济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汉奸財产作抗日經費为原則，經济政策是整頓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經济，保証战时农产品的自給，提倡国貨改良土产，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軍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減租減息；救济失业；調节粮食；賑济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課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課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覚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訓練。

九、肅清汉奸卖国賊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領导抗日战爭，精誠团結、共赴国难。

在紀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陣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說詞

（三月十二日）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紀念日子，我們开了一个庄严的紀念大会，同时，抗日战爭已經打了八个月，許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們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們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孙中山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綱領，統一战綫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見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手訂的三民主义新綱領，它被通过了大会，即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統一战綫政策，这个統一战綫，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綱領与統一战綫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貢献。不但如此，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沒有这种毅力，沒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現的。如象刚才讀过的总理遺嘱劈头一句所說：“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間，經过了多少艰苦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越挫越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励。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誘惑面前表理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共产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沒有弃置共主义于不顧的时候，他始終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現了三民主义发展。对統一战綫也是一样的，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統一战綫，从为着推翻滿清而联合各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結合，就表現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們又是一个統一战綫，这个統一战綫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統一战綫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統一战綫所应执行的綱領，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說的东西，但形式与內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統一战綫，战胜我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从革命实践中发揚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所以我們紀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話，就一定要注意这样三項：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現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項是孙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伟大的遺产，一切国民党員，一切共产党員，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遺产而发揚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項宝貴遺产的态度而定。

現在說到追悼抗敌陣亡将士的意义。从芦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經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們呢？也

是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現了伟大的团結；几百万軍队与无数的人民都加入了火綫，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們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間，許多是国民党人，許多是共产党人，許多是其它党派无党派的人。我們眞誠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紀念他們。从郝梦龄、佟麟閣、赵登禹、饒国华、刘家祺、姜玉眞、陈錦秀、李桂丹、黃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諸将領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給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們的方法就是战爭与牺牲，拿战爭对抗战爭，拿革命的正义战爭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們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經証明，現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証明，郝梦龄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而牺牲了。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他还要进攻我們的西安、郑洲、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他想吞灭全中国。但是我要告訴那些发疯的敌人，你們的目的一定达不到。不要以为占領了我們的地方，就算达到了你們的目的，沒有达到，也不会达到，你們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暫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証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們一方面。而且战爭打到結局，你們也一定只能占領我們一部分地方；要占領全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你們得到了一个城市的速决战，同时也就要你們得到一个乡村的持久战，例如你們把山西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占領了，但数終于你們占領地的乡村将始終是中华民国。我們要把这个理由告訴全国的同胞，日本差不多在任何一省都只能作部份的占領，日本的兵力不够分配；他的野蛮政策又激起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有广大的軍队与人民，中国又实行着統一战綫的良好政策，就此决定了持久战以及最大胜利之属于那一方，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結果，即使日本占領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継續抗战爭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只能占領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們在每个省中組織大多数农村中的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許多抗日根据地，如象現在已經建立起来了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們就包围了日本軍，我們的这个外綫的战爭，配合着內綫的战爭，又从各方努力把我們全国范围內的党、政、軍、民各項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內外夹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內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誰能說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軍等的热血誰能說是白流的呢？日本强盜之被赶出中国能說不是必然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主幸福的三大理想，誰能說不会实現于中国的？我們要使全国人民都有这种明确的認識与坚固的信念，都懂得最好的持久战方針，在这时大战中，齐心一致，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鎖鏈脫掉。

在这次大会上，我們要向一切在前綫奋战的将士們致敬礼，因为他們都在为着最后胜利作英勇的斗爭，我們要向一切抗日軍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們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軍人；我們也要向在后方各界辛苦焦劳、刻己奉公以从事于抗战工作的各級工作人員与各級領袖們致敬礼，因为他們的工作都直接指导了或帮助了抗战。

大会的同胞們，全国的同胞們，让我們永远的团結起来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解放》杂志第三十三期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

对新四軍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致項英同志

項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爭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揮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游击战爭已經証明了的。在偵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以跟进，在广德、苏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区之間广大地区創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爭，組織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时也是能发展游击战爭的，条件与內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論何时，应有謹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許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視的。（下略）

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滿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談話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第一个问題：目前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請你告訴我們，我們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質，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則下，都有他們言論出版集会結社之自由，不論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識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們，帮助他們，使他們更普遍的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給任何自由的。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为八路軍的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軍队，其內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軍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爭中表現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們从抗日軍政大学与陝北公学，就可看出这种精神。

其次，經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經营之。例如这里頗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稅的，但沒有苛捐杂稅，实行一种統一的累进稅，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級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說明一点，就是

有些人說："知識落后的农民，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結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們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錯，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員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爭，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維埃不同的是推广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論工人、农民、妇女、知識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滿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爭与民主制度結合起来，都能取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論那一种职业的人，无論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揮他們的天才，有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表現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質，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質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爭与民主制度結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爭取抗日战爭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充分自由，全国軍队中官兵打成一片，軍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經济建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結合，全国各級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置有各級人民的代議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爭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則現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一个榜样給全国人民看，他們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取，是需經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認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們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說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說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領导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們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現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說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頑固分子这样說，这种說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說这里象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沒有，这种說法也过分了。正确的說应該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質困难即其一例，許多工作还得繼續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不得了，不須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評，加重了这里工作人里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諸位的批評，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題：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个問題很簡单。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着的問題。我們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們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絕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倒鴨綠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統一战綫？就是全国团結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結，才能坚持抗战。現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結，但还要更加团結，不但团結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須团結全国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結在一定的組織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是算巩固与扩大

了統一战綫。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現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說："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說："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于持久战。"我們認为这两种意見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內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国大，又有許多国內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爭的一定的时期損失了許多地方，但仍然坚持战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的打胜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爭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的全部的实現，这不論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內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間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們应准备长期战爭，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現在的方針应該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統一战綫，第三，坚持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央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結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針貫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題：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縮短这一持久战时間呢？

答：要縮短战爭时間，必須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統一战綫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統一战綫的方針下，各項工作須大大的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爭期間就能縮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內人民的帮助。現在这种帮助已經开始，譬如他們的士兵不愿意战爭，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爭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中。如果日本的士兵和人民更多的覚悟一分，战爭期間也就可以縮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們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們的战爭也就会縮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結，就能使日本国內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帮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們国內的抗日力量加快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給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給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爭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現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則战爭时間就能縮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們的战爭是持久战，但我們应极力爭取尽可能縮短时間的条件，如沒有这些条件，則縮短时間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題：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內，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內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則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內，經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經营，訂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該有土地，实行統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协定，在这

个国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民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沒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內，軍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維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破坏私有財产原則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現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爭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爭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也是把日本赶到鴨綠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系。不过許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經济建設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具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主要条件，目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該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題：你以为現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年的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青年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講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坚持持久战，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齡，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任务，沒有什么分別的，有分別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們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爭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組織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組織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貧苦学生有免費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綫等等，說到世界青年們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經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要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是使他們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們自身的利益有联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絡人民的桥梁，經过学生，使各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們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給我們的物質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貨与不卖貨給日本，直至組織国际抗日义勇軍，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爭等等。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視察，給我們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謝你們，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們致敬，希望你們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爭的眞相带給世界学生与人民。我們与你們永远团結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永久幸福而战。

論新阶段（节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在一切为着战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为使之适合战爭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实現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訂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課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爭所必須的課程及发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則。第二，

創造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組織各种补习学校，識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創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覚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須拿政治上动員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結合恰当的指导与調整，給以可能的物質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的財力办几个学校、报紙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覚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在抗战政府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沒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須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間不配合的現象应免除。

八路軍軍政杂志发刊詞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当抗日战爭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軍同志出版这个《軍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給抗战友軍，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軍抗战經驗的参考材料。

八路軍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蔣委員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領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級长官与共产党員的領导之下，协同各部友軍，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針，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爭，創立了許多在敌人后方的根据地，縮小了敌人的占領地，箝制了大量的敌軍，配合了正面主力軍的抗战，延緩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認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敗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錯誤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斯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內某些守旧頑固分子的无恥造謠。

此外，八路軍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現在准备配合西北友軍，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軍的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斯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頑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認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輕視八路軍，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軍的心理，事实表現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証。八路軍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誠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的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頑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認的。中外新聞記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詳尽的或粗略的記載早已連篇累牍；一切无成見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軍的經驗，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員为骨干的八路軍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問題的話，那我們只有一句話答复：認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說。

八路軍的这些成績从何而来？由于上級領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員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軍的帮助，这四者是八路軍所以获得成績的原因。其中友軍的协助是明显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順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爭，沒有同处于敌后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这样大的成績。八路軍的将士应該感謝直接間接配合作战的友軍，尤其应

应感謝給予自己各种善意帮助与忠忱鼓励的友軍将士。中国軍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記了旧怨，而变为互相帮助的亲密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說：讀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讀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但今天我們应該說：凡看見或听見中国軍队不記旧怨，而互相帮助，亲密团結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財，吃磨擦飯"的人物，应該引起一点反省罢！

八路軍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軍，这是八路軍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軍队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軍在抗战新阶級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軍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現代新式軍队的管理与指揮，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沒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和程度的問題。解决这些問題，成为八路軍当前的第一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統一战綫，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針，八路軍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績，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統一战綫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軍一道工作与調解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統一战綫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爭取敌伪軍的工作，久而成为八路軍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許多成績，但对于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語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軍士兵与下級官长进行反侵略統一战綫的宣传，还非常不足，爭取蒙伪軍的成績較大。但还須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軍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績，还沒有做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問題之一，将是財政經济問題，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难，应該提到訊識的高度。这个問題已經引起八路軍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財政經济政策，如象过去已經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軍队本身参加生产的問題。在比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員担任生产。在战斗許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該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軍队的生活，补助了給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軍队的精神，增强軍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技术，正确的运用統一战綫政策，广泛的进行爭取敌伪軍工作，由軍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軍在新阶段中应該加重注意的重要問題，其它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問題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揚成績，糾正缺点，是八路軍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軍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揚八路軍的成績，糾正八路軍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軍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軍經驗貢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軍，也属需要。"八路軍軍政杂志"应該为此目的而努力。

《論持久战》英譯本序言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論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們，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除了一部分頑固党反对中国抗战。关于頑固党，有的是頑固成性一向同情日本軍閥的，有的則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規律，經过艰苦路程日本必敗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規律。因而由悲观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国，这类人我想也不会有的。倘能因我的书給于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眞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們，也許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眞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悶，这类同情的苦悶，尤其是我們应該为之解释的。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間作的，因为它是論整个中日战爭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間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論点是否正确，有过去的全部抗战經驗为之証实，今后經驗也将为之証实，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的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敌因被迫結束其战略进攻轉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結束自己的战略退却（主力軍，不是游击队），轉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新阶段中，我之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这种准备时間也許是长的，但我們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伟大抗战中，根本的依靠中国自力更生，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驅逐之！这是沒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爭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諸民主国尚存在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敗，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錯誤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們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眞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語各国間喚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爭，但世界各大国間的战爭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要置身于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們同意罗斯福总統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至今还保持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責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爭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原載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八路軍軍政杂志》二期）

中国軍队应当学习苏联紅軍

（为苏联紅軍二十一周年紀念——二月二十三日——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作）

当我們听到苏联紅軍二十一周年紀念的时候，我們感到有一个伟大的力量站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面前，这个伟大力量伸出他的友爱之手，愿为我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爭之后

援，这个伟大力量就是苏联紅軍。苏联紅軍經过二十一年的鍛炼，他的陆軍、空軍，还加上海軍已經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在英明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与統帅伏罗希洛夫同志領导之下，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軍队，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軍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眞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在这后一个意义上，我料想苏联紅軍的每一个指揮員，苏联的每一个公民全部知道，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現在进行的战爭是什么性質的战爭，这个战爭是在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这个战爭又是具有何种的光明前途，他与苏联及全世界又有何种密切关系。反过来說，在我們中国，不但八路軍，而且，全体抗日軍人，无不懂得苏联紅軍是中国的好朋友，无不知道苏联是最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尤其是苏联紅軍战斗的經驗教訓是为中国軍队与中国軍人所取法，使我們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軍队也要变成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軍队，也要逐漸具备新式技术装备，近代化的軍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中国軍队有許多长处，这些长处在十五个月抗战中已逐漸引起了敌人的惊叹，引起了世界的贊美，中国軍队必能在长期抗日战爭中鍛炼自己，成为全世界上反法西斯战爭中的一个有力的方面軍，为了驅逐日寇实現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援助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爭。但中国軍队由于历史原因，至今还保存着許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質的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軍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針，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紅軍学习的。誰都知道，中苏两大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基础之上，十多年来就結成了密切的关系。在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苏联及其紅軍援助了中国的北伐战爭，于今又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当此抗日战爭处于新的困难情况面前的时候，中苏友誼关系是应該更加增进的，中国軍队与苏联紅軍之間的精神联系是应該更加密切的，大敌当前，中苏同样，正是两大民族两大軍队共同奋斗的时候了。不管法西斯国家如何加紧侵略中国，如何的准备进攻苏联，如何的危害西班牙人民，以及如何的企图发动各大国之間的再一次慘战，但其前途是可以預断的，最后胜利絕不是侵略者，中国、苏联、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当此苏联紅軍二十一周年紀念的时候，我以中国人民与中国軍队之一員的資格，謹向苏联人民与苏联紅軍致以反法西斯的友誼的敬礼！

（《群众》周刊第十七、八期，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講話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同志們：

今天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員，开了一个这样盛大的会，同时，今天又是“五一”劳动节，我們开了这样伟大的紀念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今天是五月一日，在今天，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級，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統統举行示威。同志們：向哪个示威？向法西斯示威！在今天，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們，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在各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开大会，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强盜！

我們中国在今天这一天，所有工人阶級，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都在开紀念“五一”的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在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工、农、商、学、兵、党、政、軍、民、各党各派，在蔣委員长号召之下，开始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員，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場鼓掌）要把我們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全場鼓掌，接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創造新中国！……）这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我講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要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員呢？蔣委員长为什么要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員呢？因为我們的敌人，要达到他的目的，要貫彻他的主张，他要灭亡全中国，日本法西斯軍閥，已在那里进行动員日本全国的力量，来継續进行法西斯的侵略战爭，来継續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盜战爭。沒有，中国的坏蛋，汪精卫，汪精卫的徒子徒孙們，这些坏东西，又已在那里进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他們在进行倒蔣反共的活动，他們在香港，上海一带，組織什么“反共救国同盟”，汪精卫做头子，并要設立一个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因为日本同汉奸这样猖狂，所以我們要在全国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員，号召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团結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反对汪精卫，反对托派，反对一切狐群狗党，拥护蔣委員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要把我們的战爭打到底，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最后胜利！我們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鴨綠江边！（全場鼓掌）要收复一切失地！（全場鼓掌）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所以蔣委員长就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員，中国共产党就拥护蔣委員长的号召，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員。今天，延安各界，党、政、軍、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員的綱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們的敌人，一定要建設我們的新中国！（全場鼓掌，接着高呼：全国人民团結起来！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員，拥护共产党！拥护国共长期合作！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托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第三点，講到国家民族的問題，我們的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全国工、农、軍、学、商、一切爱国人民的国家，不是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国家。我們的国家是要把汪精卫这一类汉奸除外的，还有一些不明大义之徒，他們准备做汉奸，或者精神上被汉奸俘虜的人，如果他們一定要跟汪精卫跑，也要把他們除外的。我們的民族，是数千年来独立自尊的民族，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民族，我們的国家民族中，只容許抗日政府存在，决不容許任何的汉奸政府存在。我們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我們要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們国家的独立，妨害着我們民族的生存，我們要打倒它。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全場高呼：保卫祖国！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賊！）

第四点，为了达到保卫祖国，为了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就要使抗战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軍事第一，胜利第一”。打胜仗，这就是我們的唯一标准。凡能使我們打胜仗的，凡利于抗战的，我們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搗乱分子的活动，頑固分子与阴謀家的活动，我們統統要反对。任何破坏抗战的人，我們統統要打倒！（全場鼓掌，高呼：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

于抗日！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最后胜利！軍事第一；胜利第一！反对妥协投降！反对汉奸卖国賊！）

第五点，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要达到鴨綠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就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力量統一起来、集中起来，这就要实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这就是蔣委員长所号召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切意志都要集中到最后胜利这一点上，能不能够集中到别一点上去呢？能不能够同日本和平妥协呢？决不能够！一定要爭取最后胜利；一定要达到这一点！一切力量要集中到抗日陣綫这一方面，能不能够集中到别的方面去呢？决不能够！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陣綫上去，集中到降日陣綫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搗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陣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就要把他当汉奸打！（全場高呼：一切意志集中在最后胜利！一切力量集中在抗日一綫！）

第六点，为了爭取最后胜利，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錯誤的东西統統去掉，自私自利，貪生怕死，貪污腐化，萎靡不振……这些东西好不好呢？（台下高呼：不好！）这些东西要統統去掉。我們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我們民族历史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們要把它发揮起来。要把現在許多人中流行的自私自利，貪生怕死，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間，就是要糾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錯誤思想，首先是汪派，托派的錯誤思想，反国家反民族的思想，一定要糾正，其他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也要糾正。譬如有些人說：“馬列主义不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这种話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明明白白地指示过：“馬列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現在这些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說两种主义不是好朋友，这是反对全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就是反民族的思想。所以这些錯誤思想，統統要糾正，統統要取消，才能使我們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脫离的，沒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奋斗的工作作风；沒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場鼓掌，接着高呼：反对自私自利，反对貪生怕死！反对貪污腐化；反对錯誤思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第七点，最后一点，講到我們現在的总方針，这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治基础，是要在抗日建国的奋斗中全部实行的。民族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自由；民生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这些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我們要坚决的实行。从今天起，全国人民都要实行眞正的三民主义！不但要口里講，而且要动手做。有許多人，他們口里講信仰三民主义，但是据我看来，他們并沒有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信仰三民主义，就要向日本打到底，而他們却准备妥协投降，汪精卫就是已經投降了的一个。信仰民权主义，就不能压迫老百姓，而他們却不愿意給老百姓以民主权力。信仰民生主义，就要照顧老百姓的穿衣吃飯問題，而他們却不愿意改良人民的生活。这种人叫不叫信仰了三民主义呢？（全場高呼：不叫！）这样的人叫不叫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呢？（全場又高呼：不叫！）只有抗战到底，打到鴨綠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始終不投降，不叛国，才叫做眞正的信仰民族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

只有給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給老百姓以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自由，不压迫老百姓，而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遺囑，实行“喚起民众”，才叫眞正的信仰民权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努力于解放大多数人民生活的痛苦，譬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实行生产运动，使大家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才叫眞正民生主义，才算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决不可作一个假信徒，决不可作一个坏学生，不要光是咀上講三民主义，我們号召全国国民大家动手实行三民主义，大家都做眞三民主义者，我希望全国国民大家实行打倒日本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大家实行帮助老百姓，喚起老百姓，給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的民权主义；大家实行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的民生主义，現在全国要求实行的，是这样的三民主义，是眞三民主义，我們要为眞三民主义的实現而奋斗到底！（全場鼓掌，高呼：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反对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

今天我們开会，就是为了这些事件，全国国民精神动員，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总而言之，要彻底地实行三民主义！要眞正实行三民主义，要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最后胜利，打到鴨綠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們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們一定要建立一个嶄新的中华民国！（热烈而长时間的鼓掌！）

抗大三周年紀念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抗大为什么全国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为他比較其它的軍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爭，到延安参观的人們，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們的职員教員与課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們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沒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贊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頑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們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頑固派人們之起劲的反对抗大，証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軍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他称贊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頑固派人們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三年来有其貢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績，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継續有所貢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輝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員、教員、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間，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經費不足、教員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項，然而共产党領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

抗大三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員們、学生們努力啊！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今天是你們的三周年紀念日。抗大办了三年了，我們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以来創造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綫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們国內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們不贊成抗战到底，他們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講和，主张妥协、投降。我們要做什么？我們要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是蔣委員长所号召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們抗大，一致的拥护。我們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贊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敗类，是中华民族的敗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許有一人講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三年是这样，以后三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針。……”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綫上！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正当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坚决不挠的抗战到了第二周年的时候，英国的援华委員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中国周”以表示援助我們的抗战。我代表朱德同志与八路軍的将士，代表我們前綫和后方医院中的士兵，并且我自也想說一說，这种同情和关切的表示，是多么使我們感到兴奋的鼓励啊。我們敬向在国际反侵略陣綫中和我們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謝并致热烈的敬礼。

中国两年来的抗战已經証明了民主势力抵抗侵略的力量。这两年来的抗战指出了，甚至一个工业落后的，在民族生活上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与侮辱的国家，也能滿怀着胜利的信心抵抗最野蛮最横暴的法西斯进攻。而且还証明了，不仅不能把中国的抗战和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分开，而且我們給侵略者的打击，已使我們的国家，在維护全世界的民主与文明的国际斗爭中，在反法西斯的主要陣綫中，站到了最前綫。

战爭一开始，我們就看見英国人民以物質支援我們的抗战，捐給我們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到中国来服务，对我們作了許多实际上同情的表示，这，虽然我們与英国正說明了相隔很遠，我們的抗战对于英国人民并不是一件无关輕重的事情。但是由于我們抗战在全世界反侵略斗爭中所处的地位，我們有权利要求得更多一些，要求比以前所給我們的更多的援助。

首先，我們要求你們严格注意你們政府的态度，你們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再輸出軍火給日本。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英国在重庆的大使館与总領事館，在日本来首都濫肆轰炸的时候受了損害。对于这种侮辱，英国政府却只表示了一种外交上最軟弱的态度，只报以

一紙抗議。正是这种态度鼓励日本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到处扫除英国的利益。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們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日本的共謀犯，法西斯的德意两国，在这两年內，与它狠狽为奸的破坏和平。摧毀国际条約，掀起血腥的慘无人道的战爭。它們的活动已經形成了对英国安全的一种直接威胁。这里就有一个理由，使英国人民一定要强迫他們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战，并且自己也要采取与对反侵略的陣綫所作的貢献相輔的步驟，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我們从事于个别的战爭。威胁是普遍的，因此現在必須在全世界和它作斗爭。

举例說，最近日本在占領区域里加强了反英的宣传。因此，援助中国，援助那跟远东的敌人作战的国家，对于英国人民的自卫也是必要的。

鑒于上述的种种情形，我們向你建議，請你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民在遏制的愿望上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

为了我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为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們已經坚决地斗爭了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日本軍閥利用了汪精卫之类的卑鄙无耻的失敗主义者，想用破坏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来破坏我們的抗战。

但是我們的朋友們可以放心。在这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人民的战綫已經成熟，而我們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决心也大为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坚决地执行着我們共同的决議，拥护蔣委长領导我們抗战。象汪精卫之类的失敗主义者，以前还能躲在后方阴謀投降的，現在已不能够隐藏他們的眞相而被揭穿被赶跑了。

英国与中国地理上是相隔很远的，但两国人民要打倒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愿望却把我們連結是一起了。让我拉起手来打倒人类的公敌。

中英两国人民联合起来！

（原載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３日《群办》周刊第３卷第７０期）

在延安模范青年給奖大会上的講話（摘录）

“青年应該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們。

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訓儿子，中国革命沒有成功，要长期斗爭，永远奋斗。”

《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６月６日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軍軍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紀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紀念抗战两周年的論文，借以答复自《論持久战》和《論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責难、挑战和質疑，名之曰《再論持久战》，这里只能簡略地說一說当前时局的危机問題。

中华民族，在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問題，就是战不战的問題。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之間，这个問題爭論得异常严重。“战則存，不战則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結論。“战則亡，不战則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結論。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爭論暫时的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結論是对的，第二个結論完全錯了。但芦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暫时解决这个問題而并沒有最后的解决这个問題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誘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陣綫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就把这个問題改变了一点詞句，变为所謂“和战問題”而在中国內部就掀起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爭。它們的論点依然一样，“战則存，和則亡”——主战派的結論。“和則存，战則亡”——主和派的結論。但是，主战派，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来說，仅仅是抗日陣綫中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因此，所謂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騙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謂共产党搗乱，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揮，陝甘宁边区割据与向外扩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陰謀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陰謀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議，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目，蒙蔽事实的眞相，企图逐漸造成輿論，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民族团結抗战即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发起人与坚持者，不反对他，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讓步，認为日本已經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的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許多所謂主和派分子，他們不但希望国际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讓步，以便講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說道：“你們看，国际空气如此，还有什么可以打下去的？”只得和罢！太平洋国际会議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驟！这一切，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陰謀！这一套，不但汪精卫，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許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們隐藏在抗日陣綫內部，与汪精卫里应外合，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紅白脸。

我們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們是始終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們是拥护蔣委員长与国民政府历次公开宣告的抗战国策的。我們坚决反对那些所謂主和派。我們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結，巩固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蔣委員长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打到鴨綠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我們坚决斥責那些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等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分裂与两党內战的陰謀。我們向他們說：你們这种分裂陰謀的实质，統統不过是你們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驟，而你們的投降政策与分裂政策統統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謀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計划之表現，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們的陰謀会被人民揭穿的。我們坚决斥責那些認为太平洋会議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談，所謂太平洋会議，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們坚决斥責那些認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覚悟，能够根本讓步的空談，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針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語，例如放弃其所謂“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針，轉而承認而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謂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餌魚上鈎取而烹之陰謀政策，誰要上鈎誰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誘中国投降，同样是他們的陰謀政策，他們縱容日本侵略中国，他們坐山观虎斗，以待

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謂太平洋調停会議，借收漁人之利，如果寄其希望于这些陰謀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与不战的問題，如今改成了战与和的問題，但性質还是一样，这是一切問題中的第一个大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誘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的还是中国的抗日陣綫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竟把所謂主和問題鬧得甚嚣尘上，这样就把投降可能造成为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險，而把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結，当做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重要与首要步驟，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須先把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須認清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确切的事实与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与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神圣抗战，是决不容許一部分人去动摇与叛卖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締造所公認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国共合作，是决不容許一部分人去破坏与分裂的。

战下去，团結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們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結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結下去的。

投降派和投降陰謀与分裂陰謀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結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論他們如何得势，如何兴高彩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們的命运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

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結起来，坚持抗战与团結，把投降陰謀与分裂陰謀鎮压下去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抄自《解放》杂志第75、76期“七七”紀念特輯

反投降提綱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会議上的报告結論提綱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經成为最大的危險，而其反共活动則是投降的步驟，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險，則是目前政局中的現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以統一战綫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投降的步驟，則是目前的实际。

甲、日本誘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針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謂：“东亚新秩序”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聞》（軍部机关报）的社論說：

"眼前現实的課題，已不容尺寸言迟，瞬間躊躇。事变入予水拾羽，万一国步冗刹有欺騙疏漏，則不但将夫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爭的后期之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有过教訓，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平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須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識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来說，就是：基本方針非貫彻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而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經长期战爭而用英美压力恢复芦沟桥以前状态（蔣介石，国民党許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針（总路綫）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針的方法，（或策略）是軟硬兼施的，有伸縮性的，并可做出某些暫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到基本目的。

大体上，芦沟桥以前，政治誘降为主，芦沟桥至武汉，軍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現在，以政治誘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針的坚定不变，而其施行策略的軟硬兼施，只要看到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A、芦沟桥前，規定硬的方針，并实行占領东三省，对全中国則采取外交誘降政策。

1．滿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六年（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承致宮內大臣一本喜法，請代奏明治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規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針。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領滿洲。

3．一九三四年四·一七的天羽声明"天羽所代表的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日本負責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明其灭华方針。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的广田原則"广田在議会正式公布三条原則"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認滿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金孝良的秘密之呈：結論六条，均表示实行方法之軟硬兼施。

B、芦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針，采取坚决的軍事进攻方法为主，輔以政治誘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首相广田宣布不扩张主义。我党"公开决定，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則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陆相杉山在特别会議的战爭演說："断然决定，惩，陆軍当局已采取重要措施"。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一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这些条件提蔣介石，內容六条：一、內蒙古独立；二、华北自治；三、上海占領地做为日本租界；四、山海关到安南公海的捕魚权；五、中国退出国联；六、不得設空軍"。（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解放日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領南京后，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艦艇司令长谷川发表談話："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滿足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軍人签本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之目的"。表示要継續軍事进攻。

10. 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的演說："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重要观点，則能免除日之苦痛，日本政府深虑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問題"。表示方法可以用軟的，只要降。

11. 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領前二日）商議决定，十二日通过御前会議，十三日占領南京，十七日蔣委員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謂："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領土，主权与外国在华利益。"表示方針是硬的，方×也是硬的。

12.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日駐华大使川樾对記者发表談話，謂："奉令回国，参贊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商談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人員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之門戶已經关閉，即使国民政府之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組織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輔，打倒蔣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談話最露骨。

13. 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議会中宣布德国調解的和平条件四条：一、放弃联共抗日，承認滿洲。二、在若干地带成立作战區，在此區內設立管理机构。三、中、日、滿經济合作。四、中国賠款。此外求低議和条件，即陶德曼交蔣之条件。蔣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蔣、二陈、何，还有孙、于，都参加討論接受問題）最后蔣拒絕，广田乃在議会宣布。

14. 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議会中。

近卫的开幕演說："战爭之解决，尙須长久时日"。現在政府采取解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說：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見前）。

民政党議員"要求政府保証"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討論講和条件。

議員島田俊雄，質問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一、絕对不与国民党政府交談；二、为阻止軍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对华北新政府居监护人地位；四、絕对不容第三者調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議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观中国表示态度为断。和平之門仍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爭，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須准备长期战爭"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 日本駐沪大使（維新政府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談話謂："蔣介石政府将行崩溃，但須繼續加强战爭，促使蔣介石政府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蔣企图。战爭以久之法，如能使蔣氏議和，則耗費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在談話中主战又主和。

16. 五月二日近卫演說准备长期战爭，为推翻蔣政权，鏟除东亚禍根，虽費数年光明，在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积极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 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軍会議"演說：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蔣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以事于国內之团結，但未能达到团結之目的，他方面，各国軍需品之輸入，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須顧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綫占領之时，临时維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作，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

能合并統一，并完滿鍵全发展。”敌以軍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軟，或硬中带軟（軍部之特务机关）或軟中带硬（外务省）装紅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綫指揮官前发談話謂：“徐州攻陷，战爭并未停止。战爭步驟有三：第一步，卽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六日永口通信大臣发表談話，謂必須打倒蔣介石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蔣政权，援助新政权建設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需照此路綫进行。

20．张高峰事件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过境日烈，有成为大規模战爭之可能”，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字林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載，五条件是：一、日軍退出占領区，但中国也不得駐軍；二、承認滿洲国；三、虹口、閘北、江湾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战爭損失；五、共同防共。（星島日报，二十七年五月八日香港通訊）。

21．坂垣的强硬論“七月一日坂垣发表談話”“在蔣介石政权依然存在之时，日中間定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蔣介石攜手开和平談判。”七月八日事变一周年紀念日，坂垣发表談話：“今后战爭无論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万年之和平。”

22．設立对华院，总攬对华統治大权，总裁，副总裁，五相，不但占領区，而且非占領区，均归其管轄。

23．九月二十九日軍部赶走宇垣，宇垣因对华政策与軍部不合，憤之离职。

C、武汉到現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軟。

24．十月十二日占領广州，二十五日占領武汉，看見蔣介石三十日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紀念日，卽所謂天长节这一日，发表了一个重要发言，明显的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一、国民政府已成为一个地方政府，如継續抗日，則該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軍事行动；二、日本之目的，在于建立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卽华、日、滿提攜，树立政治、經济、文化等項互相連环之关系；三、至于国民政府，只能抛弃从来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的維持，則帝国未不加拒絕”。政策已变，宣布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須建立的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須蔣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卽汪精卫通电拥护，蔣介石演說痛駁之声明，其要点：“一、中、日、滿三国应以建設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結合、相互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中日經济提攜；二、因此，中国必須与滿洲国树立完全的国交关系；三、締結中日防共协定在規定地点駐軍防共，以內蒙为特殊防共地域；四、中日經济提攜，帝国臣民在中国內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內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資源之便利；五、日本允許考虑交还租界，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演說宣言的基本政策，如具体內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蔣介石（允許蔣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內閣継此方針，至今不变。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泛的“和平运动”，設立所謂“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設立統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它偶一提及，无外吓蔣，除非蔣抗战到底，他是留以待蔣的。

28．离开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謀，日本松本貞一做了一篇題为“爭取支那大民族大众問題”的文章，其中說：“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軍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攜，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或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两者，証諸支那之現实，实为对立之矛盾，試观事变以来，經过抗日政府之領导原理虽属誤謬，但蔣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性質，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的支持，現政权所以能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或抗日联合陣綫，以及旧軍人之热烈支持者，即緣于此。今訊一方欲击灭蔣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攜，事实上誠不緣木求魚。蓋欲倒蔣，忽使支那民族拥蔣，要倒蔣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蔣，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維新两政府，倘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則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綱領，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現，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国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現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則以“一面与日提攜，一面建設三民主义为号召，国共合作，乃抗日联合陣綫之基于，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領在国共間插入一个旗子，战略政策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上文見《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他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組織所謂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他在进行更大規模和有国际性的阴謀，这阴謀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誘騙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議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压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說：“訊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以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件材料，說明日本对华誘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証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針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他一定要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謂“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他实行的方法是軟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側重，武汉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迫使投降。

第三，他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議，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头上。

（四）以上三节，第一节指出他的基本方針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他的实行办法軟硬兼施；第三节指出他的基本方針之实行方法由硬到軟的历史发展，証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現在这个第四节从他的財政、經济、軍事方面說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財（三年共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經济（輸入大增，輸出大減，軍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現金用尽，外汇不补）軍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見困难的境地，他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爭，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陣綫，利用汪精卫劝降蔣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他的这个阴謀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怕，和則十分危险，《大公报》曾标为

"縊鬼式之和平"，意为如果这样，中国将无疾而終。

（五）为表示和平之誠意，給国民党看，給英美看，用大力"扫蕩"八路軍（华北十五个师团），現又企图进攻陝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步驟。

以上是日本的誘降政策。

乙、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成为当前最大危險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以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爭所采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們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純的由于他們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們"坐山观虎斗"的陰謀計划，即所謂中立政策，或不干涉政策。

他們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爭，說什么"三个月就可以打敗中国"。他們随即让出上海，使战爭深入內地去打，他們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領广州和海南島。他們大量供給日本以軍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爭。

他們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借給軍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爭。他們要鼓吹"中国胜利"，使中国在消耗战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的目的，在于消耗战爭双方，等到筋疲力竭时，他們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們的話，他們容納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同样是这个目的。

他們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們从旁观战，然后乘其敝而掠夺之。

他們始終不贊成苏联提議的普遍安全計划者在此。

他們不愿保障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者在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爭的片面性（侵略战爭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現实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之間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們是不会放弃其"漁人"的政策的。

莫洛托夫謂："英、美、法有进步，但所謂进步是浮而不实的"。

斯大林謂："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英、法漁人政策并不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以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險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信，可信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步增长，只有这种形势才是最可信的。

苏联声明継續援助中国，决不贊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慕尼黑，現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

他們正在做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正疲怠一点那时就得远东慕尼黑开幕了。

中国投降危險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資产阶級叛变的必然性

A、一九三六年四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經指出：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資产阶級（正确点說，民族資产阶級），由于他政治上、經济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会变节，这一規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經証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制度的資产阶級革命任务，历史現在已經判定不能經过資产阶級的領导，而必須經过无产阶級的領导，才能达到目的”。

B、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說：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暫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天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訓，因此应該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C、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险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政策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还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則沒有什么光明前途。

很明显的，所謂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的前途，是包括了克服了各党內部守旧傾向这种势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統一战綫的守旧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論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

国民党是以資产阶級为骨干的党，是在資产阶級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A、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投日的因素。

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矛盾的方針。

2、决定了防共反共的方針（但不是战爭），設立了“防共委員会”。

B、主和空气籠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題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幕尼黑嗎”？的文章删去了。

許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賴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卽开国际調和会議解决問題。政府中党部中許多人是主和的，軍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C、国民党已在进行眞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卽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主要的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軍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西北共产党沒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則用武力侵入边区許多地方，（鎮原、宁县、栒邑、靖边、瓦窰堡）原因在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則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則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局势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严重斗爭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驟。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資产阶級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則敌人的誘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不同的。那时抗战正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蔣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之駁斥近卫演說，就是証明。現在是在敌人以誘降为主业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借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沒有現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与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現在增加了新的具体任务，这就是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各种的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搗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軍的无鋼。全国执行良好的統一政策，拥蔣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謀，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最大。他沒有阴謀侵略过任何一国。

第三个借口——財政經济困难，这是不对的。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在作这种宣传，这样說不是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滿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作战。

第五个借口——軍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汚蔑抗日軍，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軍兵的厌恶內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日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来不可靠。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杀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許多借口。

二、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計，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努力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和抗战継續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暫时的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們相信，已經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継續地向前与发展。只要眞正組織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抗日战爭的胜利是无疑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見“八月决定”）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个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曲折性，第一个前途，它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个前途，則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們从来也沒有設想过抗战是速胜論，直綫論（一字論），而历来主张长期論与曲綫論（之字論）。从来也沒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

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設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个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国民党全国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爭。但那时的情况是：（1）沒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贊助蔣介石反共，各国暫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沒有吃过反共宣传的苦，能够动員軍队；（4）全国人民沒有尝过反共宣传的味道，沒有受痛苦的教訓，也沒有受欺騙的經驗；（5）共产党沒有統一战綫失敗期間的經驗，又沒有武装力量（都失敗了），主要的沒有战爭經驗；（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爭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沒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沒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馮玉祥，有蔡廷鍇，有赵博生、孟根堂、季振同，有吉鴻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楊虎城，有陈济棠、孙科。

光在今年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伽，有哈柴——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①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②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③有先降后战者（有一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④人民和軍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覚悟反抗。如象“共产党搗乱”“八路軍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財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暫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騙是必然会到来的。

⑤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統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他們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許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其統治。各种武装投降之間可能发生內战——中国是內战最可能（地大、經济分散）与最有經驗的国家。

⑥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分裂。

⑦弗朗哥并沒有收容米亚伽，希特勒也沒有收容哈柴。日本最后只收容汪精卫一类。

⑧滿洲人民与軍队的經驗，如果大家知道了（原文如此）。

中国軍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繳枪不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統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渴，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爭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現，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設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現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的。不能設想，这种政府能够爭取最后胜利，我們一次也沒有希望过，也沒有說过。只有愿意动員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內的政府，才是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經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发現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內的）。

那时，中国政府可能有三种性質的：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間的斗爭，将組成所謂相持阶段的局面，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所謂相持阶段，可能

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能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两种，如前所說：（1）大部抗战，小部投降；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則情况可能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絕望，原因在于：

在国內——

A、有許多軍人拥护抗战。B、国民党中的抗战派。C、共产党的反对投降。D、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

A、苏联的援助；B、西班牙、捷克的教訓；C、欧美人民的輿論。

在日本——

財政、經济、軍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統一战綫才能办到。

如果出現第二种前途，即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正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現在已做，經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国行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現在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眞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現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眞三民主义的眞国民党。

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的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甲）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非破坏日本的阴謀之外，还停止它的軍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乙）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人是要継續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抗战根据地，可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紅軍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內战，今后是对日本，对汉奸，而不是內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継續后退这一点說来，在他是全国唯一的抗日軍这一点說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丙）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把持的陣地分化过来，再爭取大部抗战。那时还不是反攻，則还是相持阶段。

我們力爭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看其前途还有第三种。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絕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見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資产阶級叛变的必然性。还有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游击战"，"可能发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級投降主义的危险。这些我們都預料到了。它的发生

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两种，我們力求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們也有办法。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須經过长期的斗爭与曲折的斗爭，短期的与直綫的胜利是沒有的。我們历来反对速胜論与亡国論，今天仍一样。以为地主資产阶級叛变，就会亡国，这是沒有看到：1、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的存在；2、抗日友軍中的抗日情緒；3、国民党中的抗战派；4、資产阶級中目前不愿投降者；5、淪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資产阶級；6、广大的小資产阶級与农民；7、苏联的援助。不看見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見地主資产阶級投降了，就認为整个世界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的現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說，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除敌以外还加以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經过各种形式的斗爭（包括战爭），抗日的国民党継續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

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們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現仍如此，要力爭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現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們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現，我們就要把他顚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爭。

三、当前的任务

估計到上述好坏两种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1、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組織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輿論，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2、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員（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們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統治区域，必須和他們一道，不是我們单独）去动員群众，开展反投降斗爭，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質，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継續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統一战綫的工作与人員。

3、不論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須坚持这种方針，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下列各問題了解，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針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們的积极团結全国爭取抗战胜利的方針，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的了。我們的統一战綫工作与党的組織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現在投降危险（……）阴謀当前主要危险，故需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現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需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的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針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內容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二）为什麼此时要在思想上組織上准备自己，准备輿論，准备群众问題。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經驗。

那时精神上沒有准备，是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在必須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陣綫，但我們也有太絕对的地方，現在，必須坚持长期的民族陣綫。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敗，党的路綫是退却然后进攻，現在，沒有組織上的退却問題，現在繼續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暫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期时准备进攻的問題（如果投降成为事实的話）。

那时，因为反动势力到来，它又沒有准备，沒有經驗，以致队伍混乱，步驟錯誤（如盲动主义）。現在，則在淪陷区，并准备在投降去占領地（原稿如此——抄者）应該作有秩序的退却（有的暫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且在其他区域則繼續进攻方針。

那时，国际国內的情况是黑暗的，現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尚沒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現在已經造成了。

以上，我做了八条比較，虽然如此，仍需在思想上、組織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輿論，准备群众，以便順利的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爭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敗。

（三）为什麼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陣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問題。

主要理由已在說明抗战前途时說过了，这里只說：

1、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須都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虽然由于叛变，許多地方資产阶級都走开了，并变成了敌人，但地主資产阶級的叛变是逐漸的，不是閃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須与之合作，忽視这一点，势将鑄成大錯。故終抗日过程，統一战綫依然是各党派、各阶級、各民族、各集团、各軍队的統一战綫。

2、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員离开了并成了敌人，但留下来的若干仍然是合作的。我們要用眞国民党对抗假国民党，爭取中間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合作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統一战綫的組織基础。忽視这点，也将鑄成大錯。

3、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統一战綫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則，方針。我們要用眞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爭取中間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中也是有区別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两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綱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內党外許多人輕視三民主义，訊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騙人的与空洞的思想和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沒有把眞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与半三民主义加以区別而来。

4、在思想斗爭問題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內，发表了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眞三民主义的"分歧錯杂的思想"，亦此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該加以严正的批駁。其中以所謂"国情論"与"統一論"之武断的叫喚为最囂张。其实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謂边区与八路軍的不統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謂統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統一，完全违背統一中的差別或統一中的斗爭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話。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沒有改变为眞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軍是必須存在的，只

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現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則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蔣问題

拥护蔣介石委員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現在还是对的，只要蔣領导抗战一天，我們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蔣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蔣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在那时，我們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須适当的姿态，当以有利多数团結抗战，有利国共継續合作为原則，而不能随便的輕率的恢复“反蔣”口号。

蔣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們必須严防他及其部队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蔣与督促蔣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对外不說“国民党投降”，应說“地主資产阶級投降派”。

（五）反汪问題

“認为汪已完事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統較之其他汉奸更大的危害中国，沒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軍队中有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須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題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脫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則。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須的，抗日除奸的战爭（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絕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輕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須）发动除奸战爭。例如現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則的。

（七）民主民生问題

沒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領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給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此切，故“爭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継續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結起来。

“改良民主”的与之联結起来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主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該明白。

（八）摩擦问題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摩擦及武装斗爭，是必須給以坚决抵制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須站在自卫立場与决不能过此限度，給挑衅者以破坏統一战綫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爭的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緩和退讓，也是必要的。

統一不忘斗爭，斗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統一为主，“摩而不裂”。
严防桃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組織及從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組織的问題

半年来經驗，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軍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軍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汉奸的軍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則不应发展。任何軍队只要变了汉奸軍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軍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針。某些抗日軍队中已有党的組織問題发生了有碍合作的問題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継續。

（十）援助友党问題

1、极力拥护那些进步分子，但也应依程度不同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2、拒絕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后对我反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許多教訓，一句話，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3、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們反对投降，必須要有很多有能力干部去工作，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間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漸恢复与建立了中央各个工作部門，除軍委会、組織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設工作較久外，統战部、妇委、工委、財政經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員会、华北华中委員会、西北委員会、南方委員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組織，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門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破坏后的一大成績，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組織问題

1、政治局会議以后每月一次。
2、书記处处理日常事件。
3、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記处。
4、人員分配，以保証中央領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党委为原則。
5、中央各部既紧縮又加强。

（十三）干部教育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的抗大、陝公、党校、馬列学院、魯艺、青訓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訊学校、組織部訓練班、行政人員訓練班、边区党校、魯迅师范、边区中学、魯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干部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績，十八年未有过的現象。这些学生現在还不能看出他們大的工作成績，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見了。今后仍应継續这个方針，……地办。去华北的指揮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

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1、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

2、党政軍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3、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論或幷重或偏重。

4、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5、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6、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7、自动与强制幷重，理論与学习一致。

8、勤学者奖，怠惰者罰。

9、各級机关学校部队均設干部教育領导的机关与人員。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須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認眞进行了的。須繼續总結經驗，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績，青委和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針：坚持青年統一战綫，繼續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爭取青年的多数，在繼續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針，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漸建立中。我們历来最缺乏的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經驗亦沒有总結，这个缺点必須补救。沒有一批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展开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了工运工作方針，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該在这方面有进步。

（十九）鋤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軍与边区政府的陰謀，已逐漸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鋤奸工作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須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須派出与訓練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个部門中去。

凡国民党員，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虏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則（不降为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放弃自己的信仰），以爭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組織问題

1、組織——現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則。
2、严密。
3、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4、阶級教育，馬列主义。
5、严格执行秘密訓令。

（二十一）自力更生

党、軍队，一切。准备对付最恶劣的环境。

（二十二）華北问題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可能，因此，八路軍与华北党必須严格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軍事、政治、財政，党的組織，統一战綫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应付最困难为原則。

（二十三）華中问題

必須大大发展华中的党与游击战爭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抗战的枢紐地带。必須有更好的統一战綫工作，并与新四軍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輸送华中为原則。

（二十四）保卫边区

1、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須坚决保卫之；
2、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驟；
3、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4、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爭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5、吃飯是第一个問題，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6、学生与工作人員大批上前綫；
7、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員；
8、保存一个領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軍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員大批学生与工作人員上前线

1、加强教育，加强前綫工作；
2、毕业后依然上前綫，早上前綫为强；

3、因为敌情；
4、因为經費；
5、决定去一万人；
6、政治上，組織上好好动員；
7、后方便于領导教育，与打游击战爭，但人員还是不少；
8、干部須作适当的分配；
9、学生必須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10、学校名义必須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

1、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2、十月开会；
3、为团結全党反对投降而斗爭；
4、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路线斗爭

1、反对右的。不看見投降与反共危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对时局无出路（失去前途），沒有阶級立場，在艰苦斗爭面前恐惧消沉。

2、反对"左"的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准备破坏統一战綫，否認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3、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領广大新党員，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陣地攻击。

（二十八）团結战胜一切

1、必須更加团結。
只要中央与高級干部是团結，全党必能团結。
只要共产党团結，必能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2、必須更加集中：
減少不必要的民主。
个人服从組織，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
3、全党团結一致，集中指揮，战胜一切。

結　論

（六月三十日）

1、时局问題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資产阶級的动搖是主要的，这是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投降——（A）克服小部投降。（B）克服大部投降。A是目前的，是

大部抗战之下的；B是将来的，是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統一不可分。

（三）按着六中全会的决議，敌我力量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么，不但現在不能說相持阶段，如出現李精卫，則是敌人已組成了（他正在努力組織）他的战略預备軍，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陣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軍，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敗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又加李精卫（中国弗朗哥），故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亦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組織两支同盟軍，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內部，我們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員国际的国內的反投降势力，打敗这二支敌人的同盟軍。在沒有打退之前，沒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軍事攻击，說已經沒有这种可能性了，是不对的。它在財政經济人力軍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說，依时間說，都还有軍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須要打仗，从側面进攻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継續打敗从正面进攻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說，要把这些正面的側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軍相等了，才能出現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加敌人弱点加国际控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現：

1、地域大，人数多，陣綫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象国內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現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陣綫不固（政治腐敗，投降者搗乱），故还沒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險，并在这种克服中改进政治，陣綫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地域小（謂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陣綫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紅軍战爭，某种程度来說，一个时期內的东北。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不同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說是暫时的小局部的相持，把华北形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局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到大部相持，經过統一战綫的扩大与反围剿斗爭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略反攻期間），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現的話，那么抗战的过程也許就要以下述公式組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暫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說是相持），但因陣綫不固，故只能是暫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种点，就是由陣綫不巩固到陣綫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陣綫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爭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質量之强。所謂陣綫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和統一战綫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不是暫时的，我們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爭”是想把暫时的变为长期的。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軍、陝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沒有别的抗日軍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軍，也就取得了战略

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們也应准备。大半天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們也要干下去。这样干三年五年，喚醒人民，吸收友軍，又逐漸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陣綫，我們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領导力量。

所以不論如何說，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組的时候，看誰爭取多数，更看誰的質量較好，以决胜負誰属。誰胜誰敗，这个問題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陣綫必然会改組，也必然要改組的。我之同盟軍的一部（地主資产阶級一部）改变为敌人的同盟軍，但我决不让其全調去，我必須爭取其一部，也可能爭取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軍沒有动員，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級、苏联的力量，动員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人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質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誰属。但指揮战爭的策略，尤其决定胜利之誰属。沒有后者，单靠本質优良，胜利仍然沒有的。

2、轉变问題

（一）我們說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伽，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綫之下的，在六中全会路綫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伽（或哈柴），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伽占領地区采取暫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設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不是路綫的轉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暫时的轉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們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綫。

（二）目前要极力爭取的，用党的全力去爭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爭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評国民党与蔣，使之能够从反汪斗爭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該强調团結，强調統一，强調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調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調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能强調这些才能更好的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能孤立投降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3、幾个策略问題

（一）巩固党問題（組織上的紧縮政策）。去年三月会議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現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須暫时的一般的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保护新党員新干部。主要責任在老党員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員新老干部之間一定要弄好，如弄得不好，老党員老干部負其主責。有完全的理由給新党員新干部以原諒，而对老党員老干部則完全沒有这种理由。此問題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員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加紧党內教育。阶級教育与民族教育統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級教育同时不忽略統一战綫教育。

要編中級課本，哲学問題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沒有地方干部——中級的、高級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欽差大臣”的傾向，反对輕視“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口号。

（五）党应保护革命知識分子不蹈过去的复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胜利的。国民党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农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軍，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識分子。

（六）友党友軍中停止发展党幷撤退党問題。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利的，否則将因此大事妨碍大局，破裂統一战綫。不爭取中国軍队革命不能胜利，而爭取，目前的是从政治上，若組織党則妨碍政治爭取。靠嘴巴不靠組織（暫时情况下），靠上层不靠下层。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絡，同意統一战綫工作的某种独立性。一般只在眞投降者的軍队中，政治党中取組織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爭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門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員，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以下缺稿）

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講話

同志們！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論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綫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組織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沒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覚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須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員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員起来了，这是沒有問題的。

女大現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維持下去，要維持下去，就要經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們办女大，有些人不贊成，首先就是那些“頑固分子”。他們不贊成，他們設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其次，还須要与輕視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爭，因为他們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視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現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員同志們，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們党应該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最后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結束。

（《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軍委关于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节选）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抗大以致一切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軍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針，应当如下：

（一）把知識青年訓練成为无产阶級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为八路軍的干部，

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們应努力轉变他們的思想，注意于領导他們思想轉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組織学生中的思想上的爭論与辯論，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資产阶級思想与无产阶級思想的斗爭。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轉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課目不宜太多，阶級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須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統一战綫的学校，而是党領导下的八路軍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

1、教育他們掌握馬列主义，克服資产阶級及小資产阶級的思想意識；

2、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对組織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教育他們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輕視实际經驗；

4、教育他們接近工农，决心为他們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識。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

我們很高兴，因为同志們非常热烈的在这里开会，同志們开会的目的沒有問你們，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了，在我們中国开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防止中国独立自由的会，是汉奸他們开的，頑固分子开的。另一种是要求中国独立自由的会，共产党的会也好，抗日分子开的也好，都是要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沒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能够的。亡国好还是不亡国好。我們說不要亡国好，但是要民主，沒有民主一定要亡国，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民主就是走路的自由权，有了这一条就够了，有了这一条我們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反对法西斯，反对汉奸托派，所以这两个字一定要。

孙中山有一个主义，叫民权主义，現在有些人不記得了，他偏偏說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信徒还不够，还是忠实的信徒，……

（《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八日）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講演提綱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講演）

一、战爭的新阶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早已开始了，已經打了好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它首先占領了东三省，然后又于一九三七年大規模侵略中国。意大利帝国主义則于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亚。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联合侵略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德国占領奥捷两国，在这一时期中，东方与西方，共有五万万以上人口卷入了战爭，而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却沒有参加。因此，我們称这一时期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的第一阶段。而从現在开始，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爭的現在开始，則称之为第二阶段，因为情况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过去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它还沒有世界規模，那么現在就不同了，現在

还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

二、战争的原因：

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說，在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間的战爭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爭結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功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爭。这个新的战爭的开始阶段，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經济危机之上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經济危机过去之后，接着的不是繁荣而是物种的蕭条。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認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贓过少的国家，如象日本与意大利，或者認为自己在上次战爭中是損失了贓物的国家，如象德国，就全副武装跑上了战爭的舞台，企图用战爭来摆脫經济危机，避免資本主义崩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就是这样开始爆发的，并形成了它的第一阶段。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的第二阶段，德英法波等国发动了大規模战爭，世界資本主义各国均将直接間接的卷入战爭，这是建立于新的經济危机之上的。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新的世界經济危机，这几年来是浸淫于英法美这些所謂“和平”国家之內的，并且正向德日意发展。在經济危机之上，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人民不滿意，資本主义与資产阶級专政，不論在早已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或現在介乎的战爭的实行法西斯化的国家，这种政治危机，这种人民不滿，却日益尖銳化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又强大到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就認为除了扩大战爭，除了把片面性的战爭扩大为全面性的战爭，除了打坏它們的帝国主义朋友，不能逃脫經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

所有这一切，就是世界各国資产阶級在它临死前夜的打算。至于这种打算——用重分世界的战爭来逃脫經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一定要加速自己死亡的日子，它們就不能設想了。它們象疯狗一样，已經疯了，被資本主义制度把它們弄得完全疯了。它們就不得不向它們的敌人，向世界的壁墻，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資产阶級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爭。

三、战爭的目的：

战爭是政治的継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爭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継續其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爭的唯一的政治目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爭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說，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爭夺对世界人民的統治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的这种目的，过去阶段与現在阶段，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种目的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沒有呢？还有什么善良的目的沒有呢？一点也沒有。不論是德日意，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参加战爭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希特勒的“民族自决”，张伯伦的“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的“援助波兰”，其实都是“掠夺”二字。不过为了說的好听起見，为了欺騙人民起見，命令

他們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詞罢了。

四、战争的性質：

战爭的性质是根据于战爭的目的而定的。一切战爭分为两类：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战爭分为：（1）正义的，非掠夺的謀解放的战爭；（2）非正义的掠夺的战爭。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爭一样，是属于第二类性質的战爭。因为这两次战爭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絲毫也沒有其他的目的，絲毫也不利于其本国与他国的人民。这就是战爭的掠夺性，非正义性与帝国主义性。現在战爭的双方，为了欺騙人民，为了动員輿論，都不顧羞恥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其实，这只是一种滑稽，一种欺騙，只有民族解放战爭与人民解放战爭，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爭而战的战爭，才是正义的战爭。这一次，許多人又弄糊涂了，他們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則是民族自卫战爭，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行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見解，这种糊涂是由于沒有弄清战爭的目的而来的，也由于沒有弄清战爭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来。

五、战爭第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于：（1）就帝国主义各国之間的关系来說，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举行了疯狂的侵略战爭，侵犯各弱小民族的利益，侵犯各民主国的利益，并在各民主国內部，策动法西斯威胁，于是全世界人民都有反抗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謂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战爭，并允許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苏联則屢次提議愿意与各个所謂民主国家建立反侵略統一战綫。如果这些所謂民主国家在当时出来干涉侵略者，如果在当时发生了干涉侵略者的战爭，例如能与苏联一道援助西班牙政府軍制止德意的侵略，援助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那么这种行动，这种战爭，就是正义的，就有进步性，可是，这些所謂的民主国家，都并不出来干涉，他們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他們的目的，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爭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漁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奧捷两国奉給德国，这是作为交換条件，就是說，作为交換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敗俱伤，然后他們就好独霸世界。由于他們的这种“不干涉”政策，在战爭中就表現为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打仗，而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却“坐山观虎斗”，表現为战斗的片面性，不普遍性，不干涉性。民族国家的資产阶級政府的反革命的“不干涉”政策，沒有能够被人民力量的逼迫而废除掉，因而出現了这种片面性，这就是战爭第一阶段第一个特点。（2）但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德意日帝国主义举行了非正义的掠夺的战爭，而所謂民主国家却纵容这种战爭，这一种情况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还有民族解放战爭，这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爭，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德意战爭，与伟大的中国抗日战爭，全世界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眞誠地援助了这种战爭。这后一种战爭，乃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謀解放战爭，这就是战爭第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帝国主义战爭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爭的存在——这就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第一阶段的两个特点。

六、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爭第一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革命政策，毫无疑义的，是組織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統一战綫，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組織各民主国家內人民群众的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爭，以保卫民主；同时还不放弃組織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之間制止侵略进一部发展的斗爭。在这最后的一点上，在組織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間的反侵略統一战綫这一点上，就是在慕尼黑之后，由于西班牙失敗与捷克灭亡所引起的，在英法两国內部广大人民中甚至資产阶級左派中的憤怒情緒，还有逼迫张伯伦达拉第政府放弃不干涉政策而与苏联締結反侵略統一战綫之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沒有完全丧失。总之，这一时期內，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組織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統一战綫內，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內部法西斯的袭击。因此，在当时这个統一战綫，有下列四个可能的組織成分：（甲）在資本主义国家內是人民統一战綫，无产阶級与小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內是民族統一战綫，无产阶級到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丙）社会主义的苏联；（丁）各个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及其政府。这第四个組織部分，在当时之所以还有可能性，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及其所謂民主政府，同他們本国人民之間，同他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間，同苏联之間，在各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之下，在各国內部法西斯势力威胁之下，以及存在着的反苏危险之下，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这些成分中的主要的力量是苏联，如同苏联同各个所謂民主国政府能够組成眞正有效的統一战綫，配合着各国的人民統一战綫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統一战綫，是能够制止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延緩大战爆发的日子；如果发生战爭，是能够战胜各个法西斯国家的，如果这样做，那是眞正有利于世界人民，有益于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国，而为国际无产阶級所贊助的，因此，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締結了苏德苏捷两个互助条約，最后还进行了英法苏三国的談判，这种革命政策，是适合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是只能这样做而不能有其他做法的。

七、英法苏談判的破裂与战爭第二阶段的开始：

所謂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他們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略他們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他們怕苏联，怕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怕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們拒絕了苏联参加在內的眞正反侵略的統一战綫与眞正反侵略的战爭而自己单独組成了反革命的統一战綫，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盜战爭。

英法苏談判从四月十五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經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終不贊成平等互惠的原則，只要求苏联保証他們的安全，而他們确不保証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証小波罗的海諸国，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軍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議的这样一种絲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条約，苏联当然不愿意訂，而苏联愿意訂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則，而眞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眞正有益于世界和平，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訂。这就是英法苏談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間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場，他愿意实际放弃所謂“防共协定”，承認了苏联的边疆不可侵略，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約就訂立了。

英法在与苏联談判中的毫无誠意，毫无眞正制止侵略的誠意，决心破裂三国談判，不是証明别的，只是証明张伯伦决心作战了，所以大战的爆发，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张伯伦要打的，因为如果眞要避免战爭，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資产阶級的代表，也是懂得的。可是一些傻子至今不懂得，还以为张伯伦的作战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不懂得张伯伦之所以参加三国談判，仅仅是为了便于动員輿論，便于向民众說：我們英法政府是仁至义尽了，三国联合既不成功，就只好向德国开火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初旬，德国与英法波三国之間的战爭就爆发了，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的新阶段——第二阶段。

八、战爭第二阶段的特点：

在現时，在大战爆发之后，情况已經根本改变了，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經失去了意义，在現时，按照性質来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爭之諸国家，以及实际贊助这种战爭的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爭与人民解放战爭，以及援助这种战爭的国家，这是第二类。現在应从新的情况做新的划分，抛弃过去的那种划法，因为情况已經变化了，各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已經最后地拒絕与人民妥协，拒絕与苏联妥协，并且举行了掠夺战爭了。現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經轉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經是张伯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共产党員应該懂得，爭取所謂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反战爭反侵略的統一战綫。現在是少了一个所謂民主国家的資产阶級，这一成分之由动摇而最后轉到敌人营垒，变成帝国主义战爭的两个营垒中的一个营垒，乃是一个大变化。因而新的統一战綫之可能的組織成分，就由四个变成了三个了。这种变化，第一，就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爭由片面变为全面；（由反动的片面变为反动的全面）第二，就使新的反战爭反侵略的統一战綫之組織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純了——这就是战爭第二阶段的两个特点。

許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变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遺弃了新事变中有包藏的性質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覚的陷入了完全錯誤的境地，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境地。我希望犯了这种錯誤的同志很快的改变过来，我也相信，只要一經提醒，就能改变过来。

九、我们在战爭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爭第二阶段的特点，无产阶級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应該是怎样呢？

我以为是下面这样的：

（甲）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国主义战爭，揭穿这种战爭的帝国主义性質，不管是战爭的甲方或乙方，把他們看作一样的强盜，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强盜魁首，喚醒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强盜的当，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爭为革命的国内战爭，建立反帝国主义战爭的人民統一战綫。

在各个交战国内，如果有共产党議員的地方，都要对于战爭預算投反对票，好象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德国无产阶級的領袖李卜克內西同志在德国議会中所做的英勇堅定的斗爭

那样，而决不应該投票拥护战爭，决不应該使自己的面目，同社会民主党混同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內的社会民主党，正在蹈袭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的覆轍，在所謂“保卫祖国”（資产阶級强盜集团的祖国）的口号之下，无恥的拥护战爭。日本社会民主党，卽所謂社会大众党，早已叛变了无产阶級，拥护了日本軍閥的侵略战爭，英法社会民主党，現在又正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誘之下，叛卖英法无产阶級，拥护英法帝国主义的强盜战爭。波兰社会民主党則拥护被张伯伦收买的走狗——波兰資产阶級反动政府，叛卖波兰的民族利益。在波兰，毫无疑义，是应当动員全民并联合苏联抵抗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保卫波兰与解放波兰民族而战。但是波兰法西斯政府則压制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拒絕了苏联援助，甘愿带領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財政資本的炮灰，甘愿把波兰变成国际財政資本反动战綫的一个組織部分。沒有問題，我們同情波兰人民，但我們决不同情波兰反动政府，波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这样的政府，同样是不能容許的，因此，不論在德日意，不論在英法波，凡属交战国內共产党只有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叛卖性，才能爭取群众，組織革命統一战綫，准备用革命战爭打倒反革命战爭。

（乙）在各中立国內，好象在美国，共产党員应該在人民面前，揭穿資产阶級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說，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贊助战爭，并图在战爭中大发其洋財的那种政策，美国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爭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之下，已經发了一笔洋財，現在他又想在新的战爭中大发其洋財。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談話中，还以为美国資产阶級暫时还不至于在国內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經济生活，那知他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內，宣布了所謂“局部紧急状态”，这样一来，他已經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的走向反动化与战爭化了。共产党必須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爭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爭趋于不至无限制的扩大。

（丙）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則是民族統一战綫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国），或不反对宗主国（如在印度），用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要反对这些国內的民族叛徒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才能发展統一战綫，才能战胜敌人。在各交战国的殖民地內，必須反对民族叛徒們拥护宗主国战爭的叛卖行动，反对动員殖民地人民参加宗主国的战綫，要把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爭的痛苦經驗告訴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如果不反对民族叛变，民族解放运动是沒有希望的。

十、战爭的前途：

这次战爭是持久的战爭。我們贊同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演說，他說：“現在的战爭，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綿延不絕的，消耗的战爭。”他又說：“无疑問的、在必不可避免的总的軍事冲突中，要来一个破天荒的与你死我活的关头。”他的估計是很对的。这种持久性，是包括帝国主义战爭与反帝国主义战爭，包括反革命战爭与革命战爭，包括战爭的繼續与暫时的局部的停頓，包括参战陣綫的改組变化，参战国家的灭亡与兴建种种情况在內的，这样种种錯綜复杂曲折变化的情况，就組成了战爭的持久性。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災难，死亡、疾病、飢餓、失业、失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悲慘現象将充滿于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义的，将激起所有各資本主义

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覚醒起来团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爭，組織革命战爭，其規模将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要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俄国外，各国都沒有共产党。現在已經不同了，共产党已經在几十个国家中分布着，并且在政治上組織上强健起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沒有社会主义国家，現在已經不同了，苏联不但存在，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爭，而坚决援助人民解放战爭与民族解放战爭的，他将在这个战爭中起其維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現在世界上已經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接間接参加帝国主义战爭的資产阶級都是反动派，組織反动营垒，現在的帝国主义战爭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間的战爭。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个大反动派的冲突，并不妨碍他們将来会联起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革命，如果以为他們会永远打下去，很容易的就被革命人民推翻，那是幼稚的見解。这是一方面——世界反动战綫方面。另一方面，則有苏联有各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这些，組成革命的战爭，革命的营垒，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爭打倒帝国主义战爭，打倒战爭禍首，推翻資产阶級，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資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爭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斗爭过程，艰难的持久作战的过程，教育人民，喚醒人民，并領导人民向資产阶級战斗的过程。資本主义經济已經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經到来了。現在的时代就是战爭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們是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进行了两年抗战的中华民族，是属于世界革命营垒中的一个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有机組成部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战爭，一定会在世界改造过程中起其伟大的作用。帝国主义战爭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但是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全世界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在与发展，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都是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援助者。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該組成坚固的統一战綫，这是革命的統一战綫，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統一战綫。帝国主义之間的战爭，帝国主义之間的互相削弱，在这一点上說来对于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苏联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有力的条件。这样說来，世界的黑暗是暫时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一定会死灭下去，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沒有疑义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国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們的敌人也是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新中华报》1939年9月19日）

研究淪陷区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中国淪陷区問題，是日本帝国主义生死問題。在目前阶段內，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內，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軍事进攻，大規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內），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經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經轉到政治进攻与經济进攻两方面。所謂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統一战綫，制造国共磨擦，引誘中国投降。所謂經济进攻，就是經营中国淪陷区，发展淪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經济。

为达其經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爭的“扫蕩战爭”，需要建立統一的伪政府，需要消灭我淪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淪陷区問題，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的問題。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領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淪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領地，为了消灭全中国，他就用經营淪陷区来准备条件。我們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淪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的支持游击战爭，改革国內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計划，实現我們計划的两个大政方針。

在这种情况下，淪陷区問題研究是刻不容緩了。在这个問題上，有敌人的一方面与我們的一方面。在我們的一方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爭的問題，研究这个問題，不待說，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方面，是敌人在淪陷区已經干了些什么并将怎样干，研究这个問題，乃是研究前一問題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况，我們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說起的。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問題，延安組織了一个“时事問題研究会”，同志們除了研究討論外，还着手編輯“时事問題丛书”。分为日本問題、淪陷区問題、国际問題、抗战的中国問題这样四个問題来研究。分别蒐集材料，用綜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間出版的“战爭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問題丛书的第一集。現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淪陷区　簡称“日本在淪陷区”），則作为研究淪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問題丛书第二集。其余两个問題，亦将継續出版。

这些系統的研究問題，并为一切抗战干部們供給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这种作风，是应該废弃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或者說：“研究时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論的起碼的一点，并不是什么“狹隘經驗論”。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問題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問題是沒有解决的。要解决問題就需要研究，需要从材料中引出結論，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沒有解决的。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天开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誕辰。“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間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們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而且这样的庆祝不仅在延安，而且在全国，而且在

全世界只要晓得他今天生日的人，只要懂得他为人的，只要是受压迫的，都会庆祝他，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哪些人是反对庆祝他，而不希望庆祝他的呢？那就是自己不受压迫单单压迫他人的人，首先是帝国主义。

同志們，一个外国人，相隔万余里，大家庆祝他的生日，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呢？

这就是他領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領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領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

現在世界正分为两条斗爭陣綫。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民的陣綫。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陣綫。有的覚得好象是站在中間，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陣营的一面。中国的頑固分了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一只手反共，一只手抗日，自称是中間派，但他們終究不成功的，如果不悔过，最后必要走向反革命方面去。革命与反革命陣綫，都要有个做主的，都要有个指揮官。反革命陣綫的指揮官是誰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陣綫的指揮官是誰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导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全人类中間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們知道馬克思是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沒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現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上的事就好办了。革命指揮官干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讀，而要这样，就要領导十几万万人向压迫者作斗爭，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这样，那么，一切被压迫的人們，要不要庆祝他呢？我想是要的，是应該的，我們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我們要学习他的两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

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緒，归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說压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級从斗爭中得来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揮了这个道理，他发揮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陣綫，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論。

事业方面是把道理見之于实际。关于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沒有完成。斯大林把他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两个五年計划之前，各个資产阶級的报紙，天天說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但是今天怎样呢？把张伯伦的口封住了。他把中国那些頑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們也都承認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們的抗日战爭外，他还給了我們事业上即物質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了我們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員，各战区的軍事顧問，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們？世界上还有哪一个阶級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所領导的国家，这样地帮助我們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級，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誰呢？

現在有些人，他們自称是我們的朋友，但是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都是口蜜腹剑，张伯伦就是現在的李林甫，各

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駐軍权、領导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废除了呢？只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論上指导世界革命，現在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

我們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之后，还应該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講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們中国的好朋友。

毛泽东

（原載《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延安紀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的講話（节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爭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課，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輿論，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員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員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說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紅軍北上抗日两件事情的結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他們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們要求停止內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震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紀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現在已經懂得了很多道理，他們認識清楚，他們要进步，他們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改革的眞正实現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現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門倒退的人，他們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現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爭，这叫做压迫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們不准倒退，他們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說明知識分子要与共产党結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要与革命的武装队伍結合，要与八路軍、新四軍結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識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識分子。現在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沒有自由，沒有走路之权，知識分子一定要与革命軍队結合起来，笔与枪結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吳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詞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吳老祝寿，想在我在两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說过，我們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記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們是会欺負青年人的，青年人誰沒点錯誤呢？但是你，錯不得，他們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沒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現在世界改变了，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象我們的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都是很受青年們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轉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負青年人，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們的行为是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敬爱他們。党外也有許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們共产党还打了賀电去，因为他是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貴呢？如果老就可貴，那么可貴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們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說可貴的是他一輩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沒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貫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間顚沛流离終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經不多了，而終为革命奋斗，无論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沒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飢餓的威胁，革命失敗的威胁，等等。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經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們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摘自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

在陝甘宁边区第二屆农工展覽会开幕典礼上的講話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

同志們：

这个农展会，我还沒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說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員努力的結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結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則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覽，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作出許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

来的，我們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覽会就有进步。我們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們，因为他們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軍，但八路軍也就是老百姓，故軍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許多八路軍同志，你們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罵人。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却不能罵他們，因为他們是主人，因为我們的飯是他們作的，房子是他們作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两条規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軍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結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們边区有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磨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們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們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們講一講，我們要吃团結飯，不要吃磨擦飯，吃了磨擦飯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們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許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們大家要吃团結飯，不要吃磨擦飯。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窩子磨擦。

強調团結与进步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紙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沒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报館諸同志的努力，亦是一个重要条件，沒有他們的积极性、創造性，要办好，亦是不可能的，但“好”是沒有止境的。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这个报紙进一步的好起来。

抗战，团結，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紀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針。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針，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强調抗战而不强調团結与进步，那末，这样所謂“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結与进步綱領的抗战，虽然現时还是抗战，但終有一日要把抗战改为投降，或者使抗日归于失敗，我們共产党認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綫中的汉奸与投降派，为了团結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內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陣綫后面进攻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前綫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軍的后方陝甘宁边区，反对否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綱領束之高閣，反对不实行总理遺囑上喚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論出版自由取消干凈，反对把党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軍，消灭牺盟，慘杀进步人員，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成榆公路隴海鉄路一带拦路刼人，反对討九个小老婆与发一万万国难財的无耻勾当，反对貪官污吏之横行与土豪劣紳之猖獗。不这样做，沒有团結与进步，所謂抗战的只是空喚，抗日胜利是沒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我們了解是强調团結与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烏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于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紀念之时，书此致其希望之忱并望全国同胞共勉之。

（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

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

第四节　共产党的十大任务

（一九四〇年二月）

我們要坚决反对頑固派，我們要坚决团結进步派，我們要用这样的政策去达到爭取时局好轉，打胜日本强　的总目的。为了这个，我們要作許多工作，不久几天，共产党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了爭取时局好轉的十个任务，那十大任务呢？我現在向同志們宣讀一下共产党中央的决議案。

为了力爭时局的好轉，克服逆流危險，必須强調抗战、团結、进步，三者不可缺一，並在这个基础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

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分裂投降的陰謀，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說明与具体地証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驟。

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軍、民、学各方面的統一战綫，組織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

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进攻，均須在自卫的原則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坚决反抗之，否則任其猖獗，統一战綫就会破裂，抗日战爭就要失敗。

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結一切抗日的知識分子，并使知識分子与抗日的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爭相結合，否則就沒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頑固派。

第六便要認眞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善工人生活，給民众以經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則是不可能的。

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設完全民选的沒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資产阶級的政权，而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級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陰謀，必須加以坚决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須加以肅清。

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軍队，沒有这种軍队，中国就会亡国。

第九便要广泛抗日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軍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論水平，沒有抗日文化战綫上的斗爭以与总的抗日斗爭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

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組織，在无党或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組織，沒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問題。

如果能解决的并具体正确的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爭取时局好轉，避免时局逆轉。击破大資产阶級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統一战綫的陰謀。

同志們，这就是共产党中央最近决定的十大任务，你覚得这十大任务好不好呢？这是对

症下药的十大任务。这是起死回生的十大任务，但是做起来不能单是共产党来做，还要全国人民来做。当然这个十大任务，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喜欢的，汪精卫是不喜欢的；反共派、顽固派是不喜欢的。他們不喜欢是应該的，我們沒有必要让他們的喜欢，他們不喜欢也就罢了，我們今天开大会，我們要向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叫出我們的吼声，我們要挽救危难中的祖国，我們要創造一个新中国我們要赶跑日本帝国主义，我們要打倒汪精卫，我們要打倒那批反共"英雄"，我們要高呼下列口号：

拥护抗战到底的政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全国人民团結起来，拥护蔣委員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中央，
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府，
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統一战綫的阴謀，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
加紧全国的团結，消灭內部磨擦，
革新內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
开展党禁，允許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自由权，
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善工人生活，
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与顽固派的阴謀破坏，
拥护抗日有功的軍队，充分接济前綫，
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締汉奸言論，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贊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贊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訊为中国历来就沒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飯，要吃飯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漸发达。不过过去沒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們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們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漸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覽可以表現出来，所以边区現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边区經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屆年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現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績。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論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动仍然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論研究。現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許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須承認現在我們的理論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論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負起克服这种現象的責任。我們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边区中央局經济自給动員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同志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經不行了，必須以細密的組織工作来代替，經济建設的任务就是适应現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接着他說要細心地待人接物，仔細地認識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們，团結他們，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們今天进行的經济建設，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謹　防　扒　手（社論）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自从晉南战局紧张，全国軍民，固无不枨礪奋发，若干幻想日寇侵华战爭可以照原狀不了了之的人們，也頗有如梦初醒模样。忧时之士，群以为中国的抗战大业或者会由此一变已往长时期的龟步，而得到迅速的开展了。

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还不容許我們立刻如此乐观。在我們的面前还存在着一大串問題，要求我們严重的警戒和密切的注視。其中尤其耐人寻味的，就是：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換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謀已經最后放弃了么？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新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里，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緩靖”乐曲在旧調重弹呢？不估計到这些問題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

如同×××所說，英美对于中国，一向就缺乏援助的誠意。英国对日妥协的危机，就是

平素与英国来往还最密切的人物現在也不能不承認了，但是美国这位朋友的眞面目，可惜許多人还是茫然。特别是在三国同盟以后，美国援华似乎起劲了些，虽然这种援助較之中国的需要是杯水車薪，較之苏联則望尘莫及，而朝野亲美援美之声，却頗已洋洋盈耳。这些先生們的眼睛自然是看到了他們所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是却决沒有看尽了他們所应該看到的。美国对日本取消鋅与橡皮的輸出限制，在美国影响下的荷印与日本締結煤油协定，日本国內英美派的暗中活跃，在在表示美日当局双方的激烈詞令，只是詞令，"政策"还是政策。如果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实际大于其对中国的支持，則美国的援华姿态誰敢断定不是和日本的南进姿态一样，只是覓寻美日妥协的一种必要的手腕？誰敢断定，在远东慕尼黑阴謀的死灰再燃时，我們的全国拜物教的教徒們能逃脫乘死狗烹的悲剧？

美联社十一日透露的中国当局关于日本也欲和平必須經由美国提出条件的声明，以及苏联报紙十八日所揭发的日本正在"径由美国"調解中日战爭的消息，十九日松岡招待美駐日大使格魯于私邸，日情报局发言人并称格魯极为仁爱，不幸証实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我們相信，已經英勇抗战了四年，拥有如此强大的抗日人民，抗日政党和抗日軍队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出卖，不允許被出卖的，中华民族任何有骨气有自尊心的領导人物，即令在美日妥协实現时，也是不甘心做汪精卫第二，躬蹈身敗名裂，众叛亲离的复轍的。但是我們愈有击破这种阴謀的信心，就愈有击破这种阴謀的必要。我們提醒全国的軍民說：在我們走向胜利的路上，不仅荆棘丛生，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窺伺着，想乘我們的不备，窃取我們奋斗的果实而去。对于戴着朋友的面具的扒手，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警惕！

我們更要正告美国当局和国民党中一部分惟美国馬首是瞻的先生們說：中国人民毫不迟疑的欢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种援助愈多愈快愈实在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懂得以朋友之道对待朋友的。但是他們同样懂得怎样去对待扒手及其同謀者的。这岂不合于你們所最爱鼓吹的"公道"(Fair Play)嗎？其中国人民是已經长成磐石了，但你們却硬說还是皮球，你們一定要踢开就請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們自己的高貴的足趾。中国人民是要頑强地战斗下去的——直到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日！

（一九四一年五月廿三日《解放日报》）

謠言与烟幕（社論）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造謠惑众是市井无賴的慣技，而政治流氓就把这种卑劣的手段用之于政治斗爭中，竟自称曰："散布合理的流言。"

在社会政治斗爭中，先进的阶級和先进的政党，它們手中握着正义和眞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綱，目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斗爭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們用不着玩阴謀、耍手段、造謠言之类的下流无恥的办法，因为他們有自信：眞理只在他們的方面的，它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它們的行动，光明磊落、坦白严肃。而那些政治流氓們，因为要維护其违反眞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們的主张、綱領、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謀，耍手段，造謠言之类，就成

了他們的拿手好戏。造謠言——或者“散布合理的流言”，就为他們的所癖爱，因为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爭中既斗不过对手們，那么只好乞援于造謠了。何况，古书上說过，曾参杀人，慈母投杼，詩人亦唱过，“三人成市虎，浸潰能胶漆”，其效力不是很大么？

不仅如此，謠言也还有别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烟幕弹的作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么？当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被人发覚，大呼捉賊。此君急中生智，亦高叫“賊在那边，在那边！”竟得脫身。政治上的沒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借謠言来轉移視綫，来隐身的。

这种“造謠术”的最近例子，就是所謂：“十八集团軍集中晉北不与友軍协同作战”的广泛地有計划地发布的流言。这个謠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务此道的个中老手——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規模的軍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規模的謠言攻势。同盟社的广播連篇累牘地散布各种謠言，尤以八路軍决不与中央軍协同作战，八路軍集中陝北准备乘机向西安出动，八路軍乘机扩张势力收繳中央軍枪械之类为特多。日寇这种軍事攻势和謠言攻势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說吓降，軍事攻势在炫耀其兵力，其愿若曰：你若不降，我将占你的故乡，占你的一切海口，歼灭你在中条山上的几十万軍队，进占你的洛阳、西安、昆明、重庆，你怎么办？謠言攻势在挑拔国共关系，描出一幅錯誤的画图来吓你說，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八路軍不打日本”之类的謠言是烟幕，吓降誘降是目的。其技至浅，其理至明。

奇怪的是某些中国人，不是汪精卫之类双料的汉奸，而是抗战营垒中統治阶层里的某些风云人物，虽然亦一字一句地抄写同盟社的广播来替它作义务的轉播。象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聞机关，居然一方面說：“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揑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复着“敌方所传”，称“十八集团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与友軍协同作战則为事实。”日本人一錢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謠言当留声机和見証人，宁非怪事！

可是“怪事”实际上是沒有的。只要懂得我們上述故事中的賊的急智，就可以理解这次謠言唱和中的“机”了。重庆軍委发言人在本月二十二号就多少洩露了这个“机”的一部分，他說：“上周寇軍全面发动，总計达三十万人之多，其結果不过如此，以此种方式而后談解决“中国事变”，不但世无相信之人，即敌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这不就是說，此种（軍事进攻）方式是不能解决的，換种方式吧！果然同盟社接着的紛紛报告日各战綫軍事当局均称第一期作战全部結束。謠唱和，这次竟完成了紅叶題詩式的媒介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員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

我們認为在这里无須再事“辟謠”了，因为八路軍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持，对民族的忠忱，是决非謠言所能搖撼的事实，是不怕火烧的眞金。尽管新四軍被宣布为叛軍，八路軍两年沒有領到一顆子弹，五个月沒有領到半文制錢的餉項，然而新四軍、八路軍的将士們，沒有一分鈡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晉南作战，八路軍在华北正在全綫出动浴血酣战，这是連造謠的人和传布謠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其所以造謠和传謠，都是别有怀抱的。

其怀疑为何？在造謠言者为誘降，在传謠言者为投降，而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成了他們題詩的紅叶。日本人当春心大发时，題詩一首于其上，从长江飄将上来，这边的人儿得了詩，果然打动春心，跃跃欲試，拾起紅叶，轉題一首，又从长江飄将下去，这就

是同盟社与中央社近日抓着共产党問題一唱一和的由来。还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将双方的情报到处传播，其目的均在“催装”，不过英美是为着反共反苏反德，德国是为着反英美，这个不同而已。“你們赶快結婚罢，好去发动太平洋战爭”——这就是德国的目的。“你們赶快結婚罢，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的。我們不能不忠告中国国民党的領导人員們，这种結婚乃是“劫婚”，将来是不好过日子的，理应拒婚为上。从共产党身上做文章，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不信，你們瞧罢！

全中国的同胞們！注意在这种謠言烟幕遮盖下的投降危机呀！远东新慕尼黑的极大危险在一天天的增长。以“吓蔣投降”为目的的这次“軍事攻势”，現在是暫时的过去了，継之而来的必然是誘降。这虽是日本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把戏，但却包含着新意义，因为正在1941年5月至10月的时机中。全国同胞起来揭破他，粉碎他，乃是民族生（存）所关的巨大任务！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論）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屆参議会上的講話

（摘录）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現在工人有地位了，农民也有地位了，你們参加了参議会，参加了政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以后你們还要給更多的人办事。以后的胜利是天天大，工作是天天广，需要人才也天天多，所以你們回到自己的崗位上时，要加紧学习政治，还要加紧学习业务，工人同志和农民同志更要大大的努一把力。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中共二十周年紀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甲）中国共产党經过二十年的革命鍛炼，現在已經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們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維克党，要求全体党員和党的各个組織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动和統一紀律下面，团結起来，成为有組織的整体，沒有这样坚强的統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爭，便不能实現我們所担負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員，尤其是干部党員，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鍛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

（乙）我們的党，虽然已有廿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經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

尔塞維克化的党；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爭的环境，党內小生产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員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組織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傾向。这些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动和統一紀律，可能发展到小組活动与派别斗爭，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的損害。而有这些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敗名裂。叛徒张国燾的結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訓。这些缺乏党性的傾向，今天在党內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現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傾向，具体的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上級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脫，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瞞。

（2）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强調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領导。本位主义，調不动人，目无組織，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統制，只要下面服从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导机关去解决問題。多数决議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則，随时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在思想意識上，是发展小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級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現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問題，鋪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眞正密切联系。

（丙）为了糾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傾向，必須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內更加强調全党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領导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党員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統及对全国性問題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現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領导人員，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領导。应当在党內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爭。

（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議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現象。

（3）即时发現，即时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損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評应当是正面坦白誠恳的提出，目的是为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調党內团結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但对于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时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紀律教育，因为統一紀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組織，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則。无論是普通党員和干部党員，都必須如此。

（5）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員，特别是每个負責的領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論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脫节的現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級立場、党的立場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員以至每个党部的負責領导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过一定的組織生活，虛心听取党員群众对自己的批評，增强自己党性的鍛炼。

中央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漸进步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內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領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認識。到延安来做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們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內外环境，不論在社会阶級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了解。党內許多同志，还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这一眞理。还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会調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領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則政策势必錯誤，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內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的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純的第一个表現，而实事求是，理論与实际密切联系，則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員的起碼态度。我党現在已是一个担負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內外，省內外县內外具体情况的調查研究，方能有效的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內外政治、軍事、經济、文化及社会阶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机关，各根据地各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該地区敌我友政治、軍事、經济、文化及社会阶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办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面关于政治、軍事、經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級关系的各种报紙……

（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館）

“曾忠才长征記”一文按語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用簡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題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調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調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文　化　課　本”序

（一九四一年）

一个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識与自然常識，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論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沒有这个基础，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識与自然常識限于直接見聞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

这个会一定开得很好，今天报告和討論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各民族都能团結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好的現象。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結，促进各民族团結，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們抓住我們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結，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过这个弱点。

現在中国就因为是团結的，所以才能抗战，但是还团結得不够，因为有一部分人表面打日本，暗中破坏团結；另一种人，一面抗战，一面磨擦。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前一种人是汉奸，后一种人是不懂得大势。延安是专講团結的地方，这里有清眞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

今后还有更大的仗要打，法西斯野心很大，力量还有，还要疯狂地侵略；希特勒在英美苏的大团結中到处乱打，自然在战爭中，都有困难存在，所以同法西斯斗爭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現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这个会議有意义。莫斯科和远东都在开会。我們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而法西斯正利用这些困难，我的看法，法西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侖，如馬其頓王亚力山大，如蒙古，……。現在只要我們团結，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地撕碎是不难的，日本正要向西北侵略，大体上是要

来的。

……現在我們有三条統一战綫，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一条是东方的ABCD陣綫，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統一战綫，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我們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革命的人民是活的，在历史上是有生命的，法西斯是会死亡的，人民大众的斗爭，必須經过困难，才能走向胜利。

法西斯快要死了，我們人民正在青春少壯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問題，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談，法西斯是沒有灵魂的，我們是有灵魂的，我們紧拉着手，团結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講平等，講亲爱团結。

广　播　講　話

如同中国共产党大会再三指出的，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結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則是团結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現在这两种团結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站在人类的立場上，我們以为英国和美国应該用一切方法拿更多的飞机坦克来供給苏联，拿更多經費和武器来援助中国，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蹂躪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起义。美国应該毫不躊躇的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絕对不可迴避也不应迴避的步驟，实現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絕不应听信日本的陰謀，与日本訂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的，我們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方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份不明大义的人，阻撓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現。因此英美的人民現在必須努力去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推向更高的阶段。

中国的情形，同样处在向前更进一步的轉折点。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論他們采取那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日本在晉察冀边区和长沙、郑州等地遭遇失敗以后，現在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新的进攻。我們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軍队，一定要保卫我們每一个抗日陣地，一定要打碎敌人的进攻陰謀。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好的团結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准备一切反攻的条件，以便及时的驅逐日本强盜出中国。我們共产党人一向是呼吁加强团結的，处在这个敌人新进攻的前夜，改善抗战营垒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更为迫切的需要。我們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迅速的当机立断，为了这个目的迅速的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我們相信，只要全国眞正的团結一致，日本的进攻必能阻止，反攻的准备必能办到，驅逐敌人的目的是必能实現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解放日报》）

贈給王观澜同志的一段話

——就战胜疾病問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既来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內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爭，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爭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庆祝苏軍二十四周年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是苏联紅軍二十四周年紀念日。当这个日子来时，特别使人回想起紅軍誕生的时候，紅軍是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对列宁格勒的进攻中間誕生的。而今天的紅軍又正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决死的斗爭。但也正是今年，紅軍的力量不但比她刚刚誕生的时候不知强大到若干倍，就是比她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也是更加强大了。現在的紅軍，在她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經过了八个月战斗的鍛炼，又已經被証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軍队了。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陣綫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紅軍便是人类絕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今年的紅軍紀念日，乃是全人类共同庆祝的节日。我們中国人民将更加热烈的庆祝这个节日，則是因为紅軍还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忠实援助者，在五年的抗日战爭中，紅軍又給了我們以最大的鼓励，而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者，又将期待于紅軍。紅軍目前正发展着胜利的反攻以打击希特勒，希特勒軍队虽还沒有退出苏联領土，但是离它崩溃之日已不远了。日本法西斯在不久的将来有进攻苏联的危險，紅軍須准备对付两面的敌人，但是我們完全相信，日本法西斯如果敢于冒險，它是一定要失敗的。有种种因素可以預断，一年之內会把希特勒打敗，两年之內会把日本法西斯打敗。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它一切反对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紅軍的历史說明了一个无可置辯的眞理，只有与人民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揚和学习这个眞理，依照这个眞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紅軍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談会上的講話

——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頓三风要利用报紙批掉絕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

共产党的路綫，就是人民的路綫。現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許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糾正这些不良作风，我們提出了整頓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調，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許多意見，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經常的业务之一。經过报紙把一个部門的經驗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它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来整頓三风，必須要好好利用报紙。关于整頓三风問題，各部門已开始热烈討論，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場說話的，这就是絕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頗有些人要求絕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确有許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对平均，則不但現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資产阶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們应該拒絕。批評应該是严正的尖銳的，但又应該是誠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評态度，才对团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种消蝕剂，是对团結不利的。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解放日报》）

“整頓学风、党风、文风”的补充

（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說）

那几样东西呢？就是一个思想問題，一个党內党外的关系問題，还有一个語言文字問題。在这三个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沒有去掉。

（第八一四頁第二行）

如果我們身为中国共产党員，却对于中国問題熟視无睹，天天看，看不見，带了眼鏡，还是看不見，看見了只是书架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献，那么，我們在理論战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坏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和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笑声）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罢，这样的“理論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假如一个人讀了一万本子馬恩列斯，每本都又讀了一千遍，以致于句句都背得，这还是不能算得理論家的。

（第八一六頁第七行）

現在工作只用百分数計算成績，那么，象讀一万本书，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究竟应該算多少分数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声）

（第八一七頁第三行）

他們須知学这种知識并不那么困难，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象大师傅煮飯就不容易，

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創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幷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师傅比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飯做菜眞正是一門艺术。书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书，那么，只要你訊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头摆脑的讀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上的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第八一八頁第一一行）

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这个东西，几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无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这样看，那样看，不象我們讀联共党史这样馬虎从事。

（第八一九頁第一行）

否則我們为什么要去学馬列主义呢？是不是因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經呢？我們党校确定要学馬列主义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問題不講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远不会提高。

（第八二二頁第一行）

好象道士們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么好看，也沒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

（第八二二頁第三行）

那怕是馬列主义，也可以使他变成空洞的东西。一种是偏于感性与局部的知識，沒有发展成为理性的与普遍的东西。

（第八二二頁第五行）

說句不客气的話，实在比屎还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同志們，你們会知道，我这样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們大吃一惊，醒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馬列主义。

（第八二二頁第七行）

李立三也对共产国际鬧过独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綫的錯誤。現在講的，虽然不是张国燾李立三那样极端錯誤的宗派主义。

（第八二三頁第九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反对党八股”的补充

（二月八日的演說）

第二，要学外国語言，外国人間的語言幷不是洋八股，中国人抄来的时候，把它的样子硬搬过去，就变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

（第八三八頁第十行）

比如，《党与非党的联盟》，这是斯大林在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吸收在陝甘宁边区的施政綱領里面，講到《共产党員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如此等类，总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不可。

（第八三八頁倒数第三行）

斯大林在联共十八次大会上說："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覚"，我們有些同志也是这样，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这个毛病必須医治。

（第八三九頁第三行）

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員，离开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讀馬克思主义，縱令你把馬克思主义讀一万本一千遍，也还是一个假馬克思主义，这样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也还是一个"老鼠上称鈎，自己称自己"的假理論家。

（第八四五頁倒数第四行）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給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創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給我的，我十分感謝！現在华北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了，我謹以至誠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說："在华北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爭。"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領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們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們，請以此意告訴同盟諸同志。敬致中日两国人民团結奋斗的敬礼！

中华民国卅一年六月廿五日

关于統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領导及調整各組織間关系的决定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共政治局通过）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領导一般的是統一的，党政軍民（民众团体）各組織間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結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爭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遺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組織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軍民关系中（实际上是軍民系統中党員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調的現象。例如：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軍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員干部对于党的領导闹独立性，党員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門戶之見等等。这些不协調的現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設，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塞維克化。根据地的建設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領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

蕩”的残酷、封鎖綫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統上下級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軍区、分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領导統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組織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給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間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和无产阶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应該領导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領导的統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現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統一的領导一切的党的委員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級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領导机关，統一各地区的党政軍民工作的領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軍委員会（党政軍委員会的設立，在根据地創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級党委的性質与成分必須改变，各級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領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該地区的党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議），因此它的成分，必須包括党委、政府、軍队中主要負責的党員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軍队三方面的負責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絕大多数委員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級党委的工作应該是照顧各方面，討論与检查党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議，决定或指示下級党委及同級政府党团、軍队軍政委員会軍队政治部及民兵团体党团及党員，均須无条件的执行。政府、軍队、民众团体的系統与上下級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級政府的决定，命令，上級軍事領导的命令，訓令，上級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須經过各該机关党員負責人及同級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負責人同意，然后頒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級机关、軍队；民众团体必須无条件执行，下級党委也必須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級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擱置。下級党委对上級政府、軍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見，可报告上級党委。在遵照各組織上級的决議解决具体問題而党委內部发生爭論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解决之。政府、軍队、民众团体負責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見，亦必須执行同級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見报告上級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軍队与地方的党組織的統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經上級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組織，軍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負責人，主力軍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軍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軍及政府的党的負責人。各級党委书記，应选择能掌握党政策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記不仅須懂得党务，还必須懂得战爭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記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議定，經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記人选，由区党委議定，經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統一地方党与軍队党的領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記，兼任軍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設副书記，管理党务工作。如軍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記，則可設副政委，专管軍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記应照顧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記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記时，須得上級党委或中央批准，軍队中軍政委員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級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門，与其他部門（如組織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門或委員会，但与其他委員会和其他部門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級直接領导和隶属关系。軍事政策（扩兵建軍原則，政治工作等等）与

軍事行动的大政方針（如反扫蕩的战略战役計划及总結等），須交党委会討論，但具体軍事行动由司令員政治委員（即党委书記）决定之（司令員与政委对軍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仍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討論只会引导軍事的失敗。軍队主要人的任免，仍須經过軍事机关依照已定規則进行之。

（四）主力軍是党領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設根据地与支持斗爭的有力柱石。主力軍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軍固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領导不統一，主要的是由于該地主力軍某些領导同志对于該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統一的認識，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軍事建設中之地方武装問題、扩兵問題，財政經济政策問題中之統筹統支等）只注意了主力軍，而忽視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爭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領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爭的認識不深刻，对主力軍人員之补充，粮食及物質保証，优抗及反逃亡斗爭，未能尽到应有的責任，因而使軍队与地方党政間的关系不协調。今后为了实現根据地領导一元化，除实現以党委为各地統一的党的領导机关外，还必須糾正某些地方主力軍，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領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錯誤，实現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軍委关于軍事建設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軍必須执行各級党委的决議、决定与各級政府的法令。主力軍对于駐扎所在地的下級党委与下級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須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級党委与上級政府。并应当經常的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軍的軍事措施如軍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須遵照执行。主力軍应当負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責任，凡因軍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軍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損失时，軍队負責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爭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爭論及解决經过报告上級，反对各个組織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談解决問題的办法。

（五）政权系統（参議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們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質。軍委及政权系統的关系，必須明确規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統工作，党政不分的現象与政权系統中党員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紀的行为，都必須糾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統的領导，应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方向的領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級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級参議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員应該成为执行参議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該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議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員违反参議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組織应給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議会及政府工作的領导，只能經过自己的党員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議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須服从同級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須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經过自己的說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沒有說服参議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見未被参議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須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見与同級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紀的行为，应該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須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議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視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現象，必須糾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員在政权系統中的数量減少，但在政权系統中工作的党員質量必須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統中工作的党員和干部，必須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議、决定与紀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領导的实現，有賴于政权系統中党員干部之言論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絕对服从，所以严整政

权中党員及党員干部的党紀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調动政权系統中的党員时要慎重，还必須經过党員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續。政府与軍队的关系必須改善；軍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証軍队的給养与运輸；軍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員及参議員。軍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軍人的违法行为，軍事机关必須严格处分。軍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員，参議員資格对参議会及政府发表意見外，一切軍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議会及政府內部工作。但軍队政治机关，必須尽可能的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自己的自愿組織的团体，党、政府、軍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內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領导，經过自己的党員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青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众团体的各級委員会須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員。民众团体中的党团問題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給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請求登記，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軍队，帮助抗战动員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訊、判决等事宜。軍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領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軍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須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軍队指揮机关政治工作机关合併。党政民干部在軍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軍事指揮員、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軍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則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記、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領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党政同級組織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現在上下級关系上。在这里，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則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統一領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領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須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时，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領导的統一（凡带地方性的不违反上級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級党政軍民組織对上級及中央之决議、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則問題及按性質不应独断的問題时，不向上級及中央請示，都是党性不純与破坏統一的表現。

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地党政軍民領导同志的注意，各級党委及政府軍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員負責同志，不得中央許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軍意义的宣言、談話及广播，各級領导同志的文章应經过同級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員的审閱。分局委員以上，师以上負責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內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級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統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認識，一个党的負責高級干部，不經过同級或上級一定組織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見，是何等违反党的組織原則，何等妨碍党的統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統一根据地的領导，为改进党政軍民的关系，必須在党政軍民各系統党員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頓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遺毒。在干部会議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識大体，顧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評与自我批評，使干部管得全局，不陷于局部与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級与下級，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間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軍民各組織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認識領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

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軍队干部，党政軍民关系不协調，在一般情况之下，軍队干部应負担較大的責任，軍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輕視党政，不守紀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軍队中軍政干部必須特别約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須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領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糾正某些党員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認为只有在党务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員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軍事工作，群众工作，經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員服从党的領导，是服从党的路綫、政策、决議、决定、指示与紀律。某些党員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領导，而对于党的路綫、政策、决議、决定、指示与紀律，則不認眞研究，不認眞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領导的統一，是为了更順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爭，“一切服从战爭”是統一領导的最高原則。要在全党中說明，假若軍队削弱，假若战爭失敗，則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軍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軍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軍队的人員补充，粮食、服装、弹葯的供給与运輸，营舍的計予，伤病残废人員的輸送、看护与保养，抗日軍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責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現象，都是极端錯誤的有害的。在軍队本身，則都深深了解，沒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軍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須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軍紀，給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軍队的人員物資补充、运輸、优待等等，必須依照政府的法令、規章去做，乱来一頓，只会損害抗战，于軍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領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則，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細則，以政府法令、軍队条例、党团規則、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規定之，以解决統一領导的許多具体問題。制定后須报告中央。

历　史　教　訓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聞記者关于“苏联所有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詢問时称：“我認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較大的話，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統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眞理报社論：“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的巨大計划。說計划原訂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卽向莫斯科、巴庫前进。”这些話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証明了。十月八日德軍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軍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綫，并据守新陣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軍被迫轉調进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該处正遭苏联解救軍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說：紅軍由城內正面与北部側面两方夾击，迫使希特勒絕望于該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轉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們就在匆匆忙忙地討論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們对于苏德两軍的力量都是判断錯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計划”是有的，但这个

計划眞如眞理报所說：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所粉碎了。

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間的矛盾，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現在他采取避实击虛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認为应当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綫一隅。七月間他曾拚命爭夺沃罗涅茲，打不开，又避开它。拚命爭夺克列特斯卡雅，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說要被迫放弃攻势，轉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現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沒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許还想最后掙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却成了紅軍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紅軍就是从克列特斯卡雅到斯城北角一綫向德軍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的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軍渡过頓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其极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軍由卡尔科夫打到頓河。这个期間，紅軍采取战略退却，德軍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軍在齐姆兰斯卡雅至罗斯多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綫及頓河下游，渡过頓河。不知是德軍原先計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軍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猛追退却中的紅軍，八月中旬即已达到庫班河流域，但出于德軍意外地遇到了紅軍的頑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德軍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还有一个較大的油田叫格列斯尼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說："通至格列斯尼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問題，只是德軍的进攻能否給予紅軍以充分时間彻底破坏該处油田。"可是从說这話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庫一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鵝肉，德軍确曾宛枉地……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5630公尺的伊尔布魯斯山升起德軍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們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給紅軍了，还是法西斯們自己拖着溜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場空欢喜。听說波克現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么，他的錯誤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向高加索分兵吧。紅軍一方面坚决扼守頓河河曲，一方面却又使波克禍水分一股流向庫班河去，因此就減輕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紅軍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頓河东岸克拉赤一带陣地。如果沒有这一战，如果德軍沒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則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从八月二十三日德軍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軍打入斯城工业区，紅軍又在頓河与斯城間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軍二十三天，沒有这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从九月十五日德軍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紅軍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該区德軍陣綫，二十四天中，是极端猛烈的巷战期間，紅軍以城內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軍的进攻。

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說中說到紅軍时，他好这样說："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們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經希望过紅軍向他講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爭已經証明：只要人們不对法西斯講慈悲，就是說，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敗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訓。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慘敗，将作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威

一带碰一碰嗎？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講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間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維克化十二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次高干会議开得很好，××同志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批評朱理治、郭洪涛两人历史路綫上的錯誤。大会說明創造边区及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好同志，边区的干部更好一些，經历了內战、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外来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团結，"洋包子"决比土包子多走了一段路，"洋包子"高明，那么你的根据地怎么垮的？所以原則不好，加上原則不好，加上客观原因，敌人压力很大，主观原則的錯誤，把白区差不多弄完了。今天我想講斯大林同志十二条。講这十二条，跟刚才講的全党路綫搞清楚，全党团結起来，在这基础上講十二条。

斯大林說："我們要实行布尔什維克化；要有那些条件，至少有若干种种条件，如果沒有这样的条件，布尔什維克化是空的。"如果沒具备这些条件或不完全，就不能布尔什維克化，可是布尔什維克化"化"字是不容易的。

我們全党情况怎样？是向着布尔什維克化，經过廿一年的斗爭，可說是布尔什維克，从他的条件他的工作說起来，这个党的經驗覚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說起来，是个布尔什維克党，但还講不到"化"，化就是彻底的很，就是完全的完整的布尔什維克，如斯大林所說的第一条，必須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的附属物——象社会民主党，在实質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职工会的不要錢的附属品——如果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敌对分子有时对于这总反复說明的那样，而应看着是无产阶級的阶級联合之最高形式，負責創造无产阶級底其它一切形式的組織——从职工会到全国党团——的使命。

这一条我党許多地方部分沒有实行，或完全实行，我們是否国会党团問題？是否职工会无政府主义問題？我們不是国会党团，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所以我們的国会党团沒有象斯大林所講的脫离党把党团員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为主体，（重庆参政会边参会有党团）而凡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的現象，我們許多同志說这一条是否可要？有些同志說对我們不适用。我講"党是一个阶級的最高組織形式"，这个最高原則領导一切形式的組織，一般組織形式在这所謂职工会，全国党团这个問題，我們有别的例子，如我們有政府軍队，民众团体，党領导什么？就是領导政府、軍队、民众团体，不領导别的。除外，还有党务工作，整頓党組織，整理党組織是为整理党务工作，整理党务工作是为把政府、軍队、民众团体搞好，也包括干部工作。干部是政府人員，除了党务干部十分之九是軍队和政府干部、民众团体干部，民众团体有工作，青、妇、合作社、文化团体（包括文学会、哲学会、戏剧社、木刻会等）把这些搞好，才能和敌人作斗爭。

但是現在有这样一种概念，你这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軍队、民众团体，你少管，少管則不管，不管則反对，这些是什么人？是张国燾，他就是反对我們管，他自己

搞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己有軍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另外，还有一个項英，中央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这样的事。其他軍队还沒有这样的严重。张国燾是最标准最标准的，比較次的是沒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再有就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服我脾气我服从，否則不服从，口里沒有講，心里这样想，作起来也这样作，边区党政軍队关系就是这样的現象，党的意志决議不能执行。如軍民合作相当长期沒有执行，不执行是原則的問題，步調不一致，政府与党、政府里工作的党員与政府領导不一致，群众团体之間也曾有这样的事，如青年工作鬧独立斗爭，跟党的政策不符，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也有这样的事，如解放日报第四版有个时期成为独立王国，什么也不能干涉，报館的意志在这版不能执行。一版有一个字不服从就是鬧独立性，有人說党一个字也要管，挖苦得很。党是管一切的，所以叫党“决定一切”。“九一决定中”已搞清楚。我們所謂党是党員組成的，一切党員就是党的組織，我这里叫軍队、民众团体……实际是不要这个党，現在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領一元化，承認中央“九一决定”与这次会議中整頓关系的决議案，知道党是一切无产阶級的最高形式。

第二条講理論，“必須使党特别是它的創造者完全精通馬克思主义理論，这种理論与革命实际工作不可分离的联系着”。这条我党历史上有个过程，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馬克思主义，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們干了一个革命叫大革命，从有党到1927年前一段，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是馬克思主义原則和思想指导下那时（1921）党成立，在十月革命之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宣传，特别是“五四”后，有广泛的传播，“五四”以前中国工人阶級知識分子对馬列主义是不知道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极大的宣传，影响，中国許多知識分子傾向机会主义，加以世界大战，中国产生“五四”运动，以李大釗为首一部分知識分子，开始自覚地研究馬克思主义，因此党能在21年建立。沒有十月革命，“五四”的酝釀，党的产生是困难的。1921——1927年这六年中，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这是在外国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就是大革命，国共合作，对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是在国际指导下，按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綱領进行活动，有些人覚得中国党开始沒有理論，我們党較后一个时期是沒有理論的，我們說21年有了共产党本身就是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么样設想呢？怎样忽然出来一个共产党呢？1921——1924年之間，大釗就宣传共产主义，大革命，內战、抗日三个阶段都是眞假馬列主义在斗爭，朱理治文章是写“为馬列主义而斗爭”实际是“右傾机会主义”，什么人証明呢？被抓、被杀的那些証明，杀了240个馬列主义者，还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未来得及杀，叫了声“刀下留人”又放了。这种現象不只是一个边区，特别是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严重，中央苏区，贛东北，四川也有，但不严重，这是个錯誤路綫，枪杀了革命干部共产党員，把共产党員馬列主义者杀了。苏区搞光90%，白区是100%，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是假的馬列主义，結果被正确的馬列主义克服了，“八七”会議把他排除了，我党大革命时期，有向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斗爭，有向张国燾左傾机会主义的斗爭，这都是馬克思主义与非馬克思主义的斗爭。

遵义会議后，基于前者的失敗，路綫是比較正确的，有否缺点？开幕那天我說过党內現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又象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統治路綫，但就是残余也是不符合原則的。对之可有两种态度，一是自由主义态度，隐瞞、包庇、不理，一种是向之作斗爭。从去年七——八月起，中央頒布了“增强党性的决

定”，“調查研究的决定”，今年又提出了“整頓三风”，就是对不正确路綫采取批評态度，遵义会議后，不是过火的斗爭，而是自由主义，过去犯左傾錯誤的，遵义会議后就容易犯自由主义的毛病，朱、郭过去是“左”，抗战以来朱右，則工作闹独立性，郭散布謠言，挑拔离間。

党就是在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党在三个时期中克服了錯誤路綫，但現在又产生右的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就是拿馬列主义对馬列主义采取自由主义，以馬列主义作招牌，懂了就是不作，我們中国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咬文咀字，他也作，錯了就乱搬公式，还有一种是不作事，只讀书，讀了好多，一箭不放。一种是“无的放失”，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貝古董，延安发现的是后一种，讀了很多东西，对边币和法币不能解释，是脫离現状的，边区党員有名为党員，实际与党不一致，还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如吳奚如就是这样的人，是个文化人，皖南事变时，国民党抓了他，把他放出，叫他到这里来，現在已由新四軍打电报来証实他被俘过，他也承認怎样当特务。王实味最近也发現了，他以党的資格在这里講話，組織了一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就是王实味，成仝、理論芬、宋绅，他們說話作事不象共产党員，但有同志就不加区别，这是否自由主义？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的闹独立性，以前不講，这次会上講了是馬列主义。

斯大林要我們注意理論，我們与党校同志商量一下，党校准备讀几本书，要讀三十——四十本，如果我們有这样丰富的經驗，这样长的斗爭历史，能讀几十本馬恩列斯的书，就把党武装起来，朱理治那一套能卖？有人陪？就是我們理論弱。

第三条必須使党在制定各种口号和指示时，不是根据熟讀了的公式和历史类比，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的关系条件、国内外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同时顧及各国革命的經驗。斯大林这一条很易理解，有一种是公式历史类比，另一种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如口号中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綫”，把区三千人，一个个括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綫，从洛川到鄜县六十里，恐怕也拉不够一个日本。也不过这么寬，（笑声）还有一种口号要打“中心城市”，拒絕作“会門工作”、“土匪工作，刘志丹曾提出作“会門工作”，“土匪工作”，把全国的斗爭形势变成我們有利的斗爭形势，要和軍閥籠絡一下。朱理治就說是和軍閥勾結，我們不是和軍閥勾結，而是利用，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救国，而我們打击在野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在野的人家去經在野了，你还要打在山里办工会，世界上那能出这样的文章，他們引用外国历史上的类比，外国在苏联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們也可以打中心城市吧！斯大林同志講到要照顧外国的經驗，他是把国际国内当前具体条件作具体的分析放在第一位，国际經驗要照顧，但要恰当估計，不是硬搬，过去的缺点就是硬搬，在外国有清党运动，我們也要把党清刷，要采取外国經驗，但主要应从国内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具体研究，如王实味确实是托派，吳奚如确实是特务，边区确有部分人是党棍坏人。

現在我們看今天有何口号？有抗日統一战綫的抗日口号，制定設有？制定的条件是国共合作，各阶級合作，过去提出过不分貧下中农的口号，今天提出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及統一战綫口号，这些根据当前国内外具体条件的具体分析，今天实行“三三制”、“十小时工作制”、“精兵簡政”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还是确有需要？項英同志很早就提出“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現在提确是恰当的，是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加以周密分析提出的“精兵簡政”，不加調查研究、周密分析就不能进行彻底。

沒有这一条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綫，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場，打大城市、再搞反馬列主义。斯大林这条就是要我們作具体分析，同时又照顧到外国的經驗，工作就会作得好，反之就作不好。制定口号凡不符合实际，制定政策指示一定行不通，作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論。

第四条：必須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爭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指示的正确性。这条和十二条都是講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則路綫。后面是講检查工作作风这条路綫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講要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制定口号指示这是个方法論，单有这部分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中得到証明，理論是实际中抽出来的。第三条講調查研究，实际的反映指示和口号。朱理治也講根据实际，他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对立等，在实践中检查結果，白区100%，边区90%搞掉了，从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国共十年内战可謂烈火矣！检查那时的口号，指示是不正确的，象打中心城市、稍山里建工会、国际路綫、肃反、都不正确，刘志丹是正确的，朱理治、郭洪涛不相信，我們試了看，信得反不得，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三三制、精兵簡政，究竟跟实践合不合，要检查，如我們过去在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合不合教学方法，結果是教条主义的，是否正确，最近証明，要在你去作，对了就对，过程中不对就要参考，不能講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講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沒有覚悟的人，說現在中央一切都对，是因为过去有那些样子的經驗，那样大的胜利也犯过許多錯誤，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之后，理論是从客观实践中抽出，从客观实践中得到証明的，这是第四条，你的客观实践的态度，实践是检驗眞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来衡量眞理？就用实践，所以說不在他的决議签名，而在他的行动，检查一个干部、一个党的重要标准，要看他实行的結果，有第三条而无第四条是不行的。

第五条必須使得党的全部工作——特别若是党里的社会民主党传統还未消失的話——改造过来，建筑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使得党的每一步驟和行动自然而然走向群众革命，走向革命的精神上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級的广大群众。

这是講工作作风，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沒有革命的作风，应該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命基础上，新的革命步調上，新的精神上，布尔什維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統治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他不革命，条件变化了，是无产阶級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是改良的作风，他沒有办法領导无产阶級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党，各国按布尔什維克的作风，建立共产党。如××說的，我們党内无社会民主党的传統，中国党有两种缺点：一是左，二是右，我們今天講的这一条，就要反对自由主义，現在党内自由主义相当严重滾厚，同时也要反过左，如征款工作不調乱派，这就不能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党内有自由主义，有很多坏蛋，有王实味，吳奚如，我們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馬列主义学院），缺乏革命作风，怎样使他們自然而然的革命化呢？具体办法是整頓三风，过去很多在工作崗位上不安心，因此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頓三风，自我批評，这样他們就安心了！我們沒有社会民主党，但有新的問題，自由主义，我們要新的革命作风，培养教育广大群众。

第六条，必須使党在給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原則性（不要把这和关門主义混淆）和与群

众最大限度联系及接触（不要把这与尾巴主义相混淆）相結合。这里講要把革命的原則性和联系群众配合起来，否則不仅不能教育群众，而且不能向群众学习。你講要教育群众，要向群众学习，要傾听他們的呼声。我們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他們，另方面要向群众学习。不这样想要把革命的原則和联系群众結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不能向群众学习，不联系群众怎能提高，怎知人家的迫切需要？人家須要打游击？在稍山里你去建工会，人家需要是分配土地，你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搞八小时工作制。这第六条是講群众工作的問題，斯大林告訴我們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的要求是最高的原則，但是用什么方法，天天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尤其是現在的中国环境要求低，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則，但話一說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問題，他們的要求是因为生活条件、經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中国人民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薩，开洋船的就不信，木船不信翻了不得了。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打大城市等最高原則，是我們党建立最高的目的，忘記了就不算是共产党員，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可能作到的那样来作，这些才算与群众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彭湃是共产党員，中央委員，他在海陆丰拜过菩薩，这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則，要把这两个原則合起来，一是最高原則，一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則不要变成关門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們搞关門主义。联系群众也不要变成尾巴主义，祭菩薩一下还可以，天天祭就成尾巴了，相信菩薩要把握住原則，不要关門也不要尾巴，要作两条路綫的斗爭，

第七条：必須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調合的革命性（不要把这个革命性与冒險主义混淆）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不要与迁就性相混淆）相配合，否則不能掌握各种斗爭与組織形式，就不能把无产阶級的日常利益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結合起来，并且不能把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配合起来。第六条着重群众工作，第七条講統一战綫原則，講抗战的战略战术，斗爭形式、組織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的問題，（第二条講理論，第三条是唯物主义）講抗战的斗爭形式或組織形式，因为我們不但有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的阶級，别的集团，可能联系就同他們联系，这里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机动性，要把不調合的革命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們曾打倒地主，現在要联合地主，过去曾沒收地主的土地，現在变减租减息，变租变息，这就叫灵活性，机动性，决不是丧失革命性，托派就講我們投降了資产阶級国民党，过去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今天日本来了，又同他联合，托派說我們投降了資本家，所以"左派"就拿这話罵共产党。列宁作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那书就是講第七条，告訴党員要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那时侯英、法、德、苏、意的共产党員，他們当中有些人提出打迂迴，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們还作什么国会工作，他們就反对作国会工作，他們反对利用国会作講台，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作了这本书，郭洪涛、朱理治过去沒有看过这本书，也不重視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沒有看进去，那上面很多东西都講了，第三条那上面也講了只有革命性，那么有否可能来掌握各种斗爭形式、組織形式呢？沒有可能，我只講到这种形式是我們主要的斗爭形式，武装革命形式八路軍、新四軍要不要灵活性呢？我們在开参政会，开国民参政会，要不要呢？还是要，要去重庆开参政会，就拿日占領区、淪陷区来說，八路軍在华北，新四軍在华东打，天津、上海、华中日本占去了，人家占住了，我們打不了，我們有一种办法，叫合法

斗爭，我們可用伪軍，在伪軍中作工作，日本不发粮不让办炒菜館子，就起来发动斗爭，提高群众革命积极性，合法与非法要結合起来，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講布尔什維克三次革命的經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有合法与非法，流血与不流血的斗爭，布尔什維克一九〇五年是非法的，一九〇五年后沒有苏維埃，只可作一些合法斗爭，如合作社、黃色工会，那时××在搞黃色工会、合作社講他是机会主义是不对的，在白区有条件也搞非法斗爭，如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革命沒有內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馬計，都是这样。只有一种斗爭形式，有合法无非法不行，如欧洲共产党只有非法斗爭，否認合法斗爭是"左"傾，列宁批評"左"傾幼稚病，要把两种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联合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这个陣綫，包括邱吉尔、罗斯福，还有中国的国民党，德苏协定后并沒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館还在英美，德苏协定破裂时，英美苏协定建立起来不采取这样的組織形式、斗爭形式就不行，有那些組織形式？英美协定，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軍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英国代表，这个組織形式要灵活运用，那些組織形式、斗爭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組織形式、斗爭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門一条是統一战綫組織形式斗爭的問題，要有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就变化了，人家进行反共高潮，跟我們斗爭，我們只好斗爭，斗爭形式轉变时，我們立刻放弃斗爭，閻錫山搞新軍时，我們不能不援助，斗爭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結，要有理、有利、有节。

为什么原則性不要与关門主义混淆，最大限度和群众接触为什么不要和尾巴主义相混淆？又說不可調合的革命性不要与冒險主义相混淆？最大限度灵活性、机动性不要和迁就性相混淆。

最大限度的和群众接触，同群众联系的最高原則性，这是講我們作群众工作，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这就是有最高的原則性和最高的覚悟，但不要离开群众，不要关門主义，所以講不要和关門主义混淆，关于原則性，中央苏区有个学校，对吃辣椒的也开展斗爭，提高到原則高度，說吃了就是有原則，那就是乱用原則，是关門主义，因此要善于区別原則性与关門主义，至于联系群众，又不要忘記这个原則性，不能因为今天老百姓迷信，我們就不能作破除迷信的工作进行宣传，边区有三万党員，只有个别的迷信，不贊成婚姻自由，但不能作尾巴，因此不能混淆。講最高原則，但不是脫离群众（第六条解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性、机动性"是講革命和妥协的关系，"左"派幼稚病那本书已講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們有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的妥协"列宁批評了，但西欧的共产党自認为很革命，这是冒險主义，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覚悟是这样，他們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爭，不看群众的覚悟程度，只講进攻，这就叫冒險主义，而这是不要迂迴。列宁講俄国的历史說："在他們的历史中，曾有过許多妥协，这一种妥协是灵活性，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但非迁就。"第三国际就是迁就，党要和别的阶級、成分进行妥协，合作，甚至利用敌人，比如俄共利用沙皇的国会，因为法律上允許共产党員当議員，这时全国沒有大的革命可以利用，不利用就不是革命，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在去年六月曾訂过苏德协定，我們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党在十五年前就和資产阶級妥协过，全世界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資产阶級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軍閥的斗爭，現在全世界除法西斯国的資产阶級外，統統同他們进行妥协，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地主，边区是同地主妥协的，张国燾就是

完全丧失自己的立場。革命完全不管，跑到汉口在大公报上签了宣言，他講的迁就是完全不要原則性，完全不要革命性。

第八条："必須对党不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錯誤，不怕批評，而且要善于在自己的錯誤上改善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第十条："必須对党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元化。"这两条在联共党史結束語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們队伍中間有錯誤应該批評，这两条应該分开，这是第一条，与联共党史結束語有点出入，不同，大体意思差不多，联共党史結束語，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講党要有一个革命党，同这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馬克思主义理論，要有革命的理論，跟这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講工人阶級的統一，工人阶級队伍中間应該是統一的，那些欺騙工人阶級的政策实际上是反革命的政党，应該跟他作斗爭，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是列宁式的党，他們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为馬列主义的党，工人阶級要清洗自己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与它作斗爭，使工人阶級統一，使党統一。第四点是講党的統一，我們是講党的一元化，其次教訓，我們說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作不調和的斗爭，不粉碎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統一和紀律，不能实現其为无产阶級組織者的作用，就不能实現为社会主义建設者的作用。我們內部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內机会主义集团，經济主义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的民族主义傾向而斗爭并粉碎之的历史。有人也許覚得布尔什維克化費大多的精力进行党內机会主义的斗爭，也許覚得布尔什維克党过分估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这是完全不对的，在自己的內部容忍机会主义正如容忍肌体內毒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級的先进队伍，是工人阶級的前方保垒，战斗的参謀部，不能允許那些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和叛徒，和他們同資产阶級作最后斗爭，那就陷于背叛受敌，保垒是容易从內部夺取的，因此要从党內清除这样人，吳奚如以党員面目給国民党作事，这叫机会主义嗎？王实味是个托派，在这里組織反党集团，这一类叫叛徒，这次开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郭在边区搞形成前边是敌人，后边也有敌人；保垒参謀部的有敌人，抓了許多人，把刘志丹也抓起来了，差点被杀了。你說危险不危险？我完全同意张×山的分析，他們前途有三：一，前途是反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二，前途継續是两面派；三，改正錯誤，联共党史結語第五条說：如果被成績薰醉而驕傲起来，如果党已不愿再看見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糾正錯誤，就不一能实現其为工人阶級領导者的作用，这里講应該看到缺点不驕傲，承認缺点并及时糾正，公开的承認，不要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講，要在犯錯誤中教育自己，党是不可以战胜的，否則就要自取灭亡，这不是叛徒的問題，而是工作中个別錯誤的問題。这次要清算过去历史問題，鬧独立性，自由主义、要精兵簡政，整頓三风、就是要糾正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犯錯誤的人应該不隐瞞自己的錯誤，不应用虛夸来隐瞞缺点，能这样作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列宁說："政党对自己的錯誤，所把的态度是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以考虑这个党是否慎重和他在实質上执行自己对本阶級劳动群众的义务。"对錯誤所抱的态度，是考虑这个党的性質的問題。

第八条就是党史結束語的第五条，"必須使党不掩盖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善于在自己的錯誤上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这里要說：寬大政策在党外不同，一九三八年三月党中

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員，同时說不要使一个坏分子进来，这叫开門政策，同时又关了一扇門，对坏分子关了門，我們的施政綱領是对外的，对外要采取寬大政策，俘虜、特务，只要不坚持作坏事，愿意改正錯誤，应采取寬大政策，但不是講对任何反革命都是寬大政策，日本的飞机可以随便在这里降下来，日本人可以随便来这里开会，这是不行的，我們的寬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寬大政策变成了自由主义，以致相当多的人弄不清吳髮如、王实味，我們要审查各个部門有否这样的自由主义？很多事項不加解释，沒有斗爭，一团和气，領导与被領导之間，有个原則，第一叫团結；第二有錯誤要斗爭。要正确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这就是第八条，联共党史第五条，我們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現錯誤，不愿公开承認錯誤，对鉆进我們党內的奸細、反革命也采取寬大政策嗎？我們現在整頓三风、精兵簡政是两种斗爭，一种是无产阶級思想与小資产阶級思想的斗爭，还有一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爭，对大多数是前者，少数个别是后者。

有些同志受批評，怕抹煞成績，我在党校二月十日講了整頓三风，党八股的报告有万多字，但成績只有百多字，那是否抹煞成績呢？不能这样提，我們現在是作自我批評，"九一决定"估計了我們的統一战綫，估計了我党抗日以来根据地領导一般是統一的，团結的，党政軍民各組織关系基本上是团結的，因而支持了八年抗战艰苦斗爭的局面，不統一团結就支持不了，列宁講："我們要公开承認錯誤，揭发这些錯誤的原因，分析錯誤的环境，产生的条件。"

第九条"："必須使得党善于把先进战斗員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层的領导核心中去。"一切单位要注意領导核心的建立，沒有核心就不好办了，不能每个人都是領导核心，沒有領导核心怎样領导呢？領导核心是斗爭中形成的，領导核心的条件，斯大林講有两个斗爭，就是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忠誠就是这样的忠誠，是以成为无产阶級的代表，經驗是領导阶級斗爭，因此要善于运用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朱、郭要独立性，就沒有資格代表无产阶級。

第十条：斯大林說："必須使党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元化。"講改善自己机会主义成分，就是說要洗刷坏分子出党，經常清洗，經常吸收。

第十一条："必須使党創立起无产阶級鉄的紀律。"以此区别社会民主党，区别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紀律，自由主义发展了鬧独立性、小广播、講价錢，調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議，講了不作，見坏分子不批評，見坏思想不斗爭，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沒有紀律，創立这样的鉄的紀律，斯大林講要有这样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若干思想的統一，运动的目的明确。現在我們运动的目的，抗战，团結，部分人想打出去則与此相反，整頓三风也算一个运动的目标，整頓三风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級思想。一个是克服暗藏的反革命，目标要明确整三风开始是搞了一个万人，后来目标講清楚了整三风是整頓全党，这样就建立起紀律，要进行紀律，运动目标明确，設法整风，精兵簡政也是一个运动，它实行在困难时期，制度要精簡节約、統一效能、思想不要鬧独立性，現在是困难要反官僚主义，这样就把精兵簡政这个目标破了，斯大林講紀律基础基于什么？紀律是逐漸凑成，不是天上掉下或下一个命令，而是思想統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統一，广大群众对运动要自覚性，作到这些就要有鉄的紀律，否則就象豆腐。

第十二条：必須使得党有系統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斯大林把这一条放在最后，就是要我們經常检查工作。

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經驗，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一九四三年）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了，現在我們整頓三风，这些文件不仅总結了中国廿一年的經驗，而且总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經驗，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这个文件也十多年了。沒有这些經驗联共党史結論的第三、四、五条就难写了。

关于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領导一切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一条，我們的“九一决定”，我們要統一党的領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中講，不要闹独立性，这次高干会議又整頓各級組織关系，叫做整頓关系，这是我們对于这条怎样实行的。

关于第二条，我們要精通馬克思主义，精通实践联系，不脫离实际学馬列主义，相当于結束語第二条，第二条講得詳細，这里只是一两句話，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教育政策，在講到教育政策时，告訴我們要教育些什么东西，他說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育式的，一种是眞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論“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馬克思主义。

第三条就是我們的口头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我們有一个“調查研究的决定”，反对那种根据公式的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比来制定口号政策。第三、四条，是講方法論，制定口号指示的方法論，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定，第四条就是証明，采取革命步驟，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与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們說反对党八股，我們还有“四三决定”，这个决定上面有很多步驟，决定講的，各机关已实行了，在开始，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場，現在逐步轉过来了。

第六条講群众工作，講群众工作的原則性同群众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們要講原則，就是原則性，不要脫离群众，这是不要关門主义，講原則不是关門，講接近群众不是尾巴主义，对此中央有关“关于群众的决定”即联系第六条，边区如德源、隴东怎样坚持原則性，坚持原則性要密切联系群众，不是关門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把这提高一步，有了經驗。

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就叫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是講統一战綫。这个有左派幼稚病，有季米特洛夫七次大会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条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磨擦中，在反共高潮中，我們有許多經驗。我們的“三三制”，我們的土地关系，对土地关系的处理，劳資关系的处理，除奸政策，各种政策等，施政綱領与斯大林所講的这一条这一类性質，不要冒险也不要迁就，冒险主义不善于革命性；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决非尾巴主义，研究一下我們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中期，最近三、二年，現在实行的“三三制”、土地、劳資、除奸政策，有許多同志不滿意，我們应动不动，应捉的不捉、土匪鬧的厉害，还要想寬大政策是斯大林講的，十二条是沒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窰堡、延安附近，还講寬大政策，他那种寬大政策那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到处叫，还說寬大政策，施政綱領，这对觉悟的講寬大，人家天天整你，你講寬大，这样日本飞机还来加油，你还講寬大，就是要检查这样的事。

第八条：要講自我批評，改正錯誤，列斯都論它，这里引列宁的自我批評結束語第六条

"四三决定"，决定告訴我們怎样作自我批評，有"論党內斗爭"，有反对自由主义、党內几种不正确的傾向，都属于第八条，現在的整頓三风，属于这种性質，所謂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糊涂的团結，无原則的团結、缺乏自我批評的团結，是团結不了的，这样的党內寬大政策是非馬列主义的，缺乏批評斗爭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第九条講党內要經常改善我們党內成分，清除机会主义，使党达到高度的一元性，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教育政策，有四大标准，也可說是干部四大条件，第一要忠誠，一条是經驗，忠誠自己講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攷驗。第二条是講联系群众，嘴講不行，要群众自己覚得你是他們的領导，只要眼睛多看一些、耳朵多听一些，夸夸其談就少了，人家就相信你了。第三条是有独立工作能力。能卽有經驗，会領导无产阶級斗爭。第四要守紀律。

第十条講經常性清洗社会成分，洗刷机会主义分子，达到高度一元性，是結束語第四条，我們有"中央巩固党的决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員"，巩固党就要清洗坏分子，經党改善党組。党員应是什么人？党的文件回答了这个問題，要对党的敌人应該怎样与之斗爭，要清洗。

第十一条，講紀律，革命党沒有紀律不成，斯大林講思想的一致性，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統一性，党員的自覚性，这些就生长在紀律中。列宁論党的紀律与民主，我們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工人阶級的文章中。

第十二条講检查，斯大林論領导及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馬克思主义时代是不可能的，如整党、整政、整軍、整財、整×、整关系是有系統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人，林老，賀老以及其他許多人，你們是各地方有威信的人，要各部門的主要領导去检查，"四三决定"上講过这样的問題，因此十二条須得好好学习、研究、这是我們全党的圣經，不是教条，每一条都可以使用，可是有些情况，象社会民主党，我們中国沒有，我們更可能使用这一条，那么我們更要布尔什維克化一步，这个"化"要自覚。

我講这十二条，斯大林也講了，而是在許多年前講的，我們自覚的去作工作，学习馬列主义，干部要有計划的讀三、四十本书，不讀則已，有了經驗的人，讀了就通了。我們是土包子怎能讀呢？恰恰是土包子能讀得通，容易懂。这次整頓三风的文件是一部經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二十五个，不到十三万字，讀八个月，有工作經驗的人讀时就鉆牛角，为什么？是精神实質，要让他們去鉆，再到工作中去，朱、郭在过去沒有工作經驗，过去大概讀过几本书，到这里就大搖大擺为馬列主义而斗爭，这个文件有一、二万字，他的馬列主义从那里来的？是那国的列宁呢？就等于沒有讀书，我們讀不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因为我們不是朱、郭那样的人，有实践經驗的人讀了馬列主义，就会同群众接近，不接近就是脫离群众，就是沒有談进去，那就是反对列宁。因此一定要有信心，有的人是走馬观花，現在要下馬看花，一年一本就是三四十本，在学校学习一星期，讀一、二本，轉来工作一段再翻，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的来，請同志們攷虑。

电贺苏联紅軍第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同志，联共中央和紅軍的将士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代表全党同志与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紅軍成立二十五周年到与紅軍反攻的胜利。

經过了二十五周年的奋斗，特别是經过由国际劳动群众的“狂欢节”发展成为全人类的“狂欢节”。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經驗，一致公認紅軍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創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鋒。紅軍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規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紅軍从十一月十九日在伏尔加河上的危城发动反攻，三个月后就一跃而至六万多公里以西的德涅泊河附近。紅軍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驅出国境，只是时間問題了。自从紅軍开始对德战爭，世界形势就已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現在由于紅軍的胜利，新世界未来面目已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經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經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够的原則，我們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我們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爭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結和努力。与紅軍的胜利同时，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也都得到重要的胜利，英美正在积极准备实践欧陆第二战綫的諾言，对于中国，美、英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約。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結自己，准备象紅軍驅逐德国侵略者。我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結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們也一定能够轉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紅軍和紅軍的最高統帅斯大林万岁！

反法西斯侵略战爭的胜利万岁！

中苏英美的团結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毛泽东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問題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同志于二十六日晚，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講坛上出現时，全会場报以震动屋宇的掌声，該会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記处召集，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問題的两个历史文件。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理由及李富春同志朗讀两大文件后，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之資格，向大会作报告。

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美国通訊社所报导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現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論是反法西斯陣营中的和法西斯侵略者陣营中的，不論何党何派，对此問題都給以极度注意，就可証明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发問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級謀解放和

为反法西斯战爭尽力的么?

毛泽东同志說：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創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組成眞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战爭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中的功劳，他說："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經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三年中連續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作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爭、土地革命与抗日战爭"。毛泽东同志說到北伐前夜，共产国际如何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領导下的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組，并締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說到当时蔣介石先生曾啣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后当国民党的代表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議等历史事实时，他說："这就足以証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何等巨大，再不必說以后的土地革命和近年的抗日战爭了。"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革命运动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虽然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国有了覚悟的工人阶級，中国工人阶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了很大的功劳，那么为什么要宣布取消呢?毛泽东同志答复道：馬列主义的原則，革命的組織形式应該服从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与斗爭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則应取消这个組織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現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适合斗爭需要了。如果还継續保存这个組織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爭的发展。現在需要的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卽无需这个国际的領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間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亦更为迅速。統一的国际組織，无法适应这样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領导，要从仔細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爭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較单純，变化比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現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盜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間划了深刻的鴻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資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有效地組織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爭，国际性的集中組織，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領导干部已經成长起来，他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共产党的侧面来說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經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連續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經有了自己的身經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七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卽沒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內部問題，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的解放战爭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毛泽东同志总合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輿論称，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經訂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現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們看奇怪不奇怪呢!他們都异常狠狽地拚命指責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中，例如斯托哥尔姆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頑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絕該国共产党加入該党，現在却

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現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統一，以便有利地迅速地打敗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的頑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失去了他們的借口，他們就很不高兴，甚至說各国共产党也应該解散。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国也許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識的議論出現，我們且看一看罢。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議論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議論，缺乏任何起碼的常識。毛泽东同志說：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減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爭的需要。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至此，毛泽东同志以极其庄重的語調指出：現在共产国际沒有了，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負担了极大的責任。从这种責任心出发，就要发揮共产党人的創造力。我們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爭中，八路軍新四軍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們的环境很艰苦，战爭的时間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爭，正好鍛鍊我們自己，使我們用心的想一想，絕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們訊眞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負責的态度与高度的創造力来。

毛泽东同志极其强調地指出下列两种团結的絕对必要：一种是党內的团結，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結，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須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須团結在中央周围，任何破坏团結的行动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們投降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結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請同志們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导的陈宗尧、左齐两个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軍的团长，他率領全团走了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騎馬，自己背米，馬也背，全团的指战員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該团政治委員，他在战爭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鋤头，但在营里替战士們做飯，挑上山去給战士們吃，使得战士們感动到不可名状。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說：我們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时一刻脫离群众。只要我們不脫离群众，我們就一定会胜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态度問題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

（一）原四方面軍干部絕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由下届工作逐漸提升上来的，在国內战爭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誠，在克服国燾路綫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忠誠，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是，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軍干部中也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軍干部在国燾路綫統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燾路綫，但必須区别国燾路綫的单純追随者与积极执行之間的区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燾路綫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

助的作用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的关系，由国燾路綫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軍队的集中原則等原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燾路綫。抗战五年来的实际考驗了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在本質是誠实的、坚决的，証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燾路綫时，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的积极起帮助手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他們在国燾路綫时期，并未起此作用，就是对国燾路綫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爭取教育，使他們覚悟轉变，而不是抛弃他們，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視同仁，不能因为他們过去执行过国燾路綫而有所歧視，应該根据这些干部个人的德（对党忠誠）才（工作能力）資（資望）分配他們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該設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們提高文化、政治、軍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軍干部，如果在工作中有成績則应表揚，如犯錯誤（任何干部都有犯錯誤的可能）則应当就其錯誤的性質和程度加以指出和帮助其糾正錯誤，不指出和誇大錯誤都是不对的。应当有互相間的誠恳坦白的关系，任何隔閡、切断、歧視的态度都是不应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軍干部犯有錯誤时，决不可輕易加“国燾路綫的錯誤”“国燾路綫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干部的团結是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們的內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应継續相信中央和軍委干部政策的正出，放胆作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見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軍政党領导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的文化、軍事、政治学习，提高自己对党的認識和工作能力。

（六）十年內战，五年抗战已經証明我們軍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們来历如何，是团結一致的，現在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內反动分子想用一切办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內部关系，我們更应团結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閡。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地各級干部会报告并討論之。

关于批評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談話”的一封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你在二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談話”我們覚得不妥。茲将我的意見列下：

例如談話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爭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談話不强調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調是为着反封建，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济权利，而說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則出发。又如不說結社自由是为着爭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經济权利，而說是为着人类互相团結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沒有說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結分子应剝夺其居住迁移、通訊和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不应該受任何干涉。其他現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

大，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少、太小与太有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十一月公布关于寬大政策的解释，强調鎮压反革命分子的必要。你在談話中采取此种方針。又如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如又在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規定，而未将革命与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現在的任务，是用战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現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經济，这两者都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只有在阶級消灭以后，才能（实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消灭战爭、政治压迫与經济剝削。目前中国各阶級間，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經济上沒有废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們应該提出限制剝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且强調抗日，但不应該提出一般的，絕对的阶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說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时間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所說的“党內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見再告你。

毛澤东

六月六日

毛泽东思想万岁

（内部資料　請勿外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目　　录

在庆祝党的二十二周年晚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1
視察南泥湾时的講話（一九四三年七月）……3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3
論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十月）……6
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8
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高干会上关于軍队政治工作問題的报告(摘录)(一九四四年四月)…9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議代表招待会上的講話（报导）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18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講話（报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9
对随軍南下干部的講話（摘录）（一九四四年）……20
与中外記者团的談話（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20
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会上的講話（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22
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23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講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24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24
时局及其它問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28
在中共中央招待合作社代表会議上的講話（摘录）（一九四四年）……42
在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講話（摘录）（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42
在延安接見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講話……42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五年四月）……4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詞（一九四五年四月）……53
在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詞（摘要）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53
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总結（一九四五年六月）……54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問团晚会上的講話……67
給福斯特同志的复电……67
在日本投降时关于形势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67
毛主席抵渝发表談話（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72
答路透社記者（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73
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74
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关于国共談判报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74
为东渡黄河給楊立三同志的指示信……79
关于土地政策的发言要点（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80
对目前时局的基本分析（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80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85
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指示（一九四六年）……85
致暹罗侨胞的复电（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5
为美国对华軍事援助的法案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85
給美国海員工会三千华侨工友的复电（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86
給十二軍軍委的信（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86
答复时局問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87
复中国民主同盟馬来亚霹靂分部盟員大会主席的电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88
春节宴請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駐軍干部时的講話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88
接見边区部队一部分負責同志的講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88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时的講話……89
給內蒙人民代表大会的賀电（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89
給各野战軍首长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89
为糾正“左”的錯誤給中央局的信（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90
給中原局的指示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90
給×　×的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90
在中央会議上的談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91
在中央对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政策的指示上的批語（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106
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三月）…… 106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的按語（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106
对《关于新区工作問題的检討》的批示（一九四八年四月）…… 107
对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 10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問題的决議（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107
致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复电（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108
电复海外侨团答复对中共五一时局主张的响应（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 109
电勉吳化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109
豫西我軍解放南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109
复民主人士电賀（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110
中国人民、共产党和解放軍握有实現和平全面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110
国民党死硬派完全孤立，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現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112
蔣介石李宗仁优劣論（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113
对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語（一九四九年三月）…… 114
給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115
給傅作义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115
关于具体实現八項原則电复李宗仁（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115
我三十万大軍渡过长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116
我百万大軍横渡长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116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議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116
电复檳榔屿侨胞（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117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 117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議上的开幕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117

补　　遺

讀《伦理学原理》笔記…… 120
怎样看待别人…… 120
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規約（一九二六年十月）…… 120
《农民問題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122
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开学宣言（一九二六年十月）…… 124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在井崗山）…… 124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 126
告商人及知識分子（一九二九年）…… 127
关于暫行婚姻条例的决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28
执行优待紅軍条例实施办法（节录）（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128
关于春耕問題的訓令（节录）（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129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紀念运动的决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129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調查团报告书通电（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130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宣言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131
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132
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133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組織上的大規模动員（一九三三年六月）…… 135
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訓令（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136
貧农团組織与工作大綱（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137
粉碎敌人五次“圍剿”与苏維埃經济建設任务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140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142
一切革命斗爭都是为着夺取政权（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145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 145
为瑞金紅軍烈士紀念碑写的碑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146
在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一九三四年一月）…… 147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总結决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172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軍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178
在吳旗打給林彪同志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83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4

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講（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185
关于抗日救国的佈告（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185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議（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186
我们要文武双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189
对美国記者談中日战爭（一九三七年）…… 189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一九三七年）…… 190
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議的指示（一九三七年）…… 196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講（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196
中华苏維埃政府致西班牙人民书（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196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197
統一論…… 198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紀念題詞（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99
对《大公报》記者談抗战形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 200
致章、陶、邹、沈四先生的信（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 201
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員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九月）…… 201
寄給前綫战士们（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202
談抗大民主問題（摘录）（一九三八年）…… 202
論新阶段（节录）（一九三八年十月）…… 202
在抗大的講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231
談抗大农庄（一九三九年）…… 231
在欢送抗大总校深入敌后所指示的“三个法宝”（一九三九年）…… 232
《抗日模范根据地晉察冀边区》序（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232
在紀念“三一八”並慰劳保卫工作人員晚会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232
在中央干部教育学习动員大会上的講話（节录）（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233
在延安高干会議上的报告提綱（摘录）（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233
談爬山…… 233
給安吳青訓班二周年紀念的題詞（一九三九年十月）…… 233
为《大众日报》周年紀念題詞（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 233
在紀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講話（节录）（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 234
我们有一个好条件（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 234
《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出版按語（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234
不要片面講丰衣足食…… 234
复美洲洪門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 235
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紅四軍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議”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35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235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237
給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問信（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240
慰勉山东临时参議会的复电（一九四二年九月）…… 241
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十二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41
在志丹陵园紅星紀念塔上的題詞（一九四三年）…… 275
新年祝詞（一九四七年一月）…… 275

在庆祝党的二十二周年晚会上的講話

今天是紀念党的二十二年和抗战的六周年，現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們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敗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

毛泽东同志总結六年的抗战說：中国抗战已經六年，就时間来說，比别国却会更长一些。他指出：一年以来，世界战爭的形势已經有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全世界各国被法西斯进攻，法西斯則主动的进攻世界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进攻中打胜仗和压迫反法西斯的国家，这就是过去的情况，就是說，是一种不利，艰难困恶的情况。現在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起了根本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坚持六年，就是造成了这个根本变化的原因。其中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起了轉变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过去，法西斯侵略者非常猖獗，主动权握在他們手里，現在，法西斯侵略者已經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同盟国的手里了。毛泽东同志以肯定的語調說，今后的問題，要解决法西斯。这个解决要分两步，先解决德国，然后解决日本。往后的一年，是欧洲决战的一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去年我們曾經說过，欧洲在一九四二年即可决战，但是因为欧洲第二条战綫沒有开辟，因此沒有实現。今年的关鍵还是这个欧洲第二条战綫，如果愈早建立起来，胜利愈早到来。

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解释道：过去我們指出趋势，指出可能性，我們共产党时时这样指出，为的是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現在的盟国的被动状况已經結束，轉到了主动，所以过去仅是可能性的东西，今天就是轉变为現实的东西了。今天欧洲还沒有第二条战綫，但此事成为現实，一定是不会很久的了，这是今天世界人类努力的目标。

对于中国战場，毛泽东同志說，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則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亦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不贊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現在全世界結成了整个反法西斯战綫，任何国家都非孤立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从一个单独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要先看打什么对于整个反法西斯战綫最为有利。这样一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会是很順利的。

这样比較了过去六年抗战与目前形势之后，毛泽东同志結語說：可以断定，过去我們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現在接近实現了。

毛泽东同志継之总結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作一比較，又把二十二年前的中国与現在的中国作一比較。他指出：从这种比較中得出的結論，就使我們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加强信心，我們就知道世界将向那个方向去，中国将向那个方向去，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

毛泽东同志首先比較了两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空前規模的战爭，乃是世界經济发展的必然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列宁正确地預見了，而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乃是斯大林。他們的正确預見，証明馬列主义乃是眞正的科学眞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爭，是帝国主义战爭，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人是眞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其領袖是贊成帝国主义战爭的，其党員則最大多数是还沒覚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資本主义的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同盟国各国的共产党参加了这个战爭，这是一个正义战爭。

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第三年才由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隔不过二十多年，現在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爭中的主角，沒有苏联紅軍、苏联人民和苏联領导者斯大林，沒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还在不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領导的布尔什維克党，旧的俄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領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現在成为世界人类反法西斯的主角。

再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于是在东方，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日本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成立，印尼共产党于一九三三年成立。我們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現在却已經成了这样的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其自己經历的二十二年中已經干了三次大的革命运动，現在則协同全国人民組織統一战綫，集中力量对付日寇。我們現在絕非只有孤立的一个党，而有全国的人民，有全世界人民和我們一起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印度的四万万人，南洋的一万万人，日本朝鮮台湾的一万万人，实际上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毛泽东同志对日本共产党的領袖与日本人民的代表岡野进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說，我們久处山中，希望来延的岡野进同志多多指教我們，現在是为了联合打倒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将来是为了建設新中国与日本。

毛泽东同志轉到比較現在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他說，那时的中国，沒有共产党，人民不覚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外国人有好坏两种还分不清，还不知道将外国人区分为帝国主义者与善良的工农。那时馬克思已經产生了七十年，但我們还不知道它，学校里教員講哲学、經济学、社会学时，連馬克思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时中国已經有了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則还沒有，那时甚至还不承認白話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可是只替帝国主义者帮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却不但未改变，反而加深了。

現在的中国，則是抗战的中国，人民覚悟到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战綫来与法西斯作战，有了共产党，文化也进步了。我們常常把我們眼前的許多进行事情当作家常便飯，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改朝換代的大变化。

由此可見，不仅在抗战的問題上，六年来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就三十年前后的世界与中国来說，也有着两样根本不同的情景，那是翻天复地的大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用自己的手造出来的。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爭，必然要造出一个更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法西斯拉着世界往后退，那是不行的。向前进步，这就是我們的大方向。

“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毛泽东同志說。于是他轉到政策的問題，他說，政策可分全国的和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两部分来說。他說，关于全国抗战政策，党中央抗战六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四条向政府建議，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結”“改良政治”“发展生

产”。至于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我党去年七七宣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希望与各党派繼續合作，共同建国。

于是毛泽东同志講到党在边区与敌后的政策。他說，我們抗战，現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場，敌后抗战的斗爭非常残酷，我們共产党在那里是作了工作的，几年以来，我們創造了許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蕩”，“反蚕食”，精兵簡政、拥政爱民、拥护軍队、生产运动、整頓三风等等都是。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别的地方，看見有缺点，我們只有建議，但是边区与敌后則不然，我們可以自己动手，所以应当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毛泽东同志把抗战六年来党在敌后与边区的政策，分做两个时期来作总結。第一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后的四年半（到一九四一年底为止），第二时期，是最近的一年半。

在第一时期中，党的注意力，放在下列問題上：如何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如何发动群众，如何与友軍抵抗日軍的战略进攻，如何創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三三制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在这四年半的后一年半中，还曾被迫去对付反共分子的两次大磨擦。

在第二时期，即最近的一年半中，除了繼續执行上述各項工作而外，又进行了整頓三风，精兵簡政，拥政爱民与拥軍运动。毛泽东同志特别詳細地講到整頓三风，說这件事保証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組織成份的純洁。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些工作必須繼續不懈地进行下去，用以保証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的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現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1943.7.3《解放日报》）

視察南泥湾时的講話

（一九四三年七月）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們不能象国民党，他們連棉布都要靠外国人。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領地，欺騙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組織，并与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設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統。抗战期間，且則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騙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組織，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則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問題，不認識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針。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員，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針，而采取首长負責，自己动手，領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結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針，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問題。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級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問題。

上述首长負責的整个方針，是和內战时期，曾經在許多地方犯过錯誤的肃反方針，根本对立的。这个錯誤的方針，簡单地說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訊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的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誣陷好人，然后审訊人員及負責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絕对不可靠的供詞，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針与办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錯誤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样方針与方法的結果。这种錯誤思想的余毒，在許多干部中，特别是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負責的整个方針，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錯誤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員，走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負責，就是将大多数有問題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責成当地各級行政首长負責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門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門，必須首先改造領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問題的人，責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軍民学校机关自己处理的約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办理的約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軍法处处理（逮捕审訊）的約占百分之十。三省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是普通机关乃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崗位及学习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視。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組織自己的自卫軍，在一定时期內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員攜带通行証及互相出入外，一切有問題的人都暫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許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負責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須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說、詢問及研究，以便收集經驗，指导运动。空口指揮，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錯誤的。

領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結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員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繞着他組織几个小核心，再围繞着小核心組織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繞着这些核心的乃是广大群众。大多数有問題的人，均須經过核心組的談話与群众的質問、劝說、斗爭及展开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級核心，即是各級学习委員会及支部委員会与小組长，这些人須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漸的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結合，就是各級領导人員，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須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給予突破，才能取得經驗，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的給以具体的总結与指示。經常不断耐煩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錯誤，和少犯錯誤。

調查研究，就是調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現其問題。每一单位，須由領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員平日的言行，經过愼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計无問題的，一种是估計有問題的，經过上級在愼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問題的，一个一个的，予以实事求是的調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訊方法。

分清是非輕重，就是用調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瞞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們，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員，但有非无产阶級思想及犯錯誤者）与二条心的人混为一談；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輕重，或者是情节很輕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輕是重，全靠我們用調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輕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錯了的，必須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結論，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錯誤（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輕为重的情形发生，領导者必須精密注意，适时糾正。对于过左偏向，糾正太早与糾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則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則造成錯誤，損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糾正为原則。

爭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則上一律采取爭取政策，即寬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錯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給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絕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鎮压的必要，但总方針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計地，耐心地，热情地，爭取他們。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談話中，向他們說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敗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則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开解他們。延安經驗証明，絕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們爭取轉变为一条心的，許多人轉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們轉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們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爭取与软化共产党員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針，很少杀人。我党必須采取爭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們服务的方針，否則我們就是失敗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縱，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們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証最后不犯錯誤，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須平反，絕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則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錯誤。

培养干部，就是应該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員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調查、研究、偵察、訊問、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論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軍，一万老百姓，应該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日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数千杂务人員中，已經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易再侵入，才能与将来准备大批的鋤奸干部，肅清、爭取并改造許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該包括党員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內，就是說，不讓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員（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

将反革命分子轉变为革命的鋤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轉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經爭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轉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們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此次在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員中，一再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經驗，积极性发揚了，眼睛打开了，覚悟性提高了，党才眞正巩固了。如果沒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鍛鍊与提高覚悟，党的眞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脫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在过去审查干部問題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錯誤，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脫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的上級不可代替下級，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級审查一切有問題的人，一則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則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級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員、审查其他坏人肅清特务分子的經驗，并使有問題的人脫离当地群众，脫离工作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淪陷区調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內抽調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的代替下級，代替他处，則是錯誤的。为了防止下級发生偏向，上級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組織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調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这样就可以解决偏向的問題。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針与經驗，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們的具体环境，創造你們自己的經驗。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須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着进行。凡发現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組織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們。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經驗，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漸推广于其他部門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沒有思想准备与組織准备的地方，在領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門地方，便决不可輕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該着重整风或改造領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論合作社

——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三年十月）

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合作社方式。把公社劳动力組織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在过去，束縛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剝削关系的一半地区，經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区經过了减租减息以后，封建束縛削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地区就破坏了封建剝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轉够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則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設在以个体經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財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組織，

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宁边区的經驗，一般的变工札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札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組織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么，現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經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沒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全边区現有全劳动力35万个，今年經常組織在集体劳动中的变工队札工队的已有三万余人，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临时性的劳动互助，就延安县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还可发展。如果各县經常的集体劳动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达十万人左右，再加上临时性的劳动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齐，还有半劳动力也参加組織，这就是一种很大的劳动力。

我們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带着合作社的性質，比如一个連，就是一个小合作社，一个旅就是一个大合作社。在各种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生产之中，揚家岭运輸队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头。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应运輸物品27万斤，但实际运輸的只有19万斤，經費开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标准外，每月还要貼六万元，今年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运輸队改为运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輛，馱騾十六头（后增为20头）及全部用具作为80股，运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义作为二十股，共100股，每月按股数二、八分紅，一切人員、牲口、装置等費用开支，均由合作社自行解决，給公家运輸物品依照里程远近按斤給运費，运輸員的生活由运輸合作社适当改良。这办法經过解释后，全体运輸員一致贊成，执行結果，运輸量由每个月19万斤增为38万9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过了普通的运輸力量百分之三十。同时大大提高了运輸員对工作的責任心和积极性，节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又更加爱护牲口。比方，过去装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无人管，現在运輸員随身带着針綫，縫补口袋。过去貪污馬料是公开的秘密，現在却沒有这种貪污了，过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坏，就要求公家补充新的，現在只要能凑合着用，就对付着用下去，对牲口，过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喂好了；运費开支，改組后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过去除照顧供給标准外，每年还要六万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还每月获利数×元。

各机关采用这种办法后，也得到很大效果。管理局运輸营100头牲口，20輛大車，在未組織合作社之前，每月运輸量只有120万斤，改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輸量提高到185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我們的公营工厂及公营农場。

这一套办法，資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为我們不以剝削人民为目的，我們貫彻公私兼顧的方針。軍队中如三五九旅战士的紡毛綫，用柳楡树条編成各种用具。規定：凡动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結果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則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时无疑增加了战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的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們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員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問題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好办。因此，我們每个共

产党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負責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杂务人員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說，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說”。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說，才能把生产搞得好。

我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是一种合作社，农村的集体互助劳动又是一种合作社。此外还有包含各种业务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称为运盐队的运輸合作社，工人們集体互助的手工业合作社，把这許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为富裕的人。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情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講話

今天延安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我們去年开庆祝会时，紅軍还正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而奋斗，但在一年之中，紅軍的胜利就轉变了战爭的全局，由伏尔加河打到了德涅伯河，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又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沒有紅軍，战爭的局面是不能設想的。紅軍的胜利，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这个眞理，早已是明明白白的了。同时，这一年中，英美法联軍肅清了北非，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的敌人，空軍采取了攻势，配合了紅軍的作战。在东方，中国的軍队与英美的軍队也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一星期前，英美苏三国在莫斯科所开的会議，胜利的完成了任务，这也是值得大大庆祝的。这次会議解决了許多軍事政治問題，于十一月一日发表了三国联合公报，签訂了几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宣言。这次会議所討論与解决的問題中，据联合公报所說，首先最重要的，是为着縮短战爭时間，解决了确切的軍事行动計划，关于此种行动，已經有所准备。由此，我們可以想到，不久的时間內，我們将看得見第二战場的实际开辟，从东西两面夾击希特勒而打敗它，决定地解决欧洲問題。欧洲問題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

莫斯科会議的决議中，有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在抗战到底的决心下，全面地規定了保障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整个重要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四国在战爭中的合作，将使之在战爭之后也繼續实行，这样就打破了德日法西斯及各国內部的投降主义者离間英美苏中的陰謀，四国是更加紧密的团結起来了，战后的和平与安全有了保障了。宣言中又規定战后将組織包括一切大小国家在內而以主权平等为原則的新的国际联盟，作为保障和平安全的組織形式，我們可以想到，这种新的国际联盟，将和战前的老的国际联盟（虽然在其后期有苏联参加在內，但那时不容許苏联起重要作用）大不相同，它将是眞能保障和平安全的联合机构。

莫斯科会議决定了对意大利的基本原則与具体政策。其基本原則是：“法西斯主义及其所有恶势力及其所产生的事物应予完全消灭，而予意大利人民以每一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則为基础的政府机构及其它机构。”其具体政策的第一条是：“意大利政府应容納始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人民团体的代表，使其更加民主化”，第二条是：“意大利人民应完全恢复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与公共集会的自由，意大利人民并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团体。”此外有几条是关于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残余的，有一条是关于建立地方民主政府的。根据这些条文，消灭一切法西斯遺迹与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广泛的新民主主义意大利的方針是

确定了。对意大利宣言的末尾还作了一个声明，这声明說：“本决議的內容，决非付諸实行以反对意大利人民最后选择其政治制度的权利”，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声明，这就是說将来意大利人民选择民主制度，还是选择其它更进步的制度，他們是有权利的。莫斯科会議对意大利宣言是一个范例，将来将以此对待一切法西斯国家。这是完全区别于第一次大战的东西，历史上凡尔賽的帝国主义精神全扫除了，給了战敗国人民以自由解放的光明道路，这是苏联人民英美人民及各国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現。

莫斯科会議宣布了奥地利脫离奥国，同时責成奥国人民要为反希特勒战爭而努力。这也是一个范例，一切被法西斯吞併的国家或地方，均获得解放。

在三国会議上宣布了罗斯福总統、邱吉尔首相与斯大林委員长三人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規定了彻底惩办法西斯凶手的原則，一切法西斯劊子手将不能饒免。同时，宣言号召：“目前尚未沾染无辜人民的血跡的人民，切勿和那些凶手們同流合污，盖三国必将追寻他們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彻以瓦解法西斯营垒，象这样的带着深刻革命意义的宣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不能有的。

总之，三国会議的成功，确实是划时代的，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战爭及战后的人类生活，人类解放的曙光已經看得見了。那些对中国人民前途及世界人民前途抱悲观見解的人們，那些抱投降思想，抱无原則妥协思想的人們，已經証明是完全錯誤的了。

我們庆祝苏联誕生的二十六周年，我們庆祝苏联紅軍的伟大胜利，我們庆祝斯大林元帅的英明領导，我們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議的划时代的成就，我們庆祝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四国宣言！我們共产党人团結全中国一切爱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以这种新国家的資格参加到新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建設中，这就是我們的期望。

（1943年11月7日《解放日报》）

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軍队政治工作問題的报告（摘录）

（一九四四年四月）

一、关于边区軍队一年經驗的总結（略）

二、关于发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与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領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領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軍队以来，就創設了并发展了軍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綱領教育軍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队，使革命軍队內部趋于一致，使革命軍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軍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領导，提高軍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軍协助友軍的工作，达到团結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們的軍队和其他軍队的原則区别。我們說，共产党領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队的生命綫，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軍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軍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爭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內战爭时期与抗日战爭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紅軍中与現在的八路軍新四軍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軍队中所做的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彻底拥护人民

利益的軍队，如果我們的軍队沒有共产党領导，如果沒有共产党領导的革命的軍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沒有共产党的領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这种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軍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軍队。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战爭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們軍队的政治工作人員做的，許多的軍事工作人員及其他人員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許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都参加了軍事工作。这在內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內战时期来說，我們軍队在其初期是創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績的情形，特别是在內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爭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調軍党关系、軍政关系，官兵关系，軍民关系，上下級关系、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軍队間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說，在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創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們軍队的一部份优良传統。

以抗战时期来說，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績的。在这时期內，整个八路軍新四軍在党的領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爭，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結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恢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陣地的国民党軍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以击敗，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軍队繼續执行了党的路綫与党的許多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軍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軍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軍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蕩”，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搶光烧光的所謂“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許多中国土地，又被我軍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沒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确乏弹葯、缺乏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綫，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論在內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軍队的成績是伟大的，軍队政治工作的成績也是伟大的。軍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也和从事軍事工作的人員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員一样，他們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貢献的。

但是，我們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說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們应該采取自我批評态度，检討这些缺点，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們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統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認为我們政治中一切传統都是好的。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們軍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經地义，当作所謂优良传統在发揚。而政治工作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許多眞正好的經驗，眞正好的传統，却又被忽視，被抹杀。

我們的政治工作，在內战后期曾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来說，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經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許多成績，主要表現在对敌斗爭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爭，关于爭取俘虏等。在团結軍队內部与团結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績，例如，关于爭取人民参加軍队，軍队的更加有秩序。軍队中許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許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績主要是表現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軍队中，在另外某些軍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領导与政治工作領导上的絕对錯誤，就不但

看不出这种成績，反而摧毀了原有的成績了。但是，就其消极方面来說，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軍事工作特别是在軍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論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們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爱好空談，脱离实际；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团結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們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論。这种方法的表現，就是他們在許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視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軍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經驗，不适当地强調当时軍队的正規化，割断我們軍队的斗爭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調所謂无产阶級的領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級思想（卽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資产阶級出身的人們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視与不甚强調我們軍队所应該訒眞倡导与訒眞实行的眞正軍党一致，軍政一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級一致，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軍队間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訒眞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內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視了与强調了許多不应該重視不应該强調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結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爭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輕視了。軍队的三大任务，三項紀律，八項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訒为不必要了。軍队內部团結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軍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軍队不尊重党政，軍队打罵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現象，以及軍队內部官长对士兵的打罵現象，虽有指責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軍队之間的友好关系也減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軍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顧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顧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顧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軍事政治后勤三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驕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說成績，不爱說缺点，只爱听恭維話，不爱听批評話，惧怕别人批評，也惧怕作自我批評，有些則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級的領导机关鬧独立性的恶劣現象。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則至今还沒有改变。

在党內生活上，內战后期曾經普遍采用了过火斗爭的方針，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軍队中的党內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許多不应該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沒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錯誤地打击不应該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結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調的情形。在內战后期，曾經不适当地强調政治委員制度，不适当地强調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調所謂軍事工作人員与政治工作人員的党性的差别；对于軍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間，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些不协調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調不能一概責备政治工作人員方面，有些时候軍事工作人員也要負責任。

在抗战初期，曾經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錯誤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員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軍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調他的作用，否則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損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調十分必要。

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調是不对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强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軍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軍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爭，为战爭、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爭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蕩、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訓运动，防止奸細，整頓三风，統一領导，精兵簡政，拥軍爱民，改善軍党、軍政、軍民、官兵、上下級各部分軍队之間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組織上去保証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調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軍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軍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脫离实际，显得空虛的原因。任何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該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軍队的具体任务去談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軍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絕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問題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訛誤不清楚的，如果現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糾正。

应該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論在內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間輕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績，优良传統，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們的軍队始終是革命的軍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壯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訛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資阶級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沒有被肅清，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則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頓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漸减輕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軍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內战后期党的領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沒有当时党的領导上的教条主义，則軍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們检討工作中的缺点錯誤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責任，而应着重在总結历史經驗，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鑑。还应知道，我們的軍队工作与軍队政治工作总結是向前发展的，我們的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訛識也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錯誤的同志或是已經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經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我們应該团結一切从事軍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們的同志深刻訛識，如果我們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軍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們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錯誤，我們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軍队，就会无力巩固我們的軍党关系，軍政关系、軍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軍队上下級之間，軍队政治工作与軍事工作之間，各部分軍队之間以及軍队与地方之間的不正常关系，也就无力克服軍閥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偏向。反之，如果我們眞正懂得了馬列主义的方法論，如果我們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軍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調查研

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軍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盘任务就能完成，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經驗，北伐战爭、国內战爭，抗日战爭三个时期的經驗，都在証明这一論断。

长期革命斗爭的經驗証明，我們軍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純地对敌斗爭的任务，四軍古田决議中已經明确地規定了这一点。由于我們軍队的特殊环境，我們在內战时期，曾經規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軍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爭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爭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两項工作，就不适合于我們的环境，在內战的初期与中期，我們軍队曾經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說，在根据地沒有建立之前，曾經协同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經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爭中也沒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軍新四軍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試問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軍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軍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負在八路軍新四軍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爭，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們提出了軍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軍队生活与減輕根据地人民的負担。于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爭，生产与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縮小成为一个单純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們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結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現軍队的三大任务，过去軍队的三項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复。軍党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队之間的关系，必須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須使八路軍新四軍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領导，才能使軍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合全国軍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軍队的內部，必須是团結的方針，必須是合作互助的方針，不能是分門別戶，各自为政的方針，不能是互相輕視，互相妨碍的方針。凡属革命的軍队，在党的統一領导之下，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調专精自己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則是不正确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軍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則应学习軍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們的时候准备去参加軍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現有工作职位去作軍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軍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則应强調彼此的合作。不錯，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內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結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須取得和諧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卽应受到贊揚，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应卽受到批評与指責。

在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針下，革命軍队內部的爭論問題，只应該是思想傾向与政策方針的原則性的爭論，只应該是正确原則克服不正确原則的爭論，并且只是因为这种爭論，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領导，巩固官兵关系，軍民关系及其它各种关系，借以提高軍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爭論都应該完全是在党的統一領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場的爭論与对立，都是无原則的，而不应該允許其存在的。

在我們軍队中，应該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針，同时提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結合起来。应該使人們懂得工农干部

的长处，我們軍队中有大批的工农干部，他們已在历史上形成为軍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領导作用的骨干，这正是我們軍队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兵工作中也是这样）。他們中的絕大多数是忠誠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輕視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該使人們懂得革命知識分子的长处，我們軍队如果沒有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数，也是忠誠可靠的，他們的缺点，經过鍛鍊（特别是經过实际工作的鍛鍊）是能够改造的，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論工农干部与知識分子干部，都有他們自己的短处，都不应該驕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軍队中的老干部是軍队的主要骨干，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軍队。因此，我們应該尊重老干部，輕視老干部的观点是錯誤的。但是同时应該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們軍队的新鮮血液，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軍队的发展与壯大，輕視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錯誤的。新老干部应該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們抗日的軍队，壯大我們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軍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識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軍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們应該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們一道工作的态度。他們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慣，不熟練，是很自然的，我們应該善于帮助他們。

我們軍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識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軍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問題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問題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該糾正的。

在軍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爭取敌軍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統一起来。沒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胜的士气，沒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軍官兵。应該使我們軍队的指揮員战斗員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地歼灭他們，或俘虏他們，这就是我們軍队的一往无前，杀敌致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們軍队非常宝貴的历史传統，今后应該在我們軍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揚。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該轉变为說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質待迁上、政治态度上爭取他們，将我們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軍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話說，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揚这两种态度，正是我們的历史传統，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地发揚起来。

如果說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說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誤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錯誤，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們的历史传統，今后同样应当予以更大的发揚。

在我們軍队的軍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規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期內，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側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費时間，多費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說来，在

分配二者的时間上，軍事教育应占的比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則应占的比較少些，不可拿許多不必要的繁瑣的会議、汇报占去軍事訓練的时間，許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議，則多利用各种間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間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誤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們認为政治工作是我們軍队的生命綫，无此則不是眞正的革命軍队。必須使人們懂得，認眞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輕視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現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大多的时間，減弱了軍事訓練的时間，这是应当糾正的。

在軍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則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緒、政治認識与政治質量。但革命軍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該提高的，不能誤認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們可以而且应該利用各种間隙的机会去进行識字运动及其它文化活动。在陝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們的軍队是人民的軍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們絕不拒絕从地主富农資本家阶級出身，而眞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爭，眞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領导的那些人們，参加我們的軍队。这些人們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他們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糾正的。我們不应排斥或歧視他們，而应欢迎他們信任与尊重他們，和他們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漸地帮助他們克服其缺点。

对于軍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慣存在，是不对的，单純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絕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經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們的政策与方法不犯錯誤。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地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純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純惩办方法所能解决問題的，必須采用教育感化方法，定要絕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們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談話是最有效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談話与群众中自我检查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純的惩办，甚至打罵的方法，只是一种脫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軍队中一定要废止謾罵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議的决議，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謾罵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純的处罰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謾罵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罰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輕易采用处罰方法。

对于会門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漸地有步驟地感化与改造他們的政策，不能是单純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們尽了一切力量去爭取，而某些会門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們，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継之以爭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爭的政治工作，爭取敌伪軍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爭取广大民众加入軍队的政治工作，組織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結广大民众加入軍队的政治工作，組織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結广大知識分子到軍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結地主資本家阶級和我們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結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績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該継續坚持与加以发揚。

如果我們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項問題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糾正。

此外，在我們軍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軍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沒有着重說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說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陝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經給了許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們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喚起同志們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哪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計划时，他們的計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們只知道习慣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們的政治教育問題上（軍事教育上边有某些相同），我們教的东西与战士們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門喜欢談論国际大势与国內大势，却不愿意談論本地本軍与本連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的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談，却喜欢向战士們輸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們要守紀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現实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雄事迹，講給战士們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沒有講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內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測驗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計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課当做一种負担，当做一門差事，虛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測驗的时候，只知算問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許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員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內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們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陝甘宁边区說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上，还是沒有彻底解决的。

我們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們去检查支部工作，討論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記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議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議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議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議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員忙于到会，結果是大家討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議是毫无內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們討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多是消极地向战士找岔子，反映所謂“怪話”，因此，引起群众不滿。这种所謂会議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脫离党員，党員脫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沒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輸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訓練、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內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級机关規定許多报告項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級（特别是营連）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級只得拚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內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費精力。上級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整理，結果化为費紙，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們軍队中的許多組織形式是不合实际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結果人員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瑣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眞正的領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連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的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属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形式与組織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說的，是指我們有些同志做工作計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問題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致他們的許多計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抱。早已成了日常习慣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謂計划之內，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攪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謂"工作計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計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內只应該有一項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項工作，想在这很多項工作中获得成績。但其結果則是一項也做得不彻底，一項也得不到滿意的成績。我們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連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項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結果呢？仍然沒有发現問題，沒有分析問題，变成了一句空話。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結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組織，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換句話講，就是空喊。我們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們沒有估計那里的工作性质，沒有顧及那里的群众情緒，他們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們也看到我們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不負責任的。第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許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許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全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都只会損失威信，得不到任何的結果。与此相反，我們应該根据"首长負責，自己动手，領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結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結合"的原則，一經提出号召，就应組織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經驗，指导其余。如果沒有具体指导，則所謂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給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是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綫，不組織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鎖在狹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員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閑着。許多事情可以而且应該协同軍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們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員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顧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察群众的情緒，而是忽視群众的情緒。从而关于領导群众的艺术問題，关于如何团結积极分子，巩固中間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問題，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問題，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組織工作互相配合的問題等等，都被認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視。在这种情形下，我們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簡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們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脫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謂"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問題时，不凭自己的本領，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級，向下

級、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識，取得經驗，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問題，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脫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說，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实質上都是小資产阶級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軍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軍队的作风，是不能并存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減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綫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們的政治工作曾經有过很好的传統，古田会議的决議，就是这种传統的一个具体表現。过去工作中，凡是繼承了并发揚了这种传統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現其革命性与創造性，反之，就表現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現在在陝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軍新四軍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創造性。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們沒有形式主义，也沒有平均主义，也沒空喊，也沒有孤立主义，他們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們应該学习他們，应該表揚他們，应該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創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們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們，善于鼓励他們，他們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揚自己的成績，糾正自己的缺点。即使过去工作中曾經犯过錯誤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經驗已經給我們証明，干部中群众中蘊藏的正气、热忱、創造性、积极性，一經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們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們的党，我們的軍队，我們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关于組織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規定（略）

（注：这是一九四四年經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議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見《中共中央軍委扩大会議关于加强軍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于北京）

（据南京革命教育学院革造指揮等单位輯印本）

在陝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議代表招待会上的講話（报导）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現在无論外国和中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們边区的工业建設，也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沒有第二个目的。边区在五年前才眞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到了今年就有了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

非常远大，誰要不認識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誰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二年以內，要爭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面自給，首先是布的自給和鉄的自給。假如我們做到了全部自給，我們工人的数目还要大大的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們都向这个方面努力，共产党員，非共产党員都向这方面努力，象沈鴻同志、陈振夏同志，他們不是共产党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产党員一样。必要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証，就必須工业化，我們共产党員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的欺負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沒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負我們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們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决經济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工业，如果我們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們。在抗日战爭中間，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軍、百分之九十多的伪軍，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有成績的，但經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們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門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員都应該学习經济工作，其中許多人，应該学习工业技术。我們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門課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个工业的短期訓練班。如果我們共产党員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經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作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們应該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識。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講話（报导）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現在边区教育已經开始走上軌道，而这是与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进步有联系的。"

"所有我們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沒有根据地就不行。"

"今后延大的具体任务：在政治上要学习統一战綫，三三制，精兵簡政的方針，要学习各政策与方法。在經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輸；要帮助三十五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訂一个植树計划，十年內要把历史遺留給我們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給，达到每年出产三十一万匹布，四百七十万斤鉄。还有文化建設，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識一千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設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鬧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內容的年画、春联。

"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鬧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象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

"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錯誤，一經发覚，就会改正，他們应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点就公开講出是缺点，有錯誤就公开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錯誤

也就变成正确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对随軍南下干部的講話（摘录）

（一九四四年春天）

还要学会两种本領，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領，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領。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雪，严寒之下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則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蕩，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

一个共产党員应該有松树的“原則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行。

与中外記者团的談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毛主席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記者来到延安，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与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場，我們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場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我們必須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場的开辟，是經过长期发展的結果，是經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議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議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場現在是实現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計划是实現了，我們謹祝罗斯福总統、邱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們，应該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內情况，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須講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問題的态度，早已見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紙，今乘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終不变，抗战前期如此，抗战中期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国內关系和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設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継續团結，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問　題　与　答　复

问題：

斯坦因先生問：毛主席是否談一談，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談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問：上述問題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先生問：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請毛主席将一九三六年国共談判的情形与今日談判情形做一比較。

爱卜斯坦先生問：第二战場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闡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謝爽秋先生問：为着加强团結，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堉先生問：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增加問，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主席答：

諸位的問題可綜合为三个：

第一个問題：关于国共談判，談判已进行了許久，但是今天还在談判中，我們希望談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結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問題：关于第二战場。日前解放日报社論已說明是一个新阶段，我們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場的开辟是同盟国战爭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質，現在与过去比較，是沒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場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等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賴有苏联的进攻結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轉变。第二战場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現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說，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軍事方面，我已說过，第二战場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說，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們可以看見，外面的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問題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轉，是不能解决問題的。

第三个問題，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內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們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現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經驗都証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問，无論什么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这統一应該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軍官与士兵之間，軍队与人民之間，各部軍队相互之間，如果沒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軍队是不能統一作战的。經济民主，就是經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換与消費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

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該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該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們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們，我們也应該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統一，才是眞統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国与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議决議，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們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們来到边区已經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間留在边区，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彻着一个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点必須克服这些缺点。我們認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們所希望于他們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許多問題，沒有不可以說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間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換意見。我要說的，就是如此。

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你們是部队选出来的，你們代表八路軍、新四軍，同时你們还代表了我們根据地的九千万人民，也代表了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会，虽然你們不是他們直接选举的，但在实际上你們所执行的綱領和工作，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軍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我們的部队，不論在前方抗战，或在后方保卫边区，不論生产或練兵，不論軍民关系、官兵关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們还有缺点，我們要改正錯誤，进一步的提高。在去年拥政爱民运动中，我們运用了自我批評的方法，我們有缺点互相批評，軍队要有統一領导和紀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評，对于領导和紀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当然这种自我批評，只有我們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軍队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們的軍队是眞正人民的軍队。我們的每一指战員，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員、飼养員，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們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的干部和战士們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們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們要努力改掉，这样我們就无敌于天下。我們的軍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針：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結。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針，也是全

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針。‘我們的心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紧紧的結合在一起，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1944年9月23日《解放日报》）

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講話

（文教統一战綫的方針）

毛主席首称：“我們的一切工作的总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与希特勒一样是快要灭亡了，但是它还有力量，中国人民尤其中国解放区必需継續努力，才能达到最后消灭敌人的目的。这个努力首先是战爭，其次是生活，然后便是文化，沒有生产的軍队是飢餓的軍队，沒有文化的軍队是愚蠢的軍队，而愚蠢的軍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国的，所以我們必須有文化。有一部分同志曾經輕視文教工作，这是錯誤的，在这次会議后，大家都应該对文教工作予以应有的重視。”

毛主席指出：“它应該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日反汉奸反黑暗反封建統治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政治經济基础，就是民主政府，就是減租減息，就是以各种規模的工厂与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为領导的个体經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方面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反映，一方面又推动这个社会形态継續前进。”

毛主席說：中国的現代工业还很弱小，解放区的工业更是弱小，但它們是有无限前途的，中国必須以此为基础克服自己的落后。解放区的經济有其进步的方面与落后的方面，解放区的文化也有其进步的方面与落后的方面，解放区有作为領导方向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但也有广大的落后的封建遺产，如陕甘宁边区就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封建迷信的还在經过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影响着边区的群众，反对群众的脑子里的这个敌人甚至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困难，边区文教会議的任务，无論教育艺术卫生报紙那一項，就都是告訴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慣作斗爭，为了进行这个困难的斗爭，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統一战綫。如在教育方面，即不但要有比較集中比較正規的中小学，而且要有普遍分散比較不正規的村学讀书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內容的民办学校，而且要利用和改造旧的村塾。在艺术方面，即不但要有話剧，而且要有秦腔、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和改造旧戏班，特别是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在医葯卫生方面尤其如此，陕甘宁边区現在嬰儿死亡率高至百分之六十，成人死亡率高至千分之三，去年死牛七千八百头，死驴四千头，死羊二十一万只，死騾二千三百匹，人民相当普遍的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机关部队的西医是不可能的，为机关部队服务是很重要，西医比中医更科学，但西医如在这种情况下，不关心人民，不为边区人民訓練更多的西医，不联合和帮助改造边区的一千个中医和旧式的兽医，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帮助边区人畜的死亡，所以新形式与旧形势的統一战綫是完全必要的。統一战綫的两原則于此完全适用：第一是团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投降旧形式是錯誤的，排斥、鄙弃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人，而帮助、感化与改造他們。为了改造他們，就首先要团結他們，只要我們做的恰当，他們是会欢迎我們的帮助与改造的。

（1944年11月1日《解放日报》）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講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有的同志脑袋象个西瓜一样，西瓜表面是綠的，很純淨沒有什么，但是切开一看，都是旁的顏色，紅瓤黑籽，啥都有。有人表面看挺好，脑袋里装着自私自利，有封建迷信……，这些复杂的观念是我們的包袱，就是敌人。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議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結了，我們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們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爭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現。我們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現在美国已打到雷伊泰島，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北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綫，中国的淪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現此期間，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詭計，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誘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內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結，国共談判毫无結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的分裂着。正面战場的战爭，节节失敗，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滿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敗主义的政策，拒絕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結与民主的建議。只有艰难締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結各族人民，建立了英勇的軍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們应該做些什么呢？

必須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議，組織联合政府，才能統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們經过林祖涵同志曾經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問題，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談判，但是依然沒有結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談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現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在大后方，在淪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眞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員与統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現了，中国抗日战爭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胜利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該想出許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們必須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須动員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須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謀活动。青年們及其他各界，应該有許多人到敌人占領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則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

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爭，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責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經有許多党派，許多工业家、教授們、学生們，甚至許多国民党人，贊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認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的道路。但是現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該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淪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們必須帮助他們組織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軍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們的兄弟姐妹們。这一任务，現在必須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們应該学习法国的經驗。在淪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們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現了，淪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們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現在已經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这里有了六十五万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軍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們不論在軍事、政治、文化那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提出的呢？

我認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該注意如下事項：

（一）扩大解放区。无論那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較远之处，都还有許多被敌伪占領，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們的軍队应該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縮小淪陷区。我們必須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現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淪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狹窄的城市及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們包围的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驅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們的軍队已經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績，明年应該繼續这样作。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領，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地，必須号召人民組織武装部队，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經驗証明，組織众多的經过訓練善于执行軍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伪，組織人民，以便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綫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該这样作。

（二）敌人的进攻“扫蕩”是不会停止的，我們应該經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蕩”粉碎敌人的进攻，沒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們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現在已經改变了，須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記向我們进攻。我們还是比敌人弱，我們还須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軍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們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訓現有的自卫軍与民兵，增强他們的战斗力。自卫軍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扩大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組織在自卫軍中，在不脫离生产原則下，輪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軍队的任务。从自卫軍中挑选精干分子組織民兵，或基干自卫軍，在“战斗与生产相結合”的原則下，协同軍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的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該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当民兵，即是說，比現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是沒有十分重視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目太少了，又缺乏整訓，質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須改变此种情况。自卫軍与民兵，均必須不违农时，減少誤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

的，战斗的民兵組織与生产的变工組織，往往可以互相結合。自卫軍与民兵的領导机关，必須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軍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奋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訓練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訓正規軍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軍队輪番整訓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訓，举行群众性的練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軍队的消耗数額。在新发展区域，在經济条件許可下，应該扩大軍队。不論补充軍队与扩大軍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財政負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須謹記，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們就会要失敗的。

（六）軍队內部的团結，非常之重要。我們八路軍新四軍，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輝的胜利。但是，中国軍閥軍队的軍閥主义习气在我們軍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門，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該进行广大的工作，将軍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現象，例如：打人、罵人、不关心士兵的給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錯誤及缺点不耐心教育說服，輕易处罰，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慣及錯誤方針，从根本去掉。許多部队，現在还未重視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軍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訓計划，軍事整訓与政治整訓应該并重，并使二者相互結合，整訓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內部团結，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軍事整訓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內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錯誤，公开講明，迅速糾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团結內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軍优抗两項工作，进一步地改善軍民关系。我們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解放区人民之間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們能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軍。但是，旧軍队的习气，同样地会传染給我們的，軍民关系中的不良現象，例如軍队态度横蛮，損害人民利益，紀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軍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現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們曾經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許多地方还未重視。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軍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績来。已經有了成績的，必須継續做，必須检查此两項工作的結果。如果我們的全部軍队，官兵上下团結一致，从政治上鉄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軍事技术与战术的訓練，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証了。

（八）民族統一战綫是中国人民救国的基本路綫，在解放区，首先表現在各阶級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結經驗。共产党人必須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閡，去掉誤会，改掉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現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項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議（参議会）工作，政府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員，不管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一律被尊重，应該一律有职有权。

（九）減租，各地均有成績。但是有些地方成績少些，明減暗不減及恩賜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減得太多，或在減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現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糾正，減租之后，租約期滿的除在照顧双方利益原則之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該重定新

約，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該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該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因被地主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們解决困难，給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作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結他們反对共同敌人。我們現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問題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爭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絕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績，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績不大，另有一部分地方軍队方面有成績，人民方面缺乏成績。一九四五年，必須絕对无例外地普遍进行大規模的生产运动。一切軍队，于作战、訓練之外，必須从事生产自給，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况者，可以允許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須动員人民，在自愿原則下，組織生产互帮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組、換工班等。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必須用极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組織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規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該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該使人民逐漸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現的。我們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須力求自給，必須爭取在数年之內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給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經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运动相輔的是节約，必須尽可能的减少浪費。“发展經济，保障供給”，是我們确定不移的財政方針。如果我們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經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財政問題，就是錯誤的方針。如我們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經济，我們就能支持不論时間多久的战爭，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須使一切工作人員及全体軍民透彻地認識清楚，以便組織他們从事大規模的生产运动。在公私經济中，按質分等的个人分紅制度，是在很多部分內可以实行，并应該实行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两个原則，必須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們解放区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都是好人，他們的缺点甚至錯誤，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們是人民事业的可貴資本，他們应該被重視。他們中有許多人从事軍事、政治、經济工作，另有許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員，都应該被重視。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議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們則利于人民聪明，我們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步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組織，均应将报紙、学校、艺术、卫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軍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的选举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給与奖励与教育，經过他們去鼓励与团結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軍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經驗，已經証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該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路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們現有的干部，比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級与初級干部，不論是軍队的或地方的，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們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是不高的，有些則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們忙于工作，領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該着重于訓練軍队的（連至班）与地方的（区

乡）下級及初級干部，在职的用輪訓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計划地将他們提高一步。

（十四）我們工作作风中的一項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习慣于独断独行，而不善于启发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們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則上区别的。但是，我們队伍中确有許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維話，不爱听批評話。为怕碰釘子，受打击，遭报复，人們不敢大胆提意見。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們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員的进步。我提議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的提倡民主作风。不論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紧，各級領导人員，有責任听别人的話。实行两条原則；（1）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言者无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眞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們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贊的，这是很光荣的。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职位高抵，都是人民的勤务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們就能团結更广大的人民，我們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項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續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談判是一种办法，全国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办法。总之，我們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們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許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項，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驟在許多点互不相同，各地应按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項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爭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們也要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們解放区的全体軍民一齐努力，无論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結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組織淪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时局及其它問題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党校演講

同志們，今天这个会是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們以及还有許多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有些来了两三年了，我一次講也沒有講，我做得不对。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們开这样的会。在外还有許多同志参加。許多同志要求看見中央同志，要求看見从前方回来的同志，今天有許多同志都到了，将来我們还要請他們講話，很快就要开七大了，很忙，七

大以后，就有了工夫多跟同志們講。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过去沒有尽到职务。（笑声）以后我应該多来講。

今天講的題目也是同志們出給我們：一个时局問題，一个山头主义問題，一个审查干部問題，此外，我还要想講一点其它問題。

大家关心时局，很好。所謂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們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几个大国家是不是能够团結到底消灭敌人——法西斯。中国的問題是什么？中国是不是能够团結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头一个問題，有些报子上，特别是敌人方面經常散布謠言，說美国、英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团結的，說他們这个团結要破坏的。（从前就有过糾紛，現在还有很多問題沒有解决），說他們中間有糾紛、有矛盾、有斗爭。他們中間有沒有糾紛呢？有糾紛的，正在开会討論，将来还会有，所有一切問題中間，有很多問題是能够得到相互同意的，能够和气解决的；也有一部分問題是要經过很长时間，要拖一下，有些爭論。法西斯主义者，他們就希望三大国不团結。还有一部分人（我們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就是反苏反共的人，他們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打倒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里头也有許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苏联，反对他們那个国家的共产党革命，也反对别的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那么这个問題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我可以說，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結占主要地位，是統治的地位，这几个大国訂立了条約，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好些問題都能解决，現在又在黑海开会，我們估計有問題是可以解决的，他們能够团結。并且我們估計不但在战爭时期而且在战爭以后也是能够团結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間的和平。什么理由？这个理由在現在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打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打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們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十个师，苏联出了两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沒有苏联就不能胜利。沒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胜利。沒有英美比如欧洲第二战場拿出这八十个师，也沒有意大利战場，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沒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是少不了的。英美两国人民的覺悟，也比过去不同了，現在覺悟起来了，参加过看見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現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在坐也有这样的人就看見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們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第一次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覺悟程度怎样？那比現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覺悟，欧洲人民的覺悟，中国人民的覺悟，无产阶級，无产阶級的政党，比如共产党就沒有，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俄国有共产党，那个时候不叫共产党，叫作社会民主党。此外，布尔什維克的党，其它国家都沒有，只有少数的个别的人，比如德国有一部分，其它各国如法国，也多多少少有少数的人或小組活动，他們是与列宁、斯大林意見相同的，其它无产阶級的政党、工人的政党的意見都是与列宁，斯大林的意見不相同的。他們拥护那次战爭，因为那次战爭是帝国主义战爭，是反动战爭，所以列宁反对那次战爭。各国无产阶級拥护那次战爭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級覺悟程度怎么样，就是說覺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級尚且如此，其它劳动人民和知識分子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我講同志們今天你們很幸福，我們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所給我們的知識很少很少，什么叫做帝国主义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馬克思好象也沒有（笑声）連馬克思的名字也沒听到講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这几年中，中国人民就在那么一个中国的情况下，至于一九一四年以前就更不

用說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比如总司令、董老、边区政府的林主席、吳玉章同志、徐特立同志，他們这些老同志都参加过。那个时候幼稚得很，有沒有党校？（笑声）那就沒有，（笑声）象我們这样的党校那里会有？有沒有共产党？沒有！影子都沒有。有沒有紅軍、八路軍？沒有！一切都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切都沒有，中国沒有，英国沒有、美国沒有，法国沒有，德国沒有，各国都沒有，只有俄国有，但是俄国虽有，为数也很少。一九一四年开战，打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維克只有几万人，只有几万共产党員。从一九一七年到今年，三十年当中，我們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現在共产党有多少呢？有一百多万党員。三十年以前，俄国只有几万党員，还是受压迫的，还沒有胜利，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才胜利。从此在世界上就区别为两个时代，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以后。到一九一七年的时候，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七十四年了。但我們中国人还不知道。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你們看只有两天。七十四年不知道，两天就知道了（笑声），同志們，这就是行动，行动比較語言，比較文章走得快，当然沒有語言，沒有文章也是沒有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四年馬克思主义运动的結果。世界大战結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党派才发生，在那以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沒有，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起了变化，而且变得很快，这二十四年比較我們古代的历史，超过了二千四百年或者比二千四百年还多些，三千年，四千年都超过了，現在中国人民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欧洲人民，特别是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覚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覚悟提高了，英国人民的覚悟也提高了，他們参加过这样的大战，需要这样大的精力，他們的覚悟就提高了，并且还在継續提高，現在一月就抵得上历史时代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講打到柏林，比如講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苏联的力量这个原因，使英美的人民覚悟了；欧洲人民覚悟了，我們东方中国人民也覚悟了，覚悟提高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的結果，各国政府就不得不起来打倒法西斯。那一般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們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贊成，他就沒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美国无产阶級有很大的工会、几个月以前，美国选举总統，因为工人帮忙，罗斯福还当选了，美国有許多孤立派的分子反对与苏联合作。因为工人反对他們，所以他們就倒下来了。我們中国人民的覚悟使得蔣介石法西斯、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法西斯派别、法西斯集团）专門反苏反共集团的东西拿不出来，他們拿一个东西抛出来，比如抛出去一个东西叫做反对共产党，但底下沒有人拍掌，不象你們一样大家要求要見中央的同志，要見从前方回来的同志。你們不要看国民党法西斯抛出来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反苏反共的东西。比如前年，在坐的許多同志参加了这个斗爭，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中，国民党宣布要解散共产党，他們說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們为什么不解散？你們不解散干什么？又說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要你們等等，把这些口号拿出来，老百姓怎么样呢？老百姓沒有一个拍掌，就是說大家都說你那个东西我們不要看；（笑声）因此我們要"委員长"就赶快收起来了，他拿出来的时候說：咳！"你們看不看？"大家就說："不要看！不要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收起来的。同志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們的力量对不对？那是对的，都是这样的情形打平下去的，延安能够开这样大的党校，就是因为我們手里拿着枪！所以第一

是力量，不然还能开成嗎？开不成，单是拿枪也是开不成，但是沒有全国人民拥护我們，党校还开得成嗎？也开不成。单是拿枪也是开不成，那就是胡宗南在这个地方开党校，也是中央党校，但我这个校长就当不成。（笑声）

这就是說大家都拥护三个国家团結，三个国家也会团結，为什么团結？因为全世界人民有覚悟，这一条給全世界人民很大的利益。現在保障了能够打敗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証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那一年終止呢？这个問題也說一說。現在美国把菲律宾占到了，占了怎么样？全在中国海岸登陆，也不是会在几个月之后日本就会倒，我說看样子几个月还不会倒，今年也还不会倒，明年还要再看。总之，日本法西斯現在手里还有东西，他現在有一点照我們的办法："敌进我退"，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錢慢慢打。他就是这么一个計策，日本想美国是不想打长期仗了的，他打个两三年三五年他就是想回家，"你想回家了我就打，本錢拿在手里。"他用这个办法打，打游击战也是日本的主意。

我們中国差不多被日本爬滿了，到处都有，要請他出去，他不走还是要靠我們把他打出去，要靠我們党校的同志們在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才能把它打出去。我們現在小米也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軍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們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軍队，扩大解放区。总而言之，同志們現在上了一点年紀的人，二十几或三十几，你們都有这个学問，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个力量，你們不去搬它，他就不动只有一个原則。比如这个桌子，我不搬他，他不走，这个茶壺我不請他，他不起来。（大笑）他的脾气还有点傲。（大笑）日本人也是这样，是要我們請他走他才走的，所以我們要有步枪机关枪，将来还要有飞机大炮，他們才会走的。我們的軍队增加的很快，早一个时候，还只有六十多万。現在已經超过七十万了。我們解放区也扩大的很快，生产运动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还很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各个区域的工作也不够，我們需要准备力量，正是我們的力量还小，他才不走，所以我們要准备力量，他不是一年或几个月就可以走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結起来？要請日本走，中国的这两堆子的問題要解决。我們共产党就是小米、大米、机关枪、八路軍、新四軍这一套。委員长的兵力更多，有中央軍、杂牌軍等等，这两堆子能不能团結起来一致打日本人？我們天天要求团結起来，国民党現在口里也講要团結起来，因为他不講不行，他如果說："我不要团結起来！"那講不下去，但是他心里恨我們恨得要死。我这个活也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講的，为什么說他对我們恨得要死呢？因为，他亲自和我們的同志講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睜的。"死了眼睛还不閉，一句古話叫做"死不瞑目"。这是他講的，如果是我造謠，大家可以調查。（笑声）这是脑子里想的东西，但口上却挂招牌、要团結，現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又和他談判。看样子国民党他是不准备眞正解决問題的。他說要解决問題要照他的办法，我們提的事情他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們加进他們那个政府里去的，去他一二个人去重庆去吃大米。（笑声），他說延安比較差一些，我重庆大米比較好（笑声），你們来吃吧！（笑声），我們就說：委員长請你办几样事：第一样，禁止一党专政。他說，此事难办。（笑声）第二样，成立联合政府。他說那又不行。第三样：承認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說这个可以。我說这要看合得怎么样，因为在特务底下說合法是合特务的法。第四样：我們說

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說：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笑声）、第五样：我們說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制的那些合法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样：我們要他释放政治犯，他一个也不放。我們說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揚成武放出来吧！叶挺放出来吧！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員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一个也不放。我們是："一个不杀"，他就学了我們这一条，"一个不放。"（笑声）还有一条，我們說你把包围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們边区，老百姓也不高兴。你打日本沒有兵力，日本人到处窜得进来了，在华北、华中，你打我們的軍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們說我們这个解放区你贊成不贊成？要求你承認一切抗日軍与民选政府，这是应該承認的。这个东西也談不好的。去年就談到，他說解散五分之四，留下四个师，其它的統統解散，不晓得日本人那天和他談过，（笑声）講得那样清楚。（大笑）八条他一条也不办，就要和我們去吃大米。（笑声）我說小米也很好。要你办八条，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說一条也不办，談判情况怎么样？談判情况就是这样。

时局問題就講这点，国际时局，抗日战爭，国共两党关系。总而言之，同志們，靠我們在坐的同志，靠我們在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做工作的同志們，靠中国人民多搞大米小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軍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的地方組織秘密队伍，在国民党的地方发展民主运动，作这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什么事况，比如英美苏三国团結靠得靠不住，我們講靠得住，很靠得住，十分靠得住，一百分靠得住，一千分靠得住。单是新四軍，八路軍、共产党、沒有小米靠得住嗎？我說这只是一个条件，条件之一是力量扩大。单是有这个东西，如果不增加力量，还是有限的。我們在党校准备什么力量？我講好好学习就是增加力量。

二，山头主义問題。現在大家在討論山头主义問題，这个問題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問題，就是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东西，起他一个名字叫山头主义。所謂世界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我們这个党由很多部分合起来的，所謂山头不是那个人从他母亲生下来那一天，他母亲就告訴他說：你将来长大了，要去立山头，这是中国这个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不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級領导下进行革命运动，举出一个先鋒队来叫做共产党，这个党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交通不方便，大革命的时期，因为我們在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地方工作，交通很方便，山头很少。內战时期被敌人割断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間提长，上十年之久，抗日时期也是这样，时間很长，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們中国是出豆腐的，外国人不吃豆腐。我們中国可多得很，照割豆腐的方法，划了很多块子，方块，这不是我們自己划的，是敌人給我們划的。

象这样的党校，內战时期沒有办过，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除了內蒙古和西藏都有（內蒙古、西藏个把子恐怕也有）在我們这里学习的。但是，我們根据地还都被敌人分割的，在乡村里头就說这不是軍队的，而是麻雀陣，滿天麻雀，老百姓如吳滿有住在延安椰林区，这里有一个吳滿有，那里有一个张滿有，又有一个李滿有，一家一家分得很散，叫个体經济，农村个体經济、都被敌人划成豆腐块子，这些革命党革命軍队，团結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的很有理由的可以打倒。这就形成各种班子，各种集团，各个山头，所

以我說这是一个社会的产物。这是中国革命特别情形的产物，要消灭这个东西，将来要起变化，不但是我們开党校来分析来講清楚，而且要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了，到处交通很方便，报紙能消到全国，到处有无綫电收音机，开会很方便，那个时候才能消灭山头主义。所以我們应該承認这个东西，就是說有这个东西。我們党校討論，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討論这个問題，現在我們提供各个机关去开会，曾經在以前以后奋斗的各个根据地的人，各部分軍队的人去开会，檢討历史自我批評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說我山头太少現在要增加它几十个呢？我們現在来承認山头主义其目的是什么呢？承認山头主义的存在，其目的是要消灭山头，要使溶化起来，全党变成一体，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承認他，并且各个部分要去檢討历史，这种檢討都要在一个条件下，就是指导上要是正确的，开这种会这种檢討在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什么叫做指导上正确呢？什么叫做是指导上不正确呢？因为現才大家在这里討論这个問題，我提出这个問題研究，請大家討論討論。

首先就是說从团結出发，从团結全党出发，从一百万党員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們討論这个問題以便討論其它任何别的問題，我們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全党全国人民在外还有什么出发点沒有，或者叫做立場，还有什么立場沒有？沒有了。就是这个立場，全党与全国人民就是我們的立場，这是我們的出发点。

第二就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評。批評自己也要批評别人，这个分析也就是批評。我們分析这一个东西加以分解，分解是分成两个东西，那个是正确的，那个是不正确的，那些是应該发揚的，那些是应該丢掉的，这就是批評。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評。对别人也是分析，分析别人就是批評别人。被批評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难过，現在我們中央大家同志可以講話，中央有决議案的，无論是什么时候，你們凡是看到工作中間有毛病的地方，你們就講，不成問題，工作中間一定有些毛病的地方，講的話是我講的，做的事是我做的，加以分析，做的正确的那就要承認正确的，做的不正确的那就要修改，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講过的两条，坚持眞理，修正錯誤。我們把我們見到的工作，把中央的工作，把我一个人的工作，把你們每一个同志的工作，把你們每一部分、軍队的部分和地方部分的工作加以分析，不管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要分析，正确的东西就是眞理、眞理就是在我們斗爭中証明了是的东西，适合人民的要求，求得了斗爭的胜利。就是說已經在客观的事实上証明了是眞理，那就要承認，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要反对这样的眞理，我們就要解释，就要批評，認識了眞理就一定要坚持眞理，如果不坚持眞理怎么办呢？眞理要坚持，如果眞理不坚持把他推倒在地下打烂了，那就不得了，把眞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了，把中国无产阶級打烂了，也就是把共产党打烂了。所以大眞理也好，小眞理也好，都分眞理也好，凡是眞理都应該坚持，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錯誤，那怎么办呢？錯誤的不是眞理，凡是錯誤的在人民斗爭中間不适合的，在斗爭中間講的話不适合那个情况，做的事跌了跤子，写的决議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事分不对，假若是不对的，那就說是不对的那就叫錯誤的，錯誤的东西应該去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該丢掉，沒有理由还保持起来，有什么理由把他保持呢？人民不需要，实际工作中又行不通，話講錯了，事做錯了，决議案写錯了，如果决議案有十条九条不錯，一条錯了，那錯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修正錯誤，这就是坚持眞理。修正錯誤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員要不要这样，要这样。在党校学习过的要不要这样，要这样。什么叫公道呢？这就叫公道，坚持眞理这就叫公道，修正錯誤也才是公

道。但是同志們，这样你們脑子里就要有准备，我看見多少同志沒有这一条准备，所以就沒有分析。这是坚持眞理修正錯誤經常的不断地分析。这就是辯証法，辯証法的最基本一条叫做矛盾的統一，一个統一的东西，一个統一的东西可以分为对的和不对的，可以分得开的，如果不承認这一条，同志們，这就是不承認辯証法。辯証法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統一。統一的东西可以分开，这样的东西他不承認，他的东西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析的，是整个的沒有这样的精神准备，自己不随时看一看我某一点做錯了，比如身上穿的衣服有什么灰尘沒有，只看到好的东西，我的衣服沒有破，沒有破我說破了，不合乎事实，但是有点脏，穿了好几个月，是不是对呢？講的話合乎事实，灰尘多少总有的。冬天过去了把棉衣折了洗一洗，明年又是好的了，修正錯誤要有精神准备，多少同志因为沒有准备这一条毫无主动性經常是被动的。人家說你这里有灰尘，"我沒有灰尘，那里有灰尘？"他是被动的。我們要自动性，要經常檢查，檢查我的衣服我的脸，檢查我做的事和所說的話，所写的决議。把我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是眞理，什么是錯誤的改正。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就好办事。我們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假如你們同意的話，假如你們贊成的話，你們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眞理修正錯誤，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那里就跟那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自己看不到的多得很，眼睛看的只有这样远，沒有望远鏡有也不是不多，那就要准备請人家看，多准备一点，准备多少？准备一百条；这里有一点灰尘，那里有一点蚤子，"哎呀！有点痒"还有什么地方，有点什么多准备一点，准备一百条，我沒有看到經过你們講，这里講十条，这里是十条，这里講十条，多少条，多少条，四十条。我准备了一百条，你只講了四十条，我还有六十条准备你講，事实上沒有那样多，那里芝洋躑躅，要有这样的精神，一个說："沒有灰尘"沒有証据，拿鏡子来照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則說之，无則不說。現在大家講話可以講，講对了很好、講出来眞理。講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講的不对，講出来有什么好处？講的不对，講出来了可以受别人的糾正；講的不对，講出来他談你这話不对，他不講我就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乱講一頓，或者其中有几句話講的不好，受了你的批評，你将了我的軍，我就謹慎一点，我就糾正錯誤，好处多得很。

同志們，我們二十四年沒有胜利，这是我們国家太大了，也就是一个缺点，如果我們的国家小一点，假如只有一百万人我們就算胜利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們名字叫做中国人，落在这个地方那也沒有办法，国家太大了就出了一个长期性，这是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沒有胜利，三次革命都沒有胜利，北伐战爭沒有胜利，国內战爭沒有胜利，抗日战爭还沒有胜利，总而言之还沒有胜利，开党校干什么？办八路軍新四軍，一百万党員，就是要胜利，現在到了这个时候，有可能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內形势，国际条件，国內条件，有胜利的可能，就是不要缺乏主观的条件，什么叫主观条件？就是我們要不要胜利，我們的思想有准备沒有，要不要胜利？那个不要胜利向我們刚刚生出来的只有这样高的三岁小孩，他也要胜利，就是沒有本領。我們精神上有沒有准备？大革命北伐战爭怎么失敗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沒有精神准备，缺乏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錯誤，失敗了。內战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那时候沒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我們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因此也沒有胜利。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貝，这个宝貝就是人头，一个时期留下

的人很少了，是以百計算的。是不知还有一二千人？不知道，要調查一下，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以前的老同志很少了，虽然很少，但是留下了一堆，一小堆，这样一茶壺，这是宝貝，一不是金，二不是銀，是宝貝，比金銀还重要。第二个时期的人变多了，有多少呢？我看不过几万人，两万左右不会很多，那共产党有几十万，軍队也有几十万，老百姓有上千万，甚至有二三千万，但是象聋子放炮竹——散了。內战时期，現在还存在着的活着的党員我看有两万左右，現在我們有百多万党員，那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这两万人是宝貝，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比两万人多一点，三万四万，这一批人是很可貴的，两个时期都包括在內，我們做了这样正确的事，那样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人大一点便少跌跤了，你們現在不跌跤了，我現在也不跌跤了，因为我們小时候跌了好多次，因为我們現在已經"七十而从心所欲了。"我在小时，左一个跤子、右一个跤子，印象很深，我跌跤經常跌出血来，触在石头上便出了血，别人比我稳重，不容易出血，我說我这个人沒有用处，同我一样大的人，跑的飞快，脚不出血，我經常碰在石头上，那时候看来是拦羊娃謝了那些石头，使得我現在不跌跤了，少跌跤了，包括各位同志在內，你們現在把內战时期的历史检查一下，有些同志检討大革命北伐战爭，抗日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目的在得出經驗，不在于把責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个同志身上，沒有好結果，把同志放在磨坊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問題？不能解决問題。这些同志不是他母亲生他下来就下了命令要他跌跤子的。

中国共产党經过多年的时間，加以分析，把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加以分析，要从全党出发，就是要团結，团結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判，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結。团結批評团結，这是我們的方法，这是辯証法，什么叫辯証法？这就叫辯証法。辯証法的发展，辯証法的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整个分别，再来一个整个，这是辯証法。如果事情搞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沒有照辯証法办事。太行山×××同志講：事情怎么样办？照辯証法办事。我贊成他的話，事情沒有办好，就是沒有照辯証法办事。不是从团結全党出发了。你們各部份开会，內战时期，北伐时期，抗战时期，那部份也好，这部份也好，第一个观点出发点就是团結。团結那就一团和气，我們开会喊一声："团結"完了，一句話再一句話："团結"完了。照辯証法就沒完，要分析，要批評，搞清問題，分清是非輕重，——党內的是非分清楚，很公道，"坚持眞理，修正錯錯"，这样的团結加以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也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酝酿成熟。我們有很多經驗，搞錯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一个側面，沒有看到那个側面，常常是因为只听了这一面的話，沒有听那一面的話，我們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好嗎？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他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徐特立同志告訴我們說，人的手为什么要这样长，大指头上天，小指头向前面，方向不同这不是缺点？不是，如果方向同了那就沒有社会，沒有共产党，沒有八路軍，沒有中国，方向不同为什么沒有中国？不但沒有中国并且沒有苏联，沒有人类，人类在劳动中长这样的指头，因为他要拿工具，他要拿木头，必須手指这样长才可以抓到。"抓一把"就是因为这样，手指头长的方向不同这有道理的。团結加以分析，分析各种矛盾的意見、不对头的意見，听一听每个人的意見加以分析，分析的結果或者說是对的，只是句把話不好，或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的一部分不对的，让同志們講清楚，然后落在一个地方，运动发展到一

个地方去了，到什么地点、团結，我們党校是个很明显的証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个时期前年的整风有很大成績，这是第一条，也有許多缺点，第二条彭×同志告訴我去年好多了，昨天我給五、六部的同志也談了，現在所采取的方法，我講的方法，是从团結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結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結小部分人出发，是从全党出发，把我們这部分，那部分，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工作，加以分析得到的結果，这部分与全党之間也团結了，运动的发展是这样的，如果不謹慎，我們历史上曾有过这样許多的事情，头一个步驟就不是为了团結，头一步走的不对，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評工作也不很妥当，落的地点，落下去的地方是不团結，我們現在鑒于历史，这些历史很有好处，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覚悟了，盲目性逐漸去掉了，減少了，我們有这样一套，这对于我們准备全中国的胜利，有密切的关系，我們的延安，我們的党校，用日本人的話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部，一个头头我們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会要达到胜利。我們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是在精神上准备胜利，我們开这个党校，很快我們要开七大是精神上准备胜利，他的性質是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客观条体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們現在加紧主观条件，就是刚才講的这些。

山头主义問題上各位同志要經常注意这一点，你們毕业以后到每个地方要估計各种情况，王震同志打敌人去，出发时我对他講，一条叫光明，第二条叫困难，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辯証法，是矛盾統一。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打自己的咀巴？講光明就講光明，又講什么困难？我們党的历史有这样的时侯，只講光明，講不得黑暗，这不是辯証法，沒有照×××同志的意見办事，我們講光明同时一定要講困难，三七年、三八年抗大学生那时侯不要过五关斬六将潮水一样源源而来，滔滔不断，我那时不忙，不是这样三年还沒講过話，对不起得很！那时我可講的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所講的都忘記了，大家忘記，我也忘記了，有一点我还記得，我講同志們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貴州、綏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人利于我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說清凉山插了一面紅旗，叫做新民主主义之旗，中国要独立，三民主义要民主，要解决民生問題，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沒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們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一些同志在做梦时候或者沒有做梦的时侯，想的各种东西好象天堂，到了玉皇大帝那里，把延安看成天堂，你这样想錯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是人間，在天之下，在地之上，我一点沒有講錯，正确的方法是看着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給他們說了七八条，你們要装进去，不然三五个月，你毕业之后要长叹一声：“早晓得这样的延安，老子不来了。”来了之后一些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相当多，那些人大慨沒有听我講这点，沒有講通，以后講通了，文艺坐談会还有别的，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到延安来的，你怎么看延安，照辯証法的看法，从整个出发，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普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嶽太山，南嶽恒山，华中、华南、都是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对不对？当然对，就是这样的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下，那就好办，对任何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万岁！就是一个万岁，万岁之外还要准备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他的特点缺点，这个边区十有之九还有缺点，全中国胜利，党校搬到上海，北平去了，这里还有缺点。苏联人家搞社会主义革命經

过多少年？二十五年，有沒有工业，三个五年計划紅軍弱小呢，强大呢？相当强大。打仗的时侯希特勒都怕得很，他們出了一个戈尔洛夫，这叫做精神准备。你們出发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为什么要喊万岁，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英雄事业，艰苦奋斗，但是你要准备人多了来不及，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都沒有那样多，有缺点，官僚主义，一餐稀飯，一天吃了一餐稀飯就生气，还有那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他們只晓得你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不是"团长同志請坐呀！"沒有的，很不尊重，因为不很了解所以不很尊重，也沒有开欢迎大会，坐冷板凳，或者我自己少有缺点，人家說話就来了，"你还批評我呢？"我从前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延安党校，我少有缺点你就批評了，心里就有那样的东西，叫做气，同志們都要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鎖綫，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几个巴掌。总而言之，同志們你們要有准备，你們到延安来也要有准备，华北、华中，华南派干部来要有准备，到了延安，人家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人家那里有官僚主义，那里还不是莫斯科，莫斯科还有戈尔洛夫，难道延安便沒有了嗎？要講这些丧气話，講話为什么要講丧气話？不对我講头一条，講壮气話，我又沒講专講丧气話，只講壮气話，光明，光明，光明，但是事实有缺点，有困难，告訴同志們，不要只說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丰衣足食专向荒山要开荒，新式武器，鋤头一把，总而言之，大概得不到現錢的支票，不要开，或者可以得到的，也許得不到的，这样不要开支票，对于同志，战士，人民要講老实話，是則是能則能，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我們先估計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因为我們在那里不說清楚，一到这里就批評人家，我們的心是好的，人家不了解。所以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評人家，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熟了，那些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講有什么缺点，这样一講就講进去了。人家会贊成也会改了，采取这样的态度，現在各个部分开会，領导的同志，領导的骨干，三个、五个、七个、八个經常商量，要掌握作风，各部分的領导人，指导要恰当，这个东西很有关系，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适当，会就开不好。

三、审查干部。有些同志希望講一下，上次在这里我已經講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沒有听到，我再講一下，前年、去年我們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过去有过，但是沒有最近这两年，整风之后这样訊眞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們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也犯了許多錯誤，我們取得了經驗，經驗就是得到了成績，也犯了錯誤，这就是两条經驗，一条对于我們的党，对于中国人民，我們准备胜利。他的成績是伟大的。我們的方針有两条，我們对于我們的党，对于我們革命团体，要采取严肅謹慎的态度，在組織問題上为什么我們的党区别于資产阶級的政党，区别于小資产阶級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大政党、中国的国民党、我們跟他們是有区别的，他們也是不是采取严肅的态度，站在他們的阶級立場上，他們也是采取严肅的态度，但是象共产党这样的严肅性、紀律性、任何政党也沒有的，小資产阶級政党也沒有，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采取这种态度，无产阶級被压迫的阶級，手里沒有权力的阶級，要从压迫的地位、沒有权利的地位站到压迫压迫者的地位，取得权力，非有严肅的紀律不可，集中統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共产党的純洁性，这样的派別，从有党以来，是模范的党派，仅仅在俄国有。历史上的布尔什維克，执政以后，变成領导苏联的党，联共党史开卷头一条，头一行，就講由小組到联邦，馬克思主义到俄国少数几

个人稀稀拉拉的形成到联邦，現在是領导核心。小組是小指头，联邦是指房子。我們中国也是从小組到联邦，到了沒有？还沒有，走到了半路，要从小組出发，小組到根据地到联邦，現在到了根据地，快要到联邦。我們要准备胜利。中国的回、蒙、西藏各族成立共合政府，再成立联邦。将来的道路是这样，現在还沒有。要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共产党的純洁性，思想行动的統一，政策的一致？現在我們怎样？在整风以前同志們大家知道，我們党在思想上并不純洁，有非无产阶級思想，并且相当浓厚，就是說有别的阶級的思想在无产阶級先鋒队里，主要是小資产阶級思想，思想上純洁不純洁，不純洁現在怎样？大有进步，肃清了沒有？沒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开，是不是可以結束，可以解散？还必要，还要存在，并且你們出来要采取党校的作风，办党校或是非党校要使我們的党在思想上是純洁的，是馬列主义的，組織上是純洁的，就是說我們的审查干部在組織上，要使我們的党是純洁的，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講起来容易，要具体采取这样的态度，經常会忘記，似乎不太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小生产的反映就是自由主义，一群一群的进党，由几万到一百万。同志們，我們的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发展到一百万，思想不純洁，組織不純洁，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要发展呢？不要紧，要发展，我們不怕。这是我們党的一条政策，我們收了来，然后整风学习，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純洁的分子混进来了，里面是敌人派来的特务，特务，叛徒，自首、党派这些問題程度不同，严重性有重的輕的，但是我們組織上应該純洁，应該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对于这方面怎样？我講有很大的功劳，我們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員，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績，有人这一点看不出，我和几个同志談，他只看到我們犯了錯誤，他举了几十件，几百件也不够，我們知道几千件，拿件数算，数量不够否定我們运动的質量，这个运动的質量，根本是正确的，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結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們把許多問題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經驗，有了这条經驗，有了这条經驗将来我們出去，每个人到底去建設共产党，发展共产党，去整理我們的組織，使它純洁，整理我們同志的思想，使它純洁、整风、整理組織，审查干部、审查党員，一百万多党員抗战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发生了一个問題，我們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要的話就要有一个紀律，思想上純洁、組織上純洁的党，合乎統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結束語第一条講的要有一个党，要什么党？不是社会民主党，不是国民党，要共产党，要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第二条我們要有理論，所以这一經驗对于我們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我們要看到这一成績。在去年一年中間发生了一种偏向沒有成績，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的时候，我們的同志长了两个耳朵，这个耳朵听一下，那个耳朵听一下，但是缺乏分析，因此发生了偏向，这种同志我給他一講，他很贊成。

第二条經驗，就是犯了錯誤，拿件数来算就很多，我是党校的校长，就在这个党校犯了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整个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为发号司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发号司令的也是我。当然是你呀！但是同志們，关于这条錯誤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錯誤，好处也是犯了錯誤。（笑声）你这个話講的糊涂，乱講一頓。这样对不起一些同志，一些同志戴錯帽子，在坐也有这样的人，对不起，一种是搞清了是同志或者是叛徒或者自首，或者党派，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們对这些同志很和气，和他团結。这些同志很好，他自动的講出也好，被

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講出来，我們就欢迎他，帮助他改正錯誤，其錯誤不等，有的重一点，有的輕一点，有的再輕一点的，有很輕的。我講的話要算数，发出去的支票要兌現。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兌現沒有，还不是兌了現。如果口里講一个不杀，結果杀了两个，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一个不杀，沒有杀两个，也沒有杀一个，分清是非輕重，是則是，是怎么办？是特务，自首叛徒，是党則团結抗战，是特务現在怎样办？我們現在让他团結抗战，人家現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錯了路，算了。过去走錯的路現在不再走，走完了。我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錯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不敢講，不然人家早就講了，因为他害怕就沒有講，現在講出来，他們这样很好。这是对于这些同志搞錯了的同志。戴錯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怎么办，非則非，取掉帽子，賠一个不是，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賠一个不是，因为搞錯了。被戴錯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戴錯了，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們戴在他的头上，現在取掉帽子，賠一个不是，那么你应采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們給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該生气："搞錯了吧！我不是，为什么給我戴上这个帽子呢？乱戴一頓这样对不对？"这样很对。現在我把帽子拿下来，賠一个不是，你应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該还我一个礼吧！因为我向你行了礼，你要还我一个礼。現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就放不下来，照美国人的規矩，敬礼时一定要还礼，如果不还礼，他的手就放不下来，同志們为什么給你戴上帽子，因为把你当特务，不是当同志，我們搞錯了，这种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可是其結果，是向着同志，这叫做錯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这个运动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轉过来凡是戴錯帽子的取下来，所有这些戴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沒有空，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因为你是共产党員，你还有道理，我們沒有道理，所以你在这一点上应該睡着覚，应該把心安下来。同志們，从有共产党以来戴錯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沒有？有。賠礼的事有沒有？也有。但是象去年我們这一年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錯个把帽子取下来就不賠理。所以我說承認錯誤，賠一个不是，这是我們的进步。是我們全党的一个进步。我們要不要胜利，要胜利，一切都是一样，凡我們对于人民講的話，决議案，这样政策，那样政策，搞錯了的就要修正錯誤。我們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評。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宁主义概論》。講列宁主义方法論有四条，其中有一条方法，就是自我批評。我刚才講的第二个問題山头主义，講来講去就是自我批評，就是这个方法。团結、批評、团結第二个步驟就是批評，中国要胜利，我們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錯誤本身他有两个側面，一个是不正确犯了錯誤，第二就是恰好犯了这个錯誤之后，就会变成經驗。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得到了經驗。被戴帽子的以后給别人戴帽子的时候，你就謹慎，你吃了亏，凡是被戴錯帽子的同志你們得了一条經驗，你們不要乱給别人戴帽子，因为他自己吃了这个亏，以后要謹慎一点。将来我們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作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說两条經驗：一个是成績，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对。我們要胜利，成績以后要发揚，錯誤以后要修正。戴錯帽子的同志，你們是牺牲者，所謂牺牲者就是戴錯了。但是我們要認識到这个經驗对将来运动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严肃态度，謹慎态度。鉴于有問題，我們党組織上不純洁，思想上不純洁，就是应該采取严肃的态度，鉴于把錯誤戴錯帽子，就是要采取謹慎态度。这是两条路綫的斗爭。严肃态度反映右傾，不严肃就是右傾自由主义？謹慎态度就是反对左傾，不謹慎就出乱子。

最后一个問題，就是上次我在这里講到各部革命团体。講到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每一方面軍里又有各部分。其中講的不完全，对于四方面軍里有几部分我就沒有講，因为我不很熟悉，还有一个十五軍团也講脫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告訴我，这样很好。十五軍团以前受过很大牺牲，干部都杀光了，剩下的很少，其它各部分我都提到，一方面軍各个部分，一軍团、三軍团，九軍团、五軍团、六軍团、七軍团、十軍团，一軍团內又有五部分，三軍团內又有各部分；提得不完全，大部都提到了，革命根据地都提到了，今天我想补充的就是那天沒提到的。

第一个問題是南方北方問題，这个問題我早就注意到了，在那天忘記提了。現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拿地方来說，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来的南方人，第二部分就是本地人。这个問題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們的同志注意这个問題。这个問題的性質就是外地与本地的关系，軍队与地方的关系。因为外来与本地、軍队与地方在抗战时期中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就很多到处发生这个問題，是一个普遍現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認識，要認識本地，認識边区，認識华北、認識华中、要認識本地各地同志，他們的功劳，他們的长处。因为我过去沒有講清这一点，也不怪那些同志。我以前沒有好好分析，在整风后才講这个問題，綜合了好多經驗，这中間有外来和本地、軍队与地方。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現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們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該感謝他們，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該感謝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維克。为什么感謝他們呢？因为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轉移到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爭，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南方，北方也参加，但主要的都是南方，南方很光荣，对不对？很对，南方是很光荣。但是同志們，这些革命都失敗了，太平天国失敗了，辛亥革命失敗了，北伐战爭失敗了，土地革命失敗了，都失敗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那两套。南方有老布尔什維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維克，并不很少，我們边区就有好几万，华北也有一大批。××同志講华中也有。南方老布尔什維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我們要承認这个边区，不要不好，不好，还不是不好，叫做“地广人稀，經济落后”，那也应該承認。但是他那个地狹人稠那里去了？上海在你手里？那儿去了？你那个中央苏区到那儿去了？給了蔣介石。只有这个根据地保留下来了。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陝北、陝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我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紐。經南一轉，轉到这个地方，然后由这个地方再出来。好象这样的門，我說是中国革命起承轉合，門的枢紐能够一开一关。陝北是上面頂天下面立地，起承轉合。起是从这个地方起，不自南方起。这里有高、刘、张承南方。轉就是从这个地方轉。万里长征，脚搞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你走好久，到落脚点休息一下。你們党校也在这个地方落脚，你們英勇奋斗，八年抗战，华北，华中、华南，你們还不是落在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是我們的落脚点。我們不是永远在这里住一生，生儿子，儿子再討老婆，再生儿子。你們要走。将来中央走，这个地方是出发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抗战以来，除了新四軍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又是从这里出发，你們等两天也要从这里出发。在北方华北也有多年的老党員，象××，××，当然还有很多，他們坐在班房里头。只有我們英勇奋斗，人家不艰苦奋斗？他們坐在班房里和敌人斗爭。在北方华北的地方党也有几次暴动，好多暴动是失敗了，有很多地方有內战时期的党，許多同志經

过三个时期：北伐战爭、国內战爭、抗日战爭。听××同志講在华中发現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在苏北、苏南。

这个問題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們的同志应該看到这个問題。外来的同志应該看到这点，不但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南方是光荣的。这就等于講一方面軍是光荣的，二方面軍也是光荣的，四方面軍也是光荣的，陕北紅軍也是光荣的，在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几万是南方的，九十万是北方的，这就应該特别引起外来同志的注意：一百万中九十万是本地人，只有几万是外来的，这几万同志对于这九十万同志应不应該尊重，感激，看重？完全应該。这九十万应該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們教訓了我們关于战爭这一套經驗，他們有經驗，經过国內战爭，北方也有一部分国內战爭，大部分还是在南方，他們教会了华北的人民，华中的人民。这是一个問題。

第二个問題，关于大后方党的問題。关于大后方党的問題，大后方党在战爭时期大概的数量有十万，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在坐的还有許多同志是他們領导的。因为在前年审察干部的时候，有同志覺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紅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結果，事实上証明也是两条。有問題应該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統治底下，坏人混进来破坏我們，我們今天应該承認这一条。在南方同志里头混进了一些坏人进来了，不純洁的人混进来了，因此，我們应該采取严肃的态度。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記不可以为多得不得了，究竟有多少，数目現在还不能算，等将来全国胜利，由小組到联邦才能搞清楚，是估計可以做的。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該說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講？因为在那里大批是农民同志，农民同志在国民党就是破坏了的地方，对他們也不大注意，我們又采取疏散的方針，聲子放炮竹——散了。到处散了，一盘散沙，現在大后方就是这样的政策，就是从前外国人飢笑中国人的話——一盘散沙，就可留下来，就可以不被破获或少被破获。还要估計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他的特务励害是励害，第一条励害，第二条官僚主义。我們不承認励害不对，合搞，那样励害，三头六臂，三头也沒有，只有一个头，蔣介石也不只是一个头两只手，和我差不多。我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比較少一点，国民党还要多一点。我們自己要搞清楚，特务励害，还要加上官僚主义。究竟多少有問題，多少沒有問題的，現在誰也不能答复。要由小組到联邦才能答复。这次王×、戴×出去建立根据地，就采取严肃的态度，謹慎的态度。大体上这样两条，一条承認那个地方党有問題，一条承認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沒有問題，是純洁的。一部分是不純洁的，有問題的，大部分是純洁的，沒有問題的。这样的估計应該做出来，应該講南方工作同志有成績。

这点，他們要去检查，总的来說，在抗战期間，有成績。在战略方面来說只有根据地也不行。有三方面的战略：解放区，淪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这是第一个問題。

最后白区工作問題，这一条我从前沒有想到。那天××同志告訴我有这样的一个問題。很好。从前我們批評內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領导路綫是有問題的，在某些时候应該說是錯誤。因而使白区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过去說百分之百，現在看沒有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損失了，領导路綫是錯誤的，应該受批評。批評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工作好好地做，不要再有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說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沒有功劳，致于在南

方根据地失掉，在領导上犯了毛病，根据地失掉了，并不是說紅軍战士、干部、地方同志干部他們沒有功劳、沒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一样的。白区工作的同志沒有坐班房活着的？沒有坐班房死了的？坐班房死了的，这几部分人，他們替党替无产阶級作了英勇斗爭，为了斗爭，他們拿着命拚，因为这样坐了班房，少数僥倖外脫的沒有坐班房，应該估計到他們的成績。这是关于白区工作的問題。

这三个問題因为上次沒有講，今天补充一下。今天我想講的問題就是这样。很对不起，同志們坐了很久，講完了。（鼓掌）

在中共中央招待合作社代表会議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四四年

……自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間合作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軌道，出現了大批模范的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第一，合作社是为什么人办的？是为广大群众办的，为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和十万部队机关学校人員。这个方向都为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經确定，这是刘建章的方針。一年多以来，很多合作社都朝着这个方面走，都有很大成績。但是还有些合作社沒有解决这个問題。因此这次合作社会議要重新宣布这一条方針。第二，合作社办些什么事？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項：工业、农业、运輸、畜牧、供銷、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組織起来。……第三、合作社統一战綫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資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領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經营的經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組織。第四、所有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們，都应該訊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該有絲毫輕視的心理，边区的任何經济、文化事业都必須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因此，要鼓励更多的同志們去参加合作社事业。……

在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

我們的任务是团結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我們早就实現了这个方針，今后更要加强它。共产党員，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的团結起来，我們团結得越好，則对于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

在延安接見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講話

你們都是从外地来延安的，首先要习慣住延安的窰洞，也要学会住延安的窰洞。延安的窰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窰洞有馬列主义，延安的窰洞能够指揮全国人民的抗日战爭，全国人民現在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也寄托在延安的土窰洞里。所以你們要看得起延安的土窰洞，要学会住延安的窰洞。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五年四月

講三个問題：（一）形势与路綫；（二）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問題；（三）关于党的几个問題。

（一）形势与路綫

七大应决定一条什么路綫？我們的政治路綫是：放手发动群众，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領导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前者是組織队伍，后者是目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一条路綫不是我們党內历来就有的嗎？是的，历来就是这样，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質就从旧民主主义变成了新民主主义，从大革命到內战到抗战。我們的路綫我們的鋼領，用一句話說，就是我們的革命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們的綱領就是这一条，若干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就是为着这一条綱領奋斗幷团結起来。我們的軍队就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軍队，我們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們的經济就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經济，我們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总而言之，当前的一切革命任务，就是这种性質的。这里边有队伍，有敌人，有指揮官（領导者）。队伍卽人民大众，敌人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队伍的領导者指揮官卽无产阶級，說我們的綱領很多，不好記，但是幷不怎么复杂，就是这么几条綱，这条綱領常常被同志們忘記。反帝記得牢一些，反封建常被忘記。何以忘記了呢？因为农民大众里有农民也有地主，反帝是要农民还是要地主呢？要地主卽容易忘記要农民，要农民不易忘記要地主，所謂人民大众，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有一个时期却忘过农民，一九二七年卽忘記过，当着农民伸着手要东西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却忘記农民，抗战初期也犯过类似的錯誤。靠什么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国？所謂人民大众最主要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資产阶級，再其次才是其他民主分子，忘記农民就沒有民主革命，就沒有一切，沒有民主革命也就沒有社会主义革命，忘記了农民，你就是做了一百万件事情，也沒好处。因为沒有力量。仅仅靠几个小資产阶級，自由資产阶級，沒有力量。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沒有农民就沒有一切，沒有农民誰給你飯吃？誰給你当兵？沒有吃，沒有兵就沒有一切。

无产阶級有一部分組成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級覚悟的部队，当然也有别部分的人参加，如农民、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自由資产阶級，地主等人，但这是他們的出身，出身和进党不同，进了党就成了无产阶級的党。革命要組織队伍，就要靠农民，組織了队伍，就有了一个指揮官，在中国要么就是无产阶級，要么就是大地主大資产阶級，主要的体現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的社会是两头小中間大。两头小，但两头都强。中間大，但政治上都弱，两头强卽共产党、国民党。自由資产阶級同我們爭領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資产阶級进步的不得了，与共产党差不多，他們有他們独立的綱領和行动，現在卽是民主同盟（其中也有小資产阶級），民主同盟主席张瀾发表的声明，卽他們独立的政見，左舜生的一次声明亦然，他們

也贊成联合政府；他們也在联合政府問題上和我們統一起来，所以我們目前还要团結他們。但他們有独立的主张，他們是左右开弓，他們一方面不滿意国民党一党专政，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他們站在国共两党之間，这就是規定了他們自由的性質，所謂中間派。

大革命时期我們犯过錯誤，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們的党是馬克思主义的，后一时期，就是少馬克思主义或者是不要馬克思主义了。大革命前我們組織了一千多万农民，什么是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級領导农民起来革命就是馬克思主义。就是說那时已有馬克思主义了，一九二七年以来陈独秀为首的党，忘記了人民大众，忘記了农民，忘記了无产阶級領导，那就沒有馬克思主义了，他不要无产阶級領导，有时又不要农民，农民伸出手来要东西，他泼給农民一盆冷水，共产党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帝国主义是要到中国来揩油，而中国五分之四的人民是农民，就是說中国五个人中四个是农民，比如用五个指头打敌人說不得了，砍下四个剩一个小指头（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这样就使无产阶級孤立起来了，无产阶級总司令沒有（农民）了，这变成"空軍司令"了。农民不来，小資产阶級也不来，开小差了，这不能怪小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就是看你力量大不大，小資产阶級有时很凶，老子天下第一，有时他又屁滾尿流。当你剩下一个小指头时，你向他說："同志来不来"？他不来，他說有事，家里老婆生了病，这不能怪小資产阶級，只怪我們总司令手下沒有兵，沒有力量。只有我們的总司令招兵买馬，原草国粮，我們有了四个指头即五分之四的农民及其阶級，有力量了那他就来了。你叫他，他本来有事，他会說沒有事，老婆也不生病了。从前犯过錯誤忘記过領导权，即要領导总有个被領导的吧。大革命后期，农民不来，小資产阶級也不来了，于是地主集中力量一打，朋友也打来了，又搞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对呀，但又来了个急性病，急性病也是不要农民，他們只要工人，急于打大城市，农民是附带的。住在农村不懂得农民，走馬不看花。下馬看花叫調查研究。走了两万五千里，沒有看見花（农民）。什么叫富农，中农？对不起不知道，小資产阶級，其他民主分子要不要，于是又成了"空軍司令"。我們党曾經两次大了又小，第一次五万党員，后来剩下一万，第二次三十万，后来剩下二万五千，現在又立起来了，可再小不得了。如象女人脚現在是放的时候了，不要再包了。抗战以前我們有准备，叫放手发动群众，壯大人民力量，中央历来都是說，只有人民战爭，才能打敗敌人，所謂人民战爭就是农民战爭。从来沒有說过不要人民战爭，可以打敗敌人，从有馬克思主义以来，一百另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的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沒有一个說过不要人民战爭可以打敗敌人。（有各种各样的斗爭，政治斗爭、思想斗爭、經济斗爭，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是軍事斗爭）。但是很多同志由于馬克思主义不很多，可以随时忘記农民，不要人民战爭，这样即使发表演說他是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他自封的，是假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以为依靠国民党可以打敗日本帝国主义，这就表明沒有馬克思主义了，党內这样的人还不少。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八月洛川会議，十一月活动分子会都批准了中央的政治路綫，曾經肯定了这样一条政治路綫，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中央不相信人民能够打敗日本，能解放中国，至少也是暫时失掉了馬克思主义，相信即不会失掉馬克思主义，暫时失掉馬克思主义，还可以招"魂"，把这个"魂"（馬克思主义）招回来，不相信沒有人民能够打敗日本，这样提出問題不是将无产阶級降低到資产阶級的，而是資产阶級提高到无产阶級，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要把資产阶級的綱領提高到无产阶級綱領，不是要把无产阶級的綱領降低到資产阶級的綱領，这个問題就是

說无产阶級吸引資产阶級呢？还是資产阶級吸引无产阶級呢？这样說法被人家駁斥过，說这不是馬克思主义，这种說法就是爭領导权，为什么不是馬克思主义呢？資产阶級总以为他对。我們应向广大农民宣传，要农民，小資产阶級团結起来，只有团結起来才能打敗日本，才能胜利，只有这样說法才是共产党的宣传队，这样两句話并不复杂，要告訴人民团結起来，組織人民的軍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他的軍队，改造他的政府，不改造不行，依靠中国人民，民主分子和国际力量，我們估計国民党能改造，結果国民党来改造我們，在估計上犯了一个錯誤，但也有好处未賠錢。我們要他改造，天天这样講，老百姓都知道了国民党的臉脏得很，知道了他应該洗臉。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应該說有两种可能，能改造，不能改造。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有了这些条件，就可能改造。我們共产党叫蔣介石改造洗臉，他說不洗，說我干淨得很呀！漂亮得很呀！老百姓說他应該洗洗呀：西安开大会，会上喊蔣介石万岁，老百姓喊："赶快納粮完稅"！老百姓知道了要他洗臉，这就是胜利。一直到今天，还是請他洗臉，不是要消灭他的政策，就是請修改他們的錯誤的政策，年紀越老的人越不愿意洗臉，洗的可能性小，稍为摸一下子裝裝样子有可能，甚至連摸都不摸同我們爭領导权，将中国拖向黑暗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集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的代表，六中全会上講清楚了这个問題，有些同志不要求国民党洗臉，說国民党漂亮得很，提出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口号。对国民党时时帮助，事事帮助，处处帮助。六中全会对这些有了糾正，开始以为国民党漂亮得很，以后出来了一个"限制异党办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露出了国民党的眞面目，我們的同志覚悟起来了，四一年两次反共高潮，人家要求解散共产党，这样大家对国民党的幻想大体肅清了，在广大同志的头脑中，展开了一幅新图画，这才了解打敗日本不是要靠国民党而是要靠放手发动群众，壯大人民力量，这說明要去掉一种錯誤思想，光講不行，必須經过經驗才能，我們請了两个义务教員。日本法西斯和委員长，不要薪水，他們教好了我們許多同志，六中全会以后，对农民、小資产阶級、地主坚决执行了我們的領导权，为的是发展我們的党、軍队、政权和解放区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扫蕩），去年以来轉入攻势，进攻为主，防預为輔，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的进攻（磨擦），于是国民党的影响低落，势力縮小。委員长也請了个教員閻村宇次，这个教員給拨了許多冷水，但是不要把国民党的影响和势力看輕了，現在国民党在群众中还是有影响的，要想去掉它，还需要多少年，国民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五十年的影响，我們才二十五年，我們的影响不来，他的影响不会走。所以說他的影响还只是低落，而不是沒有了，他的势力还大，还有二万万人口，一百五十万軍队，他有国际地位，我們沒有，所以說他的势力只是縮小，而不是沒有了。但是由于抗战时期，我們执行了一条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路綫，于是我們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广大人民群众都仰望着我們，而把国民党放在一种影响低落与势力縮小的地位上去了。現在已經完全証明，只有这样的路綫才是正确的路綫。力爭領导权，力爭独立自主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的要求，这条路綫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就是共产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路綫。現在比以前要明确了，不比以前那样了。直到三次反共高潮还有些同志不相信这一条，是否这种思想現在已經絕迹了呢？党內有各种各样的意見，对这一条正确路綫并不是都完全了解了，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是馬克思主义万岁了。我們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是有，也有万岁的但不够。他們不相信这条正确路綫，放弃領导

权，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又团結又斗爭的方針。斗爭是暫时的，局部的自卫立場，即有理有利有节，这是有利于团結的方針，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同我們决裂呢？旧金山会議我們要去人，蔣說不行，我們說去，蔣說不行，結果还是去了。我們的代表已經到华盛頓，权力是爭来的，不是人家送来的，有人說我們的哲学是斗爭哲学（邓宝珊）他說对了，我說他們也是斗爭哲学，无产阶級斗爭哲学还在他們后面，离开了斗爭講团結或斗爭的不恰当，沒有錯，这是小資产阶級軟弱性。有章乃器同志，他对恩来同志講："他犯过了錯誤。"我在一个演說中批評过章乃器主义的"多建設少号召"。不要蔣洗臉，是自由資产阶級軟弱性的表現，他的理論被我們战胜了，他那个万岁不大喊了，因为万岁不要他。他有点象汉賈誼才子不迁，但他也不会一下子轉过来喊共产党万岁。这种自由資产阶級还会用其它軟弱性来影响共产党，而且有目的的向我們送些軟香，林黛玉卖玖瑰花看来好得很就是有些刺，我們的解放日报每天放玫瑰香。他們喜欢薛宝釵，不喜欢××。（原稿不清）麻煩还在后面，革命就是麻煩，怕麻煩就趕快到閻王那里去交帳。我們党的意志变得更加加强了，不至于被他們淹沒了。

总結以上問題：

（1）农民是怎样？二十五年来尤其是八年来农民非常欢迎我們的政策，但作党的領导思想来說，我們要同农民分清界綫，不要与农民混同。农民出身的同志不易分清这个問題，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情，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員，党員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要与农民分清界限，是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級水平，将来也要把党外人士提高到馬克思主义，当然这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可是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馬克思主义。

（2）小資产阶級是怎样？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不管党內党外的）有两重性，革命性和动搖性，动搖性能以教育方法糾正的，整风就是証据，如文艺座談的方法，党提出方針教育他們（不是命令他們）是能改造的，党外亦然，我們有广大的解放区有强大力量，对他們作适当的宣传教育，是可以影响稳定他們的。

（3）自由資产阶級：目前是我們的同盟軍，但他們有更大的动搖性。他們要民主，这是与我們共同的，所以是我們的同盟軍，动搖性在我們坚决影响下，可以使他們中立，甚至可以使他們跟我們走。

（4）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阶层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代表是反动派。他們在抗战中和我們爭領导权，是抗日陣营中一个最凶惡的敌人，他們要把中国拖向黑暗的老样子的中国，是我們长期来的敌人，他們把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們的影响之下去刮油水。

（5）外国，苏联无問題，对其他国家，也是又联合又斗爭，如果出現斯可比那不行，外国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报告中提到三个国家团結是統治一切的、主要的，报告中对黑暗講的少，但要对他們警惕，他們給委員长撐腰，有时装作天賜福的样子。以上叫做形势与路綫。

（二）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問題

（1）一般綱領与具体綱領两部分是否这一次划分的，不是的，从前也划分过，不过沒有象这一次这样划分，比如"新民主主义論"小冊子，写了一般綱領未写具体綱領，如六大的十大綱領，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各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綱領，都是性質相同，条文小异的具体綱領，更具体的如婚姻法、土地政策附件等等都是具体綱領，新民主主义就是总綱領。有

綱有目，具体綱領就是“目”。

（2）孙中山。关于孙中山，引了他許多好話，把他的好处抓紧死也不放，我們死了还要我們儿子去抓。但也有区别，我們的新民主主义論比孙中山进步得多，完备得多。我們党內有很大一部分党員，不大高兴孙中山，不知为什么原因，这还是表現了不够覚悟，还保持了內战时期的作风。內战时期国民党拿孙中山打我們，不要他还可以原諒。同时那时我們力量还小，不要他也沒关系，現在与內战时期的东西不同了。現在我們党大了，力量也大了，要他有好处。将来我們的力量越大，要他的好处越多，苏联以前不要宗教，現在也要它了，力量大了，多要也沒有关系，苏联以前也沒有积极消灭宗教。我們应有清醒的头脑，利用孙中山这个旗帜。我們的力量越大利用了越有好处。

（3）关于資本主义，我在报告中有所发揮，就是比較充分肯定了这个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們肯定的是不操縱国民生計的資本主义，曾經有的同志說，应提出沒收大地主、大銀行、大买办的財产，当时考虑了一下一般綱領中引用孙中山的話，具体綱領中不提为好。一般綱領中說是允許不操縱国民生計的經济存在，实际上就是說操縱国民生計者要沒收。公益經济，合作社經济之外，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資本主义。只有好处沒有坏处。現在沒有就是沒收，就是沒收蔣、宋、孔、陈的財产。你講沒有講也講了，还是孙中山講的。現在的一般資产阶級还不是斗爭的对象。所謂一般的資产阶級是小資产阶級，特殊資产阶級，而不操縱国民生計的資产阶級，欧洲对这些都是要沒收的。对汉奸的財产是要沒收的。党內有民族主义思想存在，即是直接从封建經济到社会主义經济，不經过資本主义。俄国“民碎派”社会革命党，后来都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維克与之相反，肯定俄国要經过資本主义，这与其說对資产阶級有利，不如說对无产阶級有利，十月革命后，中小資本家、富农，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經济仍許存在，我們同志急得很，看見人家搞社会主义，我們也想搞，人家十月革命后到第二个五年計划不消灭富农，在那以前，当然粮食主要是从富农那供給。

（4）共产主义，在报告中提到了，但未强調共产主义綱領，即沒收私有財产，消灭阶級。这样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即教育党員，許多党員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农民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了他，就叫共产。此处不提是好。

有人劝我們改名字，他們說：“先生之志則大，先生之号則不可”許多人說，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如果改了名字，我愿意参加，英国也劝我們改名字。

改个什么名字，国民党吧！保守党吧！福尔曼写了一书叫“紅色的中国”，說紅星照耀中国。不管你改成什么名字，也都叫你紅党。凡是紅色的都記在我們的帳上，老百姓怕儿子养不成，起个名字叫狗儿、馬儿，我們是否也如此呢？一个記者严金先生說，我們是“溫和的民主集中制。”他是个資产阶級的自由主义者，他嫌我們溫和呢？这个名字很好，这个名字不要改。老百姓很爱他，江西老百姓叫我們为“共伞党”也好。

（5）对国民党有尖鋭的批評，但是客观的沒有超过实际，他有一点好处也挂在他的帳上，但可惜他的好事太少了。尖鋭批評留有余地，还可合作，还可談判，并无打倒“委員长”字样，連“委員长”字样也沒有。死人只提到孙中山，罗斯福，活的少提为妙，反动的只提到希特勒，革命的只提到斯大林，留有余地就可以少犯錯誤，若是打倒蔣介石就会犯錯誤，他們几次挑拨我們去打倒国民党。我們不打它，我們还是說：“你洗洗脸，我們結婚爱情重得很”。但自卫立場必須保持，他若向我进攻必須反攻，必須回答其进攻，文的武的，

特别是武的必須回击，要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要消灭的干干净净。我对联絡参謀說：我們的方針是："不以天下先"（不打第一枪——老子），其次是"退避三舍"（《左传》），第三是"礼記"所說："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这一方針，只要我手里还有一支枪，就要打到底，你繳了我九十九支枪，好的呱呱叫，但我还要打：从前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不移掉他不相信。世界上反动派不革掉它不行的，我們这一輩子打不完，交給我們的儿子去打，不把世界上的反革命打平不为止。打，但是自卫立場这叫有理，有些同志劲头来了，就忘了这一条，不对，暫时的局部的自卫的方針，违背这一方針，要犯錯誤，准备国民党搞麻煩，还长得很。

（6）爭取旧軍队，利用旧軍官，改造旧軍队。这件事要在全党进行宣传，不能簡单对付，要有政策。改造不了的只是那些反动派，相当广大的旧軍官改造得了的，从前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犯过錯誤，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中許多旧軍官是找飯吃，为了升官发財，我們力量大了就不怕他們，全都是造反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我們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爭取几百万旧軍队，做的时候要有严肃性，警覚性，有了这个性，暗藏特务公开造反都不必怕，造反嗎，他們过去不是造反了多少年，要走嗎？开欢送会，送路費。他原先沒有来，現在走了还不是一样，我們是毫无損失。損失了些小米法币，但政治上的胜利却很大的，走了何时想来再来。对进步爭取，要适当协助，"适当"就是不多不少。从前我們有两个錯誤，一个全繳枪，一个全帮助，无原則帮倒忙，要作两条路綫斗爭，反"左"又反右，对于进步的与人民有联系的旧軍队，旧軍官要适当的协助，加以改造，加以教育。

（7）我們的軍队、八路軍、新四軍，东紅纵队，山西新軍，內部外部都是統一战綫的、联盟的。內战时期是否党与非党联盟呢？是的，我們也叫过党軍，所謂党軍是說党的領导，不是說不与党外人士合作，我們軍队里边党員只占少数（三分之一）多数党外人士（农民知識分子），現在我們的軍队就是人民大众的，为人民大众所有又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只加了一个共产党的領导。若有人問："貴軍何种性質？"簡单的回答就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軍队。不要天天講：領导你領导你，使人家不喜欢。怎样領导是靠政策、行动、工作来領导，只要人家跟着我們走，你不說也就是領导了，領导权要掌握，但不是天天唸經一样的去叫，就能掌握領导权。現在山东有三支伪軍，原来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現在叫搞通思想，他們很高兴，变成了八路軍，这就是軍外合作，軍內合作，有飯大家吃，有敌大家打，不发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这也是两条路綫斗爭。坚决反共反革命者不行，只要贊成民主者，愿意来者，贊成我們的主张者加入我們的軍队，我們欢迎，姜太公鈎魚，愿来者上鈎，立場很清楚。

（8）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攻克的地方要进攻，还要防敌人之进攻，原来是防禦的，抗战的我們进攻的防禦，41年42年我們縮小，42年43年我們又发展了，所以現在規定两条：第一是进攻，第二是防禦。扩大发展，集中小的武工队，大的六个团。进攻的方針，因为情况变化了，敌人現在是自顧不暇，而我們的力量大起来了，我們集中力量去进攻他，他就是很少力量来进攻我們了，这是不是冒險主义？不是的，我們講的是"可能"攻克的地方进攻，又講巩固，故不是冒險。

再有一年的攻势，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漸轉到以正規战为主。

抗战开始时敌人是日本，友軍是以前的敌人——国民党，我們是小姆指，只有三万人，36年、37年出发时也不多，这时的任务是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长大起来，大家都贊成。如何长法，麻雀战、游击战，六中全会时提了十八条理由，凡有麻雀吃的地方都去。滿天飞，講十八条有理有利，你少一条不行，应該麻雀战，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我們沒办法，他們挑拨我們打仗，巨族英雄啊！麻雀战机会主义吧！誰也不愿意当机会主义，而愿意当民族英雄，麻雀战是有点机会主义，現在集中到九十万不麻雀吧！永远麻雀，麻雀万岁！不能！我們这个麻雀长成了野鸡，书上講有个大飞鳥，从北洋飞到南洋，一个翅膀可以横扫全中国，我們要把小麻雀变成大麻雀。

抗战开始，你搞点綫，我搞点面，还有就食，分散才能就食，要活下去就要分散，內战时期，搞了一个正規化，忘記了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連步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不生产打了几年，吃光了向后轉向前轉，万里长征，英雄豪杰。

現在要准备由游击战逐漸轉到正規战，得到新武器，就可无敌于天下，报告中講到进攻为主，防禦为輔，馬克思主义多了不同，一种是香馬克思主义，一种是臭馬克思主义，一种是活馬克思主义，一种是死馬克思主义，香的活的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也就可得。現在要防止驕傲。我們九十一万了，日本人滾蛋啊！打，一要打贏，二要有飯吃。打不贏"耳子放炮竹"散了。

現在应該准备集中兵力，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进攻，集中一千人消灭敌人一百人。逐漸轉为正規战，但是无論什么情况都集中。

（9）还有一个农村与城市問題。农村路綫到一定时期轉变到城市路綫。从前城市农村問題爭执得很厉害，叫做政治路綫，下馬看花，調查研究，在乡村走一万年，走就是馬克思主义，不是要看情形，馬克思主义是当着要到农村去时，就去农村，当着要到城市去时就到城市，現在准备夺取城市，掌握城市交通、工厂，有人講我們是土皇帝有些象，永远土皇帝下去不好，洋房子先生也做工，現在要准备把重心轉到城市去。

以城市为中心，不是一切都到城市去，現在把城市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同等重要的地位。

要慢慢講通到城市工作的道理，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学梁山伯，行不改名，坐不改性。

至于轉变，由乡村轉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轉变到运动战，要好好准备，要准备发生意見分歧，一定要发生一些分发，要准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分歧。高級干部头脑清醒，要准备应付分歧意見。有了准备，分歧意見可能減少。

（10）軍区与根据地、根据地是战略出发地，一万万人口太少了。搞到两万万以上就有了，局势就变化了，九十万軍队是分散的，現在我們沒有一个地方可以集中十万人，集中一块就沒有吃的。且沒有新式武器，打中心城市不行。內战对七次（原文不清），两条：①想爬上去：②爬不上去。

現在我們是分散的，現在条件是就地就粮，将来的条件是武器加数量，全中国在我手中时需要三百万到五百万軍队，自己生产，老百姓負担不多少，現在需要扩大軍队，但要在可能条件下，所謂可能条件就是老百姓負担問題，还有别的問題，沒有枪杆子不好。

（11）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議問題，大会建議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議是一件重要事，所謂会議就是說不是普选的。而是軍队、政府、群众团体等等派代表开

会，普选必須在战后了，召集后要发言作决議，产生一个領导机关，要比較快的召开，党外人士要占多数。准备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开会时要打电报給蔣委員长，請他組織联合政府，向他請个多少次，就說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議他說是分脏会議，我們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議，他說：“你們把我当北洋軍閥，你們就是总理”。那簡直就是个流氓。

不說是政府是又起政府作用，这个联合会出来时，一定要罵我們称王称霸，称政府之王，称政府之霸，看那个王八蛋政反对。

（三）关于党的几个問題

（1）个性党性問題：

整风时曾发生这个問題，新聞記者說我們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文件上强調党性，这样就是不对的，报告中說：“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縛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使他們智慧和身体都不能发展。”鲁迅的骨头硬，半殖民地国家，象鲁迅的骨头是可貴的，有些人受压迫着就变成外国的奴隶，上海公园門口上挂着牌子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去”外国民族压迫中国不行的，法西斯压迫人民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反对这些压迫，压迫人民不行的，这就解放了个性。

党則不同，党是无产阶級有組織的部队，統一的部队，它是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前进的，沒有这种統一是不行的，会被敌人所消灭，沒有民主集中制不行，革命的民主与旧民主不同，有更大的民主，党員人民中之自覚地承認党綱党章，自愿犧牲一切的，（有些人不加入党，不受拘束）党員要服从党綱、党章、决議案，犧牲自己为人民是自愿的。

我們的党比較过去要統一些，是更加严格，更加統一的軍队，我們只是說的比較統一，沒有講已經統一。有人說，放下来沒有問題，提起来問題很多，这話很对。36年有組織的党員有两万，現在比抗战初期扩大了几十倍，一百多万党員，意見很分歧，将来党还要扩大，意見还要分歧，因此，首先一件事，就是整頓統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則意見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1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野百合花），他是总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于是便好去整风。那些延安的人带人想找“韓荆州”找些什么人呢？找抹口紅打胭脂的人，找到“前綫”中的“空里空”作“韓荆州”，我們則說吳滿有、赵占奎、张治国是“韓荆州”，我們說的韓荆州就是工农兵，所以沒有整风不前进。

整风解决了精神問題，生产解决了物質問題，現在可好了。但仍有問題，即党还不是完全統一的。沒有民主沒有自我批評，不能达到更高的团結，問題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解决了又发生，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不把分歧的意見統一起来，許多不平均的事情不解决，說不上什么完全的統一。

所以中央以及各个領导机关，要听人家的話，若不听人家的好比不开窗房怪空气不进来，是誰的錯呢？我們开的是政治窗房，窗房一开，空气就会源源而来，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个道理有些人知道了，就是不肯发現一句話，党性——普遍性。个性——差别性。（补：了解馬克思主义不同一个人幼年同老年不同，林利这些不同，統一在一个軌道上，不行；）要发展个人的长处，发展个性，太阳是有軌道的，但八大行星各有不同，不知有人否，沒有調查研究，不知道有。天上的星也有閙

独立性的。晚上常看到一个星脫落而去。抹杀差别性，就沒有統一性。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党內有几部分干部常感覚不平，不平道，我們对这些同志特别注意。

①理論工作同志：整风講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整风中知識分子有批評，好象他們就不那样吃得开，沒有理論就沒有行动，因此，党內应該学习理論。党內理論水平不高，几年来，有些进步，但要說明一个运动的各个側面，內部联系，总結起来提高到理論，还是較差的。什么叫理論？即以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系統知識，把斗爭經驗系統化，而成为理論。

翻譯工作的同志不要以为翻譯工作不好，还是大大翻譯，党內能看原本书的人很少，馬、恩、列、斯，英美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翻譯出来供同志們看，很好。我們要重視理論工作者，要把他們看作有貢献的人，要尊重他們。

②知識分子，一个阶級要胜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能的。有高級知識分子，有普通知識分子。当然沒有其他人也不行。三国演义各国都有知識分子，第八卦衣都是。水滸传中也有。任何一个阶級都有为那一个阶級服务的知識分子，希腊有奴隶的圣人苏格拉底。中国則有周公，以后又有刘伯溫等等，无产阶級要翻身，沒有知識分子不行。因为整风，审干，把知識分子压低了一些。現在要弄平一些。欢迎他們为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我們的党、軍队，經济各部門都要有知識分子。

③大后方淪陷区来的同志，以为根据地吃得开，他們吃不开，审干审了他們一下，找他們麻煩，是西安、上海来的，对他們看了又看。現在弄清楚了，对不起扣錯了帽子的，摘下来，恭恭敬敬的敬了一个礼，他們对根据地的作风看不慣，慢慢就会习慣了。

④关于本地干部。

本地軍事干部，报告上写了要如兄弟姐妹一样的亲爱他們，初来陕北，有些人說閑話，說陕北人能創造苏区，不能带紅軍。我說講得好，华中华北是否有此情况，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条很重要。历史有許多糾紛都是从这里来的，王震、戴秀英出发时，我們都談过这些問題，現在要大講。

我看人是不完全的，共产党也是不完全的，叫“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維克”。你們不能說不是布尔什維克，多走了两万五千里。（有些同志背了一个包袱，变成了一个駝背），人家沒有走二万五千里，可是有根据地，你走了二万五千里，但沒有根据地，若是那些同志要我賠中央苏区的根据地我还賠不起。越搞包袱越大。青年同志也有包袱，青年人眼明手快輕視老同志，把老同志叫做庸俗老朽了，老同志把青年人叫做年幼无知，老幼都不应这样講，种地不如吳滿友，做工不如赵占奎，当兵不如张治国。到一地方要用共产主义精神办事，要与該地人民打成一片，要訊清山头，照顧山头，縮小山头、消灭山头。凡是用我們的手放下的石头，包袱，要給取下来。自己的手放上去，要用自己的取下来，是人家放的都把人家取消，使每个同志愉快起来，这样党就团結了，也能团結全党了。

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看人家根据地軍队工作，都是好的。到一个地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当欽差大臣，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要看不起人家，去掉盲目性，来个自覚性，要尊重每个地方的同志，与当地方同志搞好，与地方人民队伍搞好关系是每个共产党員的义务。

⑤經济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因为过去对这些工作宣传解釋不够，有人告訴我說，总务

工作不受欢迎，总务处长見人不說他是作的总务工作而說是作“一般工作”吃不开，現在要让他們吃得开，他們大有杂牌軍之感，都是“中央軍”哪有“杂牌軍”。

⑥民运工作干部，其中有工、农、妇。大城市打开之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来的。我們是工人政党，历史上做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多，留下来的也不多，要珍惜他們，青年重要，沒有妇女也不行。

⑦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大革命內战时期的干部，富有經驗，領导有方，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对！但前面两时期的干部，至多还有两万，抗战后有一百一十九万。老干部包袱大了，（又照漂亮得很）我們有我們的长处，沒有我們不行。但眼睛要看到一百多万，不要看不起他們，不要叫新干部，要說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要让他們說話，有什么話說什么話，想怎样說就怎样說，使他們覺得容易与我們接近，不要他們覺得不易接近。

⑧党外干部，是一个大問題，全国就是发展到四百五十万党員，也不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每个党員的任务就是要去团結百分之九十九。这就組成一个軍队。如果不会团結，就不是一个好党員，为什么要共产党員呢？难道是为世界上房子太多，小米太多？其所以要共产党員，就是要团結九十九个以上，好打敌人，建設新中国。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有些人則专門革財政厅之命。

只有团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革命才能胜利。一个党員是毫无办法的，只有共产党員是不会成功的，党外干部，組織部門各地要有調查研究，开座談会等等，了解他們，培养他們的領袖和干部。

（3）說眞話：

謙虛、謹愼、不驕、不躁。

“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偷？我看見过这样的事，写一本小册子，抄整风文件，改几个字，叫做“抄袭”，应該那个同志講的，就是那个同志講的。

什么叫装？“知之为之者，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懂得，不懂得就不懂得。

偷与装也是一种現象，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猪鼻子插葱，装象。

我們党要允許一种状态，不懂，懂得少，不要紧。我們提倡讀五本书，“联共历史”、“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

第三，不要吹，要“实报实銷”。对上級作报告，不要夸大，情报要眞实，缺点要向人家公开，扫尽生物。人家罵你官僚主义，罪該应得。牛也有官僚主义，牛奶都有喝的权利，但是要人家去挤，鲁迅也講过这話，从前也有人說过，写文章不如挑大粪。牛奶双方来。矛盾統一，天下太平，那么我們这个吹的作风，确实要老老实实（改正）。

我們的党是很大的党，是二十五年的党，我們准备胜利，我們去迎接胜利，为爭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补：普遍性是建筑在差别性之上，沒有党員那有党？沒有差别性那有普通性？各种工作人員（工农兵、苏区、白区……）都有差别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詞

（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

同志們：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这是一个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的大会，这是一个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国的大会，这是一个团結全国、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目前的时机是很好的。在西方，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爭即将胜利地結束了。在东方，反对法西斯日本的战爭，也接近了胜利，我們現在是处在胜利的前夜。

在我們和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光明，也存在着黑暗。日本侵略者現在还未被打敗。即使它被打敗了，中国仍然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統一与富强的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国。

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呢？团結全国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独立、自由、民主、統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力爭光明前途，反对黑暗前途，这就是我們的任务。

我們和中国人民有沒有实現这个任务的可能呢？我认为是有的。（一）中国不但有别的政党，而且有了一个經驗丰富的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个党員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二）中国不但有别的区域，而且有了一个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軍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的强大的解放区；（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四）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援助。在这一切条件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我們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点，就是团結全国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經二十四年了，經历了北伐战爭，土地革命，抗日战爭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到了現在，我們的党已經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我們应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現时，为着团結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結全国人民建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只要我們能够为此，只要我們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在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悼詞（摘要）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的二十四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

主义者，为了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設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統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繼的斗爭，我們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爭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都証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繼續革命，誰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一百万的人民抗日軍队，一百二十一万共产党員，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綱領，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的鮮血所創造的，就是他們几十年奋斗的結果。現在中国人民已經更懂得如何团結，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統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四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地实現。

（原載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

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总結

（一九四五年六月）

講三个問題：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問題。

我們的方針，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領导下，打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設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方針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組織队伍；在我党領导下就是总司令、指揮官；打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就是說的敌人，建設一个新的新中国就是說的目标，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問題……手是我們自己的，放不放在我們。誰不叫我們放手呢？有許多人，其中有蔣介石。国民党六次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綱，其中有一条是：絕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軍事、財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統一之設施与行动。比如軍事上的統一，即就是我們不要八路軍、新四軍。这一斗爭，早就开始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就是不让我們放手发动群众，蔣介石不让，汪滿卫也不让，我們自己也不敢放手。那时我們应該大胆的放手，但我們却不敢放手，所以失敗了。內战时期，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沒有与冒險主义相区别。抗战时期，就是这条路綫，这次大会只是抓住这条路綫，因为有了过去多年的經驗。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險。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是冒險。这条方針一直在全国胜利是不会变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級先鋒队从束縛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思。从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八年馬克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針。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針，崇拜自发論，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俄国布尔什維克恢复了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俄党（联共）領导下，打敗俄皇，建立工农政权。所以我們要宣传，肯定这一

方針。朱总司令……我的报告，都是貫彻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針。阶級未消灭，我們这条方針是不会取消的。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也有变化，但总的方針是不会变的。至于如何实現这条方針，这需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內部联系如何来决定。

第一、国际形势

第一个問題是国际形势。报告中說，五大国家团結起来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五大国中苏联为首。这个趋向对不对？世界是否会倒退？倒退，报告中也說到了，說世界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它們要破坏这个进步的趋向，暫时甚至是严重的历史性的曲折（大事变）还可能发生。因为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还不愿意看見人民力量，人民的进步，这里又有这种情况发生，即就是要做另外的估計，即馬上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英美法結合的反苏大战，消息报說了，有些反动派的报紙，造謠說英美进行反苏大战，旧金山会議也鬧乱子，許多人都关心旧金山会議。最近四、五年国际形势經常矛盾，好消息，坏消息，今后还会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的发展。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爭，苏联和世界人民在一方面，反动势力是另一方面。現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英美和日德俘虏立即結合起来組織反苏反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存在不？不存在。客观实际上不存在。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就是因为沒有，所以我們才說沒有，两个客观实际，我們不是按照反动派的客观实际講的，而是按照苏联及人民的客观实际講的。按照俘虏、孤立主义者、慕尼黑派……他們要不要三次世界大战呢？他們是要的。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是不要的。現在反苏反人民的大战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資产阶級內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意干；另一部分想干又不敢干。他們也是三三制：进步的、反动的、中間的。現在英国政府不是张伯伦政府，而是英国保守党的另一派，英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变化，旧金山会議可能无結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績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議的記者分析得就很好："我們只能就大势而論有三种可能，第一，有所成就，不甚圆滿；第二，无結果而散，也不破裂（与我們和蔣介石談判一样），下次再来；第三，最坏的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議的决定。这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种可能性大些，但是即使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决議推翻了，这是不是說英美就要組織反动派进行三次大战，进攻苏联呢？不是的；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議上說得对，即使現在不能建立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不能建立，我們是要努力爭取建立。这次搞不好，下次再搞，也是总括全世界形势說的。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資本家內部情况不統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这些情况，即現在世界的情况，現在战爭只結束了一半，日本还沒有打敗，把这些情况結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議这回搞不成，也不能說永久搞不成。宣布欧洲胜利那天，斯大林說，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說的对，他是根据整个情况說的，苏联在国际范围內胜利了。列宁曾說："如果十年二十年布尔什維克与农民有战爭关系，苏联将保証在世界范围內胜利了（即使在世界无产阶級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則就要忍受二十年到四十年的白色恐怖。"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講的，同志們，是不是二十年！

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說："或者胜利，或者消灭。"現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

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才开始的。沒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沒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現在苏联紅軍插在柏林了。列宁說：即使沒有世界无产阶級革命的形势，也能胜利。列宁的話講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內胜利了。現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資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沒有資本主义，二三百年前，世界上产生了个娃娃，叫資本主义，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級。中国外国的老书上沒有資产阶級、无产阶級、共产党。这些都是近代的产物。資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馬克思、恩格斯說，革命只能在几个国家同时胜利。但到了二十世紀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規定要死的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战爭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話又說灵了。以前世界上都是打小仗，把全世界的大国都捲进去，連一些小国也捲进去的大規模战爭，一九一四年是第一次，我們看到了，古人未看到，这是他們的缺憾。我們这一代人看过两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九年，隔了二十五年，又打了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資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新民主主义論"中我也講的資本主义是向下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的，来了一个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好象社会主义向下了。現在紅軍打到了柏林，社会主义又向上了，从这时起（十月革命）資本主义缺了一条足，剩下的資本主义又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变成法西斯資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資本主义。这两部分資本主义打架，其中一部分資本主义（民主的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再一夹就把日本法西斯夹掉了。資本主义好比一个四支足的馬，已經掉了两支足，剩下两支足，成了一个跛子，鉄拐杖，成不了完全的东西，資本主义残废了，掉了一支足，一支手，想把一支木足来走路，你們說，这剩下的資本主义比过去更加强大了呢？还是更加易了？是更削弱。

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許多同志常常对大的东西看不見，只看到局部的小的东西，十月革命資本主义砍掉了一支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資本主义垮了台，德国內部最坏的东西垮了台，許多小皇帝也垮了台，小国家起了变化。都前进了，这算又砍掉了一支足，这些都是事实，必須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在分析时不犯錯誤。

現在，美英各国的通訊社、报刊，专为一些小問題，如波兰問題、德里亚斯特問題、奥国問題，咬住不放，吵鬧不休，看起来很覚奇怪，它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說資本主义有一个特性："就是蝕大本算小帳。"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去了一支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去了一支足，現在却抓住一把头发死也不放，叫着这是我的呀！为什么抓住小辮子不放？英国本身打得五癆七伤，这表示資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們不抓住辮子就什么也沒有了。他們資本主义很小的，所以只得抓住小辮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話可講了。这是我們的想法，但他們也有他們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革命言論其作用在于：第一，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住小辮子，講价还价；第二，調动国际国內反动势力、慕尼黑分子、赫尔、哈德克斯分子等等。邱吉尔政府看到苏联和欧洲人民起来了，要民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反动派的調子，才能調起反动派給他撑腰，团結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三，鎮压革命人民，邱吉尔发現他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段儿反动調子压一压人民。一共三个作用。由此看来，我們便懂得旧金山

爭論的那么凶是为什么。将来东方問題还要爭論的。这些爭論将此做文章，都是題中应有之意，因为他們还有一支手一支足未砍掉，它还不甘心，爭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都变成了象苏联一样，那当然不会有一点乱子。但是現在如果沒有一点乱子，倒是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現在世界上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問題、小辮子，也抓不了几天。苏联沒有挂車，所以主动。英美打这次仗都是被动的。他們原来都是开慕尼黑的。英美是想叫希特勒打苏联，他們僱佣的这个劳动者（希特勒）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頓，打的哇哇乱叫，它（英国）才同苏联訂了二十年的协定。他們对日本也是如此，它們原是出錢請"工人"去打苏联的，送錢、汽油給日本，也就是出錢的意思，日本天天向苏联挑衅，从英美那里拿工錢，把工錢拿到手，日本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打了珍珠港，美国才和苏联訂了协定。資本主义的主动是在十八世紀时候，十九世紀上半期还有一点，到了二十世紀初便完全腐朽了，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被迫打的，是沒有計划的。对南斯拉夫他們不承認，不承認，后来也承認了。对波兰不承認，不承認，将来也还是得承認的。現在他們不承認解放区、八路軍、新四軍，将来也会承認的，赫尔利四日宣告不承認我們，他說共产党向他要武器，这个帳要算清，看是誰講的。它要送，我还不一定要哩！

資本主义是向下的，欧洲大陆的資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資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資本主义也下降了，美国的資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大战中是它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发展，超过战前的生产一倍到两倍。斯退丁紐斯說：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間，美国的生产为六百亿美金，現在为二千万万，有人說一千八百万万。斯退丁紐斯說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战后要維持一千五百万万的产額，这比战前增加了九百万万，現在恐怕不止一千九百万万，它发了这样大的財，因此說美国資本主义是向上的，是对的。但拿这一点来肯定美国資本主义是万岁的，說它一直上升，如此說法那世界上就沒有馬克思主义了。不会的，美国現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特殊的繁荣是迴光返照。美国的危机很快就要到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年功夫就发生了很大的危机，那时胡佛总統吹牛皮，說美国是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布哈林也这样說），不会发生危机。講了以后，不到三个星期，危机就来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的一年）罗斯福上台，作了十二年总統，搞新政策，使資本主义又繁荣了，但主要是战爭时期的繁荣。从前生产六百万万，現在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美国在前綫上有一千万士兵，二千万軍需工人，他們回去后，生活职位如何解决？美国共一亿三千万人口，有六千万工人，二个人中就有一个工人，肯定說，战后要維持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的生产不可能，这六千万人口，我看它怎样解决？所以，它的危机很快就要到来。多快，不会等到十年。从經济上說，美国是世界上經济的喜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馬克思主义观点看問題，应該这样来看，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义来克服，而是要无产阶級来克服。

英国一定要左傾，在反法西斯战爭中，形成的国內团結破裂了，沒有工党、自由党在政府中帮忙，沒有共产党在社会上帮忙，保守党是不行的。这次战爭中苏联打德軍四分之三，英美法只打四分之一，苏联出了四个指头，他們总共出了一个指头。美国出兵力四百万，英国一百万，法国五十万，他們要同苏联打，这是不可能。英国工党領袖和我們一样，也是沒收大地主大資本家阶級的銀行、工业，即操纵国計民生的企业，要归政府所有，采苏政策也

是一样的。对印度問題有缺点（只有英国共产党对印度問題是彻底的），叫有缺点的好綱領，但綱領虽好，不一定能实行，即理論与实践不能結合，英国共产党强大起来，邱吉尔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这次英国大选邱吉尔能胜利嗎？即使邱吉尔胜利了，但沒有国内战綫支持了，还有很大力量制它的肘；打敗日本之后，美国国内战綫也会破裂，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应有这样精神准备，这次旧金山会議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議也是会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邱吉尔的困难大得很，英国人民拖住它，印度人民拖住它，欧洲人民討厌它，美国資本家还在揪着他腰里的荷包。关于建立反苏堡垒战，英国保守党是有这样企图的。从前是从波兰、罗馬尼亚……等国家組成的，这片墙壁現在被苏联打掉了。让他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那里去了，但現在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覚悟了，英国人民覚悟了。美国資产阶級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結合起来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关系搞好的，斯退丁紐斯也要和苏联关系搞好。美国是民主政府，英国都是現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作生意）。

总起来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的稳定已經沒有了，危机是历史就有的，如月經一样，資产阶級的月經。十月革命后叫总危机，总危机即統統那样，总是那样，大危机后有小危机。这次美国是特殊繁荣，以后也不会稳定，其中是含着危机的。八个大国，誰是領袖？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說美国是領袖。这种說法不对，从經济上可以这样說，但是經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經济結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經济的力量上說，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經济，可以产生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紅軍，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所以英美各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很高的。中国也是发展資本主义，中国的資本主义是什么性質？前面說过，有反动的法西斯資本主义；有民主的資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資本主义已經打垮了。民主的資本主义比法西斯資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忍一些，不提打倒蔣介石。

蔣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义，我們是新民主主义的資本主义，这种資本主义是有它的生命，还有革命性。一部分資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作用，另一部分資本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資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質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

总的来說，資本主义是向下的，而农业国家的資本主义是向上的——不平衡。

×××能单独胜利的意見是对的，列宁講单独胜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胜利，如十月革命，打退十四国干涉，都是利用矛盾，得到各国无产阶級的帮助，才能成功的。我們中国，沒有外国的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是自力更生，力爭外援，沒說不要外援，否則《共产党宣言》上所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話就可划掉。我們不作此提議，我們还要做外交工作，中国革命必須有全世界无产阶級的帮助。

第二、国内形势

第二个問題：国内形势。上边說，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說要作外国的联絡工作。董

老这次到旧金山，要作这个工作，将来还要作这个工作。外交原则我們已經規定，要照那样去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現在是受日本压迫的国家，将来国民党統治仍是半殖民地的，独立只能是形式的。中国不是一个小国，是一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所以有很多人想打主意。日本人想刮中国人民的油水，美国帮助蔣介石是想控制中国，麻煩还在后边，沒有英美无产阶級和苏联的帮助，中国不能胜利。……

小指人家看不見，中指看得見了吧！将来变成大指，还要变成拳头，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看得見不？苏联在开始时誰承認？一九三三年美国同它恢复了关系。現在世界各国差不多都与它有了外交关系，事在人为。国际无产阶級的联合是必要的，沒有国际联合不行，国际无产阶級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級解放的必要条件。

两三年中国情况将有大变化，要有此准备……。

現在有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大会，目前国民党的六次大会和我們的七次大会。三个大会有一个相同，即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性質。昨今两天解放日报上关于批評国民党大会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国民党六次大会的特点是：蔣的話就是命令，中央委員要賭咒服从蔣总裁，要听蔣总裁的命令，世界任何資产阶級政党都沒有这一条。另一点，不准加入其他任何政治团体，我們入党沒自由，退党有自由，退党时劝一下則有之，自由还是他們的，党員有加入反革命团体者，那是保安处的事。現在国民党要自己党員賭咒不加入任何其他政党，这是表明国民党更弱了。加入其他政治团体者，他很怕，特别怕孙科搞个什么东西，不过現在賭咒沒有什么用处。孙中山搞兴中会时，被别人打足模手印，蔣現在要搞賭咒，一个党弄得靠賭咒維持，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不是靠思想覚悟而是靠賭咒。国民党大会的性質和我們講的一样，沒有什么变化，它不要減租減息，而要耕者有其田。

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們是新民主主义。国民党里也有旧民主主义者。民主同盟可以联合，有人問，我們应不应去帮助民主同盟发展？我以为应看具体情况而定。在大后方，可以帮助。在我們地区就不必，它們不会来，因为我們要搞生产，吃小米，他們受不了，将来到大城市中，情况又不同了。有人問，联合政府报告发出去以后有什么影响？我們說有很大影响，在大后方发行了三万分。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覚，一直看完，不喜欢，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陈布雷看了，說只有两个字："內战"；許多代表看了都說，共产党說的头头是道，有办法。他們的大会原訂十天結束，我們的报告发出之后，把他們打乱了，又延长了几天。大会宣言本已拟好，乃又重新起草，即現在发表的这个。他們有些东西是受了我們的影响。如少数民族問題，它不得不講講国內民族不平等的問題。我們提出減租減息，他就来了許多条农民土地政策，这些都是反映了我們的东西，而又反对我們。中国将来可能变为以美国为主統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抗战前，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統治的半殖民地，抗战中国民党依靠美国，中国可能变为以美国为主，美国插一支足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煩，我們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发生这一变化。

日本倒台是另一变化。……

有些同志，希望我講些困难和光明，光明很多，也要准备困难，例如：

（一）外国大駡，有人向我示过威，我說我們吃小米，你們吃面包，有劲，嘴又长在你們身上，你駡我沒有办法，准备挨駡。

（指美国在延安观察組，包尔德曾与毛主席談話）

（二）国内大罵。准备国民党大罵，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

（三）被他們占去几大块，他們要打内战，斯科比加蔣介石。它要收复失地。总司令說搞地雷，搞地雷他还要占这大块，内战时曾占了几大块。

（四）被他們消灭若干万軍队，一九四一年日本来了，我們講准备縮小一半，后来沒有。我就是不准备講对的，是往最坏的情况准备，那时有五十万，去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精壮了。准备吃大亏，准备将来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时，去掉1／3，还有一百万人去掉一半也有七十五万。有些准备就好办事。

（五）伪軍欢迎蔣介石，伪軍搖身一变，成为蔣介石的……，伪軍喊閻錫山万岁，閻喊伪軍九千岁。

（六）爆发内战。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内战愈推迟愈好。我們对蔣介石八年以来的政策，是使他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准备日本人走了，閻錫山占过去。

（七）斯科比变成希腊，希腊六百万人口，中国的人口七十倍于希腊，要用各种方法避免斯科比的出現，万一发生了，就有理、有利、有节：一、老子：“不为天下之先”；二、左传：“退避三舍”；三、礼記：“礼尚往来”。

（八）不承認波兰，現在中指头不承認，将来两个大指头，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看你承認不承認。一年不承認，两年不承認，百年不承認，我下命令，将来下命令，下早了沒有用。

（九）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員。情况不好时，有些人会想：“当时未料到这一着”，于是向后轉，跑掉了。散得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結果最后至多剩下三几万，我們經过两次大散，这次准备散掉三分之一，魯智深大鬧五台山，和尚散了，我們是共产党。

（十）悲观失望，疲劳情緒，革命廿四年未成功。軍队失掉了一些，党員散掉了一些，能不能发生这样情形？不要把問題瞞着，領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講清楚。三天睡不着覚，四天就睡着了，以前我們党内有个习慣，总不說黑暗，总說敌人总崩潰，說我們很大的胜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現在講困难，至多不过是黑暗，把各方面充分估計到，現在有充分自信心，黑暗也就不是黑暗了，莫斯科如果失了，我看就可以跑掉几万（整风講出来的）。

（十一）天災流行，赤地千里。近得报告，华北、华中都遭天旱。孟夫子等圣人說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太行山发生災荒，它們就灭蝗灭災，有办法，这是給共产党以鍛炼的机会，不好事情中有好的因素，准备天災流行，赤地千里、光光的，共产党有本領，就是要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打开一条生路。

（此处遺漏一条，日本进行妥协的和平）

（十二）經济困难，有天災更困难，沒有天災也困难，两三年内要学会作經济工作，要首长負責，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十三）有同志問：敌人退出华南、华中，华北怎么得了？現在和法西斯作战，寸土必爭，不会撤退的，即使撤退，国民党也就来了，我看湘桂路敌人不一定撤退，即使都撤退到

华北，难道我們就要嗚呼哀哉嗎？但我們就要准备它撤退到华北。总的局面，日本明年就要倒了，如果出現了和平妥协的局面怎么办？准备想法对付之。

（十四）国民党实行了暗杀阴謀，要准备万一出現了这事情，怎么办？死了又来，都准备。

（十五）党的領导机关发生意見分歧，議論紛紛，不要以为不会，有准备可能发生少一些，上述困难来，可能发生意見分歧，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滿意，各种意見等等……。

（十六）外国无产阶級和苏联长期不援助我們，因为他們还沒有来得及援助我們，我們困难来时，远水不接近火，这条辯証法，作外交工作是希望援助我們，特别是伟大的苏联，但是长期不援助，要准备，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許。各国无产阶級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許。

这一切等等，还有意料不到的，全党高級干部同志，要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

下面来說一定能胜利的理由：

（1）暫时吃亏，永远胜利。

（2）此处失敗，彼处胜利，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3）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要跑的讓他跑掉，跑掉少吃小米。这是党內动摇分子，热鬧时来凑热鬧，困难时又跑了，虽然一些人跑了，但另一些人又来了。

（4）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总有活着的，不怕，这么大的民族，这么大的党，怕什么。

（5）經济困难，学会做經济工作。謝謝何应欽不发餉，我們自己来。那时，解散不贊成，餓死不愿意，剩下自己动手生产。

（6）天災流行，太行有經驗，共产党会抓蝗虫。

（7）党內糾紛，取得鍛炼，生鉄变成鋼，要打多少次。

（8）国际沒有援助，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沒有援助，現在是共产党的大考驗，看我們有沒有本領。

当然，国际援助最后总要来，不来杀我的头。

第三、若干思想政策問題

（一）关于領导问題

領导要有預見。預見前途，偏向，如无預見即无領导，为着領导必須預見，从原始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对于社会运动，历来都无預見盲目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往往是自发的，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是有預見的，农民看耕下种，預見秋季收获，工人做工，医生下药，都是因为有預見，某种行为一定有某种結果，資产阶級的自然科学也有預見，但社会科学是盲目的（因为是反科学的）。只有到了一八四三年世界上出現了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問題有了預見，人类才开始走上新的阶段。共产党以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看清前途，看清社会向着什么方向走。例如中国有三个阶級，无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大資产阶級，三个阶級都在运动，它們走向何处？打敗日本后干什么？开了三个大会。我們的大会預

見将来走什么道路？規定了我們的路綫、任务。斯大林說：坐在指揮台上什么也看不見不叫領导。人們往往对大东西看不見，微生物看不見，水牛也看不見。內战时期，大城市国民党加帝国主义，大东西看不見。我們雄心很大，总是人家什么“总崩溃”。日本是个大东西，也看錯过，以为容易打（速胜論，輕敌观点），十年內战时期是十年，战爭范围普遍全国。大东西吧！但有时也会忘記。陈独秀时代，几千的农民起来要求土地，大东西吧！看不見凡是政策犯錯誤的都是看不見大东西。小东西看不見还不要紧，犯錯誤也不好，但不是大錯。大錯是对大量普遍的东西看不見。預見則要看到小量不普遍的东西，而当它刚从世界地平綫上露出一点的时候，即能看出其将来发展的意义。預見要求如此。比如这次大会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这些东西，今天还沒有，甚至今后回去还感覚不到。大城市很大，东北有四千万人口，是大量普遍的东西，有它們是明天的事。大会应該指出，如果看不見这大东西，那将了不起，共产党要灭亡。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經济、工业、正規化等等不能解决，一定要灭亡。經济在人家手里，工业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一切都在人家手里，我們一定要灭亡。

你們搞不到大城市，到儿子、孙子还解决不了，永远要灭亡的。一定要灭亡，那就要解决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我們是以工农起家，工业机器都是依靠工人，我們是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

为要領导，必須預見。盲目性是妨碍預見的，教条主义、經驗主义，不可能有預見，沒有預見，沒有領导，沒有胜利，沒有一切。

1843年产生馬克思主义，1903年产生布尔什維克党，然后全人类才得到了方針，六十年前（1903年）得到了方針，但沒有实現，十一年后，产生了世界大战，十四年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了。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又将怎样呢？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世界的发展改变了新方向。1921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的发展改变了新方向，这个党是任何历史上所赶不上的，因为它有預見，看得清前途。在党內要解决一些問題，要有預見，要去掉盲目性。

新中华报，找我題字，我当时因为所感便写了“多想”二字給他們，他們不大滿意。我是要提倡同志們多想，这叫开动机器，脑筋这个器官不是为了別的，就是为了“想”。孟夫子說：“心之官則思”。孟夫子懂得这个道理，要求同志們回去告訴每一个同志，都要多想問題，对阶級、对民族、党……的問題都要想一想，想錯了，不要紧，可以糾正。同志們到一块不要把生活問題变成主要話題，兴趣要提到想各种問題上，开机器丢包袱，輕装愉快。开机器，要分析，过去党內有个框子，这个框子容易学，到处用，即所謂党八股。季米特洛夫告訴我們，要打破这个框子，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具体問題具体分析。一个問題来了，不懂得不要紧，加以分析，一个人分析不来，几个人一起分析，和同志一起交換意見，相互分析，要造成交換意見的风气。有意見不肯告訴別人，把发明看成自己的，这是机会主义。我們就是一切問題問老百姓，問同志，打仗也是这样，功劳与人家共了有何不好？“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集体創造，有何不好？发言权不是一个人的，要公諸大家，一个人搞不完全。要这样来領导，启发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

××同志講得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性質是講程度的，历史講民主程度不够，集中也有不适当的，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但可以統一。要大开言路、开窗戶、古代专制皇帝好的还能大开言路，我們共产党人还能不开窗戶？开窗戶，有害处，不大，但流进空气益处却很大，高度民主怕什么？正是要哇啦哇啦，哇出道理，哇錯了也不要紧。归根結底，党是最公平的。他們要求集中的，要求一个建长喊口号，每个人都听一个人的号令，向敌人冲鋒作战。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有的，但不要怕，党的覚悟程度提高了，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不要怕人家批評，我們領导同志，資本很大，就是命，犯了錯誤，批不倒。只要改正錯誤，就是犯路綫錯誤的，也批不倒才好。計人家講的机会越多，意見就越少，在組織內講講可以，在組織外講是小广播。小广播存在时，領导同志要搜集小广播，我不是提倡大家小广播，而是当小广播存在时，收集起来当原料，政治工厂原料要多，还要登广告，我們的广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把黑市变成合法化，就无小广播了，只有这样才能团結同志，統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集中。沒有集中不能胜利。要被消灭，我們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

（三）干部关系

这个問題的性質是农民問題。将来是全国人民的問題，列宁說："十年与廿年有正确的关系，就在世界范围內保証了胜利（即使在世界无产阶級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則就要忍受廿年到四十年的白色恐怖"。这句話也适用于中国的。如果中国十年廿年与农民关系搞好，那能取得世界范围內的胜利，否則就要忍受廿年到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其性質就是与农民的关系。为什么我們三番五次的講这个問題：古田会議不是說了，四二年整风又提出来，这是个历史的普遍問題。內战时期苏区垮了，其原因是不是一条，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本地干部。白区也是，欽差大臣一到，工作就垮了99.9%吧，外来干部本地干部的关系問題，內战时期是路綫問題，抗战时期不是路綫問題，在边区我就亲自看見这件事，"边区干部只能創造苏区，不能带紅軍"。先对紅26軍不好，后对紅27軍不好，"我是两万五千里呀！""你是土包子呀！"現在秧歌队和老百姓一块扭秧歌，以前躲飞机外来人与本地人不走一条路！

关于軍队与地方問題，是一个长期的問題，軍队总是說地方对不起它，过去，我們沒有系統的解决問題，系統是科学，不系統是常識，高干会上，系統的說明了这个問題，所以解决了問題。以前未系統解决，不能說服同志，有个同志說，过二年以后，才了解軍队应多負責任。現在边区軍队与地方关系有了很大进步，但还不是彻底解决，华北、华中还得二、三年，这一問題很易动摇，各軍区、軍分区負責同志要負責任。現在是一百万軍队，将来还要多。能否胜利就看能否团結三万万六千万农民。要經常站起来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地方也有不对的，但問題的解决是从軍队起，軍队的关鍵在軍区、軍分区的負責同志，那个掌舵的要坚持这个原則性。

什么雷公打死毛泽东，什么毛泽东的学問不如张国燾，什么陕北紅軍不够編一个师，什么陕北干部只能創造苏区，不能带紅軍。我們要想想二万石公粮，天怨，人怨，謝謝这个反革命（希望雷公打死我的），我們从此就搞起生产来了。张国燾的学問比我好，抗大的指导員去了之后，天天整人家的国燾路綫，我沒这么整他呀！我承認这一条。想一想呀！何必生

气。

掌握軍队的是老干部，老干部是主要骨干，这是好的，后来的同志参加領导这也是好的，北伐时期的軍队不到千人了，內战时期的干部也不过两万人，老干部好，是人民的珍宝，国家的荣誉，这是人民的估价，估价很高。軍队关系着国家存亡，沒有人民的軍队，就是沒有人民的一切。軍队重要，更要特别的照顾地方軍队，地方关系，即軍队与人民的关系。了解这一点，到任何地方去，不管地方人民对我們如何不好，都应責备自己，不应責备地方人民，对地方应抱原諒的态度，尊敬的态度，要把我們軍队教育好，我們是不是人民的軍队？現在是，老早就是，但是还有許多缺点，缺点很多，××同志說过了，要学会更适于当先生，教授法要經常研究，听到批評一定要研究一番，有責任研究，要有怕对不起人民的精神，要自我批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問題。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之后，我們曾說要答复"野百合花"，要用解决物質問題，丰衣足食来答复他。解决經济不是易事。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軍各个軍都光荣，根据地和做白区工作的同志，現在淪陷区的同志都一样光荣。做政治、軍事、經济、文化、总务工作的同志都一样光荣。技术干部等也光荣。

凡是对不起的事，承認不好，承認取消，軍队与地方关系不好，承認不好，承認取消。

（四）整风、审干、鋤奸

老一部整风、审干有很大成績，也有相当錯誤，以后二部搞的好些，进步了，今后要照二部的进步办法做。审干搞錯了人，很不好，他們不快活，我們也不快活，所謂一人向隅，滿座为之不欢。現在有几百上千的人不快活，应向他們賠不是。应該是少而精，我們来了一个多而粗，数量应小小的，方法应精精的。特务在第一阶段覺得很多，第二阶段覺得很少，少是对的，以后就按这条"少"来办。自首問題，党派問題，过去我們不注意，現在知道是相当多。这个問題，也是党的严肃性問題，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

內战时期，打AB团，有用肉刑者，肉刑是封建时代遺留下来的，头一年已作了废止肉刑的决議，第二年还在打人，因此得到两条：（一）废止肉刑；（二）不要輕信口供。肃反走了极端者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当党未成熟时在这个問題上缺乏經驗，走了弯路，犯了錯誤，今天延安犯了錯誤更应抓紧，因为带有全国性。全国不走弯路，全国可以胜利。多而粗是錯誤的，少而精对么。犯了錯誤应賠不是。

有沒有宗派主义？如老干部整新干部；工农干部整知識分子干部！不要忙于說沒有，而是要用客观事实来証明，大会上有人要求党章上加一条："保証党員的政治权利(生命)"，不要小看这一条，应引以为戒。几条方針也是慢慢从几个月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有些人不知道保卫工作是件苦工作。

有人說："軍队为什么要失敗，因为我沒有当总书記。""为什么鋤奸搞錯了，因为我沒有当权。"不一定。你試試看。防止錯誤，也要警惕自由主义，保持党的严肃性……反革命失敗了，被推翻了，反动阶級一定要报复的。如搞不好，要吃大亏。

（五）准备轉变

轉变是在民主革命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从乡村到城市，从游击战到正規战，从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如何轉变，我想不用多講，要按实际情况办事，要有到城市的精神准

备，工运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了大城市就要有工运，否則不能掌握城市。东北四省很重要，有可能在我們領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們就有了东北四省的基础。現在我們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沒有基础，有了东北，就有了基础。

（六）路线问題

大会政治、軍事、組織报告，給了全党一个武器，給了一个检查工作的武器。八年来就全国来說，路綫是正确的；就某些时間，某些地方，某些同志，某些部門来說，有过錯誤或者是原則錯誤、路綫錯誤，某些同志也是有时間性的。

两方面，忽略那方面都不好。

（七）军事路线

百团大战与上条同。

（八）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问題

或能或不能，有时能，有时不能，看情况决定。抗战开始，我們的政策对蔣介石有了影响，后来它开五中全会，要消灭我們，不听話了。斯大林說过：反帝时，阿富汗的皇帝，埃及的商人，都能成为后备軍，領导权主要部分不是对大地主阶級，而是对农民，小資产阶級的問題。主要是把农民、小資产阶級从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們的領导下。“共同領导”，要看怎样做。旧金山会議五强共同領导，克里米亚会議三强共同領导，过去說在孙中山領导之下，共同領导对不对？在于如何做？你領导你那一堆，而我就放手发动群众，問題不在共同領导，而在于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九）两党談判有无希望

可能性还有一点，一絲一毫都沒有了，那就不談了，可能性小，也有些吧！还是要求他洗脸，改过自新。假若出現了另一种局面，他不洗脸，內战发生了，那就看情况，号召群众起来打倒蔣介石。联合政府，你不出来，我就請，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还去請，可能不可能？来了就可能，不来就不可能。

中国解放区代表会的作用：

（一）不是第二中央政府的性質，即不是不要国民政府。

（二）带政权性質，发号施令，过渡时期的一种組織形式。

何时召集，双十节前后，他在十一月十二日开，我們开得早一点或与他同时。

（十）党外人士合作

統一战綫是一門科学。学习，学习，党內許多同志还要好好学习，要学会与党外人士合作。

（十一）党性与个性

二者的关系，即普遍性和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党內与解放区內有了比較解放的个性，解放区减租减息即为了解放个性。在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沒有个性，沒有自由，沒有独立，沒有人格，这是資产阶級的財产私有权所造成的。有財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

立，有人格，沒有財产就沒有这一切。共产党人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民沒有我們也不会有，但是党內是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了。“共产党宣言”中講得很清楚：“每个人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設想，一百卄多万党員变成一百卄多万块木块，我們会有什么党性。不能把每个同志变成一模一样。只要服从党，在此基础范围尽量发展个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紙糊泥造的人，有两种个性：創造性的个性，例如一些模范工作者，特等射手，有独立工作能力者，盲目性減少不随声附和者，党性与个性完全統一，这是一种，破坏性的个性，例如有人主张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如模范工作者等；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小資产阶級性的錯誤。独立性也有两种，革命与反革命的，在党內闹独立性，违反党性，分裂主义，表面上似乎由自与个性，但是破坏性的个性主义，反动性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个性，也有反动性，破坏性的，因为沒有馬克思主义的，反集体主义的。

对一定問題有一致意見一致行动，这就是党性，这不算損害个性，許多个性集中起来，采取一致意見，一致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唯物主义的一致意見，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意見，难道一定要有不同意見才算有个性嗎？一致好得很，整风、生产、軍事、政府工作，有党性也有个性，凡是党員做的工作要有党性、个性。

（十二）利用外国經驗

共产国际的經驗要学。党內能有五万党員讀五本重要的书，并大致了解了，那就很好。把五本书时常揹上，有空就看，看完一次記上日期，七摸八摸，味道就出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河上肇讀了七八十遍。要經常注意看报上登載的各国党的宣言、綱領一类的文章。共产国际对中国有极大的功劳，教条主义从那里来的？不是从馬恩列斯他們那里来的，他們經常教导我們不要变成教条，是我們自己搞垮了，变成了教条主义。

对理論工作者不重視是不对的，要尊重他們，要有重視翻譯工作的空气，翻譯一本书就好，土包子不懂外文，你翻譯出来一本外国书，对同志們有很大帮助。理論工作同志也要重視自己工作，不要因外边影响而发生动摇。

最后，实事求事

陣地要一个个夺取，力量要一点点收集，卄五年的經驗証明，敌人对我們是寸土必爭。枪是一枝枝增加，土地是一块块扩大，合起来就有天下。

我們是現实主义，理想是現实主义，革命的現实主义，斯大林告訴我們要学美国人的現实主义，他們做什么事情都很細緻，粗枝大叶他們不要。此外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热情。革命的現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的夺取陣地。

其次，大会以后，全党在原則上政治上团結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結，而不是盲目的团結。

（講愚公移山的故事）

同志們，我們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都挖掉。

中国人民解放軍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話

我們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我們要站定自己的立場，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們的口号是要处处与敌人对立，决不能有絲毫与敌人混同，一切与敌人相同的言論都是existing张目的濫調，任何人想要屑起敌人的口号而又冒抗敌，那只是欺人之談，残酷的历史将給予严厉的証明。

給福斯特同志的复电

福斯特同志及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欣悉美国共产党协会特别全議决定拋弃白劳德同志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綫，重新确立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并已重新成立美国共产党。我們对于美国工人阶級与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謹致热烈的祝賀，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的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爭曾經有过許多可感謝的帮助，但是他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綫（这条路綫充分体現于白劳德同志所著的"德黑兰"一书中），本質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資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資本集团現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援助国民党內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錯誤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內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民族在战爭中与战后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級及其先鋒队美国共产党人反对白劳德同志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爭，及战后建設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将有重大的貢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主席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日本投降时关于形势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一）

現在时局是同志們关心的問題。时局怎样？我党方針怎样？时局发展很快。日本投降了，投降如何。日本未正式下命令投降，現在还是談判中。日本要求投降，同盟国允許它投降，日本天皇如何处置，同志們都知道。現在消息，日本有回信給同盟国，內容不公开，不知道，大概是在講价錢，它还有些資本，与德国的被打到柏林城市不同，美国还未打到日本本土。它在中国及南洋还保持着軍队，目前最危急的問題还是滿洲，它是在紅軍面前。投降也許还有几天，也許在明天。日本請求投降，盟国方面准許投降，天皇如何处置，日本是否馬上下命令投降，还在談判。日本投降大势已定，决定因素是苏联的力量，日本四面被包围。

抗战打了八年，日本投降大势已定，还在讲价还价，决定力量是苏联从后面打了进来，这个力量是不可抵抗。这种情况，抗战历史阶段是否已过去？当做抗日历史阶段已完結，日本投降大势已定，还有点尾巴叫做过渡，河里到冬天，搭上小桥，现在桥上叫做过渡，整个阶段是过去了。现在因为它还未繳枪，同盟国占領日本、我們收复失地还有一个时間。欧洲也是这样。当德国宣布投降、接受投降签字那天，斯大林說："欧洲战爭过去了，和平发展时期到来了"。

刚才說，日本投降大势已定，在它接受同盟国条件，向它的軍队下令投降，双方代表訂条約签字，如德国签字后，是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如此，目前一来未签字，二来签字后还要繳枪，还要占領，目前还在过渡状况。今天講的，就是这样情况。

（二）

中国国內各阶級各党派的关系现在怎样？将来可能怎样？代表两大阶級，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統治者与人民，都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此外，还有第三者，中間势力党派。

国民党怎样？国民党怎样同志們知道，看它的过去就可知現在，看它的过去、現在，就可以知道将来。这个党，过去与我們打过十年內战，27——37，抗战中它袖手旁观，等候胜利。它这政策做得相当好，它硬不肯打，胜利还是到来了，它講日苏必战，日美必战，被它講灵了。中国地主資产阶級代表蔣介石，此人大家都知道，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的政策就是袖手旁观，等候胜利。現在算达到他的目的，又借美国一点枪，武装一下，現在委員长要下山了。八年来，我們与他調了一个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战期中，我們在敌后，他在山上，現在他要下山了。現在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过去是袖手旁观，等候胜利，現在委員长要下山去，夺取抗战果实。

我們抗战八年，在敌后抗战，不是每枪都是我們打的，他也打了几枪，但主要是我們打的。我們英勇奋斗，艰苦抗战，他袖手旁观，如果沒有我們打，有无委員长？他躲在山上，有人給他守卫，我們守卫、站崗、打敌人，才有二万万人的地方未被敌人占領，这个原因在那里？'委員长"虽极抗战有几枪抵着，这也是个原因，但是解放区英勇抵抗是主要的。保卫二万万人民也是保卫委員长。这也就給他袖手旁观，贏得胜利的时間。沒有我們，他也旁观不成，旁观是我打他吹，这样他就有时間。八年〇一日，有了地方，二万万人占的地方。这样条件是我們給的，那末委員长是否感謝我們？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是怎样上台的呢？他很大权力是誰給的？是北伐战爭，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拥护他，他上了台，是人民給他的，他上了台不感謝人民，反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下去，一脚踢开。这个历史同志們都知道，这次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他有几支枪，拿枪的是什么人，一不是土豪劣紳，二不是資本家，也是中国人民。国民党一百多万軍队，战士归誰？不是土豪，是中国工农。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百万軍队，几百万民兵，更不用說。現在胜利了，日本投降，他絕不感謝中国人民。相反，他翻翻一九二七年的历史，还想照样干，他現在未下討伐令，他們过去十年不叫內战叫剿共。不管叫什么，总之是杀人，是不是杀人？我們七大講过，他要杀人，內战危机很严重。虽全国規模內战还未来，全国人民与党內有許多人在此問題的認識

上，不是如我們刚才講的，認为他一定要杀人，認为那件事还未来，內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許多人以为不一定，其中还有許多人与我党意見不一致，还有許多人怕打內战。过去打了十年、八年，怕打，是很自然的，因此我們反对內战，不贊成內战，要制止內战。我們向全国宣传，口号就是“反对內战，制止內战”，但內战是要来的。因为蔣介石的方針就是要下山夺取胜利果实，反对人民，按他的方針是要打內战，按我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战，不要打內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是蔣介石。不要打是一个方面，一个不要打，一个却要打，如果两方都不打，才打不起来。現在是有一方面不要打，我們这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內战就要打起来，內战危險很大。我党已几次不失时机指出：七大前，七大中，七大后，这次日本投降前，我們已相当充分的在人民中指出这点，使中国人民、我党、我軍有充分思想准备。这点，很重要，有这点与沒有这点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我党在幼年时期，对蔣介石的突然事变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而且使人民长期受苦，光明的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这次党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政治覚悟与政治成熟了，提高了，向全国人民和全党提出了警告，使大家处在有准备的状况，現在准备繳日本人的枪，最后消灭日本是有准备的。委員长要夺抗战果实，果子熟了，他要吃，他要垄断，一个人吃。他要打內战，我們講清楚了，有了准备，內战如果来了怎么办？內战是他强迫中国人民来接受的，打日本也是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它不打到中国来，中国是和平的。如果他这样强迫我們接受战爭，这只手拿着大刀，那只手也拿着大刀，我們被迫也得两手拿着大刀，这是經过調查研究，这个調查研究大家都不注意，当他手里拿东西，就要調查，是刀，刀有两用，一是切菜，二是杀人，刀自己不会伤人，要用手拿。再調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有刀，沒有刀也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經过长期調查研究，发現这个眞理：“土豪劣紳有刀，拿刀要杀人，法西斯有刀，拿刀要杀人。人民知道了，就可以照样办理。我們有些人就不調查，陈独秀就不知道，拿刀能杀人，这是常識。有人說，中国共产党領导人还能不知？难說。他沒有調查研究，故叫机会主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发言权，一九二七年取消他的发言权。发言权拿在我們手上，誰要拿刀杀人，我們就照样办理，要把刀拿在一切有覚悟的人手里，人家磨刀，我們也磨刀，关中人家調十几个师，附近来了六个师，三个师打进我們边区，寬九百，深二十里，这是七、八月的事。我們也照他的办，把他寬百里深二十里消灭，他在那里修碉堡，有几个連占着，我們也能修碉堡。他与外国人一样，亏大本，算小帐，从黑龙江通到重庆，不算，百里，也要算，留五个連修堡垒，我們把它消灭了，按我們的意旨，坚决、干凈、全部消灭。現在他心里呕了气，又在調队伍，是否还打，不得而知。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对，寸土必爭”。中国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許輕易丧失，必須經过战斗。如果我們打不贏，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我們沒打贏，被他夺了土地夺了人。新四軍皖南事件，虽然怪蔣介石王八蛋，但为什么有枪有手被人搶去呢？針鋒相对，寸土必爭，就是不能輕易丧失得到的土地。

去年有个新聞記者問：“你們办法，誰給的权利？”我說是老百姓給的，不是老百姓是誰？蔣介石、外国人、上帝均沒有給，老百姓要解放，就把权利委托給能代表他們利益，能忠实的代表他們說話的就是中共，就是你們大家，我們当代表，就要代表得好。陈独秀沒代表好，他是“針鋒不对，寸土不爭”，是差个把字，几个月把大革命的权力丧失干凈。这次我們与陈不同，必須針鋒相对，寸土必爭。寸土要爭不是內战时的“不放弃苏区一寸土”。

这次我放弃寬百里，深二十里，但七月放弃，八月收回。国民党联絡参謀問我們队伍动向，我說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你攻我也攻，你停我也停”，現在是“蔣反我也反，蔣停我也停”，我們是照你的办法的。經过調查研究，仿照办理，先生就是你。

这样，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一般的說，有个很短的阶段，是对付日本人，因为日本未投降，地方未占，枪未繳到，到了占的地方，枪繳了，日本軍俘虏了。这个阶段就是。現在还是过渡阶段（接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我們主要的注意力还是对付敌伪，对付得了与对付不了，靠我們斗爭方法。胜利果实归誰，例如一棵果树，树上結了果子，桃子是胜利果实，蔣介石伸出这样长的手要摘桃子，我們也伸出这样长的手摘果实。該誰摘？那要看水是誰挑的、澆的，蔣一挑子也不担，我們解放区天天澆水，現在不澆水的人也要摘桃子，說：“此桃子的所有权是他”。我說他是吹牛皮。我們挑了水該我們摘，他現在下了命令不准摘，說他是地主，我是佃戶。我們今天报上駁了他，明天还駁他，“你的权力很小，你沒有澆水，不能摘，权力应属我的。”但果子究竟落誰手，又是一回事。同志們不要以为靠得住落在我們手。落得住也有，河北、察、热、晉大部，山东、苏北这些大块乡村，乡村打成一片，七、八十个城市，五、六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中等城市，小城市，一、二十，三、四十，五、六十，这些靠得住的，我們的力量能得到这些果实，得这批桃子可能性大，得这些果实，在我們历史上是头一次。历史上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一九三八年我們苏区刚起来，有二十一个县城，还沒有府城，二十一个县城堆在一起就取得那样大的胜利，最多对人民有二百万，就能奋斗那样久，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打輸了，不能怪蔣，要怪我們沒打好。如果这次大小城五、六十，三、四、五、六块。我們有三、四、五、六块大于中央苏区的地方，事情确实就是确实。这条可以說是确实。达到这一条，历史未有的，得到一批中小桃子，第二批是得不到的大桃子，沪杭宁。我們还是能占乡村，大城市也可以摘一下，但大致可以看到这些桃子是他的，挑水是我，桃子归蔣，因为現在未实現耕者有其田。

第三批要枪，要用权力去夺，津浦、胶济、平綏中段，正太白晉、德石、郑州以东的隴海，这些地方中間的中小桃子是必爭的，都是我們灌溉的，平綏西段，太原南的津浦，沪宁、杭沪角，大江川南，我們送給蔣，不送也要送。大江以北必須力爭。現在才只这几天，究竟怎样，还难說。两三个月后可以講，現在只能講二字“力爭”。

还有問題，蔣有美援，我們有什么人援助？今天为止，还沒有，要看将来。現在紅軍离我們还很远，柏林开会，什么意見，还未公开，发表的是那一套？什么外国来帮我，还未写上，放在什么基点上，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叫自力更生，爭取外援，內战就是爭果实的斗爭。这个时期有机会主义，就是孤立者，自愿把果实送蔣，虽人民不自覚。把果实送給人是自然的，历史有些，俄国二月革命就是，因工人大都不够覚悟，相信孟什維克与社会革命党，自愿把果实送給資产阶級。十月革命，工人不要孟什維克，选了布尔什維克，就胜利了。今天，中国解放区人民，选了中国布尔什維克，淪陷区人民欢迎誰，还未决定，要靠我們广泛宣传組織，人民覚悟不是容易，要去掉其落后的东西，去掉黑暗东西。机会主义，要經过政治的扫帚，你們都知道，用扫帚扫房子，扫了三个角，一个未扫，灰尘是不会自动从中国人民脑筋中跑出，落后的东西要我們去扫除。

中国人民有一部分还不覚悟，信蔣不信我，是由于我們的宣传組織工作不够，馬克思主义

是現实主义。从未說有不扫的灰尘会去掉，会否起大风？不会。我党整风也是这样整到那地方，小資产阶級思想就跑了，那地方未整訓，小資产阶級思想就未跑。这样的情形是合乎邏輯的。我們的扫帚就是中国共产党、八路軍。人家也有扫帚，扫中共，扫人民，扫关中。胡宗南扫去百里寬，我現不扫回。

边区有个介子河，河南是洛川，河北是鄜县，河南是人家的，醌啶东西多，河南河北是两个世界。我們有些人过于相信政治影响，是迷信。可看延安政治影响可謂大点，有政治問題的，我們扫一扫他就反省，不扫他不反省。凡是落后黑暗的东西，不以扫帚扫不能去掉，苏联政治影响最大，列宁格勒的芬兰，愛沙尼亚就不受影响。紅軍到了，反革命才扫除，一九三六年，我們在保安，有个土圍子，我們首都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謂大矣，南扫北扫不成，后在里边扫，他才說不成。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桌子不搬不走，紅軍不进东北，日本不投降，我軍不去，他不投降。我們不去打，他不投降，非到了非繳枪不可他才繳枪。党內有这么一种情緒，相信政治影响。朱熹說："黎明卽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将亮未亮也，有人告訴我，給我任务，說是努力工作，努力奋身，只有这样想，这样作，才有益处。中国地面很广闊，要我們一寸土一寸土的扫。

內战会不会起来，有国际国內的因素，国內因素是我們覚悟的程度。所謂覚悟，是一切欺騙的东西欺騙不了我們，我們清醒的头脑，不受騙。我們应承認蔣是很厉害的，他的政治手段、花样，如何反共反人民他有經驗，承認这点有好处的。切不可以为人家不成。因此，我們要有清醒的头脑，包括有正确的方針，不犯錯誤。

整个說来，抗战阶段过去了。民族战爭結束，新的情况与任务是国內斗爭，会不会因国內国外因素会推迟內战发生，邏輯可能性是有的，蔣要下去摘果子是一定的，夺果子就是斗爭，有的我摘，有的他摘，許多地方我与他搶摘，在搶摘中要爆发战爭。一个时期，可能有許多地方性的搶摘。

我們有力量：①解放区一万万人民；②国民党統治区覚悟人民反內战，可能牵制蔣力量；③国民党內部一部份人不贊成內战，这是国內因素。有个苏联在北边，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国民党区有許多人反內战，中国有四十五个希腊大，丘吉尔在希腊搞，中国不同，延安有个观察組，組长是包瑞德，他与我談："你們要听赫尔利的話，派几个人到国民党去作官。"我与他說："捆住手的官不好做，要做就放手放足，大搖大擺的作，这就是联合政府。"他說："不做不好，一美国人罵你，二美国給蔣的錢。"我說："你美国人吃面包，愿撐蔣的腰，我不干涉。不过有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絕不是蔣介石的。你可撐一百年，一百〇一年。我下命令給你們，不准撐蔣。一定要撐，我不撐不成。現在我是小米加步枪，你們是面包加大炮，你們要罵就罵。"这是吓人的，帝国主义有一套，殖民地有些人就怕吓，他不知有人不怕吓。我們过去批評这点是对有許多中国人士不了解說："你們在老虎上采須。"我們就是无法无天，你們沒与我們講什么条約，蔣也不承認我們。我們参加国民参政会以文化团体資格参加。我們說我們是武化团体，不是文化团体。今年三月一号，蔣說中共交出軍队，才有合法地位。我未交，还沒有合法地位。世界上六十多国，沒一国承認我們，我們就无法无天，我們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个政策，每句話对人民負責，犯錯誤一定改正，这就是向人民負責。美国不承認我們，帮蔣打我們，对美对蔣，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苏联来了，这是三个皇帝，盘古开天以来未有的事，哪本书也找不到，外国軍队援助中

国打法西斯，在中国境内，这个变化发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一个原子弹想把紅軍的政治影响扫掉是扫不掉的。我們有人相信原子弹。不对，原子弹是有，不能解决战爭，不能使日本投降，有原子弹沒有作斗爭，原子弹是空的，如果原子弹能解决問題，为何去請苏联？投了一个原子弹，为什么日本不投降，苏联一参战，日本就投降。我們是馬列主义者，講問題，想問題，一定不能离开立場。我們有些人不如貴族，英国蒙巴頓勛爵，他說："認为原子弹能解决战爭是錯誤的。"我們有人比蒙巴頓不如，蒙还有点教条主义，他們都不以唯物史观看問題。这些影响从那里来，是从資产阶級学校，資产阶級报紙宣传他就相信，学馬列主义差几里路。要洗清脑子的資产阶級影响。有二种世界观，方法論（資产阶級世界观，馬列主义世界观），有些人常把馬列主义的世界观抛到后边，如官僚主义……可举二十条，冲口而出，原子弹問題就是，美不一定直接援助蔣打內战，蔣統区人民拖住蔣。这次內战与一九二七年有所不同？一定有所不同，那时无这样的国內国际条件，那时党是幼年的党，无清醒的头脑，无武装斗爭經驗，无針鋒相对，寸土必爭的方針。現在不同了，現在蔣介石的影响还有沒有？还有一些，相当一部分人还信他。

切勿以为一切人与我們一样，延安討論"論联合政府"，蔣介石有无革命性？那小冊子已写清楚，就未写"沒有革命性"五个字，他的政令是法西斯政令，軍令是失敗主义軍令，还有什么革命性？要說清楚，是否要中央宣布談話，提出打倒蔣介石，現在还不要，現在还不提，現在还在防禦。"蔣反我反蔣，蔣停我停"。他下台不許我繳枪，我再緩和一下，不成，必須答复他，我們下了命令，这就叫做針鋒相对，蔣反我反。

現在国际国內形势可能把內战制于局部范围，但会向公开破裂。我們要有精神准备，他討伐剿共，不管什么名义，他要杀人不管什么时候破裂，明天破裂也要准备。另方面，苏联打起来，我力量与国际因素，暫时我与蔣有局部內战。第一条我准备，第二条早已如此，現在已經有几个地方打起来了。

总而言之，現在到了新的阶段，新的阶段是抗战結束了，国內的民族民主斗爭开始了，今天是过渡阶段，我們要繳枪，搶地方，稳定不稳定，国內斗爭就加紧。从前是抗日統一战綫，一九二七年是民族統一战綫，我們总是一个民族，蔣在抗战后要"建国"，建什么国？今后就是什么国的斗爭。是建立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土豪劣紳，大地主大資产阶級領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西斯国家。这个斗爭很复杂，与一九二七年不同。我們要准备，可能恰当的应付这个局面。

毛主席抵渝发表談話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团結建国大計。現在抗日战爭已經胜利結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設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是为保証国內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內团結。国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应在和平、民主、团結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現全国之統一，建設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結起来，为实現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答路透社記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发表路透社駐重庆記者甘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項問題，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复。問題与答复如下：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內战？

答：可能。因为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項方針，不需要其它方針，因此中国內战必須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讓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現全国和平、民主、团結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讓步，包括縮減解放区的軍队在內。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須作何种妥协或讓步，才能滿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見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認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軍队，允許他們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軍。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談判会达成协定甚至暫时协定一事，覚得有希望嗎？

答：我对談判結果，有充分信心，認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讓步之下，談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暫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証长期和平建設的协定。

（五）问：假若談判破裂，国共問題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嗎？

答：我不相信談判会破裂，在无論什么情况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內战的方針。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約的态度如何？

答：我們完全同意中苏条約，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現，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們所占領的地区，是否打算継續占領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認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軍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早已允諾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爭中所做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創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們准备和蔣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蔣介石合作，以建設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們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員？（B）他們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还在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的行动方針，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員会。中共現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員，在它領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在已远超过了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則，組織了現

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軍队和二百二十万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員，則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說如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記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将实現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提出的民众民治民意的原則与罗斯福的同志自由。它将保証国家的独立、团結、統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設方針与恢复方針如何？

答：除了軍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議，实行一个經济及文化建設綱領，这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良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質的部門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欢迎外人投資与发展国际貿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遺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贊成軍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軍队么？

答：我們完全贊成軍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軍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說的“共产党軍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爭中自愿組織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軍队，这是一种新型的軍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軍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質为中国軍队之眞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貴的經驗，是为中国其他軍队改进的参考。

（《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上的講話　（摘要）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此次国共会談，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以所談問題，不是一二党派問題，而是与全国人民利害相关故也。此次双方会談，解决若干問題，其他部分将継續商談。可以告慰者，我們必以商談解决一切，今日情势“和为貴”。双方除和平商談外，則无其它途径。中国需要和平建設，将中国建設成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过去和今日双方商談，仍有若干困难，将来恐怕亦难免不无困难发生，但我們既已立定和平、民主、团結的原則，則一切困难必可逐漸解决。

（原載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9日）

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关于国共談判报告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秘书处抄——

同志們！今天我講一些关于时局的情况。首先来談一下，这一次重庆的談判，談了几十天，談的結果如何，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报上发表了。現在我們的代表还在継續談。

这次談判，是在时局发生了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抗战时期，两党談了多少次，都是談不攏的。这一次，一部分談攏了，还有一部分沒有談攏，将来会求得一个妥协的，但要經过一个时期。

談判分作两部分，談攏的和沒有談攏的。这次談攏的是过去不能解决的，这次解决了的仍然还只是紙上的。大家知道紙上的东西，不等于实际上解决的东西。要使它变为实际的东西，还要經过很大的努力。

但是談判是有收获的，在談判中間，我們延安和重庆，都有这样一种意見，說談判毫无希望，中国沒有和平妥协的希望，只有內战，在外国人中也有同样的怀疑。但談判的結果証明並非毫无希望。还有一种想法，認为一談就可以談攏，样样都能依照我們的意見解决，認为談判完全是乐观的。这种人在延安和大后方都有。这两种想法都不恰当。事实証明，而且将来还要証明。关于和平方針、民主权利这两个問題。現在和平方針是确定了，坚决避免內战，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国。但实际上在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国民党开了很多軍队来打我們，我們也不能等着挨打。

这次公报上头一条就是和平，那末写在紙上的和事实是不是矛盾？是不是冲突？是个矛盾，所以要把紙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的还要靠我們努力，还要給进攻我們解放区的軍队来一个打击。为什么解放区的問題沒有得到解决呢？因为国民党想占領大城市，想大大打击我們一下，最好消灭了我們，既使不能消灭，也要使我們更不利，他們的地位更有利一点。他們这样想，也在这样做。这是他們一方面的想法，和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想法要矛盾的。現在和平写在公报上，但事实上和平还沒有实現，将来的前途发展怎么样，現在仗打的相当大，比如山西打了一个大仗，閻錫山的十二个师进攻我們，我們是不是針鋒相对，寸土必爭？我們“对”了“爭”了，对也对的好，爭也爭的好，就是說把它的十二个师全部消灭了。他們調集三万八千人，我們出发了三万一千人，他們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跑掉了两千，一千人散掉了。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一个时期，他們拚命的爭，这个問題好象不好解决。他們为什么要这样爭呢？在我們手里不是很好嗎？这是我們的想法，人民的想法，他們不是这样想法，要是他們也同样想法，那就統一了，都是同志了，都可以到党校大礼堂开会了。可見事实上世界的人並不都是同志，他們坚决反对我們，他們想不开，我們占了的地方让他們搶去，我們也想不开。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所以，它来爭是很自然的，我們反击也是很自然的。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談判？又发表公报长期合作？世界上的事是很复杂的，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要从各方面来想，不只能从单方面去想，我們的脑筋也鍛炼的很复杂了。在重庆有人說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是欺騙的，要談好也不可能，我碰到許多人都这样說过，其中有国民党党員。我說你們說的是有理由的，是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經驗，除知有这一回事，就是說你們有理由、有根据，不是乱說的，国共一定談不好，一定破裂，一定打內战。但这只是說中了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还有許多因素，有三种因素：解放区大后方的人民，国际形势，共产党領导下的解放区的人民力量和軍队。大后方的广大人民、新收复区的人民，他們都愿意和平，需要民主。沒有到过重庆的人沒有这种感覚。这次我到了重庆，才深深感到大后方广大的人民，广大的朋友支持我們，不滿意国民党政府。經济恐慌，使許多資本家不滿，他們亲自找我談話，請我吃飯。有些大学教授，其中有中央大

学教授，不愿意在那里教书，我劝他們繼續教书，他們不耐煩。有些文化界戏剧界电影界也不愿在那里演戏，我劝他們繼續工作，他們不愿意，有的还揮下泪来，他們希望我这次去了，天下事就差不多了，什么都解决了，我說我这是来受考試的，我受誰考試？受你們考試，受中国人民的考試，我恐怕这次交不了卷，能交卷就成了。我說中国的事不是由我一个人来办，一方面来办就好了。如果都象解放区一样，那你們愿意到那里教书，就到那里教书，愿到那里做事，就到那里做事，那是眞正的自由。但是今天我是来作客的，是被人家請来重庆談判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很多是反动的，他們打日本是作了好事，他們的政策是专門扶助蔣介石反对人民的。我这样說，你們不要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子。我看到許多外国人，比如有些新聞記者、空軍战士、經济工作者、大使館的一些人都对我們表示同情，很热心。就是說广大的外国人，不滿意中国的反动势力，愿意看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在这样的外国中間，有一个外国叫做苏联，苏联和其他国家不同，它和中国发生了法律关系，就是訂立了中苏条約。

中苏条約究竟对中国有好处沒有？应該說是有很大好处，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中，开始有人高兴，以为中苏条約孤立了共产党，有利于国民党。但是經过了一个多月，他們的看法改变了，国民党中有一个将軍說：中苏条約是給我們打了一針，打的不是补血針，而是痼疾針，使他們渾身忽冷忽热了一陣。說这話的不是我們，而是国民党員。关于这个今天我們不加評論。在今年十月革命节，每个解放区和我們延安要开庆祝会，以庆祝中苏条約为中心，要求坚决彻底执行中苏条約，中苏条約規定了中国不能参加任何反苏集团，签訂中苏条約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蔣介石，他是合法政府，他签字最好，因为一切的反苏言論都是从他这个反动集团发出的，签訂了中苏条約后，象一九二七年以后那样再在国內大規模的反共打內战是不可能了，这是大势所趋，在中苏条約下的形势已經改变了，就不是一方面的問題了。他要坚持独裁，消灭共产党，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在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到了这时候就只好講現实主义，現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和同盟国都不要打內战，如果中国发生了內战，就会牵动全世界。我們的党也不是一九二七年的党了，今天我們的地位提高了。他們从来不肯承認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現在也承認了，这在公报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来了。共产党第一次取得平等合法地位。解放区和共产党的工作已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在这样情况下，人家講实現主义請我們去，我們也講現实主义去談判。我二十八号到重庆，二十八号晚上对王世杰講，和平团結，“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这种需要，我們要求了，沒有实現，到西安事变后，“七七”抗战前才实現，我和他們講，和蔣介石也講。抗战八年主要是打日本，但內战也有一些，但內战不是主要的，打日本是主要的。尽管打法不同，有政治糾紛，有磨擦，要說沒有內战是欺騙是不合实际的。但打日本是一致的。八年中我們一再提出，只要政府政策有所轉变，我們是愿意談判的。“七大”我們也講过了是“洗脸”政策，我們洗人家的脸，人家不洗，还是洗不成。現在人家說洗，那么就洗吧。这次公报上发表的和平方針和若干民主的协議，一方面写在紙上，要实現还要經过努力。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看做全部是假的，这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和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和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蔣介石也不能不講現实主义。

这就是我和同志們講的形势問題，大家所关心的有許多矛盾現象，为什么有些問題解决了，有些問題沒有解决？为什么公报上宣布了和平团結，而同时又在打仗，这些矛盾，同志

們想不开，蔣介石历年反共，我們为什么又希望和他談判呢？我們“七大”决定，只要政府政策有所改变，我們是愿意和他談判的。这是不是对呢？我們刚才講的就是答复这些問題。

有些同志說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八个地方非常可惜。让出来好，为什么非常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創造出来的，艰苦的建設起来的解放区。让出的地方必定要对当地人民很好的解释清楚，要很好的安置，但是让出来为好，为什么？因为現在全中国的所有宣传机关，除解放区以外，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他們就是一个謠言制造厂。这一次談判，他們造謠說共产党就是要地盘，要軍队，不肯让步，我們的方針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这样原則之下，容許作一些让步，过去有些比現在还大。应当知道这次让步並不是第一次，我們过去成立过中央苏区，你們知道嗎？但是在抗战前夕（一九三七年春夏）为爭取国民党抗战，我們自动的取消了苏区。我們实行过土地革命，但为了团結地主，以使他們安心打日本，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让步不另起炉灶成立中央政府，不实行耕者有其田，还是减租减息。地区方面，我們在南方让出了若干地区，在全国人民面前使他們看清楚了共产党的让步，他們的謠言就被击破了。軍队方面也是一样的，我們先提出了四十八个师，国民党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們占他六分之一，国民党宣传說，我們就是要枪杆子，我們就减到四十三个师，他們仍为二百六十三个师，他們說他們要縮編为一百二十个师，一百个师，九十个师，我們說照比例减下来，編二十个师，还是六分之一。国民党的軍队官多兵少，一个师六千人还不到，照他們这样編法，那么是不是我們要将枪杆子交給他們呢？那也不是的，交給他們，他們岂不是又多了么？人民武装一枪一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样他們就无話可說了，一切謠言都取消了。剩下的解放区，你承認不承認？关于承認解放区的問題，我們曾提出五次之多，将来这个皮还是有得扯。寸土必爭是我們的方針，为什么現在寸土都让了？寸土必爭那是一个口号，人家有一张床摆在那里，你要站在旁边，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覚，人家要回南京，浙江地方都非請我們走不可，无論如何他也要爭，我們不让也得让，爭也爭不到，何必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有些地方还得快点走，广东是走不了啦，我們王震将軍就走得很辛苦，打了两脚水泡，到广东刚接上头的时候，日本人就投降了，我們王震又要回来。回来就回来吧，他們走得很辛苦，从延安走到广东回到湖北，国民党軍队跟着他們屁股打，有欢迎的也有欢送的。但他們沒有整住我們，我們在那里大鬧天宫，如入无人之境，还是撤过了长江，苦是苦，还是一个胜利。这次談判，湖南解放区也作了让步。又如浙东，我們在撤退中顧祝同拦腰打我們，但我們倒还是撤到上海附近了，沒有撤到长江以北。这一次算点帳沒有亏本，寸土必爭，沒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了，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賺九寸。

針鋒相对要看形势，人家請我們不去就是“相对”了嗎？有时不去是針鋒相对，有时候去也是針鋒相对。过去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也是針鋒相对。他們連来三次电报請我們，我去了，他們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我們提出，击破了国民党說我們不要和平不要团結的謠言。从現在起我們要抓紧协定，要国民党实現，継續要求和平，不达到和平不止，如果他們要打，把他們彻底消灭，就有了和平，如在上党地区，太行太岳中条山中間有一个脚盆，在那个脚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反动派去搶了，我們把他們消灭了，他們就舒服了，消灭了一点舒服一点，消灭的多舒服的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問題是复杂的，我們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来了我們就打，打是打，和平是打不破的，因为大势所趋不会錯

的。

第三，我講一点工作問題，有許多人要往前方去，在座的有些人要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我对这两部分同志要提供一点意見。走的滿怀热心爭着要去。現在要說去呀，我們就开欢送会，这种欢送会可不是国民党欢送王震一样。这样一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可貴的，可是我今天要泼一点冷水。我們有些人不是想到那里有許多困难要去解决，而是認为那里一切都是順便的，比延安舒服。他們的意見好象要到那里去享福。有沒有这种想法呢？我看是有的，有的同志要求到东北去养病，不是为工作去。据我看全中国养病还是延安好，重庆我也去过，那里也不好。我劝同志們去那里是为了解决困难，去做工作。什么叫工作呢？就是斗爭。那里有困难、有問題要我們去解决，要以解决困难的精神到那里去，越困难的地方越要去，就是好同志。这些工作是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象挑担子，看我們敢不敢挑它，一百斤和八十斤的两付担子摆在我們面前，要挑那一个？（当然我所說的是力量差不多，十四岁的娃娃不能做比）就有人想担八十斤的，却有些不好意思，就在旁边問了"天气好不好"，但另外一些同志却不問天气如何，只問那个担子重，有人告訴他这个担子重，他就挑起一百斤这个重担子，这是好同志，这种精神我們应該学习。

有些本地干部要离乡背井。我們在精神上要作准备到东北去，到那里去生根开花結果。最近解放日报有一篇文章叫做"在本地工作中生根开花"（見8·28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广播，有許多南方同志参加八路軍在延安生根开花，現在又要到东北去生根开花結果了，大地就是人民，我們少数去那里就是种子，种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要和人民結合起来，並和他們搞好团結，团結的人民越多越好。这就是"七大"的路綫，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挑担子有八十斤一百斤的問題发生，选重的挑，吃东西自己少吃一饅头，叫人家多吃一个饅头，这是最好的同志，是最好的共产主义者，值得大家欽佩。

对于留下的同志也說几句，听說現在留人需要說服人，他們会說，人家吃飯，为什么叫我一个人讀书？現在人家都到东北，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延安？当然到前方去是积极的，是好的，是革命的要求，但是延安不能統統走光，假如要做个决議，把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都取消好不好呢？要付表决，我看你們都不会举手。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都还要人，不能走光，这怎么办呢？我說去的就去，留的就留。有人說天下大势已定，中央要搬家，我何不先走一步呢？我說天下大势未定，現在决定不搬，将来再走，中央現在不走。什么时候走呢？等到搬家比不搬好的时候再搬，不然就不搬，現在是不搬为好，要搬也容易。"前边烏龟爬烂路，后面烏龟追路爬"，他們几万人都走过了，脚在我們身上，要走就走，不是很容易嗎？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各个机关都是需要人工作的，我劝留下来的还是安心下。

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胜利是逐漸的，一口咬个全中国是办不到的，談判結果如要靠我們在斗爭中努力如何来决定。半年左右时間之內时局还是动蕩不安，要斗爭，努力取基本上有利于全国人民局的势。前途是光明的（不管有多少困难），道路是曲折的。"七大"設想过很多困难，我們宁愿把困难設想更多一点，在党內有些同志是不愿多想困难，困难是事实，有多少承認多少，我們共产党是現实主义者，对困难不采取不承認主义，对汉奸王克敏等，我們是采取不承認主义，抓住他們要杀头，可是困难不能不承認。我們承認困难，难分析困难，要和困难作斗爭。我希望去的同志，留的同志，都要这样想，不

要片面的看問題。

总的形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前途是光明的，伦敦外长会議失敗了，是不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的，打不起来的，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过去是为了打法西斯，現在为着和平。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和資本主义妥协呢？这一点我不必多講，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打起来，那就是反人民反延安、反南斯拉夫、反苏反共的战爭，全世界无产阶級和人民，都是要坚决反对的，使战爭打不起来。我在重庆給許多人講，凡是年齡在四十岁左右的人，都經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一九一四年八月打起，到一九一八年打完，第二次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一年打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打完，中間休息了二十八年。在三十年內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死的人和沒有生下来的人都沒有这样福气。

人类五十万年历史，只有这三十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三十年內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因为地球縮小的两个人碰头，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相互碰头，碰到了就要挤要磨擦，碰的大就打大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几年間世界进步了多少？这一次大战后世界进步更要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級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沒有过的。第二次大战后，苏联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欧洲会变会什么样子？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美国的无产阶級和人民的阶級覚悟政治覚悟大大的提高了，全世界力量更加团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反掉的，反动势力是可以反对下去的，全世界是进步的光明的，应当常常向人民宣传。但是我們还要告訴人民，告訴同志們，道路是曲折的，世界上沒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不要設想一个早上，一切反动派会自己跪在地下，我們說世界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克服困难达到最后胜利。

为东渡黄河給楊立三同志的指示信

立三同志：

（一）作战命令一份付上，可了解紅軍行动方向及任务。

（二）楊森、蔡树藩、賴传珠領导之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虹鎮为指揮中心，其任务是：（1）維持石楼、义蝶、河口的交通；（2）拆毀沿河堡垒，消灭残敌；（3）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关、义蝶鎮四点之間的群众斗爭，組織山西本地游击队；（4）保持主要渡口。

（三）已下令从綏德、清間、延水三县动員三千人当担架队，本周底集中一千人。但三县人口多少不等，这个数平均分配恐不适当，应以按照可能实情为动員原則，首先集中一千人，看前方需要情况，等候命令再集中二、三两批。办法：（1）有适当組織，有好干部带領；（2）有支部組織；（3）有伙食組織；（4）带衣、毯、碗、筷；（5）服务期一个半月；（6）每两人一付担架；（7）均到河口你处集中，待命前送。

（四）戴秀英負責加造船十二只，計馬灰样三只，老娃关三只，河口六只（此六只准备开赴下游适当渡口应用）。請与联絡。

（五）你須与清間县委及河边各苏区密切联系。

（六）周付主席日內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請示，带有电台。

（七）我由义蝶鎮向石楼前进。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时于河口

关于土地政策的发言要点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

中央关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已开始电发各地，在討論和通过这一指示时，毛主席在发言中有最重要的几点，值得全党同志注意，茲摘要通知如下：

（一）七大时說：“寻找适当方法解决土地問題，实現‘耕者有其田’”。中央五四指示就是这种为群众所創造，为中央所批准的适当方法。現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手要土地，共产党是不批准，必須有坚定明确的态度。

（二）在政治上十分需要。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幫助，占有四分之三的地区。我們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斗爭，才能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內解决了土地問題，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爭不覺疲倦。

（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須使全党干部認識其重要性。

（四）由于广大群众的行动推平了土地（即平均分配）的地方，不要去批評农民的平均主义。相反地农民这种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行动应該批准。但无休止地推平，不联合中农的推平，不照顧各色人等的推平，就要不得，群众未提出推平的地方照群众所提的方法办理，也不要推平。

（五）不要怕自由資产阶級和中間分子暫时的动搖，只有我們坚决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土地，我們之力量更加强大巩固时，我們才能有力量，更可能爭取团結他們。但对自由資产阶級及中間派应作正确而有力的解释，指出減租与耕者有其田都是实行政协决議，其方式又与內战时期大不相同。

（六）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須与土地政策、与农民运动有原則区别，切忌工資及其他劳动条件訂得太高，应該是劳資合作，要訂出共同生产計划（原料足，产品多，成本低，質量好，銷路广）努力生产，使生产发展，經济繁荣，劳資两利。只有如此，才能与外国和本国的垄断資本作斗爭，使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立于不敗之地。

对目前时局的基本分析

——康生同志傳达——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

今天不是我作报告，而是将毛主席对时局的指示与任务作一个传达，日本投降以后，日意德三法西斯国家打倒之后，二次大战胜利之后已八个月了。这八个月中，一方面看到法西斯势力打倒了，全世界各国民主势力空前发展了。另一方面看到全世界各国民主势力和反动势力在作严重的斗爭，国际局势，时好时坏。我們共产党对这种变动时局要有一个基本認

識，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因此毛主席在中央会上对时局有一个重要分析，是分析时局的方針。經毛主席允許，在党員干部中传达一下：

毛主席指示共有四条：（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各国反法西斯国家团結起来，其主要是苏联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把德、意、日法西斯及其附庸打倒了，这就給全世界民主勢力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

所謂“二次大战”，是說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这时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爭，使反法西斯国家团結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其中主要是苏联及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共产党为主力軍。由于他們領导这些国家的人民坚决奋斗，才把法西斯国家三軸心及附庸国（罗、保、匈、芬……）打倒了，同时苏联壯大了，各国人民力量，特别各国共产党强大起来。希望同志們看报留心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研究材料的同志可把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統計起来，很有价值，作为各支部的学习之用。斯大林駁丘吉尔时也統計了这些材料，不但东欧而且欧洲各国共产党都强大的发展起来了，如芬、匈……。被侵略的国家內共产党也空前发展（波、捷、南等……）这和第一次大战完全不一样。斯答丘所以未講亚洲，亚洲共产党力量也空前开展，如日本，崗野进过去在延安，現在东京了，如朝鮮共产党中央也成立了，菲共产党領导了战爭，爪哇共产党至今和人民一起反对荷、英帝国主义，印共产党也大大增加了，安南共产党参加了政府，特别忘不了中共，更加发展起来了。想想这日子很好过，一次大战后，中共有多大?还沒有，到了一九二一年才成立，第二次大战后，有沒有呢?一百二十多万，还領导了一万万以上的解放区。总之无論整个欧洲或亚洲，各国共产党力量强大了，这样給全世界各国人民民主力量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只有在这条件下，才产生了停战协定、政协决議等，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这时开始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当同志們研究时局的时候，必須認識，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开始不是偶然的，不是张群、邵力子等态度好，才签了字的，也不是我党那个同志說的好才签了字的，而是在目前大局底下签了字的，是建筑在毛主席第一条所指的国际、国內的局势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条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来了，現在又根据时局发展更明确的又一次的指示。这一条是一个大問題，是世界和中国必須要走的道路問題，离此，我們不能看清变动的时局。毛主席在七大作結論时說：“我們要对‘普遍’‘大量’的問題能看清楚，才能把握住时局。”这才是“普遍的”（法西斯打倒了）“大量的”問題。同志們在分析时局时常把大的問題忘掉，中国人有句俗話“看見芝蔴，看不見西瓜”，也是这个意思。

（二）“德、意、日这些国家中法西斯残余和反法西斯国家中亲法西斯的反动勢力（資产阶級右派、丘、戴、赫及中国法西斯派），这些反动勢力已經在並且将来还要疯狂的組織反苏反共反民主运动，企图挑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种勢力現在結合在一起，成为今后世界和中国长期的重要的敌人，这些反动勢力如不为人民勢力所克服，則第三次大战不可避免。”

在第一条中毛主席說法西斯已打倒，世界走向和平，人民要求和平，苏联强大，反法西斯各国內部困难，大战不可能即爆发。但第二条告訴我們反动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即法西斯反动力量（残余勢力的包括西班牙各国吉斯林分子）及資产阶級右派反动勢力等（丘……等），他們过去是疯狂組織反苏反共反人民，而且現在和将来还如此。他們挑拨三次大战，可看到他們不但要一般的作，还要疯狂的作，这种勢力成为长期的中国和世界的主要敌人，

他們不会和永远不能和人民势力妥协的。同时我認为“論联合政府”中基本上指出来了，“反动力量还强大，历史上严重的曲折还会发生，如看不到，我們要犯錯誤的。”这里要引起同志們注意的，是主席有新的指示，明确告訴我們什么是目前人民的主要敌人，明确的指出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資产阶級右派在目前和今后是人民的主要敌人(当前还有次要的敌人)，七大“論联合政府”因公开发表未明确写出，同时还指出如人民的势力不能克服反动的势力，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目前各国进步，各国反动势力內部困难，苏联强大，目前不会有三次大战爆发，但不是說永远不能爆发。請看斯大林二月九日演說，內中說到“馬列主义者不只一次指出：資本主义經济制度本身就包藏着战爭和侵略的因素”，从这角度我想到中国問題。

总的是和平民主阶段，中国不能违反世界大势，同样，所謂和平民主阶段开始，不是說反动派已經放弃武装，內战的危險，我們受突然袭击，已經沒有了。而是大战的因素是存在的，中国要走和平民主道路，但反动势力还未放弃內战的武器。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給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一个致命的震动和打击，資本主义危机无法克服。二次大战后，資本主义世界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局面已經很难了，因此恐慌即将到来，战爭中表現空前因畸形繁荣的美国，也将遭到空前的危机。”(毛主席說到致命的打击。十月革命爆发，开辟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論”中見到資本主义走下坡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走上坡路，二次大战給資本主义一个更大的“致命的”打击。三个資本主义国受伤，苏联空前壯大了。欧洲出現了几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南、波等，亚洲有一万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七大說：資本主义这野兽在世界一次大战时被击了一个脚，二次大战又击了一足。所以毛主席說：資本主义残废了，現在的資本主义是爬行的資本主义。这是一年以前的話，現在証明更加正确的，資本主义的危机更不可克服。十月革命后，資本主义稳定破坏，其体系已产生不可克服的危机，各国革命失敗，經20—21年恐慌后，資本主义体系还有一个相对的暫时稳定(21—29年)，虽然这稳定是很脆弱，是总危机下的稳定，故称之謂相对的稳定，今天則很难有此稳定。所以严重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毛主席“不会很久”，也不会超过十年。最近一个有名的經济学家瓦尔家說，“不出五年”，美国也一样，美国在大战中有一个迴光返照，特种繁荣。毛主席說美資本主义在二次大战中有很大繁荣，但不能說資本主义万岁。是暫时迴光返照的繁荣。我們不能作这样的了解，美国明天就有恐慌。相反的，我們要了解美国有很大的生产力，战爭中未滿足消費部門，有很大可能战后一个时期有短期的繁荣，国內市場有，国外市場扩大着，但美国的經济恐慌是要到来的，虽然美国市場扩大了，但整个資本主义市場縮小了(苏联大，欧洲新民主主义国家出現)，当美国国內市場有需要，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很快使国內市場容納不下，发生严重的矛盾，因此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无論国內和国际市場和美国生产力的矛盾即将到来，会遇到空前的灾难的。瓦尔加有一文章在“群众”三、四合刊上說：“总起来說，生产工具未受到破坏，且已有改进的国家(美)，今后二年到四年中，生产力还可向上升涨，但即将因生产周期恐慌的到来，而呈現低落，这一危机将較21—29年的恐慌更加要长了。

在毛主席分析經济后說，“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推动了反动势力疯狂的斗爭，在国內企图造成反动的統治，在国际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但这一情况又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团結起来，並将使世界資产阶級內部分裂，这样有利于世界人民便于去組織反对反动势力的統一战

綫。”（这种反苏反共的企图不是証明反动势力的巩固稳定，而是証明其沒落和恐慌。丘吉尔的反动演說証明了这一点。同样看到国民党二中全会法西斯囂张叫喊不是証明了国民党統治的稳定，而是証明它統治不下去，所以要求“革新”。但另外推动人民更加团結，資产阶級的动蕩恐慌，使其內部分裂了，便于人民組織統一战綫。資产阶級本来內部是不統一的，如二次大战，分为法西斯与非法西斯二个营垒，同样在中国資产阶級也是分裂左、中、右三派的，現在的情况还是要継續分裂的。本来資产阶級內部不統一是馬克思学說对資产阶級的主要看法的一个基本点，但这基本点常常为有些共产党員所忽視的。有些人認为世界資产阶級和中国資产阶級是統一的，“象鉄板一样的”。因此，做出两个結論：“中国資产阶級和世界資产阶級一起結合起来进攻中共和人民。”（打倒一切），另一种，都是好（联合一切），前一种犯“左”傾机会主义，后者犯右傾投降主义。

我們看毛主席所有的文件，他对中国資产阶級的看法掌握了資产阶級內部分裂的观点，是毛主席思想中很重要的精华部分。如不掌握这种观点，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只有掌握毛主席这一观点，我們的策略才能做到：“利用矛盾，联合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四句。

这样就有利于人民組織統一战綫反对反动势力。上面这种情况如何“利用”呢？毛主席說：“任何国家都有下列几种力量存在：（1）工农小資产阶級力量，他們在战爭中大大提高了覚悟程度，他們是民主的主力軍；（2）資产阶級內部的左派（华来士，中国民主同盟），他們主张“和苏和共”；（3）資产阶級內部的中央派（杜、阿、蔣）他們是这些国家的当权者，他們有可能和民主势力妥协，以便在有利的时节等待时机，消灭人民力量。

毛主席把蔣摆在中央派，有些人又要說：“蔣今天又有了些革命性了吧！”如果那样了解，那是完全錯誤的。我要大家不要去爭論，蔣有无革命性，他是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毛主席所以把他放在中央則是他有两面性，一面要消灭人民力量，但不能消灭时暫时妥协，以便等待时机来消灭人民力量。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內的买办資产阶級，他是听从国际資产阶級的命令的，以前他曾听从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的命令，今天則听杜魯門的命令行事的。他是一个封建买办法西斯蒂，他是一个法西斯，但又是一个封建买办，可說半法西斯。这是他的特点，我們应有这样的特殊的了解。

毛主席又說：“各国資产阶級現在和过去一样，內部継續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这样使共产党不但有可能联合广大人民，而且有可能去联合資产阶級內部左派，并有原則的去和資产阶級中派妥协，去打击右派使民主势力大大发展，克服反动势力，避免世界大战，在有些国家內实行社会主义，有些国家內实行新民主主义，在人民力量发展，其力量足以克服反动力量的时候，这种可能就大大增加，在不能克服反动力量时，世界大战即爆发，这时各国人民要以革命的战爭来反对反革命战爭，来建立世界的和平民主。”

这一条說明，資产阶級內部分裂，使人民有利，有两种可能，取决于人民力量的发展程度和反动力量的对比。总之，能否克服反动力量，世界要走光明的道路。

（四）“党的路綫，主要的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并联合資产阶級左派，并与資产阶級中間派有原則的妥协。去打击資产阶級反动派，实現国內和平的局面，在实現这主张中不是主要采取武装斗爭的方法，而是采取民主主义的方法，只有在反动派破坏协議时，才用武力来制止它，这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当权的資产阶級中央派要破坏协議，是因为他們要全力反对

共产党的。如不能則采取暫时的妥协，他們的政策有二条：一条是凡能消灭者，必然消灭之；二、凡不能消灭者，則予以保留，等到将来消灭之。所以資产阶級中派有可能将来走到右派的，我們必須要警惕到的。”

毛主席所指的是什么路綫，什么政策？

我認为是馬列主义的路綫和馬列主义的政策，即不打倒一切，又不联合一切，而是利用矛盾打击一点的路綫。

我們的工作方法，斗爭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停战后我們是采取民主主义的方式，但为了防止反动派破坏，才被迫拿起武装。××同志报告后，延安同志們思想上有一个問題，認为武装在中国革命中是不重要，武装同志有些牢騷，說：“找錯了职业。”我告訴同志們：“中国革命失掉武装，就失掉了一切。”沒有革命的武装，就沒有民主，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停战令、政协会、整軍方案以及改組政府的事情。講一件小事，飞机今天在延安、北平飞来飞去，也是有武装的原因。党校有人发問：改組后政府是什么性質？有人認为：“独裁加若干民主”，有人認为是“联合政府”。我說即使照协議办事，这改組后的政府依然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道理很簡单，国民党区域枪杆子还不是属于人民的，如象政协会議，一切都是想象那样好，那就不是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失掉軍队，就失掉一切，这是眞理，过去如此，現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今天在国民党区域你能否去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在我們区域进行减租减息还不容易的事哩。由此我們可以說，当前主要斗爭不是武装斗爭，但武装斗爭在中国革命中还是一个重要的問題。

毛主席还告訴我們，資产阶級中間派的本質是什么？毛主席指出中間派是坚决要消灭共产党的，和右派是一样的。必須要了解，在这点上，蔣和何、陈、杜和蔣，杜和赫是一样的。但既然如此，为何又有停战令，政协会呢？簡单說是暫时消灭不了，予以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在消灭共产党的时間上、政策上、方式上是有区别的。所謂右派則是一面，消灭不了也要消灭，蔣和杜是要走一个弯路来消灭你，这也給我們一个可利用的矛盾。我們对此如何办？采取什么方法？自然不能叫它干脆消灭我們，他要妥协即使暫时的也好，我們是欢迎的，但思想上要認清其本質。所謂停战令、政协会等等，馬歇尔、杜魯門、蔣介石都是要等待一下，将来消灭共产党的一种办法，在形势演变中他們会变成右派的。丘吉尔是一个証明。但他們那种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想法，往往是做不到的，其結果常是相反的，希特勒是一个例子，人民压迫下是会警覚起来的，停战令后，一部分人有疏忽的思想。但政协令后，較場口打了一頓，把新华日报打了稀烂，就使我們要警覚起来的。蔣介石反动派是我們这样的一个先生。

綜合起来：

第一条講世界要走民主道路。

第二条講反动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第三条講人民的力量是有利的，不但有广大的主力軍，又有广大的后备軍，不管二种可能，最后的胜利是人民的。

第四条党的路綫是团結广大人民联合資产阶級左、中派，去打击反动派，完成和平民主建設事业。

这是毛主席七大路綫的新发展，希望和毛主席的“論联合政府”中的基本思想联合去研

究，只有把总的問題解决，才能分析时局的变动的問題。但毛主席再三告訴我們，还要最后考虑下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目前还不作公开的发表。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

亲爱的战友們，不朽的英雄們：

数十年間，你們为人民的事业做了裏裏烈烈的工作。今天，你們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生！

你們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訊識，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結事业的决心。

你們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号召全党党員和全国人民团結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結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員和全国人民，将継承你們的遺志，継續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縮！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說：“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沒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劳动大学就在吳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幫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說：“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費去。”毛主席給了一斗米，叫毛岸英揹上走，走到吳家枣园，累得他滿头大汗。

（原載晉冀魯豫《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致暹罗侨胞的复电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暹罗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暹罗职工总会、暹罗华侨青年会、暹罗华侨教育协会，暹罗琼崖同乡会等七十一团体，并請轉暹罗华侨公鑒：

十一月二十二日电悉，义正詞严，至深欽佩。国民党当局既拒停开非法国大之建議于先，又拒解散非法国大之要求于后，实为自閉談判之門，全国人民对該非法的分裂的一党国大与其所通过之所謂宪法决不承認。今后本党决为恢复政协路綫与恢复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而奋斗到底，尚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实現祖国之独立和平民主。

（原載晉冀魯豫《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为美国对华軍事援助的法案的声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美国国务院本月十四日提出国会审議的継續对华軍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項法案。中共此种意見，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战爭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軍事援助，并派遣美軍在中国协同作战，其目的就是击敗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在那时，由于美国錯誤的仅仅援助国民党軍伐，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的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軍閥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鎖。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沒有停止

反而极大的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策的各种軍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軍队，駐在中国的領土与領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經証明是中国大規模內战暴发与継續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議公报关于中国問題的約束与中国国民党宣佈停止內战，并宣佈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議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議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經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軍事援助。但是現在这些前提都已經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謂軍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內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継續陷中国于內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貧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現整軍复原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領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个民族的光荣友誼与中美貿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此急需的，並不是美国的枪炮与美軍的留駐中国領土。相反的，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軍人已經太多，美国在中国的軍队已經駐得太多，他們已經造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的威协。在此种現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継續出售、租借、贈送或过渡等方式，将軍队交給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軍事顧問团来华，並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一切对华的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軍队。

給美国海員工会三千华侨工友的复电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鄺××先生暨美国海員工会三千华侨工友：

接获来电，得悉諸位工友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內战，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对依靠外力进行內战的行为表示义憤。諸位关怀祖国前途，热爱和平民主，令人感佩兴奋。深望諸位再接再厉，喚起全美侨胞，全美动工界与各界人士，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駐华美国海陆空軍，并撤消已向美国会提出的継續軍事援华法案，使中国和平民主得以早日实現……

給十二軍軍委的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粟裕同志轉边区工作委員会

譚××轉十二軍軍委：

此次十二軍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連城应让第二軍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軍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为工作区，十二軍担任这三县，三十五軍担任瑞金一县，三軍担任雩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問題眞正的解决，使雩、瑞、石、宁、会、汀六县連成一片，这是我們的中心任务。十二軍两个月要作三县工作是不容易的，二次战爭后四个月中，十二軍做了石城一县宁南丰县工作，現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全色区域，过去成績如此。現委二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連二县，并且耗十二軍主力三十四师摆到二县去，那么十二軍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須变更康都决議，把三十四师担任长汀全县，軍直属队在三县之間，望坚决照此布

量。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軍团去二崇、四軍去宁安的計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蔣介石打击两广，为蔣介石所大愿（缺字）并且要很快？两广的共同行动乃由我們一（不清）。两广反蔣視綫使之集注于我們自己，必然要促进蔣粵妥协对共的过程，我們不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許，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則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則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变，只有东方才是好区域：第一，蔣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較之我們去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縱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場；第四，有款可筹，一軍以內不愁給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紅軍。因有这些条件我們应該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計划，三軍团应以建宁、太守、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順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軍应以归化、清流、連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明溪、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給，三十五軍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給，三軍以雩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給。贛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域：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里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建立地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作时期暫定两个月延长不去可达两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两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們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十二軍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求工作好，最近在宁工作之失敗（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与农通通反了水，要来一个透底的轉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么軍委和三个师委（不清）复重明責任。

总前委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于建宁石城信所說三个月縮工作时間及短二个月敌进攻紧迫

十二軍委并轉以栗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員

答复时局問題

——答紐約先驅論坛报駐华記者斯蒂尔先生問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問：閣下是否認为美国調解中国內战之举已告失敗，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継續实行，則結局将如何？

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政策是所謂調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蔣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規模內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謂"調解"作掩护，以便从容从各方面加强蔣介石，并經过蔣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殖民地。这一政策継續实行下去。必将激起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問：中国內战将延长多久？其結果将如何？

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現行片面援蔣政策，撤退駐华美軍，实行莫斯科三国协定，則中中国內战必能早日結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爭的可能。其結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結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現的。任何本国与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現。

問：閣下是否認为蔣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領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均不接受蔣介石的五項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則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答：世界上无所謂“当然領袖”。蔣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間的停战协定以政治协商会議的共同决議处理中国政治軍事經济等款問題，而不是按照所謂“五款”或十款违反上述那些协定的片面要求，那么我們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議的决議由各党各派共同負責召集，否則我們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复中国民主同盟馬来亚霹靂分部盟員大会主席的电报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九月二十日代电敬悉，貴盟痛恶內战，呼吁和平，所提甚为切中利弊，敝党自日寇投降之后，即以和平民主与独立为奋斗之目标，但国民党好战分子持有美政府外援，坚持独裁，坚持內战，破坏政协决議，整軍方案与停战协定。数月以来，以无理要求作为商談条件，以掩蔽其进行扩大內战之烟幕，发展至目前，已列最严重阶段。解决的关鍵为使一月政协决議切实付諸实施，希海外侨胞諸賢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敝党亦当本此方針奋斗到底。

（《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

春节宴請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駐軍干部时的講話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事宜不要鋪张。

我們好比爬山，已經快攀登到山頂，去年的困难已經克服，但对于在政治上破坏“政协”，軍事上破坏“停战会”，进攻我們的蔣介石，定要坚决粉碎其进攻，求得全国和平。

軍民之間，乡邻之間要和睦、团結，爭取和平光景早日实現。

（录自《解放日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接見边区部队一部分負責同志的講話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地点：延安王家坪毛主席会議室。

保卫边区的負責同志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战士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决心那怕只剩下一个人也不能让蔣介石占領延安。

战士們的这种决心很好，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窰洞，吃了小米，学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領导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延安，同志們对延安这种深厚感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必須用坚决斗爭的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現在国民党派了二千多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們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有飞机坦

克。而我們在边区的部队只有二万人，我們在武器方面，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数量方面与武器方面，虽然比我們优越，可是我們还要看到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迴旋余地大，只要我們有一个正确作战方針，我們一定能战胜敌人。我們的作战方針是誘敌深入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周旋，把敌人磨得十分疲劳的时候，十分缺乏粮食的时候。然后寻找机会消灭它，这就是磨菇战术。蔣介石占領延安这决不是他們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們不久就要倒霉的。

我們的作战目的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一个地点为主。只要我們能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們将来就可以恢复失地，並且能够夺权新的地方。因此說，有人失地，人地則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現在我們主动放弃延安，就是这个道理。

你們回去給战士們講一講。一年，最多两年我們还要回延安来，到那时，延安就永远是人民的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时的講話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时敌人越来越近十几里枪炮声都可以听到，机关群众都已陆續撤走，大家劝主席快走，主席講：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走他的，他們到那个山头，我就到这个山头，怕什么，沒有什么可怕的。

給内蒙人民代表大会的賀电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亲爱的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們：

你們五月十七日来电收到了。曾經飽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們領导之下，正在开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們相信：内蒙民族将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亲密团結，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設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們的胜利。

（《人民日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給各野战軍首长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目前情况，給敌以歼灭与給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須同时注意，給敌以歼灭是說将敌整旅整师干淨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針，必須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四方，即是說四面包围敌軍，方能奏效，这是我軍作战的基本观点，这是在敌軍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須实行的正确方針。但在敌軍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軍前进方向实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軍应当采取給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針，这即是說，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敌軍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軍伤亡，其被歼之部分可以补充我軍，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

不过一部分，短期內也难恢复战斗力。……。

为糾正“左”的錯誤給中央局的信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上略）我完全同意习××的这些意見。华北华中各地老解放区如有同样情形者，必須密切注意改正。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領导机关千万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只要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就可以糾正过来的。但糾正时，必須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糾正“左”的錯誤而誤認为不要动了。

給中原局的指示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上略）你們主张在新解放区先建立貧农团，以提高貧僱农的覚悟性与組織性，树立貧僱农的威信，在与国民党和地主的斗爭中，吸收中农参加；貧农团建立了几个月之后，再建立联合全体农民的农民协会。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在中央对新解放区土改要点指示中已規定了。貧农团和农民协会的組織，均須严防地主富农及其他投机分子混入。农民协会的会員及其委員会的委員中，必須有三分之二是貧僱农，以确实掌握貧僱农的領导权。这一点也是完全必要的。

新解放区的斗爭策略阶段，必須分为先斗地主，后斗富农的二大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又必須分几步驟，先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根据农民群众的覚悟程度，逐步把打击面推广，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要超过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成分是富农地主（甚至个别的中农）的反动保甲长恶霸分子，为群众所痛恨，群众要求先斗他們时，我們应当允許农民这样做。特别是因为有許多乡村沒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与富农，更应允許农民这样做。我們允許打击富农和中小地主的反动保甲长恶霸分子，和我們在第一阶段的策略（縮小打击面，对于富农中小地主的多数暫时不去惊动他們）並不矛盾。

复××的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看到你的报告以后，对你所提出的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在老区凡是已实行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經济基础已經消灭，只是还不十分彻底，須酌量調剂土地的地方，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而是应該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来滿足部分农民土地不足的要求，此种地区如再去平分土地，那是錯誤的。在这种地区，只在农民內部組織貧农小組来保障貧僱农的利益，在农民委員会中，在农民代表会議及政府中，能使貧僱农与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保障他們在农村中的領导权，並同时又使老中农能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这样做法是很好的。在貧僱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組織貧农团，並硬要貧农

团去指揮一切，这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議路綫的，是极端冒险的命令主义，如果你們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組还是有这样做的应立即停止，並将他們調回訓練好后再回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起来，此事希很好注意。

其次，在老区与新区之处，还有介于二者之間的半老区。在这种半老区里，土地問題沒有解决得象老区那样彻底，但它与之完全沒有或大体上沒有解决的新区，又更好些。在这种半老区的工作方針，应同老区有区别，也同新区有区别的，望你們加以研究，並将研究的結果函告我。

在中央会議上的談話

——陈毅同志传达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 ——十二月会議的記录及毛主席的指示。

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說是个伟大的事变，原因是敌我双方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經济、土改、整党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轉变，这变化形成了这个伟大事变的标志。政治方面的变化是蔣介石孤立了，我們获得全国各阶层拥护，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現象。經济上蔣介石陷于危机的漩渦，无法脫离。我們也有困难，但能渡过。軍事上，人民解放軍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主要标志。我們有土改，蔣介石沒有，我們有办法，我們土改后也有不同情况。整党方面，发現了党內不純，发現了地主富农的思想傾向和路綫，我們从思想上組織上来一个整頓。这五条造成了变化的主要原因，使敌我形势根本变化过来。这个根本变化，一九四七年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来。

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人向我。全国人心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蔣介石深恶痛絕。孤立蔣介石是长期斗爭，而且长期沒有解决的問題，現在解决了。內战时期，我們孤立，我們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各阶层我們都脫离了，那时蔣介石的基础較大，內战时期，这个問題未解决，故內战失敗了。抗日时期也竭力要解决这个問題，情况有所改变，我們的朋友多了，因为我們采取了适当政策。为坚决打日本，减租减息，我們拿住了抗日旗帜，中立了中小地主，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揚了民主，爭取了資产阶級及其他各党派。軍事政策是分散的游击战爭，适当的进行反磨擦，防止冒险主义。抗日时期的各种政策一般是正确的。反对抗日时期的政策，否定一切，說这也是机会主义，那也是机会主义，大革命时期后期，由于机会主义搞錯了，以致蒙受了失敗。抗日时期，一般政策是对的，孤立了蔣介石，取得了朋友，王明路綫未占統治地位，避免大革命时期的右与內战时期的“左”，使党获得了領导地位。要很好研究抗日时期的政策，不能粗粗糙糙的說那时錯了。蔣介石的主要錯誤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部队不打仗，以致使他丧失了民族領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經济，政治上則是搞特务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蔣介石的問題。这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政策适当所致，这是四七年发生根本原因。

軍事上，去年七月我們轉入反攻以来，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于是軍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們长期处于防禦，被“圍剿”地位，沒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們还是处于分散防禦地位，去年（四七年）七月，我們历史上第一次轉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

攻，不要說“反攻”。反攻带有防禦滋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內容。战爭在初期是自卫性質，我們那时的方針，是迟滯內战，現在要消灭蔣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質。自从蔣介石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实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禦，把蔣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內容更适合。蔣介石无論如何要返回过去形势，已不可能。黃鶴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两广的問題，蔣介石再想过黃河、隴海已不可能。

去年七月我轉入进攻，美蔣討論好几次，美国苦心焦虑，甚至华盛頓主张放弃緯綫40℃以北（东面安东經过北宁、平綏、大同，西至西安）就是說放弃东北，爭取华北，巩固长江，經营华南。

美国人主张，一定要放弃一些地方，因士气不明，兵力分散，不如把队伍拉下来，整訓装备，才能再行进攻共产党，魏德迈說“攻不动，守不住，不如放弃。”蔣不同意說“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会全部推下来。”

美主张三种地区：放弃区，即緯綫40℃以北，安东，大同，嘉峪，西安以西这一綫；力爭区，緯綫35℃，隴海以北；坚守区，緯綫30℃以南。蔣介石則主张东北坚守，华北力爭，中南进剿，江南防禦，华南經营（包括两广，台湾，福建由美来搞），美主张撤出东北，把軍队拿到华东訓練，将来反攻。蔣說放不得，撤不得，撤了共产党即推下来了。

蔣介石要尽量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他說：“要三次世界大战，三四年內爆发就有希望。”

自从去年七月，我們轉入进攻，蔣就永远不能翻身了，局部进攻还可能有，战略进攻是不可能有了。

經济方面，蔣的經济四七年比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問題，过去对西北战場担心，內战作战又遭荒，人少兵多，晉西北也有災荒，山东敌人压境，我們經济也成問題。但自轉入进攻主动移出，負担减輕，收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我們的經济問題解决了。因蔣沒有土改，四八年蔣介石将更困难。

土改整党：使党員上軌道，土地法頒布与未頒布大不相同。五四指示是党內指示，人家不說究竟，有些怀疑，公布了索性平分，人家反而贊成了。去年九月土地会議后，全国各区土地会議开得好，土地会議就是整党会議，彻底揭发了党內严重現象，使党为之改观。晉綏西北政治方向是对的，因为是在搞土改整党，东北工作作得好，晉冀魯豫也作的好。估計一九四八年还有更大的变化，优势属于我，形势发展有利于我，例如，就人心而論，人心大变，群众靠我。蔣总动員，但人心反他，学运未停，三青团过去有劲，現在无劲，学生都是地主富农子弟，我們搞土改，学生們造蔣介石的反，值得注意。五四指示未公布，怕人家反对，公开宣传反而好了。

軍事、經济、土改、整党这些情形，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有根据說，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現在革命高潮已来，过去对于高潮是从城市大暴动、軍事胜利两个方面来看。現在不要这样看，不必希望大城市，如果仍是那样看，則日本投降后，是看能否进平津大城市，現在不这样看大城市。（1）四七年下半年群众运动並未低落，四八年还要高涨。（2）軍队未去前，大城市暴动很困难（巴黎亦然，北伐軍到了龙华，上海工人才暴动），軍事是主要的，故該七月反攻即是高潮开始，主要是在軍事胜利，将来胜利还会更大，不說是从城市

独立暴动，大城市是野战胜利的結果。

但战爭仍是长期的，要准备对付敌人最大限度的抵抗，“七大”設想了十七条困难，有些講中了，有些未講中，那时估計重点，沒有害处，未講中的只有好处，沒有坏处，但不要設想敌人最大限度的抵抗，无力攻，但有力守，抵抗他还是要抵抗的。第二綫兵力美国給他們訓練装备，（美国出兵可能不大）特别美派兵守城占領南京、上海，不让我們进去，麻煩，美打与不打沒分别，主要是蔣要垮台，蔣垮台以后，我們才来改变，是个困难，但不要怕。

地主阶級消灭了，全国土地分好还得十年。准备四年到五年，大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可能在全国把蔣介石打垮（五年胜利，从四六年算起），到我战爭結束，双方需要五百万人伤亡（每年各五十万），今年还要設想几条困难，要打不要怵，不是輕松的事。

战爭不应使之間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但不要說死，主要决定南方大城市群众和中产阶級态度，例如，蔣介石大势已去，說要下野推出李济深之类的人出来，这时和与不和取决于南方群众，如果群众要和，你如不和，他会說你是好战分子，和吧！明明是蔣的欺騙，是他的金蝉脫壳、移花接木的脆計，想借以得到休息的机会，企图卷土重来。为了預見这种事情，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說清楚，不是消灭蔣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蔣介石的集团及其阶层，群众是否覚悟到，非蔣灭亡无出路。如群众对大資产阶級的幻想一扫而光，則无此問題，但如蔣下野，中間派出头，如此是否能将群众对大資产阶級的反对派的幻想，一扫而光？两种了解：（1）消灭蔣介石本人，（2）消灭蔣介石集团及其阶层。現在却要作宣传解释工作，向群众說清楚，以揭露之，否則，战爭間断会有的。

靠自己，不靠外援，不靠不是不要，要还是要，要而不靠，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要靠，就是到了全国胜利，有了中央政府，还是不靠。蔣介石的战略基本上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敗。外援对我們不是决定条件，苏区时未靠外援，但靠自己未靠好，如靠自己靠得好，可以不长征，东江纵队可以北来，浙东可否多，皖南皖西鄂、东則未留下，故一切靠自己政策好（軍事的、群众的）完全可以靠自己。

統一战綫：

总的目标划清敌我界綫，达到孤立敌人，勿孤立自己，先分开，后磋合，把資产阶級孤立起来，无产阶級对資产阶級，他孤立我，我孤立他，最后把他孤立起来。

北伐后期右，脫离群众（农民），脫离軍队（自己不搞武装），只剩了无产阶級，孤立自己，故失敗。北伐时本不孤立，但群众要土地不給，又不搞武装，故农民失望，造成了自己孤立，以致失敗。

内战时过左，城市完全孤立，孤立了党了，强迫示威，强迫罢工，白区損失百分之百。农村中战爭与土改“左”的政策，进攻大城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赤白对立，与此有关。对中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农村沒收一切，劳动条件过高，最高工資等片面工人利益，搞坏了經济，搞垮了工商业，赤白对立。

农村中不是完全孤立，但因損害了中农，特别对商人，結果剩下工人、貧僱农，焉得不敗。

内战时期我們自己孤立了自己。

抗日战爭时期学乖了，一向反对只团結而不斗爭，一向又反对只斗爭而不团結，反对相

信国民党超过相信群众的程度，不是不完全相信国民党，他在抗日，为什么不相信，問題在于相信他不相信群众，只联不斗，反对了这个就胜利了。我們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早采取了这个政策，打了八年就把蔣介石孤立了，如不在八年中采取孤立蔣介石的政策方針，今天就来不及了。

两个原則，孤立敌人要反右，爭取群众要反“左”。

三三制就是对地主让步，又联合又斗爭的策略，要他参加政府，又要他服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在城市可以迷惑中小資产阶級，不要以为高潮来了就四面开枪。現在城市中爭取中小資产阶級有必要，当时如不国共合作是不对的，国共合作实际国共斗爭，合作是形式，斗爭是內容，对蔣有合有斗。对民族資产阶級也是如此，但斗的少些，与蔣有区别，是慢慢的来。开始报上只講合不講斗是对的，但有坏处，就是造成对蔣介石幻想。减租减息是完全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力小，地少兵少，以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先霸到地方才能过渡到土改，开明士紳到政府是要的，地主剝削阶級反过共，还是要的。今天这样还是有的。現在有人講是机会主义是不对的，李鼎銘死了要公布，要追悼。大家回忆双十宣言，双十宣言包括四种人：（1）未作过坏事的，（2）未沾过人血但是反共的，（3）有功的士紳，（4）追到天涯海角等四种人。只有第四种人要追到天涯海角的，但追到了也不一定搞，这是从工农着想，可少死些人。寬大政策不是替敌人寬，而是替群众寬，是群众問題，不是对地主富农同情。

故反右傾不要反到不要統一战綫，說三三制錯了，减租减息錯了，吳滿有运动也錯了，不对的。三三制現在不提倡，也不反对，現在反右又反“左”，划清界綫，否則还要失敗。

反右：（1）过高估計敌人，怕蔣怕美，不敢到国民党区去，怕美国人来头大，刘邓等三路大軍到国民党区，一个月解决了棉衣問題，完全証明了在蔣区是能作战的。（2）对中間派动搖分子的观念上模糊不清，对中間党派，民族資产阶級，中間阶級，搞不清楚，如新华社对张瀾、罗隆基与国民党不妥协，大加贊揚，对馮、李反蔣就作义务宣传員，对黃炎培也宣传，对其动搖估計不足。黃炎培是中等資产阶級右翼派，动搖得很，对馮玉祥、李济深、黃炎培不要宣传，这些人沒有軍权未上台前，可以表示革命，有了軍队，就撑着我們死打，到底是地主軍队，民族資产阶級是保皇党，对民族民主革命是动搖的，虽为数不多，但要批評揭露他，对其政治影响要打击，經济上不是消灭，要反右也要反“左”。

地主穿衣吃飯容易訊識，就是挨边上的，不容易分清楚，两头小中間大，中間阶級很大，也是挨在边边上的不好搞，資产阶級末尾的不好搞，具体的如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容易区别，黃炎培反蔣，但又对蔣磕头，时而贊成土改，时而反对土改，这种人很难分清，接合部地方不好搞。（3）土改中有的表現消灭地主无决心，有些人打日本很有劲，消灭封建沒有劲，有的对混在党內的地主富农不肯坚决肅清，整党无决心，也是右傾机会主义。

反右胜利后，最容易犯的是“左”傾，力量大了就无所顧忌了，速胜論，还要长期小心，准备对付敌人的最大抵抗。

（1）不要过高的估計敌人，是否輕敌，又是又不是，有輕敌的成分又不是輕敌。輕敌不应放在具体布置上，但在全体上要藐視敌人（如对美蔣地主却是鄙視）对这敌人不要怕，对当前敌人要謹慎。

战略上輕視敌人鄙視美蔣，战役上重視敌人，具体战斗上要注意，要慎重对待敌人，有

些人对美国出兵，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的要命，对当前敌人忽視得很。

搞土改时封建势力要輕視它，但对你面前的地主富农具体的敌人，要謹慎对待他，不要乱打乱杀，要用細致的策略斗爭把它压服。

我們同志恰恰相反，敌人愈远愈害怕，愈近愈不注意，敢于下手革命，但具体来革則不易，我們同志在此也是相反的，許多人在具体革命上栽跟斗，战略上它是落后的，我是新生的，但对当前敌人要重視，因为它是有毒的。

"左"的錯誤就是对当前敌人，不加分析輕效从事。

（2）不要性急，全国土改十年完成，解放后三年完成，即一九五〇年完成。战爭五年胜利，不要速胜論，速胜論是"左"的根源。

（3）土改的"左"是侵犯中农問題，主要是违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的。对中农要体貼入微，所謂体貼入微是要問寒問暖。中农是我們永久的同盟者，侵犯中农利益来滿足貧僱农要求，是挖肉补疮。中农是自家人。

爭取百分之九十的农村輿論，許多同志无此观念，地主富农沒有多少，不超过百分之八，高了要不得，要在同志中間确定此观念，机械一点好，才不致在战略上犯錯誤。超过了，打击面寬，危害革命基本利益。两个数目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八要确定。剝削者只有这样多，这是事实，不要怕"人家升官发財"，中农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貧僱农百分之七十，不要乱了我們陣綫。

对地主乱打乱杀，把一个好好的解放区搞乱。地主富农是个社会問題，弄得乞丐遍地，白骨如雪，还能領导中国。

城市是中小資产阶級問題，对中小資产阶級要有策略，在农村中是中农問題，在城市是中小資产阶級問題，两个問題弄好了，一定胜利。抗战时期是打大地主，中立中小地主，現在大中小地主当作阶級都要消灭，作为阶級消灭之，作为个人保存之。資产阶級也有分大中小，一定要爭取中等資产阶級及小資本家，打大資产阶級，对中小資产阶級要放在保护之列。

今天对大資产阶級要打，对中小資产阶級要保护，这与抗日时期对地主一样，对中等資产阶級右派，政治上要打击，但經济上仍然要爱护（这里所說的小資产阶級是小資本家，与平常所說的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之間的小資产阶級不同，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間的小資产阶級，是革命的进步力量，中农是劳动者）。

城市对中小資产阶級，农村对中农，搞好了能胜利，这是革命的战略問題，对地主富农要加以区别，这种区别是我們領导思想上的事，在农民看来都是剝削者，沒有区别，从消灭封建上說沒有区别，扫地出門与征收財产有区别，在平分时农民恨地主，少分一点給他可以，农民少分一点就不行。农民贊成少給地主分一点可以，因它有底財等于平分，原則是地主要分土地与財产，絕对平分办不到，原則上也不妥当。中农不同意平分，无論如何不强迫平分，不要因浮財就誤时間太多，彻底平分，不是絕对平均主义（毛主席对人数戶数很重視）。

（4）城市中对小資产阶級的冒險政策，必須避免，不要片面强調工人利益，搞起工商业对群众不利，无論公营、私营，共同生产与营业，計划，原料，成本，推銷，工資都要注意。

职工会专管工人利益，不管整个利益是不对的，职工会在解放区管工人利益，还要管整个解放区利益，因为工人阶級是領导阶級。

城市应强調公私两利，劳資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經济。

对学生知識分子不能有过“左”的冒险政策，过去以为有問題的，大都沒有問題，以后到大城市不要乱来，延安过去枪杀的四十个，以为有問題，現在太行，大都是好的。

民主同盟一类在国民党区，不能說沒有作用，这类团体对我們有很大作用与帮助，将来还准备帮助它。

双十宣言中，“其他爱国分子”即指开明士紳（其中也有毛病），何紹南那样的人，也要反对，那些人反对何紹南，曾起过作用，同我們共过患难的，現在不影响我們土地改革的，为何要一脚踢开。如此絕情寡恩，誰还給你共事？下层（村地富）可以不要，上层則留几个，有何不好？

三三制現在可以不提了，“二·一”指示还提了，因那时还感孤立，优势問題沒解决，現在不提，但也不宣传取消，消灭了封建势力，官僚資本，粮食很多，让一点給人家吃，他們会来成了。

（5）打与杀的問題，不可不杀，不可多杀，一个不杀不是“永远”，群众不贊成一个不杀，有些要追到天涯海角的，凡可以不杀的皆不杀，延安审干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有好处。

（6）对外国九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反刘航深指示中說，現在反对杜魯門，将来反对华来士这个作法不对，华来士反我联苏，代表一部分工人，代表大資产阶級不多，他不要战爭，美国不喜欢，看这点还要联合他。

領导权問題，領导权問題有两个条件：

第一，坚决率領被領导者向敌人作斗爭，並取得胜利。如在战爭中不能胜利，則他們是动搖的，領导地位就要丧失。

第二，必須給被領导者以經济利益，物資福利与政治教育，沒有这条不行，两者缺一不可，例如：領导中农，一方面領导貧僱农与封建势力作斗爭，但还要給他們物質福利，这样中农才会跟着我們走。打美蔣要打得坚决，打胜仗，同时还要給人家物資利益，一切有利于国民經济部門，予以发展，两条缺一不可，缺一条即无領导权。

对中小資产阶級要联合他們，在我們領导下，反蔣反美我們不坚决打不行，但必要时，还要給他們利益，假如不照顧他們而破坏他們的利益，他是不会来的。

領导权不公开講，坏处多于好处，易于模糊了群众与党員干部思想，要公开講，現在九国宣言已公开講了，今后我們也要公开講，不講思想上模糊不清。九国宣言講了工人阶級的領导权（如馮玉祥声明，不反对共产党，永远跟共产党走），你承認不承認工人阶級領导权，不承認要說服，批評，是有理說服。

武装斗爭是爭取領导权的条件，武装斗爭与爭取領导权是分不开的，美国調处时，我們曾不繳一支枪，但曾經相信三国、三党以为能解决問題，但实际解决不了問題。四六年六月以后的談判，只是教育群众的作用，並无解决問題之作用，那时我們确有拖几个月之誠意，退出几个地方，战略上有需要，但相信三国三党不对。

国际关系（美苏英关系）

三个命题，一般提法是破裂或者妥协。破裂意即：英美苏三国之三次大战；妥协意即：一切妥协。正确提法应該是这样。

（１）不是破裂与妥协的問題，而是早妥协与迟妥协的問題。这就是說最近期間无三次大战危险。三次大战是远景，三次大战危险充分存在，但不是馬上打，不要以为他們不想打，但战爭也充分可能使之沒有，因此是迟早妥协問題。

很多人意見，以为苏联与美国一定破裂，三次大战一定发生，美苏妥协一点希望也沒有。这种看法不对，是迟早妥协，美沒有战爭意思。（宣传战爭是吓人的），苏联也沒有战爭意思，所以打不起来，潘友新到美国談偿付一百三十亿美元借款問題时，美問潘，苏联是否要借十亿美元，潘答复，我們不主动借此十亿美元。潘又說現在的两国政府对立形势並不妨害两国合作。所以迟早妥协，战爭是这一远景，民主势力强大，可以克服战爭，迟早妥协，迟早妥协是民主力量强大的結果。

（２）（略）（３）（略）

国际关系补充（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毛主在政治小組发言）

（１）战爭危险的可能性（略）

（２）消灭战爭危险的可能性

……馬歇尔对我們是：把我們塞进政府去加以溶解，可是蔣介石害怕。对我們是一面大胆談判，一面死守不繳枪的原則，你打我也打，馬歇尔計穷无法欺騙，就让蔣介石打起来。

故各大国妥协，不等于其他国革命与反革命妥协，各国反动派之所以能上台，主要是因为工人无武装，統一战綫，未动員广大群众，訂立条約束縛了自己的手，不发动群众拿住枪独立自主的干，則又不一样，大国条約不能束縛自己手脚，苏联同中国战略任务相同，具体作法不同。

当时法意两国是有取得政权的革命条件的，我們不能作此結論。但可以这样看問題，注意人民起来革命，英美是否敢向法意人民开枪，戴高乐在欧洲住参政会，法国共产党跑去参加，就束縛住了，如法共不去参加，就可独立自主了，法国是繳了枪的（只秘密地存留了一部），繳枪是錯誤的，吃了亏，希腊未繳枪，曾占过雅典，城市占不住，就下乡打游击，至今还在干，錯誤正在于受雅尔塔或波茨坦的迷惑，一吓倒，二迷惑，对英美力量估計太大，白劳德即是如此。

历史証明，对反动派只有坚决斗爭，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斗爭一定能够胜利。一九二七年机会主义不敢斗爭，很大力量也垮了，以后收拾了很小力量，坚持斗爭，又斗了起来，于是又斗出了今天的局面，打了日本之后群众对美英蔣已經不怕，怕的是干部，希腊也如此。希腊有两个帝国主义干涉，但也斗了下去，斗出来了地方，所以只要依靠群众，依靠武装，亦能胜利，吓倒就是吃亏。

法共說，先打戴高乐，第二步打人民党，第三步打社会党，第四步再出来。法国以为有国会，主要靠国会方式和平斗爭。現在注意似有轉变，有革命形式或直接发展到革命，經过曲折到革命，法意罢工，訓練群众，检閱了力量，可以再来。

从希腊經驗来看，美英直接出兵作用不大，把两个紙老虎戳穿了，中国也要戳穿这个紙老虎。

因此，战爭危险有两个必然性。

（１）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爭不可避免，是一个必然性。

（２）人民必起革命，革命必胜利，又是一个必然性。

帝国主义要战爭，但革命势力强大，可以克服战爭的危险，又产生消灭战爭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要轓夫，佛朗哥、蔣介石、希腊、土耳其皆不行，故找德、日作轓夫，但德、日已打敗，也不会抬。希特勒若不先占領欧洲各国，东方若无日本作轓夫，他不敢攻苏。

要揭露战爭販子，战爭只是远景，为了吓人說得如此近。不能上当，是宣传战，两年前斯大林卽写丘吉尔是吓人，何以二年来並无战爭，是吓人的。再过一、二年战爭危险更少，就有可能消灭战爭危险，不战卽和，这二年是不战不和。不能設想总是不战不和，英美苏要和，长期並存是指英美，法意两个是革掉反动派的。

革命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对希腊、意大利、法国，有英美干涉，对中国有美国干涉。

干涉的形式，或出兵或如現在的干涉中国，希腊卽駐軍，派顧問，供給武器，但不参战。干涉方式是多种多样，卽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們不去挑战只应战，如美軍只駐青島，不去京沪駐兵，則我攻下京沪后，可以軟的办法取青島，如美軍駐兵京沪，則非直接冲突不可。

总之，帝国主义五痨七伤，不过如此，不可怕。

鉄托把帝国主义說得最凶（因美已想着南），日丹諾夫比較爱和，莫洛托夫則罵战爭，三种不同态度，表現很大策略意义。

在农业国家危机不要紧，在美国因其庞大危机来了不得了。

統一战綫要研究南斯拉夫經驗。

中間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致于解放区素无中間派。

中国还有广泛的統一战綫，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統一战綫。

以为“民族統一战綫一定要和許多党派並存，人民的統一战綫則包括的少数”是不对的。

南斯拉夫一千五百万人口，有二十四个党，民族統一战綫一概搞掉，法国則上了当，与各党派成立协定，自己束縛手脚。

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並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凡参加斗爭者皆团結，在农村中除地主富农外，要团結中农，爭取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統一战綫”。

我們历来未与各党派訂条約，只是与蔣介石有过条約，对現在不妨碍斗爭，且还有帮助的，为何不要。

民主立場他們自己表明过，非国非共，我們对民盟帮助过，民盟也超过对我們的好作用。現在蔣加以解散，一面是被迫解散，一面是自己屈服失掉威望。我們要批評它，但还要帮助它。

三三制以后不提，亦不声明作废。

中等資产阶級右翼要打掉，但幷非作阶級来消灭。

現在蔣很孤立，我們圈子很大。

联合政府已取消，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

过去講統一战綫，就是站在地主富农党員的立場去联合别人，而非站在工人农民党員立場去爭取革命士紳，原因是許多共产党員，本身是地主富农，×××又是四大家族，都是党員，他們去講統一战綫，是党內的地主富农与非党的地主富农的联合。

統一战綫应站在貧僱农立場，联合中农，抗日时期包括开明士紳，抗日时期对地主不是联合而是中立，同时消灭削弱其一部分。

对蔣也很难說是联合，而是孤立国民党，孤立頑固派，故有矛盾，又要国共合作，又到处破坏和孤立对方，蔣对我，我对蔣，都是互相孤立，互相破坏，消灭那消灭得了的，对整个国民党无可奈何，只好說是合作。而实际上我們在国民党区，所作的是对国民党打击政策，在可以消灭之处則消灭之。因为多年采取了消灭打击的政策，我們才有××，故所謂合作是：

①凡能消灭者，消灭之。

②凡不能消灭者，打击之，部分消灭，全部打击。

今后国民党沒有了，只有小集团。

大国妥协，迟早妥协，是个方向，以后研究。

有些問題能妥协，有些問題不能妥协，日德和約迟早要妥协。不战不和僵局有些时間，战爭是远景，美国出国商量要求妥协，潘友新說："两国形势对立，不妨碍两国談判"，苏不主动提出借款，可看出两国要妥协。馬歇尔說"不愿訂紙上协定，要看今后情形决定。"

陈問毛主席"是否欧美各国也有象中国一样恐惧美国对自己估計不足的情形？"毛主席說日丹諾夫已經分开講了，东北野战軍，也有怕原子弹，怕美国出兵的。粟裕的报告也說部队有些情形，地方党也有此种情緒。中国对此准备很早，整风时講过，七大时講过。因那时有人說反动势力强大，我們即講講此問題。

害怕美帝国主义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年年与美帝国主义斗爭，得到失敗，故精神有些害怕，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群众不怕英美了，干部还害怕，尤其是地主富农分子害怕。苏联哲学上的清算，文艺上的清算。文艺上搬外国搬死人，喜欢美国罐头，美国的紙烟，对伟大的現实主义看不起，这就是投降主义，是由于战爭受了創伤，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怕紙老虎。現在应在干部中解释清楚，我們在江南大发展时，美国人还会有几手凶的吓你一跳，要吓倒你，你要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了。吓不倒他就算了，炮打×基打×县等，还可能重演。有些人談帝国主义就好象談虎色变，一个是思想根源，一个是精神根源。我們历史上有失敗的經驗，苏联是新国家，也有此情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有长期的历史，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传統的怕帝国主义，有传統的力量，現在我們五百人直属队中，我們的窰洞中卽有此种人，害怕战爭，害怕帝国主义，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創造性。陈伯鈞对少将衔感到心得意滿，看不起紅軍的光荣，这是个精神問題，要从这方面解放出来。

周恩来同志說：陆××同志关于国际形势文件发出时，英共正开代表大会已閉幕，收到此文章后，特休会一天，举行会議，宣讀此文章，又根据此文章修改他們的决議案。

世界无产阶級消灭世界資产阶級，是件大事。

要搞东欧联邦就是"左"，胜利时卽易于"左"。（季、鉄均有此主张）

某种情况輕敌，某种情况不輕敌。

民主陣綫发展前途可以消灭战爭，部分接触可能有，印度尼西亚情况可能上当，因为共产党不占主要力量。越南保大投降法国，胡志明沒有軍火，主要陣地失掉，在乡村打游击，只有将来我們打到两广时，援助他們。

所有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精神还未从旧的传統中解放出来。

对美蔣主要是干部問題，要很好准备，要輕視美国，美国惟一驕傲是有錢，但也有限，究竟拿得出多少来，不是什么了不起，要有斗爭勇气，将来到江南时，不向美国挑衅，首先还是退避三舍，然后还是狠狠的打他一下，他就走了。

东欧联邦問題，眞理报說“是人为的，沒有群众基础。”毛主席說“大概是环境順利，有些胜利冲昏头脑，另一方面忽視現实。东欧联邦之提議沒有别的好处，只給搞西欧联盟者以借力，主要是沒有群众基础，共产党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如搞联邦，社会民主党不贊成怎么办？策略上有危險性，英美作借口，还是次要的，无群众基础是主要的。”

結論

开会时期思想动态，有这样思想情况，西北晉綏有些同志，坚持“左”，杀人，整三三制人物，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等等。主席說：“有人說安文欽創議是地主立場坚决，我就說取他地主立場坚决，不坚决就沒有了。人家是地主，为什么不代表地主立場”。有人主张把社会主义前途加进去。毛主席說“这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們还是消灭封建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

还有人說，三次大战一定爆发，打起来不得了。

有一种空气似乎說抗战八年都錯了，吸收知識分子錯了，減租減息，吳滿有运动錯了，要恢复到內战时期。事出有因，尙无实据，我嗅到了。

①很高兴的一次会，二十年来解决的优势問題，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洛川会議，六中全会都未解决这个問題。

以前只能講“有利于我”，現在可講“胜利到手”，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寇投降，一直形势严重，我們处于只有招架，沒有还手的地位。現在我們强大了。国民党处于劣势地位，革命高潮到来了，我們是在进攻了。現在的局势确已改观，胜利前途不但領导机关人感覚，群众感覚，非解放区党外人士感覚，外国人都感覚到了。很高兴的一个会議。虽然工作中是有严重缺点，困难也很多，但都可以解决，这是很成功的一次会議。

北伐时期，局势也很开展，但优势問題未解决，反而失敗了。土地革命时期战爭頻繁，党內糾紛太多，一直到长征是革命最大难关，幸而渡过。現在确是起了根本变化，今日形势对全世界都有意义。

这一时期的确是兢兢业业的，很担了一分心，特别日本投降后到重庆，那时蔣介石的事业好办，我們的事不好办，的确是兢兢业业領取得了現在形势。現在不同了，現在不是胆战心惊了。現在能作出結論，不是估計而是事实。过去总是估計“有利于我”，或者是說“可能”，現在事实确是如此，我們优势到胜利，蔣介石翻过来，无法打我們翻天印了，甚至在日本投降时，我們还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問題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蔣介石仍强大，严重的內战临在头上，成敗两个可能完全在斗爭。現在好了，可以肯定的講了，高兴了，前綫不断的胜利，土改整党走上正規（过去未解决，不知道路），

九月土改会議，即整党会議不是偶然的，現在确定了优势，二十年的艰苦奋斗，今天走完了，确立优势不是估計，而是事实。

②西北与晉綏两个中央局，政治上領导成熟，比过去更滿意，更有希望，告农民书有小毛病，应进行教育。义和鎮会議是滿意的，两区大体相同，但有区别，陕北是反右，晉西北是反"左"，不管"左"右不妨碍两区領导政治上成熟，即土改已开始解决了，路綫是正确的，西北已經完成一个任务，在內綫打破了胡匪，使其轉入防禦，把两区变成后方，支援前綫，解放大西北，問題更有基础，更有根据，使我們更有希望。

③会議解决什么問題？要解决这篇文章（指目前形势与我們的任务）这篇文章是当作一个时期的政治綱領，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綱領。比"新民主主义論""論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致于經济綱領打倒蔣介石以后，还要照此路綫执行一个时期。

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問題：

甲、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是肯定的。

乙，宣布蔣介石是官僚資本，要打垮他是肯定的（有的人贊成打倒蔣介石，不贊成打倒官僚資本，不懂得蔣介石是代表，官僚資本是基础）。

丙、推翻地主阶級不錯的，有人說地主是蔣根是小蔣，这样說法有毛病，我們要打倒蔣介石集团，蔣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不能象把打倒蔣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三千六百万地主，要講政策，推翻地主阶級是肯定了的，对三千六百万的人，不是都用此处理方法，是有策略的。

这三条不錯，其余就不会錯。中农問題早已解决，只是在处理問題出了毛病，注意糾正就是了。

中、小資产阶級，中小資本家現在还是不是同盟軍，是不是反蔣統一战綫，这个問題已經解决了，应肯定。

論文第四条，关于土改中中农問題，原則是老的，但对中农如此强調是非常必要的。

論文第五条，民族資产阶級問題也不是新的，但現在集中力量打击大資产阶級。官僚資本是个問題，故有作用。

土改会議后，反右問題解决了，現在解决了"左"的問題，此次会議不是重复，此次会議要注意的是：（1）中农，（2）中、小資产阶級，（3）党外人士。

中农問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这个問題早已解决。大家都知道不能侵犯中农，但是实际工作仍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現在是具体分析阶級的問題，太行山分析阶級的文件无大害，但有毛病不清楚，有些不恰当，可見馬列主义武器之少，晉西北原有一个分析阶級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自己烧掉了，也是馬列主义武器不多。

問題：是在三交冒出的是"左傾机会主义，在义合冒出的是右傾机会主义。九十九戶中弄出二十多戶地主富农，不要中农参加农民代表会，我看了惊心动魄。

肯定的說，只有两个朋友：中农与中、小資产阶級。

孙家沟也如此，他們强調不要中农，不是强調要中农。

中、小資产阶級問題这是比土地会議要新的：

（1）地主資本家的工商业非封建剝削的不要搞。

（2）勿使税收过高，劳动条件不要太高。

例如：过去陕北，晉津貼一个地主开的紙厂，現在不津貼了，李家渠的繁荣，是地主的繁荣，要搞垮，怪不怪？李家渠的繁荣是解放区的繁荣。林老对此問題不能解决你看怪不怪？基本問題是对中、小資产阶級发生动摇。土改就是要造成这种繁荣，在这上面要潮流，把沙推掉，切勿把中农，中、小資产阶級推掉，这种潮流任其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們要逆此潮流，且要反掉，把此潮流淹沒是不好的。

党的經驗痛是苦的，与資产阶級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資产阶級分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我要反，宁可反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保持光荣的孤立。

党外人士問題：

刘少白消息发表了，我簡直看不下，我不要看，我未解决。刘少白是党外人士，謝老說："两重性如何解决？刘少白有两重性，即代表恶霸地主，又要反蔣，他今天要进步，与我們一块七八年，有功，今天一脚踢开，这样下去一定会使我們孤立，遭受失敗。我們与国民党統战一次，不但得到經驗教訓，而且得到有生力量的教訓，就是国民党中一些人与我們熟了，这在打日本时期有用处，此次不要象土地革命时期，一切都不要了，把刘少白也不要了，把他的土地浮財分了都可以，为什么乱斗呢？你的政策是什么？

从地主阶級身上应当：（1）当作阶級消灭之，（2）当作个人如不反我們要收集。

可留者：

（一）过去合作而非反我的繼續合作，过去反我今后愿意合作的，也不抛弃。地主富农人口三千六百万，吃了魚肉，剩下魚骨头，还有用处，魚骨头有三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收集起来有用处。三千六百万是个大劳动力，不可輕易抛弃。

（二）当作阶級压在地下，但阶級組成的国家，是压迫别的阶級，領导者要知三千六百万还是財富，应当利用，地主阶級的人还有作用，現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五年），是候补无产阶級，現在要强迫改造，将来会改造好。

要分别对待，只要贊成土地法，高級人員（1）分而不斗，（2）斗而不打，个别犯法，依法处理，如此解决，人心安定，理直气壮。

过去非全面解决問題，抗战时"三三制"是成功的，其中吸收其成員个别的不恰当，当然也有地主阶級思想，应让步，統一战綫与之合作。

打人肉刑要废除，肉刑这个問題早已解决，我們在紅四軍九次大会已解决，以后又打，应坚决废除之。肉刑不能許可，原則性灵活性只一例外，即眞正出于群众义憤，坚决打时，我們不能制止。

財經問題：陕北、晉西北財經困难，災荒很大問題，要努力解决此問題，条件是退敌打出去，收复临汾。

宪法：中央起草的，勿急于发表，現在发表个綱領，胜利后再搞，如不恰当会被孤立，支票不应开早了。

是否成立中央政府，平綏路收复以后再考虑。瑞金搞中央政府不需要。頒布宪法，成立中央政府，不要忙。

× × × ×

第二部分——陈毅同志記述毛主席的一些談話。

（一）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議要結合起来看，一月决定迟迟未发表，要各地酝酿，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

毛主席反复考虑反"左"是不是会泼冷水。

去年土地会議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把石头一搬，增进了党与人民联系，把混入党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党員的地主富农思想洗掉了，把群众发动起来，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是保証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議。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談反"左"問題，才不会泼冷水，如孤立的反"左"，那就会泼冷水。

去年土地会議，整党会議，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达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講到这还不够，主流向支流时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三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傾向糾正，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反"左"不使右的傾向复辟，不使他們有詞可借，說你們搞"左"了，解决了右的問題再来糾正"左"，不致使右再来影响政策，"左"的糾正得好，更能保証右的不能复辟。

中农問題，为了滿足貧僱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是挖肉补疮的得不偿失。正确的是既照顧貧僱农又照顧中农，若照顧中农，不照顧富裕中农及滿有式的新富农仍不能稳定中农。要告訴貧僱农，一定要与中农、富裕中农、新式富农搞好。你們之前途就是新式富农。土地不能解决貧困，只能解决一部分問題，某村貧僱农眞正下不来台，无法生活，可說服中农給貧僱农調剂一下，但不能采取强迫的办法，維持与拥护土改主流，要对富裕中农、新富农加以照顧。"家徒四壁"的村庄，政府要設法救济，也不一定要搞新富农，富裕中农与中农。

对中小資产阶級，不要采取冒險政策。

工运問題未解决，二十年来工运方針有"左"傾传統，对蔣管区的工业，也不是一概破坏的方針，对官僚資本家的工厂，可以罢工反对，破坏他对中小資本家还是劳資两利的方針，以便渡过难关。

解放区应調整工人領导地位，除了工人福利外，还有更大的利益，还要照顧整个解放区的利益，要說服工人忍受剝削。

如我們占了西安对裕华紗厂、六元大精盐公司（战前二千万元以上的資本）要不要斗，只例外，若与四大家族关系太深，是战犯的，才能沒收。此外都不要搞，战犯也要看程度，还要打南京、北京，忙得很，那里有时間去搞他們。

对党外人士，有些十年、二十年共过患难的朋友，今天一脚踢开，覚得自己聰明，别人愚蠢。我們同志会打軍事仗，軍事仗大堡垒、小堡垒，內壕、鹿寨，許多外围，政治仗，不要外围，自己挺着打，蔣介石把外围搞光了，所以容易打，将来还要另开一席，只在土地問題上不讓步，任何人的地都要分（他們同样也分一份），严守此条，不要追求其他。

这三个問題处理上，又发生了打人杀人的現象靠打多杀多解决問題，表示共产党无本領，有本領的把他們放在群众监督下，不怕你反，三千六百万是个本錢（劳动力）不能一下

杀掉，不是同情地主，主要是群众不同意，你杀脫离中农、貧僱农、中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也危险了，工商兵还剩下多少。

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到了南京，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就是战犯，你捉不捉？还是不捉，可以胡适当个图书館館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們干什么？

乱杀人是表示无本領，无紀律。

破坏庙宇、名胜、古物不好，共产党要表示有紀律有政策，政策有策略，何为当务之急？誰都可以当家，一个人随便杀人，想必多个領导机关委員会？这个問題要統一处理，从容处理。搶救运动中群众对特务发生义憤，要杀要打是領导艺术問題，要杀也一定要經过法律手續，群众眞要打，也不一定与群众为敌，搶救中沒开杀戒。杀机已动，領导不能随声附和，众怨之下动摇，一个环子抓不紧，整个鍊子就松了。那时天天看材料，明明是特务杀不杀，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不杀，好的領导艺术就在这里。

（二）十二月文章发表后的新区情况

新区一开始即搞平分土地，群众不接受，因新区軍事未稳定，群众未覚悟，費很大力量，效果小。第一次分浮財，土地，我們一走，地主又起来杀工作人員，我們再去，群众不理。所以在新区机械的把土地塞給农民，农民不接爱。

老区平分土地不适宜，特别是新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土地多，平分必然侵犯中农，故引不起兴趣。在老区工作团超过支部直接去发动群众，把过去八年斗垮了的地主富农，以新僱农的面目出現，把他們組織起来，反对老干部。由于这些情况构成一种新观念，即一月会議所决定的要反三个浪花，决定土改要分地区，需分新区、半老区，采用不同步驟，土地要分别施用，不要普遍使用。

老区一般不要平分土地，老区一般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根据地，經过八年抗战，減租減息，反奸清算，五四指示，土地复查等等。土地問題已基本解决了，只是剩余的土地問題，基本上采取抽补、調剂的办法解决。这样地区对旧干部加以改造，主要是民主运动与生产运动問題，整党問題，撤換个别坏干部。这样地区中农占多数，貧僱农很少，地主已打垮，生产运动要照顧新富农，这种地区山东就有二十个县（共一百零八个县），晉西北四十五个县，这种地区只抽补土地，有些地主刚要改变成分（四二年起）是农民不是地主。特殊地方平分，一般地方抽补，以与群众联合的方式整党，发展經济，民主运动。

第二种地区，是日本投降大进軍时才落到我手者，經过四五年八月底到現在，二年半，五四指示不彻底，基本上使用九月会議的一套，超过支部，甚至解散一些支部，石头搬掉彻底平分，基本使用土地法，山东由七百多万人口增加到三千多万，地主富农占优势。党內不純，借党为恶。中貧农未得到土地，还未确立群众与党的优势。部分地方比較彻底者，也不机械平分。

第三种地区，是去年八月以来落入我手者，叫新区（前一种地区也叫半生熟区），例如隴海以南，豫皖苏，豫鄂陕等区，主要是軍事斗爭。地方无党，敌我斗爭軍事穿插拉鋸，土地革命条件仍未具备，不能立即实行土地法，应有步驟的进入土改，开始应集中力量打大地主，大官僚資产阶級，爭取中小地主，知識分子，保护中小資产阶級，利用地主富农左派打地主富农右派，中立中小地主，打大地主，吸收地主富农子弟好的入党，套在我們圈子里慢慢改造，以孤立蔣介石，地方組織起游击队，群众覚悟及顧虑少了，有秩序的进入土地平

分。

分别不同对象，以不同步驟来达到土改目的。

平分是战略任务，要以不同的方法达到。

老区与半老区准备三年完成，新区准备五年完成，全国准备十年完成，不要性急。

才到新区群众热烈欢迎，打土豪分浮財，人家就走了，不热烈了，这是硬土地法的結果。

減租減息政策很有不少作用，可以爭取地主富农左派打击右派，到大城市对地主富农分子好的可大量吸收。 ）

应使土改与反美反蔣結合起来。

有些人把內战时的一切东西都恢复，把抗战时学到的許多东西一下子去掉，眞奇怪。

几个問題：

（一）領导干部要破除迷信。

教条，宗派，迷信，馬列主义詞句，盲目性发展到高度固定化就成为迷信。

打胜了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是迷信武力可以解决問題。

狹隘經驗主义也是迷信，迷信其經驗可以解决問題，而不对当时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馬、恩、列、斯、毛”（指馬、恩、列、斯、毛論农民土地問題那本书說）也是迷信，以为合乎那几条就可以解决問題。

要破除迷信，要对具体事物加以詳尽分析，馬列主义就是具体問題具体分析，自覚增加了，就能主动的解决問題。我們同志多少有点迷信，抽象条文及历史陈旧毛病，打人杀人如此多，就是迷信打人杀人可以解决問題。

（二）党內有小集团主义，本位主义，宗派傾向，領导同志的态度問題，思想意識問題，主张偏見（各同志各单位之間还不是很原則的）問題等等。

要告訴同志們，你們要批評一个人，坚持一个原則，只有这种权利，不要放松，要有政治上的勇气，反对你所認为不妥当的，但同时采取合法手續，贊助你，拥护你与你合作，首先有此态度，有此基础又提出严厉批評。先取得批評資格，然后批評方才不致引起对立，上級对下級也是如此。是贊成的鼓励的，足够估計成績，然后取得批評的自由与地位，否則无此資格，还会引起反抗，有些不是造成对立，就是不批評不講，但不批評就不能进步，先要拥护，先贊成，先講成績然后再批評，这样就一定能达到团結，許多人发言就是放人家的炮。

光摸别人的老虎屁股，怕别人摸自己的老虎屁股，不能唯唯喏喏，要反潮流，任何时候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紧要关头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但要注意合法手續。

（三）对人的看法，有时說此人有缺点，或此人有好处都不对，应看到其好处，也要看到其缺点，少說此人有好处但有缺点，或此人有缺点但有好处。张国燾是个大坏蛋，但他有点好处，即不性急，这样看法丟掉他，还获得某种价值。

（四）党內一种人尺度太寬，一种太狹，量的不合就不要，拉胡琴弦子太紧，調子太高，弦子要断的，过分严紧，使人无所措手脚。应当是“德小逾閒，小德出入可以也。”

有种人灵活但不严肃，不銳敏，好处是寬，坏处是在逆流时懦弱。应当尖銳，敢于反对逆流。孔子說“吾党之小小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要有进取心，狂者大胆，尺

度寬，放得开手，但圈子不紧，猖者讜小慎微，两者应中和起来。

（五）一定要定期作报告，执行两月报告制度，要亲自写，要求反映实际，提出問題，解决問題，将要所解决的問題，打电报同中央商量。过去情况：一种是不作报告，把总公司給忘掉了，一种是报告零碎，看后令人茫然；一种是講好的多，不講缺点，只报喜不报忧，看了仍然茫然，講好的多放心，忽然出現了一个乱子，則手足无措。报告可帮中央解决問題，又取得中央的帮助。

在中央对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政策的指示（註）上的批語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土地改革在这些地区要二至三年内彻底完成，而不应該操之过急，致发生許多不应有的毛病，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細致的工作，必須依据群众的覚悟程度組織程度，領导骨干的多少强弱决定土改与整党工作的速度，每一个乡村土地問題的解决，必須取得絕大多数的同意，不能由少数人强制决定，致犯命令主义的錯誤，同时，对群众中产生的不正确的意見，必須耐心說服，实現党的領导作用，不犯尾巴主义的錯誤。

（註）关于这个指示，請参閱《毛选》四卷《在晉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一文，正文第一部分及註释〔1〕

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

用民主討論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討論如何攻克陣敌，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連队支部、班排小組，反复討論如何攻克敌陣，收效极大。陝北攻克蟠龙敌整一师一六七旅陣地的經驗，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訊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連队訊为可打，不肯撤。連队战士分組討論，找出了办法継續打，結果获得胜利。陝北将此种情形叫做軍事民主，而将訴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經济民主，这些軍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山西嵐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的按語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山西嵐县的一篇通訊。在这个通訊中說明了那里的群众斗爭已經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議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級成分，曾經划錯了許多人，但是已經公开地明确地經过群众代表的討論，决定改正，对于不給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錯誤等項錯誤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訊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議上所表現的路綫，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訊时，嵐县还沒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經驗还不完全。我們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級中的錯誤（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組織生产，改造政权等項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綜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訊。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

工作，我們有了晉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經驗。关于如何在老区調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經平分了）的工作，我們有了陝甘宁綏德县黃家川的典型經驗。現今又有了晉綏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經驗（虽不完全）。这个經驗，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給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經驗的小册子，比我們的領导机关发出的决議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經驗的同志得到下手的办法，能够有力的击破在党內严重地存在着的无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領导同志們，在对自己領导的各項重要工作发出决議和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經过选择的典型的經驗，使自己領导的群众运动按着正确的路綫向前发展。現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領导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斗爭的方向，規定斗爭的任务，而且必須总結具体的經驗，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經驗，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錯誤的不致重犯。

对《关于新区工作問題的檢討》的批示

（一九四八年四月）

××同志的这种負責的自我檢討是很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檢討，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沒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領导干部的自滿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視无睹（不細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該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略指导和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我們要求各地負責同志每两月做一次綜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規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結果，及根据这种結果而做出的自我檢討（这些就是各地負責同志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中央作报告。

对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

請同志們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灭現在存在于我們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紀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整风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問題的决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完全同意由保、罗、匈、波、苏、德、捷、意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議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問題所通过的决議。举行这个会議并通过这个决

議，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保卫世界工人阶級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应尽的职責，乃是他們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保卫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所应尽的职責。

（二）以鉄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維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領导集团，在其对內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动中，违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的原則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級斗爭和无产阶級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領导作用，党是阶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資产阶級民族主义和資产阶級政党的泥坑。鉄托集团因为它执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內外政策，因为它采取反苏立場，压制党內批評，拒絕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兄弟批評，拒絕参加情报局会議，并在情报局会議的决議公布以后，継續压制南斯拉夫党內外的正确意見，継續敌視国际共产主义，已經严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业，并使南斯拉夫的敌人欢呼。中国共产党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共产党內的国际主义分子能够坚决地起来糾正鉄托集团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走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軌道，走上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軌道。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認为：南斯拉夫党內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这是阶級斗爭在无产阶級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級存在的国家，带着資产阶級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級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內部来破坏革命事业。这种情况曾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內則曾經表現为陈独秀主义和张国燾主义。这种情况，要求共产党人努力提高覚悟，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时地識别和反对这些資产阶級分子，保卫无产阶級和人民事业不受破坏和損失，保卫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洁。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决××××××××××××××××××都应当認眞研究共产党情报局会議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問題的决議，借以加强党內关于阶級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致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复电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贊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議，討論并实現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項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現，极为欽佩。現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极宜加强团結，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統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項会議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議者的范围以及会議应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并以卓見見示，曷胜感荷。謹电奉复，即祈諒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主席　毛泽东

（原載《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

电复海外侨团答复对中共五一时局主張的响应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

陈嘉庚先生并請轉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公鑒：

五月四日新加坡侨团来电南洋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关怀祖国，贊成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見，无以感佩。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議的各項具体意見，尙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毛泽东

（原載《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电勉吳化文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貴軍長等率部起义，发表通电，决心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极为欣慰。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場上，对于任何国民党軍队的官兵們，不問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們能够在人民解放战爭的紧要关头，幡然覚悟，脫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領导，加入人民解放軍陣营，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貴軍長等此次义举，符合人民的希望，深堪庆賀。尙望团結全軍，力求进步，改善官兵关系，軍民关系，为革命战爭在全国的胜利奋斗。

（原載《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豫西我軍解放南阳

（新华社郑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电）在人民解放軍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軍当即占領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綉曾于此城发生爭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爭，創立了后汉王朝。民間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匪首蔣介石极重視南阳，曾于此設立所謂綏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軍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匪崇禧使用黃維兵团三个軍的力量，經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間的运輸道路，始終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蔣匪因全局敗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綫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現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內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尙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綫人民解放軍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軍以来，一年多时間內，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規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績，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鄂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創立了七个軍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軍区老根据地。除江淮軍区属于苏北軍区管轄外，其余各軍区，統属于中原軍区管轄。豫皖苏

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沒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軍并已和华北联成二片成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軍和地方軍一年多激烈战爭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約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經常說："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們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間內，我們在这一区域曾經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政策上左的錯誤。但是随卽糾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經驗，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負担的財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經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軍和地方軍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內的敌人，如象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竄。南阳守敌王凌云統率的軍队是第二軍，第六十四軍以及一些民团，現向襄阳逃竄。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謂"綏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調来的宋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付总司令兼前綫指揮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則剛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慘敗，又逃到了葫芦島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沒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复民主人士电賀※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二月一日来电讀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爭，百余年来，前仆后継。无数先烈的鮮血，洒遍了錦繡山河，亿兆后代的人民，表現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爭之所以胜利，是由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結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軍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負之数，因以判明。但残敌留存，詭謀时作，求喘息謂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談判，口誦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爭获得最后胜利，必須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眞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均儒、馬叙伦、郭沫若等于二月一日致电毛主席，庆祝人民解放战爭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共产党和解放軍握有实現和平全面力量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电）国民党反动派崩溃的速度，比人們預料的要快。現在距离解放軍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經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的总崩溃开始于南綫的淮海战役和北綫的平津战役期間，这两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三个月中丧失約一百零五万人，包括国民党正規軍一百零五个整师。国民党的总崩溃根本上是中国人民解放战爭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

利的必然結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阴謀，对于縮短国民党崩潰的过程，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要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現在是打在他們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說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在傅作义将軍的协助下和平地解决了北平問題外，其余蔣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张群、张治中以及名义上还属于国民党統治下的各省各城的大小头目，現在各搞一方，挂着各人的招牌，打着各人的主意。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們不爭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給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經泄露这个秘密，他在蔣介石发出所謂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記者說这是“我过去一直亲自努力以来的东西”，据合众社称該記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話而丢了飯碗。蔣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宣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項指示中說得很明显：“我如不能战，既示不能和。我如能战，則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論我能战与否，言和諸有百害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經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揮下的湖北省参議会向蔣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問題，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談的声明。蔣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和长沙去要求白崇禧和程潛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內政。但是这些步驟全都失敗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阴謀，使蔣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經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幕比較可看的双簧，但是結果与他們的預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連台上的演員也繼續失了踪迹。蔣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繼續指揮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这个私生子“政府”，一面脫离了它的“总統”（代总統），另一面也脫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伪立法委員总額七百五十人，現在上海者二百余人，在台湾者一百二十余人，在广州者至十一日止报到者仅五十七人，而按伪立院的組織法，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才能开会。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員会，虽已在广州宣布开会，但在广州的該党中常委現在只有十一人，尚不足其总額五十余人的四分之一。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爭，但是进行战爭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們只知道他的发言人是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将只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現在下过的命令，几乎沒有一項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經沒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无論在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武汉，在长沙，在西北，在西南，到处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謂全面和平，其实际意义就是取消和平。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組織而要求所謂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爭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滑稽的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李宗仁于上月二十二日关于以中共的八項和平条件为談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則“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沒有說出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談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問題的，但是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問題，这就未免叫人太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聞記者問邓文仪：李代总統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

項意見？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場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項意見，事前并未曾經李代总統过目。”邓文仪这里不但創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場以区别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場，而且事实上还創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場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場，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造謠污蔑北平的局部和平，而伪国防部則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贊北平的局部和平，是“为了縮短战爭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綏远等处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見，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場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他的代总統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現和平的最大障碍。他們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爭，即所謂“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們既沒有什么力量实現全面和平，也沒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爭。全面的力量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慘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結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視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国民党死硬派完全孤立，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現了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电）自从一月一日蔣介石发动政治攻势以后，曾經連篇累續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縮短战爭时間”、“减輕人民痛苦”，“以挽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們，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調子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調，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南京人民代表团訪問北平回去之后，立即遭到这些英雄好汉們的迫害。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給“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說：“叶劍英利用南京和平代表团作传声筒，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誠意，而指責政府軍事布置为无誠意謀和。各报对此，必須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側面力加駁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連列举了好几点。“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負破坏和平之責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战犯名单，为政府負責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見。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則和平商談之途径，势难寻覓。”“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談判的神情，再也不見了”。所謂“縮短战爭时間”，“减輕人民痛苦”，“以挽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間，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爭罪犯，那就不能談和平了。究竟是以挽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挽救战爭罪犯为前提呢？按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爭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見中，听說已經收到了很多方面的意見。根据这些已經收到的意見，都是不贊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們認为那个名单所列四十三个战犯个个都对，但是可惜太少。他們認为要負发动反革命战爭屠杀数百万人民責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么要問我們的英雄好汉們：你們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們不是愿意“縮短战爭时間，减輕人民痛苦”嗎？假如因为你們这一反对，使得战爭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間，延长战禍？“拖延时間，延长战禍”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們一

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們想收回去，写上招貼，挂在你們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嗎？你們是“以挽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們，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挽救战犯为前提前呢？根据你們政府內部的統計，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万万五千万，而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們是学过算术的，請你們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算一下再作結論罢。倘若你們不去算清楚，就将你們原来那个很好，我們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挽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挽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們可要仔細，你們一定站不住脚。口口声声“以挽救人民为前提”的人們，又要迫害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說他們变成了叶剑英的传声筒。叶剑英的魔力这么大，几天工夫就使代表相信“中共对和平有誠意，而指責政府軍事布置为无誠意謀和”？二月十四日，死硬派××（上两字电碼不明，可能为授意或指使）京市参議会通过否認京市人民和平代表团一案。国民党CC、复兴两系中的一部分死硬派，亦即战犯集团，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爭了，就連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也要被迫害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例番的，不管什么人，就是他們党內稍有良心的人們也罢，只要誰不愿意跟他們一路走，就及遭迫害，挨打击，因而把他們孤立在宝塔的尖頂上，而以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識分子，自由資产阶級，开明紳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听着：站在你們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沒有几天活命的时間了，我們和你們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現了。

蔣介石李宗仁优劣論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电）桂系首領战爭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論行动，究竟是否和蔣介石、顧祝同輩有区别的問題，引起了人們談論的兴趣。

人們說，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蔣介石談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談和平，两个人都談和平，这是沒有区别的。蔣介石沒有下过如象言論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項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都沒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的更厉害了。南京方面連和平促进会也封閉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則活象顧祝同。顧祝同命令刘峙炸毀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鉄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軫准备炸毀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鉄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半之經驗，黃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軍队的野蛮，較之蔣系軍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們罵蔣介石为美帝主义的走狗，蔣介石听慣了，从来不申辯。人們罵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沒有听得慣，急急忙忙起来申辯。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經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說：“貴方广播屢謂，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結之陰謀，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見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蔣介石政府求洗刷，人們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蔣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蔣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則有些象笑面虎了。

蔣介石撒起慌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話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給人抓住小辮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面說：“現政府方面，已从言論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施实。“事实俱在，何得謂虛？”人們說：“事实毫无，何得謂实？”李宗仁說：“事实俱在，何得謂虛？”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蔣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爭罪犯这个問題上，蔣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說可以惩办的話。他們或者不說話，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驊、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論，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問題来討論。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說和談条件必須“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贊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說：“中共方面所提八項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談。”这即是說，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談中共方面所提的惩办战爭罪犯一項条件以及其他七項条件，他首先給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調变了，而且变得很励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統，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說：“貴方所提八項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談，各項問題均可在談判中商討决定。在双方商談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須先执行某項条件，則何得为之为和談？以往恩怨是非尚加十分重視，則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哎嗚喲，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談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須先执行某項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其兵敗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談判。中共說，好，待我們准备好了你們即来談。战犯們說，不行，非立刻开談不可。中共說，你們閑得发慌，給你們一件工作作罢，你們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又将逮捕改为监視，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們才安靜下来，不再吵鬧了。这是后話，不提。且說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又說，恩怨是非不要过分重視，即是說不要分清战爭責任，不要惩办战爭罪犯。那怕黃河以南直至长江，黃河以北至松花江，发生了“慘絕人寰的浩劫”（謹按，此語見之于李代总統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文告），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你們一定要惩办战犯，則战犯們的拥护者会要报复的。这种报复，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即全国同胞中沒有一个能吃东西了，都死完了。如此，你毛泽东和我李宗仁两个，将要被我們民族（謹按，既然都死完了，为什么还有民族，待考）判决为一千年那么长久时期內的犯罪者。还好，只有一千年受罪，一千零一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算是李代总統的恩典。

人們請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贊成商談惩办战爭犯，又不贊成实行惩办战爭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蔣介石不同的地方。

对李宗仁电报写的接語

（一九四九年三月）

李宗仁此电报尚有許多阿Q語調，对于自己吹擂頗饒兴趣，所謂“国共合作”毫无界

限，尤使人民心头感到有些作噎，但是在根本說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誠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轉摘自（中国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給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邓××鑑长幷轉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們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軍虽然炸毀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們的起义的光輝，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軍人員和国民党陆軍空軍人員的爱国分子的憤恨，使他們更加明瞭你們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軍事人員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們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經日暮途穷。他們可以炸毀一艘重庆号，但是他們不能阻止更多的軍艦将要随着你們而来，更多的軍艦、飞机和陆軍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軍方面。中国人民必須建設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軍，还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将就参加中国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祝你們努力！

（《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給傅作义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将軍：

四月一日通电讀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災难，这个政府必須負責。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文武官員，只要他們訊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眞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現，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問題者，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欢迎。北平問題的和平解决，貴将軍与有劳績。貴将軍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設事业，我們訊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傅作义曾在四月一日发表通电，声明愿在毛主席領导下建設新中国。

关于具体实現八項原則电复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勛鑒：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見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条件为談判基础，則根据此八項原則以求具体实現，自不难得正确之解决。战犯問題，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解决国内問題为标准，在

此标准下，我們准备采取寬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談时，即会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結束战爭，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內开始生产建設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的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貴我双方极宜早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內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項伟大目标而奋斗。

（原載《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我三十万大軍渡过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綫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万大軍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蕪湖、安庆之間。国民党反动派經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綫，遇着人民解放軍好似摧腐拉朽，軍无斗志，紛紛潰退。长江风平浪靜，我軍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敌陣，占領南岸广大地区，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阳、狄港、魯港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勇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我百万大軍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綫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軍百万大軍，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綫上，冲破敌陣，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軍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軍中路軍首先突破安庆、蕪湖綫，渡至繁昌、銅陵、青阳、狄港、魯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內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軍开始渡江，地点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該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軍已渡过三分之一，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現已占領貴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綫的广大南岸陣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軍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軍当面之敌亦紛紛潰退，毫无斗志，我軍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战，銳不可挡；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絕签訂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見南京拒絕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湯恩伯二十一日到蕪湖督战，不起絲毫作用。湯恩伯認为南京江阴段防綫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綫。不料正是湯恩伯到蕪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綫又被我軍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軍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預定計划，都已实現。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軍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軍抵抗較为頑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潰一切抵抗之敌，占領揚中、鎮江、江阴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鎖长江。我軍前鋒，业已切断鎮江无錫段鉄路綫。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毛主席在講話中庆祝各界代表会議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議，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

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議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說，大約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們加紧准备。

毛主席号召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結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設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电复檳榔屿侨胞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貴会厌恶內战，呼吁和平，所提各項主张，均切中利弊，堪称卓識。謀独立民主和平，为弊党战后建国之基本方針，而解决当前危机局面，則应停止內战，重开政治协商，一切爭端均以政治方式解决；而好战分子不此之图，致內战継續扩大，时局日趋严重。弊党将与海外侨胞与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挽此时局，并本和平民主方針奋斗到底。

（原載晉冀魯豫《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第一版）

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难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

我們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軍的二十二年的斗爭史給了我們这样一种經驗和信心，只須共产党、人民解放軍和全国人民明瞭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質，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項根本政策，我們就能达到目的。

注：这是为新华社論《我們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所写的一段。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議上的开幕詞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諸位代表先生們、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議現在开幕了。

我們的会議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軍，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們的会議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結的会議。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結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們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間內，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軍，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軍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轉入反攻和进攻。現在，数百万人民解放軍的野战軍已經打倒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經获得了解放，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議。

我們的会議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議，是因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議。那次会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們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議証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蔣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們一道，

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議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們就要撕毀一切决議，并以残酷的战爭反对人民，那次会議的唯一收获是給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蔣介石国民党及其幫凶們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間內，很快的覚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組織起来，形成了全国規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統一战綫，援助了人民解放战爭，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議。

現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質，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在自己的議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組織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共同綱領，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委員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个共同的感覚，这就是我們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来，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爭反对內外压迫者，从来沒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領导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这样做了。我們团結起来，以人民解放战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压迫者，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将从此进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来了。我們的革命已經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們的革命工作还未完結，人民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們还要継續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內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們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搗乱，他們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們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內外敌人的复辟陰謀的有力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們必須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結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內外敌人复辟陰謀的斗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結国际友人，我們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結国际友人，将使我們的建設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規模的經济建設工作业已摆在我們面前。我們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我的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們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經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經驗。如果我們的

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內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設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們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們团結一致，只要我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結国际友人，我們就能在經济战綫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經济建設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現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国人被訊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我們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我們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許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們的国土。在英勇的經过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础上，我們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須保存和发展起来。我們将不但有一强大的陆軍，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軍和一个强大的海軍。

让那些內外反动派在我們面前发抖罢，让他們去說我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庆賀人民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賀中华人民共和的成立！

庆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成功！

（原載《新华月报》創刊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补　遺

讀《倫理学原理》笔記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質，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依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滌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变化也。

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閱讀《伦理学原理》一书时的批語。

怎样看待别人

（抄自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

世界上的两种人，一种是部分材，一种是組織材，前者多而后者少。但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們就应該鼓励、发展、运用他們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少的、有限的，我們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

〔註：此話是主席对同学的談話。主席以后（領导革命时期）也說过：无論跛子、哑子聾子、瞎子对革命都有用处。对組織部工人談話說：对一个同志首先要看他的相同处——他革命，他信仰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看他的不同处，有缺点、思想意識上有毛病……〕

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規約

（一九二六年十月）

同志們：我們为什么要进来这里？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的責任是什么？我們进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和他們进普遍的中学大学一样，我們的責任自然也和他們并不一致，因此我們进所之后一切的生活自然和他們不能相同。

同志們，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的責任是什么呢？我們不是受殖民地的被压迫的三亿二千万的貧苦农民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嗎？我們現在的唯一出路不是要喚起这广大的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向我們的敌人帝国主义、軍閥貪官官污吏土豪劣紳、起来反抗嗎？我們除了革命，除了和我們的敌人拚命，还有什么是我們的出路？所以我們进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論和行动。我們的責任是喚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領导他們起来，打倒我們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我們的敌人的状况，他們几年来占据了社会上优越的地位，这便是說，他們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統治阶級、压迫阶級，他們的基础十分稳固，他們有他們的組織，他們有优越的經济能力，有凶狠的武装（軍士警察）、有維护特殊阶級利益的法律，习

慣和一切封建制度，做他的护符，所以他們是很不易的。这两年来，在广东、在湖南、在湖北、在北方各省，农村发生了莫大的冲突、莫大的流血，結果我們的农民群众、虽得許多进步，然而我們的牺牲也眞不小，这都是足以証明我們的强敌，是很不容易打倒的、并且在我們自己的战綫上，同时出現了許多毛病，許多足以减弱我們斗爭能力的毛病。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頗散漫的，几千年来，老生活把他們弄成不問政治，只管眞命天子出世救人的依賴思想，他們对于地方观念，家族姓氏的观念很深，一切封建社会的坏毛病都应封建地主阶級的需要，而澎湃发展，便之籠罩在农民身上，現在要农民起来，反对他們根深蒂固的强敌，眞是談何容易？便是我們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封建社会里出来的人，也何曾能够免除了封建制度的影响？我們現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級的急先鋒，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在我們的身上，已經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不少毒菌，这些毒菌随地都有阻障我們前进的可能。

同志們！我們从旧社会带来的毒物是什么？我們不是过慣了个人主义的浪漫生活么？我們不是不大喜欢受团体的干涉么？我們不是不喜欢有秩序有規律的生活么？我們的队伍中有許多人不免可借自由平等的名詞来掩护他們的一切罪过，这些人喜欢崇拜英雄主义，喜欢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人的一切行动，一切的批評，常常从他自己个人做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关系，随时在他的后头做他的指揮者，他的眼睛每每只看到人和人的关系，看不見群众和客观的現实，这样的最容易变成一个唯心論者，目（口）中常常发出許多良心活，道德話。

同志們！我們許多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級出来的，所以一切小有产阶級的毛病都容易丛集在我們的身上。上述那些毛病，我們不是时常犯着么？这些毛病，最能損害我們的革命工作。我們虽然是一个具有热烈革命性的青年，仍多少免不了这些毛病在身上作怪，現在許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慣产生出来的。我們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敗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存在的原因。

同志們！我們的敌人是这样凶狠頑强，我們的責任是这般重大，我們非把我們从旧社会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我們更难免要做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傾的危險。

同志們！我們跑来这里，从消极方面，要把我們这些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扫除，从积极方面，我們要学习革命的理論和实际，这样我們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的工具，才能达到我們的目的，完成我們的責任。同志們：我們为着便利我們在所內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把我們訓練成一个好的的革命工具，我們应該照下面規定的各条去努力，这些規定我們不要看作一种普通的学校規則，乃是使我們达到变成一个好的革命的党員的一种必需的方法，这些条文我們大家都經过一番討論发表过意見，都認为是我們必須的东西，經过最后的决定頒布，已成为本所的紀律，我們一定更要一致，因为这是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紀律。这种紀律是自覚的紀律，是达到我們学习革命的理論和实际，造成好的革命党員之唯一方法。

《农民問題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农民問題乃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农民不起来参加幷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动运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問題不会解决；农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卽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經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級（地主阶級）。經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及其統治阶級，对于其他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現其压迫与榨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級給他們以死力拥护，否則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經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級，乃其国內統治阶級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軍閥只是这里乡村封建阶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級，岂非不知輕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那一个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比較欵迹的县分，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經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分。換句話說，卽是那一个陈炯明势力削減的县分，必是农民起来的县分。我們无庸諱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說幷沒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現在是在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內；往后須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漸的起来，才可以确实証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漸的削減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集中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戶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額外括錢，全县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几乎絕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鎮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鎮压住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沒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須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須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謂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卽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視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卽是同情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实际上卽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級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級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幷論。这話說猖獗对，說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級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級之領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阶級（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选出来的首領，这班封建地主首領卽封建軍閥利用城市买办阶級以拉攏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軍閥做主体，而买办阶級为其从属。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从地主阶級馴制下之农民身上挖得来的，买办阶級如銀行工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总覚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該起来猛击买办阶級，幷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級的領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地主阶級之特权，則軍閥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于組織工人組織学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組織农民的浩大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問題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間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寒冷的风雪，攙着农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从他們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們組織起来；引导他們向土豪劣紳斗爭；引导他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綫；引导他們参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国民革命运动。我們預計：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計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組織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粤贛，北方的直魯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殊重要的省分，应該下大力从事組織。有了这几个重要省分的农民起来，其余省分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須到这时候，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說到研究农民問題，便感覚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貧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分从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調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講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們分别組織的各該省农民問題研究会內提出討論，又經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們以前多沒有农民状况的詳細的調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連大略都沒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覚得可貴。我們应該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內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詳細的具体的全国的調查来。关于农业生产問題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二十六种）关于此問題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因为出版仓卒收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編印。农民問題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問題：即帝国主义軍閥地主阶級等人为的压迫与水旱天災病虫害技术掘劣生产減縮等天然的压迫問題。前一問題固然是目前的紧急問題，同志們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問題也是非常之严重，我們不能不积极的注意。要解决后一个問題，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們应得預先准备。这部书內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华部分，他給了我們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許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請过細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們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質，使我們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爭經济斗爭这两者汇合一起的一种阶級斗爭的运动。內中表現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斗爭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質頗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資产阶級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則一起便碰着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搾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軍閥政权的眞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搾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現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們五年来从各地的农民运动經过看来，我們讀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决議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記，不由得不有些感覚。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經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沒有人詳細的翻过来。本书內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較的詳細，我們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較一番。

（根据江西省博物館复制品排印）

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开学宣言

（一九二六年十月）

同志們、同胞們！

我們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繼續二次北伐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簡直等于两次北伐誓师。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鏟除国內封建政治势力，所謂封建政治势力，卽軍閥及地主阶級土豪劣紳，我們晓得軍閥及土豪劣紳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帝国主义有了这两只手，就可尽量地銷售洋貨，賤价收买原料，从而剝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斗爭力量，則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換言之，不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不能鏟除。所以，农民問題，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成了大家不能忽視的革命問題，农民問題之重大，到現在是沒有哪一个有勇气敢来否訊。誰反对农民运动，誰就是反革命。要肅清党內与帝国主义軍閥妥协的破坏农工政策的右傾分子。为了解决农民問題，要繼續两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

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的使命，是要訓練一般能領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运动有深切的訊識，詳細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鍛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間，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可以說是国民革命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說是我們的誓师，我們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沒有第二条路走，可是这种重大的运动，一切革命群众都要負起責任，都与之有关系。我們在这奋斗的途中，謹盼望各革命的民众，予以誠恳的指导。我們应該呼：

扩大农村革命！鏟除封建势力！繼續北伐工作！消灭奉系軍閥！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反抗一切破坏农工政策的一切反革命派！

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翻印者說明：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爭胜利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急需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領导。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講习所因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結束。学員派回原籍，領导农民运动，掀起了一个农村斗爭新高潮。十月，北伐軍占領武汉，革命中心已由广州移至武汉，这时毛主席又到武汉筹办了这所《中央农民运动講习所》，繼續培养革命干部。）

土　地　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在井岡山）

（一）沒收一切土地归苏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維埃政府組織模范农場耕

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迁特别情形，或苏維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經苏維埃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外，其余的人均須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嬰的設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計算分田，比較簡单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黃×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迁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維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經苏維埃許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乡苏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下，須得区苏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县苏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概由县苏維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錢，由高級苏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迁特别情形，經高級苏維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迁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級苏維埃政府核准，免納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維埃政府征收，交高級苏維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紅軍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維埃政府僱人代替耕种。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崗山（湘贛边区苏区）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爭經驗的总結，在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則錯誤，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張者不少，所以这样規定，

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僱人替紅軍人員耕田，后来改为动員农民替他們耕了。

土　地　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

（一）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級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議政府所有，分給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級的土地，經工农兵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嬰的設备未完毕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致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計算分田，比較簡单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迂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維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經苏維埃政府所許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乡苏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下須区苏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县苏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概由县苏維埃政府出卖，所得文錢由高級苏維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迂特别情形，經高級苏維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迂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級苏維埃政府核准，免納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維埃政府征收，交高級苏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果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紅軍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維埃政府僱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紅軍从井崗山到贛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沒收土地”改为“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級土地”，这是一个原則的改正。但其余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有之以見我們对于土地斗爭認識之发展。

告商人及知識分子

（一九二九年）

做生意的同胞們，讀书的同胞們：

（一）共产党所領导的紅軍到你們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們呢？你們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二）共产党在現时領导的革命，叫做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动的东西。第一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級，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給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現时領导奋斗的三个大任务。（三）提出这三种任务，你們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該十分欢迎。做到这三件事，是工人阶級的盼望，也是与你們大有益的。你們明白你們的地位嗎？你們是半殖民地的小資产阶級。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貨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們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們的益处极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級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們手里，出租出税，农民貧困到十分，乡下无錢到城市买貨，城市工商，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級，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的买貨的力量大大增加。你們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达嗎？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級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去了走狗，地主阶級失去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級的革命）就笑有成功的希望了，你們不覚得于你們有益处嗎？（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貿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农人的量筹款供給軍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軍閥的走狗，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員、工賊、农賊、学賊）的財物要沒收。乡村收租放税，为富不仁的大地主搬到城市住家的，他們的財物也要沒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产阶級的財物，服从工人阶級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級、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示服从心怀敌意。須知共产党領导的民权革命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五）知識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識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級均可吸收他們，依照他們才干的大小分配他們相当的工作。紅軍政治部正需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員，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学生們，教职工們均可加入紅軍来作政治工作。（六）蔣桂战爭已在两湖爆炸，全国新軍閥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騙民众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放屁，全国統一完全是臭話。美国走狗的蔣派，馮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秦派，白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政治及各派新軍閥之倒自溃敗就在眼前，工农阶級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現于中国。商人們，学生們，一切被压迫的小資产阶級，速起来幫助工农阶級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爭啊！

商人們起来帮助工农阶級！

学生起来幫助工农阶級！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斬絕洋貨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帮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要贊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沒收他們的財产，保护他們的商业自由！

革命的知識分子加入工农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識分子加入紅軍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級解放万岁！

共产党紅軍第四軍軍党部

关于暫行婚姻条例的决議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第一次会議通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封建統治之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經济上得到第一步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則，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們的身体許多受了很大的損害（如纏足）尚未恢复，她們的經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問題，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引起的义务和責任，多交給男子負担。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慣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規定。

此条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公布实行

中央执行委会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

张××

〔婚姻条例略〕

〔註〕：在原稿中凡原稿涉及“苏維埃共和国”或“苏維埃政府”的地方，均改为“紅色政权”易不提“苏維埃”，相应的“苏維埃代表”則改为“工农代表”。其原因見《毛选》一卷《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註释〔6〕，請同志們注意。

执行优待紅軍条例实施办法（节录）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訓令第九号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中华苏維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紅軍优待条例，这个优待条例，对于紅軍規定了許多优越的权利。为什么对于紅軍定出这許多的优待条例呢？因为紅軍在几年来的斗爭中，是坚定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軍閥的主要力量，是苏維埃政府的有力保卫者。他在过去中国的革命斗爭历史上，做了英勇斗爭的光荣事业。目前中国革命是一种残酷的革命战爭环境，是积极进行革命战爭的时候，是要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軍閥

作更残酷的大規模的战爭，必須要有广大的紅軍，才能爭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及苏維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紅軍是为了解放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而作战，为苏維埃政权而作战的战士，是以最大牺牲精神来为工农及一切劳苦民众利益和解放而奋斗。因此，苏維埃政府和工农群众，就应当对于紅軍加以特别的优待，使这些紅軍战士心中得着安慰，对于家庭沒有什么挂念，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勇敢作战，因此，第一次全苏大会特别定出这个优待紅軍条例。

过去各地方苏維埃政府对于紅軍及其家属的优待，确已有些規定，但在实际上的执行是缺乏注意的，有的地方簡直是忽視不执行；有的地方对待紅軍家属，簡直是破坏紅軍；这与扩大紅軍、加强紅軍战斗力是有很大的妨碍的，这是很大的錯誤。以后各級苏維埃政府应严格地糾正过去的这些錯誤，絕对执行全苏大会通过的优待紅軍条例，以后若再忽視优待紅軍或对执行优待紅軍条例懈怠，須当作反革命一样的来处罰。兹特規定下列优待紅軍条例实施的具体办法，以便执行。

（具体条例略）

关于春耕問題的訓令（节录）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人民委員会）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春天到了，春耕在即，这一問題是苏区国民經济的主要部分，不但关系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改善，同时关系經济的发展与巩固。因为生产增加，是巩固与加强苏区和紅軍向外发展的力量。目前正当着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的时候，而国民党反革命政府正无耻的出卖中国，使中国无数万的群众牺牲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同时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工人大罢工猛烈的发展着，各地群众自动組織义勇軍，有些白軍士兵已自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各地苏区与紅軍得到新的伟大的胜利和发展，这些事实完全証明目前中国的形势又到了革命最紧张的时候。我們要大大地向外发展，配合和領导全国工农及一切革命群众的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运动，以組織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战爭，来爭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因此发展和提高苏区生产，强固苏区向外发展的經济力量，在目前便有极伟大的意义。

在发动和加强春耕运动中，特别要注意对于去年被白匪摧残区域，应当用多种方法去帮助群众去解决春耕中各种問題，这是苏維埃政府一个实际任务。对于广大工农群众，苏維埃政府要努力領导他們来解决春耕中各种困难問題，使今年粮食收获大大的增加，来改善群众生活，来加强向外发展的力量，来充分供給紅軍的給养，以开展和帮助目前积极进行的革命战爭。临时中央政府委員会現在决定如下办法，希各級政府切实地更具体立即执行：

（具体办法略）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紀念运动的决議

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爭紀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紀念日，中国工农紅軍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漸在斗爭中成长起来。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盜战爭及

反苏联战爭的危險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規模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与华北的时候，同时是全国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极大的高潮，苏維埃运动与革命战爭得到空前伟大胜利的时候，因此今年的“八一”有着非常伟大的革命斗爭的意义，中央执行委員会为了紀念中国工农紅軍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紅軍战士起見，特决議如下：

（一）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紅軍紀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紀念并授战旗予紅軍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与領导南昌运动的負責同志及紅軍中有特殊功勛的指揮員和战斗員。（二）責成內务部人民委員部制定紅軍家属优待証，发給一切紅軍战士的家属以执。（三）在区苏土地部与乡苏之下，組織紅軍公开管理委員会，管理紅軍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內务部共同管轄下及在乡苏下組織优待紅軍家属委員会，管理优待紅軍家属的一切事宜。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調查团报告书通电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們：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早已向全国的民众宣告：

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盜联盟，它派遣李頓調查团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計划瓜分中国与鎮压中国苏維埃旗帜之下的一切革命运动。

現在帝国主义强盜联盟的調查团——李頓調查团，瓜分中国的报告书已經发表了，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完全同意接受它。

李頓报告书公开的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計划；它公开宣佈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占領滿州、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更残酷地进攻中国苏維埃政府所領导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后来消灭滿州义勇軍的反日战爭，全国的反日帝运动与抵貨运动。无耻地主张滿州应作为“自治国”，設立国际宪兵，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去积极向苏維进攻。同时用一些“宗主权属于中国”等名詞来企图解除中国民众反帝的武装和欺騙中国民众。最后，再三命令国民党更要积极地去进攻紅軍，要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更努力鎮压反帝运动，抵貨运动，凶残地去鎮压民众！

李頓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維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維埃政府領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爭，来撕碎李頓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区、进攻苏联的新企图！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武装保护苏联，建立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亲密的联盟。

苏維埃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宣言，要眞正的进行民族战爭，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必須首先推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压迫民族战爭的国民党反动統治！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完全忠实地拥护接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告书，承認作为談判根

据，国民党各派政府一切討論研究及口头上对报告书某几点之不滿意无非是掩飾它出卖中国的面具，欺騙中国民众的把戏。国民党宁肯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送給帝国主义，而对于領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革命民族战爭的工农紅軍，却在帝国主义的指揮和协助之下，动員百万的兵力来进攻，企图消灭眞正反帝民众的苏維埃政府，阻止紅軍及反帝英勇士兵和义勇軍站在一起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同时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滿州的义勇軍，压迫全国反帝运动，制止抵貨运动和工人的罢工，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以效忠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統治，我們才能順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爭。

苏維埃政府正在領导全国的工农紅軍和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艰苦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胜利地去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革命战爭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拥护紅軍的苏維埃政权！只有苏維埃政府才能眞正的領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爭，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工农紅軍才是眞正的实行民族战爭的民众武装！

全国的工农紅軍战士、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們！积极地进行革命战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进攻来粉碎第五次“围攻”！白区各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組織义勇軍，举行罢工进行抵貨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爭，一切的革命民众們！在苏維埃的紅旗之下，一致起来实行革命民族战爭，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統治，驅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全中国民族的苏維埃政权，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
张××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时临政府及工农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宣言（註）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全中国的民众們：

日本帝国主义在法美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經开始侵入华北。这是更进一步地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帝国主义强盜的更进一步的侵略，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慘杀，城市与乡村的毀灭，痛苦与飢荒的增加。上海与滿州的慘状，在大部的中国土地上要更残酷地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中国士兵整千整万的被慘杀，在蔣介石命令之下，国民党的軍閥們步步撤退，这样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国民党用一切力量鎮压反帝国主义抵貨运动的斗爭，反对組織反日义勇軍。

国民党政府及其軍閥政客們解释他們的罪恶行为与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說中华苏維埃的存在，使他們不能动員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蔣介石就不愿意与日本軍閥作战，而用八十万大軍去进攻已經創立了自己的苏維埃政府的中国工农，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許多部队与几十万国民党軍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姊妹，贊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

主义。他們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爭，能够胜利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苏維埃政府与革命軍事委員会嗤駡国民党的解释是蠢笨的謊話，他們想用这种蠢笨的謊話，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中华苏維埃政府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在去年四月我們已經是号召全中国民众与我們一起共同的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爭。而蔣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却是动員一切軍队进攻中国工农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

在下列几个最簡单的，但是为眞正組織和进行民族革命战爭所必要的条件之下，中国紅軍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訂立战斗的协定，以便共同用武装斗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維埃区域。

（二）立即保証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結社、出版言論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創立武装的义勇軍队伍以保卫中国及爭取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的完整。

我們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爭，爭取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完整。

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爭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卖国与投降的斗爭联結起来！

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毛澤东

付主席　項　×　张××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

兼工农紅軍总司令　朱德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註）：《毛选》三卷《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历史决議》中提到过这个宣言。

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三月四日宣言）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全中国的民众們：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七十五生的大炮，巨大的战斗飞机和炸弹，在热河境內施行非人道的轰炸屠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八个师团，在几百架飞机掩护之下，正在三路进攻承德。国民党的的将軍們，依然采取无恥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放弃了开魯，朝阳等，将千百万的和平居民与积极抵抗日帝的士兵，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鉄蹄践踏、摧残和屠杀。全中国的民众們！热河全省已經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整个华北，是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是直接威胁着全中国的劳苦民众！

全中国民众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的强盜战爭，还在猖狂地进行着。在我們的面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爭！只有广大的千百万民众的

武装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与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能够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維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經屡次号召中国民众起来，与工农紅軍及苏区劳苦群众們一起，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爭，并且在最近一次宣言中，在全国民众面前，明白的宣告中国工农紅軍愿意在最簡单和最必要的条件之下，与一切眞正抗日軍队訂立作战的战斗协定，而国民党軍閥政客們最无恥地的屈膝在帝国主义面前，出卖中国，实行不抵抗主义与投降。（中略）正因为苏維埃政府号召与組織全国反帝抗日运动，所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更加凶残地，更加紧用一切燒杀擄掠、軍事冒险与經济封鎖，企图阻碍苏維埃的发展，以便消灭反帝抗日的主力。国民党軍閥政客們企图把苏維埃政府愿意与抗日部队訂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宣言，解释成苏維埃和工农紅軍懦弱的表示，可是正表示了他們的蠢笨与无智。最近两月的战爭，已經給了这些卖国的軍閥們以严重的教訓。国民党的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部繳械，两师长及师部人員全部被俘虏，第五軍已經溃不成軍。苏維埃运动是得到了千百万群众拥护的，国民党軍閥的軍事冒险与經济封鎖，只有更加激起全国劳苦群众的反抗。

中华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軍队直接作战并驅逐他們出中国。因此，必須解除一切阻碍我們与日本作战的反动軍队政府武装。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眞正抗日的軍队，訂立战斗协定。对于一切侵略苏区的軍队与武装，我們号召白軍的士兵兄弟們起来反对你們卖国的长官，揮轉枪头来和紅軍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驅逐他們滾出中国去。全国的民众們！白軍士兵們！苏維埃中央临时政府号召你們起来，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的国民党統治，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紅軍与苏区！拥护我們的共同进行民族革命战爭的号召，反对你們卖国的长官，来联合工农紅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反对以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进攻苏区。要求他将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展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

张××

三月四日于江西瑞金

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全中国的民众們：

以蔣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断送了滿州和出卖了上海抗日防卫战之后，現在又与日本强盗訂立“华北停战协定”，把平津华北出卖給日本帝国主义！

所謂“华北停战协定”的內容是：（一）华軍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緩冲地带（即所謂中立区域），（二）华方承認“滿州国”，（三）制止义勇軍及一切抗日軍队的一切

活动及反满州国力量的发展，解除义勇軍及一切抗日軍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証停止一切反日运动。“华北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卖国賊的庐山会議最后决定了，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們和中国的卖国能手軍閥劊子手們共同签字。在他們的欢宴中，庆祝他們的胜利。在北京城外，在滿州、热河、在察哈尔、平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繼續着用他們的大炮飞机轰炸与屠杀抗日的义勇軍，革命的士兵与千千万万和平的居民，来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下殖民地奴隶們的“和平与秩序”！

全中国的民众們！平津华北已为反动的国民党最后出卖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长期抵抗”的內幕，这就是国民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实質，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的“已定方針”！万恶的国民党以蔣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这样无耻的，这样大胆的把数千方方里及数千万人的整个滿州、热河与平津奉送給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正在想把西藏、新疆、川边、四川等广大的区域送給英国帝国主义。

全中国的民众們！我們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們絕对不容許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們一寸土地，不容許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必須一致团結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爭，以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軍閥，首先是以蔣介石为罪魁的南京政府！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回我們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和領土的完整。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軍事委員会，曾經一再地向进攻中国苏維埃区域的武装部队提議，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訂立作战的战斗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維埃区域；（二）立即保証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成立民众的义勇軍，来保卫中国及爭取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完整。但是国民党对于苏維埃的这种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投降与出卖，尽力量向我們苏維埃区域进攻，并且增派大批的飞机来轰炸苏維埃区域內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极无耻地造謠說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維埃政权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工农紅軍“障碍抗日战爭”。又說“中国沒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現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兵士，每一个学生以及每一个革命者，都会亲眼看：到底誰障碍抗日战爭？誰是卖国賊？誰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現在誰都懂得和相信：不打倒国民党，中国将归灭亡，中国民众永远淪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組成义勇軍，东北抗日的士兵，全中国的革命的学生，知識分子，自由职业家以及一切革命者，一致团結起来，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民族战爭。不顧帝国主义的逮捕与国民党軍警的一切压迫与屠杀，违反国民党的停战退却的命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为爭取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爭！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在完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維埃区域的五次“围剿”的血战中建立广大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創造一百万鉄的工农紅軍，准备会师长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他的工农紅軍在长期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爭中，已經証明給全中国的民众看：只有苏維埃政权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苏維埃政府能够領导全中国民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出卖中国的蔣介石的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国民党卖国軍閥。全中国的民众們！团結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

民族战爭与恢复东北失地，为保卫中国，为爭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爭。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

张××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組織上的大規模动員

（一九三三年六月）

怎样进行查田运动呢？首先是組織上的动員。苏区內一切領导群众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共产党苏維埃与革命群众团体三者，在党的領导之下，协同一致的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每个斗爭任务的完滿完成。查田运动是一个残酷激烈的阶級斗爭，是一个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是党和苏維埃群众团体工作改善的根本，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整个党整个苏維埃工会都动員他們的全力，加入这个运动中去，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关于党的动員中央局已有正确的指示，关于苏維埃的动員首先要反对过去把查田运动看做只是土地部的工作，不但財政部、軍事部、国民經济部与教育部認为是与查田运动毫无关系的，就是工农检察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也認为沒有多大关系，甚至主席团也不去管理查田运动，这是完全不对的，須知整个苏維埃，沒有那一部分可以脫离查田运动不管的。第一，是各級政府主席团要用最大的注意去領导整个的查田运动。第二，各級土地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員，是各級政府在查田运动中主要領导与工作的部門，要在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問題，改造乡区县三級苏維埃，肅清农村中的反革命，这些政府部門，必須拿出他們最大的力量，財政部要注意从地主罰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残余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軍事部要注意在查田运动中整頓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員群众积极分子参加紅軍，国民經济部要注意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費品的調剂，教育部不是沒有工作的，他应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給一些簡明通俗的課本与小冊子，給于一切查田的干部与群众，他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因此現在苏区工会会員，最大多数是在农村中，并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查田运动这个伟大激烈的阶級斗爭，无产阶級必須是最坚决的領导者，所以不論农业工会，手艺工会及其他工会，必須在全总执行局的領导之下，动員他們的最好干部与一切农村中的会員，加入查田运动，最主要的是在貧农团中起推动鼓励的作用，与对于查田查阶級改造政府提出积极坚决的主张。总之，查田运动不是一件寻常小工作，不是一日甚至不是半年所能彻底完成的，所以必須有党团政府工会各方面配合的大規模的动員。

这里說到教育干部的問題：第一，須召集下級負責人开会，給他們以关于查田运动中几个主要問題的充分的說明，过去各級苏維埃人員，多不了解查田运动，是一个紧急任务，不懂得实际去分阶級成份，不懂得爭取群众发动斗爭的路綫与方法，所以沒有法子去开展这个运动。第二，这样的教育还应施之于从当地的下級調来从一切先进的区域調来的干部，要为他們开办短期查田运动訓練班，省县两級政府要为了查田运动多次的开办这种訓練班，一星期至两星期毕业，专門講授查田运动几个主要的問題，省县区三級政府土地部工农检察部政

治保卫局，每部应有他們一組工作員（区一級的不脱离生产）各部对于自己的这一組人，应給于充分的，关于查田工作的教育。第三，一种教育是应該施之于行动中的，这就是省县两級的派人出去巡視，与区一級的每五天至七天召集自己派出的工作員及乡苏主席貧农团主任开会，检閱他們的工作經过，有前两种方法，而沒有后一种方法，是不能爭取工作的最大成效的。

（原載一九三三年六月《紅色中华》）

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訓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現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沒有彻底解决土地問題，这种区域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为瑞金（除武阳区）、会昌、寻鄔、安运、信丰、云都（除新陂区）、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五个全县，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大、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兴国也还有均材，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沒有彻底解决土地問題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沒有最广泛地发动起来。封建残余势力还沒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維埃政府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阶級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組織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原故，这些地方的战爭动員与文化經济建設都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贛县、万大、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坡、安福区，瑞金的武阳区，永定的溪南区等等）之后。在这个广大区域內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群众中发展最高度的阶級斗爭，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进攻而把他們完全消灭，是各地苏維埃一刻不能再緩的任务。关于查田运动的具体进行事項，人民委員会特决定如下：

（一）責成各級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領导整个查田运动。

（二）責成各級土地部、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特派員用他們的全力于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問題，改造地方苏維埃，肅清农村中的反革命，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工农检察人民委員会部，司法人民委員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应用全力指导各下級机关，切实完成这些任务。

（三）責成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导各級財政部，从地主罰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半封建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責成中央軍事人民委員部指导各級軍事部在查田运动中整頓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員群众参加紅軍，責成中央国民經济人民委員部指导各級国民經济部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費品的調济，責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指导各級教育部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給各种簡明通俗的課本与小册子給一切查田干部与群众，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

（四）省县两級政府应該从查田区域及一切先进的較先进的区域征調干部开办短期的查田运动訓練班。县苏区应每月召集区苏負責人开会，区苏应每十天召集乡苏主席貧农团主任开会，检閱查田运动的經过。

（五）应首先召集瑞金、会昌、博生、云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县以上苏維埃主

要負責人会議及八县貧农团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发动八县的查田运动。

（六）查田运动要坚决执行阶級路綫，以农村中工人阶級为領导，依靠貧农，坚决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貧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沒收地主阶級的一切土地財产，沒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給过去分田不够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农、中农，富农則分与較坏的劳动分田。

（七）查田运动中要充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起来向着封建残余作斗爭，首先要經过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一切調查地主富农成分，通过这些成分，沒收这些成分的土地財产，均要經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沒收来的財物除現款外，应全部发給极貧苦的群众，特别注意发給貧苦的紅軍家属，并要多发給于財物所出的村庄的群众。

（八）貧农团是查田运动中极重要的群众团体。乡苏維埃要极力指导貧农团，洗刷其中的坏分子，吸收多数积极分子加入，貧农团中的工人小組应是貧农团的积极領导者。

（九）查田运动中要集中大力注意于一切落后的尤其是最落后的区乡及村子。要注意在落后的区乡，尤其在大村子中开展查田运动，必須发动本村貧农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爭，要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民族地方斗爭的一切錯誤行为。

（十）要在查田运动中肅清一切反革命的組織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謠与破坏。

（十一）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維埃，洗刷地方苏維埃中一切阶級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来，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維埃来。

（十二）各級苏維埃中一切直接間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該受到严厉的惩罰。

只有坚决执行上述的决定，才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农村中的阶級斗爭，激发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完成查田运动的任务。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
　　张　×　×

貧农团組織与工作大綱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貧农团在土地革命中一般說来是起了伟大的作用，他不但团結了广大僱农貧农群众，联合着中农在其周围，在共产党与苏維埃領导之下，以絕大的革命力量，推翻了农村中的封建半封建势力，从地主阶級手中夺取了土地积极的推进了土地上面的生产。即对于战爭动員，經济动員和文化建設等項重大的工作，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貧农团的这种伟大的革命成績，是十分值得称贊的。但是依据看来，貧农团不是都在一切地方都有这样的成績的，也不是有了这些成績就可以不注意其組織上和工作的进行上还有缺点与錯誤。却正相反，只有看到了貧农团过去的成績，同时还看到了貧农团的缺点与錯誤，还看到了有些地方的成績不够，因此努力去改正貧农团組織与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与錯誤，才能爭取以后更加伟大的成績，完成貧农团在苏維埃运动中应有的責任。

根据許多地方的材料，貧农团在組織上与工作上，还有許多不健全的地方，有些地方甚

至还只有一个空名，沒有实际的工作，总括这些材料看来，可以分成两种情形：（一）有些地方还沒有乡貧农团，只有村貧农团、村貧农团之下設小組。有些地方沒有村貧农团，只有貧农团，乡貧农团之下設小組。在乡貧农团和村貧农团内部都沒有干事会，内分主任、組織宣传三个工作部門，由干事会指揮各小組，定期开会，有的十天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組会，有的一星期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組会。加入貧农团的不論雇农苦力貧农，要有三人介紹，否則不能加入，把許多雇农苦力貧农关在貧农团的門外，以致会員数量不甚发展，減少了貧农团的作用。（二）另外一种更加不好的情形，就是有些地方只簡单地宣布除掉地主富农中农以外，其余一切都是貧农团会員，由中共支部或乡苏指定一个貧农团主任，这样該乡就算有了貧农团的組織了。貧农团主任不晓得有几多会員，也不晓得要做些什么工作，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不开会，只挂一个空名，这实际上等于沒有貧农团。这样的貧农团的任务和他在农村中应起的作用，是更加不够完成了。第一种情形的貧农团，其中有些代替了政府的职务，如瑞金武阳区的龙岡乡，黃柏区的新庄、北村两乡，就有这种情形。而第二种情形的貧农团，則沒有經常工作，散漫不起作用。这两种現象都是不好的。但是苏区之中有不少地方的貧农团在組織上工作上都是很健全地发展的，大数量的会員，紧张的斗爭情緒，能够积极地討論各种革命斗爭問題，又并不侵犯乡苏的职权，他們不但和上述第二种情形的貧农团（挂空名的）大不相同，比起第一种情形的貧农团（还有錯誤的）来也更加进步！他們眞算得苏区中貧农团的模范，值得各地貧农团的学习。为了总結过去貧农团斗爭的經驗，統一貧农团的組織，普遍建立貧农团的經常工作，完成貧农团在目前革命阶段中的重大任务，中央政府特根据土地斗爭发展的經驗，及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貧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議，須发这一貧农团組織与工作大綱。希望全国农村中广大的貧农群众都在这一大綱之下，一致的团結与行动起来。

（一）貧农团不是純粹一个阶級的組織，而是在苏維埃管轄区域内的广大貧农群众的組織，同时农村工人必須参加貧农团，組成工人小組在里面起积极領导作用，同时团結广大貧农群众在无产阶級領导之下，成为苏維埃政权最可依靠的柱石。

（二）貧农团的作用是贊助政府实現政府的一切法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关系于工人貧农的利益与权利的各种問題，应該提出自己的意見向政府建議。

（三）貧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使中农环繞在貧农团的周围，建立貧农团与中农的坚固联盟，成为无产阶級联合中农的坚固的一环，以便利于进行消灭地主阶級与反对富农的斗爭。

（四）貧农团只有共产党与苏維埃的領导之下，才能正确的实現他的一切任务，不致受富农的影响，不致受一落后区的农民意識，如絕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在还沒有組織貧农团的地方，可由农业工会或貧农中的积极分子来发起，农业工人及手艺工人工会要能够做到在自己的全体大会上通过整个加入貧农团，以实現无产阶級在貧农团内的經常的領导作用。

（五）貧农团在初成立的时候，是吸收貧农中积极分子参加，以后便逐漸成为全体貧农群众的組織，为了吸收全体貧农群众加入貧农团，（当然破坏土地斗爭包庇地主富农的那种坏分子，即使是貧农也不能加入）貧农团的老会員应該經常負責去做扩大貧农团的宣传，积极找貧农及农村工人以加入貧农团，但不須用介紹形式，而是向工人貧农开大門，告訴并指引他

們加入貧农团。加入貧农团是以自愿为原則，一切男女老少的工人貧农，均可报名加入，那种按戶派人的作法是錯誤的，为了严厉地防止地主富农的混入，須从老会員找来的及自动报名的一切新会員中，按照分析阶級的标准加以考查，遇到有成分不对的，立即开除出去，以保障貧农团不被地主富农混入。

（六）当着开展斗爭，或当着进行查田运动的时候，如果因为过去貧农团散漫无作用，或者貧农团操纵在少数地主分子与富农分子里，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就用命令主义的办法，解散貧农团重新組織，这是脫离了群众，十分不对的。这种时候的正当办法，应該团結貧农中的积极分子加紧教育他們，在貧农团內发动激烈的斗爭，揭破地主富农的欺騙，爭取会員群众脫离地主富农分子的影响，而坚决把地主富农分子及个别无法再教育的极坏的分子洗刷出貧农团去，这样来坚强貧农团的战斗力量，爭取土地斗爭与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如果貧农团中有中农加入，而便不能象对付地主富农分子一样，把他們一下洗刷就完事，一定要經过一番清楚的解释，对他們說明不必加入貧农团的理由，在他們出貧农团之后，貧农团开会时他們仍可来旁听，并且欢迎一切中农都来旁听。

（七）貧农团既不是純粹一个阶級的組織，因此他并不須要如工会一样的严密的組織形式，不需一定的章程，也不需要繳納会費，（需要用費时，在全体大会的同意下，可向会員举行临时的募捐），更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統的組織，只是以乡为单位来組織貧农团。乡貧农团之下分小組，小組可以一个屋子（即小村子）为单位，每个屋子的会員为一小組，如果一个屋子里只有极少数人家，因之会員人数不多，可以两三个接近的屋子成立一个小組。如果一个屋子有几十家甚至更多的人家，因之貧农人数甚多，可以在一个村子內成立几个小組。

（八）为着貧农团工作进行的便利，应由大会选举三个人（最积极的分子）組織委員会，較大的乡或会員很多的貧农团，可推举五个人組織委員会。由委員会推定主任一人，主持全盘工作，此外不在設别的工作部門。貧农团应当实行很广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凡遇到重要問題，必須召集全体会員开会討論。只有平常的問題，才单由革委会討論，或由委員会召集小組組长参加討論。

（九）貧农团大会，委員会，及小組开会，不必机械的固定时間，以防止形式主义的开会，減少会員群众的兴趣。凡遇重要問題，即行召集会議。在农村阶級斗爭特别激烈的时候，如象分田与查田的时候，就是三四天，五六天开一次会員大会，两三天开一次委員会及小組长会，都是应該的。

（十）貧农团的工作，在于随时能注意到工人貧农以及中农的利益，为了苏維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而斗爭，今将貧农团的重要工作列举如下：

（甲）討論豪紳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財产和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等的沒收与分配的問題。討論这个問題时，中心是如何对待地主富农的反抗，如何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工人貧农中农的身上。这里要特别注意不妨碍中农利益，并且要亲密的联合中农，要注意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并不使地主富农冒称中农貧农偷取土地利益，要做到不使一个地主留一寸土地，不使一个富农偷取一丘好田。

（乙）討論农业生产上的問題，如怎样进行春耕、夏耕、秋收、秋耕的运动。在各季的生产运动中，怎样增加人工，增加肥料，改良种子，开发水利，調剂耕牛，添置农具，消灭

害虫，开垦荒田，种植树木与保护山林等問題。

（丙）討論經济动員上的問題，除上述发展农业生产外，主要是討論合作社的发展；如发展粮食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使国民經济大規模的发展起来，以抵制商人残酷剝削，打破敌人的經济封鎖，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改良，革命战爭得到极充实的力量。

（丁）討論救济災荒的問題，如災荒时粮食、种子、耕牛、农具等的互相帮助，被敌人騷扰区域被难群众的設法救济等。

（戊）討論群众卫生的問題，如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講究清洁扫除，以抵制疾病疫癘，保障群众生活的健康。

（己）討論优待紅軍的問題，如紅軍公田的耕种收获与保存，及帮助紅軍家属耕田，实行优待紅軍条例。

（庚）討論战爭动員上的問題，这里第一是扩大紅軍，第二是筹借經費接济紅軍，第三是慰劳紅軍，第四是扩大赤卫队与少先队，这些都是关于战爭动員上极重要的問題。

（辛）討論参加苏維埃选举运动与检举运动的問題，如当着选举时保障工人貧农中的积极分子使他們当选进去，并吸引最好的中农分子参加苏維埃工作。当着苏維埃中混入有阶級异己分子，及发現有貪污腐化，消极怠工等分子时，参加工农检察部所号召的举检运动，发动对苏維埃工作人員的自我批評，使苏維埃的工作絕对健全起来。

（壬）討論苏維埃一切法令决議命令使之在本乡完全实現的問題。

（癸）討論一切临时发生的重大問題。

貧农团必須經常注意上列种种問題的討論，并且积极的向政府建議，在政府領导下坚决的参加各种革命战綫上的斗爭，使各种革命任务完全实現，他才能不断的有自己的經常工作，而眞正替工人貧农中农謀得利益，不致成为有名无实的团体。

（十一）为着更能巩固农村无产阶級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領导，貧农团委員会（并可选几个积极的貧农分子同去）可以建議与农业工会手艺工会的領导机关开联席会議，这种会議由工会召集，如組織拥护紅軍委員会，組織反帝拥苏同盟，組織革命互济会及某种庆祝紀念与示威大会等，都可举行联席会議来討論，在一致的同意下共同努力使实現之。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項　×　张××

粉碎敌人五次“圍剿”与苏維埃經济建設任务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在南部十七县經济建設大会大的报告）

同志們：我們这次开两个經济建設大会，——南部十七个县的与北部十一个县的。这种为着經济建設而开的大会以前是沒有开过的，今天是第一次，目前的形势是敌人的四次“围剿”已經被我們完全粉碎，而五次“围剿”接着就要到来，全世界革命与战爭的大风暴是逼近着我們了。帝国主义大战与反苏联的战爭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帝国主义是在疯狂的压迫中国，日本占領了中国四个半省正在向內蒙古一带发展他們的强盜战爭，国民党四次“围剿”慘敗后，正在布置新的第五次“围剿”。全中国的革命斗爭与革命战爭是面临一种新的

形势，而大踏步的开展着，这时候我們在这里开經济建設大会，这就指明了我們要討論的是什么，我們的經济建設是为着什么，我今天报告就在解释这一点，我的报告分作下面两部分来說：

一、四次“圍剿”的粉碎与新的五次“圍剿”

（1）我首先来說粉碎四次“围剿”中我們所得到的胜利；

我們要說：

第一，是敌人部队的大数量的消灭。

四次“围剿”是彻底粉碎了。总括一年来中央局、鄂豫皖、四川、湘鄂西，以及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各苏区紅軍消灭敌人部队总数在十五师以上。比过去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时的胜利更大了，敌人的武装力量，受了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敌軍全部中下級官长，都十分畏惧紅軍，怕与紅軍作战，而白軍士兵的动摇及对革命的同情，則在日益增长。

第二，是紅軍的坚强与扩大。

紅軍已經成为无敌的鉄軍了，紅軍編制的改变，軍事技术提高，政治上的坚定都比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紅軍的扩大比較过去是增加了一倍，我們已經建立了大規模的作战軍。

第三，苏区是更加巩固了。

在四次“围剿”中工农群众的阶級覚悟，与拥护革命战爭的热忱是更加提高了。查田运动的深入，工人斗爭的发展，使得苏区內部封建残余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經济建設运动开始了发展的新形势，苏維埃的工作更加改善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苏維埃的旗帜映入了全国劳苦群众的心目中。

第四，是扩大了苏維埃的領土。

中央区閩贛省的建立，四川几百里新苏区的开辟，湘鄂川××同志那方面又发展了一个大苏区。

第五，国民党統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也是极大的发展了。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去中国四个半省，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訂立中国与日本的卖国协定，使得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运动大規模的开展了，因为国民党的压迫屠杀，工商业的破产，資本家与地主更加残酷地剝削工人、农民，使得工人的罢工斗爭，农民災民的反抗情緒斗爭，农民暴动与游击战爭大大的发展了。

（2）同志們：我們已得到了极大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是依靠着什么得来的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依靠于：（1）紅軍的英勇善战，（2）苏区与白区扩大一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3）共产党正确路綫的領导。这三个重要条件：方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取得了上面所說这些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給予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的打击，一方面使革命力量增大了，有着鉄的强流的形势，向前猛进着，另一方面使得反革命力量更加削弱，更加感覚他的危亡迫在眼前，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布置一个更大規模的进攻，企图挽救他們将死的統治。

（3）因此敌人疯狂的在布置他們的第五次“围剿”。

为了布置这一次“围剿”使国民党不得不更加投降于帝国主义，蔣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热河、华北之后，更以許多卖国条件同美、英、法、意、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訂立了密約，

借得大批金錢和軍火，重新調动部队訓練新兵，拉攏各級軍閥（但軍閥間的冲突与战爭是无法避免的），正在积极的布置对于苏維埃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

二、粉碎五次“圍剿”与苏維埃经济建設任务

爭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圍剿”。

中国革命現在是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即是說，帝国主义把中国灭亡呢？还是革命战爭消灭国民党，驅逐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苏維埃中国呢？帝国主义国民党决定了灭亡中国的道路，他们已經采取了五次“圍剿”，这种办法在五次“圍剿”中把中国完全瓜分或者“共管”，使中国几万万民众变成帝国主义的牛馬奴隶，变成印度人和高丽人，使中国变成完全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这是一个絕大的危險，这种危險在我们的头上威胁着。同志们，我们能听任他们这样做嗎？不能，我们要爭取革命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使中国脫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流治，成为新的自由独立的工农兵苏維埃共和国，这里重要的关头，是彻底粉碎他们的五次“圍剿”。爭取粉碎五次“圍剿”的胜利，仍然是依靠于紅軍，依靠于群众，依靠于坚决执行共产党的进攻路綫，但我们必定要用我们的一切势力去爭取一切比較过去更加充足的条件，方能粉碎五次“圍剿”，方能取得比較过去更加伟大的胜利。

为了爭取这次胜利，我们要做許多的工作。我们要猛烈扩大紅軍，要在中央区及临近几个苏区六个月至十个月內办到扩大二十万个新战士上前綫去，使各个战綫上紅軍集团更加壯大起来，能够担負着打击蔣介石几十万白軍的任务，要开展广泛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激烈发展农村中的阶級斗爭，去彻底解决土地問題，去最后的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勢烈的欢喜参加革命战爭，要普遍实行劳动法，启发工人斗爭，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对于革命战爭的积极性，要經过今年的选举运动，改造各級苏維埃。从乡苏区到中央一律实行新的改选，使整个苏維埃政权鉄一样的强固起来，更能担負組織与指揮革命战爭的伟大事业，要注意边区和新发展区域的工作，使革命战爭得到便利条件迅速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要发展群众的文化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革命战爭得到一个精神上的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項工作，而为我们此次所要着力討論的，这就是經济建設方面的工作，我们要猛力开展經济建設运动要把經济建設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圍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給革命战爭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質上的条件，这次經济建設大会的召集就是为着这个目的。※

（根据江西省博物館复制品排印）

※本文未完，其余部分以《必須注意經济工作》为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亲爱的兄弟們，姊妹們，朋友們！

我們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里的乡里的穷人以及革命的士兵和知識分子，我們不愿永远作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資本家的牛馬奴隶，我們已經开始創造自己的新的自由生活

了。我們正在領导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作解放的斗爭，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在六分之一的領土內（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河南、陝西等省的許多地方，开始創建唯一的眞正的民众政权——苏維埃政权，唯一的眞正民众軍队——工农紅軍了。中华苏維埃政府和紅軍为根本改善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經济状况而奋斗。中华苏維埃政府和紅軍开始就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使工人、农民、穷人、革命的兵士和知識分子們能够自己自由地干自己要干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使他們从受餓、受冻、沒房子住、沒有工做，一字不識的牛馬生活一样底人，变成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工做，能讀书識字的眞正人一样生活底人。为要做到这一点，苏維埃政府就給了他們土地、房屋和工作，就为大人和小孩們开办了許多不要錢的学校、識字班、图书館、俱乐部等，并且为病人和老年人办了許多不要錢的医院和疗养院。

然而統治中国的一群寄生虫們——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中国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和放高利貸的人，始終总是不愿意我們能够过一点象人的生活。

而正因为我們开始創造了自己新的自由生活，因为我們一天只作八点鈡的工，并且增加了工錢，因为我们原来完全沒有土地或者有很少一点土地的人得到了土地，因为我们这里的妇女得到了解放，于是蔣介石汪精卫和一切国民党野兽们，便罵我们是"赤匪"，是"共匪"，便不止一次、两次地，而是簡直不断地大举"圍剿"我们。

当日本帝国主义大杀特杀我们同胞，并且把我国东北和北方領土一省又一省地占去了的时候，当美、英、法各国帝国主义者积极实行瓜分中国的时候，我们再三地向全国人民和軍队宣言說：各帝国主义要完全瓜分我们中国了，我们一切中国民众应該象一个人一样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们再三公开地向一切軍队提議說：不論什么軍队，只要贊助我们的最簡单的三个条件，为眞正組織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爭底必要条件：

（一）立刻停止进攻苏維埃区域；（二）給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就是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示威、罢工等自由权利；（三）允許人民有广大組織和发展反日义勇軍的自由。就可以和我们签訂战斗协約，以便共同去武装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爭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蔣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一切卖国賊们对我们这些提議的回答，始終都是一样，加强与扩大对苏区底残酷进攻！

国民党現在又开始了对我们的自由的苏維埃中国实行第六次"圍剿"！在这次"圍剿"中，仅仅在我们中央苏区周围（江西、福建、湖南、广东等）便集中了四十四万二千人以上的南京軍队和广东軍队，同时，这些軍队还有大炮、坦克、飞机、毒气等很新式的很好的武装。

国民党軍閥政客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許多新式武器和大批养兵款項呢？他们是从美、英、日、法、德等各帝国主义者方面得的。

这些帝国主义者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錢，去消灭我们这些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的中国民众！

我们和你们大家都还清楚地記得：在不久以前，美、英、日各国軍队曾炮轰我们的广州公社和长沙苏維埃。法国飞机曾轰炸我们的广西龙州苏維埃。

在国民党这个六次“围剿”中，帝国主义者起这个“围剿”的組織者底作用，再明显沒有的暴露出来了。美国帝国主义除借五千万美金所謂“棉麦借款”及四千万美金所謂“航空借款”給南京政府外，并且送給南京政府軍队一百五十架軍用飞机，几十条輪船裝来的大炮、坦克、机关炮、化学毒品和子弹，外加几百个飞机师和各种軍事技术专門家。美国駐华公使兰浦生曾亲到四川視察，并給刘湘两千万英磅和大批軍火，使其进攻我们那里的紅軍第四軍。虽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为瓜分中国互相間明爭暗斗得极厉害，但是他们反对苏維埃中国是一致行动的，他们指使各自的走狗——南京派、广东派、北方派等軍閥，共同“围剿”我们苏区已經得到解放的人民。德国法西斯蒂政府派送了七十个軍事专家（連前国防总长賽克特在內）到南京去，蔣介石把这一批人在南昌总司令部內組織一个特别部，以便指揮对紅軍作战行动。国际联盟恰在这时派送所謂“技术委員会”到南京去，实际上就是去帮助蔣介石計划和实行进攻中国苏維埃和紅軍。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看呵！所謂“民主”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飞机师、各种軍事技术专門家，正在德国法西斯将軍和中国国民党軍閥底指导之下，用美、英、法、德各国的飞机、毒气、坦克、大炮等，在苏維埃中国領土內实行最残酷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屠杀大批的工、农、兵，貧民、知識分子等，以便消灭自由的中华苏維埃共和国和工农紅軍。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为保卫自己的苏維埃共和国，成千累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臚、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軍器比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連五次的“围剿”。現在这个年輕的中华苏維埃共和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請求：

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劊子手呵！

为要使我们再去过以前那样黑暗的牛馬奴隶生活，国际帝国主义者决心要把中国苏維埃革命淹沒在血海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强盜们，現在把軍舰、飞机、陆战队等等，集中在苏維埃中国周围和一切中国的通都大邑和江海口岸上，他们决定先屠杀我们一場，然后再来进行互相火拚的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使全世界人类都要遭受絕大的牺牲和痛苦！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員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爭。

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維埃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維埃中国的劳苦民众！反对运輸一切軍火来华！要求立即召回美国飞机师，軍事技术专門家和德国将軍及参謀！要求立即撤退美、英、日、法、意各国駐华海陆空軍！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众的国际同情万岁！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主席　毛泽东

付主席　項×　张××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

兼工农紅軍总司令　朱德

一切革命斗爭都是为着夺取政权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和革命勢力斗爭，也完全是为着維持他們的政权。

革命的阶級——工农劳苦群众，用苏維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国內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維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須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級才能成为統治的阶級，政权才能成为統治的政权。

（“今年的选举”，《紅色中华》第一〇八期，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

全中国的民众們！

自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訂立了出卖滿蒙的华北停战协定之后，更經过了大連会議上中、日、“滿”三国的“联欢”，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但出卖滿蒙与灤平的所謂“中立区域”，而且直接动員他的武装力量，协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滿州国”的軍队，压迫东北抗日的士兵退出內蒙古，并在“剿匪”名义之下，成千成万地屠杀东北抗日义务軍与革命的士兵群众。中国国民党罪魁蔣介石公开发表“倡言抗日者，立斬无赦”，“为了剿共必須停止抗日”的最无恥的宣言，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鎮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有計划的撤退他的华北駐軍而集中他所有武装力量向反日反帝的主力軍——中华苏維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紅軍进行新的六次“圍剿”，以表示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誠，来表現他的“中日直接交涉”的預定計划。

中日直接交涉，自九月間国民党要人第三次庐山会議之后，已經加緊速度地进行了。这一次会議的內容，显然不限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認滿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以中国承認华北为日本勢力范围，日本幫助南京政府，以金錢武器，伸张他的反动勢力，进行他的六次“圍剿”为直接交涉的交換条件。什么日本愿意放弃“在华北的治外法权”，当然不过是一种欺騙民众的把戏。

全中国的民众們！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各派国民党政府，同时又将西藏与西康的大部分，出卖給帝国主义，将青海九島与云貴等省，出卖給法帝国主义，将許許多多政治經济的特权出卖給美帝国主义，最近他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数万万元的大借款与杀人的武器，都是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土地与人民的代价。

出卖整个的中国，投降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充当清道夫，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一貫外交方針！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反对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所以他对于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民众自己的苏維埃政府与工农紅軍进行他疯狂的与絕望的六次“圍剿”，正因为

这样，所以他帮助帝国主义来加紧对于中国民众的剝削，造成全中国国民經济的总崩潰，使水旱災荒普遍全中国，使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学生失学，使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生活在悲慘的地獄中而冻死餓死！

全中国的民众们！国民党所要我们走的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华民族完全灭亡的道路！

一致的团結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軍閥，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以蔣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这是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唯一出路！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再一次向全中国民众宣言，为了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为了打倒卖国的国民党軍閥，为了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完整，时刻准备着流尽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了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完整，苏維埃中央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六次“围剿”的斗爭，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即是爭取独立自由的苏維埃新中国斗爭中最重要的一环。

为了集中全国一切民众的力量，同全中国最凶惡的敌人决战，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革命軍事委員会在这里再一次向全国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議在下例三个条件之下，訂立目前反日反蔣的战斗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維埃区域；（二）立即保証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創立武装的义勇軍，以保卫中国及爭取中国的独立統一与領土的完整。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信我们这一提議，定能得到全中国劳苦民众及一切稍有爱国热血的人民的同情与积极的拥护。这种同情与拥护，将保証殖民地道路与苏維埃道路的决战中，苏維埃道路的完全胜利，将使中国的民族与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鉄蹄之下得到最后的解放！

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

为独立自由的苏維埃新中国而斗爭！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

为瑞金紅軍烈士紀念碑写的碑文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許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現了无产阶級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統治，爭取苏維埃在全国的胜利。

（原載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放軍报》）

在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三四年一月）

开幕詞

（一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現在我代表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开幕了。

同志们！今天是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維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員会向全体代表們致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經有两年又两个月了。两年以来，全国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反革命統治阶級是更进一步动搖崩溃，而苏維埃运动与全国革命斗爭則是大大的发展了。

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受地主資产阶級国民党政府屠杀、压迫、奴役的国家，全国广大的領土是很多被国民党送給帝国主义者了，使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瓜分共管的威胁，使中国处到了完全灭亡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自己团結起来，武装起来，創立了自己的政府与軍队。我們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全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銳的对立了。

两年来革命的发展，使全国革命形势更加开展了。广大民众团結在苏維埃旗帜之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两年来我们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我们胜利的面前发抖起来了，他们繼續四次“围剿”之后，組織了五次至六次的“围剿”。但是我们打破了敌人五次的“围剿”，在粉碎第六次“围剿”中間，我们已經取得了第一步胜利。現在我们是处在对六次“围剿”的决战中，是处在最紧急的关头。

两年来，全国紅軍在浴血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間，我们許多同志为着苏維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許多在国民党区域在白色区域領导革命斗爭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屠杀了。这些同志中間如黃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罗登賢，邓中夏，陈原道，何子述，鲁易，王良，关河林，张錫龙，吳高群，彭鏊，孙小宝，傅作玉，童长荣，伯阳等等，他們是在前綫上，在各方面的战綫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建議我們靜默三分鈡向这些同志表示我們的哀悼和敬仰（全体代表起立靜默三分鈡）。

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六次“围剿”，是要把苏維埃运运推到全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謀毒計。我們的大会是担負着很大的責任，我們的大会应該号召全中国民众为着扩大一百万鉄的紅軍而斗爭，号召全苏区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集中一切力量，粉碎六次“围剿”，爭取革命战爭的最大的彻底胜利，实行抗日討蔣，爭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我們的大会是全国最高的政治机关，他有着极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問題，我們的大会将

使六次“围剿”得到彻底粉碎。把革命发展到全中国去，把苏維埃版图扩大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統治的地方去，把紅旗插到全国去，让我们高呼：

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万岁！

苏維埃新中国万岁！

（压倒一切的鼓掌声中全体起立欢呼！）

报　告

（一月二十二日）

（一）目前形势与苏維埃运动的胜利※

（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維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圍剿”与苏維埃政府反对“圍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維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紅軍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軍，因为苏維埃运动与革命战爭的猛烈向前发展，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以五、六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維埃与紅軍进行絕望的进攻，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势力，为帝国主义们瓜分中国担負开清道路的責任。

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失敗，中华苏維埃与工农紅軍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領导，已經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苏維埃与紅軍的胜利，更加兴奋了全中国的劳苦民众，使他们认識只有苏維埃与紅軍才是真正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只有苏維埃与紅軍才能救中国。

当敌人四次“圍剿”开始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訂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卖国的国民党不但不以一兵一卒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不管苏維埃中央政府与紅軍的屢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軍队訂立抗日的战斗协定的提議，相反的国民党卖国罪魁蔣介石，在四次“圍剿”失敗后，立刻妥着举行五次“圍剿”，集中了数十万軍队进攻鄂豫皖与相鄂西苏区，压迫紅軍离开圍繞武汉的区域。在我们方面，虽然因为要避免与过于强大的敌人力量作战，因为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的錯誤，紅四方面軍不能不退出鄂豫皖苏区，作了有名的远征，但紅四軍在四川南江、宣汉、綏定一带創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維埃根据地。由于紅四方面軍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爭，把苏維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內，已經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已經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紅軍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軍兵士傾向于苏維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維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陝苏区是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陝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許多优势，川陝苏区是揚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間的苏維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陝苏区在爭取苏維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蔣介石与四川軍閥都不得不在紅四方面軍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同时从洪湖根据地退出的紅軍第二軍团，不但主力沒有遭到重大的損失，而且在川鄂相边，配合着紅四方面軍积极行动，取得了新的胜利。即洪湖一带，亦尚有游击队的存在。鄂豫皖苏区方面，我们的根据地虽然受了部分

※（“报告”的第一、二部分見《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144——147頁）

的損失，但留守的紅軍部队和游击队，英勇地向四周发展了游击战爭。

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維埃运动的大本营，因此，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主要进攻的目标，国民党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兵力和我们作了頑抗的战斗，他調动了所謂"中央軍"、蔣蔡軍閥，两广軍閥与湘南軍閥从四面包圍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各苏区，然而經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单只这半个年头，中央苏区紅軍消灭了白軍二十四个团，六个营，二个連，击溃白軍三个师、十二个团、五个营、二个連，繳获步枪二万枝左右，机关枪、短枪一千枝左右。尤其是在东黄坡战役，消灭了敌人最頑强的基本縱队，使敌人的五次"围剿"遭受了最后的惨敗。

在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紅軍不但数量上扩大了，而且质量上增强了，紅軍指揮員、战斗員政治上的堅定，軍事技术上的提高，比五次战役以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苏維埃領土扩大了，除四川广大苏区外，在福建的西北部，江西的东部，扩大了广大的苏区，增加了近百万的人口，建立了新的閩贛省，旧的苏区更加巩固了，这表現在苏維埃工作的改善，工农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提高，农村中城市中阶級斗爭的发展，以及苏区中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遭受到严厉的鎮压。同时，这一胜利影响国民党区域非常之大，广大白区工农群众，在这一胜利影响之下，更加提高了他们斗爭的勇气。一切参加"围剿"的国民党軍队，不但兵士中发生了普遍的动摇，甚至干部中亦发生了極大的恐怖情緒，甚至使蔣介石不得不公开宣布："不剿匪抗日者杀勿赦"的絕望命令。

然而这些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他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綫的正确，依靠了苏維埃政府領导集中，与他的政策設施的适当，依靠了紅軍的英勇善战，依靠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并且这依靠了白区的工农群众的日常斗爭和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依靠了全世界无产阶級与殖民地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沒有这些条件，是决不能够取得胜利的。

国民党軍閥在五次"围剿"惨敗之后，唯一的出路是更加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取得大批的借款与軍械，聘請大批外国顧問，收集一切旧有力量，組織新的力量（訓練新兵，訓練新的航空队，訓練兰衣社軍官团等）总之，集中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在帝国主义指揮之下，对于苏維埃与紅軍进行第六次"围剿"。

苏維埃对于六次"围剿"的斗爭，是决定中国或者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領土完整的苏維埃中国这个伟大斗爭的主要环节之一。

苏維埃应該号召一切苏区中白区中参加斗爭的群众，明白認識这一斗爭的严重性，只有团結一切革命力量用百倍积极百倍堅毅的精神統一于苏維埃指揮之下，才能爭取这一斗爭的完全胜利。

苏維埃应該指示給一切参加斗爭的群众：在粉碎五次"围剿"之后我们不着战胜敌人六次"围剿"的一切基本条件。党与苏維埃的正确的領导，紅軍的堅强与扩大，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爭积极性，这一切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础。

由于我们的努力与統治阶級内部矛盾的发展，已經使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新的大举进攻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敌人的原定計划已經失敗了，不得不在新的陣地与新的計划之下，向着我们作絕望的进攻，我们是处在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面前。国民党軍閥的整套政策

与經济封鎖政策虽然极其残酷，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鋼墙鉄壁。提高我们的軍事技术，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士兵工作，改进我们的軍事策略，集中我们一切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应該指出：敌人的困难是大大超过于我们，白軍士兵的动摇，敌人統治下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的小資产阶級的憤恨与不滿，統治阶級各派軍閥之間的斗爭与分裂，援助国民党的各个帝国主义者間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国民党財政經济的破产，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方面的条件。

这里应該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六次"圍剿"之际，蘇維埃出現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現，表現国民党系統的进一步的破裂，由于苏維埃运动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在全国民众面前破产，使得中国反动統治阶級的一部分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維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統治阶級垂死的命运。然而这一企图只是徒劳，因为如果"人民革命政府"这一类的組織不从眞正中国人民利益出发，而坚决承認苏維埃政府还在去年四月間即已宣佈了的三个条件，而与苏維埃政府訂立并眞正执行反帝反国民党的协定，而且是止于欺騙与講空話，那么，广大的革命民众，不会于"人民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采取任何不同的态度，它必然要遭受悲慘的失敗也是可以預言的。而苏維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欺騙的日益破产中，将坚决的粉碎六次"圍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努力爭取在全国范圍內苏維埃革命的胜利，在事实上証实这一句名言："只有苏維埃能够救中国"。

（四）两年来苏維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設施

当着我们来說苏維埃各种基本政策的时候，首先要問什么是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呢？答复这个問題，应該明白苏維埃过去与現在所处的环境和从这种环境所产生的任务。

苏維埃的过去时期，他是生长于游击战爭中，他是从許多极小的地方生长起来。这些地是各自独立沒有联合，每一个苏区的四圍都是敌人的世界，敌人对于苏区是每时每刻的摧残与压迫。然而，他能够战胜这些敌人，他是从战胜这些敌人无数次压迫中間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苏維埃的环境。

苏維埃現在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許多的不同；他有广大的領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紅軍，他已将許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虽然还沒有完全集中起来），他已經組織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維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經有了他的地方与中央的組織，已經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利机关，他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紅軍。这个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和資产阶級的专政，而且已經是一个具有极大权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已經向着全国范圍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广大民众中間有了很大的信仰，他与过去游击战爭时代情形大不相同了。然而战爭仍旧是經常的生活，并且更加广大与激烈，原因是这个专政与国民党地主資产阶級专政之間的对立一天一天尖銳起来，現在已經进到两方面快要决定胜負的时期，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規模的"圍剿"是摆在他的面前。这就是苏維埃現在的环境。

这种环境决定了他的任务，就是他必須用全部力量去动員民众，組織民众与武装民众，

必須一时不停地去进攻他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他的“围剿”。他的任务是革命战爭，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爭，用革命战爭去打倒敌人，并且还要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統治，因为帝国主义是敌人那一个专政的拥护者与指揮者。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目的，为的是要解放中国人民，为的要把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奴役和蹂躪之下解放出来，为的要使几万万中国劳苦同胞从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資产阶級及压迫之下翻过身来，为的使中国民众能够学习苏联工农一样将来胜利地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建立光明的，幸福的人类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維埃的根本任务。

从此，我们明白苏維埃在这种环境与任务之下，施行各种基本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巩固已經胜利了的工农民主专政，为了发展这种专政到全国范围內去，为了动員組織武装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以坚决的革命战爭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統治，来巩固与发展这个专政，并且为了从现时工农民主专政，准备将来变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級专政去，这就是苏維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中央执行委員会与人民委員会秉承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指示，两年以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得到了伟大的成績。已經从經驗上証明給中国全体革命民众看：只有苏維埃政府的政策，才是为了民众政权与民众利益的政策，才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坚决对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国的統治，挽救全体民众出于危亡，解放全体民众出于水火的唯一的政策。

不待說，在两政权尖銳对立的中国，苏維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立即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之下，受尽压迫剝削的民众对于苏維埃每一具体政策的施政。簡直如同鉄屑之追隨于磁石。这种情形造成了反动統治阶級的极大恐慌，反动統治阶級因此不惜以一切最无耻的謠言来污蔑苏維埃的施政。然而鉄的事实，是最无耻謠言的有力回答，每一个有眼睛的中国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地主資本家，便不能不承認苏維埃政府的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何等天淵之别。

一、苏維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紅軍

我们首先来說苏維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設紅軍。

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爭，为着保卫中国民族和国家，苏維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与組織坚强鉄的紅軍，組織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組織关于进行战爭的給养与运輸。两年来在与敌人四次五次以及六次“围剿”坚决斗爭中，苏維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大大取得了成功。

首先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的建立，統一了全国紅軍的領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綫的紅軍部队，开始在統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助呼应与互相配合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規的大規模的紅軍部队的行动的主要关鍵。两年以来革命軍事委員会領导着全中国紅軍，首先是中央苏区紅軍，进行了光荣的胜利战爭，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而四川紅軍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領导之下，已經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新胜利。

红軍在两年内是迅速扩大了。是比两年前扩大了几倍。这一方面之所以得到了成功，是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爭的积极性，并且还依靠于动員方法的进步与苏維埃优待紅軍法令的执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个月中間，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扩大了近两万的新

战士。很多的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地涌进紅軍中去。一切以为群众不愿意当紅軍，或者以为在新苏区边区等处不能扩大紅軍的机会主义的說法，事实已經証明是錯誤的。然而动員方法之正确，苏維埃优待紅軍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員計划的关鍵。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行充分的宣传說服，制裁破坏扩大紅軍以及領导开小差的阶級异己分子，是动員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紅軍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給予紅軍战士一切可能与必需的精神上与物質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紅軍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紅軍战士的家属很好的耕种土地，实行消費合作社对于紅軍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紅軍家属开办供給日用必需品的专門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百分之十供給紅軍家属，号召群众为紅軍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紅軍战士及其家属給予精神上物質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紅軍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障紅軍踊跃的上前綫去及巩固其在前綫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驟。这些工作，在苏区各地存在着很多的模范，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的神圣职責，而大批的不断的涌向前綫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岡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四〇七人中，出外当紅軍做工作的去了三百二十人，留在乡間的八十七人，去的与留的成为百分之八十与二十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出外当紅軍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留在乡間只有六十七人，去与留的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八与十二。这些乡中的壮丁这样大数量的英勇的上前綫去，然而乡中的生产，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呢？不但不发生不好的影响，而且更加扩大了改良了。什么原因？因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及其他一切的办法，有組織有計划的調济乡村的劳动力，解决了紅軍家属每一个困难的問題。我想这种光荣的教訓是值得全苏区学习的。

紅軍鉄一样的巩固，应使之与紅軍的扩大密切連接起来，两年以来这一个方面的工作，同样的得到了好的成績。現在的紅軍，已經走上了鉄的正規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現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現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驅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級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員制度普遍建立了，紅軍掌握在可靠的指揮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紅軍战士为苏維埃斗爭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級自覚的紀律，密切了紅軍与广大民众之間的联系。（四）軍事技术提高了，現在的紅軍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練习，然而一般的軍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編制改变了，使紅軍在組織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紅軍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維埃武装力量。

广泛的扩大赤卫队与游击队，是苏維埃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战爭的极端重要的事业。赤卫軍少先队是前綫紅軍的現成后备軍，是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并且是从現在的自愿兵役制轉变到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桥梁。而游击队則是新苏区的創造者，是主力紅軍不可缺少的支队。两年来每个苏区中是发展了这些部队。他们的軍事政治訓練也相当的加强了。他们加入紅軍，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圍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績，致使敌人惊为奇跡，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絕大困难。这在中央苏区与閩浙贛苏区，是特别表現了他的作用。把这个制度广布到一切新开辟的苏区去，极大的扩大他们的組織，加强他们的訓練，使这些部队成为紅軍在革命战爭中最可靠的兄弟，这是苏維埃的重要責任。

充实红軍的給养与供給，組織联絡前綫与后方的軍事运輸，組織軍事的卫生治疗，同时于革命战爭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我们还沒有取得若干中心城市与敌人經济封鎖的情况之下，这一任务的进行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已經在这一方面保証了紅軍在过去长期中的給养供給与运輸，这不能不說是一个极大的成績。但是当前粉碎六次"围剿"的决战，及以后更加扩大的战爭，需要我们用更大努力增加这一方面的力量，保証这一方面更加充分的供給。

更大規模的革命战爭是在我们的面前，苏維埃武装民众政策更加显示了他的絕对重要性。一刻不放松去武装民众，去从切实的工作中以最快速度，实現一百万鉄的紅軍的創造，是苏維埃基本的战斗的任务。

苏維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爭，是动員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爭。环繞着这个基本任务，苏維埃就有着許多迫切的任务。他应該对广大民众施行广泛的民主。他应該坚决鎮压內部的反革命。他应該启发工人的阶級斗爭，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在工农联盟以工人阶級領导的原則下，提高工农的积极性。他应該执行正确的財政經济政策，保証革命战爭的物質需要。他应該实行文化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以及其他的許多基本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以革命战爭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統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轉变到无产阶級专政的阶段去。

二、苏維埃的民主制度

現在我们来說苏維埃的民主制度。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維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揮他的作用。苏維埃具有絕大的力量，他已經成为革命战爭的組織者与領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組織者与領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資产阶級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苏維埃政权需要使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級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級——工农、貧民、职員、革命知識分子等大多数民众，則不能使用强力，而他表現出来的只是最寬泛的民主主义。

苏維埃最寬泛的民主，首先表現于自己的选举。苏維埃給予一切过去被剝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动群众对这种权利的取得，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結两年来各地苏維埃的选举經驗，一般来說是有很大的成績。第一，关于选民登記。用紅榜白榜的办法，将有选举权的居民与无选举权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划分。以不准任何剝削分子参加的选民大会的选举，代替了过去开群众大会选举的办法。第二，关于成份比例。为了保証无产阶級在苏維埃政权中的領导干部，采用了工人及其家属十三名选举代表一人，农民及貧民五十人选举代表一人的办法，拿了这样的成份去組織市乡代表会議。从区到中央，各級的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員会，工人与农民的代表都有适当的比例。这样便在苏維埃政权的組織上保証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并使工人站在領导的地位。第三，关于选举单位。为了保証多数的选民参加选举，并使工人能够选举他们的适当的代表进苏維埃，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央执行委員会頒布的新的选举法，規定每个乡苏和市苏，分成几个选举单位进行选举。即是农民以村为单位进行选举，工人則单独为一单位进行选举。这样就使民众参加选举十分便利了。第四，关于参加选举的人数。苏維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的認識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現在許多都积极

起来了。一九三二年两次选举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选举，許多地方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有些地方仅只害病的生育的以及担任警戒的人不曾参加选举会。第五，关于选举名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实行了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在选举之先就有应否选举其人的准备。第六，关于妇女的当选。现在多数的城乡苏維埃，妇女当选为代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部分地方如上杭的上才溪乡，七十五个代表中妇女四十三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乡九十一个代表中妇女五十九个，占百分之六十六。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第七，关于工作报告。即是由乡苏市苏在选举以前，召集选民开会，报告苏維埃的工作，并引导选民批評这种报告。这一办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也比較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驟——苏維埃的选举，有了完整的办法，保証了苏維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其次，苏維埃的民主，見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議。市乡代表会議制度是苏維埃組成的基础，是使苏維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两年来的进步，使我们的这一制度更加完滿了。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为着使乡苏市苏的代表与当地居民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見，并便于領导工作起見，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領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領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領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这样便使民众与苏維埃在組織上連成一片了。(二)，乡苏市苏的代表，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之中选举一人为代表主任，其任务是在乡苏及市苏主席团領导之下，分配和指导其領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主席团的通知于各个代表，召集其領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領导下居民中的較小的問題。一村之內，并須有一个总的代表主任，負領导全村工作之責。这样便使市乡主席团与代表之間密切的联系起来，并使村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領导。(三)在乡苏維埃与市苏維埃之下，組織各种經常的及临时的委員会，如优待紅軍委員会、水利委員会、教育委員会、粮食委員会、卫生委員会等，其数可以多至数十，吸收群众中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委員会的工作。不但乡有委員会，村亦应該有某些必要的委員会。这样便把苏維埃工作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維埃的工作。(四)乡苏及市苏的选举，規定每半年举行一次(区苏亦半年一次，县苏省苏則每年一次)，这样便使民众的新的意見容易湧現到苏維埃来。(五)在两次选举之間，代表有犯重大錯誤的，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議，經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議通过开除之。这样便使不良分子不能长期駐足于苏維埃机关了。所有这些，都是苏区中許多地方正在实行着的市乡苏維埃的特点。大家都可以看見苏維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維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結合起来，他就使苏維埃成为最能发揚民众創造力的机关，使苏維埃成为最能动員民众以适应国內战爭，适应革命建設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除苏联外无論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区以上各級苏維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維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級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員会而組成，政府工作人員，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換，一切問題的討論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維埃政权是眞正广大民众的政权。

再次，苏維埃的民主，还見之于給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結社言論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当着国民党統治区域剝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权利，执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的时候，苏維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見的权利，苏維埃并且給予一切可能的

物質条件上的便利（会場、紙张、印刷机关等等），一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集会結社与言論出版，苏維埃总是极力的領导者，苏維埃所不允許的，只是那些压迫剝削分子的反革命自由。

不但如此，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維埃必須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監督与批評。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維埃工作人員的錯誤和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貪官污吏佈滿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維埃制度之下則絕对不容許此种現象。苏維埃工作人員中，如果发現了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种人員的錯誤，而苏維埃立即懲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民主的精神，也只有苏維埃制度之下方能存在。

最后，苏維埃的民主精神，还見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維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級苏維埃的管轄境界都改小了。这有什么意义？这是使苏維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維埃因管轄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見迅速反映到苏維埃来，迅速得到討論与解决，使动員民众为了战爭为了苏維埃建設成为十分便利。国民党軍閥利用封建时代的大省大县大庄乡制度，这仅仅便利于隔絕民众，苏維埃政府是用不着的。这里应該指出：关于村的划分是重要的一节，因为乡苏維埃之下，执行苏維埃工作的最便利的方法，是以村为单位去动員民众，依靠了村的适当的划分，村的民众組織的建立，村的代表与代表主任对于全村的有力的領导，乡村的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

三、苏維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其次說到苏維埃对于地主資产阶級的态度。

苏維埃实現了最完滿的民主制度，他是为广大民众直接参加的，他給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的权利，他对于民众絕对不使用也絕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强力。

但是，地主資产阶級，即一切被革命民众所推翻的剝削分子，苏維埃对之則是另一种态度。

地主資产阶級，因为他们是剝削者，因为他们是过去的統治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維埃是怀着极端的仇恨的。因为他们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他们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有优越的智識与技术，所以他们虽被推翻，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維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剝削制度。特别是在国内战爭时代，敌人对于苏区不断举行軍事的进攻，更使这些被推翻的剝削者时刻企图以反革命行动响应进攻的敌人。因此苏維埃政权不能不从各方面对于这些分子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鎮压。

苏維埃制裁剝削分子的政策，第一件是拒絕他们于政权之外。苏維埃的宪法規定，对于地主資产阶級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在紅軍中在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但这些分子却总是千方百計企图混进苏維埃机关中紅軍中与地方部队中来，特别在新开辟的苏区，群众斗爭的发展还不充分，这些分子更容易利用机会混了进来。过去的經驗完全証明，同这些阶級异己分子混入革命政权的活动作残酷无情的斗爭，是苏維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件，是剝夺一切地主資产阶級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这种自由苏維埃仅只給予革命的民众，而不給予任何地主資产阶級分子。因为地主資产阶級分子必然的要利用这种自由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工具，剝夺这些分子的自由是絕对必要的，苏維埃之所以日益于巩

固，剝夺了这些阶級敌人的自由，減少了他們借以活动的机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鎮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苏維埃基于武裝民众的任务，建立了坚强的紅軍与广泛的地方部队，这是苏維埃直接依靠的鉄的力量，苏維埃依靠了他，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力，才能鎮压苏区內部的反革命活动。但是，苏維埃还有一个与此相連的鎮压反革命的重要的武器，这就是苏維埃法庭。苏維埃法庭直接依靠于武裝力量，依靠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依靠于人民的阶級斗爭，使苏区中一切反革命企图受到严厉的鎮压。数年来各个苏区中都发生了反革命的严重的活动，如中央苏区与湘贛苏区等处的AB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閩浙与閩贛等地的改組派，湘鄂贛的托陈取消派等，都曾經企图甚至已經实行他們的反革命暴动。但結果都受到苏維埃法庭的严厉的鎮压，克服了他們的暴动阴謀，巩固了苏維埃政权。在这一方面政治保卫局与苏維埃法庭已經聚集了丰富的經驗，糾正了过去許多地方沒有执行明确阶級路綫的錯誤。苏維埃法庭的群众化，即苏維埃法庭的制裁反革命应該同广大群众的肃反斗爭联系起来，現在也更加进步了，巡迴法庭的普遍使用就是証明。

总結起来看，苏維埃具备着对于广大民众的十分寬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同时就在这种民主主义中間构成了他絕大的权力——建筑于千百万工农民众坚固的信仰与自覚的需要之上的权力。苏維埃运用这种权力，形成了自己的专政，組織了革命战爭，組織了苏維埃法庭向着阶級敌人开展各方面的激烈的进攻，而苏維埃法庭則在苏維埃領土之內起了他鎮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的作用。

如果拿工农专政的苏維埃法庭与地主資产阶級专政的国民党法庭相比較，那又是一幅絕妙的图画。

苏維埃法庭以鎮压地主資产阶級为目的，对于工农分子的犯罪則一般处置从輕，国民党法庭以鎮压工农阶級为目的，对于地主資产阶級的犯罪則一般处置从輕，法庭的作用完全給政权的阶級性决定了。

苏維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鎮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維埃对于这些分子絕不应該有絲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經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迂，苏維埃中央政府已經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絕大的改革，而国民党法庭則至今充滿着中世紀慘无人道的酷刑。

苏維埃的监獄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与劳动紀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質。而国民党监獄則是純粹的封建野蛮的虐杀，法西斯蒂的酷刑，劳苦群众与革命者的人間地獄。

消灭敌对阶級的反革命阴謀，建立苏維埃領土內的革命秩序，而废除司法范围內一切野蛮封建的遺跡，这是苏維埃法庭的目的，苏維埃这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改革，同样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

四、苏維埃的劳动

其次說到苏維埃的劳动政策。

苏維埃在于他的政权的阶級性，基于武裝劳动民众以革命战爭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任务，必須坚决的发展工人的阶級斗爭，保証工人的日常利益，发展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組織工人的这种积极性到伟大的革命战爭中来，并且使工人成为革命战爭的积极导領者，

成为巩固与发展苏維埃政权的柱石，这就是苏維埃劳动政策的出发点。

在苏維埃劳动政策之下，工人的利益得到了完全的保护，他与过去的国民党統治时代及現在的国民党区域比較起来，眞有天堂地獄之别。

当着苏区还是国民党統治的时代，工人是在做僱主的奴隶，工作时間之长，工錢之少，待遇之残酷，工人地位之沒有任何法律保障，这是每个工人所永远不能忘記的。所有这些，在現在的国民党区域，不但是一样的存在着，而且变本加利了。最近的情形，白区工人的实际工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减工、裁工、关厂，則成为資本家进攻工人的普通方法。因此造成了广大的失业，单以产业工人說，失业人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切国民党統治区域，罢工是犯罪的行为，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公开宣布罢工者处死刑。一切工人与資本家的爭議，国民党无不是站在資本家方面向着工人压迫的。

但是，这些罪恶，在苏区中便一扫而空了。

苏維埃政权之下，工人是主人翁，工人領导着广大的农民担負了巩固苏維埃的伟大的責任。因此苏維埃的劳动政策的原則是保护工人阶級的利益，巩固与发展苏維埃的政权。根据这种原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頒布了劳动法，一九三三年加以修改，重新頒布。此次修改的劳动法，对于城市与乡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

現在苏区是一般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訂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在城市内与許多的乡村内已經普遍建立了劳动检查所与检查員，目的是检查僱主是否有违背苏維埃劳动法的行为。对于僱主犯法行为的制裁，則属于专門設立的法庭。为了防止資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操纵，为了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围剿"所造成的一部分失业工人，苏維埃垄断了劳动介紹权，一切資本家請工，必須到苏維埃設立的劳动介紹所去。失业救济机关的設立，現在也日益推广了，失业工人一般得到了具体的救济，农村工人又都分配了土地。社会保险制度是确立了，社会保险局已建立在苏区各个城市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絲毫不能得到的。然而苏維埃政权則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行乃是自己最大的責任。

由于苏維埃坚决执行自己的政策，苏区工人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首先是关于工資。苏区各地的实际工資，比較革命前，是一般的增加了。下面是汀洲的一个例子：（略）

从这个表看来，汀洲市工人的工資比战前最少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木匠），最多的竟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五十，即增加十四倍半（布业工人），这种惊人的增加，完全是反映了国民党时代的惊人的低落。当然汀洲工人的工資是比較其他苏区城市的工資要特别高一些（并且工人吃的伙食是在算内的），但是其他城市的工資也是增加了的，如瑞金城市的泥水木匠工人，在最近一时期，从革命前每日两角五分，增加至每日四角五分，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不但城市、农村中工資也增加了。……

工資的交付，一般都办到了按期付清，因为苏維埃的监督，僱主拖欠工資的事情是很少了。少数頑固的資本家，經过劳动法庭的裁判，也不敢与工人为难了。

关于法定工作时間——八小时制的实施，两年来在苏区的一切城市是普遍实現了。农村中的僱佣劳动者，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間也少有超过八小时。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僱佣劳动者的时間，是一般比較成年为少。

关于妇女及未成年人的保护，如同工同酬，产前产后休息，十四岁以下童工的禁止，也

是一般的实行了。

关于学徒的保护，则一般的縮短了学徒的年限，改良了学徒的待遇，扫除了对学徒的封建压迫。学徒的生活是相当的改善，学徒的工資是增加了（如江西方面，学徒每年至少有十五元的津貼，多的則有每月三元的）。

关于一般待遇，在城市中，特别在国家企业里，工人的卫生与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城市工人的伙食普遍是每月六元以上。农村工人的伙食，与僱主同等。

苏区工人是組織了坚强的阶級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維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維埃对于工会，在法律上保障了它的权利，因此工会会員极大的发展起来。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統計，現在苏区工会会員数，仅以中央苏区及其附近几个苏区計算，共有二十二万九千人，其分布：中央苏区十一万人，湘贛二万三千人，湘鄂贛四万人，閩浙贛二万五千人，閩贛六千人，閩北五千人，根据中央苏区的材料，沒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仅只有三千六百七十六人，不足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即是說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是加入工会了。一部分地方如兴国，加入工会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八。請問这是国民党区域能够梦見的事情吗？不但中国，全世界除苏联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有这种情形的？

总之，两年以来苏維埃的劳动法，已在苏区所有城市中实行了，乡村中也实現了他的主要条文。在两年当中，虽然遇到了不少的資本家富农对于劳动法的抵抗，但因工人群众的积极斗爭与苏維埃的严厉监督，使这种抵抗归于无效。同时对于独立生产者与中农貧农僱用工人，有时发生违犯劳动法的事情，則应該經过恳切的劝告使之明了而自动的拥护劳动法。因此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大大发揚起来，工人在革命战爭中在苏維埃建設中，是起了他的伟大的作用。

根据中央苏区公略、万太、龙岗、兴国、胜利、西江、雩都、寻鄔、上杭、宁化、长汀新泉十二县的統計，工会会員七万零五百八十人中，現在紅軍及游击队服务的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人，等于会員的百分之二十八。参加苏維埃等革命机关工作的六千七百五十二人，等于会員的百分之十；他们大部分是在苏維埃机关負責。以上两項共計二万六千七百一十二人，占会員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現在还在家的会員則为四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人。这十二县在家的工会会員，退还第二期公債四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元，最近购买經济建設公債十九万七千八百另三元，在家会員平均每人买了四元五角。在家会員現在是党团員的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五人，占在家会員总数百分之二十八。从这些統計，証明了工人群众积极的加入紅軍，参加与拥护革命战爭，拥护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些都是苏維埃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发揚了工人的积极性得来的，那些說工人在革命后沒有得到什么东西，說工人的积极性沒有发揚起来，只可算作完全的胡說。

五、苏維埃的土地革命

現在我们来說苏区的土地革命。

中国的苏維埃与紅軍，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級与国民党軍閥的残酷压迫剝削之下，只有土地革命才能解放他们。苏維埃的土地政策的原則，就在于完全推翻地主阶級与国民党軍閥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剝削与压迫。

一切过去及現在的国民党区域，农村中是吓人的地租（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吓人的高利貸（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与吓人的苛捐杂税（全国計一千七百余种之多），結果

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級与富农的手里，絕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境。因为土地上面的无情掠夺，农民失掉防禦災荒的能力，結果使水旱災荒遍于全国，一九三一年被災区域达八百另九县，被災人口达四千四百余万人。因为层层的被掠夺，农民缺乏再生产能力，許多耕地变得很瘠，許多簡直变成荒地，同时农民仅有的一点出产，又被帝国主义的农产物品傾銷所压倒，因此中国农村經济陷于完全的破产状态。农村中土地革命的火焰，就在这种基础上强有力的爆发起来了。

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蕩了一切封建的残跡，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地主阶級的全部土地財产，沒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貸，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第一次从地獄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的資格，这就是苏維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

第一次全苏大会頒布了土地法，使得全国土地問題的解决有了正确的依据。因为农村中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在分析阶級問題上发生了許多的爭論，人民委員会根据过去土地斗爭的經驗，作出了“关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决定”，将地主富农游民等許多問題給予了正确的解决，农村斗爭将更有力的发展起来。关于分配土地方法上面的許多問題，如象距离、肥瘠、青苗、山林、池塘等等，还急待收集各地經驗作成必要的决定，这在新区分配土地的領导上是非常的必要的。

为着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僱农貧农，中农的手里，中央政府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运动。根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統計，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贛三省共計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查出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亩，沒收地主現款与富农捐款共計六万另六千九百十六元。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揚起来了，僱农工会与貧农团成为苏維埃在农村中的柱石。三个月中期得到了如此伟大的成績，証明农村阶級斗爭还需要苏維埃予以充分地注意，而查田运动是繼續发展农村斗爭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有力的方法，也是完全証明了。

土地斗爭的阶級路綫，是依靠僱农貧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綫的正确应用，是保証土地斗爭胜利发展的关鍵，是苏維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因此苏維埃政府对于那些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錯誤傾向，是应該严厉的給予制裁，同时决不应該放松对于那些同地主富农图謀妥协的錯誤，土地斗爭才能走上正确的軌道。

土地革命斗爭的群众工作，两年以来得到了不少的經驗。总結其要点則为：（一）分配土地的运动与查田运动，均必須以全力去动員广大貧农中农以及农村工人群众，自己动手向着地主富农作斗爭。分田与查田的工作，都必須經过群众的同意。每一阶級成分的处理，必須通过于群众的会議中。苏維埃人員单独的少数人的进行分配土地与清查阶級，那便是有降低群众斗爭热情的危險。（二）沒收地主阶級土地以外的財产与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必須以大部分分配于貧苦的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做而归之于少数人員使用，那么也就要降低群众的情緒而有利于剝削分子的反抗。（三）土地的分配不宜在长期不定的状态之中，应当在相当短促的期間內分配妥当，使之固定在农民的手中。以后非有当地多数群众的要求，不应輕易再行分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违反农民的意見，不但影响农民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而

且同样将为剝削份子利用了去阻碍土地斗爭的发展。(四)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查剝削成分，而不是为了清查被剝削成分，因此不应該按家按亩去查，而应該动員最广大群众清查那些暗藏着的地主富农分子。(五)必須打击那些阻碍分田与查田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的同意之下用最严厉的办法处治他們，从逮捕监禁，群众公审直至枪决，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土地斗爭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六)应該极力发展阶級斗爭，而避免地方斗爭与姓族斗爭，地主阶級与富农，却是极力想拿地方斗爭与姓族斗爭来代替阶級斗爭以便阻碍土地革命的前进，苏維埃人員不应該去上地主富农的当。(七)土地革命的发展，依靠于农村基本群众的阶級覺悟与組織程度的提高，因此，苏維埃人員必須在农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必須健全貧农团与僱农工会的組織。

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由于苏維埃的領导与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苏区的农业生产在广大的地方是恢复了，有些并且更加发展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良。农民推翻了地主与国民党的剝削，生产結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現在农民的生活比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許多时候吃不飽飯，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粃，現在則一般不但沒有飢餓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現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現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那一种生活那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答复这个問題吧！

六、苏維埃的财政政策

再說苏維埃的财政政策。

苏維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証革命战爭的給养与供給，保証苏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但是有着广大的革命战費与革命工作費用的支出的苏維埃共和国，当他还是处在全国范围內的較小部分，又是一些經济比較落后的地方，并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許多外边人們竟不知道苏維埃财政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而国民党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数量的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弄到财政破产？

沒有什么奇怪，苏維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

苏維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級的与革命的原則之上。因此，苏維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剝削者进行沒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經济事业的发展。

所謂向封建剝削者沒收征发，即是向苏区与白区地主富农筹款，根据过去的經驗恰好相反：苏維埃把主要财政負担放在剝削者身上，国民党則把主要财政負担放在工农劳苦群众身上。

苏維埃的税收，是統一的累进税，現在簡单的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則，同样是重担归于剝削者。

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与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統制貨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在中国境內，只有苏維埃实行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一切貨物在边境税关納税之后通行全苏区，无第二次之征税，一扫国民党厘金关卡层层抽剝的虐政。

营业税即是商业所得税（工业税現在沒有收）按照商店資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統一的累进税，資本小盈余少的税輕，資本大盈余多的税重。資本在百元以下，群众的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品，这些都实行免税。

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的納税，同样是累进原則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輕，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貧农中农税輕，富农税重。僱农及紅軍家属免税，被災区域按災情輕重減税或免税。

苏維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税法，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所不敢采用或者不敢彻底采用的。至于国民党的税收，則是一篇絕大的糊涂賬。其税收原則是主要取之农民及其他小有产阶級。正税之外，有无数的附加税。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統計，国民党区域內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而四川的田賦預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賦比国民党未到时增加了二十五倍，这是国民党对于劳苦民众的“恩德”！

从发展国民經济来增加苏維埃財政的收入，是苏維埃財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驗已在閩浙贛苏区表現出来，在中央苏区也表現出来了。这一方面的着重的进行，是苏維埃財政机关与經济机关的責任。这里应該指出：国家銀行发行紙票的原則，应該根据于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絕对必需的。

至于財政的使用，应該根据节省的方法，应該使一切苏維埃人民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貪污浪費作坚决的斗爭，过去虽有了些成績，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节省每个銅板为着战爭与革命事业，是苏維埃会計制度的原則。苏維埃对于財政的使用，应該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絕对的差别。

苏維埃的財政不是沒有困难的，紅軍的扩大，战爭的发展，使苏維埃面前有着它財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开展我们的革命战爭，改善我们的苏維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財政收入，向着一切剝削份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維埃財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經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維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七、苏維埃的经济政策

（見《毛选》一卷《我们的經济政策》全文）

八、苏維埃的文化教育

現在要說到苏維埃的文化教育了。

为着革命战爭的胜利，为着苏維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員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爭，为着創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維埃必須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統治阶級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农的苏維埃文化。

誰都知道，国民党統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資产阶級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級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經費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軍費，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統治之下，造成了人民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則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份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獄，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誰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見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給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質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幫助。因为現在的苏維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內战爭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經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設了。

根据江西福建粵贛三省的統計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人，有識字組（此項只算到江西粵贛两省，福建未計）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組，組員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員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統計。

苏区中許多地方，学齡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齡儿童总数二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內男一万二千零七十六，女八千八百九十三），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零六人（內男八千八百二十五，女生三千九百八十一），失学的八千一六十三人，（內男生三千二百五十一，女生四千九百十二），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現在是用了大部分时間受教育，做游艺，只小分时間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組織在紅色儿童团之內，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見。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万另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識字組組員二万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女子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許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員会与識字委員会的委員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組織，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

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識字的办法有夜校，識字运动与識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識字組在群众的家里，識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領导識字运动的机关則为乡村的識字运动委員会。拿兴国来說，全县有一百三十个乡的識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識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分会下面的識字小組，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加入識字小組的組員。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規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該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間开展去。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紙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紙三十四种，其中如《紅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加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話》发行二万八千份，《斗爭》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銷二万七千一百份，《紅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証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創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

群众的紅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現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賽，而运动場則在許多地方都設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門教育的建設。但为了革命斗爭領导干部的創造，我们已設立了**红軍大学，苏維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領导下的許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門教育之应該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的应該成为教育計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識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資产阶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为苏維埃服务，这是苏維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視的一点。

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爭与阶級斗爭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履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导斗爭的高級干部。

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針与任务，只有在苏維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現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級斗爭极端尖銳的表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絕大的胜利。

九、苏維埃的婚姻制度

現在說苏維埃的婚姻制度。

为了解放妇女于野蛮封建的婚姻制度之下，为了实行眞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还在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中央执行委員会即頒布了苏維埃的婚姻条例，在这里，确定了結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两年来在一切苏維埃管理区域是一般的实行了这一法令，凡非亲族血統在五代以內，非神經病与危險性的传染病，男子年滿二十、女子年滿十八，經双方同意，并在乡苏与市苏举行登記，即可以实行結婚，离婚則只要男女一方提出要求，經过乡苏或市苏登記就行了。

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縛人类尤其是束縛女子的封建鎖鍊，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規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是，这一胜利，是附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之后的，因为工农劳苦群众婚姻制度的解放，必須首先推翻地主資产阶級的专政，实行土地革命，男女劳动群众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也有了經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苏区中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并且分配了土地和工作，所以新制度是能够完全的实行了。

因为数千年来婚姻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人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所以現时苏維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的給了男子負担。

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慣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規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認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給了特别的注意的。

这婚姻制度的实行，使苏維埃取得了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經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

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說，苏維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絕对相反的世界。

十、苏維埃的民族政策

最后，关于民族政策。

爭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繞于苏維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

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維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国內的許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纏回，甘肃回民，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都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軍閥的剝削和統治，国民党所謂"五族共和"只是欺騙人的鬼話，而且馮玉祥的屠杀甘肃回民，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賞賜"。另方面，少数民族自己內部的統治阶級，如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軍閥相結合，使这些民族的广大劳苦民众遭受更加利害的压迫与剝削，或者他们（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直接投降于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迅速的殖民地化这些区域（如西藏、內蒙）更进一步的掠夺民众，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現在生活的实質。

苏維埃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軍閥对于少数民族的統治与掠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在其頒布的宪法大綱的第十四条宣言：

"中华苏維埃政权，承認中国境內的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脫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內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維埃联邦，或者脫离苏維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中国苏維埃政权在現在必須努力，幫助这些弱小民族，使他们脫离帝国主义国民党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压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苏維埃政权应在这些民族中間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語"。

这是对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的响亮的回答，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及其苏維埃政府，不但自己正在用坚决的民族革命战爭以求脫离帝国主义的羈絆，而且号召国內一切弱小民族同时脫离中国統治阶級以及帝国主义的羈絆，直到这些民族的完全独立。不但如此，苏維埃宪法大綱第十五条又設：

"中国苏維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受到反动統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給以託庇苏維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幫助他们重新恢复斗爭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完全胜利为止"。

苏区的許多高丽、台湾与安南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安南与爪哇的代表出席，都証明了苏維埃这一宣言的眞实。

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眞誠地結合起来了。

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剝削，推翻这个民族剝剝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維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贊助中国苏維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責任。

从苏維埃政府所决定的这些政策和实施的这些成績来看，很明显的苏維埃中国內的民众已經得到了許多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政治上，經济上、社会生活上的解放和胜利，然而誰晓得，我们苏区目前所作的一切，还只不过是苏維埃革命伟大解放政綱的部分实現的开始，中华苏維埃共和国自始卽有一貫的明显的施政綱領和前途，苏維埃中央政府早已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明白宣言过，他要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統治，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新式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过着眞正的幸福的新生活，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現国家工业化政策，它将实現国家农业集体化，它将逐步实行完全有計划的国民經济，它将根本消灭失业痛苦，它将根本消除貧穷的現象，它将使人民享受优裕丰富的生

活，它将有不可战胜的国防力，它将有豁然独立的国际地位，它将使中国变成永远沒有人压迫和人剝削人的幸福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換句話說，今日社会主义胜利建設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华苏維埃共和国向前发展的活榜样！

（五）苏維埃在彻底粉碎六次“围剿”爭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当作我们說到了目前新的形势，說到了两年来苏維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爭，說到了苏維埃实施的基本政策的时候，就使我们得到一种确定的結論，即是說苏維埃运动是大踏步前进了。两年以来，苏維埃运动的胜利，明显地变动了敌我两方的力量，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动摇与崩溃，而苏維埃运动則在猛烈的发展中，革命的力量是更加壯大了，革命的陣地是更加巩固了。民族战爭与革命的国內战爭已在中国广大范围中开展着，紅軍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經确立了，苏維埃工作已經在各方面得到伟大的成績，苏維埃中央政府的集中領导不但在苏区树立了坚固的基础，而且在国民党統治区域成为广大民众的革命旗帜了，所有这些都已經成为現时生活实际，成为不可否認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了。

然而革命的前进，要求我们估計到另外一些情形，要求我们以深刻的自我批評精神检查革命的战綫中存在着的弱点，这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責任。

估計我们的弱点，首先必須明白，現在苏維埃已經胜利的区域虽然是很广大了，但在全国說来，則还是处在較为狹小的范围內，还是处在一些經济比較落后的地方。反革命还保存着他们的广大的区域，还占据着各个重要的城市。因此，苏維埃爭取全国胜利的任务是最严重地放在我们的肩上。日益加紧两个政权之間决死的斗爭，要求我们以极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个問題，而不容许絲毫的自满自足观念留存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也不容许表現任何微小的疲惫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两年中間，虽然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是广大的开展了，苏維埃中央政府对于运动的領导也有不少的成績，然而若拿了与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比較，与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严重任务相比較，則現时发展着的反帝斗爭力量，显然还是异常不够的。苏維埃还沒有采用更多的办法去发展广大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級覚悟，去組織民众的反帝斗爭，而且就在民众自发的反帝斗爭中，苏維埃政府直接的幫助与領导还是非常不充分。广大白色区域的工人反資产阶級的斗爭，农民反地主的斗爭，苏維埃还沒有充分的尽其組織与領导的責任。即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区域，也还未用最大力量去組織群众的斗爭，使这些区域造成迅速变为苏区的条件，使紅軍在这些区域作战得到群众更多的配合，特别是在白軍士兵中造成暴动响应紅軍的局面。

第三，紅軍的数量与質量，虽然是迅速扩大和增强了，但对于执行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軍事力量，爭取革命在全国胜利伟大任务上，倒还是相差很远。后方扩大紅軍的工作，还不能适应前綫的要求。赤卫軍，少先队的編制与訓練，在許多地方还是差得很。游击队的組織与行动，一般还是很不够的，优待紅軍家属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做得非常之不好，所有这些使得革命战爭的发展，还只限于过去的成績，使得我们每一次冲破敌人“围剿”之后，还不能乘胜直进，爭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第四，在一切为了战爭的任务下，我们还不能使一切苏維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爭的要求。这不論在土地斗爭方面，在經济建設方面，在財政方面，在肃反方面，以及在文化教

育方面，都有他的弱点的存在，指出其一般的弱点，即是說，革命战爭要求这些工作以很快的速度，爭取大的成績；然而在各地执行起来，都是參差不齐的。很多地方眞正达到了所謂很快速度和最大成績的标准，依靠了这些地方的工作，使革命战爭得到了很大的幫助，但在另一些地方，則不但工作进行非常之慢，甚至經过很长的时期，还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績，特别在有些新区与边区中間，那里的工作更加差些。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苏維埃机关中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甚至不愿意执行苏維埃法令政策的份子。这些份子当中，有些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有些簡直是地主資产阶級派遣进来的暗探。他们不是推进苏維埃的工作，而是妨障了苏維埃的工作。他们不使苏維埃工作服从战爭，而是使苏維埃工作离开战爭，他们不愿意去开展群众的斗爭，而使群众斗爭停頓起来。他们不曾对于广大群众的动員，不曾对于群众的說服教育，去执行苏維埃工作，而是用空談空喊，甚至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去执行苏維埃工作。他们不去了解下层的情形，不去教育新进的干部，不去听取群众的意見，而只是机会主义的誣蔑下級干部不好，那里的群众沒有革命积极性。在这些地方苏維埃的民主是沒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沒有吸收最广大群众来參加苏維埃的选举，沒有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分子来參加苏維埃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市乡代表会議制度，还沒有很好的建立，还沒有使苏維埃成为眞正广大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在这些原因之下，就使得許多苏維埃工作，在这些地方缺乏应有的成績，使他不能适应革命战爭的迫切要求。应該明白指出，这是苏維埃工作中間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所有这些弱点的存在，給了我们一种深刻的警覚：就是必須克服了这些弱点，苏維埃运动才能适应一切客观的有利条件，而采取更大規模向着更大范圍內发展去。

我们已經有了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成为我们发展的基础。但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们必須增加力量。

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圍剿”爭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必須号召全苏区全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众，坚决执行下列各个具体战斗任务。

一、在紅軍建设方面

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对于全国紅軍的領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紅軍的行动比較过去更加能够在統一战略意志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使各地方軍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領导之下充分的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

把扩大一百万鉄的紅軍的口号普遍的深入的传播到全苏区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号召群众在很短促的时間之內，为着实現这个最低限度的口号而斗爭。要使群众明白，摆在面前的苏維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間的决定胜負的战斗，苏維埃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直接广大的冲突，依靠我们数百万大紅軍的創立，因此一百万紅軍的首先創立，是苏維埃与每个工农群众神圣的責任。中央軍事委員会与各級地方苏維埃应該負責，收集两年尤其是去年紅五月以来，各地扩大紅軍的丰富經驗。着重的指出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級斗爭与苏維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紅軍与領导开小差的阶級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維埃优待紅軍战士及某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紅軍战士们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紅軍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紅軍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質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紅軍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紅軍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給，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紅軍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陰违的分子，应該受到苏維埃法律的裁判。

应該把巩固紅軍放在紅軍建設的重要地位，使紅軍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該更进一步提高紅軍战士的政治教育，使每个紅軍战士都自覚的为了苏維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紅軍成为苏維埃的宣传者与組織者，成为創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紅軍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間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紅軍的自覚的紀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証战爭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員制度，应該建立到一切紅軍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里面去。应該提拔更多的工人成为各級軍事的与政治的指揮員。紅軍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較过去更能訓練大批高級的与初級的軍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注意紅軍中战士的攷察，对于地主資产阶級分子混进紅軍中来破坏紅軍的企图，应該給予严重的打击。巩固紅軍使紅軍成为鉄軍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現时紅軍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軍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爭的規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軍队日益采用新的軍事技术的前面，对于我们是絕頂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軍事技术”的口号，应該深入到每个紅軍战士中去，紅軍学校应該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应該把赤卫軍少先队的新編制方法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紅軍后备軍与地方守卫部队的作用与責任，应該使每个赤少队員清楚的認識。义务兵役制在将来更大規模的国內战爭中的需要与作用，現在就应該向一切劳苦群众与赤少队員适当的宣传起来。应当用大力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軍事訓練与政治訓練，野营演习方法应当尽可能推广到一切地方的赤少队中間去。在敌人进攻与苏区剝削分子企图搗乱的情形之下，赤少队保卫地方的責任应該特别的加重，許多地方赤色戒严的松懈現象，应該給予迅速的糾正。动員模范赤少队整連整队的加入紅軍中去与动員之后立即重新編制起这些队伍来，是扩大紅軍最好的方法之一。与紅軍作战不可分离起而其伟大支队作用的，是新区边区以及白区中間的紅色游击队。加强和扩大現有的游击队，最广泛的繁殖新的游击队，收集过去游击战爭的丰富經驗，极大的加强游击战爭的教育与指导，把千百支游击队伸出白区去，伸出到敌人的側方与后方去，在这些地方袭敌击人，发展群众斗爭，創造游击区域，以致发展到創造新苏区，特别在尚未連成一片的各个苏区之間去做这些工作，与主力紅軍的行动互相配合起来，是苏維埃十分迫切的任务。

应該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紅軍的給养、供給与运輸，苏維埃的財政机关与經济机关，軍事系統中的供給运輸与卫生机关，应該为着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运輸队的动員，应該克服过去的弱点，使紅軍不致因缺乏运輸而妨碍了运动与作战。一切犧牲一切努力給予战爭，是每个苏維埃人員每个革命分子的責任。

二、在经济建设方面

为着冲破敌人封鎖，抵制奸商操縱，保証革命战爭的需要，改良苏区民众的生活，苏維埃必須有計划的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可能的經济建設。

首先是发展苏区广大的农业生产。苏維埃应該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应該乘着春耕夏耕秋收各个重要的农事季节，进行提高生产的普遍而广大的运动，动員整个农村民众一齐进入生产的战綫中。普遍組織劳动互助社与耕田队，有計划的調拨乡村劳动力，动員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是扩大生产的重要方法。应該領导幷帮助农民去解决耕牛农具肥料种子水利以及防止害虫等及农业上面的具体重要的問題。耕牛合作社应当普遍組織。根据去年春耕夏耕运动的經驗，“完全消灭荒田”，“增加今年二成收获”，应当成为战斗的口号。

应当收集种棉經驗，发展棉区的棉花生产。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牲畜的增殖，苏維埃应給予注意。某些重要农业部門如粮食棉花等，中央国民經济人民委員部及各省国民經济部，应当作出具体的实施的計划。苏維埃粮食部、粮食調剂局与群众粮食合作社，应当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全保証紅軍与民众的粮食供給而努力。

苏区广大手工业的恢复，軍事必須工业的建立，是苏維埃經济建設的重要任务。苏維埃恢复与发展工业的計划，应当放在战爭需要，苏区民众需要，以及白区出口的可能基础之上。鎢砂、煤、鉄、石灰、农具、黃烟、紙、布匹、糖、葯材、硝盐、樟脑、木材等項，应当是主要部門。应該用极大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工业的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将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与农民，尽量組織到生产合作社来。同时应該容許并奖励私人資本家的投資，扩大苏区的这些生产。苏維埃在目前不应当企图垄断所有的生产事业，但創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則是可以而且应当的。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賽，奖励生产战綫上的成績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打破敌人的經济封鎖，发展苏区的对外貿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鎢砂、木材、烟、紙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換，是发展国民經济的枢紐。苏維埃对外貿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須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輸出与輸入各种必要商品而努力。而普遍的发展消費合作社，把广大工农群众組織在这种合作社內，使群众能够廉价的买进白区的必需品，高价的卖出苏区的生产品，則在苏維埃貿易与整个經济建設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苏維埃对于消費合作社、中央总社与各省总社的領导，应当极大的加强起来。还沒有建立省县总社的地方，应当迅速的建立。

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資本，把他们組織在生产的消費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內，应該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貸資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經过經济建設公債及銀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資本吸收到建設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貿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应該在苏維埃法律范围以內，尽量鼓励私人資本家的投資，使苏区資本更加活泼。应該尽量发揮苏維埃銀行的作用，按照市場需要的原則，发行适当数目的紙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貸款給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計划的調剂整个苏区金融，領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爭，这些都是銀行的任务。

三、在苏維埃建设方面

苏維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維埃运动得着总的領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絕大的意义。两年以来，在領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爭中間，得到了光荣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該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組織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許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領导，必須使中央执行委員会与人民委員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須健全中央执行委員会主席团的組織与工作，必須充实各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須增設必要的人民委員部即如粮食委員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揮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省苏維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領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維埃之間的連鎖，必須极大的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領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間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严密检查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須积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須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討論，精确分工与个人負責的制度。加紧对于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极力糾正过去有些省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現象。

乡苏市苏是苏維埃的基本組織，因此用极大努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必須在一切尚未建立代表会議制度的地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必須进一步加强各地代表会議的工作，应議設立他的主席团。应該設立他的許多委員会，并把委員会制度建立到村里去，吸收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委員会的工作。应該建立每个代表与一定数目的居民发生关系的制度。应該建立主任制，每个村里要有一个主持全村工作的代表主任，应該准許他能够召集一村的代表与居民去开討論村中工作的会議。乡苏与市苏是动員群众执行苏維埃工作的直接的負責机关，他的工作中心是如何向最健全地最充分地动員全市全乡的民众，为着苏維埃的每一任务每一工作的完滿实現而斗爭。乡苏与市区苏維埃必須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須对于各村与各街道的工作，实行定期檢查制度。各村或各街道之間的革命工作竞賽，是爭取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乡苏与市区苏維埃切实而迅速的改善，依靠于区苏与市苏正确具体的領导。区苏市苏的注意力应該全部放在各个乡苏各个市区苏維埃的工作改善上面。充分地解释，頻繁的巡視，切实的檢查，与民众中間的考驗，是区苏市苏領导方法的要点。县苏对于区苏工作的考查，也应該以这些为标准。

各省苏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极力地投到新开辟的苏区去，把在新区建立并加强革命委員会的工作，看成自己重要的职务。革命委員会的組織形式与工作内容，都与市乡苏維埃有許組不同，一切白色区域变为苏維埃区域，經过革命委員会的过程。因此，健全革命委員会的多織与工作，使革命委員会能够負担起来武装民众、发动民众斗爭，肅清反动势力，迅速轉变到建立苏維埃政权，是各省苏区各新边区区县苏应該极大的注意的。

苏維埃的民主虽然发展了，但应該指出許多地方还是异常不够的。必須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把那些遮塞在苏維埃与民众之間的废物拔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維埃人員应該从对于民众的动員对于民众的說服去执行苏維埃工作，而不应該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維埃工作。苏維埃人員应該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議，而不应該忽視这些要求与提議。苏維埃人員特别是工农檢查委員会，应吸收广大民众对于存在在苏維埃机关中的不良份子，开展广大的批評斗爭，直至用苏維埃法律严厉制裁他们。保証苏維埃与民众中間良好的联系。为了健全苏維埃的成份，必須实行苏維埃选举的群众化。必須向群众解释选举的意义，吸引最广大选民来参加选举。在选举中絕对的屏除那些阶級异己分子，貪污浪費与官僚主义分子。选举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来管理国家工作。在这里，依照选举法的規定，引进大批工人干部，加强工人在苏維埃政权中的領导地位，是健全苏維埃工作的重要关节。为了苏維埃工作的群众化，苏維埃必須与工会、貧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經过这些团体去动員广大民众，执行苏維埃的工作。

为了爭取苏維埃工作的速度与質量，使一切苏維埃工作适合于革命战爭的要求，必須用极大的力量除掉苏維埃工作人員中間的松懈不紧张的現象。絕大的提高苏維埃人員的工作热忱，使每个工作人員都自覺的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作而努力，同时必須森严工作紀律，一切对于工作不积极，疏忽与废弛职务，把苏維埃工作放在不要紧的位置等等的分子，应該向之作严厉的斗爭，直至开除他们的工作。必須反对貪污浪費現象，因为这种現象，不但是苏維埃財政經济的損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維埃工作人員，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必須把“一切工作服从战爭”“爭取工作的速度与質量”的口号提到全部苏維埃人

員的前面去，在这一方面，各級苏維埃的主要負責人，特別是工农检查委員会，应該对于苏維埃工作人員，进行充分說服教育工作。

应該把苏維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維埃人員的肩上去，应把違反苏維埃法令政策的行为，首先是苏維埃人員自己的違反放在严励責罰的地位。

必須充分执行劳动法，把劳动法的每一条文解释給广大工人群众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最低工資的規定，是保証工人利益的中心与起碼的部分。劳动检查所与劳动法庭，必須使之起完全的作用。必須向着那些忽視工人利益而企图与資本家妥协的人員作坚决的斗爭。必須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具体的与及时的救济，失业救济委員会必須在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組織起来。社会保險制度，必須在一切可能实行的地方眞实的实行。必須給予社会保險局的工作以应有的注意，必須避免过去有些地方对于保險金支配上的錯誤。为了这些工作的充分执行，应該把苏維埃劳动部健全起来，劳动部与工会之間应該发生密切的关系。

充分的实行土地法，实行关于土地斗爭的一切法令，向着全国范围开展广大的土地革命，这是苏維埃中心任务之一。沒收地主阶級和大私有者土地的斗爭，应該着重地猛烈的使之在一切新收入的苏維埃版图中开展起来。应該收集过去土地分配方法的許多經驗，普遍应用到一切新区去。应該把查田运动开展到一切土地問題尚未彻底解决的地方去，把那些地方封建残余势力給以迅速的肅清。土地斗爭中正确的阶級路綫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保証土地革命彻底胜利的先决条件。

执行苏維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維埃領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爭中动員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維埃的重要任务。

苏維埃制裁剝削分子及鎮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必須坚决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苏維埃法庭，必須提高自己的警覚性，对于反苏維埃法令的剝削阶級分子，及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与鎮压。在这里政治保卫局工作与苏維埃法庭群众化，动員广大群众参加肅反斗爭，是非常必要的。

爭取苏維埃工作的速度与質量，使一切苏維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爭的要求，这是苏維埃工作的总方向。

四、关于領导反帝斗爭与白区工作

为了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猛烈的发展全国工农斗爭，为了使苏維埃区域扩大到全国去，苏維埃政府必須加强对于全国反帝斗爭与国民党区域工农革命斗爭的領导。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放纵了帝国主义的强盜侵略，就是延长了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寿命，就是限制了苏区发展的速度与范围。苏維埃中央政府及各省苏維埃，必須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广大的国民党区域去，不但要領导每一个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而且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小資产阶級群众中間，利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每一具体事实，启发群众的民族覚悟与阶級覚悟，号召他们組織与武装起来，为驅逐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領土而斗爭，特別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組織人民革命軍义勇軍，領导旧有的义勇軍，使之脫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苏維埃政府对于工人的每一反帝罢工，农民以及小資产阶級每一反帝斗爭，必須尽可能的給予精神上与物質上的幫助。

对于国民党区域工人反資产阶級的斗爭，农民反地主的斗爭，一切革命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国党的群众斗爭，苏維埃政府必須用一切办法去組織、去援助、去領导。一切苏維埃人員应該明白，要想把苏維埃运动发展到全国去，要想把比較苏区庞大若干倍的国民党区域造成轉变为苏区的条件，要想創造新苏区，要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規模的"围剿"中間能够得到白区群众的援助，必須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必須从苏区派遣人員，准备一切必須的物質幫助，去組織与領导白区群众斗爭。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对于扩大苏区与发展革命战爭的消极。特别是苏区附近的国民党区域，这些地方的群众受苏維埃的影响最大，受国民党軍事奴役食盐公卖等等的压迫最甚。苏維埃尤其是各个省苏及边县苏区政府，必須利用各种时机取得与这些群众的联系，組織他们的日常斗爭，发展到游击战爭，到群众暴动，到建立苏区与老苏区联結一片。在这里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帶的工作，应該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帶苏維埃（或革命委員会）与游击队，必須完全遵守苏維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級乱打土豪的行为。沒收地主阶級及反动派的財物，必須大量的发給当地群众。此外关于赤白对立問題、逃跑群众問題、食盐封鎖問題，被难群众問題等，必須根据阶級的与群众路綫，很好的給予解决。必須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交界地帶工作的改善，是爭取白区变为苏区的重要关节。

同志们！我们苏維埃和紅軍，正在担負着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重大責任，我们要完成这个責任，就必須完成苏維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和規定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都知道：中国苏維埃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四万万中国民众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脫离帝国主义鎖鍊的先导，是給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計划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从东方战綫上进攻苏联的計划受到摧毀，是使世界无产阶級革命胜利的时期大大的縮短逼近，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

同志们！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演講完，随着雷鳴一样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欢迎毛泽东同志！欢唱国际歌）

結　　論

（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关于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員会及人民委員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同志们已經討論了两天了，昨天的分組会，今天的大会，在这两天中間同志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見，从各方面发揮了我们工作中的經驗与教訓，总括起来对于我的报告可以說是一致承認的。对于目前的形势，对于从这一形势产生的任务，对于两年来苏維埃政策的各方面的实施，以及对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在昨天今天同志们的討論中一般是同意了我的报告，同志们的发言，一般都是非常正确，这是应該首先指出的。

但在昨天今天两天的討論中間，主要是在昨天的分組会中間，有个别同志的发言包含着不正确的观点，我也应該在結論中指出。这里主要是关于"围剿"的意見。关于这个問題大多数同志都承認我在报告中說的：我们是取得了对于六次"围剿"的第一步綫利，但是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却还是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号召广大群众，团結一切力量，爭取对于六次"围剿"最后决战的胜利，是我们当前的最严重任务。因此在討論中間有同志說："六

次围剿已經完全粉碎了”，这种意見显然是不对的。又有同志說：“六次围剿我们仅在准备粉碎中。”这种意見也是不对的。照前一說法，是过分估計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維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輕輕取消了，而实际上，蔣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計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險的。照后一种說，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紅軍从艰苦战爭中已經給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經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彻底粉碎六次“围剿”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績估計不足，同样是很危險的。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謂人民革命政府，說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見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經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現，是反动統治阶級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搞的一个欺騙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覚到苏維埃是他们的仇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又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騙民众，沒有眞正革命意义，現在的事实已經証明了。

关于婚姻問題，我在报告中曾經說到男女两方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苏維埃政府应該准許离婚。但应該指出紅軍家属是例外。为了巩固紅軍战士的战斗决心，中央政府曾經規定，紅軍战士之妻要求离婚，必須取得其夫同意，只有在两年內还得不到丈夫音信，才可以由妻子一方提出离婚。关于結婚的年龄問題，不少同志主张降低，这种意見，我覚得是不妥当的。为了种族的与阶級的利益，結婚年龄不应該低于男二十，女十八以下。应該明白早婚是极大害处的。同志们！要耐煩一下子啊！（全場轟笑）以前在地主資产阶級統治之下，貧苦工农有到四五十岁还不能結婚的，为什么現在一两年都等不及呢？（全場又大笑）

以上是我的結論的一部分，但是結論主要部分还在下面※。

※主要部分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原載《苏維埃中国》，一九五七年中国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会翻印第235——305頁）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圍剿”的总結决議※

——遵义会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議通过

※本文的第一至第八部分編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册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問題上，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的了解也是錯誤的。必須明白中国国內战爭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爭，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爭，苏維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該从防御轉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爭及五次战爭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暫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轉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爭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則。但同时必須了解另一个原則，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須极力爭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現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針，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須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針，打破敌人这种計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間之內取得决定的胜利，

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軍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較（即所謂同敌人拚消耗，見××同志紅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錯誤的。在这些方面現时我们正处在絕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較只能証明相反的結論，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沒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爭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謹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計划。五次战爭中单純防御战略是根本錯誤的，在这种錯誤战略之下，进行許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錯誤的，紅軍一定要避免那种沒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絕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爭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給予紅軍以必須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訓練的时間，这是爭取战爭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爭中沒有休息訓練的可能的說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純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結論。以为紅軍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經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訓練，也是不对的，須知沒有必要的休息和訓練，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紅軍的編制**，一定要适合現时国内战爭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許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該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訓練又无战斗經驗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該使新兵师团中有老軍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揮之下，訓練出战斗經驗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輕的組織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該是尽可能的輕装，必須充实連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領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爭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須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論。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紅軍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級武装的特質，是革命战爭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換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須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眞正的保卫苏区。沒有坚强的紅軍，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紅軍，即使苏区暫时遭到部分的損失，也終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紅紅軍才能創造出来。

在战爭持久战的原則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緒与过高估計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頓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轉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紅軍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过分估計与对敌人力量估計不足所产生的冒險主义。这种冒險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經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紅軍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紅軍扩大苏区爭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顧，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継續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錯誤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問題上即在敌人两次“围剿”之間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則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緒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成不胜就認为沒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內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傾向**。速决战是

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領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轉入反攻与进攻，是我們粉碎敌人“围剿”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鍵，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綫，同十九路軍訂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軍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蔣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談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針，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軍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鍵之一。相反的以为紅軍繼續在东綫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的側后方是等于幫助了十九路軍，因此把紅軍主力西調劳而无功的的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貴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軍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軍事上突击蔣介石的側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軍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騙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詞来維持地主資产阶級的統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現給在十九路軍欺騙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别派反日反蔣的斗爭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軍軍閥的欺騙，在共同反日反蔣的战爭中，爭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軍事上采取与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鍵上不失去消灭蔣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沒有的。然而在我们軍事上沒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使自己轉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轉变与实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样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首先应該說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繼續在内綫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經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沒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間，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轉变我们的战略方針，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轉入反攻，粉碎“围剿”，創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經这样的指出：“动員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說到对苏区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討論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議案时，关于斗爭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紅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时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針显然也是錯誤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計划”上，根本沒有提出这一問題。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計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問題，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計划的基本原則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針相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爭，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的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計划基本原則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問題，完全忽視。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針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錯誤，再加上陣地战的发揚，給了紅軍以很大的損害。这种一方面預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卫

中央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純防御路綫的領导者到了轉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現。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圍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轉变不但沒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紅軍指战員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認为不是重要的問題。在主力紅軍方面，从苏区轉移到白区去，从陣地战場轉移到运动战場去，不給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頓訓練，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問題，始終密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錯誤。庞大的軍委縱队及各軍团后方部的組織，使行軍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緩，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記了紅軍的战略轉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記了紅軍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許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特别战略方針不放在爭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則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經常处于被动地位，經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沒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然常說“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經常是“避战”。就使得紅軍士气不能发揚，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減員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爭取眞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紅軍战略轉变，迫使敌人轉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計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針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結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錯誤观点出发，即是說紅軍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則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縱队），就在他們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錯誤观点的来源，則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許我們这样簡单地輕巧地尽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計。殊不知这种簡单的輕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紅軍的巨大战略的轉移則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該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則是不应該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紅軍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軍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經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針。紅軍到了烏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轉入反轉消灭蔣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見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謂土匪的任务。虽則最后两次錯誤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糾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則适足表現其战略上一貫的机会主义的傾向。

单純防御路綫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一切事实証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单純防御路綫，是我們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綫来为軍事上的錯誤路綫做辯护

（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这种軍事上的单純防御路綫，是一种具体的**右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保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計，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紅軍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爭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反对軍事上的单純防御路綫的斗爭，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这种斗爭在全党内应該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爭轉变为无原則的个人糾紛的企图，必須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領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軍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軍委的集体領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对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揮員的机断专行与創造性是被扼杀了。在轉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許多宝貴經驗与教訓完全抛弃，并謂之为“游击主义”，虽是軍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見，而且曾經发生过許多剧烈的爭論，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軍委内部极不經常的現象。

同时政治局更認为过去书記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軍委領导是非常不够。书記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紅軍与保障紅軍的物質供給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績，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則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責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們沒有清楚的了解，战爭的指揮問題，关系战爭胜負的全局。战爭指揮的錯誤，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績化为烏有。政治局对于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自己应該承認的，书記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該負更多的責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計划是經过书記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議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导軍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揮上所犯的路綫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内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时的去糾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錯誤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負主要的責任，而××同志在他的結論中对于絕大多数同志的批評与自己的錯誤是沒有承認的。必須指出，这种錯誤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綫的錯誤，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錯誤。但这一錯誤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則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綫的錯誤。

政治局扩大会議認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創造新苏区，必須彻底糾正过去軍事領导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認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軍事上的錯誤領导使我們沒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使我們主力紅軍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損失，然而我們英勇的紅軍主力依然存在着，我們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們有着党的正确領导，我們有着物質上地形上的比較良好的地方，我們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团的胜利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揮，我們相信，这些困难，在我們全体同志与紅軍指战員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們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蔣介石几年經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沒有了，軍閥内部的矛盾与不統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們主要的敌人蔣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經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

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維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維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維埃政权而斗爭。这些都是我們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創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揚全国苏維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須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紅軍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軍閥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們。我們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紅軍現在是在云南貴州地区，这里沒有現存的苏区而要我們重新去創造，我們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創造，不經过血战是不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蔣这些敌人的軍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紅軍的行动，須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爭的基本原則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則必須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則。紅軍运动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陣地战相当的減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紅軍各級指揮員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陣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轉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員尤其是新战士，則須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須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証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紅軍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肅自己的紀律，紅軍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須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紅軍应該是苏維埃的宣传者与組織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紅軍的領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問題。

白区党的工作，必須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爭的領导方式，必須有彻底的轉变。瓦解白軍工作必須眞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爭，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贛湘鄂贛苏区与閩浙贛苏区，党必須坚持对游击战爭的領导，轉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軍团及四方面軍必須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們的領导，以求得全国紅軍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議相信放在我們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們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爭的新的胜利的保証。新的革命战爭的胜利，将使我們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創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們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紅軍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爭轉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議相信，中国苏維埃革命有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贛苏区与閩浙贛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維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絲毫也不足以使我們对于中国苏維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暫时停止苏維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軍团与四方面軍的胜利，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內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爭，証明整个中国苏維埃革命正这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議指出过去党在軍事領导上的錯誤，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綫說来不过是个部分的錯誤。这种錯誤不足以使我們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錯誤，从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領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議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維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純防御路綫。政治局扩大会議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結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綫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們的。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軍的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議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儿盖会議）

一、目前形势与特点

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領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經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災荒，农村經济的崩溃与毀灭，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不能消灭或暫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地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統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

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爭是繼續存在的，虽然許多斗爭往往带着自然性，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爭，然而这种斗爭是普遍地蘊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来的形势。

苏維埃革命行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暫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到部分損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爭是繼續坚持着。湘贛与福建沿海的紅軍得到許多胜利。紅二六軍团击破了陈渠珍一路之后，現在又消灭了张振汉一路，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及二十九軍在川、陝、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軍两大主力在川南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維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說明了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証明苏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发展着。

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仇恨与疯狂，向着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爭尤其是苏維埃革命进攻。国民党反动統治力量的絕对的削弱，促使它以更大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地出卖中国，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揮下，进攻苏維埃革命。一、四方面軍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軍閥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圍攻苏維埃与紅軍的斗爭。有計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鎖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內，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蔣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針。

但是敌人向我们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軍事政治經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給养的困难，內部的不統一与冲突減員、疲劳、冻餓、不滿意，与失敗情緒的滋长，財政支出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爭，各地苏維埃紅軍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軍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由于一、四方面軍的会合，革命战爭經驗的交換，指揮的統一，紅軍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也增加了，一、四方面軍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爭，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爭进一步的尖銳化，使共产党苏維埃紅軍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統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級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維埃与紅軍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領导与适当的战略战术方針，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創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二、一、四方面軍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一、四方面軍会合后，大大的增强了苏維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維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六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曾經决定："在一、四方面軍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創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維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爭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一决定无疑的是正确的。

創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紅軍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維埃国家的領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爭。它的模范的作用，給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經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結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紅軍基本的严重的責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創造出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蔣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鎖，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創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創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和牺牲去爭取革命战爭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爭的最高利益，才能創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維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必須深入农民土地斗爭，彻底解决土地問題，必須經过革命委員会的阶段建立眞正工农民众的苏維埃政权，必須普遍建立赤卫軍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等民众自卫的武装，必須严厉鎮压反革命，要使反革命統治区域变为眞正革命的苏維埃区域，必須坚持地执行上述各項政策。

三、加强党在紅軍中的領导

为了創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絕对領导，提高党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紅軍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絕对的領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沒有中国共产党就沒有中国工农紅軍，就沒有苏維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軍会合后，紅軍中的个别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軍的减員，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錯誤和弱点，而認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綫的不正确，这种意見是完全錯誤的，但政治局認为对于其它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給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开的）在他的决議案中曾經清楚的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报告的环境之下，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綫，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傾向与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間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轉变，得到許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路綫斗爭中坚强的鍛練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維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維克化的道路。"必須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議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議重审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綫的正确：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計，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爭，証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綫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領导之下，在动員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扩大会議同时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使主力紅軍退出苏区，受到損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軍事上犯了单純防禦的錯誤。这种軍事上的錯誤，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的政治路綫說来是个别的錯誤，即对于这一錯誤的

主要負責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綫的錯誤而是部分的严重的錯誤。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議糾正了党中央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以后，在軍事領导上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軍在遵义会議后得到了許多伟大的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預定的战略方針。

必須使每一个同志清楚的了解，党的总路綫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計了中国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是否正确的估計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並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軍事指揮問題是这許多問題中的一个問題，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論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在軍事問題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錯誤，那这一錯誤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錯誤，虽是严重的政治錯誤。

关于一方面軍的減員的原因，党在遵义会議上已經在全党内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評。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錯誤沒有絲毫的隐蔽。遵义会議后党在軍事指揮上固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实际工作中还有某些弱点，是沒有問題的。这里应該特别指出的，是部队中政治工作的薄弱，首先是总政治部沒有尽一切可能給下级政治部以适时的指示与推动，使下级政治部得不到坚强的領导。反右傾的斗爭沒有很大的开展起来。在一、四方面軍会合后，沒有利用机会来及时整頓一方面軍。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錯誤誤解为全部的錯誤，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誤解为路綫的錯誤，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給以应有的估計，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誤解，党必須給以及时的解释与糾正，使全体党員与紅軍指战員象一个人一样团結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一、四方面军般兄弟的团结

一、四方面軍的兄弟的团結，是完成創造川甘陝苏区，建立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軍团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对于紅軍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軍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問題，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一、四方軍的正确的估計。

一方面軍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蔣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軍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沒有休息的长途行軍，历尽艰难困苦与飢餓寒冷，然而一方面軍的全体指战員，在党中央与軍委領导之下，始終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蔣介石等軍閥的許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烏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軍会合的預定目的，使蔣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計划完全失敗。

然而这絲毫也不能否認一方面軍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給予他的損失。一方面軍在脫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的減員（遵义会議前軍事領导的錯誤負最大的責任），即在質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間的缺乏，更由于政治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損失。这表現在：部队組織的松懈，紀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傾向与軍閥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負責任以及右傾的悲观失望的情緒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的削弱，不看到一方面軍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軍过左或过右的估計。过左的估計可以掩盖目前

必須整頓的部队，加紧反右傾的斗爭，严禁紀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計則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軍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軍的同志应該以最大的努力整頓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軍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間与补充扩大，完全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員与部分損失而气餒。而四方面軍的同志应該給一方面軍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幫助。

四方面軍的党的領导在基本路綫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綫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創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許多次战爭的伟大的胜利，創造了鄂豫皖与南巴赤区，四方面軍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紀律等許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緒，是現在一方面軍应該学习的。但四方面决不应該以此自滿，而应更加发揚自己的特长，应吸收一方面軍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紅軍建設方面所有丰富的經驗。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鉄的工农紅軍。

必須使一、四方面軍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軍都是中国工农紅軍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領导的。在我们中間只有阶級的友爱和互助而沒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軍的团結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敌人。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針

一、四方面軍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紅軍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脫离关系，因此爭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維埃政府領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維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无条件的承認他們省民族自决权，卽在政治上有随意脫离压迫民族卽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維埃政府在实际上幫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內奸卖国賊、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剝削阶級。

估計到少数民族中阶級分化程度与社会經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用苏維埃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爭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統一战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級斗爭深入的阶段中，則可采取組織工农苏維埃或劳动苏維埃的形式。一般的組織工农民主专政苏維埃是不适当的。

在一、四方面軍沒有会合以前，四方面軍在幫助番民組織游击队，在建立革命政权上，发动番民內部的阶級斗爭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績。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維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因为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針，应首先幫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爭，并給这种斗爭以具体的实际的幫助。在他们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則可以而且应該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則，同中华苏維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眞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結的中华苏維埃联邦，在这个时候，联邦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在許多其它問題上，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問題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論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針与路綫，学习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

六、目前的中心工作

为了創造川陝甘新苏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应該是：

（一）立即在一、四方面軍中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緒，胜利信心，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准备大量消灭当前敌人，取得北进战略中各个战役的完全胜利，以实現党中央的战略方針。

（二）利用幷爭取时間整頓部队，进行軍事政治的教育訓練，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三）为了加强紅軍党的領导，必須使政治委員制度更加确定，加强紅軍中党的組織及政治部的工作，把政治工作的重点深入到連队与支部中去。

（四）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軍的紀律，必須采取严厉办法保障紀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軍的同志了解紅軍的紀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級的覚悟。极大发揚党員間与紅軍指战員間阶級友爱与服从紀律的精神。

（五）加紧对于全体党員与紅軍指战員間的基本的阶級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苏維埃革命斗爭到底，設立紅軍大学与高級党校，大批培养軍事的与政治的干部。

（六）番民中的工作必須有迅速的轉变。总政治部应收集各地番地工作的經驗与教訓，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办法爭取番民群众回家，組織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爭，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必須挑选一部分优秀的番民給以阶級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紅軍主力到甘陝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須作更大的努力。

（七）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該有計划的开始，发动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爭与游击战爭，响应与配合紅軍的行动，創造游击区与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党中央必須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陝甘三者白区党的領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中的斗爭，应該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及新的有利的环境中极力加强自己組織与領导的力量。

（八）必須立刻开始白軍中的士兵的工作，以瓦解国民党的部队。当地白軍工作委員会，必須广泛的×××工作組以×××的材料（××軍委标語）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簡单指示，使每个紅軍指战員了解瓦解白軍工作××××部，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軍工作。（原稿如此）

（九）必須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軍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眞正集中地方与游击战爭的領导。要使这个地区成为川陝甘苏区之一部，紅軍到达陝北后，須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

（十）建立保卫局的組織系統，加强同反革命的斗爭。

（十一）吸收四方面軍党的最好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它軍事政治机关的負責工作。

（十二）采取必要方法，加强对于其他苏区与游击区的領导，使各方面的行动更能取得互相的呼应与配合。

七、苏維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爭

在創建川陝甘新苏区的过程中，我们必須要碰到許多困难，敌人决不放松我们，他必将加强他的战斗力向我们进攻，同时高山河流草地……必会給我们許多困难。虽然如此，只要我们执行党中央路綫，发揚我们的創造精神，我们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必須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

估計，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內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估計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現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針表現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創造新根据地沒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沒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現在对于一、四方面軍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軍会合的伟大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現在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負責任与自暴自弃，这种动摇更表現在对于目前时局估計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維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这些右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这对于創建根据地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險。开展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是当前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斗爭中，必須向每一个党員与紅軍指战員細心的解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胜利的前途，使他们确信苏維埃革命現在虽是遭遇到一些困难，但苏維埃革命必然要胜利。必須使反傾向的斗爭同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的轉变密切的联系起来，必須在反傾向斗爭中加紧肃反的工作，反对任何对反革命活动的放任和寬恕。

在反右傾的斗爭中絲毫也不要放松“左”傾的空談，这种“左”傾的具体于以“吹牛皮”来代替敌我力量的正确的分析。因此便仍然造成对目前形势的过“左”的估計，这种“左”的估計的結果，或者走到輕敌的冒險主义，或者掩盖自己惧怕敌人的“右”傾机会主义实質。

党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員与紅軍指战員，冷靜的来估計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計，才能使我们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眞理而反对欺騙。

因为两条路綫的斗爭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全体党員与紅軍指战員，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完成他们所担負的历史任务，只有对于不可救葯的机会主义者，党才迟疑的采取紀律的制裁。

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确信，一、四方面軍在党中央及軍委領导之下，我们必然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創造川陝甘西北苏区，取得苏維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吳旗打給林彪同志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林、聶、李、邓：

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騎兵团全部击溃、繳获正清查中。

二、敌毛炳文軍主力尚在什里舖至德城之綫及其以东地区，距我約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騎各一团則距我較近，鎮鉄城則有奉軍一部。

三、我軍坚决准备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得整理之目的。明二十二日：

甲，一縱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帶宿营，派部队向两川上游偵察。

乙，二縱队在楊城子及吳旗鎮原地休息，派部队向头道川上游偵察。

丙，三縱队在宁色川原地休息。

丁，支队直属队在吳旗鎮。

四、准备二十二日再休息一天。

五，加紧筹足三天粮食。

六，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訓令。

毛　廿一日十时

林、聶：

我们率二十三分队到二道川口两端十金处之刘河湾，战斗情况如何望告，廿分队留吳旗鎮。

毛　廿一日十三时半

林、聶：

一、明廿二日在吳起鎮附近休息一天，一縱队在二道川、三道川、縱队部駐地。

二、第二縱队在吳起鎮，楊城子支队部，在吳起鎮各加足准备二三天粮食。

毛　廿一日十八时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革命軍、东北义勇軍、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繼东北四省之后，現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淪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盜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併吞东北四省之后，現在又在併吞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了。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中国海陆空軍与全国人民总动員，开展神圣的反日民族革命战爭，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賊，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曾經不断喚醒全国人民团結起来对日作战，曾經派遣了自己紅軍主力，經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現在情形更加迫紧了，現在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枪出枪，有知識出知識，大家团結，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是愿意抗日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訂立抗日作战协定，而且更进一步的組織抗日联軍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軍与国防政府，我们認为应該有以下的十大綱領：

（一）沒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的經費。

（二）沒收卖国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給工农及災民难民。

（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員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現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識分子。

（九）联合朝鮮、××、日本国內的工农及一切反日的力量，結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誼关系。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現这一主张，則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原載《湖南現代革命史料汇集》第三册）

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講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黃埔軍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領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我们的“紅大”就要繼承着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还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那就是要爭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关于抗日救国的佈告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四年以来，我国失地八百万方公里，东北四省淪亡以后，华北五省也名存实亡，現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宁夏和阿拉善旗設立特务机关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广田三原則，并把陝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送給他。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伸到我们西北五省同胞的头上来了。

卖国賊头子蔣介石，丧尽天良，实行联合日本，灭亡中国。爱国有罪、卖国有偿，阻拦紅軍东进抗日，搗乱紅軍抗日后方。非把中国統統送給日本不止。

紅軍是人民的軍队，是抗日的先鋒，在此困难严重，大禍临头日子，用自己的热血，坚决同人民在一起，向人民的仇敌作战，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及其指揮下的紅軍，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軍队提出下列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結起来抗日救国。

二、停止內战不分紅軍白軍一致抗日。

三、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創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綫。

四、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軍。

五、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六、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論出版集会結社自由。

七、爭取迅速对日作战。

八、全国紅軍与全国軍队集中河北打日本。

九、全国人民一致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

十、推翻汉奸卖国賊的統治。

十一、废除苛捐杂税。

十二、废除高利貸。

十三、打倒貪官污吏。

十四、打倒土豪劣紳。

十五、救济災民难民及一切失业人民。

十六、保护爱国运动。

十七、保护知識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

十八、保护工农利益。

十九、保护工商业。

二十、帮助回族与蒙古族人民。

全国人民全国軍队团結起来，拥护苏維埃紅軍的主张，为保卫西北而奋斗，为保卫华北而奋斗，为保卫中国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賊，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中华苏維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　朱　德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議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沒有一刻停止的，不論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終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經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經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陣地，并給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綏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爭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統一战綫的开始发动，已經給了日寇侵略計划以相当的打击，暫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統一战綫”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有組織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現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領导与影响下的軍队还沒有参加这个战綫，国民党的政策还沒有基本的轉变，因之，民族革命战爭还沒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沒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継續侵略与保持中国領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損害，而且日寇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領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証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絕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現在已經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級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續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維埃紅軍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贊助与全国主力紅軍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陣地，一部分民族資产阶級的开始轉向抗日战綫，国民党軍队官兵中广大成份抗日情緒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內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間关于抗日問題上的爭論，明显的表示出它現在是在动摇的中間。在日寇繼續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繼續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动摇地位，而轉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眞正革命的覚悟的純洁的分子，而且要爭取統治阶层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爭中来，使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陣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軍队参加抗日战爭，是实行全国性大規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爭之必要条件。但这絕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錯誤政策的严厉的批評与斗爭。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內部的抗日傾向日漸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須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实現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斗爭中不但对于統一战綫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該进行严厉的斗爭，而且对于口头上贊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該保持批評的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贊助一切眞正的抗日战爭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大規模的全国性的眞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繼續坚持“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內战。

（五）中央認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結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統一战綫的口号，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苏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爭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覚悟程度与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国无产阶級及其首領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爭以自由活动的午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贊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維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內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繼續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統一战綫中的政治領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維埃与紅軍，同一切丧权辱国及破坏民族統一战綫力量的言論行动进行坚决的斗爭，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国的实現准备前提。沒有艰苦的持久的斗爭，沒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現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爭的过程中，应該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开始，一直到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議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治路綫，基本上是正

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得到了許多成績，主要的在于苏維埃紅軍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軍进行統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績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許多党的組織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統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每一阶級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針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談判，以求訂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暫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具体实际的行动綱領，并在为着实現这些綱領的共同斗爭中，引导推动与組織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議(或国防会議)，国防政府，抗日联軍，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許多党的組織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滿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号召，滿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問題。同时在統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場合，却又表現出："共产党員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員群众与組織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沒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認为必須及时糾正那种以阶級斗爭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統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資产阶級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眞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現民主共和国。而領导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級群众的日常經济政治的斗爭，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組織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主要关鍵。但在領导这种日常經济政治的斗爭中，共产党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統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爭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覚悟程度与組織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爭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爭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継續扩大，継續发展与継續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线与实現民主共和国的斗爭过程中，絕对不应該削弱苏維埃紅軍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軍，是苏維埃紅軍在一定綱領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軍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軍的統一指揮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維埃紅軍組織上与領导上的独立性。須充分注意于紅軍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經过选择的允許学生及其他軍队的旧軍官加入紅軍的意見是錯誤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紅軍的統一和团結。必須充分注意加强苏維埃紅軍的領导成份，那种允許資产阶級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見也是錯誤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維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絕对的領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領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爭与日常經济政治斗爭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軍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爭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胜利，爭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現。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結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統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是在非苏区内，有系統的征收党員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須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經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識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議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問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

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見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領导机关必須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論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現党的政治路綫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員成千成万的党員到一切无組織与有組織的群众中去去爭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爭的过程中，对于忽視党的政治上与組織上的独立性，忽視巩固苏維埃与紅軍，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經济政治斗爭的領导，对同盟者批評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傾向，必須及时的給以糾正。但在目前說来，“左”的关門主义傾向，依然是彻底实現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策略的主要危险。正确的党內思想斗爭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原載《毛泽东选集》上册，晉冀魯豫中央局編第二四五頁）

我們要文武双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沒有組織起来，沒有专門計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創作，就是說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現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紅色中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对美国記者談中日战爭

（一九三七年）

記者問：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斗而将其驅逐出中国。这是不是說中国現在已无須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問題是世界的問題。日本暗中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須在其他强国中找到帮助。但这并不是說沒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說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爭中一定能够組織而成为有力的抵抗綫。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爭中已經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她的良方。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經驗已能熟練地运用他们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们的敌人。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动員我们的伟大潜力以抵抗日本，以我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爭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假如中国单独作战，自然牺牲較大，战期較长，因为日軍有优美的軍备，此外它也有她的同盟国。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間，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內組成联合战綫，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問：在何等条件之下，中国人民能战胜日本的軍力？

答：三个条件能保証我们的胜利：第一、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战綫之成立。二、世

界反日战綫之組成。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本身的联合。

問：請問这样的战爭要拖延到多久？

答：这要看中国政治动員的力量。中国反日本的許多有利条件的因素，和国际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发展的迅速而言。假如中国的政治动員是强有力的，假如在縱的和横的方面都是有效的組織起来，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大量地予中国以援助，假如日本的革命很快地爆发的話，那末这次战爭是很快地就能得到胜利。假如这些条件还不能具备的話，那末这次战爭是非常长久，但結局日本还是要敗的，只不过牺牲重大，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痛苦时期。所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已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以縮短战期。但假如无人与我们联合，我们还是要单独干的。

問：你以为苏联及外蒙是否要参加这次战爭以助中国？并发生在何种形势之下？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她不能漠視远东的事变。它是不得不动的。还是过（？）日本征服全中国后之以为攻击苏联的根据地？还是幫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以获得独立，而与苏联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想苏联一定是采取最后一条路途的。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开始抵抗并需要和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时，那末苏联一定会与我握手做先鋒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自然不会較英美更守中立。

翻印者說明：此文抄自《抗战文选》，文中有該記者一段自述，声称：他是七月初旬到陕北，逗留了四个月，到达陕甘宁，并在前綫待了一个月，在延安訪問过党政高级干部，也訪問过毛主席"評論許多事情"，此文是他把关于中日战爭問題的談話用問答的方式写出来的。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一九三七年）

一、我们对敌人的面孔应該認识得更清楚些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六年来，中国从日寇得来的教訓，本来已經够多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許多人对他本身及其行动的观察，常常認識不足，甚至犯严重的錯誤。就拿最近日寇大規模进犯中国这一严重事件来說吧，对于这一事件，就有許多离奇怪状的看法：有些人認为这次日寇向华北以至向上海开火，完全是日本少数少壯派軍人的行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的国策（他们認为連日本金融資本家以至近卫內閣也不同意）；有些人認为这次事件的暴发，是出于"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預先有布置有計划的行动（他们的証据是，在日本未发动进攻中国之前，东京金融市場并沒有紊乱。等到日本在华发动进攻以后，公債及各种商业股票才开始慘跌）；甚至还有些人認为日寇这次行动只是"示威"性質，最少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把事件扩大"等等。

不消說，这些看法，都是极端錯誤的。第一种看法的錯誤在于把日本的"少壯派軍人"看得太神化，而沒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近卫內閣的本来面目認識清楚。固然，在华北发动战爭和指揮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壯派軍人"；但是，这些少壯派軍人誰派他们来的呢？他们的

行动代表誰的利益呢？稍微注意一点时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駐屯軍干部，大部分都是在“二·二六”事件后，或在去年华北駐屯軍强化計划实施后由东京調来，現在华北駐屯軍的首脑，被称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郎則是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才由东京方面派来的；經过“肅軍”后的东京当局，例如預先沒有“放火”的計划，为什么要派这些“点火者”到最容易发火的华北来呢？尽管这些点火者在点火和扩大火焰的瞬間不一定要得到东京方面的同意，尽管他们在某些部分的問題上甚至会和他们的主人——金融資本家地主等有不同意見；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忠实于他们主人的利益的！老实說，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計划布置好了，駐华北的少壯派軍人不过忠实地活泼地按着这計划去做罢了。如果有人認为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大地主以至近卫內閣不同意华北駐屯軍人这次在华北发动战爭的行动，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謬誤之談。要知道东京的金融資本家大地主等，希望无事平隐地継續五年来資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固是事实；但是到了除非用战爭解除他们的危机和延长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同意发动战爭的！只要看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东京各政党对“近卫政策”（其实就是軍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政策背后的金融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态度如何了。至于說，近卫內閣也不同意这次战爭，那就更加荒謬！我们早已指出，近卫內閣的出現，主要就是为了調和日本統治阶級內部的矛盾，为了实現对中国的侵略战爭。

第二、第三两种观察錯誤的根源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不过其意义来得更加严重；由于沒有看得清日本統治阶級的矛盾的一致性，由于沒有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規模战爭的必然性，而只凭一些极表面的事实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乱下断語，那只自然会在有意无意間中了敌人宣传的毒計了！但我们必須指出，敌人天天宣传这次日中“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是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要向其它帝国主义掩飾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計划，使得这种計划能暢行无阻；另一方面則是为要动摇中国不坚定分子，使这些分子継續保留一綫苟安的幻想！对于这些烟幕，中国的輿論界早就应供給以揭破；可惜中国的輿論界，当华北战事发生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华北的問題，当上海战爭发生的时候，又往往只注意到上海的問題，而对于敌人对中国进攻的整个計划，却不但很少有正确的把握，并且有些論調还陷于严重的錯誤！反問这次战爭眞的是出于“偶然”嗎？日本政府眞的“不想把事件扩大嗎”？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政府对言論界彻底的統制，关西几个师团到了除队时間而不下令解散等等，为的是什么啊？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下总动員令，在短时間內即动員近三十万大軍（包括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师团）到中国来，又为的是什么啊？我们根据事实，不能不强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向中国实行大規模的进攻，不但是有計划的行动，而而这种計划的严密性及其广大性是以往所沒有的！不健忘的讀者总应記得，当日本軍閥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統治阶級間的意見是非常分歧的。当时的日本币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軍閥誹議“日本吞下滿洲，等于吞下一顆炸弹”（大意如此）。但是这一回却不同了，根据东京的通訊：芦沟桥事变的消灭传到东京后，各报的专电，各杂志的言論，各政党負責人的发言……差不多是“句句一样，众口一詞”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这次在事前事后，都有严密的布置，其严密性甚至連日本的“交易所”有可能在发动战爭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

当它执行对主人有利的計划，特别是軍事計划时，不一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们的同意！）至于說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侵略計划的广大性，我们可以断定，是“九一八”以来所沒有的：現在已經开始了大規模的侵略战和全国性的抗战了。

二、日本为什么要在目前发动大規模的侵略战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完成了田中奏摺里所明白記載的“征服滿洲”的計划后，天天在准备着实現“征服支那全土”的計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要选择在目前下决心执行这个計划，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原因所促成的。

首先，我们从日本經济方面观察。日本新的經济恐慌的征兆已經非常明白地表現出来了，不管日本的軍需工业有怎样畸形的发展；但是由于軍費无穷尽和无限制的膨胀，致使赤字公債无法消除，物价的高涨无法抑止；同时由于軍需原料須从外国大量购入，致又引起对外貿易的空前入超；跟着国际收支的无法平衡，大量的黃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据日本官厅发表的統計：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間，物价总指数高涨了百分之三十一（国內商品高涨了百分之十三，輸入商品高涨了百分之五十六），几个月来物价高涨之势，还是有加无已；至于入超和黃金外流之数，尤为惊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达六亿四千万元，截至目前为止輸往美国的現金共分四次，总額达二亿七千万元。照目前情形看来，日本經济的恶化，只有日益深刻，而絲毫沒有“好轉”的傾向，如此发展下去，新的恐慌的来临，只是时間的問題——这是无論是怎样蹩脚的經济学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慣于向中国搶劫以“打开”危机局面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样的时候，发动大規模的侵略战，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我们从日本內政方面观察。随着經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內阶級与阶級統治阶級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来，这也是应有的文章了！据日本官方发表，本年一月到五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比去年七百次几增加了一倍；农民斗爭則仅一月至三月已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这些簡单的数字，可以看到日本国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农大众在世界无比的残酷的警察制度压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至于日本統治阶級間的矛盾，也始終不易彻底緩和，虽則日本統治者在面对着各种危机之前，极力設法使軍部和党政間的矛盾和緩下去，然而以实現“軍資和作”为任务的林內閣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一百十七日的寿命），表示調合前途的不可乐观。近卫文磨的登台，虽則也以“緩和国內之彼此对立，以收举国一致之实”为已任；但是近卫登台以后，不但“軍資合作”既得的成績，无法維持（結城不愿再当財政部长），不但已成的許多对立，无法消除，就是在內閣之內，馬場广田賀屋之間也未見融洽。光阴易逝，特别議会召集之期已經不远，可是“新党”的組織，毫无把握，这不能不使近卫內閣感到前途的黯淡；經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連結在一起的，日本統治者在这样的危机的威胁下，当然要发狂起来，拚命向中国狂噬了。

第三，我们从軍事方面观察。侵略主义的日本为要补救軍需工业資源的缺乏，为要完成建立进攻苏联和对抗英美的有利的軍事根据地，在获得了和相当巩固了滿洲热河等“生命綫”之后，进一步夺取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原是必走的路径和既定的方針。現在眼看着苏联第三个五年計划行将开始。中国抵抗的实力显著地增加，同时世界和平势力和侵略势力最后搏斗的时期也日益迫近，在这样的种种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这位“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撑好汉”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日夜企图要实現的既定方針，加速地“断

然”执行起来！

第四，我们从日本国际环境来观察。在这一方面，从日本統治者看来，目前执行它的“既定方針”是相当有利的。他们認为欧洲的国家正忙于应付他们的盟友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硬干”。当然沒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情，他们特别高兴英国“友誼的态度”实在的，英国紳士这种态度对于日本发动大規模进攻中国，給予不少的鼓励。

苏联消息报早已指出，英日談判是促进日本发动战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中，也已說明，英国在远东一貫的动搖不定的老政策对于帮助日本进攻中国是有着莫大的作用。

此外，美国爱玩的“中立”政策，和日本軍閥对苏联的厉行清党肅軍錯誤的估計，都使日本軍閥誤認是有利的条件。

最后，最近中国內政的动向，对于日本的发动大規模侵略战爭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假如中国內部的团結早已十分巩固，民主政治早已实現，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躊躇一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国自西安事变后，和平統一虽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国防政府的建立，亲日势力的肅清，民主政治的实現，还相去很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乘着这些空隙，赶快向中国开炮了。

以上的几种因素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促进和影响下，便决定向中国找寻出路。

三、侵略中国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在六年前，日本軍閥曾在国內危机非常深刻，国际环境却相当順利的条件下，干过一回，結果可以說相当得手；現在，它又要干第二回了。这一回也是不是象前一回那样的順利呢？要解答这一問題，也应該从几方面来观察。

第一，日本統治者以为进攻中国可以“打开”經济的危局，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錯算。在战爭还沒有发动以前，日本的經济危机已經如此深刻，財政方面已經如此沒有办法，在战爭发动以后，日本每年将需要多少战費呢？据专家估計，起碼要一百五十亿到两百亿元，这是傾日本全国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战爭除了引起財政的破产外，将使对外貿易更加恶化，物价更加高涨，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据最近东京通訊：“华北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場已經被攪得一塌糊涂，一般粮商更乘机操縱粮价，囤积居奇，致使粮食价格猛增不已”（申报）。将来战爭愈持久，財政和經济的破产必然更加显著，所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将是日本这次企图以战爭来打开經济危机的必然归趋！

第二，日本統治者企图以进攻中国来緩和日本国內的政治危机，結果也必然适得其反，不能不使日寇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認。

日寇以其素来狡猾的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在侵略行动上，对中国进行大規模侵略战爭；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在外交辞令上，則散布“不扩大事态”“地方解决”。日寇这种狡猾的手段，一方面用以掩盖他的为世界人类所攻击的侵略战爭，以便在这种外交辞令的掩盖之下，进行“不宣而战”的对中国大規模的侵略战爭，借以減弱对国际輿論和英美的刺激。另一方面則用这种外交辞令，以減弱中国的自卫行动，以勾引某些人对日寇的幻想，企图作和平的幻想以牺牲中国；同时以便給某些亲日派的分子，还在南京政府中保持“有用的”地位，因此这些亲日派久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唾弃，自国內和平統一开始以来，他们逐漸的在南京政府內失去地位。

芦沟桥抗战的失敗，平津的陷落，还是由于日寇的狡猾的手段所达到的。宋哲元氏上了日寇的老当，受了日寇的欺騙，由于宋哲元氏对日寇和平解决的幻想，企图苟且偷安，临事犹豫动摇，不去积极地进行自卫战爭，反而与日寇进行妥协談判，因此把中国的政治經济軍事文化上的重鎮輕易的失去了。当然平津的陷落也有其他原因，如过去南京政府的退駐政策，使日寇在平津造成优势的地位。但这早已成为錯誤，如果在芦沟桥事变时，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針，积极进行自卫战爭，是能够补救的。可是冀察当局宋哲元氏沒有这样做，而南京政府在芦沟桥虽有×××坚决抗战的方針，但对于冀察当局与日寇的妥协并沒有表示反对，相反的却是容忍了这种妥协，在八月十四日南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說：“中国地方当局，为維持和平計，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的容忍，对于此次之解决办法，亦未予反对”。在芦沟桥事变开始的时候，对于平津之增援，亦未采取积极的自卫战爭。平津失守的教訓，已經是再一次的說明，如果对日寇还保存“和平解决”的幻想，是要上日寇的老当，是要受日寇的欺騙，而使中华民族遭受莫大的損失。

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全国輿論全国空气都是为坚决抗战所压倒。×××七月十七日所发表的代表南京政府抗战的方針，及南京政府在軍事上的措施是值得全国人民所贊許的。在平津、上海、南口的抗战中，中国軍队英勇地抵抗是为全国人民所致敬的，以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已經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神圣的任务，就是一切为着爭取抗日战爭的胜利。中华民族的生路，只有进行全民族的神圣的自卫战爭，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去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

現在已經到了“最后的关头”，已經由准备抗战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的决定中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准备的阶段已經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的胜利”。

現在已經到了須要进行全国的总动員，須要进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去保障抗日战爭的胜利。今天的爭論已經不是应否抗战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日战爭胜利的問題。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在这一阶段內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区別和爭論，已經不是应否抗战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战胜利的問題。”“今天爭取抗战的中心关鍵，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为着保障抗日战爭最后的胜利，提出了爭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綱領：

（略，見《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第二二五——二二六頁）

上面十大綱領是保障中国抗日战爭最后胜利唯一正确的方針，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中国政府为着爭取抗日战爭最后胜利，只有坚决实行这十大綱領。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抗战限制于单純的政府抗战，到处限制人民和拒絕人民的参加抗战，阻碍政府軍队和人民結合起来，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府的政治机构，这种抗战的方針，是包含极大的危險性，虽然可能取得暫时的局部的某些胜利，但决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南口失利的經驗就可証明这一点。某些前綫作战的部队，不但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反而压制人民的救国运动，解散在前綫的人民的救国团体。

上海抗战中也同样表现这种現象，上海和南京的救亡团体遭受当局禁止活动，文化界出版的救亡刊物亦遭受查封。当八十七、八十八师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上海人民自动的参加和慰劳，都被上海某些当局所拒絕。在某些人操纵下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沒有积极地援助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抗战，結果使两师在前綫一天一夜沒有飯吃沒有水喝，而抗敌后援会却有堆积如山的慰劳品，让其腐烂而不送給前綫的部队。因此前綫抗战的部队埋怨的說这次上海的人民不如上次“一·二八”积极。其实这次上海人民积极援助上海的抗战，是大大的超过上次“一·二八”，可是因为国民党的限制政策，使得人民与軍队隔离，如果这样継續下去，上海的抗战又有重复南口教訓的可能。

芦沟桥抗战的失利，平津的陷落，虽有廿九軍英勇的抵抗，佟麟閣赵登禹奋勇的牺牲，但是由于宋哲元氏乃沒有抗战的决心，当然也就不会去实行正确的抗日战爭的方針，当平津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起来援助廿九軍时，宋乃不但拒絕了人民的援助，而且宣布戒严禁止人民的爱国运动。平津虽有許多不利的条件，但这并不能說明平津絕对不可保守，如果当时发动广大的人民，武装人民，平津是能够保持相当的时間在中国的手里，以待中国大批援軍的赶到，可是宋氏深夜退出北平，宁愿把北平給日寇占去，而不愿北平人民起来保卫北平。

我们号召全国的人民，只有坚决的实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战方針，才能保障中国抗战的胜利，我们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員，应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放弃統制的政策，采納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針，这是保障抗战胜利唯一的方針。

阿比西尼亚的亡国，并不是因为它发动了发动了对意大利侵略主义者大規模的民族战爭，而是因为他沒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抗战的綱領。阿比西尼亚的国皇，沒有依靠在全国人民的力量上，他控制着民族战爭，他个人曾成为民族英雄，但全民族則陷入亡国的命运。反之，西班牙的民族战爭，則依靠人民的力量，結果能够与德意两国最大的法西斯侵略者战爭到一年多，而仍保持馬德里在政府軍的手里，并击退了法西斯屢次的进攻，并取得胜利。我们还应該知道西班牙政府抵抗弗朗哥叛軍的进攻时，西班牙原有的軍队百分之八十在叛軍手里，因为西班牙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抗战方針，迅速地組成了新的軍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爭，必須要从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两个民族战爭中去学得教訓。

救中国的关鍵，是在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的方針。要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要把单純的軍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中共中央的十大綱領中，就是包括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針。

要实行中共中央十大綱領的最主要的条件，必須是为着抗战而发展民主权利，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方能使人民自由的参加抗战，只有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軍队与人民結合起来，才能把单純的軍事抗战政府的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

国民党中有些人說，要等到抗战全面胜利以后才能实現民主。这种意見的錯誤，显然不懂得沒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因此中共的决定中提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員不够，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須在今后爭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爭取抗战胜利与实現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賴的。

国民党中有些人說，要抗战要牺牲自由。这种意見的錯誤，也正如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的錯誤了解是一样。如果沒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

要争取抗战胜利也无保障。

我们赞成在民主的基础上，以争取抗战胜利为目的，进行全国民众运动的統一。但統一民众运动，并不能解释为統制民众运动。对民众运动的統制，事实上即是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在統制政策之下，自然不能动員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所以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統一，而反对民众运动的統制。

某些民族失敗主义者，在全国抗战空气压倒的情机之下，不敢公开的揭起反对抗战的旗帜，于是在各种言詞的掩盖之下，散布民族失敗主义的情緒，如說“中国是弱国不能抗战”，如說“战呢，是会打敗仗的”，就老实的承認打敗仗是了。这些民族失敗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正因为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进行正义的神圣自卫抗战，依靠民众力量，是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的。

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发动全国的民族抗战，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果把抗战看作只是政府的抗战，单純的軍事抗战，那么这种抗战是包含极大的危險性，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与失敗可能，为要避免这种危險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只有坚决实行正确的抗战的方針，即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証。

維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綱領！

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綱領！

动員一切力量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

（原載《毛泽东言論集》，巴黎救国时报刊第四七——七二頁）

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議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

一切干部要下定决心来干，要認識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該为这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講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資产阶級意識，——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鋼刀，去創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中华苏維埃政府致西班牙人民书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們：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紅軍和中国苏維埃，認为西班牙政府現在所領导的战爭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战爭。这个战爭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政府是在抵抗破坏世界文明文化和人类正义的德

意法西斯蒂及西班牙的卖国賊们。西班牙的政府和人民正在向德意法西斯蒂战斗，而德意法西斯蒂却正是极力支持在远东进攻中国之日本法西斯蒂。日本法西斯蒂正以全力进攻中国，它占領了我们东北四省之后，又侵入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如果沒有德意法西斯蒂的幫助，日本法西蒂是不会象今天这样疯狂的向中国进攻的。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在人民陣綫中团結的各党派，而且我们也正在号召中国各党各派結成民族統一战綫，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我们的工作正在急切的进行，我们得到胜利必須将与日本法西斯蒂以打击，这就幫助了西班牙人民与政府。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斗爭是不能与你们在西班牙的斗爭分开的。中国共产党現在正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爭来幫助和鼓励你们西班牙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紅軍，中国苏維埃和中国人民，为你们保卫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綫上的胜利激动万分。我们苏維埃区域的报紙每天发表着关于你们的英勇斗爭的消息。我们坚决相信，你们人民陣綫中各党的統一是你们最后胜利的基础。我们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提議的十大綱領也完全贊成。

你们的斗爭和我们在东方的斗爭是相同的，除了已經提到的之外，在我们的队伍中，都有着托洛茨基匪徒的混入。唯有坚决反对这些內奸，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陣綫。在反对我们自己敌人的斗爭中，我们也在幫助你们在西班牙的斗爭。

在中国有着百种以上的杂志报紙发表你们的消息、文章和照片，同情你们为了民主和自由的英勇斗爭。我们知道：你们的胜利将要直接幫助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爭。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的讀着由各国人民組成的国际纵队，我们很喜欢的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間。中国紅軍中許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爭，沒有一天不是在討論着你们的斗爭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队伍中去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紅軍經过了十年的无休止的艰苦斗爭，沒有財源，飢寒交迫，缺乏武器弹葯的供給，直到最后我们得到了現在的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及你们的軍队也在經历着我们經历过的这些困苦。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十年的斗爭指示我们，如果一个革命的人民和軍队不怕痛苦，不折不挠的英勇反抗敌人，他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紅軍，中国苏維埃和中国人民，对于你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而斗爭的英雄男女们，表示深切同志的敬意。通过他们，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表示了无限的团結和友爱精神。象过去一样，我们将注意你们每一个时辰每一个日子的斗爭經过，为你们的一切胜利而欢欣鼓舞，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于陕西延安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議）

（一）芦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領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的开始。日寇已經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員。他们一切所謂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与人心憤激的压迫下已經开始定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

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經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經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經过去了，在这一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員不够，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須在今后爭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年論，已經不是应否抗战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战胜利的問題。

（五）今天爭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鍵，是在使已經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間包含着极大的危險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障政府軍队与民众結合起来，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敗的可能。

（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暫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教訓，因此，应該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經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繼續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該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現本党所提出的爭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綱領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綱領相违背的一切錯誤方針，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敗主义。

（八）共产党員及所領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該最积极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綫，应該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該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組織武装群众，只要眞的組織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抗日战爭的胜利是无疑的。

（原載《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資料》（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編第四——五頁）

統　一　論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結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調了抗日，但不愿强調团結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結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沒有眞正的坚强的团結，沒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頑固派强調統一，但是他们的所謂"統一"，乃是假統一，不是眞統一；乃是不合理的統一，不是合理的統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統一，不是实际的統一。他们高喚統一，却原来是取消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宁边区，說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統一，他们要把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繼續他們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

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統一呢？老实說，过去如果沒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宁边区，（字跡不清）不主张停止內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无人領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沒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眞心实意地出来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傾向危險，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軍、新四軍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們呢？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党营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发国难財，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說得出不要脸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軍、新四軍；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統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統一战綫，我们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誰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誰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誰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元錢薪水呢？誰人能够創造这样廉洁的政治呢？統一，統一，投降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们統一于投降；反共頑固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们統一于分裂；統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嘛？不以抗战、团結、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統一，算得眞統一嘛？算得合理的統一嘛？算得实际的統一嘛？眞是作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統一論。我们的統一論，就是全国人民的統一論，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統一論。这种統一論是以抗战、团結、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結，只有团結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結抗日才能統一。这就是我们的統一論，这就是眞統一論，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这就是实际的統一論。那种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义的統一論，乃是亡国的統一論，乃是丧失天良的統一論。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統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謀，这是借統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統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政的狗肉，死皮賴脸，乱吹一頓，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戳破他们的紙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頑固派。

为陝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紀念題詞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見，这些人充滿着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誠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鋒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順利的解决。

（原載《动員》第十期）

对《大公报》記者談抗战形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

从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后，不容諱言的，我们在抗战的軍事上受到了相当的挫折。但在各个战場的挫折中使我们获得了最可宝貴的伟大教訓，这教訓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民族抗战，虽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还不完全。我们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这是自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以来未有的好現象，但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最大的缺憾尚未动員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爭而不带群众性是必然会遭遇失敗的，在近代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阿比西尼亚抗战的失敗，可为我们前車之鑑。拿最現实的例子来說，西班牙政府軍所以能够坚守瑪得里，击退德意撐腰的法西斯们进攻，主要的在乎能够发动群众，使大家能拚其血肉，以保卫瑪得里，守住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軍現有的地区，不及我们江西省之半，因为动員了全体人民，便在抗战中发揮无与匹敌的伟大力量，要是我们眞正实践了动員全国人民，不难击潰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此外，已往各个战場上所采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錯誤。軍事上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則，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因此，我们要設法減削敌人优势武器之运用，避实就虛，击中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在每次战斗中，采用迂迴及中央突破战略，我们便不能专門着重在“单純防御”，死守正面，使敌人恰恰施展其优势武器，而集中击破我正面。必要的陣地和城市，我们当然要守，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防御，还要配合上側击或敌人后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要以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来歼灭敌人。

眼前最要紧的是改造軍队素質，加强軍队的政治工作。中国只要精兵三十万，具有最高度的民族意識，与政治自覚性，再配以新式武器，軍官与士兵一律富于高度的攻击性，便可以使目前的战局，为之全般改观。

※　　※　　※

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軍在冀察晉边区及晉西北綏东一带，已經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浦路的交通綫。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不要說敌人占了大原及晉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决不南退。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毀敌人的后方。我敢說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却是一枚炸弹。

※　　※　　※

日寇原欲在中国不战而賞其大欲，但經中国长期抗战的結果，将使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帝国主义者陷入崩潰的深淵。从这一方面說，中国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侵略陣綫中，尽力最伟大的任（义？）务。

（《八路軍的战略和战术》，上海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一月版）

致章、陶、鄒、沈四先生的信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

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統一战綫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級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結起来”。因此我们認为在統一战綫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級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錯誤的。……

……由于抗日战爭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也能够且必須是长期的……

所謂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爭中的，而且是在战爭后的。抗日战爭是长期的，战爭中的合作已經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継續合作下去，也一定要合作下去。……沒有疑义，战爭中的合作必有各阶級的內容，战爭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內容。然而战爭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爭后也能合作，这不是沒有根据的預断。

……我们相信，如果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排除一切相互的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那末全民統一战綫可胜利完成，并可保証广泛光明的前途。依靠着統一战綫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只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賊，而且經过統一战綫运动的一定阶級可以使中国民族脫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縛，并达到全中国的眞正民主的統一。因此，我们認为統一战綫决不是一个很短的暫时的現象。当然，在統一战綫的各个阶段上可以有个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或逃走，但是这决不能認为是統一战綫的破裂。

現在統一战綫比一九二七年还有更明白的前提和更巩固的基础，因为現在民族危机比一九二七年百倍的加深。一九二七年的統一战綫主要是反对內部敌人（反对北洋軍閥），現在統一战綫是反对外部敌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脫离統綫的人们，还能組織半独立式的政府。而在現在，那一个要脫离統一战綫或者不参加統一战綫，他再也不能建立半独立式的政府，并不能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找到拥护。……我们为了統一战綫的事业，不害怕被其它党派利用，因为我们考虑过坚决抗日綱領。我们愿意与一切抗日討賊的政派組織合作到底。

但是，現在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幻想实現武力統一的計划。……不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政策，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还有人企图以另一“集中战綫”来对立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統一战綫，这就是統一战綫不能順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論抗日救国統一战綫》一九三八年印行，第47——51頁）

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員的談話

（一九三八年九月）

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課：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課；在学校住窰洞，吃小米，出操上課，这是第二課；現在第二課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課，这便是到斗爭中去学习。

寄給前綫战士們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前綫英勇抗战的将士们：

望你们繼續发揮你们的英勇精神，奋战到底；达到驅逐日本帝国主义爭取最后胜利之目的。一切后方的同胞都是援助你们的。

（原載重庆《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

談抗大民主問題（摘录）

（一九三八年）

这里有共产党員，有国民党員，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員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員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論。

这里有思想的自由。所說过墻报里說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汉奸的說話在这里是沒有自由的。写信也自由，过去对于这点，做得不好，以后就要改正。

这里政治是民主的。只有汉奸在这里沒有走路之权。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証軍事的集中。班长以后用选举产生，但必須要学校加委，这是軍事集中。救亡宣民先队也一律从民主选举負責人。

取消斗爭会。現在在斗爭会里动輒代上人家一頂大帽子，这是不对的。

这里有意見箱，共产党說話是要做到的，我们要保証，任便你们什么意見，尽管投到意見箱里去，可以不記名字，决不会戴大帽子。

还有告状的办法。你们尽可以由下级告上级，也可以不記名字，并且保証你们的意見达到学校最高当局。

当然誣告不誣告，我们有办法查清楚的。

論新阶段（节录）※

（一九三八年十月）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說些什么呢？我要說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結；（三）抗日民族战爭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爭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爭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爭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說的就是这些問題。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連天全世界战爭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党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

永远的团結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員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一、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議，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員分散工作于国內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則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員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种許多領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爭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中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許多的問題，必須作明确的解决，以便爭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二、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經历許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內各党派各阶級互相对立的局面轉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由国內战爭轉到了抗日战爭。

过去国內战爭形式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統一战綫。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經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驟，进到准备並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驟。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內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內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間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間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着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內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場（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內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份訂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議，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議。並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間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針。並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結抗日的具体建議。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紅軍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紅軍实行改編为国民革命軍，苏維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內战爭的状态轉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新时期。……（略）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我们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紅軍游击队改編为国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結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爭轉到两党重新合作，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轉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經过了許多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綫（共产国际决議，九

月八日“新华日报”。）並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級援助中国抗日战爭。

同志们，假如沒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抗的日民族革命战爭之发动，持久与爭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現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来年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隶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爭的战場。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經发現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爭，和中国过去的一切历史时期的战爭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爭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爭。而且这个战爭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中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承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鬪爭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爭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結合——以中国进步並且継續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結合。就保証了我们的抗日战爭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現于东亚，並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組成部份。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人类。

三、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爭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六中全会担負了重大的历史任务。

完全不錯，抗日战爭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結与伟大的进步，給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战爭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継續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預断的。誰要是看不見过去的伟大成績和未来的胜利前途，誰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爭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許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訴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結，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沒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現在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見，新的环境提出了許多問題。同志们，我们必須发表意見，必須解决問題。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見，許多根本問題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佈新的意見，解决新的問題。

什么是新的問題呢？

如何在現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爭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驅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問題的关鍵。这个問題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議論着，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該回答这个問題呢？无疑是应回答的。

这个問題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許多的問題。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經驗究竟証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經驗証明抗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針是持久胜敌的，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爭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爭与取得最后

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經驗中找到根据給以明确的回答，並是否可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藉以克服新的困难，爭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这是一种的問題。

又如：整个抗日战爭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謂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質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爭趋势将怎么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爭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問題。这又是一类問題。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說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間的关系呢？所謂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这又是一类問題。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爭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这也是重要的問題。这又是一类問題。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爭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員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針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該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順利呢？共产党的內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結全党使之在抗日战爭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問題。这又是一类問題。

所有这些問題，都是党內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經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問題的人們。

同志們：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現在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爭。这个斗爭現在已接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間。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責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許多的問題。

（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結

一、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經驗說起罢。

十五个月的經驗給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說明了抗日战爭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針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証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論者之沒有据根。第三：証明了支持长期战爭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統一团結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藉以克服困难，爭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二、抗日战爭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針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起之时，許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現象出发。設想战爭不久就可解决，必胜思想籠罩一时。……（略）我们則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爭是长期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战爭的結果，日本必敗，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經过一个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諾談話）“应該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所

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爭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針的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經驗完全証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从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經怎样了？一句話回答：已經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說，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个基础，但惟有継續进步，才能最后胜利，所謂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內政治，軍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須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須經过全民族的努力，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論是沒有根据的，他忘記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記了敌是优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潜伏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轉敗为胜，轉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現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說，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費数十万万，軍队銳气日减，財政經济日形竭蹶，国际輿論紛来譴責，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結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須待到敌更大的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时，才是反攻敌之机会。因此急速胜論在敌情方面也沒有根据，十五个月經驗已經証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說，現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以来，我们有了国际間广大的輿論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議已經給了我们許多幫助，証明了我们是不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須看到国际和平陣綫各国有其不相同情况。資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則取某种程度中立态度，其資产阶級則利用战爭做生意，还在大量輸送軍火与原料給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义国家，在援华上已經具体的表現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它作超过現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暫时不应希望过高。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錯誤的。十五个月經驗証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爭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經驗也否定了速胜論。

总起来說，不論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經驗，都証明速胜論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爭的长期与残酷。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針，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說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爭的唯一正确方針。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針的，現在事实給了明白教訓，应該再沒有疑問了！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結。

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論大张旗鼓，訊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議論表面沒有了，他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論必与风作浪一次，訊为中国应該停战議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則反，我们訊为中国武器誠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加强的，战爭胜負主要决定于人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

結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漸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漸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漸扩大。綜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略）中国共产党亦早日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长期消耗下，它的經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頹靡，中国方面則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的奔騰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領地作最后的攻击，驅逐日本的侵略者出中国。"（毛泽东与斯諾談話）"我们相信：已經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碍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眞的組織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抗日战爭的胜利是无疑的。"（中共去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經驗証明了。悲观或亡国論者認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謬說法，已經証明是完全錯的了。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甚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財力不足，經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領地区，亦实际只能占領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他仍然是中国。第二、敌人战爭的性質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们內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略战爭，並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

这样，就使他的战爭，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絕对对立的战爭，迫着中国无論甚么阶层，无論甚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結起来坚决抗战的。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絕对对立的战爭。日本帝国主义悉率人財以应战爭的結果，已經在他国內人民与前綫士兵中間逐漸酝酿了許多的不滿，战爭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爭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經开始証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敗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爭的性質是帝国主义的；換句話說，損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贊成日本的侵略战爭。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益縮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开始証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較小，影响到他兵力，財力的不足；日本战爭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結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爭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論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沒有看見，而仅仅看見了敌强我弱的一点。所以亡国論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並沒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論者，我们的观点則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經驗已經开始証明了。

甚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虽然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爭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区域我们也还有許多游击队战爭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爭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爭，我们的战爭是民族革命战爭，是进步的战爭，不但战爭本身的性質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爭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

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軍队。在这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爭，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繼續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爭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經驗証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爭，已經推动了全中国的进行，旧的民族腐敗传統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在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統一团結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結）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也已經可以預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爭不是孤立的。不管資本主义国家現时还保存其許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暫时的形影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使中国抗日战爭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爭，是不分离的結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爭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歐洲人、美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給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爭是进步的战爭，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結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經存在，並且日益展发之中。在这里，亡国論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見，而只看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抗战必亡"的胡說；其中許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說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謀。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經驗中已証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的指出我们国家于我们战爭中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並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爭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揮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爭取最后胜利而斗爭。最后胜利将是誰的呢？我们确定地答复；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复：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之淪亡，奧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並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其共見的。現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許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則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对妥协論，反对悲观主义，喚起全民族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針。

总起来說，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爭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針，我们是持久胜敌論者，不是速胜論者。敌小，我大；敌人战爭是退步的，我们战爭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較孤立，我則比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对比，又决定了战爭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經驗的第二个总結。

四、支持长期战爭与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結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爭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問題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經驗中証明了，但支持长期战爭与爭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則过去国人的意見不一致的。許多人認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結全国，不注意軍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从来不贊成这种意見，認为唯有全民族的統一进步，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爭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国

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綱領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于轉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負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胜利，而爭取胜利抗战的中心关鍵，在使已經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中共去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經驗已經証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內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級、党派、集团都团結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軍队，都統一于国民政府与軍事委員会指揮之下，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沒有这种統一团結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統一团結各方面，这种团結一致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但十五个月經驗又向我们証明：敌人破坏陰謀之严重与內部团結巩固之不足。抗战为甚么遭受很多挫折，为甚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統一战綫力量之不足，統一战綫还沒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統一团結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才能支持长期战爭与爭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由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結，同时又暴露了这个团結之不足；而且推动了軍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爭与爭取最后胜利，必須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軍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沒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統一团結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証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証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許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訓，国人必須进一步的認識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問題，依靠民众則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則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还必須充分表現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总之，支持长期战爭与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統一团結，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結。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結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針。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針，並作了长期的扩大的努力。抗日战爭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許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針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經驗作了我们观察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基础。

（三）抗日战爭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发展的新階段

一、研究战爭与統一战綫的規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結了过去經驗之后，重要的問題，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爭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現在要答复的問題，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問題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爭变化发展的行程沒有一个大概的估計，我们就只能跟着战爭打圈了，让战爭把自己束縛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調节整理，造出为战爭所必須的条件，引导战爭向我們所需要的方向走去，爭取战爭的胜利。因此必須懂得抗日战爭的規律性，才能实現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爭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計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統

一战綫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認識了它的規律性，我们才能有效的推动統一战綫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爭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現在先来說战爭問題

二、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爭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爭有一个阶段就完結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爭，只有日軍进攻，俄軍敗退，就結束了。又如意亚战爭，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敗，就告結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反对北洋軍閥的战爭。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爭。第二类战爭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結。例如法俄战爭，拿破崙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吳魏赤壁之役，秦晉肥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則两軍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給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爭，例如外国的七年战爭，八年战爭，三十年战爭，百年战爭，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現于西战場)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許多这类的战爭。这类战爭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爭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爭属于那一类战爭呢？我以为属于第三类战爭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爭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三、中日战爭的长期性表現於战爭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爭的长期性将表現于在敌則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則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現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說退却而說防御，是說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現其退却，不是一下子乾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則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則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損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結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轉入軍事上保守其占領地而从政治上与經济封鎖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轉入失敗的态度；我虽坚决抗战于各方面向前进攻，但一时也难进攻到足以轉入反攻驅敌出国的态度。依上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个阶段，或中間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攻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漸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轉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爭过程的估計，現在並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創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扩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四、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論者反对阶段論，認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一个中間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爭面前存在着許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間，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論者的

反对三阶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計了敌人力量，另方面又过高估計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論者也反对三阶段，認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論者相反，过高估計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計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認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对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說什么反攻胜利了。因此，必須一方面反对速胜論，又一方反对亡国論，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論。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論比之反对速胜論更加重要。另外一些人，口头上贊成持久战，但不贊成三阶段論。这也是不对的。所謂持久战，所謂长期战爭，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在战爭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認持久战或长期战爭，又不贊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謂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沒有任何的內容与現实，因而就不能实現在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見仍属于速胜論，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五、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鼓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內一部分与兴高彩烈，以为日苏战爭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轉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論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計是錯誤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規律。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繞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陣綫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爭危机問題，在西方糾纏不清，无論是各大国間的战爭前夜或战爭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問題放在議程的第一位，东方問題則不得不暫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爭，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論也是沒有理由的。我们必須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爭的規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六、相持阶段战爭的枢紐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間阶段。这就是說，第一，我之抗战必須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間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謂性質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現了时，必須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設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謂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論者，我们肯定地說：必須經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結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最后实行反攻，驅逐出国，否則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問題，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結論。对于亡国論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的說：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爭的枢紐，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綫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減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多沒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資本，唉声叹气于实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領土与各种新生力量，物別已經获取的軍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貴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継續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継續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述的力量，沒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喊的。

七、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經出現了的，尚未出現而可以預計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战导战爭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統一战綫的形成，全国軍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綱領的发佈，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爭的創造，全国軍队的进步，民族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現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許多不利事件与不良現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綫和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等，（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向民主化，頑固份子与腐敗現象的存在，妥协傾向的酝釀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軍力財力的消耗，世界輿論的責备，軍紀的敗坏，軍队战斗力的相对地減弱，国內人心与前綫軍心不滿的酝釀，张鼓峰战爭的失敗，汉奸軍队的难于組成及已經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示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現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軍力的頑强，占領地的扩大，政治組織力的强韌，阴謀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壯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釀，英日間某种程度的妥协傾向，各国軍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許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現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八、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战爭形势又将出現許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領武汉並不卽等于旧阶段的完結，新阶段的开始，由現在敌人尚能繼續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間，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轉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間。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許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份时間，可以預計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則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現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陣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許多新的問題；（二）財政經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种种程度的妥协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有进一步衝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暫时的部份減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陣綫的影响；（六）抗日陣綫中部份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緒的生长，意見紛歧現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諸抗日战爭身上的困难事項。估計到这些之新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計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現于下述各方面：（一）蔣委員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針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联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巩固与扩大；（三）軍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爭的广大发展；（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

的战时财政經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継續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間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該准备长期战爭，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爭，主要表現于主力軍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爭則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爭在許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爭，現在就应該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九、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預計。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战爭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攻了；不是战略內綫，而是战略外綫了。彼时国內政治上必須有大的进步，軍事上必須有新式技术，否則反攻是不可能的。

十、保卫武汉是爭取时间问題不是死守问題。

保卫武汉斗爭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爭取时間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不利于我而放弃則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軍力为原則，因此必須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該有的，都足以防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須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爭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針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誘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憊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針內所許可的，並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十一、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須給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轉入保守其占領地，出現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爭的过程，須克服許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領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結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須針对着敌人企图継續执行战略的运动防禦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的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十二、但相持局面快要来到了

敌人占領武汉以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並作占領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所給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軍的頑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領土內游击战爭的威胁，所加給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分散）現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則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則正面防禦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說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並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內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並配合

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經进一步发揮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揮，一方面固然給了我们以損失，然而同时就給了他自己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卽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发揮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頂点。我们承認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並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計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他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說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內鎮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並且在其正面与占領地內必須对付广泛战爭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間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內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綫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財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皺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須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綫之丧失所震惊，贊助政府調整全国之作战，有計划地部署粤汉路、隴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爭，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給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爭胜利地与确定地轉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十三、敌力在逐漸減少我力在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說，沒有甚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的減少了，敌人原有的軍力与經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爭中，他的軍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葯，与軍用資材，毀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軍艦，支出了数万万元經費，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而敌人毫无力量增加嗎？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及部份乡村之占領，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資本家手里夺取了市場，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資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許多人力，这些都是日本战爭之唯一目的。他是暫时的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問題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爭消耗嗎？不能，消耗了全部战爭“投資”是已經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資。問題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資之无能不說，假定他能的話，他能取偿其战爭消耗嗎？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爭，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爭存在，例如現在华北的游击战爭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爭，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並且还須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說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卽相持阶段中将逐漸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繼續消耗是决定一方面，現在說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減少了呢？还是增加了呢？我们的回答是減少了，又增加了。減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質与量，这表現在軍队人員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資源等損失等方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沒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質与量，这表現在全国的团結，軍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们覚悟程度与組織程度的提高。主力軍虽后退了，游击战爭却前进了。一部份地方虽損失了，另一部份地方却进步了，問題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須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問題。而这种增加，卽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軍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甚于今后之

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現时形势，先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問題。

十四、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夠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問題在：敌人占領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嗎？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爭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則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論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問題，与資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問題有性質上的区别。在資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質上形成上都統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設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不能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爭。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領导性質，但不能完全統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給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貴、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領。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則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軍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經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現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論持久战”中已詳細說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許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組織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爭，去反对占領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錯的战爭，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爭中逐漸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驅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領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陣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給了以我们很多困难，这就規定了抗日战爭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須說，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內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又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爭，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誰能說在民族战爭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陣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爭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並且現在的所謂乡村，与內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貴、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許多城市与許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絡，尚可建設。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爭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家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抗，收回城市。……（略）战爭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十五、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是能夠克服的。

我们早就說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謂和平妥协，过去曾見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現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謀在抗日陣綫內部的

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問題。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覚悟于敌人陰謀与内部反間之可畏，自动自覚地努力反对这种陰謀，一刻也不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両党及一切愛国志士団結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驅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堅持下去，不但是絶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沒有多大的勢力，抗日派的勢力大于亲日派。

十六、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軍，敌后游击战爭将暫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方游击战爭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勢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爭的新形勢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然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則土地广大，在敌則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堅持发展游击战爭的方針并正确的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长江下流一帶，勢将遇到敌人的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帶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団，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暫时的縮小其数量，現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勢的到来。在現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軍的战斗，为了准备轉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爭大体分为両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爭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針是巩固已經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堅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爭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帶，主要的方針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爭，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爭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軍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須用尽一切努力堅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爭，在长期堅持中，把游击部队鍛鍊成为一支主力軍，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說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爭比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須預先見到这种困难，承認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发展的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轉过去进攻游击战爭。然而是能够是堅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領导人们必須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爭中的游击战爭，不論敌人是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得多。在这里，爭取与瓦解伪軍以孤立日勢，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十七、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說的都是抗日战爭的形勢問題，以下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形势。

抗日战爭发展到了新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也就应該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現其向困难斗爭並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間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須認眞的巩固統一战綫与扩大統一战綫，长期的战爭必須有长期的統一战綫来支持，战爭的长期与統一战綫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十八——二十（略）

二十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統一战綫，如人民陣綫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統一战綫，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它有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認識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这些特点是甚么呢？归結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

的，有軍队的，有十五年經驗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組織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規定了我们統一战綫的根本性質。一方面，我们統一战綫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統一战綫的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的党派，不同阶級，不同軍队，国內不同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組織成份能够如此广大。由于組織成份异常广大，所以这一个統一战綫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統一战綫內部又难免許多相互間的磨擦，而須恰当地調整之，才能达到团結对外之目的。我们統一战綫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反对异族侵略与組織成份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陣綫，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陣綫（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統一战綫产生了許多的特殊內容与特殊結果，这是今天統一战綫的第一个特点优点，虽然在其組織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統一战綫是用民族战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爭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統一战綫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份还要說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各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的分布上也表現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他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許多特殊的东西。

第四是有軍队的。国共两党都有軍队——这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結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有两党的軍队，使得抗日战爭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最善責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相同，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第五是有十五年經驗的。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現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經驗，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結論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貴經驗，世界各国都沒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沒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組織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統一战綫缺乏現成有組織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間可以分工地去組織民众，不須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組織的民众，正待組織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爭取全民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則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綱領与政治思想保証統一战綫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經驗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內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份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另一部份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現时也並不反对我们的統一战綫，反

而采取贊助的立場。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贊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誠执的贊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訊識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問題与工作問題，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問題。抗日战爭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二十二、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爭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必須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現，才能应付战爭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統一战綫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結抗战的教訓，将促使各党訊識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組織与扩大民众的組織。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減少相互間的磨擦，办到眞正的精誠团結，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許多的困难，唯有統一战綫各党扩大发展其組織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內部关系与各党之間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爭新形势中統一战綫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全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結与当前抗战之統一战綫发展新阶段的估計，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該是什么呢？应該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該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統一战綫，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驅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說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組織成份，应該贊助政府，幷在政府領导之下，动員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員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一、高度的发揚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緒，反对妥协企图。

估計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份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綫的丧失，財政經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緒。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緒，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揚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緒，坚决拥护政府継續抗战的方針，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須动員报紙，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軍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綫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淪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計划地执行这一方針，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緒，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路綫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結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継續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顧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經产生幷正在継續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壯士，游击战爭的前途，慷慨捐輸，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綫后方国內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

陣綫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傾向，悲观情緒，腐敗現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佈，向全世界控訴，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覚悟，发揚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須知沒有这种覚悟与自信心，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二、（略）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針对着敌人現时进攻武汉並継續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軍的战斗力，整理現有軍队，增編新的軍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中国主力軍方面：第一，必須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补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陣地防御，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之实力。第二，必須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軍事工厂，並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綫的枪械与弹葯。第三，必須在軍队中認眞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实施政治文化娛乐等教育，提高全軍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第四，就現有物質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連队中組織經济委員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覚紀律，废止打罵制度，提倡官兵之間的亲密团結，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夫，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員方式解决食粮，夫役与新兵問題，以改善軍民关系。第七，在前綫各軍之間，前綫与后方各軍之間，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則互相策应，工作則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妬等不良現象，以改善各軍之間的关系。第八，整理現有軍队，补充缺額，同时增編新的軍队，加紧教育訓練，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軍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四、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創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縮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針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継續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爭，企图巩固其占領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民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爭，創立許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縮小敌之占領地，在目前，配合主力軍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軍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爭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爭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沒有这种游击战爭，便不能牵制大量敌軍，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軍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領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領：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爭，並准备将来配合主力軍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須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爭，並創立多数的游击战爭根据地，巩固已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須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規軍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爭的骨干。这些軍队应該逐漸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創立根据地，並幫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爭逐漸提高到正規軍战爭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須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員他们大批加入脫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規軍外，把他们組織到半軍事性質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組織，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經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脫离生产的。第四，必須协助人民組織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脫离生产的各县各区应該都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須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軍事政治文化娛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

六，必須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軍事政治制度，实行官兵的平等待遇，經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肅清我軍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爭的軍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問題，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爭根据地都必須尽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制自制弹葯，步枪，手榴弹等的制度；使游击战爭无軍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爭情况。第十，必須依照战略需要，統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領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內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併的軍閥行为。

五、提高军事技术，創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倍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針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軍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車等数量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須就現有的及可能繼續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份制造与修理开始，認眞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設法从外国輸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漸改善軍队的装备，創立眞正現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义，我们应該从实际看問題。在現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該号召全国軍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爭，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視了当前的实际問題，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設新式軍队不可，須知沒有現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軍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並就可能范围內認眞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見現在，忘記了将来，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員方法进步，加之以外国的协助，逐漸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六、实行集中領导下的民主政府，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揮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軍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領导下的民主制度，沒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动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計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竭的深厚淵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統一团結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須从各方面实际有所施設。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該会工作公开的順利的进行，該会議决事項应全部付之实施，並依据該会已經决定的方案認眞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証抗战建国綱領所規定的人民言論，出版，集会，結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由自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內的，只有充分地保証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揮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問題是保証中央法令在各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的限制。应該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卽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他都不应在限制之例。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取民主集权的委員制，並設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設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門；改变公文程式；清除貪污腐化无能份子，吸收抗日积极份子；減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浅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导下，有頒布地方单行法

令之权。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权，均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沒有这些政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爭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为着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增加政府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爭中起其最大作用。沒有問題，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領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敌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領导的表現。全国必須是依照中央发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須是統一于中央的。

七、扩大統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爭。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並使之統一起来，全力援助战爭。长期艰苦的抗日战爭，一切須取給于民众，沒有普遍发展的並全国統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爭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須这样做，抗日战爭正在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員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須做到下列各項：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質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訊眞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並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則建立联合的組織。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軍队，尤其在战区不可和緩。

八、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問題，过去实行太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爭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項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軍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軍人。第二，救济战区災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減租減息，承訊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約权。第四，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罵。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貧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爭与参加增产的积极性，不但战爭需要的一切动員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的数量質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財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滿意的解决。

九、实行新的战时財政经济政策，渡过战爭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丧失之后国家財政經济必大現困难，沒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爭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員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財政經济政策。主要事項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給，滿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並和敌人的經济封鎖与經济破坏作斗爭为目的。第二，有計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規模的急需的部門开始，逐漸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間与外国三方面的資力；並从政治上动員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質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員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組織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証被隔断区域的經济自給。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錢出錢原則下，改訂各种旧税为統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員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債，救国公粮，並发动人民自动捐助

經費及粮食，供給作战軍队，以充实財政收入。第七，有計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爭，允許被隔断区域設立地方銀行，发行地方紙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訂薪餉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規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餉制度。第九，由国家銀行办理低利借貸，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須有認眞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並持之以毅力，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爭，其重心在于組織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着战爭供給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綫被敌占領，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爭的，但須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經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說各項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爭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爭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訂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課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爭所必需之課程及发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則。第二，創設並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組織各种补习学校，識字运动，戏剧运动，歌詠运动，体育运动，創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覚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須拿政治上动員民力与政府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給以恰当的指导与調整，給以可能的物質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財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紙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覚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动中，尤其战区有了显着的改进。但至今还沒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須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間的不配合現象亟应免除。

十一、力爭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爭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則出发，組織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視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分人所謂走德意路綫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驟。第二，力爭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質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我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議。第三，設立一定机关，系統的收集一些敌軍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揚国外，喚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罰日本法西斯。第四，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組織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喚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並經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暫时的沒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份的減少，国联决議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話，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針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見是必要。

十二、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鮮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統一战綫，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鮮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爭失敗下去，必須中日两大民族的軍民大众及朝鮮，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战綫。为此目的，全

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台湾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統一战綫的方針，号召他们为此而斗爭。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軍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內容的日本語，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語的教員到各軍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話起到能够同日本軍官兵講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軍士兵与下级軍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漸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战綫，使百万日本侵略軍变成我们的友軍，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軍俘虏，給以教育，經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統一战綫而努力。第四，設法从日本內地組織反侵略的文化人員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爭。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誠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軍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重心，又一方面則須糾正軍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錯誤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軍官与士兵，並区别上级軍官与下级軍官，实行了上述的方針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統一战綫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須爭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爭給以逐漸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日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綫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份。日侵略战爭愈延长，这一个統一战綫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十三、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不但是国內各个党派各个阶級的，而且是国內各个民族的。針对着敌人已經进行並还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內各少数民族的詭計，当前的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結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須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許蒙、回、藏、苗、徭、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統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須設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員組織成的委員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关事务，調节各族間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員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习慣、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語，而且应贊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他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与輕視性的言語，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結起来爭取实現，一方切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內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眞正达到团結对外之目的，怀柔羈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十四、厉行鋤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謠，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謀，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現下列办法，厉行鋤奸运动。第一，喚起前綫与后方一切軍民人等的警覚性，严密注視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毫不容情的鎮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的机密以叛国罪惡办洩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鋤奸一課，实施提高警覚性的教育。第四，軍队中設置各级管理鋤奸工作之部門，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設置鋤奸小組，国家警察加重鋤奸教育，使叛徒在众目集視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些叛徒们的亏眞是不可計量了。前綫的将士，惊叹汉奸多与損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洩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慘炸二事亦已人人

共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叛徒，将不能設想战爭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覚性，厉行上述鋤奸办法，並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爭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該指出；鋤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覚的与被騙的，坚决份子与动摇份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輕，並注意爭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律看待。还須注意确实証据，勿用刑訊，严防誣陷。鋤奸目的在肃清眞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十五 （略）

（五）长期战爭与长期合作

現在，我们就专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长期性問題来討論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經发生了的許多疑問，作一个全盘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順利的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爭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問題有如下各点；战爭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爭中的合作决定战爭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組織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讓政策，民主共和国問題，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们都得明确的給以答复。

一、战爭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爭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也能够且必須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須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論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統一战綫，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論如何要共同維持一个統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爭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並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二、战爭中的合作决定战爭后的合作

所謂长期合作，不但在战爭中的，而且是在战爭后的。抗日战爭是长期的战爭中的合作已經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継續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継續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証呢？保証就在：战爭中的合作决定着战爭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須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並經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則不能。战爭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継續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現在想得到的。沒有疑义，战爭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爭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爭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爭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沒有根据的預断。

三、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謂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統一战綫，所有阶级，从資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徭弱小民族，所有軍队，从中央軍到八路軍，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統一战綫内，有些人在长期战爭中，当然熬不过艰苦斗爭，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統一战綫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統一战綫。其理由，即是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战爭的野蛮性与长期

性。由于敌人战爭的野蛮性，严重的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存在，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級也不得不与其他阶級一道抗日。上层阶級中一部份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綫的，但其他部份和其他阶級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种野蛮性的战爭是长期的，就决定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該是从长期战爭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規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該是照顧現在又照顧将来，照顧这一阶級又照顧那一阶級，照顧这一党派又照顧那一党派，照顧这一軍队又照顧那一軍队，照顧这一民族又照顧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則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驟，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爭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又一方面，統一战綫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統一战綫不但应該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綫，不是人民陣綫。是包括战爭的与战爭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爭后又分裂又內战的国共合作。

四、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員对三民主义应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現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

还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間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綱：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經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經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現在則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份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內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並領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員所明白認識的。共产党决不拋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經过資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綱与政策，其党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策，亦比国內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佈的三民主义綱領，則是基本上沒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絕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中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在目前阶段的任务）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佈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說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現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現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現的目标，並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誕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綱領，就会

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員曾經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沒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議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並未超过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財产制。現在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全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性質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員，毫无疑义，应該依照自己的一貫的革命总方針，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与全国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誠心誠意实行三民主义。誰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誰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現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責任的。並且应該懂得：只有現实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謂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滿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經訊为必要实行它，才解决将来的社会問題。所謂現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济地位平等"的現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員应該如象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論，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見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設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爭。

五、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略）

六、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讓政策

长期战爭需要长期的統一战綫，前已說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員在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顧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該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則决不应做。……（略）

互助就不是互害，損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論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員决不应該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須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規过，是朋友間的美德，也是政党間应該提倡的作风。

統一战綫中有什么互讓呢？有的，我们曾經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讓步，那就是停止沒收土地，改編紅軍，改編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讓步，这是为了建立統一战綫团結全民族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驟。我们的友軍也作了讓步，那就是承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結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讓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說：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現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統一战綫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內部招收党員，組織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認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現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內战时期，国共两党間除了公开的战爭以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也应該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爭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現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內部作招收党員組織支部的活动，不管統一战綫采取何种的共同組織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約定之后，下级党員如有违背，由违背之

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謙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輕視，垄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說的，共产党員应該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員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員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員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該坚持自己的立場，始終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誰要违背了这种立場，这个方向，誰就丧失了共产党員的資格。但共产党員又必須有互助互讓的精神，必須有尊重友党及友軍同志用謙和商量态度解决問題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們商量解决所有事項，不应独断。沒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統一团結，所謂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讓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讓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讓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結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七、民主共和国问題

虽然我们的党远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間，就公佈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議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經多次的說明过这个問題，但外間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許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問題。抗战的結果将怎么样呢？所謂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問題。再一次解释这个問題，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謂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質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說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說，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論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給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則下互相团結，建立統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設立人民代表会議的国会与地方会議；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級、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与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会、結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並在政治上物質上保护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認私有财产制，但須使工人有工作，並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並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讀书，並保証貧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作，能够充分发揮其天才。一句話，使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书讀，有事作。我们所謂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眞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維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誰作斗爭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爭。日本帝国主义剝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飢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飯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

句話：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中国的反侵略战爭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一、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爭是世界战爭一部分，中国抗日战爭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暫时的減少一部份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論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須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閉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閉关，現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爭闖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二、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資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諸国之間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銳的表現，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組帝国主义互战的結束，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的政治經济新的发展的結果，使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爭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爭”，一点也不錯，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組成了侵略陣綫，实行大規模的侵略。另一方面各民主国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爭；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幫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亚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則助长了叛軍的气燄，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規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爭，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爭的現时状况。

三、現在世界战爭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战爭的現时状态表現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間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爭形式。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大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蝕。在侵略这些中間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爭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亚比西尼亚的战爭，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規模的战爭，但是在不宣而战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爭史上的新紀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于制裁尤其是英国妥协政策，暫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衝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間国家的行动。第二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軍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沒有战爭的表面（沒有打击），但有战爭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領奥国全国与捷克一部，並使捷克余部归屬其統治，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爭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暫时未便和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爭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壯大起来，同时即时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則是各民主国家不愿裁制侵略者，

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結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間国家。

四、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規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內閣，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謂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政局有暫时逆轉的可能。英国大部份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則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捲入战爭，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內部的不統一，法国人民陣綫的积极政策，国內国际輿論的責备，而沒有成功。現在則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爭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訂立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結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規模的冒險战爭。各大国間的战爭虽暫时还可能不爆发，暫时限制于侵略中間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繼續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捲入空前残酷的战爭里去，这是沒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必然的結果。

五、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漸动员中

在資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經济的危險，資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爭牽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爭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則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漸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結自己並准备斗爭。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資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爭，中国的伟大抗日战爭，西班牙的人民战爭，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漸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組織与斗爭才是出路，惟有团結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統一战綫，才有出路。这全世界人民覚悟，組織，斗爭，与統一战綫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須經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爭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沒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爭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結果。

六、中国反侵略战爭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則更加积极。現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領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輕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暫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結果，东方問題与西方問題在当前具体情况下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間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誼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資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記現在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該努力爭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則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

松爭取外援的方針，应該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中国共党在民族战爭中的地位

（这部分的第一——十三节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

十四、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

伟大的斗爭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結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爭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針。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內部的团結，是有决定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遵义会議与克服张国燾錯誤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結最統一的时期了。現在我们党內，无論在政治路綫上战略方針上，时局估計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員会与全党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則的一致，是团結的基本条件。党員与党員，干部与干部，領导者与領导者之間的相互关系，习慣上所謂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許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的政治原則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門的不同，不同的意見是难免的，应該的，党內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許任何不同意見提出討論。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証着交換意見，並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結論，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針，在这里，客观的与全国的看問題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見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問題，这种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漸地学会了，这又保証着党的团結。我们是科学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見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經过了十七年鍛鍊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領导人員，已經有了老鍊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証中央以至全民族形成一个团結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們，全党团結起来，全民族团結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現在我来說最后的一个問題，召集七次大会的問題。

同志們，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沒开大会了。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議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該討論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問題，並决定在不久时間实行召集大会。这次会議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結过去的經驗，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經驗。討論国內国际的政治形势。討論如何进一步的团結全民族，团結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討論如何在长期战爭与长期合作中爭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法与計划。討論如何动員全国工人阶級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在討論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結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順利的执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总方針。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組織的問題之外，七次大会应該选举新的中央委員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許多領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員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領导。同志們，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閉幕之后，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員群众所信仰的干部与党員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証大会的成功。我

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以最壯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讓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滾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的报告就此完結。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至十四在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在抗大的講話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估計到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战爭形勢要逐漸进入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

这里，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針是培植干部。

在今天，广大的敌人占領区域沒有普遍的游击队的活动，千百万群众沒有人去組織，去領导他们进行抗日战爭。这就是說，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沒有共产党，沒有抗日武装，沒有把这些生动力量統統都发掘和发揮出来，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屆中央委員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議上講話（摘要）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統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須設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調节各族間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員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慣，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語，而且应贊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語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輕視性的言語、文字与行动。

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結起来爭取实現，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眞正达到团結对外之目的，怀柔与羈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轉摘自《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的社論《进一步貫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談抗大农庄

（一九三九年）

抗大农庄一个一百几十个人担任了六千个人全年四分之一的粮食，四百个人便可以生产六千人全年的粮食（还是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来耕种）。如果按照抗大农庄的办法，那末中国只要三千万人生产，就可以养活四万万五千万人。全国都这样做，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成什么問題？！所以抗大农庄的路綫是最好的；全国都应該学习抗大农庄的办法，人人要劳动，人

人有衣穿，有飯吃，三民主义新中国就是这样！！

在欢送抗大总校深入敌后所指示的“三个法宝”

（一九三九年）

坚持統一战綫；开展游击战爭；巩固內部团結。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晉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主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話，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結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单是空喚是不行的，一民主义也是不行的。空喚无裨于实际，敌人已占領了大半个中国，稍有良心者何忍至今徒存空喚？单单軍事抗战，算是实行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沒有决心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便与抗战相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終遺嘱上面，說他积四十年的經驗，深知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須实行两大革命原則。就是：（一）喚起民众，（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岂有国难严重到了今日的程度，还可以不实行孙先生的临終訓示？喚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則无从喚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眞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成緩。……晉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欽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輩开口閉口八路軍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則在四圈麻将世界里大打其“游击”，眞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晉察冀边区里面沒有汪精卫党徒，也沒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爭創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聶荣臻同志这个小冊子，有凭有据地述說了該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爭的經驗，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說，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喚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謂予不信，視此小冊。于其出版之始，乐为序之。

（聶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八路軍軍政杂志社，一九三九年版）

在紀念“三一八”并慰劳保卫工作人員晚会上的講話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爭：一种是公开的战爭，一种是隐蔽的战爭。隐蔽的战爭，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內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敗敌人，須內外夾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要求每个保卫工作人員認識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並希望每个保卫工作人員要有持久性，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員大会上的講話(节录)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要在工作、生活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間。以"鉆"的方法求得問題的了解与深入。

(《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延安高干会議上的报告提綱(摘录)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大，党校，馬列学院，魯艺，青訓班，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訊学校，組織部訓練班，行政人員訓練班，边区党校，魯迅师院，边区中学，魯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干部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績，十八年未有过的現象。这些学生、現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績，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見了，今后应繼續这个方針。……

談　爬　山

爬山是抗大課程表外的必修科目，在鍛炼抗日的干部上，有着很大的意义。鍛炼了每个青年的体力，鍛炼出民族战士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是直接連系到战場的实践教育。

給安吳青訓班二周年紀念的題詞

(一九三九年十月)

带着新鮮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論是共产党員或非党員，都是可貴的，沒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經驗，而革命經驗是必須亲身参加革命斗爭，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虛伪地經过若干年以后，經驗就属于沒有經驗的人们了！

(原載《毛泽东同志論青年和青年工作》，一九六〇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第一〇——一一頁)

为《大众日报》周年紀念題詞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

动員报紙，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軍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覺悟，发揚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原載《大众日报》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

在紀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講話
（节　录）

（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

今天开这样的大会，很高兴。

我们女同胞，現在不但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頑固分子土豪劣紳的欺侮，而且还受着那个不开明的男人的欺侮。……現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講話，不准妇女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現在妇女要开会、要講話、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全国妇女就要加强团結起来，几万万妇女結成一个团体，这力量就要大得多，大家应当齐心合力，为爭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我们要准备干他十年八年，要求得一切問題的解决，求得一切痛苦的解决。妇女解放一定会胜利的。

延安的妇女今天有这样的自由平等，能开会、能講話，必須要全国妇女都能这样做，延安妇女应当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奋斗、努力……。

（摘自《新中华报》）

我們有一个好条件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

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是为自己，为中华民族而工作的，我们沒有錢，但一切工作都可做，因为我们不是为少数，而是为自己的，为大多数人的事业而奋斗的！

（《在八路軍后勤政治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談会上的講話》摘录）

《中國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出版按語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紅軍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結內战的經驗。只完成五章，留有战略进攻，战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茲应軍政杂志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党內同志参考。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个路綫反对另一个路綫的意見，对于目前的抗日战爭还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一九四八年版第五八五頁）

不要片面講丰衣足食

不过不要片面講丰衣足食。講丰衣足食，还得講艰苦奋斗，沒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食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它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

（轉摘自《难忘的教誨》《福建日报》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复美洲洪門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

美国紐約全美洲洪門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呂超然先生勛鑒并轉全美洲侨胞公鑒：

奉讀一月八日来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結，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爭，必須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計划，并驅逐亲日派，团結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蔣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軍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軍叛变，取消該軍番号，及将該軍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迁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給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損害。当此民族有之千鈞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驅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爭的計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兌現，总理遺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輩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終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迄未稍变，唯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謀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贊助，以期迅速見之实行，团結幸甚，抗战幸甚。

（原載《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

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紅四軍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議”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莫文驊二同志：

将四軍九次大会决議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晉西北部队，发至連长为止，每人一本，並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課材加以熟練（各级干部均須熟讀）。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一）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八日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是綜合五年来各地經驗而得到的結論。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則一切无从說起。在群众眞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經济上只是削弱（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則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資本主义部分。在經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系奖励資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說是一个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則实行三三制，使地主

資产阶級覚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資产阶級与敌人及頑固派的联合，爭取地主資产阶級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頑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則可以爭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針。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針时，必須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針。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級是坚决反对減租減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須积极援助群众打击地主，摧毀其在农村中的反动統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級感覚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爭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的行动，而这些过左的行动，如果眞正是广大群众自覚自愿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脫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絕对不許可的原則問題），則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这足以达到削弱封建勢力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时，如果畏首畏尾，害怕群众参加，那就是右傾錯誤。这是策略斗爭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所限制，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級跑到敌、頑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出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爭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防止这些过左行动的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經充分发动充分起来后，能够及时的說服群众，糾正过左行动，給与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証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財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爭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爭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爭取一部分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痺一部分动搖不定的地主，集中火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頑固的地主（但与內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內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爭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須表現极力寬大，訊眞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訊眞保障人权政权地权財权，公开批評內部宗派主义（关門主义），糾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說服党員說服农民爭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頑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入孤立以至失敗的危险。但在糾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評时，必須同时注意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緒或热气，須知我们正确的批評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使干部造成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爭过程中，应該有一种酝釀斗爭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勢，农民正在准备斗爭，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則实行斗爭（打）为第二阶段，团結抗日（拉）为第二阶段。在晉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我党政策解决土地問題以外，其它基本区域都經过了酝釀、斗爭、团結这三个阶段。这是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它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針的总过程中，应該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錯誤，大体已經糾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至严重爭議的事件，应作为已經解决，不再变动，維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沒有彻底执行，及地主农民間尚有重大爭議的事件，仍須着重糾正錯誤。

（四）目前严重的問題是有許多地区並沒有訊眞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爭，党員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傾錯誤。这种錯誤不但在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的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也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減租減息与发动群众斗爭。因此目

前需要强調反对这种右傾，要求一切沒有实行減租減息，沒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覚自愿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減租減息，迅速地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須检查此問題，如有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須向他们指明加以糾正。

（五）在农民已經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減租減息，經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評糾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爭。这一阶段（拉的阶段）各阶級的爭議，只能采取民主的合作的合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乡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騙，或被地主收买操縱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須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爭的本領，熟悉政府的法令，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必須防止被收买。

（六）減租是減今后的，不是減过去的，減息則減过去的，不是減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減息問題上：第一，应当允許农民清算旧帐（包括公帐、私帐），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經充分发动，才把双方爭論加以調停，使归平息。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錢的問題，不是限制息額的問題。各根据地都未認清这个道理，强制規定，如息額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該听任农民自己处理，不应規定息額。目前农民只要有錢貸，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貸性質，但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設費中应以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貸款（包括合作社貸款在內），以发展各根据地基本的农业經济，而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投入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須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好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財政部門問題的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三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立即公布广为宣传，認眞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須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則是专門对党內，不得公开发表。每一个根据地內应利用会議、党校、文件，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党的战略与策略方針。然后經过他们使下及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收到成效。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該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該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內，都須經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針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錯誤了。同时，着重的認眞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調許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統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該稍有忽視。但最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財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

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該引起党政軍民各级領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門的充分注意。游击战爭的特点，不但允許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須这样做。

（二）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經引起党內相当的注意，在許多地方与許多部門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現象。但忽視的現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門中，甚至还沒有开始，沒有强調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則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輕重不分，或者沒有經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沒有引起党政軍各级領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論教育，或者至今沒有引起注意，或者脫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論教育的成敗則是革命成敗的第一个关鍵。所有这些，都是必須改革或必須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須給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論从事軍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組織、民运、鋤奸、財政、經济、金融、送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門的干部，必須学会並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門的領导机关及其負責人，必須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的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門則負总領导的責任。其学习范围，包括以下五項：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門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調查研究。例如軍事部門精細調查敌我友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編成教材，用以教育軍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門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財政工作人員应熟悉財政政策与財政法令。鋤奸工作人員应熟悉鋤奸政策与鋤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門业务具体經驗的研究。例如党的組織部門，研究党的組織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經驗，加以分类和綜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門业务的历史知識。例如党的宣传部門，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結，編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門业务的科学知識。例如軍事干部研究軍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門均須研究自己的理論。对于上列各項业务学习，各部門領导机关負有供給材料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績的責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論与实际两方面，逐漸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务之目的。輕視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錯誤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須給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項。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講解时事問題及以地区或部門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項。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应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調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綱領等，使干部閱讀，加以解释或討論等；或动員与本部門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間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軍事指揮員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門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倚、狹隘、不顧大局的弊病。必須指出，空談一般政治而忽視专門业务的傾向，是不对的；但同样局限于专門业务而忽視一般政治的傾向，也是不对的。必須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

习，但其分量輕重应依各部門性質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該減輕，对于党务工作人員，宣传工作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及軍队中政治工作人員等，則其分量应該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經常性的毛病，党政軍宣传教育部門应有計划地克服之。

（丙）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須强調文化教育，反对輕視文化教育的錯誤观点。对于他們，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們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暫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課，宣传教育部門要負責解决課本問題。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許可的地方，必須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輪訓制輪流抽調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为好。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未任的教职員，輔之以兼任的教职員。在环境不許可的地方，則用小組学习制，以該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較高的干部減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員，亦可专用教員。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識字及粗識文字的人而設，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設，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識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則用小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軍机关內，提高文化教員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員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員应受到奖励。

（丁）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論資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須学习理論。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經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項，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論与实际联系与原則，例如政治科学以馬列主义論战略策略等著述为理論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論为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經济科学以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为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經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則以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为主。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組与中级学习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討論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間分配及課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脫节，由党政軍宣传教育部門負責調理之。

（五）不論任何工作部門，也不論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須貫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須由領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須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則，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爭。在情况許可的地方或部門，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許可的地方或部門，学习时間可以伸縮。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費的时間，均算入正規工作时間之內，把教育与学习看作工作的一部分。在鑑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鑑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試、測驗与賞罰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訂定之。

（八）各级党政軍領导机关，应以极大之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而需用的人員（教員与职員）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調給之。各级領导人員有参加教課的責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要用的經費，应最大量地供給之。

（九）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員，尤其是教員，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訂定之。

（《整风文献》）

給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問信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向你们全体战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致以最亲烈的慰問。回想从抗战开始，我八路軍主力开往华北前綫以后，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績的。你们曾經胜利的保卫了我全軍后方、巩固了边区治安，屏障了整个西北。在四年当中，你们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軍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內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你们並且辛勤劳苦，普遍的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績，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結努力

現在已經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苏联的紅軍要在今年打敗希特勒匪軍，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在为了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匪軍而紧张刻苦的工作着。我们則为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爭，准备反攻，要在今后二、三年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面前还有种种困难。我们双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敌人虽然已經被削弱了，但是还相当强大，並且非常狡猾狠毒；国內的亲日派还未肃清，时刻都在想破坏抗战，破坏我軍，破坏边区。因此决不容許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我们必須提高警惕，加强与友軍的团結，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边区更加巩固坚强。

其次，我们的軍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須大大提高。全体战士和指揮員们，必須好好鍛炼身体，加强練习瞄准、投手榴弹、劈刺、各种武器的使用，学习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战术水平。要以大力来組織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軍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我们还須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經济封鎖，克服物資困难，改善部队供給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多种菜，养猪，拦羊，发展棉毛紡織，組織运輸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問題，达到完全自足自給的目的。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前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須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結和发揚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間，在指揮員与战士間，在全体人員相互間，訊眞加强团結友爱，互相照顧的关系，克服其間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閡与不团結現象，在这种鋼鉄般的团結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沒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沒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沒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的。

全体战士，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全体同志们！今年是我们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大家的积极努力，能够早日举行反攻，到那时我们将把丑惡的敌人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除干淨，把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插遍全中国。胜利光明已經

在望，这个日子已經不远。我们在此伟大的年初，向你们大家致同志的慰問。希望你们更加团結一致，更加奋发努力。預祝你们今年在战斗、学习、生产和全部工作中，得到新的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謹致

敬礼

1942年3月4日

毛泽东

慰勉山东临时参議会的复电

（一九四二年九月）

山东省临时参議会諸先生：

寝雷电悉。貴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申正气，为全国作榜样，凡属国人莫不欽佩。当此中国抗战陣营內部一部分綏靖主义者、失敗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为制造內战。危机严重之际，当望貴会及敌后全体爱国軍民，团結一致，再接再励，坚持抗战团結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全国爱国同胞都是愿意援助你们的。目前世界局势极端不利于德意日法西斯强盗与中国叛卖民族及准备叛卖民族的无耻的投降派。苏联紅軍的鉄拳即将打断希特勒野兽的脊骨。英美盟帮的爱国軍民，亦正为最后打倒法西斯而努力。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伟大目标，是日益接近了。

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十二条）

——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議上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

这好高干会議开得很好，已經解决了一个重大問題。开了十一天会議，这个問題解决得很恰当。很多同志都講話了，据我听見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講得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批評錯誤路綫，所有的这些批評，絕大多数的同志，我看是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这中間有××同志的結論，××同志的发言，我認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議在批評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綫上的錯誤，在这次斗爭中間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議中間，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創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間絕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較起来，究竟那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那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較起来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綫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絕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边区是曾經經过內战、經过土地革命。西北同边区是經过了这三个时期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而别的根据地的党，拿每一个根据地的全党来說，那么他们的党龄，大多数同志的党龄要短一些；干部中間有一部分是新来的，外面来的，是新提拔的。而我们这个根据地則不同。这个根据地是經过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虽然那时还沒有根据地，可是有工作；因为

有工作，所以后来能創造这个根据地，比方那时学校有支部，有的城市如綏德、延安等地都有支部，乡下也許有个别知識分子在工作。就由于他们，所以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和群众农民結合起来了，有兵营，有国民革命軍，这是好的。后来国民革命軍有一小部分就变成了紅軍。这时我们开始有了武装部队，这是地方和軍民結合起来了，因此就創造了根据地。拿同志们的表現来說，在这次会議中，表現出进步很快。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許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外来的同志，应該向本地同志学习，特别向本地同志学习。我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本地同志，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同志是經过了三个时期，他们亲身經历了这样长期的三个时期的斗爭。因此他们观察問題、解决問題他们有經驗，比較更好一些，比較那些只做部分工作而沒有这样的独立創造出一个根据地，沒有經过长久的历史，沒有这样丰富的經驗，自己应該懂得，我们是差一点。这些同志应該向本地同志学习。事实証明他们是比我们强，甚至某些职位高的同志，也要向現在职位低的同志学习。事实上在許多問題上，这些同志比我们强一些，更正規一些，这些同志更原則些，这些同志比我们更馬列主义一些，更布尔什維克化一些。所以那些輕視本地干部，有这种观念的，当然口里不說，他口里絕不会說："我輕視你们，看不起你们"，但是心里有看不起人家所謂"土包子"。人家沒有走那样远的路，而自己走了若干路就成了洋包子。比方拿那两个根据地来說，这个是根据地，那个也是根据地，他们在这个根据地沒有走一段路，是土包子，洋包子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来工作，所不同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和沒有走那一段路。象从那个房子走到这个房子，你就洋起来了，你多走了一段路，所差就是这一段路，如果說两个根据地所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就是一段路，一个走了一段路，一个沒走一段路。这一段路算不算經驗？算經驗。因为多走一段路，两万五千里或几千里。从上海、天津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根据地現在还在，你们那个上海天津，現在呢？現在垮光了，全国白区十分之十，全国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光了，全国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只剩下这一个，你那样高明，又是你那里垮了。是不是每个同志都要負責？都不高明？所有万里长征或走几万里来的都要負責呢？那不是这样說，但是从那里走来的同志应該懂得，自己比本地同志所差别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从那里走到这里。你那里失敗的責任誰負責？上海天津垮了誰負责？大多数同志要負責，尤其是領导同志要負这个責任。但我们在那里工作也是土包子，土包子与土包子，这里头，沒有理由产生輕視人家，因为你那里領导不好，再加上客观的原因，敌人的压力很大，主观領导的錯誤，所以白区弄得差不多完了，各个根据地都失敗了。所以我想許多新同志以及老干部，到边区工作的同志，应該誠心地向本地干部学习，这样大家絕不会嘴里講，輕視他们土包子。口里沒有那个可能講，講出来那不象样子。在心里沒有一个，就有十个这样，但有若干是这样想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次会議中清楚地表現这一点。有些外来的同志，甚至职位高一些的，比起本地同志来要差一些，他们不及本地干部。应該使他们懂得，本地干部更原則一些，他们的工作更有經驗一些，工作更有办法一些。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个会議中，应講清楚的。因为这个会里有两部分同志，要很好地結合起来。本地同志很进步，进步很快，掌握政策很好，那么就沒有缺点了嗎？不要向外来同志学习？他们就不能当我们的先生？那可不然，无論任何同志与同志間大家相互都是先生。就是中央和地方，和边区同志，相互間都是先生。中央不向你们学习，中央从那里做起？中央不拿你们作先生，事情是办不了的。比方这次解决历史問

題，沒有这十一天的会議，沒有你们貢献的材料，暴露了这样的事实，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們沒有参加，你們不講，他怎么能知道呢？所以中央同志要以你們为先生，要以他領导的同志为先生，要向他們学习。同样他們也应这样向中央同志学习，也要向外来的干部学习。那怕他就是一个新来的，新加入党不久的，因他总有多少长处。比方一个新的知識分子，我们可以請他当教員上文化課，这不是先生嗎？这些本地同志应了解，自己还有缺点，我们要提高文化，提高理論。××同志講："要提高我们的理論，补足我们的缺点"。这样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是相互輕視，相互排斥，这样来解决問題就好了，問題就能好好解决。我想这次会議，不但解决历史問題，而且解决将来团結問題。将来团結問題，这里面有一部分本地同志，另外还有一部分外来同志，这两部分同志必須很好地合作。很好合作必須除掉輕視的观念，尤其不应輕視本地的同志，我們应向他們学习。关于这个問題，是这次会議已經过去的一个段落，我講是这样一点意見。

今天我想講斯大林同志这十二条，講十二条与刚才講的全党路綫搞清楚，全党团結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講这十二条的。

斯大林同志說："要实現布尔什維克化，至少必須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沒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現在我们同志互相敬礼时，說布尔什維克的敬礼——致"布礼"的敬礼，就是好象大家都說，你也是布尔什維克，我也是布尔什維克，他写信給我，致布尔什維克的敬礼，我写信給你，也是致布尔什維克的敬礼，但我们是不是空的？这个布尔什維克敬礼是不是空談呢？我說要看是否空談，就要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具备了条件沒有。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就不是空談；要实現布尔什維克化，如果沒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具备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布化，只是向着布化。"化"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講十二条，布尔什維克有二三个条件，还有些条件不合，那么你还能算布化嗎？不能够。是向着布化，但是沒有"化"。

現在拿我们全党来說，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說，我想应当是这样看，我们还是向着布化。要講布化我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說，我们是布尔什維克党。从它的路綫，从它的工作說起来，从这个党的經驗、覚悟程度、同群众的关系說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党。但是要講到化，什么叫"化"呢？就是彻底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維克。那么在我们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說，完全布化，我看我们还差，还是許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我们来看这些条件，象斯大林所講的。

第一条："必須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須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費附加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复去所說的那样。而必須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級的阶級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負有領导无产阶級組織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这一条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条在我们党許多地方、許多部門沒有实行，或者沒有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里头，現在我们是不是国会党团的問題？是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斯大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問題，不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問題。因为我们的国会党团——我們重庆参政会有党团，边区参政会有党团，这个党团沒有象斯大林所講的脫离党把党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作为主体——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現象我们

沒有。我们許多同志說：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要？我们許多同志讀了这一条說：这一条和我们不适合，我们沒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講到別的一些問題，就是我们看“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組織形式”，这个“最高”是領导一切形式的組織。一般組織形式，在这里所謂职工会、国会党团，这个問題是有別的例子。現在的事实来說，我们有政府、我们有軍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領导什么东西呢？現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說，党就是領导政府，領导軍队，領領民众团体。除了这三个工作以外，我们还領导什么东西呢？我们不領导別的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沒有別的东西了。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組織。那么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为了整理党务工作而整理党务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說可以的。为什么呢？完全不为別的，就是为着要把軍队搞好、政府搞好、民众团体搞好，所以我们要搞党务工作。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軍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很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軍队的干部，政府工作的、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民众团体工作里头，有工会、农会、青年、妇女、合作社、文化团体，文化团体中間又有各种团体，有文学会、哲学会、戏剧会——戏剧里面又有新戏旧戏，有木刻等等，这一套都是民众团体，这一套可多得很，你这党不管軍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你管什么？你这个党的干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党务工作的目的，完全不是为別的，搞这么許多人，給你小米吃，吃得你发涨（笑声），就要作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党务工作，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軍队，搞政府、搞群众团体，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爭。

但是現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实实在在存在着这一观念，你这个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点，我的軍队你少管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点。这种情形是想象中的呢？还是事实上就有呢？少管到不管，不管到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张国燾，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不要我们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黃袍加身”，鬧独立性，自己有軍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战中間还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以前有这样的事，其它的軍队象这样严重的事是沒有的，还沒有到这样的程度，象张国燾是最标准的，突出的。第二个是項英，是比較次一点，是沒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来。再有的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軍队里有沒有？軍队里面也有过，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沒有公开講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軍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現象，党的意志，决議案不能执行。比如党政軍民关系上，軍民合作不能够执行嗎？相当长期不能执行。这个不执行是不是原則問題，是原則性的問題；不能够执行，沒有法子貫彻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原則性問題。政府的工作，我们实际的政策，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該是很合符党的政策的，这方面我们有沒有缺点？有缺点的，步調不一，政府內部步調不一，政府与党，政府里头工作的党員与政府党領导步調不一。

第二，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有沒有这种事呢？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現在这个問題解决了。过去群众团体之間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青年工作，所謂鬧独立性，鬧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党的政策不相合，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中的党員对党的政策，对党的領导这个关系在过去也是有过許多毛病的。比如《解放日报》第四版，那时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独立国，什么人也不能干涉，这一版和別的版甚至变成这样的事：如象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英国差不

多。在某一点上甚至有过之。实际上这一版是闹独立性。报館的意志不能在这一版实行。現在我们无論那一版，那一篇文章里那一个字假使要干涉也可以。一共有四万字，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服从的，只有一个字不服从有什么关系呢？不提出时不是原則，不提出时不关大局，如果他一个字不准报館編輯干涉，如此下去四万字都要闹独立性。講出来党一个字也要管，好象說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要管怎么样？允許他訂一个条約，說：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可以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他如果要管一切都是可以的。什么叫党？現在我们在"九一"决定中已經搞清楚了。好象政府工作就不算党，西北局不算党，木刻、戏剧就不算党，只是群众团体，那么这个党还很小，只有这底下几个房子才叫党，这样的观念是錯誤的观念。我们所謂党是一切党員，党是党員組成的，……（原稿不清）。旧戏里头有党，新戏里头有党，工会、农会、青年、妇女中都有党。比方除了軍队、政府、民众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文化团体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党也沒有了，就完了。假使这样尊重党的領导，可是我们这里不能叫党，我叫軍队，我叫民众团体，那么实际上就是說不要这个党，因此就沒有党了。西北局不过是几間房子住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

所以关于这一条，我们現在的例子，現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領导一元化，要承認中央的"九一"决定，要承認这一次大会整个关系的决議案。承認党是一切无产阶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一切无产阶級党以外的組織，通过他的党員，一定要归党領导。这种闹独立性差不多自有紅軍起就有了，在根据地中特别发生这些事情，在根据地以外这个問題少些。

根据这种情况看来，我们說比較布化，当我们写这个字时，我们就想想我们"化"的程度，我们布化的程度还是差一点，拿全党来說，我们是布尔什維克党，拿部分的干部，甚至相当一些同志来說，布尔什維克化还沒有，还沒有布尔什維克化。

第二条：第二講理論，"必須使得党，特别是他的領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

第二就是說要精通馬克思主义，而馬克思主义是不可脫离实际的，跟实际是联系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于这一条，在我们党来說，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馬克思主义，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次革命，叫做第一次大革命。从有党到一九二七年，前一段是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这是在什么原則之下？这是在什么思想之下？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之下，是在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这一条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因为中国的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时不但是馬克思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传播。我们中国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級，中国的知識分子，对于世界有所謂馬克思主义，还有所謂发展了的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不大知道的，差不多一般說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落后得很，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变，世界上馬克思主义創造了这样久，无产阶級运动有了这样长的时間，現在列宁主义在俄国有一个胜利，有过几次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大知道的，有某一些人，有某一些翻譯印刷，但是一般的是沒有的。但在这一个时期，十月革命本身对中国是有很大宣传，十月革命本身影响了中国許多知識分子傾向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有很多东西流传到中国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有很大的

事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这时候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起来了。就有一些知識分子，中国自己产生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以李大釗为首的，就产生一部分知識分子研究馬克思主义，开始自覚地研究，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不然，一九二一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可能是沒有的。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經过几年的酝酿，又产生了“五四”运动。沒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都是难的。有十月革命，又有了“五四”运动，又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建設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这六年、七年当中，我们党是个幼年的党，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大革命。象这样一种历史，在外国都不很多，只有六、七年的工夫，干出这样一个大革命来。国共合作，在这中間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那时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全党的活动，都是以馬列主义作基础，同时按中国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綱領进行活动。有些人似乎覚得中国党开始沒有理論的，特别是靠后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同志感覚只有自己是有理論的。我们就講五四以前，就講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这四年中，馬列主义在中国已經有相当普遍的宣传。那时虽然沒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共产主义小組。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样設想呢？怎么忽然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共产党不是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是基督教主义呢？还是孔教主义呢？（笑声）后来有些同志覚得从前那一套不是什么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馬列主义，这个我看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些同志也覚得我们从前那一套不是馬列主义，而只有新翻来的才是馬列主义。那有这个事，不是这样說的，事实就不是这样，沒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了馬克思主义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的报紙、刊物、书籍都在，那时李大釗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間李大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又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証。所以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以后还有一个內战阶段，一个是抗日阶段，就是两个东西的斗爭，一个是馬列主义，一个是反馬列主义；一个是眞馬列主义，一个是假馬列主义。这个会开了十一天，××同志也这样講，一边的口号是“为馬列主义而斗爭”，朱理治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有两万多字；这一边便叫做“右傾机会主义”，也算一个主义，不过是个“机会主义”。（笑声）历史現在証明，这个現在不要书上找証明，书上也有証明而且有人証明，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就是叫做“右傾机会主义”的那个正确，被杀被杀的那些人正确。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馬列主义者，坚决的馬列主义者，很好的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沒有杀得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笑声）。这个情形只有一个苏区嗎？不只一个苏区有，特别严重的有三个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中央苏区，贛东北、四川苏区也有，不过沒这里严重。这是一个錯誤的路綫。一鬧，这个錯誤的路綫就損害整个的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損害，这中間包括了一部分共产党員，馬列主义者，把共产党員与馬列主义者屠杀了，这是一个結果。此外，就是搞光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全国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就是这样搞掉的。第一阶段中間以馬列主义为基础，开始，中国共产党領导了大革命，到了后期分裂了，陈独秀也自称是馬

列主义者，但是那时候的政治路綫是錯誤的，那时候的馬列主义，他后期的馬列主义是什么馬列主义呢？是假馬列主义。結果怎样呢？結果被正确的馬列主义克服了。“八七”会議把他清除了，清算了大革命的失敗，反对了右傾机会主义，反对了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这种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合不合符馬列主义？不合乎。是眞的馬列主义还是假的馬列主义？是假的馬列主义。什么人把假的馬列主义陈独秀这部分人清除出去和他作了斗爭？党里面正确的馬列主义，后来也向立三路綫作过斗爭，向右傾机会主义作过斗爭。李立三也是假借馬列主义之名，所办的事是违反馬克思主义的原則的。后头就是“九八”到遵义会議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党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有向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爭，后来整个內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綫的斗爭，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傾机会主义的斗爭，这个时期整个的斗爭，有向张国燾的斗爭。张国燾是“左”的机会主义。整个內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爭。这三个斗爭是什么对什么？是馬列主义对非馬列主义的斗爭，对不合符馬列主义原則的斗爭，向这样的几个路綫作斗爭，向立三路綫、苏維埃后期的路綫、张国燾路綫，向这三个路綫作斗爭。两个作了結論，一个还沒作結論。我現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結論，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結論，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質的，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样一个結論要不要作呢？要的，“七六”就要作这个結論的。遵义会議以后，我们办的事是一种什么路綫呢？現在同志们都講了，現在的路綫是比較正确的，比較合乎实际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这个是事实。遵义会議以后，党的政治路綫，党的領导思想，組織路綫是比較正确的，比較好的。因为鉴于大革命那个时期的胜利，那个时期的失敗，又鉴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又鉴于內战时期我们有很大胜利，可是我们也有失敗，我们犯了立三路綫，我们中間那个路綫和张国燾的路綫，有过这一連串的历史。这两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分裂。这样的經驗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得比較正确一点。全党的覚悟在这三个阶段里也比較过去要提高一些。但是有沒有缺点呢？我想还有很大的缺点。在开幕那天我曾經說过，我们党內現在有一种自由主义。象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統治的路綫，但是在全党还有残余。这种残余合不合乎馬列主义原則？不合的，对于这种不合馬列主义的残余应該采取什么态度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馬瞞包庇，不注意；一种是向它作斗爭，肅清这种残余。为什么要提出整頓三风？从去年七月一日起，中央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調查研究的决定，今年二月中央又提出了整頓三风。現在差不多一年工夫了。在全党进行整頓三风的工作，进行了这样大的一个学习，进行了工作检查。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不正确的残余，对这个歪风的残余，不应該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該采取批評的态度，糾正的态度。在遵义会議后（一九三五年一月）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就产生了。遵义会議以前是一种“左”傾的錯誤，对馬列主义的态度来說，拿政治斗爭，党內关系来說，是一种“左”傾的錯誤；遵义会議以后路綫是正确的，但是党內是不是还存在毛病呢？毛病是有的，这就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坏傾向。在这时期的主要偏向，我们党內的表現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坏現象，而不是一种过火的斗爭。遵义会議以后，这几年来，我们党內的主要坏現象是过火斗爭呢？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火斗爭有沒有？还是有的。在某些地方斗爭还是大的，但不是主要的坏傾向。遵义会議以来，党內主要的坏傾向是自由主义的傾向。在过去犯这种“左”傾錯誤的同志，在遵义会議以后，就容易犯这种自由主义的傾向。你们这次十一天的会議，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

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过去是过火的“左”傾斗爭，“左”的錯誤。抗战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左”傾为主还是自由主义？朱理治在銀行工作，就鬧独立性，郭洪涛散佈謠言，挑拨离間，这是左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去“左”的轉成了右的态度。

現在我们講到第二条，我们把中国党分为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內战时期、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从开始就是在馬列主义之下建設的，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后来产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来了一次斗爭；第二个时期，以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的內战——国內战爭，但是偏向又产生了，李立三路綫，中間这样一个路綫，张国涛路綫，不过这三个路綫都被我党正确的路綫克服了。哪个路綫是正确的，哪个路綫是不正确的？那几个不正确路綫已把它克服了，現在是正确的路綫，而拿这个正确的路綫克服了不正确的路綫，所以这个路綫是比較正确的，是正确的路綫。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如果說过去是“左”，在这个时期，党內到处表現了右的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拿了馬列主义实行对馬列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以馬列主义作招牌。馬列主义自以为懂了，你就要去做，但是不做。我们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也做，做的时候他就做錯了，他乱搬运公式。还有一种不做事，只讀书。讀了好多“箭”不放出去；一种是无的放矢；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貝古董。在延安近来发生的哪一种呢？是后一种。他们讀了許多馬列主义的书，連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讀书是脫离現状的。这种偏向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能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应該！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机关中，这个現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所以要整頓三风。边区党員是三千，二千，是二千九百呢？总之有一部分党員，名为党員，实际上于党不利，是反党的，是党棍，我们党內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反动分子，他们以党員招牌进行活动。吳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吳奚如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它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鬧乱子，現在向新四軍打电报，証明他是被俘过，他也承認怎样当特务，怎样訂条件，怎样放他的。王实味最近也发現了，怎样发現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員的資格，在这里講話，他们組織了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一共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五个人就組織了一个反党的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仝、王里、潘苏、宗眞。什么人知道呢？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員，那晓得他们反党呢？讀他们的文章还說很好。整頓三风时，他们就先要来整頓三风（台下哄动），我们現在有許多党員在这个时期麻木了，不自覚了，許多党員馬列主义的作风看不見，容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現在暴露了，这样的人他終久要說話做事，在他的說話做事的表現中間，不象一个共产党員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以为这样也算个共产党員，而不把共产党員和这些人加以区别，許多人沒有嗅覚，沒有警覚性，这都是麻木現象。这次会議我希望同志们要注意这个問題，我们党要来一个清理。这算什么呢？是不是自由主义呢？他们是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残余不說話，不斗爭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在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鬧独立性，以前不講，这次会上講了，是馬克思主义，沒有自由主义。过去有些同志不报告，听了他的造謠不反映，这次会議反映了很多关于过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談了一点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斯大林告訴我们，把它列作第二条，要我们注意理論。我与党校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党校准备要讀几十本书。中央的理論学习計划在整风以后，还要継續执行。我们党里有相当多的干部，每

人要讀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书，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有經驗的同志们，不久我们要讀起来，以前我们讀了一些，沒有这样多。从前党內有这样的两千多人，高级的同志每人讀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书，如果讀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明年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四十本讀得了讀不了呢？讀得了。在党校有一年半，就很好了，沒有一年半也差不多。有許多书一个星期就可以讀完一本，象《共产党宣言》那样薄的小本，不作别的事，一个星期讀完一本，一个月讀四本，十个月就四十本，讀了四十本就差不多了，眼睛就打开了。在座的同志们，工作的同志们，假如有計划，三年的工夫可讀四十本。从《共产党宣言》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选三、四十本，有些可以讀二十几本，有些甚至讀几本，主要的讀几本，最高的要讀完三、十四本，在座的同志有三年左右的时間，在党校的同志有十个月左右的时期。我们这样实行，这样計划，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經驗，有这样长的三个历史，再要能讀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书，这样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維克化就能化得更好。現在我们很弱，馬列主义的战士很少，理論方面很弱。因为很弱，所以××同志也講到，为什么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还有人信他的。有些人不信他，又不能很好提出意見說服他。为什么許多人信他的呢？为什么許多人不能拿很好的武器和他作斗爭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弱，在理論上很弱。現在我们要增强理論。增强理論办得到办不到呢？关于这个問題，有許多同志覺得自己对于很多馬、恩、列、斯的书很难清楚，很难讀懂，自己沒有信心。关于这个問題，这几个月的整风学习是解决了的。我看見許多以前認为自己对馬列主义沒有可能学到的这些人，現在有轉变了。以前他们認为讀馬列主义大概就是些专門讀馬列主义的人才能精通，这件事是他们的事，至于自己虽然很想讀，但是沒有可能讀通。最近在二十二个文件学习中間，引起了他们的信心，建立了他们学习馬列主义可以学到的信心，一点点地、慢慢地学是可以学到的，大大地引起他们讀书的兴趣。因此在这次高干会議以后，我们应該有一个学习运动，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几十本书，認眞地天天讀，一遍一遍地讀，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講的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更加布尔什維克化了。如果不然，那么布尔什維克化是不能那样講的，不能講我们就是布尔什維克化了。

第三条，必須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內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細分析的結果，同时还必須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經驗。

我们作决議案，提出口号，向全党，向下面以及向各地作出指示的时候，根据什么呢？斯大林同志講不应該根据一些东西，而应該根据另一些东西，即不应該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历史的比拟，而应該根据什么呢？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条件，这一条拿我们前一年的历史来說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理解，首先应該根据这样的东西，有两样东西都可以根据：一样就是公式，历史的比拟；另外一样就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过去我们所犯的錯誤，所发生的毛病就是根据了第一样那个东西，如果实行他这一条就沒有这种錯誤与毛病。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犯的几次錯誤，恰好就是沒有依照斯大林講的这一条。如你们这次会議中，象朱理治、郭洪涛他们那些“指示”，他们根据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講“优势劣势問題”，国民党加日本他们說敌人处于劣势，而我们則变成优势，那时全国紅軍有多少呢？在提出这种优

势劣势的时候，全国紅軍不到十万，后来也只有十几万人，具体的条件很清楚：一个是多数，多数多到那个程度，少数少到那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口号中間还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綫”的口号。××講过，把这三千人一个一个地摆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綫（笑声）。你只三千人怎么能打通国际路綫呢？还有“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的口号，这也差之不多（笑声）但三千人从洛川到鄜县的六十里恐怕也摆不够，三千人可以摆多长呢？一个人也只能有这样寬，再有一个胖子也不过这样寬（笑声）。况且还有小鬼。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这是根据具体条件嗎？要在稍山里边建立工会，工人根本沒有，可是一定要建立工会。还有一个口号是要“打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决战”，朱理治的文章里就有决战这个口号，提出决战那个口号时，还要打中心城市，担絕作会門工作，拒絕做土匪工作，他们飞出的就是这样的指示。恰好另外一些同志和他相反，如×××、××他们制定的口号，他们制定的指示，他们要作会門工作、土匪工作，把会門工作，会門斗爭的形式，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形式，把土匪工作，土匪的斗爭形式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斗爭形式，如和軍閥联絡一下，朱理治說这就是和軍閥勾結。我们不是和軍閥勾結，而是利用他们。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我们要打击在野的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經在野了，你还要打倒他（笑声）。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世界上那里能找出这样的文件，这样的指示（笑声）？为什么这样？这也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引用历史上的比拟，所以也要写一下。我们也要搞一个集体农場，因为过去苏联有过。要打中心城市，或許是因为在北伐的时候打过武汉，外国——現苏联也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吧，？这是不是周密分析的結果呢？这种口号，这种指示是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結果呢？关于那个时候对国际国內的革命具体条件，並沒有作过分析，或者作过分析，但这个分析完全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造成許多笑話，造成大錯。另外斯大林还講到，同时还必須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經驗。他这里把国际国內的具体条件作周密的分析放在第一位，而要不要考虑国际經驗呢？他講必須要考虑，不考虑国际經驗不行。国际无产阶級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經驗，苏联是革命已經胜利了的国家，这样好的經驗你不要，完全靠自己搞，完全要自己来，对不对？不对的。但应当把这一部分放在后面，把那一部分放在前面。以前有一种譯本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的，現在有正确的譯本，首先要照顧到国內国外的当前的具体情况，並加周密的分析。我们制定的各种口号、指示，就应該是依据这些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結果，应是根据这种周密分析的結果来制定口号、指示，同时必須考虑到外国的經驗，但对外国的經驗要恰当的估計，不是硬搬。

从前在这一点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經驗是在外国当时当地，所謂它的时間、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当考虑到人家这种經驗，而且必須要考虑，但是必須要估計到两种时間、地点、条件的不同。外国反对自由主义，外国反对德波林，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該反对中国的“德波林”。但是，是不是一样呢？不消說，自然不能一模一样。苏联要肅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現在也要肅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要不要采取那个經驗呢？当然要采取的，但是一模一样的搬取就不行。在外国，在苏联有过清党运动，我们現在也要把党来一个洗刷。要不要采取外国的苏联的經驗？要采取外国的經驗，但主要应从我们国內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分析。比如王实味确确实实是个托派，吳奚如确确实实是个特务，边区里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員是党棍，是坏人。我们对这

些人，对我们党员，要一个一个具体来看，要按照具体条件来处理，同样也要考虑到外国的經驗，正如上面所講的，制定口号这些东西都必須注意，比如我们刚才講过的历史上有許多缺点、許多口号制定的不确当，糊里糊涂制定口号，象朱理治，郭洪涛制定的就是这样。現在我们看，今天有些什么口号，有抗日統一战綫，抗日的口号制定了沒有？制定了！是怎样制定的？是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象国共合作，各阶級合作。又比如，从前我们有一个八小时工作的口号，現在我们还坚持这个口号，但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現有条件下，是一个宣传口号，不是一个行动口号，而不是象过去某些人所認識的那样，在农村里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朱理治、郭洪涛就要在稍山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現在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只当作一个目标。将来全国工业发展了，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联現在工业发展的結果，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比八小时还减了一个小时，所以，八小时工作制度只是一个目标。另外，过去还提出了不分富农、中农的田的口号，今天我们提出了減租減息，繳租繳息的口号以及抗日統一战綫的口号。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国內外的具体情况加以很周密的分析呢？是不是根据这些条件周密分析的結果而制定的呢？是根据周密的分析，周密的研究。如減租減息、繳租繳息的口号在今天是适用的，在抗日統一战綫时期是有效的。又比如三三制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当前国內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呢？是的，我们周密分析各种經驗，認为要实行三三制，所以我们开参議会，我们和各党派人士合作。我们今天实行三三制是糊里糊涂制定的呢？还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呢？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度，減租減租，交租交息，三三制，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这是总口号）都是这样制定的。今天整頓三风、精兵簡政这样的口号提出来了，如整頓三风这个口号，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呢？回答說，我们現在确有需要。精兵簡政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項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只有現在提出这个問題才恰当。这是在現在这样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具体分析的結果而提出的口号，各地方要实行，就要討論，我们边区一定要实行精兵簡政。有些同志在去年参加过参議会，在参議会通过精兵簡政以后，並沒有加以周密具体的分析，因此不能够进行彻底。精兵簡政过去不只进行过一次，为什么会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沒加以周密分析，沒有把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人，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間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簡政。究竟在今天能够簡多少？政府系統，党的系統，民众团体系統，执行这个精兵簡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該有一个精密的分析。象現在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他们所作的那些工作，是先加以具体的周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具体的規定，这个工作作风是对的，不是那样糊里糊涂的說現在要精兵簡政了，就簡。以前簡过好几次都說沒有簡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几次精兵簡政都沒有实行好，沒有彻底，糊里糊涂，沒有加以周密的分析。所以斯大林講的这一条要不要注意呢？我看斯大林講的这一条很重要。我们要更加布尔什維克化，就要注意这一条。如果沒有这一条行不行呢？如果沒有这一条就不行，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綫，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場，打大城市，再搞肃反把馬列主义者肃掉，这些經过具体分析沒有？沒有，就是糊里糊涂乱杀一頓，斯大林講这一条，就是講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这一条就是一个方法論，是一个思想方法，是一个看問題的方法。我们拿前一年的历史反省一下，过去凡是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同时及顧外国經

驗，那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不注意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工作就做不好。結果制定的口号，政策就不合实际。不合实际的口号、指示就一定行不通，做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論，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必須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爭的烈火中檢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这里有个第四条，后面有个第十二条，都是講檢查，但这两条的意思是不同的，这条里的“檢查”指什么？主要講檢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則的路綫；后面是講檢查工作作风。这个路綫的实行，口号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說，要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內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細分析来制定口号和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論。但是单有这一部分够不够呢？不够的，因为你說是根据具体条件的仔細分析所制定的口号、指示，方法論还沒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說所制定的指示要在实践中間得到証明。理論从实践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証明。第三条講的这个从实际調查中抽出来就是講所謂調查研究。口号、指示、决定、决議案，就象你们現在所做的討論的东西，从实际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論的第一条。还有一条，你们說正确么？那么那时他们也講根据实际呢？朱理治也講的，他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的对立，国內形势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等……。要在实践中考驗，結果是白区十分之十，苏区十分之九搞掉了，在革命烈火中檢查这个口号，檢查結果怎样呢？烈火中那个可謂烈矣！国共两党十年內战可謂烈矣！檢查的結果，那时的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呢？不正确的。象打中心城市，稍山里建立工会、打通国际路綫，肃反这些东西，无論那个都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正确的，××、×××倒是正确的，岂不是革命烈火斗爭檢查正确不正确呢？朱理治、郭洪涛不信我们試試看，使得使不得，不然就轉弯。現在我们的指示，我们刚才講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三三制，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十小时工作制，整頓三风，精兵簡政……等等。象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这些口号，这些指示，究竟跟实际合不合？我们要来檢查。比如我们过去党內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檢查这个制度合不合教学的方法？我们檢查結果是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那么怎样？就要改。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馬列学院，党校也算火焰，教育了一两年檢查一下，檢查里头有教条、里头有三风。过去我们边区有两次作了精兵簡政的决定，現在实行了几次，在今年春上，檢查的結果，还不彻底。今年我们这个高干会，决定了許多，这次高干会以什么为准呢？开这个会是不是正确？我们承認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認正确，那我们就不要作决議，既然作了决議、就要承認是正确的，是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这样作出来的。但是是否正确？不在于嘴上講的，究竟怎样？最后的証明要在你去做，作对了就是对。但在作的过程中，不对的还要修改，你这决定的許多东西中是不是每条完全对？如果每条完全对，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当；如果还有一二条不对，那就是周密的分析还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号、决定都是这样，不能糊里糊涂地講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講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沒有覚悟的人，我们說現在中央的都对，这是因为中央过去有这样多的經驗，有这样大的胜利，我们犯过許多錯誤，現在是比較慎重的解决問題，是来一个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以后，証明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說正确，不然是不能說的。中央不能說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指示一經提出，不要証明，就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說的。如果可以这样說，斯大林的第四条提出来做什么呢？岂不是多余了嗎？理論是从客观实践中抽出来的，又从客观实践得到証明，这是第四条。我在这里講話，我决不能說我的話一講出，那就完全正

确，这要在实行以后証明他是正确的，才是正确。今后任何領导者，任何同志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驗眞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是眞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可以說不在他的决議案、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宣言，我看也差不多，他隐瞞党，单把他所說的所講的一点和过去比，有进步，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在他作出以后，过去他隐瞞党，以后不隐瞞党了，过去胡乱搞，今后不乱搞了，过去犯錯誤，以后不犯錯誤了，过去破坏党，以后不破坏党了……那时我们就信了。馬、恩、列、斯告訴我们說：宣言、决議案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是在他实行的結果。所以第四条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人做事是有計划的，他要做决議，口号，沒有第四条是不行的。单有第三条，沒有第四条是不行的。

第五条："必須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內还沒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驟和每人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級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訓練和教育。"

这一条講什么东西呢？这一条就是講工作作风，他这里的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維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沒有革命的作风，而是一种改良的作风，所以应当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調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俄国布尔什維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統治的，布尔什維克党就是从那种改良主义中分裂出来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不革命。条件变化了，今天是无产阶級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呢？它是改良的作风，它沒有办法領导无产阶級去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党。各国按照布尔什維克作风建立了共产党，如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作风，他这指示、口号、政策、作风实行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群众一天天革命化，使工人农民就不再那样想改良，不再妄想第二国际想的那一套，使他们一天天革命化，教育广大的群众，他講的本意就是这个。这对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沒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統？我们沒有。×××同志的文章講得很好：我们中国沒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統。我们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許多大的錯誤。一个是右的，我们今天講这一条，应該講什么呢？就应講反对自由主义。現在我们党內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反对过"左"的，比如征粮工作，不調查乱派一頓，命令主义。这样实行能不能让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这是已經革命的地方，还可以使他们更革命，还需要他们更革命。比如，当兵打日本，要出公粮，就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出公粮？当兵呢？不能的。同时我们有自由主义，就是刚才講的。党內有很多的坏蛋，有王实味，有吳奚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馬列学院，这具体的例子，是不是一种新的作风？那里头缺乏新的革命的作风。我们魯艺，在报紙上看到，在××同志領导下，現在轉向新的革命作风。你說过去就不革命嗎？不对的，过去也是革命的。那里有很好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得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魯艺的学生，这都是群众。怎么样使他们自然而然革命化？我想具体的步驟就是整頓三风的办法。在这个月中間，你们看中央研究院，在范××同志的領导下，整頓三风是在新的革命步調下实行的。这些步驟，使中央研究院的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得魯艺的群众，在××同志的領导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現在每一个

机关，比如“解放日报”社，五湖四海，集合了許多人，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我们边区这地方有党校，有边区师范，有财政系統，有銀行，有各种机关，从各方面来的人都有，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傾向，我们就实行这种步驟，叫做整頓三风，实行这一种比过去更进一步的新的革命作风，使这些人自然而然革命化。比如什么笔記啊，漫談会啊，大座談会啊，小座談会啊，传观笔記啊，开展批評啊，实行这样的步驟，使得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全边区要实行这个步驟，你们回去也要实行这一条。我们过去的作风，有許多不健全与不正确的地方，那是改良呢？还是革命化呢？我们沒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統，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員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过去，不安心工作的問題是沒有解决的，是存在着实际問題，很多的人，天天想調动工作，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有多少呢？不只一两个，有好几百，好几千个在工作崗位上不安心，因此我们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頓三风，自我批評，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了。他们調动工作也愿意了，从前調动工作哭哭啼啼，講价錢，现在覚悟了，已革命化了，已进步了。斯大林講“改良与革命”对我们有沒有用呢？有用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問題，我们是沒有的。我们有的問題，命令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我想这样来解决，这样来实行这一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級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内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教育广大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和教育边区这一百四十万人民，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三、四十个工厂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各个机关里的工作人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軍队里的干部和士兵。是不是应該这样做？是不是应該这样解释？我想是应該的。这第五条对我们是有用的。

第六条：“必須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能和关門主义混为一談！）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談！）結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並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傾听群众的呼声和預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这里講这一条要把原則性，要把革命的原則性同联系群众結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教育群众，而且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你要講要教育他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則同联系群众結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你只講党的最高原則是不行的，党員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你不联系嘛，教育个屁！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你不联系就脫离，你与群众脫离了关系，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党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与群众脫离了关系你怎么提高他呢？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先鋒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漸地提高到了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級都废除了。阶級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了，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要这样逐漸地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如果不联系不接触群众，那怎样去提高他们呢？而且也不可能傾听到群众的呼声，你怎样知道人家的迫切需要呢？人家的迫切需要是要打游击，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农民的事，而你在这里要在稍山里建立工

会；人家需要的是分土地，你需要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要搞八小时工作。

这第六条是講群众工作問題，斯大林告訴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要求就是最高原則。但是用什么方法去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呢？这就要依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現在中国的环境，要求低一些，比如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則，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話一說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問題。比如在×县有一个庙打了，老百姓就不高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先鋒队，我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们主张破除迷信，知道沒有什么神与佛，我们是不要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呢？不知道他们現在还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經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我们中国人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薩，开洋船就不必信了。木船不信龙王菩薩翻了不得了，洋船翻得很少，很大的风浪也不怕。乡下信观音菩薩，所謂送子观音。破除迷信是最高的原則，如果今天破除了迷信，同志！他们沒有中央医院，人家生娃娃生不出来怎么办？生死了怎么办？（笑声）我们有中央医院可进，中央医院有金大夫，有外国医生，如果生不出，他可以开刀破肚，如果生不出可以挖出来。那就是灵得很，这就不要迷信了。迷信是有原則的，是受生产条件、經济条件限制的。比如我们是反对求菩薩吃葯的，但有人要求神，因为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吃了不会死人；第二比較便宜。要是請医生，还要給他吃猪肉，这就要好几元錢，还要送“色对”。医生的葯有时还要吃死人的，其实如果到处有西医，如果中医进步的話，那么求菩薩也会減少。我们这破除迷信是个最高的原則，但我们現在应該迁就他们。比如婚姻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原則，現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地鼓励了这点，而“統統是乱七八糟”（此处未听清楚）。我们說不要破除迷信吧！这就是忘記了最高原則。中国講民主，但在重庆、西安去講是不行的，我们現在忍耐一下。所以要把最高的原則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不要忘記了最高的原則性：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場、打大城市……等等最高原則不要忘記，这个原則是我们建立党的最高目标，忘記了就不算共产党。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的，可能做到的，就这样来做，这样才算与群众密切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了。澎湃同志在海陆丰，他在那里自己也去敬菩薩。澎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地主，又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大王，是个共产党員，是中央委員。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薩。老百姓是二月十九日拜观音菩薩，你也去，他们就說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說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薩呢？你也去，他们就說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說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薩呢？我看你这个人不大正派吧！菩薩不可信，我說我们就来信一下吧！你說我相信菩薩，人家看到你是大学生，又是留学生，看到你相信菩薩，人家說，你說个好同志，群众見了你就請你坐下来，就請你吃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該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戴这样高的拿破伦的帽子，穿一双皮鞋，手里拿着司的克，这样就不行，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也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就可以懂得他们的迫切要求。我们懂得了以后就要慢慢来，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薩就少了。在中央苏区就只有老太婆还相信菩薩，特别是有儿子在軍队里当兵的老太婆，他们还相信菩薩，他们求菩薩保佑她的儿子打胜仗，如果她有几个儿子在軍队中，或者死了儿子的，她就更相信菩薩了。而在一般的群众中就不相

信，特别是青年人不相信菩薩，因为他们是身强力壯的，靠自己，所以他们不相信菩薩。老太婆相信菩薩，她們是有各种原因的。这是一条，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則，要把这两个原則結合起来，一个是最高的原則，一个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則不要变成了关門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門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敬观音菩薩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混同于老百姓一样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巴。人家天天敬观音菩薩，如果你也天天敬观音菩薩，这样的相信观音菩薩，你就放弃了最高原則性，相信菩薩要能把握住最高原則性。苏联还有教堂，但是現在全国教堂已經沒有用处了。現在只有几个老太婆还相信，在高加索有几个地方的老头子、老太婆，他们还相信，他们相信也就让他们相信，但是不要跟他们做尾巴。苏联天天反对信宗教，信宗教有信的自由，反宗教有反的自由；信宗教的宣传宗教，反对宗教的也宣传反对宗教。信宗教的，他们天天喊上帝万岁，如果取消了反对宗教，专門宣传宗教，也天天喊上帝万岁，那就变成了尾巴主义。这一条是群众工作的原則。应該不是关門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要作两条路綫的斗爭。

第七条："必須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險主义混为一淡！）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淡！）結合起来。"这就是要把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如果不然，党怎么样呢？那么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級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配合起来。

有些在前面已經講过了，这一条特别提出，第六条着重于群众工作，第七条講統一战綫原則，講統一战綫的战略战术，講斗爭的战略战术。斗爭的形式，組織的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問題。这一条可以成为一大本书，斯大林每一条都可写成一大本书，第二条是理論，第三、第四条是唯物主义，每一条都可成为一本很大的书，第六条講群众工作，第七条講統一战綫，斗爭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部分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别的阶級，别的集团。我们革命要按照可能性，可能与他们联合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比如我们的三三制，这个三三制是最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我们要把不調和的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们曾經打倒过地主，現在要联合地主，实行三三制。过去曾經沒收过地主的土地，現在是減租減息与交租交息。这个办法叫什么呢？叫灵活性、机动性，这是不是丧失了革命性呢？托派这样講我们，也說我们投降了資产阶級，投降了国民党。过去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十年，今天日本人打来了，又同他联合，这叫做灵活性、机动性。而托派說我们反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我们說相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他们說我们投降了資本家。所以"左"傾的人就拿这些話来罵共产党。說共产党是右傾。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講的就是这个第七条，告訴党員要把革命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那时候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有些人提出反对打迂迴，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做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做国会工作，也反对利用国会做講台，他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作了这本书，过去不大注意它，郭洪涛、朱理治过去就沒有看过这本书，也不忠实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沒有看进去，而这上面許多东西都講了，第三条上面的东西大概那上面也講了，那本书上主要講了統一战綫問題，講反对"左"傾机会主义，如果不講灵活性，只講革命性，那么有沒有可能来掌握各种斗爭形式，各种組織形式呢？沒有可能的。

要只講打仗这一种斗爭形式。这种斗爭形式是主要的斗爭形式，武裝斗爭形式。八路軍、新四軍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去开參議会。去开国民參議会，这个要不要呢？我们还是要的。我们还是要到重庆去开国民參議会。就拿日本占領区、淪陷区来說，八路軍在华北打，新四軍在华中打，天津、北平、上海、冀中現在是日本占領了，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嗎？人家占領了，我们打不出，我们有沒有办法？我们有种办法，叫做合法斗爭。伪軍是合法的，人家承認的，我们可以利用伪軍，在伪軍中做点工作，比如象怠工，这不是很大的违法，如今天推托出发，修路推迟两个鈡头到工也不算很大违法，这就是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員过路，晉西北老百姓在淪陷区用怠工的方式不去修沟，有几个区的老百姓就不去修沟，这是合法的，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八路軍、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淪陷区老百姓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就会不見了，那一个区域的老百姓，李四张三跑出来說："日本人，我们打倒你！"那他的头就保不住了。要搞合法斗爭，你老爷叫我修路，好吧！回去后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不修一点。現在日本士兵开了代表大会，有很多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在各个地方都作了。那些要求是什么呢？要日本人发手巾，要日本人允許炒菜館子存在。这是什么斗爭形式呢？这是合法斗爭。因为炒菜館子是日本人承認的，因为法律上有，后来不承認了，发手巾法律上也有，現在不承認了，可是沒有手巾就不能洗脸。这是合法斗爭，这个如果实行了，手巾发了，炒菜館子也能存在了，也就滿足士兵群众之意了，那么这个合法斗爭就胜利了。沒有手巾就发动斗爭，这就慢慢把覺悟程度提高了，变成为群众运动，这样的一次二次三次就慢慢地把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覺悟程度提高了，这就是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的配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講："布尔什維克三次革命的經驗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最丰富的。"的确，是最丰富的。布尔什維克在俄国十五年中（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經过三次革命，有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流血斗爭与不流血斗爭。这一方面，中国的經驗也許还要丰富些。因为我们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是同时存在的。布尔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沒有苏維埃，只可以作些合作斗爭。我们不然，我们过去十年內战是非法，可是在白区我们可以作些合法斗爭是他们許可的，如搞合作社，黃色工会。那时××同志搞黃色工会、合作社，講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在国民党区內可以作两种斗爭；一种是利用合作社、黃色工会、学校等等作合法斗爭；另外还可以搞非法斗爭，白区也有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虽然法律不允許，我们还可以做。在日本人区域也是一样，在日本人区域作非法斗爭，有时还不适宜，有时还是要的。現在法国、德国立刻准备推翻希特勒的斗爭是必要的。我们演过一个新木馬計的戏，他所写的斗爭是什么性質呢？是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两种，象神密的不能使人知道的那一部分是非法的，象可以同人家合作的，如要求加工資。章程上有的他不做，我们就要求，这是合法的斗爭。新木馬計描写了这两种斗爭，比如《水滸传》上的祝家庄，两次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做了新木馬計，有一批人假裝合作打宋江，帮助我们打宋江的那就欢迎的很，相信他们，这就是合法的，但暗中准备非法斗爭，等宋江打到了面前，內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沒有內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馬計都是这样。单单有一种斗爭形式，只有合法斗爭，沒有非法斗爭也不行，如社会民主党。单有非法斗爭，沒有合法斗爭是"左"傾。列宁曾批評过"左派"幼稚病，要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現在联合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这个陣綫包括罗斯福、邱吉尔、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民党，包括范围这样广大，苏

德协定並沒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还在英美，而苏德协定破裂的时候，英美苏协定便建立起来。英美苏合作不成功，因为张伯伦反对，要搞慕尼黑。张伯伦要联合希特勒打苏联，我们让他们打张伯伦，我们要和德国合作，因为他要联合德国打我们，德苏协定，德国和我们訂条約。张伯伦到了胜利就变心了。实现公开化就是去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苏德战爭。英美苏等国的联合，灵活得很，如果沒有这样的策略，不采取这样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就不行。有哪些組織形式呢？英美协定、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軍青年大会，有中国代表，有美国代表，这是組織形式。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組織形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組織形式与斗爭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門一条講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与斗爭形式的問題，要有最高的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是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变化了，我们联合国民党。人家进行反共高潮和我们斗爭，我们只好斗爭，等到形势能够轉变的时候，我们立刻放弃斗爭。閻錫山搞新軍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援助新軍。当那时候我们能够搞好，我们便和他搞好。斗爭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結，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只講这一点，下次再講（鼓掌）。

今天我把这个問題講完。关于第六条、第七条还有些同志不大清楚，为什么原則性不能和关門主义相混淆？为什么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相混淆？底下又說，为什么不可調合的革命性不能和冒險主义相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相混淆？关于这一点，这个原則性，他是說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的最高原則性，这是講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们对基本群众，比如講群众里面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的提到先进地位，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提到先进的党的水平**，这就是最高的原則性和最高的覚悟性，但是不要离开群众，这里头不要有关門主义，所以講不要与关門主义相混淆。如果講原則性，比如拿党內来講，經常有許多同志所謂提高到原則的高度。比如在中央苏区，有一个学校里头，就是关于吃辣椒的問題也开展斗爭，把吃辣椒提高到原則高度，說不准吃辣椒，如果吃就沒有原則，提高到原則的很高程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那里是原則性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原則性，而是关門主义，是乱用原則。这叫做原則？这个不叫原則，这叫做关門主义。这样只能搞一个不吃辣椒的党，那么吃辣椒的人都不能进来。所以有許多关門主义假借着原則性，他们的口号是原則性，实际上不是原則性而是关門主义。我们要善于区别，不要把原則性同关門主义相混淆。原則性是广大群众他们所适合的，广大群众今天不适合，将来也是适合的。比如前天講破除迷信，这一点要破除，但今天广大群众信迷信立即提高到先鋒队的不信迷信，是不行的。我们怎样把广大群众的信迷信提高到先鋒队的不信迷信？这就要和广大群众接触，逐漸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工作，在这个陝北，你来破除迷信，你来提倡婚姻自由都要注意这一条。所謂原則性，我们要善于区别。有些人假借原則这个名詞而实际上是关門主义，那是实际上不要原則性。至于联系广大群众时又不要忘記了这个原則性，最高的原則性不要忘記了。如果忘記了，比如迷信的破除，今天老百姓是信迷信的，因此我们就不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一切信迷信的可进工会、农会。你講在我们党內也有少数人信迷信，也有的，我们陝甘宁边区三万个党員，你說一个也不迷信嗎？信迷信的还是有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贊成婚姻自由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拿信不信迷信，拿贊成不贊成婚姻自由来作为检查党員的标准，要拿另外几条，作为标准。我们跟群众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然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叫做最广泛的联系但不能

做群众的尾巴。最广泛的联系是一件事，做尾巴又是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講最广泛的联系不能与做尾巴相混淆。我们講最高原則並不是脫离群众，但我们要向着最高原則性走去。我们要經常記得：最高原則絕不是关門主义，关門主义是一种东西，原則性是另一种东西。这是講原則性和落后性，怎么使群众的落后性提高？但不是尾巴主义？我们要經常記得，最高原則性絕不是关門主义。

至于第七条“不可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这是講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已經講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妥协。”列宁批評这个口号是要不得的，是錯誤的。但是当西欧的共产党提出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们自命为“很革命”，自命为“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作任何妥协是革命性。但是他们是不是革命性呢？不是革命性，这是冒险主义，他们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覚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爭，不看群众的覚悟程度，他们不作国会斗爭，不利用其他的合法斗爭，就是进攻，这就叫做冒险主义。这个时候要迂迴，要妥协，列宁講到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的时候，他說：在党的历史中曾經作过許多妥协，这一妥协要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这不是迁就行为，第二国际的行为才是迁就行为。共产党布尔什維克要和别的阶級、别的成分进行妥协，进行合作，甚至利用敌人。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利用了沙皇的国会，这个国会是敌人的，不是同盟者，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規定：共产党員可以进去当議員，共产党可以以若干票当議員。这时候全国沒有大革命，象这样的当然可以利用，如果不利用，这不是革命，实际上是冒险主义，是冒险的进攻。所以需要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最大限制的灵活性，比方講这样的例子，苏联跟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是在去年六月以前的德国，曾經訂过德苏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党，在十年前就和資产阶級妥协过，在全世界上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資产阶級进行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軍閥斗爭。甚至現在全世界共产党，除了法西斯国家的資产阶級外統統同他们进行妥协的。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同地主，在我们边区是同地主。所以那样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級对于别的阶級只有小資产阶級能够領导它，至于資产阶級那是不能的。現在我们不但同資产阶級合作，而且同地主合作，各个根据地的地主阶級、資产阶級在共产党領导下共同抗日。英国資产阶級的保守党，美国資产阶級的民主党，中国的資产阶級、地主阶級。現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无产阶級，无产阶級政党，无产阶級祖国苏联都同他们进行妥协，这个妥协不同于迁就行为。这个妥协叫迁就行为嗎？这不叫迁就行为，这是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結合起来了。我们和他们进行妥协，是不是忘了革命，就一直妥协下去了？資产阶級、地主阶級他们是这样想，这样希望，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妥协不忘革命，革命不忘妥协（笑声）。現在需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很大利益，而且要同全世界大資产阶級、地主阶級妥协起来。比如波斯同苏联訂条約，波斯的皇帝向苏联妥协了，但这不叫迁就行为，完全丧失立場。革命完全不管，比如张国燾就是这样，张国燾跑出去以后到了汉口，在《大公报》上落了宣言，发表他的意見（这个宣言現在还可以找到），他講的妥协就是迁就行为，就是完全不要原則性，完全不要革命性，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只要妥协不要革命。現在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些冒险主义——一九一八以后的冒险主义，在这里开会，你们清算了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冒险主义，他们是“左”傾机会主义，是清算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性是冒险主义。

这种冒险主义絕不能与革命性相混淆。革命中間的冒險主义，他们的这种冒險主义，他们自称为革命性，自称为是革命理論，自称为是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些人也覚得他也有革命理論，也有革命的政策，这是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理論，革命的政策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无疑問地相信他这种宣传，以为这是革命的理論、革命的政策。但是这不是你搞錯了，这是冒险主义。我们講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是和冒險主义相混淆，不可調和的革命性是一个东西，冒險主义又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斯大林講了，在統一战綫中右傾的东西可能增长，所以我们要防止那种借口最高限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变成了迁就行为。典型的是张国涛，口头上是灵活，实际上是迁就。斯大林講了要我们注意，这是这六条，第七条的补充。

第八条："必須使党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錯誤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第十条："必須使党經常地改善自己的組織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結一致。"

这两条在联共（布）党史結束語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間有錯誤应該批評，这两条分开。在这里第十条的范围和《联共（布）党史》結束語所講的那个似乎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意思差不多。現在我们在这里就把《联共（布）党史》結束語第四条来看看。《联共（布）党史》結束語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講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同这个布尔什維克化的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点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馬列主义理論，要有革命的理論，跟布尔什維克化的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講工人阶級的統一；第四条講共产党的統一；第五条講自我批評；第六条講群众工作。关于工人阶級統一，第三条就是講工人阶級統一，工人阶級队伍中間应該是統一的，那些欺騙工人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政党，应該和他们斗爭。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列宁式的党，我们有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有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的共产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的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要与反革命分子作斗爭，使工人阶级統一，还有就是使党統一起来。

第四条就是講党的統一，我们就是講党的一元化。

其次，党史教导我们說：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調和的革命斗爭，如果不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有自己队伍的統一和紀律，就不能实現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現其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建設的使命。

"我们党內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在反对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經济主义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同布恰林分子反民族主义傾向者作斗爭並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而斯大林分析了这种东西，說应該粉碎，並且說："也許有人以为布尔什維克为了与党內机会主义者作斗爭而耗費的时間未免太多，以为我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間有机会主义存在，正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領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領导司令部中，决不容許有缺乏信心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不同資产阶級作殊死的斗爭，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了解，这样的斗爭只会受到失敗的結局。堡垒是最容

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須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間，工人阶级的領导司令部中間，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間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洗出去。”（《联共党史》四三三頁第八行至第十五行。）

这里講了几种人，講了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比方講机会主义，如果他不是叛徒，那就是机会主义。但是党除了对机会主义以外还有沒有别的？还有叛徒，比如王实味、吳奚如。前天講了吳奚如表面是共产党的，实际上給国民党作事，这叫机会主义嘛；王实味是个托派，他在这里組織五人反党集团。这叫什么？这类叫叛徒。机会主义就是在政治上，比方講，这一次你们开了十一天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損害党，損害革命。这样的前方堡垒——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內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在进行斗爭的时候是什么呢？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堡垒中也有敌人，参謀部內也有敌人，結果捉了許多人，把××同志，×××同志也捉起来了，杀了二百四十个干部，几乎把領导人都杀了，把大批共产党員都杀了，××，×××也几乎杀了，你說危险不危险，堡垒是最容易从內部夺取的。这叫三打祝家庄。一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二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三打祝家庄打进去了，为什么打了进去呢？小說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不但正面进攻打进去，而且那堡垒是从內部夺取的。新木馬計告訴我们，要我们从內部夺取。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如此，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堡垒里面，我们党里，特别是我们領导机关，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性就是在最高領导机关，象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团、大代表团、小代表团等这样的权力机关里头有机会主义。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現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話，就是以机会义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質。我们同意一个同志的分析，同意张秀山同志的分析，张秀山同志講得对，他說：他的前途有三个：第一个前途，反对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二个前途，継續两面派；第三个前途改正錯誤。这三种都有可能。这种分析我認为是很恰当的，这三种是講現在，将来总有一条，要就是反党鬧事；要就是継續两面派，隐瞞党，欺騙党；要就是改正錯誤。至于这三种可能那一种可能性大？現在难以分析，我看我们現在的政策，还是允許他们在党內，使他们进步，这是我们的。但还有他们自己，要他们自己覚悟。如果他们自己覚悟了，可能走第三条路——改正錯誤，不然就是第一条或第二条。

《联共（布）党史》結束語第五条講什么呢？党史又教导我们說“如果党覚因为胜利而驕傲起来，如果党覚已看不到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及时来公开誠恳改正这些錯誤，那它就不能实現其为工人阶级領导者的使命。”

这里講到应該看到缺点，应該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驕傲，应該看到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不要害怕，应該承認錯誤，不要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認这些錯誤，要公开的承認，並且要誠恳的糾正，要公开的講，不要关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講一講。即然認为是錯誤，就应該公开的糾正錯誤，公开的承認，誠恳的糾正这些錯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不能成領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評与自我批評，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錯誤的实例来教育和訓練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它就会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里《联共（布）党史》告訴我们要在犯錯誤中間来教育自己，教育干部。如果隐瞞錯誤又怎样呢？这里講了，第一，講应該怎样；第二，講如果我们糾正了这些錯誤，就会很好，这样党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如果总隐瞞不糾正又怎么样呢？“如果党竟隐瞞自己的錯誤，抹

杀迫切困难的問題，用百事大吉的粉飾詞令来掩盖自己的錯誤，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浸透自滿情緒，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臥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我们現在有沒有这样的人呢？这不是路綫問題，所謂机会主义路綫問題，也不是什么叛徒、奸細的問題，而是我们工作中个别錯誤的問題。（这样的）。这次这个会，过去十一天是清算过去历史上的問題，以后若干天还有討論，这个性質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又反对闹独立性反对自由主义的錯誤，我们要討論闹独立性的問題，自由主义錯誤的問題，我们要精兵簡政，我们要整頓三风。現在我们整頓三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說要糾正自由主义的錯誤，糾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錯誤。犯了这种錯誤的人，犯了独立性、犯了自由主义錯誤的人，他们应該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該采取隐瞞錯誤的态度嗎？不应該的。对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应該隐瞞这些事情嗎？高干会是党的，西北局是党的一个組織，高干会是整个边区党的高级人員的会議，应該隐瞞自己的錯誤嗎？如果隐瞞这个錯誤，如果隐瞞这个迫切的困难，精兵簡政是不是迫切的困难？整頓三风是不是迫切的困难？如果百事大吉的虛夸（粉飾詞令）来隐瞞自己的缺点。我们边区党的系統，政府系統，軍事系統，民众团体中有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应該不应該用百事大吉的虛夸（粉飾詞令）来隐瞞自己的缺点？不应該！应該承認錯誤，应該运用批評与自我批評。人家对我们批評，我们自己也应該作批評。如果党开始驕傲起来，不看見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害怕承認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的公开的承認、糾正这些缺点，那么党就可能免于灭亡。所以这里講的，党史教导我们說，我们应該承認錯誤，应該看到錯誤，应該及时的公开的和誠恳的糾正錯誤。

第二、如果是这样的公开糾正錯誤，承認錯誤，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史再告訴我们，我们党如果不是这样，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百事大吉，隐瞞錯誤，抹杀迫切困难的問題，一味自高自大。《联共（布）党史》講到自高自大，在我们延安也有自高自大，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不好！这里沒有講老子天下第一，你加上一句也差不多，这里講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覚，那就要灭亡。

我们講，如果不糾正錯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就要发展，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这个头也要亡掉，二百四十个干部的头亡掉了，××，×××的头几乎亡掉了，“刀下留情”恐怕党就不免灭亡。《联共（布）党史》在这里首先引了列宁下一段話：“政党对于本身錯誤所持的态度，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眞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負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对于錯誤所抱的态度，是考察这个党是不是眞正的党，是不是認眞办事的党，是不是在眞正执行它的义务。这个党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义务，这就是講要公开地承認錯誤，揭露产生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这是郑重的党的标誌，这就是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訓練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这种錯誤是不是包括路綫錯誤？我想也可以包括路綫的錯誤。在一些时，以及不久以前的时候，党的領导机关犯路綫錯誤，因此我们应該公开承認路綫的錯誤。因路綫的錯誤而一直走下去，象孟什維克路綫，托洛茨基路綫的錯誤，后面沒有作反革命的事，还是革命的时候，那是路綫錯誤，但是不包括成为一种派別的継續的斗爭，同党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反革命，这是属于那一条呢？这是属于第四条。我想这个也可以包括犯大的錯誤，也可以包括犯小的錯誤，个别的錯誤。至于現在我们整頓三风这个思想斗爭是属于那一条呢？是属于第五条的，《联共（布）党史》結束語告訴我们，要我们有这个区别，要

把这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区别。成为党内一种派别，小組織派别，繼續他一貫的路綫錯誤，这是属于第四条的。这些应該給以无情打击。在第三条里头引了列宁的話，他說："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它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爭，才能实現无产阶级的統一。"对于第四条，要清除出去，要象割我们身上毒疮一样割掉；必須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間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至于第五条，就是一个教育态度，就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对于第三条、第四条，党外反革命的派别，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嗎？不能用的。因为小組、小派别，一貫的反党，那不能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对王实味、吳奚如也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嗎？这个不是的。他们可不可以覺悟呢？当然他们也可能覺悟。我们陝甘宁边区施政綱領上写：对于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分子，我们給他回头，給他们活路。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当党員？不能当党員。过去我们把这个东西，（現在已需要講一下，）就是我们党内长期沒有这个区别，沒有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区别，把第四条和第五条混合起来。現在我们根据《联共（布）党史》結束語，要加以区别。假如眞正是一个共产党員，他们想做好，現在我们能采取第五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之，沒有希望了的，暗中采取两面派，繼續第二条，第三条，繼續破坏党的行为，象第四条中所列举的，象俄国的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这样一些，沒有問題？这些人后期当了敌人的偵探，而他们前期因为一貫錯誤路綫，这些人应該用第四条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給他们以无情的打击。甚至还可以救药的，还有希望的，用第五条的态度。我想以后应該这样的分别第四条和第五条。我们的党，現在正需要这样的分别，过去是沒有这个分别的，长期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两条是分不清的，差不多犯了小的錯誤，个别的錯誤，也給以无情的打击，跟反革命沒有区别，共产党員犯了錯誤，跟反革命沒有区别。

第八条就是《联共（布）党史》結束語的第五条，必須使党不害怕批評自我批評，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能根据自己工作中錯誤的实例来教育和訓練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錯誤。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寬大政策，党内的寬大政策和党外的寬大政策不同，这两种寬大政策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遵义会議以来，我们党内有寬大政策，对外也有寬大政策，但是这个寬大政策不同的，和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的寬大政策是不相同的。譬如象发展党員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員，那个上面說要大批发展共产党員，同时說不要使一个坏分子混进来，这叫做开門政策，大开門，但他同时又关了一扇門，对坏分子是关了門的。你說要寬大政策，是的，我们要大批吸收共产党員，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进来，但对于坏分子要关門，对于不是坏分子是革命的要开門。我们的施政綱領是对外的，对外要采取寬大政策。敌人分子，俘虏，特务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回心向善，不坚决作坏事，愿意改正錯誤的，应該采取寬大政策，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对愿意改正錯誤的是寬大政策，但是沒講对任何反革命統統寬大，这样日本人也可以来开会，日本飞机可以降下来在这里添了油再飞上去（笑声），这是不行的。中央的寬大政策——对党内对党外的寬大政策，是不是象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这不行。我們的寬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寬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在各方面生长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党务工作有自由主义，政权工作有自由主义，軍队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財政經济工作有自由主义，鋤奸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自由主义，以致使我们一些部門，有相当多的人，眼睛看不

清，象吳奚如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象王实味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吳奚如、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我们的党报上，我们的党报会发表不正确的文章。我们党报上的文章是不是統統都是革命的人写的？現在証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吳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員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吳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呢？这是应該审查的。我们各部門工作中有沒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所謂寬大政策，麻痺了、誤解了，解释不正确，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很多問題不加解释，沒有斗爭，对于干部保持一团和气，有了斗爭是不是原則性地展开批評自我批評呢？很多地方沒有。說这是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象这样的执行，不是正确的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有些部門，有些干部沒有严肅的态度，强調一方面，缺乏一方面。团結教育，强調了这方面，缺乏另一方面，批評，对錯誤的斗爭。經常教育、斗爭性这方面是缺乏的。如果缺乏这方面，这样的政策叫不叫干部政策？至少不能講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錯誤的，是有錯誤的干部政策。干部之間的关系，領导者与被領导者之間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原則：第一个是团結，第二个是有了錯誤要斗爭，要有正确的批評与自我批評。这就是布尔什維克化的第八条，也是《联共（布）党史》結束語的第五条。

我们是不是完全执行了这第八条？我们是不是完全实現了《联共（布）党史》結束語教导的第五条？我们的干部政策完全布尔什維克化了嗎？我们党內关系完全是布尔什維克化了嗎？拿斯大林講的十二条的第八条和党史的第五条来看，有許多部門，过去如中央研究院，魯艺，从前的馬列学院，那样的自由主义作风，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馬列主义，对付党。我昨天講过这两个学校改造得很好。从前那种作风——延安許多机关学校的作风，那叫正确的关系嗎？那叫正确的制度和干部政策嗎？不能的。在那些严重的地方，完全是不正确的；在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地方，是不十分正确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現錯誤，不愿意公开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这个錯誤的严重性。所以列宁告訴我们要“公开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我们办了沒有？沒有办。我们就有錯誤，我们就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最近中央关于对党外的寬大政策，有了一个解释，再过几天請博古同志印些单张，在会場上发一发，大家討論下这个問題。現在有相当多的反革命分子、奸細藏在我们党內，藏在党的环节中，我们不懂得，因此忽視了，好象不大要紧。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他们藏在共产党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些人也采取寬大政策嗎？我们現在整頓三风，精兵簡政，是两种斗爭，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資产阶级思想的斗爭，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資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党員是这样性質的斗爭；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爭，这就是对于吳奚如、王实味这样的人，現在我们开始在几个机关里审查，发現这样很严重的問題。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高级領导同志，在各个机关里，領导部門里，要非常仔細地注意这个問題，要分别这样的两种斗爭：一个是第四条，一个是第五条。第四条是一貫反党的錯誤路綫，后来一直走到反党的那样派別，那样的思想，要无情的打击，清刷除去；第五条就是講犯錯誤，共产党員犯錯誤，有大的，有小的，要自我批評，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应該区别这两种。当前整頓三风的时期，也正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拿中央研究院来講，一百二十多个人，反革命的只有几个人，那么他们一百一十多个着重自我批評，着重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級思想对小資产阶級思想作斗爭；

对五人反党集团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爭。我们現在有两种斗爭，这两种斗爭是互相联系的，沒有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反革命就查不出来，最近两个月，大家学习，整风，发現了这两种斗爭，在无产阶級思想和小資产阶級思想作斗爭的过程中，发現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爭。一个是少数，一个是多数，少数是領导人，多数是群众，多数人要和少数人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作好。我们整頓三风也只有少数的領导和多数的群众相配合，我们无产阶級思想与小資产阶級思想的斗爭，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这两个斗爭要少数和多数的配合，一定要有少数人的領导，但只有少数人是不行的。

怎样使我们党完全統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你說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怎样象法？人有男的女的，不一样，老头子和十七、八岁的娃娃不一样，高的矮的不一样，我们是講我们的心一样，不是講别的一样。我们要一条心，但我们党內有一种人只有半条心（笑声），完全是无产阶級思想的人是一条心，还有小資产阶級思想的人要用无产阶級思想克服它，有小資产阶級思想的人是半条心，他要革命，但有許多东西是妨碍革命的。再有一种人是两条心，就是王实味，吳奚如。朱理治到底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路綫的不同，郭洪涛和朱理治他们是两条心，××，×××他们是一条心，这两种人是两条路綫的不同。那么吳奚如、王实味他们也是两条心，他们不但是两条路綫的不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在革命队伍中有路綫的不同，这是两条心；革命与反革命也是两条心，路綫不同实际上是反革命，但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員犯錯誤，假如朱理治不是反革命故意混进党內，那么是共产党員犯了錯誤。現在我们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路綫不对就是要把路綫的錯誤克服。是反革命，革命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要把半条心用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过来。陝甘宁边区沒有半条心？鬧独立性是一条心还是半条心？鬧的輕的就是半条心，鬧的重的就是两条心，张国涛他鬧的重了，就是两条心，在边区大体上說还是半条心。現在党、政、軍、民、学、有鬧独立性的不是一条心，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步伐整齐。

在这里我们还要講一下关于批評錯誤的提法。这一个問題有的同志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績。有沒有这样的同志呢？有。这样的同志不只一二个，有相当的一部分，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績。抹杀成績，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本来有成績，为什么要抹杀呢？但是問題要看怎样的提法。王实味他有一个提法，我们又有一个提法。王实味他是不講成績的，抹杀成績，只暴露黑暗，他是反革命的，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自我批評，現在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作証明，我在党校二月一号整頓三风报告中，关于我们全党成績的問題，这个报告一共有一万多字，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有一万多言，而个文章合起来有两万多字，但是講成績的只有一百多字。那么，是不是我把成績抹杀了呢？我沒有抹杀，这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党还有什么問題呢？党的总路綫是正确的，是沒有問題的，我们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我们党有几十万党員，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在領导人民，向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絕的斗爭。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績，这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怀疑的。"我在这里講的只有一百多个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百另一个少一个（笑声），那就对不起（此段是按照《整頓党的作风》一文排印，字数比原搞略有減少）。关于我们全党的成績，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一年全党的成績，我只講了这一百个字，全文有多少字呢？全文共有二万多字。但是講成績我只講到这一百个字。那么是不是可以講我抹杀成績了呢？我不能这样講，

我这里並沒有抹杀。我们的成績只有一百个字，其它都是講缺点和我们的錯誤。至于这个錯誤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說，“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风了。”假如还要多講的話，还可以講一点，扯它一长篇，要这样作是可以作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現在是作的什么呢？我们作的是自我批評，不是吹成績，我们只有这样一句話：“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风了。”誰敢駁我们說，現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完全是占統治地位呢？我講不是占統治地位，这个是上了书的（笑声）。关于理論的問題，我们首先要問“我们党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过高了些。”再下面講的就是我们的理論还是不够。你說我統統都講我們的理論水平不高嗎？和过去一样嗎？我沒有这样講，我講的是比較过去高了些。如果再要多講的話，也还可以扯它一长篇，但是我們現在是作什么呢？我們是要把缺点指出，所以有这样一句話就差不多了（笑声）。

关于知識分子，我們批評知識分子的缺点，驕傲自大，脫离实际。关于知識分子的长处，“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应該的，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唉呀！那么我們革命知識分子就了不起！再下面都是講知識分子的缺点。关于中央“九一”决定、“关于統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領导及調整各組織关系的决定。”怎样估計我們党的成績呢？我們的統一，我們的团結，估計了沒有呢？我們估計了，就是“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統一領导，一般是統一的，团結的，党、政、軍、民、（民众团体），各組織間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結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爭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这有什么証据呢？这是有証据的。假如沒有統一、团結，乱七八糟的話，那么抗战怎么能打了这么久呢？所以关于自我批評的提法，据我所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懂得这个問題，有些同志在会議上怕抹杀他的成績，在会議上非要摆成績不可，那么我們可以僱上一个人，吃飽了飯，一天到晚地說：成績，成績，成績！成績！……（笑声）这样的講上一个鈡头。如果还不嫌少的話，我們还可以再講，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同志們，我們在这里开的是什么会？如果是駁王实味，那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否認成績，我們就摆一大堆成績給他看，他否認成績，我們就是要成績。我們有一百个字和这七十个字是講好的，我們不否認成績。我們的目的就是講：我們已經有了这些成績，但是我們的成績还是不够的，我們現在还有毛病，鬧独立性，还有自由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毛病，因此，有那三两句話来講成績就差不多了。再下面就是分析缺点和錯誤。列宁曾經說过：要我們“公开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产生錯誤的条件，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办法。”但是我們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东西，他們不愿意公开地承認他們的錯誤，不愿意分析錯誤的原因，不愿意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条件，他們过去不愿意这样，也不会这样搞的。

現在講第九条：第九条講什么呢？“必須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領导核心中去”。

这一条斯大林已作为布尔什維克一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才能是布尔什維克。沒有这条就不是布尔什維克。这条講什么事情呢？对我們現在有沒有意思呢？这条很值得我們注意，而且过去我們对这条很有收获。但在許多地方还有許多同志，他們完全不懂得这条，这一条的重要性他們完全不懂。这里形成領导核心的問題，有中央領导核心，有地方領导核心。中央的領导核心是經过大会选举出来的。斯大林告訴我們，在我們中央領导机关建立的时候要

注意：地方領导核心、机关、学校、团体的領导核心要不要呢？也要的。沒有領导核心，事情办不好。現在我們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团体中不注意，完全沒有注意，或者注意的很不够。这就是講，如果沒有領导核心，眞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学校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团体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比如說文化团体，沒有一个領导核心，要把文化工作搞好，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青年工作亦是一样。边区应該有一个領导核心，过去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懂这一条。似乎不要領导核心可以，似乎我自己就是一个領导核心。（笑）

他覚得，我是一个領导核心，他亦覚得我是一个領导核心，我也覚得我是一个領导核心，这样就是三个領导核心了。（大笑）因为各人都以自己为核心，那么就是有了好多核心了，但領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嗎？不！只有一个核心。領导的一元化，还是两元化，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論，个人自以为是領导核心（笑），你要附属于我，我是核心（笑），你們都是我的附属品我便舒服了，这不是实事求是。"九一"决定便講这个問題。"九一"决定这里有两种領导核心。边区已經开始实行了，以西北局为領导核心，所有党、政、軍、民、学的領导同志都要参加西北局，但是要集中在西北局，不能各人搞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覚、作的梦各不相同，在关中、三边、直属县，隴东、綏德，要建立五个領导核心。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建立两种領导核心。关中党、政、軍、民、学沒有一个集中領导机关，怎样进行斗爭呢？怎样搞經济、怎样搞财政，怎样搞干部教育，怎样和特务作斗爭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只有統一才好进行斗爭，才便于和敌人斗爭。在机关学校中，还有好多同志，不运用这一条。現在中央研究院很好了，过去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过去那种状态，一百二十个人，象一百二十块砖头，在这里沒有分别，沒有形成領导核心。那时，王实味他們形成了一个領导核心，即五人反党集团。我們共产党沒有形成这样的領导核心。王实味利用整风，墙报一出来，那时便是王实味的天下了，許多人被拉到他們那里去了。他們有討論，他们有汇报，他们有研究。你文章不会作，我王实味写一篇，用你的名字。他们用多种策略、汇报制度、研究政策、研究如何斗爭，你写的文章我怎样駁都研究一下。他们有領导核心，但我们沒有，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打了敗仗。尔后，我们便集合部队，批評我们的缺点，好多已經跑到王实味那边去了的人，由于我们的部队开会检討了一番，又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反过来打王实味了（笑）。中央研究院最近大半年是很可以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現在形成了領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随便搞三四五六块砖，便成为領导核心呢？在一百二十块砖中，随便找几块出来，便是机械的凑合，不是有机的配合，这样是不行的。是要从斗爭中产生出群众的領导分子，积极的活动的最先进的分子。現在中央研究院不同了，不仅一百二十人覚悟了，特别有几个人，他们会鑑别王实味、李实味，他们有办法，他们是在斗爭中形成的干部，只有在斗爭中才能形成干部。但是現在有的机关、学校、沒有注意这一条。平均主义，大家都是干部，不是在同志中，在干部中，依照干部的实际来分析。天天講分析，自己不作分析。假如分析，总是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中間的、落后的三种，只要上了一百个人，便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分析边区三万党員，有多少积极的；多少中間的不是很坏的，多少很坏的？我们作了任务。講党內政策，对于积极分子要团結，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組成为領导核心。另外还有許多积极分子，仍可吸收他们中有成信有办法的。通过他们去教育很多人，教

育不很积极又不很坏的，教育他们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笑)，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对少数落后分子进行教育。領导核心自己要教育自己，要进步。很多人进步了，少数落后分子也落后不起来，也不大象样子了。你们联系群众我看就不大象样子。反革命王实味，现在住在窑洞里怕得很，过去王实味誰也去看他，你的“野百合花”写得好呀！（笑）现在是臭狗屎了。我们的鲁艺、延大、党校、解放日报社、軍事学院，那一个部門，那一个机关，那一个地方，都要依照这个办法。这是斯大林同志講的第九条，搞个領导核心。

这个領导核心，究竟有什么条件呢？斯大林講两个条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誠，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級的意向的眞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經驗，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眞正的无产阶級革命領袖。”人家講是十分忠誠，不是九分，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这里講的主要是全国全党的領导核心。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要十分忠誠。人家說要十分忠誠，你只有九分忠誠，那这个領导核心就建立不起来，就不合斯大林的条件？那也不是的。那也要按照你的情形，要把一百二十个人中間，最积极，最原則的分子团結起来。

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什么叫作忠誠？斯大林同志講：所謂十分忠誠足以成为无产阶級的代表。所謂十分有經驗，是足以成为領导阶級斗爭的領袖。簡单的講就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这些优秀分子是十分忠实的，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級之意向底眞正的表达者，並且他们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为无产阶級革命底眞正領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底策略和战略的領袖。”他的忠誠足以成为无产阶級的代表，他的經驗足以成为領导阶級斗爭的領袖。領导阶級斗爭就是（运用）馬列主义，所以他底下講；要善于运用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阶級的代表，不是說个人的代表，小集团的代表；来一个宗派主义好不好？来一个派別代表、个人代表、个人野心家好不好？那可不行。斯大林說，这可不行，而是要足以成为无产阶級的代表，阶級意向的眞正的表达者。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所办的事，是不是眞正的“代表”？“眞正的”三个字不要，“革命无产阶級之意向”那几个字也不要，他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代表，是一部分人的小集团的野心家，或者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个人的代表，代表他自己。鬧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到底代表誰呢？代表无产阶級吧！但无产阶級已經講好啦！无产阶級的总代表是斯大林（笑声），他在第一条中就講好了，我们是不要独立性的。而他们呢？又要鬧独立性，你们就不能代表，沒有資格，資格取消了。这样，領导核心的人，第一条是忠誠，第二条是有經驗；忠誠足以成为阶級的代表，不是小集团、个人野心家、鬧独立性。在今天，他们足以对付王实味，足以教育同志。比方在一个学校里，善于拿无产阶級的思想去克服小資产阶級的思想，又善于拿革命去克服反革命。在各县的同志又善于作別的一些事，要善于財政經济，善于征收救国公粮，还善于一些別的事，要作这样的領导核心。

第十条：“必須使得党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致性。”

这一条，上面已經講过了。它指示要經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怎样叫作改善？比方說我们边区有三万党員，要洗刷一部分，現在听說有三千个党棍、极坏的分子。其他的要教育，那么現在在边区三万党員中，清洗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党棍是不是叫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叫做。在延安也清洗了一部份。比方講，如果把王实味这一套包括在內，要

洗刷的还有与王实昧不同的，沒有組織五人反党集团的，就是那些很坏的，完全不够党員資格的，也要清洗他们。要經常清洗，要經常吸收。現在边区就有許多在党外的比在党內的还好，党員比他們差。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要把那些差的清洗出去，这样叫做經常改善自己組織的社会成分。我想这一条在边区党可以作，在延安完全可以实行。

第十一条："必須使得党建立起鉄的无产阶級的紀律。"要制定这样一种紀律。这样一条，不但在别的条件上区别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这一条上也区别于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他們不要这种紀律，不要这种鉄的紀律。消极的自由主义，現在在我们党內存在着，在边区存在着，在延安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是破坏党的紀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沒有紀律，鬧独立性，小广播，講价錢，調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議案，講了不做，見了坏分子不批評，見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爭。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那无产阶級鉄的紀律就不能創立起来了。斯大林是要我们創立鉄的紀律，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使这种鉄的紀律創立起来呢？是不能的。底下講到，这样的紀律，建立这样鉄的紀律，要有什么条件，斯大林严正說："这种紀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之目的之明确性、"要整頓三风，要开高干会，是基于思想的統一性，运动目的之明确性。运动目标是要明确，我们边区的党还有不明确的，"要打出去。"但現在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团結抗战，一部分人想打出去，就跟这个运动的目标相反。整頓三风也算是一个目标，整頓三风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以无产阶級的思想去克服小資产阶級的思想，一个是要克服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目标要搞明确，如果不搞明确，如在整頓三风开始时有些同志不明确，認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整一部分人，而我是不在內，是整某一部人，不是整所有的人。后来把这个目标講清楚了，整頓三风是整頓全党，拿边区来說，拿延安来說，我们党主要是干部，所以我們干部要参加这个整頓三风的运动。不認識字的要听講，認識字的要学文件；这时整頓三风的目标明确了，因而現在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有中央研究院、魯艺、延大、自然科学院以及各部門，各机关，中央各部門，軍委各系統，那些部門都統統要进行整頓三风，同时学习检查工作，每人有份，整頓每个人，那时目标就明确了，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紀律来。有些人躲风，我有病了！哎呀！肚子痛！要門診部給我看病，出去門診，却不看病，而到山上去打扑克（笑声），这样就躲了风，沒有整了，这样有沒有紀律？这样就沒有紀律。現在有不少人躲风，現在整风一来，他的歪风就躲了，于是就找門診部，哎呀！肚子痛！各种办法都来了，这时要实行紀律。运动目标明确了，少数人的紀律就好执行。如果运动目标大家都不明确，那就沒有法子整风。

精兵簡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要明确它是实行在困难时期，我们的政府、軍事机关工作人員太多，要精簡。我们的干部有很多缺点，如官僚主义等。有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定了几項，要精兵簡政，官僚主义要打倒，精簡节約，統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簡政，要精兵簡政，人要減少，因此一定要統一思想，不要鬧独立性，要使每个机关，每个工作人員能发生很大效能，不要馬馬虎虎，要节約，現在是困难，要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把精兵簡政这个目标就明确了，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全国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現在唯一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法西斯陣綫。这問題，在前年参議会上講过，这样的目标我们經常提出。参議会为了什么？是什么目标？沒有别的，专門为了打倒日本，除此以外沒有什

么任何别的目标。現在我们当前的运动，这样明确的目标，可是虽然这样讲，又发了“七七”宣言，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志，他们还不懂得，所以我们还要研究，这次会議还要講的，要使运动的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統一，思想統一，运动的目标統一明确，实际行动要統一，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什么地方看出思想統一与运动目标明确呢？要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統一，就証明你的思想統一。

运动的目标要看清楚，还有党內广大群众。对党的任务要自覚。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勉强强的担負起，如果这样的党員多了，紀律就建立不起来。許多党員对于党所提出的任务，他还不懂得，完全是被动的，你要我担我就不担，沒有自覚性。要使党內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任务是抗日的任务，团結的任务，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要精兵簡政，要整頓三风，大的小的这些任务，每个任务要党員去作的时候，要使党員清楚，要他有自覚性，要使它眞正了解。現在我们边区有三万多党員，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党員，对他们的任务还不明确。比如講征收救国公粮，过去曾經发生过許多毛病。由于党員对于这个任务不自覚，党員对于征收救国公粮的这个任务不自覚。有那么一些党員，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发生了毛病，就不能执行紀律。

斯大林講，紀律的基础是基于什么？斯大林說：“这种紀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的目的之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統一性及广大党員群众对党的任务之自覚态度而成长起来的。”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紀律。紀律是逐漸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紀律我们就搞紀律，不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紀律就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样的教条是不是可以建立？也不可以！馬、恩、列、斯指导我们一个方向，紀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好办了，紀律是創造出来的，不是現成的东西，我们有工作做，紀律就有了，思想的統一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統一性，广大党員群众对党的任务要有自覚的态度。現在我们自覚的态度与作风很多党員是不够的，那么我们鉄的紀律怎样？不够！那么布尔什維克化，化的怎样？化得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党一化就化得很好，如果化得很好，还有什么事做？沒有化得好。我来講这十二条，我向同志们說明。就是要同志们懂得，我们現在的毛病很多，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的党是布尔什維克的党，党要布尔什維克化，就要化得彻底，現在还沒有那样地好。拿紀律一条来講，好容易一个紀律，思想統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統一，党內广大党員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覚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鉄的紀律，做不到这些，就是象鋼，某些地方象豆腐，某些地方相水一样，离鉄就很远，那么鉄的紀律就沒有。

第十二条：“必須使得党有系統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

要检查决議案的执行，看怎样行的，一个是决，一个是行。决而不行就要检查，决而行，决而不行，决而行了一半，那有什么办法知道？就是检查，如果不然，那么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对党的信任。

搞了一个决議案又不执行，搞了一个土地政策，我们就要执行，我们决定了要行，要在陝甘宁边区行，陝甘宁边区要按照具体情形，还要决一下，中央决一下，他们还要决一下，所以現在边区还要搞一个土地政策、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决定，这很多决定，还是一个决，还

是不行，什么时候行？就要在乡下行，現在有多少村多少乡？要在乡下村子里办到減租減息，交租交息，那叫做行。怎么晓得行，要检查！这是斯大林告訴我们的話。

所以这十二条，斯大林講："沒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布尔什維克化便是空想。"

如果沒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那么布尔什維克化是什么东西？沒有这些条件，布尔什維克化，化得了化不了？化不了！那就困难，斯大林把检查工作放在最后一条，就是告訴我们要經常检查工作。

整頓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大会也算一次检查，首先是作了历史的检查，再还要討論許多的問題，你们下去实行去，做了将来还要检查。

这是十二条，比較明显扼要！这一共大概一千多字，在所有的文件里头。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有一千四、五百字。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則問題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經驗的总結，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現在我们整頓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結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經驗。而且总結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經驗。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斯大林写的文章又不是馬克思写的文章，怎么叫一百年？沒有一百年的經驗，斯大林是写不出来？馬克思就写不了这样具体。在馬克思那时候，不能写得这样具体？能不能写出这十二条呢？很难？沒有这些經驗！《联共党史》結束語第三、四、五条，沒有后来的經驗，就很难写，就是第二条，他写得那样具体，那样明确，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新的結論，这种思想，馬克思早已有了。馬克思他自己講他的东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总結这一百年的經驗，才能写出。那些个結論原則是被新的結論原則代替了，列宁的那一条去代替了馬克思的那一条，以前能不能写？沒有經驗怎么能写出！这是告訴了我们以后怎样做，写得这样具体了！

关于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領导一切的革命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一条。我们有"九一"决定，我们有党的統一領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講；"不要闹独立性"。这一次高干会，又整頓各組織間关系，叫做整頓关系，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条这样的实行。

关于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馬克思主义，精通要联系实际，不脫离实际的那种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相当于《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二条。第二条就講得很詳細，在这里他只講一两句話。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教育政策，在这里，講到教育政策时，告訴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他說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条式的，一种是眞正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我们也講过这个东西，六中全会討論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习馬列主义，至于其他的就不講了。这是如何精通馬列主义的問題。

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号、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再照顧国际的經驗。这我们有一个"調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反对根据公式，那种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比来制訂口号，政策。而要根据客观实际，具体的調查分析，来制訂口号、政策。

关于第三条、第四条是講方法的問題，制訂口号、指示的方法論如何指示，如何檢查。第三条制訂，第四条就是証明。証明这个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要在实际中間，在群众斗爭的烈火中才能証明。这是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关于要有新的革命作风，使群众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革命化。我们有“宣传指南”，就不要搞教条式的，采取革命的步驟使得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跟“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說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一个“四三”决定，在“四三”决定上有許多步驟，“四三”决定上講的，在各机关、学校已經实行了，在中央研究院实行的有很大成績；在开始，有的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場，而現在这些同志逐漸轉过来了，站在我们这方面了；后来使反革命分子統統孤立，使过去不覺悟的分子也沒受到損失；这一次搞好了，有很好的經驗，在前两个星期，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央研究院总結六、七月的学习，那个东西很可以看，那个东西不是党八股，那是按照实际的过程写出来的。

第六条：講群众工作，講群众工作中的原則性同群众的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講原則，就是这个原則性跟广大群众不要脫离，即不要关門主义，講原則不是关門主义，講接近（联系）群众不是尾巴主义。这个中央以前有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六条，即是最后一条，专門講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边区，比如象在綏德、隴东那些区，怎样使我们又能坚持原則性，高度的原則性，但是又不要变成关門主义。要跟群众密切的接近，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而且把他提高一步。怎样实行？我们有經驗。

第七条：不要冒險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是講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是講統一战綫中的問題。这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文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摩擦中，在反“反共”高潮中，反摩擦斗爭中，我们有許多斗爭經驗。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于土地关系的处理，对于劳資关系的处理，我们的鋤奸政策等等各种政策；我们的施政綱領，这些东西，都是跟斯大林講的这一条，是一类的性質。不要冒險主义，但也不要迁就行为。冒險主义不等于高度的革命性，不可調和的革命性。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絕不是尾巴主义。而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关于国共合作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中期，抗战的初期，关于最近二三年，关于我们現在实行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鋤奸政策审查一下，在有些同志他所想象的寬大政策，在这个会中間，小組討論中間，有許多同志不滿意，我们应該杀的不杀，应該捉的不捉，土匪鬧到那样程度，还要寬大政策，斯大林的十二条中是沒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窰堡、延安附近，还要講寬大政策？！他那种寬大政策是从那里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在到处叫，你还在說施政綱領的寬大政策？！施政施綱的寬大政策那么好！这样一来，日本的飞机也来加油，你还要寬大，你說可以嗎？就講这样的政策？就是檢查这样的問題。

第八条：要講自我批評，要改正錯誤。就有列宁、斯大林論自我批評。二十个文件中有的，这里引列宁論自我批評，有《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五条，有“四三”决定，“四三”决定中告訴我们怎么样做自我批評，有这样一些問題，有《反对自由主义》有《反对党內几种不良傾向》。这样一些文件，都是关于第八条的。我们所办的，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文件，

过去的不講，講現在的，我们的整頓三风是属于这种性質的。我们的所謂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搞清楚，胡里胡涂的团結，缺乏原則性的团結，团結得了团結不了呢？团結不了的。这样党內的寬大政策是不是馬列主义的寬大政策？缺乏批評性的，缺乏斗爭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第九条：必須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領导核心中去。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教育政策中有四个干部标准，这四个标准也可以說是干部的四个条件（无限忠誠、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第一条要忠誠。刚才講的斯大林論布尔什維克化第九条中講的二条；一个是忠誠，一个是經驗。这两条在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有，斯大林的是第一条，季米特洛夫的也是第一条，这个忠誠要經过考驗，你自己講那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証明了的。第二条要跟群众联系，密切地联系，要有証据，你說你跟群众联系了，我說我跟群众联系了，那个不行。要群众自己覚得。你是他的領袖，要群众覚得你行。他不覚得你是他的領袖，那就不行，那不是季米特洛夫講的要使群众自己覚得你是他的領袖。現在有那么一部分人，跟群众沒有联系，而自称为領袖，站在領袖的职位上，自称为群众的領袖，而实际上，群众並不承認他是領袖。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陝北，自以为也是領袖，而群众不承認他们是領袖。……群众、老百姓不証明、不了解你，他决不承認你是他的領袖的。所謂联系群众，什么标准呢？就是群众贊成你。所以有些同志出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和他講，开头不要夸夸其談大講一頓，你不跟群众、干部联系，就沒有办法知道群众与干部的情形。你講的話一定会錯，不是二定会錯，（笑）这是一定的，你沒有联系，沒有工作，干部就不認識你，你怎么工作呢？！如果在这里不夸夸其談，只有跟干部連系，眼睛多看一些，耳朵多听一些，然后再講，那么，夸夸其談一定会少了，人家就信了。不然人家戴上耳套，戴上眼鏡来听，你講的不大切合实际，人家相信不相信呢？有原則一条——不相信你，你講得不象，誰吃了小米飯来听你那个“不象”。因此，这样的同志，站在領导地位就要很好的注意。

季米特洛夫講的干部四个标准的第三条，是講独立工作能力，斯大林的两个标准講了。他講的两个标准：一条是忠誠，是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一条就是要有經驗，足以領导无产阶级的斗爭。季米特洛夫講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講的这个，要我们鑑别干部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問題。第四条就是連系群众。

所以这个第九条，要形成領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領导核心，不要是平均主义，中央、地方、西北局以及各个警备区、我们的学校、机关，我们現在把这些发展起来，扩大起来，都要做領导的骨干，領导的核心，这些骨干分子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講有两个条件，因为他在这样短的文章內，不能把所有的条件列举出来，我们照季米特洛夫講的有四个条件：領导骨干要十分忠誠，經过考驗；同群众連系，使群众承認你同他们有連系；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守紀律。所以关于第九条，我们可以参照季米特洛夫給干部的四个标准。这里，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对干部，党員平均主义的一种看法，沒有分析，沒有积极分子同坏分子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对，搞領导骨干就要进行教育，对不好的傾向，就要进行斗爭。

第十条，就是講“必須使党經常地改善自己的組織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一結致。”这就是《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四条，这个結束

語的第四条与第十条相关，虽然內容不同，但大体相当《联共党史》結束語的第四条。……巩固党必須要清洗坏分子，經常地改善党的組織，那么党的組織应該是什么人呢？应該有个标准，怎么样做个共产党員？共产党員应該如何……，（不清）中央有巩固党的决定，《联共党史》第四条講了这个問題。对坏人要怎么样同他斗爭，要把他清洗出去。

第十一条，就是講紀律，要建立紀律，革命的党沒有紀律不成。斯大林講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統一性，党員的自覺性，这样就生长起来了紀律。列宁、斯大林論党的紀律与党的民主，我们选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二十二个文件之內。

第十二条，最后一条是講检查。斯大林論領导与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馬克思那时候講是沒有可能的。在馬克思那个时候沒有可能講民主与检查那样的文章。比如，什么是检查？在这次边区高干会議以及你们回去进行精兵簡政、整党、整政、整軍、整財、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統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人。……現在延安各机关也要检查，延安有的机关現在已經检查了，整頓三风有部分的检查，跟着有大的检查，要那一个部門的主要領导者去检查，在"四三"决定上面講了这个問題。

所以，关于这个布尔什維克化的十二条，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字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字。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經，这就是經，是圣經，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現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可是有些情况，象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沒有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条，使用这一条。如果我们这样作下去，那么布尔什維克化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說我们会比現在更加布尔什維克化呢？要向那个方向去化他一步呢？我们在今年这一年，整頓三风、精兵簡政，在边区高干会是要化一部分，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化"，我们是要自覺的，我们要很清楚，我来講这个十二条，斯大林也講了，而且是在多年前講的，在一九二五年就是这样講的。而这十二条，对我们恰好是适用的，我们要自覺地去做这工作。

我们对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講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有計划地讀书，讀三、四十本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經驗的同志，不讀則已，一讀就讀通了，就可以讀进去（笑）。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讀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資格讀馬列主义呢？你们是譏笑我吧！"而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讀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讀通。象外面来的，沒有工作經驗的干部，他们讀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讀通，一讀就容易讀懂。这次整頓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經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讀八个月，这样讀下去。在这里，分两种人，一种是有实际工作經驗的同志，一种是知識分子。有工作經驗的同志，他们就容易讀懂，沒有工作經驗的同志，就要鉆牛角尖。比如；为什么叫"四三"决定？为什么不叫"四二"决定？（笑）又，什么是精神实質？又是精神又是实質，你講我給听听。他们鉆的不得了，搞不清楚。这些同志，要他们先讀，然后再让他们到工作中去，然后过了一二年，再叫他讀，那就有味道了。所以讀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經驗的同志，一讀就有效力。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沒有工作經驗，他们过去大概讀过几本书，他到这里就大搖大摆地为列宁主义而斗爭（笑），写了文章也是一、二万字。他的列宁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他的列宁主义一定不是苏联的，哪个列宁主义这次会証明了的，他的列宁是哪国的列宁呢？是他的列宁。这就等于沒有讀书，如真讀几本书，也就沒有

那个。我们有工作經驗的同志，讀了，是不是象他们那样呢？一定不会的。我们讀几本馬、恩、列、斯的书，就够了，我们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会这样的。我们讀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书，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更加好。因为馬、恩、列、斯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是象朱理治那样的人，你们沒有看見过，我也沒有看見过，認識是在照片上看見过。那个是不相同的，样子也不相同，那个眞是革命的圣人，他们是精通得很，他们的态度也是好得很，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我们很接近，不是和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很好，有实际工作經驗的人。讀了馬、恩、列、斯的著作，就愈要同群众接近，如果不接近群众，那就是与群众离得很远，那就是愈讀得多，就越是沒有讀进去。列宁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搞錯了，那是反对了列宁，反对了馬、恩、列、斯。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党一定会搞得好，要布尔什維克化，一定会化的，我们已經有了进步，整頓三风，高干会，精兵簡政，……这些同志们作下去，要有信心搞下去，一定会搞好，一定会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維克化。要我们全党，我们实际工作的同志能够这样去做，慢慢地来，一年搞一本，搞三、四十年就可以搞三、四十本。有些人是走馬看花，一走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下馬看花，要仔仔細細地看（笑）。今天是要下馬看花，要慢慢地看，我们讀他三、四十本书，一年讀一本要三、四十年，今年已經六、七十岁了，还能讀几本书？我们要讀三、四十本书，有的一星期可以讀它一、二本，甚至几本，比如象党校，我们規定党校，計划八个月讀三、四十本书，我們有一个大概，把三、四十本书下馬看一下，将来做工作，一、二年以后再来翻一翻。如果說早把字典所有的字完全讀了，是不可能，如果說把字典所有的字都讀了，这样的人，在全天下都难找，連馬克思在內，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地来。我们的工农干部、有工作經驗的干部，完全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們可以更进一步。請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講的話完了。（全場热烈鼓掌）

在志丹陵园紅星紀念塔上的題詞

（一九四三年）

我到陝北，和刘志丹同志見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員，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間，而不会磨灭的。

（原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

新　年　祝　詞

（一九四七年一月）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阴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爭。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阴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爭。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爭取和平和爭取民主自由的規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結一切力量，击敗反动派的阻力。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內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統一战綫，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

爭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則將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結果將是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爭期間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統治集团，現在正在所謂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的进行其內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內战的炮声的。"在抗日战爭胜利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經作了极大的忍耐和努力来阻止內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通过两种努力来継續爭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絕的奋斗，和国民党統治区各阶层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日見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間誠意的和平談判和全国范围內眞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現在国民党当局还沒有表示任何起碼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飾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爭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結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內奠定稳固的基础。

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历史意义及其深刻的阶級內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質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資产阶级和一切剝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領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爭的継續，是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阶级斗爭的継續。

摘自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軍报》祝賀湖南省革委會成立社論《芙蓉国里尽朝暉》

※标題是編者加的。

※　　※　　※

編　者　附　言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們怀着对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誠的心情，編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編入本书的是毛主席解放前发表过而未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基本上按其发表时間的順序編印。

由于我們政治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經驗，在編排、校对工作中的缺点、錯誤在所难免，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由于时間关系，"堪誤表"也来不及与同志們見面了，同志們在学习过程中若发現了錯誤之处，請自行更正。在此我們表示歉意。

由于校对忽疏，第231頁上《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屆中央委員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議上講話》（摘要）未編入"目录"。

本书仅供校內革命同志学习，希望妥善保存，严禁外傳、引用。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編者　鋼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
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49.10.——1957.12.）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1
关于鉄路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月）……2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2
关于一九五〇年軍队参加生产建設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頒发）……2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4
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济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爭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4
給馬××的一封信（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員会第二次会議閉幕詞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7
給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議的題詞（一九五〇年）……9
×××傳达毛主席的指示……9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11
对志愿軍党委的指示（摘录）……11
对中国人民志愿軍指示的团結朝鮮人民四項原則……11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11
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統战工作同志談話紀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12
关于培养干部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14
关于政府、軍事系統审查旧人員中答复“包下来”問題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15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議决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15
关于鎮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語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16
对《祕書室关于处理羣众来信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18
批改《人民日报》社論应当重視电影“武訓傳”的討論（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18
在接見西藏致敬团时的談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20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員会第三次会議上的开幕詞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20
給馬××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22
关于一些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十二月三十日）……23
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詞（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24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三月）……24
对李×实踐論解說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25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25

我們也应当会办經济（一九五二年七月）……25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26
視察黃河时的談話（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26
对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一九五二年）……26
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議向中央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二年）……27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第二十次会議上的講話（摘要）（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27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問題的回答（傳达記录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27
最偉大的友誼（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30
在中央政治局会議討論高教、教育两部的請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日）……3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摘录）
——在中央政治局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33
对白××同志关于軍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34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35
在接見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講話（一九五三年七月）…… 36
对軍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訓詞（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38
給中国人民志愿軍的慰問电（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39
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議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談話記录稿）……40
在接見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講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42
对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議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42
給徐悲鴻的一封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45
对学校領导骨干、教材等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三年）……45
青少年的教育（一九五三年）……46
給李×的一封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46
关于国家預算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46
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講話（記录稿）（一九五四年六月）……47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47
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書时的答詞（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47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卫生部党組报告时所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48
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
——与陆××、周×的談話（一九五四年）……50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51
关于中医問題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講話（一九五四年冬）……52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規定的五項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52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議开幕詞（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53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53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議閉幕詞（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54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一九五五年春）……54

在农村工作会議上的講話和插話（一九五五年上半年）……55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59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60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63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68
中共中央关于賀誠同志的錯誤的决定（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68
在工商联执委座談会上的講話（摘录）（一九五五年）……68
在十五省市委書記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70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議上的总結（一九五五年）……72
关于增产节約的講話（記录稿）（一九五五年）……78
关于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80
在知識分子問題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81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85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五六年）……86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86
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議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87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87
关于斯大林問題（一九五六年）……88
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議（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89
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談話(摘录)（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89
論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90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99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論的批評……102
接見危地馬拉前总統阿本斯夫妇的談話（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102
同音乐工作者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107
在八大預备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110
在“八大”一次会議上的談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113
紀念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先生誕生九十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14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結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15
对发展輕工业設备制造工业的指示（一九五六年）……121
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員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談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12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127
給詩刊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129
在省市委書記会議上的插話汇集（一九五七年一月）……129
在省委書記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134
在省委書記会議上的总結（一九五七年一月）……136

在全国各省市委書記会上的一次講話(摘录)(一九五七年二月)……141
在頤年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141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47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結束語……166
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长座談会上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171
在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談会上对当前教育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七年)……176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178
給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185
在天津市党員干部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185
在山东省級机关党員干部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192
在上海党員干部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202
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員干部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206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四月)……217
在接見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时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221
接見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221
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221
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議上的講話(記录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224
在青島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230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录)(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233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234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結时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237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240
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249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館机关干部的講話(摘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250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252
回答記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談話……255
在全国宣傳工作会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256
同科学家、文学家談人民内部关系(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263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265
关于主要矛盾問題(一九五七年)……26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自蔣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結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爭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領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財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顧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軍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战爭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軍、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体会議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　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張　瀾、高　崗为副主席，陈　毅、賀　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劍英、何香凝、林　彪、彭德怀、刘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　眞、薄一波、聶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烏兰夫、徐特立、蔡　暢、刘格平、馬寅初、陈　云、康　生、林　楓、馬叙倫、郭沫若、張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习仲勳、彭泽民、張治中、付作义、李　烛、李章达、章伯鈞、程　潛、張奚若、陈　銘、譚平山、張先、柳亚子、張东蓀、龙云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是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再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祕書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軍总司令，沈鈞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长，并責成他們从速組成各項政府机关，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时决議：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权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　澤　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抄自《新华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五零年一月

关于铁路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

解放軍打到那里，我們的鉄路修到那里。

（轉摘自滕××在全国鉄路会議上的講話，
見《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悲鴻先生：

表示敬悉，写了一張，未知可用否？

順頌教琪

毛澤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注：新中国剛剛成立，徐悲鴻先生敬請偉大領袖
毛主席为中央美术学院題字，此为主席复信。）

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頒发）

人民解放战爭已在全国范圍內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軍除在几个战綫上必須专心致志追歼殘敌以竟全功之外，已有大量軍队进入整訓，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訓。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中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軍队，在和平时間，在不妨碍軍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計划的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設建工作。"这里給了我人民軍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訓这些偉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号召全軍，除繼續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負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軍不仅是一支国防軍，而且是一支生产軍，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爭所遺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設。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須而且可能实現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須实現，是由于国內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爭，給了人民以严重的災难，給了經济以严重的破坏。我們今天将革命战爭进行到底，

要医治长期战爭遺留下来的創伤，要从事經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設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一項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导下逐步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軍則必須負担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現，是因为人民解放軍絕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間，有着高度的政治覚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爭最艰苦的年月，担負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經驗与劳动的傳統。人民解放軍的广大的干部們和老战士們都懂得，軍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減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軍队的生活，并且經过劳动鍛炼，还提高了軍队的政治質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軍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以实現，还因为在战爭結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軍除了担負保卫国防，肅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訓練等項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間参加生产建設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軍能够实現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軍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設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則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財富。因此，各軍区首长，必須指导所屬，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設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約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設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訂出較长期的計划和具体的步驟。生产項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許下，以农业、畜牧业、漁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項建筑工程，各項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輸事业为范圍，禁止从事商业。軍队領导机关应根据任地情况，調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經驗，軍队的生产运动，必須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走私、囤积、投机，企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現此种行为，必須迅速予以糾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違反正確的生产方針，攪乱經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貪污腐化，毀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許。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須注意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爭地引起人民不滿。

为了使軍队正確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茲規定：

（一）在师、軍以及軍分区以上各級，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員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計划，监督生产計划的实施，檢查違法行为。

（二）建立軍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級領导机关，在軍队生产委員会的监督和領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資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結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統和軍队指揮系統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顧原則，公平合理的分配生产紅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該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作到軍队部分自給，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獲。此項个人收獲，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儲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輸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軍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的原則下，参加劳力、資金、肥料、农具、与农民移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須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爭利。

（五）各軍区部队的生产計划，須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計划相結合，統筹生产資金。所有軍队生产資金均作为投資，必須計算利息和訂定还期。所有軍队生产事业均須照章納税，并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不得違犯。

上述各項，望各軍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軍一九五〇年的生产建設工作獲得显著的成績，并随时檢查，糾正可能发生的錯誤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軍队的生产工作則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澤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抄自新华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同志們，朋友們：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寬广的貢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爭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誼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謹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們偉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領导下的幸福和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級在斯大林同志領导下的空前大团結。

世界工人阶級和国际主义运动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为爭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爭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們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綫比去年更为壯大。世界各国爭取和平反对战爭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掙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領的羣众运动已經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爭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

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間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資产阶級內部各派之間的爭吵和英国資产阶級內部各派之間的爭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間的关系則是很团結的。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約，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們能够放手地和較快地进行国內的建設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反对战爭和压迫的偉大斗爭。帝国主义陣营的战爭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爭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覚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繼續团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爭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爭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据的。

目前我們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已經成立。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若干資本主义国家已經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爭已在大陆上基本結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爭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內采取了土匪游击战爭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爭。国民党反动派又組織許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間諜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謠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間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結和合作。特务和間諜們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經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間諜，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現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內，占領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它海島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則破獲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組織和特务分子。現在人民解放軍在新解放区仍有繼續剿灭殘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則有繼續打击敌人特务組織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內实現在全国范圍的財政經济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导，爭取了財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納税、买公債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們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災荒，約有一万万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輕重不同的水災和旱災。人民政府組織了对災民的大規模的救济工作，在許多地方进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統治，造成了社会經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失业羣。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經济結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失业人員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員的办法，以期有步驟地解决这个問題。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識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調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已經做了一些工作，現在用大力繼續做此項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約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經完成，

社会秩序已經安定，經济建設工作已經开始走上軌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識分子的問題已經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經开始了有計划的經济建設。在新解放区（約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則因为解放的时間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避地方的土匪待我們去剿灭，土地問題还沒有解决，工商业还沒有獲得合理的調整，失业現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沒有安定。一句話，还沒有獲得有計划地进行經济建設的条件。因此，我曾說过：我們現在經济战綫上已經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現了財政經济情况的开始好轉，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轉。要獲得財政經济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个条件：即：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②現有工商业的合理調整；③国家机构所需經費的大量节減。要爭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間，大約需要三年时間，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創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間内爭取其实現的。到了那时，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国家整个財政經济状况的根本好轉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須一致团結起来，做好下列各項工作：

（一）有步驟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爭已經在大陆上基本結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軍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爭，胜負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貸款方法去帮助貧农解决困难，以补貧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們对待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財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的經济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財政經济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导，巩固財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税收，酌量減輕民負。在統筹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灭經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使各种社会經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經济領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經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認为可以提早消灭資本主义实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适合我們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鎮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軍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員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須謹慎地进行此項复員工作，使复員軍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統的整編工作是必須的，亦須适应地处理編余人員，使他們獲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驟地謹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爱国的知識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問題上，拖延时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錯誤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錯誤的。

（五）必須認眞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識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驟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須繼續認眞地进行对于災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須認眞地团結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們解决工作問題和学习問題，克服統一战綫工作中的关門主义傾向和迁就主义傾向。必須認眞地开好足以团結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議。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議討論，并作出决定。必須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議的代表們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

是錯誤的。

（七）必須坚决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在这个問題上，必須实行鎮压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問，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廢。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謀活动，必須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組織的指示，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羣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鑒于我們的党已經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須采取謹愼地发展党的組織的方針，必須坚决的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覚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組織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員。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組織，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內。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項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結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风运动，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总結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

给马××的一封信

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經費，学习和开会的时間宜大減。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各宜开一次。以上請考虑酌办。

毛澤东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次会議总結了过去时期的經驗，决定了各項方針。

这种总結經驗和决定方針的工作，是我們大家一齐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員会的委員們，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軍政委員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許多工作人員列席参加討論，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議协商委

員会的代表們列席參加討論，而且有許多特邀的愛国人士列席參加討論。这样我們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見，檢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針。这种方法，我希望我們今后繼續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軍政委員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們的会議在暫时还是建議性質的会議。但是在实际上，我們在这种会議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納并見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納并見之实行的。

我們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員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經济和財政工作，稅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項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結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經驗，規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針，我們这些会議所以有这样多的議題，是因为我們的新国家成立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創，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綫上开展眞正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在軍事战綫上，在經济战綫上、在思想战綫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綫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偉大的斗爭，各項工作都待总結，都待指示方針，所以我們有了这样多的議題。我們的会議按法律規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議題众多的会議，一次为議題較少的会議。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們这样做，我們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們是做得对的。

我們这次会議議題很多，中心的議題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問題。大家同意刘××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議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獲得翻身机会和国家獲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賀。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級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也应当贊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爭和土地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內考驗全中国一切人們、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則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爭一关，已經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們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們大家和过战爭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組成一条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战綫，就可以領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順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爭关、土地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圍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們在革命战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献，等到将来实現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們是不会把他們忘記的，他們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經过战爭，經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經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認为講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們有信心，不致徬徨顧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們不要我了，我虽然想为人民效力也沒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誰肯眞正地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內確实帮了忙，做了好事，

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們必須坚固地团結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动搖。在国內，我們必須团結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須巩固我們这个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战綫。不論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战綫的巩固工作有所貢献者，我們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战綫的巩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对他，他就是錯誤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統一战綫的目的，必須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們現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綱領。我們在这次会議中，即根据共同綱領，采取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眞理、修正錯誤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內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說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强迫他們做这做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取这种方法。

给第一屆全国卫生会议的題词

（一九五零年）

团結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葯卫生工作人員，組成巩固的統一战綫，为开展偉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傳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打破封鎖，改变半殖民地經济状态

力戒急躁，計划要切实可行。

帝国主义对我們各种斗爭直到封鎖，目的在迫我就范。打破封鎖之道，最重要的是軍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外交上及时主动一面倒，內部則强調自力更生，从长远建設着眼来提出問題。中央同意××局对城乡問題意見，应迅速进行，决心把农村工作做好，并認眞动員和作出調动干部下乡計划。另外，反封鎖要在政治上抓理，絕不可仅由共产党作决定，而应与各界共同决定。最好通过各界代表会討論决定。疏散难民应立即进行，疏散旧人

員应慎重，給以生活之道，做到仁至义尽。工厂内迁不是从解决上海当前困难着眼，而应从新民主主义經济建設的长远計划来提出，作出計划，分别先后、公私，对私厂内迁，必須：（1）与各阶层共同討論决定，大家負責。（2）必須自愿，不可强制，但应宣傳动員。（3）自愿迁者予以眞正帮助，不論公私工厂，均应求其内迁后有出路。（4）可迁而不愿迁者，倒閉了責不在己。学校可内迁一部，国民党中央各机构，也应适当安置各地。精簡节約应即实施，无作战任务之部队可分駐农村，加强农村剿匪与羣众工作，減少地方武装。对精簡人員应注意安插，不可送走了事。节衣縮食以不病倒人为原則。最后，应充分認識半殖民地經济不能希望一下改变，力戒急躁，一切計划，必須切实可行。

二、工作上政策上要爭取主动，避免被动

对党内应从理論上反复教育，說明必須团結党外人士的重要意义，克服怕麻煩，不愿接近民主人士，对招待民主人士較为看不慣，認为："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毛主席說，一定还会加一句："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傾向，使全党了解团結爭取党外人士，甚至把付作义、程潛、張治中之流爭取过来为我所用，虽有小麻煩，但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对人民非常有利。要学会算大帳，要善于批判地学习敌人的斗爭策畧，才能消灭敌人。今天我們力量强大，应有大气魄，一切能用的人，都拿来用，虛心学习其长处，不怕他們造反。对大中学处理要非常愼重，不在人事上輕易更动，对資产阶級学者要慢慢加以改造。在学术上必須采取老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充懂，否則必然大失威信，陷于被动。对党外人士要主动談"过三关"問題。第一关是封鎖，大約三个月以上；第二关是土改，要三、五年左右；第三关是社会主义。資产阶級也知社会主义迟早要实現，但仍力爭时間，总要求心里有个数才放心。

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几种形势

（1）人民代表会——大体上接收城市二、三个月，了解了情况就可召开，主动把党的意見变成大家共同决定，共同負責执行。

（2）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干部会議——約一月召开一次。除党内祕密外，一般政策問題，要爭取主动普遍傳达。开会时应由主要負責人出席，才能使人家重視。这种会可減少党外人士顧虑，并可以教育广大中間分子，及时給进步分子以斗爭武器，孤立右派分子。

（3）軍政委員会。

（4）顧問团。

四、改进工作办法与領导方法

領导机关对必要会見的人要見，必要的会要开，但不可过多过长，陷于被动。要学会节約时間，集中力量解决重要問題，平时要充分利用通报、电报、社論来实現領导。对下面要定章程出"安民告示"（明確指出），經常給予任务，定期檢查，傳达經驗，表揚优点，批評缺点，使領导經常处于主动。

五、加强国际主义教育

向党内党外反复說明一面倒的眞理。对苏联朋友表示热情、关心、友好的态度；苏侨来往采取护送制度；主动向其解釋不同习慣；对缺点也可經相关負責人正面講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侨民，愿走者尽量帮他們走，多走无害，但方式要講究。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悲鴻先生：

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財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請考虑示知为盼。

順頌教琪　　×信附陈

毛澤东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摘录）

我中国人民志愿軍进入朝鮮境內，必須对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劳动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誼和尊重，严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这是保証完成軍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鮮人民四項原則

对中国人民志愿軍指示的团結朝鮮人民四項原則：

一、拥护朝鮮劳动党，朝鮮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二、严格遵守朝鮮政府的政策命令；

三、爱护朝鮮人民利益；

四、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檢查缺点，增进团結。

（中国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悲鸿先生：

一月十三日給我的信并附×××先生所为書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見应×先生予以照顧。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則請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員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此致

順致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簡述此次統战工作会議两項議題中第一議題〈反帝爱国統一战綫〉的情况。談及工商界、上层知識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时，主席指出——）

对佛教問題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們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作，要他們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們中有人說，他們沒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給他們騰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主席問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回答此运动已在大城市中及部分小城市展开，主席指示——）

应該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給我，說他們已經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戶曉，大家都参加进来。

（談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主席指示——）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負責同志談談，好好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朝鮮战爭中，特别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謠言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們在宣傳上还做得不够。主席指示——）

在宣傳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謠，鎮压一下好。

反美、土改、鎮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同志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主席指示——）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

（中南和西南同志报告，武汉和西南設立了城市联絡組和減租退押調处委員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減租退押城市联系問題的机关，主席指示——）

設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設立（县城是否設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区别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則不捉，双方兼顧，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經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則多退，不能多退則酌量少退。

（主席問到华东情况，回答苏南各地現在情况好一些。主席說——）

黃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說：你們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級領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見。

（各地同志反映，地方上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去視察尚不免有所顧虑，主席指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視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贅。讓他們去听听农民的訴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們有些什么缺点和錯誤，也可以讓他們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难逢，应該欢迎他們去看。

（地方同志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視察和批評，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主席进一步指示——）

分土地，鎮压反革命，发动羣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項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沒有做过，我們才做。我們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們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計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員、开明士紳和爱国分子，我們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結和教育他們，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試屡驗，結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話应当讓他們說，写万言書也好，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釋。有人看到毛病要罵怎么办？共产党連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罵？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讓他們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讓他們与聞，这是不对的。

（关于統战会議的第二个議題，即各民主党派組織的发展問題，主席指示——）

这一問題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們所做的和所講的不一致，下面同我們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說要巩固，今年說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們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問題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該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讓他們去做，好处多，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針。

（各地同志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問題，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沒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貫彻。主席指示——）

……应該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綏远二十三兵团已經調到冀中，这个部队的軍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們打过很多仗，連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們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煩。要使他們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們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煩的，怕麻煩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們来都不来，現在来了，你們

又怕麻煩。

（×××提到，有关統战部門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議准备拟出几条，主席指示——）

对統战部的編制、任务、范圍和作法均有所規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級均应有統战部門的組織才好，是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主席去年說过，注意統战工作的，在党內还是少数派，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沒有多大改变。主席指示——）

这个少数派是正確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肅反，这就不是右傾，这就是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組織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們，使他們参加斗爭，带領他們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說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統战会議，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們自己沒有招兵买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績来給大家看。你們要很好地取得党委書記和組織、宣傳等部門的帮助，善于經过党委和党委負責同志，把我們的国家建設起来。你們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門道。

（中南同志提出鎮压反革命分子应与土改中反霸斗爭有所区别。主席說——）

此一問題，×××同志已經发了指示。江西四十七軍向中央的报告，在一个多月中，二十多县里，杀了匪首×××人，得到老百姓的欢呼。（主席已将此报告批示轉发各大行政区傳看，并囑到会同志都看一看。）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錢俊瑞同志傳达）

（一九五一年三月）

关于培养干部問題

1、旧技术人員是国民党的遺产，是很有本領，但还不能依靠，应爭取团結。

2、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資产阶級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遺产，但給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

3、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們党、軍队中十多年的知識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識分子，可抽調大部分去訓練。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中培养一部分，即是說要从这两类人經过培养后，团結上边这两种人。

（摘自徐方庭同志笔記本）

关于政府、军事系统审查旧人员中答复“包下来”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軍区，并轉各軍区；中央各直屬部門，各特种兵团，中央政府各党組：

（一）关于在政府系統中和軍事系統中审查旧人員和知識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門現在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問題时，我們看見有說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說：“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沒有矛盾。鎮压与寬大結合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同志在鉄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发表約法三章的布告，內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沒有說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們包下来。現在审查旧人員（还有新知識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軍事系統和政府系統（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們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們（这些人占大多数）則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的人們，而使他們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問題但不严重，利于团結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沒有問題的；第二部分是有些問題，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認錯誤，可以繼續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須調动工作崗位）。

（二）所謂有严重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慣匪、特务、欺压过許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屬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軍官及反动会道門的头子等。

（三）下面是李××日給中央的信，其中所說的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議的，請你們加以注意。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們，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讓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閒飯，必須立即着手組織劳动改造的工作。

經过此次全国規模的鎮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尚未破獲的特务間諜分子的活动，必須更加隐蔽。因此，公安部門必須进行更系統的偵察工作，并教育人民羣众多方面的注意防奸工作。

× × ×

对于有血債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严重地損害国家利益者，必須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損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該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緩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人民解放軍系統內，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內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則，少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緩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獲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們自己在这个問題上犯錯誤；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設。

× × ×

此外应明確的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錯誤。

× × ×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鎮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場偉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爭。全国各地，已經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綫，是党委領导，全党动員，羣众动員，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統一計划，統一行动，严格的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爭策畧，广泛的进行宣傳教育工作，打破关門主义和神密主义，坚决的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綫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確的。凡是沒有遵照这个路綫去做的，就是錯誤的。凡是大体上遵照这个路綫，但沒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綫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確但不完全正確的。我們認为这个工作路綫是繼續深入鎮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滿胜利的保証。在今后鎮反工作中必須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綫。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审查捕杀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傳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錯誤。

关于鎮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爭中必須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則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須使各地党委坚持此种政策。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保卫工作必須特别强調党的領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領导，否則是危險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鎮压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沒有話說。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所謂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畧。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錯。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为了不致弄錯，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証据的特务及会道門头子，应当进行偵察，取得確証，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所謂胁从不問，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問之列。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对那些已經实現了彻底鎮压方針的地方，則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論什么地方，都要有計划，講策畧，作宣傳，不杀錯，这些也是当然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鎮反是一場偉大的斗爭，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鎮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軍政系統旧人員和新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內的反革命。鎮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驟，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軍的某些最重要部門，特别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須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員手里，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請你們对鎮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謹慎从事，务必糾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杀錯。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鎮压反革命无論何时都应当是准確的精細的有計划的有步驟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凡工作好坏，应以羣众反映如何为断。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鎮压反革命必須严格限制在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門头子等項范圍之內，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員、普通国民党軍官也包括在內。判处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緩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釋为对于負有血債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羣众解釋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憤者必須处死，以平民憤。只对那些民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緩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除非我們采取步驟去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否則人民的国家就会受到危害。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看法妥当，讓他們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們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們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偵察工作。

对《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必須重視人民的来信，要給人民以恰当的处理，滿足羣众的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設立适当人数的专門机关或专門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够处理，則不要另設专人。

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傳"的讨论

（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应当重視电影《武訓傳》的討論〔？〕

在发表楊平同志"陶行知先生发揚'武訓精神'有积极意义嗎？"一文时，我們說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訓傳》的进一步的討論。为什么〔要〕应当重視这个討論呢？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带有根本的性質。**象武訓那样的人，处在**［清末农民反封建**革命］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战］爭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傳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阶級］**統治者**竭尽奴顏婢膝［之］**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难道是我們所应当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羣众歌頌这种丑恶的**行为**［奴隶"文化"、奴隶"道德"］，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頌，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爭的失敗作为反衬来歌頌，这难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这种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历史唯物論的灭亡。就是承認超阶級的"文化""道德"的胜利；承認奴隶的愚民改革的胜利。］**污篾農民革命斗爭，污篾中国历史，污篾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别是对于武訓和**电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們关于历史唯物論和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还是极其肤淺的。这就給我們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武訓傳》来学习，来清醒我們的头脑，来扫除我們思想中的唯心論和改良主义。］**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試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訓傳》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虽然批評武訓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目录說明）

［因为武訓能有这样的意义和影响，所以我們認为認眞深入这个討論是必要的，我們特别希望在这个問題上发表过意見的人来参加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討論。］

在許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級斗爭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級斗爭，向反动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們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爭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經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会經济形态，新的阶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員。他們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訓），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訓傳》及其他关于武訓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資产阶級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嗎？一些共产党員自称已經学得的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緣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訓傳》及其他有关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問題上的混乱思想。

注：方括弧內是主席删除的，黑体字是主席加的。

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問題，与宗教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經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現在談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們自己决定，并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去分。

成立軍政委員会和改編藏軍是协議上規定了的。因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点执行。协議是要执行的，但你們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現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經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紙、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內。过去的反动統治，清朝皇帝、蔣介石都是压迫剝削你們的，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使得你們人口不得发展，經济削弱了，文化也沒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帮助你們；帮助你們发展人口，发展經济和文化。人民解放軍进入西藏就是执行帮助你們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們发展人口，发展經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沒有什么用处了。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位委員，各位同志們：

我們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員会第三次会議，現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議上，除了全国委員会的委員以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軍，人民解放軍，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員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出席和列席人員中包括了許多为人民所公認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們这次会議的这个規模，充分表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綫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們国家內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压反革命三个大規模的运动，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殘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結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畧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爭，中国人民志愿軍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偉大意志，与朝鮮人民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畧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計划，从而鼓舞了朝鮮、中国、亚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們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畧的信心。我們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表示庆賀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經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級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努力，我們国家已經实現空前未有的統一。西藏問題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我們金融和物价則繼續保持着稳定，我們的經济建設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綫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們国家值得庆賀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現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現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獲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資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們善于团結、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現一个普遍高漲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綫和各种知識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賀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員会第二次会議閉会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这个建議已經逐步地变为現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現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獲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証明，我們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揮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現在还在繼續进行，并且必須繼續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們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畧，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軍队占領我国的台湾，侵畧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不会和美国軍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畧者已經向我們进攻了，我們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畧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繼續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爭，我們就需要繼續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約，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軍。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們这次会議的中心任务。

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現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問題，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恥的方法破坏和阻撓談判的进行，則朝鮮的停战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偉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們是依靠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獲得的。在国內，我們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

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領导之下的巩固团結。在国际范圍內，我們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陣营的巩固团結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們就獲得了各方面工作的偉大胜利，这是我們的敌人所沒有料想到的。我們的敌人認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們又用侵畧战爭来反对我們，我們沒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沒有可能反击侵畧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們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畧者，并獲得偉大的胜利。我們的敌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这种国內国际偉大团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負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結束了。他們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偉大的国家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基础上的巩固团結，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陣营的巩固团結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偉大陣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結束了。我們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們还想欺負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們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們，我可以断定他們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負的，以苏联为首的偉大和平陣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負的。同志們，自从偉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確定了，現在則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經发生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許多人民民主国家沒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結果如何呢？难道还沒有証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結果嗎？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許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覚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州和北部非州的民族解放斗爭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們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德、意、日三国侵畧者的老路，則其結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嗎？总之一句話，今后世界必須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須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絕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結一致，并好好地和我們的苏联盟友团結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結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团結一致，向着爭取反侵畧斗爭的胜利，向着建設我們偉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繼續前进。同志們，只要我們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們的。

给马××的一封信

××

关于学生健康問題前与先生談过。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体地解决此

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針。我認为（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請察閱，其中第三項談此問題，）是正確的，請馬付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毛澤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节录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向中央报告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电文

“……

（三）轉入正常学习，又須防止过去加多課程硬赶功課的偏向。此次参加軍校学生之体格檢查中，即可看出，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統治的結果，学生体质虛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来，各地也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之原則，因此造成公立学校之体格最差，大学較中学又差的現象还严重存在，这点应引起十分警惕。应按华东局高教会議的規定，适当減少正課时間，照顧学生健康需要。……”

毛主席批語：**这是正確的。**

关于一些问题的指示

把劳动力組織在“变工队”、“扎工队”、“換工队”……等这一类的农村劳动互助組織里，有組織地进行耕种、鋤草收割，这比单独耕种省工，又能多打粮食。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只有中国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經济上不依賴外国了，才能全部的眞正的独立。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

沒有农业社会化，就沒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須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須有步驟地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問題。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假如沒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現。……那么，堆在我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能夠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同志們，我們現在要和許多旧社会出身的人合作了。我們要小心，要預防旧社会的坏习气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来。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們全体——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人民志愿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战斗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抗美援朝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国防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土地改革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鎮压反革命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經济和財政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文化和教育战綫上的胜利！

祝我們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綫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們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綫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来，大張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規模的反对貪污、反对浪費、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将这些旧社会遺留下来的污毒洗干淨！

同志們，我們在上述一切战綫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許多是极其偉大的胜利。我們希望，經过我們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三月）

过去从寬，今后从严；多数从寬，少数从严；坦白从寬，抗拒从严；工业从寬，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寬，投机商业从严。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

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

（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們应当反对侵畧中国的外国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官員，他們是帝国主义，而在宣傳上爭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說那时的中国人还……

二、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滿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滿，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凱，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沒有認識这一点，而認为……

给 李 × 的 一 封 信

××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踐論解說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謝謝你！解說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說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傳。第二部分中論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經驗主义的那两頁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請加斟酌。如已发表，請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辯証唯物論的通俗宣傳，过去做得太少，而不滿足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順致敬意

毛 澤 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实踐論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說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暫仍回原。

我 们 也 应 当 会 办 经 济

（一九五二年七月）

我們不但应該会办政治，会办軍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們也应当会办經济，如果我們样样能干，惟独經济无能，那我們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們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决經济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們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們。

如果我們共产党員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經济，也不懂得到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作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們应該反对这些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識。

轉引自李先念：《努力学好經济工作》
（《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

给李×的一封信

××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紙。

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論什么矛盾，也无論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論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刪，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字刪去。你写解說时，請加注意为盼！

順候敬安

毛澤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视察黄河时的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老根据地的人民出了大力，我們要注意帮助他們。

这个大水庫（三門峽）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瓩，通行輪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

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

（一九五二年）

一、私人資本在中国建設上是有貢献的，只要不讓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二、不能讓資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須兼顧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三、很好的团結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綱領。

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议向中央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二年）

在实施增产节約的同时，必須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或稍加忽視后一方面，那是錯誤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摘　要）

就全国范圍来說，大陆上的軍事行动已經結束，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經組織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經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犧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偉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揚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設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爭。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統一战綫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

（传达記錄，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拚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簡体字材料这两个材料，已經送傳毛主席看过。他翻閱了簡体字。他認为这种工作不必太急，不要因为人家摧就操切办事。事情关系很大，影响到几万万人，是长远的事情。不要受了外界压力，輕易作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可以多征求意見。已經有了方案，可以作为繼續研究改进的材料。

关于簡体字：毛主席認为現在的簡体字不够簡，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划仍多。笔划形状仍然不順利，写起来别扭。如“ㄋ”可以用“ㄴ”代替，有了写两点的

时間，就比点三点要快。作簡体字可以更多利用草体。草体难記。但是可以把一些草体字規律化，作为基本形体、类似日本的片假名，字的基本形体数目少，規律化，学习書写起来就方便。这样就和現在汉字的秩序不同，汉字的数量必須大大縮簡，那就要把两三个汉字合并为一个，即一个字可以代用好几个字。如圓周的“圓”即用“元”。一元、二元、花园也用“元”字。这样才叫簡化，可以利用假借，以外利用簡单容易的草体，不用笔划仍繁难的草体。汉字的数目減少，字的笔划也大大減少；难于減少的，利用假借；这样就能做到的確是簡化了。笔化少，写着就順利。

他举了个例子：如“讠”字旁，用一笔作“𠂉”。要把字形規律化，就不能按原来通行的。因为原来的簡体字并沒有什么規律。

关于拼音文字：毛主席認为我們用的拼音字母，笔划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还难写。

毛主席認为何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淺。字母的笔划要向一面倒，“永字八法”要廢除，那样写法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現在这些字母有的笔划多，有的写着不順，笔划方向复杂，糾纏太多，向四面八方发展，所以难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書。草本就是打破方块体式的。

因为原来汉字笔划可恶，所以非打碎不可。主席贊成把注音字母多改一些，也贊成改用两拼，以便代替汉字。比如現在这套字母就不好代替汉字。因为有些字母和音書比汉字还难写，比賽不过，这种拼音字母就要落选。

又如注音字母也不能代替汉字，三个字母写不到一起，与汉字合，显不出来簡单。拼音字母如果不比汉字簡易，在羣众中立足就会有困难，主席对这套字母不滿意，无論如何要簡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簡单笔划和草体，笔势要一边倒，这样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注音字母”誰都沒考虑它作文字。要制作拼音文字，就是再費一年时間，也算是很快的了。如果照現在的样子拿出来，恐怕人人会阻碍它。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

总起来說，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眞正作到簡单，如果不簡单，就不能推行。因为文字主要是要写，不仅要数量少，而且要便于写。例如，“云”不好写，改作“士”也难写，草書“ㄣ”稍順一点。我們的字母一定要比日本字母好，不要比他坏。現在的注音字母和簡体字，还不如日本假名，要多征求各方意見，加以改进。

这次郭沫若主任在莫斯科曾經謁見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很关心我們的文字改革，問到，“你們的文字改革搞得怎么样了？”郭老提到，在方言不統一情况下，汉字仍然有用处。斯大林說，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話，对于文盲，汉字是无意义的。郭老說一定要改。

改革文字是費时間的，費十年时間也可以，不必求快，但一定要好。

……

現在无人要求廢除汉字，但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替汉字辯护。汉字学起来还是困难。……我們的儿童学字的时間，要比拼音文字国家多两年。我們的小学語文教学就发生問題。比如五年一貫制的語文課本第一册的程度比拼音文字国家的淺得多，但是大家仍嫌生字多，教学起来，学生覚到吃力，各方面都提意見。我們小学生的語文水平和欧洲国家比相差太远。我从大連回来，火車上看到李立三的孩子（三年級学生）看俄文大仲馬的小說“俠隱記”，三天可以看完。中国的三年級学生根本不能看这样深的書。算术，外国小学一年級就有文字題，我們到三年級才有。这妨碍教育多大！如果我們的子孙世世代代都

比别人多学两年，損失簡直无法計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如果考虑到打字、印刷、打电报等問題，而也使国家工作效率受到很大的損失。发电报，人家用电动打字机，排字，人家也用机器，在这上面耗費的时間的損失不能計算。至于字典难編，尤其余事。

但是魯莽的方法，認为汉字可以立刻廢除，也是不对的。首先要有妥当的方案，其次要有实行的步驟，过去把文字改革想得太容易，現在又反轉过来替汉字辯护，都是不对的。毛主席剧烈地攻击方块汉字，認为汉字千年来害人不淺，必須改革。《中国語文》出了半年，但是很少看到充分說明文字必須改革的文章。比如說，就沒有一篇比較汉字与拼音文字教科書等的优劣的文章。反对方块字，要拿出眞凭实据，汉字的电报，打字和印刷等都可以拿出来和拼音文字作比較。不这样做，有时候連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有点动摇。这主要因为我們改革文字的主要理由說的不清楚，文章的邏輯不强。

……

我們的綱領是文字必須改革，决不能有不用改革或怀疑改革的話，但是如何改革，改革的理由是什么，必須說清。

……

提倡文字改革是对的，缺点在于沒有作詳細的調查研究和比較，在文章的背后沒有事实来支持他。往往是議論多，科学的研究少。比如打字問題要收集最熟練的，相当熟練的，不熟練华文打字員的成績，拿来和英文、俄文的同样的打字成績作具体的比較。这样才能說服人。

……

所謂字的笔划要“一边倒”就是笔势要順。比如“水”字就不好写，方向变化多。“三”字方向虽順，起头太多，也不算好写，象“水”則必須改造。

……

一边倒，不是每字笔划都是一个方向，如“千”字就可以不改。因为它和阿拉伯数字“4”相似，比“干”好写。主要是不要起笔太多。要写起来流利，并不是說任何由右向左的方向都不要了。笔划的組織也要簡单。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大改，这样的工程就要复杂一点，必須与代用字一起考虑。

拼音文字要和汉字配合得上，不能設想某日公布后立即就要实行，要准备它跟汉字掺用一个时期。拼音方案，簡体字中有些符号，就用拼音字母代替也好，特别是虛字，如“的”字就可以用字母代，虛字要极簡单，每字一笔两笔，不一定必須有通行簡体的才簡化。例如“的”字本来就沒有簡体，但用的次数最多，必須簡化。

……

有些难写的地方名称也要改，比如盩厔、鄠县、鄠郿等，都可以用拼音字母代替。

（根据首都文字革命造反联絡总部供稿）

最偉大的友誼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当代最偉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偉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約瑟夫·維薩里奧諾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論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給予我們当代的貢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們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轉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規模的范圍內，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圍內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們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羣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資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們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偉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締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現实的生活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確，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該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証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設想，沒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而能夠有反法西斯战爭的胜利。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爭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們偉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把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規律的理論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首先胜利的理論；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貢献了关于資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論，貢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設共产主义的理論，貢献了关于現代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济法則的理論，貢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斯大林同志还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設的理論。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創造性的理論，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們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級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級和一切被压迫的人們为解放和幸福的斗爭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規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偉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書，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經驗的綜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是給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貴的遺囑。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

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徑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着他，不断地向他請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滿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記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偉大号召。人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認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問題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遁列宁斯大林的学說，得到了偉大的苏維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獲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現在，我們失去了偉大的导师和最眞摯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啊！这个不幸所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語言来形容的。

我們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紀念我們的偉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偉大友誼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說，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設我們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理論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現在是我們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們的模范。我們完全相信以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繼承斯大林同志的遺志，而把偉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揚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将变得更加团結，更加强大。

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說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現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獲得这样的偉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設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畧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漲，而我們的友誼和团結的陣綫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畧，我們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畧都将被我們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撥都是完全沒有用的。

偉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們的友誼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偉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則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間的友誼，也正是建立在这样偉大的国际主义原則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們这种友誼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眞正无敌的。

讓一切帝国主义侵畧者和战爭販子們在我們偉大的友誼面前顫抖吧！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說万岁！

偉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日）

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領导骨干問題，而且首先要解决大学的領导骨干問題。同意总理意見，从宣傳部門与青年团抽調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領导。关于中、小学的領导骨干，应該由地方在几年內逐漸加以解决。毛主席認为訓練与提高中学領导骨干很重要，东北的經驗是好的。毛主席說：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員。

毛主席对教材問題特别重視。認为目前三十个編輯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縮小一点，必須抽調大批干部編教材。確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編輯干部，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解决配备。

所謂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內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該改編教材，編輯教学法。

关于整頓小学問題，毛主席認为，“整頓巩固、保証質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針很好，但是整不要整过了头。

××同志認为，中国政治，經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該过分强調正規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規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編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該便于农民子女上学。

毛主席同意××同志的意見，并指出应該容許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規的小学存在。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傳，就可以給他一本教科書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傳迷信，也可以讓他們教書。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

关于超龄生問題，中央同志都認为不能把超龄生送出学校。毛主席說：“你們对七、八岁儿童这么爱好，对超龄生就可以不管？”并且說：“应首先把超龄生教好，讓七、八岁孩子迟几年上学并不大要紧。”这就告訴我們先教育超龄生，对发展生产有利。适龄儿童迟几年上学，影响不太大。

小学城乡比例一样，不对。城市小学比例应該大些。

关于小学經費問題，毛主席指出，税种税率必須統一，收支也必須由国家統一掌管。不能象过去那样，搞什么教育經費独立，指定一定的税作教育經費。毛主席同意中央統一支撥，預算由省（市）县拟造。

民办小学，毛主席說，可以容許。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錢。学田，也可以允許留，但是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給学田。

学費也可以收。

小学教育，应該强調劳动教育。

关于五年一貫制問題，毛主席認为既（然）貫不下去，只好緩行。五年一貫制的文件，并不錯，只是实行过早，应該推迟。

毛主席对青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課重，課外負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認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減少負担，少紧張些。毛主席說，要吃得飽，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現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面減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現象。因此，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錢子女外，一律发給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关于設置重点中学問題，毛主席認为要办，具体数字要按实际情况办，可以研究一下。留苏預备学校十所，要分配到各大区。办留苏預备学校，并不是說排除其他学校学生投考留苏；同时，留苏預备学校学生也并不一定全体一律留苏，还要經过考試和审查。重点学校一百五十至二百所。

毛主席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周总理指示，可以从部队机关抽調干部学习。

初中招生，毛主席和××同志都認为，能多招一些，就多招一些。今年还是招六十五万人。

（根据前教育部党組一位同志記录，未經核对）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

在中央政治局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結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現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現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綫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灯塔，各項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我們的各項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綫，为总路綫服务。离开了总路綫就要犯錯誤。我們必須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遙遙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变，还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农业来

說，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資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經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們必須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問題，他們有几种錯誤观点，是必須批駁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們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滿着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过去的武裝革命斗爭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資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爭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確保私有財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錯誤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經济必然要被集体經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就生产資料方面說，我們不能“確保私有財产”。“確保私有財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資产阶級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縛我們自己的手脚，束縛广大羣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沒有多大錯誤，但是不明確，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沒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們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們的国营經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認为我們現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確認識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責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說的是右傾性質的錯誤。

……

对白××同志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白××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軍委卫生部的領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的报告看来軍委卫生部对全軍卫生工作可以說是根本沒有什么領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立刻着手解决，提議（一）請×、×主持，在軍委例会上討論一次，邀軍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及白××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討論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軍委卫生部的部长付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軍委卫生部部长付部长。以上請×、×酌办。

因为白××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領导工作是否和軍委卫生部的領导工作有

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領导工作可能和軍委卫生部的領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見政治領导，也看不見認眞的业务和技术領导，只是沒有白××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們还不知道。請×、×参攷白××的报告，严肃地檢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軍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問題决定解决方案，付諸施行。

无領导，无政府，也不認眞管业务的部門——专門吃飯、作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門，除軍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門，請你們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爭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換面目，建立眞正能工作的机关。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六月）

团中央委員候选名单中，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个，太少了，女的也太少了。老一点的成熟一点的党員参加領导是需要的，但必須增加些青年，不要搞成老年人专政，不要搞成青年老年团。

要一批一批地割韭菜，不割就不好吃了，老干部还有一万嗎？可以再調出五千。

团代会的报告，有人反映有些空，是不是要求的高了。我看是滿意的。三十岁以上的人不滿意，二十五岁以下的看不懂。

几个文件党把的紧紧的，我看在党的領导下，团要有独立活动。几个文件都是講中心工作，一天天干巴巴的，搞的太严了。紀律要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紀律，那就不要用紀律了。

在党的領导下，参加中心工作，守紀律，青年向成年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要有自由活动的一面。一方面老成，另一方面不老成，天天老成是不好过的。有严格的一面，也要有不太严格的一面。

要教育青年活潑点，不是少年老成，而是生动活潑，这是原則問題。这是党同广大羣众的联系問題，不然要脫离羣众。

太政治化了，太老成化了，变成青年成年团了。搞的下面沒条件了（指系統領导），沒有独立活动了。

今天我們指导你們搞独立活动，监督你們搞独立活动。

“向歧視妇女現象作斗爭”，斗爭太多了。婚姻法的貫彻得十年到十五年。要教育不要斗爭。

“不要自由主义！”（文件中的一句話）社会上要允許自由主义，党內要反对自由主义。背后講是发表意見的一种方式。在广大羣众中禁止这一条是办不到的。

“对上級指示，不执行不发表意見”（文件中一句話）。指示要执行，至于不发表意見，我們这个会也有一部分发言，一部分不发言。

对青年不要管得太紧，小孩子打架，只要不打瞎眼睛，出点血沒关系。魯迅的儿子批評魯迅說你不象个爸爸。

叫我講什么？我就講打架、鬧。

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七月）

鬧独立性的問題不存在，我們沒有这个印象。現在缺乏的是团的独立工作，过去缺点是这方面，而不是鬧独立性。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青年团的独立工作。独立性的問題早已过去了，×××有一点，但也不多。团的工作根据各地党委反映都是滿意的，滿意就是配合中心工作，所以說滿意得很，現在要求来个不滿意。就是适合青年特点来些独立的活动。团的領导机关要学会如何領导团的工作，党的領导机关也要学会，就是圍繞党的中心任务，照顧青年特点，不断的組織羣众。

过去团的工作在党的領导下，团的領导下，配合多方面的革命工作，得了很大成績，成績很显著。无論城市、工厂、农村、学校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胜利，他們是很有紀律的，他們完成了各項任务，現在革命不是天天革，朝鮮議和，土地改革結束，国內革命完成，現在轉到建設工作。建設就要学习，学习如何領导青年和成年一道在农村把农业做好，在城市把工业做好，在学校把学习做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軍队把国防軍練好，成为近代化軍队。这些都是全国人民都要做的，除了小孩子。

但是十四——二十五岁是人們长身体的时間（二十五岁以上就不长了）。又是工作时間，又是学习时間，如果对长身体不重視則是很危險的。成年人也要学习工作，他已学了多少年；但青年剛学习剛工作，故与成年有不同，很多东西成年已会，而青年不会，例如种地青年就不如老年，如果十八岁会种地那是因为他以前学的好。十四岁——十八岁和十八岁——二十岁不能与成年人一样的强度，不能按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挑重担子，他們就是要玩。娛乐，不玩就不高兴。十八岁以后就要恋爱結婚，这与成年人不同；成年人这問題解决了。

我提議，学生的睡眠时間再增加一小时，現在是八小时，实际只有六、七小时，开始有一小时睡不着，普遍感到睡不够。要下一道命令，下一道命令就解决了。不要討論，强迫执行。教师們也要睡足，尤其是青年們要睡好。（周总理：青年团要带头。）我給青年們講几句話：一，庆祝他們身体好；二，庆祝他們学习好；三，庆祝他們工作好。只有八小时睡眠时間，学生是不够的。因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着，醒不来。如果九小时不行，就再增加一小时，一共十小时睡眠时間。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使大家疲劳不堪。現在要保証大家身体好，軍队、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魯智深、李达学习就不高明。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一定要規定九小时睡眠时間，只有九小时睡眠才能獲得八小时睡眠。初中現在上五堂課，多了一些，可考虑上四节課，一定要把娛乐、休息时間計算在內。現在积极分子开会妨

碍娛乐、休息、睡眠，应該減少这些活动。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娛乐、休息、睡眠；要两方面兼顧。現在是学习太厉害了，后者却不够了。（周总理：还有工作太厉害。）工农兵青年們，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时間与娛乐睡眠二方面要相称，两方面要充分兼顧。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睡眠、休息、玩也要抓。过去抓一头，那一头抓不紧或未抓（用手打比）。跟教育部的人說，要說服他們，你如果这样还是太松。工厂学校搞得紧，会太多，五多。現在要抓紧，減少会議次数与时間。一定要搞些娛乐，要有时間，有設备，这方面也来个抓紧。党中央已决定減少会議学习时間，你們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質問他为什么不执行？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領导同志只顧工作，而不顧青年的身体，則用这句話抵他一下。理由很充分，这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的成长，为了年輕一代更好地发展。我們一代吃大亏，大人不照顧孩子，大人有大桌子，小人沒有；娃娃在家里沒有发言权，如果哭則一巴掌。現在新中国要把方針改一改，要为他們設想。

关于选青年干部当中委問題：周瑜那时当統帅，曹操下江南，誰当統帅那时成問題，就找个青年团員——周瑜，周二十九岁当統帅，要指揮黃盖等，老的就发生問題，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說服，还是由他当，結果打了胜仗。

現在“周瑜”当中委大家不贊成；党是否把年龄大的都挑选过来，年輕的不选呢？党中央选的就有年輕的，自然要挑选一批，不能統統按年龄，要按能力。原来九个三十岁以下的，現在六十几，超过四分之一，三十岁以上占了四分之三，还說少了。我說不少。六十余青年人是否称职，沒有把握，如不称职則以后可改掉，可連选連任，有不連选的，基本方向是不会錯的。絕大多数以至全体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們弱。老年人当然强，有經驗，但其它方面却在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清楚，手脚慢，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規律。要充分相信青年人，可能个别不称职，不要怕不称职。

要說通那些不贊成的同志这样做：一是照顧青年特点，一是照顧团的系統工作，同时受各級党委領导，这总是不会錯的。这不是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馬克思主义历来就这么講。这是按事实，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这是普遍大量存在的事实。青年要长身体，因此工作情况就有不同。特别十四岁到十八岁。青年妇女与男子也不同，不照顧这些特点就会脫离羣众。你們不修改这一条，也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們，八百万不拥护你們。

工作要放在照顧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先进部分不过癮，他們要严，但要說服他們。有人說团章义务多权利少，改了沒有？（胡××：八条已改为七条。）还有七条之多？（李昌：已經緩和了些。）是要緩和一下，照顧几百万羣众。不要只顧几十万、一百万最活动的分子，要使多数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四个月不参加組織生活要自动退团，这个太严了。党章六个月，你們跑到党的前面去了。农村青年是比較散漫的，不能象学校、軍队、工厂一样。搞六个月不行嗎？

办不到的，厉害的，不要在团章上規定。“不要背后乱講”也是这样，原則性要灵活执行。法律条文要执行，也还得几年。应当是那样，实际是那样，是有个距离的，如婚姻法彻底实行至少三个五年計划。許多条文是带着綱領性的。不歧視妇女，不打老婆，有一百万办到就很好了。把“不歧視妇女”划掉了也是因为办不到。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还是讓人背后罵

骂，不准在背后骂一句話，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有的人可以在房子里，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中南海，在北京，在中国，走来走去还可以革命，只是不要到香港台湾。敌我界限要分明，搞掉自由主义就搞死了。有許多人只能搞这一套，党内自由主义还不少。

威信是慢慢建立的。过去軍队編歌謠骂人，我們就不禁也不查。軍队还是未垮。我們只抓住一些大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慢慢上了軌道。羣众对領导者眞正佩服要靠了解，眞正了解才相信他。你們团中央威信就很高。有些人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青年团只有四年历史，×××剛上台不久，不是一个早上就会佩服的。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評不挨骂是不可能的。

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讓他小广播，他就会說沒时間了。抓住大的，慢慢就会好了的。問題总是有的，不要以为一下子就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問題的。

根据社会的发展，三个五年計划基本上可以完成，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三个五年計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国家工业化，就是說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比較，是七与三之比。到了百分之七十，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概十五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十。講基本是謹慎的講法，世界上的事情謹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現在大部分是个体經济，要有步驟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猛。发展互助合作組織，要建立在自愿原則上。不去发展就会走資本主义道路，就是右傾。搞猛了也不行，搞猛了就是"左"傾。要有准备有步驟的进行。我們过去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也不打。你們这个会議是开得好的，你們算是有准备的。过去打蔣介石，开始犯主观主义錯誤，后經整风，改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現在是打建設之仗。什么叫建設？就是工业化，三个五年計划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如何执行，应有特殊規定，应照顧青年的特殊条件。

十年至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点时間，时間不要公开宣布。在报上登載只說相当长时間。团內可傳开。資本家会不会吓一跳？吓半跳是会的。农民不怕者来，怕者不来，从少到多。現在組織起来的，东北是百分之八十，华北百分之七十，南方不同，要作一些精神上的准备和組織上的准备。北方，合作社也不能大发展，河北六千个合作社，一百四十六个县。劝他們退社轉互助組的有两千多戶。条件不够，还是搞互助組。今年发展比去年多五倍，如果每年多五倍，那还得了。明年再加一倍，这样速度是相当快的。发展合作社一要有羣众自愿条件，二要有干部条件。要有許多办法，才能做好。

对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训词

軍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院工作人員同志們：

当你們开学的时候，我向你們致以热烈的祝賀。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誠帮助我們計划与創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国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学院的創办，对于我国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設現代化的国防，我們的陆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裝备和設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門的技术。今天我們迫切的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的能够掌握和駕駛技术的人，并使我們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軍事工程学院的創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优良傳統，无論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門，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們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們必須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識，学习苏联軍事科学建設的丰富經驗，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該是虛心誠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滿驕傲。

保持和发揚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光荣傳統，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們学院是和全軍一样，必須充分領会和一刻也不能忘記的。

希望你們团結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軍事委員会給予你們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1953年8月26日）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第二十四次会議，听取了XXX、XXX关于中国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軍协同朝鮮人民軍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輝煌战績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爭取和平解决朝鮮問題的停战談判，并獲得朝鮮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滿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謝你們在这一正义战爭中的卓越貢献，并对你們致热烈的祝賀和慰問。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軍大举侵犯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鴨綠江和图們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軍英勇地开往朝鮮，支援朝鮮人民軍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兩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軍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鮮人民軍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偉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陣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頑强战斗，坚持談判，終于打退了敌人的瘋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眞面目，使敌人在軍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敗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战的业績，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輝榜样，表現了我們和平民主陣营的坚强团結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贏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贊誉。

朝鮮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併吞全部朝鮮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計划，保卫了中朝兩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敗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爭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爭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鮮人民及其軍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眞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阴謀是必須

击敗和能够击敗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結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畧战爭，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問題的爭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証。

朝鮮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解决国际爭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鮮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鮮問題的第一步。一切外国軍队撤出朝鮮，朝鮮問題在朝鮮人民自己处理自己問題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級的政治会議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貫主張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爭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問題作坚强的后盾。

鑑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鮮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預謀，企图阻撓和破坏政治会議，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軍的全体同志必須提高警惕，繼續努力，提高軍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誼，更紧密地和朝鮮人民軍一起坚守陣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襲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經济建設，加强国防力量，繼續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鮮人民医治战爭創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們深信：中国人民志愿軍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負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鮮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爭取鮮朝問題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繼續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爭中牺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誼万岁！

（注：本文是毛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起草的一份电报。）

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談話紀錄稿）

办好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組大发展。

在新疆，无論大中小县，都要在今冬明春，經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少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配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傾，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不要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議，是自愿的，有强的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韓信收兵。責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問題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三月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二月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說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書記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暫缺，不派数字，但

是省委地委要負責帮助整頓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規律是經过互助再到合作，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許試一試。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級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社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个别农民，增产有限，必須发展互助合作农村陣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領，資本主义必然去占領，难道說既不走資本主义，又不走社会主义？資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間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义，如果又不去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綫，总綱領，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你要講一下。

"確保私有財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又要守呢？（法律是說保护私有財产，无確保字样）法律不能廢除，現在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代几戶鰥寡孤独，問題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可以带一点，应加以研究。該搞中的，就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戶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百戶。在大社之下設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創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謂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經驗都要做好，不要用一个規格到处套。

老区应該多发展一些。有些区可能比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陝北发展得快，成都壩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点。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海与关內后解放的地区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州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該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講，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为了搞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較快的发展起来。

华北、山东，华北現有六千，翻一翻——摊派，翻二翻——商量，一翻半或两翻，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額完成，情緒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質高，成本低。所謂成本低，就是不出廢品；出了廢品，浪費了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蝕了本，少打粮食。最后的結果是要多打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沒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沒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集体农庄）。当然要搞的細致，种菜不象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試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銷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現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均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現极大的矛盾，需要大大超过，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的矛盾問題。是私有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資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人所有制，必須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級的，土地入股；有高級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建。一个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資产阶級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經过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合营，統一于社会主义）这才是提高生产力，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

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我們要和各民族講团結，不論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結。例如鄂倫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們也要和他們团結。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張爱国和团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团結。团結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論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贊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去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人。他們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們的干部有了錯誤就应当批評。我們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錯誤，請你們講，你們不同意的和你們認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講，便于我們糾正。有了缺点就馬上糾正，这是我們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整个中国現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們現在已被我們赶走了，这四年来我們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經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設的五年計划。預計在三个五年計划以后，我們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內的坏人，建設了三十六年才有現在的成績。我們建設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們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計划就能建設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們的一定会帮助你們。帮助各少数民族，讓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經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領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議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間，而且要根据你們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讓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总之，我們的方針是团結进步、更加发展。

对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錯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經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展，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站着不动那

就錯了）有条件成立，而去强迫解散它那就不对了，不管那一天这都是錯的。糾正急燥冒进，总有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該吹倒的，象大名府四百几十个社只剩下五十多个了，倒了几百个，其中有倒錯的，查出来講清楚，承認是錯誤，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要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確保私有是受了資产阶級的影响。"羣居終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个体經济基础上搞农貸，发救济粮，依率計征，依法計免，打井开渠，小型水利，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步犂水車，噴务器，六六六，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从小农經济基础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社会主义总路綫联系起来，就不是小惠了，不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是小惠。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經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經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問題，解决国計民生的大計，那眞是难矣哉！有句古語"綱举目張"，拿住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这个綱，那么反对冒进，克服五多，以及一切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經济工作，一切都有統屬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內社外都有矛盾。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个体农民在供銷社入了股，这一部分股金所有制上也有变化，他也有了一点社会主义）。互助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組只是集体劳动，并沒有触及所有制。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內，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現在这样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矛盾就完全解决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場）。一般講互助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段时候，曾經有几个文件沒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了发展互助合作或者是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經济工作这一类的話。想从小农經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干涉农民过多，那个时候也確实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捅，捅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城市也不行，軍队也不行。主观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但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顧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計划，或計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办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要不得。不仅对于分散的小农經济要不得，就是对于不分散的合作社，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也是要不得的。不要把需要做，可能做的，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該用这个标准去检查。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誤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錯誤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吧！都是錯誤的，检查工作应該本着这个标准。冒进是錯誤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錯誤的吧，强迫解散也是錯誤的吧！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符合小农經济"，党內党外都有这种反映。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缺乏恰当的分析，其实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戶，其中百分之五是很困难的，鰥寡孤独，沒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組合作社可以給他帮点忙，比起国民党

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农民是苦，但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說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欢欣鼓午，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間，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我們不滿，其中地主和富农也有区别，就是地主中間，也有一部分他的子女在城市工作，一个月寄十多万块錢（按：指旧币）回去，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对于个体經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搞合作社，这不仅是方向而已，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綫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会議是沒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財經会議，主要是解决总路綫問題，批評薄一波的錯誤，也是关于总路綫的問題。总路綫，概括的一句話就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計划收購，計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展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議。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鑑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縮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議要积极一些，但是改革政策要交待清楚，交待政策这件事很重要。你們說“积极領导稳步发展”，这句話很好。这大半年縮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沒多大問題，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开展第二个战役。其中有些陣地退多了一些，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沒有发展，不讓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許多新生的正確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們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不能不承認嘛？还得承認他是合法的，他还是胜利了。积极領导，稳步发展，你們講了，但是还要估計到会还有些乱子出来。你說积极領导，做起来他会不积极領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数字控制数字，派任务，以后再檢查完成沒有，这就是积极稳步。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現在据檢查，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減产，办得不太好，这是沒有积极領导的結果。当然有少数社沒有办好，減了产，这也是难免的，但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的社減了产，那就是問題。

总路綫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說：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們必須弄清楚。現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資本主义的路。

区干部，县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轉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轉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們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們做什么，办个体經济之事嗎？）县委書記、区委書記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書記負責，我就是中央書記，中央書記、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县委書記、区委書記，各級書記都要負責，亲自动手，并不是要費很多唇舌。中央現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之事上。办資本家之事，也是要把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比如現在全国工商联开代表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級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論，懂得路綫，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蔬菜的生产供应，主要是有計划供应，不仅大城市，象鞍鋼，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沒有蔬菜吃，那能行呢？东北局农村工作部要負責解决这个問題。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組，有先后矛盾不好解决，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合作社，甚至集体农庄，可以不可以研究一下？

发展計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以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五七年可到七十

万个。可是要估計到，可能有时候突然发展一下，可能是一百万个，也許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領导，稳步发展。这次会开得有成績。現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冬就錯过去了。規定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檢查这次計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了下一次会議的日期，并决定下次会檢查这次会議执行情形，这个办法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討論規定明冬任务，早一点，九月二十六还要开一次会，提早一点，布置冬季工作。

给徐悲鸿的一封信

靜文同志：

十月間的信和徐先生所繪的奔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茲派×××同志詢問你們的情况，如有困难，請告知为盼！

順致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对学校領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

1、領导骨干：大专院校，中学必須有骨干。骨干配备大专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中学由地方負責，从宣傳部門，青年团干部下去。有了好校长就有好教师。

2、教材問題：集中力量編，語文、历史等原則問題，由陈伯达同志等解决。

3、整頓小学：防止过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照顧农村特点。私塾也要讓其存在。小学有三类：（1）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一般小学；（3）速成小学。小学問題主要便利农民子弟入学。教师只要不是現行犯，不做反革命宣傳就可存在。对超龄学生不应赶出，首先教好。民办可办，不要求太严，羣众需要自愿，学費可收。五年一貫制暫緩执行，提早了。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

4、学生建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減輕負担。

5、教育工作重点和关鍵：重点，高等学校和高中，关鍵問題是师資。中学要重点办好一批。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們的重点任务。

6、招生要注意成分。

7、速成識字法，在农村有局限性。应是羣众自愿的业务教育。

8、中央教育部任务：（1）方針計划；（2）教材。

9、总的方針和工作重点：过去主要毛病是盲目冒进，不能适应建設，我們任务是培养干部和逐漸（适应）生产发展，目前在培养干部。

青少年的教育

（一九五三年）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說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潑，要頑皮。他說“馴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馴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頁）在有些地方要讓我們的后一代学我們；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們，再学我們就糟糕。我們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現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們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們的青年、儿童变成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們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質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們，将来的損失就很大。

给李×的一封信

××兄：

七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覚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讀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錯处，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張物質的第一性和意識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說的实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体同样的名詞，需加以比較說明，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九句話，也須作明確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議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几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都懂得一点馬克思主义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順致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增产、节約、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綫。

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话讲(记录稿)

（一九五四年六月）

一、恰当地正確地总結了經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經驗；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設的經驗；同时又总結了反面的經驗（历史上各种宪法），并且总結了外国的經驗，但以自己民族的經驗为主，資产阶級有革命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定。

二、恰当地正確地結合了原則性与灵活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則貫彻在各方面。灵活性，統一战綫，逐步实行。不逐步就"左"，不实行，就右，社会主义的原則性与逐步实行的灵活性相結合。少数民族有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根据特殊情况制定单行条例。

宪法可以实行，而且必須实行，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員，不实行，要彈劾（共产党員犯罪，要开除党籍）。有了宪法，全国人民就有了清楚而正確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总章程。这在国际上还发生很大的影响，宪法有民族性，又有国际性。

究竟要多少年进入社会主义，这話不要講死了，十五年只能打一个基础。团結全国人民，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

国家主席的权好象太小了。有些条文沒有写进去，并不是謙逊，而是不科学。科学，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該多少就多少。对古人今人都不能迷信，对了就信，不对就不信，我們不提倡崇拜偶象。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六月）

我們要糾正領导上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錯誤，革命人民一定要有請愿、罢工、罢課的自由，我們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前进嘛！領导上有錯誤允許人民公开批評嘛！小字报、大字报、大辯論、大批判都是很好的形式。

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議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駐中华

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書，并衷心地感謝您的祝賀。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它具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傳統。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后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領导下，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謀，滿怀信心地建設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并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斗爭中所表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劳动热情，使中国人民感到欽佩。

中、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五年来，我們两国人民已結成了兄弟般的友誼。我深信：在互派大使之后，我們两国之間的眞誠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獲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我們两国人民幸福的增进，并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謹祝您在工作中獲得完全的成功。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卫生部党組报告时所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一、关于中央卫生部向中央的报告要点，和中医工作指示草案，毛主席指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特别指出这次檢查卫生部工作的方法很好，开了二十多次会，从下面提出許多意見，翻了个底，这样方能解决問題。单是上面講話还是不够的，必須靠自下而上的批評，这样才能解决得透，解决得好。单从上面解决問題，总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上而下的批評結合起来，看法才能全面，解决才能完全正確。他說，这种办法在今年夏季的全国財經会議用过了，解决了大問題；文委也用这个办法来檢查卫生部的工作，結果也很好。这种办法应該提倡。

二、毛主席指出，卫生工作的队伍很大，单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員就有二十几万，他要管的是五亿多人口的生、老、病、死，这眞是一件大事业，极其重要。因而我們的責任很重。

三、毛主席說，几年来全国卫生工作的成績很大，但是缺点也很多很大。他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政治工作少了，馬列主义、社会主义太少了。

技术是不是多了？也不見得。医疗、医病都有許多問題沒有很好解决。正因为政治太少了，技术也管不好。

毛主席最着重指出的是：党必須領导一切，必須領导卫生工作。他說，“卫生部党委領导同志認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中央不懂技术，我們所不能解决的問題，报告了中央也不一定有办法，因而許多重大問題沒有請示报告；認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

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領导有一种不够尊重的情緒”。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說，从这种邏輯出发，×总司令就不能当海陆空的总司令了，因为他不能开坦克，駕飞机，打大炮呀！但×总司令完全能当总司令，因为我們是用政治来領导軍事。毛主席說，“你不懂这一門，你就不能管我”，这种思想是相当多的，也不仅卫生部門有。在我們的軍队中，軍事不服政治管的問題，是經过长期斗爭才解决了的。卫生部門必須用最大的力量解决这个問題。

我們的党要領导一切：要領导飞机大炮，領导生旦淨丑，領导生老病死，就是說，要領导軍事、經济、文教卫生和其他一切工作。任何专門的东西，党都要去領导。譬如唱戏，党也要領导。毛主席說，×××唱戏唱得好，但他唱的只是旦角，不唱生、淨、丑角，旦角中他只唱青衣，別的也不唱。他是很专的。他不能領导別的。如果他来当主席，就当不好。但是我們的党領导他，領导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我們凭什么来領导？毛主席說，我們要用政治来領导。領导首先是政治領导，領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說不上領导。他們当卫生部长的，自己的职位就是作領导工作，也就是作政治工作。毛主席批評过去卫生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办法，誰管政治，誰管业务的办法是錯誤的。在旧中国，官僚們有所謂政务官，軍事官之分。在我們这里，可不是这样，也不能是这样。凡是領导人都应該政治領导。作为領导人，只管技术，只記得技术，只管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势必政治挤不进去了，沒有政治領导了。作領导工作的人都要懂得党的工作，懂得作羣众工作，决不能只管医务，不管政治工作。

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領导，决不能离开党的領导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問周总理，卫生部的重要文件經过政务院通过批准的多不多？周总理說很少。毛主席說，人家是独立王国，就不受你管！

四、毛主席也着重地批評了卫生部缺乏集体領导，并且指示了应該怎样进行集体領导。他說，××同志积极負責，就是說骨干是好的。但单干、盲干就不好了。盲干就是忽視党的領导，忽視政治对业务的領导。单干就是不要集体領导。大家知道，集体領导是我們党的領导的最高原則。××同志在自己的檢討中說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往往不經組織的認眞討論，即由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毛主席指出，这种单干的作风就要把事情办坏，使自己孤立。这也不能說明个人的个性强，这不是眞正的强，而是弱。毛主席指示，作为一个領导者，必須耐煩地和人家商量問題，遇事和羣众商量，和上中下三方面商量。自己以为什么都正確，这是完全行不通的。領导者必須講道理，有說服力，这样才算眞强。党組开会要認眞准备，要虛心爭取大家的意見，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

五、毛主席着重指出，我們的医务部門領导人員中有濃厚的資产阶級思想，其具体表現就是那种不愿受党的領导，缺乏政治，羣众观点薄弱，不要集体領导等思想。这种資产阶級思想在全国卫生队伍中相当普遍，我們一定要加以批判。

六、中央卫生部工作經过檢查后，已开始有所轉变。但同志們信心还不够，这首先領导上要有决心。毛主席指出，中央卫生部工作的缺点和錯誤，××同志当然要負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挂在××同志一个人帳上，其他同志也应負一定責任。他希望中央卫生部的領导工作要有个彻底轉变。他問××同志有这样的决心沒有。××同志回答說有这个决心。……毛主席說，这主要要提高思想，轉变作风，这次会議一定要开好，使大家有信心。

七、关于业务方針上的几个問題，中央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項方針任务基本上都同意。

关于中医問題，毛主席說，我認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貢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項。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貴的經驗必須加以繼承和发揚。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確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論。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該是唯物辯証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錯誤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医院可以試办。中医进修問題，讓他們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識是可以的，但应該加入中医临床經驗課程。医院可以請中医看病，治好了要向他学习。中西医的名称是不妥当的。

八、城市、工矿卫生，城市医疗要改革，要革命。

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

——与陆××、周×的談話

（一九五四年）

毛主席說：不是沒有警覚性。我們有些党員就是保护那些仇視馬克思主义的。自己不反对馬克思主义。还反对别人反对。

俞伯平的唯心論是很明显的，把家譜孤立起来看，他的批評标准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客观唯心論和相对論。

对資产阶級合作，政治上是朋友，但不能把他捧为父亲，不能放棄原則，接受他們的意見是对我們有利的才接受。如共同綱領是在党的領导下搞的，而古典文学是他們領着我們搞的。

要在学术各部門清除唯心論。

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主要是投降主义，光是反自由主义还不够，因为不能包括一个阶級思想反对另一个阶級思想。很多战綫上沒有战士，沒有斗爭。很多党員是吃、睡、休息。

第二个問題：学术界缺乏批評。“官書”为什么不能批評呢？联共党史結束語第二条說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也还可以批評哩。魯迅之所以使人感到亲切，就是把自己思想告訴讀者。

怕批評后抬不起头是不对的，总是有些人抬不起头来。当然改正錯誤后他可以抬头。

进行批評应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煞、武断，这是軍閥主义的，我們要这样就要失敗。有些有待証明的都可以討論。思想問題不是一个人的問題。

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見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錯誤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見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們都缺少学問。紅楼梦問題不要急于做結論。学术問題要开学术会議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做。

第三，关于扶植新生力量。几个部門都不注意这一点，这不是馬克思主义。老干部要好好帮助青年作战。老干部往往缺乏生命力。注意青年，招募新战士，这是領导的作用。

要注意“小人物”。任何有成就的人，过去都是“小人物”。在我們生活中，文化工作中沒有“小人物”是不成的。……在大学中要培养助教，重点放在培养青年。要相信一代好似一代。

影片《清宮秘史》很多人以为是好的，毛主席以为是錯的，到义和团时我們拥护光緒就是拥护帝国主义了。还有梁思成的建筑，既不經济，也不好看，穿西装戴瓜皮帽。印刷机和广播器沒有民族形式。

文字是要拼音的，但現在注意字母的样子太不好看了。若用民族形式就好推行了。这有个民族心理問題。毛主席最后說：我今天講的是个意見，不要看成不能动的。更不能用作打击别人的力量。

对俞平伯的斗爭应該停止了，应轉到批判胡适的思想。特别借此向全国人民宣傳唯物論思想。唯心論，唯物論要作些通俗宣傳。

这次斗爭要分清敌、我、友。对敌要打击，敌方就是有些进步的东西也不要去鼓励，我方的缺点也不要急于批評，对朋友要保护。不要把战綫弄乱，一团混乱。

斗爭由中宣部領导，郭老挂帅。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貢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們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許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須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傳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診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則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說，中医的貢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遺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揚，反而受到輕視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驗，內容有生理、病理等課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給証書。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結中西医的指示未貫彻；中西医的眞正团結也还未解决。这是錯誤的。这个問題一定要解决，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就要各級卫生行政部門的思想要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調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給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們的临床經驗，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虛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經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統一的医学，以貢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計划地請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診，允許住院病人用中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証，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診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顧虑。三、中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貴的財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們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葯材应加以調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輸，改进推銷。譬如，有些葯材因培植时間較长，由种植到培

植收穫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連为六年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沒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葯因加工設制的技术不良，浪費很大，包装和貯藏方法不好，霉烂損坏的現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葯人員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給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葯理实驗和临床实驗，特别是对中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書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視，无人整理。中医医書如不整理，就将絕版，应組織有学問的中医，有計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譯成現代文；时机成熟并組織他們（总結）自己的經驗，編出一套系統的中医書来。

为了实現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糾正那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貫彻。

今后那一級卫生行政部門如作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冬）

我認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貢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項。中医在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对金、木、水、火、土的理論可以加予批判，宝貴的經驗必須加以保护和发揚。批判必須懂得，什么叫科学，正確的、系統的知識叫科学。西医是否科学，也带有唯心的，象机械唯物也需要加以改造。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該长久的有两医，西医名称是不妥当的，应有唯物辯証的一个医。有的人看不起中医，看不起中医是錯誤的，也有人把中医强調得太夸大了，也是不对的。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試办，中医进修問題，对其进修基础課是对的，应加入經驗交流課程，講中医葯理恐有困难。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五项任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一，协商国际問題。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各級組織組成人員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层相互关系問題；并联系人民羣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羣众的意見和提出建議。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內部和党派团体之間的合作問題。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摘录)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所謂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我們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眞理是在我們方面。对于他們，我們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們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們在一九二一年剛剛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强大的敌人給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

※　　※　　※

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說，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他們的数量如何龐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这就是我們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达到目的的。

※　　※　　※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圍着我們，我們必須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爭，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襲击。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殘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們必須有計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証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安全。如果我們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以避免敌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对待一切犯了錯誤，有所覚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們改正錯誤，而且要帮助他們改正錯誤，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綠叶扶持。一个籬笆打三椿，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錯誤，更需要别人帮。“看”，等待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是必要的，不过是消极的。必“帮”，帮

助犯錯誤的同志早日改正錯誤，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必須懂得，集体領导和个人負責这两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个人負責則和違反集体領导原則的个人独裁，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摘录)

（一九五五年三月）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說过："共产党人認为隐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我們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說是党的高級干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該随时公开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对于每一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絕对不可以学崗高、饒漱石那样玩弄陰謀手段。

鑒于种种历史教訓，鑒于个人的智慧必須和集体的智慧相結合，才能发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

同志們：我們現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划期間，使国家基本工业化。

同志們！我們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們就只好退却，眞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讓路。"

但对待困难：

(一)在战术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我們都要采取認眞对待的态度，創造必要的条件，講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們克服下去。

(二)在战畧方面，我們要藐視困难，就是說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謂困难，无非是敌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而这却不过是垂死的力量，我們則是新生力量，眞理是在我們方面。对于他們，我們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来說，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遇的任何巨大困难，把他們放在"不在話下"的話里，这是我們的乐观主义。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春）

去年責成×××同志把中医工作总結檢查一下，今年发現下层对中医中葯有抵触情

緒。責成××同志限期把中医中葯做出成績。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沒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領导反映，原因是中医古野，西医当权。中国医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証明对人民有很大的貢献，要設立机构研究中医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說中医不科学，是有其不科学之处，但不能过早的批評，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們，各机构中应有他們的成分。看不起中医葯，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产阶級思想，几年来未做出成績是不对的。……

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

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因为中医功劳大嘛。反对中医間的宗派，加强中国医葯的研究。（对賀誠說）河北不是有个祈州嗎？（賀誠說：有。）那是中葯的集散地，商业部門必須加以研究。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一）理論

开会要先有精確的文件，不要凭口講，很危險，文件为凭，通过中央。“五一”“五二”均有文件，每一条均經中央看过，关系几亿人口，不可一轟而起、而念、而散，就了事。

（二）調查几个典型，找人派人来，太多了就害了事情。抗战时晉綏二十个乡典型材料不能做結論，（被批評过）形成一片黑暗。任弼时一个乡解决問題。

河北，解散百分之六，退出百分之七，貧农哭臉不退，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

不算大帳，只算問題件数，怎么行？你們鑽到工作里不出来。

粮食也是，春天很苦，秋天又好了。五三年春天都說苦得不得了，党內党外均叫，不謀而合，夫唱妇随。

今年又报告元帅，大势不好，我說再探，大事好，小事不好。麦子好，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好，何以不好？这不是生产积极性，是消极性，我前后調查了十六个省，百分之九十八大体还好。你們心中无数，百分之八十五农民改善地位，大体好。这样講，半分鐘說清楚了。你不說大数，只說小数。

（三）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針。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閉口不談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經济。共产党羣居終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經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綫傳到省，五三年无人講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四）你們搞社会主义，是逼上梁山的卢俊义，不情愿坐第一把交椅。取消这个比喻，因为你們不是俘虏。不过，你們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講好行小惠。財經会，中山解决总路綫。以后不叫貫彻总路綫，說是打倒大老虎，高

饒横切一刀，許多人說話不確当。中央孤在无援，搬来××。你們自己有資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經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社会主义不是中心。我說了几句有名的話："过渡时期"你們无兴趣。高級干部中資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請重新看看五三年財經会議发言。

我們批評薄和高饒两个目的。我們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他們借此攻击中央。

我放屁，社会主义之屁，总是香的吧！

冬季邓子恢通了，天下太平了。

今天談农村工作：

1.陈伯达发牢騷，他这个人不直爽，說沒問題——有問題，說沒有——有事。副部长为什么不能过問？拉屎撒尿睡覚以外，无第四件工作，杂牌副部长，有理由重視他。你們馬克思主义好象比我們高一些，虽高也要請教，不恥下問，他起草了两个草案呀！

2.你們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綫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講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証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沒有，滿脑子資本主义。我专門害人，講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財經会議，恩来宣布那几句話(总路綫的几句話)。会議上資本主义反資本主义，发言中不見社会主义。

你們的話不合中央要求。我們是修理好×××，高崗是横扫一刀，你×××和我同山同乡同志，当时不能和我一致。四月党代会才解决問題，从此才变成同山同乡同志了。你們要再看看演說，很不成話，尾巴那么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馬克思主义风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称师傅，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农村会議(五三年)邓子恢发言，只在自己发言中，夾着点我的意見，不成体系。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网。对資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訂貨。广大的互助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認識。如此偉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鮮事物好象沒有看見。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經济秩序，則是不对的。

这說明革命轉变，經过中央宣傳，首先是高干間的宣傳，那时大家听不进去。除高饒等外，均是好人嘛！

前年七月八日財經会議，十月农村会議，有些同志对高饒斗爭不积极，有些同志不愿自我揭发。李先念老实，比如他对农民問題改了意見，我直接派人去調查，都說大为改善。五三年大区来人都說苦，要減税反查田定产，我很搖摆，但不知为什么要反，是怕侵犯农民利益？犯了什么罪？現在又搖到原来主張了，因为站在农民苦，站在保护私有，才反对查田。建設費中，工人担百分之九十，农民担百分之十，誰苦？

个体經济不能产生这么一点，一个工人頂几十人，你們都不生产，工农是生产者，工农是負担者。間接税当然农民是不少的，七算八算还是工人多，对中国农民，我們的政策是稳的。

搞一万件材料(死人、牲口、搶粮、万件黑暗)集合起来不过百分之六。(河北)人百分之七，百分之九十四是巩固的，百分之八十是眞的。安平細雨乡材料，二条路綫，請求不

入社一年，認为蔣介石路綫，全年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五退出，双方舒服。

河北一个小社六戶，三戶貧农要办，三戶中农不办，还办下去了。中农是动摇的，互利政策也不那么灵，不揩油，他还是不来，抵抗社会主义优势。非大势强迫不可，心甘情愿不可能，不会象吊膀子逛街那样舒服。

强迫就是对中农的問題，第一个五年計划大体还是貧农，中农要第二个五年，要和中农妥协，除非完全自由（半妥协，抽象的話，傳出去出問題，統購中某些人不能和他妥协，但不是用刀子，而是要吃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干，我沒有說过不要互利自愿。）就是說要做宣傳教育工作，社会主义对他們无損害。就是讓他們不自由，不自由問題很大，全妥协妥协不成。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沒有中共中央加上省市委坚持不行。六、七个人决定大事，七百几十万人听他們的話就是吃一餐飯，靠七百万人来表示意見，不成功，因合作不自由。簡单宣傳"楼上楼下，电灯电話"，他說我不需要，宣傳这个叫不識时势。

要承認自己馬克思主义不够，去年决定发六十万，成功的，五三年"农民苦"，不对。底子薄也是农民苦，反查田定产也不对，講錯了話的人要声明。

高說，估計大局有利于他，只西南未定，錯了！

你們听見风不和我說，梅兰芳到上海演剧，还要拜杜月笙，为啥不拜我。

我好說挖苦話，为使人不忘記，致成为明日黃花，我好不客气，客气不习慣。

人們說粮食，損失农民积极性，要須知，粮食購七百亿——八百亿，我搞了八百八十亿，不到三分之一，三百五十亿回到农村，供应和日本、国民党多不了很多。共产党来了，增加了人口，多数是农民自己生的呀！从前农民照这样供城市，軍队比国民党少，浪費少。

多購了点，不良結果是影响牲口和猪，实际署多了点，如影响猪、牲口二百万，因素多种，自然杀也是一条。回民就是杀牛的，河南項城打起来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訓。延安很多了，还是杀，皮价太貴。二百万，河南杀六十万条。但河南总数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

瘦弱有之，不是多数。

不积肥等十几个例子，一講形成观念，不分析。損害积极性不符合事实。只猪牛有点損失，三年內可以恢复。

不用干部去調查，我用的是义士。干部你要什么，他来什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

对合作社估計不妥的（陈云报告，吸收你們的材料吧），沒有說好話，你們沒有看出来。

人人說統購，戶戶說粮食，一股风需要专政，堵风想办法，坚持方針。

五亿多人，多数，能順倒我們社会主义，要专政。

浙江可否恢复一下，"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好。

黃炎培，得意的不得了，整了他一下。

专政，实际无产阶級专政。只听农民的，他就要自由。中农不揩油还是不来，到了时候，考虑进不进。进不进那好？宁要不自由。貧农不一定能完全照我們，不見得。基本做到使中农不吃亏。有全是中农的，有貧农虽多的，坚持十分之三的中农当委員，貧农中农利害輿論就不一致。

大体过得去，使中农过得去。牲畜，私有公有，历来經驗如此，公喂不利养育。

工作方法

先搞好文件，不要长，长了反不好。

全国性的，不是个别的問題，要有文件，使中央有所凭据。先讓中央看看。×也可以参加，事先中央知道全部內容，免得口徑不对，損失威信。

一年两次会，此次会議，文件未发，已迟了，落在后面了，要发一个章程，根据章程发議論。

是否要等到秋后估計？用不着，現在完全可以估計，否則是不信积极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巩固，粮食叫喊不到百分之五，現在完全可以估計的。那一年也要如此估計，尽管有許多缺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五三年財經会議，說各部路綫錯誤，几十个財經部門看成基本上不对的。应是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这就清楚了。）此次有反革命，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人心稳定。

我号召上頂下压檢查，解决百分之几。心中无数，吃了飯，开留声机，随便講，鋤住自己，最近又說合作根本不好。你們經过几次革命，为什么出这毛病。农村会議开后，中央又开，內部吵起来了。預先有个文件就行了。

插　　話

1.（談到山东曹县錯誤时）把少量錯誤扩大为全体。

2.你們不是不听話，而是听另一种話。

3.过渡时期每天都动盪，每天削弱資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要动蕩，不要稳定，一动就要地震，有四大自由，反而不稳定了。

4 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貧农的力量，社会主义的空气，你們倒要解除，成为資本主义万岁。正要你們怕。

5.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針。

6.湖南洞庭湖社开了一次会，如同俄国工党第一次会議了，但也是个历史不能抹杀。

7 反对者坚决，我們更坚决，自己不坚定，无法坚定别人。

8.十二种人，缺粮戶　災民、經济区、乡村手工业者、小商販、漁民、盐、牧、林、船民、城市、自足戶（百分之二十）、余粮戶（百分之六十五）。据社会經济法則，生产关系必須适应生产力的性質，統購是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带有强制性質，沒有专政手段絕对办不到的，不能靠資产阶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挑皮，搶粮暴动都是生产力要挑皮，各种办法（餓肚办法——示威性質）。有的是假不进会进，要求資本，有的是眞的，要注意，不注意要报应。大体是适合的，开花、种麦、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坏。現在措施是稳定的，購粮減、征不加。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說服。

专政，資本家、地主、富农、余粮戶某种程度要反对，靠无产阶級，靠坚决的同盟者——貧农。

你們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內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那要到四九年！

9.农村会議，解决了揩中农油，很好，还要互利，等价交換，現在貧农基础太少了，不能完全建在他們身上，家族之間不是风平浪靜，輿論爭执不少。

10.貧农貸款不去，貧农必揩中农的油，揩定了。中农的油一定不揩，也不可能。再过两年，大风刮进来，两条路，非来不可。

11.增加支援。

12.干部(有人說)“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不一定，上层也有不好的，高饒坏人，中間也不少，“下层糟”，很不好，工农基础，坏上层倒。百分之几糟，百分之九十几好，資产阶級也是百分之几能改造呀，不能全部糟，这是片面观点，那几句好听，不对勁。工农总不是剝削者。

13.打电話，抓住組織問題。

14.防左，要有季节，研究一下。秋收以前大发展，讓他吹起来再說，收割以后，再估計五五年数字定了，又要数量又要質量，我們已訂了条約，河南百分之三十，空白手，无事做，为什么閑起来？要塡滿！他怕他烂，他一个不烂更不好，烂了再办好。房子死了人，还不住人？讓他垮一批，春季开会节制一下，开天把会，一个人十五分鐘。

註：本文似記录不全，飞白很多，較难懂。如能參考农工部的工作情况（統購、合作化）及党內斗爭(反高饒)的背景，要好些。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风利用我們的报紙繼續欺騙讀者。从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領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視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讀者从胡风写給舒蕪的那封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嗎？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們曾經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聞”、“新聞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的一模一样嗎？什么“小資产阶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傳統反抗各种傾向的現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場”，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綱領”，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話，能够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眞正有“小資产阶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們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的領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視和痛恨的态度嗎？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剝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象舒蕪那样被欺騙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們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

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轉变为退却(即檢討)的策畧，也是騙不过人的。檢討要象舒蕪那样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应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眞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眞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編者按：自从舒蕪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們被胡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經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讀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們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憤怒的情緒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內心是同情胡风的人們在說，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現在請看第二批材料。

現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給他的反动集团的人們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針、污蔑党的負責同志、咒駡文艺界的党員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揮他的反动团体的人們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計划地組織他們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領导的文艺战綫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們打进共产党內，打进革命团体內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盜窃党內文件。在这些信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順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劍，覗測方向”“用孙行者鑽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敗以后，他就赶紧指揮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檢討，以便潛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就証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謀的极端严重性。我們必須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們假投降的詭計。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們相約，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隐語，信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負責同志、文艺界負責同志和党員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經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許多信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紙，許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張寄”或其他机关名称。

下面就是从这些密信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內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間先后排列，并加必要的注釋。信中旁点都是原有的。

按：胡风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見。这是確实的，我

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这种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評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无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論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們、两种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斗爭着，总是先进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該的。只有充分地发揚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內尚有阶級和阶級斗爭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級和人民大众，必須鎮压一切反革命阶級、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达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对于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进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报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竞賽，以期由先进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賽。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領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这里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問題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論調之后，也好象覚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压制自由"，豈不是很难听的么？他們分不清人民的內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疇。在內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錯誤缺点的批評，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而这些，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則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乱說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資产阶級专政，不許革命人民乱說乱动，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論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剝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說："絕大多数讀者都在某种組織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說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数讀者就在某种組織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領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爭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剝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結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內实現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結。胡风所說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經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們認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領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爭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覚这么难受。一句話，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們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說："文艺問題也实在以机械論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証法則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檢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

提出了三个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說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緒，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零年說的。那时，在大陆上剛剛消灭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还有許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沒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沒有进行整頓工作，胡风的話確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搗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按：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党，"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們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們，为了达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风所領导的一批人，据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資产阶級理論""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报仇。《文艺报》問題，"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問題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这样严重，为了扫蕩起見，他們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眞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說是"小集团"，不对了，他們的人很不少。过去說是一批单純的文化人，不对了，他們的人鑽进了政治、軍事、經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門里。过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严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軍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陣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統治为任务的。他們随时随地寻找我們的缺点，作为他們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們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問題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风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从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一)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謀活动更加有組織、更加扩大了，他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領导的文艺战綫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二)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們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三)由于他們的阴謀被揭露，胡风集团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轉入退却，但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瘋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絕不是眞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繼續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們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胡风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类的話来鼓励他的集团分子，就是証明。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們認为，这就是他們要等待的时机。

我們从胡风集团的阴謀活动这一事实必須取得充分的經驗教訓，必須在各个工作部門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辯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們从我們的各个战綫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們已經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偉大的胜利。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編者按：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羣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憤怒。人們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們問：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誰？关于这个問題，人民政府已經獲得大批材料。其中的一部分，我們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許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們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潛藏在进步人民內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民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壠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胡风本人的眞实面目。阿壠在一封給胡风的信里，对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圍发动的反革命內战“充滿了乐观”；認为中国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肅清”；并对蔣賊的“訓話”，加以无恥的吹噓，說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壠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为“总要排出”，并認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他們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原来胡风、阿壠等人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阿壠，即陈亦門、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軍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学讀了几个月，不上前綫，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軍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軍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轉到这里受訓，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蔣介石的陆軍大学所在，也是蔣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間的住地。

胡风，即張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他曾經加入过共产主义共青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許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軍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內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許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給阿壠的一封信里，也可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焯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簡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瞞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騙过了。

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狂热地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反人民內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而当蔣匪潰敗，全国解放以后，他們就潛伏在大陆上以更加阴險的两面派手法繼續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們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現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說“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們詛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說：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們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說这样話的人們，或者是因

为在阶級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們；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覚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眞了；还有一部分則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呂熒。

現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許他們繼續玩弄欺騙手段！全国人民必須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必須受到应有的惩处！

按：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簡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們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張中曉說，他“几乎恨一切人”。許多人認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沒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覚悟过来了罢！

按：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綠原的眞面目，胡风集团的骨干就是由这样一批人組成的。綠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簡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殘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員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誰能够把綠原“調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調”誰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后一封信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綠原还在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紹为共产党党員，打入了地下党的組織。后来綠原突然潛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剛报》。一九五零年再度鑽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鑽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按：由阿壠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畧的。他說：不要“在陣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羣众中做好工作”，把“羣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論点組織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們的这些策畧，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輕視他們，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須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肅清他們。

按：卢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畧，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請求派工作，請求討論他的問題，三十万字的上書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問題放大炮。各种剝削阶級的代表人物，当着他們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畧。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謠；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現象，攻击事情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題发揮，“冲破一些缺口”，使我們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对付我們的策畧、“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們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們有长期的阶級斗爭經驗，他們会做各种形式的斗爭——合法的斗爭和非法的斗爭。我們革命党人必須懂得他們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畧，以便战胜他們。切不可書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級斗爭看得太簡单了。

按：由于我們革命党人驕傲自滿，麻痹大意，或者顧了业务，忘記政治，以致許多反

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鑽进来了。

按：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許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講的两面派策畧，特别是他的(二)、(三)两条策畧，很可以欺騙許多人。但他們总有漏洞可以給人們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証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的覚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們的两面派策畧就更易被揭露了。

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們批判胡适派資产阶級唯心論这一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視批判唯心論这一斗爭，或者說自己沒有唯心論，或者說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談。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視的，他們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論果然給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見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嗎？

按：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中国共产党內取得党員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組織注意。綠原解放前曾經一度鑽进我們的地下党組織，后因潛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零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們的党組織“用最大誠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詳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員”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組織的注意嗎？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騙了我們之后爬进党內来的，他們把这当作“一場斗爭”看待，他們斗胜了我們，他們进来了！

按：共产党員的自由主义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場，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轉到正確立場上来的話，对于胡风集团来說，那就无望了，他們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場的“斗志”不是“較差”而是“較好”的話，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險。胡风分子是要来“試”一下的，他們已經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訓嗎？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錯誤的共产党員，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擇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錯誤，做一个好的党員；一条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这后一条路是確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在那里招手呢！

按：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們的警覚，不要讓他們“滑过去了”。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見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絕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錯誤的人，对他們的方針是帮助他們改正錯誤。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們的方針則是进一步挖出他們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爭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內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畧——三十万字的上書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是提高了羣众的覚悟，采取了正確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內部紀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出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蕪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証。近日各地許多胡风分子們紛紛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內情，是这个

斗爭的繼續发展。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們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內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則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該引起全体工作人員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嗎？

按：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所確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頌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敌人，他們覚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这会使他們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們这伙反革命的所謂"生灵"，就会"压杀了"他們这伙反革命的所謂"新的东西"。但是他們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講話，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順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講話和反党的眞面目。張中曉說："这書(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也許在延安时有用，但，現在，我覚得是不行了。""現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說过么？說过这种話的人，請注意讀讀張中曉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說这样話的人，他們还只是抱着資产阶級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認識这个講話的重要性。但是，張中曉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講話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大的范圍內掌握羣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毀性的作用，所以他們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講話的影响的扩大。他們所謂"現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們的借口，他們的一种策畧。他們的本意是"几乎沒有一块干淨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們"就規定了战斗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吳王刘濞发明了請誅鼂錯(汉景帝的主要謀画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畧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繼承了这个衣鉢。他們在三十万字上書中只攻击林××、何××、周×同志等几个人，說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級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說什么"这不过是周揚和胡风爭領导权的个人之間的斗爭"。我們在肅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爭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按：胡风集团在他們的三十万字上書和其他的公开言論中，好象他們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們当然从来不反对蔣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罵几句以作晃子，即所謂"小罵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的人則是假的。这一点我們从胡风們的許多密信得到了証实，原来他們对魯迅、聞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黃葯眠、曹禺、老舍这許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輕蔑、謾罵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蔣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嗎？

按：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国际国内阶級斗爭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經常估計这种形势。但我們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們是注定要灭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总是錯誤的。他們的阶級本能引导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們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亲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

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錯誤的。难道这不好笑嗎？照胡风分子說来，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黃的叶子”和“腐朽的屍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壯地生长起来”。如果說，法国資产阶級的国民議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阶級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內，很可能还会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認他們的失敗的。这是因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别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过日子。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較悲观的。他說“也許”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沒有矛盾”，即是說，要有几十年时間，蔣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蔣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沒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眞实才不受損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內，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們的阶級本質所决定的，他們无法象我們替他們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按：这封信里所謂“那些封建潛力正在瘋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鎮压反革命力量的偉大斗爭感覚恐怖的表現，这种感覚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級、集团和个人。他們感覚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覚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剝削制度代替非剝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剝削制度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作彻底鎮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們，只有无产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阶級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剝削阶級无論如何是要經由它們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則必須团結起来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鎮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爭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說得一点不錯。只是“封建潛力”几个字說錯了，这是“无产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語的反話，如同他們所說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一样。

按：还是这个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覚是很灵的。較之我們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員在內，阶級覚悟的高低，政治嗅覚的灵鈍，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学习，必須提高阶級警覚性，政治嗅覚必須放灵些。如果說胡风集团給我們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覚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压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毛主席接見一中队的全体同志时，向大家提出学习文化的任务。今年七月二十日，又作了具体指示，他說："根据你們的任务特点，可以少学点制式教練，多学一些文化科学知識，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五年中学毕业。"……中学課程一結束，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指示，又办了业余大学。毛主席說："你們不要单武，而且还要成为有文化的政治人員。你們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

（摘自《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在职干部文化学习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几年来贺誠同志在主持中央卫生部工作中，在方針路綫上和中央有分歧，特别是团結中西医、医学教育、面向工农兵和干部政策等方面，贺誠同志犯了严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贺誠的錯誤，已多次进行过批評教育，希望他切实改正。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五年）

前途如何？趋向如何？你們为什么老是不相信？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問題？因为你們有一点財产，你們的想法和工农不一样。你們中有一部分人也不这样想。你們应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看清社会发展規律。現在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前途是肯定的，在改造两种私有制的时候（資本主义私有制和小农私有制），許多人总心不定，总要問这个問題。这就是說，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們看社会发展，可以把握，可以安定，但还要常常講。

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不是少数人，統一战綫要不要，不是随便可以廢除的，不是中共中央要不要，而要看統一战綫对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設有沒有利，有利就要，无利就不要。从中国革命长期的經驗来看，有統一战綫比沒有統一战綫好。我們的事业和蔣介石日暮途穷恰恰相反，各項建設都在开始。大家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来替你減少吊

桶，增加抽水机。我們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談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們計划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

听說各大城市工商业界有学习小組，令人高兴。要有几个核心人物，是先知先覚。有无可能？过去有些懂得政策方針的人，可以設想能組成这种队伍。

有人計算全国工商界和城市小資产者共約三千万人，这是很大的队伍。过去宣傳不够，我看总的这几年工商界是有进步的，这个总的估計是必要的；工商界有坏人，共产党內何尝沒有坏人。我上面的估計是有事实根据的(公私合营、买公債……)。否則就沒有信心，下文就难办了。講成績当然不抹煞缺点。要全面估計。

肃反也如此，一件东西总有这件东西的性質。老帳不要算，我們算新帳。

共产这件事，我看是好事，你們以后会看得見。經常說就不可怕了，私有制大大妨碍了全国統筹，妨碍我国走富强的道路。不要說了睡不着覚，要說好几年，不可能靠一个早上。我們商量来办事，現在只講宣傳，核心分子做宣傳，大家不要感到可怕，要感到可喜有利。

我們現在提出的改造政策，就是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贖买"政策。大概十五年左右，这个期間，工人阶級为資本家每年生产的利潤(一年几个亿)十年就有几十个亿之多，所以实际上是工人阶級給資本家出錢收买了工厂。

我們在安排上做了工作及政治地位的安排，我們对資产阶級采取和地主不同的政策。过去你們說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現在你們不愿叫資本家，愿叫工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国地大物博，現在每年只有二百多万吨鋼，实在太不象話。我們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們要爭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說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

領导好些，工作就好些，領导不好，工作就差些。我們要注意領导的規划，要考虑用什么办法使大家更愉快更起勁些。有朋友說有些小企业还漏税，这是学习不好，也是沒有教育好。

宣傳問題，再講几句：不要一陣风，象台风一样不好，說馬上要共产，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損失，因大、中、小进展不一。不要引起損失，要有准备，要有秩序有步驟的前进。为此核心分子很重要。我們是有成績的，柜台上沒有断过商品，这是了不起的。我看这是有国际意义的，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資本家走在前头，給世界各国資本家做个榜样，这是很光荣的。日本資本家很关心，認为我們搞得好，人和物品都沒有損失。古話說："做好事越多，前途越好"。不要你們是先进，就来一个高潮，不要只看到你們几百人，要看到几千人。农民参加合作社，有犹豫有怀疑。資本家也不例外，不要以为怀仁堂一会，就解决了問題。十五个吊桶是逐漸取消的，否則那来的这許多抽水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看这是一句好話。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

民主人士下乡，提出粮食和鎮反問題。

必須依靠貧农，团結中农，合作社必須互利才能自愿，沒有互利就不能自愿。牲口不归公，假公道，投資平摊，貧农給。

停、縮、发。該停者停，該发者发，該縮者縮。

民主人士下乡考察，口徑对一对，十几个省問題較多，他們提出来，我們抓住。

成績、缺点，他們只講成績，不講缺点。其实乱子不少，大体还好。看一下，好的、坏的、中等的，加以分析，清一清，多少沒有乱子的。

反动势力猖獗，要講一下。民主人士眼里沒有反革命，借他們压一下有好处。

他們当民主人士也不好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合作社也乱子不少，大体还好。一日停，二日縮，三日发。縮，全縮半縮，少縮多縮，按实际情况。不干不行。

后解放区，一般就是发，基本是发。华北、东北也要有发。

該发即发，該停即停，該縮即縮。

自愿互利，互利換得自愿。取得中农入社，即有利于貧农。半，半有利，不能解釋为中农吃亏。从馬列都沒有說过这种話。貧农給貸款，腰杆硬起来。

章程要完全不使中农吃亏。

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少杀，关改多。我主多抓，民主人士主大赦，不便反对。宪法有，可以討論。赦好？抓好？我已大赦过，党团三反都赦了，战犯也赦了不少，也有赦了又作反革命。

手上还有一批，上校以上七百多，講放不放，要張治中立状子，放出去能釣魚。

大捉特捉是重点，大赦特赦不是重点，是人民的意見。七月开会时，大家都認为有大捉必要。

粮食問題，党內外有潮流，曰：大事不好。我說：大事还好，有点乱子。五年計划，要搞粮食、搞供銷。

农民中缺粮戶要粮，余粮戶也要粮。从生产上解决。过剩粮不可买，空下来。

主要矛盾：个体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

粮食工作五利：一利缺粮戶，二利市民，三利災民，四利城工，五利打台湾。

粮食工作无損自給戶，稍損余粮戶。

現在供应三亿人。

河南材料，缺粮戶百分之一点五，該叫。

統購問題，有人說定产高了，是偏低，是偏高？偏高多少？高有无百分之二十？弄清楚才能答复党內外的人。

会議上插話(广西省汇报时):

一万七千个社縮一、二百，小事。发展五千个社，少吧!

(湖南省汇报时):

怪不得湖南不叫。(指粮食工作)

发展四千个，这么少，不到一翻呀!

(江西省汇报时):

发展八千个，百分之三十四的乡。再发展一万四千个。

(湖北省汇报时):

周轉粮不能沒有，不放入計划，好呀!不买过头粮，不計周轉粮。

(浙江省汇报时):

現在五万五千个，已退七千个，再退三千个，尚余四万五千，空白乡还要发展，其余各省可否翻一翻。

(江苏省汇报时):

落后乡百分之五有反革命，百分之十坏人，蜕化分子，这是反革命同盟軍，县区乡三級干部要調查。不能讓中农作主，中农可以教育，他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也可以。

三万二千个不发展?!要比一比浙江。

(安徽省汇报时):

不发达的省，要利用发达省的經驗。江苏赶上去，湘鄂两广要放手发展。合作社多数要大发展，百分之九十較好，百分之十退。

(山东省汇报时):

死人眞省粮?湖南說死几十人，只死一人。現象、本質分开，一股台风天黑了，不得了。一查，是假的，合作社百分之九十是好的，是經多次风的。再講几点:

一、証明百分之三至五，机动幅度再研究，不决定。八百八十亿，十一亿重点減。湖南、安徽、山东要加一点。交粮食会議，为粮食需要者設。

二、层层負責有好处，但会形成无数独立王国。二十多万个要統一、分級。統一計划下各省負責。

三、周轉粮、細粮、粗粮照旧。不要在粮食上舞弊，供应太广。××缺是假缺。

四、合作社自愿互利，如果自愿，要拍扳。承認了的，照着办，保証百分之九十可靠。

五、习、法、公核有爭执，党委統一，合法又敏覚，做好。饒、潘、楊案子，包庇三个反革命。用大叛徒胡京和。可以傳达到十四級以上。

胡风案子另发通知，那个字号不清楚。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五年）

一、这次会議牽涉面很广，是一次大的爭辯

这次会議，解决了很多問題，是一場很大的辯論。这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是不是完全正確的一次大辯論。这次全党的大辯論，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牽涉面很大——重工业、輕工业、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文教、卫生、科学、鎮反、手工业改造、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党、团、工会、青年、妇女、内务、軍队等。应当有这次大辯論，总路綫公布后沒有展开过这样的辯論。应当使这次辯論到农村支部的同志中去展开。城市支部党員中也要展开。使各方面工作的速度和質量都能和总路綫規定的任务相适应。各項工作都要有全面規划。大約三个五年計划左右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同一时間内完成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候，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起来，才能彻底割断了农民与資产阶級的关系，才能彻底孤立了資产阶級，才能在农村的广闊土地上最后根絕了資本主义的来源。

現在，我們还沒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和农民还沒有結成巩固的联盟。过去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正在动蕩不定。土地改革的利益，农民已經不滿足了，有的已經忘了；我們还沒有給农民新的利益（新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沒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不富裕，資产阶級还会找到岔子向我們进攻。

几年之后，我們将看到新的情况：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結成更巩固的联盟。过去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是暫时的，不巩固的。不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就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就不能共同富裕起来，阶級就会向两級分化，穷的、富的都不会相信我們，工农联盟也就不能巩固。农村合作化以后，穷的变富，富的更富，农民就会相信我們。过了若干年以后，地主、富农也会相信我們。全体农民一年一年富裕起来了，商品粮食增加了，就会出現完全新的情况，資产阶級的咀也就堵起来了。

我們現在有两个同盟：一个是和农民的同盟，一个是和資产阶級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在中国經济落后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我們和資产阶級同盟，对他們实行利用、限制，暫不沒收，是为了搞到他們的工业品，来滿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和我們一样，爱吃飯，爱穿衣，很爱东西（工业品），光給票子还不行，还会藏粮不卖。我們利用和資产阶級的同盟，来对付农民的惜售思想。我們又利用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与工业原料，去制服資产阶級。要他們拿出工业品，接受改造。你不拿出工业品，就不給你粮食和工业原料。这样，就在經济上制止了資产阶級搞自由市場，在政治上孤立了資产阶級。沒有这一条，他們不服。这就是两个改造的互相关系。

两个同盟，和农民的同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和資产阶級的同盟是暫时的。因为資产阶級是要被消灭的。将来无产阶級队伍中，要有几百万資产阶級里的人加入进来。但是，

反資产阶級思想的斗爭則是长期的。土地改革是資产阶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它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資本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它使农民分得了土地，使工人和农民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結成同盟，使資产阶級第一次感到孤立。一九五零年三中全会曾經指出，沒有完成土地改革，不能四面出击。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靠攏到我們这边，我們才能搞"三反"和"五反"。农业合作化以后，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后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个新的工农联盟，将使資产阶級最后被孤立起来，使資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絕种。有人說我們太沒有良心了，我們說馬克思主义者对資产阶級的良心是不多的，在这方面良心少一些才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了。我們要使資本主义在地球上絕种，使資产阶級成为历史上的东西，这是很有意义的，是一件好事情。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是要消灭的，資本主义也是一定要消灭的。

現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們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再有十二年，就可以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每年可以产鋼一千八百万吨到两千万吨，发电量七百三十亿度左右，原煤二亿八千万吨左右，原油一千八百万吨左右，金屬切削机床六万台左右，拖拉机（折合每台十五匹馬力）十八万三千台，汽車十二万八千輛，水泥一千六百八十万吨左右，化学肥料七百五十万吨左右（这个水平相当于苏联一九四〇年的水平，单以拖拉机的出产来說，和苏联一九五四年的产量差不多），粮食达到六千亿斤，增产一倍，棉花六百多万吨，超过了一倍（均和一九五二年比較），拖拉机共达六十万台，机耕地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再有两个五年計划，完成农业技术改革，机耕地达到百分之百。我們实現这个任务，需要一个和平建設的时間。这个时間能不能取得？我們外交部的同志，对外联絡部的同志，軍队上的同志，要努力爭取，才有可能取得。

在这个五年內，国內国外的阶級斗爭是很尖銳的。在这个斗爭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很大的胜利，将要取得更大的胜利。过去几年，我們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胜利：反对唯心主义，宣傳唯物主义；鎮压反革命；粮食統購統銷；农业合作化。这四个方面的胜利，都带有反資产阶級的性質，給了資产阶級很大的打击；以后还要給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对唯心論，要繼續长期的搞。三个五年計划把唯心論彻底反下去，建立起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論队伍。今明两年，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人中进行肅反。反革命分子看不見，但一查就查出来了。中央組織部，中央公安部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全国已經在二百二十万人中間查出了十一万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五万个重大嫌疑分子。搞反革命，要合乎規格标准，要高质的。漏一点是难免的（如延安整风，漏了潘汉年、刘雪葦），但要少漏。在粮食問題上，我們打了一个大胜仗。农业合作化問題上，也打了胜仗。在这四个問題上，我們对資产阶級展开了巨大的斗爭，打击了資产阶級，使它抬不起头，取得了主动，否則，我們被动。

二、这次会議打破了許多錯誤观点，破除了很多迷信

会議中的許多发言，破除了許多迷信，打破了許多錯誤的观点。

首先是：大发展呢还是小发展？这一次解决了这个問題。羣众要求大发展，农业适应工业也要求大发展，主張小发展是錯誤的。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災区能不能发展？災区也能发展。

落后乡村能不能发展？落后乡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沒有資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沒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过去有人說："建社容易巩固难。"建社并不十分容易，巩固也不見得难，要說难，都有点难，要說容易，都容易。为什么偏要說"巩固难"呢？就是不要办社。

沒有机器不能办社的空气也不大了。

坏社、三等、四等、五等社，除解散外，还有什么路可走？除开个别不解散不行的及富农搞的假社可以解散外，其余可以不解散。經过整頓是可以办好的。

中央农村工作部不光出謠风，还出道理。有人說："如不赶快下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我們是一字之爭。我們說："如不赶快上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

耕牛死亡，一部分是合作社的"罪过"，但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死牛的原因是粮食問題，牛皮价格問題、牛的年老問題、水旱問題等。

今年春季农村紧張，有人說是合作社办得多了引起的。根本不能这样講。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叫囂，富裕农民也叫囂，不缺粮的也爭着买粮。部分是粮食問題引起的，部分則是虛假現象。叫囂一下也好，我們把粮食問題摸了一下底：去年遭災減产，我們多購了六十亿斤，今年增产二百亿斤，又少購了六十亿斤，在农民方面，就增加了二百六十亿斤粮食。

"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論調，也是悲观主义。苏联搞社会主义几十年了，还有优越性，我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有几十年，几十年以后，社会主义沒有优越性了，我們又搞共产主义。

最近几年，应該不应該办一批高級社？应該办。办多少，各地斟酌。

木帆船兽力車也可以办合作社，几百万劳动者应該組織起来。

三、全面規划，加强領导

要有全面規划，我的文章上講合作社規划，除此以外，对农业生产，全部經济規划（副业、手工业、多种經营、短距离开荒、移民、綠化山庄——特别是北方的光山需要綠化，北戴河、香山都是石山，也可以綠化——供銷社、信用社、技术推广站），文化教育（时事、扫盲、小学、中医、唱戏、放映电影、收音机、出版物），整党建党，整团建团，鎮反（四川江津的落后乡，鎮反搞得好。江津地委書記的发言，可以看一看），妇女工作（沒有妇女，就沒有儿子，我們都是妇女生的，輕視妇女就是反对母亲，反对母亲就是不孝），青年工作都要規划。

每个合作社都要有自己的規划，每个乡要有全乡的規划，全国应該有二十二万个乡規划。区的規划有人說不要，我看要一个好，不然沒有責任。每个县要有全县的規划。省、自治区都要有規划。着重做好县、乡两級的規划。各省应該先搞出一两个乡、县的規划，发出去叫大家照办。

发展速度：根据大家意見，分三种地区：一种是多数地区；一种是一部分少数地区；

一种是另一部分少数地区。

1.多数地区：1956、1957、1958年，三个冬季，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波之間有一伏，两山之間有一谷，应該有，一个間歇。1958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2.一部分少数地区(华北、东北、城市郊区)：分两个浪潮，即1956、1957年两个冬春(其中个别地区，也允許一个浪潮，一个冬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3.另一部分少数地区(西藏、大小涼山除外)：需要四个、五个甚至六个浪潮，到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即使这样，也不能算机会主义。因为需要那么长的时間，是短不了的。总之，条件不成熟的不要搞。

什么叫做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就是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

太慢、太快都不好，都叫机会主义。有慢的机会主义，也有快的机会主义。

要加强領导。省、地、县三級，必須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隨时看到問題，隨时解决，一有問題就去解决，不要放馬后炮(半个省也可开会)。不要爱好事后批評，最好問題剛露头就批評，不要使問題成了堆再批評。情况不对，就要立刻剎車。省、地、县三級，均有剎車之权。

必須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馬列主义，馬列主义不是光防右。速度有前边說的就行了，以后就要比質量，比規格。質量的标准：要增产，不要死牛(我沒有說不要死猪，但是猪也不能死)。如何才能达到标准？(1)执行自愿互利政策；(2)全面規划；(3)灵活指导。这三条領导上要抓好。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傾錯誤来警告我們，我們要記取苏联的經驗。

关鍵在于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六个月(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这五、六个月，务必不要出大問題。

死牛之风，应該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講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領，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今后五个月之內，省、地、县、区、乡主要負責人，首先是書記、副書記，都要鑽进合作社，成为內行。鑽不进去，就要改換工作，就不叫他鑽了。

五个月之后，中央也許又召开这样的会議。每省也許請个别县委書記参加，全国增加二、三十人。都要写发言稿，要有新的东西，講新的問題，如全面規划、經营管理、領导方法(如何作到又多又快又好)。

領导方法的几个建議：

1.一年开几次会，开大会，开小会。

2.遇到問題隨时解决，不要使問題成了堆。只要搞清楚几个合作社，就可以作出結論。捉一个麻雀，解剖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中国麻雀，外国麻雀都一样，不需要个个去解剖。

3.打电报、打电話。

4.巡視檢查。坐吉普車也可以，坐馬車也可以，两条腿跑也可以。

5.改善刊物。各省的刊物我都看了，有編得好的。缺点是編輯不負責。不管內容如何，見了文章就登。刊物的字不要太小，行不要太密，不要用新五号字，要用老五号字，使人家容易看。这次編“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看了一千二百篇。我关起

門十一天，看了一百二十篇，周游列国，写按語序言。我看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每年要編一本書，每县要有一篇，公开出版。說是“党内秘密”，我看毫无秘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叫人民出版社出版，給每个民主人士送一本。

6.发簡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十天一次簡报，紧張时五天一次。内部是：发生什么問題，进度如何。省委对中央半月一次簡报，紧張时十天一次，内容要簡单明了，写几百字就够了。

四、关于思想斗爭

这次会議，在思想上交了鋒，这很好。历来經驗証明：思想斗爭要中肯，思想要交鋒，你一刀，我一枪。不交鋒就缺乏明確性、彻底性。交了鋒，就会帮助大多数同志把問題搞清楚，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

历史上犯錯誤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愿意改正的，一种是不愿改正的，要爭取愿意改正的。对犯錯誤的同志有两条：一条，本人愿意繼續革命；另一条，别人也要准許人家革命。凡是不准許人家革命的就很危險。白衣秀士王倫，赵太爷不准許人家革命，陈独秀、張国燾、高崗、饒漱石，也是不准許人家革命，結果自己的命被人革了。历史上犯过經驗主义、教条主义錯誤的人，大多数都能改正过来。一条是自己改，一条是要人家帮助，要有欢迎批評的态度。除极少数人如陈光、戴季英等人外，都是可以改正的。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首先是邓子恢同志。錯誤的性質是經驗主义的右傾錯誤。邓子恢同志已經作了檢討，有人說檢討不彻底，中央政治局認为基本上是好的。邓子恢同志过去在长期斗爭中做了許多工作，是有成績的。但不要把成績当成包袱。只要虛心一点，不摆老資格，就可以改正錯誤。

“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資产阶級的綱領，是反二中全会决議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綱領性的錯誤。“四大自由”应有限制，改为“四小自由”。經过利用、限制和改造，最后把它搞掉。不能既不限制，又不改造。要搞掉，需要有准备，要有代替的东西，沒有找到代替的东西，就要搞掉，就会犯“左”傾錯誤。

有些同志“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这些同志不好好学习，两耳不聞窗外事，根本不理党的决議。自己不翻書本，也不叫秘書查一查。

有些同志很喜欢分散主义，爱搞独立王国，爱独裁，不爱和别人商量，或者口头上拥护集体領导，实际上爱个人独裁。总覺得独裁舒服，受了批評不舒服，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个領导的样子。資产阶級还有他們的民主，难道我們还要独裁嗎？

有些同志只办公事，不研究問題，不接触干部，不接近羣众，不与人商量，不交換意見，老是教訓人。这些同志嗅不到政治气候，虽然事物已經大量普遍存在，但感覚不到。这是得了政治上的感冒。

五、关于一些个别性質的問題

1.改变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内的領导地位，要講步驟、方法。要使本人和羣众都知道不宜作領导，并且要有較好的代替人。处理方法要分别不同情况，不要一陣风都拉下来。有些人可以拉下来；有些人可以降为副职，或者作委员。个别干得好的还要繼續存在，不要

动。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看待，他們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农不同，他們是动摇的，富农是反对的。他們是劳动者，不是剝削者。

2.在支部和羣众中說明：我們分阶层，分上、下中农，并不是划成分。是因为上下中农的經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对合作社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区别。就是在一个阶层內，态度也有不同。所以要分期分批吸收入社。几年之后，所有农民都入了社，也就沒有阶层的分别了。

3.地主、富农入社，在基本合作化的地区，可以按其具体表現，分批吸收入社。过去說全国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吸收，現在有一个县基本合作化以后就可以吸收了。对他們中間老实的，可以給社員称号。对不老实的，有的不給社員称号，叫“候补社員”，劳动改造，經济上同样給报酬；有的不讓入社。所有入社的地主、富农，三年、五年內，一律不准担任領导职务。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可不可以当文化教員？我看可以，但不作結論，你們再研究。不要叫当会計，当会計是有点危險的。

4.高級社的条件，請各地按实际情况研究。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办。

5.合作化与粮食“三定”要两不誤。粮食“三定”与合作化的时間如何安排，由各地自己决定。

6.征兵，个别地方可以推迟到明年四月，但一般不要推迟。

7.夏秋之間可以建社，不要完全集中到冬春。但在两个浪潮之間要休整。人每天都要休整一次，不休整，換不过气来。

8.“勤俭办社”的口号很好。城市反浪費，乡村也要反浪費。勤俭起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不要懶惰，不要豪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約，反对浪費，經济核算等等，都要这样办，但經济核算要逐步推行。

9.明年四月以前，不要在县、区、乡三級搞肃反。去年結合建社搞粮食和征兵，工作就粗糙。今年要細法，不要搞得哇哇叫。

10.国营农場問題，这次沒有講，是个缺点。下次要有人講。中央农村工作部下去研究一下。将来国营农場的比重会一天一天大起来。

11.繼續地、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就是資产阶級思想。当然狹隘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要眞心眞意地帮助他們。沒有少数民族不行，他們占土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財富多，沒有寶鼎、烏兰夫不行。

12.在合作社中，要把文盲扫掉，不要把扫盲扫掉。

13.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事物在时間、空間（特别是时間）中运动，人們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說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象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14.是否有发生“左”傾的可能？完全有此可能。如果領导上不注意发展情况，不注意羣众覚悟，沒有全面規划，沒有分期分批，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沒有控制，就一定会发生“左”傾錯誤，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这不是会要“倒宣傳”，必須設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各种困难，如可能減产，

死牛等。要公开向羣众講，使羣众有准备，当然也不要把羣众吓倒了。

在适当时机，在人們的脑筋膨脹起来的时候，压縮一下，不使它过分膨脹，是必要的。

是不是根本不要忧虑？必要的忧虑和清規戒律仍然要，不是完全不要。猪八戒还有三規五戒。必要的閘歇、剎車、关閘是应該有的。当人們的尾巴剛翹起来的时候，就給他新的任务（例如明年要比質量），使他来不及驕傲。

15．允許县一級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数可不可以呢？我看可以，不作結論，建議你們考虑。

16．煤油太貴，是否減价？陈云同志說可以解决。

17．有人怀疑将来会不会翻案，我看大势所趋，翻不了案。

18．有人問趋势如何？大約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計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約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計划左右，可以爭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在这个时期內，国际国內，党內党外，一定会发生許多严重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冲突和斗爭，一定会有許多困难，例如世界大战，要原子彈，出貝利亚、高崗、饒漱石等。有許多事，現在还不能預料到。但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現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决議和章程：决議会議通过，政治局修改后，很快公布。章程等于第二个宪法，还要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見，然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20．所有发言稿都以可带回去，但不要印。每个人留下一份修正稿，要換的稿子，十月二十五日前交中央办公厅。“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样本可以带回。現在的文章，古文多，半文半白，“应該”只写‘应’，“并且”只写“并”，“时候”只写“时”，“貫彻执行”只写“貫彻”。写文章，要講邏輯（文章結构有內部联系，前后不冲突），要講文法修辞（文字紧密，語言生动），应該請文章专家帮忙。

21．如何傳达？討論工作中，把記得的用自己的語言說一說。决議和章程要学习。

22．注意作好“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23．周总理給大家作一次时事报告。

24．省、大区为单位开一次小会。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

（一九五五年）

我們是人口众多經济落后的大国，經济水平生活水平均很低，建設社会主义，十五年內是过渡时期，中心是工业化，打物質基础。在現有条件下，繼續貫彻党的艰苦奋斗傳統。資金唯一来源靠自己积累。第一个五年十个指头，只做了一个。二、三个五年資金需要更大，不厉行节約无法完成任务。如果非生产建設投資突出了，会破坏工农联盟和全国团結，农民为什么不进城？十五年內，不可能样样現代化，样样社会主义。是打基础阶段。非重点建設，非近代技术装备的工厂，第一个五年感到困难，第二第三个更要大。削国防不可能，

削行政人員，也非安置生产，非加强生产不可。不可設想削減建設国防人員解决問題。只有全面节約解决問題。

过去認識不深，貫彻不透。如工厂，福利設施均社会主义設施。已无福利可增加。先抓生产、开工。

农場也太近代化了。牛場120万平方米，先进社会。

工房、宿舍、高楼、大厦，百把万，住不起。长春汽車厂、烏拉尔厂，宿舍太漂亮了。廚房，西太后出来也要說話了。这是不了解建設困难，忘記傳統，違背工业化方針及与农民共艰苦患难的精神。

生产和生活不平衡。节約为了增加积累。

一、除近代化技术設备以及和設备必要配合的厂房（国外的按国外設計，国内的按可能削減），其它一律降低造价。和延安窰洞看齐，办公室、教室、农場、宿舍、車站等按过渡时期标准，用十五年、二十年。一律磚木結构，甚至土坯子，竹泥墻。

一类是現有大城市，可以磚木。

二类新的单独城市、厂矿，要用土坯。

办公室、学校50——70元

宿舍20——50元

不同宿舍不同房租。

仓庫40——50元

車站50——70元

首都盖大楼装样子，須国务院批准。

工程部六——八月拟出标准。

二、新建工厂、鉄道、农場、福利、設施，根据生产、利潤、业务的情况，逐年設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潤以前不建設。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三、新建企业其它方面厉行节約。輕工业至多一年的筹备机关，以前筹备由部局直接筹备。

設計，照标准。重工业部門到苏联的人太多。

实习生的待遇要降低。

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厂内办公室，沙发一律不准，也不买收音机。不要厂长和职工生活脫离太远。

四、現有新城，計划均要修改，不要搞社会主义化，要利用旧城。工业要相当疏散。

（1）不搞高大建筑。一层两层。

（2）非工业集中的城市，根本不建城市。如职工用水，可用地下水，用自来水者公共使用水龙头。

馬路要，綠化面积慢慢来。

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二十年后，再用新規划。

五、今年准备建筑的高楼大厂，未动工的一律停止。

六、地質勘探：

（1）勘探量不必增加。

（2）需要增加的，增加50%工作量。

七、建筑部六、七、八个月交出标准。

（1）生产方面：

1.降低成本：工业6%加到7.5%；鉄路2.5——3.5%；商业2.9——13.9%；

2.节約原料，輕工业、棉花、捲烟量。

3.重工业完成新产品試制計划，上半年49%，不及一半。

4.一律停止收新工人，先內部清理調整，現在都核不清。現在人多了。

5.每一环节，直至清理垃圾。鞍鋼月搞五万吨鋼鉄，指标到車間。

（2）生活消費：

1.除招待外宾外，一律只供清茶一杯，一律不請客、会餐。

2.办公室不买沙发，首长办公室，两个小沙发，用会議桌。

3.公文表报节約，非国家統計局批不可发。

4.減少汽車使用。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有些人思想落后在实际后边，头上沒有角，沒有斗爭性。两条道路斗爭，不进行批評，批評不尖銳。怕批評，怕丢选票，均右傾之表現，党內有反之必要。农村部經驗主义右傾，六中全会做了批評，領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問題。資本主义改造、鎮反、合作化均如此。对自己力量估計不足，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如初級社，三、四年不提高，不利的。五九年可能会社会主义。十七条思想反保守主义。全面規划加强領导，基本措施，先进經驗，半年前不考虑，現在变了。出現了极大变化，极大的生产力，象发現新大陆，大陆本存在，看不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百分之九十，手工业也要快，計划太少了。五七年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商业国有化原說六二年，也許提前。合营了，变国又不难了，合作化十八年改为十年，証明落后实际。羣众潛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該反右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議，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改掉“大約”、“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語气。可爭取的爭取，如訂貨要求提早，利用在休战期間，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思想。如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战場好办。赶快搞股有利，要打台（？）好打，但不完成建設任务則困难，要加快，各項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較短时期得到較好成績。办得到有条件，羣众要求，办得多而好，即稳步前进。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羣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漲，干部羣众均沒勁。这样問題，中央未能及早提出，是中央失职。羣众說：“跟共产党走，沒錯。”大方向說沒錯，但具体說，我們錯了，羣众也跟錯了。前进有几条路，上中下三策，

比較正確的合理的路綫即站在前头，鼓舞羣众前进，而非站在后边潑冷水。較短时間內取得較大成績，按这，即稳步前进。按常規办事，时間长工作少，即保守路綫。要克服，有两种方法：全面規划，接近羣众，非坐在办公室办法，要接近羣众找出新事物、新經驗，先进經驗，推广。不一定捉麻雀好多才知肝胆。知浙、皖可快合作化，即知全国可搞。保守主义不是那一个人的問題。抓先进的批評落后的，发現新的生产力，羣众潛力，这是一个領导法則，是領导方法，才能說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羣众，不抓先进，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負責人七至十周，接近羣众。办公室式，只能常規法。先进經驗是要突出常規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經常的，平衡是暫时的，这是前进規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錯誤。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辯証法。这才能鼓舞羣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設，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稳步前进。

我国和苏联比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經驗，三次革命战爭的演习，經驗极其丰富。胜利前，各个方面均有經驗，左右好几次，很快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軍，无政，党員少）。（2）我有苏联及其它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我三个五年即可搞二千四百万吨鋼，就比苏快。現在是两翼高張，主体可能落后。两翼易驕，但最易驕者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鞍鋼即有驕。很可能国家社会主义化了，但非工业化（比例不过六十，体系未建立），可否讓农民等一下？那是不行的。农民社会主义化，并不妨害工业化。不能讓他們等。两翼工作做了严格的檢查。此外，对工业問題，也应做一次严格的檢查，也按期过过大运动。財經、貿易、文教均要檢查。八大做一次总結性的檢查，这就是中心問題。反保守、右傾、消极、驕傲，发現先进經驗，改变領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員羣众批評，自我批評，克服保守主义，做出来更多成績，全党准备，全人民准备。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会議开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的講話，很高兴，可以看出同志們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許多講話是很好的。

現在我要講的是領导方法問題。有两种領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我們在延安时，曾組織过宪政促进会，現在沒有了；現在有人說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議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市委，各部門，也是促进会。領导机关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也可以有进有退。蔣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国

民促退政治，它促使社会倒退。我們的領导机关应該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农村工作部有一个时期就是农村工作促退部，因为它要砍掉些合作社；卫生部有一个时期也是促退部，把事业搞垮了。各地方、各部門是否也有这种現象呢？上层建筑不适合經济基础，不能促进經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門，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須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問題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你們对客观情况的发展注意不够，估計不足。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但是，今年和明年不是一样的两面性，如果一点不变化，就沒有馬克思主义了。但是現在是馬克思主义的，用馬克思主义来看，农民几年来对他們的落后性抛棄很多，最近几个月，农民跑得很快，几个月就改变了个体經济。資产阶級也是这样，我們总是說他們“唯利是图”，現在他們已經把工厂交出来了（变成公私合营了），“唯利”又怎样“是图”法？对知識分子也是尽說他們不好，可是这次会上同志們說知識分子中进步分子占40%左右，中間分子也占40%左右，落后的当然还有，但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該促进这种改变。可是有的同志看不到这种变化，想到沒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对象沒有了，还要斗，这就变成唐·吉柯德了。当然，还有对象，但也在起变化，因此，我們应当欢迎这种变化。我們应該看到在生产关系改变后的新形势，去年上半年那样困难，到处罵我們，党内、党外都說我們不行，就是为几顆粮食，下半年不罵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最近两三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这些情况反映在同志中間，人民中間和知識分子中間，我們应該認識这些情况，并且适应这些情况。

講到促进和反对右傾保守思想，同时也应該注意不要搞那些沒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鑼敲、打鼓、报喜，这是好的，这正是促进嘛，这正說明中央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嘛！但是現在已經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們注意，值得談談这一点。农村发展綱要中已把好些农业增产的指标去掉了，右傾保守思想存在于各方面，两种領导方法采取哪一种？我因为其中有些还沒有研究，沒有充分根据，例如垦荒五亿五十万亩，据說用的錢要等于一年的預算，要多少人民币？垦荒仍是要垦的，但是否能垦那么多，要仔細研究。計划一定要行得通，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現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經有些发热了。合作化快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的快。各省同志要注意。高級化务必要做到在絕大多数人滿意条件下高級化，現在听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棄土地分紅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北方可以到今年秋冬或明年春天再轉，明春最好。建議你們多考虑。陈云同志說公私合营，人家送上門来，不要不好，但問題是內心是否通，如不通，那就等几个月，等几个月并不算长。我建議这样，不要以为又是来阻擋你們，又是右傾机会主义！总要叫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高兴，不高兴的过了百分之几就有問題。各部門計划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傾冒險，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的傾向，但已經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經过調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說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計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說已經完成。要完成，还要

做几年工作（比如說还要三、四年），資本家定息的尾巴哪年割掉，还要看情况发展。北京資本家清产核資用自評的办法，可以介紹，以后农村中地主富农入社，那些人好，哪些人坏，哪些人算社員，哪些人算候补社員，哪些人应当管制生产，可不可以也讓他們自己去評，我們加以領导，建議各地試試看，讓他們自己里头发生斗爭。

再一点，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說到的："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話，我說"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說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則五年計划，岂不也沒有了。但是有的同志一改改成"已經不能按照"或"已經完全不能按照"，可見头脑已經有些发热了。

吳玉章同志的发言講得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見，我都贊成，你們贊成不贊成？老百姓問題不大，識字很容易，但有些人覚得采用罗馬字拼音，好是很好，可惜罗馬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沒有問題；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問題了。洋字比較好，吳玉章同志說的有理，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說："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見得。因此我們采用罗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現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嗎？罗馬字出現在罗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嗎？我沒有学过文字史，他們过去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据說我們中国字是仓頡造出来的，我看不見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們要統統拿过来，变成我們的东西，要在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在吳玉章同志的講話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贊成的。就是他說："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严肅地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論来动員羣众和組織羣众的結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論，只有当社会的物質生活的发展，已經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論产生以后，它們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質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說来，好象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論。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們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已經講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經做了。我們現在講的，并沒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論。我們沒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过去在欧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經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論，就是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們有沒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細节方面，如互助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資产阶級联盟，在理論方面，列宁已講过了，只是我們实行得比較完全和有步驟，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現在云南沒有火腿了嗎？）不能使物質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鴨子应該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現出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进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資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要注意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分析，以适合各种复杂情况。許多工作，也还有发展余地，譬如肃反也要发展，現在肃反有一个准备阶段，大有文章可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好的。准

备工作做好了，就能做到比延安、甚至比去年又快又好。准备工作做不好，底沒有摸清，就会把时間拖长，树敌太多。这都屬于領导艺术，也都大有发展余地。去夏以来，几方面的工作，如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領导艺术都是有发展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发展一步，我們在理論上也应有所貢献，把前人講过的进一步的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現在还沒有显著的新东西。

和平問題。和平問題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有十二年时間，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看来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經过二十一年，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經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現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講究賺錢，蝕本他不干，沒有人抬轎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現在美国軍队的摆法，就不象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象牛尾巴捆綁在樁上，怎样好动呢？但是还要估計到也有可能突然襲击，世界上可能出瘋子的，必須估計到。所以我們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

現在我們的主动一天一天多了，如农业，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知識分子問題現在还沒有主动，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沒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們都不能制造，只能造中等的，"两头不行，中間可以"。我們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沒有独立，科学上沒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車、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輛汽車，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翹尾巴的！有的同志說些不聪明的話，說什么"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話不对，現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单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話是聪明的話，要向广大干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騎着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資本論》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否則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們回去要向各方面說清楚这件事情。中国应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过后赶上世界水平。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也不錯，海岸綫很长，（就是沒有輪船）应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們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則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該的。現在美国只有十几顆氢彈，一万万吨鋼，我看沒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該搞它几万万吨鋼。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識），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識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張白紙，这一面写过了，就沒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沒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此記录稿未經校对，好多地方沒有听清，仅供参考，勿公开引用）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資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經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沒有完成的各項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闊的規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約再有三年的时間，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圍內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轉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資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獲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創造了社会条件。

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內和共产党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資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們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現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們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难情况現在已經基本上改变了，許多曾經被認为办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办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額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的基础上，給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該有一个远大的規划，要在几十年內，努力改变我国在經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現这个偉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繼續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結一起，为維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号）

（注：这次会議是毛主席为討論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而召集的。）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一九五六年）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羣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俭勤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摘自《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第二次修改草案）》第三十一条）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改进或扩充生产設备，应于国家基本建設投資解决，不应使用企业奖励联金。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鉄路工厂开始的，当时張国燾在长辛店工厂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李实的当校长，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当汇报到不少干部滿足于現有成績，缺乏从发展上看問題，滿足于数字上完成任务，缺乏对国民經济发展及周圍情况的認眞研究，因而思想工作、組織工作、技术政策、干部培养都落后于发展需要时）

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要看三家的牌，还要看桌上已經打出来了什么牌之后，才决定自己打什么牌。

××人多，家底大，成績也不小，容易驕傲，应該注意这一方面。

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过去革命經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傾，也不是后来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苏区只剩下一个根据地，白区几乎全搞光了。在延安，我們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確态度，既不是一律团結，也不是一律斗爭，既不是只"团"无"斗"，也不是只"斗"无"团"。对于党内的关系不再是"无情的殘酷的斗爭"。这是反从前的主观主义。我們想，搞建設是否主观主义会縮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我們对現实的認識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

一个右傾。当然你們是采取原諒的态度，你們說中央的領导是英明的，你們自己犯了錯誤。所以必須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当汇报確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現場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間）

对，我們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現場去。

你們自己要办学校！

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它已发現血吸虫病的省分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請他們派代表参加，請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会議除討論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鈎虫病及其它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討論。会議应当定下一次会議，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議，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当汇报基本情况时）

××部汇报，列了目录，一目了然，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

你們可以搞点展覽会，把各种交通工具展覽一下。

学院学生太少了，可怜得很。

将来可能有一、两千万吨船，中国可能突出。世界海船吨位，我国不到百分之×，这表現我国太穷。

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揮地方积极性。

（当汇报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

运价高，束縛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換不起来。

"一长制"刺眼得很，怎么不改个别的名詞？需要强調集体領导，分工負責制。降低运价問題，財政方面打小算盘不妥当，运价高，束縛生产，税收減少，結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輸紐带，中間路太狹，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过去地方公路标准太高，修不起来。

有許多事，开始听，好象有道理。学习苏联經驗要結合实际才行，脫离实际就錯了。

地方交通会議后，情况有轉变，可見領导还是重要的，不然六亿人有六亿方向，不得了。开片会办法很好，一年一次，也可一年开两次，先規定会期，下边就动起来（如消灭血吸虫病）。各种鉄、木輪車改为胶輪車，要赶快改。

人力車已合作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化当然要得，怎样化法要注意，有些先挂个号也可以，不挂心不安，能組織就組織，不能則不勉强。

对資本家贖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資本家无利益，現在資本家愿意不愿意？現在小資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資本家随潮流走。現在問題是怎样安插。中国資本家特点之一是許多資本家有經营管理知識，資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崗、饒漱石、潘汉年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領导地位。私有財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給他們福利基金。

福建省委提的对个体車船改进意見，你們可以拿几个社試一下。每个省試一下，再下决心。

肃反，要清除眞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眞反革命有技术的，已經知道了，在次要崗位上亦可控制使用。

灯光装猪法是怎么回事？可見强迫命令不行，猪尚不能，何况人乎？

（当汇报远景規划时）

一九六七年达到××万吨船，这还象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当汇报几个問題时）

机关汽車統一管理方針很对。汽車，主要看需要，要与工农业相适应。

交通和輕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們会挨罵的。

地方运价降低問題，开个会先商議透，看准后再决定。

簡易公路，要个标准，各地乱修，則不得了。

你們对的意見我都支持，我已經說过把事业办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关 于 斯 大 林 问 题

（一九五六年）

（1月在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对米高揚和苏联駐华大使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集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10月23日接見苏駐华大使时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11月30日接見苏駐华大使时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確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摘自《苏共領导同我們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人們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后，应当給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統治阶級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許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裝殮和埋葬費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紀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現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認，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經普遍实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領导工作人員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現代化的火葬場。

我們認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們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絕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慣，在人們还愿意繼續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現有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經成为历史紀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屬的同意。

凡是贊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員，請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須保証先死者实現其火葬的志愿。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子彈并不比刀枪厉害，你們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打了几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祿山造反，一打只剩下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崙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到大炮，用热武器打仗。我們沒有試过原子彈，但可以算一算：全世界有二十五亿，原子彈就算杀掉一半，还有十多亿，也比过去用冷武器时死的人少。我們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彈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

……每一个民族里总有坏人的，不可能設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沒有坏人，沒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沒有戏可看了。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經济、財政三十四个部門的工作汇报，交換了一些意見，政治局又討論了几次，綜合起来，有十个問題，十个矛盾。

提出这十个問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

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們历来的方針。过去实行这个方針，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結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現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論在革命中間，或者建設中間，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針。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一些問題还是值得談，其中有些新东西。我們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不够的地方。談一談，考虑这些問題，正確处理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弯路。我先把十个問題念一念：

第一个問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的关系；

第二个問題，沿海工业和內地工业的关系；

第三个問題，經济建設和国防建設的关系；

第四个問題，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第五个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六个問題，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七个問題，党和非党的关系；

第八个問題，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第九个問題，是非关系；

第十个問題，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現在我来講上面提的十个矛盾。

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沒有異議。在处理重工业和輕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問題上，我們并沒有犯过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沒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錯誤。他們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視輕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貨币不稳定。我們对于輕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較注重的。我們市場上的貨物比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場情况不同。我們的生活品，說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是我們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說，現在沒有問題了。也还是有問題的，就是对于輕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調整一下重工业和輕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資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資中适当地增加輕工业和农业的投資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于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輕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讓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加重一些，是不是要改重点？重点沒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輕工业和农业这方面要加重一些。

加重的結果会怎么样？結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資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資金的积累。积累从那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輕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輕工业和农业能积累得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問題：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輕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輕工业少投一些資，对农业少投一些資；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輕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資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眞想、假想的問題。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眞想假想，在我們这里来說，不适当。誰不眞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眞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輕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資，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眞，只有九分眞，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于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意发展輕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滿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問題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証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問題，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負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貴。我們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確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確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經济的重要性，从我們的經驗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証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們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規律性的問題。

我們的結論是这样：用少发展一些輕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輕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不照顧人民生活，后果是，人民不滿意，重工业也不会眞正搞好。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作法，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几十年后算总帳，那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結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第二，沿海工业和內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內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須注意照顧沿海。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沒有根本的、大的錯誤。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論是重工业，輕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謂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的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

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如果我們不重視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計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們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間，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講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比如鞍鋼、撫順就在沿海；比如大連有造船工业；唐山有鋼鉄工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鋼鉄工业，有机械工业；上海有机器工业，有造船工业；南京有化学工业，还有其他許多其他工业；現在我們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頁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义。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們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的利用沿海工业的設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我們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問題在于你是眞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眞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須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努力搞好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輕工业。

从現有材料看来，有些輕工业工厂建設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揮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資。这样，五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說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們的远景規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人員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讀了两年小学，魯迅，大学沒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講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是沒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們在实踐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質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質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們必須充分重視这个問題。

总之，不发展輕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設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維持，而是要适当的发展。

第三，經济建設和国防建設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統統都裁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們，我們还受敌人包圍吆！

我們已經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們的軍队更强大了。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們不曉得制造汽車，不曉得制造飞机，現在我們开始能制造汽車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們的汽車工业，先搞卡車，不搞轎車，所以我們每次只好坐外国的車子来开会，想要爱国，爱不那么快，哪一天我們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車那就好了。

我們現在还沒有原子彈，但是我們过去也沒有飞机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枪打敗

了日本侵畧者和蔣介石的。我們已經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軍政費用摆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軍政費用支出的比重，分几个步驟，降到国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經济建設費用，使經济建設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設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我們就不但会有很多飞机，很多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

你眞想原子彈嗎？你就要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經济建設。你假想要原子彈嗎？你就不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少搞經济建設。究竟怎样才好，請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战畧方針問題。

在一九五〇年，我們在党的七屆三中全会上，就已經提出精簡国家机关，減少軍政費用的問題，并且認为这是爭取我国財政經济情况根本好轉的三个条件之一。但是，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軍政費用占国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的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低下来，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最近，我們跟各省的同志談，他們对这个問題談的比較多。

講工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資也需要适当調整，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

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过去家里根本沒有职业的，現在有人就业了。有些只有一个人就业的，現在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业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家庭，过去他們沒有就业的，后来夫妇两人还有一个女儿都有了职业，合起来生活当然就不錯了。我們的工資，一般的說，还不算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又因为物价低而稳，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根本不可比的。工人羣众的积极性一直是高的。

上面講的，是要注意发揮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厂，整个生产单位也有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問題。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統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統一性，沒有独立性，沒有差别性。比如，現在开会是統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讀書，有的人去吃飯，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嗎！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統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給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給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当然不要。把什么东西統統都集中起来，把工厂的折旧費也都統統拿走，使得生产单位沒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經驗不多，在坐的同志們的經驗恐怕也不多，我們正在研究。那么多工厂，将来还要多，使得它們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調动起来，这对我国的工业化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講到农民。我們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問題上也曾經犯过一个錯誤。一九五四年全国因水災減产，我們多購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減一多，农民就有意見了。不能認为我們一点缺点也沒有。沒有經驗，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

点。由于我們发現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減，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对我們有意見的农民都沒有意見了，都說：“共产党眞是好”。这个教訓全党必須記住。

农民集体經济組織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經济組織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須搞好，必須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經济就不会办好。在这个問題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錯誤。在那里，集体經济組織，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办得并不是那么好的。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須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災害以外，必須在增加农业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們跟各省的同志們談了夏收、秋收的分配問題。所謂分配問題就是：①国家拿多少；②集体拿多少；③农民得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問題。国家是税，集体經济組織是积累和經营管理費，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錢。

集体經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費不必說了。管理費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再扩大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費、管理費、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項，我們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確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們主要是經过税收，而不是經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換，在我們这里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价交換或者近乎等价交換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銷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經济組織，国家和农民，集体經济組織和农民，都必須兼顧，都不能只顧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問題，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党的重視。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揮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統一計划下，讓地方办更多的事。

現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們的宪法上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違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訂些章程，訂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沒有約束。

重工业要发展，輕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場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須发揮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領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現在几十只手捧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給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說是中央来的，給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鬧得泛濫成災，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調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們的領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們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針，制定工作規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們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們要統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揮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須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崗那种鬧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統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門有不少意見，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見，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揮他們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須謹慎。可以統一的，应当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統一的，不应当統一的，不能强求統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爭"地"，鬧其可鬧者。

中央准許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鬧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們建設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縮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問題上，我們的經驗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討論。

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个問題，我們的政策是稳当的。得到少数民族的贊成。我們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有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按人口，汉人占大多数，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汉族中間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来一次檢查。早两年有一次檢查，現在应当在来一次檢查。如果有关系不正常的，应当加以調正，不要只口里講。現在有許多人講不要大汉族主义，口里講得好，实际上沒有做。

在少数民族地区，經济管理体制，財政体制，究竟怎么样才适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

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宝藏不少，是建設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汉民族必須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經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統統調动起来。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这是說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这一条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因为說到这里，应当把这个关系說一說。

究竟是一个党好，有几个党好？現在看来，还是有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

党派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沒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是历史上产生的，因此它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是这个命运。

无产阶級政党和无产阶級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現在非有不可，否則不能

鎮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設社会主义，为了实現这些任务，无产阶級专政必須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須反对官僚主义，不要机构龐大，我建議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話又說回来了。党政机构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党派。

現在，我們国內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們还有很多意見。对这些人，我們采取又团結又斗爭的方針，要把他們調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在形式上沒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外交政策“一边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鎮压反革命，他們也还有意見。他們說共同綱領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們又全都举手贊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許多問題的态度也是一样。他們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为他們要爱国，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們要讓民主党派人士說出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我們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有利。

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同志抓一下統一战綫工作，省委書記要抽出一定时間檢查一下，部署一下，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呢？它是消极因素，它是破坏因素，它不是积极因素，它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那么，消极因素可以不可以轉变为积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以不可以轉变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可以轉变？这要看什么社会条件。死頑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們的社会条件下，就他們大多数人来說，将来有一天是会轉变的，当然，有些人或許沒有来得及轉变，閻王就請去了，有些人誰曉得他們那一年会轉变？

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由于我們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確的政策，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变成不反革命了，他們参加了农业的劳动，参加了工业的劳动，有一些人还很积极，做了有益的工作。

关于鎮压反革命的工作，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比如講，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鎮压反革命是不是应該的？似乎有这么一种意見：那一次鎮压反革命也可以不要。这么看是不对的。应該承認，那一次鎮压反革命是必須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讓羣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就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給反革命分子各种不同的处理，是应当的。这些办法，都需要給老百姓講清楚。

杀了的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重的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对他們講寬大，老百姓不贊成。肯定过去杀这批人杀的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不肯定这一点就不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肯定的，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为減少。我們的社会秩序很不錯，也还不能放松警惕。說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沒有了，高枕无忧，那就不对。有少数

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燒掉，破坏工厂，盜窃情报，貼反动标語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們交給农业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們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廢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說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鎮反工作，我們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沒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沒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讓他去劳动改造，把廢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說，人的脑袋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办法。

机关鎮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針，不妨碍我們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肅态度，但是可以保証不犯錯誤，可以保証犯了錯誤还能够改正錯誤，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就要給飯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鎮压反革命，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內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錯誤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态度，应当是允許人革命，人家犯了錯誤，必須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針，帮助他們改正。阿Q正傳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沒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魯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覚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評，一批評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癩疮疤，自己不愿說，也怕人家說，愈是这样，人家說的愈厉害，結果鬧得愈被动。魯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門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謂革命，不过是想搶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們党內在这个問題上犯过錯誤，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們胃口的人，他們总是随便給人先安上犯过什么錯誤的罪名，不許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了很大損失，我們要記住这个教訓。

如果我們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經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錯誤，不准他改正錯誤，也是不好的。

我們应当容許人家革命，有人說对犯了錯誤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說是对的，但是只說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們做些工作，帮助他們改正錯誤，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机会。

对犯錯誤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錯誤的人，要給工作，要給帮助，不要幸災乐禍，不給帮助，不給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做法。

对于革命来說，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錯誤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錯誤，屡犯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錯誤的人，只要善于从錯誤中取得教訓，謹愼了，可以少犯錯誤。我們希望所有犯过錯誤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沒有犯过錯誤的人有危險，更要警惕，因为沒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翹尾巴。

我們要注意，对犯錯誤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結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好意对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視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結全党，党內有爭論，有批評，有斗爭，这是必要的。按照情况，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評，甚至采取一点斗爭，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錯誤，是为了帮助人家。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們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領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們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認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說就沒有缺点，沒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們的支部書記、軍队的連长、排长，他們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結經驗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們都曉得有两点，为什么我們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沒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現在有現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說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过去我們这里有些人鬧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一个跟斗，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見，絕对主义，往往当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們不要这样，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我們这里曾經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們进行过长期的斗爭，但是現在学术界也好，經济界也好，还是有一些教条主义，应当繼續做批判工作。

我們是这样提問題的，学习普遍眞理和中国实际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我們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們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們公开的承認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認眞地学习外国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几国文字。

我認为，我們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

第一，我們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翹不起尾巴，驕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覚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門寺的賈桂一样。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勁，要把我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来。要象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視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政治、經济、科学、技术、文学、文艺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沒有无产

阶級政党，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輪不到我們来驕傲。当然我們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来說，革命先胜利一步，也要防止驕傲。

前面这两点，是缺点，也是好处。我曾經說过，我們穷得很，又是知識不多。一为“穷”，一为“白”。“穷”，就是沒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穷則思变，才要革命，才要发奋图强。一張白紙正好写字。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的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經有一批不錯的科学家，不是說都沒有知識。

一穷二白，使我們的尾巴翹不起来。即使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們也还是要把謙虛謹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翹起来，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点。总之，我們要調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間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間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陣营，为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組、党委，总政治部：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論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作了很好的論述，对現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級以上党委学习。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話的一篇紀錄稿，毛东澤同志最近看了后，覚得还不大滿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見。請各級党委对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中　央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发言中表現神气不足，下級对上級关系像老鼠見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許多話不敢講。各省也有此問題，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講話有神气。我們財經会議与四中全会有副作用，因为有几条規定，大家有話不敢說。財經会議有些同志发言不恰当，有些同志不敢說。

另一个原因是对情况了解不够，講得不清楚，不深刻。財經制度××，先念同志都有意見。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改变了才能改变作风，要給下面一些权。

我們的紀律多从苏联来，太严了会把人束縛起来，这样不可能打破官僚主义，无产阶級专政就要制度恰当。中央与地方分权問題，苏联制度的一长制是怎样来的，政治局与国务院均未作决定。各地要分权，不要怕說鬧独立性，中央并未作决定，均可講。各地可先搞条例、細則、办法，宪法規定是允許的。要使各地有創造性，神气活潑。从明年起每年搞一次大会。五一不要开大会了，可以开小会娛乐，苏联五一口号不要登。

× × × ×

四中全会以来我們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反高、饒是对的，决議是很必要的，否則再讓高崗搞一年，是不可設想的。但产生謹小愼微，有的不敢談国事，是不对的。四中全会前有些破坏現象，需要克服。高、饒破坏活动应当堵塞起来，但有些謹小愼微，莫談国事。应該分别清楚，有两种国家大事，一种是破坏性的国事，如高、饒应当反对，一种是建設性的国事，应該大談特談。財經会議时，有些同志講錯了話，受到了一些批判，但和高、饒之事必須区别。党在大革命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后来陈独秀犯了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再后又有“左”傾盲动，失敗后就不活潑了。八年中，“八·七”会議后的一个短时期，六次大会后的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时期有三次“左”傾，抗日时期有右傾，二次“左”傾是自己的，第三次“左”傾与共产国际有关，第三次“左”傾的四中全会的决議是俄国人写的，强迫我們接受，特别是王明路綫，对革命力量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鑒于这个教訓。应当分析批判地接受，張国燾是右傾，抗日时期又有右傾。三次右傾非常集中，不准講不同的話。失敗了，不准講失敗，鑒于历史教訓，后来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团結有斗爭。抗日时期根据地独立性很大，发揮了地方积极性，但有点分散主义，有的鬧独立性，不应发表的发表了，这与王明路綫有关。为了糾正这种現象，中央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有了一元化，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解放战爭时期拟定了請示报告制度，糾正了过于分散的偏向，最近几年不正常，集中多了些，究竟工厂、乡村，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治权，苏联四十年来还沒有經驗，我們也沒有經驗，要研究。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决定的，也不是地方决定的，就照办了。如一长制，雪峯同志提出来，中央才討論的。我們党历史上有王明路綫的过于集中，有第二次王明路綫过于分散，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过于集中也是不对的，就不利于調动力量进行大規模的經济建設，請同志們很好地究研党的历史。

× × × ×

个人与国家、集体收入分配的比例問題。我同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国家和社，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最好百分之三十。（包括农业税、附加、合作社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費等）

× × × ×

社会主义經济体制問題：

党委制是无疑的，請研究列宁的指示。厂矿、合作社、商业流通过程、运輸等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独立到什么程度要很好研究。我們不是高崗的独立王国，但要鼓励公开合法的“独立王国”（不上宪法），才好办事，一点沒有是不好办的。国务院如何分工管理，要研究解决，中央設多少部，有多大权力，不久就要决定，地方設多少部門，管理哪些事，有多大权力，几个月內搞出个章案来。中央各部門要注意教育干部給下层解决問

題，地方来中央見不到人，拖延不决，有問題几年得不到解决，应查其原因。这两个問題要解决。用什么方式既能見到人，又能迅速解决問題，請中共各部注意。

地方有权抵制中央各部給地方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指示、訓令、表格，多制止了多一些也不要紧，此权只給省、市委(政治上比較成熟)，不給地县委。

× × × ×

党章要体現紀律和創造性，羣众路綫应体現在这里，各省要研究一下，沒有紀律不行，但紀律搞得太死会妨碍积极性，妨碍創造性与积极性的紀律应当廢除。党章草案中規定設一个副主席或几个副主席，是否可以仿照人代大会常务委員会的办法，設常任代表五年一任，可起监督作用，請大家考虑。

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爭鳴”（春秋战国时百家爭鳴），应作为我們的方針，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 × × ×

全国的平衡是需要的，地方的独立性不能妨碍全国的平衡，有全国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沒有全国平衡要天下大乱。北京东西不上上海，怕上海貨来冲，所以要有全国平衡。沒有这个平衡，全国工业化搞不起来。鼓励地方独立性不要偏到一面去。現在强調独立性是必要的。

經济工作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每一省、市委都重汇报一次，搞些典型。我們沒有經驗，将要找些部、区、委、厂研究一下。别人說中央英明領导，我們是知道又不知道。

四天会不能什么都談，肃反、統战、少数民族、国际問題談得少，請各地注意部署一下反革命要肯定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沒有这一手不行。民主党派与我們有分歧意見的，現在反革命是少了，应該肯定还有反革命，今年肯定要杀一些，在机关学校口要清理，沒有清出来还要清，不能松勁，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半个月打一次电話督促。你們对各地委也可以采取打电話的方法。

党内处分：县、区、乡干部处分过多过重，高級干部（包括处长以上）犯錯誤結論难做、处分一下去（对此要查清原因），过严过重都不对，除反革命外都要給以改正机会。

少数民族問題，井泉同志講了，四川是对的，虽有些报复已糾正，其他地区也要注意。

国际关系問題。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們已有經驗。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評，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們鉴于他們的垂直領导犯了很多錯誤，如对肃反，我們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軍事观点，羣众路綫还是恩賜观点、积累資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稅都有問題，但不是說苏联沒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們学习的，帮助我們建設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現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錯誤，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們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說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現在人家說臭我們也跟着說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資本主义好的也应該学。

对外国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翹尾巴，虽然我們不是帝国主义，沒有十月革命，开始翹不起来，但是过早学会了些东西就可能翹尾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間的都給人家看。苏联有沙皇时代，我們有蔣介石，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讓他們照，衣服穿的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謊，总有一天会揭穿的。

傳达問題，有些东西任何地方都可以講，斯大林、第三国际作的坏事可以傳达到地委書記，县委書記也可以，不写在文章上是为了照顧大局（这篇文章只写了一句“出了些坏主意”）不准备在报紙上和羣众中講。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論《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緒》，是刘少奇命令陆定一由旧中宣部的人写成，刘少奇、陆定一审閱发表的。后来，毛主席严厉批評了这篇黑社論。）

六月二十日社論有原則性錯誤：既要反对保守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緒。这社論講反右不到半年，就認为反右成績很大，估高了。不能說社論一点馬列主义沒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馬列主义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話，摇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話，是秦琼买馬，減头去尾要中間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講少数如何，后面講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欢迎你們，中国人民欢迎你們。全世界都知道你們的斗爭，很同情你們。恐怕只有帝国主义不高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英国可能还好一些。怎么样？在美国干涉你們的时候，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阿本斯（下簡称阿）：英国看起来沒有表示态度。在安理会上，对危地馬拉要求制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提案，英国投了棄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在事件发生时，有一艘英国商船正在危地馬拉港口运貨，被美国大使館操縱的空軍飞机打沉了。

主席：英国在危地馬拉有什么利益沒有？

阿：英国在危地馬拉沒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紀时，英国取得了危地馬拉的一块領土的讓与权，这一块領土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主席看地图）。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图上的英屬洪都拉斯。

阿：我們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主席：收回这块土地还不是主要的問題吧？主要的还是美国对危地馬拉全国的侵畧。在事情发生时，你們的鄰国表示什么态度？墨西哥采取什么态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馬拉之間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主席：墨西哥屬北美洲嗎？

阿：是的。

主席：中美洲有那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主席：不包括巴拿馬嗎？

阿：不。巴拿馬原来是哥倫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統一的中美联邦。

主席：你們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馬拉都很同情。

主席：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嗎？

阿：不。侵畧是直接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会議。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畧的爱国人士。危地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壟断組織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滲入的提案。

主席：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主席：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畧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很少，苏联离的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壟断控制下爭取解放而斗爭，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会議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滲入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棄权，危地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贊成。

危地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馬拉人民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主席：我們知道的。

你們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們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暫时的，危地馬拉終究是你們的，是危地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

美国到处欠賬。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賬。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包括英国在內。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沒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畧。日本、南朝鮮、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畧。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爭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現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主席：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讓位給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人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輩子就經历了这种变化。（主席問在座的人的年龄）我們这里有三个清朝的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滿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領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員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敗。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滿清。大，也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敗了。因为他沒有滿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曉得不曉得鎮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失敗于一个軍閥首領袁世凱。

袁世凱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規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蔣介石）同我們共产党合作，把軍閥都消灭了。

蔣介石統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認，統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們力量小，当时五万党員，經过鎮压只剩下几千党員。敌人到处搗乱，还是按照老規律，强大的失敗，因为他脫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結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爭，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領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占領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軍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按照这个規律，沒几年就倒了台。

我們經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經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們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軍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說：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贏我們。强大的打不贏，弱小的总是胜利。

現在美国很强，不是眞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脫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紙做的，經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紙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証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級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証明这一点。强的要讓位給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讓位給你們。

阿：感謝主席先生对我們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主席：我們的經驗，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們一定会使它适合我們的情况。我們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們愿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人民，包括危地馬拉人民。

主席：中国人民是你們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們的一分；你們的成就中，也有中国人民的一分。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終有一天，紙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們感到非常荣幸。我們認为这是对我們的极大的友誼，对危地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誼。在我們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謝謝。）我們祝賀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主席：我們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減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們是同志。

我們性質上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語言不同，沒有性質上的差别。我們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質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綫上的板門店同美国談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紙老虎，是从战畧上說。从整体上来說，要輕視它。从每一局部来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眞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畧上說，完全輕視它。从战术上来說，重視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現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圍、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剝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輕視它。但是它現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鋼，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爭，用力斗，一个陣地一个陣地地爭夺，因此需要时間。在板門店談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搞出个朝鮮停战。現在又在日內瓦談了快一年了，还沒有談出名堂来。也可能談到二十一世紀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紀，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观，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象我們中国所說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阿：現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主席：对。

剛才你說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說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嗎？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們相信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主席：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主席：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統。

主席：西班牙血統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主席：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嗎？

阿：墨西哥、危地馬拉、祕魯、玻利維亚、巴西印第安人多。阿根廷、智利差不多全

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主席：有人說，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馬拉人很象中国人。

主席：現在还沒有什么証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主席：这是不是就出現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問題？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剝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視，身上标着号碼，象牲畜一样。

主席：你們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統治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你們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們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給农民。外地来的人当总統，把土地分給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們的拥护。

阿：我們確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們那里沒有种族歧視，黑人不受歧視。

主席：危地馬拉有黑人嗎？

阿：很少。

主席：不知道是不是你們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沒收？有民族資产阶級嗎？地主中間有沒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結。这样就能組成强大的統一战綫。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視，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阶級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資产阶級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們听了危地馬拉共产党的建議，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錯誤。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貧富对立。我們改变了它，支持民族資产阶級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們犯了一个錯誤，民族資产阶級、工业資本家和中产阶級支持政府，我們却远离了他們。

主席：我們这里也有地主中間的左派，从地主阶級分化出来的，反对蔣介石，和我們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們接收了整个資产阶級，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員，大、中、小学的教授、教师。教育他們，要他們为人民服务。

我們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錯誤，使他們感覚到不舒服，引起他們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說，經过五、六年的合作，团結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員，只要沒有跑到台湾，我們也接收了下来。但我們处理得不好，有些有职无权，掛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挂个名，沒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館不做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会議也不做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对我們的錯誤缺点要注意，要进行比較。（主席問陪見人：还要为阿本斯組織些什么座談。吳茂蓀等：已組織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問題的座談，还要組織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統一战綫問題的座談。）尽講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不講坏的，你

就問他，有什么坏的。

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日。我們因签証問題，必須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主席：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談談，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找起义将領、資本家、宗教界人士。你們如有少数民族問題，也可談談，这方面我們有点經驗，也有錯誤。

張奚若：他們已参观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謝主席先生所講的話。我們将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間来学习。我們已經学到了你們的政策的灵活性，你們給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們为人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認自己的錯誤。

美洲的一些政治領袖，往往不是这样。他們对他們自己，也从来不承認有錯誤。

主席：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說了出来。

我們曾經犯过錯誤。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农民外，什么人都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蔣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蔣介石力量大了，把我們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們就“想”，批評、改正了这个錯誤。

我們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傾、两次右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也犯过右的錯誤，如張国燾、高崗。

犯錯誤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們的老师。我們有很多老师：日本、美国、蔣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張国燾、高崗。这些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們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很喜欢我們这块地方，都是我們的教授，我們是他們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錯誤。如果你們有錯誤，你們也可以取得教訓。美国就是你們的教授。現任总統阿馬斯可以說是你們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别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謝。我們占了你很多时間。我們知道，这些时間并沒有白費掉。我們要把主席先生的話帶到我們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們的工作。非常感謝。

主席：謝謝你們来看我。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異，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的法則。一切事物，不論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細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要找出完全相

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級斗爭、社会革命、由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一些小的原則和表現形式，各国又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現形式上，两个革命却有許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許多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們否認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張“全盘西化”。这是錯誤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闌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沒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問題。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現。同民族的习慣和語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圍的繼承性。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繪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張“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認中国的东西。就說中国的东西沒有自己的規律。这种說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繪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規律。沒有自己的規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聞乐見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錯誤思想的人，只是沒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規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虛无主义的态度。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間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遺产抛棄，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贊成的。

当然，这决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向外国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我們都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本理論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張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張对不对呢？不对。所謂“学”，就是基本理論，基本理論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該分中西。

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論就是在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分中西？我們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革命的实踐証明，不接受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沒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二国际曾經企图否定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講了一些否定、修正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駁倒了。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我們必須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眞理又必須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說来，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們都要学，学好了就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們也要作独創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識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遺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其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細菌学、解剖学，你說，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識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識和西医西药的知識相結合起来，創造中国統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沒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們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創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要承認，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艺术上，我們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須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紹，外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象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外一样，都是錯誤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国的問題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們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硬搬外国，結果是一个大失敗，使白区党組織損失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和紅軍損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許多年。其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沒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們不反掉，就沒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們也应当吸取这个教訓，注意不要吃教条主义的亏。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統統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的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的結合起来。魯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譯，而在于他的創作。他的創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們应当学习魯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創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結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說，語言、人物、环境，必須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驢非馬，成了騾子也并不坏。两者結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論在政治上、經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論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我們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資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創性，要有鮮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異”。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須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異”。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問題。这个問題，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及其知識分子，有几百

万人。他們人数不多，但是有近代文化，我們一定要团結、教育和改造他們。买办阶級有文化，那是奴隶文化。地主阶級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識还不多。比較起来，在沒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有較高的知識和技能。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就可以使他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不能够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呢？能够的。我們在座的許多人，过去都是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都从資产阶級那边轉到无产阶級方面来了，为什么他們就不能轉过来呢？事实上，已經有許多人轉过来了。所以，一定要团結他們，把他們教育和改造过来。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工人阶級的革命事业，才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在座的都是音乐家，学西洋音乐的，你們有很重要的責任。整理和发展中国的音乐，要靠你們学西洋音乐的人，好比整理和发展中医要靠西医一样。你們学的西洋东西是有用的，只是你們应当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学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們要重視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要以創造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为努力目标。你們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們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 × ×

我們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軍乐队千万不能拿哨吶、胡琴去吹奏，还是管弦乐队。我們要提倡民族音乐，但西洋的管弦乐还是应当要，因为世界上都作兴这种东西。这等于我們穿軍服，还是穿現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和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当然我們的軍服同苏联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軍队色彩。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大家都沒有言发了，我来发个言。

今天是开个預备会議。（邓）××同志已經講了，要討論和修改几个文件。

（一）

这次大会的目的，要解决的問題是要总結七大以来的經驗，团結国內外一切积极因素，使我們的工作作得更好些，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总結經驗和修改党章可以使我們的工作作得更好。

我們团結全国一千多万党員，要进行广大的教育、說服、团結工作。

过去，外国同志不了解我們对待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和整风运动，后来逐漸地有了了解。現在全世界上都了解我們党是正確的，一般外国党的同志是了解我們的。我們作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資产阶級也不能否認我們的

成就。

俄国的資产阶級是一个反革命的阶級。同等他不干，他反对苏維埃政权，消极怠工，进行破坏活动，与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不同。

美国不讓新聞記者来，就是杜勒斯也承認我們有这些好处，（即成績、长处），以至他們不敢派人来。（笑声）

这次会議有四十九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来参加我們的会議，这很好。

过去我們沒有执政，大家看不起我們。現在我們执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們。外国同志很尊重我們的党。过去外国人說我們是东亚病夫，不会打球，不会游泳，連月亮都不好，有辮子，有小脚，魯莽得很等等。認为一切都不行。現在我們翻身了。但单有党不行，党是核心，必須要有羣众，要依靠羣众。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党員干的，譬如梅兰芳，周××都不是党員。我就不会唱戏，在座的同志也許有会唱的。因此要好好团結全党和非党員。团結工作中还有許多毛病，要搞好。要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在国外要团結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各国。团結全国、全党、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为什么呢？为了建設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說应該說是偉大吧？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們。党是偉大的，革命是偉大的，国家是偉大的，建設是偉大的。过去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有点理由的。那时蔣介石只有几万吨鋼，而我們現在就有四百多万吨鋼，第二个五年計划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一千万吨以上，变为世界上几个强国之一。世界上年产二千万吨以上的国家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再过几十年以后，我們可以超过美国，而且应該超过美国，否則，我們六亿人口干什么呢？美国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万吨鋼，我們現在有四百五十万吨，比美国落后。如果我們几十年赶不上，就要杀掉一批人，要开除地球籍。否則，我們就对不起世界各国，对世界的貢献不大。

（二）

在思想作风方面——我們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很多主义吧？（問邓××）中央文件上还有个官僚主义，我們这里只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經常扫清又兴起，又扫清又兴起，到一万年还是有的。

为什么斯大林会犯錯誤呢？就是由于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不符，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但是很多文件沒有好好談到这一点。我們的文件，要尽量克服主观主义，一定要尽可能的合乎实际情况。过去我們中国革命，因为主观主义带来了很大損失，革命力量失掉了百分之九十，經过三九年整风才解决了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主观与客观相結合，政治与实踐相結合，否則就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义。

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只看局部。現在只談地球上。只要有利于团結，我們就要同意。要团結全党、全国、全世界的积极因素，要团結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首先是苏联，不能因为斯大林犯了錯誤就不学苏联了，这是不对的。人家搞了几十年，不能不犯錯誤，他的錯誤只是一部分，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这是主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有了馬列主义，变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也不要認为苏联一切都是香的。苏联自己也說有的是臭的。我們过去也有陈独秀、張国燾、李立三、王明、高崗、饒漱石，他們是我們的教員。但是最大的教員还是蔣介石和帝国主义，他們用枪炮教育我們，——

必須要搞好团結。这里講的团結是自己的对手，打手，而且是錯誤的方面。（正確的对手就不要說了）罵过自己是机会主义的人，交过手的人，不是与自己意見一致的人。与自己意見完全一致的人，就沒有什么团結的任务。要积极地帮助教育犯錯誤的对手改正錯誤，旁观是消极的作法。

（三）

八大中委多少人合适？我認为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比較妥当。苏共中委近三百人，他們的党年龄长一些，我們等两年再說。人太多了，也不好办。演連环套就是人多一些，我看过連环套。七大七十人，再加一倍，多一点比較合适。

三八年是我們实际工作很主要的基础，但是人不多。不好安排，也是个問題。我看还是……吧！五年以后再談。

大家要提一百八十，一百九十，二百，都是二百人的，权力在代表身上，你們要提三百人也可以。我也是代表，只有一票也沒有办法。

上屆中央沒有辜負七大的委托，作了很多工作，有成績，沒有过大的問題。其中有个别同志的成績，也很难作如此估計，如王明有病，不能用脑筋，一写檢討就要害病，不能写。可能眞有病，也可能沒有病。王明写过一次檢討，承認了中央路綫的正確，但是不久他又不承認了，我說不承認可以收回檢討，但是他不收回。李立三同志是比較諒解王明的。

王明和李立三同志提不提呢？大家可以考虑。王明同志这次有病，不能参加会議，七大是选了他們的。这次我們也可以象七大一样选他們。我們不选犯錯誤的人，那就是以他們的办法办事，他們就是把和自己斗过的人不要。

最基本的就是他們不是一个个人，他們代表一部分小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是动摇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愁起来垂头丧气。中国是个小資产阶級比重很大的国家，我們党的农民的比重也是很大的。党內知識分子出身的就占一百万，这一百万党員，放在資产阶級不恰当，放在无产阶級也不适合，放在小資产阶級最好，他們主观主义多，宗派主义也不少。我們选他們两个人，是表示我們对这种犯思想錯誤的和对反革命与分裂派（如陈独秀、張国燾、高崗、饒漱石）有所不同的。陈、張、高、饒等有政治綱領，王、李也有，但他們和高崗、饒漱石不同，这是有社会原因的。动摇分子，机会主义，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无原則的。如王明，先犯“左”后犯右的錯誤。張国燾也有。他最近在香港听說想回来，回来也好，蔣介石少一个人。沒有党籍还可以有几个籍。

小資产阶級在紧要关头就要动摇的。王明有时右得不得了，有时“左”得不得了，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十一年来对我們的工作并沒有什么影响。今天的水災大概不是因为他們仍然选上了中委吧？

选了他們，是不是大家都会去学王明呢？不会的。选了王明、李立三，就是讓出两个位子来，把两位正確的同志或有小錯誤的同志讓給他們。位子讓出来是不公的，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的。能不能說：“正確的不如錯誤的，犯小錯誤的不如犯大錯誤的”。問題不在这里。道理是他們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們选了他們，全世界都会說：共产党在等待他們。外国都知道，别的国家象我們这样对待犯錯誤的同志是很少的。

这次会議虽然筹备仓促，但还有十多天时間，一定要开好。……大家要竞竞业业，看文件，选举，发言，好好的加以組織。依靠大家努力，会才能开好。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討論候选名单）

七大开了一个团結的会，团結的結果，使得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現在是建設的任务，也要求我們团結。

我們中国革命时間很长，已經二十八年，这中間經过很多曲折复杂的道路，犯过多少路綫錯誤。所以这样，还是个覚悟的問題。如果全党都覚悟很高，那些錯誤路綫就执行不通。直到錯誤很明显了，才清楚。可是反对了这种錯誤以后，又犯了錯誤。不过，正是因为經过的时間那样久，我們才从中搞出一套政治路綫、軍事路綫、組織路綫、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統一战綫。不經过那样許多挫折，是不能有这些建設的。現在我們搞建設，希望錯誤不那样长。那样长的时間，是犧牲了多少人，才讓我們学会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与羣众关系——走羣众路綫，才有了認識。我写了那些文章，沒有几次斗爭經驗是搞不出来的。問題是，在建設当中，还要犯那样长的錯誤，栽那样多的筋斗嗎？可以不必，主要的問題在于認識。我們六年学会很多，但是科学技术还沒有学会，还要作很大努力。現在我国有十五万高級知識分子，第三个五年計划，要发展到一百五十万高級知識分子，那时我們就有許多科学家、工程师。……我們应当避免走那样多弯曲的道路，就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更少一些。一般講中央和高級干部中間主观主义还是比較少的，否則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了，我們在斗爭中也沒陷于孤立呢？但是我們还是有主观主义的，比如中央批轉过一个地区的一长制經驗，当时就是不清楚。現在清楚了，不如集体領导与个人負責制相結合好，团結全党关系很大，我們这次会議应該是一个团結的大会。

这一百七十人名单，是反映了革命发展过程的。比如上海、天津、鞍山、沈阳各处工人都沒有，有的說那你还是工人阶級，还是馬列主义？問題在于二十二年根据地，根据地里这批人学会了馬克思主义。你說我們不是，我們可是反对了帝国主义，在建設社会主义呀！馬、恩、列、斯都不是工人，他們不懂得中国农村先胜利，城市后胜利这个条件。城市胜利才几年，要等他們成长起来，我們就会变了成分。

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紀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鮮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爭。他在这一場斗爭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領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偉績。

紀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偉績。

他在治政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东西。

現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繼承者。

我們完成了孙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〇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紀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較大的貢献。而这种貢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內，則是太少了。这使我們感到慚愧。

但是要謙虛。不但現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謙虛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种宏偉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內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費了毕生的精力，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偉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号）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經济問題

經济建設不是一点沒有进退地、四平八稳的前进着，建設也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馬儿跑得快一点，有时馬儿跑得慢一点，有时上馬，有时下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第一是我們沒有經驗，第二是我們的經济建設要以形势为轉移。比如过去經济建設可能搞快了一些，那是因为当时存在战爭形势，如果馬上要打的話，重工业搞多一点，就有必要。經济建設的进行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波逐一波，就是說，有平衡、破裂。而破裂之后又恢复平衡。当然，波浪式的起伏也不能太大，不要一下子又反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規律发展前进則是必然的。如果承認了这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也就沒什么，总的来講，我們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是正確的。

165項是决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重点工程，这些不能不搞，但少許搞快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至今已經四年了，总的情况是好的，生产前进了，工人收入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了一些，虽然社会上紧張一些，但也还过得去，基本建設成績也还是好的，建立了許多工厂，有很多过去不能自己生产的产品，現在已經能够自己搞了，象过去那样什么都要依靠外国的落后情况，已經开始有了改变。在工业方面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应該確定，第一个五年計划是正確的。当然，錯誤也是有的，这主要是因为經驗不足，而且今后也可能会有錯誤。因此，不能說我們总結这四年經济建設的經驗，就能够完全掌握了經济建設的規律，一点錯誤都不犯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五年計划的中心項目是165个，而限額以上的項目一共是八百个，其中大多数是自己搞的，只有一百五十多个是苏联帮助設計的，其它有些是东欧兄弟国家帮助的，主要还是自己設計的，誰說我們不行呢？虽然我們自己搞的数量不少，但大的工程是苏联帮助設計的，小的才是自己搞的；如果大的都能由自己来搞，就行了。看来，如果第一个五年計划有缺点錯誤的話，那么最大的缺点錯誤，就是沒有經驗。建設工厂只有骨沒有肉，也就是說，把厂房、机器設备等搞起来，而对于附帶的設备——下水道、馬路、邮电、茶館、酒楼、宿舍、剧院等等都沒有相应地建設起来。实际上，眞正要建設一个工业城市，不把这些包括进去是不成的。西北現在有很多困难，搞得很紧張，这是因为城市沒有基础，工厂搞起来了，沒有理发的、縫衣服的，馬路沒有，汽車不够，物資运不进去。因此搞工业，只是設計工厂本身，那是不够的，必須把工厂的許多附帶的服务性的設备和福利設施一并計划进去，而过去我們沒有列入計划。我們的八百个項目本身的投資經費是够用了的，可是一旦发展下去，所需要的經費势必会增多，而这些我們又沒有計划进去，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今年問題并不大，而問題大的却在今后，如这次不发現建設工厂中骨和肉的关系問題，只是搞厂房、机器設备，不搞附屬設备，工厂是建立起来了，可是問題会有很多。

尽管我們在建設上，我們犯有主观主义錯誤，然而錯誤不犯一点也是不行的，因为沒有經驗。犯了錯誤，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从而得到教訓，主要是把錯誤改了就行了，不要潑冷水，要保护干部和羣众的积极性，应当在这个前提下面，来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对于羣众要求而暫时办不到的事，一定要公开告訴羣众，反复地向羣众解釋清楚。

以后搞預算，每年要搞两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討論，三榜定案。因为預算是个框框，經济建設速度的快慢，主要决定于預算。×××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講得很好，他說：現在到底哪一年的計划是冒进不冒进，就看这年財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今后要使建設速度能够保持經常稳妥，搞好預算是个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中央把它提到二中全会上来討論，是有道理的，是要大家关心这个問題。討論一次还不够，还要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討論，这样做的結果，就会使得我們的預算搞得比較准確，同时也可以使得我們的經济建設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省委、市委及中央各部的負責同志，一定要抓財政經济和計划，而現在沒有抓的居多，要迅速改正这个缺点。各級党委在改革已經完成之后，要搞建設，而党委如果不抓財政經济和計划，建設如何能搞得好呢？党委是外行就沒有办法領导，要想成为內行，就要深入进去，抓起来。中央現在已轉向抓財政經济和計划工作。

粮食、猪肉这个問題很大。今年的粮食，虽然全国还是增产的。但災区面积很大，由于对粮食銷售沒有抓紧，半年来多銷了很多，浪費也很大，大家要好好把粮食問題研究一下，看看怎样才能保証供应，又要不发生問題，不要浪費，不要多銷。猪肉和付食品供应都很紧張。这些都不是很簡单的問題，特别是談到农产品价格問題，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講农产品收購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張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張对生猪的收購价格也提高一些。現在解决粮食問題，一方面是节約，抓紧不要多銷，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沒有飼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現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負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現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換，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錯誤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縮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不管怎样，我們的經济設設，必須要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我們用一角錢，不能只做八分錢的事，而要做一角一分、一角二分錢的事。在困难的时候，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就想着要国家拿錢来解决困难。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不依靠錢，靠我們的模范作用和艰苦奋斗，也可以解决問題。为什么这样說呢？据說兰州建設工厂，办公大楼首先就建立起来，可是沒有工人宿舍，現在工人只得睡在棚子里。

搞經济建設，还要靠报紙，要使报紙在經济建設中，在整个工作中起很好的作用。要抓好报紙，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羣众講清楚，提高羣众覚悟，大家眼前都苦一些来搞建設，建設好了以后生活就可以好一些。如果只是提高生活，而不把羣众覚悟提高，問題还会发

生。如：匈牙利的人民生活提高不多，但也不是很坏的。可是，由于沒有教育，沒有提高羣众覚悟水平，小資产阶級、資产阶級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致出的乱子很大。

此外，今后应該多强調与人民同甘共苦，首先是宣傳領导机关干部要起模范作用，然后才能要求羣众艰苦奋斗。建設社会主义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必須要强調生产，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强調領导机关干部的艰苦奋斗，发揚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同时号召人民与我們同甘共苦。

二、国际形势問題

目前的国际形势，发生問題的地方是中东和东欧，看来都不是好消息，但也可以說是好消息。因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表明有問題，有矛盾存在，既然有問題就要暴露出来，而事件爆发，使得問題明朗化，清楚了，这样就可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把問題能够解决好，使波兰、匈牙利能够搞得更巩固些。如果从这方面看，又是好消息。所以有問題，終究都要爆发，迟爆发不如早爆发，早爆发的問題可能小一点，容易解决些。‘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之后，有好的一面就是可以接受經驗教訓，如果確实在失敗中取得了教訓，也就有所收獲，这就是好的。如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人民，也教育了苏联，同时也教育了我們。問題是会不断有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問題也还是不断发生的。“革命”这两个字，在字典上大概不会取消的，什么叫革命呢？就是說，有矛盾就会有斗爭，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叫革命。現在的革命，就是指消灭阶級；将来的革命，內容和性質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是，有矛盾就有斗爭，要解决矛盾就要斗爭，这在将来同現在和过去的意义上，还是一致的。将来阶級消灭之后，矛盾的性質可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今天的中国阶級矛盾已經基本解决，当前国內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講，本来它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三、中苏关系問題

目前，社会主义陣营中，苏联的領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动摇了苏联的領导地位，会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陣营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我們拥护苏联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大家都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資本主义，既然我們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苏联能发揮更大的作用，我們为什么不拥护他呢？当然，拥护苏联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加以盲目的拥护。事实上，我們一向都不是盲目拥护的，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我們是不采用的，我們中国革命和工作的方針、政策、路綫，都是我們党依照中国的特点、情况，独立確定和制訂的。应該說，苏联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居于領导地位，也是恰当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也是有基础的。苏联还是有不少先进經驗。虽然苏联过去也有些缺点，有些做法不够妥善，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正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而我們有些同志过去就是片面地把苏联看成十全十美，現在調过另一方面又看成什么都不好了，这是片面性的表現。

馬列主义者看問題不能片面，事物有眞美善与假丑恶之分，而又是相互对立的。对苏联的看法，过去看不能什么都好，今天也不能認为什么都不好。实际上，近来苏联在許多工

作中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且是向好的方向走。这說明苏联基本上是好的，过去是好的，現在是好的，将来会是更好的，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有些問題处理方法不够恰当，在理論方面也有些錯誤。

我們党一开始就学习苏联。羣众路綫、政治工作、无产阶級专政等，都是由十月革命学来的。列宁在当时是注重发动羣众、組織工农兵苏維埃等等，不是靠行政命令。列宁派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問題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斯大林的后期，虽然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是他把列宁的一些东西抛棄了，脫离了列宁主义的軌道，脫离了羣众等等。因此，学习斯大林領导后期的东西，教条主义地往中国搬用，我們是吃了一些亏的。現在苏联还有一些先进經驗，也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跟苏联一样的，如：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經济建設的十大关系，都是中国的做法，今后的社会主义經济建設，主要应該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所以学习苏联的口号，还是要提，只是不能盲目、教条地生硬搬用。同样，我們对資产阶級国家的某些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我們主要是学习人家的长处。

斯大林有脫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傾向，具体表現在否定矛盾，至今还沒有彻底消除斯大林这种观点的影响。斯大林是唯物主义。辯証法的，但是，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他把个人摆得高于一切，否認集团，否認羣众，个人崇拜，更確切地說，是个人独裁，这就是反唯物主义；斯大林也講辯証法，实际上是行而上学，如联共党史中講辯証法，把矛盾放在最后。应該說辯証法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矛盾对立的統一。由于他是形而上学，才产生片面的观点，否認事物的內在联系，孤立靜止地看問題。講辯証法則是对立的統一的看待問題，所以是全面的。生同死、战爭与和平，是对立的矛盾的，实际上它們之間又有內在的联系，所以，有时这种对立又能統一。我們認識問題不能只看到一面，应該全面分析，透視它的本質。这样，对認識一个人来說，就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好，一下子又坏得不得了，連一点好处都沒有。为什么我們党是正確的呢？就是因为我們認識和解决一切問題，都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这样就比較全面而不絕对化。其次，羣众路綫，被斯大林看成尾巴主义，沒有認識羣众路綫的好处，許多問題都用行政办法来解决，而我們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承認羣众是創造一切的、历史的主人，沒有什么个人英雄，只有羣众团結起来才有力量。实际上，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却把羣众路綫忘却了。在反斯大林的同时，也并沒有很好的認識和强調羣众路綫的意义，当然，最近已經开始注意了，但認識的还不深刻。再有，阶級斗爭和无产阶級专政是为列宁所强調的。当时列宁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的分歧，主要就是馬克思主义者强調阶級斗爭和无产阶級专政，而机会主义者則不肯承認。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教訓之一，除了工作中有缺点等之外，就是他們在革命胜利之后，沒有很好地发动羣众，彻底肅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說，沒有認眞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搗乱。还有就是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上，我們一向主張应該是平等相待，国有大小，各有所长，各兄弟国家有着共同目标，所以一定要团結，平等相待，不能有任何优越感。我們的党自从遵义会議以后，是独立地执行政策，独立地决定方針，保持独立的地位，按照中国情况办事。建国以后，我們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須同社会主义陣营的国家团結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

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資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們在政治上同資产阶級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中国不可能走資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資本主义。

中苏关系必須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領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則，对我們社会主义陣营是很不利的。应該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必須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須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講清楚。

四、大民主与小民主問題

近年来，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要求实行大民主。其实，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提法是錯誤的。究竟什么叫大民主呢？大民主是来用对付敌人的，从我們的历史上看，陈胜、吳广揭杆起兵以抗秦，王莽廢子嬰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晉之际曹操、刘备、孙权分爭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楊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大民主的作法；我們搞革命推翻蔣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作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应該說我們是贊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必須確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統治阶級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同样，帝国主义、阶級敌人对付我們也是用大民主的手段，这次匈牙利事件就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是用大民主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他們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們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級矛盾已經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們对付資产阶級不是采取大民主，也不需要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細雨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但是，在阶級矛盾沒有解决之前，我們对于敌对阶級向来是采取大民主的。

当然，大民主也可以适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脫离羣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損失、恶果，到了羣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們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成都有些学生罢課，因为問題沒有解决，就要到北京請愿，两路进軍，一部列車到了宝鷄，一部列車到了郑州，第二机械工业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該讓他們到北京来，你們事情做錯了，又不肯承認錯誤，人家到北京請愿，还拦人家。你們沒办法說服他們，我們向他們承認錯誤。不叫他們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是怕增加我們的麻煩。其实，这沒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接見他們，并且向他們承認錯誤。

羣众有道理的請愿是完全应該允許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許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領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領导紧張，就不敢光坐在厂长办公室里指揮了，而要到工人羣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們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結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脫离人民，甚至最終为人民所打倒。

大民主，我們是贊成的，如果現在用它来解决問題，恐怕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資本家和党内的一些人（如官僚主义分子）却不贊成，因为一实行大民主，羣众就会起来清算和“整”他們，經过历次政治运动，这些人已經整得够呛，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可以想象他們是不会欢迎的。其实，虽然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也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

但是，我們也不必害怕它，問題在于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好，認眞克服缺点，改正錯誤，羣众只会拥护，也就不会搞什么大民主来反对了。

五、少数民族問題

对于少数民族，我們一定要团結好，不能把这个問題看得太簡单，过去几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解决了一些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仍然不少。同时，民族問題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看来，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好，它的問題就可能少一些。这次波兰与苏联，匈牙利与苏联相互关系上的一些問題，也都包括有些民族問題沒有很好地解决。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民族問題也沒有完全解决。因此，中央几次都提出要重視这方面的問題，不要以为团結少数民族是很容易的事。一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切实把少数民族团結好。

我們对于民族工作，过去存在一些缺点，对改正要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对，因为有缺点，人家才反，缺点沒有了，也就不会再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党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們党的干部是土生土长的，这些干部有北伐时代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爭和解放战爭时期的，也有建設时期的。而且都是在斗爭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我們党的領导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軍队是忠实可靠的，因此，应該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釣魚船”，不要悲观，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須很好地改正我們的錯誤，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則，将是危險的。

六、整风和整編問題

我們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貪污浪費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明年一月，中央对这个問題要发个指示，確定整风的方法和內容，动員全党作好准备，7月以后再开始进行。在7月以前，主要是作准备，作个人檢查，如果在整风之前已經改正了錯誤，那就不要再整了；对于还沒有改正的，屬于一般的問題，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那些錯誤比較严重而沒有改正的人，才做重点的批評。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正錯誤，不整就改了，不是更好嗎？中央的意思就是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搞彻底，不是刮一陣风，不是搞突击式的运动，不要来个突然襲击，不要損伤元气，也就是說，不是采取暴风驟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风細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以达到提高干部思想覚悟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的目的。

过去整风，有些大民主的做法，特别是时間有限，搞得簡单粗糙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好人，这次有充分的时間，一定要做到治病救人，不仅对我們自己的干部如此，就是对一些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也应当如此，都是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說服教育，提高認識，改正錯誤，改进工作。应該做到：既有保护，也有斗爭，这样才能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和平时期，是贊成減少一些軍队的，要很好地进行整編。同时，地方也要大大紧縮編制。大家都要做思想准备。現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講工作，开口就先要編制、要人，并且認为編制越大，人越多，工作才有办法，好象不这样就不能进行工作。实际上，并不如此，往往編制愈大，人愈多，就会增加我們的官僚主义，現在有些同志做工作，很

少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发揮羣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挖掘各方面的潛在力量，相反地是：动不动就是得多少編制，多少人。所以这次中央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軍队要大大精簡，地方的編制也要大大压縮。

同时，还要反对領导干部的特殊化。現在高級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減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羣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脫离人民。看来，值得考虑的特殊待遇，一是物質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須很好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則，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党内上漲的享受风气，这是由于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思想的侵蝕和影响，必須加强思想教育，来批判和克服这种不好的风气。　　（完）

对发展軽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

在輕工业部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发展輕工业的設备制造工业指示說：“专用設备有条件自己搞的就自己搞，不要依靠机械部門。”还尖銳地批評，“你們野心不大，斗爭性不强，重工业部門都积极地抓，你們却推；凡是重工业部門不干的，你們都应积极地抓，将来移交出去也行。……”

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我对經济是外行，我就講一些外行話。你們提出很多問題，很好，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时間不长，我已听到一些。昨天我找了正副主任开会，听到了一些，了解了一些情况，詳細的你們开会討論。陈云、×××副总理还要給你們作报告。你們要解决的問題，政府要和你們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能解决的，总要解决的，我还沒有研究过，有些問題还不能解答，你們把問題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考虑，解决一些能解决的問題。

我看工商界这个时期以来，公私合营以后，有很大进步。我們感覚比过去更熟悉了，更加靠攏了。公私合营以后，資本家只剩下定息問題，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說各地都办了講习班，每个城市几百人，上海一期几千人，十期就几万人，这都是很大的爱国主义。我們民族工商界的学习热潮，他們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学經济，学本領，大中小都愿意学习。

对資本家有大中小，我对資本家的看法和要求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認为改造很困难，

你們自己也料不到这样快，学习高潮这样高。你們开展不开展自我批評？（答：开展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許多人做了檢討，这个办法是我們共产党的办法，我們也想在民主党派中推行这个办法，但是沒有开展得很好。最近民建的会議，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人民內部解决問題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决問題，达到团結。

我們两次革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已經过去了，沒有問題了，現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沒有最后完成，还有很多問題。象农业合作化問題、手工业合作化問題、公私合营問題。就是将来全部改造完成的話，还是有許多問題，問題是层出不穷的。所謂問題，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調，就是不平衡。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国內外問題，总是矛盾，是充滿了矛盾的。从前有人問：俄国为什么出了一个貝利亚？后来斯大林也犯了錯誤，中国出了高崗，香港也鬧其事，还有波兰、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問題，世界上問題多得很，我們今天提的問題还是一个类型，是工商界的問題，大中小的問題。

我現在来談时局。

你們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們有沒有吊桶？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呢？社会主义陣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也沒有大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看是不会崩溃的，崩溃不了的。社会主义陣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針是正確的。現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針，說“不要靠在一起”，还認为可以采取中間路綫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間，作个桥樑，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錢，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認为站在中間，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們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間，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給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給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能給我們吃飽呢？，不会給你吃飽的，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压迫的。印度受压迫二百多年，从来不給他們吃飽过，帝国主义是一毛不拔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就是八国联軍，燒了我們的园明园，割了我們的香港、台湾，而香港是我們中国的，为什么要割走呢？万隆会議为什么能够团結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心压迫人家，这个帝国主义是美国。拉丁美洲的人到了中国对我們很亲热。我今天还会見了一个巴西的代表。巴西是一个大国，有六千万人口，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巴西一直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那些幻想处在苏美英之間作桥樑，有所利得，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我們大工厂还不会設計。現在誰来替我們設計大工厂？例如化学工业、鋼鉄工业、石油工业、坦克、飞机、汽車工业，誰替我們設計的？英国从来沒有替印度設計过，最近因为苏联替印度設計了一个鋼鉄工厂，英国跟着也設計了一个，美国也設計了一个，他們为了爭取印度，才替他設計的。印度第一碱厂，是我們中国工程师侯德榜先生替他們設計的。帝国主义要保守秘密，沒有一个帝国主义給我們設計过。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宗教界、工商界的思想里，还有一部分无产阶級中，还幻想美国会帮助我們，英国会帮助我們，我們大家要好好宣傳一下，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們一边倒是和苏联在一起，我們的一边倒是平等的。我們不感覚有波兰、匈牙利所发生的問題，我們是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不是硬搬苏联經驗的，硬搬苏联的經驗是錯誤的。对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就与苏联不同，他們农业合作化后几年是減产的，我們农业合作化是增产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不仅所

有人包下来，作为阶級是消灭了，作为人都包下来。工商界不是国家的負担，而是一笔財富收入，过去曾經起了积极作用，他們在經济上是現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和政府合作，企业又公私合营了，这些好事不能說資产阶級对我們沒有用，而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工人对这一点不太了解，因为他們在工厂里从前和資本家是有斗爭的，我們应該对工人說清楚。特别是工商界学习高潮以来，你們愿意学习，工人对你們会改变观感的。对資本家要宣傳把个人事情和国家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之要想到国家的事。河北省合作化，过去的口号是“要发家，种棉花”，結果大家只管家。后来覚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好，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就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了。你們現要把家和国家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們也有份的。我們的国家是穷国，而且穷得很，今年只有四百五十万吨鋼，明年才有五百万吨鋼，日本是七百万吨鋼，我們要赶上日本，要第三个五年計划，才达到一千万吨。

你們这个会的中心是討論你們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国家的事，回去宣傳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們要几千万吨、几万万吨鋼，要隔几十年、几百年。我們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經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們在經济上还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小的精密的也不能做，只能做中型的。飞机还剛剛开始出厂，汽車还剛剛开始生产。甚么国家替我們設計的呢？是苏联。我們应該和苏联合作。我們的国家里沒有象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反苏潮流、反苏情緒，工商界中也沒有，青年大学生中也沒有，大学生百分之七十是資产阶級和地主子弟，我們要团結教育他們。因为是你們的子弟，解决你們的問題，对他們有影响，入学入团，助学金問題，戴紅領巾問題，青年团要解决这个問題。要一視同仁，要看質量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够不上，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取，够得上，資本家子女也应該取。补助金問題，应該看学习和家庭来决定的。大的不要补助，中小的寒微的就应該补助，入团入党都应以此为标准，在中国是完全可以实行的。顏色不一，思想不一，还有两面性，有先进一面，有落后一面，是符合事实的。因素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都是好的，那么每个人都是孔夫子。如果每个在街上跑过的人都是圣人，蔣介石、希特勒都在街上跑过的也是圣人嗎？侵畧埃及的人、特务分子也是圣人嗎？人是有所不同的，整个講資本家是爱国的，但是有缺点，有正面的东西，也有側面的因素，因此有学习的任务，否則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康有为自己說，他三十岁以前做文章很能发揮，三十岁以后学到了頂点，他后来变成复辟，不是沒有理由的。一个人不要滿足，七十岁、八十岁，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世界上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知道，我們要加紧学习。陈叔老，你是翰林，你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你是不是都精通的？你是翰林，我是不行的，我連秀才都不是，知道得很少。我們要承認自己的缺点，是有好处的。你們中間有秀才，有举人，就要来一个学习任务。

匈牙利事件出得好，还是出得不好呢？既然有問題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膿包总要出膿。那些国家的工作沒有做好，一概仿套苏联的办法，沒有照顧到具体情况，出了毛病。因此得出一条教訓，我們要根据馬列主义的普遍眞理，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結合起来办事。我們提学习苏联經驗的口号，从来沒有提过学习他們落后的經驗。他們有沒有落后的經驗？有的，例如肃反工作，他們是公安部門搞的，我們是机关学校来搞的，是地

方党委来領导的，不是由公安部門負主要責任的，我們是全体动員，大張旗鼓地搞的，他們是神密地搞的。民主党派自己去搞。現在是不是有人怕搞肃反？是不是搞到自己头上？你們有你們的苦，工人有工人的苦。政府要听两方面的意見。你們有就业問題，工人也有就业問題。你們有失业的問題未解决，工人也有失业的問題未解决。匈牙利事件証明，他們国家里面藏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早几个月以前就在布置了，和外国也有勾結的。中国完全不同，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工商界也一样，只有个别的。关于过去与国民党有勾結，有往来，特别是大的，不勾結不行，那个不算。我們党也和国民党有过勾結，我也以社会賢达的身份当过参議員，我到重庆去参加过会。过去进过国民党、三青团講一講就行了，可以不算。所謂反革命分子有現行活动，如果是現行犯不管是哪个阶級都不行。我想是很少的。現在工商联比較干淨了。現在的工商界不是以前的工商界了，反革命分子少了，可以告訴大家放心，个别的是例外。在我們国家里面，匈牙利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从去年潘汉年、胡风事件以来，到今年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分子，查出了確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一点二。过去估計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是估計不对，是主观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上机关学校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社会上更少了。这是細菌微生物，不把它去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里面祕密搗乱，搞清了也教育了广大的人。其余十二万多人，宣布无罪，搞錯了，我們賠礼道歉，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約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今年又布置了×××人的清理，方法更講究，还剩下四百万人要清理。主要工厂、私营企业現在不清，免得惊动大家，大家放心，将来清理要你們参加的，要工商联、民建和共产党城市組織都要参加，一道去清理，又是对个别的，眞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牽涉到过去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不算，过去做坏事后来做好事也不算。今天講的是政治問題，你們关心的是經济問題，恐怕你們就听不进去。总的来說，中国和外国的形势是好的。匈牙利的事情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乱子还会有的，世界上还会出乱子的，不要認为出了高崗，出了貝利亚，斯大林犯了錯誤就了不起，匈牙利事情了不起，大家都可以睡得着覚。十月十日香港的人有些睡不着覚，过去几天就睡着了。你們有意見說政府帮助不够，你們可以提出来，我們可以多帮一些忙，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都摸熟了，我們就是这些人，是跟人民商量办事，是跟工人、农民、資本家、小資产阶級、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不是意見提得不对就給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意見尽可講，我們不会借故整人。

你們关心大中小問題如何解决，定息問題如何解决。大中小应分阶层。我現在提一点意見，是否对，講你們考虑。把小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不划入資产阶級范圍內，叫做上层小資产阶級，过去这样搞过。象医生带两三个徒弟也是小資产阶級，漁民、船民雇用十几个人的也不叫資产阶級。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土地出租者，不叫地主，这样就使几万人得到好处，对于这顶帽子他們很感兴趣。資本家代理人或定息少的，如果不愿意干要老保，可以把他們划出来，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划出来，以免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百分之九十的人过不去。剩下来的就是所謂大的。照經济学来說，美国也是这样做法，三十人以上就算大工厂，二十人以下、十五人以下的愿意放棄就放棄，不愿意放棄就叫他拿下去。关于定息的时間問題大家很关心，有一个原則，就是要解决問題，不

要損害他們的利益，特別是不要損害大的利益。还是大的对国計民生作用大，还是小的对国計民生作用大？小的人数多，占百分之九十，但他們的經济不决定国家的經济生活，对国民經济作用大的还是大的。你們說主席专門照顧大資本家，不照顧小的，是不是右傾机会主义？你們分析一下，是不是照顧小的。小的人数多，不注意安排是錯誤的，要替他們解决各方面的問題。大的因为他們就是大，沒有别的，一个大的抵几千万个小的。我們党对資本家也有过中小路綫，例如統战部。这个路綫应当承認是不对的。中小必然照顧，現在把他們放在小資产阶級范圍里来解决。农民是小資产阶級，是乡村的小資产阶級，城市也有小資产阶級，現在小的定息只有几包香烟的就是小資产阶級，資方代理人也划过来。公私合营，国有化，大的国家意义很大，沒有工业，我們就不能活，沒有农业，我們就沒有飯吃。不把大資本家很好照顧，百分之九十都摘了帽子，剩下的只有几个，面子上不光彩。别的都是紅色的，我們还是白色的，就不好看。

定息問題到底多少时間，中共中央談过，时間太短不好，贖买就眞正贖买，不是欺騙的，花不了多少錢。有人問究竟还有多少年？“八大”文件里已有这个意思，还要和你們商量，可以不可以解决問題，小的会反对的，工人会反对的，工人会說太便宜了資本家。照工人的道理馬上取消，中、小的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这样长？有两个抵触，第一是工人，第二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小，他們的眼睛都紅了，你們的生活好。这个就要說服，要贖买就贖买到底，不要半贖买半沒收。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有两重性，有革命的一面，但实际本錢不大，工业私股只有十七亿，折合美金七亿不到，只有这一点儿，我們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負我們是有道理的。民族資本只有这一点点，要贖买就全部贖买，不要省这个錢，要說服工人，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不要吝惜几个錢，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終。我們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計划。你們看怎么样？人还有个尾巴痕迹。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不能解决問題，还可以拖一拖，还可以再拖到第三个五年計划，只要人情講得过去。中小人数很多，要帮助他們解决問題。大資本家人少，但他們的資本大，比中小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綫是不对的，应該是大中小路綫。民建是大的路綫，以大的为主是对的。工商联大会代表中小占多数，要帮助他們解决問題，同时要向他們說明，不要損害大的利益，因为大的对国民經济起很大作用，損害他們的利益对工人、农民，对国家、中小都不見得有利。中小的利益是尽早摘帽子，大的想拖长。你們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就早摘，老虎头身七年，中小愿想拿还可以拿，这样做还可以不可以？現在沒有法律規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决問題，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因为老虎总是有尾巴的，我們第一个要照顧到工人的利益，資本主义工业有一百六十万工人，資本主义商业也有九十万店員，合起来二百五十万，还牽涉到国营的工人、店員，他們会不贊成的，在这个問題上，他們和党是有矛盾的。是否有右傾机会主义？是不是变成了資本家的党？要对他們說明，这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級、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个“利”他們一时是不懂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是資产阶級的子弟，他們是不要繼承权，但是对于政府这样对待資本家，他們是会滿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領袖，宗教界是会同意的，很快的取消定息，他們会不滿意的。还有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都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車，一部还是两部，房里有沒有鋼琴。法国有个資本家看过以后說，只要法国

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对亚非国家和西欧一些国家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沒有好处的，而会損失很大，实际上沒有几个錢，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有人說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共計八亿。这个錢沒有送給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給中国人的。总之，"肥水不落别人田"，是"楚馬楚得"是国家的購买力，也是公債抵銷的对象，还可以开工厂，从各方面可以考虑。你們会議代表中小占多数，就要解决得說明問題啦。对中小要說明道理，要中小的代表負責說，大的不好說，如果大的說出几个好处，就要七年，这是不好說的，要××、×××副总理去說，在座的代表中小的也要去說人家共产党是不是要取消大的定息。荣毅仁先生的資本要抵到一个半北京，大家都看着他，全国十多万資本家，大約大的只有几千戶人家，只看这几千戶，不看那十二万中小戶的。我們要整大的很容易，来一个高潮，敲鑼打鼓就敲掉了。中小摘帽子不要一陣风，不要登报，一登报就来了，不搞高潮。这次会議如果报导，只說工商联、民建会代表团长都参加了，我講了国內外的政治，作了分析，对經济問題也講了些話，內容不要講了。如果內容宣布了，工人和中小都要罵我，共产党就是要共产的，那有不共产之理。人家說共产党三头六臂很凶，实际上我們只有一个头，两只手，我們做事要"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人民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覚者坚决行之，則未有不成功者也。"这是偉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說的。我們两次革命就是繼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为建設扫清道路，都是方法問題，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識形态法律、政治、經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还沒有解决基本問題，目的不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四百万吨鋼，明年只有五百万吨，再五年只有一千多吨万，在我們国家六亿人口不算事，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一亿万吨鋼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請大家把目标轉向这个方面。陈云同志看到一个瑞典朋友，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每人平均有二吨鋼，照我們人口算，要几万万吨，美国現只有一万万吨，要达到瑞典的数字要超过美国几倍，所以过去搞民主革命，現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什么呢？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几万万吨鋼，还要办学校，收音机都要，全国一切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碼路，廚师所有的人都是大学生，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蔣介石該打，就是因为他一件好事也沒有干，二十年才搞了五万吨鋼。我們八年（算到明年）就有五百万吨鋼，他是心不在焉。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这一千多万人向着生产方向，再几十年功夫，才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我們要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人。

今年一月里，在最高国务会議上，我說过社会主义革命大約再过三年左右可以基本完成，这句話引起了很大波动。有人說这样快嗎？"大約"、"基本"、"左右"，我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詞。什么是"基本"上呢？就是指公私合营还沒有取消定息，还有一个尾巴。全部完成就是取消定息。我認为时間定的长一些，早一点完成是好的。全行业合营誰也沒料到这样快。現在国有化就不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不利。我們照顧大資本家，对整个民族有利，花的錢不多，講的話要算数。可以影响外国的資本主义，对改造世界資本家有利。尼赫鲁、苏加諾、吳努以及法国資本家百代公司都在看我們，看荣毅仁……。現在的情况和我春天講話是一致的，我只是講"基本"上，那是指公私合营，全部完成还要七年，

除了今年，还要六年。国内各方面都要照顧，对資产阶級、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工商业者、手工业、机关学校、工作人員講清楚，不了解是不好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現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間的热烈鼓掌）

从我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間，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們应当永远紀念他們。（全体起立，默哀）

我們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結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經驗，团結全党，团結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为了建設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們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踐中，証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現在，党中央委員会的路綫是正確的，我們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們的党現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結，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們的党已經成了团結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我們的工作是做得正確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錯誤。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总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就国内的条件来說，我們胜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級領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結了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为了进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們有一千多万党員，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們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項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員来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羣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員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强全党团結的时候，我們还必須繼續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結，繼續巩固和扩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必須認眞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結的不良現象。

在国际范圍内，我們胜利的獲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現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設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爭、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畧发財的壟断資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經趋向和緩。（鼓掌）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陣营中各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結。（热烈鼓掌）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愿意和

我們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們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們必須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張局势和准备战爭的阴謀彻底破产。（长时間的热烈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們在加强党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組織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脫离羣众、脫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結的，是阻障我們事业进步、阻碍我們同志进步的。必須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給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們，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們在不长的时間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間的热烈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偉大的发展。（长时間热烈的鼓掌）

我們現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須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們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們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或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国无論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极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应当永远記住这个眞理。（热烈鼓掌）

同志們，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們又有偉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們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們并沒有孤立的感覚，这样，我們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們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設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坐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間热烈的鼓掌）他們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們和我們有一种共同的語言。（鼓掌）他們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誼参加我們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們对他們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間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坐的还有我們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們是和我們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們一向給了我們很多的帮助。（鼓掌）我們对他們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間的热烈的鼓掌）

（《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号）

給詩刊的一封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同志和各位同志：

慧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請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　澤　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汇集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思想斗爭問題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內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说服力，不是簡单骂几句。如果簡单粗暴，则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七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沒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沒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两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马参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資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爭，要反复斗爭多少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别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二个马克思，一、二个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应该写。

每个省要培养理论家。现代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沒有培养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你们靠中央，中央并沒有不让你们搞。

二、鬧事問題

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教授、学生与我们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卄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问题。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闹事。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们闹事不要怕，闹到北京来也不怕。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骂群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轰下台，卡达尔则不同，既不骂群众也不跟纳吉跑，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方法，争取分化。有本领的人，就是要在波兹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沒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现在得了七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罢工、罢课、請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要罢工請愿，就让他罢工請愿。提的合理的要纠正，提的不合理的要解释。教授要发议论让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总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纳吉。

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爭论，看谁胜利。但事前要作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沒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爭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乱不可能，那里有膿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者五万，中者三万，小者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賬，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作好了。

对闹事要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作准备，区委书记、区专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先太平无事，消极怕闹，结果闹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痺后事事苍应。

不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要经过斗爭解决。河南回民杀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膿总得放。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要杀掉（反革命刑事犯除外）利用他作工作，把他当做政治教材，剝夺他的政治资本。简单处理就是思想工作不承认对立统一。对千肖罗、丁雪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对学校闹事的党员，讨论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陕

西关于工人成份摸清楚，搞的调查很好。匈牙利没有调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鉴于这个教训，必须把工人成份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间的、有问题的各有多少，现在调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大学生成份再过十年才能改变。现在招许多工人、农民，在学校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会，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的很，现在斯大林又活过来了。摇过去是本心，摇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摇过来，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不说不是本心。

三、哲学問題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单的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又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爭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地在破坏，有的几天几个月就破坏了，刚平衡，马上又不平衡。同一者卽是一致、同一、合一。党内有意见，开个会统一了，过两个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开会。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也是对立的统一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永远有斗爭。有人讲哲学只讲一面，百花齐放，只讲放香花，不讲放毒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东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苏联不承认有对立，法律上不允许，实际许多错误的东西，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面掩盖着。

列宁认为单讲唯物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和唯心主义做斗爭。要斗爭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斗爭出来的。

哲学领域里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爭，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爭，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爭。我们与蒋介石是对立统一；与民主人士也是对立统一。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的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会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

四、农村問題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许多情况好办了。我们有了一年的经验，今年要来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減产，我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员沒有增加收入。应该向党政军民讲清楚，合作化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犯错误，人家只有一年多的历史为什么不犯错误呢？要有三年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可能办到的。

农民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人生活苦，笼统的说农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收入减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宣传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计划十一年完成。

头三脚难踢，办事有三折，今年完成了才一折，要三个五年计划才好办。

自古以来，凡是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沒有不挨骂的。进化论、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都挨过骂。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驳倒一切胡说，以此做宣传。

五、經济問題

化学肥料，各省自己开厂。

要注意搞粮食，不搞粮食很危险。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罢工、罢课也有饭吃，天下不会大乱。油料和猪肉由合作社包干。国家只要不给。收来粮食也是这样（经济作物区除外），国家只管统购，不管农村统销，社包社，队包队。

两年后，不是与民爭粮，而是怕国家不买，只要统购，不要统销。湖北省孝感县，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开国营农场，解决粮、油、肉、菜等问题。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销路为原则，大的要以国力有多大则搞多少为原则。

六、学校問題

初中要加农业课。

各省市要派干部加强学校，把学校抓起来。整个文教工作都应如此。

省委、地委、县委同志要分区分片向学生进行教育。

各省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先准备好。一天报告，三天讨论解决问题，对学生工作沒有安排应当安排。一年开一两次会，讲一两次话。要注意发现问题，不要等问题大暴露了再解决。现在好管了，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就是这么些单位。

七、文学艺术問題

百家爭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给你身体内部埋点对立物），为什么文学艺术不可以种牛痘？

宣传部，一、二个月召集记者谈一、二次，两个月谈一次也可以，现在是一年谈不上一

次。

八、干 部 問 題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沒事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现在只得下放，不准上提。领导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电话。

国家是阶级斗爭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那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极端民主，绝对平均，总是不行的。颜渊沒有评级，是第二级圣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调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九、领 导 問 題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变成拉科西。

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对各部看到等于沒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钻。

眞正的知识，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是上面，越沒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是要下去，二是调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的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业部长跑农村。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部长，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下乡，研究问题。搞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月可以搞清楚，两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现在听说大家都不下去了，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书记可以兼一个县（市）委书记，把原来的县（市）委书记压成第二书记。省委书记下去了，地县委书记也会下去。市委书记可以兼厂长、校长、党委书记。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识。

区委书记会议，一年开两次好。逼的你研究问题。

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内），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贫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

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有人提出要学中国百花齐放，百家爭鸣。但不让学，说过去学中国学错了。结果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现在改变了。

十、其 宅

精简各省自己搞，有出路的先搞下去，尽可能转回生产。无出路的设教养院，听候出

差。

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一月）　　記錄要點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即思想动向问题，农村工作问题，经济工作问题。还研究其它一些问题，如增产节约，法制（包括肃反），编制（主要是精简），中央与地方分权，税收，统战，少数民族，灾区，学生（大中小学），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今年的困难，粮食、山区、整风等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有的是家里的事，爭名夺利，“唯利是图”在党内有很大的发展。提一级不起床，提二级还哭鼻子，提三级才起床。党内不是比艰苦奋斗，比多做工作，而是比待遇，比地位。过去国民党有一个唐诏义，由内阁总理做广东省中山县县长，我们共产党还沒有一个部长去当县长。总而言之，升得降不得，比高不比低，比阔气不比艰苦。

再一个，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问题。合作社究竟有沒有希望，究竟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听说重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沒有问题，就是災而不重，收而不丰的那些地区发生问题。一部份人沒有增加收入而減少了收入，于是议论都来了。这也反映到党内，北京有些部长下乡回来说：“农民无精打采，生产情绪不高”。有的干部议论：“合作化大有灭亡崩溃之势”。“合作社沒有什么优越性”，地方上有的宣传部长也不敢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受批评，三面挨骂。农业部门开了一次会，农村工作部，农业部两个系统泄了气，四十条有无必要，能否实行也发生了问题。

前年反右倾，出了冒进。去年反冒进，又出了右倾（右倾主要指农村，别的方面未究竟）。这里有一股风，各地可能都有，只是大小不同。好象台风有八级，有十二级。在干部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大部分干部家庭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动摇的阶级），听了家里的话，就说合作社不行。合作化无论如何会化好的。但一年两年不可能办好，我们合作化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历史，要有三年历史就可以基本稳当，有五年历史就吹不倒了。

学校办了，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不满意。地质部在石家庄专区正定县有一个地质学校，有一千多人因为沒有分配工作而罢课闹事，要上北京，他们的标语口号有“打倒法西斯！”“要战爭不要和平！”“社会主义落后，沒有优越性！”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公开说：“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去讲话：“你要杀人，我要专政！”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哥穆尔卡原来反对教条主义，他的话在学生中很吃得开，现在转过来反对右倾，也不行了。铁托、卡德尔的演说也受一部分人欢迎。听说农村中地主、富农到相当守规矩，城市中的民主党派、资本家也比较守规矩。因为这些人脚底下是空的，沒有本錢。至于天下有变，上海、北京打下来原子弹，这些人变不变就很难说。现在这些娃娃们沒有经

验，沒有他们老子长于世故，所以就冒了头，大喊大叫一气。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螞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螞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螞蚁也缩回去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发生了两次大风潮，许多国家的党受损失，英国党搞掉四分之一，瑞士搞掉一半，美国党搞得天下大乱。东方党、中国党受影响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些人批判斯大林不加分析，过去拥护斯大林最厉害的人，现在反对斯大林也最厉害。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道德。党内有些人台风一来就动摇，动摇分子一有风声就动摇。有的摇一、二次就不摇了！有的永远摇。小树、稻子高粱、包谷、墙头上的草，总是见风来就摇，只有大树不摇，台风年年有，政治台风不一定年年有，这种现象是社会政治的自然现象。

中国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但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有的党员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但马列主义沒学好，思想上、政治上经不起台风，应当注意。党内有些人，别的关都过了，只有社会主义关过不了。河北省委付书记薛迅，是“九·一八”后学生南下請愿的代表，统购统销中动摇了，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全国合作供销社付主任孟用潛也上书言事，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其实统购统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他们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党内这些现象，还沒有结束。再过十年可能还不会结束。十年之后，是否所有的人真心相信社会主义，也不一定，一遇到问题，有人就会说他早就想到了。

军队干部对农民的生活反映要分析。有合理的部分（如薪水高），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有些人听了家里的话，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灏滨也替农民叫过苦，党内也有人叫，好象党中央省委不代表农民，只有他们代表农民。江苏有一个调查，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有余粮不卖。军队有同志反映说：“乡村左了，城市右了。”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举例说，一个农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但一个工人养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戶来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农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费用大，农村费用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农村很多付业沒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国家帮助农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农民搞，大中型水利国家搞）城市看来好象右了。过去资本家每年拿去一亿五千万，六年拿了九亿，现在定息七年这么给他八亿，共十七亿。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錢买了这么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剝干淨，办法一是出錢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沒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

大学生给你助学金，請你读书。你要扩大民主我不怕，一遇大民主，第一欢迎，第二分析。对的我接受，错的我揭露。我无理就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你无理就抓住你的小辮子。地质学校罢课闹事，一讨论就分化了，七十个代表赞成三个口号的只有十几个人，反对的五十几个人，放到四千多人中间去讨论，都不赞成，十几个人被孤立了。扩大民主是好事，匈牙利沒有大民主，就不能鎮压反革命。出了乱子是好事，痞溃了膿包就解决了。不要怕事，

过去帝国主义蒋介石我们都不怕，难道还怕大民主吗？共产党怕大民主太不象样子了，不如段祺瑞，现在的党和政府是革命的，这一点上了宪法，娃娃们发疯乱叫："打倒法西斯"，"要战爭"，是违犯宪法的。中国改革不会被这些娃娃们冲垮的。如果几个学生娃娃把我们冲垮，那我们就是饭桶。

去年一年是多事之秋，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激烈的一年。

我只讲一个问题。

其它问题，增产节约有一个文件。

肃反必须坚持，有反必肃，缩手缩脚是不行的，但法制必须遵守。

精简一定要坚持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先把人安排好，再送出机关。

中央地方分权，你们感到不"过瘾"："一沒錢，二沒权"。你们要什么請尽量提出来。

统一战线工作：有重安排不重改造的偏向。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对知识分子不敢改造。马寒冰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苏联下面赞成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上面有人说："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他放，但是他要用革命的面儿放，就得让他放，里面有禾有草，只准放禾，不准放草，事实上办不到。草翻过来，就是好肥料。我们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和杂草作斗爭。年年长草、年年除。沒有国民党，就显不出共产党好。沒有唯心主义，显不出唯物主义好。沒有对立就沒有斗爭。只有斗爭出来的，才经得起考验。矛盾不断发生、不断斗爭、不断解决，一万万年如此，学了正面的，还要学反面的。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你就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也不能巩固，因此不仅要出孙中山全集，蒋介石全集也要出，黑格尔、康德、孔子、孟子、老子、二程、朱、王都要讲。你沒看过蒋介石的文章，要反对人家就反不好，有人说，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以后，文学衰落了。×××的报告才只有五个月。就算文学衰落了，哪儿那么快。大家伙要长期准备，短时间写不出来的。作家要做工作，不做工作不给饭。作家坐在家里不到外面去，肚子里沒有貨，怎能写出好东西。

干部不提级，減薪问題要研究。

学生问題有入学、就业两个问題。

少数民族问題相当严重。

想尽一切办法的问題，我很赞成。（柯庆施的一个大发明）

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总結

（一九五七年一月）

都是老话。成绩要有足夠的估计，夸大不行，过低估计要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胡志明把土改成绩估计低了，下了罪己诏，地主沒有了，引起各方面（天主教、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进攻，现在纠正了。

去年一年，成绩是基本的，这个问题，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但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还有问题，认为错误缺点不少，所以有讲的必要。不足夠估计成绩，合作社就有泄气之势。

我们历来的方针，赞成公共食堂，不另起炉灶，但要给管饭。一九四六年重庆大公报王芸生写社论说不要另起炉灶。我说“蒋委员长”要管饭才行，但“蒋委员长”不管饭。现在我们管事了，我们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把各党各派，民主人士都包起来，把国民党的人也包起来，这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战略方针。这条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少。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公社缺粮戶，城市无粮戶都管，反革命也夠一份饭，人长了肠胃就要吃饭。苏联办法不是这样，不是都给供应。统筹兼顾，学生也不可能都进大学，但要都给适当安排，或补习，或到农村去，或去边疆，或给救济，这个思想，要在不清楚的同志中说清楚，不能把人餓死，所有的人都要给以安排，这一方针乱子少。

想尽一切办法搞增产节约，解决困难。想尽办法困难可以解决。这点困难沒有什么，比长征过草地好得多。草地沒有房子，只有空气，过了大渡河后何处走？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现在沒有想出几方几计来，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是千方，九十九计加一计是百计。

国际问题。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先泼冷水，后打气，要蒋冷靜，不要冲动。希望寄托在我们内部出乱子上。

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是一个怪事件，出了纳赛尔，要收回运河，艾登出了兵。英国资产阶级老于世故，老奸巨猾，出这样乱子不乱。这次艾登冲昏了头脑，犯了错误，把中东给了美国。主要矛盾在美国不在纳赛尔。文章都是美国对付英国的，美国想把中东夺回去。世界的矛盾基本的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借口反苏反共爭夺亚非中东，两派帝国主义爭夺殖民地，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国，第二是英法。殖民地出了一股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对日本、台湾是用武的，对中东是有文有武。他们闹对我们有利。

我们是“保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九亿人口霸起来，易北河，三八线，十七度线一步不让，出了这个界线，让他们去闹，但我们可讲话。双方都搞頗复活动，我们之中，有他们（地主、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更不要说劳改犯），他们里面也有我们（共产党，工人，进步人士）。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资本家变成工人要几十年，基本消灭只是讲大规模的斗爭。苏联的同志不愿意接触这个问题。帝国主义内部爭夺殖民地的矛盾大，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是条战略方针。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一九三四年跟美国建交，经过十七年，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中东事件，苏联一封信，美国三军下命令戒备，究竟谁怕谁？双方都怕。谁怕谁多一些？我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这样估计：如果大家一睡，三天不起，就有危险。还要看到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会发疯。

世界大战，现在打起来不容易，打起来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我和苏加诺谈，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使它在国际国内沒有道理，把它的政治资本剝夺干淨，使它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一百零一年以后建了交，他更无能为力，后悔莫及。我们房子已经打扫干淨了，四害除了，找不到他们的朋友了，如同他们在苏联一样，后悔莫及。帝国主义不怀好心，战败国不怕，主要是美国。

中苏关系。皮总是要扯的。不要设想世界上没有皮扯，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因为总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有点皮，但不大，比以前更靠拢更团结了。他们的方法与我们不一样，要等待，要做工作。党内各种意见，对党员也要做工作，要谈话，要开会，要谈心。南下渡江，蚊子多，天热，没有馒头，江是渡了，但是思想没有渡。组织上入了党，思想没入党。思想工作就是麻烦，不能怕麻烦。党内语言不一致是常有的，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形势比人强，形势逼得苏联同志不能不适当有所改变。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国内国外都不利，二十次代表大会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利用，铁托利用，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要帮助他们，但不要忙，要慢慢来，当面讲，法宝不要一次使用干净。“利令智昏”，无非是五千万吨钢，三亿吨铁，二千万吨石油。这点东西算数，加一倍，加十倍也不算数，不这是地球上撂那么点东西，官当大了，也可能昏头昏脑，昏了要臭骂一顿。这次周当面尖锐批评，当面抬杠。十个指头九个一致，一个指头不一致，中央和省市也有不一致的，矛盾总会有，求同存异。

国际宣传要压缩一点，文工团，展览会要缩小一点夸张宣传，把尾巴夹紧一点。

还是要学习苏联。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可学。要有选择的学，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的学。三个五年计划把他们的基本东西学到手，对别的国家也要学。周出去的口号是找和平，找朋友，找知识，要到处找，单找一个地方太单调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事善人是同恶事恶人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旦，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还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禁止人们同丑恶、同谬误、同唯心主义、同形而上学见面，是很危险的政策，这将引起人们思想衰退，思想硬化，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共产党人对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比较单调，因此讲不出几句有说服力的话。马恩列都不是这样，他们都努力学习当前和历史上各种东西，并教人们也这样学。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国哲学（康德、费尔巴哈），因为德国打了败仗，也否定德国军事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宗。斯大林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哲学词典上是形而上学的说法：“战争不变到和平，和平不变到战争。两个东西是割断的，没有联系，不互相转化，只斗争没有同一性。”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战争的结果，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斗争。战争时期酝酿和平，和平时期酝酿战争。斯大林教坏许多人，他们有很多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错误。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杀头，谁对苏联有不同意见就叫反苏。实际生活使斯大林不能这样做。斯大林并不是都杀头，都关，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杀得多，一九三八年杀得少，一九三九年杀得更少。有不同意见就杀头行不通。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我们报上，对一些有害言论没有反驳，登了一些不该登的文章，例如：“难免论”就可以不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有个大难免论。谁愿意犯错误？犯错误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开始时总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做的结果总是要犯错误的。这是历史经验，方针是少犯一

些错误，报纸在做了准备之后，有了充分的说服力再回答，没有充分准备不忙于回答。有些作品要十几年才能产生，如大型文艺作品。有些在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现在一放，牛鬼蛇神都出来了，过去你看不到，现在看看也无妨。不要一出就骂，这对增产粮食棉花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财政，爱情戏演一点也可以，让观众去判断，不忙禁止。

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必须力爭是鲜花，折一把都是臭的也不好，毒草占次要地位就沒有害了。好象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为辅一样，好象原子核和电子一样，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几个火车头的力量。核子外围的电子则很轻，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沒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统一。

准备发行四十万份参考消息，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出来，替帝国主义尽义务，其目的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毒草放在同志们和党外人士面前，使大家得到鍛炼，否则，只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其他东西，不好。但要加强领导，好象种牛痘，使人的身体内部做斗爭，产生免疫力。看参考消息，搬出唯心主义，出蔣介石全集，就是种牛痘。

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这是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一起对敌人作斗爭，我们和人民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要搞建设，反革命快搞完了，沒有敌人了，对外虽有帝国主义，但它沒有动，所以问题就来了，人民鼓起眼睛看我们，必须准备有一小部分人年年闹事，只要有精神准备，不会陷于被动。书记同祕书，部长同付部长，书记同书记要经常谈这些问题，分析交换意见，我的经验，这种研究有很大益处，匈牙利事件，拉科西、葛罗沒有精神准备。河南临汝县三万人闹事，是最大贡献，下了一道赦令，把所有地主帽子都摘掉，推翻了乡政权，这就是打了一次防疫针，种了一次牛痘。石家庄步步放弃阵地，毫无精神准备，甘肃林校学生三百人闹得天翻地复，无可奈何。共产党不怕蔣介石、帝国主义，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是新问题。两种可能，要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如西藏不出问题，两个可能，达赖一跑到美国，二留在印度，达赖不回来，中国大陆也不会沉，闹事原因：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生硬，反革命分子存在，所以要完全避免闹事不可能，只要不犯路线错误，不出全国性乱子。即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国家更会巩固。要象卡达尔一样，在国会大厦有一个月不能睡觉，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历史走回头路，反复也是可能的。辛亥革命革了皇帝又出了皇帝，我们的制度是否最后巩固了呢？两种可能性，也可能逐步巩固了，也可能犯错误出乱子。出了乱子总有英雄豪杰出来收拾局面的，最后总会巩固的。

对闹事如何处理？闹对了，承认错误，满足要求。闹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给以批评，爭取群众。孤立坏人。除行凶杀人外，不能乱捉人，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逐步引导他们。要有领导艺术，他要闹，让他闹夠，不闹夠不收场，否则还会闹。不要急于开除坏人，剝夺干涉他的一切政治资本。甘肃捉了六十人，处理简单了，石家庄闹事要放假，我看就是不放假，把是非闹清楚了再放假，利用他们当教材。

对人民绝对不要轻易开枪，捉人，要开枪只能向天上开几枪，不要怕闹，有理由应该闹，沒有理由也闹不长。闹不出一二·九来，我们过去也是闹出来的。

各部长、各省市要研究思想动向，过去忙于业务，不研究思想动向是不好的，要改变。

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甘肃的办法近乎国民党，除非真正的反革命暴乱，才可用武力对付。

我们要加强工作，改正缺点，要加强对工农兵商学的政治工作，现在大家都忙于业务工作，不搞政治工作是危险的。×××出马到大学作报告，大家都要出来到学校作报告，重要的是学校和军队。有的说军队政治干部政治思想衰退，这还得了？！必须在增产节约和整风中好好整顿，把干部意志振作起来。四川学生要上北京请愿，不让来不好，来有好处，生活复杂一点好，不然太单调了，清一色的麻将难打。

青年团要加强学校工作，工会要加强工厂工作，民主人士让他们去批评，唱对台戏，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了，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就反倒把他们孤立了。民建会一斗，还给他们饭吃，部长还给他当，错误犯得越大越有教育意义。不要怕他们批评，不要跟国民党一样怕批评，对批评要分别情况，有些采取主动，有些采取后发制人。又团结，又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从斗争中取得益处，得到锻炼。坏人坏事有两面性，埋伏着好的作用，很多同志弄不通这个道理，表现在选择王明问题上。坏事包含好事，好事也包含坏事，出了事就认为不好，不加分析，是形而上学观点。去年大胜利，包含消极的东西，头脑膨胀。

我们在建设时期，对阶级斗争（是部分的），人民内部斗争（就主要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当很好的研究。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人闹事，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要取得经验。

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成绩。守法是守社会主义的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的，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生产力，保护经济基础，一定要守法。没有完成肃反的继续搞，一年完成。肃而不清的看来不少，要在事变中逐步肃清，肯定过去成绩，给肃反干部撑腰。民主人士骂，让他去骂，不能因为他骂就不敢动手了。敢于闹事的人，改造过来可能是有用之材，徐懋功十二岁闹事，以后做宰相。肃反中的错误要严肃批评。按着法律要放手放脚，不要缩手缩脚。

争取今年丰收，稳定人心。合作社可以巩固，从初级社算起五年巩固下来。农业首先关系到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非商品的产品很大，三分之二是自给经济。五亿人口自给，天下就稳定了。其次是轻工业的原料市场；第三，农业大部分是工业市场，如化肥、农具、铁路、几乎全部公路、电力、煤炭、石油、大型水利、建筑材料等，重工业的市场主要在农村。美国没有封建制度，市场广大；第四，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业，农产品变外汇。支援工业，农业即工业。第五，发展农业是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所以要说服干部到农村去，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积累要搞出一个比例来。斯大林把积累搞多了，反而影响工业，究竟比例多大，还必须研究。总之要使合作社扩大再生产，能得到更多的积累，不能竭泽而鱼。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搞经济核算，利用作价法则计算成本，商品粮价格到一定的时候提高百分之五。现在全国商品粮一千万斤，十二年要提高到五千万斤，商品粮增多了，如果价格太低谁还种地？我不是说现在就要提价，但价格政策要研究。

合作社积累一年比一年增多一点，但仍不能太多，让农民吃饱一点，如果今年丰收，增加部分可多留公积金，丰收年多积累一点，与歉收年平衡。

一切事情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走路、开会、电话、声波、唱戏、说话、我写字，都是波浪式的，赞成学辩证法。

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上的一次講話（摘錄）

（一九五七年二月）

再一个思想动向，在学校里青年学生值得注意，学校办多了，就不能就业，一不能就业就請愿，石家庄三千人示威，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有三十二所发生了问题，同时许多学校出现了一些典型人物，清华大学的武天保，西北大学的朱伯诚，武汉大学的陈伯华，鞍山的武俊卿，他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他们要上台，现在大学里百之七十至八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欧洲来了一股风，大讲民主，这些人跟着哥穆尔卡的棒子转。现在是乡村的地主到城市去，规规矩矩，我们要分析他们脚下是空的，沒有群众，天下如有变，他们也要起风浪，青年人是沒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晓得，下雨之前，蝎蚁总是要活动的，思想动摇的人，一有机会就要动摇，从去年到现在，帝国主义对我们刮了两次大风浪，英国先搞垮了四分之一，美国搞乱了，五洲党影响较大，反斯大林牵涉的面比较广，我们要懂得外部情况和内部阶级动向，有些人永远是动摇的，有些人摇了几次就不摇了，台风年年有，大家都要注意，这是社会的自然现象。

——摘自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第二部份第55—56页

在頤年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爭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当如如对待。

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仔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沒有批评整个的官仔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夠，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我们的官仔主义就是沒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指《荣誉属于谁》）沒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仔主义沒有整垮。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文章，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坏小说，无非里面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象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用油锅煮。

〔李希凡的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仔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仔主义）更不希奇了，“难免论”吗。（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错误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问题是作者（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是有官仔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仔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万之多，……这也是客观实际。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大王国，党内也不可能没有小资产阶级。〕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观点不对。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干部中真正搞通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不多——要帮助人家改造，达到真正的团结。怎样帮助改造人家思想，很不夠。办法常是整一通。“整”，很容易，但不是好办法，应不用。“整”，不能团结。〕

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

“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

……

〔小资产阶级大王国是客观现实。工人阶级只有二千四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一半，干部也占一半，这是一头；另一头是地富和资产阶级，大约有三千万；中间五亿五千万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千二百万干部也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化，真正化了的大约有二百万。所以，看文艺问题要从这现实出发。〕

现在是大变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大学生中地富和资产阶级子弟占80%，都是非工人阶级，青年问题多，并不奇怪。其中要搞匈牙利事变的极少，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的。〕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矛盾总要表面化，闹一闹还是好的。闹是片面性，我们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仃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光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得不好，教条主义。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立场很好，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但是说服不了人，似乎百花齐放以后都错了，这是教条主义，朵朵香花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尔斯基，所以要下功夫，驳倒了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象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

〔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請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了，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

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后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陈沂，你写了几篇文章？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

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

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了，他骂人，不平等，没有说服力。

应该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骂人象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不应该骂。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对地富、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戴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付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错误的杂文也是不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应当“刀下留人”。

……

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为工人阶级。〕

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仔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吆！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都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

学艺术来的。

是不是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

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来，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借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唯心也有唯物，斯大林两者都有，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苏联同志转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必需的，现在就不同了。

〔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百家争鸣。

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的。现在打的仗也就是无准备的。

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

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两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现在五百年当过去多少万年。

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恆眞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总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

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对宇宙进化有好处。

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铜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书”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动物，野兽没有选，细菌也没有选。大概只有植物才不反对我们。我们死了，可以供给植物养料，我们排泄的东西也可以供它们补用。

人类本身要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进步。

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少走弯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六亿人口，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几年。

我们六亿人口，将来有一天上街，在大街上走都得排队。将来在街上会挤杀人，怎样分配报纸，怎样看电影，怎样逛公园，都会成问题。

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发现，要解决。

不要怕歪风。风总有两种，一歪一正。

吉林今年大水灾，就是下多了雨。两股流，一股寒流，一股暖流，不在黑龙江上空相遇，也不在辽宁上空相遇，偏偏在吉林上空相遇，作战，就下大雨。雨下多了，不好。但是如果不下雨，就是旱灾。两股还缺不得一股。

越斗爭，越丰富，就会出现新道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写爱情多。）

沒有爱情，人类就绝种。

（××：杂文有“难免论”。）

“难免论”要多登几篇，这样就引起注意了。

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怕“鸣”。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掌握政权之后，想用简单的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有人）怕放？怕饭票子过河。

青年人反对官仔主义不那么怕，因为他们还（沒）有当事，官仔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好，反官仔主义；2．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仔主义，好象骂官仔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仔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坪，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说不搞工农兵了。）

不搞了？全国就剩下工农兵加知识分子了。

（××：工农兵搞得好，大家还是欢迎。）

是啊，我们反杜林反了许多年，还不知道杜林是怎样的，可不可以找到杜林的书？

（××：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黑格尔、马赫。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

〔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① （翻印說明：这一材料是根据三份傳达記录稿整理而成，以一份記录稿为主，〔 〕內是根据另两份記录稿描入的。）

② 这是中央宣傳工作会議之前主席召开的一次座談会，对文、哲、教育界談文化思想問題，着重談文学批評問題。

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因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內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談这两个问题。并不只是談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談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談。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談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多年来我们談这个问题。要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要分清是非，这就是讲人民內部的啦，人民內部的问题是是非的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比如我们跟蔣介石，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仃资本主义，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通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普通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內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內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沒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专政干什么呢？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鎮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我们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剝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剝夺他们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內。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谁人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要经过人民去作。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內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內，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

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似乎高兴这个事件。这是少数人所谓的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自古以来的历史上，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然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么样整一下，那也有的。“那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以为我们这个是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说，归根结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那个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议会自由，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的自由，什么集团的自由。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的自由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就宣传不要打苏伊士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出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文章一篇来宣传他的观点。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有阶级的自由集团有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至于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这过样的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思想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仃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

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他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八年来，有些斗争斗错了，错了，我们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淆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泽过去在襄阳那里工作过。杀过他的儿子，他是襄凡市的叫王和卿，他就反对。但是跟康泽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思想感情就不同了，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有人却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分。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这是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用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

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就没有想，主观上没有想，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我”后来果然也就明白了，后来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比如讲，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开的一次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的会议，他们就是批评了一个月，结果批评得很好，并没有伤感情，而把问题解决了，资本家可以采用这个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剝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剝削者，这是两类剝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用这个方法。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在已经解除武装后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以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场。两类矛盾问题。

第二、讲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说，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别的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我们有鉴于它，我们也不是特别聪明。因为苏联已经左过了，我们在那里学了一点经验。我们自己也曾经左过。在南方根据地的时候，那个时期就不懂得，吃了亏，每个根据地没有一个根据地他不用，就是学苏联那个办法。后来纠正了，才得了经验，延安才规定了九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到北京有所进步，当然还有缺点、错误。现在进步了，比起苏联来，就是两条路线（指过去，不是现在，就是斯大林当政时期，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这是一面对的；另一面杀错

了许多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几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杀跟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们沒有干这件事，是有鉴于他了。杀错了的人，有沒有呢？也有的。大肃反的时候，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沒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杀了七十万，从那以后大概杀了七万多，不到八万。去年起就根本上不杀了，只杀少数个别的人了。人们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么反复无常，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又不杀了。后来这四、五年只杀了几万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杀了，杀得很少，个别的。在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杀了七十万，香港的报纸把这笔賬给扩大了（当时我们也不需要和他对賬），他说我们杀了两千万，用減法来计算，二千万減去七十万，委实等于一千九百三十万，他那个多了一千九百三十万。“过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几杀了两千万人呢？七十万人则有之。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人民要求杀，解放生产力。他们是束缚生产力，“恶霸”——五霸天：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中霸天，五类反革命的骨干分子。不杀掉怎么解放生产力？

现在有些人想翻这个案，有些朋友想翻这个案，翻那时候的案也是错误的，我看不要翻的好。如果翻人民会起来打扁担，农民就要起来打扁担的，工人也拿什么武器，拿铁条打我们的。

比匈牙利，匈牙利对于反革命根本沒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的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从我们国家看。匈牙利这样事件以后，人们说中国局面很稳固，外国人在这里看了也是如此，我们自己也这样觉得。

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有沒有什么风浪沒有呢？有那么一点小波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那春水是吹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那样大的波浪是沒有。为什么道理，好几个原因。肃反把反革命分子根本上肃掉了，剩下的沒有几个，还有一点少数，极少。这是一条。第一条还不能讲这个咯。第一条是几十年革命斗爭鍛炼出来的根据地，解放军，共产党，民主人士，几十年斗爭，鍛炼出来，我们的党是生了根的；我们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我们是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的；不是突然占领全中国。民主人士也是经过鍛炼的，共过患难的。学生们，有“一二·九”、“九·一八”、“五卅”运动、抵制日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起，各种学生运动也是在反帝国主义鍛炼出来的这个传统。什么民生队，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我们从反对帝国主义，官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长期斗爭中鍛炼出来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识分子也有教育，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改造。而匈牙利沒有。再有，我们的反革命肃得差不多，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了。比如讲经济措施，比如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现在我们大学生的成分怎样呢？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而匈牙利大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农民的子女。工人，农民的子女大罢工，大游行，听“裴多萍俱乐部”的命令，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我们也沒有“裴多萍俱乐部”，当然啰，可是他们爱国，除了个别少数人说怪话，讲閒话主张大民主，主张要杀人之外，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比匈牙利好。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沒有苏联那么左，沒有匈牙利那么右。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反革命就要肃清，有错误就纠正嘛！

有沒有过火的呢？有。有沒有漏掉的呢？也有。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采用的是群众肃反路线。采用群众肃反路线，这个路线当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主要还是比较好的，比较由公安机关，学苏联那样的公安部门单枪匹马地肃反那比较好，群众得到了经验，群众在

斗爭中得到了经验。犯错误，群众也得到了犯错误的经验，叫做犯错误，搞对了，得到了搞对了的经验。我们希望在肃反工作中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了步驟去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年明年（如果时间来不及有这两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协同政协主持。个别的检查，不见得会有效力的，有人写一个信，说他有问题，就去检查一下，是不夠的。我们现在要作好这个工作，第一，不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的。“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头。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法院工作、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是完整的一句话。表明两件事。第一条，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沒有了，天下已经太平了，我们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这个不合乎事实。在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就有个北京，北京就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就有一个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支部就有个支部付书记，此人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人应该给他扬一下名吧！（台下：叫马云风！）马云风就写标语一个：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又不跟党委商量，你一个支部付书记，他祕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都贴了。他这实际上这位共产党员就赞成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国去“援助”匈牙利。所以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种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动的思想，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因为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反动行为，但是说他是什么蔣介石派来的人或者怎么样也不是的。发现反动标语还不少，在北京的学校里头，工厂也有，学校也有。所谓“无反革命”论，天下太平沒有反革命了，这个思想是不对的。第二条：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这两条都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至少，我说十个指头，除了九个，至少剩下一个。不是还有十分之一的反革命，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把反革命当成一百，可能只有千分之一，总之不多了。

是不是应该大赦？大赦的问题，很多朋友有兴趣。我对这个总不那个积极，消极分子（笑）。所以未免跟一些朋友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宪法上规定了，那你当主席，你又不遵守宪法？我说，应不起这个名义。实际上也可以大赦，但不定要用大赦这个名字，一下把反革命都放下去。如果大赦就必然包括康泽、王耀武、宣统皇帝、杜聿明，这些人放出去，老百姓势必反对。现在这时候，犯人劳改者就反映，“大反革命你们都赦了，我为什么你们不赦呢？”所有犯人都这样讲，法庭无事可做，检察机关也不要了，因为康泽可以赦嘛，有人说：“台湾都可以赦免。蔣介石都可以赦掉他，为什么康泽这些人不可以赦呢？”谁赦蔣介石了呢？沒有那个赦他，人民代表大会也沒有决定赦蔣介石！我们是向蔣介石建议，你如果起义，你变成起义将军，就可以取得赦免的权利。台湾方面的人，你们要起义，我们现在不说蔣匪，“蔣介石匪帮”了，可是他可不同，天天叫我们为“共匪”，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叫做“逆”，比如说“张逆治中”之类，在报上发表了。所以放不得。那么是不是永远不放呢？那不是。我看慢慢放，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反正是不登报，也不下一个命令。少数著名的分子将来考虑。比如宣统皇帝怎么处理？人家是个皇帝，我的顶头上司（笑）。上了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百姓，但是这位宣统皇帝他是得罪了人民，将来也可以放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现在还

不能大赦，赦出来对他没有益处，对康泽也没有益处，对杜聿明也没有益处。对这些人放出来，人民不谅解。請他们参观，看看天安门，看看武汉大桥，看看工厂，看看农村。宣统皇帝也看了，康泽也看了。学习、教育、看报纸、研究、是不是可以找点工作给他们做，也可以考虑，就在班房里放点工作。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较好的那些犯人。改悔较好的，罪又不很重的，逐步放掉他们。以后这样放就是，不要在报纸上登报，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问题，农民要拿起扁担来，工人要拿起铁条来打，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的手无缚鸡之力。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讲这么几点，一个问题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上半年优越性就很大，合作社一到下半年好象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而是有那一股小风，说合作化不行了！今天发的文件里头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請各位看一下，这里缺少一个坏的，一个坏的典型。将来要找几种类型，这是一个好的典型，是很艰苦奋斗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什么人呢？就是贫农跟下中农。对于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农以外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請工了！不能雇长短工了！那末，要多少时候合作社才能巩固呢？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全国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就是去年这一年，前年一个冬天。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好，这个就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五年，去年一年，今年起还要四年。比如王国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在河北省遵化县，靠近长城，靠近热河有那么个县叫遵化县，这个合作社完全巩固了。农民生活有沒有改善？有所改善。七年以来，一九五〇年起，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粮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全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而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现在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了。去年我们有三千六百九十亿斤粮食。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所謂农民生活沒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一部分农民还沒有改善，缺粮戶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百分之几。缺粮戶在逐步消灭中间，我看大概过三年到四年。我们不是说合作社巩固要五年吗？有五年缺粮戶就消灭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只统购不统销，农民我就不销粮食给他了，准备几年之內，我们不增加购粮的数目，增产不增购。现在农民手中有多少粮食呢？有三千六百亿斤，国家征农业税一小部分是小部分，大部分是买来的，购来的。征同购，征农业税和购粮这两部分共计去年是八百另二亿斤。三千二百亿斤中，国家手中拿了八百另二亿斤，统销在农村有多少？全国农村缺粮戶和災区农民，如种棉花的农民，只销三百九十亿斤　四百亿斤。八百亿斤中，城市及出口，出口只有三十八亿斤、四十亿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备粮合起来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如果还有两年三年只征这么多粮，那么农民就会富起来，就可以养猪，养牲口，农民可以儲备一部分，所以说农民生活沒有改善，叫农民苦，一片苦声是不对的。我们有些干部，也这么叫，有一些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因为干部有了几个錢，寄点錢回去，今年寄点，明年寄点，几年之內他家里有了，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就影响我们的干

部，民主人士也受影响，大概也有什么亲戚朋友之类。这个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有非共产党，跟着一起喊：合作社沒有优越性。我看还是有优越性。不信，請看王国藩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百分之六农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崩溃了。一万多个合作社，只剩下一千多个，吹掉了十分之九。在我们国家里能夠有这么快的合作化，这是有好多原因：第一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地少人多，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就比較好。第二是我们党，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驟。采取有步驟的，分几步，分几个步驟。因此我们与苏联的合作化的过程不同，他们的合作化几年不增产，而且減产，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加去年我们增产二百亿斤。除了富裕中农叫，因此影响党內外同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眞正苦，就是刚才讲百分之几的缺粮戶。还有一个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較，城市工资比較高，现在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块，有高于六十块的，有低于六十块的，比如五十块，四十块还可过，三十块就差了，还有二十块、十七块的，一家四口，十七块。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过一年，那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高达一百多元的，有沒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个人一千块，家的四个人就有四千块，几年之后，你们看，农民要比工人富，你们看吧！工人除了一部分粗工、临时工、工资不适当，一到城里来八十块一个月，有部分工资是不适当的，这跟农民一比較起来，刺激他们。但是城市跟乡下是两种生活，乡下如果每人有五六十元錢，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人民币，那就很可以过生活了。有个地方算了賬，有四十八块錢收入，每人四十八块收入，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乡村很多东西不要花錢买，城市样样要錢，所以是两种情况，把两种情况混合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改造。我沒有研究，但我鼻子闻到那么一点东西，也在这说两句。在资本主义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风，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说是资本家就不用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些人这么说，当然可能是少数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如果要改造，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在阶级斗爭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在阶级斗爭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并且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那他自己就不能解放。这是一个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不解放六亿人口，那工人阶级就本身不能解放，所以阶级斗爭中间都有改造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个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旺嘉錯先生，你那个佛教我们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嘿！那个无政府主义很好，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后来才鉆进去，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之曰改造，主要是在阶级斗爭中。这几十年来，资本家就那么高明，一点不要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笑）你沒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对事物不能分析，总有缺点，两点论呗，优点缺点，而且资产阶级的根子还沒有脫离，资产阶级还沒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取消论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沒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反而资产阶级不要学习了。那短期训练班就不要开了！这不符合工商业者多数人的愿望的。他们是愿意学习的，学习四十天回到工厂，面目一新，有了共同语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资本家，我是公方代表，两个人客

气的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现在你算是资本家，还算我是资本家？我算是资本家吗？我进了四十天的训练班，回来时有了共同的语言。生怕听改造两个字，我们有些人。改造这个东西，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我看美国人确实是洗脑筋，美国人可洗得凶，我们这个还文明一点。照这种议论，那宪法就要改了，因为宪法上说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都一样了，工人不仅和农民一样，而且与资本家一样，那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要取消。我刚才声明了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有些人在说。

第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问题。前面说的，我们六亿人民有很大进步，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进步，工人有进步，农民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现以后，有一些怪议论，我已经说过，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说将来可以赚薪水，无非是为吃饭，此外还有一个讨老婆，讨老公，大概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吃饭、一个叫生儿子。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个东西不着重，好象这个马克思主义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行时了！也有缺点，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避免这个改造。过去那些改造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进步，学点马列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就学那么一行专业，一辈子吃不完。没有政治工作，不作政治工作。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部门政府应该管。从前叫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我们变成两育了，智育专搞智育，此外还搞点体操，就叫体育。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学点这些东西。

第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现在又反铺张浪费。共产党就是那么一套，而且摸得共产党不过就那么一套，几个月完后就没有事了，现在有那么一种议论，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看也有点真，真正反一次的时候是三反。三反时把铺张浪费，把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来没有再反了。有一年提倡过一次节约，那是节约什么东西呢？那是讲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就是前年节约了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但有些地方节约不当，节约结果工程不好，节约过了。另外，在生产方面节约原料，以至降低了质量。就是基本建设降低了质量、生产降低了质量，这些是那次的缺点，但成绩很大，节约出来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别的一般没有搞节约，机关、学校、工厂、合作社、商业系统、运输系统都没有搞，现在要提倡节约，现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来，现在就开始见效，桌椅板凳都不买了，地毯没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毯出卖，在座的没有受主。我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没有办法，大家提倡增产节约，我有那么多地毯可不得了，现在反到我身上来了！这一回比较要搞彻底些。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我打个比喻，象洗脸一样，你们各位是怎样洗的，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不是？（笑）据我所知道的许多人的洗脸是一天洗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几次。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付脸要天天洗，干什么？那无非不是增产也节约？无非是为了面貌要漂亮一点，为了使尊容漂亮一点。每天洗一次面，这无论是共产党非共产党都搞这事嘛！并非共产党员提倡才洗脸，从古以来就洗脸嘛！现在反对贪污浪费，这东西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经常要洗脸。人不是别的动物，别的动物它就

不洗。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他就要洗脸。我们的党，民主党派的一些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这天亿人口，我们来提倡一个节约。现在搞的不象样子，许多人无非是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这个评级评出毛病来了。评级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夺利于市。

第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六亿人口。同志们都是负责同志，替国家负责任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大笑）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火拚的，就是趋于灭亡。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没有东西吃，加以提倡卫生，卫生工作一做，防疫针一打，娃娃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劭，（大笑）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他是专门名家！（大笑）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笑）他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这一点现在不多讲，我讲还是用战略方针。比如我们的一些事。救灾，全国每年都有灾，有很多灾民，要给他们粮食。比如统销，苏联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是把一切城市乡村，无粮戶、缺粮戶都计算在内。比如安排工商业就业，安排失业人员就业，统筹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所有这些都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去年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就业，麻烦，问题也很大，按照计划，原来计划八十万，而实际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万人，多了二百多万，工资支付就多了。不仅这八十万人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工资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差不多三百万。这个负担很重了。但是失业是不是完全消灭了？还没有。比如广州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他们说要想办法，不能一律而论上海也有一些失业的人，其他地区还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这失业的人已减少了。有人提，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办法很值得考虑，宁可薪水低一点。比如我们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这一提出来，可能你们大多数要反对，也许你们赞成的。如果十年不增薪，高级人员十年不增薪，我看死不了人。不会死人的！以不死人为原则年还可以高，德可以劭，为什么德劭？不增薪水就是德嘛？（笑声）再增让下面去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到了年龄没有学校，这人民政府并非万能政府，人民政府办事不能一步登天。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校进。另外还有个事，这叫四百万，今年这一年有四百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中学，没有法子升中学，没有地方，没有经费，除了应升的之外，今年计划升的之外，有四百万不能升，高小毕业生就要回到生产队里头去，包括农村的。有多少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有四十万，有多少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一说四万，一说八万，一说九万。（周总理：初中是八十万，不是四十万）啊！初中八十万，不是四十万。这个早晚时间不同（笑）。八十万初中生不能升学，好多人就业也是问题，要等候就业，八十万这么多嘛！有九万高中生不能升大学，这也是发生一个就业问题。等候也是一种安排。比如买猪肉，一条长龙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经卖完了，只好回家，买不到了嘛！这个问

题是相当大的问题，要請大家考虑，政府也考虑。总而言之，今年这计划就是那么多錢。一句话叫：錢就是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事。休息一下吧。（休息十五分钟）

第八：讲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我说列宁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全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缺乏经验，他就死了。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的好，矛盾可以不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处理的不好，那就发展为对抗（周总理：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来这一点了。我们鉴于苏联差不多四十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領导革命斗爭，从他搞根据地开始——一九二七年，也是比苏联同志迟十年。他们是一九一七年胜利，革命胜利，革命开始胜利。我们就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们也有三十年的经验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沒有剝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沒有私人的資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斯大林，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辯证法，不是讲沒有辯证法。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他：部分的但是严重的违反辯证唯物主义。是那么说的。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一本书，叫做“簡明哲学辞典”，是两个人写的，其中一个就是苏联大使尤金，这是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在讲同一性的条件下。他有一个题目叫同一性，说了半天，驳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根本就沒有分析清楚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跟辯证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就引用恩格斯说，恩格斯讲沒有什么同一性，实际上什么都存在变化，客观实际上沒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来个形而上学，他说对立的东西，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不能说他有同一性，你比如说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一个社会中，他们是沒有同一性的，只有互相排斥，只有斗爭。战爭和和平沒有同一性，生与死沒有同一性。如果说这些东西有同一性就是錯误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哲学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变化。我看的东西不多，但是看到他们开始有所变化。斯大林在哲学上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謂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沒有变化。战爭就是战爭，資产阶级就是資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说法不同，資产阶级它变化为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转化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无产阶级。战爭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爭，生转化为死，死也转化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话之后（恩格斯那话是沒有形而上学的）就来了一个形而上学，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变化不能统一的，不转化的，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上他说到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处理得不好，而且可能成为对抗的。这东西说得好，不过不彻底。我说他的辯证法是个害羞的辯证法，是个羞羞苔苔的辯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辯证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它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长期共存，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

包括这些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百花齐放，可能胡风虽然坐在班房里头，胡风的灵魂却活在世界上，写出胡风那类作品还是可能的。但只要他没有破坏行为，胡风他为什么？他就是组织秘密团体，那东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团体，你开那一朵花，我们中国面积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开那么一点花有什么要紧吶？开那么一点花给人家看看，人家也可以批评他那种花，说你这花我不喜欢。就是讲野草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粮食，只要大麦、小麦、包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是不能实现的。每年农民都要除草，你们不信，今年春耕你们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长草，不晓得那草从那里来的。总而言之，年年长草，等于人天天要洗脸一样。农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长，这行不行？事实上不行，它还是要长，你锄就是了。如果什么人下一个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长了，那当然省事，那农民很感谢。但事实上有那么多的野草跟粮食竞争，其中有毒草。一株香花，一株毒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个学问古代就有了，但是特别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在外国，中国也有。难分香花毒草。曾经在人们眼睛看起来，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要被打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毒草。国民党、同盟会，那时候清政府看孙中山认为是毒草嘛！把共产党叫做匪党嘛！共匪嘛。跟共产党往来叫通匪嘛。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这是由毒草变成香花了；但是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是毒草，还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人家不听。耶稣，在开始也是社会不承认的。佛教怎么样，释加摩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耶苏教到了马丁路德新教也是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么被封成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的封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干部鉴定），他自己的鉴定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的鉴定搞他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薛仁贵当火头军，薛仁贵不是当过火头军吗？这是张士贵给他鉴定的。此外，哥泊尼的天文学，长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许多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认。意大利的伽俐略，他的物理学，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的。我看了一本科学小册子，安眠药的历史。安眠药是什么人发明的？是德国一个卖药的店员发明的。德国不承认，法国人承认，把他請到法国去了，以后被承认了。中国人有个李烈钧，国民党中央委员，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从中国到马沙（译音），从马沙坐火车到巴黎，他吃安眠药，他说这东西是好，能使人睡觉。英国一个跳舞的，舞蹈家，叫邓肯，她生孩子，生头一个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用安眠药。我是说世界上一切发明，政治的、科学的、文学艺术的开始都不被承认。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嘛！他是准备要"藏之名山，传請其人"，不能出版，当时沒有出版机关，大家抄几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运输也困难。总而言之，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仔主义者。碰到顽固派，究竟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斯大林曾经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毒草，现在也香起来了。

最近有一些批评。我这都是讲共产党，共产党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踏糊塗，否定一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爭论了。但是台湾很尝识这篇文章。另外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

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一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因为×××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发表是去年七月了。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同志写文章是一月七日，只有五个月，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写得赢？所以只说没有大作品，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没有搞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坐，他表示了什么？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有主张，你们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棐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的那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克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台上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恐怕现在要批评一下子吧，有一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组织部新来的人”也发生事情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头研究这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打架，讲的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共产党区委有官仔主义，因此就说他的典型环境放的不好，大概设在上海最妥当。我们的这个地方就不行。××的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学的很少，但是我没有看到过（笑）说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仔主义？中央还出官仔主义，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中央出过什么人物呢？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焘、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么一条道理，也是批评不对。

马克思主义还有发展，马克思不是已经学过了就完了，还要继续学的。情况是发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六亿人口，我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万人口，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一点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有吃饭时才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讲话，把它堵住那很难办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意识形态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也要自己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它表现，只能够在他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说：同志，你的话里有点不大妥，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使用辩证的方法。要有说服力，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老干部能不能批评？这个批评的问题，从马克思以来，没有说过一次要分清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够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

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利，可不可以？我看不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几千年，还批评他嘛！现在孔子又好了点。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活人也能批评，死人也能批评，这个不分官职大小、老稚长短。是不是你越老越享福，避免批评呢？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凭老资格吃饭可以不可以？你老资格可以，这一方面承认。因为他老，活了那么大，他也不死。于是他有点资格，有点作用，还可以起跑龙套的作用，摇旗呐喊，拍拍巴掌帮助人家。我看梅兰芳就跑过龙套，跟人家合作，拿个刀站在那里。今天在座的有沒有梅兰芳？我看你到了八十岁还可以起作用，至少跑龙套还可以跑。我这个人的作用，只能起一点跑龙套的作用，至于唱主角我是不唱了，那是我们周总理这些人物了，（笑）你们各位啰。"西廂记"是那个唱"红娘"，我是不能唱了。我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我是那个老太太的角色，（笑）"西廂记"里头那个老夫人，她出来唱上那么几句，转那么几下就进去了，你如果尽唱，唱的多了，人家会赶你走的，（笑）而且老资格不管你怎么老，你事要对，要正确，你活到九十九岁是正确的，到一百岁那一天，你做了一件大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行的。拉科西曾经作过什么好事，我也不知道，假若拉科西他沒有作什么坏事，但在最后做了一件大坏事，你就不能因为是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新干部当然也是一样，也要受批评。列宁讲过上帝原谅他们青年人因为他们年轻，上帝还可以原谅他们。老资格的人就应该严格。老干部是这样，青年干部也应该严格，也要帮助他们。如果对青年干部严格，老大爷就特别舒服，我看那不见得好。要做长期耐心的教育。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眞正通的，眞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辯证物主义的对立面的方面，比如讲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文艺作品中间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我说，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说服力的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人们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爭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要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那些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敌对的。这些统统都长起来的香花和毒草，它长起来有什么可怕？沒有什么可怕，我觉得沒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长草，中国已经长了几十万年，现在不过是继续长嘛！如果你下一个命令，禁止什么花不准开，什么草不准长，其中可能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历史上的进化论，伽俐略，哥白尼，这样一些花草。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花草，有时不见得是眞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我们现在继续生长），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爭。在一块互相批评，在批评斗爭中才能发展。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候统统忘记了，沒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沒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我们不说这方面，从这个问题我想到种牛痘的问题，为什么种牛痘？你们出过沒有？我是出过的。出的不是牛痘，是类似天花的一种病菌，

使它在人体里生病，人体跟这种病菌作斗爭，作斗爭的结果是产生免疫，不跟疾病作斗爭就不能免疫。所以一輩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经常害病那是好事，可以产生免疫。

第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請愿这些问题。大概同志们的文件中有几个关于这类问题的。昆明航空学校为什么沒有闹事？（这里缺乏一个闹事的材料，最好找一个闹事典型的材料印一下）这是沒有官仔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认识青年当前的思想状况，青年团中央曾供了一个材料。去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这个材料分析相当好，无非是官仔主义跟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同时，学校当局、办事人，各种的欺骗他们，又不跟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个是工人罢工、請愿，总工会的报告中，部分的统计，有五十几起罢工，其中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多，最大的一次是一千多人的罢工。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处理？我说人民內部矛盾，经常不断的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事件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看有几千个学生闹事，有部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搞了几条，提出四条看对不对。

第一条，努力克服官仔主义，那么人家就不罢了嘛！努力地克服官仔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了，就不闹事了。

第二条，官仔主义沒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不让闹，凡闹事者就说是反革命，就说是要造反。我已经先讲了，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让闹还是不让闹？我说还是让他闹。罢工他要罢，农民他要闹，学生要罢课，农民要打扁担嘛！

第三条，闹起来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两种方针。刚刚闹过两三天，闹事的人还沒过癮，当局就急于想结束，这就发生矛盾。这怎么解决？我说让他闹夠。施复亮先生就闹过事（好象在浙江），我也闹过事（在学校里）因为问题不能解决嘛！并且要让他闹夠，一星期不夠，二星期；二星期不夠，三星期，三星期不夠，四星期，总而言之，闹夠了就不闹了。把闹事的过程，当成一个教育的过程，作政治课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夠，思想工作沒作好，官仔主义应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工人打铁条，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一个过程。闹事的头子、领导人物要不要开除？我看不应该开除，除了个别的以外，如他拿刀子杀人，那他就得到公安局坐班房。因为他杀人、行凶。如果你又不打人，不杀人，沒有那么严重，就不要开除。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这种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一般的不应开除。领袖人物，正确的应该留下，错误的也应该留下。错误地留下干什么？留下当“教员”。因为犯错误，有些个别的清除了特务分子，是不是让他离开学校？我看让他学习，只要他不是现行犯。一个学校里有几个特务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淨淨你就舒服了！所以清华大学那位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现在留下，他就是“教员”，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宣言，这是难得到的。我讲的这四条，第一条，努力克服官仔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夠，让他闹夠；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工厂的负责人、合作社的负责人、机关里头的负责人，乃是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不高，

就是文化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犯错误还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和右倾都犯过，知识分子多，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知识分子。

第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讲这个问题，罢工、罢课、游行、請愿、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嘛！商品都有两重性嘛，罢工、罢课这种事情也是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你们说匈牙利这个事情好不好？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他闹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匈牙利事件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所以匈牙利闹事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反苏反共的风潮全世界来了，第一次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我们怎么看？我看当然不好。第二条，这是好事，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锻炼了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把机关报打烂，瑞士共产党搞的非常不好，总书记躲在山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不敢见面，不敢出去，见面就打，大批党员脫党，荷兰、比利时很多脫党的，英国知识分子，知识愈高愈要脫党。脫党好不好？又好又不好，所以知识分子有两种，愈是大知识分子愈不赞成共产主义，混了几年、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要脫党。这种知识分子留在党内有什么好处？主要的还是好，你脫出去了为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国有胡适这位先生，现在他大作文章。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他说：他提倡过"万花齐放、万家爭鳴"。（笑）批评斯大林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他揭的办法不对，沒有做过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这几个月的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所以他有错误的方面。我们在公开的文章上虽然沒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我们与苏联同志当面讲了。讲什么呢？对斯大林事件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主义。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方面，不承认我们当然不好，联合国我们不能进去，他说世界上沒有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被承认而他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有个极大的好处，美国不承认我们，我很舒服。我与许多朋友交换过意见。总而言之，我沒有说服他们就是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承认，最好过六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至少过六年后承认，这样比较好。最好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使他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对我们利益不大，沒有他，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的差不多了，請他们来看一看。（笑）他们就是悔之晚矣！（笑）还是美国把尾巴一翘，硬起来，说不承认，我很高兴。美国差不多要承认，我有点发愁。但是美国的事情。美国的参谋长是美国人，不是我们这里的聶荣臻，或者那一个跟他打主意，但是也有准备，如果承认的快怎么办？还是接受一定要承认，我说也行，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这个东西有文章可作，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不算，英国是承认了我们，但我不跟你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半外交关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办，因为在联合国他投蔣介石票。

我们有文章，可出现了几篇错误文章。刚才我不是批评了几位同志吗？同时要感谢他们，错误文章也办了一件好事，因为给我们根据，使我们批评有了对象。有教条主义文章、机会主义文章，这文章出了几篇，还要多出现一点，他的性质不但不好，不单是错误，另外有个作用，另有一种给我们反批评的可能。沒有大作品，沒有好影片怎么办？我说这是坏事，因为沒有吗？长期沒有终究就要来了的。物极必反，坏事做的愈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

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笑）早就曾这样说过。他说凡是坏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坏的，祸就有福，福就有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去马，有人反而去庆贺他说：马失的好，失的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从前有人烧了房子还去贺喜的。日本人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大半个中国占去了，中国就叫失败。但是中国这个失败包含一个胜利，日本人的胜利包含着失败。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菲律宾、印尼、东南亚许多国家，胜利包含失败，结果果然胜利转化为失败。而被占领国家，象中国的失败转化为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希特勒兵临城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整个欧洲被占领了，就要胜利，但是包含着失败，而被占领的欧洲，苏联大半个国家却包含了一个要胜利。

现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们看，这个等会儿再讲。我们中国有两条，一条穷，二叫蠢。说中国人聪明，但中国人不识字。一个生活水平不高，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这件事情也要看作两重性。我们革命就靠这两条，一个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说中国人富起来，象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要革命。西方世界富，有他的缺点，其缺点就是不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文盲，我看还是文盲好。（笑）当然文盲还是要消灭。我这里不是来提倡继续保存文盲。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么快，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太穷了。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样？马上就打。比如讲，我们散会后听广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怎么办？你们都不想？有没有精神准备？我看要作准备，要打就打，象学生闹事那样，要闹就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要打就打，有什么办法？全世界再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消灭一半，有人说，要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尼赫鲁和我辩论过，巴基斯坦总理苏格瓦底也和我辩论过。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第一条是不欢迎，第二条是也可以（笑）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许多国家，九亿人口，三次世界大战，大概至少十五亿二十亿，来个赤化全世界，帝国主义人口剩下就不多了。所以战争有两面性，有破坏的方面，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精神状态紧张起来，使人民觉悟起来，使革命爆发。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怎么主张？你们怎么处理？又象日本占领中国一样，又把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广东占去了怎么样？大家就是嚎陶大哭，我们那种情况来了，我们只是一个哭脸，连蒋委员长还不及，蒋委员长并不哭脸，我们大家都经过的，没有哭脸。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弹？我们是一个也没有，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打的结果归根到底，你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是反动的落后的，虽然经济先进，文化先进，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违反人民志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灭不了，一个苏联，一个中国。地势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岷嵛山，（笑）灭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也有两重性。日本人跟我谈话，说很对不起，侵略了你们。我说朋友，你们做了好事。他给我搞糊涂了。我说，你们不打进来，不占领这么多地方，中国人民就教育不过来。我说你们当教员，调动了全中国人民来反对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功劳。国际间的事情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从前有人写过一首诗的："二个菩萨，一齐打烂，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资本主义的泥菩萨里头有我们，社会主义泥菩萨里头有他们。于是你这个里头就有我，我这个里头就有你的。现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是两个泥菩萨。那个匈牙利就多了。听他们的话就多了，东欧各国听他们的广播，苏联也喜欢听美国之音，欧洲电台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人，受他影响。还有特务，那是天天计算他们来了。有些

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来，有些国民党把党证保留，等到那一天他们来了做证明。我们有党证嘛！向坏处去想，打大仗，一个打，一个不打，第一条准备他打，他要发疯嘛！当然最后我们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已有九亿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亿人口。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时间，或者更多一点。先说打败仗，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建设怎么办？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帝国主义他对我们搞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搞互相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争殖民地，争亚非。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英、法之类，这个是他们主要矛盾。三种力量，一种叫社会主义力量，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一种叫帝国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斗争。而这第二种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纳赛尔等可以和我们合作，在某些问题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帝国主义问题上，程度不同，可以跟我们合作的。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打仗结果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呢？用抢地方的办法，美国人与英国人争亚洲，与法国人争非洲。我看采取这个办法。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他的方针就是我们的估计，好象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他的主要目标不是进攻我们，而是整英法。洛克菲勒把所有这些国家分成三类，一种是巴基斯坦亲美的，已经和美国签订定了军事条约；还有一个是中立国，象印度这类，他们采取和平中立，要拉拢他；还一种是殖民地，完全没有独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要假装帮助他。洛克菲勒这封信是去年一月份写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来在德国（东德）报上登了，我们现在公布发表了，很值得看一看。

第十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问题，西藏问题。少数民族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广大，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百分之六。所以我那个十大关系里头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这个大汉族主义作风，思想情绪，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西藏有一派，他们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請求我们允许达赖到印度去，他已经去过印度，现在已经回到西藏。美国就作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仁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搞破坏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諜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希望按十七条协定办事。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仁堡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

最后一条，第十二条，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采取比较过去有相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得太多，当然刮来的錢是搞建设，不是进腰包啰。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吗？重工九，轻农一。我们是重工业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比），没有农业，加上农业那这个比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他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村做为市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来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我看反而可能比他快一些。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子四百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百万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〇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这个时间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百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合起来一千八百万吨。我们老底子九十万吨，不是讲一九四九年，而是讲最高年产量，主要是日本人的。至于蒋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几万吨。我们从那年算起，从一九五〇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一年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可能的。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给。不给就打起来了，打个天翻地复，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时间。二十一年照苏联那样，一九五〇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〇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〇年还有三年。我们现在说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可以断定不止发展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能有两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针，迂迴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买力，轻工业加以发展，农民生产更多的工业原料，生产更多的粮食，农民增加购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有市场，卡车有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关于经济问题，不准备多讲了，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了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作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比较有经验，我们翻过觔斗，犯过错误。而搞经济这个东西，就没有多少经验，我希望不要学革命斗争翻那么大的觔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个万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价，要求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现在似乎不好了。我看还是好的国家。谁能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工厂呢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件事。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跟他们一类型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也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夠。但主要我们还是学苏联。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东西，只有他们委

派工程师给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夠设计，只有他能夠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来搞。所以苏联是学习重点。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沒有提出口号要学习苏联落后的经验，报纸上也沒有登过。但是有时候实际上有些经验是落后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苏联团结，跟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沒有良心的，良心有疑问的，杜勒斯就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骂我们，霸占着台湾不走、不放。

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不讲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最高國务會議上的結束語

同志们：我沒有多少话讲了，有几点说一下。

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谈到老干部批评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在小组会的时候），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领导的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因为规定他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讲由过去的那种领导，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嘛，那么一种领导，改变为让位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础基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末，他就是有个党，现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党、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咯。那末，问题是他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让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如讲世界观这个问题，只能夠是逐步地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了一点人，不能一下子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强迫人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提到了。精神上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家人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咯，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不行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但是马克思世界观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那信那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后，多少年后，还有相当一些人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马列主义领导里头应该安排的，就是应该认识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许要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夠批评倒他就沒有用，能夠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眞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评，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唯心论他就批评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就批评

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说就是了。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说成为与他那个宗教结合。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是该批评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纸糊的、棉扎的，纸糊棉扎风一吹就倒。应该是不怕批评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就是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那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的不够。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么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他就有多长，就是，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今天郭老说我们这些人统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长咯。共产党有天要灭亡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地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他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督监？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督监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说，你又讲大民主不适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间的某些作法。现在有人建议不要大民主了，现在的作法已经改了，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都是小民主咯，有些一个"小"字还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细雨比较好。现在所讲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单位怎么办？它任何的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 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简直是官仔主义，一万年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仔主义 如果不允许他我看是不好的，应当允许他，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仔主义，提倡人民范围之内的所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仔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有纪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商店都应该有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是很守纪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仔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不能解决，没有教育。纪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应该先生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罢工呢？凡是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仔主义。以后下面三条，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仔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问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军队为例，军队我们曾经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战士批评军官，使军官很难受，战士批评连长，干部会批评军长、师

长。大批评以后，这个师长、这个军长、这个连长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们是拿着枪的，可以用这样的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你就要检讨，你当连长的要检讨，你犯了错误！不能打人，官长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们解放军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做？我们工厂不能做？我们合作社不能做？我们合作社现在的时候，许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一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军队没有乱，还这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氢弹，洲际导弹，一个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团结起来？就靠肃清官仔主义，减少官仔主义，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厂要服从厂长的领导、指挥，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挥，要有学习的纪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识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所以讲到这个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請愿这个事情，我们要作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仔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一种补充方法也是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二千份，现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报纸，比如《大公报》他是发二十万份，这个报纸发行比他多，有三十万份。由二千份准备跃进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就是要花錢买就是咯。凡是愿意购买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们就要说替帝国主义出錢办报纸，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无条件件地办报纸。我说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把你们骂我们的话，如何骂我们，你那里发生了的乱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遗失"，那个东西人家遗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那么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一、二个变，变一、二个，我们中国人多，刚才马寅老也讲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蒋委员长这个问题，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多长，我就赞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全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行不行？现在还不好公开发行吧，图书馆里里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不是读了他的文章统统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见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里面总要放出一些祸出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他另外有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他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些也有好的作用，它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的不夠，沒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沒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个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大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仔主义、教条主义、脫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沒有原料，沒有销场，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毅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件一起，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子沒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压，沒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爭，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沒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三年才能恢复到过去十月二十三日，一二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減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減产一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有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人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沒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沒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沒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夠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頓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沒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沒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邵先生咯！嘿，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泼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好，不要泼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泼冷水。向科学家泼冷水这当然不好。一切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泼冷水。科学家不要泼冷水，积极分子只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的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有那个别的、极顽固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药的，科学家不要泼冷水。参观科学院，今天郭老将了我一军，这个恐怕沒有办法，你既然将起我的军来了，不然你已经封了我的封号叫“官仔主义者。”（笑）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同志们说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得好，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技术干部，学生们不要单纯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应该有技术观点，沒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还沒有哪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热心。但是单纯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可以服务，替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些东西他们不

能接受，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没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术人员存在的地方，学生们中间加强并且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贫且贱焉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所谓安排问题。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辩证法嘛！（笑）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够；贱就是没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讲他不注意劳动吶，没有工作或者安排得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来批评我们。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笑）这个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缺点的问题，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什么话都说。那一些人搜罗起来贫且贱焉的有多少，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按：）

还有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讲美国他有他的困难。红楼梦里头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给她借錢，他就说（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刘老老借錢，因为他这么一说，刘老老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我看，经济危机要来了，美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他们都矛盾很大，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恐怕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证明。有时刻他们的那么几个原子弹，多了几斤钢铁，他现在强点，这一点要不要承认，要承认，我们骂他纸老虎，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说他是纸老虎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谁人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不那么巩固，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整个社会主义跟他比较起来我们还落后，可是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我这个讲话，前天这个讲话，有些地方补充一点，修改一点，今天讲的同志们提了许多意见，这个东西不准备全部公开发表，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讲罢工罢课这个问题，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国就罢起来了吧！（笑）而我们的干部没有准备，我们的同志没有准备，地方来的同志开过会回去的时候，请你们要使他们有准备，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好讲，我们坐在这里好讲，身当其冲的是他们，要使他们有准备。局部的、若干个别的，是那些极端的官仃主义长期不能解决问题，是指那些范围。最后如果修改一下子，调整一下子，我讲的这一篇，准备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到。几天之后我们准备开一次宣传教育会议、宣传会议、宣传工作、报纸的会议，准备跟他们再谈一次，完了！（鼓掌）

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长座談會上的談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关于会议开法，听了主席录音报告，内容很丰富，要好好消化，最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

好，开一星期，不夠，再多开二、三天，开到解决问题为止，多开些小会。

（各地到会有党外人士，我们来的是清一色。）

党内也不会是清一色。

（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听报告录音与前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所传达精神，不同。）

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过去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什么了。

（关于党委各部门应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政府各业务部门不抓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庶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后，问题很多。）

问题是多的，要放手，有好处。

（批评工作沒做好。）

打大仗往往不可免先要打几次败仗，有了经验就会胜利。

（康生：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沒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同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爭鳴。）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爭鳴”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有人提出，陈其通文章问题是否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一面，国务会议又强调一面，因国务会议有党外人士？）

党内党外要一起谈，关起门来，对外又一套，或单独对党外谈也不行，要党内外一起谈。

（闹事问题）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一百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希望讲讲上层建筑与基础关系问题。有图画家说，花草没有阶级性，还有自然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当前思想斗争，是否可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

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

（周×：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但“中申”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该文的。）

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现就马上驳倒。

（陆××：大将不要先出马，不要打冲锋，先让党外人士发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少，要他们信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的，如三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知识分子信了马列主义，就是很大的胜利。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因他没办法，不能不接受，但思想上不是很服。（××：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公开说相信唯心论。）他们政治上可以跟我们走，但要信马列主义不容易，有的搞康德，黑格尔几十年，可以逐步改变；有些一辈子也不变的。

（××说：百家争鸣还有顾虑，怕把是非问题弄成敌我问题。）

怕升级。

（有的人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好象过去工作白费了。）

不暴露好象没有，暴露就很多，是否过去工作白费，解放才六、七年，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了？他们说出来是好的，我们得到机会去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还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有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基本解决分清敌我，分清拿刀子杀人的，这是有数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一件一件的讲，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一派派，必须具体讲是非。（有人问：这个是非怎么分？如新闻工作等就有争论，請主席讲一下。）我不是新闻家，你们是内行，××就是专家，我们要讲的是大是大非，要分清敌我。不是特务，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湖北反映初级党校科级干部酝酿上街游行有五条理由，反对官仔主义。）

官仔主义改了，人家就不游行了，因此要加强党员教育。

（现在思想混乱，究竟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官仃主义，有的说是要民主、自由、个性，不要集中、专政、共性。领导要纪律、共性、集中，被领导的干要另一面，有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如果动不动就说“反对社会主义”，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当的，因为学校存在问题没解决，所以闹事。如湖北党校是什么问题呀？要分析。

（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官仃主义？……）

都有，不能用一个简单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同了。合作化要搞好几年，个人与集体是矛盾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要改造，这就叫过渡时期。（……）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吆？（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象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仃主义，欺骗，又有官仃主义。……共产党员工作这样，要整！不罢课怎能整掉官仃主义？！学生中很多成分不好，但他要说“对，我是地主成分，但你为什么骗了我？”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党校讲课都用大纲，党内关于马列主义教育能否争鸣？）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家，如果有不同解释，就是曾经有第二国际，列宁的第三国际，斯大林有马列主义，也有教条主义。

（教学大纲以前叫“法律”，后改为“参考”了。）

以前叫“法律”，现在叫“参考”，可见这“法律”就不太严肃了吧。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燥，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专业学校官仃主义为主，还有欺骗。在工厂里也有官仃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毒草是有的，但不是多数，占百分之几？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但99％或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方法，在于

有说服力的文章，学校的教员，工厂的干部能讲得清道理，能说服学生、工人。光压，压得服人？

（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

简单口号压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有说服力的文章。如果大家看来都对，只有一人说是教条主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多数人都说你是教条主义，那就不成了。地、富、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知识分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极少数的人会教育不过来的，大约只有千分之几，但如果他们不拿起刀子来也不要紧。《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文章中有这么一种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因此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两点：（一）对毒草估计过分了，几千年来，人民就这样容易毒倒啦？！人民是有分辨能力的，不怕！让他放一下吧！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先讲话，先让民主人士写文章，让党外充分讨论。（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等的办法，现在是思想斗争，是不同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小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17个学校7000人罢课，全国有500万中学生，中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500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词是什么呀！大部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国，有几千万人口。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要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再放"。

（航空学院付支书张云凤写反动标语问题。）

他写"苏军滚出匈牙利"，我们要他"滚进"，他要"滚出"，学校里同意这意见究竟有多少？千分之一大概会有的。（有人提糊涂思想还很多）这是显明的敌对问题，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糊涂思想不算，世界上多得很。（××：支部表决开除张党籍问题，5人赞成，4人主张留党察看，是在负责同志讲了要开除以后表决的。）九个党员，五个赞成四个不赞成，说明时机未成熟，何必急，张有意见可在支部中公开讲，为什么要秘密写标语？这是恶劣！我们还可以研究经验，是否要开除？如要开除，什么时机开除？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儿子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少了些，象张云凤这样的少。（××：象张东荪那样的人，几年了，现在还放在那里教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许多教授公开说："共产党会胜利是无天理！"我们也还是采取严肃批评与耐心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最近他自己公开检讨了，这说明还是有效的，对党无损害。去年还参加了知识分子会议。）还加了薪呢。思想斗争是"文"的，要瞻前顾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

（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不要改造？我60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象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有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们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对，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在一定范围内是应当这样说的。）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的。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就应该由你们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阶级斗争，是种攻势，他们没办法，但不舒服。现在要建设，知识分子就以改造之身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仔主义。他们批评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要学习，要研究。（……）

（知识分子中的新老问题，老的怕新的批评。）

规律就是如此，后一代的人学过前人就批评前人。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后代跟我们一样，什么好处？

（他们不公开宣称唯心，而是把唯心唯物搞在一起，搞乱了，借反教条主义之名，以抬高唯心，是他们百家争鸣之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但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那么明确，是否加上“去伪存真”或“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　　）方法，唯心主义者是虚中求是。

（有的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能够，办办看，如领导不起，还是不行，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个我还领导不得？（××：去年我们搞照顾等等，做了总务长的工作。）我们，总务长加李富春（计划），第一给饭吃，第二计划。现在科学研究，我们就是没那么多党员去充当所长，难怪人家说，这点不要去争，自然科学我就不懂，要請他们当先生，李富春加总务长，我一点都不领导？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

（苏联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

还没有。

（陈伯达同志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所提知识分子通过两条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问题。）

自然科学家是通过自己业务实践道路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指他个人通过的道路，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有些知识分子口头说党不能领导，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得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他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

（教授说：政治为教学服务。）

政治为教学服务，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也为科学技术服务的。也是的，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并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对闹事学生、工人中共党员该怎么办？有困难。）

有困难，应当看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对十分坏的官仔主义，要反对。当然首先要极力争取和平解决，不罢工罢课，对于无理的，就不卷入。有理的，党员、工会、学生会应该站到群众方面。

（报纸要不要干预生活？）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沒有抽象的言论自由，只有什么阶级的自由，阶级中集团的自由，有阶级的时候，是阶级办报，如果把报纸当作沒有阶级性的，将来是对的，现在可不。

（有人提出省里传达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对的。）

我是先后插话谈过“这几个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下面这句话沒了。

（康生：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就容易忽略。）

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沒有这也不得了，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夠了吗？鸣夠了吗？不夠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这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该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打死的态度。

（关于八大决议，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爭论。）

矛盾有，但不大。但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50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50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40年吆，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给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

在七個省市教育厅局長座談會上對当前教育工作的指示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主席于三月七日晚间在頤仁堂和天津、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四川、陕西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当前普通教育问题。参加座谈的有：康生……等。

首先由主席询问学生闹事情况。经河南、山东两省同志汇报后，主席指示，学生闹事，应当重视，也要具体分析。如许昌学生向视察的人民代表提了一百多条意见，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你们应当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应当拖。你们都看过“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为什么沒有闹事”的参考资料（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吗？学校负责同志如能象该校校长和教师那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主动地给学生讲清眞实情况，师生同甘共苦，战胜困难，不是解决了问题吗？

主席又问去年由于合作化，办了很多学校，但出了很多问题，戴帽子的学校怎样，好不

好？经各省同志反映情况，一般群众都欢迎，同时也提出困难问题，如校舍、设备、师资、领导等。然后主席指示，戴帽子学校是先进经验，群众是欢迎的、拥护的，不愿搞掉，这就是好的。要继续办下去。你们专家要求过高，并要正规化，这就不对。有困难，可以补充一些教师，发一些经费，要求放低一些；先使普及，便于生产，课程可简单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多少錢。经初步估计约八千万。主席说，一亿行吗？只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节约一亿并不很难。

大家又請示主席，这样的办法，将来学生可以升学吗？主席指示，这种学校是为了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学生将来主要的是参加农业生产，课程简单一些才容易办，学生学得好的，同样可以升学。

主席又问学校就学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说很多学生交不起费，要依靠助学金来解决困难，特别是农村学生，但是助学金又不夠分配。主席指示，合作化不过一年，合作社还沒有巩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还有困难。三、五年后，合作社都象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中宣部办公室印发参考资料）一样，就沒有什么困难了。因此，在三五年內，农民子女就学，要帮助解决困难，助学金不宜降低，还可增加一些。这时主席又问需要增加多少。经大家反映情况，×××提出高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初中增加到百分之十八，可以解决问题。

主席又问每年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是不是很紧张呢？同志们一致反映紧张的情况。主席指示，全部解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略增加一些任务，适当地解决群众迫切的要求。戴帽子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民办小学也可以提倡。群众需要而又能办的可以办，这时×××也提出厂矿企业机关办学的问题，主席表示同意。

大家又請示主席，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多少、快慢应该如何掌握？对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应该如何宣传教育？主席指示，对群众宣传，可就国家经济情况来说明。李富春同志已在全国政协讲过，你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明。（三月十日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录音）。

同志们又提出若干关于教学计划和教材方面的问题，如科目多，分量重，內容深，教师水平又不高，师生负担都很重，教学质量都不高，特别是文学课学习苏联办法更感困难。主席指示，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有教条主义。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很复杂，不能采取划一的办法。科目要減少，七、八门，九、十门就可以，教材要适合各地方情况，要允许各地方自编地方教材，如地理（如湖南省）、文学（当地文学家的作品）、动物、植物……。现在这样的文学课本不好，要改编。这时候×××说：大家意见还不一致，要再研究。

同志们又反映，政治课取消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困难。这时×××说明，政治课教学效果不好，因而学习苏联，不教政治课，只教宪法。主席指示，高初中要增加政治课，教材要另编生动的，包括基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隔二、三年要修改一次。宪法课这样教不行。当时就指定×××、×××、×××负责编。并指示，要教育学生艰苦奋斗，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讲得太好。师生要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要劝导青年迟婚。各省市宣传部长、教育厅局长，要有一人专管政治思想教育。当时又指定×××拟发指示。

大家又反映，基层教育工作繁重，干部力量不足，又常常抽调搞其他工作。因此，要做工作，完成任务，必须充实人力，健全机构，如县市教育科局，乡文教委员。教师忙乱，侮辱教师，占用校舍等问题也要解决。主席指示，要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并指定×××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最后主席指示，教育工作是政治工作，很重要，省地市委第一书记要管政治思想教育，我就是第一书记，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忙，每年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七时，毛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界代表举行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国新闻社代表全仲华，《大公报》代表王芸生，上海《文汇报》代表×××……

谈话开始，主席先請上海方面的光外人士发言。主席问上海的《申报》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听到答称解放后《申报》就沒有出版，主席便说：《申报》取消沒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几十年的老报纸嘛！现在改做什么报呢？（有人答道：改做《解放日报》了。）主席说：改了就不好吧，如果把它改回来又好象是复辟了，但是这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接着《文汇报》的×××提出问题。他说去年七月《人民日报》改版后，上海的报纸也改了一下，但是改了之后，问题也很多，大家都感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

主席说：现在心中无数，但是慢慢就会心中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未打之前，我们就连想也沒有想过，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爭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就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象过去搞阶级斗爭（当然也夹杂一切阶级斗爭），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急，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虽然出了那么多，教我们怎样去具体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还沒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事情沒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都不等于能夠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办法。

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思想把它顶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的旧思想抵触，所以写

不出东西来。

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堆。《人民日报》就是这个样子，知识分子堆在一起，毛病就多起来了；但是堆在一起也有好处——知识集中。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的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插话：当时他写了文章来，一进门，就说他们有些意见，要想争鸣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动。）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但是思想方法片面、孤立，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主席说到这里，叫×××再说下去，×××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也有困难，反批评往往简单化，太粗暴。《文汇报》上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初时老演员、老导演参加讨论十分热烈，后来电影领导部门的同志写文章，一枪把批评打回去，他们就很后悔，认为自己出头发表意见，是上当了。

主席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能一批评很有益，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他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听说撤钟惦棐的职是不是？（××答：是他自己要辞《文艺报》评论员的职。）主席说：我看也不必撤职，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洩发洩。

（×××说：报上登的东西，读者意见不一致的，有些青年说《文汇报》登些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要看，写信来抗议。

主席说：你们的报纸编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不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爱看的。

（《新闻日报》金仲华提出意见说：日常生活问题出现紧张现象的时候，人民群众提出意见的很多，报纸一封也不登，群众有意见，报纸登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人又有意见，说是刺激群众，造成更加紧张。不知该怎么办才对？

主席说：可以试试看。（意思是说，也可以登一些出来看反映么样。）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官仔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主席问到上海报纸的销路么样？金仲华答：《新民晚报》扩大报导面之后销数增加了很多。这时座中有人提到“心中有领导，编报无自由，读者不爱看；心中无领导，编报就自由，读者就爱看”这句“怪话”。王芸生接着说：这个说法是原则性的错误。）

毛主席说：这也要具体分析。报纸是要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是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第三国际不灭亡，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列宁在生的时候，第三国际是领导得好的。列宁死后，第三国际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就不大好。）只有季米特洛夫那一段领导得好。季米特洛夫所作的报告，是很讲道理的。当然，第三国际也有功劳，就是帮助各国建设党。后来教条主义不顾各国的特点，一切照搬俄国，中国就吃了大亏。我们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也是不承认第二国际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要再搞国际了。情报局成立之后，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批评了南斯拉夫。（康生：还批评了法国和日本。）但也不是从此不要，但要就要象第三国际初期那样，各国独立自主，按情况办事，不要干涉别人。这些话，我和许多苏联同志谈过，和尤金、米高扬都谈过。

（有人问到报纸应不应该专业化的问题。）

主席说：有些专业化也好。好象《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他，因为他登这一类东西的多，又登得快。但是太专业化有时很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有人提到现在报纸上的东西太硬，反映了最近上海对于报纸问题讨论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又有人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等。）

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好。香港的报纸虽然没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夸大，传播毒草。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现在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

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说到这里，主席问《光明日报》的代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位同志回答说，"是共产党员"。）主席说："共产党员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嘛"。主席又说：你们的报纸还可以看看，副刊多。

跟着，主席问新华总社的朱穆之同志，你们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朱穆之同志回答之后，主席说：在阶级未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抑或报纸新闻都有阶级性。说："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报导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导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原因是它想做生意，所以故意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必要时，蒋介石不也会做出些姿态来的，他也放和谈空气。因为美国压迫他，要用更加亲美的人如胡适等来代替他，他放出和谈空气，使美国不敢压他压得太厉害，现在美国学了我们过去那一套，过去我们联合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现在美国联合胡适等去孤立蒋介石，拆蒋介石的台，倒过来，却由我们去"保护"蒋介石了。蒋介石不垮比垮了好，垮了，胡适等更加亲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蒋介石放和谈空气，是为了抵住美国的压力，我们不要揭露他的批评他。他放我们也放嘛。当然，蒋介石还是反共的，还是要骂我们的，他不骂就没有资本了。

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已退休3年，最近复出）反映了目前出版界的情况和他到湖南长沙一带视察所见的情况。他认为人们说目前出版的书又"缺"又"滥"，其实缺是主要的。因此他要求中央设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他又说目前中央各部都搞专业出版社，编辑，出版等整套业务都各搞一套，是否有此必要，可否只负责本部专业书刊的编辑工作，其他业务拨出来统一搞，以节省人力、物力，又各地大量搜集档案、旧书回炉，把大量资料性的档案、书报都毁掉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只管文物，不管资料，这样下去，将来要找过去的资料也困难。

主席对纸张供应问题说：轻工业部是否考虑多投资一点，这是不会赔本的。（文化部有一同志说：已请示过总理，计算了一次，增加投资无可能。）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人家谈的是要纸，你说没有纸，大家不要听，不要说吧。对于档案，旧书回炉问题，主席说，这是焚书的新形式，一看这样，别省也这样，恐怕浙江一带更多了，（向××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下。

谈到这里，×××发言。他说：主席今天和出版界的谈话，将使中国报学史开一新纪元希望主席对于新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给予指示。×××认为目前报纸工作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存在，但是会后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报上开展批评搞得好不好，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很大，因此可否想出几条准则来规定一下？康生同志也插话说，现在报上开展批评碰到很多困难，不是有人反映说，"批评军人，说你压制新生力量；批评老干部，说你立场不稳；批评民主人士，说你破坏统一战线"吗？

主席说：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了楼。反对官仆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来的。"三反"初期，说打出那么多老虎，后来一查，又说只有2%到3%了。肃反也有类似情况。"三反"实际上是整共产党，"五反"才是整资本家。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

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如果你推翻人民政府，蒋介石就要回来。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末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整风运动明年正式开始，今年先发一个指示，让大家有个准备，有一个非正式时期。在这个非正式时期，你有主观主义、官仔主义、宗派主义，自己检查出来，把它改了，以后就不追究。不久以前，陈伯达同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搞基层选举，就是这样的，有些干部贪污了，叫他把錢吐出来，向群众认错，结果群众批评了他之后；干部仍旧当选，这个经验很好。共产党整风免不了会波及民主人士，但是千万不要整死人。要用小小的民主的方法，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共产党整，大家就谦虚了。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沒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我们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文艺有一点，人也不多，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眞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譬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执政20多年只造就200多个地质人材。我们解放七年，就选了一万多。行政领导就是“一个李先念加一个李富春”，一个管吃饭，一个管规划。现在是过渡时期，只好这样，这个情况，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爭取80%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恩克主义有个初步的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是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全部贯通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大概我们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半。（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同志说：翻过来的47%）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沒有那么多功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主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都沒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捕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你们这次提出的问题很多，大家回去研究一下，试试自己来求得解答。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合起来开有好处，这是辩证法，可以把两方面的意见统一起来。（康生同志插话：这种开会方式大家还不习惯，党外人士有些顾虑，党内的人有些吞吞吐吐，主席说的是好办法。）主席说：你们回去试试行不行得通，行不通我就来个强迫命令。至于人数问题，我看党外人士可以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

马寒冰他们几个人的文章，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对党中央的方针，他们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康生：现在对于中央的这个方针，也有三派，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代表“左”的一派，怀疑这个方针不好，认为以后不要宣传这个方针。右的一派则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在报上闹闹有好处，闹闹有好处，但是要看如何闹。还有中间的一派，承认方针好，但是心中还不大有数，有畏难情绪。）主席说：怕什么呢？如果批评青年人帮助了青年人，批评老干部帮助了老干部，批评了民主人士巩固了统一战线，这样不是很好吗？（康生同志又说：现在部队干部对这个方针思想混乱，认为部队进行

的正面教育，只能开香花，不能放毒草。）主席说：事实上也有毒草，只不过不以毒草之名出现罢了。因为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意见当作香花开的。当然部队应该和其他部门有所不同，部队是下命令办事情的。但是我们的部队本来就有民主讨论，士兵可以批评军官，答复不满意可以再批评。部队不是也有贪污浪费和军阀主义吗？因此部队也要整风，不过搞得很乱就不成，要有领导的来开展。过去三反的时候，戏院“打虎”可以挂个牌牌出来，停几天不演戏，报纸可不能这样，有缺点可以开个会讨论，但是不能夠明天不出版。（康生同志插话：对部队来说，应该“开言路，讲效果”。）主席说：这很好，各处都要这样。

关于新闻的快慢问题，在这次宣传会议上，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讨论。对于这个问题，主席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譬如禁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污蔑我们卖鸦片，我们登了，不是正好供给他们宣传资料么？土改新闻也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新华社一播，（新华总社朱穆之同志说，是广播电台先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又如匈牙利事件当中纳吉登台这件事情，我们不明情况，又沉不住气，早登了三天，结果第一天登出的消息，没有说他好和坏，第二天的消息说他好，第三天又说他坏，群众弄得莫明。所以，本来情况不明，根本可以不登，这点法共就比我们高明，《人道报》在巴黎出版，四面都是资产阶级报纸，它未弄清情况，就是不登。

谈到再培养一些人写文章的时候，主席说：一定要找出能夠写文章的人，而且现在已经找出了些。谈到批评人民内部事情的文章应不应该尖锐？主席说：对人民内部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对于当地有关政策性的可不可以批评？主席说：有些也可以批评。听说新疆有一个县城，商业系统就开了24间公司，《大公报》你们不是搞商业报导的吗？你们就可以搞几个典型来批评一下。

（《人民日报》的××说：报纸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得不好，影响就不好。但是我们过去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文风生硬，现在情况不同了，文风不能适应。）主席说：过去就不适应了，有些文章使人看了不舒服，不讲道理，一出来就要压人。（××接着说：这个当然和我们报纸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有关。刮风往往是由报纸刮起的。报纸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极力设法避免刮风，避免片面性。譬如这次宣传节育和晚婚，《人民日报》一开头就注意到防止片面性，可是消息、文章一登多了，下面就发生问题。）主席说：文章一多了，就以为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里，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情况可不同。（××又说：譬如百家争鸣问题，有人以为争鸣的主要限于学术思想，实际工作不好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容易混淆，譬如关于劳卫制和因材施教的讨论，报上文章一多，有些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就引起混乱，恐怕要划个范围才好。）主席说：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

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新华总社的朱穆之同志说：现在问题很多，是否可以专门开一次会来讨论总结一下呢？）

主席说：这次只是提出问题，过一会还要开会讨论。这次会议也是“五湖四海”，效果如何，将来再看。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因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只解决了国际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大规模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一股风，说批评多了，说人民闹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有些人又觉得还不过瘾，有些人要收，有些人要放。中央的方针到底怎样，大家都要来摸底。其实中央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底，方针就是那么一个，不过有了新问题。罢工罢课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罢课是因为去年招生太多，一招多，有些人恐怕招不够，于是就骗人。骗人，学生自然不满意。问题凑起来，就显得严重。这样的事情，今后还有。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现在是社会大变动，思想混乱就是反映了这个大变动，不反映出来倒是不可理解的。官仃主义是闹事的直接原因，因为官仃主义不肯改，群众就会闹事。中国人民是最守纪律的人民，上海副食品供应那么紧张，我们把情况摆出来，把道理说清楚，叫大家想办法，结果今年的春节不是过得很好吗？现在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问题。（×××说：我们过去和新闻界也联系不够。）主席说：不是没有联系吧？今后我们每年都要开个会。我们今天还是过得比较好的，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到了1927年还很乱，文学艺术更乱，他们更穷，知识分子更叫，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十九年，商品也不见得比我们多。

谈到这里，有人提到过去对苏联的宣传是否存在片面性的问题。

主席说：当然苏联有缺点，我们不要登，印度的缺点，我们也不登，现在就是两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对于这些，我们就是要片面性。有人说西德的生产比东德快，你们为什么老是说西德不如东德。可是我们在宣传上还是不要说西德比东德好，不过也不要说东德什么都比西德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们历史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的地方突破，取得革命胜利的。我曾经对德国的同志说过，现在马克思在东方很忙，暂时还不能回去，所以他们那里的革命不能成功。现在亚洲政治上比英美进步，因为亚洲人的生活比英美的差得多。我们过去受剥削，很穷，穷就要革命，他们生活水平高，文化水平高，就是不革命。自然，美国也有好处，历史短，没有历史上的负担，他们学起历史来，就不象我们那样费劲，也用不着去讨论历史分期的问题。有时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现在是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以后再过几十年，东方国家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赶走精光，到那时候，他们没有殖民地可以剥削，油水就不多，而我们东方国家却富起来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人民就会进步。现在亚洲闹起来了，非洲闹起来了，如果拉丁美洲也闹起来，那就好办了。

給周恩來等同志的一封信

恩来、××、××、××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成批得力而又适宜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請中央讨论几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 澤 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传阅文件，五七年寅月一百零六号）

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黄火青、吳砚农、×××、李耕涛四同志陪同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黄火青：同志们，现在請毛主席给我们讲话。（鼓掌）

毛主席：你们有什么问题？

黄火青：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主席解答的，可以写出来，现在主席先给大家讲。

讲什么东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同志沒见过面，今天和同志谈一点事情。希望同志们提一点问题给我，你们的问题还沒有来，那末，还有时间，我就先讲几句咯　就讲“百花齐放，百家爭鸣”吧！好不好啊？（鼓掌）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上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是关心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

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爭鳴”，咱们共产党员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有沒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就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有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內。

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吗，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爭工作。阶级斗爭，还不是建设工作。阶级斗爭就是要推翻几种制度，就是帝国主义、官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那些制度。那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爭范围。打蔣介石、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里还有一个民主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爭范围。那个声势很大，是不是？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前年下半年跟去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一方面。这个斗爭时间很长，它从我们祖宗鸦片战爭那个时候算起，一八四〇年，从那个时候反帝国主义算起，算到一九五〇年，就一百年了，到去年——一九五六年，就有一百一十六年之久，才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讲所有制，现在我们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国家权力机关、军队，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斗爭。在过去作这个斗爭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谁人相信共产党能夠成功呢？开始有共产党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中间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中间我们经过失败。经过北伐战爭时候的失败，后头，土地革命的失败，经过两次很大的失败，人们都不相信的。现在呢？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人们说共产党有这两门，还可以考赢了。还是帝国主义考赢了？跟我们考，跟我们比，蔣介石，国民党跟我们比，谁比赢了？谁胜谁败？我们赢了。你赢了嘛，那就算嘛，赢是好的嘛，你赢了嘛，还有什么话讲，那好嘛！建设呢？历来人们就是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面革命，一面建设。我刚才是讲为“主”，阶级斗爭为主，不是讲沒建设，还是有建设，这一方面，我们是不会。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作阶级斗爭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什么设计、施工、安装，哪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教大学生，大学教授我们就很少了。在座有沒有多少大学教授？（起立向台下问），有沒有？大学教授請举手！一个都沒有？有沒有大学教授？总得有几个吧？（台下有同志举手）一个，那里有一个，少得可怜啊！同志们！（黃火青：有的沒举手！毛主席又回原座继续说）有几个沒举手？是啊，你们势力不大，你就不敢举手。

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有几不行就是喽！这个话怎么样呢？你们听得到沒有呢？同志们！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话喽！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沒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就是象斯大林犯错误一样，斯大林不是有三分错误有七分正确吗？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文学艺术方面，优势还是共产党以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

的，医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一方面。

他们讲得对，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我说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不能领导，这是对的，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沒给讲。为什么也能领导呢？我说就是我不懂請你们干嘛！国民党也是不懂，“蒋委员长”蒋介石他也不懂，国民党那个党对刚才讲过的这几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也是做阶级斗爭的这个党，他是专搞阶级斗爭的，他就不搞建设。我们一面搞阶级斗爭，这七年搞了点建设。他搞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我们搞了七年，今年八年，有多少吨钢呢？可能达到五百万吨钢，按照计划四百一十二万吨，可能超过。也许不到五百万，就四百多万吨。那么他二十年只有几万吨，我们八年有四百万吨，这就是说我们搞计划，此外，财政部给 饭给这些人吃。国民党一无计划，二不给饭。同志们！不吃饭我也不能讲话，你们也不能听，科学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是要吃饭的，国民党有饭不给那些人吃，他专搞阶级斗爭，给军队吃了，给那些政客吃了。我说李富春，一个李先念，世界上还有这两个人嘛，一个管计划，一个管财政，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上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一条什么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阶级斗爭，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爭基本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爭，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爭，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加以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花几十年时间。象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爭一样，阶级斗爭谁会呢？沒有哪个人会的，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当小学教员的，进共产党也沒有想到，相信资本家对我们宣传 的那一套，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相信那一套，后头，大概是逼上梁山了。你们各位呢？老早就打定主意了，母亲生下来，就当共产党？是不是？交代任务就是共产党，我妈妈沒有交代这个任务给我，那么是学的，是不是？什么土改，也是不会，各种都是不会的，打仗也是不会的，打了多少败仗，经过多少变化，跟着经验的增多，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爭。是不是？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学习阶级斗爭时所付的代价少一些？因为我们付的代价很大，有几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万里长征以前的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白区也沒多少工作了，那是因为“左”。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是因为右。阶级斗爭右了，后头是因为“左”。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学会了。所以陈独秀，王明（陈独秀就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后头这个人也死了。王明还沒有到敌人那方面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都给我们很大的益处。不是他们个别的人，而是他们领导的这个运动，在一个时候失败了。这给全党以很大教育，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那么代价是很大。现在我们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爭也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一闹嘛——去年十月一闹嘛，我（说）是闹得很好，有些人很

不高兴这个匈牙利，我是很高兴。坏事就是好事。匈牙利还是闹好还是不闹好？无所谓闹不闹，总而言之是要闹的就是了，一个脓疮总是要穿的喽！我看可以争取，因为我们曾经学过阶级斗争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学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不搞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曾经付很大的代价呢？不是搞左倾机会主义吃的亏嘛，搞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吃了亏嘛，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少的少付代价，可以避免象匈牙利那样的事情（有些语句不通，原文如此）

现在我们好好的想想，很需要想一想，有这么一种情况，作阶级斗争结束，这么一件事。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比如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缺点，人们不大看得见，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懂，我们在建设方面，科学，办学校，这些事情人们要原谅，人们比较原谅我们。社会上现在那个戏不唱了，×××，有没有？那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戏不多了，有还是有，在座的有军官，有军事干部，如果没有戏唱，还要他们干什么呢？当然还是有戏唱的，但是现在不唱，叫做养兵千日，现在还没有听见炮响，于是就把现在社会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有了，因为这个锣鼓，阶级斗争的锣鼓，热闹得很，自从去年上半年锣鼓喧天，以后“八大”做了结论，那么这个东西就浮到上面来了，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摆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就更加要求我们了，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同志！我也有一套本领叫阶级斗争喽！哈哈！你们不要老是看我们不起吧！老子也是干了几十年的哟！”（笑声）但是我们老是讲这个话，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人们，承认你这条。他说你政治行，军事行，你是干了几十年，你是辛辛苦苦，那是没问题，功劳簿上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同志啊！现在大学教书是怎么教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开刀啊，我是没学呀！中学怎么办呀？什么科学问题怎么解决呀，原子物理，什么东西，工程师、设计、施工、安装、运转，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远须三个五年计划，至于还要有十五年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学，需要时间，那么能不能学到，我看是一定能学到，没什么巧，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我去开刀，就是象一个相声讲开刀一样的，一定会当那样的医生就是了。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有没有人学呢？现在有人学，我们还要派人去学。比如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十五年，有十五年他毕业的时候，还有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所以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阶级斗争，那个容易学习呢？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学习。总比那个打仗，比那个肃反，象那个肃反，看都看不见，你说没有，又有，你说有，他又没写名字叫反革命。抗美援朝打美国人那样的仗，事实没有多少把握　美国这样大一堆，我们拿这么一个指头去打他。我看还是就要是中学毕业以后进五年大学　以后出来做五年到十年工作，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就可以当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　开刀也可以。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些变化，大概共产党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　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到。那么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他们学点东西，只要我们态度好，不摆官架子，不摆那个老子多少年，革命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不把这一套摆出来，我们把这套装起来，因为那套摆得没有意思，什么几十年嘛，那个是历史家去写的。我们每天见面就

把两句话讲完了，老子革命几十年，此外，就沒有了，就等于沒有干一样，因为那个事情完了嘛，那个事情基本完了嘛，阶级斗爭的问题。咱们现在来讲科学，你有什么长处，我跟你学习。我懂不懂呢？我是一窍不通。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那你过去干什么去啦？那么就是因为过去搞阶级斗爭喽，就是忙一点喽。这样子答复一句那可以的了，就是少年失修嘛！少年失修，所以不懂。现在你可不可以教呢？有些教员还不那么爽快的哩。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請教，他会教的。我说从前拜师付的时候要烧香，又磕三个头，现在天津还有沒有啊？恐怕也还有吧！还有磕头的？（黄火青：不磕头了）不磕头了，（黄火青：订师徒合同）订师徒合同。现在磕头这一災难免了，我说假如要的话，怎么办？一定要那个规矩呢？还有要磕三个头才教我们，磕不磕？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我说咱们应该磕三个头。你要学本领嘛，那他的规矩是要你磕头嘛！头现在是可以不磕，但是诚心诚意向他学，要尊重师付啊！要尊重他啊！要努力学啊！这也相当于磕头了。这个精神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党里头是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还是装滿了过去那个几十年，新的风气沒有养成，沒有事情就是，你们这里是打麻将还是打纸牌啊？或者是看戏，或者是跳舞，横直是沒有事情做，沒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沒有把我们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面去。这是一般喽。至于在学校里头，在工厂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凡能学的，你能学那么一部分也好，了解一下内容也好。你完全不懂，你又要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就是无怪乎人家说我们不行了。你完全不懂，你学，你又要摆那么一套架子，这就不好了，应该学习。百花齐放，关于艺术方面，这样的方针，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则特别显著。百花齐放，百家爭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这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来的花不好看，这个花有毒。百家爭鸣，说是共产党只是一家，其它九十九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爭鸣。是两家爭鸣。无产阶级一家，資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爭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資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資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爭。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資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資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資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資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在共产党这一家里头，有沒有爭鸣的？事实上有，历史上第二国际这是一家，头上顶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沒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讲有修正主义，不必去讲，好象我们是有个修正主义派别一样，现在沒有。但是过去有，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后头王明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同志们知道不知道？第二次，就是打日本初期，抗日初期　那就是修正主义。现在钟惦斐不是写了篇文章吗？关于电影问题，否定一切，对于过去的成绩。另外有些同志就肯定一切，看不到缺点错误，人家批评不得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陈圩、马寒冰，一月七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　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看到外面锣鼓喧天反对我们，就是不得命令自动出去作战　这个自动出去作战的这些人们，他们是有一股精神　他仇恨那些看不惯的那些东西，应该承认他们这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天津有沒有这样的事情　你们可以找一找。“左”的右的，肯定一切的否定一切的　这是两种片面性　把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肯定　不加分析，这个

东西不对，以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拉科西就是这样，斯大林就是这样，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这个人，他作了许多事，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这个房子什么人盖的，也还不是我们盖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还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嘛。他是两方面都有，又有教条主义。一切搬苏联，我们必须学苏联，苏联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学，错误和成绩这两方面，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那一天提过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是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的就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的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政治去领导吧！国家计划去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对这些错误的议论，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那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记着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简单的方法）×××的办法（指镇压反革命的办法——记录者注）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对付阶级敌人呀，对付那些有血债什么东西的那些人们，就出去砍了吧，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我们习惯了。搞了几十年了，在阶级斗争里头，其实也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喽，但是因为是对付敌人，我们很有一股劲，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这么许多人，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这是另外一套。我们要经过学习，他们是对的，辟如科学、技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而学习是完全可以学到的。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技术上领导他们。至于各种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也是这个方针，不能“军法从事”的，×××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只能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的，都是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而要改造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经过说服的过程。这些议论完全没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呀，胡风怎么样呀，胡风不是抓起来了吗？那是国内他搞秘密的小组织，胡风这个人还活着的了，总有一天要把他放了的了，坐班房坐了一个时期，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满了嘛。但是呢，胡风的思想并没有死，在社会上，胡风的思想活在许多人里头，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譬如宗教，马列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这两个方法里头取一个，还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去想要压一下，这个压么就不服了，压不服的人；只会把问题压得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再来个，他挂笔账，共产

党犯了错误。你对美国人打过三八线，你用压服的方法，那是对的，反革命你用压服的方法，是对的。对国民党蒋介石、地主阶级使用压服的方法，你为什么用压服的方法对付科学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脚住，我们就输了，所以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说服我们又不会说怎么办呢？问题是那么就学嘛。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叫化子打狗，叫化子你们叫要饭的，他打狗是专门技术，“叫化子打狗，操习一门”，我们乡下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们是不了解的，不会应付，不会说理，我们要学会说理，要学会写说理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老子就是一冲。曾经有过一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是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他说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文章来有说服力。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也就是极少数人是仇视我们的，也不是特务，但是他是仇视我们的。许多人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了一点，但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这里头包括共产党员，我们党里头的同志有一些，但是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的，还不懂，你看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嘛，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的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可见得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发行《参考消息》在座的同志都看过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么多吧，有呀。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了，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尽义务，一个铜板都不要，给他出份报纸来骂自己，共产党无代价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我每天都看，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呀，现在要扩大发行三十万份，可能有一百万人看，发到县一级范围看的，城市到什么一级呀？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这是你们市委黄火青同志告诉我的），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一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是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敌对力量作斗争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那么我们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具体问题的情况来解决。对百家争鸣没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列主义，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蒋介石那样的“老干部”，他们也是“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可是批评不得呀，因为他们的脚是站不稳的，我们本钱大。这个地方没有摆一摆——摆一摆几十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天天挂在面上，说老子干了几十年，但是人民还是

知道的。老干部就是那样容易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你们都是老干部啊，有沒有新干部啊？大概也有吧！现在专讲老干部，我看是吹不倒的，普通的风；除非是十二级台风，十二级台风可以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要吹倒老干部我看也还是不行。十二级台风要吹倒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不行，新干部也不行，只要他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是要有点风吹一吹，要刮点风。这房子沒有风扇哪？这是因为冬天喽！到夏天得搞点风扇，大概夏天人就要有点毛病吧。我们用洗脸打比喻，你们是三天洗一次面还是一天洗一次呀？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去研究它，不去研究为什么人们要一天洗一次脸，有的甚至一天洗两次，这个就是因为有灰尘嘛！既然这个皮肤不仅与外面是一条界限——"三八线"，它是与空气接触，它是"黄河为界"，它搞了一付面孔，它而且是个排泄机关，皮肤是个很大的排泄机关，它排泄那么多东西，人的面部我看周身就是它最脏，因为它有七个洞，出了些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排泄机关，因此每天要洗。那么党就不要洗吗？党也要洗脸。毒草不可怕，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爭，使我们发展起来，这就等于我们种牛痘一样。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现在不是提倡种牛痘吗？牛痘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微生物，种那么点东西放在人里头，使你两个人打架，就产生一种免疫力量，以后就不出痘子啦！出了麻子就不出麻子了，因为他产生了"免疫"了；一辈子不害病的是很危险的。有个人写文章说我讲什么东西，说是小毛病什么东西，我是讲这一辈子不害病的人，就是有一天他要害病了，就是危险，就是了。因为细菌病毒钻他钻得太少了。经常害病的人呢，那些人比较牢固，因为他作斗爭嘛！无产阶级思想他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爭，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爭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爭鸣，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爭，来比较。百家爭鸣，互相竞爭，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头。

在山東省級机關黨員干部會上的報告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題目，我只讲一个題目：思想问題。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　譬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祕密，我给你们交換意见，你们记人就忙了　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沒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沒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去年以来就比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

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比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看得出象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一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家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笑声）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跟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仃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象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

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道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笑声）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起来怎么得了，（笑声）要請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的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請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沒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那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夠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沒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不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为請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一

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有沒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笑声）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夠，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夠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爭辯，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那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岗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搞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內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內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沒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沒有这两个东西，一沒有基本群众，二沒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是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內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內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的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內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爭的办法。

是不是可怕？人民內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沒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辯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眞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內，十几年到几十年內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眞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眞理是跟错误作斗爭中发展起来的。我们

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好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笑声）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条。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就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夠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笑声）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面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笑声）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的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笑声）有些当了付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請我到班房里面去，（笑声）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笑声）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笑声）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

们已经学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請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仔主义，要克服官仔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笑声）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笑声）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笑声）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笑声）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笑声）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仔主义。官仔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笑声）官仔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吗，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仔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那一个胜那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

爭，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沒有最后胜利，还沒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資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資产阶级要看，小資产阶级农民要看，城市小資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爭谁胜谁负，那个胜那个敗，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現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爭，資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爭，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現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題目叫作思想问題，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頑固的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面，就是資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辯証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爭，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現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头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資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資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資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資产阶级学校，受过資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沒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他并沒有讲这一句話的，（笑声）他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爭逼上梁山，我那个梁山叫井岗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眞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眞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滿，根本反对我们，有沒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眞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沒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蹓一蹓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沒有改，根本原因是資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錢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題上，眞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資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資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資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資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爭取他们。要知道現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

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个了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面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吗。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笑声）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

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二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积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这批人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根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整风是用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跟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

整顿三风，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仔主义。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附带在里头整，比如贪污的问题，政治机关里面有贪污，特别是基层，合作社、厂矿里头的贪污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减少，革命意志衰退这个问题。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拚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拚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茶碗里头的水叫茶。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用手形容全场笑声）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滴眼泪也不出，一接触到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笑声）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据说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三天不吃饭，我们说三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个礼拜不吃饭有点危险就是了。（笑声）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这样一些事情出来了。这也算人民内部的矛盾。双泪长流，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有一个戏，叫《林冲夜奔》，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請看：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你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洒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洒几滴泪，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笑声）要吞下去。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实际上是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是革命同志嘛，要奋斗，一万年也要奋斗，有共产党要奋斗，沒有共产党那时消灭了，那时总要有领导者，总有一批管理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总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替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仔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个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大民主　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　如果一个小还要少　再加一个小字　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　下点毛毛雨　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仔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刚才柯庆施谈到，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爭，从事阶级斗爭。而这个斗爭，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敌人的统治已经被推翻，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旧制度。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爭，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爭。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爭还包括阶级斗爭。我们说阶级斗爭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些沒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爭还要延长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爭，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沒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去年四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讲到一条敌我问题，一条是非问题。在那时候还沒有说到阶级斗爭基本上结束。到了去年上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沒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许多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并且解决得不好，矛盾也会转化成为对抗。虽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还是说得很少。我以为我们今天应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比较好。

比如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但是会经常有，因为官仔主义这个东西总会存在，我们要整风，要解决官仔主义问题。凡是出了官仔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闹出了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成是普遍的事情，不应大惊小怪。应该看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直到群众一闹，才解决了，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闹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提倡闹。不闹而解决问题，经过民主集中制、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主张，实行这个主张，就需要反对官仔主义。如果有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官仔主义十分严重、十分顽固，群众不可去提意见，而上级又沒有及时发现、纠正，把

那个领导撤掉，那么，那里的群众就会闹。在这样特殊情况下，闹一点事有什么要紧呢？无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党内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右有“左”，在敌我矛盾的问题上，右的观点就是看不见敌人。现在不是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吗？有些人，就把基本解决看成完全解决，因此他们对那些人民痛恨的很坏的人，真正的特务，真正的坏人，也不去处理，这一种思想然当不对。夸大了也不对，夸大了是“左”的观点。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有些人却说还沒有，说阶级矛盾很大。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以为太平无事。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跟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爭的，后来又跟资产阶级作斗爭，人民怎么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过去沒有设想过人民会有不满意，沒有设想过群众会对我们游行、請愿、罢工、罢课，现在也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一种情绪。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怕。出了一点乱子就是不得了，天下就要大乱，人民政府就要倒了，就算起了龙卷风，我们共产党会不会吹走呢？人民政府会不会吹走呢？马克思列宁主义会不会吹走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所以沒有什么可怕。不如此如果在客观上真有事非闹不可的形势，让闹反而比压着不让闹好些。这样一种看法，同志们考虑考虑，是否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大约有百分之几。这两部分人合起来，据有的同志估计，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跟我们有敌对情绪的人。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跟我们还能合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怀疑的。这样一种人大概有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状态的。他们了解一点马列主义，但是了解不多；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容易动摇；至于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就还有困难。他们常说：“你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党当作他们的党，象多数工人贫下中农那样。从他们跟工人农民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列主义的，他们到工厂里头、农村里头去看的时候，跟工人、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看是看了，但是有距离，互相不能成为朋友，不能谈知心话，也还是“你们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跟工人农民不是一条心，但也不是两条心，而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爭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各个世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爭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来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新的人生观还沒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向他们说明　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工人农民就沒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已在农民。除了这两种人。第三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本身性质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沒有别的方向。你们还能提个地主方向　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那些力量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丧失了社会基础。至于几亿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进入了集体化，现在还叫小资产阶级就不行，他们已经变成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

当然他们的思想还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富裕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严重。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思想。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只剩了一条尾巴，尾巴无论有多长，终究是要消灭的。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现在还流行着一种舆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这个话有沒有理由？我们说有一半理由。在现在，党员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确实很少，一般地说来，我们现在还确实不懂科学。我们的人不但沒有时间也沒有錢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还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也不让我们留在城市里研究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搞政治可以，军事也行。其实，这也只是现在的话。在以前我们沒有胜利的时间，在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说，他们那时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总之是成不了气候。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因此在我们在科学上还沒有占领领导地位的时候，要他们承认我们可以领导科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只有一半对，另一半他们就沒有看到。我们现在显然不懂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在用国家计划领导着科学事业，用政治领导着科学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又是在谁的领导下工作呢？而且，科学也是跟政治、经济一样，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既然可以学会政治和军事，也可以学习科学。如果说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学习科学达到一般专家的水平，就不必用这么长时间。进五年大学，再加十年工作，有十五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吗？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这些想法对不对呢？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基本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个方针更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的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对于说错了的怎么办？用压服的方法，还是用说服的方法？中央认为压服的方法不好，压服就是压而不服，不可能压服。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的方法，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只适用敌对分子。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说道理，是可以学会的。用了说服的方法人家还要闹怎么办？会不会搞的天下大乱？我说不会，只要我们坚持说理、充分说理，不会乱的。而且

也不要尽是忙乱，出一些小乱子有好处，我们可以取得经验。对于那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我们同那些有毒素的东西作斗争，会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同敌对思想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我们自己的缺点首先要整顿。我们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有许多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的。不应该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最主要的，正确的东西。同时也绝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就是机会主义者，肯定一切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肯定一切而不加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们要进行整风。

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实行。采用延安那时候的方法，从容不迫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学习一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仔主义的缺点，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批评是在小组内，不开大会，有多少毛病就是多少毛病。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自己反省反省，同志们加以帮助。总之，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整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有十几年没有进行全党范围的有系统的思想整风了。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自己来批评我们自己的官仔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丧失威信？我看不会丧失威信，会增加威信。延安那次整风就是证明。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得到了教育。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害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了自己。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方面。我们把风整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东西就更多，我们的本事就更多。同时也就会更谦虚一些，原来不会说服人的就会慢慢的增加说服人的能力。党外人士，可以让他们自愿参加。我们先整，他们后整。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就很好了。

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的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的热情有些不足。注意待遇，注意享受的人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使这些同志重新振奋起来。经过这么长久革命斗争，有一点疲劳，需要一些休息，这是可以理解的。看一点戏，跳一点舞，穿一点花衣服，这并不需要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追求地位，追求特权，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可以节省，应该节省的都要节省。阶级斗争，几十年革命，都是为建设开辟道路。而要建设，就必须珍惜人力、物力。建设的时间长得多，这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中国比现在要好，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一仗就是为了这一仗，那个战争就是为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更艰苦，时间更长，比方说至少一万年。为了建设得更好更快，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铺张浪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跟党外的关系，应该比过去更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

必要的，沒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会不会妨碍党的领导？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象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我刚才讲的一些话，说是闹一点也可以，登一点错误的文章也可以。我们慢慢来批评教育，讲道理。这两种提法是不是互相冲突？文章上讲的原则性，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灵活性。要灵活地运用原则。不然，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沒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沒有道理，无论党政府（原稿不清）都不实行官仃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沒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在南京部隊、江苏、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叫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虛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虛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爭——阶级斗爭，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是阶级斗爭；对官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爭，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爭；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爭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爭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爭。但是合

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

所以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築，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那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

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築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改变另外事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沒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沒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鎮压过的，比如象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沒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

关 于 思 想 工 作

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沒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戶，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請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脫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

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

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夠，沒有机器，沒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沒有生产，沒有生产就是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产就是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为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沒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沒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沒有粮食，现在还是沒有粮食，还是不夠。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象他一到了世界上，样样要象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 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請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仔主

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人头要落下地。你打倒官仃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沒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是有点官仃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沒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請愿，就帮助了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沒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沒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象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沒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那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沒有粮食，沒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沒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爭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沒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　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請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沒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沒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沒有解决得好　他为什么不闹呢？請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

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仔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仔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夠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百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

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带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

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你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它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铁，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铁，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作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

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象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不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主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的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它。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象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仔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　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仔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象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象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請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沒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沒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样。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尽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沒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沒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沒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沒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一个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心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不成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

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溜一转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廊，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样，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象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它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仔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的比较好，有一百五、六十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难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在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

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把剩余的精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在学习里去了。

有一些同志，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拚命”精神。什么叫“拚命”？水浒上有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拚命精神，有那么一股劲。现在这几年就慢慢地有一些同志劲头不大了。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象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饭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做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据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作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军队里头怎么样？今天军队里头的同志很多，平时的政治工作和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各种制度，一面实行这些制度，一面还要上级和下级打成一片，跟士兵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他们有批评，比如开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讲得好，他在“三反”的时候，在华东军区，说是我们专制了几年，现在让人家向我们专制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的，现在让下级向我们说一点话，批评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是可以的。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硬着头皮，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他们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做点报告，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三、四条，然后让同志们发言，补充一点，批评一下。有功劳的，人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的。战士们对连排长，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我们曾经做过，结果是有益的。军事里面的民主，军队里面的民主，这样不因为我们有军衔制度，有各种制度，而使上下、官兵以及军民、军队跟地方这个密切的关系受到损失。毫无疑问，上下应该密切，应该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官兵、军事干部跟战士们，应该密切地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应该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不要靠官职，靠职位高吃饭。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几十年，都是真的，可是有一天，你办了一件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谅解。你解决的事情解决得不对尽管你过去做过许多好事，职位有多大，因为你今天的事办得不好，你对人们有损害，这一点他不能原谅。因此，我们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来吃饭。靠正确，不靠老资格。你还是靠正确、还是靠资格？靠资格就吃不了饭，因为你搞的事情不正确，你解决问题不正确。你虽然有资格，但是人们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索性都不靠资格，还是一个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老爷架子不要摆。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不摆官仔架子，不靠老资格吃饭。这一条，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新干部他们没有这个包袱，他们比较自由。他讲“老幷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夠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爭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它有前途，其它阶级都是向它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它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幷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幷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爭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爭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义，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在上海局杭州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四月）

（思想问题讨论时，毛主席插话，整理成五个问题。）

一、最高国务会议、宣传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情况：紧张空气比较缓和，党外知识分子初步和我们接近起来，犹豫情绪比较开朗，报告不是万灵药，还要用各人的药，要的东西不给他们，就处于被动，给了以后，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先整自己，把党整好，整得谦虚一些，讲道理。现在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知识分子左派向我们要民主（放），学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时就要求救于我们。我们一放，他们自己就鸣起来，我们一紧，就向我们要。

民主党派，上海去年发展一万一千多，他们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只有无产阶级不怕政变，错了，就改。他们中间问题就多起来了。

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不清）月，我们想一想。陈毅同志三反时说：我们专政专了这么多年，让人骂一个星期也可以。问题是你倾盆大雨那样向我们倒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对。共产党威信高，报上只要一二句话，风吹草动，就有人怕。党外怕，党内也怕。事情对，也要谦虚三分。压力大，自己要懂。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我们现在让人批评，以后再去分析。知识分子象惊弓之鸟，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党内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后来看了事实，才相信。要经过许多考验，共产党的政治要受考验，领导者要受被领导者的考验。过去知识分子为旧统治者服务，现在生产关系改变，没有社会基础了。知识分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识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们现在爬在我们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让他们做事，帮他们吃饭。我们还要用十几年洗脑筋，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他们想不要批评，说不出口来。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们的脑筋是旧的，没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们热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化，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的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脱了皮，但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不可能改变。……考验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考验他们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二片。下乡不能和农民说真话。党内的官仔主义者世界观也成问题，脱离群众。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张打出去。改

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这是有领导的反官仃主义。凡是不让放，毫无准备，结果大放。我们主张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阵。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的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满意，比将来或比现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只要去睡觉好了。现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现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错误，长期不批评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见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香花中间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问题是新问题，干部还没有试过，试一试，试出味道来，顾虑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讲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吗？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闹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的，应该让干部去工作中试一试。

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骄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错误大，没有自我检讨，没有威信。错了，紧张一礼拜，检讨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问题，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名我。

巴金说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论者是不怕的。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是站不住的。

鲁迅墓搞个运动坊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钟惦棐代表两个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论……可以变成循环论，但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辩证法。这些人无非要我们倒霉，我们就想得更坏一点。现在好象右了一些，但说服群众，不能简单化办法，对闹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处理过分了，不行。谁说要牛鬼蛇神？是群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应该让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说不开除闹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们应该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们比较，很好。他们是在掘坟墓，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請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这点应清楚。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幌一幌，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爭鸣，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规模政治斗爭已基本结束，八大做了结论。这个方针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很深。我想是说没有一条沟，没有界限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沟，有沟，就脫离群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没有万分之一闹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仃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脑筋，否则就只说专政，说集中（即压）。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锄草，批评错误要有说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资格。

对敌讲力量，对人民讲理。没有理，不会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资格，讲势力，是很危险的。

没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也行，苏联就没有。听不到反面意见，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没有农工。要给他们事做。

两头团结，中间批评。没有批评就是右倾。钟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没有批评。

《文汇报》上批评要全面分析，这批评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讲真话，有缺点就说。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讲一些党的缺点。我们要打倒民主人士，他们就反起来。虚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这是国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线，不应当有一道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见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诱敌深入，也可以讲，不讲是不民主。让讲又是诱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们野心要大一点，知识分子有五百万，要争取他们。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社会存在不能否认。社会存在有反革命，我们就要肃反。民主范围内的问题早已存在。火烧红莲寺也要采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么行？江丰、莫朴搞辩证法，为什么不要国画？只搞单干户？夫妻也要配对呢！老干部要考虑，过去是一套办法，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新民报》看了几张，不是黄色报纸，软一点。不能领导科学，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請教，刘备还要請个诸葛亮。党外人士讲话是考虑过的。有时有错误，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不要说死了。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问题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对，我看没有黄色，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写文章要有逼，毛骡子没有人骑不行。领导、选报、准备、说服力、有利、五个条件。这么多条件，只有说服力比较具体，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条主义。

对党的政策能否辩论，《人民日报》的文章组织都对？陈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有些难办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有二百多××反对，可见是少数。报纸上也不能天天打气。一年开次会，春夏秋冬。文教事业是教育人民的东西，要经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影厂有人说力爭香花，不出毒草。这精神不对，我们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

片面性。要求党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为辩证法专家，一万年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从自己谈起过。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远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该争取三分之一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可以跨党，领导人员不要入党，六年之内搞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稳步。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如果组织上关门，那是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高尔基只读二年书，孙中山也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养的。

教育上摇摆不定，有道理。没有经验，摇几次，就不摇了。初中教材中，应当有历史、地理、文物等等。过去中小学就学外国文，应该学。初中课太多，应该砍掉三分之一。学校教课怎么百家争鸣？应以一个为主或几个为主。

肃反检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过去的不查了。

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这句话不对。

节育问题。马尔萨斯结论不对，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国节育要看省份。江苏人多，东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劝说不要早婚。

一千年还有革命，我说过，但不一定。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将来不叫国有化，是球有化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被推翻。现在已有个别的乡政府、支部。

五、领导问题

要改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共产党的责任。不怪宣传部，要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领导，还要看文章，要看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分期。人家锣鼓喧天，第一书记什么都没有看，怎么解决？有人说，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养成习惯，慢慢就有兴趣。党内也要讨论，讨论没有时间，不讨论也会没有时间。有人把“百家争鸣”唸成“争鸣”。不懂要接接班，周瑜二十多岁，程普五十多岁，大敌当前，谁挂帅？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诸葛亮初时不被重用，后来用了。那时能破格任用，现在为什么不行？去年评级，有人意见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碍。当兵的没有文化，可难，可也要业余学习。现在是打另外一个仗。各级的将、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备。各级干部要学会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不然，大将出马，耍了两下子，枪杆子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学党委会要改组，接受干部任务完了．现在可调出来，有个把留在校里搞搞事务，“百家争鸣”，不要去当校长。

要做宣传工作，逼上梁山讲，要到大学里去讲，先与教师、学生谈谈。今天不讲，明天不讲，今年不讲，明年不讲，一万年不讲，怎么行？

高教部长、宣传部长、党委书记都請去讲，总比政治教员好一些。

定息问题。企业性质改变了，两重性质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灵魂还在。定息搞短搞少，长期留一个口实，不合算。现在一年还一亿，还十年，将来还一千万。他们不要求取消，我们就还下去。小的资产阶级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后总归自动取消。

六亿人口中有缺点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可以不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

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胡风、铁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就脱离群众，这也是帮助的一种办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点办法，不怕发表，要驳他。

各省要交流经验，不要不相往来。

在接見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接見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會代表時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沒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無党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沒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过去好象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蒋介石四百万军队，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也沒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就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

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仔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劳动。这并不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示一种态度，要砍掉官仔主义、主观主义，加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农民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现在你们作了官了，不理我们了。过去合作社主任不参加劳动，很不得人心，群众很不高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现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群众马上同他们讲真话。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比方在南方打秧锄草并不困难。当然，年老的有病的可以不去。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那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马寅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主席：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三分之一，即一百五十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就很好了。今后学习都要自愿学习，自己研究，可以自愿结成小组。关于辩证法的课本要一年编一本，有些过时了，旧话要新讲。世界观是长期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要转过来为新社会服务，他们有的是旧的世界观，有新的世界观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快的时间内就有很多人相信新世界观是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估计十年之内，还会有三分之一多一些三分之二少一些的知识分子还会有旧的世界观，但这些人一是爱国，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了。有些教授讲课讲马列主义，这是为了吃饭；但对自己讲，就说自己并不相信辩证法了。上海有一左翼教授说，解放以来“魂魄不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教

社会科学的天天处于被动，历史要重写重教，在旧社会教书拿出来就行，一个课本可以教多少年，又没有这么多的会议。自然科学家好一些。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仃资本主义早已推翻，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了，个体所有制也破坏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长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向工人过渡的。解放时产业工人只有五百多万，苏联初期也只有三百五十万人。社会前进不决定于人数，农民有几亿，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前进不前进，农民最后都要变为农业工人，合作社变为国营农场，这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毛要附在一千二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皮上，毛脱离了皮是不行的，总要在一家吃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脚（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一经地震，他们就悬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说小资产阶级出二元论，资产阶级出一元论，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社会风气，如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影响，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课本可学，但课本就是课本，思想还是思想，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变的。条件反射，生孩子本来不痛的，就是社会舆论说会痛就痛起来了，要变痛为不痛，要医生作许多工作，要另外一种条件反射。不要相信所有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都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的是民主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准备。原河北省付主席薛迅就反对统购统销，主张自由贸易。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卷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分复杂，由五百万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起算，已经百余年了。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剝削者与外国剝削者的斗争。单就最近几十年说，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

阶级斗爭，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什么学，譬如阶级斗爭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沒有。这是经过多少年犯错误作检讨学来的。阶级斗爭，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爭，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爭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爭，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办？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章中就说过了：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爭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党的成立到七大（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了许多挫折才学会阶级斗爭，现在学建设的新战爭，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有些党派专家多，如民盟、九三，民建也不少。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阶级斗爭结束，向自然界宣战。现在还在过渡时期，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经济基础还沒有巩固，打这个仗，要几十年，大概要二三十年。因为我们无经验，无干部。有苏联经验在前，可能我们比苏联略好或略差或一样。搞得怎么样，大家要看，我也要看，不能吹百分之百正确的牛皮。有人说共产党朝令夕改，特别是高教部。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就要变，今年基本建设就变了二十几亿。预算头年十一月就需要确定，提到人大常委，十二月就要发下去讨论，一月就要生产。提到人大是实际上的事后批准。缺少经验，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验，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沒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属于经济方面的。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点）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同志们：

你们好。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这里同党内的同志们讲过一次话。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这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人民觉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仗嘛！当时我们是料到这些事情的，我在这里就讲过，不过当时沒说过烧火这句话，而是说人家批评，我们要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以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就加以批评。我们总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全世界也好，全国六亿人口也好，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工商界也好，学生也好，工人、农民也好（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多数人都是好人。他们的心都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

十以上。比如这一次，以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教授与学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百分之一，只有七十几个人。经常闹得天翻地复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他们组织小团体，什么“百花学社”、“爱智者学社”、“黑格尔——恩格斯学社”、“孔夫子——毛泽东学社”，后来觉得还是不大妥当，还是叫“百花学社”。学生的“领袖”名叫谭天荣，现在是全国有名的人物了。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人后悔了，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开放？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那些牛鬼蛇神出来，怕它干什么呢？那时，我们讲不要怕，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如×××等，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怕天下大乱。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们是跟我们一块儿的，用不到怕。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打我们，他们用口骂，但是不用拳头打。至于那些极少数的人，譬如刚才讲北京大学学生中，百分之一不到的右派骨干分子，另外还有百分之一、二跟他们拍拍掌，拥护他们的。教授付教授中间，情况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左派，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中间派，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一些同志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少数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河南的“杞人忧天”，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怕天塌下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小组长、班长、学校里的校长、教授、助教、讲师、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包括我们在内，都是领导人物。我们这些人，总有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就是要把我们烧好。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毛病，包括我在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要定期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荧，五年再荧，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火烧二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就更好了吗。我们不是讲要锻炼吗？锻，是打铁，炼，是高炉里面炼铁，平炉里面炼钢，炼出来的钢还要锻。那个汽锤可厉害，我在苏联看见过了千吨的汽锤，一万吨的汽锤。我们这些人也要锻炼。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时讲锻炼舒服得很。“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但真正要锻炼，他就不干了。这回应该锻炼一番了，虽不是万吨汽锤，至少也有五千吨吧！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这是二股风，一个是大多数好人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他们批评共产党的缺点，要共产党改。另外有极少数的右派，他们是向我们进攻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该的，攻得对，这是一种锻炼。右派进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还是要感谢右派的进攻。对于我们党、对于广大群众、各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农民，右派对我们的教育最大。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他们是要打倒我们的。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有一群，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

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沒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展开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沒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命从清朝的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爭、抗日战爭，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爭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夠，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以后重庆谈判，旧政协，南京的谈判，这都是辩论。蒋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內，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有人说报纸沒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爭的工具。这句话讲得不对了。至少在这几十年內，全世界帝国主义沒有消灭以前，这样讲不好的。报纸以及别的东西，如哲学、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部分，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也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些，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唯心论也多，而且自然科学里头也有许多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你若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是照实际情形亦事的。你讲社会怎么改造，共产党怎么整风，他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说要整好共产党，他说要消灭共产党。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听不说，说几个星期內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长一些，自己一句不说，我们也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也不通知支部干事会，也不通知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清华大学党委会內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內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搖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敌人方面，也很高兴。我们把右派一包围，事情就反过来了，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来揭露他，不是起义了吗？还有一些右派也要起义的。现在右派也不好混了。

几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讲话，到今天不到一百天，时局起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斗爭主要是政治斗爭，斗爭的性质是阶级斗爭。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爭，这一次主要是政治斗爭，不是军事斗爭，不是经济斗爭。思想斗爭成份有沒有？有，但政治斗爭占主要的成份。思想斗爭还在下一阶段，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员也整风，经过思想斗爭，提高一步，眞正学习马列主义，眞正的互相帮助。主观主义有沒有？官仔主义有沒有？眞正用脑筋想一想，写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就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斗爭还要个把月，右派分子尽是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不好办事了，也沒有那么多东西登了，右派就是那么多。登得也差不多了，以后就阴登一

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沒有就不登。七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七月到了八月就要和风细雨了。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而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的。他们说共产党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即使我们从前搞的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在内，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地前进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那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他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以前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说和风细雨，天天下黄梅雨，秧菽烂掉了，粮食就沒有了，就要闹灾，不如急风暴雨简便。现在是夏季，是暴雨天，到了八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沒有多少东西可挖了。

我们中国历来受到两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跟反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又是第一个大好“教员”，从前有清朝、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以后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沒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教员不夠。我们有许多话，中间人士不听，要另搞一套。譬如“团结——批评——团结”他就不听。譬如讲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又不听。譬如讲民主集中制，他又不听。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又不听。讲要联合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他又不听。还有一条，他特别不听，就是说“毒草要锄掉。”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他出来。让大家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长出来，就要锄，农民每年都锄草。锄掉可以做肥料。这些话讲过沒有？还不是讲过吗？可是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锄草，就是跟他讲话，可是，草根本不听的，它明年还要长。锄了一万年，一万年还要长，一万万年，年年要长草，认为毒草是我们，他自己是香花。因此，他并非被除之列。他要把我们锄掉，他就沒有想到他正是应该锄的东西。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沒有辩论。党内沒有辩论，社会上也沒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都基本上改了，但是沒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的《伦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传下来了，“十五贯”也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两千张，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只有几张，吃丁等。大字报是沒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沒有阶级性。白话文沒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也有话剧，资产阶级也有话剧，汉奸也有话剧，抗日时期也有话剧。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并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所谓一个时候，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只有那么一点。所谓硬着头皮，也就是那么二、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不是讲要锻炼吗？人生在世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鍛炼。并非真的把你送到高炉里去烧。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得到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很多

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归根结蒂中间派都是好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想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有点象。无产阶级争取他们做同盟军，一个时候也有点象。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是，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的批评是借着这个事来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刚才讲大字报，是方式的问题，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是轻武器，象文汇、光明日报，还有些别的报纸，是飞机大炮。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的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领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感，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仔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仔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了一个时候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整风，为什么不好？

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一条路，走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条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三个问题要搞清楚：革命的成绩、建设的成绩问题、几亿人做的事，究竟做得好不好？将来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要受那一个党的领导？还是要章、罗同盟来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搞清楚。共产党内有一个路线问题，就是那些“起义分子”。那些“起义分子”是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对他们来说这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路线。我们历史上有一次教条主义是形成路线的，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打上一锤子，火这么一烧，它也就软了一点。各个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里头不是在讲下楼吗？不要国民党作风、老爷习气，合作社主任下田同群众一起耕田，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这样官仔主义就大为减少。出大字报、开会、开座谈会，把应该改正的，应该批评的问题，分类来解决。再学点马克思主义，提高一步。

我们中国民族，是个好民族。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既集中统一，又是生动活泼；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该提倡讲，应该生动活泼。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

没有罪。不受整，不给穿“小鞋”。“小鞋”要给右派穿。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你们游水不游水？只要一百天，每天一小时，不间断地搞，你本来一点不会游水的，保证你会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个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学不会，人民就象水一样的，打譬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象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认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你们这些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可是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工人阶级决定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有个资本家讲的，我是引伸他的话。他讲的跟我讲的意思不同。他说自己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说我是资本家？还说我是剥削者？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仃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合作社了；官仃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要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請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高。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那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他就知道不对，用不着写这么长的文章。你看谁的知识高？还是

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攻，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是有用处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他们这一回头又帮了大忙，给我们当了“教员”，教育了人民。他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我们并不准备把他抛到黄浦江里，还是要治病救人。也许这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末也好，那就带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现在多少年纪？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坚决不改，巩固得很，这个堡垒攻不破，也就算了。尽攻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气，我们现在要办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了得。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让他带到棺材里面去见阎王，他可以跟阎王说：“我可是有骨气，我是‘五张皮’的坚持者。我跟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中国人左翼、同广大群众作过斗争，要我检讨，我都抵抗过来了。”可是现在阴间的阎王也改了，阎王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恩格斯，第三个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地狱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狱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这些人到阎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讲的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整理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

（据新北大“雷达”战斗队翻印稿翻印）

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谈到工商界）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

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导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场。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的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的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那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功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象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戶，退了一万戶，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挖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阶级敌对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象张轮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斗 ，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象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作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市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万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以上是7月17日上午会议上讲话）

（谈到打右派）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待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斗爭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那个地方烂，崩溃越多，那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谈到区、乡、社整风问题）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象胡老头一样、罪已诏千万不　下。

手工业社脫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眞是太多了，应该成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錢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沒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以上是7月18日会议上的讲话）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報時的指示（摘錄）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要青年学生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沒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摘自《毛主席关怀我们》一文，《中国青年》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二期）

在八届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国两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仃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只是在党内作斗爭。当时有两条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剝削，是无产阶级革命。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沒有问题的。

一九五三年在财经会议上提总路线，开始还不敢在全党宣传，先讲到县一级，五三年底在政协上讲开了。跟着宣传部起草了一个总路线宣传提纲。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这句话也沒有说错。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权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沒有完全解决。

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映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看到（那时还是提了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爭，这种阶级斗爭沒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的好，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复这不好。现在应再按青岛的讲法说他三个月。

工人中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党内的三大主义也挂在资产阶级賬上。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暫时不在报上讲。讲了有无可能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冲淡了；另外是內部的官仃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任白戈讲的，可以从理论上写这个问题。

劳动人民內部的关系——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个人与集体、青年与老年、工人內部等矛盾，是大量的东西，突然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否会影响鳴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响劳动人民內部吵架。

人民有两部分，一部分剝削过人，一部分沒有剝削过人。受资产阶级影响，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过几百年后就不能再挂在资产阶级賬上，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斗爭。大规模阶级斗爭基本结束，矛盾基本解决，说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问题。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势力的问题大量的还沒有解决。个人主义、官仃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上层建筑，也得解决。

去年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不利。以后鳴起来了，就好办了，取得经验就好办了。我们提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他们就放出来了。过去资产阶级是服服贴贴，现在是大吵大闹，我们提鳴放，右派提大鳴大放。我们说在

文学艺术和学术上鸣放，他们要发展到政治上。今年共产党与右派合作找出一个好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形式。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鸣放的。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论人民矛盾正是防止采取压服的办法。

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

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在报纸上不讲，继续宣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加这两字，免得引起许多麻烦。

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解决，一提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将影响整改。

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有区别。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是非对抗性的，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中心问题是三部分人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对抗的，如和章伯钧等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对待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采取剥笋政策，每年剥一点，今年剥了一些笋皮，但是剥不完。有两年不宣传社会主义就出来了。以后还要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没有错误，但是没有青岛的一篇就不够。现在主要问题不是封建残余、帝国主义残余（矛盾还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谁也不说话，但捉一个章伯钧就有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家属三千万，是大问题，工人阶级三口人家，最多四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间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问题，批评问题。我们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资本家还有公民权。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同盟军。所以地主爱文汇报，是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现在六万（一作五写——编者），将来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应该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现在明确：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地富反坏赞成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人赞成资本主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是经过长期斗争来解决的。“主要”和“基本”是一个意思。

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现在矛盾，将来也还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为国营农场发薪水的时候，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由两部分组成、公有制、集体制，将来二者也要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基本适合，也有不完全适合的地方，还有缺点，讲完全适合不对，斯大林提完全适合，就出了问题（报告第十四页）。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但是还要修庙，修庙是为了达到毁庙的目的。为什么说大体适合呢？因为可以发展生产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万吨钢，我们增加四百万吨。我们的制度不妨碍生产力发展。几十年后，集体与国

营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到共产主义价值法则不要了，军队不要了，当然也要国际环境许可。八大决议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但也没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是没有讲清楚，带语病的性质，没有认真的讲清矛盾，是比外国、比将来，这句话现在也不必改，现在可不谈这个问题。列宁讲过苏联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现在不讲，以后解释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讲，说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许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说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说法不好。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领导方法，基本上有两种，按照一种方法领导，我们的事业可以进行得多快好省，按照另外一种方法领导，我们就会进行得少慢差费。

不仅革命工作有两种方法，建设工作也有两种方法。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是个正确的计划，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这个计划能否再进一步作得更好一些？看来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如果一方面充分发展大型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中型小型企业，一方面抓中央管理的企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速度就可能更快一些。现在看来，我们能否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三年恢复时期加上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年产纲一千八百万吨，甚至两千万吨呢？如果我们的方法正确，经过努力，有此可能。

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两种方法。不进行斗争，不反对少慢差费的方法，多快好省的方法就不能实现。我们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还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是一个多快好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促进派”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应当作促进派，不作促退派。由于有了这几个东西，一九五六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多用了点錢，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场供应有某些紧张。这个缺点并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一九五六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结果就影响今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这个经验教训很大，不能不接受。总之，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总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要批评纠正，但是要在保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批评纠正，既批评他们的缺点也批评我们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派”，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

我高兴的是这个会上有同志讲到“多快好省”的口号。

多和快有了好和省的限制，就没有弊病了。多和快，就是要求多办事。好，就是要求质量好。省，就是要求少用錢。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錢，那么，多和快就没有毛病了。当然，“多快好省”应该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不应该是主观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在主观主义的条件下，总应该尽可能争取多一点、快一点。

中國共產党八屆三中全會总結時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一、这次会议评论一下究竟开的好坏？省委书记说很好，怕有的同志，不一定这样看法，开的很长很累，有些同志害了感冒，我也感冒了。恐怕成绩是主要的吧！交換经验，明确方向，统一意志，有很大好处。这次会议有两天没有参加，发言也未看完，我打算全看一遍，有的要看两遍，也怕你们沒看完，希望你们也看一遍，这次发言有很好的经验。这样的会有必要一年开一次。我们是大国，工作复杂，一个也要开一次这样的会，省、地、县、区四级参加，加一部分社主任，中央明年打算一部分县委书记参加，我建议一年一次。去年未开吃亏了，来个右倾，工作松了劲（因开八大，无时间）。一年一次大概需一个月时间，各省可开一次四级干部会，把问题批清楚。

二、整风讲几句。湖北提“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的口号好，广东南方日报用这样的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很好，还说要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认真的放，也得认真的改。反右上了轨道，不必提大胆的反（主要是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省、中央也还要放，但主要还是要改的问题。今年整风创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即几大：“大鸣、大放、大爭、大字报”，现找到了这种形式，过去是找不到的，不能产生的，层层辯论那时不许可，因而土改打伏不能采取这种形势。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政权是巩固的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适合阶级斗爭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事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风也好，建设也好，都可以用辯论形式解决。不仅与中间派一道，也与右派一道，农村与地主、富农一道，上报，骂的狗血淋头，“党天下”、“下轿”等，这是好的形式，容易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过去也有扎根串连商量，连长与战士平等友谊的谈话，这是民主的传统，无此传统是不可能有“几大”的，延安整风是写笔记，开小组会、反省，大家都感到帮助很大，搞了几个月，那次克服了主观主义，以后三查三整，三反五反，扎根串连都表现了一定民主形式。但大鸣大放和大辯论，这种更大的民主形式则是这次产生的，找到了这种形式对党的事业，克服官仔主义，命令主义有极大的好处，这是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要传下去。社会主义一定要能充分发挥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别的阶级是沒有的，在此基础上实行集中，就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巩固的集中制。民主是为着加强集中制，而不是削弱它。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只有几千万，专政靠几亿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贫苦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以巩固专政，加强集中。

三、农业。四十条修改后发下，在农村中希望很好组织一次辯论。提高认识，作出规划，省、地、县、区、乡、社我都问了一下。省、县、乡、社应该作出规划，专区和区也要作规划。这六级要作，抓紧搞。全面规划（即计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去年下半年不大强调了。这个老口号，现在还要强调做，何时作好规划？我问了一些同志，有

的已做好了，有的还未做好。是否在明春，省、地、县三级做好，或明年“五一”前做好，不行就在明年底，这是长远规划——十年至二十年，定出后可能不完全合适，做了不合适将来修改，总是要修改的，大概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有规划比沒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二十世纪速度快，不要照旧历书行事，最多也是廿一世纪初就可以达到，我看农业生产，地也不要那么多，有人就好办事，每人有几分地就夠了，三亩地有些多了，当然还有节制生育，我不是奖励生育，各级规划都要到农村去讨论，规划很多，可分级分批的去讨论，粮食已有底，大小口平均四百斤就夠了，种子、饲料不在内，湖南湘潭地委发言说，有一家七口人，每人五百零九斤，只吃四百斤，每人还余四百零九斤，南方四百斤稻就可以了，河北只有三百廿斤，三百一十斤，二百八十斤，豫北辩论的结果，过去富裕中农才吃到三百六十斤，还大喊大叫不夠吃，餓死人。要很好的提倡勤俭持家，节约才能积累，国家、社、家庭都要积累，否则都吃掉如何能富裕。今年未受灾和收成好的地方要坚决做到“以丰补欠”，多搞一些积累，湖南提出搞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在外），全省共六亿元，不是平常的生产费，而是买肥料修农具，内有28％的基础（山区、平原不同，有多有少）即每年一亿二千元，这样做到很好，你们看可以则行，不然扣多了，就无优越性。管理费一定收缩在1％之内，以之增加到基层上面。要教育全国每个人要有志气，有远大目标。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情况会大变，要看这一点，大吃大喝不算什么志气，还要勤俭持家，大约有十年就好了，你死了还有儿子、孙子、红白喜事应该少办，棺办农民大概还要的（我们中央的同志死掉烧掉，已经签了名的，要火葬否自定），但要节省，慢慢来，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解决，也搞个十二年规划狠狠改一改，要不要賭博，也只有通过辩论，改变风气。关于除“四害”我是有兴趣，但无人响应。同志讲的不多，幸喜有广东省韶关地委乐昌县搞的好，已做出榜样，消灭“四害”，把卫生搞好，这是文化，要提倡，两双筷子吃饭很好，可是费点竹子，但这样对手工业有好处，就多做生意。我提议：从明年起，两年试点、五年普及，三年扫尾，行否？或者三年试点，五年普及，二年扫尾，两头小，中间大，各地可参差不齐。我对这四样东西很感兴趣。中国要变成四无国好不好？过去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三无，“即无政府、无家庭、无阶级”。将来无政府是可以实现的，无家庭几百年之后也会不存在的，家庭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现在生产单位已不是了，条件全部改变即沒有家庭了，大概需一千年，现在首先搞“四无”，把“四害”除掉，使我国变成高度文化的国家。

人口节约，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还有各地搞规划，有个综合规划很重要，即工农商学（无兵）的计划要结合起来搞，不是各搞各的，請你们看浙江的文件，红安县的经验很有用，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同志都搞点试验田是好办法，我也很想搞点试验田，县、区、乡、社干部各搞一块试验田，这样搞技术就摸底了，无业务不行，要学点，内行光政治不行，工、商、农业都要懂点业务。今天讲的是农业，也搞个十年规划，十年，技术业务都要熟悉。我们不要先红

而后专，一定要又红又专，现在的干部是先红后专，有些红也不红变成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不专。有些人提出先专后红，这是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不要，但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知识队伍，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就是说的技术，业务是可以学的，五十岁也可以学，不要胆怯，问题是在肯学，我们能的就是红星旗很红，政治上行，技术还是不行，右派和我们争的不可开交，说服不了人家，所以还要学。组织科学技术队伍，省、地、县都要有计划。十年内党委就是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都要有计划变成专家，百年树人，现在要减少九十年，要十年树人，在北方十年树木不行，树人是可以的，无此一条，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建设不成的，我们已解放八年，再十年，即十八年树人，基本上造成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技术队伍，以后就是扩大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再有十年，即二十八年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缩短二十年，行否？这是可能的，因为有苏联的经验。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同志讲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动摇，在此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建成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光说现代化工业（其中包括现代化农业）还不够完善，过去宣传工业是对的，今后要着重多宣传农业。

四、两种方法。凡事至少有两种方法，才能有所比较，一种是比较差的慢的方法，一种是比较好的快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好快的一种，如修铁路，一般都要选择几条路线加以比较，最后才确定。如大鸣大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要大字报不要？大字报哪个好？这里都有比较。不要大鸣大放总是放不开。北京市有几十个大专院校没有一个顺顺当当放得开，做了许多工作，一次两次会最后逼上梁山，不能不搞，否则引火烧身。过去革命也是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摸到一套正确方法，进步比较快了，建设有两种方法两种政策的，也可以有这样那样，如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些国家不同方法，我们可以选择做参考，但比较起来，苏联的建设道路是最正确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经验甚少，苏联已经四十年经验，我们只有八年，苏联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是较完全的，将来还会有错误，当然成绩是主要的。苏联比我们强，我们要学习苏联，学习有便宜，不学习有损失。学习有很大好处，不学习有很大坏处。特别在我们反了教条主义后，学习苏联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学习对我们只有利而不会吃亏。因为苏联的经验最完全，比如人造卫星，现在大家都说它行，过去中国就有人（龙云）说它不行，美国也看不起它，可是他就放出了这个东西，五天了还在转。我过去也不相信什么人能到月亮去旅行之类的宣传，现在相信了，因只懂社会科学不懂自然科学，我不是专家，只红不专，现在看来，月亮可以去，金星、火星也可以。他们说五年到十年可以去月亮，我现在如还不相信，那就变成顽固派。但是，是不是可以将苏联的弯路撇开，比苏联搞得更快一点，质更好一点，苏联从一九一八年底才有四百万吨钢，再经过二十年只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达到二千万吨钢，这就说明我们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我主张今后小钢厂多开一点有好处，比如二、三十万吨，三、四十万吨很有好处。

五、去年扫掉了，把多、快、好、省扫掉了。好省没人反对，但多快不提了，实际上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好省是限制多快的。不象卫星跑的那样快，不切实际的多快，即不可能多快，那不能搞。但反过来，好是好，省是省，就是那么一点点，慢得要死，那也不行。我高兴的是这次会有个别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完全的口号。我看要实事求

是，要提倡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现在要恢复这个口号，你们赞成吗？还扫掉农业纲要四十条，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促进会。我们有许多委员会，最根本的是共产党委员会，究竟你是个促进委员会，还是个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去年二中全会组织个小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亿，就只能在这点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错误，也就是说，不可过分强调反冒进。因右派是促退派，我们与右派的根子不同，我们永远是促进派，要促退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如农业发展纲要上的六百万部双铧犁被促退了，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我是始终坚持的。

六、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七、八大决议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爭，八大分析是指生产力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夠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这一套。在群众中间创造了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方式跟历史上有所区别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风，也有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点怕。后头有一个三查三整。三查是查历史，查工作，查思想，三整是整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新华社社长范长江就下不了台，整了他两个月，然后才翻身。因为发动了群众。三反中间有多少个部长下不了楼，后头我们摆了梯子才接下来。从前军队里头，在战爭时期，依靠战士们，依靠当地人民，沒有那个地方发响，沒有那个地方创造枪炮的工厂，就只好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军队，地方都形成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整个革命时期，就沒有现在这个大放，大鸣，大爭，大辯，大字报。三反五反沒有搞大报。三查三整沒有搞大字报。再上去，延安那个时候出了一点大字报，我们也沒有提倡。这是什么理由？我想或者是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蠢一点吧？恐怕还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打仗，阶级斗爭那么尖锐，内部又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现在就不同了，那样的阶级斗爭已经过去了，基本上结束了，全国和平了，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形式。这种革命的内容，它要找到这种形式的，现在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设，而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

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虽然有几怕，主要是两怕：一个就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你们胆子那么大？我就不那么十分相信。因为我们有许多人也是怕乱的，你说我一点也不怕乱呀？各民主党派是不是也有一点怕乱？还有一个是怕下不了台。当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这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好说了，比如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学校，开了多少会才放开。北京大学的江隆基算是愿意放的，也开了多少会。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人，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比如冯雪峰，他是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冯雪峰是个共产党。其他的人就不要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多数，要相信人民中间的多数人是好人。应该讲，工人多数人是好人，农民多数人是好人，资本家多数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共产党，青年团，应该相信多数，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的。所谓多数，究竟什么叫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就叫多数呢？不是这么个数目，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现在全国，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这个事，什么人都是生的，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是搞好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破坏封建阶级所有制，买办阶级（蒋、宋、孔、陈那套人）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可以过来。某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热心，但是他可以过来。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么一个雇农叫刘介梅，报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饭，后来翻了身，发起来了，现在当了区长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这个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社，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他开了展览会，痛哭了，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愿意改。他是湖北黄岗县的，在那个县里开个展览会，他就当指导员，分两个阶段，要饭的阶段，同后头发起来的阶段。象那样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开除党籍，因为他愿意改嘛。民主革命可过关，而社会主义这个关就有些人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关，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多一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这一年是一个高峰。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洪峰？象每年七、八月，八、九月间，黄河的洪峰要来，以后这十五年是不是年年要来洪峰，你们水利部要筑堤，（笑声）我看恐怕不是那样，这个峰越搞越小。六亿人口中间，出了十几万右派，也是很少。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们许多同志摸了这个底，有人说百分之十五，有人说没有百分之十，只有百分之几。大概百分之十可靠。对于社会主义，按他本心是不赞成的，这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于个别的贫农、下中农、工人，刚才讲的刘介梅那样的人。六亿人口中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有六千万。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他看小了。在这上头，我们就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一个同盟军是在农村，有贫农、下中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刚才讲，有人说百分之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插话：是中农里边的百分之十五）我是讲全国人口，我跟一些省委书记摸了这

样一个底。但是所谓坚决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的，很坚决的，可能要带到棺材里去的，他就不改，什么社会主义，他不听，月亮还是美国的好，中国的月亮差一点，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刚才你（指×××）讲了，三百万人里头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二，全国人口里头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如果集合起来，那是个很大的军队，如果他手里拿了枪，那是一千二百万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不会大乱？因为它是分散在这一个合作社，那一个合作社，这一个农村，那一个农村，这一个工厂，那一个工厂，这一个学校，那一个学校，这一个共产党支部，那一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他不能集合。所以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把地主同买办这两个阶级不算，那两个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仃资本主义吗？帝国主义在外国，现在我们已经赶走它了，在国内就有一个封建主义、一个官仃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同买办阶级，那是一个革命对象。这一个革命是在什么范围之内呢？是一些什么阶级发生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样三个阶级。

无产阶级数目很小，但是他有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同盟军，就是贫农、下中农。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下中农是中农，是有产，但他是比较苦的，这个数量，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体占百分之二十。现在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两可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也有分化，地主现在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因为这几年的教育，出来了一部分不闹粮食，赞成统购统销，赞成合作化的地主，富农也出来了一部分。不要以为现在的地主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富农都是反对社会主义，资本家都是反对社会主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事实不是那样，要加以分析，这里面坚决分子是大概百分之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多数。你看，百分之九十嘛！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手×××同志讲了，他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呀。地主更没有威信。买办资产阶级是丧失了威信的。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威信了。比如农村的富裕中农是有威信的。因为富裕中农生产是比较强的，贫农赶不上它。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不是说过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吗？的确是，你那一样都是缺不了他，没有他，不能开学校，教授离不了他，中学小学教员离不了他，办报纸要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这个阶级人数不多，几百万人，连他的家有几千万人，大概有三千万人。听说真正的资本家七十万，不包括家属。知识分子可能有四、五百万，我说一共打他六百万，五口之家（因为他们比较富裕，生儿育女比较多），五六就是三千万。这个阶级比较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自己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来，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大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比罗隆基高明。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

同他们的知识分子，包括中间派，他们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是不服气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实际上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但是这里头就要分析了：右派是对立的，非右派是半服半不服。不是讲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是右派有这个思想，别人也有。总而言之，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就非搬外国去不可，无产阶级非上月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他都说你不行。我说经过这一次辩论，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那个文化不高明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讲本领，贫农不如富裕中农，但是讲革命，就是他们行。这可以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多数人完全可以说服。资产阶级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我刚才讲，富裕中农只有百分之四十是赞成合作化，有百分之四十是动摇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不赞成的，这个动摇的就可以说服他。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这许多人，多数人都可以说服的，用说服的方法，不大服气，慢慢他就会服气。我看还要过若干年，大概经过十年。比如对苏联总是不服气，现在放出一个“月亮”来，好象又有点行了。（笑声）在苏联也是经过这个阶段的，说共产党不行，这样不能领导，那样不能领导，现在他们早已解决了，革命四十年了，我们还只有八年，所以难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可以下台嘛，无非是三大民主，有则改之。

在这个基础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在这个时候出现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报。我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没有这个“大”字。去年×××有一篇文章，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是没有那个“大”，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右派也可以用，中间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右派不利。问题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这样大鸣大放的口号，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说，等于演话剧一样。从前抗日时期，北方有个新民会，是那个缪斌在这里搞的。缪斌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改组派。缪斌他后头当汉奸了，搞新民会了，他们搞话剧，报上登了，在太原演话剧，来赞扬日本的皇军，反对中国人。那么因为汉奸演了话剧，我们就不演了吗？我们还是要演。还有旧诗，黄老你是专家，这个东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写的那几首诗里有什么“××××乱横行”，什么东西，他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那个时候我也说，这种人不要十分去追究他，那个时候他那种思想，就是要写一点诗骂人。我也很赏识他那几首诗。（笑声）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当然，右派是下不了台。但还是可以下台的，右派总要下台吧。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是一分为

二，两点论，一部分右派将来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永远戴下去吗？从此不得翻身呀？我看不一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总理：劳动改造。）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听说她很愿意干那个事。那种人，娃娃，二十八岁了，也不娃娃了。自己撒谎说只有二十一岁，确实有二十八岁了。进青年团进不了，她就不高兴。现在孤立起来了，在学校里做点工作，劳动改造。那是个别的人。但是你要费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吴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我们的干部许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将来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没有做过工，没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们，要你黄炎老、陈垣先生、张文伯都下去做苦工，（黄炎培：家里头做做也可以）老人不是说："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吗？（笑声）这些话我们过去都说过。当然没有现在说得这么透，尤其没有摸这个底。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一下底，一方面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用我们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波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他要封一个报纸，我们不需要封报纸，我们只一篇社论就行了。《文汇报》写了两篇社论，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第二篇社论就自己攻。《新民晚报》是自己攻。赵××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搞得很好。他说实在是犯了错误。我说，你犯了错误，你改了，就行了。《新民晚报》很小一个报，你们都不看的？这个报值得一看。在波兰不行，他要封一个报纸，封这个报纸，就惹起来来了，不晓得这两天结果如何？（总理：还没有完。）他那个问题，总而言之，还没有解决，他是反革命没有解决，右派问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两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

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各位听了是不是吓一跳？因为你们许多人又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虽然少，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八年以来增加了八百万，不要看这么少一点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全部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至于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是过渡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要了，这个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慢慢变的。我在四月三十日就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然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那一次主要问题是讲这个问题，讲阶级起变化。这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说进了工会岂不是变成工人阶级了吗？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了。学校里的教职员都进了工会，钱伟长不是工会会员吗？钱瑞升不是工会会员吗？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赏识他们。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们改造一下？比如费孝通，我跟他谈过，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笑声）他学了我们土改里扎根串联的办法，他一共有两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什么北京、成都、武汉、上海、无锡各地都有，他说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他在那圈子里就出不来，他不仅出不来，他有意识组织这些

人，代表他们大鸣大放。我说，你不要搞那二百个，另找二百个，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二百个，他说不晓得还要不要我。我说，你不讲去调查吗？你再可以去调查，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调查，谁人不要你呢。这是我在六月初跟他谈的。所以有几个右派朋友是好，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了解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都要有朋友，工人要有朋友，农民要有朋友，现在民主党派，大学教授，文学界，许多共产党的作家他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一个缺点。我看要到那里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个地方。在农民中你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当朋友，那个刘介梅你不要找他当朋友，他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找贫农、下中农、找老工人。老工人他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容易辨别方向。所以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从来不悲观的。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不是谈了吗？乱不了。不是讲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师范大学鬼叫一个时候，天下大乱，我看事情就好办了。

整风准备有四个阶段，刚才邓××同志也谈了一下，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风，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字，检查思想，学点马列主义，和风细雨，开小组会，搞点批评自我批评。五月一号整风文件讲和风细雨，许多人不赞成，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用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我们延安那一次整风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要来急风暴雨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贴几千条，那个工厂当局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车间主任就想辞职，就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那时候也对他们讲，要让他们讲，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在六月八号以前，我们一概不驳，充分鸣放出来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鸣放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就是右派言论，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恐怕你们各民主党派现在也有了经验了，每个单位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每一个合作社，每个工厂，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明年搞不搞，明年再定，我们再商量，因为明年搞到五一，下半年再来搞一次，是不是有这么必要，但是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是那么怪的，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界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等于我们扫地一样，这个房子最好每天扫，我们洗脸一天总要洗一回，以后我看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只个把月就行了，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峰，也许那时候要来一点洪峰。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有些东西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

整风的四个阶段，一个是放，一个是反，一个是改，一个是学，这样四个阶段，大概还要搞几个月。

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他们不承认还要改造，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愿意改造，说我们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你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会抽筋剥皮。我们中国许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搞？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老知识分子将来还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什么助教、讲师，他将来总有一天当教授，你讲学问，他说他现在不行，他

将来也可以行的。工程师、科学家，新的人出来了，那么这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非得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必须造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跟资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它没有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他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右派中间那些不变的，不愿意脱胎换骨的，大概章乃器就不能算，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他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你是什么颜色呀，你还不是白色，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起来也很容易，并不困难，你就下一个决心，并不要读很多书，主要是着重在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们不懂这个，我在四月三十号讲的那些，他们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们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张皮而已，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新皮二张也不存了，现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的饭。那个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他还看不起这个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这个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那个时候（四月三十日）我就劝大家，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说这个事情也不容易，比如吃狗肉，我就有这个经验。从小不吃狗肉，我又没有吃过，但是我就反对吃狗肉：你没有吃过，为什么反对呀？你没有经验嘛！你说狗肉不好吃，你吃过没有呀？你何以见得狗肉不好吃呀？你吃都没有吃过你却到处发表意见，说狗肉不好吃，并且把狗肉送到你面前，你闻一闻就跑，这是因为社会上的舆论历来都是这么讲，狗肉古人是大吃特吃的，孟夫子的经济纲领就有一条：养狗。他说：“鸡豚狗彘之富，无失其时，七十可食其肉矣。”七十岁的人才可以吃肉，六十九岁不行，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弱，只有那么多东西。马克思主义，因为过去反对的多，帝国主义反对，蒋委员长天天反，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有一句话，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是说狗肉不适合人民需要，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个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右派反过之后，风平浪静，提出来的许多意见就不肯改了，我看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贴一贴，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要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要学，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个段落，这个，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的差不多，不过没有完结就是了。不要松劲。有些人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将来

还说服他，说几次，他一定不服，你还天天开会呀？摆到那里，听他怎么办。我们采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剥夺他的选举权的办法，对于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分化他，那么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怎么办呢？那也就算了，他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多数人要向前进，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面貌会有改变的。

现在我讲农业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还是那个目的，就是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都没有改，但是有些东西改了，譬如有些东西已经解决了，合作化问题就是基本上解决了。还有，这个条文次序都有些改。还有，过去有些没有强调的，譬如机器、化学肥料这两个东西，过去没有强调，现在要大搞，要加以强调。过几天开一次人大常委同政协常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一下，讨论后就可以登报，拿到整个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今年冬天或者十二月什么时候共产党要开全国党代表大会，那个时候再通过。这是共产党提出的，这是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共产党要提到国务院，国务院再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今年冬天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一点通过明年的计划和预算，过去我们不是总搞在五六月吗？现在要改一下，要提早。同时把农业纲要在那个时候通过。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现在已经开始有劲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开始泄了劲，现在整风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向同志们说，这四十条以及工业计划，文教计划，完全有希望，比较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这里头有些主观主义的，我们改掉就是了。比如农业纲要四十条里头有一个六百万双铧犁，这是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把它去掉了。此外还有些修改，经过两年的实践嘛！但是总的说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一方面它可以吃虫，但它也吃粮食。老鼠就没人赞成它，还有苍蝇、蚊子，是没有人赞成的，名誉不好，现在北京的苍蝇蚊子不很多，但是又有了。过去没有搞蚊子，去搞苍蝇麻雀了。这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把这几样东西也搞掉是不容易的，如果动员全国人民来搞，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三个五年计划搞到两千万吨钢，再有十年就可以了。今年就是五百二十万吨，我们五年增加三百多万吨，拿一九四九年算，只有十几万吨，恢复的三年（一九五〇、五一、五二）就搞了一百多万吨，现在又搞了五年，就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再过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可以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跟打麻将一样，加它一番。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大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得了灭不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

完全错误的。他们沒有信心，他们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是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沒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

至于是不是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不是刚才讲了两种人了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取消，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爷你看我是多么有骨气呀！这是资产阶级的忠臣，他不投降。右派是跟封建残余有联系的，通气的，他们并沒有通信，沒有开什么会，但是彼此呼应，那个文汇报，地主非常高兴，地主就买了报，对农民读，你看报上登载了的呀！他们就想倒算。所以封建残余，反革命残余跟右派，他们实际上是通气的，还有外国跟中国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还有葛佩琦，最出名了。还有美国，他们很不赞成我们反右派，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也讲过的，我说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办？采取什么态度？你们怎么做准备？还是跟它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我不是在二月二十九号的前两天谈过那个话么？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然后不是搞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呢？我们说感谢日本人，我跟日本人谈过，我说你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这个侵略，激发全民族反对你们，提高了觉悟。

此外还有几个文件，就是劳动工资，体制问题，这些会跟大家商量的，要提到人大常委。还有一个工资同劳保福利，这个也要商量的，恐怕先还要去试验一下，作为草案在工厂里头搞一个试点，然后才能夠决定。

右派不讲老实话，我们讲老实话，他不老实，他瞒着我们搞一些事情。谁晓得章伯钧搞那么多事情，这种人我看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部长怎么样？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吧？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个人民代表如何安排？右派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工作总是要有一点工作。这些著名的右派，人民代表恐怕难按排了。丁玲是不是选人民代表呀？人民代表不能选。明年要选举了，明年选举还要跟各位商量选举的名单。有些人，你一点职务也不要恐怕也不好。对右派的安排也是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有些教授，比如錢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当不成了。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当教授。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事情。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人也不摸底，等于我们对于许多地方不摸底一样。这一次，百分之二的坚决的右翼分子，可以在一个时候把水搞得浑，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个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农村看得见底。工厂看得见底，学校、党、团、民主党派，这些都有底。章乃器这些人，你要长期共存，他是短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是不相监督，章罗联盟，对长期共存这个口号最高兴了。一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爭鸣，他们最喜欢了，结果就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对右派的处理问题，請诸位去考虑一下，议一下，如何处理法。

今天是个通知性质的会议。請大家回去研究一下：整风问題，农业纲要。农业纲要会发給大家的。

在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沒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內部，尤其是在同志內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沒有中心，比如沒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沒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沒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沒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沒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这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沒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沒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甚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沒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沒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言宣，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那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國留學生、實習生、使館机关干部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同志们：

我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鼓掌）我们都老得这样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热烈鼓掌）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斗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沒有？（有人答：读过。）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二个阵营，其中有中间地带，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挖它的墙角，那里会发生地震的。我们有十亿人，我们中间也有它们的人，譬如中国的右派。这种人比较少，在中国约占百分之二左右。二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妻子的一首词里所说的：“二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成二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这个比喻虽然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但他们阵营中我们的人多，在我们阵营中他们的人少。

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我们约有十亿人，帝国主义约有四亿人，还有几亿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上分布在三个洲：亚洲、美洲、拉丁美洲。十三亿中七亿多已取得民族独立，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黄金海岸等。还有六亿在那边，如日本、伊朗、台湾、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那一套。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美不合作，这中间地带的十三亿人由二个阵营爭夺，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鼓掌）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什么殖民主义也沒有，也沒有在那里搞军事基地。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热烈鼓掌）又是小国。在政治、人口上是大国，但是经济是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呢！你们大概不高兴吧！（台下有人说：不高兴。）但又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呢！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百年来这次大会是最大的一次，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几天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台下说：不反对。）（热烈鼓掌）这二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转折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二个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起开会，这也是大转折点。这是世界的战争，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暴风雨般的掌声）

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不对，应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就这么一提，好比人民政府在这头，工农群众在那头，资本家在中间，二边一挟就挟过来了。

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伦。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象你们这么大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多列士、杜克洛、陶里亚蒂等。我们那时对于中国革命是怎么搞法，有谁知道？！

我们大家都要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就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大笑）青年人应该具备二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热烈鼓掌）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有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鸣放，就到人民面前去报帐，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你们没有做过工作，不知道。你们去当当厂长、党委书记、校长、付校长、教授、工程师试试看。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八年来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的改。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干部放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农民都说：“老八路又来了。”基层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一有严重缺点，脱离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其中一部分有错误，但可以改正。

我国人口现有六亿四千万，已经不是六亿了。（鼓掌）要六亿四千万人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老的四十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部分有主观主义成分，在新的纲要中化学肥料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召集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话，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又如除四害的问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人建议麻雀不要打，那就网开一面，城里的不打。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回答说：有）四川的老鼠是多得很。北京的苍蝇打完了，过了两年又有了。这个问题也要有决心，大家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这类事情上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

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苏联就会超过美国。（热烈鼓掌）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热烈鼓掌）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高呼：毛主席万岁！）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夫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毛主席的三项嘱咐：

一、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請同志们允许我卽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鎮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爭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恥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

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达，請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告诉我，钢产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請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资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达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請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呵！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象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象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沒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点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条敍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作罗科索夫斯基。作了这两件事情，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沒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沒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旦还沒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作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他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眞的。××××的告诉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爭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了。……

……归根结底，我们要爭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爭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氫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辯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爭，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沒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爭，战爭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爭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爭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敍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沒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就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沒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沒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写了一个辯证法：从小组到全

国。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几个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爭是不是能夠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过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脫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沒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爭，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夠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一桌酒席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作各个击破。

回答記者关于中國前途的談話

记者问：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　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夠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象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在全國宣传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于懷仁堂）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好，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懂得了很多事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上全部解决，某些问题可以解决，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上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我讲，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大变动很久就是。解放战爭，是一个大变动；上溯到抗日战爭，也是一个大变动。解放战爭，推翻蔣介石政府，现在变动更深刻，搞社会主义革命，几亿人口进入这个运动，在几亿人口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又广泛地进行经济建设，办了很多工厂，办了很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事业扩大了，办了很多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办了很多报纸，这在过去根据地的时候是沒有的。报纸过去是有的，五年计划的四年中，特别是最近两年，突然学校、工厂多起来。这么大的变动，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国民党政府发生变化，一个上台，一个下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在土地问题上，一个起来，一个下去。过去被国民党统治的企业，官仃资本起了变化，最近私营工商业，又起了变化。几亿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大的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了一个新制度，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巩固。现在是未巩固的时期，例如合作社，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才能巩固。需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一年，再加上五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起来。不能认为建立了合作社，就巩固了。这是不可能的。建立新工厂都有个巩固过程，办个学校，办报纸刊物，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应该看到，会巩固起来的。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这个前途，应该看到。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多少知识分子，还沒有精确统计。大约的估计，各类知识分子有５００万左右。可以作个粗略的分析，无非是左、中、右，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甚至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沒有优越性，走社会主义，不那么高兴，甚至有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长不长，会失败，或者希望总有一天会恢复到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人是很少数，有人说占10%，恐怕沒有那么多，可能有１%、２%，或者更少一么。总而言之，有这么一些人就是。他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除此以外，９０%以上的人，点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荅复，还不大清楚。其次，有些人对马列主义不那么都习惯，不那么热心，不那么欢迎。但是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列主义。所以在５００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概有１０%左右，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內，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赞成、拥护的。只有１０%左右，或者还多一点，或许少点，这只是一种估计，对５００万知识分子来讲，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也学习了一点，但不那么熟悉，有些人

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来说不同，有许多人，他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在外国人面前，他是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中间状态，是占大多数。少数人是反对的。这种不赞成的人，很长时期都会有的。如宗教家，他可以赞成社会主义，但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宗教存在一天，他们就是有神论者。有些人心里不赞成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不敢公开说，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不应该强迫他接受，应该容许。大多数人当中，赞成的程度也有区别，赞成或者有几分赞成，或者还有一定的怀疑，要承认这种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要求过高，就不符合事实，就会把任务减低，外国有一个马克思。中国怎能出几亿马克思，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们就没有宣传的任务了。我们开宣传工作会议，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宣传的任务，要宣传得好。在几十年后使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的世界观，通过科学研究、生产和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马列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三）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无论办学校，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教育人民的人，都是人民的先生。５００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没有这５００万知识分子，我们一件事都做不好，我们国家的文化不发达，但有５００万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先生要教出许多学生，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科学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作品，报纸，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国家只有三部分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他们有个任务，教育人民的人就要先受教育。尤其是在大变动的时期，500 万知识分子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产，须接受教育。如果说没有学习的任务了，是否恰当呢？有人想："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恐怕是不恰当的。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有学习的任务。共产党员，如果不研究新的问题，过去旧了的不恰当的东西不丢掉，不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道理，那么，教育人的任务就会作得很差了。这一点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就是所有的人，包括500万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说已经改造好了，不对！我看还要改造。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改造，因为，那时，又有变化了，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懂得多的人仍要学习。我看，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别人好心的帮助，而不是强制的学习，人家怕是大会搞思想斗争。欢迎个人研究，小组帮助。只能一面教，一面学，一面是教员，一面又是学生。并且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好的。要向工人，农民，学生学习，要向教育的对象学习，要在生产、工作中学习。

（四）整风。共产党员要准备整风。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来也整过几次，那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样的整风。准备今年开始，中央做出决定，做试验，明年普遍地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时候是要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整宗派主义，不以六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为范围来帮助、团结这些人，不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就是宗派主义；再一个是官仔主义，现在官仔主义相当严重。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要在全国造成一种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与延安那样，研究文件，看点东西，自己有错误，有缺点，批评一下，不管什么人，（包括中央委员）有错误缺点讲一讲，不用大民主，只用小民主，小组会上用小小民主也可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也就在整风中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一步，多学习一点马克思

主义。陆定一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整风运动是思想运动，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有许多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讲到，也没有看到，我们应该不限于他们讲过的范围，可以按他们的基本方针，按照他们的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停滞不前是教条主义。

（五）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除了这两种人外，就没有什么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现在要提倡知识分子下工厂、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下农村，陈伯达、邓子恢两同志到农村住了几个月，很有益处，看了很多东西。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同志下马看了几个月，做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应该下去，应该去，科学技术人员都下去那也不必，他就在工厂，研究人员是实验室的，都去这也不必，但有时下乡下厂转一转，也有好处。家在乡下，从不回家，一辈子见不到工人、农民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十人中有七个人到乡下、工厂去跑一跑，看一看。还有三个人因为年纪大，或是不愿去。有70%的人下去看看，了解情况。考察小学、中学，顺便看看合作社，人民代表，政治委员都下去看嘛，如果能办到这样就好了。也不是今天开了会，明天就70%的跑光，那么合作社就会成灾，新闻记者这么多，他们招待不起。逐步的，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时间，争取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直接接触，看一看，跑一跑，与工人农民一道，混几个月，一年、两三年，在那儿住去，安家落戶，两三年再回来，在延安曾经这样作过，那时知识分子很多，有一个时期，思想混乱，有怪论，闹得天下大乱，后来开了一次会，讲了话，也有一批人下去，就好得多了。知识分子照道理来讲是没有知识的，一不耕田，二不造桌椅板凳，知识分子只是看书，书当然不可不看，可以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光看书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有朋友，还要研究当前情况。现在有些人下去体验生活，有些有成绩，有些没有成绩。工人农民不和他们讲真话。一看"你是知识分子，你跟我又不一样，你是来搞调查的，大概想整我一下吧？"他就不和你讲真话。看你采取什么态度？这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变为集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变工人，这就有可能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按其出身来说，许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我，就进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学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学的。要改变过去的世界观，换成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下去跑一趟，工人和农民不会和他讲真话，我们要造成风气，要有30%，40%，50%，60%，如多少年有70%，十一年之内，有70%的知识分子去接触工人和农民，研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在书上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看到的常常会溜走，等于我们每天看报纸忘记了一样，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学到，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如果这样，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又接触工人农民，在工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有较多的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不只有爱国主义共同语言，而且也有社会主义共同语言。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这样，我看，许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作品也还是不能写好。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少学为好，学多了文章反而写不好"。这是一种说法。马克

思自己说过，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妨碍创作，这是一种抵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他脑筋里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赞成新的东西。这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很长的时间，要造成风气。我们建议文艺上工农兵方向，如果说不是工农兵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延安时都是工农兵方向，今天仍然是，有人说如不是，那是什么？那只有资产阶级方向了。有人说："百家争鸣，马克思一家，其他还有99家"。依我看，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西方世界是一家，我们是一家。还有民族主义是一家，是中间地位。什么叫百家？新闻是一家，教育是一家，新闻中我这样办报纸，你那样办报纸即有两家。办学校，大学一家，中学一家，大学中的家可多！科学院的家可多了，技术人员的家也很多，其实不是什么百家，而是千家、万家，所谓百家，无非是言其多也。我说现在世界上基本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列主义也有几家，马列主义一家，修正主义也算一家，挂了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英国的工党，也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一家。三家。

（六）片面性问题，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种是肯定一切，一种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肯定一切，所谓100%的布尔什维克，不是99.9%，硬说是100%，经过十年的功夫，1935—1945年中，后来一查，"正确"没有了。教条主义外国也有，是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好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有缺点，但是，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仔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我们过去军事时期，搞阶级斗争，有些学问，有些办法。但产生了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领导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有许多事情不能那么从容讨论，要迅速，这地养成了一种作风，只有那么一条经验，一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还用这个办法，那是不对的。特别在军队工作久了的人，容易简单化。现在围剿王蒙的也是解放军，开了几个团，把他包围起来，那不好。

另外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一切。没有一件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是几亿人民的伟大斗争，没有什么好的可说，漆黑一团，使人丧失信心，这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没有困难，也不合乎事实。也不是一切都好，要加以分析。例如钟惦棐揭露了电影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要把他们揭露的加以改正，错误的要批评，正确的要改正，但他的批评是片面的，台湾很欢迎。陈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有的传达错了，说我赞成，我再讲一遍，我很不赞成。这几个同志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不过，有这么一种情绪，是讲毒草务必去尽；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提出来，好处甚少，坏处甚多。据他们估计，成绩太少，缺点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文章里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这个方针的，对这个方针不通，有怀疑。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分析，简单从事，短促突击，人家看了文章是不会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认识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嘛！这两派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片性，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要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其实，共产党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过是代表很多的人，不单是个人

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就没有了吗？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500 万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左”派，有右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带括弧的。也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这也难免，事实上，在工作中，在文章中，不可能不带有片面性。要求写文章不带一点片面性，有几万万个马克思，那里有这么多！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片面性，是过分的，事实上，批评起来，各人站在各人的角度，各人根据各人自己的经验来说话的，但是，可不可以要求逐步多一些辩证法？所谓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也是违反辩证法的。是不是辩证法可以逐步推广，逐步多一些呢？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些问题。这样多的作家、教师、新闻记者、科学家，都存有片面性，那就不好办，所以，承认有片面性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第一；第二，要逐步克服。一万年还有片面性，不然六亿人口，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辩证法家，总不会那样。要逐步推广辩证法，对事物要有分析，文章要有说服力，讲道理，不靠官僚架子来压服别人，不靠行政命令办事，要把做了几十年的什么局长、处长、部长抛在九霄云外。写文章要与人平等，官虽然大的话讲错了人家还是要批评。斯大林的官还不大？有了错误，人家还要讲。老资格，“革命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还不是在桌子底下爬！”或者是“当国民党”。摆出这一套，人家就不爱听。辩证法应该使他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少些，两种片面性逐步少一些。

共产党是否能夠领导科学？人们说：“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爭，搞政治可以，搞自然科学不行。”有些人听不惯，听了不舒服。我看他们说对了一半，现在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他懂，他能夠讲，在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上，你不能具体领导。你讲不出来嘛！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也是针对这些事实来说话的。我说一半对，道理就在这里。一半不对是党既然能领导阶级斗爭，也就能夠领导向自然界作斗爭。如果说，共产党只能领导阶级斗爭，不能领导向自然斗爭，这个党就要灭亡。这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忙于阶级斗爭，现在阶级斗爭基本完结，还沒有完全完结，许多问题都要他处理，说有一百万知识分子入党，忙不过来，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需要几十年，要三、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改变。科学要学会，要花很长时间。阶级斗爭学会，也花了24年的时间，从1921年——1945 年，24 年才总结，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战略策略。自然科学也可能要这么多时间，无非是要进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了，研究一个时期，工作一个时期，也就学会了。象我过去不会作政治斗爭。军事斗爭，也有很多人不会的，后来是逼上梁山，一教就会了。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年纪不大的人，都可以学，还可以调一些人去学习，学生中也有许多党员、团员，有十几年功夫，就懂得了，只要能夠领导阶级斗爭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爭，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再有十年，二十年；是可以学会的。现在科学家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因为你是学生，他是先生。

人民内部的斗爭为主，还是阶级斗爭为主？好几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好些同志一定要讲个为主，我看不讲也可以，似乎讲个阶级斗爭为主舒服些，讲到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似乎不好。恰好我犯了这个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一部分阶级斗爭在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有斗爭，有人说，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好些，不愿说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为详细说明。现在的情况下，是难解难

分的。无产阶级思想之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说，谁为主？除无产阶级思想之外，谁为主很难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爭现在很突出，“八大”已作了总结，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爭已基本结束，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人民内部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也当作人民的内部问题来处理。现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有些时候，可以放在一起讲。你说那些是属于小资产阶级，那些是属于资产阶级，很难划分，一定要分也可以。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扣大帽子。似乎扣大帽子就好办事了，加他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许多文章都是扣帽子，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扣帽子。人总是要戴帽子的，在冬天不戴帽子，在外走不感冒我就不相信。但各人的帽子要适合自己的头，别人的帽子是沒有量过尺寸的，往往检了一顶卽给扣上。

杂文如何写？是否一定要带片面性？前面讲了片面性是难免的，不要那么要求全面，那样是阻碍批评的发表。长文、短文也好，可以要求有不带片面性的杂文。比如，列宁有些文章是杂文性质，很有点象鲁迅，有些很尖锐，很讽刺，谁象谁，不去管他，你能说它是片面性吗？鲁迅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同志的，也有对敌人的。鲁迅的对付敌人，可否转过来对人民内部呢？倘若鲁迅活着，我看是可以的。“不敢写文章，摸不到领导的底子”，我看底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马列主义就是好的。现在的环境不算太坏，不象国民党时期要检查。编辑部要修改文章，但有些人的文章不要修改它。政府也沒有设检查机关。“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方针提出后更宽了，但有个问题，卽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是无所畏惧的，要讲道理，卽辩证唯物论者，是很革命的，还怕官僚主义？我看不要怕。但是也不能否认环境问题，现在的环境还有些人不敢写文章，所以共产党要整风，对“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要整得他们谦虚一点，以平等的态度来看问题，作者与读者都要有平等态度，鲁迅卽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和作者的。眞正好的文章是会受读者欢迎的，眞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清朝末年写文章，有文字狱，如章太炎的“九晉书”、“殊天华”、邹容的“猛四头”，“革命军”，都是人民喜欢的。但章太炎与邹容同时坐班房，当时章太炎是唯物论者，章太炎很有唯物论，写了一篇驳康有为的文章，说“南海小丑，不辨菽粟”，就因此坐班房三年。章太炎有篇文章叫“虮书”，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直接骂康熙皇帝。章太炎的“民报”，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办，我们虽然纸张困难，领导也有缺点，但比章太炎办白话报条件要好多了。现在要改革这个国家，要有这样志向，要有仁人志士，使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好起来。想到这方面，就不要怕什么。又要改革，又要怕，就不好办。也要创造环境，使写文章的人能立志改革，有条件。

（七）是“放”还是“收”？这是一个方针问题。“百家爭鸣，百花齐放”，放了这么久，有人想收。在讨论中同志们不赞成收的，这个意见对。中央卽要放。会不会乱？有些人怕乱，乱卽治，一乱一治。会不会变匈牙利？变不了，变了也不怕，匈牙利变好了，如果我们象匈牙利，有那么多的错误，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帝国主义在那里指挥，该变就变，怕有什么用处。我在1月18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过眞善美，眞理是与谬论对立的，一万年还是会有错误的思想，总是有丑恶的现象。好与坏，美与丑，眞与假，总是相对的，沒有好，就沒有坏，沒有坏，就沒有好，沒有大坏人，就沒有大好人。香花毒草是对立的，毒草长多了，卽会有人把毒草挖掉。眞理是与错误作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斗

爭，总有个比较，是从比较里头发展起来的。社会上好人与坏人的斗爭，好人增多了，坏人就减少了，毒草不怕它多，多了可以肥田。什么叫毒草？我问过布尔加宁，欧洲一百年前洋柿子是不是毒草？他说：是有这回事。一百多年以前的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我讲过耶苏，马丁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孙中山，共产党，这个阶级认为是香花，那个阶级就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认为是毒草，这个阶级就认为是香花。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是全世界人民的毒草。蔣介石是不是毒草？是不是现在有点香了？以前他香过一个时期，北伐时香过，后来他反人民，抗日战爭时期，还喊过："蔣委员长万岁！"是我的老朋友，借过粮食。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物的斗爭，对立的统一，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有发展，沒有即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与资产阶级作斗爭中发展起来的。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可以批评。如果批评倒了，那就该倒。我想是难于批评倒的，批评倒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把人民政府批评倒了，請蔣委员长回来老百姓就高兴？那不会的。所以不应有害怕批评的情绪。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作品，批评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发展时期不怕批评，沒落时期怕批评，如英法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不怕批评，在十九世纪也还不大怕批评，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就怕了。但还能容许肯伯纳这样的人。到了20世纪，很怕批评，美国在20世纪，对批评有如惊弓之鸟。在美国住过的人知道，美国那有那多的自由，他们控制得很严，合乎它的，无伤大局的，还容许一点，罢工不是总同盟罢工不带政治性的个别罢工还是容许的。人民政府刚建立不久，70%、80%多数人都是拥护的，10%的地主、富农、特务反对、不赞成。沒有办法。民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有些勉强，××同志说的话，不太勉强接受社会主义，就是说，有点勉强。经过教育，他们才服。五百万知识分子，和他们有关系的，那么服，不见得。怎么办？有两个办法，有两种政策来领导这个国家；是放还是收？还是放。罢工，就让他罢工；罢课，就让罢课。官仔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沒有，小小民主也沒有，逼上梁山，不罢课罢工怎么行？在那种情况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使90%或者更多一点，99%是好的，官仔主义比较少一点，但1%或千分之一，估计到那一年总有一些官仔主义者。人民对严重的官仔主义者不得已才举行群众斗爭的，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百家爭鸣"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发展真理的方法。"百花齐放"是推进文学艺术事业的方法。牛鬼蛇神，都搬到舞台上来啰，搬一点，也是可以的。搬了几十年，几百年，沒看见毒死多少人，让它再搬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我劝我几个孩子，去取得算命的机会，过了几十年，就沒有命可算了。他们去算了一回，不诚心诚意，又讥笑人家。在杭州，我要他们抽籤，他们到了什么寺去抽籤，有的抽得好，有的抽得坏。我说，几十年之后，你想要体验这个生活，也不可能了。禁止人们接触丑恶现象，禁止人们看牛鬼神蛇，那是不好的。我并不是提倡每一场戏都要有牛鬼蛇神，有一点也可以，让它存在几年，能天下大乱？存在这么久了，中国人并沒有毒死多少。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沒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对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

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犯错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眞理的，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是发展科学的，是使我们少犯错误。是辩证法的。有许多事情，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不会解决，要在辩论斗爭中，才能学会。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只是试答这几个问题。现在是放的不夠，用这样的一个方针，我们企图团结500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又好又不好。好，是爱国主义，愿意工作、学习。但不完全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差很远，接近工农群众，更差得远，对马列主义不熟悉，对工农不接近，这是可以经过教育改变的。首先要求共产党员改变态度，改变官仔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面向500万知识分子，几亿人口。有官仔主义存在，说服与压服，二者必居其一，是要说服。不能压，只能放。以力服人不行，要以理服人。对付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用粗暴。抗美援朝，对美国是用粗暴的方法，对蒋介石，也是用粗暴的方法。我们对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可是我们在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对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有些同志，习惯那种方法，“你还调皮呀！”那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方针。因此，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鎮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八）对各省、市委意见。希望各省市委也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都抓起来，现在沒抓，不是忙的问题，是面对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新问题，关系很不正常。内部矛盾突出，要研究，要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出马，我就是第一书记，陆定一同志把我找了出来，讲了一通。我不是讲第二书记，我是讲第一书记，做了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希望也召集这样的会议，党内、党外的同志都参加，这次沒有解决的问题带回去。这样的会议，证明有益处。过去开会，共产党员开一次，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开一次，各开各的。这次会是第三种形式，党内党外一起开。希望地方召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来。

同科學家、文學家談人民內部關系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对王蒙调查一下，青年人才开始写小说有缺点，要帮助，对起义将领也是帮助。现在有许多作家，和胡风有区别。应又保护又批评，在保护下批评。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生动，生活上的原因，观点上的原因，也不单是王蒙的问题。有同志批评中央附近不能有官仔主义，这个观点不对。为什么中央附近不能产生官仔主义，中央内部也出了坏人。如果照这些同志的观点，写这种文章的人要剧肉。总之，我们对待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在许多同志中未弄清楚。实际上许多人是反对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

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这篇东西，说地点不对，时间不对，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没有说服力，党里面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这是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到一千二百万，还包括有真假，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概念就不对。党的统一战线，党内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再三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一脚踢开。这种办法很简单，是简单开枪，这是国民党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最大量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客观现实。合作社主要的一部分富农中农不满，学校里面百分之八十出身小资产阶级以上，但多数人都不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事物有两重性，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不好的事反过来就是好的。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王蒙小说未写好，需要帮助他在实践中改正，李希凡开始写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多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象骂儿子一样，不应是老人和小人的关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开始批判胡适有好文章的，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自比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这样的人，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　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应该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要如此，党内百分之五　六十不了解这个方针，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好不好？要靠他们搞社会主义，要用适当的方法　使他们得到改造。就是武天保，也不开除他。我们不提倡全国性的罢工、罢课来对待政府，要照顾到历史情况，我们的人民用这个对敌斗争的方法用惯了，宪法是也有规定这种自由。闹事不等于造反，六万万人口每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我看来是正常情况，百分之一的人闹事可能是永远的，至少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内。闹事的人可能也有反革命，不能说都是反革命。闹事中不合理不应苍应，合理的应该苍应。凡是合理的东西　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否则就要脱离群众　“你们都是公家人”，人民没有什么武器，拳头和扁担。此起彼客是完全可能的，是正常现象，资产阶级也允许闹事　为什么我们不允许。

我们的矛盾是临时性的，但是矛盾不解决，隐伏下来不好，冻疮割了好。不能说我们是老革命就不许闹事，国民党也是老革命。

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生长出来，只能从向敌对思想作斗争中并从其中吸取合理的东西，才能生长发展。

我们的危险在于革命成功、四方无事。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和毒草作斗争中成长的，田里面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粮食和野草一起生长，“落霞与孤鹜齐飞”。不能只允许粮食，应该是香花和毒草齐放。

斯大林基本上是唯物论，也有辩证法，但辩证法不是那样多。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

而是一点论。我们同志看事物，应是两点，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最近有个姚文元写了两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教条与原则。我看不能。过去提倡一家独鸣，历史条件限制，不如此不能打倒二十年的一家独鸣。

我们要写东西，要搜集充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有这么多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人，就必须教育，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容易，很简单，这决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产生、发展和灭亡。也许一千年以后，就不叫马列主义了。如果永恆，就不叫马列主义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三个留学生推翻永恆论，推动原子能来个新的革新）

有些东西能推翻，有些东西不能推翻。如地球总是转的。人类总有一天要自己否定自己，被否定掉，总有不适应的一天，变化成为另外一种人，现在人类本身就经过了多少变化。三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纯、青），后来又铁（旧、新）。动物可能反对我们，不会讲话；植物可能感谢我们，互相依赖。马克思未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到不久，社会主义的时间还不长，还无充分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要不断积累经验。

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流就不行，需要交锋，越斗就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特别想到，掌握政权之后，不能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甄子过河。青年人反对官仔主义不那么可怕，因他们还没有当事，官仔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大官仔主义也可以反，凡是怕骂官仔主义的人，就是怕骂自己。

哲学，杜林，黑格尔，马赫的著作能否找到看一看。《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爭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爭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爭。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的，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絲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应当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来说，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

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为“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因为是执行中央的方针犯的，不应当过多的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须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内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70%左右，左派大约是20%，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认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作梦。中间派有一些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他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遍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相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肃反、三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些可能。对于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作梦。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他们反对扣帽，这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和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来多少帽子，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凡是对中间派过去所扣的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肃反中，在三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作错了，都要公开纠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实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1%、3%、5%、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

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强烈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有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任他们。必须给予职权。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是对的就应该接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一遇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完成，我们的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同他们的联系，以便让他们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的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

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包括××大学××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互相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香花与毒草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除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作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二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真伪善恶，有几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請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沒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为左、中、右，未免不合理吧？除了沙漠，凡有群众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理呢？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拿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企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有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的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又是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诫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切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速，党群关系迅速改善，看样子几个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水平，则时间就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人们正是这样希望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性质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嘛！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斗争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

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复。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仔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挂到资产阶级帐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的人民。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挂到资产阶级帐上了。但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湖北有个刘介梅就不是资产阶级，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式。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过去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来看，用后的方法是不行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纸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流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称两条道路的矛盾。右派有多少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是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之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

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一十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多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吗？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58.1—1960.12）

内部学习·不得外传

目　　录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1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2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一月）……6
关于报纸工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10
给《文艺报》编委会的一封信（关于１９５８年第二期《再批判》栏
　的按语）（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10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11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話要点（一九五八年一月廿八、三十日）……17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19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20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21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30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32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35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四）（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38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42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話（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44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話（一九五八年三月）……46
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56
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57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話（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57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話（一九五八年三月）……57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59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61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話（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63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65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录录）（一九五八年四月）……66
对宋××关于苏联专家问題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68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話（一）（摘要）（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69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73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話（三）（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80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84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87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話（四）（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87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話（摘录）（一九五八年五月）……89
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89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90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90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插話（根据记录整理为九条）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93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95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六月）……97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爭宣传等问題）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传达）……98
譴责殖民主义者侵略亚西（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98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98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99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100
接见西哈努克时的讲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101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題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101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101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103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106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108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111
关于主要矛盾问題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115
给××，陈×，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117
接见巴西记者穆里罗·馬罗金·苏烏薩得杜特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117
批评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有很多大方向不对（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传达）…… 118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118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123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126
关于游泳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127
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128
视察武钢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128
视察安徽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128
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129
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130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一八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131
国防部长命令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門炮击再停两星期（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132
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錢学森同志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133

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十月）…… 134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135
在邯郸地区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136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話纪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139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話（摘录）
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141
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143
第三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145
第四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146
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149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話
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150
第六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152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156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一九五八年）…… 156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話
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158
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163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总结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169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靜的头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169
给周士钊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0
第一次接见朝鲜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1
接见金日成时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武汉）…… 171
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2
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172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話（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173
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75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176
对《张鲁传》评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181
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話（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83
给自己诗词作的解释…… 184
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7
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所加的一段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189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89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192
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一九五八年）…… 192
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一九五八年）…… 192

给福斯特同志的回信（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193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話（摘录）（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193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194
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話（记录）（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198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200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204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208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四）（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212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214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話（六）（一九五九年三月）…… 216
党内通訊（一）（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219
党内通訊（二）（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武昌）…… 220
党内通訊（三）（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221
党内通訊（四）（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 222
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223
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223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224
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話纪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224
党内通訊（五）（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27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話（摘录）——工作方法九条（一九五九年四月）…… 221
工作方法十六条（一九五九年四月）…… 229
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話纪录（摘录）（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233
要政治家办报（一九五九年六月×××传达）…… 234
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谈話纪录（摘录）…… 235
七月十日讲話纪录…… 236
在廬山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236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243
对三个文件的批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243
给王稼祥的信（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243
在廬山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244
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245
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
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246
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話”较多的是那些人》
二文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 246
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246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 247
为《经验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前言（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247

对《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248
机关枪追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248
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250
关于枚乘《七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250
附：枚乘《七发》今译…… 251
《七发》简介…… 253
一次讲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 254
对张闻天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255
关于游泳的谈話（一九五九年八月）…… 255
给诗刊的第二封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255
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256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257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話（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257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261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261
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262
对新华社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262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話（摘要）（一九六〇年一月）…… 263
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一月）…… 263
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对一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〇年春）…… 263
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題的指示》
的批语（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 264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265
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的批语（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266
关于反华问題（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266
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268
对聶荣臻同志《关于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268
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話（摘录）（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269
接见非洲外宾时的谈話（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 272
接见拉丁美洲外宾时的谈話（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 275
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的谈話（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 278
同蒙哥馬利的谈話（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281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話（一）（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291
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291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話（二）（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292
十年总結（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292

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29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阅读笔记 …… 297
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話（节录）（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 335
和狄克逊、夏基的谈話（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336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对山西省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338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338
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第四次报告》
的批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39
接见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和古巴妇女代表团时的谈話（摘要）（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339

× × × ×

批评《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一九五八年一月）…… 341
与陈昌奉同志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342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下午）…… 342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343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三月）…… 346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九年三、四月）…… 346
接见十一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记录（节录）（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 348
论中印关系（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348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 349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350
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351
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一九六〇年春）…… 352

在杭州会議上的講話(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象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沒有，粮食沒有，(沒有布疋，就不能換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沒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沒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馬克思主义），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鏵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沒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門，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

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門的负责同志，说話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則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館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

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題鳴放一次，鳴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在杭州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辯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暫时的，不平衡、鬧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辯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园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园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門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題：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沒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滿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暫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来，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摘話：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沒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話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吸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內）。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內部不要請客，不要要人家請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請看戏。谁去机場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爭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內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內

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沒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預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眞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帐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戶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廬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

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廬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爭（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爭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辯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爭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爭取群众，有思想交鋒。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鳴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沒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沒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內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象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內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比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鳴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廬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在南宁会議上的講話

(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沒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虛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虛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虛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請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沒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洩了气，六亿人一洩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庫空如洗”，“市場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綱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場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洩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銘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

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銘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蒼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話，说应该多积累）。

減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減，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蔣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針。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門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訣：大权独攬，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攬，如四十条綱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攬。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二）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逕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象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象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沒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象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門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門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逕流，总不开恩，总沒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沒有认眞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象“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沒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象《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則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鬧对立的统一，沒有针鋒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鳴，一鳴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話，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話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頤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买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鳴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話，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綱要，促进委员会），沒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話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

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洩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駡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象陈叔通、黄炎培、陈銘枢的方法。

我要爭取讲話，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錢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脫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脫离了六亿人民。請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話，好色，宋玉一一反駁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駝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潤，不要突然袭击，使人倖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覚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購九百二十亿斤。多購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鬧得“人人谈统購，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鬧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銷量多，反映了农民沒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沒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洩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題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攬，只攬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減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賬，爭取超額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請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关于报紙工作給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眞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紙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請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給《文艺报》編委会的一封信

关于1958年第二期《再批判》栏的按語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即送北京《文艺报》×××、×××、×××三同志：

看了一点，沒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读者的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則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多了。請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信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祝你们胜利！

毛　澤　东

一月十九日下午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眞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沒有？（答声：来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鳴大放大辯论，把许多问題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沒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蒼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蒼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內都沒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沒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眞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沒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覚醒，象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覚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請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內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象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瓩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瓩），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爭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尝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話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象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沒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門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象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歟，汉歟，近代歟？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話是对的。

陈銘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銘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銘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沒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

正卯同他爭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銘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象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象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沒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象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沒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黃道之学(黃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錢油，五錢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脫节，可见黃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場，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題，請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題，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鳴大放好。我们说鳴放，右派说大鳴大放，我们说鳴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鳴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鳴小放不行，中鳴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鳴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黃安县，因为黃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末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獅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淨，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駡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駡红安县以前那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

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午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洩，应当鼓午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沒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請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沒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沒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場新的战爭，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眞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眞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象蔣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請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請右派分子参加这象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請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請什么人，就請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話。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沒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象章、罗，要象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爭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剝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

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場。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象。"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象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沒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滿应该批判，知识分子象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象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眞理，工农出知识。除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沒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剝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顾茅廬"、"礼贤下士"、"士为知已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溫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罵娘，同舟敌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沒有先例。三、五反是場严重的斗爭，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內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話，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象蔣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話，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兌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沒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蔣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沒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蔣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蔣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爭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爐灶》。我们請蔣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爐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爐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沒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話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話：沒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沒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辮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喲！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爭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方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沒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洩。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鳴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眞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沒料到，我也沒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沒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沒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鏵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鏵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講話要点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八、三十日）

一、八年来第一次在一月讨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大要开的从容一些，多开小组会，大会可以少开，工作缺点看到的要加以批评，准备工作不太好，一方面开，一方面准备，文件可以在讨论后再修改，再发表。

二、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鳴大放大辯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綱要４０条修正，重新发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过去沒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观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沒有希望，文章就在大字。

我们民族还在逐漸觉悟，因为觉醒了，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行整风，反右派，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闊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

现在生产与我们地位完全不相称，历史甚久，但钢铁生产比不上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群众热情甚好，它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象原子能，发出了热力，十五年后，要搞出×千万吨钢，×万吨煤，××万瓩电力，农业发展綱要４０条，看起来，八年可以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爭上游。

三、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話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符合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符合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墻折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話提得很好。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話，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沒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四、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

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做得好些，一种做得比较差些，也就是两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鸣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末后我们搞的，现在全民中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除，象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觉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红安县的干部，1956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说："八路军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负责人，除了病老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情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不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产生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东西，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就有了东西。

六、劲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沒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好，举登徒子好色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沒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剝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现在是一場新的战爭，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向技术革命，要认眞学习，搞试驗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说改造好了，将来还要整。

要讲不断革命论，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場，在这里，要团结一个可能团结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现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作风也可以改变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继续，但不要勉强，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对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格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变成梁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他们变成“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話，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話，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話，现在不适用，逐步做到说眞話。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未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见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沒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格考驗，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鑽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到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间，逐步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注：为便利阅读，把前后两次谈話按问題整理在一起，问題排列次序也略有变动，项目也是记录者所加——中央统战部）

在中央政治局会議上討論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要搞好卫生，減少负担，少紧张些，要吃的饱。学得太多，可以少学一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減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方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峯，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約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爭，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縛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三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門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沒有彻底解决的问題。北京天桥百貨商場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減少人员，节約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糾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滿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鋪张浪费，也决不滿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辯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鑽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沒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沒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辯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綱，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爭大辯，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

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帐，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思想帐、政治帐。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分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夺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

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纪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他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請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約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綱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鏵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側重。綱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側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沒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內说的。

（七）如何評比？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評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評比，按产业系统評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期內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內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減。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

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易。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門和财贸部門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場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爭取在五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十年內，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眞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鳴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眞的反浪费斗爭。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大问題，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題也需要研究。湖北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鳴放辯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內暫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請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付业和经济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鳴放辯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做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內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以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和工区、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风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求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会议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谈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

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沒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沒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場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进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的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門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三千四百人缩减成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位单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鳴放辯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門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足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眞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鳴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罵，人们罵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攬，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話中，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首先由它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攬”是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是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話，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攬吗？这八句歌訣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各方去办。第三句話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抓这项作工的。只是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門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做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門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沒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眞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沒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釘子的。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鮮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是都是逻辑问题。鮮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場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賴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輔。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賴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 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爭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內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話，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話，先订一个五年计划，爭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会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沒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办工厂或农場，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或附属工厂，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場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校，应当设立附属农場，沒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除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門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門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門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业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省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波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的高产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內，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戶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驗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鳴放辯论后取得群众同意，将这个经驗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复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复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复盖面积的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鳴放变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辯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緒，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請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請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請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約要有几个月才能形成正式条文。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賬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爭取五年完成，这就比较主动。现在賬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罵，有无把握？挨罵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沒有注意农业，沒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象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認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沒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馬克思主义"反

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沒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虛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証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題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眞，他们也是有眞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眞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鳴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爭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減。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辯駁，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內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鮮、波兰（农业问題）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題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題。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題。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題，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題。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題，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館，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縛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錢买经验。建国之初，沒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眞理，但也不是全部眞理。不能認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縟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門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

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沒有人，商业好象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馬列主义的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辯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辯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側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側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眞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象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辯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峽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則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則。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門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爭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內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沒有教条主义。

內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

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鹅蛋，不能吃鹅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鹅蛋和鹅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象，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眞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眞理，眞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眞理。是眞理就要崇拜，不是眞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尝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

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沒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話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內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象，我们挂象。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門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爭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綱领，王明提六十綱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辯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眞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象又是不眞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紐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蘆蓆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沒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沒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眞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象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爭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覓覓，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話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沒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黑人很凶，但是黑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沒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

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緩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緩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庫，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沒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緩”，“緩”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覚？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覚。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沒有不散的席。”这是眞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眞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爭，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爭，不是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爭，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爭，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爭、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沒有矛盾斗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发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爭，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滾滾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爭、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飯，一点气力沒有，不能生产，吃了飯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詞典，专門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爭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請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沒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沒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沒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眞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沒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沒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沒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沒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

就束縛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爭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爭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沒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沒有错误，历史上沒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沒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爭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換意见。

西廂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請他的朋友白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鳴、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罵你一顿出口气，并沒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爭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爭》、《实話》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沒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爭。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話，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話。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爭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爭，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象賈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內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鎖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馬列主义沒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則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門的主要部門，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題不敢去设想，思想狹窄得很。这些问題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頓，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吳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爭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誕生。比如在端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峯。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

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貧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請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沒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馬克思开始创立辯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資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滿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滿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顏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題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眞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資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題，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門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眞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眞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眞心話。

王鶴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膝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

"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話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話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話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眞話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賈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爭的。不敢讲話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沒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話。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話，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儲安平不同，那是敌人罵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話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話？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爭，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話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象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內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罵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駁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內的沉閟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

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話，听下级的話，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沒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沒有征求各部門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門想多搞，财贸部門想少搞一点，不仅脫离了省，也脫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面、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沒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还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沒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爭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題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沒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爭论，沒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沒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題解决得多，沒有抓住本质问題，这次会

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請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沒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請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沒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沒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鳴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鳴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爭，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爭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沒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內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話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

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綱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兌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沒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沒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脫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虛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話。先虛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在成都会議上的講話（六）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虛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虛少了一点，如果虛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沒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請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沒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沒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沒有摸过，林业沒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沒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沒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沒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剝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剝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剝削，二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剑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剝削者和不剝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剝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在成都会議上的插話

（一九五八年三月）

〔×××发言时的插話〕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眞理在谁的方面。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蔣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但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話〕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話〕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話，三、群众便于说話，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話〕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搞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主席插話〕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題，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題鳴放。

〔×××发言时的插話〕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虛，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沒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則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沒有办法时，睡一覚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主席插話〕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話〕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烏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驗，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請他们来插手，要請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門。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輔。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內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爭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蘆，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主席插話〕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內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譚××等同志，靠些內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話〕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沒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沒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綱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內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內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傾又有右傾，即陈独秀右傾路线，三次"左"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沒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

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沒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沒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剝削与被剝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曰所有制，一曰相互关系，一曰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吳德发言时的插話〕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話〕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沒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蘆，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

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回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紡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錢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主席插話〕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沒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脫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錢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話〕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复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沒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鳴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話〕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內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話〕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請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話〕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象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爭的规律。阶级斗爭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露暴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爭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爭，就是要找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爭。要逐步研究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馬克思主义。

双鞋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統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爭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沒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爭。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沒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沒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涝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沒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爭，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爭，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綱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帐，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購买力相符合，否則，象匈牙利工业产品沒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購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則。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話〕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內，要逐漸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內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島、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島。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內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沒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illegible]发言时的插話〕

说人民內部矛盾经典作家沒有讲，这个話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內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內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

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沒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黑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項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沒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內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話，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內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尝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蘆蓑当渡船。

請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沒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綱。以后口里要触到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辯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門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戶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內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剝夺干淨，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鳴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鬧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爭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話〕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賽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題，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費目标鮮明，批评领导，领导覚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沒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沒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豎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沒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象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沒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慌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沒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話。

沒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話。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沒有眞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門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題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剝夺淨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話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題上是眞左派，在政治问題并非眞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时的插話〕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沒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沒有解决这个问題。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沒有划右派，沒有搞臭、搞透，是非沒有分清楚，鳴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題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鳴放中让他们知道

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沒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掺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購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分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沒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塞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沒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寬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爭。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

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出席会议发言时的插話〕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沒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沒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結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書《按語》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沒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沒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沒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沒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沒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語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沒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沒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沒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

和《江峽》輪船員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对江峡轮三副、女青年石若仪说："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沒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接着，毛主席又问石若仪："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当石若仪说到有四年多了的时候，毛主席转过去问杨大副："你呢？"杨大副回答说："三十多年了。"毛主席慈祥地对石若仪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毛主席还说："有些地方航道的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閘，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

毛主席对江峡轮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给青年人。"

（据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有关报导）

視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場时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三月）

毛主席：（对饲养员）辛苦了，好同志！（握手）祝你们获得更大成功！

饲养员：全靠你老人家的教导！

毛主席：主要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对社长）能使你们全社妇女都当上模范吗？

社　长：保证全能当上，毛主席！

毛主席：全当上模范未必得行吧！只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有一半妇女当上模范就不错了。你说我这个看法保守吗？（众笑）

毛主席：参观一下你们的养猪場好吗？

饲养员：欢迎，欢迎！請毛主席多指教！

毛主席：别什么都要我指教吧，我和××都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许多事情上，你们比我们内行多了，是吧？

×　　×　　×

毛主席：这是什么？

饲养员：是糖化牛粪，拿来喂猪的，猪很爱吃。

毛主席：眞是新鮮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向××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沒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話："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　　×　　×

毛主席：（对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回家喂猪有意见吗？

饲养员：有啥意见呀！我一輩子也不愿意离开这养猪場哩！

毛主席：很好！可要把你学的科学，传授给群众才更好。

×　　×　　×

毛主席：……多看看先进的东西，眼光就会更开阔些。

（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然后对××说）

这里的经验眞不少，特别是代饲料，如果全国都推广，一年要节约好几十亿斤食粮哩！請记者同志在报纸上介绍一下好吗？

×××：办得到。

毛主席：最好后天见报。

（对饲养员）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教育太大了！

饲养员：可有人还看不起我们哩！

毛主席：谁？谁是頑固派？

（饲养员介绍一些人如何从轻视妇女到称赞妇女的成绩。）

毛主席：看不起妇女的人虽不多，但哪里总有几个，这不完全怪他们，过去封建制度对他们影响太深了，脑筋一下不容易转过弯来，又不能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加强教育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妇女同志们做出成绩来，多拿事实给他们看，看得多了，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封建王国就会不攻自破的。

（见《中国妇女》1958年第7期）

在汉口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爭，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沒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爭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覚，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

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沒有假也沒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題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賬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眞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沒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話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緒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話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門对浙江潮"就会说話，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洩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象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話："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沒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在汉口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过渡时期阶级斗爭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爭，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剝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剝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沒有改造过来的。沒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蔣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內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沒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向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眞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剝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剝削者，与前一个剝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蔣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話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沒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爭，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鳴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剝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爭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剝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剝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剝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圍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話，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暢，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象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錢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沒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題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

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話。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鳴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話，是人民內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眞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爭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辯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脫离实际，相互关系沒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錢、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內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爭，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爭艰苦，时间长，在斗爭中鍛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題还沒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眞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爭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暫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爭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蓬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沒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脫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門。

过渡时期阶级斗爭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題，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題，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在汉口会議上的插話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对于学习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慣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虛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則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內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眞有假，都是眞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題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比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鷄。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沒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眞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沒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話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

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憎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就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洩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門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蔣、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敗？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鷄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額、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沒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儲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門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鳴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話，只听空气的話。斯大林在世好象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題就接近解决。让鬧，鬧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鬧，二不让鬧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馬克思主义现在还沒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凡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沒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蔣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沒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象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購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購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購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帐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購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眞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沒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沒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鳴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眞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門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罵得很兇。整风沒有內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鳴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鳴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毛主席指示：整风是綱，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題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毛主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毛主席说：“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沒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毛主席说：“这个问題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題。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毛主席说：“这是党內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視察撫順煤矿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的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傳达記錄）

（一九五八年四月）

当前有十七个工作：

（一）十年农业规划：1、水利规划：全国大兴修水利，甘肃省五八年一千一百多万亩，我省原定三十二万亩，有保守，现为九十二万亩（解放前全省为九十四万亩）认为差不多，现在看还落后，五八年要修九十四万到一百万亩，解决水利。2、肥料：要作到上万斤肥，打千斤粮。3、土壤改良：盐碱地的改良（如柴达木等地）。4、选择优良种子。5、改制、改良（农业技术改良，深耕细作）。6、病虫害的消灭。7、推广新式农具（包括农业机械在内）。8、副业发展：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副业为了支援农业。9、发展耕畜。10、绿化。11、除四害。12、消灭严重疾病（传染病）。

这十二条中央、省、地、县、区、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作出规划。

（二）另有十二个规划：1、工业规划（主要地方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森林；6、渔业；7、牧业；8、交通；9、商业；10、文教；11、科学；12、卫生。中央、省、地、县都要作出规划。共为二十四条。

（三）反浪费问题。要开展反浪费运动，国务院将发指示，贪污也要反，贪污不是大量，浪费是大量的，特别在建设方面浪费最大。×××同志讲："浪费很大，各个厂（場）矿都有浪费，反掉浪费就能积累建设资金，他说柴达木建设（工薪）不降，不管有多少油，我主张不降。"增产是两个方面，即增产，节约。增产不节约就浪费了增产。

（四）正确解决农村积累和消费问题。在合作化开始一二年，为了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提出多扣少分。现在是要多积累合作社的资金，一个合作社的积累也是巩固社的，沒有社的积累，社就无法巩固。可考虑50％作为社的积累，50％分配。合作化后，农村的情况是25％的农戶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现在不强调生活水准，主要要发展生产，現在不是要吃好，穿好，而是要眞正苦干五年，艰苦奋斗，如果一人少用十元就六十亿，这对国家有好处，有了积累才能建设，有了建设才有希望。积累资金的办法：一种是国家的积累（包括企业事业公益金）。二种是合作社积累（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三种是国家税收积累。

全国取得一条经验，一些建设国家投资就搞不好，凡是自己动手就能搞好建设，要大量

的依靠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来建设水利。自己搞水利建设就搞好了，靠国家投资搞水利就沒搞好。

农业合作社里，可以搞社员个人向合作社投资，作成合作社的积累，来建设农业，集中生产，但不能强迫社员投资。青海一九五八年搞一至三千万积累，有些人是有錢的。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的好（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的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場，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搞几十个，几百个場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場）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驗，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眞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六）红与专的问题。红与专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红专两个方面都搞（红是政治，专是专业技术）要批判空头政治家。批判不重视政治的技术家，只讲空話是不行的，有些人不红，就是白的。

（七）打掉“官”风（全国反官僚主义一般化）。要提倡干部有革命的干劲，干部要有朝气。現在的干部不论新老，应是越老，干劲就越大。

（八）二十四条规划，省、地委在六月报中央，县委的规划除报地委外，直报省委，乡区的规划好的典型与不好的典型选择报省委。

（九）除四害：毛主席指示，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它的意义不仅是除四害，它关系着人的健康问题。

（十）绿化问题。主席讲天天绿化，大规模的搞运动，如木林、经济林。有些省提倡上山，河北省飞地，农业社抽人上山搞生产，搞牧、农場。

（十一）认眞地搞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爭取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王震参观日本的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

（十二）开会方法，地区联系问题。开会的方法我们党內有许多好形式。主席讲大鳴大放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几级干部会除讲工作外，还要讲理论、思想问题。这样就能提高干部的思想性、原则性。这次反右派是理论问题，又红又专。地方民族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从理论讲，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浙江省委书记××同志的报告是标准，我们要看七、八次，报告中第八、九部分是敌我矛盾，政治、思想、革命问题。上海市委的报告提到了思想问题。

地区联系，更好地互相配合起来。中央提倡互相联系，过去大区撤消是必要的，大区撤消后密切了上下联系（省与中央），地区的联系是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可以互相订合同。

中央初步考虑了七个点。1.以上海为中心，华东五省。2.武汉，两湖、河南、安徽。3.广东，包括两广、湖南、福建、江西。4.成都，包括西南三省、陕西。5.西安、西北五省陕、甘、青(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河南。6.天津，与河北合併，河北、內蒙、山西、河南。7.沈阳为中心，东北三省。

各省开党代会，互派代表参加。

我们也要搞中心联系，农业社也要互相联系。

（十三）中央领导同志下乡问题，一年至少四个月下去。

（十四）中央同志下去，不迎接，不請客，不唱戏，以免耽误工作。

（十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报告谈得很明白，反右派以来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是敌我矛盾问题（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右派是代表敌人的），但是敌人一天天減少。右派十五万要超过，这些右派搞了，敌人的量減少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敌我斗爭还有。但是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占了主要的，敌我矛盾2％，同时是分散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也可以采取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右派中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上下之间，这是长期的大量的，因此，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或者看不到敌我矛盾。

（十六）不断革命，（这是对工作而言）工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接一个运动，经过这次整风，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今后是解决技术问题，十五年后鉄的产量要赶上英国。十五年，党的任务放在技术问题上，政治是统帅，灵魂，只有红不专，当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工作要比賽，比先进与落后，全党要钻研技术，不钻研技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但要红就要学习政治，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提拔干部有的人说不要德，有才就行，德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沒有是不行的。另外，要有技术。十五年后要消灭阶级，那时有沒有革命，有沒有斗爭？还是有的。解决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苏联两个人造卫星的上天，证明科学技术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干劲应赶上先进派。

（十七）对立面的统一。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好与坏，才能比较出先进与落后。报纸也要宣传好的、坏的，大量的和主要的。比较的方法实际是积极性的比较。不但经济工作上要比较，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比较，主席讲一年比三次（党代表大会比，其他会议比）办法是：推广好的，批评差的。

对宋××关于苏联专家問題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請××××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的不高明，因而双方隔离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专家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　澤　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启

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的講話(摘要)(一)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于中南海怀仁堂)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荷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馬克思。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沒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馬克思也不要怕。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沒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沒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沒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馬克思。馬克思沒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馬克思革命沒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沒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則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講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自申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

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錢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閣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馬克思的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〇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吳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黃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沒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宇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紡紗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沒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話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門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賈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內閣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賈桂坐下，賈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賈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綱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眞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眞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沒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眞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眞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眞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話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話：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鎭反。还沒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辯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辯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爭鳴，这是辯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辯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馬克思。

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一、国　际　形　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沒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烏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蔣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內，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蔣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沒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蔣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話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話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慚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蔣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綱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綱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沒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沒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沒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沒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　内　形　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

工人阶级假如沒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沒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沒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戶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戶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賬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內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錢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沒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錢。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眞的粮油布都沒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鬧得最兇，替农民叫“苦”，说统購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沒有人喊吗？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場上看问題。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場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場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沒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賬派”，这部分人还沒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譚××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話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門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內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內，沒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綱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眞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

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籽，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垅，每垅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話也是非要不可的沒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沒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眞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沒有问题，沒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　四　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沒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沒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

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沒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沒有辯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爭，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爭，对东欧，北朝鮮和平土改，沒有斗地主，沒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爭。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爭。我们在"五反"中斗爭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賜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鮮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賜观点和平土改。沒有阶级斗爭，沒斗地主，沒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遺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設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請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貧农，不过他沒有这句話。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話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眞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扫街的，只要他有眞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貧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眞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內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鉴、吳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淨。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鳴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內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子洗不干淨，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沒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鍛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釣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沒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

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話，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場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債，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帐，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祿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沒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离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

××××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沒有？这是本好书，沒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鬧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鬧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鬧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鬧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象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爭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爭，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爭，求爭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峯，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駒(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鬧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駒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場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場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鬧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鬧，想分裂，不想合作。鬧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沒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沒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門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門，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的問題。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眞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眞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眞理不在他手里，就沒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

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領导內行問題。

外行领导內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內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鬧得天翻地复，说外行不能领导內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內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內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內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內行，人人可能成为內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內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門，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門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內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內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駁他。我说外行领导內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紅旗，辨風向的問題。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沒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爭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鳴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爭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爭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

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請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題，不讲前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鈍。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沒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駁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該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沒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現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換。

（五）讲一个紅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爭和党內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爭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辯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裂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象航空母艦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辯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辯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現象，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漸变。假如蔣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沒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據地的丧失，等于現在的苗子被霜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題。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沒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沒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暫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則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沒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別的会，現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

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沒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沒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二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爭，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請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眞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眞理。浙江父亲儿子爭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沒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內分裂。象×××、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峯，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象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象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沒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內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設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鳴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沒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內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

国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象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申，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請哥哥、妹妹，不行，請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讲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在八大二次会議代表团团长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沒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沒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个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話，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爭。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沒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爭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接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愚蠢观点，阶级斗爭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开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吉大存，冯自勉，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庫西宁的谈話，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沒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沒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沒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爭，要用长期的斗爭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場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場革命，沒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沒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爭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覚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沒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论如何沒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沒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爭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覚，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場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

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滿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驕傲，现在又太谦虛，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瞞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卑賤者最聪明，高貴者最愚蠢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請中央和工业交通部門各自搜集材料，编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大都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罰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的证明这一点，那就鼓舞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许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后听鷄度”出于鷄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吗？

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的講話（四）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眞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眞，一认眞，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脫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沒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沒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暫不請，那时你找上門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

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沒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沒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沒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請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請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爭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預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爭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爭，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沒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爭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驗，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沒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沒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沒什么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爭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門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爭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眞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至少有六、七

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話，“力爭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話。……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象不通，沒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現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沒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辯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沒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象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沒有明确决议，但有报导，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沒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門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綱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賦》，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谿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接見阿联軍事代表团时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爭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賬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沒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指标》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眞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沒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爭取外援为輔，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眞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請问有什么出路呢？

在軍委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这次讲話不是指示，先讲几点意见供参考，是否对，供讨论，只当做问題提出，几年来习惯于这种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今天？我是昨天起来的。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对军事沒有抓，这几年，有同志批评了军队，但他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这方式曾提倡过，但有时也有缺点。军事工作基本上作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也怪我去抓别的了，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薩。头一页上讲不唱天来不唱地，开头先唱香山记。事情总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唱天，不唱地，开始先唱别的戏。这事也难免，唱《打渔杀家》不能同时唱《西廂记》，如红线女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据说有二百个，其他的时间不搞工作，虽有理由，但也不大好，有个空军政委说，他这次参加会议很荣幸，沾一点边，是否中央间接有点责任？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这是提出了问題，这次检查首先检查军委和各部，不要针对各军区，他们可以回去检查。你们越压迫我，我越舒服，中国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起来革命，人不逼不革命，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实际作了自己掘墓人。当然你们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是督促的意思，否则我们不会动了。事情关系到六亿人民，关系到世界持久和平问題。

军委几年来工作基本对的，但有很大缺点，责任首先在领导。

国內形势起了很多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这次会议批发了富春、先念、薄××、冶金部、一机部几个文件，希望大家很好地阅读（主要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題）。值得仔细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題是：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爭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

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二百钢，今年计划：五年之内争取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过英国。从工业方面想办法，干部一年下去四次，抓四次。军队也如此，你们要我管少了，是要我参抓，骏驹子喜欢人骑，中央这些骏驹子也要有人骑。如果没有钢，不能造机械，炼钢本身也要机械（平炉、轧钢等）的发展，电力、石油、煤油、采矿都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农业也要机械（播粒机、排灌机械等）。

当前是粮、钢、机械三个重要问题。

军委会开的很长，但还要准备很长的开，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最少一个半月。反正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六十条中有一条抓军事，同样每年要搞几次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愿意抓了。现在各方面进步很快，首先是地方，特别是农业方面。这是说中央各部門是有缺点的，多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官气，少了一点政治。南宁、成都会议，八届二次会议后，政治扩大会议后，有很大进步，不能说他们"一多二少"了。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队有的同志讲，工、农、兵、学、商，兵在老三，现在落后了，如果有些落后，是领导上有缺点，象今天这样的会议开的很少，这几年主要抓农业，搞出一套办法，解决了，以后搞工商也都弄出来了一套，还有一个"兵"和学都在那里开会（康生：前几天主席讲：工农兵学商，农搞出一套思想解放了，工业也基本上搞出一套，商（财贸）也如此，只是兵与学未搞出一套来，意即"兵""学"落后、思想落后。）开始动了。（康生：前几天主席的話有道理，教育的确还未搞出一套中国形式的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民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眞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大众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与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留同志们三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何迷信？思想沒解放？这次会议务实太多，务虛不够，讨论中的时间不够，也可以看出这问题。大跃进中，群众思想跃进，教育工作跃进，我们领导思想仍落后。（主席把军事与教育会议并列，军事会议比我们务实多，时间多，他们也沒有那么多实的问题）我们这会有点事务主义，（他们的会还要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这两方面都在开会。军队的落后，不是全部落后，中间脫节，可能上层热情少点，但也不是上层都如此，军事干部对我说："各方面是大跃进，军事进步不够，心不安。"这是好的，经过这次会议后，会起变化的，军事会议要开得好，要讲清道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五千万，地方比苏联小一半，但是比较好是溫带，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国家有山有平原，山是西边，平原在东边，这有好处，使水位落差比较多，可建水坝利用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苏联早一些，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四十七年；俄国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时间很短，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有三十八年，我们落后，但革命是自己搞成的，自己找馬克思主义，并把馬克思主义普遍眞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种辩证主义的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作用于实践的。馬克思主义普遍眞理是什么？在莫斯科会议前，我们有五条，后变成九条，这种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不行，因中国有其历史的特点，照搬不行，有过照搬，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也有很多好处，给了我们教育，得了很多经验，同样的，凡是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很多教育，也有好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等；再如陈独秀、罗

章龙、张国焘，有些是党内性质的，王明现仍在党内，但他走到何处？将来再看，这人一开会就有病就是了。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也一定会犯错误。写过游击战争小册子，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总结那时经验，划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军事的界限，那时这种界限不清楚，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军队中有两种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指当时军代表政委不能领导军队，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当然不存。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军队非学过军事不可，你们大家是否进过学校，沒有的。这不是说过去在军队呆过的同志沒用，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沒有他们革命要迟好几年，俘虏兵也有作用。（过去内战中俘虏兵也是内行）。

如果是缺点，大家都有，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有那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特别有兴趣。林彪虽进过旧学校，但他反对那一套，另搞了新花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军事管理制度无非是打罵制度。这一时期，喜欢旧的资产阶级军事学，管理制度那一套是一种什么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代，有个外国人（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争思想，说是上山主义，他们要正规化，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門之外。此时旧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归降洋教条主义，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实际也不是归降，而是两种教条主义合作，结果把我们的工作送掉了，来了个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其他根据地也犯过错误，中央苏区还来了一个大扭秧歌，一直到陕北。

我们党有三次“左”路线，两次右倾路线，结果军队搞少了，受损失。但也有好处，取得经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会议，延安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绝大多数同志说服过来，纠正过来。因此，不能说军事沒犯过错误，正因为犯过错误，蔣介石請我们走，我们就走了。长征中还有一些，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反中央。以后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犯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若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今天沒办法在此怀仁堂开会和看梅兰芳的戏。

抗战后，解放战争中全党全军沒有基本分歧。一九三八年六中扩大全会上讲述游击战争的好处，可建党建军建政，由九十万游击队变成四个野战军，主要说抗战，解放战争不是按洋教条，也不是按资产阶级教条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外国经验，不是按着两种教条主义取得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胜利后，我们又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小战争。苏联同志讲过，在朝鲜战場上，敌空军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場上未遇到过，当时我空军不能到第一线（敌后）。第二线（三八线）只能在后方顶一下，在当时情况下，打败美帝国主义很不容易。有人说我沒参加世界大战，不对，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美国陆军怎么样？不清楚，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在战略上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要看成是铁老虎。

胜利后办了许多学校，产生了教条主义，請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有教条主义沒有？对此有四种看法：（1）沒有；（2）有，不多；（3）有，不少；（4）有，很多。那种对請大家讨论。

党的历史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无产阶级接受外国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对这两种都作过斗爭，克服过。

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是否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研究，说完全沒有，是不妥

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沒有。只写过几篇文章，那时有一肚子气，沒有气也写不出来。王明由苏联回来，王明速胜论。（写文章说四年抗战胜利）当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党内主要批评速胜论，对国民党则主要批评亡国论。那是应时文章。现在的一套我不懂了，小米加步枪，我是看过的，辛亥革命时也背过。后来南、北议和，成了外行。

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馬克思主义传统。

这次会议要作点决定，大的一个，小的可几十个，成都会议就是这样（三十多个），实事求是讲道理，大家说，大家要讲心里話，我们也提倡直道心事（坦白、交心），直道工作，有人怕讲了穿小鞋，穿有什么要紧？共产党怕穿小鞋？中国过去女人都穿小鞋。三寸金莲不妨碍她们生四万万五千万人，共产党人怕什么？穿上几十双有何要紧？我在成都会议讲过五条，杀头当然不会，我们提倡交心，我向你们交心，得罪人有的，总之要插旗子，不插红的就插白的或灰的，不要讲出話来过多斟酌，讲話可以，今天讲話也是乱吹，写出稿子就困难了。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全军团结，要团结起来，必须把问題搞清楚，否則不会眞正团结，军人要爽快，交心才能达到团结。

为何要团结？要爭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照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现在蔣介石台湾很小，但还神气，常搞出飞机来，如果我有一亿五千万吨钢，那时只要吹口气，他就要走路了，现在打雷他不理，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许有可能。

部队一年要开一次会，心里有一个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对肖劲光要讲明白，海军重要，但现在还不行，可是大有希望。明年可能搞到两千五百吨钢，事情也难说，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斤，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总之，国家强大，军队也必然强大，有七年可能接近美国，十年超过美国，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軍委扩大会議小組长座談会上的插話

（根据記錄整理为九条）

（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三日）

一、人民解放军有沒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則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是沒有，一种说是有，一种说是很多，一种说是相当多。说沒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眞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馬列主义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

三、现在形势很好，特别是国内形势很好。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同志打电話给我，说华东五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今年可以增产粮食××亿斤。如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作一个单位，两广、云、贵、川作一个单位，也各增产××亿斤，这样即使不算东北、华北、西北，今年就可以增产××亿斤。钢一九六二年可以达到××万吨到××万吨。赶上美国不要×年，×年×年就可以了。×年可以赶上苏联，×年，最多×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話，人民解放军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到那时候，肯劲光同志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主要的，新的还沒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四、肯定讲我们要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过去学了，现在要学，将来也还要学。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所以对苏联的经验要有选择地学。苏联顾问、专家，大多数是忠心耿耿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肯定。我们对他们应当做兄弟一样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客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也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政治水平不高。有问题时要好好同他们研究，商量问题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团结诚恳对待他们，也要有批评，有斗爭。这一方面第二机械工业部做得很好，向专家宣传我们的总路线，专家也说要向我们学习，批评我们有些人有依賴思想。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整。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搞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六、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方法就是一年去摸四次，象地方一样，有系统地去摸。住北京的人，官气多一些，政治少一些（现在有改进），因此要注意这个问题。军委领导要改进，下面有批评，我看这些是好的，要求高一些，都是为了改进军委领导。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加强，如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者，军委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你们不是说文件看不到吗？这次给你们多看一些。你们参加省委沒有？（刘培基答：我们有八个人参加福建省委。（福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知道的。

七、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門讲“十大打击”（指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八、王明至今还向苏联告状，告我三个东西：一是反对共产国际；二是搞个人崇拜；三是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做检讨。×××说：共产国际有错误为什么不能反？×××就是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他说得很对。××同志的这个报告也要印给大家看看。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是××亿，由于沒有经验，加上教条主义地照搬，浪费了一半，本来可以搞××亿的事业，可以做更多的事而沒有做到。好处是取得了经验教训。

在軍委扩大会議小組长座談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专門請主席看几个同志的发言。主席看了张宗逊、刘亚楼等同志的发言。）张宗逊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赞成。这是经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逼他写出来的，可见一逼就写出好东西了。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沒有很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亚楼同志的发言也可以。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采，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文章中讲話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

我军队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爭。古田会议斗了一下，但沒有说服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肖克同志不仅有教条主义，而是个军阀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思想。

战爭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馬列主义。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教条来背。如果馬克思列宁在的話，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請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章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題，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爭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請问当时苏联又依靠谁来援助呢？

工农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我们在×年可以赶上英国，×年至×年赶上美国。明年我们钢产量，将达到××——××万吨。据说东北一九六二年即可产××万吨，这是整风的结果。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业大跃进。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連一本战斗条令也沒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有些人提出苏联顾問同志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

我们也不抄。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沒有搞好呢？除了对前一段未深刻检讨，接受历史教训不够外，一是迷信旧的东西、旧教条，二是迷信洋教条，迷信苏联，三是迷信自己。这个人工作很积极，很努力负责，就是方向不对头，政治上不够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鳴放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沒有写出名字嘛！

×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感，沒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为主。现在一个合作社也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然就会落后。湖北省新洲五个合作社搞得较好，麻城差点，可是新洲沒有注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而麻城派人到新洲学习，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结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边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苏联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錢，是不对的。（林总插話：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的情况的。再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对苏军的经验是要学习的。装备技术天天在发展变化，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过去俄国人很怕拿破仑，因为他领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后俄国人又把他打败了，所以俄国人经常宣传他们比拿破仑还厉害。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想〔？〕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的，沒有防御，沒有打败仗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爭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爭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至于他们说我们是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就说，你们搬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也是经验主义。

肖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沒有这样的时机来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关于学习苏联，对內讲“批判地学”，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馬列主义的普遍眞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向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要学，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同他们讲，我们学习你们，你们又是学那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苏联专家现在也有了转变，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朱可夫事件后有转变。（陈总插話：据归国苏联同志他们也讲：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经验来的，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们的经验回去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的形势，不但鼓午了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鼓午了苏联同志。（林总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主席曾说我们写的社论比眞理报的社论水平高。关于上层建筑问题，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沒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他们的战术，思想性，群众观点有问题。半学，就是学海陆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

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技术科学，现代化战争组织要学，但也要用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学。要趁我们这班人还沒有死之前。组织一批干部很好地把我们的一套搞出来，传授下去。）这样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是有些东西的。凯风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沒有馬列主义，我问他看了沒有，他答不上。可见沒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好。（林总插話：《孙子兵法》是有唯物论，有辩证法，《孙子兵法》是部集体创作的书，有孙子、孙膑、曹操、杜預等人。）

破除迷信是成都会议提出的，四个月来发展很快，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在全国全面开他展，如鞍山，原计划产钢××万吨，但现在变了，到明年就可能达到××——××万吨钢。们也搞大中小型结合，土办法洋办法结合。据×××同志从东北来信说：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可搞到××万吨钢。有了钢，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林总插話：民兵很重要。）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现在搞出了东西给大家看看。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刘导生发言稿中提出十年搞××万吨位，这太少，最好搞××万吨位。一九六二年我们可搞××——××万吨钢，要这么多钢干嘛？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艦、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繩、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总插話：×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

原来认为军队有很大的捞头，现在只有×多万了，考虑还减不减？去年减××万，留××万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准备下次座谈会上、专門讲部队整编和干部等问题。

接見应举社社长时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六月）

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民政工作就是作人民工作，不要怕麻煩。

（见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

谈肃反斗爭宣傳等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傳达）

文章发表的面比较宽了，目前可以采取少而精的原則了。

群众的檢举很有作用。这要大大提倡。反革命最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报社有几百封来信。有材料，应写成新闻，读者知道自己的信有了下落。对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神经战，使他们知道我们发动了群众，并且进一步号召群众檢举，写成社论。

不要把自由主义当作政治上闹独立王国，反党等等。

譴責殖民主义者侵略西亚

（一九五八年七月廿八日）

毛主席在印度新任駐华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鄭重措词申说：

“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至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还指出，我们“必将更加高举五項原則的旗帜，为維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

視察徐水时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鬧文化娛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

闻的話，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徐水县委书记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視察山东时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毛主席特别强调布置各项工作必通过群众鳴放辯论，他说：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辯论，主意是你们的；辯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指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指山东省农科所付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題，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爭上游。

（在接见山东著名的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们时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視察天津时的談話（汇集）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指示）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怎么样？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視察天津大学时的指示）

（天津大学张××校长向主席汇报学校情况说，这个学校已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

主席说：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沒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沒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的中学勤工俭学搞的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沒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沒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主席问王元之同志：天津中学有沒有搞勤工俭学？（王元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六十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主席说：好啊！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毛主席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毛主席对天大在短时期办起许多工厂很感兴趣。）

毛主席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五十岁以上的教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校长汇报说：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说服他们也说服不了。）

主席很关切地说：连夜搞是否把人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毛主席还指示：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

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接見西哈努克时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学生数目也要控制一下。小学沒有关系，中学要控制一下。因为沒有那么多事等着给他们做。……

不要搞普通的学校，要搞些技术学校，农业学校。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中所加的一段話

（一九五八年八月）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煩。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覚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議上的講話（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題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看題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題，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題，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題，今年铁、钢、铜、鋁问題。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

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話，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話，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阿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購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斤，明年每人爭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2500斤至3000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脫离实际，脫离群众。十三陵水庫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庫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飯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內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內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拚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鎮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鈣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沒有机会整我们就整

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緩和，好象緩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辮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爭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錢，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庫，大肥料庫，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庫，小肥料庫。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眞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費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

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沒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级别，要加班費，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儲粮一年（每人××斤）。红薯可以減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鳴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沒有重点，不能沒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吨要完成，今年××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寃有头，債有主”。邯鄲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鷄、鴨、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

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門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門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爭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遙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鋁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拚命干。不拚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爭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話：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錢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沒有谁能赔嘗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場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尙？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覚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嘗重罰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沒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拚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会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沒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題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爐。要大收废钢废铁，暫时沒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高爐、平爐、軋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債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戶，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納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沒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沒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沒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題。过去搞军队，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飯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幫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沒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窰洞，

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路道。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象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嵯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門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蔣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沒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紳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沒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爭中，鍛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爭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貶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爭鍛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沒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眞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

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焉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象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象"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有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議上的講話（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話：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沒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焉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爭，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

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請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爭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爭问题。"死"活斗爭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沒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攬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攬攬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寃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赚！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沒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三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沒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沒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鳴大放大字报，就沒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盜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話：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參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沒有彻底破坏，因而沒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

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話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鳴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眞理的，眞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門一門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爭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賴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錢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暫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請不請外国人，請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鈣。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沒有礼拜，沒有薪水，

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請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戶，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寬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場。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話（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会議講話（五）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沒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縫紉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戶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戶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錢，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励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象中山公园、頤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干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蔭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話，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沒有树怎样叫绿化？眞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騰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話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爭取××吨，这是一場大仗，还是沒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題目，但沒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沒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沒有搞到，一是題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沒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沒有懶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沒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是）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等等级、等特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〇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幸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爭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那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

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庫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沒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罰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罰，靠惩罰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爭，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罰。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沒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沒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沒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爭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沒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請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沒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沒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沒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蒼蝇，蚊子多得很。

关于主要矛盾問題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八月）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沒有好处，（康生，和××，柯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話的爭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爭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沒有问题了。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佈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綱。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爭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貼貼打锣打鼓吗！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沒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解决（思想斗爭）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还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滿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沒有划清，八大并沒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貼貼，现在他们要造反嘛。

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爭，阶级斗爭沒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鬧得天翻地复。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排到资产阶级帐上，这些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剝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剝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沒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沒有人剝削人了，总不能再排到资产阶级帐上了。但还是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宗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沒有完全解决，党內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鳴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势，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鬧就让他鬧，革命这么多年就沒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鳴大放大字报。大鳴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沒有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鳴大放，我们

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去过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看来，用压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瞎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剝笋政策，今年是剝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沒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类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算两条道路的矛盾。

右派有多少人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沒有完全解决（查看八大文件第四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会发生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嘛。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沒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話（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沒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話是好話，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話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套了列宁的一句話。）这句話有语病的，但沒有坏处，实际上沒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話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

給××，陈×，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这个文件看了两篇（注：指计划说明要点）觉得不大滿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文件交待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順，一般具有鮮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如×××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较高，逻辑性、准确性、鮮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算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书，读得下去，提綱領。“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鮮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順，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辯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是內行，还不大懂，如果眞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学（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辯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內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杨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文风不动，灵台如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那一年，稍稍松劲一点，使读者感覚有些忘，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內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我的意思痛切一道，引起注意（过去我所做的一万次唠叨历史，是当作一阵西北风。）如不同意，可用通信方法，鳴放辯论。我写的是一张大写报，你们也写吧。如果同意，請你们会谈一下。我看你们的心意，把这类事当作芝麻，你们注意西瓜去了。却是写出文件叫人不愿看，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是不是呢？建议：重写一遍、二遍、三遍，以至多遍。写得同人民公社那样好。你们研究一下吧？你们做工业官，有工业就是不用心思，毫无理论研究，以致文件写成这样。建议：你们有空写工业綱要四十条，那样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英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说明要点”，无年月日，无署名，不知谁人写的，表中有好几张，除作者外，恐怕谁也看不懂。为什么如此呢？

接見巴西記者穆里罗·馬罗金·苏烏薩得杜特夫人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毛主席：……教育方面，过去的制度也要改变，主要办法是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你们看过我们这样的学校吗？

馬罗金：看过一些，学生很愉快，在实验室就能生产出东西来。

毛主席：这是历史性的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说是历史性的问题，是因为多少年来教育和劳动都是分离的，说是国际性的问题，是因为那一国都是这样，学习和劳动相结合起来，学生不仅会得到科学知识，而且有生产技术。……

批評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有很多大方向不对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傳达）

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对许多国际问题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

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去年整风的时候，我就予先考虑到反攻的问题。右派进攻了，要不要反攻？什么时候反攻？抓什么题目反攻？后来抓到了卢郁文这个题目。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什么时候批判，抓什么题目开火？后来新民晚报进行了自我批评，就抓住这个题目开火了。

对国內外问题都应该这样。

报纸宣传，报纸编辑工作，最近一个月比较杂，看不出方向究竟搞什么？去年反右派的时候，突出，一气呵成。今年春天，在发表《梅林看全国》的社论以后，也很突出。最近一两个月，东西很多，方向不太明了。报纸应该有方向，在最近就要转变过来，把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放在第一位。省报也应当如此。

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紀要(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沒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話，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門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坐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內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覚得心里舒暢，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沒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覚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沒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縫紉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沒有注意，沒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〇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〇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預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现在还沒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起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来是主张对立面的，沒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

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購，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沒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購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沒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沒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轉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場，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場前进，也还有少数沒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爭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象吃鴉片烟一样，吃鴉片烟上了癮，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沒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減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門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沒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綱，编学生不贏，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綱。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还有什么大担島、二担島、东椗島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絞索，美国人的頸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門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給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請各位拿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爭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爭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眞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虛，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条，他们专扶什么“蔣委员长”、李承晚、吳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爭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眞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鋒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他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賽尔，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

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沒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那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是侵略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爭，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門、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沒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鬧得这样滿天飞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爭，怕美国到处闖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沒有

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件条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除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利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可能是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十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

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亿斤，可能到××亿斤。搞八年沒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沒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沒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蔣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战爭。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爭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沒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辯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沒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覚。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还是谈一谈老話，关于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爭贩子使用絞刑。对他们使用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絞索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

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沒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絞索，自己套上去，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沒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請，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一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艦队是杜鲁門。杜鲁門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沒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門、馬祖套上了沒有？金門、馬祖据我们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沒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况，那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門九万五，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候赛因和黎巴嫩的夏蒙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艦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內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蔣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鋁，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蔣介石这一边是內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沒有驻军，但是他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们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要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眞正的反共好些？所谓眞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沒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件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那里，无损于大局，我们

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万，争取××万吨。后年再搞××万吨，不是××万吨吗？苦战三年，××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是五千万吨，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吨。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万吨，接近苏联，再加×年，到××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吨，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年，×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到××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只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家。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美国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用了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則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脫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条基本原則。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沒有问題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題也不多了，中心问題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題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須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个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沒有经验的娃娃来读，淨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場，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財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財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預计大概可以收××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〇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三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沒有突破二百亿以上到三百亿。三百亿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到了××。明年应該是××几或者××几亿吧？也不要××几，也不要××几，一下跃到××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帐，××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亿也只有一年，××沒有，××沒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預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亿，平均每年××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〇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三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減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減少到一百三十八亿，減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該就可以搞××亿。前面这八年，五〇、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費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亿，就可以当作××亿（等于一倍）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規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沒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沒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去了。搞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眞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只两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沒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餅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門，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矿山的机械，开油田的鑽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化学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化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沒有钢铁，机械就沒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銑、磨、刨、鑽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万台吗？实际上明年爭取搞××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万台，后年再搞××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內。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二十六万台里蔣介石交给我们的遺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台減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万台，一年××万台，后年搞××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万，后年××万，××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关于游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

“你们不要老在游泳池里面练，游泳池小，游来游去就那么一点，要多到江河里去练习。”

“要走出游泳池。”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鍛炼意志和勇敢。”

（注：毛主席1958年9月12日在武汉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話）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应该提倡。”

（注：毛主席1958年9月在安徽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話）

視察武汉大学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

……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当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視察武鋼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象武钢这样的大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了生产多种鋼鉄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

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視察安徽时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

（对钢铁工业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

发展鋼鉄事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群众运动，不搞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 × ×

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鋼鉄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鋼鉄联合企业比较快。

× × ×

劳动人民万岁！劳动人民万岁！

（視察舒茶公社时的談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廿四日）

吃饭不要錢，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錢，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

× × ×

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 × ×

（毛主席在参观除四害陈列馆时说）老鼠这个东西很狡猾，这样，老鼠就要大遭殃啦！

× × ×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

× × ×

……以后山坡上要多开闢茶园。

（視察合肥时的談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

（毛主席到合肥时高兴地说）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毛主席在与妇女干部谈話时说）如果每年每人沒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沒有公共食堂，沒有幸福院托儿所，沒有扫除文盲，沒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主席指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巡視大江南北

回京后向新华社記者发表重要談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在九月间巡視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

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沒有做好，沒有开群众大会，沒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辯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規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規’，貶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眞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規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門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爭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学生自覚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書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門战斗，属于惩罰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鑽，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沒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話，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

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門军民供应缺乏，飢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沒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爭，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內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題，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題。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題，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爭，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話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妥善。何去何从，請你们酌定。

对卫生部党組《关于組織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結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請与徐××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請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庫，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防部长命令福建前綫我軍对金門炮击再停两星期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門击炮，从本日起，再停止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門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內，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詐，这就是詐。这是为了对付美国

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划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已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馬一千万中国人，有利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样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出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沒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賊。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沒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題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題呢？請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又沒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沒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议。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爭，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太不高明。例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話，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国人不能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再告台湾同胞書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糾紛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的命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沒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門的飞机場、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

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場、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蔣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少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話，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話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他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去？請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蔣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设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沒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內，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滿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話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錢学森同志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錢学森同志，和錢学森同志谈了話。

……主席看见了錢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一九五六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眞是一股邪风。说‘馬鞍形’是不错的。”

錢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話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題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議的汇报后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月）

一、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象話，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二、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沒有可以交換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換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換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葯材等。

三、交換问題，交換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卑视交換是不对的。交換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換。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換。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四、两个出路。劳动力很紧张，这是个大问題。出路一个是改变广种薄收。少种多收，可以省工省水、省肥等。一是机械化，目前是抓工具改革。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象个样子了。

劳动组织分工，要适当固定起来。工业、农业劳动不固定起来不好。

五、公社分配问題。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給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給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額，级差不能太小，否則，不合按劳取酬原則，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減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六、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成本一万元，工资八百元，积累七千二百元。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不过七百元，二十五个农民頂一个工人的产值。鞍钢产品可以全国调拨，农业上可以调拨的就不多。所以十二年能过渡了就不错。

七、不论搞什么工作，象搞人民公社，不能走馬观花，要搞透一个公社，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有把握。学馬列主义也是一样，书看得很多，不透，不好。我最近看参考资料，很仔细，每次看几遍，多看一遍，就多一些收获。

八、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

九、可不可以不走化肥的道路（今年化肥生产一百八十万吨，明年只生产六十到七十万吨，进口化肥也要減少了。今年沒有化肥，粮食搞到八千亿斤，棉花搞到八千万担，证明可以基本不靠无机化肥，主要靠有机肥料和土化肥。

可不可以不走拖拉机的道路，走绳索牵引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在石家庄地区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你们这里是河北省水利化先进的地区？今年的水库用上了沒有？（×××：有的用上了，有的沒有用上。）

这里有什么铁矿沒有？（×××：井陘、平山、获路等十几个县都有铁矿，估计有×××吨。）可以在这里搞个大鋼鉄厂了，你们不一定在邯郸搞一个大钢厂吧，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个吧。

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沒有？（×××：有一个县搞一万斤。）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270斤。）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有十四个县。）那还有十几个沒达到。今年小孩摘棉花，将来农业是妇女和娃娃们的事情。

究竟是否需要化肥，要它干什么？我看就搞土化肥好了，不搞洋化肥怎么样？拖拉机是否需要？（×××：拖拉机搞深翻地还有用处，带三华五华改成带一个犁可以深耕。）这样子你们要拖拉机了。化学肥料不要可以吧？（×××：有些还是好。）搞土化肥，洋化肥是否少搞一些？你们这里有拖拉机厂沒有？（×××：有一个，现在搞鼓风机。）暂时休息，只搞鼓风机，不搞拖拉机。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沒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有几种，有的在一起吃，有的打回家去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吧，食堂里作不作菜？你们食堂有办的好的吧。比较一下，分一、二、三类，都要向一类看齐，人民是否欢迎吃大鍋饭？过去不欢迎，现在欢迎了。（×××：正定县妇女罢了一天工。食堂就办起来了。）正定罢了一天工，真有其事，罢一天工有什么不好，进步的罢工，是对落后分子最好的批评。

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沒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孩子一叫一鬧就打不好，要叫小孩子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睡的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錢，工资一个也沒有，你们这里有沒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

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子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么，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48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110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70元，安国是110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沒有象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们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

吃饭不要錢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沒有？有很的沒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啸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400元，要求实行供給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沒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在邯鄲地区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作，一年才二十四天不算多，过了十一月份后放假一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钢铁这一关还沒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现在桃还沒有开。还要一个多月。）这时桃还沒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十一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滿意的吗？（××：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沒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80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沒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沒了吧，（×××：四十元吃了饭就沒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

）。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沒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鵝鴨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你们是两个区合併的，九个县一个市，那和石家庄一样了。你们的粮食去年是22亿斤，今年70亿斤。翻一番是44亿斤。这么你们翻两倍多了。你们每人吃四百斤不够吧！你们这里吃饭还要不要錢？明年粮食计划生产多少？（××：计划170亿斤。）你们今年是一千万亩麦子，去年是多少，（××：七百万亩。）七百万亩，今年一千万亩都施底肥了吧？以后还要施追肥，每亩下种多少？（××：25斤以上的占95%。）亩产多少？你们这里是两白两黑，两白是棉花、小麦，两黑是钢铁、煤炭。你们种五百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那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一口猪，一口猪一百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公社化后猪減少了些。）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明年亩产千斤，亩产八百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202斤。）明年302斤也就滿意了。（××介绍了临漳县搞的百里丰产川计划亩产五千斤。）临漳离这里有多远，路好走吧！出門坐火车不好看，这是老太爷的车，坐汽车也就好看了。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不跃进的县？（××：不是他这里，是石家屬县，白旗也拔掉了。）有白旗，当然也不会跃进了。

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250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桌子可以砍掉一半，耕它三尺深，其余地叫它休息一年。我在安徽省看每地都烧肥，把那些主根子、杂草，一堆一堆地堆起来，叫作熏亩，地一休息，阳光一晒，一分化，一熏，我看是要走这个方向。在北戴河我提出种地三分之一，其他种草，种树，沒水的挖塘养鱼。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过去几千年都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再加上一条机械化。你们这里有钢，有沒有机械厂？（××有个小机械厂。）可不可以生产拖拉机？（作不了拖拉机。）你这个人就是志气不大！不用拖拉机行吗？用绳索将来用钢絲牵引。肥料不要洋化肥，只要土化肥行吗？我觉到有机比肥对作物有利，人畜拉的屎尿你们压绿肥用什么？（答：用紫穗槐）这可以代替洋化肥吗？明年可靠它。是否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用拖拉机，少要一点，不是拖拉机化。洋化肥也是大部分不要，少搞一点，用在那些需要的作物上。这是我提出来交換意见。我看沒有洋化肥，亩产一万斤，苏联有了它是一百八十五斤。我们是万斤可是沒有洋化肥。拖拉机也是一样。土化肥就是洋化肥，第一，是人畜拉的屎和尿，第二是压绿肥，第三是土化肥，这些都是化肥。（××：全专区有二十三万个化肥厂。）好吧！在当地群众搞，比洋化肥好。

北戴河提出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种树。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柴是化学原

料，可以多种些。

拖拉机是否少搞一点，但是要机械化，用其它的形式，用中国的形式。少搞洋化肥也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机械化是否一定要经过拖拉机？肥料是否一定要经过洋化肥？人畜屎尿绿肥、土化肥、拆炕、折墙、挖河泥，多的很嘛！

你们钢铁任务多大？（××1105万吨，七万吨钢。）你们钢的原料从哪里来？什么叫低碳钢？含碳多少？（××不清楚，说元朝都在这里炼过钢。）你们怎么知道是元朝的？你们这里有多少矿石？（××：勘察清的有×××吨。）含铁60%，就×××吨铁。这两个月矿藏资源查清楚些了吧？（××到处说有矿，越来越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了。）由糊涂到清楚，用铁垒梯田、垒墙、垫路，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富，土都是铁，不开矿挖土嘛！

你们这里有铜矿没有？（×××勘探清楚的有××××万吨）有铜矿就搞些铜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的好，这样可不可能？解放妇女，看拿些什么人去教育孩子，青年不愿意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重要，还是小人重要？还是小麦、棉花重要？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了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专、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它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这点人口25%的娃娃带好。在托儿所要比在家跟父母好些。

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饭，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和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的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食堂要划分一下，一、二、三类，找一个一类食堂，叫他们都向它看齐。（××：涉县有一个食堂，吃玉米饭半月不重样，搞得很好。）这好么！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吃早饭就是中午的劳动力，吃午饭就是下午的劳动力，吃晚饭就是明天的劳动力，要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

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要人吃，要人睡。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睡个中午觉，你们研究研究怎么样？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都可以。不叫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现在平均下来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下个命令至少睡六个钟头，睡完了劲更大。劳动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

吃好、睡好、孩子带好。

对小孩要吃好、教好、管好。你们六百五十万人，25%就是一百六十万吧！这是一支很大的娃娃军。有的就是见物不见人，钢铁也是物么，种棉花也是物么，不管娃娃军就是见物不见人。托儿所要比家里有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一定会垮台，不垮台那才怪哩！食堂也是一样，如果不比家里吃的好，那也会垮台。

劳动力如果睡不好觉，私有都没有了，睡觉也是私有哩！在中午让他们睡一个钟头，你不是军事化吗？营长、连长开一次会，好连长应当是关心战士，给战士盖被子，不是老是只睡五个钟头，要睡七个小时行吧？不睡不行，睡觉是个任务，强迫命令一下，群众会欢迎的。这当作问题研究，不是作了决定。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你们这里公社平均一万戶左右，你们这里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这里还有同车巷。）廉颇蔺相如还要同车，我们的干部有的鬧不团结，连车也不同，还不如他们呢！

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大搞土法炼钢、秋收种麦、水库用劳动力，群众不能休息。）三大任务，有四百五十万劳动力，怎么组织好些？小土办法要一点，睡觉，一天一定要比七个钟头，这是个任务，你们先试一试。小孩问题，都不愿管人，师范学院的不愿教书，这是本末倒置，愿管物，不愿管人，实在也怪，我愿在小学当教员，去管娃娃。睡不好觉，你们要看到后果，几年后是会受到影响的。苦战，睡觉算苦战任务之一，吃饭要吃饱吃好。睡觉就睡七个钟头。试一试看完成任务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比睡觉少完不成任务。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管人的事情。这都是人的事情。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沒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沒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書記談話紀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你们这里沒有钢铁？（×××：有很多铁矿）。路东有什么铁？（×××：路东沒有，都在路西。）有多少参加搞钢铁？（×××：120万人。）包括炼钢铁炼炭、运输？（××：包括。）区有多少人口？（820万人。）八个里头一个还多。天气冷起来你们怎么办？你们搞起来多少铁？是铁渣？是铁水？（×××：全年任务××万吨，已炼铁××万吨。）不算铁吧，同志。（×××：有10%的好铁可以上调的。其余我们可以自己炼钢。）可以炼钢是不是商城又炒又打的办法？只炒不打可以吧？（×××：要打。）一个爐子要多少人？（×××：六、七人。）一半炒一半打？（×××：大致是。）你们炼多少钢？（××：全年任务××，已炼钢××。）那你们可以不要干事情，睡大觉。下雨下雪怎么办？你们打算沒有？（×××：我们正在开会研究，打算十一月分下山一批。）（×××：采取精兵的方法。）什么时候再上山？明年开春。你们准备下山多少？（××：六十万）。还有六十万住在什么地方？下雨下雪，要叫他们生活好，工作好。山上的人都是青壮年吧？（×××：也有很少年纪大一些的。）有妇女沒有？（×××：有，妇女顶大事。）顶大事。（××：有这样个道理，妇女搞农业生产，沒有男人熟练，不如男人。搞钢铁男女都不会，大家一块学习。（×××：有的妇女比男的学得还快。）啊！有这个道理。120万里头有多少妇女，（×××：40%，四、五十万人。）

七里营的棉花收多少？（×××：全年平均每亩皮棉200多斤。）我去看的那一块呢？

（×××：还要多些。）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十斤左右，今年都在三十斤以上。）多一半还多。（×××：还有下种几百斤，一千斤的。）太多了，挤死出不来。（×××：分层种，象楼梯一样。）啊，麦子在楼梯上站着。（主席笑，大家都笑。）你们的地耕得深吗？（×××：一尺二寸左右。）沒有七、八寸深的？（×××：有。）五、六寸深的？（×××：很少。）要注意浇水、追肥、锄草、管理，要注意一下。

群众生活怎么样？食堂办的怎么样？（×××：以连为单位办食堂，一个食堂几百人。）要轮流吃饭。（×××：原来有打回家吃的，现在都集中吃。）打回家吃饭就冷了。吃多少粮食？（×××：可放开肚子吃，不限。）这是一件大事，吃饭还有菜，都有菜吃吗？（×××：有。）什么菜？（×××：红薯、蘿卜。）（×××：七里营群众普遍可以吃上豆腐。×××：还有豆芽。）冬天吃什么菜？（×××：蘿卜。）每人每月吃多少盐？能不能吃一斤？（×××：差不多。一个同志说：现在市称改为十两一斤了。）油呢？一天一个人五錢？你们明年要有计划种油料，你们有棉花，可以吃棉子油，每人每月十五两。（×××：可以。）不仅是饭，还要是菜，菜里还要有盐有油。猪肉一个礼拜吃一次行不行？（×××：行。）鷄蛋呢？（×××：猪肉、鷄蛋国家都收購，不能吃的太多。）

公社的工资普遍发沒有？发的什么？（×××：人民币。）人民币从那里得来的？（×××：政府收購物资。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工资？（××：都能发。）靠不住。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它只产一点粮食，那有錢发工资？（×××：受灾地方困难些，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灾区，有丰收区，可以互相调济。奖励工资究竟好不好？每个月都要评，爭吵，你多我少。（×××：我们是津贴。）你们是津贴怎么分配？（×××：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年七十元。）津贴多少？（××：供给部分70%，津贴部分30%。）

钢铁基地上有医生沒有？（×××：有。）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蔣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你们有模范食堂？（×××：有。）你们把食堂排排队，分一、二、三类，号召二、三类食堂向一类看齐。（安阳县委书记：安阳挖出一个赵匡胤炼铁的爐子。）你有什么根据（看县志和听老年人说的。）安阳出曹操、袁世凱（坟在那里），沒听说赵匡胤在那里炼铁。赵匡胤是洛阳生的人，他的父母是个小官吏，是五代梁、唐、晋、汉、周时的人，你说的可能是宋朝时候的炼铁爐。（大家都笑了。）

管理人员是件大事，一是管小人的，一是管吃饭的，过去都不愿干这种事，不愿当娘姆，这个事情不管好怎么办？优越性就是比父母管的好，管的一样就沒有优越性，管的比父母差一些，他还要拿回去，沒优越性就不行，出个大字报，看你怎么办？大灶不比小灶好，怎么能行呢？现在大家一股劲，将来大家一算细帐，说不好。（×××：能办好。）你们都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信心。有个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办的比单吃的好。）有垮台的沒有？（×××：沒有，许多妇女决心大，把小锅都砸了。）这个革命可革的厉害。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幸福。）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我们的幸福院，现在只收五保戶。）他们做活不做？（×××：做。）是单独搞还是跟群众一起搞？（×××：有单独紡紗的。）他们吃饭怎样？（×××：小孩……吃中灶，青壮年吃大灶。）这个好，客人吃饭要不要饭票？（×××：不要，实行供给制。有一个老人来了客，队上给他做四个菜，还有酒，他高兴极了。伙食是个大事，你们解决得

很对。

睡觉问题解决的如何？睡觉要当任务，每人每天能不能睡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总可以。（×××：睡不到六小时。）要强迫命令，一定要睡六小时。紧张时也一定要睡六小时，睡五小时就沒有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疲劳的时候，叫他们睡半小时再起来干，睡觉是一大任务。（×××：现在炼钢铁，秋收秋种，过去这一紧张阶段就可以了。）你们研究出几条睡觉的宪法，规定小人、青壮年、老人的睡觉时间，睡不好将来要受损失。（×××：七里营妇女摘棉花，上午两个小时可以摘六十斤，下午四个小时只摘六十斤，疲劳了劳动效率就不高。）不管你如何紧张，一定要睡六小时，少半个小时也不行。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主要是干部，小人要睡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们不是有营、连长吗？（×××：有。）叫营长、连长下个命令，躺下来睡，叫农民睡个午觉，你们研究一下，这是大事。一个吃饭，一个睡觉，一个管好小孩子。

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他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我们再搞卫星田。）搞大面积卫星田（×××：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年后，公社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出题目你们研究一下，不要一下弄的沒饭吃，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的要死，好，咱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为八屆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議上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第一次講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紂，也是

如此。

〔陈伯达同志插話：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內，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3)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4)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內，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內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〇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②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沒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內爭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象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鋁、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輔，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輔。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象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泥、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铔。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

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第二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綱，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象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沒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煬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紂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〇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錢。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錢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沒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門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錢多。农村水、火不算錢，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諱“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难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象黃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頓，不过一两五錢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門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驟，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四—二—十制，工人最好是八—四—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五十年，种树也必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候，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鎂、鉀、鈉、鍺、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第三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錢，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錢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沒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沒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

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門。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錢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錢，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第四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象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义社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义社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〇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

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綱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指标指“××”，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拔，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鋁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卫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嫫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罰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傢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爭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罰。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謊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謊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謊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国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眞眞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瞞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

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一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綱，工业方面以钢为綱。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綱，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馬克思讲过的，是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象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沒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絲、棉、蔴、菸，都沒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錢，就发不了工资。

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錢。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錢的东西。钢铁赔錢，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賺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象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辮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关于讀書的建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那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那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

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馬列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辯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期间，读这些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覚得如何呢？

在为八屆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議上的講話

第五次講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

題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題的紀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沒有实現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脫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脫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現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則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損伤积极性，线內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綱，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換提高到产品交換，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沒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減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

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門（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含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碼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碼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意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第六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話”，是不对的。诗有达話，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潤，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現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象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馬克思教科书时是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象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則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剝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象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減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象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闖。我们沒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則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則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則才能去駕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則，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則？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觔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

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請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沒有先例的。"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象蒼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沒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沒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沒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綱，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綱，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側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綱，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綱。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鬧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沒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沒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話很好。我们还沒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喲！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題。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銅鋁。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

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沒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沒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沒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錢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話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沒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国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沒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馬克思主义者”要剝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剝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剝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误，征購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戶戶谈统購，这也是“可怜的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減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沒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脫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繳（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內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譚）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贏。中国工人穷慣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簡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沒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剝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錢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錢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錢，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黃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

这是山西的話。不断革命沒搞，停頓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接受的。要全力展开貿易。这段話，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貿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貿易，不能剝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購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沒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紡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沒有资本主义剝削工人，沒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沒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〇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貨，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話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沒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換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吳××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爭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爭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沒有可能的。杜蔣在一起好，还是爭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蔣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駁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沒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说主席在郑州谈話（一九五八年）时，对《人民日报》提了两点意见：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靜些。（有人又说，要当头脑冷靜的促进派。）

《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沒有进行批判，欠了帐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問題》一書

（一 九 五 八 年）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經济法則性質的問題

1.作者摸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則与政策有区别，这一点很好，主观的计划应力求适应客观的法則。他提出了问題，但沒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不大清楚。他们的计划，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法則，值得研究。

2.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学多研究它的必然性，对客观的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沒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才能认识，几年不晓得以钢为綱，今年四月才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

3.“必須研究这个经济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須制定辯证的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則的要求的计划。”作者这段話很好，我们还沒有充分地认识、学习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法則。

4.关于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法則，作者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題沒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那么多規章制度呢？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問題

1.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作者完全正确（P13），商品生产看它与什么经济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2.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重要，极为有用。

3.不要以为自给自足就是有名誉的，商品生产不是名誉的，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否则不能发工资。

4.我们向两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

5.作者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资料是商品，这行不通。商品不只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

6.我们现在之商品生产不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

7.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8.商品流通之重要是为要共产主义所考虑的，必须在商品充分发展以后，当有权支配一切商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不必要，而趋于消失。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法则问题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1.他们宣布土地国有化，实际是社有，我们没有宣布国有化，实际上是比较彻底。

2.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标志，只能够有条件地调拨商品，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算全民所有制。

3.这一著作的最后一封信，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这是彻底错误的，把国家和集体对立起来。

4.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作者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地说，要单独地讨论。

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1.作者说农民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秩序。

2.社会主义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要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秩序，实行部分供给制，这是为了破坏这种秩序。

3.他们社会主义是两种所有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共产主义因素不提倡，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割裂轻重工业，公开提出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也扩大了。

4.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錢就是萌芽。

5.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不造成障碍。

6.作者对于两个过渡没有找出方法来，没有解决以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出路。

7.作者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是好的，但缺少个政治条件，这条件的基本点就是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没有一条办法，没有几个并举，没有设法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斗爭，作者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办到的。

六、其他问题

1.政治经济学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在他们的经济学里，其实每一段里都没有“忘我”，是冷冷清清，悽悽惨惨，阴森森的，好处是提出了问题。

2.他的批评方法里，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过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3.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谈，教育制度、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没有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到共产主义？作者见物不见人，只见干部、技术，不见群众。

在武昌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洪山）

第一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睡不着覚，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帳。出点題目，請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綱，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沒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內，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象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沒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馬克思那时沒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沒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沒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則，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內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沒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題？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題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閡等一系列的问題。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錢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戶，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沒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沒有反

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沒有需要？有沒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象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沒有来，他的腿就是沒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綱，但眞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沒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们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沒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請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騰騰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

库，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马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話：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攒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館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沒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沒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綱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沒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沒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沒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話：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象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

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錢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請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剝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沒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剝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場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場，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沒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淨？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沒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

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沒弄清楚，請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沒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辮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紛紛，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沒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沒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虛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覚，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覚。现在要減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銅、鋁、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則。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沒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減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軋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話：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則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側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紡织、造紙，这次会议要唱

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象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吗！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即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象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第二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請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

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沒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沒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沒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軋钢设备还沒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爐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場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沒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綱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沒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沒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沒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陈，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

場，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馬克思会为我弁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覚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陷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門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沒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眞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蔣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蔣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請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沒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題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帐，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滿意。

第一本帐，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門的指标，都要相应地減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呂正操，沒有钢怎么办？（呂：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題是能不能办到，有沒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眞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則压在地方身上。（×

×：任务是第三本帐，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門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象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沒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沒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沒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爭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沒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沒有就沒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爭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项沒有假，有真必有假，沒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沒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你是元帅，算了帐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沒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象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鏡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沒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績，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沒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沒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

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沒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話沒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沒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內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走，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馬克思还要罵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沒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就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絲、茶、油、麻搞多了是沒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沒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沒有跃

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內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眞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虛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洩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眞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沒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眞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恳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話沒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話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沒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釣魚就釣魚，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象过去內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沒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內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沒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鋒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錢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內讲清楚。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組关于組織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結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医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爭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爭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須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

記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靜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傳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虛和实的问題，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側面。看问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辯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瞞产？我对隐瞞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話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瞞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瞞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隐瞞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瞞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沒有大不了的坏处。

虛报不好，比瞞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虛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虛报。如果虛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虛报。

紧张好不好？沒有紧张就沒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話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話。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內“强迫命令”，不反对。

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坏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沒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給周士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

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則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紛，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都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说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有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是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蔣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约得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沒动，眞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却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何也？河則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則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蠱病，俗称鼓胀病。周、秦、汉累欠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湘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請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辯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第一次接見朝鮮代表团时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越搞越热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与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

一个民族，一个党，两个民族，两个党，兄弟国家有十二个党、十二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十二国、六十四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对于我们之间的认识，对于十二国之间的认识进了一步。

我们对你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同你们认识我们有一个过程一样。

……

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讲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些方面表现了馬克思主义路线的本质，这些都是表现，例如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表现。是不是坚决？可以作个比较。象铁托是不是坚决？他的东西，我看三条都缺少。反帝国主义，他是不怎么反的，总是讲帝国主义好。

接見金日成时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武汉）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今天沒有什么力量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党。我们好好的搞，是可以继续巩固的，但是我们还沒有最后巩固，有可能我们来一个大失败，敌人全部的占领上海，占领武汉，占领北京，占领郑州这一条线，我们要退到西北西南山区，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保证能够经过几年的战斗，最后能够恢复我们中国，最后战败帝国主义。不能只看到现在发展顺利，我们随时要做好这个准备。

一　个　教　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沒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象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沒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話，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門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沒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对两份关于国际問題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一）对宜乡《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宜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沒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話。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二）对《从美国总统竞选看美国的内政》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宜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講話（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則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話：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鋼鉄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減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綱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沒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題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題，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錢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清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沒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沒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題，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題，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題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題。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題，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綱，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暢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沒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

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話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开记者招待会，在柏林问题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鲁晓夫也懂得了搞紧张局势。我们也搞点紧张局势，使西方要求我们不要紧张了。让西方怕搞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台湾就开紧急会议，其实会上沒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四国首脑会议不得开了，也说是受中国影响，其实会上也沒有说四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如果出远門，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经不健全，从前哪里也不去。各种材料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也沒有了。杜勒斯十八日的谈話说：你们共产党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个范围，你们只管你们的事，不要管你们以外的事，我们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说我们搞奴隶劳动，搞集权主义，说我们积累太多。他说总收入扣除工资，就是积累。他把这种积累叫做资本。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是列宁的公式。好好看看杜勒斯十八日的讲話。他承认我们的积累多，组织性强，哲学搞不赢我们。杜勒斯谈話的调子低，战爭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不说了，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美国人老奸巨猾，美国人比较暴躁，美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会议，三千七百万教徒发出一封信。主张承认我们。杜勒斯说教会只要规定道德原则，细节不要管。

北戴河会议谈的八个观点灵不灵？还是灵的。北大西洋公约，同民族主义和本国共产主义进攻（重心是进攻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除非出了侵犯利事件。但我们在宣传上是另一回事，还要说他是进攻的。不要自己被宣传蒙蔽。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不是进攻，但说服不了苏联人民。谁怕谁多一点？李普曼主张把印度扶植起来抵制我们，看来很怕我们，怕我们在亚洲、非洲爭取领导权，很怕我们经济高涨。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戴高乐出现，横暴要出现，出现了，比较对法国无产阶级有利。中东美军早撤好，还是晚撤好？只有一个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证明他们撤走。台湾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组织这样快。禁运、进联合国、和、战、打原子弹问题，比较对谁有利？怕好还是不怕好？横起一条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议一议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战。挨黑是假象，不是真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看要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人民生活穿三百卢布，比我们稍高一点。重工业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一点，松一点。比较集中，只搞两个文件。纸老虎问题，党内外尚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说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打台湾，为什么还要提出赶上和超过英国。我写了一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是真又是纸，暂时现象是真的，长远来看是纸的。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爭应当这样，对自然斗爭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

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講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紙老虎的问題。我的回答是，即是眞的，又是紙的，这是一个由眞变成紙的过程的问題。变即转化，眞老虎转化为紙老虎，走上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現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題，战略上藐視它，战术上重視它。不是眞老虎，为什么要重視它呢？看来还有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規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眞老虎又是紙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內，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眞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迈步壯大，并同它们进行斗爭，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紙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臨人民决死斗爭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眞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爭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現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眞老虎吗？但是，他们终究转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沒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眞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須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紙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眞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爭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爭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綱要》，这些都是从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的变化当作过程出現，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視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視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过艰苦奋斗，不奋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法則。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眞正单纯的乐种，从来沒有。每个人都是忧患与乐观同乘。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劳七伤，使魏到四十一歲，以及"天有不測风云，人有旦夕禍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爭，向自然界的斗爭，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視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

一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矛盾的每一个问题的侧面，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或者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跟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地热起来。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沒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载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爭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沒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沒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頓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話，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罰，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沒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沒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辯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罵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沒有抗旱，而謊报抗旱。总之处罰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馬克思尝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鋒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鋒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帐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剝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剝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紛紛，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脫韁

之焉，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黃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黃石港不是中吗？有沒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嗆也沒有，窮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搞大而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沒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沒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虛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

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沒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沒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馬克思那里去請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綱要，这次擱下沒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驗，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綱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沒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脫发、脫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沒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沒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

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沒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諱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沒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爭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門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話，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軋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騙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沒有，有沒有，沒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沒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脫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測风云，人有旦夕禍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話。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沒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沒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話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爭取超美后才去见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说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

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对《张鲁传》評注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那是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綱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团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沒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爭史。

附：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为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居巴汉，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缓刑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以鬼吏，主为病者請祷。請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

小人昏愚，竟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戶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贵富。今丞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曰：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尘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守易，虽有精兵虎将，势不能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张鲁或张卫）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世语曰：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张卫军大惊。夜，（魏军）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只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逐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戶。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戶，五子皆封侯，过矣。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明轨训，于物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遂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欤？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魏略曰：黄初中，增圃爵邑，在礼請中。后十余岁，病死。（晋书云：西戎司马阎纘，圃孙也。）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复军山下。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郭李之乱，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小将，马超等仗，不肯从，超破之。后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部党不欲降，遂刼以反。诸亡命皆往给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鬓曰：老贼，眞得汝矣。复其官，徙渤海。时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各有众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阵死，银、选南入汉中。汉中破，诣太祖降。皆复官爵。

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公报问题。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样子会四分五裂,但是也还不准。欧洲大陆一个集团,对付英美,但内部矛盾重重,德法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们是又团结又斗爭。斯大林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要打仗。我们早已说过,一九四六年我们写的文章,发明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爭夺中间地带是主要的,为什么不打中间地带,先打苏联呢?以反共为名,去搞蚕食政策,对中间地带侵略,引起中间地带的反抗,有广大中间地带,他们走不过来。包括美、法、德、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们的后方。欧、亚、非在鬧乱子,美国如何脫出手来打苏联?

剝削是剝削人,剝削人才能剝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干什么?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打原子弹,还是常规武器。我们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赞成,许多国家都不怕美国,不能訂个条约互相不使用?垄断资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为沒有原料,沒有市場。

公报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说:要搞经济竞賽,要把印度扶起来。印度如何能扶植起来呢?西方是一股悲观气氛,我们是一股高兴气氛。四分五裂这句話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眞理,但一讲,是否会引起他们警惕,可是又沒有办法。美国在台湾要把自由主义分子挤进去。伊拉克很紧张,这几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胜负还未决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阴谋(卡賽姆——为什么解散工会?怀疑伊拉克为什么消息灵通)。

(2)三个文件,已定稿。辞职问題:"偶象"总要有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沒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沒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死了便成为"偶象",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里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可少,可上可下,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五九年计划搞二个月再说,二月半再议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海。

香港报,黑蔣介石"仓惶辞庙,逃往台湾"。

人代会三月十五日开。

二月一日开会,除检查两个决议外,另外,整頓国家机构是必要的,安排人代会报告,还有教育问題,人民公社再搞点内部指示。

人民公社对宪法有破坏沒有?例如政社合一问題,人代大会沒有通过,宪法上沒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学美国,搞不成文宪法。美国是不成文宪法,一篇一篇凑起来的。

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搞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少

則三、四年，是指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多則五、六年，是指第三个五年计划。

（3）人民公社文件，还要修修补补，还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时间修改，十八号发表公报和主席辞职问題，十九号发表人民公社决议。

主席辞职问題，如果还有疑问，还可再开一次电話会议，解释解释。

（4）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錯誤，想了一千〇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門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沒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現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沒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陈烟明在东江和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凑股子，选举一个人当局长，抓两个月一摸。

还有两句話，“轻重緩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横联是“政治挂帅”。

下午必須开一次会，出告示，要专政。省委书记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经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问題，做省委书记要全面，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顾全大局有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顾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扬一辰就是不顾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陈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顾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顾大局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如扬一辰、高岗、罗章龙。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顾全大局，扬一辰有多少馬列主义？一毫也沒有。

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紧，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红娘晚上站在外边，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給自己詩詞作的解释

我的几首词发表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在广州，见一九五八年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鉤沉》后记中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蚤蚊逞强，于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们仍需努力。港台一带，蚤蚊尚多，西方世界，蚤蚊成阵。安得其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天上太空，　　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蚤蚊日，　　公祭毋忘告馬翁。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沁园春

长沙

一九二五年

击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到隆冬，犹在水中。当时有一篇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菩萨蛮

黄鹤楼

一九二七年

心潮：（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萧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春季。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从此才找到了出路。

清平乐

会昌

一九三四年夏

踏遍青山人未老：（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首清平乐与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情。

忆秦娥

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

万里长征，千迴百折，胜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几首反映了这种心情。

七　　律

长　　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水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的。他说：不要一篇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陆海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谓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念奴娇

昆　　崙

一九三五年十月

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后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清平乐

六　盘　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蒼龙：（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縛住蒼龙？）

指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时全付精力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沁园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

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咒骂这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

末三句，指无产阶级。

七　　律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三十一年：（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北京。
旧国之国：都城。不是Ltoho（国家），也不是Country（首都）。

浣　溪　沙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五〇年十月

乐奏：（万方乐奏有于阗）
这里误置为“奏乐”，应改。（现版已改正）

水　调　歌　头

游　　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

长沙水：（才饮长沙水）

民谚：“常德山山有德；长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在常德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

武昌鱼：（又食武昌鱼）

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饮扬州（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

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时所加的一段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爭中，认识到了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沃土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爭，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接見参加全軍政工会議的各軍区負責同志时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要培养新生力量，沒有年轻的哪能写好文件？

△过去不是有人说干军队沒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战时有奔头，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可以成为多面手，一专多能，学会很多有用的技术。

△金門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沒有影响？还是不要打？（答：部队情绪高）鬧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門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馬走了，我们怎么办？請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蔣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蔣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沒面子啊！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請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如果金門的敌人真叫我们

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在此次军工会上，可拿一天时间谈谈形势问题。过去，《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们对台澎金馬的政策问题想不通，新华社的同志也讲不通，周总理报告了，分头研究，才搞通了。在此次政工会议上可以大鳴大放一天。这是政治问题，国际形势，离开形势，政治工作不好做。过去的规矩，第一是讲国际形势，第二是讲国内形势，第三是本部队。过去那些有点形式主义，如一点不搞就不好了。形势问题至少讨论一天。

△四国共管柏林，是德苏战爭结束，苏联打得精疲力竭时，斯大林同意了的。尤金大使曾告诉我，苏德战爭中苏联死了两千万人，可能包括战区的男女老幼。苏联近两亿人口，就算他有五千万壯丁，作战死去一千万壯丁，问题不算小。苏联同志们，斯大林在那几年中能取得那样的胜利，已经了不起。斯大林为什么不要我们和国民党打仗呢？因为国民党就是美国人。一方面他把美国夸大了，另一方面把我们看小了。后来斯大林承认他错了（一九四九年夏）。他曾问过××，他说的話在中国有无影响？××说，沒有影响，因为你们提出的，我们沒有执行，也不能执行。一个共产党指挥一个共产党，奇事。因为当时沒有第三国际了。其实蔣介石硬要打你，你不打怎么办？……美国也怕我们——怕我们蛮干，不怕死。别的他也知道，无非是手榴弹那一套；还怕我们的将来，今年是钢翻一番，粮食那么多，眞让我们搞七、八年，可了不起。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他总研究人民公社，黑我们两条：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家庭要不要拆散？有沒有这个问题？劳动是不是强迫？如蔣介石强迫老百姓那样，还是自愿？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只要我们让他们睡足覚，每天睡八小时，一定要强迫，你不睡不行。

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学军队的办法，准备出发，十分钟可以完吗？出发很快，整整齐齐。还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过去各家吃饭，这家煮得早，那家煮得晚，上工稀稀拉拉要三小时。现在一个食堂吃饭，议事，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方便，上工整整齐齐，只要一小时。

△政工会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有些什么问题。（众答：房子问题，男女分居问题……）分居有几个星期，扎野营你不分居怎么办？这次人民公社运动比合作化要顺利些。由个体到集体比较难。合作化和现在的变化哪个大？

△（谈到部队内民主作风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样整整齐齐的军队还这样，公社刚办起来，有点缺点就议论紛紛，公道不公道？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三个月不搞就忘得干干淨淨，天下大乱。还不是每天搞，每个礼拜搞？

小锅子还是要恢复，可以炒菜，做饭，大集体，小自由嘛！自由主义搞光了不行。

对领导方法简单的农村工作干部要说服教育。过去，军队里的官长只要兵不听話就打，把打人当作最后的手段。后来我们实行官长不打士兵，许多班长就沒办法了，经过说服教育慢慢地就改过来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兵还是可以带走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不是写一个文件吗？现在看那样的文件，哪有现在这样进步？问题那么多，沒有发挥。

公社一个连长要领五百人，实际上是一个营，有男女老幼，不如军队好带。

去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巩固合作社，现在五六～五八年，加上明年四年之内使人民公社上轨道，使干部学

会带兵——男女老幼，又管生产，又管生活，又管思想，又管精神，又管物质。

把过去的区乡干部转为公社干部。政社合一，县政府就不要了，县级干部转为县联社的干部，县委会就是县联社党委，加上下放干部。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姜太公当政委，武王是司令员。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三化是军队发明的。组织不军事化怎么打仗？从来军队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好，乡村搞不得？广州市有没有公共食堂？死了人没有？（朱光答：有食堂，死的都是该死的。）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点不会犯原则错误吧。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一九五五年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谁料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一整、波匈事件，一两周之内，天下大乱。这是坏事，没有料到。有好些事也没有料到，如今年的大跃进。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斤以上，共……亿斤，砍掉……亿斤，算……亿斤，有个保险系数。这件事我就没料到，人民公社也是没有料到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七月份还是没有想过。

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

还有军队起变化。今年一月份我找几位部队同志谈話时，罗荣桓同志讲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军委开了五十五天会，以后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解决了。现在空气不是改变了嗎？还不是有希望嗎？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八个文件，是去年就计划好了嗎？我不相信。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大跃进，干部当兵，民兵大发展是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搞起来的，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

△（谈到看问题要看到两种可能性时）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你们广东就有省委书记想搞分裂嘛！我们的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不准备就被动。列宁总是不避諱，他常常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解决。还是帝国主义灭亡，还是我们灭亡？中苏社会主义十二个国家是共同命运，无论如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暂时灭亡，部分灭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会崩溃一部分。没有坏处，这部分的失败有好处，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你们准备垮台就不会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们可以进行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我们这次决议上没有写。工厂的工人可以跳厂。鞍钢那么大，工人自己一个人要成立一个鞍钢是困难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似乎与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论点不符合了，这还是

符合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象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不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让敌人登陆。登陆了，可以打败它。或者就是登了陆也只占领少部分地方，这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苏德战争，德军打倒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不是苏联崩溃。但是那是危险的。第二个可能也要估计到，要受损失，部分的，暂时的。

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闹别扭，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西方世界闹别扭，不带革命性；纳赛尔反帝是有革命性的，但是他们一面反帝，一面本国又有反动的部分，如印尼右派。

把各国因素合起来看，巩固因素第一，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仗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写保票，总还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性，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

活老虎能转化为死老虎，铁老虎能转化为豆腐老虎。估计两种可能性，说东风压倒西风，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说通了。在座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说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两方面都要估计到。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門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我的讲話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议。一个人也有两种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广州军区一千台汽车三个月之內运输了许多物质是好事，但是有××人伤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沒有？有个县委书记被碰伤了，他事先也沒有想到呢！部分的，暂时的损失随时都要准备。三个月之后总要进步一点，老是这样搞还行哪？

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对地方党委領导新聞事业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新华社国内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合并，体制下放给地方党委，曾向主席汇报此事，主席说，

早就应该这样做，过去（分社）省也管不了，现在这个办法是适应国家的情况的。省委管比你们有办法，分社也就不孤单了，就有依靠了。

关于造船方針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　月）

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爭时，在打败敌人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本土，坚决、干淨、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侵略战爭永远不再发生。为此，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建设以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給福斯特同志的回信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編者按：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寄给毛泽东同志一封信。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给福斯特同志回了信。信中说：

十分感谢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来信。从您的充滿热情的来信中，使我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共产党的灵魂，看到伟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的灵魂。

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很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很多人现在还沒有覚悟，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美国共产党虽然暫时还处于不大順利的地位，但是您们的斗爭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現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久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暫时的現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面起变化。

請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致以衷心的问候，并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如果您有可能的話，我热诚地欢迎您到中国来医疗和休养。

接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談話（摘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用他们，沒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沒有他们就沒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又用他们，又同他们作斗爭，所以是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爭性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北京有三十四个高等学校，我们让他们造反，有一个时期他们占上风，鬧得天昏地暗，好象共产党就要灭亡了。这时候，我们准备反攻。经过几个月的辯论，駁倒了他们的謬论，多数人爭取了过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你们那边不能这派样做，因为你们离敌人太近了，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我们一个月沒有说話，并且给他们登报，这就给他们照了像，再也收不回去了。然后，我们就组织队伍，进行反攻，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右派的政治资本沒有了，可是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再来，我们要有准备。

在省市委書記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象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話，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爭，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暫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請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辯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沒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辯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象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靜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鬧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駁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駁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則不如无书。武王伐紂，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話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

……

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论、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挣三百亿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漚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人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話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塗，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

感。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編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綱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綱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沒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內。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場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蘆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馬列主义的普遍眞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門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貨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象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沒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話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象小孩抓火一样，沒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沒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沒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爭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門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沒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沒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沒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請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沒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驗，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驗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罵一頓。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爭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請同志们研究。

对新、洛、許、信四个地委座談时的談話（記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5,500万吨钢不能和我们1,000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剝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剝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包括桌椅板凳在內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沒有记取。1956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沒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沒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摘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門收購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沒有收淨，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淨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題。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話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25%，这就占1/4，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三十年间，沒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

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沒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沒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改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叫作这是好心不是好意（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沒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沒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沒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沒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錢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淨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沒有錢，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一）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貧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沒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沒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賬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現在正在进行整頓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辯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現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沒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沒有被揭露，因而沒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購至今还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务。再則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鬧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請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現象看出问題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

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內，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內，实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沒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脫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脫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內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沒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

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給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剝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剝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沒有采取无偿剝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剝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剝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

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戶，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爭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輔，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脫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象河北省遵化县鷄鳴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爭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減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脫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眞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內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績，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內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賬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

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絲毫沒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內，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頓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沒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題是公社所有制问題，所有制问題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戶，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題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戶，有一千多戶的。所謂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謂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稅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瞞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則。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爭，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爭是两个问題，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門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錢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題。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內主要鋒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瞞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瞞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

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門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購买东西不给錢，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錢，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沒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減少，沒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購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沒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購、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３８０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話：

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象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他产的吗，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吗，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剝

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设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培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大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購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致于如何实行，沒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沒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購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錢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購，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購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沒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錢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鷄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鷄杀掉，母鷄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煬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攬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

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請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沒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７％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７％，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門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鹅、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鹅、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剝夺过

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黑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鑰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

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澧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鶴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換关系。价值法則，等价交換不仅存在公社內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門之间也有价值法則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換，大体上是等价交換，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錢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貸款，主要支援貧队，一部購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許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沒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題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沒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請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賬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話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則，等价交換。統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則、等价交換。不解决这个问題，大跃进就沒有了。我这篇話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許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則。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題，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瞞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則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門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猪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沒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題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

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沒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沒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賬，卖粮之后，錢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購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鳴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內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溫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錢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

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賬。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

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沒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戶、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戶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沒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尝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剝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錢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換，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換，剝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購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錢，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沒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沒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一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購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长江 珠江流域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辮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話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沒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呂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沒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鑰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沒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

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沒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沒有錢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蘿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覚，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錢，中央僱工是拿錢的，購粮油是拿錢的，征購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黑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沒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沒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話，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象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爭，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謝，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門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

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紡织工业出紗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鶴寿不给他交換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換。国家给錢，就是公社不给錢。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沒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則，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話，起码暫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貧农貸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銀行行长戴一頂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內。对付剝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綱，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刼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爭边緣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緣我也边緣。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內外都不滿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帐，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帐，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刼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換，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僱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馬光的办法了。司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僱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辯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沒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覚得浪費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沒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

济剝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沒有飯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眞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錢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稅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減少，公共积累要減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減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題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場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鷄鳴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貸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戶，几百戶。现在多少戶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輔，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賴思想，何应钦不发錢，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館子吃飯也分山头。山头之內无話不讲，話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綱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洩气話，只能讲壮气的話，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題，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顧，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

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观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堵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蝎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馬列主义，沒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拔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沒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在郑州会議上的講話(六)

(一九五九年三月)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的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沒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沒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剝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炼、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党 内 通 訊(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

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話，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話，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帐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象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帐派无話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党内通訊（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

和王××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請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党内通訊（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話。因为他的讲話比一般公社第一书

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鳴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鋒，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帐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鋒。辯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門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暫时脫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請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悞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党内通訊（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財政金融貿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眞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关机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話，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脫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

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错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叫他们的話多了，我们也不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訊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議的报告》的批示(节錄)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沒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覚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騷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騷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覚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象，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帐不能不算这句話，是写到郑州讲話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帐一般要算。算帐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刼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驗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淨；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眞正的民主集中制。

在上海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要多謀善断。第一要多謀，第二要能断。

什么叫多謀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換交換意见。

要謀于秘书，謀于省市党书记，謀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謀于农民，謀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組长，謀于工人，謀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錯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 × ×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圍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打沒有准备之仗。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眞正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沒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比如就不晓得多謀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題。

× × ×

我们过去反对的"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馬鞍形"是不行的。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库存減少很多，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調整一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調整。錢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馬鞍形"将来还会有。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天高潮。象我们开会，每天高潮，就要死人的。波浪式的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題。

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紀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但是他们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变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大概是一

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除掉几万人，还是一百十几万人，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同情相反，我们同情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少数人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和阿沛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资，二不生产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结婚的，回教是结婚的，天主教多数是结婚的，只有少数不结婚。（周恩来：印度教也结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数人以外，也结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结婚，不生人，不生产后代。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来一个近代化？同时，教徒（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可以維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信教的。但是你们要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个人自己决定。这些話，我跟达赖一个人谈过。我说，你们为了长久之计，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它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们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来不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边，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资本家也是一辈子都包到。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有利，这样一来，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把仇就解开了。而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个报紙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沒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事，既然我们打了大败仗，那么就有打了大胜仗的。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你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話有一点道理沒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奈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眞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沒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的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

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个大家的疑问。我这里回答：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军队，只要二十万的×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包括干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退××多，剩下××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这样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后，如果你们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西藏整个民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番、阿赛那些地方。这个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跟他们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刻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就举行叛乱，武装斗争。现在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现在有许多所谓康边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康人同藏人就发生了矛盾。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饭？那里来呢？就在这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来吃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那些枪收缴了。比如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的队伍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怕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头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军队，可以灭得干干淨淨。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要。所谓灭掉者，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国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之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他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之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象印度资产阶级，比如尼赫鲁总理这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是两面性：一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号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

党内通訊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問題，包产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問題，节約粮食問題。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題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話、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問題，扩种面积要多的問題。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問題，机械化問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問題，讲眞話問題。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話。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話。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話。老实人，敢讲眞話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話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眞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眞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講話（摘錄）

——工作方法九条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多谋善断，这句話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人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队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是要不得的。

二、留有余地，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需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这就是沒给下面留余地，也是沒有给上面留余地。过去我们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经济工作不能蛮打蛮攻，生产东西不能都停掉。计划工作就要留余地。保证重点是主要的，沒有重点就沒有政策，我们是按照政策办事情的。

三、波浪式前进，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波，曲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四、要善于观察形势。要经常注意观察政治动态，经济动态。所谓政治动态，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場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的工作。

五、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

不要优柔寡断，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一些，就要缩短一点。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要当机立断。

六、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一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是通气的办法。不要满足于书记处办事，更不要对省委书记封锁消息。

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話讲、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話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沒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权的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许多人死在朝廷。

八、要集中：集中在书记处、常委会，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党内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开展，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九、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話要看对象。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很多通俗的話。

工作方法十六条

（一九五九年四月）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沒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話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沒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

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話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沒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沒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泼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話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沒有重点就沒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爭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場了。沒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進。过去讲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滿乾坤福滿門。”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洩气的办法。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沒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顺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場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沒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了×××，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鑰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話不可听，尽是好話，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話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沒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沒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鎖。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請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覚，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眞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眞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眞理。那不见得。往往眞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眞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話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经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話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話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沒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权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原稿如此——抄者）。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沒有眞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問題。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吗了？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洩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沒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門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減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眞懂得经济，如果眞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沒有钻进去，沒有掌握材料，沒有把每个问題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脈。（按：此公报是在主席亲自主持下写的。）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題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沒有眞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沒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者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问写駢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訊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門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

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門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沒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眞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眞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評。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眞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沒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好。（可能有漏字——抄者）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爭，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

一个人如果沒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領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門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門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说明：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工作方法九条，此后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話增为十六条。以上是根据九条的传印稿和十六条的两种传抄稿整理的。）

接見智利政界人士的談話紀录（摘錄）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教人是很好的事情，跟学生保持关系，是很愉快的，特别是当大学教授。要研究学问，就要当教授。

我有几篇哲学著作，就是因为教书需要我写，我才写的。因此当教授是好的。要备课，就要自己写讲稿，不用人家的课本最好。学生逼你上课，你总要贩卖一点东西。我现在还想当教授。现在正如你们所说的。我的知识增加了，可能当教授，或是讲师或是助教。

要政治家办报

（一九五九年六月×××傳达）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不仅敌人，而且朋友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受到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話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大家在风头上，要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沒有注意价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沒有了。但吹的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內部参考”，每天必看。“內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內部参考”。怎样把“內部参考”变成报紙，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紙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对。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毛主席对？（注：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多端寡要，沒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內荏”，沒有头脑。袁绍还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校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用。——《三国志》曹操评袁绍。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 ×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談話紀录(摘錄)

表扬好人好事，批評坏人坏事

有鑒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不大了解，不懂得济济发展规律，有鑒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眞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很好，不謊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門说假話，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有系统的编一一本书。

成绩偉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国內形势如何？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①综合平衡；②群众路线；③统一领导；④注意质量。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絲、茶、糖、菜、烟、果、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沒有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沒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內部的各部門，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秩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现在是否是农轻重呢？也就是说，要强调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轻、农、商、交的秩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首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了之后，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会有人说闲話，罵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关于农村的几项具体政策

三定政策：定产、定購、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非恢复不可，可以三年不变，如果可以定，究竟定多少，增产部分是否可以征四留六，有灾減，自留地不征税，这次会议要议一下。

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場。

要使生产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加强中央統一領导，反对半无政府主义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有两条可以普遍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不搞一平，二调。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七月十日講話紀录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請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沒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眞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在廬山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話。我感覚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吳稚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話，只愿人家讲好話，不愿听坏話。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話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話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話。好話坏話都是話，

都要听。話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門，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沒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話都是会外的讲話。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請来。象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銘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話，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坐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場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沒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脫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資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逐平詳細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貧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資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貧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資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資产阶级，是貧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話了，請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資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賬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

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沒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刼，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剝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刼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刼的是“生辰綱”，就是我们打土豪刼的是不义之财，“刼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購、購买、挤垮，怎么能削剝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沒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則，等价交換，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沒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几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廬，笼盖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沒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沒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吆！要人家讲吆！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吆！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話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黑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話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話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洩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沒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

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紙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話的方向要注意。讲話的內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緣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緣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話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馬歇尔八上廬山，×××三上廬山，我们一上廬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戶，节约归已。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滿意了，一讲，吳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沒有这四句話？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沒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沒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賦"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話，不能到后宫

去，很危险。宋玉反駁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話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減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沒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沒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馬运，这点我沒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沒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脫也是开脫，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沒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話，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話，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闖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眞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蔣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絲麻、糖、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峯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囘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沒有一眼神气，沒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囁嚅"也，不要象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囁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話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吆，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闖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駁，说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对，事实上紛紛在駁，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駁，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尝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嵯峨山章程如

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話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悽悽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沒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沒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話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沒有来。）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維也夫后来被杀了。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沒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沒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沒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对于一封信的評論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六日）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門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爭沒有“同时”反对左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付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沒有好评。他是一

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洩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趦趄，口将开而嚅嗫”，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沒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廬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洩气。错误必须批判，洩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洩。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洩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沒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沒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

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廬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話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話。

对三个文件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請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邁同中央社的一則紐約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請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話，有那些是以使它们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話，又是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倒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請同志们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搬出馬克思这个科学原則，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給王稼祥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話，其意思是駁斥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在廬山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5人，会议议程：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薩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廬山前不清楚，上廬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話，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沒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沒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滿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則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癮，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论吗？廬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沒有显著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象“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爭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脫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換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爭，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場斗爭，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瘧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采

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是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廬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話：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沒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沒有了，浮夸也沒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給张聞天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眞是好宝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沒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纏住脫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瘧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臥，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顫时节，顫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眞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渙乎若一听圣人辨士之言，滋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眞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眞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著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話，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請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对《湖南省平江县談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象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鮮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順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覚者决志行之，則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話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閑話"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請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以介绍，請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意见是可以采納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請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闲話'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廬山讲闲話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对《安徽省委書記处書記张愷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愷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內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場，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爭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綱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場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傾指示报告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傾情绪、右傾思想、右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很好，步驟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为《经驗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書写的前言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各位同志：

建议读这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两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本书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頗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缺点和错误。不要紧，你们读时还可以加以分析和鑑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过教条主义，但是沒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在这里即出了《辞典》中的一部分，題为《经验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兴趣，以后可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門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門。

对《馬克思主义者应該如何正確地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一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題目叫做《馬克思主义者应該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廬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沒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釣出来”，而且“有些象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廬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請你们看看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請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一九〇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請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爭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題的那个文件，“不知道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砲，向着廬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砲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

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廬山出现的这一場斗爭，是一場阶级斗爭，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爭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爭，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爭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爭止息了，新的社会斗爭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辯证法，矛盾和斗爭是永远的，否則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爭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爭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爭。

党內斗爭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爭，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这种斗爭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沒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題，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題，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題，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爭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爭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內斗爭，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爭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則，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內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內，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內、中央委员会內，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內。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內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廬山会议上这一場成功的斗爭，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沒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損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幫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溫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关 于 枚 乘《七 发》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骈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骈体是有民主色采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提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采吗？“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腴，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有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爬山、游泳、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麤澁，四肢痿随，筋骨摧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侍而游讌，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象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臥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立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峯。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

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象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越，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釗、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贈之予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洩气、悲观、糜烂、右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吳王刘濞的文学待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吳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景、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附：枚乘《七发》今譯

楚国的太子有了病，一个吳国来的客人去问候他。客人道：“听说太子贵体不安，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太子道：“还疲乏得很，谢谢你关心。”客人趁机进言道：“现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在少壮之年。或许你长期貪恋安乐，日日夜夜沒有节制。邪气侵犯，在体内凝结阻塞，以至于心里烦乱郁闷，情绪恶劣好象醉酒似的。常常心惊，睡不安宁。中气不足，听觉不灵，厌恶人声。精神散漫，好象百病齐生。耳目昏昏，喜怒无常。这样下去日子长了，性命就要不保。太子你是不是这样呢？”太子道：“谢谢你。我倚靠国君中力量，常常有些享受，但是还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客人道：“一般贵家子弟，住在深宫內宅之中，內有媒母照料，外有师傅陪伴，要想交结朋友是不可能的。饮食一定是淳美香嫩，肉肥酒浓。衣服一定是溫暖轻细而且多，永远热得象过夏天。这样，虽有金石的坚强，也是要销损而解体的，何况筋骨之间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嗜欲，貪图肢体的安逸，就要妨碍血脉的和畅。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就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就是斫伤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就是烂肠子的毒药。如今太子皮肤太细嫩，四肢不灵活，筋骨松弛，血脉阻滯，手脚无力。听使唤的，前有越国的美女，后有齐国的佳人。往来遊玩吃喝，在曲折幽深的房子里纵情取乐，这简直是把毒药当看美餐，和猛兽的爪牙戏耍呀。过去的影响已经深远，而又拖延不改，即使叫扁鹊来治疗，巫咸来祷祝也来不及啦。现在对付你这样的病，需要世上的君子，知识广博的人，有机会时给你出出主意，改变改变旧习和成见，常在您的身边，做您的辅佐。那么沉沦的享乐，荒唐的心思，放纵的欲望，就无从产生了。”太子道：“等我病好了一定照你的话行事。”

客人道：“现在太子的病，可以不用药石针炙而用精深的理论来治疗。您不想听听吗”？太子道：“我愿意听。”客人道：“龙门山的桐树，高达十丈还沒有分枝。中心纹理盘曲，树根分布很广，上有千仞的高峰，下有百丈的深澗。急流逆波摇蕩它。它的根半死半生。冬天的烈风霜雪刺激它，夏天的雷电打击它。早晨有鸟鸣晚上有鸟宿。孤鸿在上面呼号，鹍鸡在下面哀叫。于是在秋冬之间，叫最精于弹琴的师襄砍下它来做成琴。用野蚕的絲做弦，用孤子的带鈎做隐，用九子寡母的耳珠做琴徽。叫师堂弹奏那名叫《暢》的曲子。叫伯牙来唱歌词。那歌词是这样：“麦芒尖尖啊野鸡晨飞，面向废墟啊背倚枯槐，道路穷绝啊溪流遇迴。”鸟儿听了，拢起翅膀不再飞。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再走。虫蚁听了，支起咀巴不再前进。这是天下最感动人的歌声，太子您够勉强起来听听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

不能够。”

客人道：“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加上筍蒲。用肥狗的肉来加羹，盖上一层石耳菜。煮饭用楚地的粳稻，或是雕胡的米粒。粘的饭成团，松的到口就散。敎尹伊来煎熬，易牙来调味。熊掌煨得烂烂地，加些芍药酱。将薄切的兽脊烤来吃，新鲜的鲤鱼做鱼片。配上秋天变黄的紫苏，白露时节的蔬菜。兰花泡的酒，酋来漱口。还有野鸡肉，豹子胎。少吃些干的，多喝点稀的，就象热汤浇在雪上似的容易消化。这也是天下最可口的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赏赏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又说：“钟、岱等地的良马，年龄到了就用来驾车，跑在前头的象一飞鸟，跑在后面的象距虚。用爵麦喂，马马都成了急性子的，配上结实的马鞿，赶上平坦的大道。让伯乐前后视察，让王良、造父来赶车，秦缺，楼季做车右，他们能制止乱跑的马，能扶起翻了的车子。然后和人家下千镒黄金的大赌注，在千里的长途上赛跑。这是天下最快的车子，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乘坐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登上景夷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水，左江右湖，那乐趣是天下少有的，这时可以叫博学有辩才的人，陈说山川的本原，尽举草木的名称，排比事物，编成文辞以类相连。在一番徘徊游览之后，下台到虞怀宫中摆酒。游廊连接四面有檐的建筑，有台的城，结构重叠，采画纷纭。车道交错，池水曲折，养的鸟儿有鸳鸯、白鹭、孔雀、鹍鸡、天鹅、鹣鹣、鸪鹊。有些鸟头上有翠毛，颈上有紫缨。螭龙鸟、德牧鸟，鸣声相和。鱼类腾跃，鳞翅振奋。清淨的水边长着藉草和水蓼，还有蔓生的草和芳香的蘼。女桑和河柳，素叶而紫茎，苗松、枕木和樟木，枝条上达青天。梧桐和棕树，一片林子望不到头。各种浓郁的芳香，和种种的声音相杂。树头舒缓地随风摇动，树叶翻复忽明忽暗。大家入座畅饮，乐声振荡快人心意。这时让景春来助兴，让田连来调音。各种美味陈列在面前，各色肴饭都具备。娛目的是精选的美色，悦耳的是流转的好音。这时发出旋风般的《激楚》之曲，飘起郑卫的悠扬乐声。叫先施（西施）、征舒（夏姬）、阳文、段干、吳娃、闾娶、傅予等美人，拖着各色的裙裾，垂着燕尾。眼光对人挑逗，表示心里暗许。她们引流水洗濯，身上带了杜若的香气。头发上好象笼罩着尘雾，塗上了兰膏。换上便服来待奉。这也算是天下美妙盛大的娛乐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玩耍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那么我要为您训练骐驥，驾有窗的轻车，您坐在这样壮马拉的车子上，右边带着夏后氏箭囊里的劲箭，左边带着黄帝的鸟号之弓，去到云梦的林中，围绕生长兰草的洼地奔驰，奔到江边然后缓缓地行进。在青苹之间休息，迎着清风。陶醉在春天的空气里，满怀春意的心为之动荡，然后追赶狡兽，许多支箭射中了轻捷的飞鸟。这时犬马的本领发挥尽致，野兽的脚困乏万分，看马和御车的人使尽了他们的智慧和技巧。威慑着虎豹，吓坏了鹙鸟。奔马的铃当当乱响。跨越游鱼，抓着麋角，踢倒麝兎，践踏麋鹿。这些动物都流着汗珠，窘迫屈伏。无伤而吓死的，足足装满随从的车子。这是规模最壮大的田猎，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干一場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也不能够。”但是他这时眉间呈现了喜色，渐渐地这喜色几乎布满了整个面部。

客人见太子有高兴的样子，就更进一步道：“打猎时夜火烧天，兵车雷滾。旌旗高举，装饰着鸟羽和牛尾，整齐而众多。放开马蹄追逐，因为爱得野味，个个爭先。为拦捕野兽而焚烧过的地面非常广阔，远望去可以看见边缘。然后把毛色纯一躯体完整的牺牲献到诸侯之门。”太子道：“妙啊！我愿意再听下去。”

客人道：“这还不曾完呢。那时丛林之间和沼泽深处，烟雾弥漫，野牛和老虎都跑了出来。勇壮的人非常强悍袒露着身体空手上去搏斗。白刃闪闪，矛戟纷纷。收取猎获物的人同时掌管记功，赏赐银绢鋪下杜若，盖上蘅草，为牧人布置了筵席。有美酒和佳肴，有细切的烧烤肉，款待宾客。盛满的酒盃并举，言语入耳动心，诚实无悔，说一不二。忠信的表情就象刻在金石上一样。高声歌唱，长久不厌倦。这真是太子所喜爱的，能够勉强起来去玩玩吗？”太子道：“我很愿意跟你们去，就怕我这病人成为大夫们的累赘。”看起来太子的病已经有起色了。

客人道："我们将在八月十五日，同诸侯和远方来的朋友们兄弟们齐到广陵的曲江观涛。初到时还不曾见到涛的形状，不过看水力所到之处，已经令人大大吃惊。看那水力所驾陵的，所拨起的，所激乱的，所结聚的，所洗荡的，纵然是有才能辩的人，也不能详加描述。既而目迷神乱，心惊胆战。浪涛滚滚而来。初时迷茫一片，少时奇峰突起，忽然声势浩大，超越旷远。似乎要陵驾南山，以望东海。那浪头几乎上冲苍天，而它的边际煞费想象。这时观赏奇景无穷无尽。然后注意东方日出之处，只见浪头迅速地乘流而下，不知要奔到何处才停。有时奔乱曲折地奔泻，忽然纠结着流去再不回头。浪涛冲到南岸然后远逝，看的人心神紧张更加疲怠，涛的形象在心中久久不散，直到天明，然后才心安神定。这时胸中受到荡滌，五脏受到冲刷。洗淨手足，又洗颜面、发、齿。驱逐了倦意，去淨了尘垢，困惑消失，耳目开朗。在这时候纵然是久病的人也要伸直驼背，招起跛脚，张开瞽目，打通聋耳来观看它，何况小小烦闷病酒的呢？所谓启发昏蒙、解除迷惑，都不消说了"。太子道："妙得很！那么涛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呢？"

客人道："那是不见于记载的，不过我曾听师付说过，涛有三点似神非神：雷声轰隆传达百里是其一；江水倒流，海水上潮是其二；山中云气吞吐，日夜不息是其三。初时江水平滿而流得极快，然而波涌涛起。开始的时候，水淋淋而下，象许多白鷺在降落，再进一步，就滚滚翻翻，象白车白马，张着白的帷盖。当浪头象云堆似的，纷纷扰扰，就如三军奋起。当两旁的奔流忽然涌起，飘飘地，就如将领乘着轻车在统御军队。驾车的是六条蛟龙，跟着太白帅旗。忽而但见白色的虹蜺在奔驰，前后相连不断。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挨挨挤挤。又见壁垒重重，人多马众有如军队。大声轰轰，漫天沸腾，势不可当。看那两边岸旁，汹涌激怒，盛气冲突，向上击刺，向下投石。正如勇壮的战士，猛扑无畏，冲营抢渡。小湾小港无所不到，跨出崖岸越过沙滩。遭遇者死亡，阻挡者崩溃。开始的时候从或围津口出发，逢山陇而回转，遇川谷而分流。到青篾时盘桓迴旋，到檀桓时无声急进，到伍子山速度減低，远奔胥母之战場。上赤岸，扫紫桑。横奔象雷滚，显然威武，如发狂怒水声混混，犹如擂鼓。涛在岸合处被阻而又发怒，上升远跳，大波扬起，在名叫借借的隘口大战起来。这时鸟来不及飞起，鱼来不及转身，兽来不及逃走。纷纷忙忙，也象波涌云飞一般的混乱。向前扫荡南山，回头冲击北岸，丘陵顛复，然而又荡平两岸。浪头高峻，破坏堤防，直到全胜方才罢休。然后急速地奔泻，任意泛滥，十分横暴。鱼鳖都不能自主，顛倒翻复，稀里花拉，起伏不绝，连神物也觉得骇异。这种景象难以尽述，简直令人吓倒，或者吓得昏头昏脑。这是天下最奇的奇观，太子你能勉强去看看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去啊！"

客人道："我要为太子推荐有道术的，有才智的人，如庄周、魏牟、扬朱、墨翟、便蜎、詹何之类，让他们谈谈天下最精深的道理，讨论万事万物的是非，让孔丘和老聃来总结，孟子来稽核，这样，一万个问题也错不了一个。这是天下最切要最美妙的理论了，太子您可以听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站起来，说道："我现在一切疑虑都消散了，好象已经听到圣人辩士的言论。"这时他出了一身透汗，忽然之间，老病全消。

《七 发》 簡 介

《七发》是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作品。枚乘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二代。（公元前179—143年）

《七发》的结构是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开头另加一段序曲，叙述緣起，并借一主一客的问答把各段联系起来。

一　次　講　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沒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沒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象乐队，沒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請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爭、自然斗爭所必需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沒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沒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沒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沒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爭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不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爭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的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嘛？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来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暫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靜，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內，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沒有战爭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对张聞天信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就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关于游泳的談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爭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鍛炼。”

毛主席轻快自如地领头游着，并风趣地问一位同志：“你说是人怕水，还是水怕人？”

那位同志回答说：“人怕水！”

毛主席笑着说：“我看是水怕人，水怕人压迫他。”

（1959年8月毛主席去九江和江西省歌午团的同志游泳时的談話）

給詩刊的第二封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以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检起几片鷄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眞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駡我们狗血噴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駡而特駡，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駡得兇，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駡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　澤　东　九月一日

附两首律詩：

七　律　到　韶　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　律　登　庐　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視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之后说："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象吧！也站不下呀！"

毛主席又亲切教导说："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沒有礼拜天，沒有休息，沒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毛主席看了宴会厅，詢问工程情况，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沒有大跃进就沒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又高度赞扬了建筑工人高度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说："最近，我们看天安門礼堂，只有十个月，过去许多人说不信，請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都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休息礼拜天，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是八小时的，结果他做了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他不要錢呢？他不要。有一些工程沒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夜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

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元錢呢？一小时一元錢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元，就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作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有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讲的伟大创造共产主义礼拜天，有不计报酬在內。”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場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內。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內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在中共中央軍委扩大会議上和外事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沒有成为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

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廬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廬山的綱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場沒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廬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覚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眞正变成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脫胎換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喲！不脫胎換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門。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沒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沒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

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廬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沒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內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內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沒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請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內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沒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請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沒有共产党的语言，沒有共同的立場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話，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話。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話，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話。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話，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癩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癩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沒有主动。

你沒有主动，人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赌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話，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話。再一个要靠拢太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則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話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話，又不靠拢太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話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蝕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太太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蝕也”。好象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慣，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話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內）。许多东西我沒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沒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沒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題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沒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內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駁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沒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峽）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該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溫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鯊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眞理。这是个眞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門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場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請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錢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沒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覚，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

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錢嘛，一小时一块錢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請××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錢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錢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話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錢，人民他不要，你算錢他不要，如果要算錢，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錢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語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的工作。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同志：

此件很好。請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少数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吳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方法办理。在吳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鍵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雄心壮志都沒有。这些人离一个眞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

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騾、养馬、养鷄、养鴨、养鵝、养兎等项事业，认眞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飼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飼料，看来包谷是飼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开始大办了。中国的河北省吳桥县现在也已经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养猪不亚于吳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同粮食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养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鷄犬猪”，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说，农林畜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了。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位互相依賴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脏（可以作制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对《我們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批語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話，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沒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对新华社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新华社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沒有做什么（按：指发展国外分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沒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沒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沒帮助。

应该大发展，各个国家都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广播。

在上海会議上的講話(摘要)

（一九六〇年一月）

一月九日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沒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眞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　　※　　※　　※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一月十七日

我们能够管的六亿多人口，其他地方我们都管不了。有些地方有我们的使馆，可以进行一切可以进行的活动，但是，也不等于我们能够当他们的参谋长。我们不能当美、英的参谋长，也不能当苏联的参谋长。要分几个阶段，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爭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这主要靠自己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爭取人民，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一月）

斯大林奖金我们沒有就不要搞，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还不是把蔣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勋章、博士那些东西不要搞了。

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对一个文件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春）

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

工作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眞调查研究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议论，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門，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話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订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請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以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法。

办法：

一、走出办公室，田间会师。

二、实行“三同”、“三包”。

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办法，既做好中心工作，又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的经验。

四、立即精简会议，減少文件表报。

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問題的指示》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糾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糾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請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靜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題，糾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糾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則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眞思考，在几年之內，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內，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順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題。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卫生工作，这两年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书记沒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沒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績，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关卫生部門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眞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門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作，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蒼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減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眞抓紧和认眞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恥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式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强健，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戶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爭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門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定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請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遺誤。

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綫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覚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題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現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謂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題，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話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現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現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現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請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內，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关于反华問題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請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謂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

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者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国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想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过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三千斤至四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关于山东六級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輔。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沒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对聶荣臻同志《关于技術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交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請你们细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在天津会議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頓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沒有辯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絲、茶、糖、菜、烟、果、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馬牛羊、鷄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鴨、兎。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沒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主要是煤、铁问题。有煤有铁就有钢。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〇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門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

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門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各省先摸一两个县，在六级干部会上提出。贪污的錢要退出来，贪污严重的要处理，一定要赔偿。公社的开支，要由党委集体决定，报县批准。我批的山东那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少。”“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错误性质严重，民愤极大的，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带着外部矛盾。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迴避问题。

不做本地官。不要全部回避，一律迴避破坏一些原则。应该相信多数是好的。大概限制在四分之一才好，主要负责人回避。

先派人去摸几个月，了解情况，然后反客为主，反主为客，請他走开。

有一部分人要坐班房。不要杀人。

外宾参观问题。

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最好看好中坏三种，“强迫”让他们看。如果来不及，看两种也可以，实在不行，也只好不看。

我跟德国人讲，公社有百分之五十是一类社，百分之三十五是二类社，百分之一十五是三类社。四万个公社中，有六千个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听了之后，感到我讲了公道話。

三类社整好不难。先进与落后，一万年也有。外宾参观，中央发过指示，好坏都看，可以比较。

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煤、电、水、盐、木材、石油、农副产品，主要是煤，木材的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的方向问题。

反华问题。

读一个文件（指《关于反华问题》及附件），大家斟酌。反华，其实是大拥小反。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影响很大。

接見非洲外宾时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们。他们实际上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成一种很贫

穷的状况，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可是蒋介石只有十万吨钢，比利时那么小的国家，就有三百万吨钢，所以我们很穷。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我们就打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譬如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不行，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说我们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的，很脏的，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差不多，似乎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的地位相同。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他们杀人，或者经过他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他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国人，怕帝国主义，怕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譬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美国人，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不怕了，跟他们的走狗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手里学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得出结论，我们说，可以。一个人压迫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沒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胜利？！我们的敌人有强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他们的武器很强大，他们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他的武器，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空军。我们什么都沒有，也沒有炮，也沒有飞机，也沒有坦克。我们有的是步枪、轻炮。这些东西是那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送给我们，我们就有了枪炮了。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了，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占领了大陆。他们的空军每天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沒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害怕我们了，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了。后来蒋介石也怕我们，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办法，还有别的办法。你们在座的有些国家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象几內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帮助了几內亚，几內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是不是眞的？（几內亚的外宾说：是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它就沒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寬了，中国俗話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也捉不到。（全場活跃）因为它管的大寬了。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太多了。你看，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要控制欧洲，还要控制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这几天情形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沒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李承晚是美国的走狗，是一个老走狗。（笑声）南朝鲜人一起来，一鬧一

轰，几十万群众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支枪也沒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沒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选择了新的走狗许政。他们的斗爭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的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又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正在起来。今天是七号，后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政府和美国訂立的军事同盟条约。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你们可能有人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他们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他的走狗。但是請你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人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个大国，只有六百万人。离美国那么近，人口只有六百万人，巴蒂斯塔在六百万中间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古巴的民族英雄××××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小船，到古巴登陆。开头第一仗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八个人，其中有××××和他的弟弟××·×××。他们只好隐藏起来。然后又进来，一下子打了两年半，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看，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是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他，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沒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沒有人去过，我们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都欢迎古巴的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斗爭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斗爭。我们完全同情你们，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认为你们的斗爭支持了我们，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古巴的斗爭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爭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爭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的斗爭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減輕了。因此，我们有义务要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也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爭，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就好走，可以站起来，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例如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它只有那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又牵制着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人民起来对压压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我们说这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他们在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这些事情，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一条腿，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沒有保证。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意见，也许你们不一定赞成。我们是交换意见的性质。請你们讲一讲好不好？你们的情形和意见我很愿意听。

〔索馬利兰的朋友讲到爭取独立的情形时〕謝謝。祝贺你们所有的爱国者，祝賀你们的胜利。你们一定会胜利的，哪有不胜利的道理？

〔馬达加斯加的朋友讲到爭取独立的情况时〕总有一天，你们会完全独立的。

（喀麦隆的青年代表：我们赞成主席所说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但是实行起来我们有些怀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从来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们举行各种会议都不过是一些阴谋。我看首脑会议这一条腿，是一条有病的腿；还是另一条腿比较健全，更为重要，那就是反殖民主义那一条腿。）

讲的对，我属于你一派。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怀疑的，因为他老欺骗。但为什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暴露它那一条腿有病。（全場活跃）

〔阿尔及利亚工会代表在发言中说要和平共处必须排除殖民主义时〕对，有殖民主义怎么共处啊？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了对法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爭的决心，并说：法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强大的壁垒，要想窒息我们，我们只有要求朋友帮助，我们不需要人力，而是需要物资帮助，这是阿尔及利亚战爭的特征，希望毛主席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再讲几句。我赞成这位朋友所讲的这种思想，象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爭。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困难。我说过，中国的斗爭光是武装斗爭就是二十二年，你们的斗爭才进行了六年。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还犯了几次错误，犯过右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犯过"左"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曾经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力量原来有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还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得到机会，又发展到一百万人，这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蔣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面，而是用帮助的办法支持蔣介石，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它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十个战役，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变为优势，蔣介石变为劣势，大部分军队被我们消灭，我们占领了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占领，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京。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讲，老百姓不相信，似乎蔣介石爱好和平，似乎我们爱好战爭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我们讲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繳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代表签了字，派人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請求批准。蔣介石说不行，不能繳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过去了。（全場活跃）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它。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譬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要用

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揭露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爱和平。帝国主义哪里爱和平？他们爱好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二亿人口中还有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作工作，有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完全破除迷信，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很行。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可以干，而且还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而且白种人并不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劳动者，农民。真正怕原子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也怕，他们几个国家相互之间有矛盾，所以有机可乘。他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并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了一个、二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了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譬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赶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还有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起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年十四日伊拉克革命，一九五七年苏彝士运河战争，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起来日本人民也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方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还有英国、法国，还有什么比利时，阿登纳，还有日本政府。中国有一句俗语，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做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接見拉丁美洲外宾时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

欢迎各位朋友。

今天都是拉丁美洲的朋友，你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你们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地位大体是相同的，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当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点，都处在一个不很发达的地位。我们中国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经济发展仍然是很差的，过去有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的局面。你们大体上知道，中国过去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是外国人控制的，这样的时间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当中，帝国主义就在中国人民身上刮了许多油水走了。我们沒有工业。中国民族工业是受压迫的。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人民很穷，每年要餓死很多人；沒有文化，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因此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譬如钢铁，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上的钢铁，也就是蔣介石所管的钢铁，年产量只有十万吨。在座的有巴西朋友，听说巴西每年有一百六十万吨钢，而蔣介石灭亡的一九四九年只产钢十万吨。全中国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但有广大的贫农，占几亿人口。所以工人阶级依靠贫农，结成联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同半无产阶级首先结成联盟，然后再联合中农，然后再联合民族资本家，再联合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一百人中间我们就联合了九十个人，反对我们的人就只有百分之十了。这样一团结，革命就能胜利了。还有国外的帮助，国际的帮助，这种帮助也是一种声援的性质。我们长期被敌人围困，不可能从外国取得物资帮助，但是我们取得道义上的帮助。譬如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都对我们有帮助。今天在座的是拉丁美洲的朋友，你们的斗爭，就是对我们的帮助。因此我们要感谢你们。你们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譬如古巴，就在美国的旁边，你们的斗爭帮助了我们。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祕鲁，我们并沒有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你们的工作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座的沒有我们的敌人，是不是？（全場大笑）我们沒有利害冲突，我们有一种友誼关系，我们希望你们胜利。

拉丁美洲有差不多两亿人口，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美国人并不都是反对我们的，要把美国的人民和资本家区别开来。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对你们不利的那个阶级。比如古巴的糖，就被那个资产阶级所垄断。听说智利的铜，哥伦比亚的石油也是受美国控制的。美国在巴西有沒有投资？（巴西朋友说：很多。）阿根廷有沒有？（阿根廷朋友答：也很多。）美国人就是錢多，（全場活跃）他们的錢不仅是剝削本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得来的，也是从各国剝削得来的，他们的财富建立在对我们的剝削上。昨天我会见了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非洲人口和拉丁美洲差不多，他们是两亿一千万，拉丁美洲是一亿九千万，只比你们稍多一点，差不多相等。合起来，这就是四亿人口。亚洲人口有十四亿五千万，苏联两亿人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亿。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西方世界只有五亿人口，但也还

要加以区别。大多数人是好的，殖民主义者只有少数人。全世界的殖民主义者同他们在各国的同盟者——例如中国的蒋介石，朝鲜的李承晚，土耳其的曼德列斯，古巴的巴蒂斯塔，加起来顶多是一亿。就算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只有二亿七千万，人相当的少。十个指头只占一个指头。有一些人现在还不觉悟，譬如美国工人中也有同资产阶级合伙的，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事情还是靠人民决定。究竟是巴蒂斯塔的力量大，还是"七·二六"运动的力量大？在三年以前，即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你们从墨西哥登陆时只八十二个人，而巴蒂斯塔那时有很大的力量，他曾经杀死两万古巴人。我们过去也是手无寸铁的，权力是在蒋介石手里，后来又有美国人帮助他。但是蒋介石还是打败了。巴蒂斯塔也是打败了。由此得出一条结论：反动派，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他们的力量形式上很大，实际上有的已经被推翻了，有的将要被推翻。手上没有武器的人，推翻那些手上有武器的人；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穷人把富人推翻了。是我们推翻敌人，不是敌人推翻我们。还是人民决定。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就有办法。要组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们不但团结了工人、农民，而且团结了民族资本家，我们到现在还是跟他们一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教授、教员、艺术家、工程技术人员、新闻记者，凡是赞成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这些人都团结起来。

我们解放十年了。过去只有十万吨钢，去年我们就有××××多万吨，×年可能达到××××万吨左右，×年可以超过日本和法国，×年再看吧，如果能有××万吨的话，就可以超过英国。所以事情是由人办起来的。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包括拉丁美洲、非洲、整个亚洲和社会主义各国在内。当然困难是有的，有些国家受外国控制，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但是人民要斗争。南朝鲜、土耳其的人民已经起来斗争，逐对你们都有帮助。中国的工作对于你们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可以团结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对西方国家怎么办呢？几百年来，世界是由他们决定的。听说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大。要防止战争，非取和平，要不要跟他们打交道？我们认为应该同他们打交道。因此，我们支持大国会议，能够裁军，不打原子大战就好。但是专依靠大国会议行不行呢？不知道你们意见怎么样？专依靠，我们看来恐怕不行。（外宾中有人说：要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我赞成，就是同时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而且第一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第二才依靠会议。譬如我想和美国人打交道，可是他不干，并且还影响许多国家，譬如法国，西德、日本都不同我们打交道，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不是睡不着觉呀？不，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他们想把中国分为两个，承认台湾，不承认我们，在联合国让蒋介石代表中国。蒋介石是中国的巴蒂斯塔。巴蒂斯塔跑到葡萄牙，蒋介石跑到台湾，都是在美国保护之下。我们认为美国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喜欢帮助坏人。（全场大笑）喜欢帮助巴蒂斯塔、蒋介石、李承晚、阿登纳、艾森豪、佛朗哥，他们喜欢那些人，脾气怪得很。（全场大笑）各位朋友有什么意见？

（古巴军队总督察：我想大家都同意你的意见。）

很好，我们能够取得共同一致的观点，所以我们是朋友。我们的朋友很多，全世界顶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

（古巴军队总督察：十分之一还不到，有些人受欺骗，所有的人民都是高贵的。）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但是人民不能包括蒋介石、李承晚、巴蒂斯塔，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总之，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事情就好办。什么都要依靠人民。我们今年可能取得××多

万吨钢，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口，按人口比例来说，还不多。我们人很多，粮食不多，棉花不多，钢铁不多，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发展，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

你们准备在中国呆多久？（一位外宾：时间由中国工会决定。中国很大，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参观到。）

由你们决定吧。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吧。还有朋友发表意见没有？

〔在一些外宾发言以后〕再说几句：有些朋友说到中国来学习的。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尤其是古巴的经验。古巴经过两年半的斗爭，我们经过二十多年。条件不一样，古巴离美国很近，取得了胜利，我们离美国很远，也取得了胜利。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经验，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有个整风运动，每年一次两次。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也就可以避免再犯类似错误。经验不能照搬，只能作参考。

有的朋友提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把合作社扩大发展起来的，把二十个、三十个合作社并成一个公社。人多了，平均五千戶一社，少的二千戶，多的一万戶。人多，土地多，力量大，所以它比合作社更好。有的朋友也想办人民公社，如果要办，我建议不要采取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因为这个名称，我们挨黑。假如不采用这个名称，把合作社扩大也可以。但是不是后悔？我们不后悔。这个名称是群众取的，就是这个省——河南省开始办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夏季成立了人民公社。杜勒斯黑我们，说人民公社是不好的，不能长久的，进行奴隶劳动，沒有自由，又拆散家庭，丈夫见不到老婆，妈妈见不到孩子。还有一个大跃进，也是黑的名称。我们如果改个名称叫离速度发展，可能就不挨黑了。总之，只要稍微改变一点习惯，人家就黑。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也沒有办法。我们离美国很远，离上帝很远。（全場大笑）罗馬教皇不喜欢我们，这是沒有办法的。人民公社是不是奴隶劳动？是不是自由？在座的朋友已作了答复。中国人过去是奴隶劳动，就是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工作，替他们当奴隶。现在他们不当奴隶了，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敌人说只有台湾有自由，大陆上是奴隶劳动。现在又轮到古巴身上了。美国说巴蒂斯塔领导有自由，×××领导下是奴隶。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和我们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他们帝国主义制度那么好，我看不出。所以請他走路，回老家去。（笑声）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戈森豪威尔因为沒准备好，又看到我们力量大，不敢打世界大战。但是很难说，有两个可能。一是有爭取持久和平的可能，要为此而奋斗，另有一个可能还有大战。阿根廷朋友讲的好："要保持弹药是干燥的"。东方有个日本，一亿人口，是军国主义，和美国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和西德一样，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西德和日本，都是美国喜欢的，支持的。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日本人民正起来斗爭，他们不赞成岸信介政府，不赞成日美侵略性的军事条约，明天将有几百万日本人民进行示威。我们要支持日本人民。南朝鲜、土耳其人民的斗爭，对我们对你们都有帮助，日本人民的斗爭对你们也有帮助。

祝你们斗爭胜利！大家团结起来！

接見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看看。我们是团结的，是全民一致的。今天有好多人是伊拉克的朋友，你们的革命是一九五八年取得胜利的，这个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跳。你们七月十四号革命，十五号美国就下命令在黎巴嫩登陆，它为什么这么急？是怕跟着你们会有许多国家要解放。当时全世界人民都反对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那是一种侵略，一种干涉。英军也占领了约旦。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那时我们中国人民很高兴你们解放，认为是有世界意义的事情。现在你们周围还有不友好的国家，他们的人民还沒有解放，有许多国家还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譬如土耳其对伊拉克就是不友好的。在座的有伊朗朋友，你们国家的人民似乎还沒有解放，只是由英国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你们的国王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压迫你们所有的人民。你们原来受英国控制，现在转变为美国控制。英国、美国两个国家在打架，爭夺伊朗的石油。在座的有塞浦路斯的朋友，压迫你们的是不是英帝国主义，同时也还有美帝国主义？（回答：有英国人、美国人、土耳其人。）一定有美国。你们三个国家，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中间，都在亚洲西部。亚洲西部的国家都寄希望于伊拉克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支持伊拉克人民的，也是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土耳其最近发生了群众示威，有好几个大城市示威，反对政府，反对曼德列斯，这对你们有利。看来这个斗爭会发展下去。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李承晚，李承晚已经倒台了。在我们东边也有许多不友好的政府，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在东南也有南越、泰国，都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现在南朝鲜人民已经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也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今天是五月九日，日本朋友有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反对岸信介为首的政府同美国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我们同你们一样，共同支持这个斗爭，反对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以及美国在各国的走狗。

我们也是个被侵略者，人们却说我们是一个侵略者。但是我们沒有占领外国一寸土地，我们台湾却被外国占领着。占领台湾的人不叫侵略者，叫做和平爱好者，叫做有民主有自由的国家。而我们这个国家，据美国人说，既无民主，又无自由；说中国人民都是当奴隶，人民公社就是奴隶主组织起来管理奴隶的团体；沒有民主自由，进行强迫劳动，拆散家庭生活。他们很关心呀！（全場大笑）世界上第一个反对人民公社的就是那个死去的杜勒斯，现在美国当局也不欢迎人民公社，他们喜欢台湾，说台湾有民主，又有自由。似乎美国的工人阶级跟资本家一样都是美国的主人，台湾的人民跟蒋介石一样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奴隶国家——就是你们所到的这个地方。

伊拉克也曾经为许多国家所不喜欢，现在也有许多人不喜欢，名义上承认你们，实际上要搞垮你们。伊朗总理摩薩台是怎样的结果，你们是知道的。他不是共产党，是一个爱国者，是伊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是不愿意外国人统治伊朗，结果被英国人通过伊朗国王

把他抓起来了。伊朗的人民党也沒有合法权利。塞浦路斯的党到现在也沒有合法权利。总而言之，帝国主义就是喜欢这么办的。帝国主义喜欢的人和我们喜欢的人不一样，他们喜欢的是蒋介石、李承晚、曼德列斯、岸信介，喜欢伊拉克的费薩尔和伊朗的国王。（全場活跃）

世界上分成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集团，彼此结成一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同费薩尔、曼德列斯、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以及伊朗的国王，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团结起来呢？我看，可以团结起来。一些人不覚悟，可以劝他们覚悟起来。我们的敌人数目很少。昨天同拉丁美洲的朋友谈过，反动派也就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各国的走狗，顶多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我们有十分之九或者还要多，包括西方国家中的劳动人民在內。西方国家的工人、劳动者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算什么族？（回答：白种。）白种人多数是好的。苏联也是白种，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白种。黃种也有坏人，譬如蒋介石。（笑声）我们并不爱蒋介石，我们跟你们好，跟蒋介石搞不来。（全場活跃）李承晚不是黃种的吗？也是不好的。曼德列斯也是黃种，但土耳其广大群众不喜欢他，他走过大街，群众不让他过，他对群众说不要搞那个示威了，可是群众一起叫喊要他下台，他换了三辆汽车才逃脫。可见人们是以阶级来区分，不是以顏色来区分的。费薩尔同你们是一个种族的，你们不是不喜欢他吗？你们不是弟兄，而是敌对的。而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正在改造的坏分子以外，跟你们都是一致的。

至于中国现在的情况，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从事自己生活的建设，建设工作刚才开始，需要各国朋友们的帮助，需要你们帮助，我们要互相帮助。各国人民的斗爭就是对中国的帮助。

美国人讲的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五月一日美国飞机入侵苏联內地，从巴基斯坦起飞，飞到苏联的烏拉尔，有两千公里，被苏联打下来了，駕駛员被俘虏了。目的是进行空中照象，偵察苏联军事基地，照片也被苏联得到了。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美国人讲和平的方法和我们不同，（笑声）在他们说来，侵略就是和平，讲和平的人就是侵略。我们被宣布为侵略者，可能你们伊拉克也是侵略者，因为你们侵略了费薩尔。（全場大笑）你们伊朗人民也准备侵略那个国王，他侵略你们伊朗人民好多年了，你们大概准备报复一下吧？只要你们报复，就叫侵略。（全場欢騰）塞浦路斯也是不安分的，因为英国要基地，你们不肯。但是，最后胜利你们会得到的。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很长了，看起来现在它还有一点势力，其实它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希望它的寿命不长好。它已经活了这么久了，太老了，应该去见上帝了，上帝准备招待它。（全場大笑）但是我们仍然要准备艰苦的斗爭，还有一段时间，上帝暫时还不准备請他去。（大笑）大概还有几十年，二十世纪还有四十年，给他这么点时间吧！（全場活跃，掌声）希望四十年以后，全世界看不见帝国主义，也看不见他们在各国的走狗了！统统把他们送到上帝那里去。（外宾在笑声中说：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接受？）那就把他们关起来，宣布无期徒刑，或者让他们死亡。（全場活跃）总之，他们做的事情太不好了，他们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全場大笑）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人民会把他们判处徒刑的，有些人要杀掉。譬如古巴从前的政府，曾经杀死两万古巴人民。××××逮捕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只判处两百多人的死刑，美国资本家就大叫起来，可是巴蒂斯塔杀死两万古巴人的时候，美国一声不响。费薩尔不知杀死多少伊拉克人民？（回答：很多。）帝国主义也是一声不响。如果你们现在的政府杀死一些坏人，帝国主

义就要叫的。我们也杀过一些人。蒋介石杀死的不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中国人民，沒有一个帝国主义说他犯了罪。现在联合国里还有蒋介石代表的席位，说他很好，很有道德，很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那有什么办法？那就让他这样办吧！蒋介石很有"道德"，我们是"侵略者"，因此在联合国里沒有我们的席位。蒋介石为美国以及四十四个国家所承认，承认我们的不比他们多，就照这样办吧！我们还要活下去，你们看一看，中国人还是活着吗？并且相当高兴。并不因为美国不承认我们，联合国不让我们进去就活不下去。这种状态是由他们决定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这种状态需要存在几十年吧，譬如说四十年吧！到二十一世纪，我看会起变化，那时帝国主义本身就会发生问题，蒋介石更不消说了。

〔在西亚朋友讲話以后〕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脫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蒋介石怎样被赶出大陆的？因为他脫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是生产者，他们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沒有他们，我们就不能过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滿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当然，还有别的人，我国就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现在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同他们合作的。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指翻译××），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五十三岁，是专門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沒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就不能脫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全場大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为他（指翻译）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他拥护社会主义，而且拥护共产党，那好办事。他相信穆罕默德，他又不是共产党，那沒有关系。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但只有一千三百万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团结六亿五千万人。被打倒的阶级，我们也要改造，譬如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剝削阶级。还有解放战爭中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们，也是采取改造的办法。有一部分已经被赦免了，其中还有一个皇帝，他在北京，名叫溥仪，他从六岁到九岁统治全中国，统治我们，后来被推翻了。他现在很有进步，他已经被赦免，不是战爭罪犯了，恢复了他的自由，他今年才五十三岁。他说他现在眞正解放了，自由了。他现在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你们有兴趣可以集体找他谈一谈。他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并不杀他，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做国王就是了。

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內。这是我们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地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我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話只供朋友们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祝贺我们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的团结。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今天日本有几百万人进行斗爭，祝贺日本人民斗爭的胜利！

同蒙哥馬利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蒙哥馬利（简称蒙）：我来到中国发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误。他们以为中国人是受压抑的，很不愉快，餓着肚皮。事实上，大家都很愉快，满面笑容，看起来都吃得很饱。今天我访问了一个人民公社。社长才三十岁，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的公社办得很好。

主席：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们的粮食还不够。按照平均人日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公斤粮食。

蒙：可是沒有人餓着肚皮。

主席：这四百公斤包括口粮、种子、飼料和储备粮。当然比过去有很大的好转。比十年前好，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就是比前几年也好。所以西方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蒙：可是大家还是有足够吃的。

主席：相对来说是够的。

蒙：孩子们看起来吃得很饱。

主席：这是对的。

蒙：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健康。

主席：他们是很高兴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了，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改善生活而努力。

蒙：我去天津近郊看了你们的士兵。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

主席：我们現在的日子还不能算是富足。还要等十年或者两个十年，那个时候我们每人每年可能有七百五十公斤到一千公斤粮食。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了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粮食的增长可以满足你们人口增长的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人口的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的平均寿命已提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生产的钢铁每年很少。今年可能生产钢××××万吨到××××万吨。但是，这还是不够的。你们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吨钢。要是我们按照六亿五千万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只有二点点，还差得远呢。

蒙：我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主席：你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蒙： 而且还在更加工业化。我们国家面积小。但是人口多。

主席：你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

蒙： 你是否去过英国？

主席：沒有，可是去过香港，所以也可以说是去过英国。我去过二十多次。

蒙： 最近的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主席：最后的一次是一九二四年。

蒙： 那是三十六年以前。三十年以前我曾经到过上海。当时上海是一个欧洲城市。现在仍然是欧洲的建筑物，但是欧洲人不在了。

主席：英国还有一些侨民，还有一些商业和企业在上海，例如英国还有一个毛线厂在上海。

蒙： 那很好。請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国际局势很好，沒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 这是很坏的。

主席：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 但这是很坏的。

主席：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 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主席：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 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主席：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冷战共处。

蒙： 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主席：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題。

蒙：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主席：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 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主席：还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 有可能。

主席：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 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主席：我们说是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 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沒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主席：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靜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

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我希望看到美国在西方阵营制造了它的反对者。我也谈谈关于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问题。你们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名称。我们用西方世界这个名称，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说的名称。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主席：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而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须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主席：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主席：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威胁。苏联也不感到英国是个威胁。我们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那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主席：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主席：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摩洛哥。在东方，美国也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与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主席：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还有土耳其人民。土耳其刚才发生了政变，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主席：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主席：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主席：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主席：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　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主席：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章。

蒙：　我们应当从二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主席：好，我赞成。

蒙：　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主席：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它是寸土不让的。

蒙：　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主席：有可能。

蒙：　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主席：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　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他们为难了。

主席：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　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話。

主席：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有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沒有一个军事基地，沒有一个兵。

蒙：　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主席：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爭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　这点我是同意的。

主席：美国人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它这个話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沒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判解决问题。

蒙：　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主席：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沒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　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主席：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变的呢？第一次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沒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几万人。

蒙：　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主席： 过去是对英国的，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 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主席： 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 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馬歇尔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主席：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沒有铁，沒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却扶植了一个力量，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

蒙： 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主席： 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 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主席： 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号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葯。

蒙： 日本对中国有沒有什么坏的意图？

主席： 我看是有。

蒙： 什么样的意图？

主席： 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上有一条，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內。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苏彝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 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主席： 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

蒙： 尼赫鲁永远不会参加任何集团。

主席： 我不是那么肯定。

蒙： 尼赫鲁说，他永远也不会参加任何集团和联盟。

主席： 现在是这样，将来怎么样呢？

蒙： 我跟尼赫鲁是很熟的。只要尼赫鲁还活着，印度就不会参加任何集团。

主席： 只要尼赫鲁还活着，尼赫鲁多大年纪了？

蒙： 他七十岁了。他还可以工作十年。

主席： 就是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那么他八十一岁时候怎么办呢？

蒙： 尼赫鲁不在以后，就难说了。

主席： 英国在印度的资本同美国在印度的资本的比例，正在下降，而且英国现在不能增加对印度的投资，美国却在大量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和借款。

蒙： 讨论尼赫鲁不在以后印度会怎样和阿登纳不在以后德国会怎样，是沒有好处的。毛主席不在以后，中国会怎样呢？

主席： 资本是一个实际问题。美国的资本在印度大大增加，压倒了英国的资本，这是事实。

蒙： 这点我同意。但是印度是一个英联帮国家。

主席： 名义上是英联帮国家，实际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蒙： 毛主席不在以后，中国会怎样？

主席： 我们的制度不同，我们是靠制度，不靠个人。

蒙： 我觉得领袖永远是很重要的。

主席： 有一部分责任。我现在和你差不多。

蒙： 你还相当年轻。

主席： 我不是国家主席，不是内阁总理，不是部长，任何国家职务我都没有。你还是元帅，是上议院议员，我也是人大代表。

蒙： 我是议员，但不是被选的。

主席： 你是被任命的，我是被选的。我和你有点不同，你不是英国保守党主席，我是中国共产党主席。

蒙： 我不是一个政客，我是一个军人。

主席： 你是一个军人和政治家。

蒙： 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这大概需要五十年。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主席： 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 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主席： 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 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主席： 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 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主席： 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支短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 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主席： 你很开明！

蒙： 我是个军人。

主席： 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 我同意。

主席： 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华盛顿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吧？你们英国开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算是仁政吧。现在澳大利亚有八百万人口，新西兰有二百万人口。

蒙： 澳大亚利有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人口，新西兰是二百万人口。

主席： 根据我的地理知识，澳大利亚只有八百万人，也许我了解错了。他们实际上都是英国人。

蒙： 是英国人的后代。

主席： 一旦他们自己能够制造钢铁、飞机、轮船、坦克，他们就半独立了，成为自治领。

蒙： 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主席： 他们背着英国同美国订了一个条约，而条约规定不许英国参加。

蒙：　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主席：他们亲美比亲英还多，或者说一半对一半。

蒙：　他们是觉得，如果发生战争，英国离得太远，最大的保护还是来自美国。这是唯一的原因。

主席：美国不买他们的羊毛。

蒙：　你们倒买澳大利亚的羊毛。但是你还沒有回答我的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样？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主席：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沒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話，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　革命前，你们曾经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主席：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沒有了，只留下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　我希望如此。

主席：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題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沒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的问題，就是：（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的代表权问題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人从台湾到伦敦，你们外交部接待。

在西藏问題上你们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叛乱分子嘉乐顿珠到伦敦，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　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主席：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　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主席：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

蒙：　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苏、中这个问題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主席：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　人人都有缺点。

主席：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由美国指挥。

蒙：　海军也是这样。

主席：法国在地中海的艦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脚被捆住。

蒙：　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主席：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　麻烦就在是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主席：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主席：是必须解决。法国人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打不过胡志明。

蒙：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主席：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在存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主席：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　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主席：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　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主席：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　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主席：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强大。

蒙：　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主席：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　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主席：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　但是他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主席：这就是一个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　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主席：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　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主席：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　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主席：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　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死掉，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主席： 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 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話，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主席： 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 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的时候，他沒有很多的跟随者。

主席： 华盛頓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 可是他被暗杀了。

主席： 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代表印度人民的。

蒙： 印度的问題是这样的，中国和印度都是很大的国家，两国都进行了革命。但是印度的革命是依靠对甘地的个人迷信。他们沒有思想意识，沒有统一的目标，沒有纪律。中国的革命有强有力的思想意识，统一的思想和目的，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并且有很好的领导人。你们的革命不是依靠对个人的迷信，而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反对一个非常腐败的帝王制度。

主席： 印度取得独立比我们早，但是去年它才有一百七十万吨钢。

蒙： 那是另外一个因素，尼赫鲁沒有能够把三亿农民团结起来，象你们作到的那样。你们把农民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尼赫鲁沒有作到。

主席： 十年前，在一九四九年，我们从蔣介石手中只继承了四万吨钢，但是在去年我们就生产了××××多万吨钢。

蒙： 我不想谈数字的问題。你们的革命是以人民为基础的。你们的人民都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目标，所以你们就进步了，你们作的是对的。

主席： 这不是我，我并沒有生产什么钢铁，也沒有耕地，这是人民组织起来搞的。

蒙： 问題是如果革命是以人民为基础的，就必然有统一的意志和目标，而这一点你们是有的。

主席： 精神力量产生物质力量。

蒙： 当然。

主席： 可是，如果英国沒有二千二百万吨钢的話，英国就抬不起头了。

蒙： 我现在感到兴趣的是道义上的力量。如果人民道义上是团结的，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来，而这一点你们是有的。

但是，印度的三亿农民是不团结的，也沒有统一的目标。

主席： 这是因为印度沒有解决封建剝削的问題。

蒙： 是的。尼赫鲁感到很难团结他的人民。

主席： 他搞了一个土改法，但是沒有实行。

蒙： 尼赫鲁已经七十了，他去世以后，印度怎么样呢？

主席： 他沒有准备好继承人……。

蒙： ……权力在总理手里。

主席： 不对……。

蒙： ×××是否军人？

主席： 他打过几十年仗……。

蒙： 我为什么沒有见到他？

主席： 你沒有要求见他。

蒙：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主席：你来以前没有调查清楚，现在我向你解释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你为什么这样忙，只访问四、五天？

蒙：　周总理要我再来中国，作一次较长的访问，多看看，我答应明年十月再来，访问一个月。我现在必须回去，就我和中国领袖所谈的几个问题动员世界舆论。我明年十月再来访问一个月。

主席：欢迎。

蒙：　十月份气候如何？

主席：还可以。可是为什么不在九月下旬来，可以参加我们的国庆。

蒙：　那我就从九月中到十月中，访问一个月吧！

主席：好。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想同谁谈，就可以同谁谈。

蒙：　明年我将经过莫斯科来，而不是经过香港来。在访问时，希望有人陪我，因为我大概在一年内学不好中文。

主席：欢迎你来，我们会有人陪你的。我们先吃饭好不好？等一下再谈。

蒙：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发现我开朗而感到奇怪？

主席：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前没有见到过你，只听到关于你的事情。你说革命是好事，可是有各种不同的革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克伦威尔的革命，华盛顿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孙中山的革命，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例如中国的革命。你说你也赞成中国的革命，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吃饭时，没有作详细记录，双方谈到如下问题：

（一）蒙請主席谈了一下长征的情况。

（二）主席提到，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对我们没有任何害处，使全世界反对美国，而反美的事情总是使我们高兴的。蒙问：那么紧张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吗？主席说，不是我们要紧张，是美国要紧张，我们怕紧张有什么用呢？紧张损害了我们一根毫毛没有？蒙就说不谈这个问题了。

（三）蒙提起尼赫鲁，主席说尼赫鲁对我们不友好，就因为一个叫达赖喇嘛的人是他的好朋友。但是，我们同印度人民是友好的。蒙说，他认为尼赫鲁是不友好的。

（四）蒙问印尼如何？苏加诺这个人好不好？主席说印尼不坏，并说苏加诺不算坏，也不很好。主席说印尼人民是起来了，但权力是在苏加诺他们这批人手中。

（五）从抽烟和不抽烟的人之间要“和平共处”谈起，蒙说，我对毛主席说的我们四个国家要一致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推行这方面的工作。

主席：这是决定世界大局的问题。

蒙：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話，今后就不再会有什么麻煩了。

主席：问题就是美国，它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办事的。它国内有一亿吨钢，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一百五十万军队。

蒙：　他们利用他们在别国领土上的基地来进行间諜飞行是很坏的。如果他们一定要进行这种飞行，他们应该从他们本国领土上起飞。

主席：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和你们可能是一致的。

蒙：　我会推行关于四国这一思想，我将同戴高乐谈，也准备同赫鲁晓夫谈。我认为这个思想是非常好的。周恩来沒有提过这一点，这是很好的一点。

主席：我们这四国是一条线，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六）蒙提到对中国军队的良好印象，从这里谈起哪些国家的军队能打仗。主席说，在朝鲜我们打过十六国军队。起初，英国在朝鲜有一个旅，后来增加为一个师，这很好，使英国有了发言权。到后来，我们故意不同英国军队作战，集中打美国军队。在英女王加冕那天，我们停止向英国军队开火，英国司令员还为此特别来信向我们表示感谢。

在上海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沒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門搞个缺門部，叫拾遗补缺部。

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

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在上海会議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爭方法，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爭，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話，那么，他们的斗爭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爭如此，生产斗爭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須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眞理转化为主观眞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則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脫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沒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在上海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敌人只是少数，这一点不但应当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我们长期对外工作的思想。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十　年　总　結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爭，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內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沒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馬鞍形。七、八两月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个时间

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眞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辯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沒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眞理的所谓圣人呢？眞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辯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話，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題沒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接見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主席： 非常欢迎你们。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爭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爭对中国，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支持，你们斗爭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个国家曾经控制制着中国，援助蔣介石打内战，现在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台湾都有军事基地，实际上占领的还有南越，巴基斯坦以西还有许多国家就不讲了，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访华时，和张奚若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爭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爭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沒有想到的。这次斗爭是从反对“安全条约”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岸信

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本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都是提政治口号，是世界上少见的。而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就召开了全校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樺美智子，现在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樺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政法律。好象有好几千的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宗教界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的规模的罢工。

你们对你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没有？

野间宏（团长）：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感动。我们是元月四日到达北京的，在北京车站发表声明时就说：我们要在北京参加日本人民的斗争。当天晚上，第二天早晨听到日本有五百四十万人参加总罢工的消息后，很感动。这表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走向新的道路。在日本，最初时斗争性质是反帝这一点，还不明确，“六一五”事件后，日本人民阻止了艾森豪威尔访日，自觉地认识到斗争是反美的，日本民族反美力量团结起来了。斗争不会停留，将会继续前进。

主席：好！这样就好办了。日本有军事基地，过去对它没有办法，苦恼，又不能去打它。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就是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国过去还有武装斗争。但“五四”运动时并没有武装斗争。一九一九年也是反对巴黎和会的条約，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一九二一年党才誕生，开始人数很少，几十个人，是馬列主义小组。以后有北伐战争，是一九二六年，那时和国民党合作，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没有准备，突然遭受袭击，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又与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与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我说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你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有军事基地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你们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你们现在不欠賬了，相反地外国人欠你们的賬。这个外国人就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所以日本人民现在憤怒起来了。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象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现在谁在教育日本人民？是美国人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也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来了。相反地，我们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場。现在压迫中日两国人民的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呢？是英国吗？过去是，后来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法国在中国过去也有势力范围，但二次大战开始时就没有了，美国就代替了英、法。

你们被压迫的历史不长，我们很长，有一百多年。但是你们的工业、经济、文化

比我们中国发达。我们是落后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落后的遗迹。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比你们少。你们是否普及中学教育了？（团员亀井胜一郎说：战后是这样，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还沒有，再过几年才能赶上你们。当然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你们有沒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即除大资本家外，和外国资本联系较少或沒有联系的资产阶层？（野间、亀井说：有。）对这个阶层，你们要团结。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找上海的资本家谈谈。

野间：在日本就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有，有兴趣，很想和资本家谈谈。

主席：柯庆施同志是上海市长，也是上海市党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有事情可以找他。

柯庆施：我可以组织这个谈話。

主席：（问过大家年龄后）你们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作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九五八年我们召开党代会时，曾经谈过这件事，后来作过调查，调查全世界在三百年以內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做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包围哈格蒂，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也是那些年轻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竹內写的一篇短文章，写得很好，是青年报請你写的吧？

竹內：（用中文）：我平常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今天蒙老师的夸奖，我很荣幸。

主席：你们在中国还会呆一个时间吧？

野间：到中国已经二十二天了，还剩下十天左右。

西园寺：我还要再呆几年。

主席：你回不去了吗？

西园寺：因为说了岸信介很多的坏話，回去怕回不来。

主席：岸信介倒台后你再回去。

西园寺：岸信介倒了，还会有第二个岸信介出来。我在北京，也可以参加日本人民的斗爭。

主席：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同岸信介不是在一道。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如四、五年前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一提到美国的事情，他们都不开腔。我看那时日本朋友是在想问题，听我们说的話，他们不反对，愿意听下去，不替美国辯护。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日本人民在日本各地做起来，写标语来反对"安全条约"，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回U－2型飞机，美国佬滚回去。冲绳人民起来当面質问美国人："你们究竟还要占领多久？"大会都谈开了，作起来了。日本的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有几百万人，这是四、五年前所不能设想的。我看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有希望的。把美国军事基地取消，"安全条约"取消，日本的永久和平是有保障的，亚洲和平也有保障。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內，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并不知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后来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馬列主义。周总理也

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中等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后来反对军阀，受《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党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也是念不下去，跑到日本住一年，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要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报館（申报）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恢复工业，人少，招了很多华工，去帮助恢复工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念书。中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

一八四〇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政变，也失败了。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有一两万人。一九〇六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要作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大会。一九二六年北伐，一八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时对外国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了。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

这十年里有些成绩，究竟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拿钢来说，去年才××××万吨，你们是××××多万吨。其他工业也有些发展，按人口平均很低，比你们差多了。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历史，都是自己亲身经过的，说明中国人民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辈子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的。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敢与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别的地方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先例也有，如一百八十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个机构，斗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我们中国过去没有象你们这样。

总理： 这样的机构中国过去没有，中国有个各界联合会，但搞了一下就垮台了，你们搞了十八次统一行动。

主席： 十天后你们回到日本，日本的斗争还在继续。你们过去没有来过中国的可能不熟悉，

呆下去就熟了，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

野间：对这一点我们很了解，全团都很感谢。

主席：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关于馬列主义的传播，你们比我们早。我们最先是从日本得到的。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这个人现在是否不在了？

野间：××从中国回去后，他才死的。他还写过一首诗欢迎××回日本。

主席：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野间：听了你的有益的谈話，很感谢。有一个问題，可否问一下？

主席：可以。

野间：我曾反复读过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毛主席是否还想写新的哲学著作？

主席：沒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想写一点。《矛盾论》已经很早了，想把从那以后这段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一下。

野间：希望你再完成一本哲学著作。

主席：现在精力比过去差了。我比××小一岁，去年十月国庆节我问他，他是一八九二年生，我是一八九三年生。

野间：但是看不出毛主席年岁有那样大，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年青，就是在世界上有名这一点同我们不一样。

主席：年岁大了，所以创造性也减少了，这是自然的规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書》閱讀笔記

（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

第一部分

（从第二十章到二十三章）

一、关于从資本主义到社本主义

教科书327—328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说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说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说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它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327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328页）。其实不只

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二、关于过渡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328页）。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的研究。只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

这里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級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329页）这个提法好。在1848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110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上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329页）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发展，沒有列宁主义就沒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教科书说：“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联盟”（329页）。

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在革命开始时，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沒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沒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沒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爭，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爭，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爭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沒有列宁主义也就沒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书中说："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329页）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里。书中所引列宁的話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革命都沒有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薄弱的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都是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来说，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象列宁、斯大林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沒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沒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沒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成熟的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在1905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綱領。这个綱領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爭中同立宪民主党爭取領导权的问题。中国在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沒有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1905—1917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1924年沒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領导者。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时候还不成熟，从主要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的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沒有看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并且也沒有做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在这里(331页)还有这种意思：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这样说是不完全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这种帮助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前进得快点和慢点的问題。有帮助可以快一点，沒有帮助会慢一点。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四、关于“和平过渡”

书上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可现实的可能性的。”（330页）这里的“某些”究竟是哪些呢？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1917年7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入无产阶级手里已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轉变問題

330页最后一段说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何转变？沒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令，但是完成土地问題的民主革命也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在解放战爭中，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沒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

我国在解放战爭中除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爭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是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的，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官僚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8:2。我们解放后，全部沒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如果以为在我们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漸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級专政

333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鎮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剝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剝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剝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333页），这个说法不完全。不仅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剝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用暴力来鎮压革命

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鎮压敌人的反抗，沒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怎么能行呢？

书中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说的不完全。沒有说对敌人的鎮压，也沒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的多次的斗爭，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滿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眞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按书中在这里讲到“主要任务”时，引用列宁的話，与列宁的愿意是不符合的）

说話，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騙群众，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

七、关于无产阶級国家的形式問題

334頁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质并沒有多大区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領导，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鬧事，但鬧不起来。这种形式好象与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維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維也夫派等等。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代表。那时（指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門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八、关于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335頁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说得不对。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沒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政策（沒收），对于官僚资本的财产，我们是采取沒收的办法来实现公有化的。

339頁上第二段的意思是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沒收是沒有问題的，但是中小资本家也一律沒收吗？是不是也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我国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国这些省区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分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办法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成日本的国营企业，

或者垄断资本的企业，而对于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我们对于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貨、统購包销、公私合营（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说，也是逐步进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沒有遭到什么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发展了。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是有很多新的经验，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九、中国农民問題

我国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錢，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爭，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恥，这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中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339页），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导致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沒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之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些。历次运动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份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50％完全拥护公社，沒有动摇；35％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15％的队或者反对，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发生严重动摇和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队的领导权被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爭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辯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

339页中说：“从富农那里沒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政府沒收，然后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賜观点，不搞阶级斗爭，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作法，那就是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联，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爭。

书上说（340页）：“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两重性的。”对这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点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历来他们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十、关于工农联盟

340页三、四段上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沒有敍述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者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沒有讲进行改造的过程，沒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中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沒有敍述整个改造过程的步骤和策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要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購统销就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購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实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一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

的。就合作化来说，如果只是小合作化，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发展到国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工农联盟真正的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十一、关于知識分子的改造

341页专讲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沒有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因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刘绍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有些人把知识看成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沒有高价錢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外行"不能领导"內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科学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将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同页上说过渡时期的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对的。但这里只说在经济生活上的一切领域中开展谁战胜谁的斗爭，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说法是在三条战线上即政治、经济、思想的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书上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421页也这样说），但我们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世界观以及个别问题上的观点，书上在这里都不提改造。

十二、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书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看成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种说法并不合乎苏联自己的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在1930年至1932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多，但是1932年机耕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20.3%。集体化不完全决定于机械化，故工业化不是前提。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完成得很慢，主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以后，沒有趁热打铁，而是间歇了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滿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向前进的现象。问题并不在于有沒有工业化。

十三、关于战爭与革命

（352——354页）书上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沒有国內战爭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又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沒有经过国內战爭"。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爭的形式来进行国內战爭的，是国际战爭和国內战爭合而为一的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苏联红军的铁拳拳掉的。说这些国家沒有国內战爭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沒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同国

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上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57页）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1927年起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22年延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15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混战。如果从1911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连续进行了4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成立之后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30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的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十四、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工党走。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353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在东方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十五、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嗎？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364页）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成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十六、列宁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375页）引用列宁的一段話，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辯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覚悟程度和实行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覚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十七、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鋭的問題

教科书上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376页）现在我国的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相对地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资22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2亿多元，它原有工人50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工人外，现在全市有工人百多万人，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題更加尖锐。书上这段話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沒有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沒有可能，那么怎能做到高速度呢？

十八、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381页上虽然提到我们广泛发展中小型企业，但并沒有正确的反映我们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说我们"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題"。问題并不在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增加就业。在大的主导下，大量的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上普遍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十九、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并存嗎？

教科书386页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由此推论下去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

苏联的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时间太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教科书上不承认这个矛盾。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同样会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与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我国在完成高级合作化以后，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題。

社会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为生产力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经济范畴是永恒不变的吗？能说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象其他范畴一样是历史范畴吗？

二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382页上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上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397页上说：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情况的叙述，都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和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

402页上说："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二十一、所謂"徹底巩固"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407页）"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沒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的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变质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沒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沒有量变。

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沒有部分质变，沒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的规模和外形都沒有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同样有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从个体

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的么？难道是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死亡变化么？难道不象其它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么？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死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是有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什么都不变了吗？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么？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不断的进行的。但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结束，这就是"边"。拿思想改造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是有个结束，就是有个"边"。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经过不断的量变，不断地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完全肃清了，到那时，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然后又会开始新的质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帐。例如：工业产品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

409页上说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不断迅速地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讲了许多"不断"但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许多部分的质变。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408页上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使失业者的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馬克思经济学原理忽然失灵了么？难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彻底消灭战争吗？

能不能说现在出现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世界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馬列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与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区别开来。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即使签定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的。即使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方法，只有经过战争

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就不能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在人类的阶级社会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军队是阶级实力的具体表现。只要有阶级对抗，就有军队，当然我们是不希望打仗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的协定，争取十年、廿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409页说：现在苏联已不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我们，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沒有眼睛，它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了吗？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嗎？

413页上说社会主义“团结一致”，“十分隐定”，说一致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就中断了。沒有矛盾就沒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414页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沒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沒有这种权利，就沒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沒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剝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钟惦裴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內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性，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哪一派的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馬列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这些机关这些企业就可能变质，人民对这些机关这些企业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417页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供应，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它产品去。

拿我国的人民公社的发展来说，在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实现基本社有制，对于社员一般都是有利的。这样估计对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做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于这种改变会不会抵触呢？

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时，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人这个动物就是怪，他有一点优越条件就有架子，……不注意很危险。

二十六、所謂“中国沒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銳的阶級斗爭形式”

４１９页说得很不对。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沒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动手，就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垮台，于是他们实行武装的反抗。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沒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还沒有经验。

说中国的阶级斗爭不尖锐，这不合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22年的仗。我们用战爭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沒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經济80％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20％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办法来加以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爭。

４２０页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描写得不对。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蔣介石，沒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場，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綱領规定了各种經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看到接受改造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經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本家对企业沒有实际上的管理权，并不是公方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管理生产，不能说：“资本对劳动的剝削受到了限制”，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科书上沒有吸取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企业是3/4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当然现在说来不是3/4，而是9/10，甚至更多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1957年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1959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我们对民族资本

家的策略是拉住他们又整住他们。

书中引用了列宁的話（421页）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爭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对的。

二十七、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

423页上说：我们在1957年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这样说，而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同页上说，要在十年或十五年内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倒可以同意。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1972年爭取提前二、三年到1969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

二十八、再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423页上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种話讲得不对。在东欧这些国家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至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了，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場手工业，这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工場手工业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创造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法、美、日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 （从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433页上只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而沒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

国民經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还是全民所有制，但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理，这仍然是重要问题。1958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地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发挥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妨碍这种积极性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可见在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例如，领导人采取平等态度，改变某些规章制度，“两参”“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作。原始公社的公有制时间很长，但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435页上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沒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些地方就已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經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提高到了45%，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让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比工人高，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438—439页上说“国营企业和合作（集体）經济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經济内部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就敌对势力来讲是可以的；如果要就它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说，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作是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变化的过程。

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社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出现单一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在经过一定的时期才进而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439页说：“另一部分是消费品按每个工作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这种说法使人以为社会产品中属于消费品的部分都要分配给劳动者成为个人财产，这是不对的。消费品中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设备，公共医疗、体育设备、公园等等。而且这部分公共财产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每个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

440页上把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平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住宅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转化而来的。

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谈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如公共文化、福利事业、卫生等，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中的房屋还很不象样子的，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国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是应该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该靠个

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有人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注意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象样子！

教科书在另一段说：集体农庄农户的财产，包括个人财产，包括个人付业，对于这种个人付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这样农民就会永远是农民。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要有一个限制，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一页上说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动劳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441页上承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矛盾，很好。但说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得到逐步的解决。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是一二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443页第五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也讲要克服这种矛盾，但是并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接下去的一段讲得还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和领导经济的某些形式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也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再下面一段的说法就很有问题。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是共产主义制度下之误——原抄者）虽然没有战争，但是还有斗争，有人民内部各派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经过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许多革命。

这里说到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及时克服矛盾（444页）所谓"积极活动"就应该包括复杂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444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虽然这些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矛盾。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

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进行抵抗。广东在农村中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453页第三段倒是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斗争，讲得有点生气。但是接着后段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对。矛盾是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三十三、認識的辯証过程

446页三段上说：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应该看到这里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规律总是开始少数人认识，然后是多数人认识，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沒有什么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績，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馬列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进行认眞的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沒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

所谓"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这是不容易的。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能实现的。446页上引恩格斯的話："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改造自己的历史，……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说是"开始"，是"愈来愈大"，这就比较准确。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沒有写出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鋒队也不能例外。

三十四、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452页上说到工会的使命时，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全文提到"依据一长制原则管理生产"。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所实行的在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

三十五、从原理原則出发不是馬列主义的方法

从第二十章以后列举了许多规律。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綱挈领。而教科书的方法是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乱，它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馬列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的结果是要经过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从现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却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要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这是演繹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推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理原则。

三十六、先进經驗能毫无阻碍地推广嗎？

461頁三段上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科学的最新成就也不是毫无阻碍的得到推广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们不习惯，或者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相抵触，就会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种事情本身沒有阶级性，但还是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的东西的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

三十七、关 于 計 划 工 作

465頁上引用恩格斯的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经过经济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在这里说：“自发性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46頁）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沒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人的计划都是合乎规律的，一定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或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沒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要一次再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但也不是认识够了。如果说够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466頁上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就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经常保持比例同时也就是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就到处都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分配的矛盾，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出现了不平衡，出现了不成比例，人们也就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

在计划工作上，如果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四平八稳，要求絲毫的漏洞都沒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会破坏比例。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地区不建设新的工业，1957年以前沒有进行什么建设，就误了七年的时间，1958年以后才开始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就说明象计划之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或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三十八、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工农业並举

466页上说到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也不能扩大再生产。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也有过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其他几个并举，每个并举中又有主要的方面。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不得解决。我们提出工农业并举已经四年了。眞正实行是在1960年。重视农业就表现在拨给农业钢材的数量上，1959年给农业的钢材只有59万吨，今年包括水利建设一共是130万吨，这算眞正是工农业并举了。

这里谈到1925——1957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93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17.5倍，问题是93倍同17.5倍的比例是否对重工业发展有利。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使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只要我们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与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三十九、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

二十章中说："利用工人个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348页）又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应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争取国家工业化的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348页）"社会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使工作人员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强大动力。"（456页）象这样地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只会带来发展个人主义的危险。

474页上又说按劳分配规律"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计划，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人们不能不问，既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怎么又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生产的决定性的动力？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按照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把消费品的分配当着决定性的动力，是对馬克思上述的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

四十、政治掛帅和物資鼓励

475页第三段中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党组织就不能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是不行的。（475页）虽然承认群众的创造活动，但是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爭，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条件之一。"477页也说"庄员的主动性是发展农业……的决定因素之一。"这里把群众的斗爭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

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紧接着又提到，首先要利用物质鼓励因素。好象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反映了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靠物质鼓励，就沒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半句是说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要把这两句話分开，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象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

四十一、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482页上的一段写得不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它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发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的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上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目前我国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每逢一个新的技术部門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又会特别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也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书中的这段話既否认了资本主义下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这本教科书中沒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沒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的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式，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说的，沒有不平衡就沒有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在各个方面、各部門、各个部門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的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教科书中沒有充分运用辯证法，对各个问題沒有用辯证法来研究。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沒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私有制，可以有计划的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覚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暫时的平衡。

生产力跑得快造成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关系的情况，于是就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求得适应。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前进，所以总是不平衡。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其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的规律难道独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吗？应当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

爭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沒有条件的，是永远的。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做为綱，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未加研究，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了国家论，阶级斗爭论了。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爭学说，国家论，革命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是情况不同，二是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统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十二、关于所謂“物質刺激”

486页上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沒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486页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部分人：绝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得很对。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覚悟。

书中这段说到较为勤勉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覚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覚悟低些，后一种人覚悟高些。

书上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486页），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487页）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減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覚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

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革命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在“劳动的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竞賽”的一节（501页）中关于竞賽，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缺点是沒有讲政治。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

他东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此覚悟。教科书上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則，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則，有一点偷天換日的味道。

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这种傾向，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爭时的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牺牲，也并不是为个人眼前利益，而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題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爭级别而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內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第二次国內战爭后期，打了敗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沒有或者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題有很大意义。

× × ×

二十八章说："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510页）

二十九章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漸消失。"（523、524页）

这段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劳动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是说，为了多掙錢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在学校学技术，学文化，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首先为了得高工资，

说，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524页）而在526页的第三段，在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不断提高以后，未修订的三版本，还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的話。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资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是消费品的分配，沒有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不会有产品的分配，不会有产品的分配，不会有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四十三、关于社会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500页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领导人员的威信取决于他们的联系群众的程度，取决于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这句話讲得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覚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現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的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

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制，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

政治性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所以接下去馬上就说："彻底实行从工作者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的原则……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５０６页）

四十四、关于突击和赶任务

５０５页上说：未修订的三版上这句話是："要同突击现象作斗爭，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消除赶任务的现象，按图表均衡的进行生产。"

不能完全否认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界中有和风细雨，也有疾风暴雨。突击和不突击也是波浪式起伏，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常常发生需要突击的情形，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美国，我们想不用苏联那么多时间达到苏联这样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赶上先进者，就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是要竞赛，要赶先进，也就会有突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緣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緣故。

四十五、关于价值規律与計划工作

５２０页用小字印的一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

价值規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規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規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規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規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象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有七五〇〇多万人，用搞这样两次大規模的运动的办法，我们的水利问題就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更可以增加得多，增加得快，农业生产可以更稳定，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也就更能够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赚或者是赔了錢"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中自己已经提出了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是极积"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15％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題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生猪的收購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象现在这样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521页上说到集体农庄市場上的价格问题，他们那种集体农庄市場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場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调节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有控制。我国初级市場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成为大自由。

522页上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会带来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这种说法，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发生危机，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全国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和分配，沒有自由竞爭和无政府状态等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也是由于它的所有制决定的。

四十六、关于工資形式

530页讲工资形式，主张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輔。我们是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輔，片面强调计件工资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掙大件而斗爭"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有的材料说明计件工资制还有碍于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采用。

书上承认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一面说要广泛发展生产自动化，一面又说要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形式，这就自相矛盾起来了。

我们实行计时工资和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以外，其他职工中普遍有年终跃进奖，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自己评定。

四十七、关于价格的两个問題

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消费品的价格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贯实行的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535页）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是但普遍的就业，物价低，房价低，职工生活水平并不很坏。究竟是不断降低物价好，还是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品的价格问题，相对说来，他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低，轻工业品的价值高。我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高、轻工业品的价格低。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第三部分（从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

四十八、关于土洋並举、大中小幷举

547页说到在基本建设中，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说大建设单位，同时搞得很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而反对建设中的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初步安排，今后八年中钢铁工业要完成29个大型、近一百个中型、几百个小型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是要起很大作用。许

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土的变成洋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们是要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然不可避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差武器的人打败拿好武器的人。内战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沒有全国的政权，沒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了最新武器才能打仗，那就等于自己解除了武装。

我们要实现象教科书上所说的全盘机械化（428页），看来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在第三个十年中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因为机械不够，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还是我们要提倡的，现在我们还不一般地提倡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是不要讲得过火，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火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地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以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在农业上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多少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但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眼睛都看着他，就不注意养猪。无机肥料也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硬化。

教科书中说，在一切部門中采用最新技术，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总是要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而且在采用了某种新机器的同时，总是有许多旧机器。教科书中说到，一方面新建企业，并对现有工厂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充分合理地使用现有的机器和机械（427页）。这样的说法就对了，将来永远会是如此。

至于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一定要自力更生地搞，一九五八年提出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的口号，事实证明自己来搞还是可以做到的。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靠采用先进技术而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一定这样做，也一定能够做到。

四十九、首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化？

563页上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99%还是使用木犁和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上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观点。而562页上所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場所"則是对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很慢，到现在还沒有完成，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沒有拖拉机（相对的说来，他们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恩賜的，他们沒收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100公頃以上的土地才沒收），是用行政命令来进行沒收工作的。土地改革以后又沒有趁热打铁，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則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农、下中农展开阶级斗爭，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以后，紧接着开展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的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有了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贫农、下中农的极积分子组织起来。

五十、关于"一大二公"

苏联的集体农庄合併过两次，由25万多个合併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併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势必还要扩大。教科书上说："要加强和发展各集体农庄的生产关系，组织集体农庄之间的公用生产企业等等。"（568页）事实上有些地方和我们的方法类似，只是不用我们的说法而已。它的将来，即使办法和我们一样，看来也不会用公社的名称，说法和名称的不同，包括一个实质的问题，就是实行不实行群众路线的问题。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扩大规模，按戶数人数来说，可能不会象我们这样大，因为他们农村人口稀少、土地多，但是能够因为这样就说现在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么？我们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但仍旧需要扩大公社，我们南方几省有些县，如閩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的条件下搞起大公社的。

扩大公社是一个重大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就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必然带来部分质变。

五十一、特别强調物質利益的原因何在？

在集体农庄制度一章內，反复讲个人物质利益，如565、571.580页等等。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了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公是对私说的，私是对公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从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沒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性质也各有不同。例如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沒有遗传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就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也不成其为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可以起好的积极的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在一定时期內采取一定的形态固定起来，或者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但是如果只有遗传的一面，沒有变异的一面，那么就沒有改进、发展，永远停頓下来了。

五十二、事在人为

书上说："集体农庄有形成级差地租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577页）级差地租不完全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其实还是事在人为。例如河北省內京汉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沿线的机井却很少。自然条件相似，交通一样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是各有不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事在人为"。

同是上海郊区，有的养猪养的好，有的却养的不好，上海崇明县原来说那里各种自然条件，例如蘆葦多，不利于养猪，现在打破了畏难情绪，对养猪事业采取了积极态度以后，却看到自然条件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实际上，深耕细作，机械化、集体化也都是事在人为。北京昌平县常鬧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变了，还不是"事在人

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三年治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渠的建设，也就证明“事在人为”。

五十三、关于运输和商业

运输包装不增加价值，但是增加使用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还在矿山，不用铁路，轮船、汽车运输到用戶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585页上说，他们的商业系统有两套，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此外还有所谓“无组织的市场”，即集体农庄市场。我们是一套，把合作商业合并于国营商业，现在看来，一套好办事，并且各方面节省得多。

587页提到对商业的公共监督。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依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

五十四、关于工农业并举

623页上说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未修订的三版本中在这里还特别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

工业的发展是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从别省运粮食，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的生产受到限制，增长较慢。我们过去没有了解到，恰恰是东北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辽宁这样的省，应当好好抓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今年我们估计可能生产钢材一四〇〇万吨左右，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这在今年的条件下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当然不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

波兰有三〇〇〇万人口，只有四十五万头猪，现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兰现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624页上说：“在个别时期，为了提高落后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門，消除他们的落后现象和克服因此而造成的局部比例失调现象，加速这些部門的发展在实际上可能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这是好的。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所造成的比例失调，不能说成只是“局部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不是局部的问题。

625页上说：“必须合理的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段只讲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

五十五、关于积累水平問題

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哥穆尔卡起初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结果工人只想多要錢，不好好干。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现在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錢买不到人心"。

特别强调物质刺激，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滿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兌现而不能兌现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根据631页上所说情形，苏联积累资金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国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57年是27%，58年是36%，59年是42%，看来今后我国积累比重经常保持在30%以上或者更多是可能的。主要的问題是生产大发展，只要生产增加了，积累比重大一点，还是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

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財力，这是经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么？

第四部分（从第三十五章到结束语）

五十六、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問題

639页上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将变成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漸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沒有，这是危险的。639—640页上说，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书上又说："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句話不好懂。国家的性质是压迫敌对势力的机器，国內即使沒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压迫的性质也还沒有变。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獄、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共产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五十七、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641页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沒有敌对的阶级"，但是还有敌对阶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书上在这里接着声明："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內部的矛盾。"不过是附带声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的提起。说明问題不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当作一門科学，就应当从矛盾分析出发。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馬克思他们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所预见到的。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

阶段，新的目标，新的任务一定又会提出来。

五十八、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650页上说："集体农庄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形式完全符合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有一篇苏联的文章，介绍了红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不合併时很多事情不好办，合併以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说现在一共一万人，计划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这个材料可以说明现在集体农庄的形式已经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书上这段说："要求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需要发展，要过渡，怎么能大力巩固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要讲巩固，但不能讲得过火。书上讲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讲到具体措施就不清楚了。从某些方面（主要是生产方面）看，他们沒有停滞；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停滞不前了。

书上说，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但是在我们看来，首先必须把集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由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85元，将来达到每人150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

五十九、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651页的前一段对农村建设的设想很好。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爭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六十、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經济体系問題

659页上说："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門。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滿足需要的产品。"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滿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內，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

各省服从中央决议，接受中央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重大问题的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例如廬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认为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了么？我们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提倡各省尽量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就都可以尽可能去办。以前是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

种工业，象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业品，会沒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上海已经提出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它们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滿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应当是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的独立的搞，以不依賴别人为原則，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实象书上所说的情形："发展所有工业部門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所不能胜任的。"那当然不要勉强去搞。我们国內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六十一、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能夠"拉平"嗎？

660页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漸拉平。"各国人口不同，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內的各省、一省之內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来说，佛山市和歧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歧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六十二、根本問題是制度問題

668页说，社会主义国家贷款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个敍述是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則，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妥协总是临时的。

六十三、关于两个世界經济体系之間的关系

671页上说："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場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提出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这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場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場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爭，教科书避开了这个斗爭。

六十四、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評

680页上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著作上，正如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书中所指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说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漸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生产交換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

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集体农庄由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须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的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计划经济。”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六十五、对《教科書》总的看法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沒有馬列主义，因为书中许多观点是馬列主义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是馬列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馬列主义的。基本上否定这本书，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书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剝削者谋利的经济。书上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这本书基本观点说的就是这个，书上也说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等等。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还是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承认有计划按比例之后，如何按比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各有各的办法。

但是这本书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书上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地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突出个人主义。这些都是错误的。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书上不是从矛盾出发，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斗爭，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爭。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社会中还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主要是靠集体，同时又靠个人。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斗爭。教科书上不讲这种矛盾斗爭，不提倡群众运动。书上不承认先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

书上用什么“接近”，“融洽”的模糊说法来代替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

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有严重的缺点，有严重的错误，是部分的离开了馬列主义。

× × ×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它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书上凭空的提出一连串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中发现和证明的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问题不突出，文章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

这本书看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使人觉得是一本经济学词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体写作，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写，象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

写书有批判对象，才有生气。这本教科书虽然也说了些正确的話，但沒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悶。

许多地方使人觉得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話，而不是革命家的話，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实践，并不眞正內行。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作实际工作的人沒有概括的能力，沒有概念和规律这一套，而作理论工作的人又沒有实践的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沒有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与实践沒有结合起来。

这本书表明作者沒有辯证法。写经济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沒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是不可能的。

这本教科书初出版是一九五五年，三版是一九五八年，但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就定下来了，看来斯大林在当时定下来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现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本书的写法。格·科兹洛夫：《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这本书的批评，提出了带根本性的意见。他指出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明规律，他提出了结构方面的建议。

从科兹洛夫这些人的批评看来，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这本教科书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书来，有对立面就好了。

初步读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仔细研究一下，并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这本书的观点的其它发表的文章和书报，在有爭论的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了解一下，问题要弄清楚，至少也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和反对错误的意见，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謹愼。

无论如何，他们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有了这本书，至少可供我们议论，并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六十六、关于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写法

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分配如何决定产品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个基本矛盾。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

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的商品两重性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还照抄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可能会反而把问题模糊起来，使人不容易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们写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如下放体制，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时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是中央部門直接管理，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方专区管，有的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是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管的或各级地方管的，都在统一领导下，而且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有句“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这样的話以外，根本沒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沒有在这方面分析和研究。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內，总有限度，但是在这一定时期內，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却可能是不断变革的。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管理，采用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

关于产品分配，要重新再写，换一种写法，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革命的兴趣和热情呢？

六十七、关于从現象到本質的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在国內战爭和抗日战爭的时候，我们研究战爭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强我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內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人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一个梯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它梯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敌守我攻，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

× × ×

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事物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人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经过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

× × ×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等特殊规律。

六十八、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过倍根和霍布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记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是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们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列宁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产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动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补　　遗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問題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70%就宣佈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八大”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沒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现在看来，我们再有三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长时期內，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一直总是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的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要一切爭取赶过它。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有四百万吨的商船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沒有远洋的轮船自己运货，说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九万多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的水平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调查材料说，那里的现代企业中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1/3。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沒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〇年起，十三年中还要紧张的努力。

二、关于人民的地位和能力

486页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紡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装置，有助于使紡紗、织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知识是经过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騷”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受到了挫折，才转过来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

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沒有办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国家——英国、法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明的人，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沒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工程师和普通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但是这里确实有个问題，历史常常是文化低的打敗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內战爭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內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敗了他们。

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沒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是历来看不起俄国人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人家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有这么多的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問題

列宁的这句話："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332页)"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引了这句話以后说："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极积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門的领导。"(332页)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决议中说："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法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377页)这句話也讲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那个时候，沒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的动员起来，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

列宁说："眞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順利地发展。"（450——451页）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較

教科书422页上引用列宁的話："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話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沒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沒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沒有能发展。

在內战时期，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沒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沒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缸。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內战结束以后，才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们的內战时期比他们长得多，二十二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購买余粮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爭中紧紧地依靠农民。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有点象我们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①。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397页)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沒有減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许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地多起来了。教科书中光拿苏联的经验吓唬人，影响不好。

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場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进行坚决进攻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说："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因为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生产的粮食不下四亿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四八页）

五、关于总路綫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还沒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滿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話，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生产钢四百多万吨，到了一九四〇年发展到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以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綱要，此外，当时还沒有提出其他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后，出来了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辫子，举行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会主建设的成就。1957年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9月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綱要，促进会等口号。11月在莫斯科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地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題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了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五月××同志代表中央向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但是总路线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北戴河提出了钢产量翻一翻，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报紙所说的后院钢铁。

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又夹着金門打炮，这些事情，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錢，把粮食和副食吃得紧张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几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北戴河定了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间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些被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两次郑州会议不提，武昌、北京、上海会议不提，等到"左"已经反掉了，指标已经落实了，在反"左"必出右，廬山会议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的确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廬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恐怕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总路线也将更加巩固起来。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最近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共产风也还可能再次出现。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现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和廬山会议的两次整风反右，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批判得比较彻底，使群众从它的威胁下面解放出来，同时破除了各种迷信，包括所谓"馬钢宪法"之类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不知道怎么革法，以为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廬山会议实际上也进行了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锐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会议把右倾机会主义那条路线打下去，是不行的。

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間的矛盾及其他

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斗爭，看作是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所说的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就是指这个。中国搞革命根据地也吃过这碗饭，我们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背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內部有这样的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就只有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部敌人，而且我们常常能得到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內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而且不齐心，相互勾心斗角。朝鲜战爭中，美国和他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爭也打不大，不但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不愿意。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它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同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五九年十四年中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得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剝夺之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还沒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夠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所有的国家工业革命，中国看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

我们彻底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解放。

八、人　口　問　題

消灭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生产大发展，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两千斤粮食，我们还沒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眞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在北戴河会議上的講話（节录）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条。

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賬是很难还的。

× × ×

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滿意，滿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鷄喂鴨。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爭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沒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沒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和狄克逊、夏基的談話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夏　基：首先，我必须说，在若干原則性的问題上，象我们时代的性质，防止战爭，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平过渡，普遍和全面裁军以及其他问題上，我们完全支持中国党的立場和主张。对于另外有些个别问題，我们不很清楚。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原則方面的分歧，只能有利于阶级敌人，这是使我们纳悶的事情。和中国同志一样，我们希望分歧经过讨论之后，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获得解决，中国党和苏联党必須团结。

主　席：是的，团结是必須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当然主张团结。有些人却不愿团结，他们是貨眞价实的修正主义者。任何党里都沒有什么完全一致。你是不是认为你们党是完全团结和一致的呢？

夏　基：是的。

主　席：你认为你们党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么？

夏　基：希望它能够。

主　席：在下层干部中有沒有反对的意见？

夏　基：也许有。但就我党政治委员会的同志来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在目前阶段，我们还沒有在下层中讨论这个问題。

主　席：有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好的。在中央委员会里有大多数的支持是好的。

夏　基：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将是可能的。在狄克逊同志和我离开澳大利亚的前两天，我党政治委员会开了两天会。我们在新西兰共产党的湯賴同志和曼森同志所作报告的基楚上进行了讨论。我党政治委员会的十一个成员一致支持中国党的立場和主张。

狄克逊：事实上我们前些时候研究了中国党的为记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而发表的三篇文章，我们决定支持中国同志。

主　席：我们知道你们党曾和英国党辯论过。我们党和英国党也曾在和平过渡这个问題上有过辯论。

夏　基：这也是我们党和英国党辯论的主題。

×　　×　　×

夏　基：苏共是普遍和全面裁军的倡议者。

主　席：我还不了解普遍和全面裁军是什么意义。

夏　基：我也不了解。苏共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題的严重性。就象我们那个小国家，还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大国，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老是在嚷扩军备战。在许多地方，战爭事实上正在进行，澳大利亚政府派军队到馬来亚去插手，屠杀游击队。这个政府目前正计划通过一項法律来加强对人民的压迫。这是针对我们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朝鮮战爭时，我们的同志因反对朝鮮战爭，支援中国而被捕，

他们只判坐牢几个月。但按照政府……这一案件就得判死刑。

主　席：什么案子要判死刑？

夏　基：按照这项法律的条文，支援……死刑，犯"叛国罪"的终身监禁，有破坏活动的监禁七年。这都是为战争作准备，那些像伙当然不是在考虑什么普遍和全面裁军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准备战争。在美国这次竞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宣扬扩军备战，他们竞赛谁能更好地扩军备战。因此，苏共的意见完全是梦想，是不现实的。

× × ×

夏　基：有些人抱着梦想，认为裁军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援助不发达国家，认为帝国主义可能自动解除武装。但是，帝国主义者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假如他们解除武装，工人阶级就会罢工来夺取政权。

主　席：是啊！如果真是那样，这岂不是奇事呢！

夏　基：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形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形势吧。

为了赚钱，资本家正在扩军备战。例如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中，去年钢铁公司获利二千万英磅。而在澳大利亚的美资通用汽车公司却获利一千五百万英磅。与此同时都是：教育存在着持久危机，医院缺乏，道路一团糟。并且，虽然时常闹旱灾，却毫无蓄水计划，资本家不在这方面投资，因为没有厚利可图。结果是垄断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社会制度却倒退。扩军备战能为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教育事业等等是获利很少的。资产阶级从事前者而不从事后者，这是自然的道理。

主　席：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

× × ×

主　席：不抵抗暴力的保证正好投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工党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主张阶级斗争的党。

夏　基：共产党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

主　席：不然的話，为什么共产党不去加入工党呢？

狄克逊：在我党的历史上，党内经常出现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那些人想搞垮共产党。他们要共产党加入工党，要把共产党变成为工党的翼，或具有推动力量的团体。一到历史上的重要关头和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出现。我们党和英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就存在分歧。一个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分歧，而另一个是关于对待工党的态度的分歧。英国共产党提出了组成一个左翼工党政府的口号。当然，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政府是会容纳共产党的。可是我们并不设想改良主义者会有那样的大度量，以至能够容纳共产党。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英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散发了许多材料，散布这种思想，搞得我党最后不得不批评英国共产党。波立特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很生气，他问我们敢不敢公开批评他们。我们说："敢"。这样，一个公开的辩论就发生了。我们同英国共产党的辩论继续了十几年，然而分歧当然沒有得到解决。我们希望中苏两党间的分歧不会象澳大利亚党和英国党之间的分歧那样长久存在。我党和英国党之间的分歧沒有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 ×

主　席：他们能向我们施加压力，他们能召回专家，施行经济封锁等等。中苏之间的文化交

流已经不存在可能，《中苏友好》那个杂志已经仃刊，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否继续，我们还不能断言，贸易的数量必然会减少，因为撤退专家就使按他们计划而修建的工厂发生困难。

夏　基：赫鲁晓夫高喊反对美国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但是他本人却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这比美国干得更坏。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問題

对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

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山西省委的报告讲得很对，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情况，那么，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谈。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眞万确的道理。三个月来，山西省委认眞地采取了措施，已经从各个方面压缩一百一十万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战线，农村劳动力情况有很大好转。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門领导机关，认眞地研究山西的报告，参考山西的经验，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頒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村缺乏劳动力的严重情况。

彻底糾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糾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糾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糾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眞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中央关于轉发“甘肃省委关于貫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关系甚大，請大家注意。

接見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和古巴妇女代表团时的談話（摘要）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厄瓜多尔朋友谈到“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学遗产，应该利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完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带着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你说是不是？

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分别出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我们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们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地利用它，我们现在还沒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門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再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一位外国朋友谈到："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看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

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拚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个东西也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

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的东西。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些，诗的问题还沒有解决。我很久未接触艺术界了，你们（指楚图南同志和×××）和他们谈谈吧。

（古巴代表团团长："想问一个问题，中国与古巴签订的文化贸易协定，对两国之间有什么利益？"）

就是友好，互相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的斗爭支持我们，我们的斗爭支持你们。整个拉丁美洲各国罢工、示威，反帝反封建，我们对此都很高兴。

刚才讲的文化方面的问题，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民族特点，有所貢献。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都画一样的画，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就沒有人看，沒有人听，沒有人欣赏。……普遍性就在特殊性里。

（毛主席在接见两个代表团后，还向楚图南同志和×××作了如下指示：）

你们应该和××谈一下，我们的艺术如绘画、音乐、文学等，在创作方法上，要向外国学，但不是主要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应该学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这么几个人学外国的就行了。这是个老问题，说了也很久了，但始终也沒有解决。你们和××谈一下，这个问题要解决。

批评《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

（传 达 纪 要）

（一九五八年一月）

大家对报纸的反映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不要满足。

新闻近来搞得比较活泼。

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的办法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

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

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

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气候，转变要快。

写的不要刻版，形象要多样化。

政论要象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报社的人要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

下去的人，又作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报纸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转载地方报纸的新东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作。这样，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使他们非看人民日报不可。

思想评论可以搞。

红专还是大问题，但要结合当前情况谈。

标题要吸引别人看，这很重要。

除四害还要搞一个专刊。

× × ×

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如何，要检查一下，检查那时的评论与消息。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说什么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当时反右不到半年，这篇社论就以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是不对的。不能说这社论一点马克思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里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者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话，这不对。象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

批评双轮双铧犁“冒进”了，说南方不能用，不好。实际是用了，很好。应翻案，为它恢复名誉。

“打破常规”的问题，社论说是“不适当地打破常规”，这话就不对。革命，就要打破常规。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

社论说，特别在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四十条”后，产生了冒进。这说法是片面的，这样说就认为缺点来自中央。

你们反了右没有？这种说法，形式上是辩证的，实际是把辩证法庸俗化了。反“左”、反右同时并举，四平八稳。“多快好省”方针本身是全面的，是一个整体，不能说这个适当，那个不适当。

根据经验，工作中有缺点是正常的，不是反常的。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法如何。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与陈昌奉同志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山东地方很好，根据地很大，新解放了许多县城，很需要干部。到那里要尊重地方，尊重地方干部，尊重新单位的负责人，要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

学习也好，倒不是为当官，而是为人民多做些事。当然，学习中间也有很多困难，只要你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指导员也是革命工作嘛！非当上什么官才行吗？

想当官的人到共产党这里来就是走错门啦！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官不官啊！都是一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到我们这里发财当然不用说了，想升官也达不到目的。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下午）

帝国主义很乱，我们很好。一乱一好，就这样下去。

二五年计划没有四年。我们再搞四年，过去九年如四年，十三年。过去九年不能说是全党办工业，全党办工业只靠工业厅办，这算全党办？，全党一办，就有把握了。我们办政治三十年了。

二五计划搞××万吨，一年加××万吨。……

要这么多钢，要这么多铝，从哪里来？能不能搞那么多？需不需要那么多钢？有钢无

铜、铝，就搞不到那么多电，因此缺电力，钢摆下没用。一年××万吨，史无前例。苏联战后每年才三百万吨钢。铁路、轮船不要电行，有蒸气机、内燃机也行嘛！

横直要看。因为我们人多，到处敲敲打打，中央、地方，大、中、小，条件就大变：一、人多，自然规律，并非马克思主义；二、办法，算是马克思主义了。学了苏联，你不搞，我就搞。与斯大林唱反调。他不强调农业，重工业太重，轻工业也注意得不够，我们强调工农业并举；他不强调政治也单纯强调了技术，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他采用群众路线不够，我们就强调群众路线。我们要稳步。假如每年能增加××万吨钢，这是一种想法。夏季是高潮，现在要定案，不能只讲精神。还有一种可能，办不到，放在少于××万吨，××万吨。超过××万吨有几个方案。最高一九五九年到××万吨，一九六〇年到××万吨，一九六二年到××××万吨。铁路选线有个办法：要选六条线，从其中选一条最合理最可靠的，现在我看也有几条嘛！今年增加××万吨钢算一条，插个××××万吨也算一条，××万吨算一条，××多万吨也算一条，选嘛！

中央全会二十八号开。他们（指帝国主义报纸）给我们开出题目来了：讨论打金门是否成功；日本问题；支持××××对西柏林意见；还有一千零十万吨钢、人民公社，等等。

总之，有两句对联："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政治挂帅，对嘛！"挡箭牌"，排队是个挡箭牌，还有个挡箭牌就是小土群。政治挂帅，这也都对嘛！

我们现在中央对地方，比打仗时好些。那时，不给粮食，不给军饷，不给衣服，什么都不给嘛！现在包钢还给些材料嘛！

内蒙古写了个报告，那样客气："可否"？"考虑"？不是"可否"、"考虑"，硬是要请求。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在武昌与胡××、吴××談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問題　传达記录）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一、反对浮夸作风。不是追求责任，而是接受教训。自大跃进以来，在通讯社、报纸、广播的宣传工作是取得一定成绩的，对推动大跃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宣传也有些问题，使思想上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大跃进形势来得很猛，我们又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很难免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追究责任，而是要取得教训。一定要作些检查，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的大跃进。过去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苦战三年，放"卫星"，"三化"，起了很大作用，总的方面是对头的，就是在宣传的分寸上有些问题，界限掌握得不很准。

二、放“卫星”对不对？在开始是好的，但老是放下去就值得研究了。长期下去会造成人为的紧张，不见得好。特别是有些单位放的钢铁卫星，人民日报登：“这个省、县能做得到，那个省、县为什么做不到”，对各地压力很大。运动搞起来了，不要这样干，人民日报在宣传广西鹿寨县炼钢时，连续写了两篇社论，大家都去参观，但事实上数量没有那么多，质量也很差，很多是烧结铁，影响不好。宣传工作中光讲成绩，不讲缺点。如河南今年成绩很大，缺点也不少，只讲成绩，会助长下边的浮夸作风，急躁情绪，这是不对的。文艺界放“卫星”时，不要这样宣传，因为放出了“卫星”后，还要群众承认，还是先搞出来以后，群众说“卫星”才算是“卫星”。

三、宁可少说，不可多说。对于生产成绩的数字，各省都公布出来了，但很难对起总数。今后发表统一的数目就行了。今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究竟多少，说法不一，有说一万亿斤，有说九千亿斤，也有说七千五百亿斤的，我说就七千五百亿斤的好。报道中究竟说多好呢？还是说少好呢？说少好，说少了，顶多落个干劲不足，说少了结果多，粮食还在，说多了，事情就不好办。粮食翻一番，在全世界是少有的，现在有些人就不相信，如果说多了，拿不出东西来，不单纯对你那个数字不相信，而且会把我们整个成绩都推翻了，对党的威望有损失。

四、郑州会议后，宣传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1）防止夸大消极面，不要认为过去我们都是搞左了，现在又要纠偏，不要只讲坏的不讲好的，不要说紧张得不得了，不要说过去糟得很，不要造成一种纠偏空气，要实事求是，实际上成绩是主要的。

（2）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宣传中不是要泼冷水，而是在水缸里放些明矾，使水澄清一些。

（3）要考虑国际影响。现在国外许多人怀疑我们大跃进的成绩。我们不能说这是浮夸，那也是浮夸，你说了，人家就更不相信了。为了防止副作用，要从正面宣传。如说关心群众生活，不要说过去生活搞得糟，要说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民主与集中要结合讲，不要说过去不民主，要说管理民主化。

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同志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越论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本来准备结束这一讨论，现在要继续讨论三个月，有教育意义。郑州会议有些东西不宜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内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外宣传，搞不清楚的不要急于宣传，应请示。

五、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科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要很好结合。现在宣传工作中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报纸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但有些不很正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作和写诗不一样，要切实。浪漫主义有一定限度，反对浮夸。运用群众语言有进步，但有些滥用，将群众语言变成文字时，一定要求正确性、确切性，科学性。

六、对中央各领导同志到各地视察时的报导的问题。中央报纸很注意这些报道，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把领导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传播出去了。但也有些缺点，把负责同志的每句话，衣服的颜色，笑了一笑，什么时候点了一下头等小动作，写了又写，不必要，有的写群众等领导同志，等了很长时间，给人以官僚主义的

印象，有些将领袖写神化了，这样报道不好。有些领导同志在视察中对一些问题，随便点点头，并没有肯定或者考虑要推广的，但报纸上就加以肯定了，有些事就造成被动。报道××同志在河南视察，周总理在清华大学视察时，都有类似现象，今后对中央负责同志视察的报道，中央规定：

（1）只限于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同志；

（2）写成后必须交本人审阅，不能随便发表；

（3）中央报纸不得随便转载地方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宣传问题。好的方面是主要的，但在宣传中也有片面性，违反中央精神的也有，有些问题只讲搞劳动，不讲搞学习。现在有的中学与大学把许多基础课程都放松了，这是一种危险。学校在基础课上打不好基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大中学校，以学习为主；另一种是红专学校，以劳动为主。但现在人们中有一种趋势，想将两种学校搞成一种红专学校，要纠正。两种学校都要，否则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行的。在学校中过分强调社会化，强调学生住学，这作为方向是可以的，有的作的过急，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八、对家庭问题的宣传有很多缺点，强调了斩头去尾，男女分居，各地对此反映非常反感，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对“家庭”两个字都不可以提，可成立父母兄弟姐妹“小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宣传，将来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式，还不清楚，不宣传它，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什么妨碍，宣传了实际意义不大，反而造成混乱。

九、对城市公社化的宣传问题。城市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农村中地主富农都被消灭了，但城市中还有资产阶级，要集中起来搞生产还没有把握，究竟怎么搞还没有经验，现在可积极试办，但不宜在人民日报宣传。阳泉市大量调整房子的事，这在小城市当然可以，因为房子质量差不多，但在上海、北京就不行，在城市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活悬殊很大，住宅不一样，还有一部分人还不从事生产，要调整房子会天下大乱，所以暂不要宣传。

十、对农业问题的宣传。农村大跃进以来，农业跑到工业前面，这是一种实际情况，农业过了关，这是一种实际情况，但也有一些人造成错觉，认为农村先进，城市落后，农民老大，工人老二。究竟农民先进还是工人先进呢？这要从三方面看：（一）从所有制看，工人是全民所有制，农民是集体所有制。（二）对国家的贡献来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所得工资八百元，贡献很大，而农民是无法和工人比较的，农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丰收地区，对国家可拿出贡献来；一种是刚刚可以供给自己生活的；还有一种是国家要补贴的，如灾区。（三）农民组织纪律性不如工人阶级。所以今天农民还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共产党来领导。

十一、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不要公开对外宣传。该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缺点，苏联把这本书批判得很差，如我们公开讨论，那样就不好。

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标准，不要宣传，最好要慎重。我们和苏联的标准不一样，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它有两个条件：一条是消灭阶级，一条是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宣传了我们的标准，那么等于说苏联现在还未建成社会主义。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大意)

（一九五九年三月）

一九五五年说过，不要多久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句话现在看来不对。……生产关系不仅包括所有制，还包括人与人的互相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有他们的世界观，在政治关系上要复辟，推翻我们，当时没有料到来一个反斯大林风潮，五六年“反冒进”，五七年右派进攻。

出现马鞍形不要紧。波浪式前进是客观规律。错误在于不该“反冒进”。……五七年有马鞍形，库存多，五八年才能跃上出。……只要不“反冒进”，出现马鞍形并不是错误。马鞍形总是要有的。……不能每天都是高潮。……事物前进总是有波浪。飞机、汽车往前开，都有波浪。声、光、电、水，都有波，这是运动的形态。事物前进总是一波一波的。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一九五九年三、四月）

二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有几个问题：

组织章程问题。社、队、组都应有章程。来一次全民讨论。

小队部分所有制。

吃饭不要钱如何？要研究。供给制要和按劳分配相结合，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处理吃饭不要钱的问题。

算账问题。过去说一般不算账，现在要改过来，一般要算账，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边的。

公社委员的选举问题。委任制是危险的，应该由有生产经验的人当委员。要规定那些人不到场不能作决定。

征收要搞绝对数。多少议一下。多了不利。

县要不要积累？我看不要好。有些已经抓了一些，手很长。办工业赔了钱，两头抓，抓了财政部和人民，后者不要抓好不好？

银行贷款。贷款一律收回，其目的就是破坏公社，违反专款专用的方针。

投资。×亿元投资如何分配？投在谁手里，如何用？有些公社干部，以共产主义之名，行本位主义之实。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人民就有利于国家。

农业指标。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指标定的太高，要留有余地，使下边能够超过。潜力让群众去发挥。

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计划是不是也有主观呢？

搞了十年的经验，才知道准备要一套一套地抓！

据说你们很忙，睡不成觉，忙什么呢？越搞越不落实。

老干部办工业，我看还如×××。官这样作下去，怎么得了！去年××搞××××万瓩的发电设备，还不知道要合金钢管！

群众路线讲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开会就找厂长、工业书记，不找车间主任，没有对立面。

我们党有一条群众路线，现在看来工业还没有。老是说不够，什么叫不够？秀才打官腔。

对事务的观察又深入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个提法很好。

明年马鞍形，积蓄力量，后年来个大跃进！“天增岁月人增寿”，岁月过去了，经验还没有总结起来，余致力于工业凡九年，才知发电设备要无縫钢管。

搞工业，××××项，搞不成何必多搞！分散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

运输力量不足。什么叫短途运输？短多少？

以物易物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互通有无，一种是不好的。

来个狠，实事求是。你这个人不狠，所以不实。

一面搞钢铁，一面搞粮食，双管齐下，抓得狠，抓得紧，抓得实。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废品，像打麻将一样，就是靠“吃”和“碰”。上家的废品，是下家的粮食。

什么“可否”！犹豫不决。这两个字改为“一定”。

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节衣缩食，不可出口，自己少吃一点。

要搞增产节约。

全民办工业如何解释？全民办工业讲得太多了，全民办农业差不多。

工人阶级老底子是四百万人，大革命时（一九二六年）两百万人，经过二十三年增加两百万人，到一九四九年四百万人。解放八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每年平均增加一百万人，增加了八百万人。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一百零九年只有四百万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八年中间就增加了八百万人。去年一年增加××××万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照这样搞下去，一年××××万，十年×万万，有人没有机器，一个人的事可能七、八人做。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就业六百万人，包括“美国之音”等，只有六千万人。我们这样搞下去，十年×万万人，怎么得了！学徒一年二百一十六元，壮丁在城市赚钱，老弱在农村吃饭，壮者散在四方，流在城市，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这同马克思主义不合，同社会主义不合。

接见十一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和驻华使者谈话纪要（节录）

（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好呢？还是不怕好呢？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一个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这么大，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象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鬼，半个人，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尼赫鲁是半个绅士，半个流氓，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

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而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论中印关系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注：外交部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为潘××大使拟了一份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的书面谈话稿。毛主席在审阅这篇谈话稿时，加了这段文字。标题是原编者加的。）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

也将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俗话），今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个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明白和欣尝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路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

讲讲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谓人生观就是社会观，世界观，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部分。为了通俗起见，说人生观也可以。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俄国有造神论、神论和迷神论，把精神来造人。是谁呢？是不是卢那察尔斯基、波格达洛夫，他的著作我看过，现在忘记了。马赫主义说，是奥地利和德国的，美国叫实用主义，又叫功利主义，是一个东西。他们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真理是固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个真理。由感性到理性，客观真理又变成

主观真理。

主观真理是来自客观真理。同宗教不同，和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相反的，我们的这些同志一厢情愿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而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真理，求是者是主观反映客观真理，要经过脑筋。要千百次反复的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人马牛羊、鸡犬猪都是概念；人有资产阶级的人和无产阶级的人，男、女、老、幼都是概念，都是抽象来的。具体的人，张三李四。如董老、林老、吴老，你们是老年人。你们的娃娃是青年人。你们的夫人叫女人。

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巴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是最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宗教家，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上也没有了，他们是唯我主义。

为什么要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关于坚决地认眞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四川省委送来的“周×同志关于南部、仪拢两次农村劳动力问题和“三反”情况的电话报告”和“南充地委，温江地委关于农村公社浪费劳动力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至县委，要他们仔细阅读，切实研究，如果本地也有类似现象，就应该象四川那样，派出专门小组到公社去加以检查和督促，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千万不可迟疑不决。

四川这几个材料说明：县、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是极为严重的。甚至生产队本身也把许多应该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过多地使用于其他方面。四川省委和地委找到了这个窍门，进行了调查和清理，结果在五十五万人口的仪拢县，就可清出约四万人，（约占全县总劳动力百分之十五以上），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南部县建兴公社就可挖出占全公社劳动力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鄂县友爱公社在调整前，生产队一级使用的劳动力只有三千零三十五人，调整后增加到三千六百四十四人，即在农业第一线到增加的劳动力，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从这几个典型材料，就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没有希望的。

四川的材料还揭穿了一个“秘密”，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农村活路重，生活苦，城镇劳动轻松，又能拿现钱，便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农村”。“城镇占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基层干部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和舅子，老表，亲戚朋友，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使自己家庭生活舒适，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他们的家属从农村搬到镇城，安插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逃避农业生产”。因此，“从这次清理劳动力的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指出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扫除某些干部包庇自己亲戚朋友逃避农业生产的障碍。上述这些分析是很生动的，是很正确的。中央还要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中，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形成一种特殊阶层，干部包庇亲戚朋友，安置较好位置，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的一种，也

就是官僚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千万不要忽略，在其萌芽时就要不断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不可任其滋长。

四川解决农业第一线劳动力的斗争，是结合农村三反进行的，其他各省区也可以结合三反进行，也可以先对农业第一线劳动力问题作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结合三反作深入的解决。总之，清出一切可能的劳动力去加强农业生产，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

（对一个文件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春）

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议论，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五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订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广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何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以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的办法。

办法：

一、走出办公室，田间会师。

二、实行“三同”，三包”。

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办法，既做好中心工作，又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的经验。

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21.7—1968.5）

内部学习·不得外传

目　　录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1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4
《反对本本主义》说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6
《中央关于认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
　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一封信》（摘录）（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7
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話（节录）（一九六一年三月）……7
在接见亚洲、非洲外宾时的谈話（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8
在接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8
调查成灾一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8
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9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10
对《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11
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1
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話（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12

关于科学研究十四条的指示（一九六二年一月）……13
给郭沫若同信中的几句話（一九六二年一月）……13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13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14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15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場的问题……18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19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2
　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23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讲話（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25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29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話（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31
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34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34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37
关于电台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38
批评新华社（一九六二年）……38

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二月）……39
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話（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39
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
工会工作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話（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39
对四个文件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42
对东北和河南两件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42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三年五月）……42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44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45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46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爭……46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47
三、关于四清问题……48
四、关于组织贫、下中农革命的阶级队伍……49
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49
六、关于应用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50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話（一九六三年五月）……51
一、形势问题……51
二、认识问题……51
三、要点……53
四、四清……53
五、方法……54
批示×××在农村蹲点至少五个月（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54
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代表团的谈話（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55
八连颂（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58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爭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59
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
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60
电唁杜波依斯博士逝世（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61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九月）……61
祝贺霍查同志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61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62
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65
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
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66
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70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滿的指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70
谦虚——戒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71

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75
论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76
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77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79
同×××谈人民日报要学习解放军（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79
给问恩克鲁瑪总统的信（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79
就巴拉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爭对
《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80
谈报纸革命化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81
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
正义斗爭发表谈話（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81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
代表团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82
几段插話（一九六四年一月）……86
对《人民日报加强学术文章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88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
情况通知》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88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89
关于出版三十本馬、恩、列、斯著作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91
春节谈話记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91
送给李纳的四句話（时间不详）……96
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話记要（一）（一九六四年二月）……96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二月）……97
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97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97
对新华社的指示（一九六四年春）……98
给华罗庚的信（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93
给高×的信（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98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話（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99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三月）…… 100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103
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一九六四年四月）…… 109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和批示（一九六四年四月）…… 109
在谢富治同志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110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一九六四年）…… 111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一些插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 111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112
在四个付总理汇报时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五月）…… 115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115
和×××的谈話（一）（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117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下午）…… 118
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話（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119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一九六四年六月中旬）…… 121
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 121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128
接见外宾关于保健工作的一段谈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133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133
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136
暢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六月）…… 136
在小型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四年）…… 137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六四年）…… 137
关于部队开展游泳活动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137
对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报导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 138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
细迫兼光等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138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144
对汪东兴同志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七月）…… 146
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后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 147
关于部队学习游泳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147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 147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
的請示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 147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148
同李雪峯等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 154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
访华外宾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155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158
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話（二）（一九六四年八月）…… 161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164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169
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話（一九六四年八月）…… 174
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175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176
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驻华大使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181
与计划领导小组的谈話（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 181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讲話（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 181

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186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 186
接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的谈話（摘录）（一九六四年十月）…… 186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話记录（摘录）（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187
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187
对《关于×××、×××、×××问题》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187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188
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89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89
人民日报现在有看头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9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99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9
同江西省委同志谈話记录（摘录）（一九六四年）…… 201
中国的大跃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202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爭并沒有熄灭（一九六四年）…… 202
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3
关于划分阶级问题的指示（时间不详）…… 204
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时间不详）…… 204
《前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一九六四年）…… 205
蹲点问题（一九六四年）…… 206
论实事求是…… 206
小資产阶级的通病…… 207
《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一九六四年）…… 208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209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212
对徐××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226
中央《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摘引)(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226
接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226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227
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一月）…… 227
听取××汇报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228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228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
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228
正面教员与反面教员（一九六五年二月）…… 229
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三月）…… 229
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230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 230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230
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231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231
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231
给章士钊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232
对医务人员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232
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233
给华罗庚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233
接见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的谈話（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233
在錢××、张×汇报卫生工作时的插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234
接见法国务部长馬尔罗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236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240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一九六五年九月）…… 242
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讲话（摘录）（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242
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谈劳改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242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九六五年十月）…… 243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243
在听取×××同志汇报时的插话（摘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244
批判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244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244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46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49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249
对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 250
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 250

关于《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252
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三）（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252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
（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253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253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話（一九六六年三月）…… 254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将文章后
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254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255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話（摘录）（一九六六年三月）…… 257
与康生等同志谈話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三十日）…… 258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二十五日）…… 258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58
批判彭眞（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259
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259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話（一八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260
关于发表全国第一张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261
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話（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261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一九六六年七月）…… 262
暢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 262
重要讲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262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263
对中央首长的讲話（一九六六年七月）…… 264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265
关于打人问題（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265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266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266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67
在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时加的一段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67
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267
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八月）…… 267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268
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林彪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268
在天安門城楼上与北大附中×××谈話纪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26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269
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爭问題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 269
关于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八月）…… 269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270
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270
对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270
附：“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 271
关于中央文革（一九六六年九月）…… 271
就左派队伍问題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271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272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 272
对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一十四日）…… 272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27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274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各大区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六年十月）…… 276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276
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十月）…… 277

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时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277
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278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278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78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79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79
关于军政训练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79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四点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79
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80
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80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0
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1
附：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 281
和林彪同志的一段谈話（摘录）…… 281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十六七年一月一日）…… 282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282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話（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282
与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 283
关于接管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283
谈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284
关于军队支持左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284
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84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235
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285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285
与周总理谈夺权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 236
关于夺权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 286
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
的夺权斗爭》所加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一月）…… 287
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87
谈文明斗爭（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287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288
关于西安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290
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十八日）…… 290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9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的
两个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293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一九六七年二月）…… 293
为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
加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293
对北京两所中学军训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94
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94
在《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話（一九六七年三月）…… 294
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295
两条路线斗爭的基本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 295
对铁道兵党委一个报告（渡口驻军支左经验）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295
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
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一文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295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一九六七年三月）…… 296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八月）…… 296
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
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296
对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报告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297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297
对报纸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97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98
对《红旗》杂志调查员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一个组成部分》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298
关于大批判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98
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98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四月）…… 299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99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99
关于批判黑《修养》（一九六七年三、四月）…… 300
不能放弃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爭（一九六七年四月）…… 300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301
附：《触詟说赵太后》原文…… 301
与×同志的一段对話（一九六七年四月）…… 302
关于军管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 302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四月）…… 302
接见谢富治同志时的谈話（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302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罰（一九六七年四月）…… 302
关于陕西驻军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
的批示和批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303
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303
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304

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話（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304
“五一”节对阿尔巴尼亚贵宾的谈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304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305
“五一”节和张×的谈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306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306
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306
关于军队整训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307
对广州、湖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 307
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文章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308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九六七年五月）…… 308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09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一九六七年五月）…… 309
对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309
对上海市革命委会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309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10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10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312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話（一九六七年五月）…… 312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关于夏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315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有了错误就改（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 315
对中央警卫团支左部队的三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316
对赞比亚总统的谈話（摘录）（一九六七年六月）…… 316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一九六七年六月）…… 316
对姚文元同志訪問阿尔巴尼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7
关于绝食靜坐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317
看了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7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317
关于建造主席塑象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317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七月）…… 318
在听了××××会议汇报后的讲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318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 319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319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話（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319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一九六七年七月）…… 320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20
《中央对武汉军区的复电》（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20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21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21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加的一句話（（一九六七年七月）…… 321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2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2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一九六七年八月）…… 322
对天津、河北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2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323
关于武斗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3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
的批示和修改（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323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4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一九六七年八月）…… 324
8.27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324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25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325
对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25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25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26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七——九月）…… 326
附：中共中央通知…… 326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話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338
一、视察沿途讲話主要精神…… 338
二、视察上海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29
三、视察浙江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331
四、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 331
五、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334
六、视察武汉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十一日）…… 335
七、视察河南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338
八、在回京列车上，以“斗私，批修”四个字祝贺
铁路工人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九月）…… 339
对林彪同志1967年国庆讲話的评语（一九六七年十月）…… 339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話（一九六七年十月）…… 339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 340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馬扎莱的谈話（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340
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341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341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341
对《解放军报》1967年11月9日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的重要修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341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342
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342
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342
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343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343
关于举办学习班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二月）…… 344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345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34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爭的继续（一九六八年三月）…… 345
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346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爭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346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347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是好的，百分之××是一般的，百分之××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的，有不到百分之××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沒有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沒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

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沒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咀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顏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請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錢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沒有基础，沒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沒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門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門，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作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沒有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〇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眞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剝夺劳动者，只能剝夺剝夺者，这条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剝夺劳动人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剝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錢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購，常常压级压价，剝夺农民，交換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脫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話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圍。有些省决心不大，作的差一些。一省之內，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剝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的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沒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象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場大斗爭，要在实践与斗爭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

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眞，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賬，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〇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沒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沒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逸，决议文件也不多，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〇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万吨。今、明、后年，搞几年慢騰騰，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作，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的坏話，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沒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爭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爭时期，我们和蔣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賬，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爭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購、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廬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沒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沒有兌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鳴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爭。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沒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

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沒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廬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廬山会议是要纠正“左”的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作。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沒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沒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廬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廬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沒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剝夺农民利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剝夺农民的，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滿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象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賬，不搞两本賬，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万吨到××××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話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話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象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沒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沒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沒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洩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賬。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廬山会议时有少数人鬧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眞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好的不到百分之××。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个单位，烂掉了××个，占百分之×，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眞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愼，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眞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門进行调查研究。

《反对本本主义》說明

（原名："关于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沒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

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分供同志們参考。

毛 澤 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中央关于認眞进行調查研究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一封信》（摘录）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課堂，走出书斋，毛主席讲：眞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人有眞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人走。

在广州会議上的講話（节录）

（一九六一年三月）

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題：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題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眞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

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

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几年来出的问題，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滿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馬观花只能是輔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則，沒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題。沒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在接見亚洲、非洲外宾时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对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毛主席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说，对帝国主义进行斗爭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毛主席指出，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毛主席严厉地譴责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并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进攻古巴，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它的眞面目，说明了肯尼廸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作为工具侵略刚果和杀害盧蒙巴的罪行，将非洲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

毛主席表示，最近万隆亚非团结会议上表达的亚非人民同拉丁美洲人民加强团结的愿望，是好的。对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爭的共同事业是有益的。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爭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爭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接見古巴文化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和古巴是两个友好的国家，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在一些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都有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爭中取得胜利，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爭中取得胜利。

調查成災一例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如果还是如同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方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話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轟走。

在北京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沒有眞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訊”，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頓，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糾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眞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沒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沒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〇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沒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沒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〇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沒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眞糾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眞的整頓，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沒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 ×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了三年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思想上眞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爭和解放战爭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沒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

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 × ×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錢，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試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則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則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門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也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守卫，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話。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对《各地貫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問題》的批語

（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县、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題，作一次认眞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兌現，爭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購、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給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題，至今还沒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題。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題。这个问題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題。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規定界限，河北同志規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規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題，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話：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沒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絲、茶、糖、菜、烟、果、葯、杂以及猪、馬、牛、羊、鷄、鴨、鵝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題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在接見日本朋友时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眞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眞正朋友。朋友有眞有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眞朋友，谁是假朋友。

中国有句古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尽管斗爭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原载《新华月报》1961年第十一期）

关于科学研究十四条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一月）

“……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群众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事很重要，請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給郭沫若回信中的几句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九六一年，郭沫若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了一首诗，毛主席十一月十七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后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郭沫若又作了一首和主席的诗，诗曰：

赖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该和诗由康生同志转交主席，主席回信郭沫若说“和诗好，不是‘千刀当剐唐僧肉’。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問題。这个問題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

性的問題。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問題尤其重要。毛泽东同志最近指出："看来問題很大，真要实現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現的，否則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望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領导干部，认真貫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傾向。

《发至县团党委，不登党刊》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同志们：

我現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題，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題。

第一点、这次会議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沒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請大家評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題。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題。因此要請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紛紛，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沒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評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題。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請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題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話，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

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問題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題。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話，怕群众批评。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眞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題，正确和错误的问題，这是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話的方法。

不论党內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眞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眞正把问題敞开，让群众讲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让人家讲，罵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鍛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鮮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离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呂覽。韩非囚秦，说难孤憤。诗三百篇，大抵賢圣发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話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鍛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臏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暢，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鑒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題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話，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眞正犯了

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話，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眞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怕害，不敢讲話，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內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沒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沒有民主不行。当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沒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題不了解，有意见还沒有发表，有气还沒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沒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沒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沒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眞实的材料决定问題，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眞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題，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眞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內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話，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眞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眞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

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話。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是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见儒生。管門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請。請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頓。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酈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覚。如果他们睡得着覚，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沒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鴉雀无声，大家不讲話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紛紛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話，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話，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請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沒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眞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眞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

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沒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爭。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爭，这种阶级斗爭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沒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沒有民主，沒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沒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們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級？压迫那一些阶級？这是一个根本立場的問題。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場问題。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暫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覚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認識客观世界的問題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战爭。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爭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爭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鍛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爭前夜和抗日战爭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沒有经过大风大浪，沒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沒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沒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说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

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沒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沒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話，我说："你知道，对于治政、军事，对于阶级斗爭，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沒有干过，还沒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話太謹慎。"我说："不是什么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沒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眞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沒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釘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谈話，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壯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內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賈宝玉这种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爭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爭。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爭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

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門，例如粮、棉、油、麻、絲、茶、糖、菜、烟、果、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眞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內，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眞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业，至今还沒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沒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驗，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驗。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內，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沒有经驗，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

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沒有来得及，也沒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釘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請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沒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眞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錢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

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蔣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結全党和全体人民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沒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爭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話。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話。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話。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眞話，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話，眞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話，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罰，讲错了話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暫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眞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眞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

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眞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眞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沒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話。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話。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眞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話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賬，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賬，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賬，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賬，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的了。总之，各有各的賬。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

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眞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眞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請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話，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請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請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靜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話，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話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話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接見几內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

主席：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与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或沒有独立正在斗爭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爭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二亿吧？二亿人民要翻身，不管已经站起来或者将要站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也是二亿人口，亚洲的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我们不是孤立的，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来了几天了？

凯塔（几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我们是四月十九日来的。

主席：她们呢？（指妇女代表团）

凯塔：她们是四月二十五日来的。

主席：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

凯塔：她们不走。

主席：欢迎。他（指柯庆施同志）是上海的主人，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你们是民主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样，对嗎？

柯庆施：你们为何不多住几天？

凯塔：我们的日程排得很紧，国內工作很多，五月十五日以前要完成改组党的各级机构，如有时间，我们很愿意在中国访问一个月。

主席：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是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是一个有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綱领的党，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领导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搞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搞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沒有这种人？

凯塔：沒有。

主席：如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

凯塔：有些国家的技术人员有这种情况，中国专家沒有这种情况，他们都工作得很好。

主席：是不是有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特殊化的情况？（对叶××说）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叶××：周总理正在要方×同志检查。）

凯塔：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直到现在中国专家并沒有过分的要求，有些国家的专家要比几专家高二、三倍，相反，中国的专家沒有过分的要求。

主席：驻几内亚大使是谁？是柯华嗎？（旁人答是的）

凯塔：只有中国专家和越南专家待遇一样。

主席：是否有人损害你们的民族利益？搞顛复活动？

凯塔：有，但不是中国人。对搞顛复活动的人，我们也不是听任他们去搞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回击，我们不愿意做人家的尾巴。过去发生的事件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你们也是知道的。

主席：你们做得对。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顛复活动，应把他们赶掉。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顛复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是一个革命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他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友好的支持、帮忙。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帮忙不大。再过五年、十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与你们差不多，差不多是在沒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几个国家的殖民地。你们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嗎？

凯塔：关于跟法国建交的问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沒有解决。我们独立后与法国双方互派过代表，进行过谈判，想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至今还未解决，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主席：你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好嗎？

凯塔：好的。

主席：与馬里呢？

凯塔：非常好。

主席：与索馬里呢？

凯塔：差一些，还沒有外交关系，往来较少。

主席：与加纳呢？

凯塔：好的。

主席：与摩洛哥和突尼斯呢？

凯塔：跟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好，但有些不同。非洲有两个不同的集团，即卡薩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

主席：蒙罗維亚集团？

凯塔：卡薩布兰卡集团是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內亚、馬里、利比里亚和摩洛哥六国集团。蒙罗維亚集团是过去非洲馬尔加什联盟的国家。卡集团较进步，蒙集团不大进步，与殖民主义联系较多。

主席：蒙集团是否属于法属共同体？

凯塔：是的。我们与卡薩布兰卡集团关系好一些。跟蒙罗維亚集团的有些国家，如塞內加尔、利比里亚、象牙海岸等国，边境相连，遭遇和问题都差不多。我们认为非洲分为这样两个集团并不符合非洲人民的利益，所以杜尔总统向所有非洲国家采取外交措施，创议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五月份要开会，要协调相互的立場，取得一些共同点，取得合作。正如主席所说，进步力量应该支持邻国人民，非洲许多国家与殖民主义势力有联系，与欧洲共同市場有联系，而不是与兄弟的邻国有联系。我们預备开会讨论非洲共同市場问题，以便发展非洲自己的经济，摆脱非洲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非洲所有国家首脑会议五月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貝巴召开。如果几內亚创议的非洲首脑会议有结果，可以使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主席：非洲国家要联合，另外还要一个更大的联合，即亚、非、拉美三大洲的联合。

凯塔：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大联合的重要性，因此首先非洲国家自己要联合，以便在大联合中起积极作用。我们不少非洲国家正在受痛苦，还在受殖民主义的痛苦，特别是经济上受新殖民主义的痛苦。要实现大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主席：几內亚有多少人口？

凯塔：几內亚国家很小，有四百万人口。

主席：土地面积多少？

凯塔：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二——十三人。

主席：很大的土地，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有森林嗎？

凯塔：很多，特别是矿产的前途很大，我国有丰富的铁矿、鋁矿、鉻矿，是非洲矿产最丰富的国家，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利用来发电，以便在当地自己提炼矿砂。

主席：听说你们在建造一座大水坝？

凯塔：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法国人已有此计划。法国想在孔库雷河上建造一座大水坝，每年可发六十亿瓩的电，用此电力提炼鋁。法国组织了国际公司，并与国际银行建立了关系，以便取得资金。一九五八年几內亚独立了，法国认为不安全，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独立后，几內亚政府想搞，苏联原則上同意与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援助几建设水坝，但现在苏、几政治关系复杂化了，恐怕不准备搞了。

主席：还沒有搞嗎？

凯塔：沒有搞，杜尔总统访华时经过莫斯科，苏原則同意援助，但至今沒有动靜。

主席：听说有个貨币问题，解决了沒有？

凯塔：我们在一九六〇年建立了几內亚法郎，目的是退出法郎区，建立独立的貨币区。这种

法郎不能兑换外币，以避免殖民主义者掌握大量几內亚货币兴风作浪。但有些邻国以几法郎投机，他们从几带出大量货币，换美元和英磅，或以低于官价出售几法郎，压低币值，或贩运货物到几內亚来换取几币搞投机。所以几政府在今年四月决定取消旧币换新币，在外国的旧币一律作废。

主席：你们自己能印鈔票嗎？

凯塔：不能。

主席：在哪里印呢？

凯塔：起初在捷克，最近一次在英国印。现在正设法自己弄到印鈔票的机器，以便保证不断地印自己的鈔票。

主席：几內亚妇女有选举权嗎？

卡瑪拉（几妇女代表团团长）：有的，在党內、政府內都有。

主席：党里有妇女领导人嗎？

卡瑪拉：党的街道委员会，村委员会和省委员会都有妇女领导人，恩廸阿依、贡代二位都得到了独立勋章。

主席：你们的革命是群众性的，党也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女的太少了，女的有，但比例是男的多，女的少，地方党委也是如此。你们走在我们前面去了。

凯塔：我们的比例也少，十七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二个女的，政府中只有一个部长是女的，就是卡瑪拉夫人。我们那里也仅仅是开始，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妇女受到双重压迫，不仅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男女不平等，女的上学机会不多，革命胜利后男的还有封建思想，女的积极斗爭，现在有女的市长、村长等。

主席：慢慢来。

凯塔：她（指卡瑪拉夫人）想一下子解决问题。

卡瑪拉：他想阻拦。（全場笑）

主席：我们与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沒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沒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沒有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飯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他们造成的，经济、文化水平低是他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他们代替我们管理的。本国人讲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沒有错误？他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他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沒有错误，我们是革命。沒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沒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提高，例如地质人员，你们现在开始有了嗎？

凯塔：以前的地质人员都是别国的，现在有许多几留学生在别的国家培养。

主席：我们国民党、蔣介石遗留下来的地质人员只有二百人，现在十三年来有了十几、二十万人。（问柯庆施同志：各省都有嗎？柯说有。）能搞起来的。难道只有西方国家能搞，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嗎？

凯塔：杜尔总统也认为爭取独立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管理国家也是一样。只有打铁，才能

成为铁匠，只有学了才会，管理国家慢慢能学会。如一九五八年独立时，几学生只有三万二千人（指在学校的），现在有了十二万。

主席：增加了三倍多。你们过去可能沒有大学。

凯塔：沒有，很少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要到巴黎去。当时殖民主义者对培养当地的干部沒有兴趣，只有二百个大学生，现在有一万五千个大学生，各省都有。

主席：比例不小，四百万人口中有一万五千人。

凯塔：现在科纳克里正在搞技术高等学校，培养地质、农业等技术人材。一方面继续向外国派，另一方面尽量在国内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使能适合本国的条件。

主席：今晚你们有何活动？

柯庆施：晚上我们要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主席：他（指柯）是主人了，我们这就告一段落，好嗎？

凯塔：我们沒有别的話。在北京已与许多负责同志讲过，现再一次向主席表示：几內亚对于中国的友谊和合作寄以极大的希望，对中国为几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谢。这次谈判印象很深，中国政府领导人很谅解我们，谈判进行得顺利，得到了积极的成果。再一次表示两国关系是巩固的，代表几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我们感谢你们，这是互相支持，我们很抱歉，不能完全滿足你们的要求。

凯塔：你们已尽了你们的能力。非洲有句話：援助的方式比援助的东西更重要。

主席：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友好、坦率、诚恳、不讲假話，讲老实話。以后继续往来。你们来过中国吗？

凯塔：他们都是第一次，我一九六〇年陪杜尔总统一起来过，到过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主席在北京接见过我们。到上海时柯市长举行了宴会，我们还参观过上海汽轮机厂，宋庆龄副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们。

主席：你们回去后替我问候塞古·杜尔总统，问候你们中央的各位领导人，祝他们好。

凯塔：在我们离开这儿前，再一次祝主席身体健康，祝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暢所欲言的问題。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刘××、周、朱×、邓××、彭×、富春、先念、譚××、伯达、陆××、富治、谷牧、罗××、陈毅、楊××，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沒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沒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題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話，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內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

阶级存在，认为沒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爭，说阶级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爭，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有沒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題。

二、形势问題，也要談一下，国际问題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內形势談一談。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沒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題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廬山会议的三句話："成绩很大，问題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沒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沒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謂沒有实行，就是沒有认眞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題，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沒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題。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內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內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阶级，就沒有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鬧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戶"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戶"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鬧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鬧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爭夺小资产阶级鬧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鬧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沒有解决，还要续继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話，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內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內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題，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議中心小組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綱，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提）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請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吳××、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淨淨？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現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剝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購物券，他们的購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搖分子坚决鬧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沒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戶，单干、集体两下竞賽，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盜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貸，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戶）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場。

（康生同志插話：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內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戶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則错误东西泛濫。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場，平均每个場有十六戶，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戶。包产到戶，大戶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沒有阶级斗爭？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象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象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財，发国家困难之財，贪污盜窃。党內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沒有精神准备，我们沒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沒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財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眞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購，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購，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沒看准，农民就沒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沒有精神准备，和沒有馬克思主义。沒有思想准备，沒有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話，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話，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話。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爭。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爭，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沒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爭，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饒漱石，长期沒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話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〇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爭夺，地富要爭夺，我们要爭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爭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貧农，还要爭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則来，挥之則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沒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兎、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購。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象军事、外交，有些部門象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攬，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攬？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門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門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門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对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批評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話，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沒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沒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沒有阶级存在？有沒有阶级斗爭？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爭，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

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沒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購，沒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艦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爭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沒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場斗爭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爭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爭问题，馬列主义与反馬列主义的斗爭问题，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爭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州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爭，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爭，那是很好的武装斗爭，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爭的问题，就是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爭。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爭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話。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眞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馬克思主义的立場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沒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眞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沒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沒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沒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救免他们嘛，我们也沒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眞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眞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沒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請同志们注意，阶级斗爭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廬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爭要平行，阶级斗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爭）。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沒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爭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爭要搞，但要有专門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門是专搞阶级斗爭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館、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馬列主义普遍眞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眞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沒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話："诸葛一生唯谨慎，只

端大事不糊涂。”

請邓××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沒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沒有审查清楚以前，沒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門。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爭，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 × ×

官僚主义小則误国误民，大則害国害民。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主观瞎指挥的官僚主义。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溫床。

治官僚主义的办法：接触群众，接触实际。

三自：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祿。

一爱：爱形而上学，爱好资产阶级思想方法。

爱好形而上学，缺乏两分法，这表现在爱讲成绩，不讲缺点，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做全面分析，扶得东来西又倒。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

（北戴河記录稿）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在谈到坚持集体化方向，工业支援农业时说〕：搞了四年，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不大自覚，不大愿意。巩固集体经济有两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支援农业。从长远来说是农业的技术改造，总的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科学的研究，沒有抓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说：科学院是搞尖端的。

要抓农业技术改造。

民主与集中，集中与分散，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指綜合部門）。

农业机械化要搞个文件，二十五年左右实现机械化，同时实现工业化。

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躺下。是消极好，还是鼓足干劲好？是单干，还是集体好？要提起注意。

对困难发生消极情绪是不是思想问题？

计委、经委、工交各部要加强支援农业。要抓紧改，这是机会，还来得及。

计委搞两个文件：支援农业的报告；三个部分：方向，面向农业，支援农业的方针。

关于电台的指示

（国庆节在天安門城楼对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講话）

（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

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取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说話，原政府的声音人们就听不到了。我们的电台怎么样？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

批評新华社

（一九六二年）

《內部参考》登那么多包产到戶的材料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登。办內部参考要有方向。

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汇报时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二月）

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主席，主席称不适。因再三要求，主席着睡衣接见。）

契：听说你们要发表文章，不必要的，感到很沉重。

主席：不必要，你们为什么发表那么多文章？沒有什么沉重的，不过互相论战，不过是唇枪舌箭而已。

契：請你到莫斯科去談一談，可以吗？

主席：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老而不死，破套鞋去不成了。

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

主席：你们到中国有多久了？是一起来的吗？

各代表团团长：新闻代表团四月二十一日到中国，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工会代表团都是四月二十六日，档案代表团四月三日。

主席：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两党、两国，修正主义都攻击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要分析：第一是坏，攻击我们当然不好，第二也好；修正主义罵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修正主义不罵我们就不好了。修正主义不援助我们，经济上不援助我们，撤走专家，这也要分析，第一是不好，撤走专家，不帮助了，当然不好；但也是好事，让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对吗？要自力更生，要不怕困难。

你们到过××吗？有机会最好到那个国家去看看，不一定就是你们去。……他们建立了重工业，他们自力更生。我们的农业还沒有过关，他们过关了，他们的农业比我们好。我们的朋友不少，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要孤立我们，但孤立不了。

我们是多数，他们沒有多少人，多数人民并不赞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各个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并不见得很欢迎修正主义。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知道一些。人民是好的，包括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干部中也不都是坏的，不是一块铁板，并不都是修正主义者，是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坏。

你们在中国还有多久？

各代表团团长：工会代表团还有一个月，新闻代表团和青年联盟代表团还有二十天，档案代表团六月七日走。

主席：你们可以到处走走。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外宾笑了）

馬馬基（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美国借款给他们——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主席：你们有一个“好”邻居（指南斯拉夫），他们鍛炼你们，他们反对你们，南斯拉夫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你们。

馬馬基：但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的人民很坚强，因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主席：即使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也不会灭亡。

卢鮑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团长）：但我们感到幸运，中国给了我们国际主义的援助，鼓舞了我们。

主席：但是援助很少，有些科学技术关鍵问题，我们自己也沒有解决，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購买技术，所以不能完全滿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过意不去。再过五年到十年，我们会好一些。

馬馬基：修正主义企图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而你们是帮助我们。

主席：你们原定的五年计划有沒有修改？

吉貝罗（工会代表团团长）：有的，一般说项目有些增加，大型项目有增加。

馬馬基：五年计划有些改动，但总的说增加的比减少的多。去年冬季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很大，雨下得多了，涝了。

主席：春季生产怎样了？

馬馬基：直到三月还在下雨。

主席：你们雨下多了，我们有些地方少了。

馬馬基：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雨送一些给你们。（全場笑）

卢鮑尼亚：沈阳很久沒有下雨，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一到就下雨了。

主席：很好。你们可以到郊外去看看。这里（指上海）春季生产还可以，有麦、油菜、蚕豆和豌豆。

卢鮑尼亚：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看到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尤其是从山东到上海这一段，很深刻的印象是农民沒有荒废一寸土地。

主席：这是因为我们土地不够，平均每人只有五分之一公頃，长江以南每人只有十五分之一

公顷。我们是寸土必争，否则沒有饭吃。这里一年要种两次，冬季种麦，夏季种稻。南方有的地方不种麦，种两季稻子，早稻和晚稻。东北只有一季麦子，只有一百二十天无霜期。这些地方（指上海附近）比较好。上海是北緯三十一度，你们在北緯多少度？

卢鲍尼亚：我们和北京一样，纪诺卡斯特城（霍查同志的故乡）和北京在一个北緯度。

主席：北京是北緯四十度。請你们问候霍查同志和谢胡、卡博、巴卢库、阿里雅和凯莱齐等同志。这些同志我都认识。

卢鲍尼亚：一定转达您的问候。我们出国时，同志们也一再要我们向毛主席致最衷心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

主席：谢谢。

卢鲍尼亚：您身体健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主席：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罵我们，我们要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一起，反对他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难道还孤立吗？印度还是反动派统治，但印度人民对我们很好。

卢鲍尼亚：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来过中国，这次再来，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无限鼓舞。我一九五七年来过中国，这次再来，北京不认识了。十大工程是世界上绝妙的杰作，只有象中国人民这样有才能的人才建造得出来。也看到上海的工业展览会，使我们十分惊奇，生产出很精密的仪器，还有重工业，这使我们十分鼓舞，欢欣愉快。我们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爭，你们党以自己的英雄气慨鼓舞了我们。我们劳动党和霍查同志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中国青年的会面，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鼓舞。

主席：不是一国支持一国，而是互相支持。不是一国帮助一国，而是互相帮助。有了你们站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不仅中国人民。

卢鲍尼亚：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主席：都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是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也是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应当如此，应当坚持馬列主义，应当互相支持。

你们今天还有什么活动吗？

阿外宾：主席的接见就是最重要的节目。

主席：今天谈得不多，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卢鲍尼亚：主席接见我们，不仅是给我们，而且是给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劳动党和青年的荣誉，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大事。

主席：我要谢谢你们来看我。

对四个文件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针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情、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請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眞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对东北和河南两件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宋××同志报告一分，河南省委报告一分，都可以供各地同志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沒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眞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沒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沒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驟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驟的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眞正要惩办的，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請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沒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話（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作不完，可以在下半年作。同年作不完，可以在明年作。特别要注意分步驟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三年五月）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是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竪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

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沒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爭是十几年来沒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而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爭。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沒有螞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螞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沒有一例外也不好。

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眞正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眞正一尘不染是有，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沒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溫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淨沒有力量，搞干淨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爭有劲，对人民內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內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場宣布不算貪污分子，可不公布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貪污。至于貪污大的案处理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換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须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方法，来的力量大。

一个坚决把运动搞起来，一个怕搞乱了。

（××同志讲：我懂主席心情，第一要搞，第二要搞好。经常向主席反映情况，得到主席指示，不要搞乱了。）

三个伟大革命斗爭，不搞好不行，定要搞好。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中央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爭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溫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

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

服教育。照理说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实际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多，证据说比较少。

你们有机会去一个区搞十几天（我们说：沒有），你们下去干部是否很紧张，熟了就不很紧张，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划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爭靠公安部門搞，人民內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綱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誉。

（众议：有地方走过場，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場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不是……。

（大家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廈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沒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沒准备，兵沒练好，不要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像解放战爭时来打仗，辽沈战役、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象皖南事变那样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爭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語

（一九六三年五月）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眞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脫离群众，不能抵抗剝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沒有认眞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

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請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鍵，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則。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那里下乡工作，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要认眞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減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則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爭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眞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爭、生产斗爭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話，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則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則几年、十几年，多則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顏色了。請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約需要一年、二年，或者

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級斗爭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沒有阶级？有沒有阶级斗爭？外国有一种说法：他们国內沒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沒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內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爭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爭，说阶级斗爭是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內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爭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視无睹的。

以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內（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

〔翻印者注：公报上原文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

社会上的阶级斗爭，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內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內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爭所以会反映到党內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內成份来看，我们党內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內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沒有全部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沒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沒有入党。这些人

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尚未成功”这是孙中山的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搞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在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只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要批评，要洗手洗澡，还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些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讲社史、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农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步骤是什么？就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分地区地进行。一个县之内，也要分期、分批进行。要注意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允许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开始训练县级干部，再训练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然后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试点很重要，各地都要搞试点，经过试点把情况弄清楚。有的同志，开始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不大相信？后来他去试点以后，就相信了，相信了就抓起来了。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要有点“紧张”，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组织贫、下

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就要搞我们这一套。贫、下中农心情不舒畅（此处遗漏了一段）才能出现真正的心情舒畅的局面。

当然也不要急燥，不要蛮干。过去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的地方，要从搞得不深的实际情况出发，要跳起来，一哄而起。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准备好了再打。没有试点，情况不明，或者兵没有练好，干部和贫、下中农没有训练好，就不要急急忙忙的、大规模地开展运动。对干部要着重说服教育，口头说不服的，就用事实材料去说服。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去领导运动，不会打仗的人，不要他当指挥官。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例如，过去有些一类社、队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完全采取现在这一套办法来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着的，在一类社、队，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考验，干部好不好，行不行，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考验。只要我们分期、分批、分地区去搞，经过试点，认真对待，再加上保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大毛病是可以避免的。

三、关于四清问题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1962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門賒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捣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場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沒有搞阶级斗争了。1952年搞“三反”、“五反”，是在城市。在农村，1957年搞了一次全民整风，但不是用现在这个方法搞的。合作化以来，农村中的现金、工分、财物、仓库就沒有清理过，沒有向社员全面公布账目。“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四清”能搞出来。

进行“四清”方法要对，要采取扎根串连，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有些干部不听领导的話，他们却不能不听群众的話，把群众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打击极少数严重贪污盗窃分子。有些人坦白了，退赔了，就可以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要使多数洗溫水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四清”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不退群众不允许，太挖苦了，有些干部过不去，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们的。对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方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判；一方面组织专門小组清理账目，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要严防敷敷衍衍“走过場”，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罵人和任何变相的体罰。已经搞过的要复查。凡是搞得不好，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沒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四、关于組織貧、下中农革命的阶級隊伍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的问题。（翻印者注：上文与下文连系起来看，这里一定遗漏了一段，請读者注意），因为那时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沒有阶级差别了，总还有左、中、右。

在农村中依靠谁？

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貧农、下中农。貧农、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左右。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我们要同地、富、反、坏作斗爭，就要团结大多数，首先是依靠貧农、下中农。要多数，还是少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牛鬼蛇神专政？眞正的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一些农村干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听話，中农好办，貧农糊涂。"其实，地主是要你听他的話，县社干部都不注意听貧农的話，那么貧农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依靠貧农、下中农，树立貧、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都要依靠貧、下中农。

要依靠貧、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貧、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貧、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貧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组织起来了。

建立貧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爭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戶，先组织两三戶，以后四、五戶，有十一、二戶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要像滾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一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貧、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由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任，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爭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剝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問題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脫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爭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眞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

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一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是个好榜样。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分期分批，使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劳动。比如一百个支部，第一年先有三分之一参加劳动，第二年又有三分之一，就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这样声势就大了，其他的人就要参加进去了。

有些劳动模范现在不参加劳动了，不参加劳动，还作什么模范？不能参加劳动，理由无非是忙啦误工作，会议太多。公社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减少开会。一个县，每年只开一、两次三级干部会议就够了。必须开的会要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

六、关于运用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調查研究的問題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計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爭，一个是阶级斗爭，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哪有馬克思主义？浙江省清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里去了。那里人民开头不赞成冬水田，经过试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贫农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就是沒有试点，沒有认真调查研究。比如走路，象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的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則，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爭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要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的情况就不会眞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不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也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辯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課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同志是不知道的，对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些同志就更糊涂了，但是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比如农民认为地主是人，是剝削压迫他们的人。人、地主是两个概念，农民把这两个概念联结起来，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说：地主是剝削人的人。农民的这种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一定识字才懂得，所以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鋒

那样年青的同志就懂得一点哲学。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杭州会議上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五月）

（据五月七日、八日、十一日谈话插话归納为四大問題）

一、形　勢　問　題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沒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沒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門”，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沒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認　識　問　題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沒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斯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爭，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雪峯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縝、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贄、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門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門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門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爭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顥、程頤的老师周濂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辯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象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螞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螞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爭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眞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內，讲多了就糊塗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內反倒沒有人讲。

三、要　　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1.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2.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譜。

3.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話，中农调皮，贫农糊塗。”地富怎么不听話？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話。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四　　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淨，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5.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搞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五、方　　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批示×××在农村蹲点至少五个月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

（写在中央工作会议简报李雪峰同志发言上面）

此件送×××一阅，阅后退我。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接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　泽　东

六月三日

接見古巴文化、工会、青年等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主席：文化代表团到什么地方去看了一下沒有？

奥斯明费尔南德斯（以下简称奥）：到上海、广州、武汉去参观过。

主席：一共有多少时间？

奥：刚好二十六天。

主席：去年代表团是什么时候到的？

佛利斯·库左拉（以下简称佛）：上个礼拜天到的。

张××：（以下简称张）：周总理昨天接见时，希望青年代表团到延安去看看。

佛：昨天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讲，可以到延安去参观。

主席：那个地方很落后。到落后的地方去看看，也有好处。文化代表团来签订文化协定，签好了沒有？

奥：前天中午（二十四日）已签了字，我们非常滿意。

主席：非常滿意吗？

奥：是。非常滿意。

主席：协定包含些什么內容？

奥：协定的主要內容，是关于两国互派代表团访问的事情，古巴方面将邀請中国杂技艺术团去访问，同时我们也要派艺术团来中国。另外，双方要互派语言留学生，交換影片、书刊以及其他文化资料等。

主席：我们的影片，恐怕不那么高明。

奥：电影是教育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我们相信，中国电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主席：影片的作用是不小，但我们的好片子太少。

奥：中国的电影事业，象其他经济建設事业一样，正在飞快地向前发展。

主席：我们的胶片还不能够完全自造。你们能够制造胶片吗？

奥：古巴不出胶片。

主席：是进口吗？

奥：进口。古巴的电影，主要是些记录片和短片。

主席：慢慢发展下去，就会搞长片。我们的杂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玩意。

奥：到哈瓦那去的，是由武汉的杂技团组成的，我们亲自到武汉去看过他们的节目。

主席：杂技团去过古巴沒有？

张：沒有去过。以前，去过歌舞，京剧团。

主席：杂技团过去不是去过吗？

张：那是到拉丁美洲巴西等国访问，当时，古巴革命还未成功，我们的艺术团进不去。

主席：古巴革命进展很快，几年之內，就战胜了敌人。我们的革命时间很长，搞了二十几

年。有本国的敌人，也有外国的敌人。外国的敌人是日本，我们和他打了八年；国内的敌人是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四年。日本没有打进来以前，和蒋介石打了十年，日本投降后，又打了四年。蒋介石后面有美帝国主义支持。后来，又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差不多三年。有很多人怕美国人。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怕美国人。打了三年之后，怕美国的人少了。现在，美国人又在越南南部打，越南南方人民只有很落后的武器，而美国有很多新式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直升飞机，细菌战，化学战，但是，打了五、六年，南方人民和军队在发展，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他们不怕美国人了。这些经验很值得讲一讲。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兵还不如日本兵。我们和日本打了八年。美国的士兵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武器多、武器好，但是，他们不喜欢打仗。美国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作各种战斗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在越南打的就是这种常规战争。过去，我们和朝鲜人民打的，也是这种战争。那时，他们不是没有原子弹，而是不敢打；现在原子弹更多了，可是在越南南部也不敢打。美国现在的三军参谋长泰勒，此人就是在朝鲜和我们打过的。他写了一本书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书名是：《音调不定的号角》。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門和艾森豪威尔过去是不重视常规武器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泰勒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当过陆军参谋长，后来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辞职不干了。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他又起来了，当了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

据您们看，全世界人民现在还那么怕美帝国主义吗？

奥：从我们来看，现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拉丁美洲，如委內瑞拉，秘鲁等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日益高涨他们国家虽然很小，进行常规武器的战争力量不够，但还是在那里进行斗争，他们不怕美帝国主义，敢于反对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反动统治。

主席：他们和你们一样。如果只是怕，把手缩回来，让人家抓住关在监牢里，或者杀掉，那革命的火焰就熄灭了。我们参加朝鲜战争的时候，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怕美国人，但是，怕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能解除武装吗？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无所谓怕不怕，因为敌人已经打来了，怕又有什么用？打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可见不必那么怕，怕美国人是多余的。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他们在越南北部打，结果胡志明同志打胜了。在阿尔及利亚，阿民族解放军也打胜了。他们打了七年，经历了许多艰难，法国军队多到八十万之多，而阿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人。他们很多人都同我讲过，包括现在的议长，过去的总理阿巴斯。你们知道阿巴斯吗？

奥：知道他的名字。

主席：他们对我们谈过很多，谈过他们的困难，阿牺牲了九分之一的人口，就是说，九百万人口中死了一百万。另外，法国军队领导机关还出版我写的小册子，企图打败阿民族解放军。我告诉他们，我写的小册子，是人民战争的小册子，反人民战争的那一方面，不可能利用，他们想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

石也利用我写的小册子，想把我们打败，结果还是不行。美国人也想利用我们的办法，他们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在朝鲜战争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在朝鲜战争中，除美国外，还有十五个国家参了战。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奥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哥伦比亚等。当然主力是美国人。美国去了一个师，土耳其去了一个旅，哥伦比亚去了一个营，他们是凑合起来的。他们到朝鲜来，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子。打了二年半（快三年），谈判就整整谈了二年，当时是一面打，一面谈。谈判的地方就是双方交界的一个小地方——板門店。

奥：我们在朝鲜时去过那个地方。

张：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前曾到过朝鲜。

主席：朝鲜很可以去看一看。要研究那个时候怎么一面打，一面谈；怎么用很少的人和武器，战胜了拥有强大武器的敌人。

奥：我们在朝鲜呆了十天。

主席：在朝鲜看过防御工事沒有？

奥：我们在朝鲜访问时，去了开城的板門店，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展覽馆中有一个一千一百一十二高地模型，山头被敌人打去了两公尺。

主席：山里面有我们的工事，有地道，我们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山地有山地的办法，平原有平原的办法。不管敌人武器多么好，多么强，因为他们是反对革命，不利于人民的，不可能得到胜利。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失败。最后，所有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要灭亡，我们在座的人就是证据。美国支持的反动派巴蒂斯塔，不是也失败了吗？你们在和反动派斗爭中，有外国援助沒有？

奥：只有七支步枪。

主席：是啊！沒有任何外国援助，就是步枪，而且很少，也胜利了，我们中国的战爭也证明了这一点。你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因为敢于和它打，终于打胜了。

恩来同志劝青年代表团到延安看看，是有理由的。延安虽然很落后，但在当时是我们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南京是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上海是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那里住着外国人，很容易得到外国人的援助，延安城和附近只有七千人。看来，不是大城市打胜小城市，而是小城市打胜大城市；不是大城市打胜乡村，而是乡村的人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不是有大炮、飞机、坦克的敌人打胜我们，而是只有步枪、轻炮、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打胜了敌人。起初，我们沒有大炮，打到第二年，就有了大炮，打到第三年，大炮就更多了。是哪里来的呢？是美国的，是蒋介石运输给我们的。后来，我们也有了坦克，也是蒋介石送的。当时就是沒有飞机，现在空军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沒有空军也可以打胜有空军的，飞机的作用很小，打不死几个人，破坏不了多少工厂和房屋。你们有人到过伦敦沒有？

奥：我们代表团中，有一个同志到过。

主席：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很危险的地位。英国军队从敦克尔克撤退后，军队毫无组织，海防线沒有防御了，空军不能防卫伦敦了，海军也不能保卫运输线，陆军、空军损失很大。当时，希特勒的空军猛烈轰炸伦，可是并沒有破坏了多少，据我们这里看过的同志讲，后方陆海空军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说，空军的作用不大。在战爭

当中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陆军。你们在战争中，敌人有无空军？

奥：他们猛烈轰炸解放区。

主席：作用大不大？

奥：唯一的效果，就是敌人费了很多錢。

主席：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也曾大编队轰炸延安，有一次，打死了一条猪，一个人也沒有打伤打死，另外一次，在乡下打死了两个老百姓。今天谈的太多了吧！

奥：我们非常渴望听到毛主席的谈話。

主席：我今天是谈了一点历史，以后有机会再谈。

八　連　頌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好八连，　　天下传。
为什么，　　意志坚。
为人民，　　几十年。
拒腐蚀，　　永不沾。
因此叫，　　好八连。
解放军，　　要学习，
全军民，　　要自立。
不怕压，　　不怕迫，
不怕刀，　　不怕戟，
不怕鬼，　　不怕魅，
不怕帝，　　不怕賊。
奇儿女，　　如松柏。
上参天，　　傲霜雪。
纪律好，　　如坚壁。
军事好，　　如霹雳。
政治好，　　称第一。
思想好，　　能分析。
分析好，　　大有益。
益在哪？　　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門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比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場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鎮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鎮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费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瀾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续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回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续继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鎮压；另一方面，又装着一付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

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最近，南越吳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譴责吳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吳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吳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爭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吳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爭。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吳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吳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吳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脫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滾出去。

吳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換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內瓦会议的议协，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爭。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內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內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在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吳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此文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

电唁杜波依斯博士逝世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杜波依斯夫人：

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的斗争的事迹、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眞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毛　澤　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1963.6.30.）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对文学艺術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九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鏢之类。

祝賀霍查同志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你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賀。

你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解放斗爭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以你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地领导着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馬克思主义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你和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阿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祝你，亲爱的霍查同志，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　澤　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接見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主席：很欢迎同志们。你们来了几天了？

阿拉尼特·切拉（以下简称切拉）：十天了。

主席：走北路来的，还是走南路来的？

切拉：最近是从朝鮮来的，我们在朝鮮住了一个月，在朝鮮是休假。到朝鮮是从北路走的。

主席：他们让你们过？

切拉：让我们经过了，但对我们冷遇。

主席：冷遇啊！請抽烟。（外宾说，不会抽），朝鮮的同志们很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切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主席：……。这几个月在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爭更加发展了。你们坚决地站穩了立場，并且取得了胜利。你们的国家是被他们包围的。你们对全世界眞正的馬克思列宁

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回去时，问候你们的领导同志们好，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請喝点茶。除了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卡博同志、阿利雅、巴卢库等其他同志，也替我转达问候他们。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你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切拉：我们今年的收成情况是：去年冬天雨下得多了，造成今年夏收不好；但今年春耕春种搞得好，所以今年秋收是好的。可以说今年的年成是个好的年成。

索非克利·巴巴华西里（以下简称巴巴华西里）：今年的气候对我们的秋耕秋种是有利的。

主席：很好。今年我们有点灾，一般说来是增产的。如果沒有南边的旱灾和北边的水灾，那今年是个大丰收。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万吨。今年有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好。

切拉：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布达佩斯。听说那里的人民意见很大，有抱怨情绪。他们今年的收成不好，政府向美国买粮食。我们去的时候，还沒有告诉人民，现在也许告诉了。

主席：你们是否最近就要回国？

切拉：现在预定二十六日离开中国。

主席：今天是十五日，还要到外边去？

张××：还要到上海、杭州、广州、昆明，从那里离开中国回去。

主席：好，到那些地方去看看。

切拉：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主席：交换意见嘛！

切拉：是帮助了我们。

主席：互相交换经验。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到中国来，中国同志都是很欢迎的。

切拉：我们具体地看到了。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早已知道你们会欢迎我们的，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

主席：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

切拉：是第一次。

主席：你们两位都是做政法工作的吗？

切拉：不，我是司法工作者，他（指巴巴华西里）是在党中央当视察员。

主席：沒有去东北看看？

切拉：时间有限。我们在朝鲜停了一个月，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现在想利用这些时间到中国南方看看。要到中国各个地方都走一趟，这是一件难事。

主席：我刚才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秋收还沒有完全结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广东可能还沒有收完。你们这次到不到广东去？

黄火星：要去广州。

主席：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門，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舖张浪费、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讲，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司法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門都是专政的工具。

切拉：毛泽东同志，我们同你们的同志谈了些问题，他们还把我们带到北京监狱去看了，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感到你们教育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主席：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好的。

切拉：也可能你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但基础是正确的。

主席：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

巴巴华西里：对于你们用的这种方法，感到受益不少。

主席：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他们看了哪个监狱？

黄火星：北京市的监狱。

主席：那些人有工作做吗？

黄火星：那里有塑料厂、鞋厂、袜厂等等。

主席：他们学了技术，放出去以后好劳动。

切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对的。我们国家的劳改营里也有些劳动，但没有你们开展得这样广泛。我们监狱的工作是薄弱的，虽然，在我们监狱中关的人很少，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分子。尽管这样，对这种人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

主席：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

张××：刑满了可以把家属搬来，安置就业。

主席：对，就是安置就业。有些人是自己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到当地名誉不好，他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熟人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家属也搬来，等于迁居了。这样的也不少。

黄火星：北京市那个监狱，也有就业的，有四百多人。

主席：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切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主席：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切拉：听说他还写了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主席：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象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谈到这里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照相吧！

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門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門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門（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門）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門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門）；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門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門的情况），做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門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

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門采用和学习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接见古巴詩人、作家和艺術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席：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罗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达）：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

皮诺·桑托大使（以下简称大使）：主席身体好吗？

主席：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大使：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主席：去年何时见过？

大使：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主席：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达：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主席：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达：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主席：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达：在上海，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文豪。

主席：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馬列主义者。

比达：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主席：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爭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爭。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达：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大使：这是眞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达：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主席：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达：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主席：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侵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达：他们是如此说的。

大使：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主席：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达：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主席：两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大使：不是。

主席：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记？

比达：五十四岁。

主席：你和格瓦拉的年记差不多吧？

比达：大一些。

主席：比罗加呢？

比达：小一些。

大使：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达：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大使：有点象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青。

主席：一般说来，年青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抛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称号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比达：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主席：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达：他们的“耐心”太大。

主席：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大使：三年。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以下简称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主席：我也见过他一次，請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主席：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大使：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馬列主义原則的斗爭今后的前景如何？

主席：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沒有？

大使：沒有。

主席：奏哀乐沒有？

比达：沒有。

主席：我们沒有下半旗，沒有奏哀乐，也沒有打电报吊唁。

大使：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下半旗。

主席：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个人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度，不是換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沒有死吧？

大使：沒有。

主席：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內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矛盾，美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大使：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大使：沒有。

主席：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亡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即吉隆

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有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南越统治者的力量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大使：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席：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就要回去了吗？

比达：明天走。

主席：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达：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主席：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

大使：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国发生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张战争的人干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主席：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那一派干的，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主席：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門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沒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甫寨等，小小的柬甫寨竟敢拒绝“美援”，为何有此大胆？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甫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象，美国每年“援助”柬甫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甫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复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援”。好吧，就谈到这里。

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結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門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門，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門，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眞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加強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鋒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故步自封、骄傲自滿，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还有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話，不爱听批评的話，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干部去虚心地加以考察，便于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陷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狹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題，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須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眞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做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側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斗爭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眞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的反面，这样一个眞理。就是人们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話，不愿听批评話。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熟视无睹，永远不到那里考察研究請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得较好，上面都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一部分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祿、养尊处优、骄傲自滿、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不知道，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虛心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单位、对别人作分析，拒绝馬克思主义辯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題是个大问題。請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內，不做调查研究，主观的下达许多指示，往往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眞实情况少，因而脫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了两个考察团分别到上海和广东去学习。这一点請你们注意研究，是否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請你们提出。

謙虛——戒驕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固步自封，骄傲自滿，对自己所管的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馬克思主义的辯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話，不爱听批评的話，对于外省、外市、外地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中级干部去虛心地学习，认眞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狹隘的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或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屡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眞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因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爭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很多人都很少认眞地运用这个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脫。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抗斗爭（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眞理，就使人固步自封，骄傲自滿，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話，不愿听批评的話，自己不愿批评

（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話，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是一个眞理。

（一）骄傲自满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产生和滋长。但是一般说来，通常在胜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产生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因为当处在困难的时候，一般是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客观上的困难摆在面前，不虚心谨慎也不行。可是每当胜利的时候，由于有人感谢，有人赞扬，甚至过去的敌人也会掉过脸来奉承一番，阿諛一番，因而就容易为胜利的坏境冲昏头脑，而全身轻飘飘起来，眞以为“天下从此定矣。”我们党深深地懂得，越是在胜利的时候，骄傲自满的细菌就越是容易袭击党。

（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一类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了不起；另一类是在无特殊胜利，亦无特殊失败的平常情况下产生的，他们经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安慰自己，并原谅自己的不进步，他们还善于用“沒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等等来自我陶醉；再一类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即虽然已经落后了，也还是骄傲。他们认为“我们工作虽然沒有做好，比过去总是好多了”，“某某同志或某某单位还不如我们呢！”他们每每炫耀自己的历史，三句話不到就是“想当年……”讲起来眉飞色舞。

（三）只要我们稍微忽视一下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眼界狭隘一些，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稍微把成績估计得高了一些，把缺点估计得低一些，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就会骄傲起来。

（四）骄傲自满的情绪，从本质上说，乃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場上引伸出来的，同时它又培养和滋长了个人主义，因而骄傲自满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

（五）就阶级根源来分析，骄傲自满基本上是剝削阶级思想，其次則是小生产者的思想。

（六）小生产者就其本身是劳动者一面而言，他们是具有很多优点的。他们勤劳朴实，刻苦谨慎和实事求是。但是就其本身是小私有者一面而言，則他们是个人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经营，眼界不广，见闻不多。因此，他们往往看不到集体的力量，而只是看到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滿足，当他们取得一点微小的成績以后，就产生“这个不错了”，“这也到顶了”，“该享享福了”以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一类思想。

（七）骄傲自滿是在资产阶级唯心世界观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使人在看待周围客观事物时经常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把人们引向失败的道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可是骄傲自滿的人，总是夸大个人的作用，居功自傲，而忽视、低估群众的力量。

（八）因此，骄傲自滿在本质上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党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九）骄傲自滿的人往往不能忘情于自己的许多优点。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许多缺点掩盖起来，而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别人的许多优点抹煞掉。他们经常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相比，从而私自窃喜，看到人的优点則又覚得“沒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个啥”。

（十）事实上，把自己估计得越高，所得的结果就越坏。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幽默地说过："一个人就好象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十一）谦虚，它是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应有的美德。因为谦虚对人民的事业有利，而骄傲自满却会把人民的事业引向失败。所以，谦虚也是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一种表现。

（十二）一个人要真正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工作者，必须做到下列两点：首先，他们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肯听群众的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一员，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实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这种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就是谦虚的美德。

（十三）其次是他必须有不屈不挠、永远向前的精神，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缜密的思考能力。因此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胜不骄，败不馁，不贪天下之功，也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高贵的谦虚美德。

（十四）一个人如果能够認真的从工作中、生活中和其他实践斗爭中去学习，经常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无情而坚定地和骄傲自滿情绪作斗爭，并且毫不保留地加以彻底的克服，那他是完全可以鍛炼成为一个具有谦虚美德的人。

（十五）眞正具有谦虚的高尚品德的人，他必须是滿腔热情地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为集体的事业而忠诚不渝地积极工作的人。他之所以积极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和荣誉，不夹杂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在內，而是全心全意地为着给人民带来愉快与利益。因此，他总是埋头苦干地作着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利的工作，从不抛头露面，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待遇，他不仅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勋和成就，而且在自己內心中也不让这些功勋和成就占地位，他全付精力所考虑的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十六）眞正的集体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求自己具有谦虚的美德呢？

第一、因为他懂得，他的一切知识和成就的获得，虽然他自己也尽了一定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的努力，沒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就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他就认为不应该抹杀群众的功绩，不应该掠他人之美，貪别人之功。因而他觉得自高自大是可恥的。

第二、因为他懂得，他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所作的一些工作，在整个知识宝库里和整个革命的工作当中，仅仅是"滄海中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因为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工作，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要用他宝贵的生命去最大限度的获得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最大限度的对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就觉得不应该固步自封，替自己关起进步的大門。

第三、因为他懂得，整个革命事业象一架大机器，是由大小各式轮盘、螺絲、鋼架和其他机件紧密结合而构成的，谁也少不了谁，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一个人的成就，就象尊重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样。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紧密配合，他感到他离不开集体，他热爱自己的伙伴。因此，他便必然会用谦虚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而不会对任何人狂妄自大。

第四、因为他懂得，一个人的眼界往往是窄小的，能够看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革命

知识和革命工作的范围却是极为广阔的，并且内容又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便进一步懂得了任何人总难免会有若干缺点，会犯若干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常常不是自己全部及时觉察得到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为了要把革命工作搞好，为了对人民负责，他就得要求自己看得更深更广，要求能及时地发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迅速改正。因此他便要虚心恭谨地向别人学习和請教，他便要诚恳地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

由此可知，真正的从集体利益出发的人，是必须具备谦虚的精神的。而谦虚实质上就是高度的革命热情，强烈的群众观点，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集中反映。

（十七）克服骄傲自滿和培养谦虚品质的另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这就必须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为什么？

（十八）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党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革命斗爭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领导下的亿万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絲釘，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是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沒有党的领导，沒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覚地谦虚起来。

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狹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只能看到脚下，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就会象“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抬起头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化无穷，人类事业之雄伟浩壯，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极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翻地复的大事业，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要看到整个的、长远的、全面的工作和幸福。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帮助我们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因而就能帮助我们克服那种因小小成就、小小胜利而自滿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而促使我们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十九）谦虚和自卑不是同义词，谦虚并不等于小视自己。因为谦虚本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视客观现实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自卑却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缺乏自信力的、对困难采取畏缩的态度的表现。

自卑和自夸，自高自大，同样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主观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是对自己的两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的估计。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作用，因而他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他就不再前进了，他也不能及时地吸收什么新鮮的事物了，他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那些自卑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和自高自大的人相反，但同样也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低，忘记了自己还可以努力提高自己，还可以从工作中鍛炼自己，过分地降低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已经起的和可能起的作用。于是，便从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松懈了斗爭意志。

总之，无论是自高自大或自卑，同样都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都是非实事求是的非科学的态度，因而都是错误的，都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类的习性，而且要严格地把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划分开来，免得由一个极端又倾向于另一个极端。

給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戶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人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二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杨×、廖××、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沒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沒有看过文件，也沒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达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作，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以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請你们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　澤　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附：曹操《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終为土灰。老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一作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論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

我们这些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是容易犯的弊病，有了官僚主义，必然对上闹分裂主义。比如“跃进号”抓了才清楚的。下边也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前年下放权利那么多，文件是我起草的，造成了分散主义。有人说要反对，顶不住，问题还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个剝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党外部长和我们一道，也希望借重一下你们的归劝。

官僚主义，思想上表现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总之，要集中的反对剝削阶级的思想作风。三月一日，中央五反指示中说：“官僚主义在抬头”。我看带有普遍性。

我尝归纳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

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滿，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作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顾指气候，作风粗暴，动輒黑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五、不学无术，恥于下问，浮夸謊报，弄虛作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功則归己，过則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六、不学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委，怕负责任，办事拖拉，长期不决，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七、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为爭，老于事故，上捧下拉，两面俱圓，八面玲瓏。这是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八、政治学不成，业务钻不进，人云亦云，语气无味，尸位素餐。领导无方，濫竽充数。这是滿預无能的官僚主义。

九、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懶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十一、机构庞大，人事庞杂，层次重叠，浪费资产，人多事乱，遇事团团转，不务正业，

人多事少，工作效率低。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十二、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会议多不传，报表多不用，往来多不谈。这叫“五多”的官僚主义。

十三、图享受，好伸手，走“后門”，怕艰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作官全家享福，內外不一請客送礼。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十四、官越作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錢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十五、自私自利，假公济私，以私作公，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十六、爭名夺利，向党伸手，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爭权夺利的官僚主义。

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門，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鬧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鬧宗派的官僚主义。

十九、革命意志衰頹，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

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总之，使干部脫离实际，脫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鬧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是剝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了，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沒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在聶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谈到松辽平原的经验时〕石油部是第一个运用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工业部門都要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工作部門。用政治工作来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石油部是学习解放军的经验

验，象连队的政治工作一样，不脱离业务。

石油部比较单纯，一机部复杂（指产品），要调些人到工业部門作政治工作，解放军是出人材的学校。

〔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汇报基础理论时〕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

〔汇报留学生工作时〕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

〔汇报向国外进口书刊时〕多少外汇？（答：××万美金。）不多嘛。社会科学的买吗？（答：也买。）影印外文杂志，广告不要弄掉。

〔汇报十年基建投资××亿时〕十年××亿，每年×亿，不多嘛！

〔汇报到受激光发射时〕要有些人专門搞这事，长远来搞。从数量上看，人家比我们多，我们搞不过人家。但是从历史上看，攻防两手，防我们要考虑。比如城墙，筑起来是为了防御。

〔汇报治理黄淮海问题时〕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

〔汇报医药卫生问题时〕感冒药要认眞解决。

〔汇报探索性工作时〕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

〔谈到朝鲜的战备工作，搞了××万里山洞作地下工厂时〕我们也要作蠢事情。

〔最后谈到三大革命时，问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的。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演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科学实验。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馬列主义原来是外国的，和中国革命结合了，我们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它，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了。

同×××談人民日报要学习解放軍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

人民日报要学习解放军。

新闻工作要学习解放军。

人民日报要看一下林总对解放军报的意见。

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主要学习他们怎样抓思想政治工作。

文汇报、解放日报在这方面，很可以看看。他们把政治思想工作的綱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

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用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話，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話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話，而用自己的話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慰問恩克魯瑪总統的信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主席兼总书记克瓦米·恩克鲁瑪閣下：

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恥的手段来暗害閣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憤慨，同时对您平安脫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請你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的最亲切的慰问。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自己在非洲的失敗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的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掙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爭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閣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

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毛　澤　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就巴拿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爭
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爭，是伟大的爱国斗爭。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鎮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謀顚复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艦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門、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脈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

談报紙革命化問題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报总編輯魏××在解放日报編委会上傳达）

毛主席认为，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革命化问题。革命化就是肃清一切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有些错误思想是容易看得出来，有些就不容易看出来，比如文汇报的《胆与识》一文错误容易看出来。）按：此文表扬“年青一代”敢于批评将军。）不革命化的另一表现是头脑中缺乏辩证法，往往把问题说死了。

革命化是立場、观点问题。报纸究竟要宣传那些东西，究竟要系统宣传那些东西，能不能选择得好，都是革命化问题，解放日报的干部那么多，为什么写不出好东西？要革命化一定得下去，参加实际斗爭的鍛炼，要使人革命化，同时要使机务革命化。

报纸一定要抓思想。主席最近谈到解放日报的好处，说：“好在比较注意抓思想，比较抓思想工作。”一张报纸从头到尾都要思想化。你们（按：解放日报）过去和现在，这一点作得不够，常常把一些好的东西，当另件处理，有时候又把一些一般的东西当作大东西处理了。

依靠什么人办报？要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好的东西应该让群众自己写。

你们要善于抓住活的东西，把他提到理论高度，宣传活的哲学。报纸要有各种议论。

国际消息。主席说：“外宾接待消息，地方报纸可以少登一些，这样，可以让出地方来宣传活人活事活哲学。”

要总结报纸工作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主席对柯庆施同志讲：

革命化的三个意思：（1）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2）要下去实践，同工农结合；（3）要学习唯物辩证法。

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爭发表談話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

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地方滚出去！

（《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接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主席：代表团有几个人？

本·阿卜杜拉：十二个人。

主席：来了多少时间？哪一天到北京来的？

阿卜杜拉：一月十七日到北京的，十三日就离开阿尔及利亚了。

主席：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参观？

阿卜杜拉：还要到上海去两天，杭州两天，广州两天，然后回国。

主席：到广州从南路回去吗？

阿卜杜拉：是的。

主席：你们是从南路来的，还是从北路来的？

阿卜杜拉：从南路来的，经过开罗、仰光和昆明。很希望在中国多呆几天，因为国内有工作，已经延长了几天，现在不得不回去了。

主席：你们胜利了，我们很高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为什么少数能变成多数呢？原因就是你们有群众。人民群众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阿卜杜拉：我们胜利还不久。

主席：阿尔及利亚现在是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吗？有人也说是一千万。

阿卜杜拉：一千二百万。不过阿尔及利亚从来沒有进行过人口调查。过去法殖民统治者把阿尔及利亚人民当狗看待，多一、二百万、少一、二百万，对他们说算不了什么。

主席：过去你们临时政府告诉我，阿尔及利亚有一千万人口，包括一百万法国人。那么本国人只有九百万，战争上又牺牲了一百多万，只有八百万不到一点。人民一定会胜利。人口在打过仗之后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这話的。

我们党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十七个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十二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人，那十个人或者牺牲了，或者叛变了，可是革命力量发展了，越来越大了。我们的革命一共化了二十几年才胜利，从一九二七年打仗打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五万党员降到几千党员。那时我们沒有经验，蒋介石叛变革命，同我们打了十年国內战爭。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我们党內产生了右倾。然后在战爭中党壮大了，军队壮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有了三十万党员，三十万军队，根据地的人口也有几千万。这时又产生了“左”倾，他们要打大城市，社会政策不对，只要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对民族资产阶級的政策不对，沒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分开，提出的一切政策也就不对，结果又失败了，被迫举行了万里长征。万里长征不是我们愿意干的，这是政策失败了，沒办法，从南方跑到北方。这一来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被搞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三十万党员只剩下几万，所有大城市的组织差不多都完了，又是一个大失败。可是这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阿卜杜拉：主席所讲的这点，在我们来中国以前就认识了，失败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所以也可以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主席：我们就是这么看。沒有这两次失败，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不能总结经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又团结又斗爭的政策。第一次失败，是沒有看到朋友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爭。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爭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內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经验，所以抗日战爭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抗日战爭经过八年，由两万五千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根据地的人口由十几万发展到一亿多。胜利时日本人跑了，美国人又来了。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一切大城市和铁路、矿山资源都在他手里。国民党向全国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我们很多城鎮和乡村，我们把延安都失掉，许多外国朋友也认为我们不行了。延安是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只有几千人口，是山区，我们拿它做根据地，后来这个根据地也失掉了，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沒有希望了。后来我们采取正确的退却政策，退却一年的样子，退却过程中消灭了国民党八个旅，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可以举行反击。解放战爭一共用了三年半时间，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现在蒋介石还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我们还被叫“土匪”。（全場大笑）法国人昨天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胜利之后，法国人才承认你们，那也好嘛！有些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日本，主要是美国，他们的政策是孤立我们，那时我们与你们一样。你们在沒有同法国签定埃维昂协定之前，你们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好象很孤立的样子，其实你们并不孤立，有什么孤立的？突尼斯的关系与你们搞的不好，不久前摩洛哥的关系也搞的不好，我看沒

有什么要紧，同情你们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民同情你们，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人民都是同情你们的。你们在欧洲也有朋友，法国人中也有你们的朋友。法国政府过去不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当法国人跑了的时候，你们多困难，没有粮食，没有教员，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工厂开工资金不足，现在你们也还在困难阶段，没有工程师，没有技术员；要有地质工作人员，要勘探石油，要勘探各种矿产，但是要有个过程才能建立这样的地质工作队伍。总之，你们是会搞起来的，由没有到有，由少到多，由不会、不懂，到学会，到懂，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讲这个話的。比如军队，我们没有，现在有了，你们也没有军队，现在也有了。又如打仗，谁会？我就不会打仗，还不是学会的。军队的事，打仗的事，能由没有到有，由不会到会，为什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困难可以克服，不会的人可以学会，没有的东西是可以有的，不要那么多迷信，要破除迷信，只要肯干，我是不大信迷信的，过去也有过迷信。很多是敌人教会了我们的，必须团结国內人民，只要依靠人民就有出路。脱离群众是不行的，是不是这样？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你们不要了，我们有一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清楚，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是这样吗，不知对不对？

阿卜杜拉：主席的分析很正确。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的黎波里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起草和通过了一个綱领。那时出现了一个多数和少数，多数中不包括过去临时政府的某些领导成员及其他部門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对中国朋友们说，这沒有什么秘密，世界报也谈到过。那就是少数人不愿意服从多数，不愿意接受多数的观点，可以明确指出，当时出现的多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广大人民的意志。后又经过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任命了现政府。

主席：革命中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但再进一步他们就不干了。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干，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他们干，他们自认为共产党员，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一到搞社会主义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就反动了，有这么一部分人。哪一个党內都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转变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多数是进步的，少数是落后，如果政权掌握在落后分子手里，那就危险了。你们现在正要建立一个党，不久开党的代表大会？

阿卜杜拉：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拉希德·日拉伯兄弟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成员，他可以谈一谈。

阿卜杜拉希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决定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刚才本·阿卜杜拉兄弟谈到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会议，那是在战爭中阿尔及利亚內部分歧斗爭的表现。当时说的分歧是斗爭方法上的分歧，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斗爭。在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出现分歧意见，领导方面存在的眞正矛盾表现出来了，方法上的分歧不是实质，实质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在的黎波里会议上的潮流，是进步的潮流，是向前进的潮流。但能否说的黎波里会议之后什么矛盾都解决了呢？不能这么说，由于我们斗爭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因为我们的斗爭是继续发展的，需要革命的綱领，革命的领导集团，使我们不断前进。我们这样的思想意识是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斗爭中不断建立起来的，将来还要向前进步，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是明确的选择，我们正在准备报告，

将来在党代表会上提出。

主席：什么时候开？

阿卜杜拉希德：日期还沒有定。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特别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武装斗爭的经驗和独立后在本·貝拉兄弟领导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驗，准备在大会上总结一九五四年以来的革命经驗，这些总结是重要的，将使我们了解过去的经驗是什么，这样也能使我们明确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中，今后选择哪一方面。这个大会将为我们奠定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基础。这是独立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历史性的会议，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历史转折点的会议，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

主席：你是他们一起来的吗？

阿卜杜拉希德：是一起来的，分开接待。

主席：只一个人吗？

阿卜杜拉希德：一个人。本·阿卜杜拉兄弟领导的法律代表团是来中国学习法律方面的经驗的。我是中共中央接待，负责另一方面的工作，学习另一方面的经驗的。

主席：不能学习，我们也是在摸索过程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要全面分析再接受，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工作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经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隐瞒错误，你们（指陪见人）不要隐瞒错误，只介绍正确的东西，不介绍走弯路和错误的方面。中国农业很落后，工业现在与先进国家比还差的远，在我们的社会上和党内，干部也有变化，有的变成了贪污分子，实际上是资本家，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惜时间不够，不能细致地介绍我们的政策。象你们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把一切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你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人的政策，我们也犯过错误。你们看见过我们的监獄沒有？

阿卜杜拉：我们看过北京监獄。

主席：我们的监獄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指陪见人）北京监獄是那个办得好的吧？办得不好的不让你们看。（向陪见人）要让他们看一个办得坏的。就是应该这样介绍，有好的，也有坏的。人民公社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使办得不好的办得好起来。军队里也可以看看。军队是专政工具的主要工具，你们是搞法律工作的，不看军队不好，你们国家如果沒有军队，你们的法律工作还能搞吗？沒有军队的保卫，你们就不能生存。还要看看警察和公安部队。（向陪见人）与军委和公安部联系一下，让他们看看军队、警察、公安部队，以及民兵的情况。你们大家都是搞法律工作的，专門在法律条文上作文章是作不出什么来的。光靠监獄解决不了问题，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少数坏人，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獄关人，要靠人民群众中多数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监獄里关很多人不好，主要劳动力坐牢就不能生产了。今天我们讲不完了，沒有时间，只能介绍些要点。你们还过几天走？

阿卜杜拉：我们在北京只有二十四小时了。

主席：有些问题可以到上海去解决。可以告诉他们，说是我讲的，要介绍正确的方面，也要介绍错误的方面，要介绍好的方面，也要介绍坏的方面。这样才是好的方法。

阿卜杜拉：从现在起我们就采取这种方法。

主席：（对陪见人）给各地要讲清这个问题。

阿卜杜拉：我也应该表示，在这里介绍的情况没有什么隐瞒，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胜利的经验，也讲了失败的原因。

主席：好嘛，应该这么作。我讲我们过去的历史，就讲了我们是怎么犯错误这一点，错误对我们很有益处，教育了我们。从成功的方面学得的经验，也从失败的方面学得经验。我看你们总结你们的历史也会是这样的，总有代表比较正确的一面。回去后你们的本·贝拉总统和其他朋友们，你们真的搞社会主义，我很高兴，那我们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同志，而且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搞社会主义要团结大多数人，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团结一切干社会主义的人。

阿卜杜拉：我代表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主席表示感谢，感谢给予我们的荣誉和骄傲。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亲切的祝愿。现在請允许我们把这把刀送给主席，这是阿尔及利亚武装斗爭胜利的象征。

主席：很有意义的礼物，这东西是对付敌人的。

几　段　插　話

（一九六四年一月）

（談到工业問題，要建立“托拉斯”問題时）

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象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

生产出来的物质，必须按合同收購。商业部門说是因为計划变了，不收購；是谁变的計划？国家变的，就由国家收購。总之，不能积压在工厂里头。

（談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

解放军一道命令，可以通到底，行得通。说解放军所以搞得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那经济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呀，为什么搞得四分五裂？抢錢（利润分成）、抢物质（物质分成）、发生冲突（鬧关系），多年不得解决？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党委管思想、管政治、管仲裁（冲突）、管人、实行监察嘛！

（談到专业化和协作、制造主机和輔机的关系时）

主机和輔机的矛盾，是对立物的统一。资本家办一个工厂，管工厂的资本家总是少数，做工的工人总是多数。少数和多数的矛盾，也是对立物的统一。

（讲到树立标兵，領导上不要埋沒英雄时）

我说高官厚祿、固步自封有的是，比如有的部的报告就说他们也有多少模范、典型、标兵，但多年沒有发现，这不是被固步自封的官僚主义所压住了？！现在被压住的，沒有发现的还很多。要改变这种情况，抓活人活事。

（讲到报紙应該怎样宣傳时）

文汇报、光明日报办得比较好，有些议论，也有科学研究、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人民日报单纯些。（它担负人家不担负的任务。）报导国际消息，一礼拜几次也就可以了。要写点新鮮事物，活人活事。加上一版，专門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许多老粗懂得哲学，最近解放军发现一个炊事员写的文章说，他从前烧饭每頓二斤四两煤炭，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煤炭的客观規律，每頓只用六两煤炭。

（讲到石油部的經驗时）

过去封建皇帝时代，还可以据理力爭。我们解放军有一条，眞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在伙夫手里就听伙夫的，在班长手里就服从班长的。眞理不是谁的官大、官小来决定。

（在和日本人談到对壟断資本反美的态度时）

（一）日本垄断资本现在有变化，八番钢铁托拉斯，富士鋼鉄托拉斯，东海渔业托拉斯，反美反得很紧张。过去只紡织业来反，现在垄断资本家也反了。这一件事，对日本共产党来讲，是个新问题。过去讲得太死了，切记不要讲死。我讲了法国的经验，戴高乐掌握了民族独立的旗帜，掌握了反美的旗帜，而法共則去欢迎艾森豪威尔，为肯尼廸流泪，所以戴高乐上台，倒不了。苏加諾也是大资本家，但他掌握了反美和民族独立的旗帜，所以他能維持。而印尼共产党就把这些接过来。希特勒上台后，宣布废除凡尔賽条约、收复失地，抓民族独立的旗帜，德国共产党台尔曼未表态，失败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是两个拳头作战，一手反美，一手反共。你们要给他放松一头。日本垄断资本家提出反美，要美国撤走基地，要反控制，你们应该把这些接过来。日本目前的形势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就是要跟垄断资本家在反美问题上搞统一战线。我们也给四大家族（中国垄断资本家）搞过统一战线。这样做，可能麻痹了工人。但我们也要想想工人的心理，资本家反对美国控制，工人有事做，工人是同意的。我们跟蔣介石的经验也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同蔣介石是采取两手：又团结，又斗爭，斗爭也是为了团结，以斗爭求团结。反共高潮只三次，一打，他退回去了，我们还是联合。不联合，哪能发展这样快，这样大，从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如果日本不投降，这一政策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在这中间发展，我们要趁这个空子发展嘛！

（二）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讲到不用武力来解决領土爭端問題时）

台湾海峡，两重性。这是国内问题，谁人都不得干涉。我们也是两手，和平解放或者武力解放。不管那一手都是内政问题，谁也不能干涉。我们用武力解决，并未说死。

（讲到苏联現在請南斯拉夫以观察員身份列席經互会議时）

经互会要去，南斯拉夫参加，我也去。現在形势变了，赫魯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南斯拉夫你参加，我也参加。将来要把经互会转到抵抗苏联的控制。大西洋公約国家反对美国控制，以法国为代表嘛！东欧国家也反对苏联控制，并且正在发展。……現在指挥棒不灵了……。要看到这一形势。

（談到介紹工人中間的模范人物时）

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但是，沒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汉朝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靜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約不条約，要进攻，他立即听了张良的話，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即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是眞齐王，何必假的。"而项羽則有三次错误，鸿門宴不听范增的話，那时他有四十万军队，刘邦只有十万人。鸿沟协定他认眞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我们中央上过大学的也很少，过去上了大学的就算做官了，还革什么命。現在有许多新的好的典型，要提倡。

对《人民日报加強学術文章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

××、××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視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須改变过来才好。現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請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題为盼。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貫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門中适用，在交通、財貿、文教各部門，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

接見新西蘭共产党总書記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还利用电子发电。后来又进了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沒有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門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

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爭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爭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是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呢？那时是先进集团同落后集团的斗爭。一万年以后还是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不可能设想铁板一块，都正确，沒有一点错误。沒有错误，那里有正确？

社会是复杂的。根据馬克思主义，根据对立统一的規律，一百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我就不信在一百万年以后，所有的人就都是那么文明、高尚、道德，都是圣人，沒有肯定，沒有否定。

而且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也是要通过斗爭的。……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滿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沒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现在，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在泰国、老挝、南越，它代替了法国；在南朝鲜和台湾，它代替了日本。它到处都要伸手，我们就要反对。有人罵我们用肤色来划分人。如果眞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同蔣介石团结起来？为什么你们不支持美国的统治者？为什么×××同志不喜欢英帝国主义？各国都是用阶级来划分的。

……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

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沒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就是你们和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你刚才不是讲，你们过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只应该有团结而不应该有斗爭吗？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你们思想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你们思想中正确的那个方面占主要地位。因为你们是眞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的党的脫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咧！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鋪张浪费、反对贪污盜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沒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沒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馬列主义的一面，而沒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沒有贪污盜窃的一面。否則就不符合事实。

对外国同志介绍情况时，只说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不正确的，不是眞正馬列主义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沒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就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沒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劫物质。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則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蔣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沒有飞机、坦克、大炮，沒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关于出版三十本馬、恩、列、斯著作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同志：

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

二、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书仍要分册），請你督促迅速办下去。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两万分，好吗？我急于想要看这种大字书。

春节談話記要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內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罵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罵，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蔣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康生：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宣统的叔叔载涛生活苦。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魚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罵我们宗派主

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3、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生：质量差。

主席：一条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馬黄的武器，沒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沒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岗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士钊：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陈敍老，你是研究系，章士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黄老，你的家如象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主席：各部門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輔。我们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同志谈谈。

×××：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

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廿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二、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廿三、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据根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最近××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工作。总之要搞的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門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比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的岗位。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沒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門：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門門五分沒有用。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內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帮是个草包。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

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沒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囉囉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睜着眼睛听着沒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請××同志搞个专門小组研究。

毛主席：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要停止。

×××：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門門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門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是书法吧。

毛主席：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化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化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沒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煩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沒五八年，就沒有现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二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劳动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沒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沒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

车，骑馬射箭，“御”是駕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顏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罵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話，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罵。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鏢，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話，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予科一、二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二年的予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主席：还有到军队去鍛炼。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大学如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主席：对了，要多样化。

××：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門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眞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鳩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沒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沒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送給李納的四句話

（时間不詳）

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餓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4・在命运的前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与毛远新同志的談話紀要(一)

（一九六四年二月）

（毛远新同志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哈军工毕业）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得，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提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洗溫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溫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沒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象你那样的青年人要多挨些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我到哪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你们青年人要学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

最近两个下放干部来我这里，谈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化工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活，领导者水平不高，据说有一个犯人经过教育以后，坦白了全部问题，结果加重了刑期，这样做就有顾虑了。不坦白反而可以早出去，坦白了却加重了刑期，此事如果属实，就奇怪了。坦白应该从宽。他不骗你了，应该从宽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事，谢富治同志或徐××，可以去这个厂子了解了解。这样的工厂很重要，应有一个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去领导。

（1964年2月，对胡藏芸案件的指示，汪东兴同志传达）

关于学校課程和講授、考試方法問題的批示

（在北京铁路二中调查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留中央三份。并請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人民日报要搞理論工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听了×××汇报学术讨论，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宣传情况时，谈了一些意见。汇报时周恩来同志，×××、×××也在）

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主席在听了×××汇报人民日报组织一些学术讨论之后说，这样做好。他又问，人民日报对教学改革发表过文章沒有。文汇报上一篇文章《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以看看，可以转载。

关于《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林总提的还是对的（指“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对群众不能象对理论工作者那样要求，许多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恩来同志谈到，四川基层干部学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效果很好。

谈到人民日报上“桌子的哲学”的讨论，主席说：观念是从实践来的。人们从土堆、石堆，或者别的东西中，逐渐有了桌子的想法。做桌子，把想法提高了一步，是一个飞跃。而做出来的桌子同原来想法已经不同，又进了一步，这又是一个飞跃。王若水同志可以写篇东西来补正一下。

×××谈到这个讨论时说：如象有的文章说的，人造的东西都是先有观念，这不对，这就成了唯心主义了。

××说，报低要把两方面的意见都登出来。

（据×××说：报纸理论版近来登了些讨论，但主席还没有形成已经有改进的印象。因此康生同志提出，决定在学术版挂起“学术研究”的牌子，并准备一周出两次。）

对新华社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春）

你们新华社只有几千人，太少了，恐怕是世界通迅社中最小的吧！可以办得更大一些。

給华罗庚的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給高×的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高×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二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两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吉安。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談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二、我们有十年沒有搞阶级斗爭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則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題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

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

（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

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

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爭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盜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沒有谈阶级斗爭。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沒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机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到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象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十二、一九四七年，《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讲話，就是黄鎮、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十三、一九三三年我在古田调查，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沒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工。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三月）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爭，等等，好久沒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爭，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爭了一輩子，敢跟帝国主义斗爭，也打敗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爭。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談到有人在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議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問題时〕

眞理，一切眞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〇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鏡观察天空，看星球是否动的，但是，他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馬反动法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眞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葯的是德国人，是个葯店子的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葯剂师請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談到社会主义教育問題时）

最近我们讨论了一次，批了两个文件，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委员，都到群众中宣读，用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我批了，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吳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不要去了），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们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你要到那一个地方宣读，你就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談到全国現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爭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

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談到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三年大发展中間的經驗教訓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沒有经验。革命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綱領（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功夫。不费十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沒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功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爭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內。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功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沒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岡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人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沒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住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蔣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話”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談到学习解放軍、学习石油部，要学他們的革命精神、打歼灭战时）

不能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沒有这么个×、×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年，×、×年，才能全学到手。也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沒有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年、×年建成（指年产××万吨以上的煤井，过去一般要×年才能建成），这就算是多快了，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談到什么叫做拥护总路綫、大跃進，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爭、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爭、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爭，不搞科

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爭，而不搞生产斗爭、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談到某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能病得那样厉害？！……象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談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貴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沒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沒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沒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沒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了。结论是：老粗打败黄浦生。

（談到現在風气不錯，大家都願意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願意向別人学习时）

凡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馬克思，知道有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沒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門就是听不得批评。象×××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二，就产生了馬克思主义。請问，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馬”。这句話不对，连长应该骑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爭可厉害了。

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那时张并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查，张是否党员，何时入党，何人介绍，都查不出来。但是，那时却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反而不让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話，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話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沒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爭彭德怀的会议。他在蘆山会议不是说，你们罵了我四十天，我也罵你们二十天。延安斗爭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鬧成的，沒有山头，那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沒有共同綱領。

彭与高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沒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話，他覚得井岡山沒有山头，很沒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沒有山头，不滿意。

一九六二年，又鬧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爭，各部門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戶”。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沒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统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綿綿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談到讀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內，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剷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談到農村粮食收购、換购时）

有些地区不搞基本口粮，我不赞成。要搞基本口粮。

接見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主席：来了多久了？

馬利克·本·纳比（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纳比）：已经八天了。

主席：听说最近你们签了一个文化合作协定。

纳比：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文化协定，一个电视广播协定。（注：该团在北京签订了中阿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四年度执行计划及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

主席：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这位（指一团员）是干什么工作的？（团长向主席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对非洲、对亚洲、对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人的帝国主义军队。那时看来你们还没有八万人，大概只有三万人。现在好多法国人走了，有一百多万居民也走了。是不是这样？

纳比：是的。

主席：学校里没有教师，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两年以前，还是……

纳比：一年半以前。

主席：现在好些了嘛。现在有些教员了嘛，有些医生了嘛，有些工程师了嘛，工厂也可以开起来了，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看起来你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这还只是讲你们文化方面嘛，没有讲经济方面，也没有讲医务方面。

你们有些工作是不是军队的人在做？

纳比：军队现在参加了大的工程和地方管理工作。

主席：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可能没有你们的高。

纳比：我们想正好相反。

主席：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一百个人里有八十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受压迫的，没有多大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是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跟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他们走。工程师也不跟他们走。他们说他们在大陆上带了二百万人走了，主要是军队。他们过去有几百万军队，打到后来，带了三十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約有六十万人。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象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笑声）那时候你们有一个总理，叫阿巴斯，和我谈过。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国军队也用我的打仗的书来教育法国军官，想消灭你们。

本·科比：（副团长，笑着点头称是）他（指拉齐兹）还写过这方面的书。

主席：我跟阿巴斯说，法国军队是压迫人民的，是用不了我们的经验的。听说美国的军队也用我们的材料教越南南方的反动军队打南越人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人民军队作战的经验，是人民军队积累起来的经验，归根到底，他们用不着。（对拉齐兹）你写过些什么书？

拉齐兹：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法国军官想利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打我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为封建主来打人民，而主席的著作是教我们为了人民去打封建主。

主席：对的。结果法国没有打赢，你们胜利了嘛！比如中国，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

动派吗？你们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古巴不是打敗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胜利了吗？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仗，你们花了七年时间，古巴只花了三年时间。情况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你们根据你们的情况，敌人的力量，所以要花七年时间，古巴的情况只要三年。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花了二十二年。

有些賬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通丢掉，那不能怪蔣介石，只怪我们自己。统通丢掉，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三十万人減少到两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两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八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敗，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沒有研究过吧？

纳比： 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斗爭，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敗。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了广州，现在又到了长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既然主席先生提到了我们同胞阿巴斯，我想用我和我的同志的名义说明一下。阿巴斯是属于你们称之为买办阶级的那个阶级。以本·貝拉为首的领导集团正在清除其错误。我们正在按照主席刚才讲的革命传統这样做。

主席： 他现在不干了，不跟你们合作了。

纳比： 我们不仅希望改进我们的政治机构，而且特别要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

主席： 这个好。

纳比： 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次和周恩来总理讲話时已经谈过了。周总理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讲話的习惯是短的。我们把毛主席说話的这种规则，看成我们自己的规则。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席充分了解当时的局势。

主席： 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淨。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八十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我提到政治方面，是因为还有反对你们的，也有要推翻你们的人，有沒有？

纳比： 在我国的周围有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国内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仆从，他们反对我们新型的民主和自由。

主席： 国内沒有吗？

纳比：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他们扶植一些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这些资产阶级就成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他们想要实行对人民的控制。这批资产阶级是殖民主义一手制造的。

其中一部分，在经济方面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人就是右派分子，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还有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动。这是些自称有进步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实际上是托派。阿共就是这一派。正如您所知道的，阿共是受法共领导的。

主席： 你们的共产党老是埋怨我们不跟他们说話，说他们沒有政治地位。我们说：“你们名为共产党。革命嘛，你们不参加，你们反对，等到后来革命有点希望了，你们又说要参加，那时已经晚了。”所以你们的共产党和我们谈不来。（笑声）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这有点和古巴相似。

纳比： 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健康力量表示的信任。我的同志们和我，会把这一点转告我国的革命者。

主席： 你们把阿巴斯，还有貝勒卡塞姆清洗掉是有道理的。那些人不行了。所以要靠你们，靠你们的党。听说，民族解放阵线最近要开大会？

纳比： 本月十六日开。

主席：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纳比： 二十一日。

主席： 今天十五号，还有四、五天。你们怎么安排？上海还去不去？

纳比： 我们等丁××先生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 （对丁××）时间不多嘛，要看他们的方便，少走几个地方也可以，不要搞得太疲劳。（转向团长）你们是从广州来的，还是从北方来的？

团长： 我们是从香港到广州之后去北京的。

主席： 少看一点也可以。

纳比： 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很高的。在中国作一次旅行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当中许多人不一定有机会再来，所以要尽可能多带一点收获回去。

主席： 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也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也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为什么阿巴斯、貝勒卡塞姆跟不上了呢？

纳比： 这是因为——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三十多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

主席： 你们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胜利了十四年，我们又重新抓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

纳比： 至于我国的革命形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可以适用的，是和我国革命思想吻合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过幼稚病的阶段。

主席： 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門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話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也不要很多时间，个把星期就够了。（对周××）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話。你们参加沒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爭？

周××：（以下简称周）：反陈独秀时我们正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主席： 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屆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纳比： 我和我的同志们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眞理。因为您领导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这里，（还不止是阿尔及利亚，而是在整个阿拉伯集团）沒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我讲这个話，并不是以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的身分，而是以作家的身分讲的。

主席： 你是位作家，有什么著作？

周： 他有十五本著作。

主席： 那方面的？

周： 政治方面的多一些，其中有一本叫《亚非主义》。

主席： 噢。

纳比： 谈到《亚非主义》这本书，我正想说明一下。因为不知道主席今晚就接见，所以把书放在宾馆，沒能带来。对我个人来说，来中国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要把这本书送给主席。为了弥补这个不凑巧的情况，现在我是否可以回去拿？

主席： 可以吧。（对周）他们明天在这里吗？

周： （对团长）可由我转交。明天去韶山，主席的旧居。

纳比： 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主席： 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三十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去，而是国民党不让我去。（笑声）

纳比： 我们在中国很幸运，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首先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了长征的经过。听说你们把长征称作英雄——在这里，英雄是指事，而不是指人了。在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发现門口处写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話：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同时，还看到林彪讲的一句类似的話。

主席： 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沒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从轻武器入手，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我就不相信，只有法国

人能制造大炮，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制造。法国人积累了二百年经验，你们只几年。你们会比法国人快。法国有四千万人口，你们有一千多万。但是，为什么你们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打败了四千多万人口的法国呢？所以你们是很有希望的。

我跟你们的谈話和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讲的就不同。我就不对他们讲什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还犯的错误就更不讲了。（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如实了解中国情况，不要只了解片面的。法国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不愿意听这一套。讲革命经验对他们无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和他们讲干什么呢？你们是革命党，我见了革命党，就介绍两方面的经验。我只对你们讲。对别国的革命党也讲，但不包括你们的共产党。他们不会来，来了我们也不讲这一套。

纳比：因为阿共是多列士的門徒，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这个区别很大。

主席：跟法国共产党我们也讲不来。他们也沒有代表团来。现在共产党不一致，有点小矛盾，不大也不小。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和你们的党（指阿共）怎么能谈得来呢？再如法共，他们天天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你们现在和我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谈話，（笑声）跟我这个教条主义谈話。（笑声）他们只是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吗？

纳比：刚才我讲到，我们关切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它已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的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我们也知道，这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

主席：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要不然，假如一点好处也沒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的共产党是不准备搞眞正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也不忙做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大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沒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二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沒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

（对团长）你多大年纪了？

纳比：五十九岁。

主席：还年青嘛。

（对副团长）你多大了？

本·科比：三十一岁。

主席：我们总还能活几年。你们活的更长些。

本·科比：我们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尽可能的长寿。

主席： 说“尽可能的长寿”，这話好。只可以尽可能活得长一点，不可能不死。中国历史上还沒那回事。

你们回去后，請代我问候你们总统，说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克服困难，向前发展。

纳比： 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您牺牲了您的时间，本来您还有极其重要的工作。我想向您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敬意。是您领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想表示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有发自內心的友好感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殖民主义。他们的斗爭所处的条件，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战胜了敌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是从法国军队手里夺取了武器打垮法国军队的。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主席： 要向你们国家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

你们的本·貝拉总统的全名怎么写？

（翻译用纸条写好，主席阅毕收存。）

纳比： 谢谢您，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敬意。感谢您的热情接待。

主席： 谢谢。再见。

（主席同全体外宾合影留念）

对人民日报理論工作的批評

（一九六四年四月）

《人民日报》的理论工作是应付我的，谁管理论版？（答：陈凌）让王若水管好了，他的文章多吗？

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和批示

（一九六四年四月）

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以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

（1964年4月，同汪东兴同志的谈話）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1964年4月20日，对公安部党组关于调查处理胡藏芸案件的情况报告的批示）

在謝富治同志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谢富治同志汇报说：去年我们着重抓了改造，然而生产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但劳改工作中改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迄今还沒有解决。

主席说：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谢富治同志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守硕中队，向犯人宣讀了双十条，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也在乔司农場五大队宣讀。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

主席：大概那些人是比较有用的。他们为什么对双十条感兴趣？

谢富治同志说：他们懂了党的政策，感到他们自己特别是家庭和子女有了前途。

主席说：是啊！有前途改造就有信心，不然，一片黑暗，改造就沒有信心了！

谢富治同志说：许多干部起初反对向犯人宣读双十条，但读了以后，犯人反而好管了，因而干部也就改变了。

主席说：许多干部不赞成读双十条，是怕读了以后，他那一套不灵了。他不相信能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新人，过去红军军官带兵靠打人、罵人、关禁闭，枪毙等等。当连长、排长如果不打人，不罵人，不摆威风，他就沒有法子带兵了。这样事情搞了多少年，后来总结了经验，逐漸改变，兵反而好带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现在，你的那一套在劳改中开始见效，但才是个开始，也要搞多少年才行。

主席说：对，原有的劳改干部水平不变。

谢富治同志说：劳改干部质量较弱，但任务重，劳改工作中阶级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验都有。

主席说：是啊，你一样都不行，怎么能改造人？（谢富治同志说了经过蹲点研究，提出劳改工作的“四个第一”，“二个为主”，“二个从宽从严”。对刑滿就业人员的处理，提出“四留、四不留”，要求劳改干部对罪犯要“四知道”时）。

主席说：这很好，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谢富治同志说：准备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的改造工作都作的较好，释放后，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

主席说：在一定条件，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只靠强迫压服。

（1964年4月28日，同谢富治同志的谈話）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

有为青年多得很，青年一代要打败老一代，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不要为名望、知识所惧怕，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在計委領导小組汇报
第三个五年計划时的一些插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

一、搞计划要把朝、越的一些需要打进去，听说越南要××万吨油。

二、一九六五年不一定有七亿二千万人口吧！一九七〇有八亿？不得了。

三、知识分子很重要，沒有不行。理论要知识分子，理论沒有知识分子不行。但是知识分子还是要总结下面的东西。

四、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五、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

六、所有的单位，工厂、街道、学校、机关都要划阶级。

七、工资问题。再减上面的工资有困难。今后采取上面不动，下面逐步增加的办法。

八、工业为谁服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之间有一个相互关系问题，但是整个工业是为农业服务的。

九、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天老爷下的，沒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十、有多少力，办多少事。不要以个人来决定。“我这个人老啦，快死啦，在我死以前，要干出什么……”这不对。

十一、我要把二十四史看完。《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比《旧唐书》又好些，最不滿意的是《明史》。

十二、工厂划阶级的目的，在于暴露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工人中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有百分之八至十五。

接見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维托·卡博（以下简称维托）：受到主席接见，感到幸福，这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光荣。

主席：什么时候到的？

维托：四月二十七日。

主席：大使什么时候来的？面孔很熟。

大使：十年前，当你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向你呈递过国书。

主席：你第二次来，欢迎你。他们几位（指阿电影工作者）是干什么呢？

维托：电影工作者。

主席：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眞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黑，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黑就好。

维托：敌人咒黑，我们就感到舒服。

主席：沒有人黑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别人不知道，这一黑就黑出来了，现在要辯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起研究谁是谁非。是修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黑：又是假革命、新托洛斯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维托：他们除了谩黑，别无他法。

主席：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干。

维托：他沒有理。

主席：就是。他无理，他不干。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駁。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维托：对！对！对！

主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维托：修正主义是他们的同谋。

主席：中国人都欢迎你们。

维托：我们到处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处，欢迎都变成了友谊、热情的示威，告别时含着眼泪。这使我们感到不是小国小党，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是你们党

进行工作的结果。

主席：你们站住了，未被压下去，是一个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四面受敌人包围住，压不下去。他们提出无论如何要停止公开争论，你们赞成吗？

維托、大使：我们从来不同意。

主席：他们要停，提出那怕是三个月也好。

維托：赫鲁晓夫要争取时间。

主席：他们通过罗馬尼亚向我们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此时团结报记者进来，主席站起来说："欢迎你，你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走，我们就发表文章。我们的文章还沒有写出来，就发表了其他兄弟党的文章。对他们的公开信还沒有评完，只写了八篇文章，还要几篇才能评完。现在他们有新的提出来，又要时间。他们就想要开会，要五月中、苏两党开会。对不起，我想大概明年五月差不多。他们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说，把你们的"集体措施"拿出来我们看看呀。

维托：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主席：也许会搞什么"集体措施"，我们准备着。什么措施，你去搞吧！

維托：中国是巨人，在东北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啊！

主席：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开始有一点工业，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开始积累了一些农业的经验再有几个五年计划要好些。越整我们，也许越好点。

（问×××同志）你这位同志是谁？

陈：×××。

主席：现在搞文艺，去过延安吗？

陈：去过，见过主席几次。现在是搞电影工作。

主席：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此工作。

（问陈）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主席：那时是土地革命时代，长征是一九三四年。今天在座的有的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契布里耶、齐烏是文教部副部长。

陈：还有作曲家、导演、摄影工作者。

主席：你们都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群众组织也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执行党的路线。

主席：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場。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沒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陈：好多了。

主席：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又反映活人。你们国家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維托：也有。有过去的残余，有外来影响。

主席：很顽固。

維托：特别是妇女。

主席：妇女要分青年、老年、中年，老人信迷信，因为她们一辈子受过许多苦，把希望寄托在神上。她们的下一代比她们好点。你们去杭州参观一下灵隐寺，每天有许多人去烧香，有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孙子。他们是去真正烧香的，但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是去玩的，不是真正烧香，是去逛逛杭州的。

情况也要看条件。在武汉、上海、杭州可看到木船、轮船工人不信神了，旧社会中轮船工人就不信神了，木船还信，敬龙王，因为没有保障，有风浪会翻船。妇女生孩子也是如此，医院有保证，她不信神了。没有医生，没有保证，还得信神。（问×××同志）你们注意了吗？如果没有医生，叫她不信，就不行。

維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主席：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主席：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爭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維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主席：我们爭取。

齐烏：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主席：以阶级斗爭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爭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爭，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蔣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維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主席：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維托：专政。

主席：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話，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沒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維托： 完全同意。

主席：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維托： 还有修正主义。

主席： 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主席： 问题扯的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爭。农村四清是阶级斗爭，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爭。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明春结束，要准备三、五年才能结束。城市也要划成份。至于如何划法，将来作时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份论，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个计划。一定要把干劲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来订计划。计划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我七十多岁了，比你们大些，但是不能凭着我们在临死以前看到共产主义来订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还是要注意数量多了，而质量沒有更多的注意。

计划绝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问题。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眞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的就要差些。现在我们全国眞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贵公社；另一个是山东的曲阜的陈××公社，他们从来沒有向国家要一个錢，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现在这个问题还沒有很好解决。领导干部要蹲点，不能只靠听汇报。部长都要蹲点，不然就不开会。……

五、今年的小麦估计可以比去年增加五十亿斤。看来今春多雨，是利多害少的。

六、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从农村搞那么多人进城当工人，不是个办法。

关于第三个五年計划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

生活福利，是搖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錢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爭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鍵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象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虛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減、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門、各地区，就分数字、爭人、爭錢、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爭錢，爭来了錢，就乱花錢。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錢在香港。有的年青演员就作“十年的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爭取几年內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錢。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懶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

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爭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門”干部很多（出家門、进学校門、进机关門），“三門”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門、中学門、大学門”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錢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和×××的談話(一)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开了二十天的会，我们才见面，你们的简报我都在看。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下面有沒有，××说有，提了好几年了。主席说我在郑州就讲过把榨酒厂搬到农村，但沒提得这么高。提到两种教育制度，主席讲，主要靠自学，肖楚女就沒有上过学，他在茶馆跑堂，我很喜欢他，在农民讲习所教书，主要教员靠他。他能打破旧书的旧框，后来当黄浦军校的教官。农民讲习所，我们拿小册子给他们看。现在学校不发讲义，叫学生抄，为什么不发？据说怕犯错误。抄就不犯错误？发讲义叫学生看，你可以少讲。材料不仅发一方面，反正两面都发，如历史新学、旧学都要发给学生看。我写战略问题是写讲义的，就沒有讲，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好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复写，写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可以叫人家看么！现在的教育就是懶，自然科学不同一些，要看试验。要有工厂，过去搞概念，今天是概念，明天还是概念，学生啥也看不到。先生不写讲义（有人说发了讲义先生沒什么讲的）那你可以多看书么！

问××：你不是同×××同志谈了吗？

刘××：×××是好同志，是左派核心，希尔也是好同志。

有些国家尚无左派核心，仅是小组活动。主席说先出来的可能是积极分子。

×××活动在美德軸心，沒看到美德矛盾，欧洲有些国家恐德病，赫鲁晓夫想搞美国控制德国，主席说，德国统一对我们不利。法国也怕德国，欧洲一些党也怕德国。

法国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四十万军队，邱吉尔担心法国拿不下来。戴高乐有办法，第一是封官，第二是改为国防军三十万，另外十万军队解散，庞大民兵解散。多列土从苏联回去说服大家交出军权，当了付总理，最后一脚踢开。

欧洲党都如此，刘××讲他们象我们大革命时一样，工人和农民都组织起来，武装也有了，工农向我们要办法。我们就是沒想到夺取政权，也沒有想准备国民党可能解除我们的武装。

当时形势很好，就是沒想到资产阶级会叛变。武汉政府有两个共产党员当部长。一个是

譚平山，后来组织第三党，解放后搞农工民主党。一个是苏兆征，不经过那次资产阶级叛变是不行的，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现在又是一次，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沒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眞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已经出了，白银厂，小站，过去我们不注意上面的根子。

郑州会议，主席提出赫鲁晓夫是好人是坏人，照他讲的来是不照办。希尔讲，他早就知道赫鲁晓夫是坏人，我们知道，但不好公开讲。

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

出毛选五卷的问题。

一分为二有辯証法；合二而一是有修正主义。

写党史，請董老挂帅，要把蔣介石全集印出，看他是怎样罵我们。

总理讲太多了，可以出选集。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草。錢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二）

（六月十六日下午）

地方要抓军事，要搞接班人的问题。地方党委要搞军事，光看表演可不行。

无论出什么大事都不要慌慌张张。原子弹打下来就和他干。“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原子弹都炸光了，帝国主义也不干。他沒有剝削对象了。他们只要錢，不要枪，十年之內手榴弹有一点好，要搞一些工厂，等打烂再搞来不及了。要教育人民都不要慌。站着死趴着死都一样。

要准备后事，接班人的问题。

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沒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我有几条：第一，综合观察干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义。第二，为大多数人服务包括全国全世界大多数。第三，能团结大多数，包括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如果七大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胜利，但搞阴谋的不行。如高、饒、彭、张、周、习、吳等都出在中央，要一分为二，不是我喜欢这些人，这是客观的存在，要有对立面。五个指头，四个一致，一个另向，总沒有完全错、总有九九九…自然纯了，不能叫世界，社会也如此，你看我们那年经过了三代五朝；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王明、张闻天。

我年青时拿棍子打毛泽潭，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毛家宗祠，××同志讲中国党內发生修正主义，要准备公开讨论，不准许有阴谋、篡夺、政变。解放军最发扬民主，有了这一条就不怕修正主义。

关于軍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十三陵）

讲二个问題：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題，二是要搞接班人。……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就是政委，多少年不履行职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題，不帮忙，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大的战线，光靠中央的几百万解放军怎么行呢？不靠，你们就得自己打注意了，守土有责……要打原子弹沒話讲，他要打吗？他丢原子弹我们走。他们进城我们也进城，敌人就不敢打原子弹了，我们搞巷战，总而言之和他斗。

要把民兵很好整頓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頓。组织上整頓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上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眞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三个月民兵精神面貌大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馬克思，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他剝削谁呀！……二十年战爭，我们不是死了许多人吗？黃公略、刘胡兰、黃继光。我们沒有死，是剩下来的渣子。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同志就是閻王招手，他沒有去，现在还活着。军事上也要准备，和平时期要搞上枪，打起仗来再搞就晚了……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总而言之，我们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沒劲，有准备，不怕，就有劲。

二、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題

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沒问題，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話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们怎样培养操权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1.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馬列主义。要搞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2.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不为少数人，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也要为世界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沒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书记、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少数人，我们是为多数人。

3、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以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計的人要注意，如高、饶、彭、黄、张、周、譚、賈等十多人出在中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就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如吳自立、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讲的小站。各部門、各地方都有搞阴谋的人，朝中有官，下有群众，沒有这种人不称其为社会。我上一次就说过，不是我喜欢有这种人，而是客观存在，不然就沒有对立面，就是形而上学。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姆指向一边，这才担得拢，如果都向一边就沒有用了。世界上沒有纯的物质，沒有眞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还有零点零一。这个道理多数人沒有想通。完全纯是沒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纯就不合乎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是对立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灰有尘土。你们看，我们那一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仲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沒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帝国主义也好，我们自己冒出来的也好，都沒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又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沒有？也沒有。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七年也未把解放军搞垮。几品官一出来就沒有希望了。要别人讲，不要一言堂。要团结大多数人。形式有民主，作了决议，还有说他那时未通过，×××说：中国要保持讲道理，人民解放军要保持讲道理，有了这一条，彭德怀就搞不成。

4.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与同志商量，要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派意见要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人是可以变的，×老不是变了吗？牛可以驯来耕田，人为什么不可以变？有少数人是不能改变的，如于学忠，章伯钧，刘立明，党內有××，×××，他们是变不了的，吃了饭就罵人。还有郑位三，也是不变的，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罵。要团结大多数人，我看对吳自立不要开除党籍，要劝他们改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讲民主，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开了会赞成了又翻案。形式的民主，开会自己讲几个钟头，好象眞理都在我手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潭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話有道理。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自己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较少出错主意。讲错話，出坏主意，少一点好，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一个打败，二个打胜，就比较好，就可以当下去。……不要搞过火斗爭，要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只要他认眞改正了错误，就不要总是批评沒个完。

接班人就要馬列主义的，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我想的不完全，你们自己再研究研究，布署一下。都要搞几个接班人，不要总是认为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好，好象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沒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的损失？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死了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沒有那回事。人总是要死的，死有各种死法，被敌人打死，坐飞机摔死，游泳淹死，细菌病死，无病老死，包括被原子弹炸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有一、二、三把手，不要怕大风大浪。……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評

（一九六四年六月中旬）

（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提出了批评。六月二十三日，××同志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編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传达）

主席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有鬼无害处”，事后一直沒有对这件事做过交待。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爭，进行反修宣传，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爭，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沒有批判“有鬼无害论””要在报社开一个会，把这个问題向大家讲一下，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主席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是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主席说：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沒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据说这是学的苏联《眞理报》。事实上，沒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沒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眞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

接見桑給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

主席：先照个像吧！

（照像，然后坐下）

主席：你们是非洲来的，桑给巴尔的？

阿里：是的。

主席：（对江××）你讲的是什么？

江××：英文。

主席：（对阿里）听说你在中国有几年了。

阿里：是的，有四年了。

主席：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了中国人民搞广播事业。

金××：他帮助我们办了斯瓦希里语广播，帮助我们培养了斯瓦希里语的干部。

主席：好！

阿里：北京电台也帮助了我们的人民，帮助他们了解世界情况。

主席：听得到吗？

阿里：听得很好，不仅桑给巴尔听得到，而且整个斯瓦希里语地区都听得很清楚。

主席：有几个国家？

阿里：有坦噶尼喀、肯尼亚、乌干达一部分，还有刚果。

主席：哪个刚果？大刚果？

阿里：几乎两个刚果。

主席：啊，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两个刚果。

（阿里给主席点烟）

主席：谢谢你！（用英文讲）

你为什么要回去？

阿里：这是国家的需要。

主席：国家要你回去。你们这回来的联合共和国代表团里面有你们的一个部长，你遇到过他吗？

阿里：是巴布，我见过他。

主席：我是头一次见到他，他很高。

阿里：是的。

主席：他现在在坦噶尼喀的首都工作？

阿里：他沒有去，将来可能去。

主席：你们过去是朋友？

阿里：是的。实际上是他把我介绍到中国来的。

主席：你走了，就沒有人囉。

阿里：还有，还有六个桑给巴尔人工作。

主席：你们两个人走了，还有四个？

阿里：不，我是说还有六个。一个在电台，四个在外交出版局，一个在外语学院。

主席：都是桑给巴尔的，有沒有坦噶尼喀的？

阿里：有一个，他在中国画版社工作，翻译斯瓦希里文。

主席：你们那里的气候同我们这里的不同吧？

阿里：是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那里不下雪。

主席：几个冬天了！

阿里：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主席：你们那里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南緯度还是北緯度？

阿里：实际上是在赤道。

主席：在赤道上不是很热吗？

阿里：是的，但是我们那儿只是一个小岛，不太热。

主席：海洋性气候。

阿里：是的。

主席：你有中国朋友吗？

阿里：很多，很多。

主席：到外地去参观访问过沒有？

阿里：去过。一九六一年去了哈尔滨、广州、上海、杭州以及其他地方。最近还荣幸到井岗

山去了一趟。

主席：哦，爬到山上去了。

阿里：瑞金我也去了。

主席：哦。

阿里：我看到了第一次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我们同井岗山的人民进行了交谈，同老干部，老区人民交谈。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

主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我们在那里。到现在三十七年了！后来转移到瑞金去了。瑞金地区比较大，有几百万人口——不只是瑞金一个县，有几十个县，在那里打过很多胜仗。后来万里长征到了北方。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到了陕西北部。甘肃也到过。也到过山西，过黄河到太原附近。山西靠近河北省。后来打日本，主要以延安为中心，在长江以北各省。后来发展到满州。日本走了，蒋介石又来了，蒋介石打我们，我们就同他打，打了三年半，打垮了蒋介石大部分军队，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剩下的都跑到台湾去了。他历来是靠美国保护的，现在还是靠他们的（美国的）第七艦队。所以美国同我们还和不了。美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帝国主义，也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它对你们也有影响。

阿里：是的，美国现在正想一切办法渗入桑给巴尔。

主席：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

阿里：英国把桑给巴尔殖民地了，把它叫做“保护地”。

主席：有个国王，叫苏丹。

阿里：正是因为有个苏丹，所以叫“保护地”。

主席：坦噶尼喀呢？

阿里：叫做“领地”。

主席：那就沒有什么国王囉？是英国直接管轄？

阿里：是的。

主席：还有肯尼亚、烏干达呢？

阿里：肯尼亚是殖民地，烏干达有国王，也叫做“保护地”。

主席：南北罗得西亚呢？

阿里：沒有国王，是殖民地。

主席：现在那里白人还不少囉？

阿里：是的，在坦噶尼喀、肯尼亚有移民。在肯尼亚，因为气候比较涼，有许多移民。

主席：有多少，听说有几十万。

阿里：是的，有几十万。

主席：听说有三十万。

阿里：是的。

主席：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

阿里：八百五十万。

主席：有这么多？

阿里：是的，坦噶尼喀的人口还要多，有九百万。

主席：有一千万。

阿里：可能，我的数字是很久以前的人口统计。

主席：你去过坦噶尼喀吗？

阿里：只是路过。

主席：到过肯尼亚吗？

阿里：到乌干达去时路过。

主席：现在回去走哪一条道？

阿里：经过巴基斯坦、肯尼亚，也可能经过坦噶尼喀再到桑给巴尔。那儿有两条航线，一条直达线从肯尼亚到桑给巴尔，另一条从肯尼亚经过坦噶尼喀到桑给巴尔。

主席：你的皮肤颜色看起来同坦噶尼喀人有点不同。

阿里：是的，坦噶尼喀人更黑一些。

主席：还有个馬达加斯，那里的人的皮肤同非洲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一样。

阿里：嗯。

主席：希望你们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来。

阿里：中国已经是我们的家了。

主席：来旅行，观光。就谈到这里吧？你还有什么问题沒有？

阿里：有，我想請问您几个问题。现在非洲人民的斗爭，正在蓬勃发展，斗爭越发展，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越大。但是这个斗爭还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我虽然读了不少文件，但是还希望您谈谈您对非洲人民斗爭的前景有些什么看法。

主席：我对非洲的情况不太熟悉。但依我看，过去十年、十一年，从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起，非洲的变化是很大的。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不甘心被打败的，进行了对苏伊士运动的攻击。另一个地方是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阿尔及利亚以少数军队抵抗几十万法国军队。结果，法帝国主义失败了，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最近不久，你们国家也有变化，你们国家只有三十万人口，敢于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也不敢怎么样。坦噶尼喀也独立了，英国军也走了。肯尼亚呢？

阿里：肯尼亚也独立了，但兵变以后英国军队还在。

主席：还有吗？听说非洲国家军队去了。

阿里：这是在坦噶尼喀。

主席：哦，在坦噶尼喀。

阿里：在肯尼亚情况有点不同。肯尼亚与英国有协定，英在肯有基地。英国军队到年底才撤走。

主席：他们最终是要走的。

阿里：对！

主席：在刚果，我说的是大刚果，有个卢蒙巴，是个民族英雄，被整死了，但斗爭还在发展。在最近大半年，斗爭有发展。在西南非洲，安哥拉，葡属殖民地，斗爭也在进行。我对非洲虽然不熟，但我看来，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你们也是这样看。我们要从历史看，从发展看嘛！困难一些的是南非。那个地方有三百多万白人。他们是不愿意走的。那个地方要解放。恐怕时间要长一点。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大洲，现在都有革命形势，这三大洲占世界人口的

最大多数。这是事实。这是世界的大多数，欧洲、新西兰、澳洲和北美洲是少数。

（阿里给主席敬烟）

阿里： 现在非洲没有共产党。您认为在非洲建立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您对非洲的统一战线有什么看法？

主席： 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我看，在非洲有工业，很多国家有工业，有的是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有的是非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有矿山、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业。现在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总有一天会有的。现在也不是没有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有，摩洛哥有，南非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是革命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如阿尔及利亚的党，还不如民族解放阵线，因为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解放战争的，它听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我们的，反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同我们合作的。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们反对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反对我们，我们不懂。

还有个例子，亚洲的伊拉克共产党，也是反华的，只注意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注意他们自己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就是去年，来了一次政变，把卡塞姆杀了，把党的总书记也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阿里： 知道，在报上读到过。

主席： 杀了许多共产党，杀了许多修正主义，也杀了许多进步人士。你说，为什么伊拉克共产党反对我们？

阿里： 听指挥棒。

主席： 听指挥棒，搞和平过渡。

再有一个是巴西，也不赞成我们，因为我们不同意和平过渡。几个月以前发生了政变，把总统赶跑了。修正主义党的领袖被判了八年徒刑。这个党的领袖到中国来过，叫普列斯特，是个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不管你是修正主义，不是修正主义，他们是不管的。有九个中国人被捕，六个是贸易工作者，三个是新闻记者。

这就是说，修正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妥协。非洲工人阶级会得到教训的。可能出现一些修正主义的党，也可能出现一些馬克思主义的党。

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反帝不反帝的问题。反帝的都要团结起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来讲，就是看他反帝不反帝。至于建立眞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名义上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不仅是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要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讲，现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走社会主义。老的一批人跟不上，包括临时政府的总理阿巴斯，贝勒卡塞姆，他们跟不上人家。

阶级斗爭，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讲阶级斗爭的，社会上有阶级斗爭。我们同国民党有两次统一战线。一次是北伐，那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打日本的时候，第一次统一战线，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得到了政权，就反对我们，我们只好同它打，上了井岗山，后来到了瑞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感觉得再要同我们打下去不行了。就建立了第二

次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有八年之久。一方面国民党同共产党团结，反对日本，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每天反对我们。我们怎么办？这一边有日本，那一边又有国民党。所以我们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团结为主。这样，同国民党維持了八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打我们，统一战线就破裂了。破了就破了嘛，我们打胜了，他们打败了。我们沒有大城市，沒有外国的援助，我们军队人少，沒有空军，沒有海军，沒有飞机，沒有大炮，只有轻武器，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缴来的。

这样岂不是沒有统一战线了吗？把他赶到台湾去了，但是，还有统一战线。其实，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泛了。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在的时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与我们接触不很广泛。在解放以后，他们都不走。我们把他们都团结起来。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在上海、广州，大学教授都不走，他们感觉到跟着国民党沒有前途。

基本的统一战线是同工人、农民的统一战线。也是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我是讲它的后期。国民党曾经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那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是中国唯一的、最进步的政党。那时还沒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才有的，一九二一年才有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战线。

后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打了十年仗。它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什么它变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还可以同它形成第二条统一战线呢？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日本侵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还打我们。只是在日本打进关内，向大陆进攻时，它感到同共产党不讲和不行了，所以才形成第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是站在美、英、法一边的，反对日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派帝国主义，打另一派帝国主义。德、意、日三个国家变成了战败国。要看什么条件，那时美、英、法，我们也可以同它们合作。在战后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想控制世界。日本变成了战败国，意大利、德国变成了战败国。英法削弱了。非洲为什么起来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削弱了，英法削弱了。

大概非洲……，对英、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对广大人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为什么我们同你们非洲人、黑人讲得来呢？我们有共同之点。

阿里： 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中国解放之后，我们更加了解中国。

我们的斗争不断发展，因为中国给了我们许多经验，中国给了非洲人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发表了许多支持我们的声明。近几年来，我们能到中国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对我们很有帮助。

苏联修正主义告诉我们要和平共处，裁军，说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说要把裁军省下来的錢来援助我们。但是，我们的斗争要靠自己的力量。

主席： 对！

阿里： 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在您看来，他们勾结到什么程度？

主席：可能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又勾结，又有矛盾。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也有矛盾。修正主义有几十个党，但并不是很团结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不是很团结的。你看，法国同英国就不是很团结的。日本垄断资本家，日本政府首先打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占领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馬来亚、印度尼西亚，打到印度的东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朝鲜就不再讲囉，本来就是它的殖民地。现在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有的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有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日本也是在美国半控制之下。你说，日本，不要说人民，就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会舒服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沒有矛盾。

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受美国欺侮，我们反对欺侮。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中间地带的说法。

这个話不是现在才讲的，是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时候沒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內。一九四六、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十八年了，話讲了十八年了。那时我们在延安，是同美国记者讲的，她叫斯特朗。

阿里：我认识她。

主席：她七十几岁了！

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间地带，不是打苏联。反苏是个口号，是烟幕。与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中间地带，以反华为口号。

阿里：我耽心主席的时间。請允许我表达我的感情。到中国来以后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一天，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主席：你看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沒有？

阿里：看过，也看过您的著作。

主席：我是从馬克思、列宁那里学来的。

阿里：您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您的著作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

主席：比较通俗一些。

阿里：这是我的感覚，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

主席：我也沒有多少著作。

阿里：不，很多。

主席：好，就说到这里吧！

阿　里
阿里夫人：再见！

主席：再见！

接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团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主席：你们以前都沒到过中国吗？

席尔瓦：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主席：第一次来过以后就能再来啦！我们两国记者和两国人民互相联系，这是好事。我们两国政府还沒有建立关系，你们政府大概会有困难。也许你们的政府不高兴我们。

席尔瓦：不，他们并不是不高兴。前不久智利政府向中国卖了铜和硝石，这就是一个证明。

主席：有生意吗？

席尔瓦：是。

主席：那好。

席尔瓦：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办了中国经济展览会，引起了智利人民很大的兴趣。许多工人、学生、职员都去参观。他们看到了原来以为中国不能生产的许多机器和其他产品。

主席：我第一次从你口里知道中国在圣地亚哥举办了经济展览会。看来，我这个人官僚主义很厉害。

席尔瓦：早在上一世纪，就有中国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他们很勤劳，很受尊敬。我们的政府是主张民主的，而且实行民主。对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比如，我们和古巴就有外交关系，而且哈瓦那有智利的大使馆。

主席：有吗？过去巴西在古巴有大使，现在还有吗？

席尔瓦：沒有了。

主席：巴西发生了变化。

巴斯克斯：巴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主席：巴西政变当局把中国人抓起来了，九个人中七个是做生意的，两个是记者。他们把中国人抓起来，不知对巴西统治集体有什么好处。

席尔瓦、巴斯克斯：毫无好处。

主席：他们可能得到一些美元。

席尔瓦：可能是这样。

主席：对他们沒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事干什么。

席尔瓦：我要向毛主席谈到这样的情况，拉丁美州的报纸经常受到美国佬通訊社的影响，他们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参观中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中国人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不要战争。昨天我们有机会得到陈毅付总理的证实。中国是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看到并证实中国人民是在和平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

主席：打仗对我们沒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打了几次战争，

如一八四〇年在广东的鸦片战争，还有八国联军的战争，八个国家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国和日本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在渤海湾的旅顺、大连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种军阀混战，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比如我这个人，也做过新闻记者，当过小学教员，那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因此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有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那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那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因为白色恐怖，有一些共产党员不干了，消极了，只剩下几千共产党员，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军队原有三十万，剩下两万多人。你看，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用了吗？人数不是很少了吗？两次人数减少，前一次在一九二七年，这次在一九三四年。我们人数少了敌人就高兴了。恰好在人数减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人数又有了发展。日本走了以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到现在我们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我们是支持的，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的，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支持，我们就给他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侵略者”，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战争。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了朝鲜，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我们是不会放弃它的。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法国在当时已是共和国。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胜利在哪一年？

巴斯克斯：一七八九年。

主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是起义的日子，还是胜利的日子？

巴斯克斯：是起义的日子。

主席：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在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侵略者”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

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你们那么喜欢美国资本家吗？

巴斯克斯：我们不喜欢。

主席：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

席尔瓦：它永远做不到，但在经济上可能做到。

主席：我是说在经济上，许多时候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人都不能容忍它，把他推翻。甚至稍微不听他的話的吳庭艳，美国都把他杀掉。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吳庭艳兄弟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沒过几个月，肯尼迪又见上帝去了。不知什么人把他杀掉的。是共产党人还是什么人？美国不说是共产党干的也不说是什么人，这个案子到现在都审不清。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他是侵略者；他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看。在我们周围布滿了美国军事基地。总不是我们占领了美国什么岛屿，而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台湾。你们智利沒有侵略我们，我们也沒有侵略智利，我们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我们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众笑）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现在沒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等于从地球上不能把你们搬走一样。他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它要搬走也不行，比如阿尔巴利亚。

主席：你们智利有多少人口？

席尔瓦：有七百万，相当于北京的人口。

主席：北京城市人口只有四百多万，你们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有七百多万人口。你们去过上海吗？

巴斯克斯：去过。这次在中国旅行还去了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南京、无锡、杭州。

主席：你们去了不少地方，花了多少时间？

佩雷斯：二十七天。这次旅行，非常有兴趣，在智利对中国很少了解。这次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等。

主席：还参观了工厂、学校了吗？

佩雷斯：是，除了工厂、学校，还参观了人民公社、矿山、石油、钢铁、汽车制造等工厂和上海工业展览馆。

主席：中国的工业建设在我们说来才刚刚开始，和我们的人口比较起来，还很不相称。因此外国人说：中国是很落后的，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也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功夫，你们国家的工业是不是比我们先进一些？

席尔瓦：也不。我们的工业发展根据人口看，还可以。我们有紡织工业、冶金工业，但比起鞍钢来还差得多。

主席：应该按人口比，我们虽然有鞍钢，但按人口比还很不相称。

席尔瓦：不管怎样，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主席：有点成就，不算很大，有一点。

席尔瓦：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主席所说的相反。我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干劲十足，抱着牺牲的精神，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主席：这一点是真的，中国人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你看我们的警察很少，只有不多的交通警。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持交通。

巴斯克斯：这一点已深深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主席：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军队和武装警察，就会发生抢劫、偷盗。现在北京抢劫现象没有了，偷盗还有一点，也不多了。

席尔瓦：在这样有七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觉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主席：人民自己来批评那些小偷行为，靠人民自己维持秩序。

巴斯克斯：我们看到在街上，在学校，少先队员维持秩序，使我们深受感动。

主席：解放初期北京还有些车祸，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车祸了，汽车压死人的事可以说很少了。

佩雷斯：实在是这样。

主席：的确比初解放几年起了变化，我们训练司机避免车祸，也教育行人不要乱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我们把它叫做整风。要做到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这少数人教育过来，总相信多数人是好的。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做坏事的总是少数，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以改变。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

巴斯克斯：过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现在他解放了。

主席：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得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美国人说我们“洗脑筋”。脑筋怎么洗法，我还不知道。我的脑筋就是洗过的。我以前信过孔夫子、康德那一套，后来不相信了，信了马克思主义啦！这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帮了我的忙，是他们给我洗的。他们是用枪屠杀了中国人民。譬如日本在中国就不知杀了多少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来美国和蒋介石又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对我们的战争。他们都是些给人洗脑筋的人，使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从而起了变化。你们说是谁把卡特罗的脑筋给洗了？（众笑）

席尔瓦：关于洗脑筋这一点，我要亲自问主席说：你们不仅只洗掉我们脑筋里美国的谎言，也使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

主席：你们过去大概对中国不太清楚吧？看一看就清楚了。你们每五年来一次，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

席尔瓦：主席，你作为马列主义的最高领袖，可以感到非烈满意和高兴。因为有这样的国家全国人民守纪律，努力工作，在中国全力进行建设。在这十五年中已清除了在几个世纪里遭受的贫困、压迫和掠夺，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相信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主席：不能估计太高，我对我们的工作不那么太满意，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么多人口，还不相称，这是事实。我们仅只说比国民党

蒋介石统治时期进了一步。还有一件事实，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眞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把我们打倒，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要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的，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那么好感。但是为什么除了美国，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不做，想派新闻记者来，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沒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能来中国，美国记者来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过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不够，就再加。

席尔瓦：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空接见我们，我们能听到主席亲口和我们谈話，我们将把这些話带回去，作为对我国人民的问候。

主席：问候你们国家的人民，问候愿意跟中国交朋友的一切人。

席尔瓦：我们有许多人愿意跟中国交朋友。

主席：我相信这点，你们就是证明。

席尔瓦：我们在智利也接待过三个中国去访问的记者代表团。

主席：中国有记者到过智利吗？

席尔瓦：在座的常××先生就参加了中国访问智利的第一个记者代表团。

主席：他（指常××）所在的报纸《大公报》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过去为满清皇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

巴斯克斯：我所在的报纸，也是一九〇二年创办，和《大公报》同年创办，但是现在还沒有为人民服务。

主席：将来可以为人民服务，《大公报》的社长王云生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过去很多这样的人，差不多全部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等等，许多人都是国民党的，但都沒有走，我们不跟这些人合作就沒有教员，就不能办报纸，也沒有唱戏的艺术家，沒有画画的美术家。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其中有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团结在一起。

巴斯克斯：这些都是中国人。

主席：对！但有些中国人就不那么和气，比如蒋介石，他也是中国人。（众笑）那么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都为人民服务。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敌人就不高兴。就谈到这里为止吧！

席尔瓦：今天能见到主席，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因为到了中国沒见到主席，那就等于沒有到中国。

主席：你们要见我，我就见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接見外宾关于保健工作的一段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話。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請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沒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話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完全听医生的話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沒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門医生变成不专門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王海蓉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修科学生）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爭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都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主席：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蔣万岁。

主席：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蔣。

主席：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告诉我的。

主席：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貼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主席：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蔣介石为什么好？蔣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蔣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主席：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蔣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

子弟，烈属子弟等。

主席：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主席：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主席：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主席：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主席：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沒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沒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話，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驕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有一次談到了学习問題）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沒有？

王：读过。

主席：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話："賈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馬（賈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請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綱。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沒有？

王：沒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沒有这首诗。

主席：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我閱读）。

王：读这首诗要意注什么问題？要先打点予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主席：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予防针囉？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鉆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主席：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沒有

主席：《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

王：不知道。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主席：你翻翻看，有沒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沒这个字，只有"知识"这个词，沒有"知识分子"。

主席：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给主席）只有"知识"沒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字典"沒有用，很多字都沒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沒时间又沒人，怎么编呢：

主席：你们学校那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这个字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有一次主席接見外宾之后与王海蓉的談話）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主席：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主席：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做什么？

主席：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做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有一次主席讓海蓉讀文天祥的詩）

主席：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主席：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龙）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沒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沒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完全靠自己。

对全国文联和所屬各协会整风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緣。如不认眞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暢游十三陵水庫时对青年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

毛主席问大家："在七级大风里，你们游过吗？"

“一人高的浪，你们游过吗？”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爭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鍛炼。”
“这很好，部队要学会游泳。”
“会休息，才会持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两条腿。”
“有许多地方通不过去，看起来只有两只脚有用。”

在小型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瑣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斗爭。

不能纠纏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沒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也好，罗××也好，开始就是內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內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

（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毛主席说：越学越蠢！黃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話。打了几次就会打了。

第二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沒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沒有人看，不要搞繁瑣哲学。

在中央工作会議小型会議上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

向来讲話不要鼓掌，要允许人们打瞌睡，养神。我过去读书就看小说，老师一查，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先生不对，不如看小说。后来就发明可以打瞌睡。你不要讲我这个人沒有创造，还是有一些。这样一来，就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話式的人。有了讲义就不要再讲了。

关于部队开展游泳活动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付武装泅渡。每团先搞一个营，每师先搞一个团，然后做到全会。

对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报导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

主席看了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二版关于一渡河党支部培养青年干部的报导，当日作如下指示：

×××同志，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导。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訊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　泽　东

七月四日

接見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主席： 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较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象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沒有好处，对我们也沒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話：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沒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那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港，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艦队是美国最大的艦队，它有十二只航空母艦，第七艦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艦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門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艦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話。

主席：好。

佐佐木：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話。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跃进，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主席：谢谢！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話。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沒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沒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場活跃）

佐佐木：谢谢。

主席：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請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有一千一百多人（指战犯——编者）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主席：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話沒讲完，請再讲。

佐佐木：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爭。

主席：说得好！

佐佐木：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赵安博先生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題，就围绕日中问題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題，交換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主席：这个好！

佐佐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主席：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滿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的确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

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沒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在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話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嗎？

佐佐木：（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話吧！

黑田：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勿宁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主席：好！

黑田：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主席：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田：保守党內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內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爭，那些沒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爭，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爭。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沒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沒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主席：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場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沒有印度人。

（会場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那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沒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沒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沒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請罗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作这个工作的，要停止公开爭论。听说现在罗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

（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 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象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沒有办法象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戶坐中国的“燎原”号貨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主席： 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迫： 是的。象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眞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主席： 多大年纪了？

细迫： 六十七岁。

主席： 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一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爭，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沒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

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主席：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自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自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帐。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者进行斗争。

主席：你们有多少人？

曾我：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話：包括我在內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請讲讲。

主席：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沒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沒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脫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

二七年北伐，只晓得要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佐木：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話，谢谢。

主席：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迫：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話。上次我随鈴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諺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

听了主席的谈話，我想，不读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主席：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沒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沒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沒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沒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沒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教訓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必须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辯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爭，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內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爭，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結合。劳动人民要知

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地、激烈地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門机关相結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眞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門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汪东兴同志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

鳥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弄花。

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里摆花，白天好象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害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撤了，以后又让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滿好嗎？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要減掉，只需少数人管理庭园。今后庭院要多种树，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区中的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这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

要突出武装斗爭，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关于部队学习游泳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吸血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鯊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对卫生部党組关于高級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

“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关于哲学問題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阶级斗爭才有哲学（脫离实际谈认识论沒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爭。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爭，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爭。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爭，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爭。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蔣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爭，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馬、牛、羊、鷄、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爭，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內。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爱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鳥》，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

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沒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鍛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爭，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沒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沒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戶，“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爭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綱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綱——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象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話，说他

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沒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綱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沒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沒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沒有解散，我们沒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沒有听，长征把电話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糾正“左”的都沒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賭場，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沒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請他吃一頓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話，了解到农村阶级斗爭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請他吃頓饭，三可以贏几个錢。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滿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錢，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沒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紛紛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戶，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紳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沒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爭。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馬克思主义？听都沒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侖　华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

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沒有植物，沒有水，沒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沒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爭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鷹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話，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鷹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沒讲过几句話。我曾找艾思奇谈話，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綜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沒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沒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脫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鍵就是脫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脫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罵了他一頓，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罵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沒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沒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沒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綱。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断葫蘆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請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爭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爭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

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沒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吳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綜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綜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綜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綜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綜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复沒，这就綜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綜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綜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沒有打仗，全部繳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沒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沒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烏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規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隸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沒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

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沒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沒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沒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沒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話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沒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象蒼蝇一样多，闖来闖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沒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門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鉛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沒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眞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訊》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沒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話。

哲学界的缺点是沒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

究，是湯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沒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沒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同李雪峯等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

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沒有搞过嘛！我沒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的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南昌有一个研究科学的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理解，但变石头则不可能。例如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造的大理石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什么叫大理石？是石灰石，是碳氧化鈣。几千年来，老百姓知道，把石灰石一烧，一氧化碳挥发了，剩下生石灰，放在水里会发热，变成氢氧化鈣。认识这个化学过程，人就可以造石灰，精神就可以变石头。所以，化学这門学问是一門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可以造各种肥料嘛！电石也是一种石头，即碳化鈣。通过电产生高溫，使碳和鈣结合起来，就成了电石。

× × ×

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沒有那回事。馬克思知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不用说了。单是社会科学有几百門，你能全知？戏有几百种，你能都懂？河北的戏有七十种，你们都熟悉吗？有的看也沒看过。评剧、梆子、老调，《追鱼》男角是女的演的。內蒙的戏我沒看过，山西的在晋西北看过《打金枝》，女的唱老生。

全知也不合理。全知等于不知，一样都不精嘛！自然科学有几百門，怎么学得了？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社会科学就分很多門类，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分好多門，政法又是公安、法院、检察；公安又分侦察、审訊、民警、消防，一个公安部长都学得会？！我看部长沒有学过消防。社会科学，又分上层建筑，又有经济基础，又有生产力。上层建筑有党、军队、政府，又有教育、文化、报纸，又有唱戏、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电影，可多啦。唱一出戏，有旦角、老生、花脸、小生、丑，丑又分男丑、女丑、文丑，旦又有老旦，你去学，学得了那样多？

接見出席第十屆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訪华外宾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主席： 欢迎各位朋友。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国家访问。这是头一次见到你们，但是我们的思想有共同点。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同老的殖民主义。你们认为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內，是沒有原子弹、氢弹的。这里有法国朋友么？（法国人示意有）有英国朋友么？（无人答）喔，沒有。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你们是反对发动原子战爭的，是不是这样的？（法国人带头鼓掌）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这是我们做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美国有这么多原子弹，也只使用过两次，就是在长崎和广岛。这里有日本朋友么？（西园寺点头）他们的国家是受害的。美国在日本丢了两个原子弹，但是因此使美国的名声不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美国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反对那些在越南南方的外国军队干涉别人內政，打“特种战爭”。法国政府说，法国政府过去在越南打仗是打败了的，你们美国又在打，照法国人看来，美国人也要打败的。因此法国反对用战爭办法解决越南问題、老挝问題，主张和平谈判。

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資格来讲話，日本也取得了一定的資格来讲話。第二次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爭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原子战爭。在座大多数代表的国家同我们一样，是沒有原子弹的，我们跟法国有外交关系，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不但跟在座的法国朋友在共同点，跟戴高乐也有。（大家笑）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在座的各位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人口，你们的理想是要胜利的。当然我讲的还未成事实，是不是会胜利，要靠斗爭。但是我可以讲讲我自己的经验。我是一个当小学教员的，读了很多孔夫子的书，他的道理是封建主义的。后来就读資本主义的理论，熟悉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大革命，华盛頓领导的大革命，民主革命的思想，也读过法国康德的二元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更不知道。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使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去搞政治了。依我看来，还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国內反动派压迫人民，因此，使我们这些人一下子就跑到共产党一边去了。孔夫子的道理也不信了，資产阶级的思想也不信了，相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搞起了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织组了工会，后来又织组了农民运动组织。那时，我们跟国民党合作，我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工作。那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世，我听过他演讲，跟他谈过話。孙中山夫人现在还在上海，她是我们国家的副主席，她不是共产党。这里有一位廖承志，他

是个共产党员，（转向廖问）你是搞什么工作？哦，和委会副主席。他（指廖）的父亲是国民党，是中央委员，国民党的左派，被右派暗杀了。他很早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了。（问廖）你父亲是那年死的？

廖：一九二五年。

主席：（让大家抽烟），他的母亲在北京工作。

（问廖）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廖：八十七岁。

主席：她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是一位艺术家，能画画。我这是讲怎样使我参加到共产党当中来。我没有准备打仗，更不知道原子弹，也没有无线电。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呢？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一九二七年我们有五万党员，蒋介石背叛革命，搞白色恐怖，到处杀人，这五万党员中有一批被杀牺牲了，另一批投降了蒋介石，第三批没有被杀，也没有投降，不干了，五万人只剩下几千人，这几千人就打游击，以后打了十年。那时候我们不懂打仗，谁教我们的呢？还不是蒋介石！我们也没有枪。谁给我们枪呢？还不是蒋介石！蒋介石也没有多少枪炮，是背后的帝国主义给他枪炮，主要是英国和美国。这样我们就有了枪炮，一打就打了十年，军队到了三十万人。我们叫作工农红军。这十年中间，我们犯过错误，后来我们打败了，国民党打胜了，我们就走路，一走就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相当于地球的直径，由南方走到北方。这不能怪蒋介石，只能怪自己犯了错误。军队由三十万剩下两万五千人，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个时候，腿走那么远也是难受的。（大家笑）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也没有茶，也没有水果吃，仅仅每人每天三錢油、三錢盐、一升米。可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候比过去更弱了，相反，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得到了教训，以后就是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打了八年，又跟蒋介石合作，不打仗了，一齐跟日本人打了。我们的军队打了八年以后，由两万五千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万。以后日本投降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日本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也对胜利作了贡献。日本军队走了，美国人来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就打内战，打了四年。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说不打仗了，他跑了，（大家笑）他就到台湾去了。我跟你们讲了历史的变化。讲了多久？（看表）讲的太长了吧？（外宾中有人说："很好"。）就是讲，世界在起变化。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你们是失败主义者吗？（外宾中许多人答："不是。"）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大家鼓掌）我要讲的就是这么一点，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问大家）你们有什么話要讲？

孟德斯（巴拿馬）：不知道能不能提几个问题。你对修正主义有什么具体的意见？修正主义目前提的问题你看有什么出路？前景是什么？

主席：我看修正主义没什么出路。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象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这里有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朋友，你们国家的共产党就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党，我们跟他们谈不来，我们反而跟本貝拉谈得来。（鼓掌）反而跟戴高乐总统谈得

来，我们跟戴高乐不是一切都谈得来，是在反美这一点点谈得来。（鼓掌）还有什么问题，想一想？

易卜拉欣（约旦）：我们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很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是个问题。我们很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党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听到毛主席的意见。

主席：就是站在你们那一边嘛。（鼓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应该回到家乡去。我们和以色列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外交关系，你们是大多数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是反对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嘛！我们不赞成你们就是犯错误，所以我们采取了赞成你们。问题他们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的问题。（问外宾）还有问题没有？

琼斯夫人（特兰尼达）：在美国所有的黑人，非洲血统的人都非常感谢主席支持黑人的声明，针对美国当前形势更加尖锐化，美国更失去其世界地位的情况，請就此声明再说几句話。

主席：黑人是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但是人数也不少，有两千万人。他们反歧视、反压迫的斗爭正在发展，总有一天要胜利。美国无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觉醒。就是要大多数白人无产者、半无产者、进步人士和黑人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一个国家里面要分阶级的。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跟蒋介石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都是黄种人，中国人，都讲中国話，写中国字。有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就应当同蒋介石团结，而不是同你们团结。在座的这里有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但是在反帝，特别是反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在今天同你们见面以前我一个也不认识。沒见过的人可多哩！难道都见过么？我们国家七亿人口，我就沒都见过。（问法国外宾）你们法国几千万人，你们也沒有都见过，难道几千万人你们都见过么？（大家笑）不可能的。（问大家）还有问题吗？

恩朗（喀麦隆）：毛主席知道我们非洲人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独立的斗爭。我们一向很滿意中国领导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爭。今天希望毛主席对非洲局势，特别是刚果局势讲几句。

主席：非洲的局势是很好的局势，对人民有利的局势。在非洲有蓬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这使修正主义不高兴，帝国主义更不高兴。刚果应该是刚果人民的刚果，应该是卢蒙巴那样的人的刚果。卢蒙巴身体死了，他的思想沒有死。我们支持刚果人民的斗爭，不是偷偷摸摸地支持，是公开支持，公开支持他们的斗爭。我们报纸上公开登载双方的情况，就是讲压迫他们的一面和反抗压迫的一面都提，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被压迫的人民一面的，就是说，我们是有偏向的，有人看来这是不公正的，你们为什么不两方面都相好呢？对帝国主义走狗也相好，对卢蒙巴、对正在斗爭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相好！我们不干，我们只跟一方面好。要说我们有偏向，我们就是有偏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偏在大多数阿拉伯人民一边，在东京大会上，我们偏在你们一边。东京大会我沒去，他（指刘宁一）去了。他叫刘宁一，他就是个有偏心的人。（大家笑）他不是两个会都参加，只参加了一个。（大家笑，热烈鼓掌）我看你们也有偏心的，只参加了一个会，不参加另一个。（大家又笑）因此我们大家团结起来。（问外

宾）差不多了吧？

瓦达达（乌干达）：现在南非人民受压迫，南非统治者武装到牙齿，受美帝国主义支持。非洲各国领导人是反对南非统治者的，可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团结，依主席看来，南非非洲人取得胜利的前景如何？

主席：要很快胜利可能有困难。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爭。因为南非与别的地方形势不同，甚至同阿尔及利亚也有所不同。阿尔及利亚人民打了八年仗，他们胜利了，南非可能要更长的斗爭，更曲折，也许要超过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胜利的时间。也许不需要象中国人取得胜利的这么多时间，我们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包括朝鲜战爭三年，就是二十五年，所以我们这些人半輩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无论如何总是要胜利，有全世界人民支持南非人民。南非有一千万非洲人，三百万外国人。三百万外国人中也有一部分同情非洲人。我问过南非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三百万外国人都反对你们？他们说，不是，有一些进步力量帮助他们，甚至有高级知识分子，如律师，帮助他们辩护。我就劝他们要向外国人作工作，不要以为三百万外国人都是不好的。全世界白色人种大多数是好的，顶多有百分之几是不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或者现在已经觉悟，或者现在还不觉醒，将来总会觉醒的。他们是好心的。有人说我们团结有色人种，反对白人，在座有不少白人，你们白人朋友是代表大多数白人的，也并非所有有色人都是好的，蔣介石就不好！（大家笑，鼓掌）（主席作一手势）好，完了吧。

关于坂田文章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席：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辯证唯物主义立場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門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主席：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的道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讲清楚。列宁也沒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但是沒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話说到这一点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沒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沒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沒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譚嗣同都沒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沒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

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話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主席：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鏡，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系和地球，一直到现在还沒有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地球、太阳都是由很热很热的气体冷凝而成的。我们的地球大概还在青年时期，我们的地球已变得愈来愈大。因为每天都有不少东西投到地球上来，如陨石、阳光等。太阳大概已经到中年，现在的太阳已经不那么热了。如果地面上的阳光那么强，有一百度，人怎么受得了？太阳表面溫度有五、六千度，在太阳表面上面还有一层溫度有一、二千度。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这方面的认识就漸漸多起来了。地球上气候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问題，科学家还在爭论。李四光是主张每隔百万年左右有一个冰川时期。到那时候，生物界又会起一个很大的变化。古时候的恐龙就经受不了冰川时期的寒冷而灭绝了。人是产生在最近两次冰川之间的，以后来到冰川时期，对人说来是一个问題，人要准备对付下一个冰川的来临。

×××：主席方才说到望远鏡，使我想起一个问題，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鏡、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主席：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些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鏟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鏟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器官的延长。鏟头就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鏡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也有灵长类，但是猴子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就沒有概念。

×××：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对不对？

主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阶级，那时他对资本主义沒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候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主席：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溫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那时候水就会爆炸成氢和氧。《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傅鷹讲要几千万年。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鷹讨论过沒有？有了水，生物才从水里产生出来。人就是从鱼变的，人胎有一个发展阶段就象鱼。

主席：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它是产生出来的。人要有死，张三是人，张三要死。他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为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徒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更高阶段。我说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象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話对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主席：事物是在运动中，关于地球绕着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在哥白尼时代，欧洲只有三个人相信，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沒有。不过宋朝有个辛弃

疾，他写了一首诗里面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他照亮着别的地方*。晉朝的张华（号张茂先）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收在《古诗源》里。

主席：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世界上沒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在煤燃烧时运动形态是什么？

×××：是化合物中原子外层电子改变运动轨道时放出来的能。

主席：这种形态转化为使水蒸汽体积膨胀的运动。

×××：这是分子运动而产生功能。

主席：然而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在铜线、鉛线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頓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沒有牛頓力学到有牛頓力学，以后又从牛頓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辯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門。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义。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頓。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沒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岗山。在井岗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蔣委员长给我们上課；也要谢谢党內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馬克思主义也沒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的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主席：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政策。路线、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四清”、“五反”这个政策产生出来，还要谢谢广东的一个反革命，他写信给××和××，要我交出政权、军队。

科学家要同群众联盟，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更新，我们身体的皮肤上的细胞早就不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的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道換了多少次。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

主席：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

---

* 木兰花慢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賦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向体賦。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是天外，在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誰系，姮娥不嫁誰留？

个儿子，好象是第九、十个儿子，一个改姓猪，一个改姓狗。

主席：分解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谈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的基础上面的。

细胞的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細胞有細胞核，細胞质和細胞膜。細胞是有结构的，在細胞以前一定有非細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細胞变为細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沒有结果。

×××：我国在罗馬举行的国际外科会议上报告了断手再植后，美国人说他们摸不清中国科学技术的底，有点害怕我们。

主席：有点怕，是好事，不怕倒不好了。我们有点怕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有点怕我们，说明我们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是有力量的敌人。在科学技术上应该注意保密。不让他们把我们的底摸去。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

主席：这半年有沒有进步？有沒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沒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沒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爭，搞革命。

主席：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沒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爭，阶级斗爭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黑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爭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沒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沒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

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課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題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課、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沒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沒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

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

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沒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

远新：有四年沒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沒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覚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題。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絲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贊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話，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課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沒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爭是你们的一門主課，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爭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

给你安排这一課，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沒感覚？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沒有？敌人连饭吃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賠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沒有经验，好象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爭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試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課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課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爭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沒有眞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眞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沒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鍵是教员。（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覽，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詳细了沒有时间，走馬观花又沒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沒有？我就是不信，你沒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烏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沒有知识了。

接見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主席：欢迎你们。

你们是哪些国家的朋友？（这时外宾起立，分别向主席作自我介绍）

你们是正在念书的，还是讀完了？

日拉尔：已经念完了。（其他外宾答：还正在念书。）

主席：你们有什么问題要问的吗？

喝茶。愿抽烟的抽烟，不抽烟的不抽烟。（全体笑）

谢尔盖·巴里奥：我想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秘鲁的看法，希望我们秘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对我们秘鲁有什么希望。

主席：先要问你，你有什么意见。（主席笑）你们国家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谢尔盖·巴里奥：毛泽东同志讲对我们国家的情况了解得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离你们的国家很远，而且我们的政府禁止人民到中国来，所以到中国来的秘鲁的人是很少的。不管怎样，我们国家在拉丁美洲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并且在将来，毛泽东同志很快可以听到，它能够在拉丁美洲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声音。

主席：什么很重要的声音？

巴里奥：革命的声音。

主席：革什么样的命？

巴里奥：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反对压迫阶级的，反对压迫民族的革命。

主席：一切资产阶级都反对吗？你们国家有沒有民族资产阶级？有沒有爱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啊？

巴里奥：在我们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很弱的，大部分是跟帝国主义的利益，跟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紧密联系的。因此，它们和革命的利益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主席：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是比较少的，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你赞成不赞成啊？因为压迫人的人在世界上总是少数，一百个人中间只有几个，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題，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題。在欧洲、北美大体上也是这样。譬如在美国，譬如在英国，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美国那些大工会的领导人，他们是帮助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有很大一部分现在还不覚悟，但是将来他们会覚悟的。所以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同它在各国的走狗，其他的人，我们不反对。我们并不反

对整个美国人嘛。他（指谢尔盖·巴里奥）又不赞成了。

还有什么问题？

阿里烏：我们是黑非留法学联、西非学生总会的代表，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主席讲几句話，并且通过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想請毛泽东主席知道非洲的情况，并且就您知道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些答复，正象刚才毛泽东主席给秘鲁的朋友的答复一样。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地理上，非洲和中国是离得很远的，但是我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多年的斗爭把我们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我们在中国虽然只呆了几个星期，但是我们看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热情地进行建设，中国的人民群众也在参加建设工作。非洲曾经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譬如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已经给了这些国家许多独立，但是人民并沒有眞正地参加建设工作。我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对非洲国家的一贯支持。我们非洲的学生正在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正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斗爭，我们才同中国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关系，正因为这个斗爭今天才使我们来到中国。通过这次座谈能够使毛泽东同志了解非洲的情况，同时希望毛泽东同志对非洲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主席：还有非洲朋友要问吗？

艾克洛：我认为，我们非洲现在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这是一个现实问題——毛泽东主席是不是能够同意——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国家的问題，这个国家过去曾经是我们很好的同盟者，现在是修正主义。过去我曾经有机会在法国念书，现在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捷克念书，在那里，我每天都看到修正主义直接的影响。我们在捷克已经念了三年书，但是在这三年內，他们要求我们不要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譬如在一些会议上，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让大家跳舞，不帮助提高我们的政治覚悟，就是应该怎样武装起来，爭取我们的自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委內瑞拉的同学过去每年都组织一些讨论委內瑞拉国內斗爭情况的会议，自从去年以来，委內瑞拉和捷克建立了商务关系以后，就禁止再组织这样的会议了。他们对委內瑞拉的朋友说：你们在这里可以读书，回国以后不要再参加解放斗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喀麦隆人民联盟的留学生，自从捷克和阿希乔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在那里的喀麦隆的留学生就不能再举行任何集会了。不论在布拉格，在莫斯科，都是一样。去年我曾被邀請去参加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一次支部大会，他们的负责人曾同当局协商，但是并沒有得到结果，后来这个集会只是在学生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当然，现在非洲在国外的留学生，有些还沒有覚悟。他们仍然认为，不谈政治，不谈反帝，是一件好事。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同捷克和平委员会的一个人谈話。他说，现在已经爭取了一切行动，来反对黑非留学生联合会，但是我们认为，黑非留法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先进组织，捷克当局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話呢？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非洲正面临着一种修正主义的危险。现在的问題是不是要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題，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参加这个斗爭的问題，而他们有些人却把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爭论说成是北京和莫斯科之爭。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和莫斯科之爭，而是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題，是不

是要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不是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争吵，不是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争吵，而是世界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正象秘鲁的同志已经讲过的一样，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问题，也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非洲已经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现在是不是要同帝国主义合作、同帝国主义共处的问题。

主席： 帝国主义是压迫各国人民的一些集团，各国被压迫人民怎么能够跟它们和平共处呢？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老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各国走狗的问题。不管那些人如何，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无所谓革命，就无所谓革命的胜利。不谈政治，单跳舞，是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众笑）修正主义要你们服从他们跟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它也要我们服从，它要全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都服从，我们是不服从的。我们也不服从帝国主义，也不服从新、老殖民主义，也不服从修正主义。也不服从它们各国的走狗。譬如在中国就有那么一个走狗，顶著名的人物是蒋介石，我们能够跟蒋介石合作吗？蒋介石现在在大陆上有他自己的朋友，就是地主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残余，同这些人不能合作，要教育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如果他们要造反，譬如破坏，烧房子，破坏牲畜，搞投机倒把，杀人，暗杀革命者，我们必须进行鎮压。我们的方针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明了，沒有什么吞吞吐吐。无论见效的，沒有见效的，只要他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

你们知道，譬如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古巴的革命、越南南方的革命，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刚果（利）的武装斗争，我们也是公开支持的，冲伯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跟他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站在刚果（利）人民的一边。譬如加纳，我们支持加纳人民的斗争。帝国主义者两次暗杀他们的总统，我们是反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暗杀行为的。

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不仅你们秘鲁，你（指谢尔盖·巴里奥）不是问我秘鲁的前途怎么样吗？秘鲁的前途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前途一样，是要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同它的走狗。我说的是大的、忠实的走狗，而不是跟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那些人。这样，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会扩大一些。

还有问题吗？

埃內斯加： 我们在这里代表拉丁美洲革命组织的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內瑞拉的代表首先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感谢您接见了我们，并且通过您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走狗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 谢谢。

埃內斯加： 我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努力也表示敬意。同时，我们代表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內瑞拉的革命组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国家的解放斗争所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解放斗争也给予了同样的支援。我们深信，中国一定会站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解放斗爭一边的。

我们同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中应该团结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民。我们革命运动组织的总路线，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

在我们国内要建立这样一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有困难的。古巴革命给我们各国人民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榜样。古巴的人民使我们拉丁美洲广大人民认识到，他们可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也使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懂得，这些革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的，现在这些革命运动已经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因此，这些资产阶级就要选择，要不就投靠工人、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要不就跟帝国主义一块去平分利润。

我们相信，最后由于工人和农民强大的联盟，这些资产阶级将不再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而投到民族解放斗爭中去，同时，这也包括一些中间的阶层，主要是指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多一点，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少一点。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将属于我们各国人民。

主席：讲得对，我赞成，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这已有许多证据。譬如古巴不是胜利了吗？当然还沒有最后胜利，中国不是胜利了吗？也沒有最后胜利，最后胜利要全世界帝国主义倒下去了，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翻身了。

我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我们的台湾还沒有解放。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况就算最后胜利了吗？沒有。这是几十年的事情。美国帝国主义不打倒，这些军事基地不撤走，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馬来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的垄断资本或者是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

拉丁美洲、非洲和整个亚洲，还有欧洲、北美、大洋洲如果不解放，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解放了，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算是暫时地解放了，譬如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北越、北朝鲜。但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敌人。所以我们跟你们要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共同的敌人作斗爭。

在座的各国朋友的思想也一致嘛？

×××：不一致。有馬列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

主席：不完全一致不要紧，有些相信馬克思主义的人，有些现在还不相信，甚至有些人信宗教，但是，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现在帝国主义的头子是谁呢？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在非洲说来，法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是有影响的。在拉丁美洲，美国的影响是主要的，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可以团结起来。

修正主义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还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那我们也不赞成，要批评他们。现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仍在欺骗人民，因此我们要做批评工作。刚才那位朋友（指艾克洛）讲得好，他就做了批评工作。

你（指艾克洛）是那个国家的？

艾克洛：是多哥的。

主席：多哥在哪里？

王××：在西非。

主席：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

主席：你们国家独立了沒有？

艾克格：名义上独立了，现在所谓的独立，就是有一个国歌，有一个国旗。

主席：你们认识了这一点。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独立有区别嘛！

要做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人、农民结合，不对工人，农民做工作，团结工人、农民，而是脱离工人、农民，那就不好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它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它可以替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替那个阶级服务。譬如我们中国的北京有一个北京大学，你们去看了沒有？

×××：沒有去，因为放假了。

科西·加普逊：访问过人民大学。

×××：在上海看了什么大学？（答：沒有看。）

日拉尔：在西安看了交通大学。

主席：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有些亲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亲美帝国主义，有些亲法国帝国主义，有些亲德国的，有些亲英国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现在有些人已经进步了，赞成馬克思主义了，有些人还处于中间状态，是中间派，此外有少数人思想很右，他们的脑筋还是旧的，大概占百分之几的人数，他们赞成修正主义，不那么公开讲就是了。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蒋介石再回来。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但是不妨碍大局，因为左派和中间派联合起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有一部分还是右派呢？外国人说我们“洗脑筋”，为什么这些人的脑筋还沒有洗好呢？（众笑）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众笑）只能劝说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自己逐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他们同工人、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沒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沒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就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状况。这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做调查研究，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赶也赶不下去。（众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了并不等于眞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付老爷架子，农民看不惯，摆一付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的。而不是伤害他的。同农民说話，绝不能摆起一付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样的

話，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最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农民的知识多。因为我们讀的书，无论你讀的是什么书，讀的是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书也好，或者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样革命，只有馬克思主义的书教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讀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讀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我借这个机会讲一点我的经验，也许你们不赞成，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们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些話。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有四百万工人，有几万万农民。剝削者和压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那一边呢？是站在少数剝削者方面，还是站在几万万农民同几百万工人方面呢？这个问題在开头我是沒有搞清楚的，因为我讀的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讀了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馬克思主义了，世界观就改变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了唯物主义者，逐步地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就是辯证唯物主义者和辯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讲多了，到时间了。

科西·加普逊：我的讲話我相信所有的同志都会赞同的，就是我们感到今天能够同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会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話，都很受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到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对整个世界局势作出结论，斗爭应该如何办，提供了许多建议，对这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也很感动。毛泽东同志还给我们说，不管我们讀多少革命的书籍，谈多少革命的話，如果我们不深入到农村中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成为眞正的革命者。同时，我们感到毛泽东同志对非洲的事物是非常关心的。我们感到中国一贯是帮助非洲人民进行革命，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我们可以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我们将高举革命的旗帜，一直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后摆脫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为止。谢谢主席。

主席：就谈到这里吧！还有什么问題？

外宾：希望毛泽东主席在《毛主席诗词》上签上您的名字。

主席：可以。

（外宾請主席签字。最后外宾同主席握手告别。）

接見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主席：欢迎你们。

潘廸：能够同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会见，我们教育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感到非常高兴和十分荣幸。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快乐。

主席：谢谢。我沒有什么伟大，跟你们差不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还差一些。

潘廸：我们都把您看作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

主席：可能你们看得不对。你们的国王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人。

潘廸：馬享德拉国王的确是我国最伟大的领袖，在他执政期间，我们的国家很好地向前迈进了。

主席：你们的国家有进步，有发展。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以及某些人强加给你们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讀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馬、牛、羊、鷄、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米，菽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讀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众笑）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門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沒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经济学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請喝茶。你们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也喝茶？

潘廸：我们也喝茶，但是要加糖和牛奶。

主席：我们不加糖也不加牛奶，沒有这个习惯。

大多数人民喝白水，根本不喝茶。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要喝茶。

潘廸：中、尼这样比较冷的地方需要喝茶，以增加热量。

主席：西藏的人民以吃牛羊肉为主，他们要喝茶。以粮食为主的地方可以不喝茶。同时茶叶也沒有那么多，供应不了。你们国家产茶叶吗？

潘廸：产得很少。最近几十年才有此习惯，现在不仅有錢的人，一般的人也喝茶。

主席：茶叶相当贵，很穷的人是喝不起的。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文化也是落后的。（问×××部长）普及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城市基本上普及了，农村还不行，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的一般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几。

主席：比解放前的情况好，城市基本上普及了，但是乡村还沒有。

×××：尼泊尔在馬享德拉国王执政以后，文化数育有很大的发展。克伊腊克先生是一位诗人，老教育家。

克伊腊克：我对教育工作很有兴趣。我从事教育工作有五十多年，我的兴趣就是扫除文盲。

主席：这很好。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鬧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爭。然后蔣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又

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門学问我沒有学过，也沒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沒准备去打。谁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到外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沒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沒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笑声）

（×××向主席介绍代表团几位团员的身分。）

主席：你们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诚欢迎的。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

潘廸：我们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们感到象在亲人家里一样。

主席：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国的缺点，小国有小国的长处。你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沒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沒有能够征服你们，可是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让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外国人的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凯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然后，就是北洋军阀专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们之间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们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人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放。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们却沒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评我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说我们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鲜，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我们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沒有兵了，打仗沒有对象了！（笑声）现在我们撤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人现在好一些了。比较守规矩了。一条所谓麦克馬洪线，中国连袁世凯都沒有承认，他要我们承认，岂不荒唐？我们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线，而且从这条线后退二十公里。

我们同你们两国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很好，很容易讲得通，同缅甸也很容易讲得通，很容易解决。同巴基斯坦也容易讲得通，很容易解决。同阿富汗也签订了边界条约。就是印度这个朋友很难讲得通。

馬拉：为什么？

主席：我也不知道。印度人民是好的，印度政府中有一些坏人。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不怎么好。印度人民对我们，对你们都是好的。

听说印度同你们的关系比较好一些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赞成。

关系老是那么紧张不好。现在印度政府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坏了，首先他们的军队不越过麦克馬洪线了。过去他们越过这条线到这边来，越过了几十公里，把我们向这一边挤，现在比较规矩一点了。这就算好。

你们这个国家要通过外国才能进口和出口，人员往来也要通过外国，所以你们同外国的关系搞好一些是好事。所谓通过外国，就是说通过印度。在关系紧张的时候，

印度就是搗乱，比如机器运到你们国家，他们进行破坏，甚至把一些另件拆掉。现在不知道情况改善了一些沒有？

潘廸：现在稍好了一些。例如，我曾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拔针是坏的，许多人买的拔针也被搞坏了。

主席：所以你们要开一个后門，现在后門还沒有通。

潘廸：中国政府帮助我们修筑的从加德滿都到科达里的公路修通以后，就有一个后門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开辟别的道路。

主席：这可能是有益处的。

巴斯尼亚特代办：团长已经说过，我们正在探索各种通道，除了加德滿都到西藏边界的一条以外，还有一条路，通过巴基斯坦的达卡。

巴特：我们这次来中国就沒经过印度，而是直接经过达卡来的。

主席：等几条路都通了，那时印度可能就比较尊敬你们了。（代表团的团员们頻頻点头）

巴斯尼亚特代办：我曾去过拉薩，这使我相信，从加德滿都到西藏的路修通以后，对中尼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起重大作用。

克伊腊克：中、印是两个大国，而我们是小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们就害怕，你们两国和好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主席：主要问題还不是一条麦克馬洪线的问題，而是西藏问題。因为我们进军西藏，后来又进行了改革，印度政府就不高兴了。因为就是那位麦克馬洪先生，在几十年前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一个协定。所以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是他们的。

克伊腊克：您刚才说中印关系正在改善，这是很好的消息。我们希望中印的爭执问題能够友好解决，那处于二者之间的我们，日子便好过了。

主席：现在不大吵架了，双方对罵的照会也少了。

馬拉：希望最近的将来，中印的边界爭端能够得到双方都滿意的解决。

主席：这是可能的。

馬拉：这是个好消息，令人非常高兴。

主席：两个国家应该和好。

馬拉：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样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以便让我们多少能学到一点。

主席：我已经说过，我沒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題。

我们中国人，比如象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订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沒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以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所以在教育科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这两門科学。

巴特：主席阁下，中国学校，向青少年进行“五爱”的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邻居（原話如此），爱科学，等等，这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我个人一直这样想，只有一个伟大国家才能以这样的精神教育每一个人。

主席：你的意见怎么样？

巴特：刚才我已经说过，我对此印象很深。另一件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的事情是，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校的付校长谈到他们怎样把高等教育同实际结合起来。我国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念了很多书，但是不大了解实际。

主席：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沒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Vammav），读的时候也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話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沒有语法这門课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

克伊腊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

主席：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规戒律太多。

各位还有问题吗？

克伊腊克：要爱一切人，而不要仇恨任何人，这是生活中的一条原则。照此原则行事，日子就会过得很好。中、印好比两条大牛，尼泊尔好比在旁边的一只小牛犢，大牛打架时，小牛犢就怕得要命，担心被粉碎了。中、印和好了，我们就很高兴。小牛犢就能平安无事了。

主席：只能爱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我们爱蒋介石，但是他不爱我们，（笑声）他要吃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半个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我们沒有办法，只好打。

克伊腊克：实行自尊、自学、自制（克制自己）的三条原则，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独立的主权。我们看到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尊、自爱的精神，这是使中国成为伟大国家的

因素。

主席：这个对。

克伊腊克：我个人为了祖国和人民，受过许多痛苦。因此很高兴看到中国发展起来。

主席：你们正在发展，我们看到了也很高兴。

克伊腊克：让我们两国手携手地向前迈进。可是最重要的是和平。你们打了那么多年仗，在时间、金錢和精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要是把这些时间、金錢和精力节省下来，中国的进步会更快一些。

主席：可惜我们的敌人不给我们以时间，請他走他也不走。沒有办法，只好打。英国人自己走了，日本人就是不走，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实在沒有办法才走的。蒋介石也是不想走的。那时北京城我们是不能进来的，只有美国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才能进来。后来他打败了，我们就来了。你们也就来了。（笑声）你们的国家承认我们，但是不承认蒋介石。你们过去同蒋介石建立过外交关系沒有？

巴特：沒有。我们的政府支持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

主席：做得对。蒋介石本身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他却看不起你们，甚至也看不起尼赫鲁，有一段时间，同印度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蒋介石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笑声）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潘廸：好，对于您的接见，請允许再一次表示感谢。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今天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主席：再见。請你们转达我对国王陛下的问候。

关于团結方法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也沒有。我就是犯过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要有绿叶扶持。你××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个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沒有完结。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逐步的学了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爭，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正象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是不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沒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他们最后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辩证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来说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妥协了吗？

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爭，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议同志之间有隔閡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认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沒有分歧，沒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入共产党，就要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房间里头与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谈判(对帝国主义也是要同他们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四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接受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斗爭，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斗爭的目的是坚持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人一条出路，跟他们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同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滿着矛盾。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着矛盾，沒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沒有一个人不可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不可以加以分析时，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滿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二个对立的统一，中子里头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在全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需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是优点，第二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普通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蛇是引出来好打，还是钻黑洞里好打？（对苏斯洛夫报告我们赞成发表，它不发，出了八评后引出来了。）

一九五六年以来，苏联罵斯大林，我们一论、二论发表后，他就失去了主动权。

点名不光我们两家，东欧也点名了。（苏批评罗自力更生，罗回击，用我们评苏联的

話。）不是內部的事，正在电台上干，公开干了。

控制，反控制的冲突，第一位的不是中国，而是东欧国家。（罗已做了同苏断绝经济关系的准备，自己不能制造武器，要求我国去人到罗访问，不讲話都可以使人震惊，去了不讲話，握握手都很重要。）

准备两手，准备破裂，爭取拖。那天出事，不要出于意料之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苏关系）

南昌暴动轰轰烈烈，剩下几个大人，以后发展了三十万人。长征剩下几万人，以后发展起来。山不在高。（巴西老党四万人，成立新党六千人。是四万人可靠，还是六千人可靠？）

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准备出，可能不出。

接見老撾爱国战綫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員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武汉）

主席：欢迎你们啊！你们是今天到的？

宋西·德沙坎布（团长，以下简称宋西）：我们是今天到武汉的。

主席：这里气候很热，习惯吗？

宋西：請让我向主席报告，这里的气候并不热，因为我们是南方人。

請让我们这些子孙向您问候！請问主席身体健康吗？

主席：勉勉强强过得去，眼看就不行了。快要去见馬克思了。（众笑）

你们好，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斗爭是英勇的，你们是在前线，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前线。你们学会了走群众路线，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工人、农民以及爱国人士共同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和群众一样。要跟群众交朋友，首先就要精神一样。然后就是穿衣服要一样，他们穿什么衣服，你也穿什么衣服。吃饭要一样，他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同他们一起劳动。不然，他们要怕你们的。你们是知识分子，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就搞不清。如果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穿衣、吃饭、住房子，劳动就得一样。有一、两个月就熟悉了。你们这样就可以团结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

我不是单讲你们文工团，军队也一样，你们能够做到，帝国主义就不能。反动派尽是剝削群众的，压迫群众的。军队要作战，也要做群众工作。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我们搞了几十年，订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各干各的就不行。你们文工团也有组织纪律吗？也听指挥吗？

××：他们的纪律很好。

主席：沒有纪律，文工团就搞不好嘛！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军队怎么办呢？穿什么？吃什么？不能到工人、农民那里去要哇。除了向敌人要而外，我们政府还要收一点税，收点粮食税，收点商业税。不收一点税就不行。收来后，一部分归军队，一部

分还要归老百姓，老姓百利益。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党，是工人农民的政府，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看你们也是这样。你们是工人农民的文工团，革命的文工团。不是反革命的文工团。你们的党，你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党，革命的军队。让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你们看美国那么大的势力，在印度支那有四、五十万军队，现在美国也为难。在南越有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军民关系好。祝他们胜利，也祝你们胜利！再有十年，十几年就会取得胜利的。

我们搞了几十年，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犯过几次错误。比如右倾错误就犯了两次。"左"倾错误犯了三次。你们好，你们没有犯我们犯过的错误。

宋西： 因为我们吸收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的经验，所以就没有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 犯错误，看犯什么错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损失就大。比如一九二七年犯过大错误，损失很大，五万党员剩不到一万了。要纠正错误，就是拿起枪来打仗，这样我们就有活路了。有了几块根据地，三十万军队，这时候头脑发昏了，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了。开始万里长征到北方。然后三十万军队剩下两万。这个时候就舒服了。为什么舒服了？就是犯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了。我们用说服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也没有丢掉。最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你们到中国来看到一些好的东西。但我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不了解我们的错误，对你们不利。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的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你们从南方来，认为中国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不相信。你们年轻，经验不多，觉得什么都好。一个社会有黑暗一面，有光明一面，当然我们光明面是主要的。我们的军队、政府和党都比较好。现在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万。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所以很难说找不出缺点来。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糊涂？搞了十五年，还没有搞好？就是因为我糊涂，并不高明，并不比你们高明，信不信？不信啊？

宋西： 我很难理解。

主席： 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

过去忙了那方面的事情，就忽略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要来抓一抓。今年文化界可不太平噢。整风不是把他们统统丢掉，改正错误就可以。

少数人不改怎么办？不改也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是少数人。我看一百年也有人不会改的。他不改也不能把他枪毙。我们如何争取？一百人有三十人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了。现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有百分之六十五是中间派，是大多数。我们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也有文工团，文工团也不都是好的。演戏的全国有多少？

×××： 全国约有三千多个剧团。

主席：统通演古的。表演的戏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缺乏反映工农兵的，反帝的。你们看过我们的京戏沒有？

宋西：我们从前看过中国戏。这次到中国来，我们在北京也看过。

主席：是京戏吗？

宋西：我们在北京看的是京剧现代戏。

主席：这是少数，是开始。这方面我不相信样样都好。

宋西：我不容易理解。

主席：事实就是这样。看过旧京戏沒有？

××：沒有看过。

主席：帝王将相搞点看看嘛。就比较嘛，也有一部分绘画、电影、音乐、照象是好的，可惜不多。

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有人做官当老爷，有大老爷，有小老爷。有的支部书记，那是老爷，在一个乡当支部书记象个土皇帝，可厉害呐。特别严重。我们站在大多数农民方面，不站在少数地主、富农方面。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了，还有国民党。你们两位（指宋西和副团长巴巴）年纪大一点，是能够理解的。他们（指主要演员）年纪轻，不容易理解。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嘛，还不少呢！三个指头中就有一个指头。我们现在已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还要搞几十年。把老的改造了，又产生新的出来，有些贪污分子，今天说不贪污了，退了脏，可是明天还照样贪污。

主席：（面向外宾）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南方：老挝、泰国、南越、柬埔寨、印尼、缅甸、馬来亚、日本、南朝鲜……，你们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帮了全世界人民的忙。

你们表演的什么节目？

×××：昨天晚上，×××看了。

××：节目都是战斗性的。

主席：好！

你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以为是小国，小国又怎么样呢？小国同样出英雄。你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叫什么名字？

宋西：艾地。

主席：这个同志，我问过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他是苏門答腊西南一个小岛的人，是个少数民族。你说地方那么小，为什么能当印尼党主席呢？他对我说，你不要看我们的地方小啊，印尼的语言是以它那个地方为标准，那是印尼共产党最活跃的地方。馬克思就是少数民族，他是个犹太人。耶苏也是个犹太人。过去犹太人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中国的孔夫子住在鲁国，也只有几十万人。他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校，大家都不理他，后来到各国去找工作，人家也不理采他。沒有办法，就只好流浪。他是宣传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那时候人人都说他是个圣人。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讲得太远了，离开题目了。

宋西：刚才主席所讲的问题我们很关心。如果不提出这些例子来谈，就不容易理解。因为它关系到执行文艺路线的问题。

主席：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十五年，将来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

請你们回去向你们党中央转达，我们是有希望的。赫鲁晓夫不是好人，但他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认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他不仅帮了中国人的忙，也帮了你们的忙，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忙。

世界上有三种坏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第二种是修正主义；第三种是各国反动派。你们那里反动派还有力量。叫什么呀？叫什么富米·诺薩万、西何·库帕拉西……，富馬看来也是靠不住的，但还要拉他一把。所以苏发努冯同志去巴黎开会是正确的。我认识你们的领导人很少。一个是苏发努冯，一个是凱山。

差不多了吧？你们讲，你们讲。

宋西：首先让我向主席报告，我们见到您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听了您对我们讲的話，将它当作一种教育。

主席：我讲的不是教育，是经验。你们回去不能硬搬中国这一套。

宋西：我们将您的讲話看作对子孙教育一样。

主席：是对同志。

宋西：我讲的話是从內心讲的。今天有机会来见主席是毕生最荣幸的象征。我们很久以来就听到您的名字。想找机会见您。我们覚得您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领袖，也是为反对殖民主义爭取解放斗爭的人民的领袖。

主席：不是领袖，是朋友。

宋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外来的，而修正主义是內部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今天有机会拜访您，感到十分荣幸。也是老挝人民的荣幸。我们正在遵循以苏发努冯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进行斗爭。我们在抗法斗爭中经过八、九年。后来美帝国主义进来了，因此，我们又起来进行反美斗爭。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我们的斗爭是正义的。因此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尤其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主席：讲得好。

宋西：我们今天有机会见到您，也就是由于我们革命人民和革命先烈二十多年斗爭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同志沒有机会来亲自见到主席，但他们为我们见到您创造了条件。我们还很年轻，我们不会辜负先烈们所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在这里宣誓：要做革命的接班人！

主席：对的。

宋西：目前我们的任务很重，因为美帝国主义从各方面来破坏我们。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认为文艺是一条革命路线，是从政治思想上向敌人斗爭，为人民服务的。我将尽最

大的努力从事这项工作。

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拜访了主席，从主席的谈話中获得了很多经验。文艺战线上不进行革命是不行的。因为要通过艺术来进行思想革命工作。旧文艺服务于旧社会。而新文艺则为新社会服务，怎么使旧文艺为新社会服务呢？我看我们在北京看到的京剧现代戏，內容都是革命的。沒有看旧戏，因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艺术。这一点是我们刚学到的。

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新任务，我们为接受这个新任务而感到荣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工作忙，有党务工作，有国家工作，但是还抽出时间来抓文艺工作。过去在老挝有人看不起演戏的，认为演戏的不是好的。

主席：你们自己认为怎么样？

宋西：现在我们有些人还是看不起这种工作，甚至他们的父母也不让自己的子女来演戏。

主席：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宋西：我们这个文工团从建立起来已有三年时间，在党中央和苏发努冯主席领导、关怀和教育下，我们很年轻，也贡献了一点力量。群众赞扬说：我们文工团是一个有民族性、革命性、斗爭性的文工团。

主席：这个好。

宋西：尤其是到中国来表演，受到中国同志热烈欢迎。

主席：那就好。

宋西：在中国我们受到了男女老少热烈地欢迎。从基层干部到国家领导人都支持我们的演出。

主席：你们来多久了？

宋西：我们到中国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前几天还到过沈阳、鞍山，虽然在鞍山只演两个晚上，場子小，票子少，可是有许多观众在戏院外听我们的广播。

主席：好哇。

宋西：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他们一致支持我们。

主席：应该支持。不支持是错误的。不支持的无非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宋西：我们正处在激烈的斗爭中，沒有什么比知心朋友更宝贵，沒有任何东西比朋友的支持更为宝贵。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感想带回老挝去，向老挝人民进行宣传。我们将把在中国学习的经验带回去工作，把您的話带回去，好好向党中央汇报。

××：好吧，是否照个象留作纪念？

主席：好哇。

（合影后，主席請外宾向在北京这次沒有来的团员们问候。当主席送老挝同志们出門口的时候，宋西和其他客人恋恋不舍地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并说：“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接見法国技術展覽会負責人及法国駐华大使的談話(摘錄)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佩耶说，他最近去北京大学访问过。

主席说：这不是一所好大学。

佩耶接着说：我见到了校长、系主任、教授和学生。他们谈到了他们的活动，我认为，他们在研究和公民精神方面是热情洋溢的。

主席说：这是他们告诉你的，但是他们告诉你他们做的和他们实际做的不一定是一样的。这不是一所好大学。

杜阿梅说：我很荣幸在西安访问过一所技术学校，用了两个小时，同学生谈了話，其中有个学生迫切要求入党，他说，入党是不容易的。……在这个学校我看到三个女学生，两个是医生的女儿，就是资产阶级的女儿，但她们思想都社会主义化了，毛主席的著作她们都能背诵出来，我提的问题她们可以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話来回答。

主席說：当然，他们对你说得好。但是不要听了就信。未来将会告诉你这些学生是好是坏，好不好，要看将来。判断他们的将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所学的只能当做资料，同过去上学一样，老师讲的話我们后来都不一定作。文科有语法和修辞这二門，写起文章来，就不照那个写。语法还有点用，修辞学就不一定有用，修是修，用的不多，谁写文章照修辞学写呢？

佩耶：換一点课程，更加活跃一点的。

主席：对，更加活跃的，更加实用的，合乎事实的。

与計划領导小組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

工作方法，这是思想问题。来的计划是一本书。问题是思想从哪里来的，始终沒有搞清楚。计划是从哪里来的？我看是俄国的书本，再加上自己脑筋的“想当然”。我看要上谋中央、下谋群众，还要谋前后左右。

接見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

主席：欢迎你们。

布馬扎（团长）：主席同志，我代表全体团员表示，今天是伟大的日子。因为我们有机会

见到主席。我们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们见面。我在这里向您转达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兄弟敬意和友情，特别感谢你们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建设时期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临来之前，本·贝拉总统委托我转达他给你一封信件（布馬扎把信交给毛主席），并口头转达：阿尔及利亚人民钦佩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在建设自己国家中所表现的胆量和智慧，你们的方针对全世界人民，对所有革命的国家都有指导意义，我们从中国人民那里获得鼓舞。本·贝拉总统还要我口头告诉毛主席，我们能有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样的朋友，感到驕傲，我们感谢你们在解放斗爭中和独立后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同时我代表全体团员感谢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的接待，我们经济代表团的任务是要加强中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你们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一使命，让我们看到许多东西，使我们了解了你们的国家，我们感到非常滿意，这次访问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法国有句成语："凡是结束得好的事情，本身就是好事情"。在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时，我们会见了主席，就表明了这一点。

主席： 感谢你们。感谢整个代表团的朋友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更大。整个非洲人民支持你们，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內）支持你们。你们打了八年仗，牺牲很大，值得各国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在整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各国有很大影响。而且你们正在支持尚未独立的国家。自己国家刚刚解放就支持别国。例如支持刚果，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注意你们的活动，注意你们国家在本·贝拉总统领导下的活动，例如鎮压反革命。反革命不鎮压不得了。不鎮压反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以后还会有反革命的，他们从国內顚复你们的政府，破坏你们的经济，甚至于暗杀你们的领导人。这些人代表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国內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代表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你们就非同那些反革命分子作斗爭不可。说现在是搞建设，还不如说是搞革命，搞社会革命，我们的国家也一样，一方面在建设，一方面在进行社会革命。同你们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有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我们捣乱。你们以为我们把蔣介石赶走，我们的国家就太平了吗？并不是这样。你们看到的是表面，时间很短，沒有深入到社会去调查研究。这是大使的任务，我曾向大使说过，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要做社会调查。不要只看表面。例如我国工厂增加，工人也增加，就混进了国民党的中将、少将、上校、地主、富农、警察、宪兵等。在农村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从这个省跑到那个省的农村，说是难民、是贫雇农，其实是逃亡地主。我们估计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百分之五就是说有三千多万人，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呢？因为他们分散在各地方。如果都集中起来，三千万人就不得了。你们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反对你们的人，也是分散在各地，所以你们可以消灭他们，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注意这件事情，警惕他们就好了，要记住这点。

我们支持你们建立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听说你们正在开始建党。我和大使讲过，建党的原则是建立在百分之几的少数剝削者，还是建立在百分之九十的被剝削者，还是建立在不被剝削也不剝削别人的基础上。听说你们把阿巴斯软禁起来了。是建设阿

巴斯的党，还是建设本·贝拉总统所主张的那样的党？如果大批党员都是阿巴斯那样的人，他们不代表工人、农民，那么将来还得革命，总会有人起来革阿巴斯那样人的命，阿巴斯还算文明一点，他没有拿起枪打，如果拿起枪来打，那就更厉害一些。

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如尽搬外国经验，工厂要越大越好。其实不然，现在我们正在把工厂缩小，化一个工厂为几个小工厂。你们到过沈阳看过什么工厂？

布馬扎：我自己去朝鲜了，我在沈阳看了展览会，看了模型，代表团部分人参观了钢铁厂，机床厂和自行车厂。

主席：鞍山这个工厂太大了，十几万人，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搞，从采矿、炼焦、炼铁、轧钢都是它。我们这条道路是错误的。我劝你们不要抄这条经验。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多，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有些兄弟国家把专家撤走。这一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干。技术、资金从哪里来呢？任何外国不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技术从哪里来？都得靠自己，当然从外国購买一些技术如我们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进口一些技术，但是要付款，不然他们不给。只好把建设拖长一些。要很快建设先进的工业、农业、国防、研究技术是困难的，把时间放长一些就可能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公债，现在不发了，正在还。我们欠苏联的外债，明年就可还清，明年再还一千七百万外债就没有了，至于内债，国内公债到一九六八年就还完。现余很少了，欠了一身债是不好过。这个你们考虑过没有？

布馬扎：考虑过。我们也这样想过，欠债就往往不那么自由。

主席：说話就不那么响亮。还是請工人、农民帮忙，工人和农民会帮助你们的。工人、农民帮助你们打败了帝国主义。过去八年打胜仗，并非外国帮助你们打的胜仗，外国帮助顶多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工人、农民力量很大，他们能帮助你们战胜那么强大的帝国主义，他们会帮你们鎮压反革命，巩固政权。請问如果沒有广大工人、农民帮助你们能不能鎮压反革命？你们有一支很好的军队，这些军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我们也有一支军队，我们的军官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文化的，他们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而国民党的军官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在军官学校学过的，可是哪一个打胜了，哪一个打败了呢？我们同三个敌人打过仗，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和这两个敌人一共打了二十二年。第三个是美帝，在朝鲜打了三年。我们那时三个军的炮还抵不过他们一个师的炮。他们的空军白天黑夜轰炸，使我们运输很困难，可是最后还是我们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国军队打败了，所以美国不喜欢我们，美国说我们坏。从前法国也说我们很坏，就是因为我们支持胡志明打了奠边府。我们也支持你们，你们胜利了，法国人就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不胜利，法国人是不会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支持你们的不是我们，而是阿联，第一个承认你们临时政府的不是我们，也是阿联。谁劝说我们尽快承认你们临时政府呢？我同你们说，是你们的阿拉伯兄弟国家，那时叫埃及。沒有它，有武器也运不去。现在阿联也支持刚果武装斗爭。阿联同你们一道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人才有多少？以色列有一百多万人，不是以色列的问题，而是它背后的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工人和农民帮助了古巴领导人在沒有外援的情况下，

夺取了政权。你们依靠工人、农民不仅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可以，也一定可以把你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内政，外国人的話只是一种参考性质的资料，究竟怎么搞好，由你们自己决定，谁也不能干涉。請问一九五四年的革命是外国人帮助你们决定的，还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呢？那时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我听说你们看到胡志明打败了法国，就考虑到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打败法国呢？你们采取了胡志明的经验。大使不是要去越南吗？

阿大使：我们要先回国，十月一日以后准备去。

主席：总之，只有依靠群众才有可为，脱离群众就很危险。最可靠的是本国的群众。是你们怕法国人还是法国人怕你们？事实已经证明，是法国人怕你们。是你们强大还是法国强大？看起来法国是强大的，它有四千多万人口，当时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有一百万之多，一切重要工业、农业都控制在法国人手里。法国人不但有陆军、还有海军和空军。你们沒有海军，一架飞机也沒有，同我们一样，陆军也不及法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你们打胜了，这个道理很可以想一想。我也经常同外国人举你们的例子，说明依靠群众实际上比强大的帝国主义更强大。你们知道我们亚洲有战争，就是在南越，那里遇到的敌人是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美国怕南越，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打下去还是退出来？谈判还是继续打？是扩大战争还是缩小战争？南越人也只有一千万多一点，可是美国和他所支持的傀儡是不得人心的。不管怎么讲，我看美国总是要失败的。

我感谢本·貝拉总统给我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我还沒有回答，請你回去代我问候他，我收到第二封信很高兴，我还要回他的信。

布馬扎：非常感谢你的讲話，我们非常注意听你刚才的話，我要再次讲，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不论是国内或国际问题，中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你提到的许多点，我很滿意的说，由于一些提法是你这样有经验的领导人讲的，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立場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从革命角度来说是年青的，从经验上来讲，与中国革命的经验比较，我们的革命是处于初级阶段，刚才你提到，胡主席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应该说他的胜利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并证明了农民和劳动者所说的一句話：不一定需要象殖民主义者那么多的武器也可以打败帝国主义。那时在阿有两派，一派是改良主义，主张用和平主义的方法；另一派是革命派，主张用暴力的方法。北越的胜利给阿尔及利亚开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一派中有阿巴斯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在这问题上打了賭，我们赢了。我们一开始就支持了越南的斗爭。阿尔及利亚、奥兰等港口的工人拒绝装卸武器，为此，同法国的左派组织搞得很僵，因为他们对越南的支持是犹豫的。

主席：那时奥兰和阿尔及利亚等地都有抵制装卸的活动吗？

布馬扎：每次装卸时都有这样的活动，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如果去越南时，一定会遇到不少我们认识的越南人，他们过去在法国和我们一道共同斗爭。

主席：他们对你们一定会很友好的。

布馬扎：越南战爭有好处。他们的斗爭帮助我们加强了我们所维护的观点。我们也利用一些别国的经验，如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和中国长征的革命。我想你们一定从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他们埋怨说阿尔及利亚在游击战这一方面运用毛泽东的著作来进行斗爭。

关于建立革命的党的问题，不久以前，我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綱领，使我们能澄清一些问题，继续前进。綱领中写着阿尔及利亚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另外，在党员成分方面，主要从农民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但不是说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沒有幻想，我们知道要经过一个阶段。

主席：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布馬扎：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在国內仍然存在着外国特权分子，特别是需要高超技术的工业部門和石油部門。外国掌握这些部門的事实对我们是个威胁。他们同从內部进行顛复的活动是同样危险的。

主席：在工业部門沒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来代替他们，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順利的处理。你们的经济同法国的关系很大，这是应该注意到的。听说百分之七十五的对外贸易是同法国进行的，沒有一段相当长的过程，要脫离法国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国就要利用这个关系来压价，暫时你们也得容纳他们。同时开辟另外的道路，使他们将来同你们平等贸易。例如石油你们还不能自己开采，那么只好让他们来开采。是不是能順利的培养自己的石油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布馬扎：我们和苏联合办了一个石油学院，准备培养二百个工程师。我回国后还准备和罗馬尼亚石油部负责人共同考虑培养石油技术人员问题。所以法国也提出要帮助我们培养干部。

主席：法国过去是不培养的，如在越南过去沒有多少技术人员，同日本在我们东北一样，根本不培养技术人员。帝国主义可挖苦得很。你们有苏联、罗馬尼亚培养技术人员的条件下，法国才可能帮助培养技术人员。

布馬扎：现在阿尔及利亚只有三个石油工程师。

主席：有三个人就好！

布馬扎：这三个人是在战爭中培养出来的。

主席：有三个就了不起，可以培养出三十个、三百个。听说你们有五十万人在法国，这是个有利的条件，这五十万人中可能有一部分技工或工程师。

布馬扎：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在紡织方面，我们建设工厂快开工时，可从法国搞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回来。

主席：所以有希望。困难是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管他多么大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帝国主义欺侮你们非洲人，说你们不行，帝国主义也瞧不起我们亚洲人，说我们不行。我不相信，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你们北非人，东非人和西非的人都是很聪明、很勤劳、很勇敢的人。帝国主义也看不起我们亚洲人，看得起日本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到外国去，人家就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现在还有这样情况。

布馬扎：但现在必须承认中国人所做的都是伟大的事业。

主席：现在还不行，中国经济上还沒有站起来。大概再有一百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看起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黃脸皮但是两个民族。你们今天怎么安排？

×××：下午游览参观，晚上有晚会。明天到杭州，再到广州，然后回国。

主席：还有什么意见？

布馬扎：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同您讨论问题。这是我们期待很久的日子。

主席：很希望看到你们，我感到你们有个特点，你们比我们年青。你们是刚升起来的太阳。

布馬扎：但我们覚得毛主席永远年青，思想总是明智开朗，看问题很清楚。你的話我们都详细记录了下来，回去要汇报，要向党的干部传达。这次谈話很有教育意义。谁知道可能有一天在阿尔及利亚或非洲看到您。

主席：我也希望。

布馬扎：二十年前亚洲人、非洲人都受人欺侮，过去亚洲人、非洲人都被岐视。如对中国和日本不同对待，非洲人也如此。他们也想分化我们，说有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坏的。但现在我们自由了。

主席：你们解放了。亚洲问题还大，美军基地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在太平洋西岸包围我们，威胁着我们，也威胁着当地人民，也威胁着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帝国主义受伤了，但是还沒有死，要多少年，恐怕要一百年吧！那是下一輩子的事，但是我相信帝国主义总有一天要死亡的。

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同志：

此件請一閱。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观看革命現代芭蕾舞剧《紅色娘子軍》后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接見西南非妇女代表团的談話（摘录）

（一九六四年十月）

要請你们给我们的青年人讲讲课，使他们不要忘记世界上受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剝削、压迫的人民。

在北京找些青年人跟你们会见一下，少年儿童、中学生、大学生，给他们讲一讲，召集几千人开个会，請你们给我们青年人做做教员，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沒知识了，沒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要請你们给他们讲讲。你们要告诉他们："中国青年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你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要忘记我们还在受苦"……

会見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談話紀录（摘录）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我这个人老早就讲了，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讲了二十几年。可是以后沒有去抓。只要你不去抓，他就照例不动。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

关于总結经驗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內，阶级斗爭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內，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爭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爭和科学实验范围內，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滿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会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对《关于×××、×××、×××問題》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件已閱，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躁无味，則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內，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則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辯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

（注：方括号內为刘××讲話的有关內容）

〔有些地方提出，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农民不容易懂，还是叫贪污盜窃、投机倒把分子好，农民懂得。

〔加强社教工作队的领导问題。战线是不是要缩短些？〕

要短容易，收缩嘛！

〔关于农村整党、建党问題〕

我早就赞成。……

〔要发展一批党员〕

还是从貧下中农、工人积极分子中去发展党。

〔下边借反资本主义来反对貧下中农〕

让他搞嘛！你不让他搞，他憋不住。要反群众，他就暴露出来了。

〔机关干部家属中有不少四类分子，要清理。这是个普遍的问題。〕

反革命、恶霸、四类分子，就那么多嘛！几千万，几百万，分散各地，总是少数。只有那么多，有是有，清是要清，多是不多。

〔领导干部蹲点，还是蹲在大队的好。〕

抓中间，吃两头。

〔这次社教运动中，有些地方还查出不少黑地。〕

我看瞒百分之二十——三十就算好的。

〔我看查出来，过三、五年再征購。〕

粮食五年到十年不征購，以后增产再增購一些。粮食还是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否則，阻止人家报黑地。

〔要把干部不脫离生产的制度固定下来。〕

反官僚主义，要跟班生产。

〔科室人员有半天的工作时间也就够了。〕

还要注意文牍主义。

能够四、五小时劳动，厂长、党委书记事就少了　开会、文件也会少了，工作就能做好了。

（会议结束时）我们的会议，每天下午三点半开大会，大家可以在大会上发言。上午开小会。你们如果秘密谈，出简报我也不看。你们要暢所欲言，冲口而出。讲的不对，有什么要紧？大家可以原谅嘛！

对高揚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白银有色公司斗爭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爭。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爭、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爭要克服各种右傾思想，不怕伤害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公司斗爭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爭搞的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爭、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爭和生产斗爭、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在中央工作座談会上关于四清問題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沒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飲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沒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話。他是不准人駁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話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沒有民主。他一进場，全場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沒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总理：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

主席：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沒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闖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总理：去冲破一潭死水。

主席：你（指贺）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做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按：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一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

××：不是，是胡绩伟他们。

主席：我全部读光了。按语谁写的？

××：按语是胡绩伟写的。

主席：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现在好了，《人民日报》上白荣是怎样长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议论了。让胡绩伟参考《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它里面有不少思想性的东西。有些小孩子专看《人民日报》，我说，你们又不看《中国青年报》，不看《解放军报》。

（××来了。）

主席：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讨论一下嘛！

主席：讨论一下有什么矛盾。

××：大家下去蹲点，认识一致了。

主席：时间短了。

××：还是初期，还是第一次，还沒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之后才行。

主席：要省、县、社、大队、小队发动了群众，都成立了贫协，才行。

××：农村我知道些，对城市了解很少。农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这几天我对城市工厂的材料努力看，也还是初期的经验。

主席：白银厂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

××：白银厂搞了两年，高扬文这次的报告，我也看了，看来还要深入。可以再写个总结性的东西。总之，大家蹲点还是第一次的初期的经验，所以很多问题还讲不出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经验，就有头緒了，要有比较，你们懂得点农村以后，再做个比较，就会懂得的。现在看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体作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主席：要两年呀！打长一点，搞三年也好，横直是要把问题彻底解决。也可能缩短。

××：湘潭、山东就是。陈正人提出洛阳拖拉机厂也要搞两年，不要赶时间。

主席：把问题解决。

××：熟练了，不用这么长的时间。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沒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沒有搞过，沒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这是头一回。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划漏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

主席：如×××讲的湟中县，是馬步芳的参谋长。

××：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主席：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場、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主席：后两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主席：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沒有希望。

总理：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峯，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主席：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人就太多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爭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说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沒有讲过这一套了。

××：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主席：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內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主席：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

××：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的剝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主席：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全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哩！

××：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剝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主席：被剝削、被压迫、不滿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內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爭，彻底退赔。

主席：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份，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

××：那好办，再戴上。

××：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主席：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剝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沒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沒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晉西北就搞中农嘛！

××：晉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沒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爭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滿意。退赔要搞。

主席：你讲第三部分。

××：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爭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主席：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戶数不能超过7％——8％，人数不能超过10％。

雪峯：是包括现在的在內？

主席：你们看？否則，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題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雪峯：能爭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爭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減少很多。

主席：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主席：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现在还是×××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主席：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帐，是河北的发明权？

（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

××：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

雪峯：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主席：我沒有这个印象。你们把×××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的。

康生：××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赏。

××：你帐挂到河北賬下，×××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題是贫下中农当权。

主席：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主席：挤牙膏，挤不淨，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淨？宽大处理嘛！

××：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剝削群众，一个剝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沒收。

主席：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沒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沒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很坏的。

××：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将来新剝削分子多吃多占。

主席：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請秘书……。

××：要退赔多少？

××：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主席：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淨。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戶，沒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以后可以摘。

主席：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他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

××：改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主席：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錢多的做大官，给錢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沒有錢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鴻門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馬××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主席：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門，減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我当时就怀疑。

主席：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喔，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淨，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雪峯：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沒有搞清楚……

主席：沒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主席：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沒有，如果沒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

（雪峯：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

××：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鮮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主席：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主席：冶金部根子是谁？

××：我沒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王鶴寿嘛）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

××：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 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鶴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馬下来，然后改造。

××：重点是党。

主席： 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鶴寿庇护，变了吗？

××：北大整陆平，资产阶级教授出来保护陆平。×××同志在延安不是说右吗？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群众。

主席： 你姓陆的，×××整××，我是站在你这方面的。××还可不可以当校长？不能，××××嘛！看来清华比较好。（有人问：四清与四不清是农村主要矛盾，这样提行不行？不行！）（又有人问：这些富裕阶层……是什么性质？）

主席：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

××：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主席： 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有的沒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

主席： 你整他，他不布置？

××：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主席： 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农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解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主席： 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然后再集中搞少数严重的。

主席： 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安源开始联系小职员么！你那安源，肖志远、朱錦堂、朱少棠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粤汉铁路要成立工会，一个人不认识，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

××：爭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要上当。扎根串连，雪峯同志讲的，扎在眞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

主席：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老实根子，不一定工作队开始就能找出来，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一定的火候才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是根子。

主席： 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搞社会主义。

××：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出来，经过斗爭，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你说他不是老资格？

主席： 李立三不是老资格？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請我们国家主席去。

××：不只李立三，蒋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认识他的人多，因为宣布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活动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

主席：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

××：凡搞剝削历史，有人不赞成的。找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扎准的，×××那里就换了百分之三十多嘛！恐怕还是在斗爭中逐步发现。

主席：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

××：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露。

主席：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

××：先背靠背，后坐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

主席：他不沒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个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总而言之，把那个流氓无产阶级说的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赞成。

××：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

主席：王鶴寿有沒有转变？

××：有进步。

主席：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沒有他，我不知道。

××：总之，一脫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参加劳动。

××：能不能实现“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鍵。特别要参加劳动。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项”实行的好，有些干部只学到了炼钢的本事。

××：那批人有技术，不应该脫离生产，作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

主席：每天要几小时？

××：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小时也就够了。

主席：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罵呀！要大家蹲点。我罵娘不灵，××一罵，还是下去了。

××：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爭取。

主席：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我当他的助手。

富治：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本是工人的工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工厂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20%，你们搞出经验来，我们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拿出训练骨干分子。谢富治就是这样搞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

主席：全国都要搞，你（指谢）那个厂抽出一半人来，另搞一个厂子。一个厂办两个工厂。

××：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爭，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

主席：也不那么专，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听意见听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下一个死命令，余秋里办法，六万人里有七千人，各种各样议论。……

××：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

主席：还是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

（有人提：要组织革命委员会，现在工会贪污的很多，不行了。）

××：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工会系统恐怕不行了，重新组织，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组织，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组织20%～80%的积极分子。

主席：有30%就了不起了。

××：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

××：不能上交，还是雪峯讲的，三勤夹一懒，自己处理。

主席：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夹一懒好，李雪峯同志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嘛！以邻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夹一懒嘛！怕什么！适当分散。

××：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劳动好了。

××：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些去？

主席：有家可归的，你们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说那40%就没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哪里去，交到到他（指总理）那里去了。

××：我还想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一个乡几万人，一个厂……昨天李雪峯同志讲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馬列主义、提高文化，认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一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颜色。江西兴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

主席：还有永新。

××：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鐮刀与錘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全世界大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现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对我们的新型人物……

主席：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一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主席：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形

成那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象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沒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沒有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识论不行……

主席：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有了可以造成……

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暢，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暢，地富反坏不舒暢，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暢，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虑。

主席：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沒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错了死者不可复生。

××：象天津厉慧良要杀，也沒有材料可用，家庭……。不杀，得罪了广大群众。

主席：京剧界就发生问题。

××：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主席：是社员，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让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雪峯：貧农、中农也叫社员，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问题。

总理：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主席：你们再爭论爭论嘛！（完）

人民日报現在有看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現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十日）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注：(1)十一月二十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造设计工作"的讨论》第六期登出的四篇短文章，是《带着党政策下現場》、《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后的二百五十字，题目是《根本问题在那里？》(2)大白菜报导，指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一版《卖菜札记》和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陈伯达同志发言时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方括号內为陈伯达同志发言的有关內容）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題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題。《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

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內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清朝刘鶚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內部矛盾那个时代沒有？党內党外矛盾交叉，党內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題。〕

我们党內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話。好話，坏話，特别是反对的話，要耐心听。这是工作做的好坏的准則。〕

讲話长了怎么办？李雪峯同志说的話，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沒人听嘛！

〔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那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頂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蔣委员长”不姓蔣，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沒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见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不怕官，只怕管嘛！〕

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沒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題，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的可凶啦！“单干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军队同志说形势好，我直接听到的是许世友、×××，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是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末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話坏話都要听。好話，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話。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話不那么文明，改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話，错話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話，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話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沒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話，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

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别的同志，他就是训話，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門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联系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种事动员）。

×××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話，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沒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場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唸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沒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話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題，不是提问題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題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们，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是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罵人、关禁闭，别无办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罵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請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就逃之，不想逃，就蹲下来。不能用打人、罵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罵我们一顿。罵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罵。音乐家付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題，二是工作态度。

同江西省委同志談話記录（摘录）

（一九六四年）

湖南还提出农村要建立儿童团，少先队，青年联合会，因为现在农村有不少高小程度的小知识分子。

（少先队）为什么要按学校组织呢？还是按行政村组织好，还可以把地富儿童组织起来，使他们受教育。

中国的大跃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預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社会主义社会阶級斗爭并沒有熄灭

（一 九 六 四 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爭并沒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爭，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转引自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談会”的亚非作家的談話

（摘　　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沒有知识分子，沒有教授，沒有教师，沒有新闻记者，沒有艺术家。那些人，他就相信他们的，不相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希望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当然，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好东西，创造出了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好东西，创造了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评了古典哲学，接受了古典哲学的好东西，创造了唯物辯证法。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接受古典遗产的时候，就要接受好的，批判坏的。

人一脫离群众，就沒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剝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还有一条：人是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来起了变化，起初是形而上学的，后来学了辯证法，学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辯证法，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有这个变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沒有受到大学教育，我原来当小学教员的，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抛到革命中来了，大概是帝国主义教会了我们，教的方法是用杀人、压迫、剝削。你们是讲文的，我是讲武的，因为打了几十年仗，先生就是蔣介石，还有日本法西斯，还有美国，（当初）我们什么也不懂。现在修正主义又来整我们。赫鲁晓夫很快下台了，留下做反面教员多好！现在我们来出。

现在美日反动派已在教育日本人。各国都是一样。沒有激烈斗爭，教不好人。

（回答凱尔的问題）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搞了一輩子，就是这件事。

（回答普端纳）美国说他是福利国家，究竟谁得到福利？还不是垄断资本！他收买一些工贼，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右派。一些共产党也不象話，他们听社会党的話，说我们不好。他们亲帝国主义，亲反动派，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叛徒。我国就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事不足奇，我们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变成托匪。共产党历来是招收一批，跑出一批。志贺义雄不就跑出去了吗？不足为奇。他们能起一种作用——反面教员的作用。过去我们有五万党员，白色恐怖一来，剩下一万，一部分杀掉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干了，我们变成少数。有时正确方面常常是少数。达尔文时代，只有一个人相信是会进化的。达尔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是从大学学的生物学，他是到处跑。正确的开始总是少数，共产党当初只有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其余都是蒲鲁东、巴枯宁等等。所以你们不要怕孤立，有一个正确的就行了，何况你们还有许多人。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是可以打倒的，这一条也是破除迷信。他们心是虚的，是脱离群众的。我们有亲身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他们是可以打倒的，我们还沒有想到赫鲁晓夫倒得这么快。

关于划阶級問題的指示

（时　間　不　詳）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居了要害部門，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場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查出来，象白银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查剝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剝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剝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爭現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覚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剝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馬克思主义。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太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爭的現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爭的，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馬克思，读馬克思的书。

关于依靠貧下中农的問題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们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边。剝削者不过一、二、三、四、五，按七亿人口计算，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五百万人，剝削六亿六千五百万人口，要算这个基本賬，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他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

我赞成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沒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该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

我们这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地委书记也忘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作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修正主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前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調动人的力量？

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內部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人是生产力诸要素的首要因素。人，劳动手段（包括畜力、农具、肥料等）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嘛，实行了（六十条》《双十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畜、农具、土地等等，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了。

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后“贫下中农心正，地富心服”，那也不一定。贫下中农心正，以后有可能正，也有可能不正。地富心服，也不一定都服。

当讲到“小站有个假劳模不劳动，一年得一万五千多工分、二千元。”那是剝削阶级了，撤职，一定要撤。賬目要算清楚，一定要退赔。

还有小霸王之类，也要整。

贪脏枉法，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事情就是这样复杂，沒有才怪哩，有个对立面也好。

当讲到曲阜陈家庄陈玉梅被打下去，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把亩产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把好的打下去，比如把莫洛托夫打下去，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莫洛托夫上来，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陈玉梅这些人，小学沒上过，大学也沒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象陈家庄那样，砍树鏟葡萄，把房子里的桌椅都搬掉了，好人上台，又都变了。赫鲁晓夫也要把苏联变成这样砍树鏟葡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给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陈玉梅，大寨陈永贵。

不要只看到阴暗面，凡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十的模范，带动大多数，整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坏人。

有些支部，被不好的老党员霸着。他们有一条顶县委的办法，你知道有多少中央委员，姓甚名谁，答不上来，他就说你问题解决不了。上面的人根本下不去，不了解情况。

蹲　点　問　題

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时间，调查沒有研究，实在气得要死。红军到一个地方，屁股坐不住，吃了就走，当时林彪同志说要有“灵活战术”，大家反对说这叫新花样，“步兵操典上沒讲，步兵操典是人家经过流血写出来的，搞什么新花样”。

蹲点不蹲点，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一不請教工人，二不請教技术人员，这怎么行？不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学？应该懂些嘛。搞了几年了，恐怕就是不蹲点，毫不知道。可以到白银厂学习，沒有到工厂学习，不向工人学习，不向技术人员請教，总是內心无主。蹲点也要采取比较法，比学赶帮，首先是比较法嘛，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是比较嘛。

論　实　事　求　是

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有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具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一、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的指导下，一切从客观的眞实情况出发，究研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做为我们行动的根据和向导。

二、实事求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善于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决定方针、政策、路线。根据新的革命形势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变成群众的自覚行动。

三、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实行某种改革，要完全根据人民的自覚自愿，既要耐心地等待群众的覚悟，让群众有所比较和选择，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又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作出榜样，进行宣传，说服群众，既要从本质发现群众中蘊藏着的巨大的积极性，又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进行一切工作。

四、实事求是，就是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认清事物的现象与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的革命事业中，不过是一个小小螺絲釘。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沒有党的领导，沒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眞正深刻理解到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覚谦虛起来。

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狹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看到脚下，而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是会象“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的头抬起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无穷，人类事业雄伟壯丽，人材之多和知识之无限，他便会谦虛起来，我们所从事的天翻地复的大事业。

小資产阶級的通病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財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覚，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覚，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釘子，以幻想代替現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則热情奔放，消极时則垂头丧气，好高騖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則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沒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情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滿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內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題，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談話上：

脫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駭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鳴則罢，一鳴則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象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則无話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則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話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則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則无原則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話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則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則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的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

七、团結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騷，鬧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馬司。

八、在政治斗爭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爭性不强，不坚持原則和立場，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沒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关于学习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

現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也要向全国城市、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的先进单位学习。

国家工业各部門，現在有人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习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提起整个工业部門（还有商业部門，还有农业部門）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講話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沒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沒有用。（刘××：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倾，搞清楚一些问题。）（刘子厚：我们集中也是反右倾放包袱。）有成绩沒有？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就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员，二十一岁，他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沒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么，他说还有几怕，怕死人，怕扎错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千八百个干部，还说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坏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两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沒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一两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倾盆大雨，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一去就公开讲：有那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两个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沒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么。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門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門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內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沒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內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沒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大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話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

月搞不开，又沒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沒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沒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钻到那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主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的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那里是这样的扎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沒有？有灾救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沒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来！（刘××：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习四十天，搞烦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我历来反对这样读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谢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百分之二十的人来训练。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不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纠缠在文件上，训练那么久？搞斗争么。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书也沒有。有人说我带《三国演义》打仗的，谁照着书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内行，××过去也是内行。×××也是内行。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问谢富治）你们搞了一千多人的训练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大队为中心或以社为中心开训练班？所谓训练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调查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张承先、李悦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沒有搞开。李××是保定地委书记，他首先提出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书记李××，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家，农村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政治军事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沒有。有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粤

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沒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么。现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军官学生。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話。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蒋、蔡向赣州退，我们向山沟里退，各退各的。

（问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略）不得了，糟糕！多浪费时间，就不要开么！（陈插話：略）一千多戶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戶你依靠七、八百戶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总理插話：刚才陈毅讲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城）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张茜在哪个县？（×××：句容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开会不要长，有話则长，无話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我身边的娃娃学四十天文件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下去才知道。另一个在通县说教授不懂，助教好一点，学生更好一点。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读，你向大家说，我二十几年是靠吃蜜糖长大的，什么都不懂。請叔叔伯伯大娘指导。还是学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书读得太多了，不然怎么是教授。这些人下去是阻碍搞四清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一个是谢富治的经验，办训练班搞斗爭。一个是河南经验“三结合”开斗爭会。他们搞斗爭也搞了一个月四十天。他们不是读文件，而是搞斗爭，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总而言之，搞斗爭。（×××：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搞了两个月，搞出两万多元，十几万斤粮食）还是有油水搞，向他们借点錢用，他们的錢多得很，群众还是有希望的。照顾五保戶也好，搞生产也好。会不能开得太小了，有的生产队十几戶，十几二十几个人，讲話打不开情面。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开大会顶多也是几百人么！

现在搞不起来，其原因就是不开大会，不宣布来意。

从来沒有看到要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沒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一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康生插話：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的。……）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产、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沒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戶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出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題严重的，当工作队到

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烦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一千多戶，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下了五百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邓××插話）讲长一点，反对急燥情绪。讲五、六年，三、四年，两、三年完成岂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个县集中一万多人是多了。一九二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沒有好几个干部。农业部、财务部、武装部……七、八个哩，开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围县城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爭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刘插話）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淨，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沒有知识，沒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沒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沒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

王××提出干部交換问题，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社到那个社。来了新人不摸底，群众敢讲話。新社长、新书记来了，就敢讲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沒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刘××、邓××……）

貧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題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和美国記者斯諾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翻印者的說明：此文是毛主席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后斯诺写的，题为《毛泽东主席会见记》；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起，日本《朝日新闻》予以连载并加了按语。现将按语摘录及斯诺的文章录如下，谨供读者参考。

《朝日新聞》按語摘錄：

由于中国实行严峻的共产主义，自力更生政策，试验原子弹，全世界的视听都集中于这个"強大的中国"的登台。看来，这个中国，似乎对给激烈变化的世界历史带来新的激烈的动荡，然而，中国的内部还有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北京的领导人，从来不向人们谈一切，也不给人们看一切。

一月九日斯诺同毛泽东主席谈了长达四小时，这是異乎寻常的单独会见。

斯诺说：毛主席允许外国记者发表会谈内容，这是最近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毛主席在这篇谈话中谈了，他对当前問題的重要看法：（1）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将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2）中国本身就象一个大联合国，即使现在不进联合国，也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3）核战爭是不好的。应当用人民的力量把原子弹变成真正的"纸老虎"；（4）美中两国总有一天重新攜起手来。毛主席还很随便地从他幼年时期的宗教观谈起，一直谈到自己的命运，即"不久要去见上帝"；他话題广泛，纵谈阔论。

以下是会见记的全文。

“感謝”外国的干涉相信越共会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很少答应同别人会见。但是，他在同我大约四个小时的会见中，亲切地谈了许多事情。用他自己的说法，便是“山南海北”，无所不谈。一九六四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两亿吨。由于丰收，粮庫堆得滿滿的。无论到哪一家商店，都可以看到很多廉价的食品和消费物资。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的成就，以庆祝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下台进行核爆炸的形式显示了出来。对于毛主席来说，现在是可以引这些成就而自豪。然而，他却说到他将同死亡进行斗爭的问題，而且还表示，他的政治遺产可以让后世来做出评价。

今年七十一岁的这位斗士，在隔着一个广場，在天安門对过的人民大会堂的一间有着北京式摆设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他在谈話中间不只一次地说，感谢外国侵略者，因为它们促进了中国革命，而且现在，在东南亚，他们又賜与了同样的恩惠，他还说，中国沒有向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派出军队；只要自己国家不受到进攻，就无意同别人打仗，他还谈到，美国向西贡送的武器和军队越多，南越解放军就会越快地武装自己，教育自己，从而取得胜利。他说，南越解放军已经不需要中国军队的援助。

长 时 期 的 暢 談

在谈話开始以前，毛主席从容不迫地坐下来，同意给他拍电影。外国给他拍电视片，这是第一次。最近风传他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恶化，但是，政治的临床医生们，可以根据这部电视片作出自己的診断。一月九日的这次会见，是在他非常繁忙的几个星期之后进行的。在这几个星期中间，他同每年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聚集北京的许多的地方领导人连天连夜进行了交谈，如果他是一个病人，他就会更快地结束和我的谈話，我们的会见从下午六点前开始，我们边谈，边进晚餐，然而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但是，他使我感到，直到最后还完全从容不迫，毫无倦意。

主席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的身体沒有不好的地方，只是因为年龄关系，容易疲倦，他同我一起吃了很辣的湖南菜，他吃得不多，他还象过去一样，簡单地饮了一两杯葡萄酒，然而，如同我将在后面所敍述的那样，现在已经准备“同上帝见面”，这不能不使人进行一些揣测。

关于我的这次会见，外国（通訊社）报道说“其他政府官员”也出席了，这些官员是我在革命前的中国居住时就认识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龔澎夫人，另一位是龔澎的丈夫、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先生，我事前沒有用书面提出问題，会见时也沒有记录，但是，后来，我同一位做了部分纪录的出席者回顾了这次谈話，加深了记忆，这是很幸运的，我们还谈定，在我写文章时，不直接引用主席的話，而可以象下面那样，由我详细地转述他的看法。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支持社会主义

我首先说，中国自我上次见到他以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到了一九六五年，已经发展到

惊人的高度。一九六〇年，他对我说过，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支持政府，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那么，现在情况又是怎样呢？

毛主席回答说，蒋介石集团的分子，现在还有一些，但是不多了，很多人的思想都得到了改造。这个数字，今后还有可能增加，而且，这些分子的子弟也是可以教育的。总之，可以说，今天大约占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一致拥护社会主义。

（在这里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班禅喇嘛，不久前，班禅喇嘛被解除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

“关于班禅喇嘛的问题，是否是因为他们企图统治农奴的喇嘛地主势力保持着传统的联系？还是因为作为宗教领导人的任务同由寺院分离出来的新的政治权力之间发生了冲突”？

毛主席回答说，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由土地问题引起的问题。封建统治者失掉了土地，他们的农奴获得了解放，现在成了主人翁。班禅喇嘛不仅阻挠这个变化，而且同结党的那些过去的特权阶层的“无赖之徒”不断地来往，他们手里有一些武器，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暴露了计划，班禅喇嘛周围有几个人，年令还不是大到不能改造的程度，因此还有希望。班禅喇嘛自己也许会改造他的思想，他现在还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现在，他在北京。如果他愿意回去，随时都可以回到拉萨。这要他自己来决定。

至于作为宗教的喇嘛教，谁也沒有压迫真正的信徒，所有的寺院都开放着，而且还可以拜佛，只是问题是活佛们未必一定都实行了佛的教义，他们对宗教以外的事，并不是不关心的，达赖喇嘛自己就对毛主席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活佛。但是，如果有人公开这样说，恐怕他就不得不否定他的話，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和祭司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说教，但是，他的信徒却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有人说，毛主席本人从来沒有迷信过，这是不对的。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总是不忘记拜佛。毛主席在小时候，同母亲一起，曾经反对过不信佛教的父亲。但是，有一天，他父亲在寂静的森林中行走，遇到了一只老虎——是真老虎，而不是纸老虎，于是，他父亲跑回家来，给神上了供，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去祷告神，沒有事时就忘记了。

毛主席还记得，三十年前在第一次国共内战快要结束时，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同我见面时，向我谈过他父亲和老虎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条件很坏，中国红军在数量上是少数，但团结却很坚强。那时，他们只有轻武器……。

我插咀说：“贫民的军队还扛着红缨枪”，他说是的，有红缨枪，还有扫地柄。这样看来，决定斗爭和最后的胜负的，不能光靠武器。

我说：“当时人们主要只想到从日本人的手里解放中国。”他说：“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这样大的意义，当时我还不能預想到呢！”

战乱使人民提高了政治觉悟

主席在这里回忆了这样的情况：一九三七年同蒋介石合作并且签订了同日本作战的协定以后，他的军队仍然避免同敌人的主力进行战斗，而把重点放在在农民中间建设打游击战的根据地，日本军队实在是起了作用。由于日本军占领中国各地，焚烧村庄，教育了人民，促使人民很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日本军队为共产党人率领的游击队发展队员、扩大根据地创

造了有利条件。现在，当见到毛主席的日本人向他赔罪时，他反过来感谢日本人说，那应当归功于日本的帮助。

后来，在内战时期，美国政府通过援助蒋介石，也帮了忙，蒋介石总统经常是他们的教员。如果沒有蒋介石的教导，毛主席自己也不可能排除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会拿起武器同他进行的战斗。坦率地说，直接教导他们必须战斗的是蒋介石，而美国是间接的教员。日本将军们也是直接的教员。

“西贡的美国评论员当中，有人把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消灭国民政府军的一九四七年时的中国的形势作比较。这两方面的条件，是不是比较相似。”

主席并不这样认为。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一百多万军队，它同蒋介石拥有的几百万军队相对抗。当时，人民解放军调动师和几个营的兵力，但是现在，越南解放军以营，顶多以团为单位采取行动。驻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还不多。如果美军增强兵力，那么，就有利于加速对抗他们的人民武装的成长，然而，这件事，尽管告诉给美国的领导人，他们也不会听。他们听过吳庭艳的意见吗？北越主席胡志明和毛主席都认为吳庭艳并不那样坏，而且认为美国人还会支持他几年。但是，急性子的美国将军们对他不感兴趣了，并且把他抛弃了。尽管如此，在他被暗杀后，天地间难道比以前更太平了些吗？

“越共的军队，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取得胜利吗？”

毛主席回答说，能够。

越共的处境比第一次国共内战(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当时的共产党方面要好得多。当时的中国，虽然沒有外国的直接干涉，但是越共方面已经受到外国的直接干预，从而有助于武装和教育自己的一般士兵和军官。反对美国的，不仅限于解放军。吳庭艳过去也不想服从（美国的）命令，象这样闹独立性的情况，现在甚至已经扩大到（南越）政府军的将军当中。美国教员当得成功。

我问，这些将军当中，有人将会参加（南越的）解放军吗？毛主席说，有人可能仿效跑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国民政府军的将军的做法。

革命从压迫中产生核弹，归根結蒂是“紙老虎”

“对美国干涉越南、刚果以及以前是殖民地而目前成为战場的各国这一事实，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可以从理论上提出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法国人喜欢说的“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所谓不发达国家和由殖民地国家以及目前仍为殖民地的国家表现出来的新殖民主义和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矛盾？或者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呢？”

毛主席回答说，现在关于这个问题还沒有把意见整理出来，但是，他说，他想起前总统肯尼迪讲过的話。

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間的矛盾

肯尼迪不是曾经断言说，美国同加拿大、西欧之间，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的、根本性质的对立吗？已故总统还曾说，问题在于南半球。已故总统在提倡进行‘特种部队战爭’

训练，以准备进行‘局部战争’（防止破坏活动的战斗？）时，也许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本身。尽管它们因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而耗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以法国为例，戴高乐总统的政策，看来有两个理由。

第一，摆脱美国的控制，主张独立；第二，设法使法国的政策适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的变化。结果，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然而，法国是它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吗？

最近，（毛主席）问过几个来访的法国人，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说，法国是已经发展完毕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员，问题好象并不那样简单“也许可以说，法国虽然在‘第三世界’里面，但是，不属于‘第三世界’？”

毛主席回答说，也许是那样。曾经读过：前总统肯尼迪由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研究过毛泽东写的关于军事作战的文章，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们在同法国进行战斗时，从阿尔及利亚的朋友那里听说过，法国军队也读过这些文章，并且曾经拿这些知识来对付他们。

但是，他对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说，这些书是根据中国的经验而写的，因此，反过来用是没有效果的。只有人民在进行解放战争的时候，才能运用它。对于反人民的战争是没有用处的。法国归根到底没有能够避免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曾经研究过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自己。

（在谈到另外的问题时，毛主席还说，想把人民战争的战术运用到反革命战争中，就象使鹅再回到蛋壳里一样困难。）

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是困难的

毛主席说，中国人也在研究美国的书籍，但是，中国人是不能进行反人民的战争的。

例如，他读过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泰勒将军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据说，泰勒将军认为核武器大概是不会被使用的，因此常规武器将掌握决定权，他一面赞成生产核武器，一面希望给陆军以优先权。现在，泰勒将军有机会把他的游击战的理论拿到现地去运用。他在越南正在积累宝贵的经验。

（毛主席）还读过美国政府当局为了部队使用而出版的指导对付游击战的战斗书籍。这些指导性的书籍指出游击战的缺点和它在军事上的弱点，并且保证美国会取得胜利。然而，他们无视了一个明显的政治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吳庭艳，还是别人来领导，如果它是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就不可能战胜解放战争。（毛主席说，）美国人反正是不会听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話的，所以，他即使进行这样的忠告，对谁都是无害的。

独立和革命是两碼事

“现在在东南亚、印度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和拉丁美洲，都存在着与发生中国革命相同的社会条件。问题是，因国家不同，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解决的方法将会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你是否认为（在这些国家）会发生要借用很多中国经验的社会革命呢？”

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相结合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从过去的压迫和

腐败行为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他的回答。

哪里有压迫和腐败行为，哪里就会发生革命，但是，刚才列举的各个国家中，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还不是要争取社会主义，而只不过是要争取国家的独立而已，这完全是两码事。

在欧洲各国也曾经发生过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美国虽然沒有出现过眞正的封建时代，但是，尽管如此，曾经进行过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进步的独立战争。后来，为了确立自由的劳动市場，进行过南北战争。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伟人。

殖民地国家和中苏爭論

“我们知道在属于所谓‘第三世界’的占地球的大约五分之三的地区，有着许多非常迫切的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并且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下。它们同富庶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也迅速地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能不能够等待苏联证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不能再等一个世紀左右，等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证实以后，在这些不发达地区产生议会政治主义，并且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毛主席说，时间不会等那么长。我进一步问他这个问题是否同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爭端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他回答说，是那样的。

“你是否认为，‘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可以不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而完成？”

主席回答说，“完成”这个字眼值得考虑。

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目前阶段，距离社会主义革命还很远。有些国家里还沒有共产党。也有的国家只有修正主义。拉丁美洲有二十个共产党，据说，其中有十八个党通过了指责中国的决议。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哪里有残酷的压迫，哪里必然会发生革命。

“我们把話题再转回老虎身上。您现在是否还相信核弹是纸老虎？”

毛主席回答说，那句話是那样说说而已，也就是说，那句話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当然，核弹有杀伤力。但是，最后，还是人消灭它。这样一来，核弹就变成了眞正的纸老虎了。

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联合国，原子弹不能消灭全人类

“有消息说，您以前说过，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象其他国家那样害怕核弹。即使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死掉了，中国还会剩下好几亿人，因此，可以重建家园。这些报道是否有根据？”

毛主席回答说，我不记得曾经说过那样的話，但，也许讲过。

同尼赫魯的看法不同

然而，我记得，当賈瓦哈拉尔·尼赫魯访问中国时（一九五四年），我同他谈过話，我确实向他说过中国不希望打仗。我还说过，中国不拥有核弹，如果其他国家希望打仗，那

么，世界将遭到毁灭。也就是说，会死很多人。究竟会死多少人，那是不得而知的。因为当时不光是谈中国的事情。

我不认为，一颗原子弹就会毁灭全人类，以至于连进行和平谈判的对方政府，都找不到。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点，在同尼赫鲁谈話时也讲过。然而尼赫鲁说：他还担任印度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因此了解原子能具有多么大的破坏力。他相信，（如果打起核战爭）一个人也留不下，因此，我回答他说，大概不会出现那样的局面。现存的各国政府可能被消灭，但是，代之以别的政府，将会上台。

毛主席说，不久前，赫鲁晓夫曾经说过（苏联）拥有能够杀死一切生物的恐怖武器，但很快地他又取消一这句話。不只取消一次，而是取消了好几次。但是，我说的話绝对不撤回。对于这个传说（即纵然打起核战爭，中国也会剩下很多人的说法），也不希望有人替我辯护。关于原子弹的破坏力，美国人谈得很多，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題上也乱说了一通，在这一方面，他们比我们高明。我们难道不比他们更谦虚一些吗？

大自然依然如故

毛主席说，最近，我读过一篇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是美国一九五三年（？）进行核试验后六年，访问了比基尼岛的一个美国人写的。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就有调查人员到比基尼岛进行调查。据说，他们在比基尼岛最初登陆时，野草长得很深，需要开路才能前进。他们看见老鼠到处跑，鱼在河里游来游去，好象未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井水可以喝，田园的植物，枝叶茂盛。鳥儿在树上啼鳴。进行核试验后的头两年，情况好象严重一些，但是，大自然却依然如旧。在大自然、鳥儿、老鼠、树木的眼里，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而已。难道，人的精力还不如大自然吗？

“尽管如此，并不会认为核战爭是好事吧？”

毛主席回答说，当然，到了不得不打仗的时候，也应当局限在常规武器上。

是美国在联合国开了先例

我就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以及中国对此表示欢迎这一点，向他提出了问題。我问毛主席，你是否认为，印度尼西亚的退出，会不会开个先例，以后还会有国家退出联合国？

毛主席回答说，开前例的，是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美国。

他还说，尽管美国反对，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表示要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于是，（美国）就搞了一个新阴谋，说这一次不采取只是多数的方式，而需要采取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但，问題是，这十五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之外，究竟是占便宜，还是吃亏？

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是因为它考虑到即使留在联合国也沒有多大好处。就中国来说，中国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联合国吗？中国有好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的任何一个自治区，无论人口或面积来说，都比目前在联合国里通过投票来剝夺中国席位的某些国家，要大得多。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不进入联合国，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忙得很。

“是不是说现在到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把美国除外的世界各国的联合组织的时候了呢？”

主席说，象这样的場所已经有了。一个例子就是亚非会议。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把中国

从奥林匹克组织排斥出去后，组织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亚非会議的任务

（预定三月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为许多问題伤脑筋。在这些问題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同馬来西亚之间的纠紛，以及保卫“万隆会议精神”的亲中国派的各个国家，认为苏联完全是欧洲国家，而主张把苏联排斥在会议之外。

有迹象表明，中国似乎认为可以依靠这个亚非机构而不怎么依賴新殖民主义和西欧的资金来有计划地开发‘第三世界’。如果根据中国的原則，在国內建设上靠‘自力更生’，亚非各国之间靠互相援助，那么不使用那种靠资本主义方式去进行迟缓而费劲的资本积累的方法，也或许反而会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理论性的代替方案，当然意味着若干资本不足的亚非各国将在政治上获得更迅速而急遽的进步。从而加速创造走向社会主义前夕的条件。話題虽然离开了这次的会见，但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表明，也可以考虑把亚非会议作为一个同联合国——它受美国的控制，而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及其紧密的盟国排挤在外，而且印度尼西亚最近也自行退出——沒有关系的永久性的集合場所。

說不准的人口数字

我问：“主席：在‘中国的联合国’里到底有多多人？”“你能告诉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人口数字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眞地不知道。

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或六亿九千万。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么？

我说，只要调查一下購貨证（用来买棉织品和米的）的数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说，农民时常把问題弄得不能辨别眞相。

解放前，农民们因为怕被抓去当兵，生下男孩子，隐瞞起来而不报戶口，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夸大受灾面积，而只报一点点产量的现象。现在，生了孩子虽然立即报告，但是死了人几个月也不报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这样作，似乎可以多领供应物品）。

不错，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还要大。平均寿命过去是三十岁左右，而现在提高到近五十岁。

我说，“您的回答会使外国的大学教授们感到很困难。”

毛主席问我，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教授呢？

不会使用原子弹，美国不可能接受禁止核武器首脑会議

“你在中国鬧起了革命，因此，在外国，中国问題的研究工作也发生了革命。所以，现在在学者当中也出现了毛泽东主义者啦、北京派啦等等许多派。”

我告诉毛主席，我曾出席过一个会议，学者们在那个会议上讨论毛泽东对馬克思主义究竟有沒有创造性的贡献？他表示关心。我又告诉他，在另一个这种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向一

位教授提过问题。

我当时向那位教授说，如果事实证明毛泽东自己并没有主张过他曾经做过创造性的贡献的話，那么，可能对这种爭论有些帮助吧？那位教授焦急地回答说："不，那也不会有什么帮助，那完全是与爭论沒有关系的事情。"

不写"自传"

听了我的話，毛主席愉快地对我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庄周写了一篇有名的关于老子的论文。（被称为《庄子》）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近一百个试图议论《庄子》的意义的学派。

上一次，在一九六〇年会见毛主席的时候，我问他，你写沒写过"自传"？还是今后打算写？他的答复是否定的。可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发现了几个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自传"。尽管那些"自传"都是假的，也一点儿沒有影响那些学者们的爭论。

现在，学者们有一个大胆设想的问题，那就是毛主席的两篇著名的哲学文章《矛盾论》和《实践论》，象《毛泽东选集》上所注释的那样，眞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写的，或者实际上是在过了几年之后才写的。

据我的记忆，一九三八年夏天，我曾经亲眼见过这些文章的翻译稿。让那些只重视自己想法的学者们沉默，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为了唤起我的记忆，能不能告诉我，这两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

他答复说，那些文章的确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写的。

《矛盾論》和《实踐論》

毛主席说，在蘆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我在延安的生活暫时有些空闲。部队出发到前线，所以便有时间搜集为编写在抗日大学讲授基础哲学讲义所需要的材料，为了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把青年学生培养成顶事的政治干部，需要简单而又基本的教材。

就这样，党强迫我作这一工作，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就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写成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我打通宵写稿子，白天睡觉，用了好几个星期写成的讲义，只用两小时就讲完了。我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我问："一九三七年听了你课的青年们，以后又在实践中学会了革命，但是，对现在的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办法吗？"

他回答说：现在二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民，当然沒有打过仗，沒有面对过帝国主义者也沒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对于旧社会，沒有什么直接的感受。父母也许会讲给他们听。即便他们从故事里面或者从书本上知道一些，可是这同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沒有安全的国家"

我在这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把重点放在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让他们养成体力

劳动的习惯的问题，采取这一方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保证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呢，还是在于教育青年少年，使他们懂得，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以前，安全是沒有绝对的保证呢？或者这两个目的是一个，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沒有直接回答，相反地他问我说，能够说有绝对安全的国家吗？

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都在谈论安全问题，同时也在吵嚷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中国自己也从很早以前就提过关于裁军问题的建议。苏联也曾提出过建议，而且美国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

但是，在我们面前所看到的，并不是裁军，而是全面彻底的扩军。……

我说："一个一个地解决东方的问题，对约翰逊来说也或许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希望向全世界说明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的复杂，那么他不就可以接受中国关于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建议，从而接触问题的核心吗？"

毛主席同意我的这些話，但是他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反面教員：赫魯晓夫前总理"

毛主席说，即使约翰逊先生愿意举行这种会议，但是，归根到底他只不过是垄断资本的一个奴仆，所以资本家们也是不会允许的。中国还只进行过一次核试验，今后将不得不证明一变为二，一直扩大到无限。

他说，可是中国并不想要那么多的炸弹。恐怕哪一个国家也不想眞地使用它。因此，它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沒有用的废物。进行科学实验，只要有两三颗也就足够了。但是那怕是一颗炸弹，他们也不希望让中国得到。中国名声不好遭到帝国主义者的厌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发动了一个反华运动，这难道都是对的吗？

难道能说是中国杀了吳庭艳么？可是，他还是被杀了，肯尼廸总统遭到暗杀我们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这件事情并不是中国人民策划的。在俄国当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时，人们也吃了一惊。可是，这也不是中国下的命令。

"西方的评论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激烈地批评苏联领导人用阴谋的、不民主的作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你对这件事情是怎样看的呢？"

主席作了如下的答复：

赫鲁晓夫就是在下台以前，在中国也沒有什么威望。他的画象中国几乎沒有挂过。赫鲁晓夫的著作从前就摆在书店里，现在也还在出售，可是在俄国已经不卖了。对世界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的幽灵恐怕很难消失。有些人喜欢他，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中国对失去了赫鲁晓夫这个反面教员，感到遗憾。

中国軍队不越过国境，在北越不至于发生战爭

"如果按照你的三七开的标准，即在评价一个人的功过的时候，只要他的行动的七成是正确的，只有三成是错误的，那就可以认为是说得过去的，那么，你怎样评价现在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呢？他们还差多少分才能达到及格的分数呢？"

毛主席说，他不想这样来谈论现在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今后或许会有一些改善，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苏联前任总理赫鲁晓夫的消失，只是表明失去了打笔墨官司的目标。

助长“个人迷信”

“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迷信。这个批评有根据吗？”

毛主席回答说，也许有些根据。

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目标，但是据说赫鲁晓夫完全沒有这种事情。批评家们说，在中国人民中间有一些这种东西（这种感情或习惯）。（他们）这样说，或许有某种理由。也许，赫鲁晓夫就是因为絲毫沒有受到个人迷信，所以才下了台……

（我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见时也曾提过这个问题。当时，在我答应不发表后，他就更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赞美个人这种做法在现时代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远比外国人所想象的要复杂，所以，当时我就沒有深问。）

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

“由于历史的潮流，美中两国人民在十五年间被分隔开来，不能进行任何交流。我个人对此感到遗憾。两国之间的隔膜从来沒有象今天这样大。但是，我相信，这不会发展成为战爭，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一大悲剧。”

他回答说，历史的潮流将会使两国人民重新和好。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认为当前不会发生战爭，是正确的。只要美国军队不打到中国来，就不会发生战爭。就是打来了，对他们也沒有好处。因为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美国的领导人们，可能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不敢侵略中国吧！当然，中国绝对不会为攻击美国而派遣军队，所以终归不会打仗。

扩大战爭的可能性

“因越南问题而打起来的可能性怎样？我读过许多关于美国考虑把战爭扩大到北越的报导。”

毛主席回答说，不，我不那样认为。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曾经明确地说，美国不作这种事情。腊斯克以前也许那样说过，但是现在他又作了更正，说他沒有说过那种話。所以，可能不会在北越发生战爭。

“我想，美国负责制订政策和行政工作的人员，不理解你的話。”

毛主席说，为什么呢？中国军队决不会越过国境去打仗。这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在美国攻击中国的时候，中国才要打仗。还有比这个更明确的吗？

中国国内的工作非常忙。越过本国的国境去打仗，是犯罪行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作呢？越南的形势，越南人自己应付得了。

什么人进行“侵略”

“美国政府当局一再说，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越撤退，整个东南亚就会受到侵略。”

毛主席回答说问题在于受谁的“侵略”和被谁占领。是被中国占领呢，还是被当地的居民占领呢？拿中国来说，只是被中国人占领过。

此外，毛主席在回答关于中国军队的问题时断言，在北越和东南亚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中国军队。中国沒有在自己国境以外的地方派驻军队。这就是他的回答。

对于被当做侵略者感到意外，解放的武器是美国“提供”的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只要中国停止采取侵略政策，美国就从越南撤退。这是什么意思？”

毛主席回答说，因为中国沒有采取侵略政策，因此想停止也无法停止。

毛主席说，中国从来沒有采取过侵略行为。中国对革命运动是支持的，但，那不是通过派遣军队。当然，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展开了解放斗爭，那么，为了声援，中国就发表声明或者举行示威游行。帝国主义者感到伤脑筋的原因，就在于此。

故　意　鬧　一　下

例如，在金門、馬祖的问题上，中国有时故意地鬧一下。在那里，只要稍一打炮，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定是因为美国人离他们本国太远，因此，总是提心吊胆。請设想一下，在中国领海內的那个地方附近，只打两三发空炮，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久前，美国曾经认为，在台湾海峽的美国第七艦队不足以对抗中国这种打炮的行动，因此，把美国第六艦队的一部分调来了，把驻在旧金山的海军部队的一部分也调来了。但是，来到一看，他们却无事可做。这样看来，中国似乎可以随意调动美军。

就蔣介石的军队来说，情况也是同样的。可以随意调动他们，一会儿叫他们向东，一会儿叫他们赶快向西。对于那些吃饱了却无事可干的美国水兵，当然要给他们找点事情做。然而，为什么那些实际上轰炸和烧杀别国人民的人不被叫做侵略者，而在自己国內只打了几发空炮，就被叫做侵略者呢？这是毛主席的说法。

毛泽东主席谈到，过去有一个美国人说过，中国革命是俄国的侵略者领导的革命，但，其实是美国人给中国人提供了武器。

积　极　地“換　帽　子”

毛主席继续说道，目前的越南革命也同中国革命一样，是美国人提供了武器，而不是中国提供了武器。最近几个月来，越南解放军显著地改善了补充美制武器的状况，同时，吸收了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南越伪军的官兵，大大地加强了自己。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曾经吸收由美国人训练和提供了武器的蔣介石军队，加强了自己。这种现象被称为“換帽子”。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知道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就会被农民杀死以后，都爭先恐后地換帽子。这时，（解放战爭）就临近尾声了。现在，在南越伪军当中，“換帽子”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是专門打败仗的。第二个条件是，人民解放军强大而有能力，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如果是在不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的地方，美国人就能够干预。否则，他们要么不插手。要么不久就要撤退，二者必居其一。

越 南 的 未 来

“这是不是说，在南越，解放军已经有了获得胜利的条件？”

毛主席回答说，美军还不想撤退。战斗也许还会持继一两年。对于越南丧失了兴趣的美军，是回国，还是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将是以后的事。

“如果美军不撤退，那么，即使举行日内瓦会议来讨论统一的越南的国际地位问题，中国也不参加，这是不是你的政策？”

毛主席回答说，可以考虑的可能性有好几个。

第一个可能性是，会议召开以后，美军撤退。第二个可能性是，会议一直延期到美军撤退完毕。第三个可能性是，即使召开了会议，美军仍然驻在西贡附近。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解放军不依赖什么会议或国际协定，而把美国人赶走。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规定法国军队从整个印度支那撤退，并且规定一切其他外国军队绝对不得介入。尽管如此，美国违反了这个协议。今后也许还会违反……

改善中美关系要等到下一代

“你是否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真有希望能改善中美关系？”

他回答说，有这个希望。

但，那需要时间。大概在我这一代是不会得到改善的。我不久就要见上帝去了。根据辩证法的规律，包括每个人的生命的斗争在内，一切矛盾最终都要得到解决。

把未来寄託于青年一代，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

“下面，我将話題转到您的健康问題上，从今天晚上的情况来看，您好象很健康”。

毛主席苦笑了一下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題，总象是也有点疑问。他反复地说：我已经准备很快地去见上帝。然后又反问我：你相信不相信？

“您的意思，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上帝是否存在？您相信上帝吗？”

他回答说：不信。

死 神 躲 着 走

他说，但是，在那些自夸神学的人中间，有人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有很多，有时，同一个上帝保佑各个方面。欧洲大战时，基督教的上帝保佑过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相互打仗时也是这样。苏伊士运河发生危机时，上帝保佑英法两国，但，对方则有真主保佑。

晚饭时，毛主席谈到他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同样是在革命当中被敌人处死，他的儿子是在朝鲜战爭中战死的。他说，回想起来也奇怪，死神过去一直是躲着我走的。他说，他有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但是，不知为什么都沒有死。

他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多次都曾以为是要死的了。紧靠在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牺牲过。有一次，身旁的战士被炸弹炸伤，满身是血，可是我却一点也沒有受伤。这种差一点儿死去的事还有过不少次。

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大概知道我的出身是一个小学教员。

偶　然　的　巧　合

他说，那时，并沒有想要打仗，也未想过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同你一样的民主人士。是一种什么样的偶然的巧合，使自己立志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现在，时常想起来也感到奇怪。事物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我说："这就是说，人自己创造历史，而历史依据环境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东西。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有个疑问，就是，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主席回答：我自己也无从知道。他说，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点是，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預想到。正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接续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

说到这里，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闔了眼睛。他说，地球上的人类的条件，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从现在起再过一千年，馬克思、恩格斯、甚至连列宁也一定显得不高明了。

祝　美　国　进　步

在我要告辞的时候，毛主席说："向美国人民问候，祝他们进步。"

我想，他大概不好说美国人解放吧？他们不是已经有了投票权吗？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沒有解放。对于那些实际上还沒有解放，但衷心期望着解放的美国人，他表示了祝福。

尽管我谢绝，但，毛主席还是把我送到车里。毛主席按北京的传统的礼节，为了挥手送别，一个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天中，沒有穿大衣，站了片刻。我在大門附近沒有发现警卫战士。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我沒有看見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我在开动了的汽车里，回过头来，看見毛主席微缩着双肩，由侍从人员扶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迈着徐缓的脚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望着，贪婪地望着。

（按：毛主席于1965年1月9日接見了斯诺，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話。）

对徐××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徐××同志的讲話和××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同志们一阅，并希望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们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話全文充滿了辯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沒有看到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中央《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

（摘　　引）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科学技术，我们都吸收过来，为我们所用。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当然迷信外国，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也是不对的，不论是迷信苏联，还是迷信西方，都不对，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尊重科学，破除迷信。

× × ×

引进新技术不是一味摹仿，照抄照搬。学习外国必须用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进口的技术装备，必须加以研究，一般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

接見苏班德里約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这样才有希望。

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沒有军事学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沒有军事学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过去都是老粗嘛。

进军事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蔣介石办的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

蒋介石的军队主要就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

我们有陆军大学吗？（×××：有高等军事学校。）那就危险了。

（×××：现在要缩短时间了。现在我们大体上就是实现抗大的方针，四至六个月毕业。工程技术学校，要学技术，可能时间长些。）

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門至几門手艺，那就一輩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計划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

（一九六五年一月谷牧、余秋里同志向主席汇报计划工作，当讲到敢想敢干时）主席说：

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不要讲了半天，又是设计，又是试制，最后什么结果也沒有。

（汇报到今年钢可以搞到××万吨时），主席说。

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上去，不要急。

（讲到××建设时）主席说：

××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爭时间，同修正主义爭时间。

（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主席说：

是的，我们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我说过，原子弹响了，人类即使死一半，也还有一半。斯诺同我谈話，问我为什么不辟谣，我说不要辟谣。我只说过战爭打起来人死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有比我更厉害的，美国的一个影片形容得很厉害呀！赫鲁晓夫比我说的多得多嘛！他说有毁灭人类的武器，什么死光。我不是说中国，而是说全世界死三分之一，总而言之，死一半！××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

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从前我们沒飞机、大炮……又沒有黄色炸葯，还不是打赢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讲到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主席说：

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錢少，办事多，哪些花錢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場设计？我看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设计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听取××汇报工业交通会議情况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由××向主席汇报工业交通会议的情况和问题，当讲到工业的任务一是支援农业，一是支援国防，需要大家来逼时）主席说：

人就是要逼，一逼就逼出来了。他不办怎么样？（答：另請高明。）办法就是要你干，你不干，“自有后来人”，有人干。

（当讲到要搞好××省份的建设时）主席说：

这些地区都建设起来，就不怕了。……要搞些××万吨规模的钢厂，搞它十个，二十个。这种小钢厂恐怕是有用的。

（当讲到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时）主席说：

你政治部是党的工作机关，是在党委领导下嘛！是党委领导下的政治部嘛！过去总政管下边军区党委，部为什么不可以管直属企业。……象鞍钢这样的党委的领导该怎么办？象鞍钢就应以部为主，重要的直属企业应算是我们的野战军嘛！是主力嘛！不是地方军，不能乱插手！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我们现在有些东西保密得太过分了。技术上很落后，你给人家人家不要，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一、有的非保密不可，如……要保密；二、有些加工技术，有什么密可保！？根本不要保密。

接見海軍干部工作会議、《解放軍报》編輯記者会議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沒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正面教員与反面教員

（一九六五年二月）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鍛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沒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辯证唯物主义者。

（摘自《赫魯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说明）

接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三月）

日本投降了，我们又被迫打仗。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的就这么两句話。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沒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不要看书囉，谁打仗还拿本书去看。我打仗从来不看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

战場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两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

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就是讲研究和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学，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駕駛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場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训练。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你不是说念了我写的文章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我们开头时用游击战的办法，攻的时候用，防御的时候也用。根本的办法是打游击战。打蒋介石时，从小仗打到大仗。后来我们用三十万军队消灭他五十万军队，我们用三个指头吃他五个指头。我们是少数，怎么能吃得掉？怎么吃法呢？还是一个个地吃，结果把它吃掉了。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课堂上尽讲，沒有什么用处。回去参加打仗，最有用。有些道理只要讲点就行了，不讲也可以。大多数时间可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就可以去那里。

接見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議同志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沒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沒有？首先是有沒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眞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跟敌人。就是要爭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四月）

劳改犯办了很多事情，要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沒有几个貪污分子不行，这样大的国家沒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

他们可有才能！沒有才能，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事，凡有功的，可以摘掉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二十三条为什么规定这么一条：工作队的成员不一定要十分干淨，有坏人不要怕，有些人政治上不好，但很有才干，改造嘛！改造不了也不要紧，只要把他们引到正路，就很有用，我们不会貪污，不懂貪污，也不懂技术，他们懂得这些，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政治挂帅，可以让他们办很多事，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要调动他们，他们中间可有才能，他发明眞空电爐，是高级产品，我们不行，他行。

（1965年4月，关于王璨文发明眞空冶炼电爐的指示）

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錢，要抓改造，让他们寄点錢回家。

第一是思想改造，第二是生产，劳改工作干部不能太弱，要训练。训练两个星期就行了。

（1965年4月，在十四次公安会议期间对劳改工作的指示）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北京师范学院調查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請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請酌。

对軍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鍛炼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鍛炼，去参加四清。

关于模特兒問題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科学，不惜少有牺牲。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人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給章士釗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报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爭问题。

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請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掘出眞、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眞、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爭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急寄来。敬礼

康吉！

毛　澤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对医务人員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沒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錢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葯品医疗不能以赚錢不赚錢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赔錢，

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錢，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錢还是赚錢？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錢。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錢的医院赚錢的医生、假药，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薩，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在全国工交系統四清工作座談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沒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不然就沒有正确的了。眞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辯证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沒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沒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爭，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給华罗庚的信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話，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在西南视察并讲学，有所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接見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同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手。

毛主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说：我们回来后都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先生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今天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陈思远先生。

接见后，**毛泽东主席**和江青同志设宴招待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陈思远先生。

在钱××、张×汇报卫生工作时的插話指示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八月二日，錢××和张×向主席汇报：根据主席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卫生部作了检查，請主席再给予指示。

主席：我要讲的都已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答：（略，汇报到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主席：训练多长时间？

答：半个月左右。

主席：半个月太短了吧！

答：他们主要学会些针灸，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训练后还要带他们做。

主席：带很重要，带多长时间？

答：城市医疗队下去可一直带，共带三、四个月。

主席：这还可以，带三、四个月，学会十几种病。

（当汇报到搞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时）

主席：半农半读怎么搞的？

答：采取农忙不学，农闲多学的方式。

主席：多长时间？

答：二年，三年。

主席：二年就是读一年书，三年就是读一年半书，这个办法好。

（我们又汇报了根据主席指示作的检查）

主席：现在有多少卫生技术人员？

答：（略）

主席：这个队伍不小！

答：（略）

主席：你们用了这么多人力，这么多錢，为那么少的人服务。

（我们又汇报：现在正在召开医学教学会议，讨论主席、总理指示、要办三年制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医生）

主席：高等教育要学五年，读那么长时间书，值得研究。

（我们说：现在想两条腿走路，办三年制，多在农村办，在农村招生）

主席：招什么生？

答：大部分招高中生。

主席：初中还不行吗？

答：目前农村高中生还不少。

主席：招中学生还不行吗？你们不在城市招了吗？

答：城市也招一些，主要在农村招。

（当谈到医生的政治思想和技术的关系时）

主席：这一点很重要。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招些政治好的中学生就可以了。

（我们又汇报了城市问题）

主席：你们对城市是不是服务的好？

（我们当时对这句話体会不够，答了：也沒有服务好，要求愈来愈高）

主席：怎么愈来愈高？

答：以北京来讲，××万干部公费医疗，××万工人劳保，还有家属。

主席：工人不是老爷，工人还是要为他们服务的。

（我们说：工厂医务工作沒有搞好，工人也都到医院去看病）

主席：你们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脫产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

答：非正式医生开不了假条，要請假还要到医院去，经医生开证明才行。

主席：这涉及劳保问题，要好好考虑。

（我们又汇报城市组织医务人员下农村的问题，每年去三分之一）

主席：怎么下去？多久？

答：轮流下去。下去后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仍较重。我们打算高等医学院校学生三年后就一边工作一边上課。护士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主席：光会念书是不行的。

主席：你们对打仗考虑了沒有？怎么考虑的？

答：（略）

主席：打仗了还能都到北京医院看病？要考虑到打仗。你们分科那么细，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还不是什么都要看，只会內科不会外科怎么行？

（当汇报到要有一小部分力量搞尖端时）

主席：搞科研的人看不看病？

答：一部分人看病，一部分人不看病。

主席：什么人不看病？

答：搞基础学科的，如搞生理、药理、生化的，研究理论不看病。

主席：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呵！

主席又说：科学尖端还是要搞的。

（当谈到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时）

主席：这話很对，党委是集体领导，什么都要管。卫生部門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要抓，党委也要研究卫生工作。

（我们又請示农村卫生员工分问題。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补貼工分不超过百分之二。卫生员的补貼工分社员同意给，但六十条沒有规定）

主席：给群众办好事，沒有问題，农民会同意的。現在干部参加了劳动，百分之二已用不了，有的地方只用百分之一，工分不成问題，农民会同意的。

（我们又請示主席，建议中央今年召开一次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中央召开，可以找省、市領导同志参加）

主席：可以。

（当谈到葯品问題时）

主席：葯品应当降价。

主席：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錢。看来国家出了錢，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錢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葯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又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最后，我们請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主席：沒有什么了，就按你们讲的办吧。

接見法国事务部长馬尔罗时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主席：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馬尔罗：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主席：喔，你到了延安。

馬尔罗：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旁边，感到很激动。

主席：你说得太好了。

馬尔罗：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蔣介石住宅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主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馬尔罗：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比。

主席：我听说你打过游击。

馬尔罗：我是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

主席：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馬尔罗：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沒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这个问題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沒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主席：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果不打赢仗，谁听你的話？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馬尔罗：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农民习惯于打败仗，打胜仗的不多。

主席：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甚至整个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来。

馬尔罗：尽管如此，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仍然存在。

主席：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发展了军队，发展了党，发展了群众组织，北方人民得了土地。我们解放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队伍逐渐扩大到几百万，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甚至跟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馬尔罗：为什么蒋介石要进攻你们呢？

主席：他想把我们吞掉，他认为他可以。

馬尔罗：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弱？

主席：我们有许多根据地，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军队有一百万左右。蒋介石却不同，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根据地很大，但根据地是分散的，也沒有外部的援助。

馬尔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即蒋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主席：他有城市，有外国援助，同时他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多。

馬尔罗：我曾去过俄国，曾同高尔基谈过这个问题，同他谈了毛泽东，那时您还不是主席，高尔基说，中国共产党最大困难是沒有大城市。当时我问他，沒有大城市是会失败还是成功？

主席：高尔基回答了你沒有？（馬尔罗摇头。）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答复你。

馬尔罗：高尔基常说各地农民都一样，但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伟大的中国。几世紀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絲綢，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变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主席：需要时间。

馬尔罗：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裕时间。

主席：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沒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馬尔罗：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主席：有一点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于英国的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馬尔罗：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馬尔罗：英国有馬来西亚问题。

主席：英美俩要交换。

馬尔罗：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場。每天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眞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眞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主席：当然囉，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是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是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馬尔罗：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沒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內容很不同了。

主席：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沒有说过的。

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主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主席：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馬尔罗：难道主席眞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是的。

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主席：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你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眞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眞相信馬克思主义？

馬尔罗：法国社会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些党员是南方的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数少，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眞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主席：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馬尔罗：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內冲突很严重，法共就象最懒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毅：他们并沒有应付我们。

主席：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脫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內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主席：有一部分的作家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沒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佩耶：我有一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的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沒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主席：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沒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主席：一定有矛盾。

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主席：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沒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馬尔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主席：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沒有解决。

馬尔罗：我在西安参观了紡织厂。在法国，紡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〇、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在里昂，因为紡织工人是最穷困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紡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党能在紡织工业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主席：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馬尔罗：你考虑可以增加些耕地面积吗？

主席：可以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作，今天就不多谈了，請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馬尔罗：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閣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乐总统閣下的问候。（出門时）

主席：我接见过法国议员。

馬尔罗：我最不相信议员的話。

主席：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沒有你这样明朗。

馬尔罗：可能是因为我更负有责任的緣故吧。

接見几內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主席：你们是从几內亚来的？

贡代·塞杜：（几內亚教育部长）是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来了十天。我们是几內亚政府和党派出的两个代表团，来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接触。我们来了以后，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孤立不了的。我们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要加强同中国友好的甚至兄弟般的关系。

主席：我们都是友好的国家，有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怕了。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两国是走在一个方向的。你们都是头一次到中国吗？

法廸亚拉：（几內亚总检察长）我已经来过一次，享受过中国好客的接待。

主席：你来过一次了！

法廸亚拉：我是在一九六〇年来的，当时我参加了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访问过中国，当时受到了主席的接见，我还保存着接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很好的紀念。

主席：你是跟总统一起来的吗？

法廸亚拉：我是在总统进行国事访问离开中国几天后参加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随后我又和韩幽桐同志和她的爱人一起参加了索非亚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大跃进。

主席：沒有大跃进，小小的进步。

法廸亚拉：还是大跃进。

主席：（分别问贡代·塞杜和法廸亚拉）你先到，还是你先到的呢？

法廸亚拉：贡代·塞杜部长先到。上一次，我访问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索非亚。这一次，我计划在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外地参观，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主席：到处走走好。

法廸亚拉：谢谢，我已经跟我的朋友们说过，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邀請。

主席：邀請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来看，我们都邀請。不过你们要注意，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

法廸亚拉：主席很谦虚。

主席：不是谦虚，这是实际问题。世界上沒有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国家只有优点沒有缺点。沒有哪一个人不犯一点错误，也许只有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都沒有看见过他。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自己沒

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沒有颁布民法、刑法、诉訟法。（主席问韩幽桐同志："现在搞了沒有？"韩回答："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

法廸亚拉：在我看来，规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办法就有了。规定不过是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明确下来，规定是次要的。

主席：你这个讲得对。现在正在做些工作，譬如改造反革命分子，改造刑事犯，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十五年，过去根据地也有些经验。

法廸亚拉：在这一方面，一九六〇年我和中国检察长、政法学会会长谈过这个问题，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问题。我们几內亚也有同样的情况。把战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需要动员人民，把司法机关和人民结合起来，我们两国的问题是相同的，当然其结果是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还在试验阶段。你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你们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主席先生，你信任人民，认为改造人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国的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主席：（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鎮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鎮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贡代·塞杜：非常正确。

主席：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主席对韩幽桐同志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場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做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場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錢。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廸亚拉：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滿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主席：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錢。

法廸亚拉：这点同意。在我们那里有同样的问题，做一件事首先要教育干部才能收到效果。

主席：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贡代·塞杜：这很正确。

主席：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贡代·塞社：这是正确的，我们很同意。

主席：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

大使是哪一年来的？

卡馬拉·馬馬迪：一九六三年来的，来了两年半了。我刚来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陪一个代表团去上海，在上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见。

主席：（微笑）你这次穿的是白衣服，我不认得你了！

卡馬拉·馬馬迪：是的。上次在上海我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

主席：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也沒有什么道理跟你们讲。你们回去后，請向你们的领导人杜尔总统问候。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沒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 共产 主义 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談話（摘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事情总是有麻煩，不能怕麻煩。革命也可以叫麻煩。革命就是麻煩，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煩。怕麻煩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煩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煩，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煩得很！这些人听話，那些人又不听話，就有这些麻煩。不能怕这些麻煩，无非是在长期的斗爭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眞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接見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談劳改工作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错误的，比如劳动改造工作，就还有缺点，主要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不高，劳改农場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

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錢是第二位的，过去很多地方把它翻过来了，把搞业务放在第一，思想工作放在第二，甚至思想斗爭很薄弱，如果把对反革命分子，刑事罪犯的思想改造得很适当，这样的話，业务(工业、农业)不要去催促，也是会搞得很好，但是这个问題，还沒有完全解决。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一九六五年十月）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的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輩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賦人权，那里有天賦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爭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現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現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話，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現在教育太脫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題，恩格斯讲辯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門专門科学，和辯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路过济南在火車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沒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馬列主义的反，否則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沒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在听取×××同志汇报时的插話(摘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在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沒有受过鍛炼的时候）

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

现在的教育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六、七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

……要办抗大式的学校，……

……社教就是大学，……

现在学生馬、牛、羊、鵝、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

初中学生一学期劳动一周太少了，小学也可以搞点轻微劳动，看起来还是搞半耕半读好。

课程负担重，为什么上那么多东西？我看要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批　判　罗　瑞　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請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反　对　折　衷　主　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爭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务服；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

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緣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眞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錯误的路上。

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沒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馬克思主义、辯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爭，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爭，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爭，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爭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爭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爭，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話，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

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爭，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爭，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則的暫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稜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辯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辯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馬虎眼”，容易偷梁換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騙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辯证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象滿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貨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話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話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象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习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則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則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在杭州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吳晗拉，翦伯贊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贊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爭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沒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緒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沒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話，我也还沒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眞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請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話，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黃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見，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沒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話，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沒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象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沒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沒有大城市，沒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沒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沒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沒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爭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話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汲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馬克思那里学来的。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內核，改造成唯物辯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沒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办法。吳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眞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沒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沒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些这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話：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爭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滿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爭。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

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爭。后来国民党內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爭。

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辯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质、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辯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专門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輯。

形式逻輯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駡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蔣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蔣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輯的。

用形式逻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輯和辯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貴而重要的时期！現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輩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咀，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咀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話。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話，就要负起斗爭的责任来。

沒有党的領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領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領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对林彪同志一封來信的批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对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月听取李质忠同志請示工作时，对机要保密工作作了如下指示：

主席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主席问：如何在机要部門防止出修正主义？

质忠同志答：

（一）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武装思想；

（二）组织干部参加“四清”，并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劳动和当兵，鍛炼革命意志。

主席说：好嘛！青年知识分子就是会出修正主义的。

关于礼宾工作指示

（一九六五年）

【宴会】主席说：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錢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这是西太后和《红楼梦》里賈宝玉、林黛玉那些人吃的。我们請外国人，热菜有四菜一湯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又要同外国人谈話，又要同他吃饭，我们陪不起。听说外国人的宴会就比较简单。

主席請外宾就比较节俭，而且区别对待。有些非洲人不吃鱼翅，有些欧洲人不吃海参，主席請客一般不用这些东西。六三年××国王来，在勤政殿請他吃饭，陈总开的四川菜单，主席讲这次的菜好，扎实、大方，有一个菜叫“拷方”，只吃皮不吃肉，主席说好吃，就是这样吃有些浪费，他说吃了皮以后把肉再回锅。有一次在杭州，請×国人吃饭，主席说，他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不行，今天的菜搞得简单一些就是我平时吃的菜再加一两个就可以了。听说，×国的宴会沒有什么吃的。就是这样，×国人还吃的很高兴，说是很丰富。有一次接待××国客人，主席说，他们不是执政党，生产很困难，今天的菜要搞的很丰富，实惠，要让他们吃好。不要吃那些山珍海味，这些东西××比我们多。前几年国内经济困难的时候，主席还说过，大区书记，到我们这里开会，不要给他们吃得太好，吃得太多，他们餓了肚子就会想到老百姓吃不饱不好受的味道。

【礼品】主席说：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化錢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的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自然要大方，但不能沒有个边，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品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

政治，外国人送我们的礼品就比较简单，艾地同志来，送我一根“金鷄毛”，约多同志送我一个小孩玩的弹弓，这种礼品就很好，礼品就是来表示意思，也不能靠礼品过日子。

主席还说过，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錢，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要好好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沒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錢归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送给主席的礼品，就是遵照主席以上指示处理的。有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我们曾建议给主席家里的人和小孩子吃了算啦。主席不肯，并且说，你们为老百姓做事，为我服务，有功劳，应该吃，小孩子有什么功劳，不要给他们吃。现在把一些吃的东西轮流分给中南海几个单位的同志吃，虽然东西不多，但同志们反映非常好，说主席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而对周围的同志却那么关心。

【礼节】主席说外交礼节，不能学洋人那一套，什么黑衣服，薄底皮鞋等等，都是从外国人学来的，我们是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是看你的政治，看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看群众的情绪，人家不是来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皮鞋。

还有过国庆节时，江青同志接见外宾，与主席商量做不做新衣服。主席说，你接见了客人，客人就会高兴的，人家不是来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后来沒有做，结果外宾反映很好，说主席夫人很朴素。

【接待】接待外宾时，工作人员多，秩序乱，主席每次接见或宴請外宾时，事先都亲自交待让那些人参加，主席说过，他不喜欢人多，说人少坐的靠拢，谈話方便，有一次主席在武汉宴請××××××外宾，主席交待摆两桌就行了。但××部的同志搞了四桌，事后主席批评了我，说沒有按照他说的办。一九六三年，主席在中南海宴請××国王，本来都准备好了，但礼宾司一个同志说这样不好，要摆大桌子，从大会堂把桌子抬来后，因桌子大，門小进不去，正在忙乱的时候，主席和外宾说完話后，要吃饭，结果沒有准备好，又把主席和外宾挡了回去。事后主席和总理都批评了我们。

（据汪东兴同志传达。）

关于《海瑞罢官》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廬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爭，是长期的阶级斗爭，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眞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同毛远新同志的談話（三）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二、三年，然后搞二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預分时，毛主席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結合。六年改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驟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沒有记下读几年)，结果出来尽打败仗，做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話，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沒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辯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

（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請送××同志，請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的不大好。

（给王××的信）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一日信收到了。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的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作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約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方面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但要由地方出錢購买。也要中央确有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应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过国家计划甚远者（例如超一倍以上者）或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購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种，要为地方爭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賴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爭，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那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則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則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再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这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至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購）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引以为戒吧。现在虽只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

足”的老話）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眞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請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拟以余秋里，林××二同志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話，各省拟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大約七十人左右去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場会，是否可行，并請斟酌。

（给刘××的信）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談会紀要》时所加的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爭。所以，这是一場艰巨、复杂、长期的斗爭，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沒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 × ×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爭，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 × ×

須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則的，并且很顽强。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敗强者，沒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敗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釘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內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在政治局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华东）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內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沒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門。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門門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沒有一門沒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門，我们还沒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爭。）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場严重的阶级斗爭，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又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場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場广泛的阶级斗爭。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場斗爭，还有十三个沒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吳晗、邓拓、廖沫沙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場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爭很尖锐，很广泛，請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是历史所长，他是赵××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綱、翦伯赞，反正不剝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文艺界，医务界都组织工作队下乡）

他们都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写不出好东西来，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象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沒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沒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沒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象×××的批判罗尔綱，×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綱、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爭，他们要讲話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沒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馬林科夫，不行，沒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場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象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沒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爭。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鳴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鳴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鳴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

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沒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沒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沒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象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小钢铁厂有××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象×××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吳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沒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縛。列宁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縛，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場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場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沒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議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

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沒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前线》也是吳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义？

与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主席两次找康生同志谈話，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話，批判五人小组（彭眞、陆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扬）汇报提綱（指彭贼背着康生同志，以五人小组的名义，与其走卒许立群、姚臻等泡制而成的反革命“二月提綱”——《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綱》）。并说：“吳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鬧天宫。”主席又批评彭眞：“彭眞、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眞对叫许立群打电話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主席最后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在政治局扩大会議期間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

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譚、罗等都当过书记处书记，是不断分化，合乎辯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吳晗问题，后面还要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爭，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門，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淨？我不相信。

批　判　彭　眞

（对康生同志講話）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眞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鬧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眞是混到党內的渺小人物，沒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眞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給林彪同志的信

（对軍委总后勤部“关于進一步搞好部队農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請他们馬上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上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们我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換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爭。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話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場大斗爭的目的是对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爭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爭，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剝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剝削阶级同剝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沒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爭，但是絶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場伟大斗爭的領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眞，很不得力的时候，……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滿了我们的报紙、广播、刋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領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則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領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現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則还沒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現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須充分注意这一点。

关于发表全国第一张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此文可由新华社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刋发表，十分必要。对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速办！

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須立刻广播，立即见报。

（摘自康生同志九月八日的讲話）

在接見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武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覚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覚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

（一九六六年七月）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暢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　上午）

"人民万岁。"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炼身体，可以鍛炼意志。"

"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答有）这很好！"

重　要　講　話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大学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鬧事，不叫鬧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出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話、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話，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沒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涉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

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峯、吳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沒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redacted]京大学三次辯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話，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沒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沒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沒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鍛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指李雪峯）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話、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都要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沒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无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飯吃，三要鬧事，鬧事就是要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上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呀！他还拥护党中央嘛！不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爭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在会見大区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批、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沒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話，不让人家

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話，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沒感性知识，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沒有阻挡学生上中央来。（康生同志插話：南京搞了三次大辯论，第一次辯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辯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辯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辯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辯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鬧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話。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沒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話，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鍛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刪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插話：砍掉三分之二，学习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教条。打人的问題，通知上沒有写，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話，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沒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話：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門改成科，沒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話（北大进行四次大辯论，弁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暫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对中央首长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七月）

主席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沒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主席说：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

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門都关起来了，甚至鎮压学生运动。谁鎮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鎮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內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沒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鬧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鬧到底，从这方面鍛煉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換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評

（一九六六年七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鎮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关于打人問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給清华附中紅卫兵小将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剝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請同志们予以注意。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議上的插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鎮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鎮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蔣南翔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鎮压他们。不是沒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鎮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鎮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沒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鎮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峯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內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貼在大門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請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鎮压学

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鎮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請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場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　澤　东

在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时加的一段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在中共中央羣众接待站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楊寅田大字报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

印发全会（指十一中全会）各同志。将楊寅田大字报題目用特号字，全文用老五号刊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閉幕式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題，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題，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需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大会所决定的问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学生和革命的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依靠群众吧，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沒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样的决定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志同，也要给他出路，要准许他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们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效果的。

在第一次接見紅卫兵大会上
与林彪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在天安門城楼上与北大附中×××談話紀要

（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问×××：“陆平现在干什么？”×××回答说：“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主席说：“陆平只能扫地，就象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毛主席又说：“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

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多少人啦？”×××回答说：“又发展了。”毛主席说：“这就对头了。”×××问主席身体好不好，毛主席说：“我身体很好，我去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疼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问主席下一步应怎么办？毛主席说：“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问×××是否会游泳，×××回答：“才学会，游得不好，只会游十几米。”主席说：“那不叫游泳，这叫闲庭信步。（主席做了闲庭信步的动作）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江青同志说：“不能让她出风头，要让她谦虚。”主席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革命嘛！”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沒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象就照象，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話有什么要紧？！

关于北航《紅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爭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

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鬧上三个月。

关　于　工　作　組

（一九六六年八月）

全国的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摘自周总理八月二十二日讲話）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請你们考虑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請酌定。

对《关于长沙、青島、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請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題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預学生运动。北京就沒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我看譚××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对署名“奥地利《紅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則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請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請主席审查

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

陈　毅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附署名“奥地利《紅旗》派的同志”来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爭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蔣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綢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馳”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剝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2—0005）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維也纳

关于中央文革

（一九六六年九月）

中央有很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

（摘自周总理九月十九日讲話）

就左派队伍問題与張春桥　姚文元同志的談話紀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主席问：你看左派有多少？

答：上海好一点，左派队伍大。

主席问：多大？

答：工人有四十万、五十万、六十万。

主席说：左派不会多，大概占10%。

答：后期可能多一点。

主席说：有20%就不得了啦。

（注：以上谈话是六六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上看焰火休息时进行的。张春桥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此次谈话情况时还补充说：这是指世界观的改造，不是指一般的表现。是指世界观里有较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更难了。）

接見在京部队时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关于組織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軍事訓練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話，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对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結》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直送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話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請考虑。要大量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峯的简报沒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后教育李雪峯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沒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实話，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話，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刘××给江××的信，批评了江××，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主席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主席说："你说話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主席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主席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主席说："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沒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沒料到，连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鸣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主席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話。"主席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主席讲："你先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主席说："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鬧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馬林可科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同志插話："大权旁落"）主席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鬧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究研、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会议我是不滿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沒有办法的。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滿，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沒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朱×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眞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这不要紧。高岗、饒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眞、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沒有好下場，好结果。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沒改（周总理插話：李立三思想沒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不管什么門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奇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了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几个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崗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

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沒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不能一笔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么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鬧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淨？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五七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吳晗、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沒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了反面（康生同志讲：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爭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靜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鬧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爭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这还不是阶级斗爭。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在中央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讲几句話，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沒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沒有办法，中央也沒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沒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闖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鬧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沒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闖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沒有信心的，说过决定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話，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24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爭怎么斗爭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吳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沒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作。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則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則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題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沒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沒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駕，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讲历史，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廿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沒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沒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沒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峯讲："沒有想到我们老前輩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四个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结束了，也是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同志和××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沒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沒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在中央工作会議期間与各大区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賀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滿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盞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坏黃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現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頂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眞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眞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馬克思列宁主义眞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現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

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請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沒有帝国主义、沒有资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　澤　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眞。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聶荣臻说：这个人很懶。）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眞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鋒，还有一个李范五。

眞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总理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勛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聶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连问題时总理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沒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天津万晓棠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掉会，他们以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沒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在聶荣臻同志去指揮发射导弹时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摘自周总理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第七次接見紅卫兵大会上与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要支持羣众的革命串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沒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沒地方住的。

（摘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给我被苏修无理勒令回国的留学生的报告）

祝賀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爭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貧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綱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滿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貫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同以苏共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鋒相对的斗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爭，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英勇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

修正主义的斗爭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爭，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　澤　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爭中学会斗爭，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会大民主。

（摘自恩来理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讲话）

关于复員轉业軍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一）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和其他名称的单独组织，只能参加所在单位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复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于軍政訓練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四点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的，脱帽洗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之改过自新。不然，怎么能团结95％以上呢？

四、说服干部，使他们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錢越来越高。

討論"工矿十条"时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沒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沒有实际，那能有理论？有时理论和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来，那儿来的几条规定？

贊揚参加接待紅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軍指战員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你们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做得很好。

（周总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讲话传达）

給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眞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請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　澤　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对《林彪同志給浙江省軍区的指示》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門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军队和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到反面的話，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注：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浙江军区杜平用电话向林彪同志报告了省军区与浙江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后，当天下午五点半钟林彪同志作出的重要指示。）

和林彪同志的一段談話（摘录）

林　彪：现在全国都在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我不愿照抄照传，要突破，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创造。

林　彪：要以毛泽东思想作种子。

毛主席：好。

林　彪：不能滿足于经济建设，要搞精神建设。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1．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张春桥同志传达）

关于陶鑄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陶铸的问题我沒有解决了，你们也沒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鏡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話：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插話：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換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沒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对中央文革小組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場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

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吳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陈伯达）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搞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淨，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吳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吳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脫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場阶级斗爭。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沒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与外宾談如何看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

看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不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坏大字报；有的是符合事实的大字报，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字报。

关于接管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鬧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副总理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谢副总理说：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这是阶级斗爭。

（摘自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对公安干部的讲話）

談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沒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題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鬧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关于軍队支持左派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請酌处。

毛　澤　东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一日

以后，凡有眞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請酌。又及。

談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注）这場夺权斗爭，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內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７〕２７号）

（注：据查明，在“走资派”后面加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种提法，是经王力篡改了的。主席发现后立即纠正了这个提法。参见《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一文。）

在軍委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爭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鍛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这时主席引用了《战国策》的《触讋说赵太后》），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則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传达摘要）

关于軍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爭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爭，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续继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鎮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要顾全大局。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外国朋友眞正革命的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与周总理談夺权問題

（一九六七年一月）

毛主席问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权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受黑帮影响很坏，变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要划小，要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爭，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爭，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

主席：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了就休息，睡大覚，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的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鍛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的，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关于夺权問題

（一九六七年一月）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沒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为《紅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論《論无产阶級革命派的夺权斗爭》所加的一段話

（一九六七年一月）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各级干部都应经受无产级阶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到他们的的缺点和错误，而看不见他们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对广播系統夺权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內部又要分裂，內部爭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结主义，不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內部有分歧，应按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談文明斗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斗爭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噴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爭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沒这兇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題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主席问：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答：去年五月。）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爭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爭是沒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話，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爭，少則几年，多則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顏色。这篇讲話沒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沒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話，说的是眞話。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饒，五九年把彭德怀、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爭，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沒有解决问题，沒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吳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湖南也未转载，张平化作了检查——有人插話）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眞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个卫戍师，现在是×个卫戍师。以前×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捣，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所以军队也不是沒有问题。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聶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話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滿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当时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正在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話，他们不听話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話，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的要死。

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話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同志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同志说：不搞斗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沒有看见我么！见都沒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話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成了反革命，夏季是少数，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井岗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不行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的大字报，打倒×××、×××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是×××，管好几个部，××部要打倒他。打倒××是××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是有条永远的眞理，那就是绝大多数党、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关于西安問題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送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大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继续作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派是不破坏工厂的。請酌。

此件恩来看后送林彪同志。

毛　澤　东

二月十四日

接見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鍵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篇文章，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題。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題不大，贵州问題也不大，內蒙古问題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鍵、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们这儿还有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是搞不了几天的。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沒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

※　此文是根据张春桥同志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人民广場的讲话录音稿和有关传单整理的。是否每句都是毛主席的原话，很难断定，只供加考。

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沒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沒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沒有教书的经验，沒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巴黎公社，不是我们都讲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沒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

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它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他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样的哪一个国家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的好一点。这是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囉。旧中国的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是叫皇帝，秦始皇他把三皇五帝都叫了。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太宗也是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是只看名称变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汉朝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囉，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都象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喜欢“长”啊，都改了，他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也统统改了，有些象我们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字改的差不多，改了大家都记不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下詔书，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改成什么了，这样使得下公文就麻煩了。話剧这个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主要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

我们是否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什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煩，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

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认人民公社，一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沒什么意思，沒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那你们就叫一个时候。你们看怎么样啊，能说得通吗？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爭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百人的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的人了。工人组织起一百万人了，这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处理上海红革会问题的《紧急指示》我看过，写的很好，有造反派的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如果开的話，一定要采取必要措施抓人。

（上海人民）公社在鎮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門进，后門出。

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上这里来告你（们）的状。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张春桥回答说：“还在”）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沒有眞正结合好，现在才是眞正结合。

《文汇报》搞得好，很同意他们对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有几笔賬以后算。

关于宗派主义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

凡是鬧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

（陈伯达同志传达）

給中国人民解放軍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的两个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报告》，一个是《关于两个中学军政训练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的批示如下：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

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

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

以上請酌办。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

（一九六七年二月）

五四运动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剑，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曇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眞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題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曇花一现的人物。

为中央《給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貧下中农和各級干部的信》加的一段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貧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对北京两所中学軍訓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

林彪同志：

請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政训练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千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面参考。

又，大专院校也要做一个总结，发到全国。請酌。

对《鄭州日报》問題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

准备查封军管，时机宜迟几天，让罵解放军的多罵几天，然后左、右两派各派数人来谈。

（四月六日周总理传达）

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不同意“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难道说沒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大联合夺权”。

今后斗爭矛头应指向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資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頑固分子。

（注：这两个口号均是被王力篡改了的，形“左”而实为极右，引起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所以主席发现后就坚决指示把它们改过来。）

× × ×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話是对当年形势提的，今后不要再提了。

（摘自周恩来同志1967年3月1日接見西安革命派代表时的讲话。）

在《論革命的“三結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話

（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紅旗》杂志社論）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

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关于軍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多的。××军在无锡、××军在重庆、××军在伊春、蚌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两条路綫斗爭的基本問題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爭，基本问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題。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題，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題，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題。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題。

对鉄道兵党委一个报告（渡口駐軍支左经驗）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請酌处。

毛　澤　东

三月七日

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現全校大联合和整頓巩固发展紅卫兵的体会》一文件的批語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頓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要认眞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　澤　东

三月七日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

（一九六七年三月）

全国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搞倘未揭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什么理由放松警惕？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在胜利中要戒骄戒燥。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八月）

一、注释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沒有司馬炎、司馬师、司馬昭，何以成为“晋史”？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頓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話沒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沒有时间，我也沒有时间。

六、《语录》第二〇八页引用刘少奇的話的一段也删去；第二〇八页标題“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糾正错误思想”。

（1967年3月16日，对《毛选》注释诸问題請示的答复）

× × ×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释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1967年8月4日，对《毛选》出版委员会有关請示的批示）

对中共中央　印发薄一波、刘瀾涛
楊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党、政、军、民、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

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对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报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主席听了林副主席三个问题的报告，主席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并作了三点指示：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那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条组织纪律性强，行动快。如沈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在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群众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接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够的。此事請你们研究。

（摘自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接见铁路、交通、邮电部革委会核心组成员、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代表及各部委成员的讲话）

对报紙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的不够，批判的不够。

关于党組織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暫时现象，沒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摘自张春桥同志1967年3月26日在上海整风会上的讲话）

对《紅旗》杂志調查員調查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一个組成部分》一文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請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关于大批判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

一、批判要踏实，要调查确实，不然会一风吹。

二、文章要一、二千字，短一点，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了。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沒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三、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都是有条件的。

四、托拉斯不能都推翻吧？旧名词可以有新内容，主要批判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宜宾問題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沒有指责他们，更沒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話

（一九六七年四月）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剝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辯论清楚。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军队的威信必须坚决维护，不能有半点含糊。拥军爱民社论的发表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军队第一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是大规模的战斗任务，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当前主要危险是有人把解放军打下去。

× × ×

支左支错，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

× × ×

有的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是县委地委或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那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是老婆是那个地方当权派之一，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摘自谢富治付总理四月六日讲話）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从宜宾问题的揭发，才开始揭开了四川阶级斗爭盖子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李井泉的盖子。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次才翻过来。以后要把这个材料印出来，发给每个党员。四川阶级斗爭的揭盖子，两条路线斗爭还未解决。

（摘自林彪同志1967年4月5日关于四川问题的讲話）

关于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

（一）

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

（二）

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即《修养》）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权，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四月十三日康生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話）

（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馬列主义的。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的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話。

（四）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发表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四月九日传达）

不能放棄对党内最大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爭

（一九六七年四月）

我个人覚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爭，对最大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綱，这个綱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触詟說赵太后》

（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剝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注：主席的这段重要讲話是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传达的）

附《触詟說赵太后》(《战国策·赵策四》)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jian音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Zhi音哲〕願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xu音须〕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xi音戏〕也，故願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nian音碾〕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者〔ai音奇〕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願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沒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願及未填沟壑〔hho 音貨〕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ao音袄〕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Zhong 音种〕，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in音鱼〕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与×同志的一段对話

（一九六七年四月）

主席问：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了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

答：沒有了，都取消了。

主席：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

（摘自周恩来同志1967年4月18日在广州群众组织座谈会的讲话）

关于軍管問題

（一九六七年四月）

军管太少了。

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群众，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摘自谢富治副总理四月十八日讲话）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

目前全国斗爭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門、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但要注意保守派把造反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造反派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接見謝富治同志时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再搞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鍛鍊。青年人不能脫产，这样会造成脫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

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惩罰。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和反动的群众组织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爭。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罰

（一九六七年四月）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罰，要走向反面。

要把所有的联动放出来。

关于陕西驻军虚心听取羣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的批示和批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同志：

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对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羣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省军区司令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军军长胡伟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继召集西工大、西军电造反派、交大文革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沒有支持眞正的革命造反派，有时还支持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沒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办法，搞“关門训练”，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不要怕批評，全軍在这种批評过程中将会正確地認識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黄经耀、胡伟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胡伟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掌握斗爭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領袖，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捕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对军区提出了几条意见。即：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对新成立的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对保守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爭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爭取团结。

要帮助工总×部队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确实做好各大头头的工作。抓好活思想，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毛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二大革命派之间的大联合。（**開展談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黄经耀、胡伟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掌握斗爭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的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讨论。

关于四川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周（恩来）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眞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织组，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些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澤　东

四月二十三日

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組和政治局会議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我们一定不要脫离群众，不能脫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脫离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滿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廈，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脫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沒有听我的話。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鍛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沒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沒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沒有右派，就沒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五一”节对阿尔巴尼亚贵宾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主席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爭，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象“九评”那样批判《修养》。）主席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場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作工作，江××、江××、譚××不是三反分子。陈××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过关了沒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譚××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話，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譚××，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請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鬧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逃脱，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門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沒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五一”节和張×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在天安門城楼上，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单独引见了张×，接见时周总理也在座。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张×亲切握手。毛主席红光滿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付主席介绍说：这是国家科委张×，她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她们那里运动搞得不错。

毛主席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

毛主席又说：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接着主席又亲切地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回答说：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主席问：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总理说：也就是了吧！

这时，毛主席向林副主席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必须把粮食抓紧，把棉花抓紧，把布疋抓紧，粮油征購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抓的很紧，而且抓的及时。

不注意儲备，鋪张浪费，吃光用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粮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大批判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批判文章不要象九评那样长，每篇一、二千字，不要超过三千字。一篇一个中心，一个概念，明明白白。长了就沒有人看，记不住。

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都能做工作。搞“三结合”，要老中小，老的都会去见上帝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批判文章文字要短。彭、罗、陆杨可以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其他人都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章中提，在标题上要提。

× × ×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話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駁，主要駁他走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 × ×

写文章要琢磨，要准确，要尖锐明确。

（1967年9月）

关于軍队整訓的指示

——給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10——14天为宜，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三个月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对广州、湖南軍区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

一、现将广州、湖南军区报告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希望遵照执行。

二、是错误的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能比以前高。

三、不能动动摇摇，犹犹豫豫，听老婆孩子从保守派那里来的错误話，信以为眞。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改正，解释不通的，暂时阁下来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什么问题也想通了。

对《紅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編輯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級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貨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沒有，一点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規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辯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要破除資产阶級法权思想

（一九六七年五月）

多少派也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做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廾二年战爭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貶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别，要加班費，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値，是法律規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廾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根据聶荣臻同志的传达）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的机构，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

（据谢富治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上的讲话）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

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有工农兵感情。

（据陈伯达同志一九六七五月十一日在北京女六中讲话）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五月）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据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整风报告会上的传达）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

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是个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关于处理軍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现在冲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妮妮。错了沒关系，改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餓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內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黑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放了么？为什么不让××派参加红代会？大学生各地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妮妮，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爭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內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接見阿尔巴尼亚軍事代表团时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爭，胜负还沒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內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爭，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內的斗爭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爭存在与强调阶级斗爭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眞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話：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暫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

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煽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場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改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話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話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話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1——2%，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转引自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关于夏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积极行动起来夏收夏种，目前正进入两夏大忙季节，南方已开始收割。今年全国夏收作物生长很好。今年的夏收，各级领导同志应特别重视，立即投入夏收夏种。各地要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以劳力、畜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持人民公社，做到颗粒归仓，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全国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慢，中央各部要慢。”开始说三、四月出眉目，前几天主席说“比预料的晚了一个季度，不是三、四、五月了，而是六、七月了。与其估计快一点，不如估计慢一点，与其估计很容易，不如估计困难一点。”

中國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爭，而是武装斗爭。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沒什么问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六月八日张春桥同志传达）

关于干部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我们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长期鍛炼的，还是要有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是要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可能被打倒，原因是他们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行。红卫兵不行，沒有经过鍛炼，这样的大事情，信不过他们。

× × ×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 ×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有了錯誤就改

（一九六七年六月）

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的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转引自六月二十七日河南军区检查报告）

关于叛徒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出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話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对中央警卫团支左部队的三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附注：这是主席在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去北京针织总厂及其两个分厂支左临行前所作的指示。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八三四一部队向毛主席报喜，主席当即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对赞比亚总統的談話（摘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

非洲是很有生气的大洲。在亚洲，是东南亚比较突出，美国黑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先独立的国家是要援助晚独立的国家的。你们不要感谢我们，这是为了世界革命，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不援助才是错误的。世界革命可能还要几百年，任务就落在我们身上了，特别是落在下一代，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接班人。

× × ×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

修改中国紅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

（一九六七年六月）

翻印者注：〔 〕内为毛主席修改时删去的字句，黑体字为毛主席添加的。

一、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下……

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三、在以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四、领导阿尔巴尼亚青年胜利前进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敬爱的偉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

对姚文元同志訪問阿尔巴尼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这次出去要注意谦虚啊！这不是一个代表团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红卫兵问题。

关于絕食靜坐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食靜坐可以做为一种斗爭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內部有一小撮敌人，有官僚主义。他无非要让你答应几个条件。所以绝食靜坐，允许。但不能提倡，一般不赞成。绝食可以开水放糖、放盐、打葡萄糖，可以轮班。

看了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給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现在有的人是“舖张鬧革命”，“大少爷作风”，“掌权开始，是浪费开始。”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批评人家宽一些，批评自己严一些。

关于緬甸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关于建造主席塑象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毛　澤　东

七月五日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七月）

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話就行了。一句話：错了；二句話：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是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句話：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

（摘自××在1967年7月7日在昆明讲話）

军队这几年群众工作做得少，错了改了就好，也不给处分，也不要治罪。

（摘自周总理1967年7月7日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話）

在听了××××会議汇报后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毛主席在七月七日接见了××××会议全体人员，在听了汇报后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勳章。"

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感到××太落后了，而且数量也很少。主席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爭。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爭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溫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60%。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迴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爭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爭祸首。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他。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还是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艦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沒有用热线）后，约翰逊很快就告诉了以色列，实行突然袭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三十三个亿，打掉了廿亿，最后阿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丁美洲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滿。中东战爭不久，苏联召集了三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盾尔跑到中国要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协作。单项经济协作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

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象我们孤立，实际上他们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还未解决”。

主席讲：“还要把××，×××，××××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要大大赶上去。”

（四机部军管会传达）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

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过去革命条件不提出这个口号是对的，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城市住的无产阶级，你用农村包围城市干什么？包围城市就是包围无产阶级，包围革命造反派。

关于不要“开快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开快车要翻车，要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要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接見軍队領导干部时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鬧八鬧，总会鬧出名堂来的，可以鬧清楚。不管怎么鬧，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鬧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鬧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鬧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誘导嘛！

关于湖南軍区的龙書金

（一九六七年七月）

这个人是否还可以用？你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你们水平怎么这么低，也不研究一下。据我了解，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对打仗很勇敢的人还是很尊重的。他犯了错误当然可以批判，但既然他表示愿意改，就应给他机会，不要太过分。你们这样做，不能争取别人同情。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上海的形势是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何搞好教学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搞些调查研究，创造一些典型材料。

× × ×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的。

过了夏天屁股要坐下来。

× × ×

中学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规。军训还要搞，中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复课闹革命，有的单位搞得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这是关系到革命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是关系到把青年人培养成接班人，变不变色的问题。

《中央对武汉軍区公告的复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林、周、中央文革小组：

拟复电如下，請讨论酌定。

毛 澤 东

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眞改正，并得到群众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人员和百万雄师群众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本来军内的问题沒有机会解决，武汉问题发生了，就有机会解决了，机会是他们给的。

× × ×

全国都应该从武汉事件中学习。全国支持武汉地区，武汉地区的斗爭推动了全国的工作。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当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沒有什么关系。象武汉这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

武汉一小撮人的叛变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

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 × ×

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关于“八一”建軍节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岗山的斗爭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顚倒的。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卅日《人民日报》社論加的一句話

（一九六七年七月）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坏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的联合。每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充分的注意，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否则就会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派互相攻击，刘少奇坐山观虎斗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

关于大串連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去年走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倒忙。

（转摘自周总理1967年8月16日对北京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話）

对《紅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論的批語

（一九六七年八月）

还我長城。

（注：这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是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鋒批准发表的。社论中错误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转移了斗爭大方向，主席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对天津、河北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天津、河北应该搞得好一些，因为天津、河北离北京近，特别是天津，容易影响北京。

无产阶級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关于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对形势不能看得太严重，不要急。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乱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好的。打架是支流，是暂时的支流。决不能转移斗爭的大方向。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煤炭工业战綫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批示：已閱，照办。

毛　澤　东

主要修改：

信的开头，“广大的职工群众们”一句是主席加的。

信的第七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一句后加了“工人阶级利益”只字。

第八段“凡是坚持下去、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整段都是主席新加进去的。

关于軍队支左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爭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爭，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爭，看到阶级斗爭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辯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內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谈判。

（摘自谢富治同志1967年8月22日在北师大讲話）

× × ×

（对增派往溫州的6299部队指示）

行动要愈快愈好，工作不要太急，要做到家。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走資派打倒

（一九六七年八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沒有完成。

8 · 27 指 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许世友要帮助过关，他是一个战将，文化革命以来，落后了，跟不上；

二、要出馬恩列斯语录；

三、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 一年发动 一年胜利，一年扫尾；

四、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了一篇好文章（指《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

五、不要把党內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內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內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

六、群众组织提以我为核心，这样提是极蠢的；

七、依靠青年人；

八、依靠群众，加强专政，新疆办大型劳改农場不一定好，要研究；
九、要抓学习，把工作做好，要精兵简政。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門垂直领导。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对北外造反团所编《陈毅黑話集》的评语）

材料不黑，性情直爽。

× × ×

陈毅是个好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 × ×

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沒人搞，还要他来搞。

× × ×

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四十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

对姚文元同志《評陶鑄的两本書》一文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好极！此文的要害是点破了“五·一六。”

对新聞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

（据陈伯达同志1967年9月3日对新闻人员讲話时传达）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今年的国庆要充分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 × ×

遊行不单是遊行，也是大批判。用文艺武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羣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各地要将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中央。

记录稿未经主席审阅，不要在大小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毛主席視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記录稿，未經本人审閱。）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沒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閒話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辯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辯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

们很狠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視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談話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一、視察沿途講话主要精神

（张春桥同志在河南传达）

一、形势：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指革委会），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指河南，湖南已建立筹备小組），共十五个省。爭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北方五个，共二十五个。（实际上二十四个省。因黑龙江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員会，革命委員会不能垮，坚决支持。）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納入軌道。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進一步。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級关系：为什么搞的那么苦？打、罰跪、挂牌、戴高帽不好，这样把团結——批評——团結的原則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縮小打击面，对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最頑固的也要給一碗飯吃。

北京開武装干部会，不只武的要去，文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参加，左派也要去，紅衛兵也要去。紅衛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訓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誅，教也不能誅。

要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说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眞讨论了的。

三、大联合：那条语录：“在工人阶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級专政下

的工人阶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組織。”是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句話沒有被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谈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我）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話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插話：**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級，沒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一种走資派操纵；第二种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种是小集团思潮影响。”**

春桥接着说：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眞正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让工人来左右局势，上海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上海一乱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嗎？”**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不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三結合：主席讲：“上海軍、干、群三方面关系比較好。”主要是三方面经常开門整风，这次以军队为主，召集革命群众团体，下次以革命群众为主，如此轮流，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负责召集。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一级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插話：**主席說：干部絕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干部，解放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資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斗那么厉害呀！有些干部坐汽車了，房子住好了，官做大了，工資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脫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当我们问到“5.16”时，春桥同志说：“5.16”是个反革命组织，有三条，一反中央，二反解放军，三反革委会。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一段，讲革委会一段，是主席亲自加的。

二、視察上海时的指示

毛主席到上海視察。在上海，见过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红光滿面，步履尤健，身体非常健康。

我們經历了“一月風暴”和“九月高潮”，这是毛主席親自提出的。

一月革命的经验，**主席总結为：无产阶級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九月份毛主席亲临上海，对工人阶级、红卫兵的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使上海的大联合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徐景贤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上的讲話传达）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現在紅衛兵都当权了，不訓练也很难办，可以開訓练班，这个事情跟紅衛兵讲一讲。他們还很年輕，容易犯錯誤，他們犯錯誤象列宁說的，上帝还是会原諒的，我們犯錯誤就不行了。訓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談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談几次，要用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告訴他們犯了錯誤怎么办。对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

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沒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們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風方法把大多数团結起来，革命就会受損失。**告诉那样爭名爭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爭中央委員，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員，但主席提名叫他当。**主席說：不当中央委員不見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員的不見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員，主席仍提名。把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沒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進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爭，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該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爭会要允许斗爭对象讲話，允许人家答辯，不要不让讲話。**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話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級，現在对干部，同对付地主阶級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許答辯，允許他們讲話，包括陈丕显，曹荻秋。**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視斗爭陈、曹大会，沒戴高帽子，沒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滿意。**主席还說了，为什么不允許他們讲完呢？人家还沒說几句就喊"打倒"，……允許人家把話讲完，然后再反駁，眞理是在我們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則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諜，沒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評說：发通諜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最近主席要我們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經驗来。**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上海高校负责人会议上传达）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爭核心、爭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爭，**主席問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風暴不錯嗎？現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劝他們不要爭了，核心有啥好爭的？核心总是在斗爭中形成的。**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东北三省
代表团时，张春桥同志的讲話传达）

主席在上海看了怎样砸上柴"联司"的电視，上面两次出現"揪军內一小撮"的字样，**主席就指示，提"軍內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主席在上海視察时，除了对工人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外，对学生也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在谈到交大"反到底"时，要他们"无条件实現革命的大联合"。〔"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改引如下：**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学生組織要实現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实現革命的大联合。**"〕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話传达）

毛主席在关鍵时刻指示：

把"团結——批評——团結"改为"团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团結。"

（徐景賢同志九月十九日在党校传达）

三、視察浙江时的指示

毛主席到杭州，只休息了一小时，就召集省军管会负责同志了解浙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被接见的有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等，参加接见的还有杨成武、张春桥、吳法宪等同志。

毛主席对浙江文化大革命情况很了解，接谈了两小时，主席作了很多指示。主席詳细地詢问了舟山文化大革命情况，对军队问題问得很詳细。

南萍同志汇报说："二十军进入杭州前，军党委作过决议：向空五军学习。"

毛主席說："空五軍支左很好嘛！"

陈励耘同志汇报说："空五军党委也作出决议：向二十军学习。"

主席說："大家互相学习。"

主席对南、陈两負責人說："你們要很好地向群众学习，不要架子，放下官架子，什么事情都是群众創造的。"并对吳法宪同志說："飞机不是战士打下来的嗎？"

南萍汇报说："我们还有罰跪、戴高帽等現象。"

主席說："我向来反对这样搞，对待干部不能象对地主一样。我們有个好的傳統：团結——批評——团結，对干部要一分为二。"

主席对南萍說："金華轉得很好嘛！"（据悉毛主席曾于九月十六日视察了金华。）

毛主席对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很滿意，并指示："**这样发展下去，浙江在春节前后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眉目来了。**"

在整个接见中，毛主席精神非常好，神采奕奕，接见开始时，**毛主席**问二十军政委叫什么名字，二十军政委说"姓南"，毛主席就讲了一个唐朝的故事，说明姓南的是怎样来的，毛主席抽香烟，南萍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風趣地說："自力更生，我自己来。"**

（根据二十军首长回忆大意）

四、接見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由省革筹小组杨栋梁同志传达）

九月十七日清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南昌。当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极为英明的最高指示。

随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等。

当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滿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伸出伟大、溫暖的手亲切地和程世清等同志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身普通的布的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这里我们报告同志们一个最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滿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脸上看不见皺紋，白头发很少。我们当时又想多看看

他老人家，又想多听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导，又想多记些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又想多汇报些江西的情况。我们感到浑身充满无限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洞悉一切，高瞻远瞩，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对我们教育最大，感受最深。主席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話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撫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谿、資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黃、崇仁、乐安。”**在谈話中，主席曾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6.29”事件、贛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滿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藹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最高最新的指示。

下边分五个问题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人民群众传达。

（一）毛主席对形势問題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們：“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話，給林彪同志、总理，說江西軍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沒有下結論。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說：“六、七、八月間最紧張，紧張的时候，我就看出問題揭開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張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匯报后教导我們：“撫州的問題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們会这样大胆？他們总要開会研究形势，認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們有利，才这样干。他們对形势估計不正確，我看是。”**

撫州問題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說中国沒有內战，我看这就是內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贛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農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記工分，一天六毛錢。現在農村包圍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話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們：“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們已經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說法，衆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問題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們研究了这个問題沒有？总要給他們时間，来認識和改正錯誤，要批評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有些人犯了錯誤，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們：“不能不教而誅，誅就是杀，誅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罰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立足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現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認識問題。有的把認識問題說成是立場問題，一提到立場問題就上了綱，一輩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場問題就不能变嗎？对大多数人来說立場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縮小，教育面要

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們：“我还是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們爭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頑固下去也可以嘛，我們給他飯吃算了。”当主席問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錯誤的干部时說：“如果能改，能多爭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們：“開訓练班中央应該開，主要是各省開，不仅軍队開，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訓。訓比不訓好，时間頂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黃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訓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黃埔嘛。有些軍事学校，学的时間越長，学得越糊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去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們：“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錯誤。”

主席还教导我們：“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們是省一級的，省級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問題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們：“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訓练。他們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訓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們：“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傾时，主席教导我們：“是教育左派的問題，不是右傾的問題。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贛苏区，湘鄂贛苏区，閩贛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遲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們用一个綱領团結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組織群众政策問題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說“要很好說服，不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噴气式囉，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們說：“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軍队問題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們說：“人武部总是好人多，軍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

“到处抓赵永夫、譚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譚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們說：“你們先把武装部干部訓练一下。我看訓练的办法好，內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內蒙問題的决定，他們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鬧，都不听总理的話，打破家具，会開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訓练了四十天，都轉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訓一下就轉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現在有人挑撥战士反对官長，說你們每月只有六块錢，当官的錢多，还坐汽车。農民是願意当解放軍的，解放軍很光荣，他們每月还有六块錢，家里还有优待，農民是願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撥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們：“江西軍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

火就很大，浙江現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噴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6011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滿意，主席說“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綫战报，有他們三个人的照片，他們三个人都很年青。”

（原稿由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翻印）

五、接見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月十八日来到长沙，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黎源、华国鋒、章伯森三同志，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号召我們迅速实現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說：工人阶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評，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們要正確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毛主席說：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們。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

在汇报到湘潭情况时，毛主席說：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鼻子保皇。要正確对待，至于他們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毛主席教导我們要正確对待干部。毛主席說：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們要团結大多数，包括犯錯誤向群众作了檢討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寬了不好。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縮小打击面。進行批判斗爭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不要侮辱。

毛主席教导我們造反派要加强学习。毛主席說：对造反派也要進行教育，現在正是犯錯誤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現在紧張，严肅有余，团結、活潑不足，缺乏民主作風，不平等待人。打人、駡人、拍桌子，把我們的傳統搞乱了，把我們坚持“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搞乱了。

（以上根据黎源、华国鋒、章伯森同志传达）

开始汇报湘潭问题时，毛主席說：这么多工人不能一鼻子保皇，要正確对待，其头头由他們受蒙蔽的群众自己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安江问题时，汇报这些地方农民进城的问题。主席說：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許多農民進城不容易，現在是十五个工分，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两元錢，有的是一百元打一次仗。

谈到內战问題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現在爭人数，认为人多就要以它为核心。主席說：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主席說：搶枪把你們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搶的，有的是发的，政干校就是把枪发給造反派了。主席还說：搶枪不要怕，民兵的枪就有××万条。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武装保护解放军时，主席說：这也是个經驗。

谈到“高司”问題时，主席问到姓万的（指万达），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主席說：等一段。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主席說：解放軍也五不了。（此时原有四不了，現在是五不

了）（主席算了一下，湖南军队两个月沒有拿枪）**主席說：開大会軍队可以武装参加。**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說：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內部有压力。**

主席问湘潭王治国时，华国鋒汇报了王被斗的情况，**主席說：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呢？他身体很不好嘛，軍区錯了影响到軍分区，也影响到县人民武装部。**

谈到公检法问題时，**主席說：好象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它一垮台我就高兴。**

谈到干部问題时：**主席說：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軍分区、人武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主席又說：“……最后要团結大多数，包括犯了錯誤向群众作了檢討的，除极少数的坏人外，打击面太寬了不好。”**

谈到对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說：只要犯过錯誤的？軍队的、党的机关都要訓，要吸收紅衛兵参加。**

谈到红旗军问題时，**主席說：再研究一下嘛，看一下，恢复了再說，世界上的事不要怕。**（张春桥同志插話，红旗军问題，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说服他们和别的组织联合，或参加到别的组织。）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革筹小组，**主席說：十月份都要搞起革筹小組来。**（张春桥同志插話说：江西也成立了临时小组，驻军召开了全省会议）**主席說：開会也是訓练。**

谈到造反派团结时，**主席說：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过去軍队和地方的关系，軍队老是先做自我批評，这样就好了嘛。**（张春桥同志插話说：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話）**主席又說：“两派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我想总是上头有人。对保守的不能压，越压越反抗，蔣介石压我們，我們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共产党，三十万紅軍，后来是自己犯錯誤才有二万五千里長征。”**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說：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候嘛！**（×××插話：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陪同主席接见的有：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

六、視察武汉时的指示

（武汉部队負责人曾思玉、刘丰两同志传达）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在汉视察了两天三夜。主席在湖南视察了一天，坐火车来，也是坐火车走。毛主席巡视了武汉市容，两次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无限关心，劝他老人家下半夜巡视，主席说不行，要白天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主席巡视了市容和街上的大字报，感到很滿意。回住处跟我们谈到深夜二点。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我们在他老人家讲話时不插話，仔细地听，那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啊！在讲話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精神煥发。主席讲了很多党的历史，从党的历史连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題，讲中国历史，外国历史，耐心教育我们。

毛主席在汉接见了武汉部队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方銘、张纯青等四同志，二十三日刘丰同志送主席到郑州返汉，可惜街上大批判专栏被涂坏了，我们很难过。

根据我们回忆，主席讲話精神如下：

（一）武汉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湖北的問題基本解决了。武汉出了一个“七·二

○”事件，好比脓包穿了头，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乱透了就会好的，党内走资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他们被彻底打倒了，他们无权了。**主席說：湖北的問題基本解决了，形势好得很，乱透了就好，好解决問題。主席問我們：湖北第二批建立革委会行不行？形势大好啊！这个机会錯过了，那以后就赶不上。还問我們：今冬明春的工作安排了沒有？明年元月、五月，八月准备搞些什么？**（我们想，“三结合”基本具备了条件，七大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还沒把握。）**主席問：你們看美帝敢不敢打？”主席很乐观地說：“我看不行，它不敢打，它連一个越南也对付不了。南越最初只有九条枪，后来越南把美国搞得騎虎难下。美帝沒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很高兴。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想，还要作艰苦工作，才能由“基本解决”走到“完全解决”，现在离建立革委会还有一段路程。（张春桥同志插話：你们千万不能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矚，想的很远，我们湖北一定紧紧跟上毛主席战略部署。同志们考虑一下，过了国庆节先把工代会搞起来，再结合一两个革命领导干部，十月分建立革筹小组，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爭取在元旦开个会，腊月十五再开个会，春节放三天假，大家好好过个年。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說：对犯錯誤的干部，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要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机会。打击面要縮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議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陈总对軍队問題解决不了，以后陈总又把我接到軍队来。在古田会議上，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評了那些“主义”。以后，又排斥我，說“山上沒有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見，打了敗仗，后来才長征。在遵义会議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即使王明这样对待我，我还是主張选他当中央委員。**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開的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不能取消“八一”。賀龙是个土匪，南昌失敗，实际不会打仗，賀山头指靠苏联，但八一起义还是革命行动。前几次上天安門都是我批的，你們打你們的，我批我的。我这个人曾經五次被人家排斥，后来又要請我回来，南昌失敗后，干部不多了，但都成了骨干。什么叫長征？長征是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長征之后，質量就高了，就是現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場上沒受伤？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錯誤，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的命令一下，他們上战場还是很勇敢的。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主席讲：听說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那样搞会逼上梁山的。独立师一万多人，上街的有二千多人，連人家的家屬也倒霉，这样不好，搞得太兇就会脫离群众。（主席很注意看小报，每个小报都看了。）**主席**对曾思玉同志說，“听說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曾答：“打倒沒有关系”。刘丰说：今天（九月二十八日）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说不翻案就沒有好下場。署名“狂人”。**主席說：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是受蒙蔽的。你們要多請示，刘、邓就不喜欢請示。我們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自己决定，决定錯了怎么办？**

主席还指示：湖化、安徽的干部还沒有站出来，有的不能当省長了，当副省長也可以。紅衛兵小将也可当干部。

（三）要文斗，不要武斗。

主席說，体罰这个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農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紳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現在时代背景不同了，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資本家的姑娘。

現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四）团給——批評——团結。

現在有些人破坏了这个优良傳統，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軍是团結、紧張、严肅、活潑八个大字，現在是紧張、严肅有余，团結、活潑不足。（曾思玉插話：有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說：“你这太急躁了”。又对刘丰說：“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給他潑点冷水。”

主席說：張国燾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問題上是好的。許世友是个和尚，但是員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較的看。要有几个反面教員，沒有反面教員，叫独裁。要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人們。

（五）革命大联合

毛主席說，工人阶級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发覚了。七月十八日主席就在汉指示：“在工人阶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級专政下的工人阶級內都，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組織”。

我们一定要替毛主席爭气。武汉点名的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联合的关鍵在你们，主席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性特别强，纸倒特别好。主席指示我們：“多給他們（注：指造反派）讲些历史。过去苏区里面打內战，无非就是一个馬克思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問題。”主席非常关心武汉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临走时还問我們：“两个月，联不联合得起来？”

曾、刘首长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很好学习中央首长对北京“天派”、“地派”的讲話。中央对革命小将的批评，武汉造反派要引以为戒。“三新”不要驕傲、二司驕傲不得，工总也不要以为人数多，老是驕傲就会犯错误，这一段犯了点小错误，是支流，最大也不过是汉水，不是长江。“五·一六”兵团，我们这里也有，武汉有黑手，中央已经打了招呼。安徽两派联合起来后，黑手就自己揪出来了。七月十六日，主席本来想渡江的，死了那么多人，结果沒渡成。有黑手，要警惕。主席讲：“現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錯誤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山头主义搞得我们犯错误。我们的革命小将不要去管工人的事，坐下来好好学习，写文章，多起促进作用。林总从苏联回来时，对毛主席讲，中国一定比苏联强，因为中国有很多优秀儿女。你们革命组织的勤务员一定要做优秀儿女，不要掉队。

毛主席还指示：干部不要从外地調，可以精簡。接着問張政委：“你們警备区有多少人？”张说：八十多人。毛主席說：“有一十到二十就夠了”。

主席参观市容时，正值“三司革联”开红代会，街上很多宣传车，主席对司机說：“你告訴曾司令員，这不好，我很反感”。我们不要搞经济主义。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沒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办好大字报专栏，坚决抵制小报新闻，扫除一切非宣传品，取消小报买卖。曾刘首长还表示，我们支左，决不支派。又問：干部怎么結合？張体学这个人行不行？他过去做实际工作多。

毛主席的整个谈話长达两个半小时，他老人家红光滿面，神采奕奕，总是乐哈哈的，一点也不覚得累。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为毛主席爭气！

（曾、刘首长传达）

毛主席在汉指示：

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爭，大联合，尽快实現三結合。希望你們成为对党內走資派斗爭的模范；希望你們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們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經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經历看来，眞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头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七、視察河南时的指示

（刘建勋同志传达）

九月二十二日，我和王新同志，纪登奎同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毛主席红光滿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老人家非常关心咱们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向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汇报情况时，他老人家精神煥发，笑容滿面，頻頻点头。

这次随同主席来河南的，有×××，张春桥等同志。

主席一見紀登奎就笑着說：“你是紀登奎？老朋友了！”我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換了四个月的斗爭。”**主席笑着对紀說：“你說一点好处都沒有嗎？”**紀答：“大有好处。”**主席接着說：“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們搞的；我上次路过鄭州，看到了一張大标語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

当我们汇报各地站出来一些革命干部时，**主席說：“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要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主席說：“集訓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情况时，化肥厂主张打，**主席說：“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給八、二四做工作，我贊成你們的意見。”**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打死人时，**主席說：“群众起来議論，不贊成他們，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場了。”“抓軍內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現在已經不那么响了。他們不拥軍，一拥軍就沒有对象了！”**王新说：“主要是从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思想批倒。”**主席說：“对！”**

八、在回京列車上，以“斗私、批修”四个字祝賀铁路工人大联合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八日接見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

这次我们跟随毛主席出去視察，坐了一段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系統的），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人家是保守派。起初我和××同志去做工作，他们说我们“合稀泥”。后来毛主席把三派的代表找来，听他辯论，他们辯论了两个小时。

主席說：“我看你們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該联合嘛！”

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做自我批評。

主席說：“不要尽看别人的缺点錯誤，你就讲你自己的，人家的問題他自己会讲的。人家的缺点应該人家讲，你讲什么？”

这样就沒吵起来。等到他们从主席车廂走出来，还是说对方是“老保”。我就和××同志一直和三派做工作，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135页那一段話，我们说，主席和一个省談話也不过两个小时，和你们却談了两个小时，你们还不联合，回去怎么交帐？结果三派均照主席指示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他们联合起来。当然，也不那么简单，有一派还提条件，可尽是一些鷄毛蒜皮的事，离北京只剩三个小时，经过做工作，也通了。

这样，三派达成了联合的协议，到毛主席那里去报喜。

主席說：“祝賀你們，送你們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么来的。

的确，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不去掉造反派領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就不能实現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即使勉强联合也是不巩固的。

斗私、批修是相互联系的……。

姚文元同志九月二十九日晚接見华东四个铁路分局革命派时传达说：最近铁路工人群众组织，实現了革命大联合，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革命大联合后搞什么？

毛主席讲：斗私，批修。

对林彪同志1967年国庆講話的評語

（一九六七年十月）

这个讲話是很好的讲話，气势磅礴，又沒有夸张，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好的总结。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話

（一九六七年十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話，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

不要调人，二十多个人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呢？人少了，多下去，会也开的短一些，在下面解决问题，少搞些小报。

接見剛果(布)总理努馬扎萊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下午）

努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主席：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沒有看到这些。

主席：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主席：非谦虚不可，否則群众斗他们。

努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主席：沒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沒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罵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沒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沒看到？

主席：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鬧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主席：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主席：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話就行了。×××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主席：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主席：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瑪那次来，沒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关于按系統实現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門、各企业单位，都必須在革命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現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转引自１９６７年10月１８日《人民日报》）

对海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个象章好（指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敬献给毛主席的象章——编者），有海军又有空军，又有这么多群众，我就放心了。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級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转引自１９６７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时所加的“编者按”。）

对《解放軍报》1967年11月9日社論《抓好形势教育》的重要修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在社论的第三段，毛主席特地重新引用了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如下两段話：“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規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

（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爭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５２３页）

在同一段“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句后，毛主席添加了“要经常把运动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及时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能不断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一句。

第四段，在“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后，加了“识破阶级敌人的挑拨煽动”一句。

第六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相结合”后，加了“除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外”一句。

关于党組織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党組織应是无产阶級先進分子所組成，应能領导无产阶級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級敌人進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鋒队組織。

（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关于正確对待犯过錯誤的老造反派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則。

（注：这是毛主席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转摘自中共中央中发（67）367号文件：《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特别指出：“毛主席这个极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指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应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給林彪　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沒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眞理是无数相对眞理的总和，绝对眞理只存在于各

个相对眞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爭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請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有查明证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鋒队组织。

祝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立七周年
給阮友寿主席的賀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兇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爭，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爭，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掙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爭，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举办学习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

× × ×

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期不行，可以训练两期、三期。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

× × ×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 × ×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

对广东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

广东形势大好，省革筹要抓紧关鍵，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带动广西、云南、福建、湖南等地区。因为此国防前线，有三条黑线。

× × ×

主席对派性很有意见，大联合已经号召一年了，现在还讲派性。

文汇报的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主席看过说：“很好”。

（周总理给广州军区负责人溫玉成同志电話传达的主席最新指示）

关于革命委員会等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題，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眞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合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据传达精神）

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爭的繼續

（一九六八年三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剝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爭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爭的继续。

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暉》

革命委員会的三条基本经驗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爭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沒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鎮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爭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蘊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場黑人的斗爭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內，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內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爭，不仅是被剝削、被压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而且是整个被剝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統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爭，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爭，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爭，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統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統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爭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爭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爭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終結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統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爭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終。"我現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爭取解放的斗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爭的一个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

人的斗爭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剝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对派性要进行阶級分析

——几段最新指示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党外有党，党內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评论员文章：
《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五一社论：
《乘胜前进》